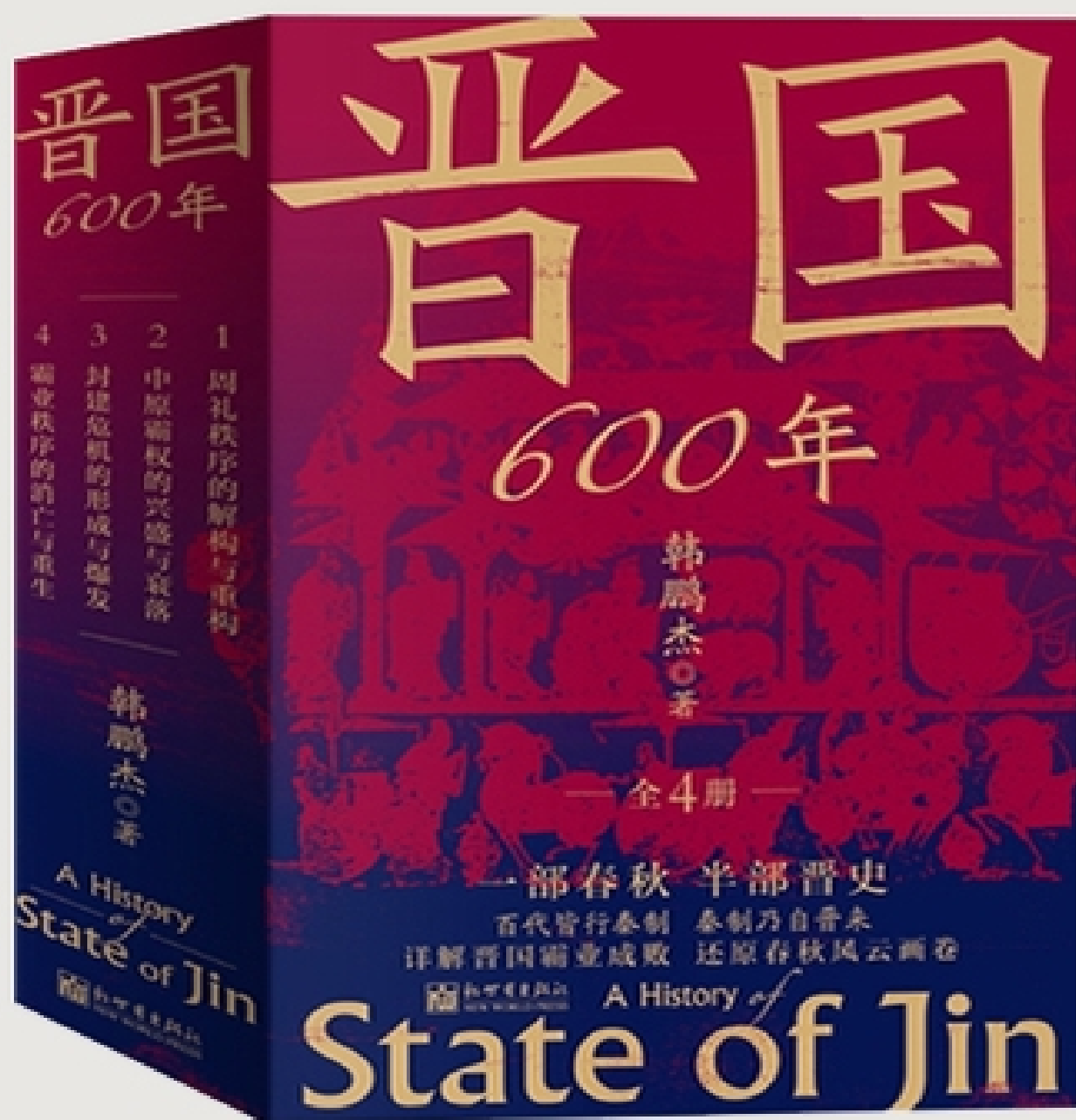


晋国600年

（合集 | 独家首发）



晋国600年

(合集 | 独家首发)





第一章 从桐叶传说到曲沃代翼

第一节 晋国初立

剪桐封弟

每当谈到晋国的开国史，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桐叶封弟”的典故。故事说的是周成王年少时，与他的同母弟叔虞（字子干）一起玩角色扮演游戏。游戏中他削下一片梧桐叶子作为珪——也就是古代举行典礼时所执的玉器——递给叔虞，郑重其事地说道：“我将以此分封于你。”

这本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玩笑，可在一旁陪侍的史官佚闻言却大惊失色，急忙下拜说：“请天子择日分封叔虞！”

小孩子说话没轻没重，但对于封邦建国这种大事的重要性毕竟还是有些认知的。看到史官一本正经地要自己兑现诺言，小成王顿时便慌了神，不住地为自己辩解道：“我不过是跟他开个玩笑罢了！”

史官佚对此却很不以为然，无论天子如何辩解，他都始终坚守原则，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天子无戏言！只要是您说过了，史官就要如实记载，您就要按照相应的礼节完成分封，并且作歌曲来传颂这件事。”

小成王终于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便依从史官佚的劝谏，将河汾以东方圆一百里的唐国故地封给了叔虞。叔虞也正是借此以国号为氏，被称作唐叔虞。这个国家建立十几年后，又将国号改成了晋——于是乎，那个在春秋时代雄霸一时的晋国就这样诞生了，而唐叔虞实际上也就成了晋国的始封之君。

这个故事被记录在《史记》中，但其最初的版本应该是来自于《吕氏春秋》一书。只是与太史公的记载略有不同，原本的叙事场景中，在一旁悉心劝解的可不是什么史官佚，而是摄政当国的周公旦。

至于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角色替换掉，或许是因为在信仰淳朴而真诚的古人心中，素来人品贵重的周公旦大约不会做出这么不合情理的举动。但由于书中的故事实在精彩，令爱惜史料的司马迁不忍丢弃，于是便偷梁换柱，让一个地位不那么尊崇的史官来替周公旦背这个黑锅。

与司马迁心有戚戚焉的还大有人在，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名无须在浩瀚史料中苦心摘选素材的散文大家，柳宗元身上的担子显然要比司马迁轻很多，对待传统史料的态度自然也少了许多顾忌。在漫长而困顿的贬谪生涯中，他曾专门写了一篇叫作《桐叶封弟辨》的文章，以《吕氏春秋》的原始版本作为标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富有童话气质的浪漫故事的不信任态度。

在柳宗元所处的时代，以封邦建国为主体的政治模式早已成为久远的历史记忆，但当时的人们还是可以通过对现实政治体制的体察，轻易地分辨出封邦建国在周代国家政治当中的重要地位。

任免封疆大吏、考察地方长官，无论放在什么样的时代，都应该是一件极其重大且严肃的人事决策。哪怕是在卖官鬻爵盛行的混乱年代，昏聩的君主们也总保有一丝底线，不会轻易地将对王朝命脉、社会运行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高级职位明码标价随意出售的。

在叔虞封唐这件事上，柳宗元就提出了一番见解：如果成王的弟弟的确贤能，适合去做一个国家的君主，那么周公就应该在正式场合、以正当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向天子提出建议，而不是在一个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游戏里，

以一种近乎哄骗的方式趁机促成。若是这个弟弟不堪重用，周公更应该规劝成王，以避免闹剧发生。

故事中的周公显然没有尽到为人臣的本分，反而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变成了事实，将大片的土地和百姓封给了一个未脱稚气的孩子。好在受封的唐叔虞也算是一名贤君，在封国上表现颇为抢眼，一场儿戏才终于没有铸成大错。

然而，这件事终究还是让人感到后怕。试想，假如当时与成王玩耍的不是这个贤能的弟弟，而是一个只知享乐不理政事的纨绔子弟，甚至是宫中的妇人或者太监（妇寺），难道周公也要让成王都分封了不成？

柳宗元同时还对所谓“天子无戏言”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这非但不应该是臣子一定要谨慎奉行的金科玉律，反而是需要极力摒弃的文化糟粕。因为天子也会犯错，也需要臣子的规范和教导。假如天子的言行举止不符合正道，做臣子的对天子的错误非但没有出面规劝，反而是曲意逢迎，甚至巧言辩解，那便是君王背后唯唯诺诺的应声虫，是“小丈夫缺缺者之事”。考虑到周成王是出了名的贤君，周公旦更是人所共知的贤臣，自然不会犯下这种见识浅薄之人才会犯的低级错误。因此综合下来，柳宗元便认为所谓“桐叶封弟”的叙事显然是靠不住的。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言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柳宗元写这篇文章，更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因此尽管言辞犀利、逻辑雄辩，但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用事的成分，是以一个假定全知全能的圣人为模板，去推断哪些事他有可能会做，又有哪些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做。

可问题是，假如周公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圣明，抑或是素来圣明的周公恰好就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做出的任何推断也就都失去了

意义。因此，在更加注重证据链条的史学研究方面，柳宗元的思辨最多也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想要证明“桐叶封弟”的叙事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就必须拿出更多更实在的证据才行。

童话辨伪

史学研究者批驳这个童话叙事的炮火，主要集中在叔虞受封的年龄上。有很多证据表明，唐叔虞受封之时，已经是一名足以独当一面的赫赫功臣了，这样的证据在传世的古典文献和近世出土的青铜器物铭文上都有所体现。比如在《国语》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唐叔虞受封之前，曾在徒林射死一头犀牛，取其皮制作了一副大铠甲。拉开大弓一箭射死一头膘肥体壮的犀牛，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更要有过人的膂力，这显然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办到的事情。

此外，《逸周书》讲武王时期一次盛大的朝会，在介绍完天子的冠冕服饰之后，紧接着便提到了“唐叔”的名号，且名次位于大名鼎鼎的周公和太公望之前。可见早在武王去世前，唐叔虞不仅已经成年，还在武王的班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同样能够提供证据的，还有近世出土的青铜器“晋公盃”与“晋公盘”，其上铭文回顾了晋国先祖叔虞的丰功伟绩，说他“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殽畏百蛮，广司四方”“至于不廷，莫不秉敬”，因而受封为唐公。可见其在武王去世之前，便已经是一名勇猛善战、大杀四方的武将了。

如此一来，当我们依照之前的故事，把年长的叔虞和年幼的成王放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里一棵梧桐树下时候，场面顿时就不那么美好了——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老狐狸在骗小朋友手里的棒棒糖。

也正因为如此，当在历史迷雾中尤感惶惑的人们，得知唐叔虞受封的时候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年，而彼时的成王却还只是一个有赖周公辅政的闲散天子时，难免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唐叔虞与周成王，到底是兄弟关系，还是叔侄关系呢？

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按照我们过去所依赖的史料，无论是《左传》《国语》《史记》这些严肃的历史作品，还是诸子百家那些带有个人倾向的论著，都是建立在前一种结论之上的。比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曾提到：“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左传·昭公元年》更是确切地指出，唐叔虞的母亲正是武王的正妻、太公望吕尚的女儿邑姜。

在这些被人们反复打磨的作品中，无论是晋国人自己的记忆，还是友好邻邦的记载，都为二人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做了注脚。问题产生的根源，恐怕还是因为这些讨论都是建立在“成王年幼”这个假定事实的基础上的，可如果这个预设前提本身就不成立呢？

探究成王即位年龄的依据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从他的父亲武王的年龄出发进行推断。有不少的证据都表明，武王去世的时候已年过半百，甚至还有更精确的考证，认为他是在五十四岁的时候去世的。作为武王的嫡长子，周成王彼时的年龄怕也不小了，哪怕他的父亲因筹谋克商而生育较晚，也不至于到花甲之年了才留下一堆未成年的娃娃驾鹤西去。其次，是现在掌握的很多古籍金文也为此提出了印证，表明在周公辅政期间的许多战事，成王都是参加了的，也就是说其继位的时候未必还是小孩子。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成王年幼的错觉，恐怕多少是受到了诸子百家学说和后世经验的误导。在早期文献记载中，成王常以“冲人”“孺子”“冲子”“小子”自谦，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从而破坏掉原本的故事

结构。尤其是对于不熟悉那段历史的当代人而言，也常常会被帝制时代的经验所误导，想当然地以为只有未成年的国君才需要大臣摄政，既然成王需要周公辅政，那么肯定年纪还小。而战国时期的游士们，他们只在乎学说能否为当政者所采纳，至于所叙述的历史是否真实却并不关心，因此便有意无意地将其理解成了“年幼”之意。尽管如此，战国时期的著作多少还有保留余地，只是说成王年幼；而到了秦汉时期，则进一步被夸张成了“成王初立，未离襁褓”，这恐怕是完全出于政治目的的曲解了。

打破固有认知，还原历史真相，是一项繁复而艰巨的工程。在没有确实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很难为这场论辩简单地画上休止符，有关成王年龄的真实答案仍然有待进一步考究，这也是我们面对支离破碎的先秦史料时无法避开的窘境。

在众说纷纭的各种论断中，本书更倾向于采信成王和叔虞皆年长的观点。但由此也就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既然成王即位时已经成年，为什么就不能自己理政，还非要周公来予以辅佐呢？既然唐叔虞受封的时候已经功勋卓著，为什么又会出现“桐叶封弟”这样的童话叙事呢？

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周公东征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历经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周武王终于在牧野打败了商纣王，建立了以周朝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在取得天下之后，周武王将东方部族中的豪强集中迁徙到镐京，把他们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加以监视控制，同时也让那些部族的遗民群龙无首，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对于他们的死对头，周武王则给予了极大的宽仁。他并未对商人赶尽杀绝，而是委任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接续商部族的统治。不过，为了防止商人造反，他还是特意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安插在商人的周围，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安排完这一切之后，武王感到很满意，于是就把天下留给儿子驾鹤西去了。然而，就在他死后不久，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出现了。

武王走的时候，成王的政治经验不足，还不足以领导整个国家，于是就有了成王叔父周公旦的摄政。而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周公的摄政似乎不仅仅是担任辅政大臣那么简单，而是要行王命、成王事的。在《韩非子》《荀子》《尸子》等先秦典籍，以及后来的《史记》文本中，都曾出现过周公“履天子之籍”“假为天子七年”“南面倍依以朝诸侯”的字眼，也即在武王去世后，周公旦很有可能就是以天子的身份来统领天下的。

出于儒家“为尊者讳”的传统，这样的提法自来便受到了颇多质疑。不过，若是以先秦时期的政治传统观之，即便周公果真“履天子之籍”，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比如《春秋》起始时所记载的那位鲁隐公，他的真实身份并非鲁国国君，而是和周公旦一样的摄政。只是由于父亲去世的时候，被确立为太子的弟弟允年纪太小，鲁隐公便只好以“国君”的身份暂行摄理国事。而真正的国君则是在他的庇护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只等着有一天长大了，哥哥把国君的位子还给自己。

可事情坏也就坏在“摄政称公”这件事上，毕竟大权到手了，退不退位完全要看个人自觉。假如鲁隐公贪恋权位不肯让位，真正的国君还真就无可奈何。就算你鲁隐公心底无私，也难免会有人在背后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于是乎在他摄政十几年后，一个隐藏的猜疑链莫名其妙地打破了鲁国的宁

静，鲁隐公在大夫家中被暗杀的消息震动了朝野，他的弟弟允，也即后来的鲁桓公，便踩着哥哥的鲜血如愿登上了本就属于自己的国君宝座。

尽管人们对周公旦“假为天子”的提法鲜有认同，但以当时的情境而言，“摄政”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武王尸骨未寒，朝野间便有了传言，说周公旦想要自己坐天下，不准备还政给成王了。

一时间舆论纷纷，众议沸然，最气愤不过的自然就是周公那几个还在监视商人的兄弟了。当然了，他们气恼并不是因为有多爱护关心那个小侄儿，而是说王位若要在武王的兄弟当中传承的话，那也应该是按照长幼顺序来，你周公旦排行第四，凭什么越过兄长继承大统？

流言起于何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有人说是商人武庚乘机造谣，也有人说是因为三监嫉妒，所以才放出谣言——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反了，殷商旧部连同监视他们的管叔、蔡叔一道起兵反叛。

中原发生的叛乱还引发了连锁效应：东方原本与商王朝不对付的淮夷、徐、奄等部族，趁着西周王室无力控制局面纷纷自立；晋南夏朝故地的封国都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北方与商王朝有着或远或近关系的戎狄部族，也都摩拳擦掌，作壁上观；就连宗周国内也不安分，许多与三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开始蠢蠢欲动；西迁的东方豪强更是与武庚眉目传情。

越是到了危急关头，内部的团结就愈加重要。经过短期的动员部署，周王室内部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周公也用他的诚心又或者是许诺打动了国人，在他的带领下，刚刚建立的周王朝又开始了一次烈度不亚于克商战役的东征。

这次东征规模浩大，包括成王、周公、召公以及唐叔虞在内的周朝核心力量，可以说是倾巢出动；战线也拉得足够长，南到淮上，北至梁山，兵锋所指，几乎席卷了当时殷商文化所能波及的整个中原。持续时间也很是漫长，相比克商战役的一日功成，这次战乱历经三年的艰苦斗争才彻底结束。最后的结果是武庚北逃，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霍叔处被贬为庶人，徐、淮等“九夷”部族被相继平灭，与中原战乱遥相呼应的唐国，也在中原战事平息之后被周公所灭。

营建东都

这次战争给周王朝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也给宗周权力核心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按照《尚书大传》的表述，为了尽快稳定人心，彻底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在完成东征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营建成周、封建诸侯和制礼作乐。

按照周人自己的传说，在远古时期他们也算是中原的一个大部族，只是由于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才不得不避居戎狄，因此回归东方沃土大概也是他们心心念念许久的事情了。

而从战略角度考虑，镐京偏处西方，若要统治中原这千里沃野，终究有些鞭长莫及，也亟须在东方建立一个政治中心。早在克商之后，武王便已经确定了“定鼎郊廓”“宅兹中国”的初步方略。只是由于他晚年染疾，计划还未来得及施行便撒手人寰，在伊洛之间营建东都的计划也就被搁置了下来。如今天下初定，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景象，周公在心有余悸的同时，也更加认识到了营建东都的重要性。因此东征的战役刚一结束，这一搁置多年的计划便立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值得一提的是，建设东都的主持者是周公和召公，工程的分配动员则是通过殷商邦国的贵族、运用商朝的行政体系、通过召诰等形式、征集殷商的庶民来完成的。兴建的新邑据说也是由两个城池组成——东城就是成周，西城是洛邑。

周人将殷商的贵族迁到成周，但并不打算破坏他们的传统，而是一再承诺原有的社会结构无须改变，所有的贵族依旧领有原来的采邑和属民。就连成周的守卫任务，也都是由殷商贵族统率的殷八师、殷六师来执行，他们入则守卫王城，出则征伐天下，为周王室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西城的洛邑，后来也称为王城，则是由周人居住，以完成东都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新邑建设完成之后，成王在成周按照商朝的礼仪举行祭祀，通过这个典礼，周人整体接收了殷商的神祇祀典，算是将天命完全从商王那里继承了过来。殷商的贵族都参与了这次盛典，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礼遇，主宾双方其乐融融，一片盛世欢歌之象。

以藩屏周

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还开启了周朝立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封。

周朝初年的这场叛乱，包括殷商遗民、淮夷、夏后氏在内各方势力都有参与，使得周公认识到仅靠自然法和道德规范，很难对这些敌对力量进行有效控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叔伯兄弟、子侄舅甥分封到各地，以分割旧朝的土地和人口，从而将他们化整为零，以从根本上断绝他们复国的可能。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殷商故地。周公特意将商朝故地分割为若干块，其中以商丘为中心的土地，交由殷人微子的后人统治，封为宋国，维系殷商

的祭祀。黄河以北的区域由武王的弟弟康叔徙领，统治殷民七族，封为卫国，以监视宋国。

徐奄故地由齐鲁两国占据，鲁国由周公旦的儿子伯禽所领，统治殷民六族，防范徐奄旧部反扑；齐国封地由原来的吕地（河南宛西，这也是齐国姜姓吕氏的由来）迁徙到营丘，以防范东方部族。蔡叔度的儿子继续接任蔡国的君位，大概也有着同样的使命。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散布在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战略要地，与“蛮夷戎狄”杂处，共同对周边地区进行开发。

有鉴于当时中原各地民族成分复杂，风俗传统不一，周人以少数统治多数，显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因此，在授予各地封君以土地和人民的同时，还给予他们相当的自由度。比如卫国和鲁国，他们所统治的区域内大多都是殷商遗民和奄民旧部，周王在分封的时候，就要求他们要任用当地的贤人和长老，尊重原住民的习惯和传统。

在政治制度上，鲁卫两国都采取“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基本方针——通俗地理解，就是按照殷商的政治制度来约束民众，以周朝的礼法体系来治理国家。旧人旧办法，新人新制度，以使用怀柔的手段逐渐渗透，达到彻底归化原住民的最终目的。就比如鲁国，在祭祀结盟的时候同时存在着亳社和国社两套系统。君主自家人有什么事情就到国社去，当地的贵族和民众有什么事情就到亳社去。

这种面对不同族群所采取的变通的做法，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化对异种文明的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大概也是受此影响。

鲁卫两国所统治的区域大体上还是殷商的核心区域，文明发展的程度较高，统治起来相对也比较容易，可齐国面临的却是另外一种局面。

沿海的原住民族大体上还处于原始部落时期，生活习惯和民风习气与殷商核心区域有很大的区别，治理难度自然也大得多。据说齐国从中原迁往山东的过程中，大军还没到营丘，“莱夷”就已经过来抢地盘了，可见齐人所领到的究竟还是张空头支票，所有的地盘都必须靠自己拿命来换。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齐国在山东建国之后几代人没有睡过安稳觉，一直都在与东夷、徐奄、熊盈之国缠斗，过着朝不保夕的苦日子。以至于开国的五代君主死了都不敢葬在自家的地盘上，还得把灵柩送回宗周去安葬。这也难怪，当鲁国的君主用三年的时间在封地移风易俗的时候，齐国君主去了刚几个月就跑回来复命了——那种地方真是多待一分钟都有丧命的危险啊！

制礼作乐

周公为稳固王朝统治而做出的第三项改革，便是所谓的“制礼作乐”。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叛乱，周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王位继承制度的不完善。

周朝建立之前，各国的继承制度差异很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拿周王室来说，文王的父亲季历历来就有兄长让贤的传说，但若抛开道德的外衣，季历的继位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早期典型的幼子继承制的体现。与宗周相隔万里，被人鄙称为“蛮夷”的楚国，直到春秋时期还保留着幼子继承制的传统。而刚刚失去天命的商王朝，早年采取的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替”交错的制度。到商朝晚年，随着行政效率和各级官员专业性的逐步提高，国家对于君主自身素质的要求降低，才开始出现了父死子替单一继承制

的迹象。也正是因为继承制度的变化，导致商朝王族——如微子、微仲等人——对于核心家族产生不满转而投效周人，这恐怕也是导致商朝败亡的一个内在原因。

周公主政时期，以往的各种继承制度（如兄终弟及制、幼子继承制）的合理性还未深入人心。反而是由于先民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官僚制度的不完善，国家需要有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领导者，使得父死子继的单一制度并不被人们广泛接受。

商周交替之际正是多元继承制度向单一继承制转变的节点，而在制度转变的节点上，新旧制度、新旧观念的冲突总是无可避免。尽管周王室已经开始采用父死子替的制度，维系旧制度存在的土壤依然存在，旧制度的影响力依旧不容忽视。尤其是王朝草创初期，内有功臣贵勋虎视眈眈，外有旧朝遗民伺机而动，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领导者依旧是稳定秩序的首选。这也是成王尽管成年，却依然需要有人辅政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周公摄政实际上是旧传统对于尚不完善的新制度的一个补充，其本意是为了保护新生的王朝不致倾覆。可由于观念的限制，周公摄政的举动还是引发了人们对于旧制度的联想，从而诱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暴乱。

有鉴于此，周公认为有必要对继承制度进行一次颠覆性的改革，在根本上确立父死子替制度的唯一合法性，以打消原先制度中隐含的危机。由此也就诞生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以逐级分封的大小宗体系为枝叶的宗法制度。

在这套严密的制度体系中，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诸侯相对天子而言则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庶工商皆是如此。大宗在选

择继承人的时候往往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嫡长子之外的其余子嗣都要降格分封为低一等次的小宗。由此也就形成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的制度体系。

在此基础上，周公对现有的夏商礼乐体系进行了一番改造，削弱了其“事神致福”的宗教性，建立起一套适用于宗法社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也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

他将周王朝治下的贵族按照宗法秩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贵族享有不同规格的仪典规则，所有人都必须在限定的框架内活动。上至天子列侯，下至黎民百姓，在日常生活、宗教祭祀、政治经济活动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有着明晰的界限。任何人都不得超越，或者刻意降低自身的规格，以使用严格的行为模式限制人们的思想，从而杜绝一切可能的反叛。

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体系并行的，还有以公、侯、伯、子、男构成的五等爵制，以及由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蕃服构成的所谓“畿服”制度，并进一步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华夏意识”和“华夷秩序”。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一整套制度体系将周人治下的部族都统一到了华夏民族的大旗之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民族共同体，这对于华夏文明在艰难的环境下的薪火相传，以及后世大一统观念的形成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唐国古史

绕了半天，总算要说回正题。唐叔虞的受封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的决策。

唐国也即后来晋国所在的区域，一直以来都是原来夏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商朝灭掉夏朝以后，大概只是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尊号，无力对夏朝核心区域实行有效控制，这就给了在晋南的夏后氏、陶唐氏部族很大的自治权。而王朝控制薄弱，就导致了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当地出现了很多“戎狄”民族所建立的方国，比如鬼方。

这也可以想见，商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可能也只是刚刚步入了城邦制国家的阶段，而周边的部族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部落制的社会形态。这种松散的政治结构，也让周人钻了很大的空子，周人在灭商的过程中，也是首先争取到了夏地方国的支持，方才从容地经过晋南一线进入中原与商朝决战。

武王克商之后，夏地依然保留着原有的社会形态，直到武庚与三监发动叛乱，夏地方国中较为强盛的唐国也趁火打劫，让周人吃了不少苦头，这才让周公产生了要整顿夏地政治格局的想法。

提起这个唐国，据说来头还很不小。唐国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他们的祖先是被尊为上古五帝之一的尧帝所在的部落，据说很善于烧造陶器，故而以“陶”来为部落命名，被称为“陶唐氏”。这其中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有人分析，古时尧读作陶，帝尧很可能就是陶唐氏部落的人格化象征。

帝尧之后陶唐氏逐渐衰落，有虞氏兴起，虞舜就取代了帝尧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这时的陶唐氏部族颍（刘）叔安的后裔形成了两个分支，其中的一支，其首领董父善于驯养龙（有可能是鳄鱼），在整个部落联盟中仍旧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被称作是“豢龙氏”。另一支号称“御龙氏”的部族，因为其首领刘累偷学了养龙的手艺，渐渐受到夏后孔甲的重用。但在不久之后，刘累又因为养死了一条龙得罪了孔甲，只好偷偷地带着部族迁到鲁

（河南鲁山县）。之后经过部族之间的兼并整合，御龙氏改头换面以豕韦氏的面目出现，几百年后逐渐北迁回归故地，建立唐国，武王克商时归附周人。

除了唐以外，晋南地区散布的一些大小方国，如陶、刘、董、黎等等，单从国名上看，便与陶唐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整个陶唐氏在夏朝故地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为了能够制约陶唐氏的力量，对夏朝故地进行有效控制，武王灭商前后已经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可还是没能制止唐国参与周朝初年的这场叛乱。

周公灭唐之后，原来的唐国被整体搬迁到杜（西安市长安区东南），放在周王的眼皮子底下看管起来，因此后来又被称作唐杜氏。唐杜氏在周王室仍旧有一定的地位，直到西周后期，唐杜氏子孙杜伯为周宣王所杀，陶唐氏的这一支才最终亡国。后来杜伯的儿子隰叔逃回故地避难，在晋国担任大理一职，成为晋国异姓卿族范氏的始祖。春秋后期，其后裔士匄曾夸耀自己的家族“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便是由此而来。

童话因辨

从以上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唐叔虞受封唐国显然不可能如儿戏一般轻率，而是周公稳定中原局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周公在面临复杂局势系统决策的产物。可在如此宏大的叙事面前，为什么还会出现“桐叶封弟”这样的童话叙事呢？这恐怕要得益于一次美丽的错误。

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张颌在《“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一文中就已经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在他看来，“古代文书都书于简牍，而简牍经常卷舒，文字易于磨损，字迹往往湮漫不清，于是经常出现鱼燕、马为等误读”。再加上书经在传抄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错漏现象出现，使得后人看到的文本常常与其原始版本有异，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在甲骨文、金文的书写当中，“桐”和“唐”的字形太过相近，书写不规范或是简牍磨损都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进而将“唐”误读为“桐”。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张颌认为所谓的“削桐”“剪桐”应当是对“削唐”“剪唐”的误读。“削”“剪”二字都有灭和分割的意思，正因应了上文中周公灭唐而分封叔虞的历史叙事。

此外，王雪樵在《“剪桐”音辨——也谈“桐叶封弟”传说之成》一文中还进一步提到，“桐”和“唐”二字不仅在字形上极为相像，在上古读音上也同样有着某种相似性，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而且在他看来，周秦以前简册繁重，识字的人又少，历史故事往往是通过口耳相传流行下来的，故而“音同比形似造成讹误的可能性似乎要大一些”。

如若二人的分析不错，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剪桐封弟”的故事或许只是个美丽的传说，但这个传说却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极有可能是从被误讹的“剪唐封弟”这四个字演变而来的。人们在甫一听到这几个似是而非的字时，起初或许会有那么几秒感到莫名惊诧，但很快就会脑补出一个完整的画面，进而将错就错、以讹传讹，终于将这四个原本缺乏浪漫色彩的字扩展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我们之所以会对这样的故事喜闻乐见，以至于在不同的场合还是会想起这个典故，或许要得益于那些深藏于我们基因中对美好生活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吧。

当然，这些也都只是猜测。假如开头的那个梗是真实存在的话，那情形也可能会是这样：正当周公不知道让谁去担当此重任的时候，突然叔虞跑过来说天子要给他封地，然后便灵感闪现，认为站在面前的就是绝佳的人选，干脆顺水推舟，这事就这么定了——尽管太史公不愿意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柳宗元也无法面对这样的周公旦，可想象毕竟无法替代事实，谁又敢说周公旦就一定得是个完人呢？

叔虞封唐

周公灭唐的时间应该是在其摄政前期，但由于商周时期断代问题至今依旧无解，我们很难将叔虞受封的具体时间明确下来，只能圈定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后半叶这样一个模糊的范围内，是为晋国历史的上限。

叔虞受封时，周天子举行了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赐给他“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作为治下的百姓，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沽洗之钟”作为授命唐叔虞征伐不臣的象征。

这里的“密须”“阙巩”都是当时的方国，密须地在甘肃灵台，当地人很善于制作战鼓，直到汉代时仍有盛名；而阙巩则是河南巩义西南部的方国，以制作的铠甲质地优良著称。

据后来周景王的回忆，“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是周文王检阅军队时所乘坐的战车和使用的战鼓，“阙巩之甲”是武王克商时所穿戴的铠甲。周天子将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物品赐予叔虞，显然是对他镇守北疆、拱护王室寄予了厚望。

至于“怀姓九宗”究竟何谓，一般来说应该是与赐给鲁、卫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具有同样性质的族群。王国维就认为所谓的“怀姓”是

由“隗姓”伪变而来，“怀姓九宗”实际上就是鬼方的隗姓部族。这些部族是常年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本来就不听王室管教，压根算不上是什么周王的赏赐。周王室所谓的“授土授民”只是为了体现天子权威而必须履行的手续，真正想要稳固统治这块土地，唐叔虞还必须尽其所能实行“武装殖民”。

也正因为如此，周天子对唐叔虞的叮嘱和对鲁卫的嘱托是一样的，都是要采取怀柔与武力并举的大政方针。

具体来说，就是考虑到唐地的特殊情况，夏人和戎狄混杂，让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个政策比鲁卫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还要宽松，不仅要按照夏朝的政治制度来统治人民，还要以“戎狄”的风俗习惯来治理国家。唐叔虞乃至后来晋国的历代国君，对于国内的原住民族的政策始终是比较宽松的。这种对于周边部族的宽松和解态度，成了晋国与周边“戎狄”相处的基本方针，一直延续到了春秋中后期。

尽管我们无法知晓其中的“夏政”和“戎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和法律制度，但可以确证的是，晋国沿袭了夏朝时的历法，这与“启以商政”的鲁、宋等国所采用的“殷正”，以及周王室采用的“周正”是有区别的。

这三种不同的历法都采用十二地支作为各个月份的标记，以冬至日所在的月相周期作为建子之月，此后如无闰月，便依次是建丑之月、建寅之月……建亥之月。不同的是：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这与现行的农历大体相似；殷历则提前一月，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周历在殷历的基础上再提前一月，以建子之月也即冬至日所在的月相周期为正月。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春秋》及《左传》，是以鲁国为主体编写的史书，但其记述事件时又多是以周历为依据的，因此相应的春季也就是从冬至月开始计算。如果对比今天西方国家使用的天文四季就会发现，周历的四季与天文四季完全错开了，其春季刚好是寒冬腊月大雪封山的时候，秋季又恰好是酷暑难耐的炎热季节。

晋国身处“戎狄”环伺的环境之中，难免就会与原住民进行融合，从而沾染不少“戎狄”的习气。比如唐叔虞死后，原来的唐国也一分为二，他的嫡子燹改唐为晋，继承其衣钵继续发展，而另一个儿子则另立炉灶建立贾国。这种现象被称作“耦国”，据推测这也是因为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特殊现象。在草原文化的传统中，未继承王位的成年王子都会分领人众外移立帐，即便是一般贵族家庭，成年的儿子也会分产外住。当然，受到戎狄文化影响的并不仅有晋国，当时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恐怕也多少受到了游牧部族文化的影响。

与融合相伴的，还有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建国之初的晋国基本上就处于戎狄包围圈当中，这些游牧民族不论是战是和，总会不时地在唐都城外晃悠，冲着他们秀肌肉、露獠牙，斗争形势和姜姓的齐国不相上下，想必唐叔虞每日也睡得不会太安稳。

晋地局势如此复杂，“戎狄”就在家门口时时挑衅，一旦遇到什么事，远在宗周的天子亲戚压根指望不上，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尽管唐叔虞有克商灭唐的征战之功，有“射兕于徒林”的神功护体，可在对方没日没夜的侵扰下，也终究会感到左支右绌难以应对。看到如今的情景，不知唐叔虞在寂寞的夜里，会不会想起那个“剪桐封弟”的故事——早知今日如此艰难，又何必当初要跟成王开那样一个玩笑呢？

改唐为晋

有关晋国建立的传说，《左传》中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

故事的讲述者是郑国的贤臣子产，他在回答叔向的提问时说道，当初武王的夫人邑姜十月怀胎时，梦到天帝对自己说：“我为你的儿子起名叫虞，并将唐国赏赐给他，以后他就将在那块土地上生活，在主神参宿的保护下繁衍生息。”

等邑姜生出了儿子，果然就见他手心上写了一个“虞”字，于是他们便按照天帝的旨意给孩子起了名字，并在他长大以后将其封到了唐国。

古代帝王将相的出世常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征兆，长期浸淫于神秘主义思潮中的古人对此不仅不会深究，有时反而还会因得闻“天命所归”的信号感到欣喜异常。不过，这种颇有怪力乱神气质的叙事显然无法说服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现代人。以我们当代的视角来看，唐叔虞之所以受封唐地，并且能够青史留名，恐怕更多还得依靠其安邦定国的武力，和在封地上真抓实干的奋斗精神。

唐叔虞就封之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国防，把唐国这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到他死后，他的儿子燮父（单名一个“燮”字，父是尊称）继承衣钵，并改国号为晋，从此便开始了晋国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

至于说晋侯燮父为什么要更改国号，其中的真实原因早已无从得知了。过去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提法，认为燮父改唐为晋的原因，当与唐叔虞在位时所获得的一株“嘉禾”有关。

据《尚书》《史记》等文献记载，这株嘉禾有着“异母同颖”的奇特性状，也就是一颗穗子长在了两株庄稼的茎秆上。唐叔虞认为这是“天下和同

之象”，是一个大大的祥瑞，于是急忙千里疾行，将其献给了坐镇宗周的成王。

成王拿到“嘉禾”倍感欣慰，不由得诗兴大发，作《归禾》（《史记》作《馈禾》）一首以表圣心，随后还派人快马加鞭，送给了正在辅政治乱的周公，让他与天子一同体会这其中的喜悦之情。周公得到天子赏赐，更是喜不自禁，便也即兴赋诗，作《嘉禾》一首以表内心的狂喜和对天子的崇高敬意。

如此一来，这么一株原本只是碰巧长坏了的禾苗，竟然历经辗转成了周朝上层人物眼中的吉祥物，并最终以光辉的形象载入史册，作为一株植物，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此时的周王朝刚刚平定天下，内有板荡之局，外有不臣之邦，这株嘉禾的出现也算是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看来天命终归还是在周啊！因为这株嘉禾的出现，成王高兴了许久，等转头再看时，发现自己的弟弟叔虞已经去世了。鉴于嘉奖叔虞对于稳定天下人心做出的突出贡献，成王便对其子燮说：你父亲有晋献嘉禾的功劳，以后你就改国号为晋吧！

当然了，但凡是带有主观色彩的猜度，多数都会有它的对立面。另一种说法认为“异母同颖”说明流年不利、庄稼减产，乃是凶兆。假如天子和周公都没有往祥瑞的方向理解，唐叔虞的晋献岂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还真不是这样。前文曾经提到，按照坊间流传的某种说法，周公旦名义上虽只是摄政，但却是以天子自居的。即便不考虑“摄政称王”的传言，周公因受猜忌而奔楚、成王未遵从周公意愿迁都成周，这些都是史料有载的，

足见这对明君贤臣之间并非一团和气。在周公羽翼的护佑下，周成王未见得就能够安之若素，对周公的乾纲独断毫无芥蒂。

在这种微妙的局面下，这株嘉禾的出现，可以说是正逢其时。两株禾苗共享一个果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周公与成王共享天下。假如成王有让周公归政的意愿，便大可以此为媒，向自己的叔父做出暗示——所谓的《归禾》，其真实用意恐怕就在于此吧！

不过话说回来了，沿着“嘉禾”的思路出发，无论选择哪一种说法，都未免主观色彩太过于强烈。以“嘉禾”来解释改唐为晋的缘由，更是牵强附会，难以令人信服。

因此人们更愿意相信，燹父之所以要改唐为晋，是因为他把都城迁到了晋水一带。这里的难点只在于：唐叔虞始封的唐地，以及燹父迁都后的晋地，其地望究竟在何处？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度认为，唐和晋的地望就在如今的太原一带。这种信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汉代学说的影响，比如班固编写的《汉书·地理志》就持此种说法。不过，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可知，西周初年时，现在的太原地区还是戎狄部落盘踞的地方，晋国的势力范围直到春秋末年才扩展至此，这种说法已经很难站得住脚。

在其余各种具有说服力的见解中，人们对晋国早期地望的争论虽有差异，但大都将其定位在如今的临汾市周边地区。而随着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重见天日，争论的范围也日渐缩小，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将燹父迁都后的晋地锁定在如今的曲沃、翼城境内。至于唐叔虞始封的唐地虽至今无解，但距此也不会太远，大抵是在襄汾县的塔尔山周边地区。

除此之外，有关晋国国号的由来，还有一种以字取名的提法。人们对于甲骨文和金文中“晋”字的字形有许多不同的解释，较为广泛的有两种。一种是引申为供奉、进献等含义，从而将其与“晋献嘉禾”的故事联系起来，这种提法已经无须赘述。

另外一种解释，是以两支倒立的箭矢射在了“日”字的靶心之上，将“晋”的含义引申为前进、向上之意，又与唐叔虞“射兕于徒林”的故事结合起来，但在具体的原因上却各有不同。有的人认为，燹父改唐为晋，纯粹是以其积极向上的含义来自我勉励。但也有人认为，是因为燹父在位时期，唐国在戎狄的侵扰之下风雨飘摇，不得不迁都避祸，晋侯燹父为了血洗耻辱，立志要用手中的箭矢射杀敌人。至于这些见解孰是孰非，便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根据史料的记载，晋侯燹父在迁都的过程中，还做了一件为自己争取爵位的事情。据说叔虞受封唐国的时候还只是伯爵爵位，到燹父的时候有些不满足于现状，因此便趁着迁都，给自己盖了一座华丽的宫殿，超出了伯爵所应享有的规制。周康王派人来指责他追求奢靡，可此事最终却不了了之，反而是天子做出了让步，在康王二十八年时，“命唐伯侯于晋”，使得燹父的爵位由伯爵升格为侯爵。

燹父死后，他的儿子晋武侯（名宁族，又作曼期）继位，再之后分别是成侯（名服人）、厉侯（名福，又作辐）、靖侯（名宜臼，又名喜父，前857—前841年在位）、僖侯（又作釐侯，名司徒，前840—前823年在位）、献侯（名籍，又名苏，前822—前812年在位）按着一成不变的规则相继继位，一切也都相安无事。

由于西周时期史料的残缺，这六代国君的生平事迹就如鸿爪雪泥一般，只有一些细碎的片段存留。到下一代晋穆侯费王（弗生，前811—前785年在位）在位期间，将都城迁到了“絳”。穆侯去世半个世纪后的曲沃代翼时期，晋国的都城又改成了“翼”。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者提出，在晋成侯在位时期，晋国还一度迁都到“曲沃”。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唐和晋，晋国从建立到进入春秋初期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出现了五个都城。而这五个都城的具体位置究竟在何处，至今都扑朔迷离。

对于晋国在穆侯时期迁都的原因，据学者分析，可能是因为晋国先前的都城是在一片山地上，交通不太便利。经过长期的经营，晋人逐渐在当地站稳了脚跟，都城的位置就成了一个瓶颈。与此同时，晋穆侯时期戎狄活动猖獗，周宣王多次征讨都失败了，迁都到平原地带可能也是出于保护土地的需要。

晋穆侯死后，晋国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内乱。公元前785年，穆侯的弟弟发动政变，夺取了晋国的君位。四年之后，也即公元前781年，穆侯的太子仇带人攻杀了叔父，夺回了政权，即位为晋文侯。这位通过政变短暂获取君位的叔叔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名字，人们只记住了晋文侯给他的谥号“殇叔”。

短暂的内乱虽然没造成什么大的混乱，但却开启了晋国内乱模式的潘多拉魔盒，给后世的政治变革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文侯始兴

骊山烽火

晋文侯是晋国的第十一任君主，在位期间，历史从西周进入了春秋时代，晋国的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王室的内乱，也就是那场戏说中因“烽火戏诸侯”引发的系列灾变。为了搞清楚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有必要回顾一下西周的历史脉络。

西周共有十二任天王，第一任武王克商为周部族赢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第二任成王时期发生了三监以及殷商旧部的叛乱，有了周公的制礼作乐封邦建国，进一步巩固了周王室的统治，这也就是《左传》中所说的“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

中原历经多年战乱，民生凋敝，因此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生产、休养生息。到康王钊后期，周王室的财富达到极点，这就为康昭时期向长江流域攻略提供了坚实基础。正因如此，史家通常都将成王、康王主政的这段时期誉为“成康之治”。

但也是时运不济，周昭王趁国势之盛南征荆楚，谁知却遭到了当地部族的暗算，本欲建功立业的一代天子不幸溺死于汉水之中——这件事情到春秋时还被齐桓公拿来当成伐楚的借口之一。

昭王之死使得刚刚兴盛的周王朝停止了南征的步伐，融合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周王室在经历了短暂的巅峰时刻后，也开始走上了盛极而衰的不归路。从昭王的儿子穆王满开始，周王室尽管在对外战争中仍捷报频传，但过去那种积极扩张的势头早已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

东方的徐奄、西方的犬戎开始兴起。之后到共王、懿王时更加衰弱，戎狄交侵，一度曾迫使周王室迁都犬丘（今陕西兴平）。

懿王的无能给他的叔父孝王辟方叛乱称王提供了机会。孝王因为靠兵变夺权，较为崇尚武力，对戎政策有不少的建树，算是暂时安定了西方。但孝王最大的“功绩”，恐怕还是由于发动政变，给王室威信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中原诸侯对于王室的敬畏之心渐渐减弱。

到他死后，诸侯扶立懿王的儿子夷王燮复位，为了能够重新挽回王室的权威，夷王做了不少的蠢事，最著名的就是因为听信谗言烹杀齐哀公一事。这些作为对挽回王室权威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反而为自己带来了行为暴虐的恶名。

与晋靖侯同期的是西周第十任天王——大名鼎鼎的周厉王。周厉王大概是为了改变戎狄交侵、诸侯不臣的紧张局面，着力增加财政收入，使得周王室出现了短期的兴盛。早年偏处南方的楚国不尊王室，其国君熊渠曾把三个儿子封为王，此时也因为害怕厉王征讨，不得已取消了他们的王号。但与此同时，厉王在经济上所实行的专利政策侵犯了贵族的利益，其后采取的措施更是激起了汹汹民意，结果就引发了“国人暴动”。

这一年是公元前841年，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愤怒的国人将周厉王驱逐到了彘地（今山西霍县），并推举共伯和执政。直到十四年后，厉王去世，太子静才继位为宣王。宣王继位后，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整顿朝政，又任命秦仲为大夫征伐西戎，经过一番努力，王室权威略有提升，出现了所谓“宣王中兴”的大好局面。

不过这个所谓的“中兴”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到宣王的晚年，王师败绩的记录便开始接连出现。比如“三十一年，伐太原戎，不克”；“丧南国

之师，料民于太原”；“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三十九年，宣王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王师败绩”，等等。而另一方面，宣王在处理诸侯事务时也同样昏招迭出：杀掉了杜伯，引发了朝局的动荡；因为私爱立鲁武公的少子，导致鲁国内乱。内政搞得一团糟，对外又经常打败仗，使得“宣王中兴”的局面也如昙花一现，周王室的颓势已经无法挽回了。到第十二任天王周幽王在位时，就连宗周的局势也开始垂危起来。

西周中后期的中原大地正在经历一场小冰期，各地的平均气温和降水量都有所下降。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后果，不仅使得农耕地区自然经济遭受打击，还驱使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不得不向东、向南迁徙，进而对农耕文明构成威胁。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终于酿成了导致西周灭亡的骊山之乱。当时的人们不知晓其中的原委，只是看到了游牧民族的侵袭，以及宗周内部的各种乱象，便将这种局面归罪于天子，认为是周幽王太过昏庸，在虢公石父等奸臣的怂恿下胡作非为，终于惹得天怒人怨，出现了“三川震、岐山崩”的重大灾异。

这场影响深远的大动乱终于在周幽王即位的第九年（前773年）彻底引爆了。申侯因不满申后和太子宜臼被废，一怒之下将自己的外孙宜臼立为天王。周幽王听闻勃然大怒，于是便兴兵伐申，谁知申侯竟然联络了缯国和犬戎与王室对抗。战争打了三年之久，到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俘虏了褒姒并杀死太子伯服，幽王自己也被追兵杀死在骊山。辅助幽王实行改革的虢公石父大概在这场战争中也死掉了，继位的虢公翰临阵扶持了宣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携王（《清华简·系年》作携惠王、惠王），与申侯所保护的周平王形成二王对峙的态势。

幽王一死，天下震动。东方诸侯，如晋国、卫国、许国、周朝大夫王子友、秦仲等，都纷纷前来勤王。但幽王死后的宗周局势，显然不能与厉王出

奔时的局面相提并论了，镐京附近的戎狄势力犬牙交错，而失去了组织的诸侯也如同一盘散沙，根本无法廓清局面。随着时间的流转，勤王攘夷的紧迫感已退至其次，人们注意力的焦点反而转向了王位的合法性争夺上来。

这个时候如果对周朝的二王进行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携王余臣为王室正统，是在幽王死后名正言顺继位的，很容易就获得了东方诸侯如虢、晋、卫等国的支持。而周平王却正好相反，他既得位不正，又有联合戎狄弑君杀父的罪行，这是为中原诸侯所不齿的，很难在道义上占据主动。

但老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平王虽然处于劣势，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此后的十几年间，还真就把局面给扳回来了。

平王东迁

东周初年这场二王相争的局面持续了约二十年的时间，这既是一次对耐力的试炼，同时也是一场比拼底线的游戏。

对于勤王的诸侯来说，当战争初期的紧张感一扫而空，他们的心态难免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尤其是看着战事日渐胶着，这些原本急公好义的“勤王之师”，很快就变成了在乱中取栗、待价而沽的投机客。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平王和携王而言，能够一再突破底线，以更诱人的条件笼络到更多支持者，才往往会成为制胜的关键。

在这方面，携王的王室正统地位反而是一种羁绊。作为王室正统天子，他自然不愿意低下头来跟这些草台班子们谈生意，反而是那个本来就得位不正的平王，却完全没有天子职责带来的思想负担。

他手里没有任何可供傲娇的资源，没有以正统身份号令诸侯的威信，更没有众多豪强无条件的服从，反而是有勾连戎狄、搅乱宗周、擅自称王、弑

君杀父.....这些足以让自己身败名裂的罪名。起手拿到这么一副牌，若是旁人恐怕早就放弃了，可偏偏不服输的周平王即便是处于劣势也甘愿放手一搏。

在他看来，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公卿大夫、东方诸侯，虽然都道貌岸然地打着维护王室正统的旗号对自己口诛笔伐，可只要他们心中还有欲望，就都是可以收买的。若是能用一些空头支票换来王位的永固，又何乐而不为呢？

平王背后的申侯也深谙此中况味，早早地就开始着手拉拢那些具有影响力的诸侯了。为了拉拢王子友，也即郑国开国之君郑桓公，申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晋文侯的妻子叫晋姜，也是姜姓女子，过去人们都认为她是齐国宗女，可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局势，这个晋姜很有可能也是申侯家的女儿。

但要正名实在不易，毕竟骊山烽火的消息早已为天下诸侯所共知。平王没有清除人们记忆的魔力，更没有办法堵住万民之口，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便是为这十恶不赦的罪名寻找一个替罪羊，为悠悠众生心中的怒火寻找一个宣泄的对象——如此重大的“责任”，显然是非申侯不能担当。

可如此一来，便又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把申侯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以后在宗周也就失去了最大的屏障，那他将来又该如何自处呢？

寻找避难之所并非什么难事，平王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因为早在二百多年前，苦心支撑社稷的周公就为他提供了备选的场所——东都洛邑。最终的目标一旦确立，就需要对具体的实施过程进行细化。天子迁都牵涉甚广，并不是寻常人家搬家那么简单，摆在平王面前的有诸多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东都的归属问题。

在《史记》的记载中，郑桓公是一个为王室殉道的悲剧英雄，但《竹书纪年》的出土，却无情地毁掉了郑桓公的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发国难财的窃国大盗。

郑桓公是王室近亲，据说是周厉王又或者是宣王的儿子，在幽王时期担任王室司徒。任职期间，他看到王室衰败的景象，便向太史伯询问自保的办法。太史伯为其指点迷津，从而确立了在东方建国的基本方针。

公元前774年，也就是申侯举兵的前一年，他请王命到东都任职，并带了一部分家眷财产东行。第二年，郑桓公以暂时安置家人和财产为由，贿赂虢、郃两国国君借地寄孥。虢、郃两国的国君收了钱财，欣然应允，让他把家人财产寄存在两国十个城邑中。

到幽王死难两年后（前769年），郑桓公使用借刀杀人之计，离间虢、郃两国君臣，致使两国的战将被君主屠戮。之后他带了成周的驻军，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轻而易举地攻陷了虢、郃两国，将两国土地据为己有。

当周平王为了东迁的事业而逡巡东顾的时候，郑桓公也正伸着脑袋打探西方的消息。因为此时的郑桓公虽然已经占据土地并建国，可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王室的承认。也就是说，此时的郑国并不是一个合法的国家，亟须得到合法的授权。

但有着王室正统身份的携王，对于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显然是不认可的，这自然就让平王抓住了机会。周平王抢先承认了郑国的合法地位，并任命郑国国君为王室卿士，使得非法建国的郑国迅速转向支持非法称王的周平王为王室正统，为东迁洛邑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周平王在后方也找到了一个极佳的人选：秦国的开国之君秦襄公。秦襄公名赵开，其祖先原本是商朝旧臣，武王克商时，其先祖有一个叫蜚廉的人一直都效忠于商朝，为纣王联络北方的部族抵抗周人的进攻。纣王死后，周武王成为天下共主，蜚廉只能投降周朝。后来三监之乱兴起，四方诸侯纷纷为乱，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又试图联络淮夷各部举兵反周，结果反叛失败被周公镇压。也正是因为如此，嬴姓宗族在周朝早期一直不受重用。

到周穆王时期，因同宗族的造父有功于王室，被分封到赵城为诸侯，秦国的先祖非子便也开始以赵为氏。后来非子也受宠于周孝王，被封在秦地成为王室的附庸。

到周宣王时，出于抗击西戎侵扰的需要，秦仲被拔擢为大夫，为王室抵御戎狄。在这场战争中，秦仲战死，周宣王召集了包括秦襄公的父亲秦庄公赵其在内的五个兄弟，给了他们七千士卒继续抵御西戎。

骊山之乱后，秦襄公一直统御其部族在宗周以西抗击戎狄，势力渐渐发展壮大，进而产生了侵吞已然残破的宗周故土的念头。而恰好周平王也想以秦人的力量护送自己离开宗周，就干脆将这些已经无力收复的岐丰之地全部许给秦襄公，并册封其为诸侯，从而建立了秦国。

秦襄公虽然知道这只是张充满了凶险的空头支票，但是为了获得诸侯的地位，实现他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还是没能经得住诱惑，成了平王东迁的马前卒。

有了郑国和秦国的扈从和支持，周平王的东迁事业便已经遥遥在望了。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迁的道路漫长而艰险，尤其是此行的必经之地崤

山通道，此时正掌控在携王的手中，周平王又该如何克服这最为凶险的一环，得以顺利东迁呢？

文侯之命

历史深处迷雾重重，有关携王的生平事迹已经无从考证，其称王之后究竟驻跸何处，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依靠历史的碎片管窥全局，我们似乎可以将携王的统治区域圈定在如今的陕西大荔一带，也就是崤山通道的西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断，一个主要的依据，是在如今晋陕豫三省的交界处有许多诸如王城、王官、灵台之类的地名，默默地诉说着这片土地一段深沉的往事。

即便不考虑携王驻地的因素，打通崤函通道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节点，那便是携王的忠实拥护者——虢公翰。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虢国都在王室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史料文献严重匮乏的西周时代，曾先后有虢城公、虢宣公、虢厉公、虢公石父等多位国君名留史册。虢公石父随周幽王战死后，又有虢公翰奉王室正统，立王子余臣为携王——而虢公翰的大本营，恰好就位于崤函通道的东端，如今的山西平陆至河南三门峡一带——这必将成为平王东迁路上最大的阻力。

虢公翰在携王班底中地位尊贵，这就使得他很难像郑桓公、秦襄公那样被轻易地收买。但虢公翰油盐不进，并不代表周平王就无计可施，想要打通这最后的一环，还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个人便是晋国如今的大当家——晋文侯。

晋国的本土位于今山西省翼城县周边，在黄河以西本来并无影响力。不过由于距离适当，当王室发生祸乱的时候，当时的国君晋文侯第一时间从中

嗅到了机会，并迅速组织军队赶到河西勤王。正是在这一轮的勤王行动中，晋文侯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个足以左右天下局势的区域性强权。

然而，晋文侯与携王的相处似乎并不愉快。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依旧无从得知。但从百年后晋国势力范围突然扩展到河西并深入骊山打击骊戎的举动来看，周平王显然抛出了足够诱人的条件，使得晋文侯很快就背弃了携王，转而投入了平王的阵营，为平王东迁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公元前750年是晋文侯纪元的第三十一年，也是骊山烽火之后，以周平王纪元的第二十一年。晋文侯冒天下之大不韪，攻杀了其原本支持的携惠王，并亲自到少鄂迎接平王，护送其穿过崤山谷地东迁洛邑。至此，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动荡局面，终于在一群野心家的全面反叛中宣告结束，周平王也如愿以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共主。

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包括晋文侯在内的众多诸侯，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然而在成王败寇的话语体系下，薄情寡义、背弃礼法的行径，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骂名，反而让他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名利双收。

东迁之事落定之后，为了对晋文侯的支持表达谢意，周平王曾赐予他美酒、弓箭、车马这些象征着代天子征伐不臣的器物，并特意作了一篇《文侯之命》传诰诸侯，以表彰其辅助王室的丰功伟绩。

在这篇文诰中，周平王自称“予小子”，将晋文侯尊称为“父义和”——这其中的“父”与郑桓公之名“王子多父”中的“父”同意，都是对人的尊称，“义和”则是晋文侯的字。

文诰开篇追述了文王、武王以来历代先王的盛德与功业：“伟大的先君文王、武王，他们克慎明德，圣德上达于天，美名广布于世，受到了上帝的

垂青，因而能够上承天命、下抚黎民。历代先王有贤明的卿大夫悉心辅佐，在谋求善政的时候无不遵从天道，所以能够长久地居于天子之位。”

但是，“到我这个年轻人即位的时候，受到了上天的责罚，导致国用匮乏、民不聊生，家国也因受到异族侵略而陷入混乱。再加上我身边缺乏老成持重的御事公卿，无法破解眼前的危局，故而也只能向先祖祈求，并呼吁各位叔伯前来为王室分忧，好让我能够安稳地居于天子之位。”

在万般危急的关头，“是您继承先祖唐叔的遗风，遵从文王武王的法度，大义会合诸侯来追怀效法先王，在最困难的时候对我施以援手，让我能够保住王位，我怎能不对您予以嘉奖呢？”

在文诰的最后，周平王列举了他赏赐给文侯的器物，包含“柎一鬯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这种做法跟我们当代给人颁发奖状的时候，总喜欢把奖金金额和奖品都写上是一个道理。这些不仅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天子授权晋国礼乐征伐的象征，因此平王还特意嘱咐文侯回国后要勤于政事，做到内安百姓、外抚远人，安定国家、成就大业。

所谓“最爱你的人也伤害你最深”，平王此时大概就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晋文侯有定鼎王室的功劳不假，但从王室获取的利益却也是最多的，对王室权威的损害更是最为彻底。

由于在这次的勤王行动中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晋国的疆域从原来的绛都周围区区百里之地，沿着汾河谷地向西南方向延伸，一直扩展到黄河以西如今陕西大荔境内。后来引发秦晋冲突的河外列城，包括前文提到的王城、王官等地，似乎也都随着携王的被杀而成了晋文侯的囊中之物。这些收益使得晋国摆脱了诸侯“地方百里”的限制，一跃成为一个远超西周礼法约定规模的超级大国。

不仅如此，因为有了周王的授权，晋文侯还打着“以王命讨不臣”的旗号四处征伐，原先位于汾河流域的一些诸侯如先、沈、姒、蓐、黄、韩等国，据说都是在晋文侯时期并入晋国版图的。与此同时，晋文侯似乎还开启了霸业秩序的先河，最远曾经征服过南方的淮夷。

这些有利于晋国的功业，对于遭遇劫难的王室来说，无异于是在落井下石。至少晋文侯的大规模扩张，给东方诸侯起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示范作用。再加上周平王的地位是靠着大量的利益交换获得的，使得西周王室赖以生存的礼制秩序瞬间崩塌。原本受王室挟制的东方诸侯对于平王地位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从此不再朝见天王，更不受王室的约束。摆脱了王室压榨和束缚的东方诸侯，开始了互相之间的攻伐和兼并，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一批突破了礼法约束的超级大国，如齐、鲁、宋、卫、陈、蔡、郑等国也都有样学样，在灭掉了周围的邻邦之后称霸一方，轰轰烈烈的春秋时代正式开启。

第三节 曲沃代翼

晋乱肇始

公元前746年，是骊山之乱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平王东迁的尘埃刚刚落定，整个中原还处于一片沉寂之中，一股不安分的气息便已经开始在空气中弥漫。在这个暴风骤雨即将来临的前夜，中原诸侯都在静静地扩充实力，准备酝酿一场伴随着礼崩乐坏的历史剧变。

也就在这一年里，引领晋国走上崛起之路的晋文侯溘然辞世。这让所有人都感到猝不及防，惨淡而哀伤的气氛弥漫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城邑。

然而，沉浸在悲伤忧愁中的人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也正在等待着他们。这场危机将会给他们带来无休止的战火和杀戮，将这个已经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国家拖入深重的灾难之中，最终在成河的鲜血和累累的白骨上改天换地。

掀起这场暴风骤雨的是一位名叫成师的公子，他是先君穆侯的少子、文侯的弟弟，现任新君昭侯伯的叔父。

提起文侯和他的这个弟弟，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往事。据说这兄弟二人都是伴随着战火而降生的，六十年前（前805年），他们的父亲穆侯跟随周宣王讨伐晋国西南活动的条戎和奔戎，结果大败而归。文侯就是降生于这样的一个时节，为了铭记战败的屈辱，父亲给这个孩子取名为“仇”。不久后，穆侯再次征伐位于晋国以北的干亩之戎取得大捷，于是兴之所至，为这年刚出生的儿子命名为“成师”。

似乎早就有人预言了成师将会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这个人是穆侯的宫廷乐师，名叫师服。师服听说了两个公子的名字之后直摇头：“取名是为了赋予意义，通过寓意来产生礼仪，并进一步规范政事、端正民众。所以政事没有失误，老百姓就会听从，相反就会诱发祸乱。”

也就是说，起名字是一件极其庄重的事情，一定要慎重，特别是国君的公子，他的名字承载的可是家国兴衰之先兆。“如今国君给太子取名叫作仇，俗话说‘嘉耦曰妃、怨耦为仇’，这个名字也太不吉利了；而公子成师的名字却显得富贵，这是混乱的预兆，恐怕他以后会篡权夺位的啊！”

穆侯并没有听从师服的劝诫，果然在他死后，太子仇没有顺利继位，而是被自己的叔父抢去了君位，算是部分应验了师服的话。直到四年后，太子仇才纠集了一批支持者杀入翼城，夺回了君位。

手足相残带来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而随后发生的王室内乱更让他们心有余悸。可不管怎么说，文侯还是很倚重自己的弟弟，毕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亲兄弟才是最靠得住的。

文侯在位的三十五年间，成师跟着他也算是饱受了战火的洗礼和权力的历练。此时年过半百的成师，已经成为一名多谋善断的老政治家了。而成师的侄儿、新继位的昭侯伯，在他眼里还只是一只在温室中驯养的雏鸟，又有什么资格统领这么一个强盛的国家呢？

文侯去世后不久，成师便拥兵自重，与翼城的侄儿分庭抗礼。那个被看作是雏鸟的新君哪里是成师的对手？最后只得忍痛割爱，将其分封到离翼城不远的曲沃去，并委派晋靖侯的庶孙栾宾（成师祖辈的一个公族）来辅佐他。

乱在曲沃

在这场较量当中，成师之所以选择曲沃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首先，曲沃是一座军事重镇，其城池规模比翼都要大不少，且距离翼都也不过一两天的路程，朝中有任何风吹草动他都能及时掌控。另外，曲沃的地理位置在翼都的西南方向，只要控制了曲沃，向西可以阻挡翼都与西部封土比如故韩国的联系，向南则可以掐断汾河下游一直到黄河以西领土的纽带。这就相当于说，晋文侯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打下来的疆土，全都拱手让给了成师，而公室的土地就只剩下了西周时期的传统疆域，这必然会造成曲沃与翼都方面力量的失衡。

关于这一点，那个五十多年前的预言家师服再次不失时机地张开了乌鸦嘴，他引用周朝的等级秩序说道：“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在周朝的制度里，只有天子才能建立邦国，诸侯只能“立家”，而昭侯分封曲沃的本质，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封建大夫不同，是要建立一个名叫“曲沃”的独立国家。

依照周王朝给晋国制定的大政方针，晋国可以“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一直以来都有建立“藕国”的传统。师服在这里拿出周朝的制度，其本意并不是说你建立“藕国”不对，而是在强调“皆有等衰”这四个字。只有当你封建的大夫或者“藕国”比你弱小，才能让对方“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可现在呢？你把曲沃分封给成师，显然是违背了这样的一个宗旨，明摆着是要让曲沃“觊觎”你大宗的地位啊！

昭侯其实也知晓其中的利害，可又能怎么样呢？父亲刚刚去世，自己的亲叔叔就开始拥兵造反了，你不答应也不行啊！而且据史书记载，成师还是一个“好德”的人，很会笼络人心，在贵族中拥有崇高的声望，以至于“晋国之众皆附焉”。朝野上下都是他的人，人人都在给他说好话，在这个还有些贵族民主制色彩的时代里，昭侯也不能把满朝的大夫都给得罪了。因而在内外的强压之下，他也只能忍气吞声，将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城池曲沃封给自己的野心家叔父。

看到无法阻止变乱的发生，师服也只能喟叹：“晋之乱其在曲沃矣！”

出师未捷

野心家成师获得封地之后，马上就开始了窃取晋国君位的各项活动。不少人都对成师在曲沃的部署做了总结，其大政方针涵盖了政治瓦解、外交孤立、经济蚕食，外加军事打击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多位一体，全面架空翼城方面的君主权。

政治上，成师充分运用了自己“好德”的优势，极力拉拢敌方阵营中意志薄弱的对象为己用。这些被拉拢的对象在和平时可以收集情报，作战时可以充作内应，以保证进行军事打击时有更大的胜率。

外交上，同样采用互通有无的手段，他越过翼城的君主，与周边的国家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分离与敌方阵营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建立外部的攻守同盟。能够直接拉拢到自己阵营的要拉拢，不能拉拢的就尽量劝服他们保持中立态势。

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给予农业、手工业生产者更多的优惠措施，吸引附属在对方土地上的劳动者来自己的土地上耕种。《诗经》中就有

关于翼侯治下的平民或是奴隶满心欢喜地逃亡到曲沃的段落，表明这些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最后，军事打击。经过了六年的细致筹划，到公元前739年，野心家成师完成了他的统一战线，于是便唆使在翼城的支持者潘父杀掉晋昭侯。弑君行动成功后，成师迅疾带兵前往翼城，准备趁机夺取君位，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然而现实有时是残酷的。大军还在行进的路上，城内就发生了哗变。翼城的贵族们虽然很“认可”成师的“为人”，但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他们还是集结了大量军队，捕杀了潘父及其党羽，并列兵在城外阻击成师，使其代翼成为大宗的梦想瞬间破灭。

机关算尽结果无功而返，成师损失惨重。这次行动使得多年来秘而不宣的矛盾公开化了，也使得那些平日里与曲沃方面暗通款曲的贵族们也开始举棋不定，不得不为以后的前途做出选择。很多原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跟他划清了界限，导致这六年来的运作功亏一篑，也为以后的代翼功成增添了不少难度。

当然了，最为无辜的恐怕还是那位继位仅仅六年的翼侯伯，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晋国内乱中的第一个牺牲品，也成了历史进入春秋以来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他的一生无功无过，即便是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没有机会实现了。然而逝者无言，生者总还要把局面维持下去，晋人扶立他的儿子公子平为君，也即晋孝侯。

第一次代翼战争失败后，成师继续厚着脸皮四处给翼城方面挖墙脚，又活动了七年的时间。不过，他终究还是没有等到代翼成功的那一天，到公元前732年，壮志未酬的野心家成师在曲沃城的黄昏中带着终生的遗憾离世了。

他用十三年的时间筹谋策划、精心酝酿，尽管杀掉了晋昭侯，却终究还是没能入主翼城。垂暮之际，他只好把这个梦想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希望他能够代替自己实现这个未竟的心愿。

功败垂成

成师去世后，谥号为“曲沃桓叔”。他的儿子鲜（又作鱄）——也即曲沃庄伯——继承其遗志成了曲沃的新任伯主。曲沃庄伯在位期间，又发动了两次代翼战争，可每当胜利在望的时候，却总是会被来自外部的力量所干预，最终功败垂成。

春秋早期，由于周平王自身破坏礼仪纲常，中原诸侯离心离德，天子无法约束征召诸侯，反而处处受到诸侯的牵制，其所肩负的征伐蛮夷的职责自然也无法开展。先前晋文侯在位时，代替周王行征伐之事，还能稍微约束周边的“戎狄”。可文侯死后才几年，晋国就陷入了内乱，翼城和曲沃都只忙于内斗而无暇他顾，自然也就给了这些游牧部族更大的生存空间。

在所谓的“戎狄”当中，对晋国影响最大的是活跃于晋国东部山区的“赤狄”。“赤狄”部落不断骚扰，最严重的时候竟然打到了国都郊外，这对翼城方面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曲沃方面则一心投入生产、训练武装，似乎没有受到“赤狄”太大的侵扰。经过七年的准备，终于在公元前725年十月再次向翼城发难。

这次的行动，曲沃庄伯已经无视“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不再像他父亲那样遮遮掩掩，而是直接撕掉了挡在他们中间的遮羞布，做起事来也是心狠手辣。为了能够一举攻破翼城，他事先做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因此只经过时间不长的攻坚战，曲沃方面就对翼城实行了有效占领。翼城贵族作鸟兽散，他的堂侄晋孝侯平也在乱兵中惨死，成了内战以来被杀的第二任国君。

看到战事进行得如此顺利，曲沃庄伯不由得嘴角上翘。他有些忘乎所以地摆好了庆功的酒宴，似乎就等着天子派人前来册封了。

可千算万算，曲沃庄伯还是没能料到，翼侯的死忠粉竟然那么有志气，仅仅几天之后，他们便从西边的邻国荀国搬来了救兵。正当曲沃的将士们踩着翼城的废墟饮酒作乐、庆祝狂欢的时候，“神兵”从天而降，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曲沃庄伯心如刀绞。可事已至此，也唯有尽快止损，曲沃庄伯仓促带兵撤回曲沃，第二次代翼战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这次战事的失败，给曲沃庄伯上了血淋淋的一课。回到曲沃后，他对战争先胜后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自己之前在外交上投入的力度还是不够。拉拢结交国内的贵族并不需要多少花费，可要拉拢一个国家来为自己卖命，则需要更多的外交智慧。曲沃庄伯在此后的七年间，特意加大了在外交上的投入。

到公元前718年春季，也即其即位的第十四个年头，在取得了周王的支持后，曲沃庄伯联合了中原的郑国、河北的邢国，以及周桓王派来的大夫尹氏和武氏，组成多国联合部队，浩浩荡荡地向翼城开拔而去。

这一招的确很管用。彼时翼城的国君，是前任孝侯的弟弟公子郤（又作郕、都）。他本就无心与曲沃对抗，如今看到多国部队的旗帜，更是不敢与天子起冲突，于是干脆放弃了抵抗，收拾细软向北逃窜而去。

站在翼城的城头上远望群山，曲沃庄伯泪如泉涌，想到父亲多年来的夙愿终于要在自己的手中实现，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酸楚和欣慰。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表，还没等他去告慰父亲的英灵，唾手可得的胜利便再次转化为失败的眼泪。或许是对眼前的胜利景象盼望得太过于急切，以至于得意忘形露出了马脚，从而做出了让天子不高兴的事情；周桓王的态度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决定不再支持曲沃伯，转而选择与他们为敌。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周桓王便与曲沃结下了不解的仇怨，只要曲沃方面敢于向翼城动武，周桓王就必定会干涉，这股无名的仇怨一直被带到了坟墓里。

周郑交恶

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桓王翻脸，让他产生如此深仇大恨，其中情形着实让人费解。《左传》上给出的解释是，战前曲沃庄伯为取得支持而贿赂天子，获胜以后就死不要脸地背叛了，因此周桓王才变卦。可具体他是如何贿赂的，事后又如何背叛，书中却语焉不详。

翻看公元前718年前后的历史记录，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可用以旁证的资料，唯一能够让人产生联想的，也就只有“周郑交恶”这么一件事了。因此，想要搞清楚事情背后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周郑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

前文曾提到，周平王得以顺利东迁，离不开晋、郑、秦等国的支持，因此尽管看不惯这些大国落井下石、作威作福的派头，可表面上却还得承认“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这个事实，并长期将晋、郑两国定性为夹辅王室的功臣。可问题是，平王东迁之后不久，晋文侯就去世了，此后的晋国更是陷入了长期的内乱，再也无力与郑国“夹辅王室”，平王所能“依靠”的便也就只剩郑国了。而实际上，天子对郑国所谓的“依靠”，不过是眼睁睁地看着郑国对王室权力的垄断和对天子的欺压罢了。

郑桓公建立郑国的时候，本来就是凭借着王室司徒的身份，以成周戍守的兵力来谋取利益的。如今郑国有了定鼎王室的功劳，还兼具王室卿士的身份，自然少不了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搞以权谋私的小动作。周平王尽管对此有所不满，但碍于郑国的强大，也只能忍气吞声，低眉顺眼地看郑国人的脸色。

巧合的是，就在晋国爆发内乱的同时，一颗内乱的种子也在郑国萌芽了。这场内乱的起因不少人都很熟悉，是缘于郑庄公的母亲嫌恶自己的大儿子，因此常常怂恿丈夫郑武公将小儿子叔段立为太子。即便是到郑庄公即位后，武姜还是没有放弃打算，曾多次要求他把制邑封给叔段。制邑在郑国的战略地位，与曲沃在晋国的地位相似，郑庄公自然不能同意，武姜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改封京邑。

叔段就封之后便开始扩张自己的势力，将京邑附近的许多土地都纳入了自己的管辖范围，给人造成了一种“一国二君”的假象。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地扩建城池、修缮武备，随时准备着与母亲里应外合，造自己哥哥的反。

故事有着近乎雷同的开头，但最终的走向却截然相反。

与晋昭侯在强压之下分封自己手握重兵的叔叔不同，郑庄公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弟弟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而且自打分封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时刻在防范着，甚至是有意引导叔段发动叛乱。因此当晋国陷入长期内战的时候，郑庄公却能先发制人，在叛乱刚出现苗头时就迅速出兵弹压，把志大才疏的叔段赶到了卫国。

内乱平定后郑庄公紧追不舍，又攻打卫国以讨伐叔段，结果就引发了多国争端。位于郑国以东的卫、宋、陈、蔡等国，早就看不惯郑庄公假借王命以肥己的做派，便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对郑国的联合抵制。

已近暮年的周平王看到这个机会，便想着要趁机分权给虢公，以削夺郑庄公手中的权力，也好宣泄一下这三十年来心中积聚的怒火。可偏偏他用人不善，事情尚未议妥就被人透露了出去，郑庄公自然不高兴，就怒气冲冲地去找平王要说法。平王害怕郑国，矢口否认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且还提出愿意跟郑国交换人质，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郑交质”。

堂堂天子要通过与诸侯交换人质来建立互信，而诸侯对此竟也毫不推辞，这还是开天辟地以来头一回，可见王室的权威已经受损到何种地步。但事情到这里，还仅仅只是个开始，公元前720年，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的周平王去世，其孙子林继位为桓王后，再次提出要分权给虢公。郑庄公也是个暴脾气，顾不得先王正在丧期之内，竟然派人把周朝的庄稼给收了。尽管后来双方达成了和解，可仇恨的种子已然种下，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消除，直到最后双方兵戎相见。

池鱼之殃

公元前718年联军伐翼的事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按照《左传》的说法，曲沃与郑、邢联军伐翼时，周桓王派了大夫前来助阵。不久后，又是因为曲沃庄伯背叛了周朝，才引来了虢公所统率的王室大军的征讨。

但是，如果结合周桓王与郑庄公之间的关系来考量，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测：曲沃庄伯联合郑国伐翼的战事，并没有请得天子的同意。相反，他看中的是郑庄公在王室说一不二的权威，因此便以其有限的资源，把赌注都押在了郑庄公的身上，试图通过其在王室的影响力达成自己的目的。王室派来助阵的大夫尹氏和武氏，在当时的声名并不好，很可能也是郑庄公的党羽。

然而让曲沃庄伯怎么都想不到的是，周桓王对于郑庄公的专权早已忍无可忍，故而当他听说郑国又打着王室的旗号出去帮人打内战的时候，心中的无名火便猛然爆发了。

在这个过程中，为周桓王所倚重的虢公忌父的态度，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知道，虢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跟周平王的关系并不融洽，其先君虢公石父和虢公翰，分别是幽王和携王的近臣，是周平王最大的敌人。但随着时间的流转，双方的关系也开始好转，王室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合作者来制衡郑庄公，而虢公忌父也希望能够恢复祖时、父时的荣耀，双方可以说是各有所需，于是又走到了一起。但依照双方的力量，完全削夺郑庄公的权力似乎并无可能，于是便只能通过分权的办法，逐步侵削其手中的权力。

至于如何分权，其中的细节显然不是如今的我们可以获知的。但至少从地理上看，虢公的权力不可能越过郑国渗透到东方，他显然也不希望郑国染指西方事务。从这个角度出发，晋国与曲沃的内战，无疑是虢公势力范围内的事情，郑国干预晋国内战，难免有越俎代庖的嫌疑。为了向郑国示威，也为了表达忠于王室的决心，虢公必须要在晋国事务上猛刷存在感。

“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这场发生在成周的政治斗争，战场却选择在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地方。在曲沃借用郑国兵力攻下翼城半年之后，周桓王突然下令，让虢公忌父统率大军讨伐曲沃，使得曲沃庄伯所主持的第三次伐翼战争再次功败垂成。

曲沃方面受到来自周王的连续打击，军力严重受损，整体实力陷入了内战以来的最低谷。这几年在外交上努力结交的荀、董等国，也都因为周桓王的态度转变而纷纷背叛，成了自己的敌人，使得整个曲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

绝境。供养多国部队和抵抗天子战争造成的费用，更是花光了他大部分的积蓄，境内实在是民生凋敝，民怨沸腾。

看到此情此景，曲沃庄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就因为自己的草率和误判，使得过去三十年来曲沃两代人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以后只要天子的态度没有发生转变，任何一个野心家都可以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对曲沃进行所谓“正义”的战争，任他做出再多的努力，都无法扭转局面。

曲沃难道从此就要灭亡了吗？

想到这里，一股绝望的情绪猛然占据了他本已寥落的心，从此以后便一病不起。

径庭之战

公元前716年，带着深深的自责和无穷的愤懑，在位十六年的曲沃庄伯溘然辞世，他的儿子称即位为曲沃武公。

看着父亲留下的烂摊子，曲沃武公的内心也同样充满了绝望。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翼城方面在得到天子的支持之后，就突然像转了性一样，不再被动挨打，反而开始连续不断地对曲沃进行侵扰，让他根本无法像祖父和父亲那样，从容地养精蓄锐，使得饱受战火摧残的曲沃更加凋敝。

干脆认输吧！他决定向翼侯低头认错，归附称臣。为了表达诚意，在派人到翼城去求和的同时，他自己也带了几个随从到桐庭去等候旨意。

此时翼城的国君已经不是跑掉的那位翼侯郤了，而是他的儿子晋哀侯。

这事还得说回两年前，当时虢公忌父奉王命伐曲沃，目的不过是为了跟郑庄公掰手腕，并不关心翼城的局面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到了晋国之后，

他甚至都没有派人找寻那个临阵脱逃的国君，而是图省事就近找到了翼侯郤的儿子公子光，漫不经心地举行了国君受命的仪式就打道回府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随邑（今山西介休东南）翘首期盼天王大军的翼侯郤简直惊呆了：怎么还会有这么不靠谱的操作？难道不是该接我回去复位的吗？

不仅他理解不了，国内的很多大夫也无法理解，其中就包括出自“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的嘉父。他实在看不懂虢公的操作逻辑，干脆甩手走人，到随邑去找寻老国君的下落，不久后又保护着老国君避居到位于国都西北的鄂邑（今山西乡宁）定居。翼侯郤此后再也没能回国，后人便以定居地将其称作晋鄂侯，而他的儿子光，便是后来的晋哀侯。

晋哀侯继任国君之后，因为有了天子的支持和不少诸侯的投怀送抱，胆气陡然增加了不少，于是便“宜将剩勇追穷寇”，对曲沃进行连续打击，直到把庄伯打到吐血，把武公打到认怂，还依然不解气。

这也难怪。或许是由于过去的几场战争太过惨烈，刻骨的仇恨挥之不去，极端的恐惧如影随形，这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对方的诚意，更不敢贸然接受这突然抛来的橄榄枝，议和的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的希望也被无情地抹杀了，曲沃武公濒于崩溃。他肩上所背负的是祖父和父亲都没有承受过的重担，他面前呈现的也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困局。他想哭却不能哭，想放弃又不能放弃，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都在他的手上，他必须振作起来。回到曲沃以后，他关起了大门，一心一意谋发展，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个艰难的冬天里存活下来。

随后的几年间，晋哀侯在虢公的支持下，每天都派兵前来叫阵。尽管曲沃武公血气方刚，正处于好狠斗勇的年纪，可面对翼城军队的骚扰和谩骂，却也只能打碎了牙和血吞，只能深沟高垒固守不出。

这种连续的军事打击持续了八年，曲沃武公也隐忍了八年。在这八年里，他一直密切关注着翼城方面的动态，寻找反攻作战的时机。到联军伐翼的第九年，也即公元前710年冬，机会终于出现了。

这年周历冬季，正当哀侯还像往常那样到径庭（今山西曲沃县听城村）的庄稼地里“体验生活”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那个一直被他们骂作窝囊废的家伙，竟然在径庭人的引导下不声不响地摸出来了。由于事先毫无防备，这支纪律涣散的郊游部队很快就被击溃。晋哀侯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情急之下只能命人驾车朝着都城方向拼命狂奔。曲沃武公受了这么多年的窝囊气，哪能这么轻易地放过对手，于是也命人拼命地追。

这场互相追逐的游戏持续到了后半夜。晋哀侯惊慌失措，偏偏在行经汾隰（襄汾、曲沃间的汾河谷地）的时候，乘坐战车的驂马（战车有四匹马，位于两侧的就被称为驂马）被树木给挂住了。

晋哀侯心内焦急，不停地催促手下人赶紧把马从树丛里拉出来。可手底下的人比他还害怕，听到远处的战车轰隆隆地驶了过来，牵马的手抖得不听使唤，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战略转变

径庭之战是内战中唯一一次在野外进行的战斗，其结果是晋哀侯被曲沃方面杀掉，成为内战以来第三位被杀掉的君主。

经历过上次联军伐翼一战之后，翼城早就已经元气大伤，只不过是周桓王的打击下，曲沃比他们更惨。他们在联军的支持下，靠着曲沃的粮食养活自己，还能嚣张几天。但自径庭之战失败后，翼城最后的自信也被摧毁，终于连小打小闹的勇气都没有了。贵族们手忙脚乱地将晋哀侯的儿子小子侯扶立为君，苟延残喘延续政权。

曲沃武公此次出战只是为了报这几年被欺压之仇，因此在取得大捷之后便收兵回营，并没有趁胜掩杀到翼城去打攻坚战。这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经济状况恶劣，曲沃缺乏抗风险的能力，不敢再次犯险；另一方面则是经此一战，曲沃武公虽没有在名义上取得晋君的地位，但却已经完全凌驾于翼城君臣之上，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意摆布那个坐在翼城大殿上的小子侯，不必急在一时。直到公元前706年，也即径庭之战五年后，他才终于找准了机会，对翼城发出了致命一击。

事情还要从中原讲起。自上次多国联军伐翼事件发生后，奉王命讨伐曲沃的虢公忌父终于如愿地当上了王室右卿士，周郑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了。而被桓王寄予厚望的东方联盟，却并未有效地封堵住郑国的势头，反而被郑庄公用远交近攻之计一一击破，最后都变成了郑国的跟班，郑庄公也就成了春秋历史上的第一个准霸主。

郑庄公本来就不听管教，如今又成了东方诸侯的领袖，更加不把天子放在眼里。在周桓王发出对他的“免职”诏令后，郑庄公不仅不再朝见天王，甚至还产生了取代天子的想法，令桓王震怒不已。

公元前707年秋天，周桓王召集了虢、卫、陈、蔡四国联军，“御驾亲征”讨伐郑国。双方在繻葛展开决战，其结果是天子的大军被郑国打败，周桓王自己也被射中了肩头，从此威严扫地。

天子战败的消息传来，曲沃武公大喜过望。在他看来，如今的天子颜面尽失，哪里还会有闲心插手晋国的事务，这岂不正是取代翼城晋级晋国大宗的绝佳机会吗？为此，他特于前705年冬天召请小子侯到曲沃去，其意大概是想胁迫其以晋君的名义出面恳请周桓王同意权力的让渡。

然而，曲沃武公终究还是失算了。

第一个没想到的是，小子侯年纪虽小，志气却不短。他此行也算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无论曲沃武公如何威逼利诱，他都誓死不从，最终选择了慷慨赴死。而在翼城，贵族们也知道国君此行必有一死，临行之前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在把送死的国君送出城之后，翼城上下守备森严，随时准备抵御来自曲沃的军事打击，告急的飞鸽传书也昼夜不停，将消息传到了周桓王的耳朵里。

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周桓王尽管实力受损，却并没有把曲沃放在眼里。相反，他在中原憋了一肚子气，正愁找不到出气筒呢，可巧就听说老冤家曲沃又在惹是生非，当下便又委派虢仲调兵征讨曲沃。曲沃武公自知不是对手，又躲在城里不出来了。虢仲带兵在曲沃城外转了一圈后觉得没趣，就在翼城以天子之命立晋哀侯的弟弟、小子侯的叔叔公子缙为君，随后班师。

对于这样的结果，周桓王显然是不满意的。他需要的是胜利的消息，是高奏的凯歌，是能够重新树立天子权威的捷报，虢仲如此草草了事，显然是辜负了自己对他的信任。于是到第二年（前703年），周桓王又派虢仲调集芮、梁、荀、贾四国兵马前来讨伐。这次曲沃是真扛不住了，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城池土地满目疮痍，让曲沃武公再次见识到了周桓王誓与曲沃死磕到底的决心。

此战过后，曲沃武公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陷入消沉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而是对过去的战略进行了革命性的调整。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曲沃的政治中心从如今曲沃县境内的旧曲沃城，搬迁到了如今闻喜县附近的新曲沃城，以避免翼城的直接侵扰。

与此同时，郑国以一国之力单挑东方列国，并一举击溃王室的故事也给了他不少的启发，让他认识到过去一贯采用的“斩首行动”的局限性。如果想要获得长远的发展，目光就不能仅仅局限在翼城，不能仅仅把目标定位为统一晋国，而是要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度，让自己占据整个周边地区政治秩序的主导权，否则就永远无法避免沦为他人工具的命运。

经过这样一个转变，曲沃武公终于从内战思维中解脱了出来，不再为了一个晋侯的名分而招来别国的干涉，转而采取了一种“以农村包围城市、以郊邑包围国都”的新战略。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其首要的目标便是收复和巩固晋国过去的疆域。

晋国归一

晋国在文侯时期，趁着王室的内乱，攫取了汾河流域乃至黄河西岸的不少土地。但随着晋国内战的持续演进，其他诸侯在干预晋国内乱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蚕食晋国的领土，因此武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被蚕食的土地重新夺回来。如早先在文侯时期灭掉的韩国，到武公晚年灭荀之后才被封予桓叔的幼子韩万，很可能就是因为在内战期间被荀国侵占的缘故。

此外，在曲沃渐渐壮大的过程中，王室的力量却是江河日下。特别是在周桓王死后，王室内部开始出现了接连不断的内乱，再也无暇顾及晋国的那

些事儿了。反而是曲沃趁着王室权威衰弱内乱频发的机会从中不断渔利，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开始出现逆转。

在此期间，曲沃武公曾经攻打过王畿内的夷邑，取得了大胜，生擒夷邑大夫诡诸，并将其名字赋予了自己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晋献公。事后，因为周朝大夫蒍国的求情，武公同意将其释放。又过了几年，夷诡诸和蒍国之间发生了矛盾，蒍国就向曲沃告黑状，曲沃武公也就恭敬不如从命，趁机兼并了夷国。

除此之外，武公在征战中还灭掉了不少敌对国家，比如早年曾干涉晋国内乱的荀、贾等国，都是在其晚年被并入曲沃版图的。

通过不断向外扩张，曲沃逐渐超越了原先晋国的传统版图，成为晋南地区政治秩序的缔造者和主导者，而翼城则在曲沃的封锁之下，几乎成了一座孤城。特别是在王室失去了干涉的能力后，翼城便已然是曲沃的囊中之物，曲沃武公在诸侯的心目中也早已成为事实上的晋君了。只是出于各种考虑，曲沃武公并不急于灭掉大宗，这才让他们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年的时间。

但随着时光的无情流逝，再伟大的人物也逃不出生老病死的轮回。到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垂垂老矣，想到自己时日无多，他还是希望能够完成祖父六十多年前的夙愿，希望自己能够以晋国国君的身份进入宗庙。经过长久的思虑之后，他终于迈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步，派兵一举消灭了被困翼城徒留虚名的晋国公室，最终完成了晋国的统一大业。而那个毫无存在感的晋侯缙，也在这次战争中丧命，成为内战中被杀的第五任国君。

这个时候，曲沃与王室以及虢国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往日。不过，为了能够告慰祖父桓叔和父亲庄伯的在天之灵，他还是命人将翼城缴获的珍宝器

物全部输送到成周，献给新继位不久的周僖王。周僖王自知无力干涉，干脆也顺水推舟卖了个人情，派虢公到晋国去举行正式的册封典礼。

这一年是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终于完成了从祖父以来延续了三代人的梦想，正式晋位为晋侯。为了这个梦想，他们用了67年的时间，付出了三代人毕生的心血，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磨难，终于以杀五君（昭侯、孝侯、哀侯、小子侯、侯缙）、逐一君（鄂侯）的结果实现了小宗对大宗的成功逆袭。

这场从公元前745年开始的晋国内战，历史上被称作“曲沃代翼”，这也是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后，诸侯国中发生的最为惨烈的一场内乱。

然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晋武公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在死后以晋君的身份进入宗庙，并没有多少时间来慢慢品味胜利。在成为晋君的第二年，他便满含着辛酸和幸福的泪水，离开了他辛苦经营了近四十年，并最终实现统一的晋国。

而在他死后，晋国国内公族之间残酷的杀戮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骇人听闻，隐隐然为晋国君权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若是曲沃桓叔在天有灵，当他知晓这一切的时候，不知是否还会做出与当年同样的选择。

第二章 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第一节 开疆拓土

成周之行

晋武公去世后，那个被他用俘虏的名字命名的儿子——诡诸坐上了晋君的宝座，他就是名震江湖的晋献公。

公元前676年，也即晋献公纪元的元年，刚即位不久的晋献公与他的老对手虢公携手，到成周去朝见新登基的周惠王，受到了天子超常规的礼遇和赏赐。盛大的王室宴会结束后，他们又与郑厉公一道，委派原庄公去到陈国为周惠王迎娶了新王后。

相比于几十年前曲沃与周、虢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趟行程很明显让人感觉到晋国的地位已经非同一般了，但晋献公却并未因此而骄纵起来，更多的反而是在心理和感官上受到了强烈刺激。

回想起晋文侯在位的时候，晋国的疆域或许并不比现在更大，可那时的晋国却是列国中的佼佼者，是能与郑国并驾齐驱，夹辅王室定鼎大局的强国。晋文侯去世后的几十年间，晋、郑两国都出现了内战的危险，但后来的走向却截然相反：郑国迅速平定了叛乱，并以一国之力暴打列强，成为东方诸侯的盟主。

在这段时期内，东方诸侯如齐、鲁、宋、卫，都抓住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大力开展兼并扩张的事业；偏居南方一隅闷声发大财的楚国，在吞并了江汉流域的诸多小国之后，业已成为一个地方千里、民丰物饶的巨无霸；被滞留在宗周的秦国，逐渐将犬戎势力逐出丰岐之地，掌控了西方局势，并逐

渐开始向东渗透……这些逐渐形成的大国，纷纷把他们的马首指向了中原，试图在这片厚重的沃土之上，建立属于他们的功业。

然而晋国呢？在诸侯崛起的黄金时期，晋国反而是陷入了内战的泥潭无法自拔，竟至于没落成一个受人欺凌的二等诸侯。尽管晋武公在位时曾奋发图强，兼并了不少的诸侯，让统一后的晋国不至于太过衰弱；让晋国摆脱了王室和虢国的控制，使得晋献公能够跟天子卿士虢公平起平坐——可这个体量跟上述的那些大国比起来，几乎不值得一提。用大夫郭偃的话来说，如今的晋国不过是一个地偏土狭的“偏侯”罢了，晋献公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是一个虽完成了统一，却积贫积弱远未强盛的晋国。

看到东方诸侯个个都兵强国富、物阜民丰，晋献公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过。特别是他即位的那一年，正是齐桓公的霸业刚刚开始兴盛的时候，东方列国早已超脱了以王室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若是看到这番景象，还把目标仅仅停留在与虢国并驾的层次，或者是希求在王室的利益格局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未免显得目光太过短浅。

在那个霸道盛行的时代里，无论是哪个君主，只要实力能够勉强，都有一个霸主的梦想，晋献公又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当他回想起文侯时的荣光，更是难免心潮澎湃。

不过，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眼下没办法与中原列强争霸，于是回国后便关起门来谋发展，着力于施行积极的扩张政策，以求有朝一日能够取代齐桓公，实现称霸中原的理想。

在此后的二十六年间，东方诸侯慑于齐侯之威，无不战战兢兢地跟随在齐国的后面东奔西跑，可晋献公却始终都摆出一副不关心的姿态，从不参加

任何形式的会盟和征讨活动。他一心只想“继文绍武”，修整内政外交，治理战乱之余，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弥补晋国过去因为打架而耽误的功课。

广莫为都

晋献公即位后，继续施行武公时期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力图扩大在故夏地的主导权。而在这其中，被中原诸侯鄙夷地斥为“戎狄”的游牧部族，自然就首当其冲成为其开疆拓土牺牲品。

“戎狄”与“诸夏”的主要区别是生产方式的不同，“诸夏”以农耕为业，“戎狄”以游牧为生。“戎狄”多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往往同一个国家的两个城池间就有许多部族的身影。在与“诸夏”的冲突中，他们肆意侵扰城邑、破坏农耕，来无影去无踪，让中原诸侯皆不胜其扰，却又无法将其彻底消灭。

此时开始于西周末年，为害中原百年之久的小冰期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退，由西周灭亡而造成的“戎狄之祸”仍然时刻威胁着各诸侯国的安全。而晋国又身处这些游牧民族最为集中的地方，东有“赤狄”，西有“犬戎”，北有“白狄”，国内各城邑之间也散居着大小诸多部族，在当时的诸侯国中，恐怕所受的侵害也最为严重。

不过这些困难对于晋献公来说或许并不是什么问题。晋国从建国开始就长期与“戎狄”纠缠，斗争经验极为丰富，一直以来怀柔与武力并举的措施，在晋献公当政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怀柔方面有记录的有“狐氏大戎”“小戎”等。其中的狐氏大戎，其首领据说原本是晋国同宗的贵族，晋献公把狐氏的贵族狐突（字伯行）收编为晋国大夫，还娶了他的一个女儿“大戎狐姬”，也就是后来晋文公重耳的母

亲。小戎不知由来，据说是一个允姓的部族，晋献公同样采取联姻的办法，娶了“小戎子”，也就是晋惠公夷吾的母亲。

武力征伐影响力比较大的是献公五年（前672年）时所伐灭的“骊戎”，后来引发晋国内部危机的骊姬姐妹，就是这次讨伐时被晋献公掳来的。

需要一提的是，关于骊戎的地望，一般认为是在陕西临潼的骊山地区。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此处所伐的骊戎应该是在晋国东南不远的山区中，是后来的“丽土之戎”的前身。在他们看来，骊山靠近秦国的本土，且后来一直都在秦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与晋国相隔甚远，中间还有耿、魏、梁、芮等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舍近求远攻打骊山的戎狄实在不合情理。

不过，在《史记》文本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记载，在晋国伐骊戎的当年，秦晋两国曾在一个叫作“河阳”的地方交战，晋国在此战中负于秦国。对于这场战争，史料中没有更多的说明，但似乎也可以间接地印证，晋国讨伐骊戎的确是侵犯了秦国的势力范围，因此遭到了秦国的打击。

至于远涉西方去攻打是否合理，似乎也不能用我们今天的观念去理解。春秋时期还没有领土的概念，规模较大的诸侯国往往也只是占据诸多的城邑据点，城池密集区域的边缘隐约间形成一国所谓的疆域界限，这就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海权概念。诸侯的对外扩张往往以占据城池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常也不会占据山河险要。根据我们之前的论述，晋文侯在攻杀携王的时候，就已经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河西区域了，距离骊山并不遥远。

另一方面，春秋时期讨伐“戎狄”是政治正确的首选，齐桓公称霸就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各诸侯国都有为周天子征伐“蛮夷”的义务，而执行这个义务并不受势力范围的约束。比如晋文侯征伐南方的“淮夷”，距

离晋国更远，但因为是代天子征伐，谁也不会觉得不合理。因此我们也不能仅凭借主观判断，就认定了晋献公征伐的骊戎不在骊山地区。

除了这些没有固定据点的游牧民族，有些部族已经向农耕文化过渡，并仿照诸夏建立了城池定居，有了独特的典章制度。但在中原文化的语境中，这些国家的建立并未经过周天子的认证，因此仍然被视作“戎狄”，如《国语》中所提到的翟祖国。

据说有一次献公外出田猎，看见狄祖国上空的云气感到很不吉利，回到大帐之后便愁眉不展、忧思难眠。大夫郤叔虎去觐见时，看到国君一脸疲惫的样子，就满是关切地问道：“是因为床铺不安适呢，还是因为骊姬不在身旁无法入眠？”

献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郤叔虎却已经了然于胸。离开之后遇到士蒍，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国君夜不能寐，一定是因为狄祖国。”并就此分析了狄祖国必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国君“好专利而不忌”，其臣下“竞谄以求媚”，敢进逆耳忠言的人都被排挤得没有了立锥之地。君上贪婪不义，臣下苟且偷安，朝中上下全都是只图一己私利的蛀虫，这样的国家又怎么能长久呢？

士蒍将这些话传到了晋献公的耳朵里，献公听后豁然开朗，原先的顾虑一扫而空，于是当机立断出兵伐翟，果然取得了成功。战争中，叔虎认为自己无谋无功，没有尽到人臣的职责，便不顾将士的劝阻，身先士卒“被羽先升”伐灭了狄祖国，更是受到献公的嘉奖。一般认为，郤邑（据称在今山西沁水下游一带）的分封便是在此役之后，叔虎及其后裔此后便以郤为姓氏，这也是有着显赫地位的郤氏家族在春秋历史上的首秀。

兴灭继绝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晋国境内的“戎狄”势力已被基本肃清，威胁晋国安全发展的潜在隐患也被扫清。可正当此时，在中原大地上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

晋献公十七年（前660年），东方大国卫国的国君在与狄人作战中战败身亡，卫国军队溃散。狄人长驱直下，竟然攻下了卫国的国都朝歌，将卫国灭掉了！残留的国人被戎狄追逐砍杀，一直被追到了黄河边上。黄河南岸的宋国得到消息，忙出兵接济卫国的遗民，前前后后一共才聚拢到730个人。

狄人气焰之盛还不止于此。早在攻取卫国之前，地望在今山西黎城，由帝尧后裔建立的黎国就已经被“赤狄”攻灭。攻下卫国的“戎狄”部族继续在中原大地上四处劫掠，直逼郑国而来，郑国不敢怠慢，慌忙组织兵马到河上抵御，结果也被打得大败。另一股“戎狄”势力沿着黄河攻打邢国，邢国更是无力还手，举国上下被闹得鸡飞狗跳，几乎就要重蹈卫国的覆辙了。

事件发生之后，以齐桓公为首的中原联盟迅速集结起来，向受害国伸出了援手。他们集合了从朝歌逃亡的七百三十人，以及共、滕两邑的五千民众，在曹邑扶立卫戴公复国。中原各国守望相助，为了保证卫人在曹邑立足，他们还安排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守卫，捐赠的车马、布匹、牲畜、木材更是不计其数。只是由于“戎狄”势力流动性太强，各国都疲于应对，齐桓公无法夺回被侵占的土地，后来也只能组织诸侯帮助卫国和邢国异地重建。

当此中原各国在戎狄势力顾此失彼之时，作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晋国必然也要担当起讨伐“戎狄”的大任。于是，当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带兵征伐盘踞晋国东南（今山西垣曲县皋落乡）的“东山皋落氏”，从侧面呼应东方诸侯对“戎狄”的围剿。这次征讨后不久，在成周附近便出现了所谓

的“皋戎”，如今的昔阳县境内也有“皋落镇”，这些大概都是“东山皋落氏”受晋国驱逐四处流散留下的印迹。

随后，晋军又多次进行了小规模战斗，似乎是夺回了卫国在黄河北岸被戎狄所占据的朝歌（今河南淇县）、邯郸、百泉（今河南辉县）、河内（今河南卫辉）等城邑。只是由于彼时卫国已经在黄河南岸复国，这些城邑自然也就归属晋国所有了。

进入中原的游牧部族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在中原诸侯的合力打击下分散各处，无法再形成合力。但他们依旧像是被放出山的猛虎，嚣张的气焰虽被扑灭，残留的影响却久久不能消散。在此后的数年间，依然可以影响周王室的内政，这些都是后话了。

第二节 辟土服远

兼并诸侯

晋国向外扩张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兼并周边的传统诸侯国。这些国家大都是周王所分封的姬姓同宗，西周时期与晋国在“戎狄”环伺的环境中互相扶助，一直相安无事。但到曲沃代翼时期，许多国家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晋国内战，其中的大多数国家都站在了曲沃势力的对立面，因而也就给了统一后的晋国以讨伐兼并的借口。

晋国灭国夺邑的第一阶段，大致在晋武公晚年和晋献公初年，主要对象是围绕在晋国周围的一些小国。晋国本部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反C形的盆地，其北、东、南三个方向都被太岳群山所包裹，西面则有杨、贾、荀、董四国由北向南呈扇形分布，其外围还有韩、冀等国，都处于临汾、运城盆地之内。

其中杨国在今洪洞县东南的故杨城，一说是文王庶子伯侨的封地，另说是周宣王之子尚父的封国。具体被伐灭的时间无法确认，到晋献公十七年（前661年）前，杨国故地就已经封给了献公的子侄羊舌突作为食邑。

贾国是唐叔虞少子公明（贾共公）的封地，其地在今临汾市南部，属于是从原唐国分化出去的“藕国”，整个西周时期都是独立发展的，在公明之后有宣公梁、相公笔、雍、唤、萋、伯车、惠伯兕、无纪、辰公僵、贾公丘十位国君接任。晋武公时期，贾国曾参与过公元前703年虢公组织的对曲沃的大围剿。后来随着曲沃的长期活动，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贾国曾把一名公族女子嫁给了当时还未继位的晋献公。不过这段关系维系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到武公晚年，共历十一代君主，存续时间三百多年的贾国就被晋国吞并了。

荀国在绛都正西，如今的新绛县东北，第一任国君是周文王的十七子，西周时很强盛，曾一度成为这一区域诸侯的领头者。在曲沃代翼的内战中，荀国于公元前725年的第二战中最先干预晋国内政，公元前703年虢公讨伐曲沃，荀国亦参与其中。公元前677年，晋武公成为晋君后第二年将其城池土地赐给原氏黠（也即荀息），可见在此之前荀国就已经被伐灭了。荀国被灭后，似乎有余部迁徙到临猗县南铁匠营村附近的郇邑，不久之后被再次伐灭，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无确实的证据。

董国在今闻喜县境内，古代有董泽，传说是豢龙氏蓄龙的地方。曲沃代翼初期，董国似乎与曲沃关系密切，但在虢公第一次讨伐曲沃之后，其慑于天子与虢公之威，不得不与曲沃断绝关系，后来被武公所灭。之前曲沃的城邑还在今曲沃县附近，武公伐灭董国后，将曲沃迁到了现在的闻喜县境内。

韩国的地望在荀国以西，今河津、万荣之间，是周成王弟弟的封国，公元前757年时就已经被晋文侯吞并。公元前677年晋武公灭荀时，将其封给桓叔幼子韩万作为采邑。韩万的子孙正是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最后与赵、魏两家三分晋国，跻身战国七雄的行列。

冀国在今河津市东北冀亭，与韩国相邻，据说是殷商传说后裔的封国，灭亡时间难以确证。其灭亡的原因，据史料的记载，是因为冀国无故占据虞国的城邑，晋国借此与虞国联合将其伐灭。晋献公十九年（前658年）之前，将其封给郤芮作为采邑。

伐霍魏耿

经过这一轮的扩张，晋国基本上已经将晋南临汾、运城盆地的大部土地收入囊中，获得了大量的城池和良田，各方面实力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彼时晋国的军力仍然只保留了武公初封时的一军编制。为了更好地应对疆域

扩大而带来的挑战，公元前661年（献公十六年），晋献公进行了一次扩军行动，将晋国主力部队扩展为二军。

按照春秋时通常的军队建制，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一两有25人；四两为一卒，一卒有100人；五卒为一旅，一旅有500人；五旅为一师，一师有2500人；五师为一军，一军有12500人。

此种建制并非一成不变的，比如齐国的军制就与此不同。按照《国语·齐语》的记载，管仲为齐国制定保甲之制，军队以五人为一伍，十伍为一小戎（50人），四小戎为一卒（200人），十卒为一旅（2000人），五旅为一军（10000人）。

晋国所采用的是何种军制，如今已经很难找到确切的资料，其军队编制可能会有出入，但依照当时各国的实际，人数也不会偏离太多。也就是说，经过扩充后的晋国军队规模大概在20000至25000人之间。

军队扩充之后，晋国灭国夺邑的扩张行动开始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年，晋献公自领上军，以赵夙为御戎，毕万为车右，灭耿、魏两国；太子申生统领下军，伐灭霍国。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春秋时期进行车战时，通常是三人共乘一车。古人以左为尊，故而地位较高者通常都站在战车的左侧，主要负责持弓箭射杀敌人，称为甲首；居中的是御戎，也就是司机，负责驱使马匹，控制车辆行进轨迹；车右是执戟的卫士，负责近距离啄刺（不是砍杀）靠近的敌人。车右一般会选择大力士，作战时保护车左的主帅，行车遇到障碍时，负责清理障碍物或者辅助推车。国君和主将所乘战车与通常配置稍有不同，即尊者需要站在车的中间擂鼓指挥战役，而御戎则在左侧驾车。

魏国和耿国都属于是周初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其具体的传承已经不太清楚。魏国地处晋国西南黄河三角区域，大致在现在的芮城县东北的河北城附近，与潼关古城隔河相望。周灭魏国后封给了姬姓宗族，晋献公灭魏之后又将魏国封给了毕万，以其为魏县大夫。

耿国在晋国以西黄河东岸，临近荀、韩，大致在今天的河津市东南耿乡城附近。商代时，耿国是嬴姓部族建立的方国，周朝初年灭耿，将其分封给同宗姬姓。晋献公灭耿后，将其赐给了嬴姓大夫赵夙为采邑，令其为耿县大夫。

霍国位于晋国北方的汾河沿岸，大致位置在现在霍州市西南的霍城。霍国的本源是真姓侯国，周朝灭霍后，将霍国封给周武王的弟弟（文王第八子）霍叔处。其原本的封地似乎是在河北境内漳河以北的邺地，因为参与管蔡（三监）之乱，霍叔处被贬为庶人，后来又被重新起用，徙封到晋国的北方。他的儿子仲员继承了封地，此后还有家重、静叔带、旧、安叔、将、君问、角、光、福几任君主，到晋献公时期，当政的君主是霍公求。

按照通常的说法，霍国在管蔡之乱后降格为伯爵国，霍公求认为成王时的处置不合理，就僭越封号自称霍公。晋献公认为他太过放肆，于是便兴兵讨伐，将霍公求放逐到齐国。但问题是，霍公求所处的时代距离三监之乱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且周朝的五等爵制是否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也是个未知数，即便是执行了，西周灭亡后各国僭越称公的情形也层出不穷，晋献公以此为由讨伐霍国显然是欲加之罪。

在儒家理论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兴亡往往与国君的德行联系在一起，而霍公求似乎还算是一个德行高尚的君主，晋献公大肆征讨时甚至都找不到合

适的借口，未免让人感到有些尴尬。大概为了“师出有名”，才产生了所谓霍公求自封公爵的所谓“罪名”。

不过即便如此，霍国的灭亡还是给晋献公带来了一场舆论危机。按照史书的记载，晋国灭霍之后发生了一场大旱，晋献公让人求神问计，得到的答复是霍太山的山神失去了霍国的祭祀，因而才给他们降下灾害。晋献公原本打算把赵夙封到霍国，如今也只好为赵夙改封，并派他亲去齐国把霍公求请了回来，专门负责祭祀山神，这才消除了灾祸。

此次出征连灭三国，体现了晋国军事实力日趋强大，但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后来三分晋国的卿族中，有两家的先祖都在献公的战车上，似乎也是命运给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伐灭霍、魏、耿三国，可以说是献公一生功业的压轴之作。这三个国家分别代表了晋国向北方、西南、西北三个方向的重要关口。在确定了这样一个基本框架后，晋献公彻底巩固了自己在晋南盆地的统治，于是便开始整军备战，准备向他们最大的对手虢国开战了。

第三节 假道伐虢

虢国史略

虢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史书上针对虢国有着许多不同的称呼——有东虢、西虢、南虢、北虢、小虢——让人看了眼花缭乱，不明所以。不过，若要仔细梳理一下，其实不难发现，历史上所谓的虢国原本只有两个：东虢和西虢，分别是周文王的两个弟弟虢仲和虢叔的封国。

东虢和西虢的关系，其实是有点类似于鲁国和周公的关系，都是同一封君的不同封地。鲁国之所以在诸侯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就是因为他们与在周王室任职的大夫周公祭祀的是同一个先祖——周公旦。

西周实行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很多学者认为所谓的五等爵在两周时期并没有严格的划分，不过即便如此，其中的规律也是有章可循的。西周时期所封建的诸侯之所以叫“诸侯”，是因为他们的爵位大多都是侯爵，我们所熟知的齐、晋、卫、鲁属于西周早期分封的功臣和贵戚，都是侯爵。侯爵之下有伯爵，如秦、郑，也都是王室贵戚和功臣，但分封较晚。伯爵之下又有子爵（如楚国），有男爵（如许国），这些国家与周王室既无亲缘关系，也无战胜之功，只是商朝时留存的国家归附于周王室的系统之后追认的，爵位相对较低。

唯一例外的是宋国，因为是商王后裔，在周王朝属于是客，所以爵位较高，为公爵。此外，史料中还有所谓“三恪”的提法，一说是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另一说则是将黄帝、尧、舜之后封于蓟、祝、陈，地位较之其他诸侯更高。由于缺乏相关的证据，此处就不多做讨论了。

诸侯国内的大夫通常都是子爵，与之对应的，周王室的大夫就是公爵，他们也有采邑，但却没有诸侯国所具有的独立性，其在周王室的地位类似于子爵大夫在诸侯国中的地位，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郑桓公在获得合法的诸侯地位前，曾在王室担任大夫，其爵位是公爵，而其在新郑所建立的郑国，则只是伯爵爵位。表面上爵位从公爵降为了伯爵，但由于从王室的大夫转变成了具有实际权力的诸侯国君，其实际的自主权却是提升了。更何况郑桓公在担任郑国国君的同时还兼任了王室卿士，其入朝为公爵，入国为伯爵，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地位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回过头来再去看这两个虢国，两国国君应该属于是文王的堂兄弟，一个留在宗周担任王室大夫，一个到东虢就封成为诸侯，两国共同祭祀同一个先祖，也就是虢仲和虢叔的父亲。在东方建国的东虢位于河南荥阳附近，骊山之乱后不久，因收留郑人最后反被灭国，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郑国在东虢设立制邑，也就是武姜起初要求分封叔段的地方，后来的战略要地虎牢关就在原东虢境内。

留在王室担任大夫的就是后来所称的西虢。西虢原本的封邑位于今陕西宝鸡市东，属于虢公在王室的采邑，而不是独立的诸侯国。周宣王初年，因感到宗周局势微妙，西虢整体东迁到山西平陆到河南三门峡一带——这与郑桓公的东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当时危机意识已经在宗周的上层弥漫了。

西虢东迁以后仍然保留了宗周的采邑，一直到平王东迁之后，无须到宗周朝王，这块封地也就废弃了。不过，大量未能跟随东迁的民众依然以虢为号，也就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小虢，在公元前687年被秦国吞并。

东迁到三门峡一带的西虢建都上阳（今河南三门峡李家窑遗址），由于地跨黄河两岸，被习惯地分为北方和南方。位于黄河以北今平陆县境内的北方地区被称为北虢，中心在下阳（又称为夏阳）；黄河以南今三门峡境内的南方地区被称为南虢，中心在上阳（又称大阳）。南虢和北虢不属于独立国家，它们都是西虢东迁后的一部分，只是因为黄河的分界，被分成了北方和南方两个单元。

不过也有说法认为，西虢东迁之后本来定都在黄河以北的下阳，晋国第一次假道伐虢之后，为避其锋芒，迁都到黄河以南的上阳。两者的地理位置相比，迁都后的虢国被称为南虢，而迁都之前的就被称为北虢，以示区分。也就是说北虢和南虢是人们对于同一个虢国不同时期的称谓，这就跟人们根据都城位置而划分的西周东周、西汉东汉、北宋南宋是一个道理了。

历史上对于建国的东虢和留在宗周的小虢并无太多的记录，大多数关于虢国的记录，实际上都出自有贵宠在身的西虢。不过，由于灭亡较早，西虢完整的君主世系也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浩瀚的史料和佶屈聱牙金文资料中去探寻蛛丝马迹。

依据现有的资料，我们知道在周穆王时期，有虢城公与毛伯班同事天子；到周夷王时期，有一名虢公随天子伐“太原之戎”，但没有留下谥号；周厉王时期又有虢公长父，谥号厉公的，曾随天子讨伐“淮夷”，周宣王初年，举族迁徙到三门峡一带立国；厉公之后又有虢宣公（虢季子白）征伐“玁狁”大获全胜，虢文公名季的，劝谏周宣王“不籍千亩”之事。

到周幽王时期，又有虢公石父名鼓的，伙同周幽王败坏朝政，后来似乎是在骊山之乱中殉难了。嗣后虢公翰在携拥立王子余臣与周平王对峙，因此与王室的关系不甚融洽。但到周平王晚年和桓王时期，双方因有着共同的利

益，虢公忌父被任命为王室卿士，以分郑庄公的权力，虢国由此获得了对西方事务的发言权。

虢公掌握卿士权力的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原各国内乱爆发的高峰期，虢国自然也难以置身事外。公元前702年，也就是曲沃武公诱杀小子侯，虢公林父带领诸侯联军大举讨伐曲沃的次年，虢公因为与大夫詹父闹了点矛盾，就跑去找周天子打小报告，结果还让詹父给揭穿了。詹父官司打赢了还不肯罢休，又带着周天子的兵去攻打国君，最后把他撵到了虞国。

晋献公即位后，虢国依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晋献公四年（前673年），虢公丑曾与郑厉公一道平定王子颓之乱，稳固了周惠王的地位。晋献公十三年（前664年），虢公丑攻入樊城，讨伐樊皮的叛乱，为王室建立了功勋。四年后，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的军队。

虢国在历史上与晋国有着不少的交集，本书前面的部分也曾多次提到。首先是在二王对峙时期，晋文侯为协助平王东迁杀死了携王，自然也就与虢公结下了仇怨。后来到桓王时期，在位的虢君忌父和林父曾多次干预晋国的内乱，为曲沃一方统一晋国制造了不少阻力。

随着晋国的统一和国力的提升，晋献公逐渐有了与虢公平起平坐的底气，但虢国似乎仍然把晋国视为其势力范围内的小兄弟，屡屡干涉晋国内务。比如晋献公九年时，因发生了屠戮公族的事件，虢公丑两度伐绛，让晋献公吃了不少苦头。

若要依照当时中原大国的脾气，受到对方的讨伐之后，不管能不能打得过，都会纠集一帮盟国前去找对方的晦气。可晋国由于在内战期间一直受人欺凌，逐渐养成了隐忍的国家性格，其做法也就大不相同了。在士蒍的劝说下，晋献公果断放弃了即刻报复虢国的计划，转而专心发展自身的实力，很

快国力就完全超越了虢国。相比于积极进取的晋国，原本强盛的虢国则由于安于现状而逐渐走向了衰落。

神降于莘

公元前662年，也就是晋献公在位的第十五年，《左传》记载了一件奇异的事情。说是在这年七月，有一位神祇降临在莘地（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境内）。光天化日之下就降临人间，一住就是半年多的时间，而且还不说话，愣是要人去猜他究竟想干什么。周惠王得知消息，曾向内史过询问缘由。素来博古通今见多识广的内史过似乎是对这样的事见惯不怪了，他很是平淡地回答说：“一个国家将要兴盛，就会有神明降临，来考察受试者的德行。一个国家将要灭亡，也会有神明降临，来记录他的罪恶。所以有的国家会因为得到神明而兴盛，有的国家却会因为得到神明而败亡，这种事情在过往的时代都发生过，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不管这位神仙究竟是何目的，既然来到了人间，作为天下的主人总得接待一下吧！于是周惠王又问他：“那么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规格来接待他呢？”

内史过说：“把他降临的日子作为祭日，按照相应的规格如常祭祀即可。”

在古代，跟鬼神打交道是一件非常烧脑的事情，周惠王作为天子，对于这种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学问缺乏兴趣，故而便委托内史过代表王室前去祭祀。

内史过到了莘地后，发现事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原因倒不是这位神仙架子大，而是莘地的地主虢公丑，竟然在公然腐蚀上天派来的这位使者

——他派祝应、宗区、太史嚭带了大量的礼物去行贿，希望神灵赐予他更多的土地。

这种事别说内史过了，就连虢国的太史嚭都被气坏了：神仙降临人间是多难得的一件事，你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表现德行也罢了，竟然无耻地去行贿！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虢国将要灭亡了！

所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仙是聪明正直而且专一的，神仙降临的是灾祸还是福气，全要看国君个人的修为。虢公德行不昭，怎么可能得到神明赐予土地呢？

这个故事在《国语》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内史过头头是道地讲述了夏商周三代有神明降临的故事，甚至连这次降临莘地神灵的来历也讲得清清楚楚，其中的说教大体上也是为了证明虢公的昏庸，以印证虢国的灭亡是罪有应得。

虢公到底有多昏庸呢？史料上没有特别的记载，大概他并没有什么让人非要惩戒的罪行，但就如同晋国讨伐霍国时非要给霍公求找一个罪行一样，既然要讨伐虢国，就不能让他清清白白地走。因此所谓神降于莘的记载，很可能是当时谣传的故事。

刘勃在谈到这段故事时曾做过一段评论，说这大约也是大动乱时代小国的宿命，政治上被毁灭之后，总还要在道德上被再毁灭一次。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而是贯穿于《春秋》始终的惯用叙事手法。无论是国家的成败也好，宗族和个人的前途命运也罢，作者通常都会在德行的视角下为其找到合理的依据，从而使得三传的叙事往往带着强烈的“因果报应论”色彩。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以成败论德行，以结果导例证，这不仅是《春秋》及其三传叙事的固有特点，也是先秦时期百家学说的通病。为了能够从过去的历史中提炼出警示意义，以此来宣扬自己的理论、传播自己的学说，先秦时期的意见领袖和追随他们的游学士子们并不介意篡改史实、捏造事实；而那些凭借“非礼”手段获取权力的诸侯君主们，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也有十足的动力来歪曲历史、隐瞒真相甚至生编乱造，这就使得先秦时期的历史叙事总是真假难辨。

因此，对待这些鱼龙混杂的先秦史料，我们既要重视其所陈述的客观事实，又要仔细甄别其中失实扭曲的成分，尽量避免作者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偏概全的手法给我们带来的误导和迷惑，对待其中的主观评价更是要持审慎怀疑的态度。对于书中所刻画的脸谱化形象，无论是人人崇敬的圣人贤者也好，无道蛮横的昏君乱臣也罢，都不宜以极端化的视角来看待，而是要尽力将其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个体，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探寻到事件背后的真实动因，从而更好地理解春秋时期政治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虢公贺鬼

这种近乎谣传的故事不只一桩，在《国语》中还有另外一个神灵托梦的故事。

话说有一天，虢公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长着人脸、老虎爪子还有一身白毛的神仙，拿着一柄大斧子站在宗庙西侧的廊檐下。虢公丑惊慌失措，正准备要逃走，却听到那神仙说：“不要走，上帝要让晋国进入你的国门。”然后就消失了。

梦醒后虢公找来了负责占卜记事的史嚚来解梦，史嚚告诉他说：按国君你所描述的样子，那个神仙应该是掌管刑杀的大神，名叫蓐收，主要负责给

人降灾祸的。我看你流年不利的样子，多半是快要灭掉了，还是趁早跑路吧！

虢公听了很不高兴，竟让人把史囂关了起来，还下令让国人都来庆贺这个“吉梦”。

虢国的大夫舟之侨叹道：“国家壮大并广治道义，小国进入国门是来臣服的，可是国家弱小还傲慢自大，让大国进来那岂不是诛讨吗？”

据说舟之侨还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虢国内外局势，认为虢国必将灭亡。其一是国君奢侈放纵，不思进取。因为放纵私欲，导致国人痛恨，没有人愿意服从他的指令；因为不思进取，在面对可能的外敌来袭的时候不修整军备，反而鼓动国人庆祝欢迎，可谓是病入骨髓，无药可救。其二是公族弱小，且离心离德；其他诸侯疏远，无法得到帮助，导致其势单力孤，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其三是上天不佑，故意给他错误的指示，让他在无知愚昧中更加放纵。“上天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说的就是他啊！

舟之侨一边分析，一边打包行李，就在虢国上下还在为君主的美梦庆祝的时候，他早已带着一家老小悄悄跑到晋国去了。舟之侨跑路去了晋国是真的，至于那些话他究竟是不是说过已经不重要了，反正虢国最终的确是被晋国所灭。

虞国简史

虢公丑不思进取，同时也有着昏庸的名声，使得原本强盛的虢国在竞争激烈的各国竞争秩序中渐渐走向了边缘位置。但若要说他完全是个“酒囊饭袋”倒也不见得，至少在抵御晋国的入侵上，他也曾费过一番心力。这其中

最让晋国人感到头疼的，是虢国与它的近邻虞国之间牢不可破的战略伙伴关系。

虞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度缺乏存在感的国家，但要说起它的立国故事，却是大有来历。

这段故事要追溯到周朝立国之前。相传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季历有一个儿子昌很受古公亶父的喜爱，太伯和仲雍明白父亲的心意，于是双双避位，把君位的继承权留给了季历。两个人离家出走跑到了吴地，因为农业技术好，太伯就被推举为勾吴之主，建立了吴国。不过，由于太伯没有子嗣，死后把位子传给了弟弟仲雍，等仲雍死后葬在虞山，因此就有了虞仲的称号。

留在周原继承君位的季历，死后如愿把君位传给了昌，也就是周文王。多年以后，文王薨逝、武王继位，剪灭殷商、建立周朝，开始分封同姓宗族为诸侯。为了感谢太伯和仲雍避位让贤的举动，周武王派人四处寻找二人的后裔，最后终于在吴国找到了虞仲的曾孙周章。

仲雍死后，吴国的君位先后由季简、叔达继承，此时已经传到了周章这里。周武王将周章封为诸侯，奉祀吴太伯，将周章的弟弟仲封为虞君，奉祀虞仲雍，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封地在今平陆县东北部的虞国。这个被封到平陆的虞国首封之君，因为排行老二，故而也被人们称作是虞仲。

虞仲之后的历代国君似乎都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因此很难找到他们的记录。一直到了春秋时期，才有了虞君的些许记载。故事发生在虢公林父逃奔虞国的同一年，在位的虞公发现自己的弟弟虞叔得到一块美玉，于是就遣人前来索要。虞叔对这宝物爱不释手，自然舍不得轻易送人，因此毫不迟疑地拒绝了兄长的请求。

当时他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但后来有人劝他，说了些“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之类的话，把虞叔吓得不轻。他担心自己手持重宝会惹来杀身之祸，于是一咬牙一跺脚忍痛割爱，主动把宝玉上缴给了自己的兄长。

虞公得了宝玉之后还不知足，过了没多久，他又发现弟弟得了一口上好的宝剑，便贪念又起。虞叔这回可不答应了：你这样贪得无厌，刚要了我的宝玉，现在又要宝剑。我要一味地纵容你的索求无度，万一到时候你要些我没有的东西，岂不是连命都不保了？就这样，虞叔带着家兵把自己的亲哥哥虞公赶到了共池。至于后来事情是如何解决的，史料中都没有交代，只有虞公的贪得无厌被长久地留在了历史的记忆当中。

从虞公被驱逐的公元前702年，到晋献公启动伐虢大计的公元前658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此时的虞公与彼时的虞公是否还是同一个人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但其贪婪不义的名声却似乎得到很好的传承，并最终葬送了虞国的国祚。

荀息献计

公元前658年，是晋献公伐灭霍、魏、耿后的第三年，也是晋献公诛灭“桓庄之族”引来虢国讨伐后的第十个年头。经过长达十年的蓄力，晋献公连年灭国夺邑，逐步兼并了周初封建于晋南临汾、运城盆地内的诸多政权，距离实现这一封闭区域的统一大业只有一步之遥了。

然而，声势日渐壮大的晋献公，面对晋国势力范围内这仅存的两个国家时，却着实犯了难。为了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的兵祸，虞虢两国结成了紧密的联盟，给晋国人带来了不少的困扰，也让晋献公常常感到寝食难安：若要攻打其中的一方，另一方必然会前来救援，使得晋国不可能将其各个击破；可如果要同时对付这两个国家，晋国的军力难免又显得不足。

这个时候，有一位名叫荀息的大夫对两国关系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计策，这便是著名的“假道伐虢”之计。他让晋献公以晋、虢两国之间的恩怨为借口，通过外交手段说服虞公与晋国一同讨伐虢国，虢灭之后再顺势将虞国收入囊中。

这个计策的关键就在于虞国能否如愿配合晋国的行动。毕竟虞虢两国山水相依，互为依靠，他们之所以结成联盟，就是为了避免被晋人各个击破。若是虞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个计策也就无法施展。

有鉴于上文提到的虞公贪婪的本性，荀息提出让晋献公将上好的玉石（垂棘之璧）和宝马良驹（屈产之乘）送给虞公。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极其重要的物件，上好的玉石相当于现在的钻石，既属于奢侈品，又属于硬通货；宝马良驹是车战必备且极具稀缺性的战略资源。

“垂棘之璧”是玉中极品，而“屈产之乘”更是马中龙驹，晋献公着实有些割舍不下，故而颇有些犹疑地问道：“这可都是宝贝啊！假如虞公收了我们的礼物却不肯借道，那我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对此荀息早就胸有成竹，他回答说：“这就是小国侍奉大国的微妙之处所在！假如他们不愿意借道给我们，就必然不敢收这些礼物。反之，如果他们收了礼物且愿意借道给我们，那也只不过是把玉石从我们的内府藏到了外府，把那些马匹从我们国内的马厩暂时存到外面的马厩。虞国的国君只是暂时帮我们看管一下，等到虞国灭亡，这些东西还是可以拿回来的。”

听完这番话，晋献公依然不放心，继续追问道：“我听说虞国大夫宫之奇很有心计，有他在虞君肯定不会同意的！”

作为晋献公的智囊，荀息在外交上活动频繁，对虞国内情有很深入的了解，他为献公解惑说：“宫之奇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有三个致命的缺点：内心旷达，行事懦弱，而且从小在宫中由虞公抚养长大。内心旷达的人通常言简意赅，说话点到为止；行事懦弱的人就不会拼死劝谏，就算自己的话得不到采纳，也不会据理力争；另外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国君对他很疼爱，但对他的话却不会特别重视。更何况，当你把这些珍宝器物、宝马良驹放到虞公面前的时候，他根本不会考虑到自己将会有亡国之祸。这些计策只有中等以上智力的人才能识破，就虞公那老朽之人，智力也就是一般偏下，您就放心吧！”

荀息的这番鼓动让晋献公瞬间信心满满，当即便委派他到虞国去交涉借道事宜。到了虞国之后，荀息先是跟虞公拉了拉家常，讲起了虞、晋两国联合消灭冀国的故事。当时冀国从颠軫入侵，围攻虞国郟邑三面城门，晋国急公好义出兵攻打冀国，这才解了虞国围城之困。

说完了这些，自然就该说虞君该怎么回报晋国了。荀息向虞公提出：现在虢国建筑堡垒，攻打敝国南部的边境。我们也不要求贵国出兵攻打虢国，只是想向贵国借道，好让我们去找虢君问罪。

果然不出所料，虞公自然是欢喜的，他不仅同意借道，甚至还抢先提出要帮助晋国打前站，但宫之奇却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在朝堂上极力劝阻：“晋国使者言辞谦卑而礼物厚重，一个大国对我们这样的小国如此恭敬，怕是有见不得人的阴谋，我担心他们会对虞国不利啊！”

虞公不听，宫之奇继续晓以大义：“正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虞虢两国互为依靠，虢国一旦灭亡，虞国又岂能独善其身？”可虞公固执己见，终于还是同意了晋国借道的请求。

在做完借道联虞的一系列工作之后，晋献公十九年（前658年）夏秋之际，晋国大夫里克、荀息带着晋虞联军，通过虞坂古道直抵下阳城下。不久之后，下阳城被攻陷，虢国退守黄河以南的上阳，第一次假道伐虢战役结束。

伐虢灭虞

下阳是虢国扼守虞坂古道，封锁晋国南下之路的重镇，失去下阳，对于虢国来说意味着再无防范晋国的能力。可虢公似乎并没有被这些事情所困扰，反而忙于建功立业。失去下阳没多久，他就在桑田打败了“戎狄”。晋国的大夫郭偃（卜偃）听闻后评论道：“虢公丢失了下阳不感到恐惧，经历了战争不是积极防御晋国并安抚民众，反而去别处建功，这是上天不愿意让他反省，加重他的衰势啊！过不了五年，虢国必然会灭亡的。”

第一次假道伐虢三年后，也即公元前655年，里克、荀息再次借道虞国伐虢，虢国终于迎来了决定他们最终命运的时刻。

只是毫不意外，这次宫之奇又出来劝阻了，他痛哭流涕地对虞公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亡了，虞国很快就会步其后尘的。晋国的野心太大，你让他们的军队走了一次还不够，怎么还要来第二次？这样下去是养寇为患，到最后将会危及虞国的啊！”

虞公很不高兴地反问道：“晋国与我是同宗，难道还会加害我不成？”

宫之奇回顾了虞虢两国的渊源，说：“太伯、虞仲是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因为避位让贤所以才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都是王季（周王季历）的儿子，做过周文王的卿士，他们的功勋都是在王室盟府中有记录的！”意思是说，虞国是晋国的同宗不假，可虢国也同样是晋国的同宗，晋

国想要伐灭虢国的时候，何曾考虑过同宗之谊呢？他们既然能不顾宗亲手足情谊灭掉虢国，为什么就不能灭掉虞国呢？

看到虞公不以为然的样子，宫之奇又接着追问道：“虞国与晋国亲近是没错，可是你再亲能亲得过桓庄之族吗（那可是三代之内旁系血亲）？桓庄之族有什么罪？不就是因为使他们感觉受到威胁就全被杀掉了吗？那些亲近的人尚且被无辜杀害，更何况是血亲早已冲淡了的邻邦呢？”

虞公吃人嘴软，一个劲地为自己解围：“我奉献的祭品又丰盛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

宫之奇又用鬼神来劝导虞公：“上天和鬼神都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心去亲近谁，他们只会亲近辅助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上才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还说‘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说‘民不易物，唯德絜物’。”

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说，你献上的那些祭祀品再好，对鬼神来说也都不够香甜，只有美德才是真正芳香的。所有人祭祀上天的祭品都没有多大的区别，有区别的只有人的德行，这才是神明真正依从的东西。

因此说：“如果没有德行，百姓就不会和睦，天上的神明更不会来享用你的祭品了。假如晋国占领了虞国，然后修养自己的德行作为祭品献给神明，神明难不成还会把这些都吐出来吗？”

宫之奇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虞公却是一句也没听进去，最后又同意了晋国的请求。宫之奇闻听后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虞国大概是撑不到今年的腊祭了”。回家之后马上吩咐家人收拾细软逃跑，与舟之侨的见风使舵不同，宫之奇并没有投入敌国，而是躲到西山避祸去了。

这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二次借道虞国，围攻虢国都城上阳。十月初一日，晋军顺利攻克上阳，并附带灭掉了虢国附庸焦国（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故焦城），虢公丑奔周，虢国宣告灭亡。

灭虢之后，晋军回师途中在虞都附近迁延不去，虞公对此毫无对策，只能任由晋国大军在城外驻扎。随后，趁虞国疏于防范，晋军发动突袭灭掉虞国，俘虏了虞公及井伯等一众大夫。

当此大获全胜之际，荀息满怀喜悦地将之前贿赂虞国的马牵到献公面前，献公不无感慨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牙齿有些老了！”

所谓忠信

晋献公假道伐虢的多数史料都来源于《春秋》三传及《国语》。在这些史料中，出场次数最多的并不是晋国君臣，也不是虢国上下，而是虞国的大夫宫之奇。有关战争进度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在围绕他的言论展开，他所说的“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也成了后来脍炙人口的金句，这也使得宫之奇总是以先知先觉、睿智卓学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而与之相对的虞公则是一个贪财好利、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然而这些结论是否站得住脚，还很值得商榷。

总结宫之奇在三传中的表述，其核心思想无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虞、虢两国要抱团取暖，相互依赖，这大概是晋国伐虢之前虞国采取的一贯措施，也是晋人最为忌惮的一点。反过来讲，晋君无耻、不讲信义，连亲族都可以诛杀，作为同宗的虞国显然不能将其作为倚靠，与晋国结盟更是不可取的。

第二，鬼神和上天只辅助有德行的人，而不是虔诚地奉上祭品的人。究竟什么样的德行才是上天所眷顾的呢？三传中没有详细交代，倒是《国语》借宫之奇之口进行了一番附会，其侧重点主要是“忠”“信”二字，认为只有讲求“忠”“信”的国家，才能在有外国军队驻扎的情况下不受损害。

那究竟什么才是“忠”呢？宫之奇解释说：“除暗以应外谓之忠”——所谓的“忠”，就是去除对方的阴谋来应对敌人，也有人将其翻译为除去自身的愚昧以应付外界的压力。初看这句话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无论采取何种解释，似乎都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忠”扯不上半点关系，用来形容机智或者聪慧似乎才更贴切一些。

为了解释清楚为什么“除暗以应外”就是“忠”的表现，宫之奇又进一步阐释说：“今君施其所恶于人，暗不除矣。”遭受被灭国的命运，是每一个为君者都不愿意看到的，虞公自己也不能例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你自己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自然也就不应该施加给旁人。如今虞公的做法显然违背了这一宗旨，他不但不能尽力粉碎晋人的阴谋帮助虢国反制晋国，反而为晋人铺路去伐灭自己的友国，让虢国接受虞公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这就是对虢国的“不忠”。

对于所谓的“信”，宫之奇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定身以行事谓之信”，也就是要坚持正确的立身处世之道，在大是大非面前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左右摇摆。具体到借道予晋这件事情上来说，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欲而背弃友国，不管这种私欲是来自于贪欲还是自身的恐惧，都要堂堂正正不为所动。虞公因为贪图宝马美玉而背弃了自己的亲密邻邦虢国，这是“以贿灭亲，身不定矣”，就是“不信”。

最后他总结说：“夫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衅而归图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离开了“忠”就无法立足，离开了“信”就无法稳固，不讲忠信就等于是丢掉了立国的根本，国家怎么还能长久？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留外国军队在本国驻扎，敌人知道了你的底细之后，就会回过头来谋算你，虞国不亡何待？

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一个疑惑：既然说忠信是立身处世的根本，那么宫之奇知道国家将要灭亡，自己却跑到深山里去享清闲，这样的行为是否也是忠信呢？

在儒家的观念中，宫之奇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忠信”并不只局限于君臣之间，而是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这是一个人走向“仁者”之道的必由之路。而在这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人最低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如果你还有更高的追求，那就试着去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同理心去体察、推知他人的内心需求，从而积极帮助他人，并进一步扩展到“达则兼济天下”甚至是“尽心于王道”，以自己内心的追求去惠及天下所有人。

具体到政治生活当中，“忠”的表现不仅仅是要忠于主君，更是要忠于天下、忠于同僚、忠于百姓。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作为臣子不应该追求所谓的愚忠愚信，而是要时时刻刻都遵从从一个正确的信念。如果你侍奉的国君是如商汤、周武这样的贤君，你自然要尽心尽力地辅佐他们。假如君主没有那么贤明，就应该及时纠正、阻止他的错误。若是遇到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乘桴浮于海”“走为上策”也同样不失忠骨。

因此对于宫之奇来说，既然国君已经选择了背弃忠信，他尽己所能一再劝谏，已经算是尽了“忠”的本分。这个时候，守正自己的人格底线，不与不忠不信的行为同流合污，选择体面地退出，也正是“信”的体现。

献公功业

说完这些，我们回过头来看，是不是虞公遵循宫之奇的这些原则就一定能够保全虞国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宫之奇的说法包含了太多意识形态的色彩，着力从“德”的角度来阐释国家兴亡的内在联系。也正是为了附和这套说辞，史书上才有了虢公丑贺鬼和虞公贪婪不义的故事。抛开这些道德说教的故事不论，对于晋、虢这场冲突的起因，实际上也并不难理解。

虢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故夏地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曾一度与东方强国郑国分庭抗礼，并几度干预晋国内政，让曲沃的几代君主都对其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晋献公即位初期，晋国的实力已经有所提升，但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碾压对方的地步。当同一地区出现了两个实力相当的强权，就很容易陷入现代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只是与晋武、献两君积极进取的姿态不同，虢国的几代国君似乎都只满足于王室卿士的地位，仅仅为在以王室为主导的政治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沾沾自喜。然而时移世易，伴随着天子权威的一再滑落，以及郑、齐等国在东方的开拓，国际政治的逻辑已经从王权秩序转向了霸业秩序。虢国僵化保守的政治观念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等待他们的便也只有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当此晋虢相争的关键时期，虞国这样的小国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其命运便如飘零之浮萍，根本由不得自己掌控。《穀梁传》在提到借道一事时，曾引述荀息的话说“此小国之所以事大国也”，可以说是道出了其中的关键。当荀息带着宝马美玉前来商议借道事务的时候，虞公实际上早已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听从宫之奇的劝说，与虢国联合抵御晋国固然更符合道义，但却会将虞国推向晋国的对立面，给对方以名正言顺讨伐自己的借口。以虞国本身微弱的实力，以及虢国聊胜于无的支援，虞国抵死抗衡的结果，恐怕也只是灭亡得更快，后果也会更加惨烈。

虞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不顾宫之奇的劝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晋人苟合，除了抱有一丝侥幸之外，更多的恐怕还是希望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最后的结果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晋国虽然灭掉了虞国，但却并不废弃虞国的祭祀，还把虞国的赋税归于周王，让虞公继续坐享荣华、安享善终，这恐怕已经是他最好的归宿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虢国的政治版图大致在今山西平陆到河南三门峡一带，虞国国都则位于平陆以北的张店镇古城村附近。两国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地带，秦岭、太行两大山系的衔接处，向北有虞坂古道控扼晋国的咽喉，向西有崤山函谷关锁钥百二秦关，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晋国南下争雄，还是秦国东出求霸，茅津渡口前的崎岖古道都是他们的必经之地。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当历史跨入春秋中叶，虞、虢所处的位置已经成为秦、晋两大强国争锋的焦点所在，如此险要的地理形势，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必将成为秦、晋两国眼中的珍馐，无法在这乱世中独善其身，这将是我们在后文中着重探讨的议题。

春秋早期正处于政治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像一个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兼并和灭国已经成为风气。一个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的国家，一味地遵循礼仪

王道，并不能使自身摆脱被吞并的结局。彼时兴起的国家往往是在不断变化的时局中，果断采取改革措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逐渐在这黑暗森林中得以立足。那些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只能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虞、虢两国正是这场淘汰赛中微不足道的牺牲品罢了。

在完成了假道伐虢之战后，晋献公时期的对外扩张便基本告一段落了。经过这短短二十年的发展，晋献公以“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功业，使得晋国从一个蕞尔小国（偏侯），发展成了一个地方千里的大国。

按照《史记》的说法，到晋献公去世时的公元前651年，“晋疆（通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晋国疆域的最西端已经越过黄河，进入陕西东部，与秦国接壤。即便是考虑到讨伐骊戎当年被秦国打败，导致失去了骊山地区，其疆域的西垂也仍然延伸到了陕西大荔附近。向东则有卫国的故地，大体就在今天的邯郸、安阳、新乡一线，与齐、鲁、卫、宋、郑等东方大国遥遥相望。向北则有霍国故地与戎狄相拒，势力范围到达了今天的灵石、介休附近。往南大致与今天的山西、河南交界相当，有些地方已经越过了两省交界，进入了河南西部地区。

这些疆域基本构成了晋国后来的领土格局，为后世君主逐鹿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献公功业的基础上，后世的惠公、文公不断推陈出新、力行改革，晋国才拥有了称霸中原的资本。从这一角度考量，晋献公恐怕才是成就晋文公霸业辉煌居功至伟的第一人。

第三章 “国无公族”制度的成型

第一节 手足相残

献公之忧

晋献公是在其父亲武公统一晋国两年后即位的，依照晋武公伐灭夷国以及晋献公几位公子的年龄来推算，其即位时应正值壮年，在政治上还不很成熟，而他身边的宗族们却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功臣元老，这就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按照《左传》上的说法，晋献公即位初期面临着被“桓庄之族”逼迫的局面，这与晋昭侯即位时受曲沃桓叔压迫的旧事颇有些类似。

这里的“桓庄之族”，指的是晋献公的近支亲族。其中的“桓”是其高祖曲沃桓叔，“庄”是其祖父曲沃庄伯，他们的后裔中除了国君（晋武公）一系之外的其他子嗣后裔被统称为“桓庄之族”。桓庄之族在内战中与国君一系同仇敌忾，为曲沃最终统一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一旦战争结束，功臣贵勋的分配问题就成了新统一的晋国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帝制时代的开国君主通常都面临着功臣安置的难题，为了处理这些疑难问题，开国君主们也都绞尽脑汁。比较粗暴的一种是诛杀，比如刘邦和朱元璋，他们的“创业团队”都是在“造反”的过程中临时拼凑起来的，个人情谊没有那么深厚，只要有潜在威胁的就一律杀掉。第二种是转移安置，比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因为都是前朝里带兵打仗的将领，说些好听话送些礼物就可以轻易解除威胁。要说最有手腕的，当还要数唐太宗了，对同样出身“关陇集团”门阀世家的贵族们，又是送锦旗唱赞歌，又是进行再就业辅导，不知不觉间就把他们手中的实权给卸掉了，算是最为圆满的。

晋献公与后世的帝王也有着同样的忧虑。“曲沃代翼”的内战刚刚结束，与之有近亲关系的“桓庄之族”在内战中建立了功勋，此时都亟待分封。在大规模的利益分配面前，公平性是一个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劳苦功高，需要得到比别人更多的赏赐，而如何对各人的功勋进行量化，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公平合理的分配，就变成了晋献公面临的头等大事。

这可真让晋献公犯了难，若是晋武公还在，以他的权威分配土地，即便是不公平，也没有谁敢说什么。晋献公没有经过多少战火的历练，自然也没有能够服众的权威，因此无论他出什么方案，都会有人跳出来表示反对。而更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是，曲沃以小宗取代大宗，国家的权柄几乎都操持在“桓庄之族”手中，先代的公族如栾、先、籍、祁、郤等氏大多都不显达，又使得他缺乏制衡“桓庄之族”的力量。

士蒍之计

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一名在晋国供职的异姓大夫，给晋献公提出了一个妙计。这个人名叫士蒍，字子舆，其先祖是原来在唐国的土地上世代繁衍的唐尧后裔。周宣王年间，时任杜伯被天子所杀，他的儿子杜隰叔跑到晋国担任士师（也即法官），其后代也一直世袭士师的职务，成为晋国的“祁姓士氏”家族，此时担任士师的就是这位士蒍。

在以公族为主体的政治体系中，士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人，不存在亲情血缘的羁绊，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就多了一分肃杀之气。他的建议很简单，只有四个字：斩草除根。

这个建议的确过于惊世骇俗。春秋初年，东方各国内乱不断，宗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事迹屡见不鲜，但还没有谁狂妄到敢把整个公族连

根拔起。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擅杀亲族不仅是一条了不得的罪名，更是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

一方面，周代的宗法制讲究“亲亲尊尊”，国家本身就是通过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秩序构建起来的。国君在任命官员、分封土地的时候，都要以此作为首要原则。在这个框架之下，没有明确的罪责却要杀掉至亲和地位尊贵的人，在舆论上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诛杀手握重兵的功勋贵戚是一项宏大且极具危险性的系统工程，很难保证行事万无一失，一旦处理不慎就极易反噬自身。

也正因为如此，晋献公在听到这个计策的时候，多半会有所犹豫。但士蔿却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只要去掉了富子，其余的公子们也就好对付了！”

关于士蔿所提到的“富子”，史料上没有任何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记载，但从士蔿的判断来看，这名“富子”显然是群公子中的核心人物，是最有权势、最富智谋，也最有可能危及君权的人。

至于他是如何对付“富子”的，《左传》中只提到了一个字：“谮”。也就是在群公子中制造对富子不利的流言，离间他与群公子之间的关系，然后假手于“桓庄之族”将富子驱逐。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曾指出，当一个孤立的个体融入了群体之后，他的个性就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从而产生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绪激动等特征。群体当中的领袖，必须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一个能够提出断言的人，他的行动能够直接带动整个群体成员追随和效仿。

作为世代以司法工作为主业家族的继承人，士蒍大概称得上是一个深谙人性的行家里手，也是一个玩弄心术和贩卖焦虑的高手。在以“桓庄之族”组成的群体中，“富子”就是那个具有超强意志和决断力的领袖，而士蒍要做的就是打破“富子”身上的光环，并进一步取代其在群体中的领袖地位。

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士蒍于晋献公六年（前671年）首先与群公子合谋赶跑了富子。第二年，又如法炮制杀死了游氏之二子，第三年将游氏合族消灭。

在做完这一系列工作后，士蒍信心满满地对献公说道：“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不出两年，国君就不会再有忧患了。”

在上演了两场大戏之后，群公子之间互相猜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而这也正是士蒍布局中最重要的一步，当人们的焦虑情绪被充分释放出来，内心中充满了非理性情绪的时候，便是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

聚邑之围

公元前669年（献公八年），士蒍以国君的名义，将群公子安置到绛都南部的聚邑（今绛县东南车厢城）。或许是以为大封土地的日子就要来临，群公子个个都欣喜若狂，于是便终日饮酒作乐，享受着人生中最后一次狂欢。

这年冬天，凄冷的北风越过了千里冻土和草原如约而至，晋国的原野上也显露一番萧瑟的景象，苍黄的土地上已没有一丝生机。往日在树林中活跃的麋鹿和野象，此时都不见了踪影，山林中最后一片黄叶，也在凛冽的寒风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它久久眷恋的树枝。

群公子们聚拢在聚邑的城墙上，遥望着国君的旌旗和车马浩浩荡荡地从都城开拔过来，整齐的车队成行成列、井然有序，鲜艳的旗帜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亮丽。他们行军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战车的阵列竟然也可以这么美。

国君带着卫队进入了聚邑时，他们匆忙从城墙上跑下来，在城门口夹道欢迎。眼看着卫队进入了分封的场地，分列在广场的四周，旌旗飘扬、戈戟肃穆，他们内心就越发地期待。他们急迫地整理了衣冠，有序地走到了场地的中间，整齐地排列成行，翘首盼望着典礼的开始。在这急切的等待中，他们都压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互相吹捧逗笑，嘈杂的广场就像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然而他们始终没有等到国君的登台。

不知过了多久，伴随着一阵尖利的呼啸，青铜的箭雨带着令人战栗的风声从天而降，清洁而平整的广场瞬间变成了一片血海。许多人还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就发现鲜血已经从自己的身上喷涌而出；有很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失去了知觉，永远都醒不过来了——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此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就在死去的那一刻，脸上还挂满了幸福的微笑。然而更多的还是受到重伤的人，他们在血海中痛苦地挣扎抽搐，不断地呻吟哀号，如海浪一般的欢笑声霎时间变成了震天的哭喊声。

有人在随从的保护下奋力地想逃离这个广场，可广场四周的卫兵却迅速将他们包围起来，用长戈和矛戟刺穿了他们的身体。不久之后，痛苦的哀号和喧闹便平静了下来，间或有低沉的呻吟断断续续地传来，也被面无表情的卫兵迅疾抹掉了。

苍天无语，大地无声。

桓庄之族的群公子——曲沃桓叔和庄伯的满堂儿孙，就在这样一个阴冷的冬天里被屠戮殆尽。只有少数的公子逃离了聚邑，漫无目的地奔跑在冰冷的原野上，他们绝望地狂奔、无力地哭喊，却终究无法得到苍天和大地的回应。

这些在曲沃代翼战斗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公子们，除了韩万在武公时期获得了封地而得以幸存之外，其他人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印记，只有他们集体的称谓“桓庄之族”为后人所知。即便是那些侥幸逃出生天的人，之后也都湮没在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再也没有了消息。

晋献公诛杀桓庄之族的灭亲之举实在是骇人听闻，有公子逃到了虢国，将这场惨无人道的泼天大祸上达天听，在中原大地激起了滔滔巨浪。于是第二年（前668年），担当天子卿士的虢君再次起兵伐晋。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晋国早已不惧怕虢国的征讨，经过内战之后将近十年的休养生息，晋国已经初步恢复了文侯时的疆域。此外，在兼任司空的士蒍主持下，绛都的战后重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重建后的绛都城防设施更加完善，规模也更为宏大。在没有其他同盟的情况下，虢公大兴兵马伐晋却讨不到任何好处，只是惹了一身骚，此后作为周王卿士的虢公再也没有胆量与晋国过招，直到最后为晋国所灭。

晋献公用最为残酷的手段，以最为惨烈的代价，摆脱了公族势力的操控，保证了君权的稳固，同时也让晋国在礼崩乐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聚邑之围的长期谋划，缔造了晋献公对内政策中鄙弃公族的坚定理念，为了宣示他的这一理念，他在曲沃建造了宗庙，以表示曲沃永远都归公室所有，不会再赐给亲属和臣下。

而这一切，也为杀嫡逐子的“骊姬之乱”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第二节 风波初起

献公私情

作为一名有着赫赫武功的君主，晋献公在政治上有着强烈的集权主义倾向。为了稳固君主权位，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屠戮自己的宗亲手足，从而制造了“尽杀桓庄之族”的惨剧。然而，从历史影响来看，“桓庄之族”的覆灭似乎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真正对晋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的，还要数之后发生的“骊姬之乱”。而提到“骊姬之乱”就不得不对晋献公的家庭关系进行一次梳理。

按照《左传》的记载，晋献公即位之前，曾娶过一名贾国公族的女儿。这门亲事本就是一场政治联姻，两个人的关系想必也不甚融洽，因此婚后多年都没有子女。后来曲沃在武公的经营下发展壮大，已经不需要贾国这个外援了，干脆就灭掉了贾国。献公正好也始乱终弃抛弃了贾君，爱上了自己的庶母，一名来自齐国公族的女子——齐姜。

齐国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开放，没有什么教条的约束，成长在这种开放环境中的齐姜自然受不了太多的拘束。偏偏她嫁到晋国的时候，武公早已是一位耄耋老人，无法将他们的“爱情”进行完美的升华。正当她为自己无望的一生而忧思之时，年轻气盛的诡诸出现在她面前，这位“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翩翩君子，瞬间就俘虏了齐姜那颗多情的少女心。

这段隐秘的私情并没有藏匿太久，因为武公在完成统一大业后便驾鹤西去了，正好就成全了这对小情侣。齐姜为刚刚登临国君之位的情郎生下了一双儿女——申生和伯姬，晋献公大喜之余，正式将齐姜扶上了国君夫人的位置。

然而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齐姜在生下这一双儿女后就去世了。这个噩耗如晴天霹雳一般，使得刚刚沉浸到幸福之中的晋献公，很快就陷入了肝肠寸断的痛苦境地。不过他并没有悲伤太久，大雨过后又是晴天，他把申生立为太子，然后化悲痛为力量，先后征服了许多小诸侯国和“戎狄”部族。

不少受到晋国威胁的部族为了求存，纷纷前来请和。他们带来了数不尽的珍宝财物，同时还将部族中最美丽的女子送给了晋国的君主，这其中就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分别是“狐氏大戎”的狐季姬和“允姓之戎”献上的小戎子。

献公在这两名女子的服侍下渐渐地摆脱了丧妻之痛，而且还新添了两个儿子，分别是重耳和夷吾。可即便是妻妾成群、儿女成行，似乎也并没有真正驱走晋献公心底的寂寞。

到继位第五年（前672年，也即士蒍设计驱逐富子的前一年）时，献公带兵西渡黄河，攻伐位于渭水流域的“骊戎”，俘获了骊子的两个女儿大胜而归。这两名女子都很有姿色，让献公意乱情迷甚是欢喜，于是便决意要立姐姐为夫人。而这名受到献公宠幸的女子，就是后来在晋国掀起滔天巨浪的“祸国红颜”——骊姬。

卜史之忧

晋献公再立夫人的举动在国内激起了强烈反响，这其中反对最为激烈的是一名史官，人称太史苏。

太史苏掌管史书，对过往的历史极为熟悉，他列举了夏桀伐有施氏得妹喜、商纣伐有苏氏得妲己、周幽王伐有褒氏得褒姒的例子，苦口婆心地劝告

国君，说娶亡国之女是不吉利的，更不可以立为夫人。否则的话，“有男戎必有女戎”，晋国用男人战胜了骊戎，骊戎一定会凭借女人来战胜晋国。

然而对于史苏的这番忧虑，国内信之者却寥寥无几。

原来，在征伐骊戎之前，献公曾让太史苏占卜吉凶。太史苏算了一卦，按卦象说是“战胜但最终不吉利”，因此不应该前去讨伐。献公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鬼神之说，故而对太史苏的预测颇有些不以为然。甚至当太史苏解释说卦象中最忌遇到“口”的时候，他竟然傲慢地说道：“哪来的什么‘口’！‘口’都由寡人控制，寡人不接受，谁敢大放厥词？”

晋献公不顾劝阻执意攻打骊戎，结果大获全胜，还抱得美人归，回国后便宴请众大夫，觥筹交错间颇为怡然自得。可巧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太史苏，想起了之前占卜的事，便想搞个恶作剧来羞辱这个油盐不进的史官，于是特命司正在招待太史苏的时候，只给他盛酒，却不能上肉吃。

太史苏是“哑巴吃黄连”，因为他原本说的就是“战胜但最终不吉利”，并没有说“无法取胜”。可献公根本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

与晋献公持相同态度的还大有人在，这其中就包括同样负责“卜祝”事务的大夫郭偃（又称卜偃）。所谓“同行是冤家”，看到太史苏吃了瘪，郭偃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架势，以其“专业主义”精神细细地对太史苏的见解进行了一一驳斥。在他看来，太史苏的解卦和所举的那些例子并不恰当：“宠信女子不是祸患的源泉，荒淫惑乱、放纵奢侈才是亡国的真正原因。现在晋国國小地偏、强邻环伺，国君就算是想要犯错，也总有人撻着袖子准备教训他，让他改正错误。”

至于说骊姬是否真的会带来灾难，郭偃似乎并不否认这种可能，他认为假如祸乱真的发生了，那也不过是改立三五次国君的事，离亡国还差得很远。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郭偃同时从礼义、德行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骊姬既没有上天的支持，也没有百姓的顺服，更没有正义的理由，以她个人的这一点智谋，是无论如何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的。就算是她想要背弃礼法制造混乱，最后也不过是如田间的“隶农”一般，虽然获得了一块良田且勤耕细作，却也终究是为人辛苦为人忙而已。

郭偃的论述着实有些强词夺理，尤其是他在提到“不过是改立三五次国君的事”时，那种云淡风轻的态度更是令人咋舌，太史苏估计都要被他气晕过去了。正当此时，献公的智囊士蒯及时出现，为他们打了个圆场，说：“两位大夫说得都很有道理！但要我说，与其坚持无用的劝说，还不如提早做好防备，这样一旦真出事了也不至于手忙脚乱。”这才算把一场风波给压了下去。

国君要立夫人，与后世皇帝立后一样，都是极其隆重且严肃的大事。特别是在春秋时期，人们信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和战争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而在这两件事中，宗教又是排在第一位的。宗教生活的具体表现便是祭祀和占卜，但逢国君更立、战事攻守、人事更替等重大活动，都要举行占卜和祭祀的仪式，以从上天和神祇那里得到启示。想立骊姬为夫人，就必须按照传统，通过占卜来征询上天的意见。

在这件事上，晋献公倒也不含糊。他郑重其事地请人用龟甲占卜，可占卜的结果却是不吉。献公铁了心要立骊姬为夫人，一看龟甲不行，又让人用蓍草占卜，终于得到了“吉利”的卦象。有了这样一个结果，晋献公就像是一个找到心爱玩具的孩子一样破涕为笑。他开心地说道：“采用蓍草占卜的结果。”

卜人劝道：“蓍草的寿命太短，算卦不如龟甲灵验。况且龟甲上的卜辞也说了，‘专宠会使人心生不良，将会夺走您的所爱’，‘香草和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以后还会有臭气’。说明这个事件的影响还会特别久远，希望您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

晋献公早已是意乱情迷，最终还是排除万难，如愿把骊姬立为了夫人。不过，这也仅仅是历史大剧开启前的一个花絮而已，真正的故事要到六年后（晋献公十一年，公元前666年）才正式揭开帷幕。

轻阴乍起

这一年是晋献公征伐骊戎后的第六年，也是“桓庄之族”覆灭后的第三年。在这六年中，由俘虏登临夫人宝座的骊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奚齐，并开始为儿子争夺储君之位进行谋划。

按照我们当前所掌握的资料，奚齐的主要竞争对手有三个人：首当其冲的是齐姜的儿子太子（太子）申生，其出生的时间大概在献公元年（前676年）前后；其次是狐季姬的儿子重耳，出生于献公六年（前671年）左右；再次是小戎子的儿子夷吾，出生在重耳之后，大约献公七年（前670年）左右。到献公十一年骊姬开始“策划阴谋”的时候，其中最年长的太子申生也不过十一岁，其余诸公子如重耳才六岁，夷吾五岁左右，奚齐则更小。也就是说，晋国此次君位的争夺都是围绕着一群稚气未脱的小孩子展开的。

为了能够有效地打压竞争对手，给奚齐将来的上位铺平道路，骊姬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竞选”班底。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叫优施，是一个在宫廷中负责演戏逗乐的演员。优施因职务便利常年在宫中活动，信息渠道通畅，主要负责为骊姬收集信息、出谋划策。具体执行“公关”活动的是梁五和东关五，常被人贬称为“二耦”或者“二五耦”。

优施详细分析了竞争对手，尤其是申生的性格特征，认为其“小心精洁，而大志重，又不忍人”。也就是说申生有三个明显的缺陷：其一是为人过于正直清高，处事小心谨慎且洁身自好，对自己要求甚高，可以说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其二是敦厚木讷，不懂变通；其三是待人宽仁，不忍心谋害别人。

正直孤傲的人都很爱惜羽毛，最受不得羞辱，这便是他最大的软肋。老实持重的人，以至诚之心待人，就没有戒备心，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而他那颗善良仁慈的心，又使得他即使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也不愿意去伤害他人，只能戕害自身。

申生有着如此软弱的个性，加之齐姜的早夭，使得他没有母亲和亲族的庇护，自然就应该将其作为重点的攻击对象。

至于如何攻击申生，优施在回答骊姬的疑惑时提出：“夫人现在深得国君宠爱，您要是说一个人的好话或者坏话，国君是断然不会怀疑的。”对待申生，要两面出击：“在国君面前，就极力说他的好话，而在背地里，大可以散布一些流言蜚语，以不义的罪名羞辱他。这样一来，他还能坐得住吗？”

看到骊姬还有些不放心的样子，优施继续补充道：“申生虽然精明，但越是精明的人越容易蛮干，越不懂得躲避灾难。”也就是说，即便他知道是您背地里做的也不要紧，国君看到的是您处处维护他，如果他敢于申诉，只能让国君对他更加不信任，这岂不是对您更有利吗？

就这样，骊姬运用攻心之计在舆论上造势，摧毁申生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又在心理上加压，逐步蚕食申生的防卫边界。在这双重打击之

下，才只有十几岁的申生怎么可能想得到破解之法，自然就只能任人摆布了。

一国三公

想要在人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没有具体的点位渗透，还是无法撼动申生的太子地位。为此，在做好了基本战略规划之后，优施立刻就抛出了一个撒手锏。

这项工作是由梁五和东关五，也就是人们所俗称的“二五耦”来具体执行的。他们向献公提议说：“曲沃是晋国宗庙所在，需要强有力的公子前去镇守，百姓才会畏惧，太子就是最佳的人选。”与此同时，他们也没忘了要敲打一下重耳和夷吾，提出：“蒲城和南北二屈是晋国的边疆要塞，若是没有信得过人前去坐镇，恐怕会让戎狄产生觊觎之心，正好可以让重耳、夷吾两公子前去主事。这样一来，狄人广阔的土地成了晋国的都邑，几名公子也都得到了历练，于公于私岂不都是好事？”

“二五耦”的游说工作做得极好，晋献公当即就同意了这项“提案”，并命令大司空（也就是在聚邑之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士师）士蒍带人去修缮宗庙所在的曲沃，以及边防重地蒲城、二屈等邑的城墙。

士蒍是一个头脑极其清醒的政客，他虽然积极主导了聚邑之围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可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没有底线。特别是如今的这件事，是决定未来家国命运走向的大事件，与之前的重压之下不得已做出选择完全不同。在这件事上，国君可以任性，他自己却不能不慎重考虑。

士蒍深知诸公子一旦外放意味着什么，为了避免被动站位，他故意磨磨蹭蹭拖延工期，即便开工了也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大概是想用消极的态度

让这件事自然流产。可只有幼儿园年纪的夷吾似乎并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又或者是他的师保已经认定此事没有转圜余地，必须要趁此机会为夷吾打造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便跑去找晋献公告士蒯的黑状。

晋献公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便怒气冲冲地质问士蒯为什么要这么做，士蒯慌忙解释说：“臣听说，没有丧事却悲伤不已，忧患必定会接踵而至；没有外患却大兴土木，别有用心的人一定会据此为患。诗中有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如果国君能够修养德行，那么宗室子弟就是城墙，就没有必要劳民伤财。如果这座城池注定要被敌人占据，现在修得越结实，将来的麻烦也就越大。如此一来，若是我不听从您的命令，那便是不敬；若是听从了您的命令，却又不忠——您是想让我如何抉择啊？”

士蒯的话说得很明白，你无缘无故把有着众多师保私属的公室子弟外放出去，就是要给他们自立反叛的机会，这无异于是在给自己制造潜在的敌人。因此不如把城墙修得差一些，将来万一有了什么事，也不至于太过于被动。

但以晋献公对夷吾投诉的反应来看，他此时显然并没有针对几位公子的意思，也没有意识到事情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因此对士蒯的建议未予理睬。

看到自己的逆耳良言没能挽回国君那颗执拗的心，士蒯也只能喟叹：“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意思是狐裘的皮毛杂乱无章，一个国家出现了三个主人，我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城池修筑完毕，晋献公即令太子申生迁往曲沃，公子重耳守卫蒲邑（今山西蒲州，位于黄河金三角秦晋边界），公子夷吾驻守南北屈邑（今山西吉县吕梁山区，与戎狄相邻），其余年纪稍长的公子们也都外放边邑，只剩下骊姬两姐妹的儿子留在绛都。

君臣之义

让几个小孩子驻守边城，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政令甫出，朝野上下顿时就炸开了锅。那个以预言而闻名的太史苏见人就说：“你们可都要小心了，晋国就要出乱子了！”

因为史书读得太多，他对亡国之女有着天然的戒备，因此又旧事重提：“国君杀掉了骊姬的父亲，却把骊姬留在身边，还对她言听计从——可是谁又能知道她暗藏了多少祸心呢？”

红颜祸水是太史苏一直以来的论调，这点不奇怪，但是他的另一番论调却真实地反映了此时在晋国国内悄然发生的变革。太史苏说：“古代的明君向外征战，都是在为百姓除害，为百姓谋福利，因此百姓才拥戴他，愿意为其尽忠竭力甚至不惜一死。而如今我们的国君外出征伐却只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打了仗之后百姓没有得到实惠，导致君臣离心，国家就要混乱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以前的时代里，历代的王朝和诸侯虽实行君主制，但多少还有些贵族民主制的色彩。他这里所说的百姓并不包含庶民，而是指贵族，国君带领贵族出征是有共同利益的，征战成功之后要利益均沾，国君不能独享，国君与贵族之间存在着相互制衡的关系。

但到晋献公所处的时代，诸侯国的势力范围在不断扩张的同时，国君的权力也日益增强。此时的国家制度，已经逐渐从小国寡民的贵族民主制开始向君主集权制过渡了，这是整个东周时代的潮流，也是春秋早期的一股暗流。太史苏虽然史书读了很多，对这种潮流却总是看不透。作为旧制度的忠实拥趸，他看到贵族的权力在国君集权的挤压下日益逼仄，感到了深重的危机感，但却无力做出改变。

与太史苏处于同一时代的大夫们都有着同样的困惑，他们也都无时无刻不处于与国君的博弈中，我们可以从里克、荀息和丕郑三个人在看待太史苏预言的表述中看出一些端倪。

这其中，后来策划“假道伐虢”的荀息，可以说是最早进入状态的。他认为：“以臣事君，就应该尽心尽力，不能违抗君命。国君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我们只管服从就是了，怎么可以有二心呢？”

丕郑则还抱着固有的观念，认为贵族与国君之间的关系应该存在制衡：“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所谓的义，就是国君与贵族之间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有了这种关系，社会秩序才能运行不悖，才能实现君臣共赢。如果国君一意孤行，这种和谐共存的关系就遭到了破坏。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就是说，国君的决策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可以顺从；然当国君的决策出现了偏差，就要坚决反对。如果不论国君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言听计从，无异于是自废武功。在这一点上，丕郑和太史苏的观念倒是达成了一致。

里克则是一个摇摆派，是这几个人中最感困惑的。他显然意识到了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既不想认命，也无力反抗，处在两者的缝隙中不知所措，只好什么都不做。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们还是回到太史苏的预言。太史苏之所以看到公子出居就认定晋国会乱，是因为他的忧虑与士蒍的困惑实际上是同源的。国君公子拥有庞大的师保私属团队，属于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这样的不安定因素必须要安置在国都，置于国君的看管之下，否则他们的野心一旦被激发，就一定会酿成祸乱——曲沃桓叔的外放便是一个例子。

关于这一点，春秋晚期的楚国大夫申无宇也曾做过总结，认为国君任用官职要遵循“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羈不在内”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问题。这其中的“五大”就包含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太子申生就恰好属于“五大”之首。其他公子或许不属于“五大”之列，但也是“亲”的范畴，显然是不能外放戍边的。晋献公的做法显然更加极端，他一口气就把所有的公子外放了，这个举动给晋国带来的风险可想而知。

蒸礼风波

大夫们慷慨激昂的反对浪潮，让骊姬以及她的智囊团都捏了一把汗，生怕计策还没有开始执行就流产了。可万万没想到，晋献公依然是那么执拗，他决定了的事，是任谁都无法轻易改变的，终于还是让骊姬等人遂了愿。惊喜之余，骊姬决定再接再厉，以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为此，在他们的鼓动下，晋献公紧接着又下了第二步棋。

按照春秋时的典仪，各国每年都要在宗庙里举行四次重大祭祀活动，分别是春杓、夏禘、秋尝、冬烝（《公羊》《周礼》略有不同，为春祠、夏杓、秋尝、冬烝），以祭享历代先君。

作为国内最高宗教权威和大祭司，国君通常都会亲自主持祭礼，如果国君因故不能出席，也会委派太子代理。不过，这年冬天的烝祭却是个例外。当祭祀日期临近的时候，献公突然称病不能前往，并特意安排骊姬的儿子奚齐从绛都赶到曲沃去主持祭典。

当初献公派太子去往曲沃，提出的借口正是“宗邑不可无主”。如今太子正坐镇曲沃，献公却视而不见，反而是让幼子前往主持，这样的安排实在

太过于突兀了。听到这个消息时，不仅太子感到手足无措，朝中上下也全都为之惊诧不已——这明摆着这是要废弃申生尊崇奚齐啊！

太子的私属猛足是个急性子，他显然无法理解献公的用心，便一个劲地在太子面前抱怨：太子您是国之储君，此时又身在曲沃，国君这是何苦要舍近求远让您难堪呢？您难道就一点想法都没有？

想法自然是有的。但作为一名心地纯善的孩子，太子“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旁人，也努力“以最大的善意体谅人心”，此时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为自己的父亲辩解。他引用了老师羊舌大夫的话来劝说猛足：“国君既是我的主君，也是我的父亲，必须要用‘敬’和‘孝’来对待他。”而如何才能做到敬和孝呢？申生解释说：“君主的命令坚决服从不违逆，这是敬；对他恭敬，顺从他的意愿这就是孝。如果我违抗君命，违背父亲的意愿去做事，你让我将来如何自处？另外，不回报父亲的爱却享受他的赏赐，那是不忠；废了别人（奚齐）成全自己，那是不贞。父亲希望我能孝敬他、对他忠贞，如果我只为了自己的地位而抛弃了这诸多的美德，他老人家如何能安心？”反正父亲什么都是对的，我如今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听从他的安排了。

不过正如人们常说的那句话“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人的记忆只有七天”，任何热点事件在舆论场上都不会长盛不衰。在一切都未明朗的情形下，不少人都抱持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遵循着“不要过分解读”的原则，不声不响地就把这样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化为了无形。因此尽管在骊姬的鼓动下，献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人们也都就此有过争论，可到底还是没起什么波澜，人们依旧把申生当作正牌太子供着，申生也继续战战兢兢地履行太子的职责，好像事情根本未曾发生过。

这个结果倒是让在幕后筹谋的人都大吃一惊，为了尽快改变朝中的风向，骊姬决定再加一把火，于是便有了围绕“太子为卿”而展开的又一场大论争。

第三节 父子离心

太子为卿

这次的论争发生在诸子守边后的第五个年头，也即献公十六年（前661年），申生大概刚到十五六岁的年纪。这一年，晋国用新组建的两军接连灭掉了霍、魏、耿三国，确立了晋国疆域的基本框架，但对于申生来说，这场战争注定将成为决定他今后命运的关键一战。这其中最致命的不是战场上的敌手，而是躲藏在背后的黑手。这一次，骊姬通过晋献公给他抛出的难题是：让他带兵出征，担任下军统帅。

如果你看过一些古装宫斗剧的话，对于这样的计策大概不会陌生，剧中的大反派会特意安排温良淳厚的主人公带兵出征，然后利用各种派系之间的关系，将主人公推入险境。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想要消灭掉一个人，就要把他的地位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后让他从高处跌落。

不过，若是你以为骊姬的想法也不过如此的话，那可真就把她想简单了。骊姬之所以要让申生带兵，并不是要借敌人的手去杀掉他，而是要人为地给他制造一个天花板，用“正名”的办法剥夺其君位继承权。

在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卿”的由来。在早些时候，各国规模还都很小，一国的军队规模往往是以“师”（也就是2500人左右的建制）甚至是“旅”（500人）为单位的。《左传》中经常会提到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型，将各国的军力规模限定为“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不过这样的理想模型，在西周时期并未真正实现过。

当军队规模很小的时候，军队的主帅往往由国君本人担任。到春秋早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推进，国家规模开始不断扩张，才逐渐出现了

以“军”为单位的军队建制，比如晋武公统一晋国时，便是以一军为诸侯。同样，随着国家规模的继续扩张，开始出现二军、三军乃至六军，国君无法直接统率这些军队，习惯上便以卿或上大夫来做辅助，统领其他各军。

国君的公子虽然不是国君，但也是潜在的君位继承者，因此他们的身份对于国内的大夫来说也是“君”，现任国君死后还有权继承国君之位。可如果某位公子一旦接受了某国国君的封地，或者在一国之中担任了重要官职，其身份就会转化这个国君的臣子。这就意味着他的地位已经触及了天花板，从此以后只能充当属地的封君，不再具备竞争储君资格。除非他们有曲沃桓叔那样的野心和实力，否则就趁早打消了夺嫡的念头。

正因为有这诸多的限制，春秋时期很多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公子，如果还抱有野心，那么他在国外避难时，就不会接受所在国给予的封地和官职。国君的子嗣在还没有正式给予封地，没有分宗立嗣为别氏的时候，就不属于卿或者大夫，因此也就不会带兵出征。

了解了这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献公——或者说骊姬——的诸多决策就不难发现，他们实际上都是抱着这样一个念头，是想用象征性的意义来封堵诸公子向上的野心。

在外放诸子守边的过程中，三位公子尽管获得的并不是实质上的封地，他们的地位也没有发生变化，但这其中却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会让人们误以为他们所守卫的城池就是国君许给他们的“期权”，等他们成年以后就会变成“永久产权”。国君若是同意了这些建议，就可以认为是他默认剥夺了这几位公子的继承权。在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下，那些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就会打消追随三公子的念头，从而间接地削弱他们师保私属的力量。

可暗示毕竟不是现实，总会有人抱有这样的幻想：让太子驻守曲沃虽然不合情理，可曲沃是宗庙所在，太子打理宗庙也算是职责所在；让奚齐代替太子祭祀先祖，或许可以理解成是国君疼爱自己的幼子，完全不必当真。这些举动都没有明确地表示要给予申生卿或大夫的地位，就没有封堵住他的向上之路，他就还是正宗的储君，这就给那些心存侥幸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如果说之前的所有暗示都还留有余地的话，那么让太子作为军队统帅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意味着太子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官职，而且还是大夫之中地位最高的卿，等于是彻底将申生的地位锁死了。正因为如此，献公的这个举动才让士蒍感到痛心，这位在骊姬发难早期就持有消极态度的大夫，此刻更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慨，痛心疾首地对旁人说道：“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怎么能够担任官职呢？可如今国君不仅把都城分给了他，还给了他卿的职务，地位已经达到了顶点，这分明是把他当外人看待啊！将来又如何能够继承君位呢？”

谗言弥兴

士蒍深感此事万分重大，由不得他视而不见，故而急匆匆地进宫劝谏，谁知晋献公却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下军是上军的辅佐，寡人亲自统领上军，让申生统领下军，这有什么不妥吗？”

士蒍小心地反驳道：“下军怎么可以做上军的辅佐呢？这就好比人的上下肢，各有各的作用，双手互相辅助，双脚交替前进，这样人才能顺畅地做事。可如果你让手脚互相辅助，手脚并用地走路或者使用工具，那样的话办什么事情都会不协调，岂不是乱套了吗？”

打完比方后，士蒍又回到正题，说：“军队也是一样，上下军各有各的职责，一军内部互相补充协助，才能让敌人找不到缺口，最终取得战争的胜

利。如果你只是把下军作为上军的辅助，一旦上军出现了缺口，下军急匆匆地赶来补救，两军之间难以协调就会耽误大事。敌人看到你军队混乱失调，很容易就找到缺口打进来了，这样的军队如何取胜？”

献公决心已定，听士蒍唠唠叨叨说了半天，实在心烦不想再去理会，就干脆吼道：“那是我的儿子，我就是想让他带兵历练历练，这你也要管？”

士蒍还真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眼见国君已经怒不可遏，仍然不肯罢休，继续追问道：“那可是太子啊！太子是储君，是国家栋梁，你让他带兵，就不怕出危险吗？”

献公依旧没好气地回答说：“他迟早是要打仗的，我先让他历练历练，等于是减轻了他以后的负担。即便可能会遇到危险，又能有什么害处？”

士蒍被献公的冥顽不灵惊得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退了下去。出去以后他再次发出感慨，心情比刚才更加沉重了：“国君改变了太子的身份却不考虑他的困难，说是为他将来着想，却又不顾及他现在的危险。”——这究竟是哪门子的父爱啊？

在宣泄了悲愤情绪之后，士蒍缓过劲来，才把他真实的感悟说了出来：“国君现在已经有了二心，太子将来恐怕是无法继承君位了。这次带兵出征如果胜利了，太子会因为得了民心而遭到陷害；如果失败了，更是会因此而获罪。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取胜，只要他接受了下军统帅这个职位，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士蒍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于是便奉劝太子说：“与其辛苦卖命还得不到国君的青睐，倒不如一走了之，逃离晋国外出流亡。这样的话既遂了国君的心愿，你也不至于无路可退。想想吴太伯避位让贤的举动，留下一个美

名，既保全了自己，也成全了别人，不是也挺好的吗？更何况，心底无私天地宽，上天若要保佑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你一席之地的！”

太子听了士蒯的劝说十分感动，但却断然拒绝了士蒯的建议。他深情地望着士蒯沧桑的老脸，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回答说：“子舆（士蒯之字）为我的将来谋划，也算是尽力了。但作为儿子，有没有美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顺从自己的父亲。作为臣子，得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勤恳地侍奉国君。我虽然愚钝，但可以顺从自己的父亲，勤恳地尽心于国事，其他的就不多想了。至于吴太伯那样的精神境界，也不是我该奢求的。”

事情果然如士蒯所预料那般，申生伐霍凯旋的消息传来，不但没有弥合父子之间的隔阂，反而给骊姬集团带来了极好的素材，他们抓住机会散布不利于太子的言论，于是很快就“谗言弥兴”。

金钱和权力是腐蚀人性的最佳药方，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过的。骊姬集团散布谣言所抛出的无非是子夺父权，这种无中生有的言论尽管经不起推敲，但却直击人性的弱点，总能让身居高位者心惊胆战。历代君主最为忌惮的事情便是大权旁落，无论这个潜在的抢班夺权者究竟是谁，都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他们的求生欲，从而对过去的挚友乃至血缘上的至亲大开杀戒，身在春秋纷争之世的晋献公更是如此。

当舆论的声势被渲染起来，献公对儿子的猜忌心理也就渐渐地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只等着有人临门一脚帮他做出最后的决断了。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在智囊优施的指导下，骊姬决定对献公展开最后的攻势。

骊姬夜哭

这是一个阴云密布的午夜，本该普照万物的皓月也被隐去了娇羞的容颜。在微风婆娑的吹拂下，窗外蟋蟀窸窣的声音让这个世界显得格外寂静。

约到夜半时分，睡梦中的晋献公隐约听到了一阵啜泣声，醒来后正看到昏黄灯火的映照下，骊姬柔弱的身影不断地起伏。他轻轻地披了一件衣服走到骊姬身旁，询问她如此伤心的缘故，可骊姬却始终不肯说。

看着往日里娇羞的美娘子哭红的双眼，国君的心都碎了，在他的一再许诺下，骊姬才欲言又止吐露了实情：“最近外面都在传言，说国君已经被我迷惑了，如果再让我这么迷惑下去，这个国家就会乱了。申生一向宽厚仁义、爱民如子，最近又新立了战功，势力越来越大了——我实在担心他们会以此为借口对你用武，让百姓遭受动乱，不如趁现在祸乱还没有开始把我杀了吧！”

听到爱人的这番话，献公心中不免为她的“柔弱”感到哭笑不得，刚刚忐忑不安的心情也松懈下来。他轻柔地抚摩着骊姬的头发微笑道：“既然你说他爱民如子，难道就不爱他的父亲吗？”

骊姬早就准备好了话术，不等献公问完，她就继续说道：“我害怕的就是这个。我听说，仁义和爱国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更注重仁义，就会把爱护自己的亲人作为最大的信仰；可是如果他更注重爱国，就会把国家的安定放在第一位。所以人们才说，若想做一个伟大的君主，就不会顾念私亲，而是把对亲人的爱转移到对百姓的爱上去。如果他认为对大局有利，能让国内的民众都支持他，就算是让他弑君又能算得了什么？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抛弃亲情，只会让人更加拥戴。即便是一开始大家会嫌恶他的弑君之举，可只要他继续兢兢业业克俭奉公，为自己争得忠于国家的美名，过去的罪行统统都可以掩盖掉的！”

骊姬继续嚤嚤而泣，几度哽咽之后才终于缓过气来：“老百姓总是追求利益的！杀了国君虽然不怎么光彩，可如果能够让百姓得到丰厚的回报，谁还会在乎事情做得对不对呢？杀了自己的父亲，却能让大家都得到好处，人们欢喜还来不及呢，难道还会背叛他吗？他得到了君位，百姓们也得到了好处，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就算是有人还顾念着你的恩情，可在实实在在的利面前，又有几个人能够把持得住呢？”

骊姬稍稍顿了顿，并悄悄地用余光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见国君突然陷入了沉思，她又加了把火：“看来你还不相信，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假如商纣王有个好儿子，这个好儿子把他给杀了，这样他就能免于罪恶被张扬并招来武王的讨伐。同样是死，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纣王没有死于周武王之手，商朝的国祚会一直延续下去，他们祖宗到现在还在享受祭祀。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纣王究竟是善是恶呢？我也知道你对儿子很疼爱，谁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总得以防万一啊。你也知道，从你的曾祖桓叔到现在，有谁是顾虑私亲的？正是因为不爱私亲，所以你今天才能坐到晋君的位置上。对于申生来说也是一样，他若是真想成为一名伟大的君主，就很难保证他不会这么做。你现在不做准备，等到事情来临的时候再去做，可就真的晚了！”

献公此时满怀忧虑，嗫嚅了几次都没有发出声来，过了很久才又问道：“可是又能怎么办呢？难道……”紧接着他又叹了口气。

骊姬宽慰道：“不如现在就把国政交给太子，太子掌握了国政，一切都能按照他的意愿来。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你也能图个轻松自在，这也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听了这些，献公马上回绝道：“绝对不行！现在晋国还是依靠着寡人的武功和威势，才能威慑诸侯。寡人还没死就把国政交了出去，这要让人知道了，会说你连自己的儿子都制服不了，还谈什么武功威势！寡人若真把国政交给他，诸侯必定会跟我们断绝关系，甚至会加害于晋国。如此一来，国政丢了，国家也深受其害，这种事情寡人岂能容忍？你也不必担心了，寡人自会想办法的！”

骊姬此时又抛出一计：“你有没有考虑过让申生再带兵出征一次？我听说，赤狄皋落氏日夜侵扰晋国边境，搞得边境百姓都不敢到田野里放牧了。现在国家刚打完仗，本来就府库空虚，他们要是趁机侵略岂不是雪上加霜了？你何不让申生带兵去讨伐皋落氏，一方面可以检验出他是不是真的能带兵，另一方面还可以试探一下民众的态度。如果不能战胜皋落氏，自然随时都可以给他治罪；如果他胜了，说明他的确很善于笼络民心，也就是说他的野心不小，以后就要想办法防备了。当然了，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如果我们把狄人打败了，诸侯一定会震惊甚至害怕的！到时候边境不用设防、国库更加充裕、四邻纷纷服膺、封疆更加稳固——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不试试呢？”

偏衣金玦

为了向申生表明态度，晋献公决定不再亲自出征，而是让申生亲自统领上军。与此同时，他还特意赠给申生两件物品，一件左右颜色不同的偏衣，和一块金玦（用青铜铸造的带有缺口的环形器物，可以戴在右手拇指上辅助拉弓弦，玦在后世常有“绝交”的意思），并告诉他：“杀不完狄人就不要回来了！”

嗅觉敏锐的国人很快就从这次安排中觉察到了怪异的气息，其中就有一个名叫赞的家仆，口无遮拦地跟旁人议论道：“太子危险了！国君赐给他这

么奇怪的东西，也太反常了，明摆着是不准备传位于他了！偏衣和金玦象征冷淡和离心，就是要加害他的信号，让他内外都不得安宁。国君还让他把狄人杀尽了再回来，问题是杀尽了又怎样？国内流言四起，还是没办法应付。现在这局面，算计来自宫中，太子想要摆脱危险，不好办啊！”

这些议论很快就传到了太子的耳朵里，让太子感到万分焦虑，急忙去找里克商量对策。里克听了之后也是怒不可遏，一向行事谨慎、左右摇摆的他终于忍无可忍，怒气冲冲地闯到宫里向献公质问道：“我听说皋落氏已经应战了……国君还是不要让申生去冒险了吧！”

献公知道来者不善，故而也只冷冷地反问了一句：“大夫何出此言？”

里克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不符合常例。太子之所以叫冢子，就是因为他肩负着祭祀宗庙、社稷以及照顾国君饮食的重任。但凡出兵打仗，一直以来都是国君出征，让太子留守监国，即便是要随军出征，也只是安抚军心，这才是自古以来的制度。之前您已经违制让太子带兵了，现在更是破例，自己留守国内，让太子独自领兵出征。我倒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道理？”

里克说得嗓子都冒烟了，献公依旧不为所动。里克清了清嗓子，又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带兵打仗是需要做出决断并发号施令的，这本来就是国君和卿大夫的事，太子又怎么能够做这些呢？您让太子领兵打仗，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该如何处理？他好歹也是储君，如果遇事需要向您请示，那么他的威严何在？如果他不经请示擅自发号施令，那就是陷他于不孝啊！您违背礼制任命太子为卿，而太子统率军队也没有威严，这是两败俱伤的决策，您又是何必呢？”

看他的怒气也释放得差不多了，晋献公这才缓缓地说道：“寡人有这么多儿子，将来要传位给谁还不一定呢！”

里克立时就被这句话给噎住了，他知道献公或许早有这样的心思，却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直截了当地就说了出来，一时哑口无言。献公也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而是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道：“既然你提到了礼制，那寡人就跟你说说礼制。寡人听说立太子有三个原则：德行相同的要根据年龄长幼来决定，年龄相同的要根据国君的喜好来决定，喜好难以确定的就根据卜筮的结果来决定。你可曾听说过？”

看到里克手足无措的样子，献公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于是便说道：“寡人现在也不知道更喜欢哪一个儿子，所以才要让太子出征，就是想考察一下他的能力，看他是否适合接任。这都是寡人的家事，大夫平日里事务繁杂，就不必为我们父子操心了吧？”

说罢他便把目光从里克身上移开，看向门外。里克知道国君是在下逐客令了，也不答话，径直退下了。

太子正在宫外候着，看见里克出了宫门，马上哭丧着脸迎上去问道：“国君赐给我偏衣、金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难道要被废掉了吗？”

看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正恭敬地向自己请教，里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可他也只能强作镇定，温和地问道：“你害怕了吗？”

太子早已是魂不守舍，带着哭腔回答说：“我怎么可能不怕啊！”

里克夹在他们父子中间进退两难，实在也不好说什么，便宽慰道：“国君让你在曲沃学习治理，又让你亲上战阵去学习军事，是担心未来你不能胜

任，有什么理由把你废掉呢？”

这句话显然不能打消太子内心的恐惧，还未等他说完，太子便又追问道：“可是又为什么送给我偏衣和金玦呢？”

里克违心地回答说：“他怕你不能威慑众人，便用这些信物来帮助你，让你令行决断。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作为国君之子，不要太在意自己是不是被立为储君，而是要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孝’。我听说，恭敬胜于请求，你要努力地修养自己，而不是一味地责备别人，这样才能免于祸患。”说罢便黯然离开了。

出征东山

话虽如此，太子还是从里克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不安。在出征的路上，他又向随行的大夫们询问，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此次出征，太子申生统领上军，狐突御戎，先友为车右；原本该辅助太子统领下军的里克称病不出，故而以罕夷为下军统帅，梁余子养为其御戎，先丹木为车右；羊舌大夫（羊舌突）担任军尉。这几个人都针对国君的安排，分别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最先发言的是车右先友，他对此比较乐观，或者说是和里克一样假装乐观。他说：“国君赠给你的偏衣有一半是国君的服饰，代表着已经授予你一半的君权了。金玦代表你掌握了作战的决定权，可以自谋决断，不必事事请示，这是对你的信任啊！国君对你如此亲近，并没有什么恶意，有什么可怕的？成败在此一举，太子只管放手去干吧！”

担任御戎的狐突则持悲观态度，他叹息道：“时令是农事的指征，衣服是身份的象征，佩饰是心志的标志。对于重视的事情要在一年开始的时候发

布命令，若要表征你的身份就要赐给纯色的衣服，鼓励你的志向就会让你佩戴符合礼制的饰品。而国君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年末给你发布命令，就是不想让事情顺利完成；赐给你杂色的衣服，就是想要疏远你；让你佩戴象征着寒凉离心的器物，表示要丢弃你。用意都这么明显了，就不要再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了。就算你拼尽全力去杀敌，狄人能被杀得尽吗？”

下军御戎梁余子养更是直接奉劝太子放弃幻想：“素来带兵出征都有相应的礼仪，要在太庙受命，在神社祭祀，服饰也有特别的规定。现在完全是反着来，足见国君的用意！就算是战死了也要落下个不孝的罪名，还不如趁早逃亡去呢！”

罕夷和先丹木都同意梁余子养的看法：国君赐给你的东西都是要暗示你离开，狄人也杀不尽，就算杀尽了还有国内的各种流言蜚语。国君的心思如此，你回去还有什么用？

各人各表心志，让本来就担惊受怕的太子更加惊惧了。看到太子踌躇不决的样子，狐突便想帮他做出决定，却被担任军尉的羊舌突给拦住了。他说：“违背父命是不孝，抛弃职责是不忠，就算国君待人凉薄，也不能背弃本心去作恶。战死事小，失节事大，君子宁折不弯，就算是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决不能因为贪生怕死而一走了之！”

羊舌突可以说是一个守旧派的代表，尽管其态度与先友一致，但出发点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先友反对太子出奔，不过是站在自身的立场上，不愿为太子的事情担责，而羊舌突则是从心底里就认同敬孝为大的观念。他的这种观念对于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羊舌突开始一直到后来羊舌氏被灭门，羊舌家族虽然在政坛上声望不高，但却出了不少文化名人和忠直之士。

不过羊舌突在太子申生一事上所起到的作用，绝对可以用“猪队友”来形容。在早年的蒸礼一事上，猛足急欲给太子讨个说法，太子就是搬出了羊舌突的话来劝阻猛足。而这一回太子出征，在大家意见已经基本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太子本来已经被说动了，他是有机会出逃的，但正是在羊舌突的阻止下，才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从而使得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最终成为现实。

军队在抵达稷桑（皋落氏属地，位于今垣曲县皋落乡附近）之后与狄人相遇。狐突不希望太子枉送性命，于是便在出战前郑重其事、语重心长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说：“您还是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国君喜欢宠臣宠妾，庶子与嫡子可以争位，大城和国都相当，这些都是国家祸乱的根源。现在您以身犯险与狄人作战，国内却处处都是针对您的阴谋，祸乱的征兆已经形成，您觉得自己还有机会顺利继位吗？既然不能，倒不如干脆把储君之位让给奚齐，这样既能顺从您父亲的意愿且留下一条性命，又能顺从百姓的意愿而利国利民，岂不比冒险拼杀却因此获罪好得多？”

申生含着泪回绝道：“不会的，君父不会就这么抛弃我的！他让我讨伐皋落氏，临行前赐给我偏衣、金玦，还不断地嘱咐我，说了不少的话，他的内心一定很痛苦。是因为有人进了谗言，所以君父才对我生二心的，这种时候我怎么能逃避呢？倒不如战死沙场，还能留下一个孝事父亲的名声，如果我逃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第四节 骊姬之乱

暗潮汹涌

此时正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在位的第十七个年头。申生讨伐皋落氏之后还是没有离开，而是带着缴获的战利品和战俘回到了绛都。而狐突则心如死灰，他实在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申生一步步走入陷阱，回去之后便闭门不出，从此不再过问朝政。

大军班师之后，绛都城内流言四起，一时间朝野物议纷纷，再次将申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不过尽管如此，骊姬一心想要除掉申生，却还是没找到什么机会。

一方面申生新立军功，骊姬就算是到处散布流言，短时间内也很难找到陷害的借口。另一方面，尽管很多政治嗅觉敏感的大夫，比如狐突，知道申生将要穷途末路，纷纷避难而去，可仍然有很多不明就里的以及像羊舌突一样认死理的大夫围绕在申生的左右。更重要的是，还有以士蒍为代表的杜氏家族，尽心尽力保护申生周全；而里克虽然对申生很是失望，但作为朝中重臣，对申生依旧负有难以推卸的保护之责。这些都让骊姬无从下手，只能在舆论造势上继续兴风作浪，以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献公的决策。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五年，直到献公的重臣、申生的保护者士蒍去世之后，骊姬感到机会已经悄然降临，于是便再次鼓动献公杀掉申生，以早日立奚齐为太子：“最近我听说申生谋权的打算更成熟了。以前他年纪小的时候，就很懂得笼络人心，要不是因为给了民众好处，他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打败狄人？如今他更是屡立战功，便常常夸耀自己善于用兵，野心也越来越大了。我实在担心他会对您不利啊！别的不说，狐突您总是相信的吧？他为什

么闭门不出？还不是因为他不想顺从申生做犯上作乱的事情，所以才称病的？”

一提到申生，献公的胸口就像是被什么堵上了一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尽管他不相信申生会背叛自己，可每每听到对申生的种种非议，又难免会起疑心。此时听到骊姬的话，心中更是左右彷徨，于是便有心回护道：“申生平日里对我挺恭敬的呀，我让他干什么他都百依百顺，总觉得没有传说中那么不堪啊！”

看到丈夫不以为然的表情，骊姬又靠近了一些，加重了语气说道：“申生素来重信守诺。就算他碍于父子之间的关系不好发作，可那些他曾经许诺过的人呢？他已经把夺位的野心透露了出来，假如突然终止了，那些被他许诺的人也是不会罢休的。既然不得不做，他就会把事情计划得滴水不漏，免得给自己留下后患。这种时候，您也该做出决断了，否则就真的要大难临头了！”

“寡人终究还是要这么做吗？”

献公长叹一声，心中百感交集，再次陷入了持续的沉默之中。这注定将是一个无眠的夜，晋献公在无边的夜色中仔细回想，却始终都想不起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就产生了要废弃申生的念头了。

按理说，申生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在襁褓之中便失去了母亲的关爱，此后又被寄养在大夫家中，从未体察过父爱如山的真切含义。每当看到这个孩子闪着泪光的双眼，献公总是心生爱怜，不忍心让他再受煎熬。可世事就是如此吊诡，越是互相关爱的人，似乎越是纠葛不断，不知不觉间便走到了今天这父子对立的地步。

这个时候，献公难免会怀念起齐姜——那个曾让他魂牵梦萦的女子，以及后来在一起度过的短暂而快乐的甜蜜时光。他犹记得申生刚刚出生时，自己心中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也曾记得当年许下的诺言，更难忘记的是在齐姜去世后，他立誓要让申生继承自己的衣钵，将他培养成一名有为的国君。

可人总是善变的，当他在战场上见到了那个出身于“蛮夷”的女子，便深深地被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所吸引了，从此便移情别恋，把对齐姜的感情全都倾注到了骊姬的身上，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另一段旷世的爱恋之中。

心意难平

爱一个人就要给她想要的一切，给她最为尊贵的地位，给她最美好的愿景，就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女人就是他拼尽一生要去保护的人。或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初心，晋献公决定要将骊姬立为夫人。

然而，他的这份执着，他的全情投入，于骊姬而言或许是爱的关怀，可对于敏感的国人来说，却无异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国君的内心深处，太子的地位早已动摇了。

在嗅到危险的气息之后，一些有危机感的大夫们便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出面反对这个荒唐的举动。然而晋献公却并不理会这些反对的声浪，或者说，他就像是一个陷入热恋的情种，越是有人反对他们的爱情，越是会激起他的叛逆情绪，从而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稳固。

喜新厌旧是人之本性，更是古代帝王的通病，君主很容易因为有了新欢而见异思迁，因为宠信新欢爱屋及乌而偏爱她的儿子。其他的贵族也会因为

这个原因，在决定是否侍奉太子的事情上有所顾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强烈的暗示之下，不少投机者也向骊姬频频示好，开始挖太子的墙脚。一时间关于太子的流言四起，又使得这个信号得到了正反馈，最终在整个国家系统中被层层传导、逐渐放大，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随着时间的流转，事态的发展渐渐偏离了轨道，以至于连献公本人也被裹挟其中，对过去的种种决策和判断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认知失调。

也许从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过要废黜申生，可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就连他自己都开始产生了怀疑，总认为废弃申生或许就是自己的初心。既然如此，他就必须要为这个选择找出合理的依据，从而在内心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以批判的角度审视这个儿子。

起初，他将申生描摹成一个个性懦弱、行事优柔寡断的庸人，怎么看都不应该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储君人选。在骊姬的推动下，他不断地试探、不断地暗示，希望能让申生知难而退。

然而事实与想象再次背道而驰，申生不但经受住了自己施加的考验，而且还以其幼弱的臂膀，在充满了血色杀戮的战场上屡立功勋。申生这令人惊奇的表现，并没有让他感到欣慰，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疑虑。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在疑虑什么，直到听到了骊姬的那句话，他才突然意识到：那个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的太子，难道是装出来的？

要知道，出征皋落氏的时候，申生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出征在外能杀伐决断、破敌立功，回到国内能翻云覆雨、勾连人心，谣言起时波澜不惊，风暴来时临危不惧——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将这些手段运用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不知道这个儿子是真的愚钝，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机。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用各种明示和暗示的手段让申生知难而退，可以说是已经把该释放的信号都释放出来了。一个人只要头脑还有那么一丝清明，大概都能看出其中的冷淡，难道申生就这么愚钝看不出来吗？就算他看不出来，他身旁的那些师保私属难道还不清楚吗？

倘若他对此知根知底，可为什么还一直表现得对自己百依百顺呢？一直都诚惶诚恐地为自己尽忠尽孝？这究竟是内心淳朴与世无争，还是大智若愚另有所图？

申生或许是个纯孝的孩子，但他的用意恐怕很难为他的父亲所理解，而他的固执，却真真地把父亲推到了两难的境地。说申生没有心机，只知道愚忠愚孝，申生自己相信，羊舌突和杜原款相信，里克和狐突也相信，但是献公，他是想相信却不敢相信。

如果申生真的这么善于韬光养晦，或者是有高人指点的话，那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南面称孤的国君来说，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摸不着的威胁——而这个威胁竟然就来自于一直都被自己看作是生性懦弱的太子。

对于献公这样心思缜密的君主来说，对手表现得越简单，他只能想得越复杂。这就像是“黑暗森林”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谁也无法预知对方是如何想的，也无法预知对方认为自己是如何想的，更无法预知对方认为自己是如何猜测对方所想的……这简直是一个永远都无解的难题。猜疑链一旦形成，就很难轻易地抹除。因此尽管骊姬的话并非滴水不漏，但还是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足以让献公那颗脆弱的心为之惊惧不已。

更何况申生代表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更代表着暗潮汹涌之下那些看不见的、具有潜在共同利益的集团在和自己博弈。就算是他相信申生不会反

叛，可也难保申生的私属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怂恿甚至胁迫申生反叛。这世间有太多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便是人们虔诚供养的神祇，也并非是全知全能的。如果反叛注定会发生，就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不情愿而自然消止。

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个不知是愚钝还是精明的太子，他既不愿意直接废掉申生让他难堪，更不忍心杀掉这个一直以来都对自己温顺恭敬的孩子。他的内心陷入了疯狂的斗争中，这其中既有亲情的纠葛，也有人心的博弈。

到了这种地步，献公若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除掉对手：不管对方是简单还是复杂，只要对方不存在了，自己才能绝对安全。因此，尽管对申生有太多的不舍，现在似乎也是时候做出决断了。

想到这里，他转头望向骊姬，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现在也没有什么定罪的理由，还是从长计议吧。”

里克中立

骊姬等的就是这句话。

尽管他说的是“未有以致罪”，可这足以表明他已经默许了这个想法。骊姬既得了这个态度，自然是欢喜得无以复加，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该如何施行计划了。而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最有可能形成阻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里克。

为此，骊姬特意招来优施商议对策：“现在国君已经答应要杀死太子改立奚齐了！可太子的背后还有里克，他可没那么好对付，我该怎么办呢？”

“这有什么难的？”优施胸有成竹地回答道，“给我准备一整套宴席，再辅之以酒水，一天之内保证让他就范！”

骊姬心里总是放心不下，疑惑地还想问些什么，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看到她欲言又止的样子，优施出言又安慰道：“放心吧！我不过是个戏子，就算说错话了也没关系！”

骊姬半信半疑，但还是让人去准备酒菜了。到了夜里，优施带着特赐的酒菜去拜访里克，与里克夫妇一起大口喝酒、大口吃肉，一时间其乐融融、甚是热闹。酒过三巡，大家都喝得有些微醉，优施就趁着酒劲跳起舞来，一边跳还一边对里克的妻子笑道：“回头主人若是肯再请我吃一顿的话，我就献丑把侍奉国君的技巧透露些给这位大夫吧！”也没等她答应，优施就开始唱了起来：

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

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

里克听出优施的歌里似乎暗含深意，便警觉地问道：“你的歌声婉转而悠扬，让人不禁思逸翩飞。可是我却不懂，那‘苑’所指的是什么，‘枯’又是什么意思？”

优施带着酒意漫不经心地说道：“听说有一位公子，他的母亲是国君的夫人，他也将要成为国君，大家都纷纷聚拢到他周围，可不就是芳草肥美嘛！而另一位公子，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还处处招人议论，人心凉薄、枯枝败叶，恐怕就要被折断了。”说完就疯疯癫癫地哼着小曲溜达出去了。

优施走后，夫妻俩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干坐了半宿。优施分明是在暗示他眼前的局面，太子将废，奚齐将要成为储君，可又无法确证这消息是否真实，更不知晓国君究竟是什么态度。

夜深了，里克也实在没有心情，便回到了卧房准备休息。可优施的那些话却一直都在他的脑海里盘旋，让他辗转反侧根本无法入眠。又想了大半个时辰，梳理了最近听到的各种消息，里克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危机正在一步步地逼近。

为了弄清楚优施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到了半夜他特意将优施请了回来，万分警觉地询问道：“你刚才所说……是开玩笑呢，还是确实听到了什么风声？”

优施假装很害怕的样子，哆哆嗦嗦地回答道：“这事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国君对骊姬许诺，要杀掉太子改立奚齐，而且具体的计划都已经定了！”

里克顿时慌了神，一不留神差点栽倒在地。过了半晌，他才恍然问道：“若果真如此……让我顺从君命杀掉太子，终究于心不忍；可若是一如往常地和太子交往，我也没有那个胆量。那我……可以保持中立吗？”

“当然可以！”

得到里克中立的保证，优施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可里克却更加难以安心了。第二天天刚亮他就找到了丕郑，把优施的话转述了一遍。丕郑惊惑地问道：“那你对优施是怎么说的？”

里克说：“我告诉他会保持中立。”

丕郑大怒：“糊涂啊！你难道不知道优施就是故意来试探你的吗？”丕郑狠狠地跺了跺脚，转身跪坐在几前，拍了拍案几大吼道：“如果告诉他你根本不相信这些，骊姬知道后就会有所忌惮而不敢加害太子，只能改变计划。他们的策略一变，就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分化瓦解他们。现在说中立，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你再想做什么也没用了！”

里克此时才恍然大悟：“可是我话已经说出去了，该当如何挽回呢？再说了，骊姬这个人你也是了解的，她行事素来肆无忌惮，可没那么好对付。你难道有什么好办法吗？”

丕郑叹息道：“能有什么办法？我不过是个替国君办差的，国君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决定权不在我手里！”

丕郑说罢便起身回房去了，留下里克一个人兀自发愣，他喃喃自语道：“要想救太子就只能弑君，可是国君父子之间的事情，我一个外人又有什么资格替人家裁决？如果不管太子，任由事态发展，甚至参与其中……我又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怎么办？”

里克就这样迷迷糊糊地想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闭门不出。就这样，太子最后的希望也彻底断绝了，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却完全不知情，依旧温顺敦厚地在日日如常的生活中，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祠而归福

骊姬的这些动作尽管是出于她自己的私心，可并不代表献公就完全被蒙在了鼓里。那个外表纯孝的孩子现在让献公感觉到的，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威胁。尽管他的内心也犹豫过，却还是期望着有人能帮助他下决心，而骊姬的举动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他潜藏在内心的那种阴暗需求。

国内的贵族们对此也大都保持沉默，里克如此，丕郑亦然。当里克将骊姬将要发难的讯息传递给他时，他除了在口头上表达愤慨之外，并没有做出任何可能会对申生有利的举动。而他的这种表现，又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当时国内贵族的普遍心态：所有人都在观望，却没有一个人插手干预。

这一年是献公二十一年（前656年），太子申生大约21岁，重耳16岁，夷吾大约15岁，骊姬的儿子奚齐也十几岁了。即便是考虑到古代的孩子们在性格上更加早熟，他们也都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自己的威望和稳定的利益集团。因此在国君表达出废弃申生意愿的情况下，那些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精英们，很少有人愿意把赌注放在申生的身上，而是冷眼看着他一步步地走上死亡的道路。

有了这个基础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骊姬这样一个在国内毫无根基的女子，可以明目张胆地陷害太子而畅行无阻。正是在君臣一致的默许之下，骊姬在诱使里克宣布中立一个月后，终于向太子发出了死亡的路引。

这年秋季，献公外出田猎。他前脚刚走，骊姬便与中大夫密谋并传话给太子申生，谎称献公夜里梦到了他的母亲齐姜，起来之后很是伤感，因此出去打猎散心了。身为继母和现任的国君夫人，她表现出了夫人的雍容气度和作为母亲的体贴关怀，言辞恳切地劝告申生：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君对你的母亲还是用情至深，可见他们当年是何等恩爱！国君有伤感之情不敢在外人面前显露，可这份深情却终究是无法释怀的。倒不如你就替国君去祭奠一下，以聊表相思之意。祭祀结束以后带些祭品回来，你的父亲知道你这么体贴，他的心里也会舒服一些。

一想到自己那已逝去的母亲，申生的眼泪便夺眶而出。可以说他从记事起，就几乎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也许正是因为从小缺乏母爱，让他素来都

缺乏安全感，以至于对抚养过自己的大夫都有一种莫名的眷爱。特别是对羊舌突和杜原款，申生对他们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不敢有丝毫违逆。

而对于自己的亲生父亲，却全然是另外一副光景，申生从来都不敢对他过于亲近，只敢像庶民对待国君一般充满仰慕。而这种带有怯懦的感情，又在无形中让身为君主的父亲产生了厌弃的想法。

父子关系陷入莫名的低谷，那早已死去的母亲齐姜，也就成了他们之间表现亲近的唯一纽带。因而，当骊姬以夫人和继母的身份嘱托申生祭祀母亲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只有过去的伤心往事；他唯一想做的，就是通过这件事，修复早已布满嫌隙的父子关系，却完全未曾料想，这竟是一个将会把自己拉入火坑的诡计。

几天后，申生按照骊姬的要求虔诚地祭祀了自己的母亲，内心忐忑又满怀希望地从中精挑细选，打算把那些腌制好的祭品送回绛都给父亲享用。可惜这个时候，外出田猎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申生满心失望，只好将祭品交给骊姬存放起来，然后耐心地等待父亲的归来。

太子受诬

晋献公田猎归来是六天以后的事了。

听说了申生的孝心之举，献公心中或许还冒出了一丝感动，于是便决定叫上诸公子一起用餐。有关这次宴会的过程，史料中的记录十分简略，但从这简短的几句话中，我们似乎也能够遥遥体会到，这场发生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家庭宴会是何等地惊心动魄。接下来，我们就试图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

宴会开始前，申生遵照骊姬的吩咐将祭品呈了上来，却不知骊姬早已在酒肉中下了毒。彼时的他全然没有多心，只一心幻想着宴会开始后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然而，正当他思绪缥缈之际，一个尖利的嗓音打破了大殿的宁静：“太子竟然在酒肉里下毒！”

按照《左传》《国语》的描述，众人在用餐之前似乎要先举行一个“祭地”的仪式，而出人意料的是，献公刚刚将酒洒在地上，地面就崩陷了！

天底下恐怕还没有什么毒药能产生如此恐怖的毒性，因此这或许只是史家在回顾史实的时候，采用了小说家的笔法。但无论如何，这一声不同凡响的尖叫，把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到了申生的脸上。申生更是被这一声尖叫吓傻了，霎时间面色苍白，支支吾吾地向父亲辩解道：“这不可能！怎……怎……怎么会？”

申生脑中一片空白，正想要跪到阶前解释，谁知刚踉跄着走了几步便被绊倒在地，身子也撞到了门槛上。这时，那个尖利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太子要跑！赶紧把他拦住！”

这个声音就像是命令一般，申生头脑混乱，竟然真的就在它的指引下起身跑了出去。出门之后，申生抢了一辆马车夺路而逃，风声呼啸、车马雷动，内心急促的他根本来不及细想，便直奔曲沃而去。

国君原本压制的情绪也被这个举动彻底引爆，当下便命人将申生抓回来。这时骊姬正端坐在献公一旁，内心不住地窃喜，可在表面上却依旧在为申生开解：“国君且不要动怒，申生怎么会给您下毒呢？会不会是弄错了？”

骊姬小心地拉扯他的衣袖，假装好心地辩解道：“您消消气，一定是寺人（宦官）搞错了，不如……不如我们就找一条狗来……让它吃一口，不就试出来了吗？”

当即就有一条猎犬在寺人的牵引下进了大殿，见到地上丢的一块肥肉，便扑了上去。只片刻之后，这条体型高大的猎犬便口溢鲜血倒地身亡了。

猎狗的暴毙让他愈发怒不可遏，于是便随手指着一个小臣说道：“你！给我吃一口试试。”

这可是实打实的送命题。小臣显然比刚刚倒地的猎狗更能够明白眼前的处境，因此当他看到国君用手指向自己的时候，瞬间就被吓得魂不附体，恐怕都不用等酒肉送进嘴里，就已经口吐白沫了。

经过再三证实，献公终于确信酒肉是被下过毒的。这时骊姬也如突然受到惊吓一般，浑身发抖地啜泣道：“想不到太子竟然真的会对自己的父亲下毒手！”

坐在下首的重耳、夷吾及其他诸公子也都像犯了错一般，跪坐在案前低头不语，耳朵里警觉地辨析着父亲粗重的喘气声。虽然在内心里，他们也会为申生的处境担忧，可更多的恐怕还是在快速地检索着对自己最有利的解决方案。

就在诸人各怀心思的时候，派去追赶申生的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显然都是两手空空。献公知道自己又养了一帮酒囊饭袋，既然找不回申生问清缘由，便只能认定他的确有罪，于是便拍案道：“既然申生跑掉了，杜原款作为太子太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太子的过失，就让他来承担吧！”

太子驾着马车疯疯癫癫地跑回曲沃，这件事早已满城皆知，杜原款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当国君使者赶到时，他正跪坐在几案前，恭恭敬敬地在竹简上书写。使者耐心地等待杜原款写完了书信，看着他将书信交到了小臣圉的手中，这才宣布了他的罪状，并对他处以了极刑。

杀身成仁

申生一溜烟跑回了曲沃，一进城便下令关闭四门，不允许任何人出入。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上，刚才的紧绷的神经渐渐松懈下来，他再也无法控制情绪，像一个孩子一般放声大哭起来。

此时的申生是多么孤寂，母亲早夭，父亲猜忌，曾经保护过自己的士蒍已经去世，而里克却为了自保闭门不出，如严父一般教导自己的羊舌突，此刻正在北方遥远的封地上，现在的师傅杜原款更是在绛都生死不明。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挽回如今这颓势。眼看着自己陷入了绝境，父亲派来的大军很快就会兵临城下，留在身边的却没有一个能让自己放心倾诉的人，更没有一个人能为如今的艰难局面出谋划策。

申生在万般的纠结与痛苦之下艰难度日，不久后，小臣圉把师傅的临终遗言带给了申生。听说杜原款已死，申生再次放声大哭，他满心忐忑地接过竹简，放在几案上多次跪拜，才将那封倾注了师傅心血的遗书打开。只见上面写道：

太子申生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君永别了。

这些年来，能够成为你的师傅实感荣幸，你我二人以师生之名相处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刻。说实话，款自知没有多大的才能，为人处世也太过于愚钝，本来就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正因为如此，当国君对你有厌弃之意时，我却不能够察觉，让你及早地放弃太子之位逃亡国外。

这固然是由于我生性愚钝，但更多的还是私心作祟。我太过于追求安稳，谨守本分，不敢和你一起出走。我太过于相信正直的力量，以为清者自清，所以当人们散播关于你的流言时，我听而不闻，不愿为你出头辩解，以为国君自有公断，不会轻易相信那些传言。然而我终究没有料到，因为我的失职，让你落入了骊姬的圈套，陷入了如今这般危难的境地，我实在是愧悔万分。

如今我也算是死有余辜。我杜原款并不怕死，只是不知不觉间变成了骊姬的帮凶，还真有些死不瞑目。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管过去犯过多少错误，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谅解，也希望你能容许我对你做最后的告白。

人的一生总要有所追求，不能为自己的信仰而死，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希望太子也不要因为惧怕死亡，而把仁爱孝敬这样的美德抛诸脑后。君子至死都不丢弃自己的信仰，不会对谗言有所申辩，有了美好名节的护身，即便是遭到谗言陷害而死也不丢人。

一个心志坚强的人，不会因为死亡来临而改变自己的性情；一个尊崇孝敬之人，就算是死也要顺从宽慰自己的君父；一个有仁义之心的人，会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信仰。以爱民之心而死，死后留下青史美名，这不就是君子应该追求的吗？希望你能够牢记为师的话，这样我也就安心了。

罪臣杜原款 拜谢君恩

看着杜原款留下的这些字句，申生终于收住了扑簌的泪水。师傅的话一字千钧，于他而言称得上是最大的安慰，让他不再惧怕和忧虑，而是决心要从容地面对死亡。故而当仆从张皇失措地为他收拾好行囊劝他出逃的时候，却见他平静地说道：“我不走了。”

小臣一下子急了，赶紧跪倒在他面前，急切地问道：“为什么？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申生很坚定地说道：“我不会走了。”

看到他平静的面色，小臣突然感到有些害怕，身体慢慢地向后挪动，似乎是担心申生会猛然发狂伤到自己。可申生依然无动于衷，说道：“师傅说得对，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呢？假如我要真的走了，这件事的责任就会落在君父的身上，人们就会认为我是在怨恨君父。我的出走就会把君父的过失公布于天下，人们就会取笑我，说我是一个不忠不孝的人，谁还会接纳我？”

“啊？”小臣大惑不解，现在面临危险的分明是太子你，怎么你反倒替国君担心起来了？“可是太子你是清白的啊！为什么就不能逃走呢？”

申生没有理会他，而是接着喃喃自语：“内不容于父母，外又没有诸侯可以投靠，内外交困，我还跑什么呢？更何况，为了逃避罪责背弃了君父，是可以留下一条命，可这又能如何呢？这只能说明我是一个无智谋、无勇力、无仁德的庸人罢了！有智谋的人就不会落到我今天这样的下场，有勇力就不会因为怕死而逃亡，有仁德的人就不应该怨恨国君，否则让君父留下骂名，这不就是小人的做法吗？”

新城雪月

申生每日沐浴更衣，等待父亲的钧命，却始终都没有等到。此时的他不知是否还存着那份侥幸，但杜原款的话却真切地说动了他，让他宁愿求死也要搏一搏，用父亲的宽厚仁慈来为自己博一个前途——抑或是声名。

事实上，晋献公已经从盛怒之中清醒了过来，他并没有继续派兵围攻曲沃。因为按照《国语》的记载，酒肉中所下的毒分别是乌头和鸩毒。而杜预在注解中则提到，鸩酒乌头盛放一昼夜就会变质，若果真是放了六天，恐怕早就被发现了，因此毒药一定是当日才放进去的。

这一点献公显然是知晓的，因此当他回过神来，便再次陷入了犹豫之中。父子亲情显然让他无法割舍，即便是申生真的有罪，他也会有所犹豫，更何况他已经认识到了事情的真相。但这又的确是一个废立太子的时机，趁这个机会换掉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很欣赏，而且已经声名狼藉的太子，并非一件难事。

献公一犹豫不要紧，骊姬却一刻都坐不住了。她担心国君发现下毒之事是自己所为，并因此而迁怒于自己。事情一旦开始便没有了回头路，要想在这次的斗争中获胜，就必须不择手段。为此，骊姬急匆匆地从绛都赶到曲沃，以彻底摧毁申生的心理防线。

在空荡荡的新城大殿上，她声泪俱下地斥责申生，让他不要再心存侥幸。这番说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下手：首先是一口咬定下毒之事就是申生所为，他的父亲之所以没有讨伐，并不是因为不知晓内情，而是顾念父子亲情不忍心下手罢了。其次是告诉申生，也不要指望国人会对他施以援手：“你信誓旦旦地说会为国人谋福利，可一个连亲生父亲都忍心谋害的人，他们又如何相信你会真心地保护他们？相信你会为他们谋利呢？百姓对你恨之入骨，又岂能容你继续逍遥？”

骊姬的一番话让申生心如死灰，他失魂落魄地瘫坐在地上，痛彻心扉的嚎叫声让整个城池都为之震撼。他本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唯一的奢求就是再见父亲最后一面，可如今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办法？为了一个忠诚孝敬的名声，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经过了一次次的打击，所有人都已经离他而去，他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反抗？

不想反抗，不想逃亡，留给他的便只剩下了一条路——一条绝路。万念俱灰之中，申生终于做出了一生中最有勇气的决定：他选择了一条绳索，孤苦伶仃地在这座了无生气的曲沃城里，在下国宗庙冰凉的大殿上，迎着冬日里飘摇纷飞的琼琚，结束了这如雪花飘零的一生。

这一天是献公二十一年（前656年）夏历十二月二十七日。

闭门谢客的狐突，在新年来临之时收到了太子自杀的消息，那是太子最忠心的家人带来的遗书，信中说道：

当年伯氏语重心长地劝我离开，可我却没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最终落得如此下场，如今回想起来，真的是悔不当初。事情既然已经发展到了如今的地步，我申生不敢贪生，只能对你表示感激。

如今我要离开了，本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可想到我年迈的父亲，终究还是有些不舍。如今国家多难，又有那么多小人围绕在他的身边，实在让人放心不下。伯氏如此睿智练达，如果愿意重新出山帮助我的父亲，我将更加感激不尽。父亲有了你的辅佐，我死也瞑目了。

看到这些话语，狐突顿时老泪纵横。一个远离家庭温暖独自长大的孩子，为了获得父亲的认可，为国为家付出了那么多艰辛，如今却落得如此下

场，怎不让人痛哭流涕？一个忠诚孝敬的孩子，即便是死到临头了，却还时刻惦记着自己的父亲，又怎能不让人为之动容？可惜他生不逢时，上天给了他太子的尊荣，却又给了他愚忠愚孝的秉性，最后难得善终，可悲可叹啊！

第五节 祸起何处

祸水之源

“曲沃代翼”和“桓庄之族”的故事还历历在目，所造成的创伤还没有修复，“骊姬之乱”便以一副狰狞的面目血腥上演，终于造成了太子自杀的惨痛结局。不久后，其余两位公子重耳、夷吾也相继出奔，为后来晋国政局的长期动荡埋下了隐患，更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深感痛楚。晋献公尝到了权力任性的后果，也意识到了原有制度的缺陷，可他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再去修补这些弊端了。

“乱世用重典，沉痾下猛药。”此后不久，一项决定了晋国此后命运的法令横空出世，这也就是所谓的“国无公族”制度。晋献公下令，晋国不再蓄养公族，凡未被立为太子的公子要一律送出国门，成年之后也不再给予封地，这项政策也成了晋国此后几百年里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

至于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骊姬，人们总是不吝于用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她，并将这场事变的责任都推到了她的身上，这便是“骊姬之乱”得名的由来。骊姬承担了晋国祸乱的全部责任，终于如太史苏所预测，成为继妹喜、妲己和褒姒之后的又一个“红颜祸水”，自然也遭到了国人的痛恨。

根据汉代刘向《列女传》的描述，骊姬由于扰乱国政，为里克所戮。“戮”在古代刑法中并不仅仅是杀掉了事，还包含有羞辱的意味。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游街示众、公开处死就是“戮”的基本形式。除此之外，为了表达对罪人的深恶痛绝，鞭尸也往往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在重视个人名誉的春秋时代，这种刑罚是对一个人最为残酷的羞辱。

但是如果我们抛开“红颜祸水”的论调，仔细回头来审视这场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悲剧，或许就会发现，骊姬虽然在整件事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可若要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她，也有失公平。

在男性掌握多数资源的父权社会里，女子往往要依附于男性——比如父亲、丈夫和儿子——以获取生存资源，即便是那些有着赫赫声名的女性领导者也概莫能外。而在这其中，儿子往往才是宫中女子后半生唯一的依靠，这也是身处宫闱中的女子不得不参与到权势争夺战中的根源所在。

身为一名亡国之女，骊姬除了具有那个时代女性所共有的焦虑外，还同时兼具了由国家破亡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为了消除这些无处不在的焦虑，她自然会将希望寄托在奚齐身上，并为他将来的道路谋篇布局。而由废长立幼带来的灾难，显然也不是她能够控制的。

“骊姬之乱”之所以会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晋献公一手导演的悲剧。骊姬在整个事件中如果说起到什么作用的话，最多也只是顺应献公的心思推波助澜，做了一些舆论引导工作，也就是史料上常说的“谗言”。如果献公没有这样的念头，以他这样心志坚定的君主，单靠骊姬一个人不断地进谗言、散流言，恐怕很难起到实质上的作用。也就是说，骊姬不过是晋献公抑或是晋国当时制度缺陷的“背锅侠”罢了。

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有“诸侯不再娶”的说法。一般认为这主要是与当时普遍实行的“媵婚制”有关。《公羊传》有云：“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诸侯嫡女出嫁，不仅要有本国的侄女和庶妹作为媵妾陪嫁，还要有两个同姓诸侯送出同样数量的媵女，加起来共有九女同嫁。但从更深层次分析，“诸侯不再娶”的根本目的恐怕还是为了确定尊卑，以确保嫡长子继承制能够得到贯彻。

本书开篇时就提到过，商王朝的灭亡以及周初“三监”的叛乱，继承制度的不确定性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周公旦制礼作乐，正是以这些教训为蓝本，将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为周王朝的基本制度，用完全的确定性消除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风险，用严格的制度约束为后人开辟出一条通往和平稳定的康庄大道。而在这诸多的确定性规则中，“诸侯不再娶”的规定，正是在为这种唯一继承制度保驾护航。

比如杜预在注解《春秋》“考仲子之宫”时便提到“诸侯无二嫡”，也即诸侯国君一生只能娶一名正妻。就拿晋献公来说，既然他已经立过夫人，且将夫人齐姜的儿子申生确立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就不应该轻易改弦更张。即便是齐姜已经亡故，在她之后进门的，无论德行多么高尚，都不能再立为夫人。否则的话，就必然会给当时的礼法专家提出一个巨大的难题：申生是否还是嫡长子？或者说，骊姬生子之后，她的儿子奚齐和齐姜的儿子申生究竟谁才是嫡长子？谁才是合法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申生将来不再是嫡长子，那么他如今太子的地位是否还能得到保留呢？

晋国大夫无论是唱起“红颜祸水”的论调也好，通过占卜来表明态度也罢，他们阻止献公立夫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既然太子的地位已定，若不想动摇太子的地位，就不能再立夫人了，以免使得太子无所适从，从而将晋国再次拉回到战乱的旋涡之中。

但在春秋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切旧制度旧观念都已被摧残得不像样子了，若是固执地坚守过去的原则，晋国就不可能取得今日的成就。越是卓有成就的君主，往往也是破除旧观念最为彻底的人，譬如当时称霸中原的齐桓公，不但一股脑儿地立了三位夫人，还同时并行着六位如夫人。在这位有着赫赫声名的霸主面前，晋献公的出格举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一提。

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新旧制度和观念的冲突总是无可避免的。于晋献公而言，他再立骊姬为夫人或许只是一时任性，可对国内大夫来说，传达的却是另外的信号。世间所有的故事都有因果，而在“骊姬之乱”的故事中，申生的悲剧，恐怕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观念之争

前文 我们通过分析晋献公的心路历程，对这对君臣父子关系逐渐走向恶化的过程进行了推测和还原。尚未提及的一点是，晋献公与申生之间的冲突，还隐含着的观念冲突的影子。

晋献公是一个极富野心的政治家，这种野心不仅仅体现在“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功业上，更体现在他对旧有制度的“大破大立”之上。

晋献公对旧制度的“破”，在前述“聚邑之围”和“骊姬之乱”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周礼倡导“诸侯不再娶”，可晋献公偏要顶住压力，将骊姬再立为夫人。当时的人们倡导同姓不婚，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偏偏晋献公就娶了一堆同姓的女子：贾君，贾国公室，姬姓；狐季姬，狐氏大戎，姬姓；骊姬两姐妹，姬姓。周礼倡导爱亲尊贵，他偏偏不信任自己的亲戚，用尽残忍的手段屠戮亲族、摒弃公族，从而连续制造出两桩血案。

而在“立”的方面，晋献公也颇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首先，是在制造了“聚邑之围”将“桓庄之族”屠戮殆尽之后，他坚决摒弃了“亲亲尊尊”的原则，启用了大批异姓、异氏大夫，这在整个春秋时代都是独一份的。

比如一手导演了“聚邑之围”并被任命为大司空的士蔿，以及太子申生的大傅杜原款，都属于祁姓唐杜氏后裔。在讨伐霍、魏、耿三国时担任御戎

和车右，并因此获封耿、魏两邑的赵夙和毕万，分别是嬴姓赵氏和姬姓毕国后裔。随同太子出征的梁余子养，以及“二五耦”中的梁五，都是嬴姓梁氏出身。在“假道伐虢”战争中献出奇谋的荀息，其本名叫原氏黯，虽同为姬姓，但族源应该与王畿内的原公国有关，与晋国公室并无亲缘。在“骊姬之乱”中倾向于申生的里克和不郑，大抵上也都是异姓、异氏出身。

在献公时期受到重用的也有一些出自晋氏公族的大夫，比如在讨伐狄祖国的战斗中献计并“被羽先登”的卻叔虎，以及讨伐东山“皋落氏”时随同太子出征的狐突、先丹木、先友，据称都有公族身份，但其与公室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严格来说也应当归于“异氏”之列了。

不仅如此，晋献公在选人用人之时，对个人的出身也并不挑剔。在刘向编撰的《说苑》一书中，就讲了一个《东郊祖朝上书》的故事。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祖朝的东郊百姓，有一天他上书请求与闻国家大事，晋献公答复说：“肉食者已经考虑周全，藿食者又何必干预呢？”没承想祖朝却以御戎和车右的关系举了个例子，说“肉食者”在庙堂上一旦失策，“藿食者”在原野上就会有性命之忧，自然是要关切的。晋献公闻听此言，急忙将祖朝请了进来，与他长谈三日，甚至还将其视为自己的老师。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晋献公为实现君主集权，在重用异姓大夫的同时，还在晋国边境地区率先推行县制，试图以国君任命边境官员的方式，取代过去封建亲戚的旧制度。这其中，献公十六年时赵夙受封的耿、毕万受封的魏便是晋国设立的第一批县级行政单位。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测：献公十一年时将申生、重耳、夷吾外放边城的举动，未见得就一定是厌弃了三公子，也未见得自那时起，他就动了要立奚齐为太子的心思。恰恰相反，或许正是因为三公

子身份尊贵，他希望借此将曲沃、蒲城、南北二屈变成国君直辖的领地，并以此为样板将县制改革推行开来。历史上并不缺乏与之类似的例证，比如战国初年魏国攻取中山，魏文侯将自己的太子魏击派到中山，其本意就是不希望将中山封给建有战功的乐羊，这与晋献公的做法可谓是异曲同工。

然而，春秋初年的思想观念毕竟没有战国时期那么开明，其结果自然也就大相径庭了。正如早年再立夫人的举动被人误读，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晋献公时期所推行的县制改革似乎并未取得成功，反而是外放公子的举动在各种势力的推动下走了样。随着时间的流转，整个剧情完全脱离了预设的轨道，演变为制造动乱的根源。

作为一名有着赫赫武功的君主，晋献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将晋国从一个处处受制于人的区域性国家演变成了一个可以影响中原政治格局的重要参与者，这样的成就也的确太过瞩目，使得他身上被赋予了太多的光环，以至于失去了自省的能力，从而变得比其他的君主更加膨胀。这种超级自信，让他总以为一切都能在他的控制之下按照预定的轨道走下去，却全然意识不到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的局限性，这也是他的一个悲剧。

与晋献公“大破大立”和集权主义的风格截然相反，从十几年来的种种表现来看，申生却是一个极端守旧的代表。申生并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他之所以在献公频繁的暗示下岿然不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羊舌突、杜原款的教育，谨守敬、孝、忠、贞的观念，毫无底线地维护父亲的权威。

申生和他的父亲恰好处在新旧时代、新旧观念的两端。观念的差异导致了思维方式的差异，申生以极简的方式去看待周围的每一个人，以最为良善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则是以最大的恶意看待每一个可能威胁自己权力的人，因此申生的这种极简主义就很难为献公所理解。观念截然

相反两个人注定无法共存，这种错位逐渐积累起来，就会酿成巨大的矛盾和冲突，申生之死正是这一冲突必然会导致的结局。

晋献公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杀伐决断、冷血异常，在征讨兄弟之国的时候不择手段，诛杀桓庄之族的时候心狠手辣，很多做法都大大地超越了底线，为世人所不容。但在对待申生时，他又是个顾念亲情的人，终究还是保留了一些温情。从即位五年左右确立骊姬夫人身份开始，一直到二十一年申生自尽，这十几年间他从未对自己的儿子下过狠手，只是一直在用各种手段暗示申生知难而退。甚至到下毒事件发生后，他也没有趁机逼迫，而是给足了申生逃亡的时间，足见其舐犊之情。

只是他的良苦用心难以为申生所理解，申生最终没有如其所愿逃出国外，反而是以在宗庙中自尽这种悲惨而壮烈的方式将自己的父亲推向绝境，同时也使得本来只是局限于申生与奚齐两个“嫡子”之间的争斗，变成了诸公子共同的战场。这大概是晋献公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的结果吧！

献公遗恨

申生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不管怎么说，逝者已矣，太阳总会照常升起，活着的人还要把路继续走下去。然而对于操盘了整个事件的献公来说，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一场变故就让他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父子亲情也变成了蚀骨之痛。更让他痛心的是，骊姬之乱爆发后，诸公子夺嫡的斗争开始浮上水面，派系之间已经势同水火、剑拔弩张，国中上下各怀异心，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做打算。整个国家积极进取的风尚也一去不返，使得他韬光养晦所要寻求的集权之路戛然而止，更打断了他孜孜以求的霸主之梦。

尽管如此，晋献公寻求参与中原大事的雄心始终未死，他还是想到中原去会一会诸侯列国的君主们。于是在即位第二十六年（前651年）时，他不顾

老弱的躯体，坚持要去参加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附近）举行的会盟。

途中，献公路遇周襄王派往葵丘参加会盟的太宰周公孔（又称宰周公，宰孔），问明来意之后，宰周公对献公说：“历来齐侯的会盟你都没有参加，这次的会盟也不必去了。”

献公不知其故，宰周公耐心地解释道：“齐侯生性爱炫耀，爱表现，更爱施恩，注重武力但却缺乏真正让人心悦诚服的德行。为了让归顺者受到鼓励，让背叛者羡慕嫉妒，齐侯从来不吝于施加最丰厚的赏赐。他所举行的历次会盟，不过是不断重申过去的誓约，简化会议的仪式，并尽量给诸侯施以好处。诸侯对此心向往之，以至于不少人来参会的时候，往往只需要象征性地带一些礼品过来，但却可以满载而归。”

在武力方面，宰周公说：“齐侯主持了三次会盟，挽救了三个即将灭亡的国家（指的是齐桓公‘救邢、安鲁、存卫’的三大功业），向这些有危难的国家施加恩惠。他邀集诸侯向北讨伐山戎，向南攻服楚国，向西则是举行此次会盟。”

这些作为表面上看大家都心悦诚服，实则是暗藏危机。齐桓公并不是无偿地在做好事，而是“像放债一样遍施恩惠”，是需要人们回报的。可得到帮助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他，最后难免会因此结下怨仇。

最后，宰周公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从这种种迹象来看，齐桓公的霸业已经到顶了——“这就好比是盖房子，栋梁之上的屋顶都已经建好了，又如何再加盖楼层？”即便是还能延续几年霸业，他的影响力也只限于东方诸侯，对晋国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与其耗费精力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会盟，倒不如回去好好想想，将来果真需要你出力的时候究竟该做些什么吧！

听了宰周公的这一番分析，晋献公深以为然，于是便终止了这次行程折返回国，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参与中原事务的冲动也就此打消。望着献公远去的背影，宰周公突然喟叹一声，对自己的御戎说道：“晋侯命不久矣！晋国有霍太山作为城墙，有汾水、黄河、涑水、浍水作护城河，周围更是有数不清的戎狄环卫。如此表里山河，只要不违背天道，又有谁能撼动呢？他明知齐侯霸业不久，不关起门来治理国家，却轻率地坚持参加会盟，可见他内心是有多着急。心理如此失衡，恐怕很快就会死了！”

宰周公所言非虚。晋献公之所以如此心急，正是因为他的身体早已江河日下，使得他急迫地想在有生之年实现心中夙愿。然而宰周公的话却点醒了他，让他明白成就霸业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他如今的当务之急，恐怕还是要趁着自己健在的时候，尽早为嗣君的地位做出安排。

然而，亡羊补牢显然有些太晚了。不管献公多么雄才大略，身后的事情终究还是他无法操控的。公元前651年夏历九月，在位二十六年的晋献公撒手人寰，仅仅一个月后，一直暗藏心机的里克便发动了政变，献公穷尽一生都试图消除的公族内乱，终究还是以“五世昏乱”的形式爆发了。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晋献公征伐一世，大大地扩展了晋国的领土，但最后却因为手段太过激进，将自己一手壮大的国家拖入了内乱的泥潭，更中断了他梦寐以求的霸主之路。而由他一手缔造的“国无公族”政策更像一把双刃剑，影响的不仅仅是他自己一朝，更是后来晋国的国运。晋国先是称霸中原，而最后又被强卿所瓜分，都能从中看到端倪。

第四章 “五世昏乱”与“秦晋之好”

第一节 二子争政

里克之乱

公元前651年夏历九月，参加葵丘会盟中途折返的晋献公自知时日无多，便将他最信赖的大夫荀息叫到了榻前，郑重其事地将骊姬的儿子奚齐托付给他，让他担任奚齐的老师，辅佐其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

这位荀息大夫旧名原氏黯，晋武公晚年时因功勋卓著受封于荀国故地，从此以后便以荀为氏。晋献公在位时期，荀息一直兢兢业业，为国家征伐大业出谋划策，著名的“假道伐虢”之计便是他的手笔。

可尽管有如此智谋，荀息却也是一个愚忠之人。当许多大夫都卷入到骊姬之乱中并先后表明立场的时候，我们却从未看到荀息对此做出过任何有倾向性的表态。他始终坚守着“君立臣从，何贰之有”的人生信条，凡事以君主的喜好为上，即便他明知国君的决策是错的。正因为其脾性如此，献公对荀息的为人深信不疑，故而才在临终前将一个人人避之而不及的烫手山芋交付于他。

此时距离申生之死已经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间，尽管有骊姬羽翼的护佑，奚齐在国内的根基终究还是不够稳固。相反，那些原本效忠于太子的党羽纷纷转投到重耳、夷吾二公子门下，誓与骊姬周旋到底，反而使得奚齐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

荀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托孤重责。他深知奚齐幼弱，两个兄长又虎视眈眈，辅佐奚齐的事业终究会走向失败，却还是无法拒绝，不得不接

受了这份使命。当献公问起，如何才能保证兑现诺言的时候，荀息给出的答案是：“唯有忠贞二字。”

献公不解地问道：“何为忠贞？”

荀息不假思索地回应说：“只要是对公室有利的事情，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尽力去做，这就是忠；埋葬逝者，侍奉生者，即便您从坟墓里爬出来，看到我的做法也不会埋怨，这就是贞。”

言至于此，献公突然流出两行清泪，随后无奈地摇了摇头不再作声。初十日，晋献公带着对未来的忧虑与世长辞，而荀息也信守诺言，与骊姬及二五耦等人合力扶植奚齐为君。

大约就是从这一刻起，那个在先君面前唯唯诺诺、态度左右摇摆的里克，终于压抑不住本心，决定召集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子之党发动一场政变。

政变之前，里克念及同僚之宜，曾旁敲侧击征询过荀息的意见：“三公子的追随者想要杀掉奚齐，秦、晋两国各方势力都将支持他们发难，你究竟是何立场？”

荀息面色凝重，掷地有声地吐出了四个字：“以死相报！”

里克十分关切地问道：“你这又是何必呢？如果你的死能换来奚齐地位的安定还则罢了，可你明知道以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局面，又何必非要送死呢？”

荀息坦诚回答道：“我已经向先君许下了诺言，就要以死来践行，岂能因为爱惜己身而食言呢？就算是死得毫无意义，也绝不后退！”

往日里是亲密的战友，如今却因为立场不同成为对手，这让里克不禁感慨万千。他含着泪看着荀息视死如归的脸庞，心中暗暗地为之惋惜。

事后里克又找到了丕郑，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丕郑听了之后如连珠炮一般，把想法全抖搂了出来：“你就带着公子党羽和七舆大夫放手去做吧，事情只要谋划得当就一定能成功。这件事我会从侧面协助你，若是还不放心，我可以引狄人和秦国的力量来干扰公室。事成之后你我就立一个人望差的做国君，人望好的就不让他回来了，也好让天下人看看，这晋国究竟是谁说了算！”

丕郑的想法简单粗暴，让里克脑子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急忙劝阻道：“万万不可！即便是不成功也绝不能行此不义之举！我们之所以要杀掉奚齐，并不是因为他这么一个小孩子能有多大罪过，而是因为骊姬蛊惑君主欺骗国人，逼杀了无辜的申生，又赶跑了诸位公子，使得民众皆心怀怨憎。我担心百姓的怒火会像壅塞的大河一样一触即溃，所以才要杀掉奚齐，为的只是团结国人、一致对外，以免让晋国遭受祸乱。只要我们的做法符合公义，天下诸侯就会主动前来协助。可要是为了贪图利益引狼入室，这就是违背道义的行为了，就算是成功了也会失去主动、任人宰割。更何况，如果杀掉新君仅仅是为了给个人谋私利的话，只能招致民众的怨恨，就算是成功了也会遗臭万年，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丕郑听了汗颜不已，急忙向里克道歉：“你说得没错，都怪我急糊涂了，差点犯下了弥天大错！”

有了丕郑的支持，里克便伺机率领三公子私属武装包围公宫，在献公灵前将奚齐杀死。眼见先君灵柩未葬、尸骨未寒，嗣君就死于非命，荀息自觉失职，对不起献公的嘱托，便想要以死谢罪。这时有人从旁劝阻，说还可以

立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为君，荀息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又立了卓子。为了防止里克再次图乱，他对卓子进行了严密的保护。然而卓子还是没能撑过一个月，很快就被里克所策反的东关五门客、大力士屠岸夷杀死在朝堂之上。

里克连弑二君，又杀掉了骊姬，逼得荀息无路可走，只能自裁以报君恩。而君位的空缺，又使得晋国上下的空气顿时紧张了起来，原本有着共同目标团结一致的贵族们，自然而然地分野为两个阵营：以里克、丕郑为首的一派选择支持公子重耳，郤称、吕甥则另立山头，选择支持公子夷吾。两派之间剑拔弩张，争先恐后地派出信使前往两公子驻地进行联络，以期自己所支持的公子能够尽快回国夺位。

柏谷之谋

说起重耳和夷吾这几年的下落，我们还需要把视线再拉回到五年前，也即公元前656年的那场宴会。彼时骊姬假意让太子申生祭祀齐姜，随后又在他带回的祭品中动了手脚，从而成功嫁祸申生，迫使其奔守曲沃，并于当年冬天悬梁自尽。申生的死讯迅速传遍了晋国的大小城邑，但人们对这件事情丝毫都不感到意外，反而是静静地盯着公宫的动静，等待着另一只靴子的落地。

这只靴子倒也没有悬多久，就在申生死后不久，在宴会上亲眼看到了事变全过程的两公子也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到了他们所驻守的边邑，这倒是帮了骊姬的大忙。不久后，她再次向献公进言说：“申生下毒之事暴露之后，两位公子不告而别，显然是与申生合谋，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审问！”

献公本来就对申生下毒一事抱有疑虑，对重耳和夷吾与之合谋的说法自然也很难说就深信不疑。无论他有多么心狠手辣，也断然不会忍心因为骊姬

的几句挑唆，就轻易地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杀掉三个儿子。

可问题是，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个人，最难逃脱的莫过于“不得已”这三个字，哪怕是手握宝器的国君也概莫能外。人人都爱惜羽毛，没有谁会情愿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之上，可到了情非得已的地步，总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让你无力反抗、无法自主。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于晋献公而言，已经不是他想不想、愿不愿的事了，而是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将影响降到最低。尤其是当重耳、夷吾出逃以后，当初为士蔿所忧心的“一国三公”局面已经形成，战乱一触即发，由不得他有半点犹豫。因此，新年刚过（前655年，假道伐虢之年），晋献公就借着这个理由发兵蒲、屈，去攻打自己的儿子。

伐蒲城的是一个叫寺人披（又称阍楚、勃鞞、履鞞）的宦官。此人得了国君的命令，兵贵神速，不日就抵达了蒲城之下。重耳刚刚逃到蒲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天降神兵”打了个猝不及防。重耳在蒲城内与对方短兵相接，无奈年纪太小武力不济，在对方的强攻之下只能越墙逃跑。寺人披武功可真真了得，他一直追到了城墙边上，手起刀落就砍掉了重耳的一只袖子——要不是寺人披当时手持的是青铜短剑，后来雄霸天下的晋文公恐怕早就成了“独臂侠”了。

这件事情让后来登位称公的晋文公感到十分尴尬，因此在回忆起这段逃亡生涯时，他并不承认是自己失策，反而辩解说，当时自己还念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原则，不愿意违抗父亲的命令，因此特别下令：“谁要敢反抗，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套说辞尽管可以维护其“伟光正”的形象，却并不怎么经得起推敲。若其如此，当申生事发之时，他就不应该不告而别；当寺人披抵达蒲城之

时，也应该束手就擒接受君父处置才是，为何又屡屡逃避呢？

可不管怎么说，重耳还是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仓皇间跑到了黄河南岸的柏谷（今河南灵宝西南朱阳镇）。不久之后，他的部众也陆陆续续赶到，这其中就包括晋文公所谓的“五贤士”——狐偃、赵衰、胥臣、贾佗、魏犇等忠臣良将。

重耳出逃之时，虚岁只有十七岁，对大势的认识还十分粗浅，只知道齐、楚两国势力颇大，于是就想占卜一下以确定究竟该投奔何方。但他的舅舅狐偃（字子犯，又称舅犯，是狐突次子）似乎早就打定了主意，摆了摆手说道：“不用占卜了。齐、楚两国离晋国太远，一旦国内有事再往回赶就来不及了。”此外，狐偃还指出：“齐、楚两国野心太大，在你困厄之时前去投奔，才不会出手相助呢！”

狐偃的分析不无道理。自故太子申生死后，太子之位虽已落入奚齐彀中，但谁都知道，仅凭骊姬在国内的人望，很难稳固奚齐的地位。一旦国内发生变故，想要回国争位，时间就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因素，其中的逻辑从齐桓公与公子纠纷夺君位的故事中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说，君位的最终归属并不取决于个人能力，而是要看谁跑得快，先入为主者往往能够占据主动权。

狐偃对齐、楚两国态度的分析，与周室大夫宰周公对齐国的论断不谋而合。两国对于国际政治都有着非凡的野心，他们对诸侯的封赏或帮助，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倘若你的到来不能为他们带来实在的利益与声望，就很难让他们产生帮助你的动力。更何况，当下两国交锋的主战场在东方，晋国僻处西方，与他们利益并无太多交集，这就使得他们很难产生干预晋国内政的强烈意愿，又怎么会帮助一个流亡公子回国夺位呢？

不过，在分析完局势之后，狐偃走了先手，却下出了一步臭棋：他建议重耳转道到狄国去。

据坊间传言，重耳所投奔的狄国似乎正是重耳的母国，位于吕梁山区的狐氏大戎，也就是狐偃的老家。不过狐偃在分析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只单纯地提到狄国具有“近晋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达”的诸多优势。也就是说，狄国与晋国距离适当，但却与晋人素无往来，国内无事时便于隐藏行踪，当大事将临之时，也能够快速反应；而与周边各国结怨甚多，又使得他们愿意与流亡团队结成同生死共进退的利益联盟。

从当下的情形来看，狐偃的分析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相比于距离遥远且欲求不满的齐、楚两国，狄国的确是个不错的选项。但当我们看到夷吾接下来的选择后，便不免会对狐偃的论断产生疑问，两者决策的高下也就隐然显现了。

夷吾奔梁

晋献公在派人攻打重耳的同时，还派贾华去攻打驻守屈邑的夷吾。或许是因为山高路远，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夷吾在支持者的保护下拼死抵抗，挡住了第一波攻击。但到第二年（前654年），贾华重整旗鼓再次带兵攻打时，夷吾也无法坚守，只好与当地军民盟誓后匆匆弃城出逃。

夷吾出奔之时，早就听闻重耳正居住在“狄国”，也就打算跟着去，但却被他的智囊郤芮（冀芮，字子公）断然制止：“你出逃在后，但却与重耳落脚到同一个地方，就坐实了你们合谋的罪名。”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郤芮有扶植夷吾争夺君位的野心，假如跟重耳逃奔一处，将来国内一旦有事，两个人都想回国夺位，势必会让夷吾陷入危险之中。

在诸多选项当中，郤芮最终选择了梁国作为夷吾的落脚地。其优于狄国的原因有三：首先是从地理位置上看，梁国地处黄河以西（今陕西韩城境内），与晋国的韩原隔河相望，距离要比狄国近许多；其次是从政治关系上考量，梁国与秦国同属于嬴姓诸侯，且是鸡犬相闻的友好邻邦。投奔梁国，会给骊姬造成夷吾已经取得秦国支持的假象，使之不敢前来讨伐，甚至还会迫于压力主动寻求和解；再次，是郤芮的话语中没有提到但也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能够与秦国保持适当距离，避免因其“望大”而对夷吾将来争夺君位产生消极影响。

郤芮的判断是准确的。在他们抵达梁国的第二年，骊姬就不得不派寺人披带着上好的玉环与夷吾结盟。君位的争夺还没有开始，夷吾就占尽了先机，而反观重耳的局势，就很不乐观了。

重耳投靠狄国之后，由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在各方面都很难得到有力的支持。为了打击重耳，打消其夺嫡的念头，骊姬鼓动献公于二十五年（前652年）派人讨伐狄国，在采桑（今山西交城）打败狄军，着实给了重耳一个下马威。

好在此次统兵的将领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发动政变的里克。我们无法揣测申生遇难之后，里克是如何在悔恨中煎熬度日的，更无法揣测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一个意志飘忽的政客，有朝一日会突然鼓起勇气发动政变。但至少可以肯定，在有望争夺君位的三位公子之中，里克更倾向于支持公子重耳。因此在奉命讨伐狄国之时，就留下了相当的余地，并不想将敌人赶尽杀绝。而当担任御戎的梁由靡想趁敌人败逃之际掩杀之时，里克更是一口回绝道：“我们只需要吓唬他们一下就行了，不要因为追击招来更多的狄人。”

倒是担任车右的驪射自以为聪明，在一旁随声附和道：“对啊，我们不追击，是故意向他们示弱，这样狄人就一定会卷土重来。”后来狄人果然前来报复采桑之败，驪射自以为预言了这场战事，但在里克的心里，恐怕早就有了更大的筹谋，这些显然不是驪射能够预知的。

信仁为亲

里克之乱爆发后，里克、丕郑旋即派刺杀卓子的大力士屠岸夷往狄国与公子重耳接头，卻称、吕甥则派蒲城午前往梁国寻找公子夷吾。

重耳和夷吾得知国内消息，都知此事关涉重大，若是不能及时回国即位，君位恐会被对方抢去。但与当年齐桓公争夺君位的态势有所不同，晋国内部矛盾要比齐国的局势复杂得多，又使得两位公子谁都不敢“先入为主”。

里克之乱爆发之前，重耳和夷吾虽志向不同，但至少在申生一事上立场是一致的。可当他们把目标都放在君位争夺上时，就不免会产生嫌隙甚至是敌对情绪。当此之时，二位公子支持者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完全占据上风，无论是谁率先回国即位，都会面临一个反对势力坐大的问题。

国内派系分化严重，斗争形势不容乐观。在这种局面下，速度固然重要，但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真正能够决定君位归属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于是，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秦国，而秦国此时的君主秦穆公，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大救星”。

按照《国语》的说法，为了尽快解决争端，避免君位悬而不决引发动荡，夷吾的支持者吕甥（字子金）率先提出了请秦国介入晋国嗣君之争的提

议。在取得国内贵族的同意之后，他便委派梁由靡出使秦国，而巧合的是，秦国人也恰好有干涉晋国内政的强烈意愿。

接到调停两公子纷争的邀约，秦穆公召集大夫孟明视和公孙枝商议对策。孟明视认为公子絳“敏且知礼，敬以知微”，在外事活动中不仅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且有洞察入微的智慧，最是适合担当这次的外交使命。

公子絳以吊丧的名义外出考察，首先来到了狄国，向公子重耳郑重提出：“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时不可失，丧不可久，公子其图之！”其意是在表明，争夺国君之位的时机通常都是在国丧期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并不关乎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而且这样的机会转瞬即逝，公子若是因为有所顾虑而放弃争夺，将来可就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可怜公子絳一番真情流露，重耳却不怎么领情，反而态度坚决地推托道：“父亲的丧礼没能参加，已经是不孝了，现在父亲尸骨未寒，怎么敢有其他的想法以玷污您的义举呢？”说完之后，重耳恭恭敬敬地向公子絳行了个再拜之礼，然后就哭哭啼啼地离开了，此后也没有对他进行回访，以表示自己在感谢吊丧之外，并不想提其他要求。

不过，公子絳并不是头一个吃闭门羹的，早先屠岸夷受里克委派，前来邀请重耳回国，就曾说过“得国在乱，治民在扰”的话，这与公子絳提到的“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但屠岸夷的提议却遭到了狐偃断然拒绝。在他看来，要想坐稳国君之位，必须要先强基固本，基础不牢靠，即便是坐上了国君之位也难得善终。为人君者，必须要谨守礼节，才能够训导民众。倘若在国家丧乱期间夺取君位，就会把国丧当成乐事，把祸乱视为喜庆，做出违背礼仪的事情。这样还如何教导民众，又如何当得好国君呢？

狐偃的高论违背了常理，因此就连重耳都表示不理解：“自古以来新君即位哪个不是在先君的丧期之内？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动乱，也不可能有人来接纳我啊！”

然而狐偃照旧态度坚决：“所谓丧乱也有大小之分，父母之死为大丧，兄弟相争为大乱，此等锋芒绝对不可以冒犯。如今正值大丧大乱期间，贸然回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这套说辞并没有完全化解重耳的疑虑。但重耳对舅舅的信任显然是不打折扣的，因此便依着狐偃的吩咐，对屠岸夷说道：“君子能惠顾到流亡之人，重耳不胜感激！但我听说，能够安定国家的人，要懂得亲近民众、和睦邻邦，还能因民而顺之。若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得到邻邦的扶助和大夫的效忠，重耳自是不敢违背。可如今重耳却是一个不忠不孝之人，父亲在世的时候未能在他身旁尽忠尽孝，父亲去世后又不敢回去操办丧事。身负如此罪过，自知无法做到亲众而善邻，恐怕是要辜负各位大夫的期许了！”

如今公子絳再来考察，重耳依旧不改初衷，在狐偃“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思想的指导下，又一次推托了秦穆公的好意。

当机会来临之际，重耳两番推辞君位，素来被当作仁德的典范为人所称颂，但如此典范却很难经得住推敲。正如重耳在反驳狐偃时所提出的疑问，自古以来，新任国君大都是在父母之丧或兄弟阋墙的大丧大乱期间即位的，狐偃即便再迂腐，也不可能连这最基础的常识都不具备。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何要做出此等姿态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之前重耳与屠岸夷的谈话：“夫固国者，在亲众而善邻，在因民而顺之。苟众所利，邻国所立，大夫其从之，重耳不敢违。”这句话看似是在谢绝里克的邀请，但也表露出了当时局势下回国即位所需的三

样条件——民众的支持、邻国的扶助和大夫的效忠。或许在狐偃看来，在大丧大乱期间表现所谓的“仁德”恰恰是获取这三个条件的手段。至少从当下的情景来看，公子縶名义上是来考察两公子德行的，那么在他面前表现至仁至信，似乎才是最有力的武器。

然而，政治运行的逻辑从来都是残酷的，在现实利益面前，道德教条从来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即便公子縶有意依照“德行”观念来做出评价，可最后的选择却必须符合秦国统治阶层的整体利益。因此，从这些表现中我们很难看到重耳的德行有多高尚，狐偃的谋略有多机智，相反，恰恰表明重耳和他的舅舅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他们在选择逃亡地点失误之后，再次犯下了一个重大的错误，直接导致与君位失之交臂，最终不得不继续流亡。

而与狐偃处处标榜“信”与“仁”的姿态截然相反，夷吾团队的表现则处处透露着强烈的功利主义气息。

早在公子縶出访之前，吕甥和郤称便已派出使者蒲城午来告知，希望夷吾能对秦国施以重贿。当时夷吾的智囊郤芮就直截了当地劝说道：“国乱民扰，大夫无常”，这样的机会可千万不能错失！在如今这个节骨眼上，吝惜财货土地是最要不得的。因为这就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游戏，一旦让别人抢了先，那么晋国所有的土地和百姓就都跟你没关系了。与其如此，倒不如倾尽国力来收买内外各方势力，就算是闹到国库空虚也无所谓。只要能够得到君位，还怕不能重新聚敛财富吗？

如今公子縶告别重耳，马不停蹄地赶往梁国拜会夷吾，谋臣郤芮更是敏锐地洞察到了秦国的真实目的，于是再接再厉继续劝道：流亡之人无所谓洁身自好，洁身自好者往往办不成大事。如今我们有求于人，就应该适当地放

低身段，用贵重的礼物来回报别人的恩惠。现在仰人鼻息并不丢人，能够得到真的实惠才是最重要的。

在郤芮的动员和安排下，夷吾盛情接待了来访的公子絳。双方就未来晋君归属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友好的会谈，并在一系列共同关注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在送别公子絳时，夷吾特意赠送了大量的财礼，其中包括黄金八百两、白玉制作的装饰品六双，以表达对两国君主友好关系的美好祝愿。此外，为了趁热打铁，尽快促成与秦穆公之间的交易，他还特别委派郤芮为全权大使，对秦国进行了回访。那么他们之间究竟做了哪些交易呢？

崤函谷地

春秋战国时期，大凡出现君位更替或公子夺嫡事件，于邻国而言都是从中获利的绝佳时机。秦国人不“活雷锋”，公子絳也不是“教导处主任”，他在访查两公子态度的时候，身上肩负的最大使命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德行”考察，而是要提出一个会严重损害晋国利益的条件：割让河外列城五。

“河外列城五”具体是哪五座城池，史书上没有给出详细说明，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一些零碎的记载来探求大概。比如在《左传·烛之武退秦师》的段落中提到，晋国曾将焦、瑕两邑许诺给秦穆公，可见这两座城池是包含在内的。《左传》也提到“河外列城五”的大致方位，“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

根据现在的考证，解梁城位于今山西临猗、永济之间，正位于黄河以东、中条山以北的核心区域，向西可控蒲城渡口，向南则纵览崤函通道，是一座具有战略枢纽价值的城池。焦邑位置在虢都上阳附近，也就是现在的三

门峡市陕州区境内，是“河外列城五”的最东端。瑕的位置在今天的陕西省潼关以东，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地处“虢略”与华山的中间位置。以焦邑作为起点沿着黄河一路向西，经瑕邑抵达华山，需经过秦岭、中条山之间一条狭长的谷地，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崤函谷地。

只要对战国历史有所了解，就能够理解崤山、函谷关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扼守崤山谷地东端的函谷关，无论是秦国东进中原，还是六国合纵攻秦，都是一个很难绕开的关口。尽管春秋早期的国家形态大都是以都鄙构成的城邦联合体，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没有据守关隘的习惯，但控制崤函谷地，无论是对秦国还是对晋国，都有着极高的战略价值。

具体到晋国而言，其素来有“表里山河”之称，莽莽太行、浩浩黄河形成的天然屏障，将其与东方列国阻隔开来。当晋国实力弱小之时，山河险固便是一种天然优势，使得东方的野心家很难踏足晋地对其构成致命威胁；然当其逐渐发展壮大，试图向中原进军一争雄长时，雄壮的高山大河便又如愚公面前的王屋、太行二山，成为制约自身发展的瓶颈。

经武公、献公时期的长期经营，晋国基本实现了临汾、运城盆地内政权的统一，其外延似乎也已扩张到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但其对晋东南地区以及太行山区的控制却并不充分。在战国时期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的上党高地，以及古代兵家熟稔于心的“太行八陁”，后来大都进入了晋国的版图，但在献公晚年时，这些战略要地和雄关险隘却依旧控制在“戎狄”部族手中。

比如素有“太行第一陁”之称的軹关陁，从晋国都城附近直通中原，是其经略东方最为便捷的通道。晋献公曾于在位十七年时派申生攻打盘踞于此的皋落氏，但并未完全肃清其中的“戎狄”部族。在其去世十几年后的晋楚

争霸前夜，晋文公为争取时间抢先平定王子带之乱，还不得不贿赂“革中之戎”和“丽土之狄”才得以通行此地。

在轹关陁未能打通之前，位于太行山和中条山衔接处的虞坂古道和茅津渡，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崤函谷地东段，就成了晋国沟通中原并进一步阻遏秦国东进的必由之路，而占据这条重要通道的虞、虢两国自然也就难以幸免——这也是晋国急于实施“假道伐虢”之计的内在因素。

崤函谷地于秦国而言同样意义非凡。我们知道，秦国原本只是周朝的附庸，得益于骊山烽火造成的混乱局面，平王东迁时将周人赖以兴盛的丰饶之地打包成一张“空头支票”许给了秦襄公，秦人由此立国。最晚到曲沃代翼内战的中期，秦国就已经在宗周站稳了脚跟，并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了黄河沿岸。如在公元前708年，也就是晋小子侯在位的那段时间里，秦国就曾先后侵袭并干预芮国和魏国的内政，其兵锋所指，与晋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已经有所重叠了。

秦国在西垂戎狄混杂的环境中艰难求存，如今终于成为雄霸一方的强国，免不了也会产生东进参与中原事务的野心。但由于他们的土地都在黄河以西，东进中原的道路被秦岭、黄河所阻绝，若要想突破地理限制东进，打通秦岭与中条山之间狭长的黄河通道就成了不二之选——而这恰好又对晋国的利益构成了挑战，从而使得秦晋之间的冲突成了必然。

秦晋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发生在晋献公即位五年（前672年），也即晋国讨伐骊戎的同一年。彼时秦国已然是第一梯队的大国，可晋国却只是一个所谓的“偏侯”，战争自然也就以晋国的战败告终了。

此后十几年间，秦晋之间并无直接交锋，但战略上的冲突却已经隐隐显现。他们都秉持着“只争朝夕”的劲头，铆足了劲在崤函谷地布局，使得这

场竞赛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视作是两国争夺中原霸权的一场预选赛。

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晋国作二军伐霍、魏、耿，其中的魏国正位于崤山通道的北侧。而秦国也不甘落后，晋献公十八年，秦穆公刚刚即位便不辞辛劳，亲自攻灭位于北虢附近的“茅津之戎”。或许也正是受此影响，使得晋献公产生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从而不得不在虞虢联盟尚未完全分化时候，就冒险于次年发动了第一次假道伐虢战争。

三年后，这场注定会决定两国未来命运的竞赛，以晋国伐虢灭虞抢占先机而暂告一段落。而为了规避可能发生的冲突，晋献公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大女儿，也即太子申生的同母姐姐伯姬嫁给了秦穆公，以期通过联姻的方式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包括井伯（百里奚）在内的虞国大夫，也被一并作为嫁妆送给了秦国。秦穆公尽管心有不甘，却只能虚与委蛇与晋国维持表面上的和气，算是为“秦晋之好”的千古佳话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秦晋之好”是在妥协基础上建立的一桩并不稳固的政治联姻，很容易被突发情况所动摇。四年之后爆发的里克之乱，就是撼动“秦晋之好”的第一颗“重磅炸弹”。当晋国的两公子纷纷求助于秦国的时候，秦穆公不禁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夺取崤函通道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恐怕才是秦穆公与晋国两公子交涉时的核心诉求所在。

尘埃落定

秦穆公的这些诉求，晋国两公子心知肚明。在与秦国使者的对话中，夷吾的一席话就已经道出了其中的关键：“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列城五。岂谓君无有，亦为君之东游津梁之上，无有难急也。”秦穆公最不缺的就是土地，他之所以着急忙慌地介入晋国内争，为的就是以后东游黄河的时候，没

有什么能让他跳脚的难事——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便是取得“河外列城五”的主权。

这样的条件显然太苛刻了，恐怕不仅仅是重耳，就连夷吾也会感到为难。尤其是秦国对解梁城的诉求，就等于是晋国的腹心中插入了一把刀子，此后晋国不仅会失去对崤函通道的控制，就连内地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其节制，这是无论谁都不可能爽快答应的条件。这或许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重耳要在公子絳面前表演苦情戏码，其用意大概就是想以仁德堵住公子絳的嘴，以免他当场提出这样一个让大家都尴尬的条件。而夷吾后来对秦穆公的背信弃义，也就是可以预想的结果了。

可问题一旦出现，就必须出实招主动化解，消极等待是最要不得的。尤其是当两个卖家争夺一个主顾的时候，这个市场就会变成买方市场，作为卖家的两公子自然也就失去了议价权。重耳的失算之处就在于此，他不仅仅低估了买家志在必得的决心，也明显低估了夷吾的无耻程度。经过不怎么艰难的谈判，夷吾十分爽快地答应了秦国方面提出的要求，甚至按照儒家对其黑化的人设，这个条件都是他主动提出的。既然如此，秦国还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呢？

公子絳回到秦国以后，把自己的谈判成果和所见所想都做了汇报。《国语》在这件事情上对秦穆公颇为“体贴”，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助人为乐且不求回报的老好人。在听了公子絳的汇报后，秦穆公对重耳的仁德感到十分钦佩，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担当得起晋君的重担。

这个时候，公子絳才算是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慢条斯理地回应道：重耳的确仁德。假如我们扶立晋君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全晋国，他的确是最佳

人选。可倘若我们为的是成就秦国的威名，恐怕立一个缺少仁德的君主才方便驾驭啊！

当然了，秦穆公之所以最终选择支持夷吾，公子絳所提出的“仁置德，武置服”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以当时的局势而论，恐怕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真正促使他做出选择的，恐怕还有夷吾在交涉过程中所制造出的紧张感，以及东方霸主齐国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当公子絳在梁国访问之时，夷吾就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说他已经重贿国内的贵族，策反了不少重耳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制造事变的核心人物里克和不郑。在取得国内支持这件事上，夷吾也绝对不是放空炮，如果公子絳愿意留心打听一下，会发现他真的将这些事情付诸实施了。

有吕甥、卻称两个智囊在国内调查分析，夷吾对国内大夫的秉性和诉求可谓了如指掌，自然也能有的放矢地将其各个击破。在这方面，夷吾同样不吝惜财货土地，为了策反里克、不郑为己所用，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只要他们改变立场支持自己回国即位，就同意封给里克数以百万计的汾阳之田，封给不郑以七十万的负蔡之田。

不郑这个人就不用说了，之前被里克拉拢的时候，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追逐荣华富贵的愿望，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夷吾的贿赂可谓正合他的心意。至于里克，在早年骊姬之乱的一系列事件中，都表现出了优柔寡断和易被人左右的性格特征。里克对于诸公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我们很难判断，但从常理推断，他选择支持重耳很可能只是出于对“立嫡立长”观念的执守，因此态度并不坚决。正因为不郑的贪婪和里克的摇摆，让夷吾看到了可乘之机，用区区百万的田土就轻而易举地瓦解了重耳背后的势力，真真地切中了对手的要害。

在攻破国内防线的同时，夷吾的智囊郤芮在出使秦国期间，对秦国君臣也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在一次公开会谈中，秦穆公询问道：“公子在晋国可有什么依靠？”

郤芮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听说‘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自小就不喜欢游戏，有争斗的能力但从不过分报复，即使是发怒了也不会给人脸色看，长大后依然不改本色。正因为如此，他虽在外流亡多年，国人对其毫无怨恨之心，百姓也能安然待之。”

夷吾有意将敏感消息透露给秦国使者，郤芮在秦穆公面前顾左右而言他，都是想以国内局势的突变，倒逼秦穆公尽快做出选择。

前文重耳在辞谢屠岸夷时曾提出回国稳固君位必需的三个要件，分别是民众的支持、邻国的扶助和大夫的效忠。此时夷吾和郤芮想要向秦国君臣传达的也正是这样一个讯息：夷吾既有大夫的效忠，又有百姓的支持，三分要件已有其二，回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如今来争取秦国的支持，不过是寻个锦上添花，如果秦国还想要从中渔利，倒不如“因民而顺之”。假如仍然执迷不悟非要支持重耳，或者为了提高谈判价码故意拖而不决，很可能会弄巧成拙，丧失即将到手的利益。

秦国君臣显然接收到了其中微妙的讯息，因此当秦穆公再向大夫们询问时，公孙枝便对夷吾的作为表达了强烈不满。从种种的表现来看，夷吾为人诡诈而好强，出手咄咄逼人，与郤芮所塑造的形象截然相反，且根本不是一个好控制的人。秦国倘若果真扶持他做晋国的国君，那才真是弄巧成拙了！

与晋人打交道多了，秦穆公对诸公子的秉性也多少有了些了解，对公孙枝的观点心中也深表认同。然而此时此刻，他已经别无选择。

一方面，秦国之所以能够左右盘桓，是因为两公子的支持者水火不容，亟须有外部势力前来调停。可如今夷吾已经通过贿赂手段取得了国内表面上的团结，这就使得秦国作为调停人的话语权、议价权都显著降低。

另一方面，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称霸中原，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弑君犯上的“乱臣贼子”。恰好里克发动政变的时候，齐桓公刚刚在距离晋国不远的葵丘举行盛大的会盟，而此次选择葵丘作为会盟地点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有意要向西方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在盟会上，齐桓公一再向诸侯强调组织纪律，偏巧话音未落，里克、丕郑就为其奉上了介入西方事务的借口，他又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为了争取时间，齐桓公甚至都等不及盟友聚齐，便于献公二十六年（前651年）冬带领诸侯大军登太行、过王屋，兵锋直指晋国而来。

这未免就会给秦穆公造成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夷吾的努力之下，重耳入主晋国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这个时候若是再闯入一个外部力量，那么整个博弈的规则就会出现巨大的反转。以齐桓公“好示务施”的性情，难保他不会以稳固晋君来邀买人心。果真如此的话，那秦穆公岂不是便宜没有捞着，反而惹了一身腥臊？

时至今日，秦穆公才恍然发现，介入晋国内争或许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从一开始，他就太过于轻视对手，生生把一副好牌给打烂了，以至于处处陷入被动，甚至是被夷吾牵着鼻子走。可事已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故而当公孙枝做出无法安定晋国的判断时，秦穆公不禁喟然叹道：“猜忌心强必然会多树怨恨，又如何能克敌制胜，这对我们也未见得就是坏事吧！”

此时距离晋献公的去世已经过去了五个多月。重耳还在等待着秦穆公的垂青，等待着里克为他摆平国内乱局。哪知局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夷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了国内国外的一致支持，扫平了回国的一切障碍。

公元前650年四月，秦穆公和齐国大夫隰朋护送夷吾归国即位为晋惠公，王室大夫宰周公（忌父）、王子党等人也特地前来赐命。一场硝烟弥漫的君位危机，在夷吾等人的周旋下终于尘埃落定，而重耳也在君位的第一轮争夺中宣告落败。

第二节 惠公当国

欲加之罪

能够顺利取得国君之位，自然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可对晋惠公夷吾来说，还远没有到摆功庆宴的时候。当此之时，外有重耳煽风点火，内有群公子党羽四处活动，水面之下暗潮汹涌，使得他来之不易的地位时刻都有倾覆之危。而在这其中最让他感到忌惮的，莫过于辅佐其上位的权臣——里克和丕郑。

里克其人族源不详，据一些无法确定来源的说法，似乎与赵氏、秦国族同为嬴姓。据《国语》记载，早先献公初年讨伐骊戎之时，里克便已位列大夫，曾参与太史苏关于“红颜祸水”的论争，并一度承担对太子申生的保护职责。到献公后期里克已位居卿列，以上军主帅的名义伐灭虞、虢，并在采桑击败来犯的“狄人”。

相比于里克，有关丕郑的记载更是寥寥，不过依照里克选择盟友的次序来看，应当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国语》记载的言行来看，丕郑算是一名高度的功利主义者，对国君的种种出格举动大都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而对申生也谈不上有太多感情。

献公去世后，二人联合七舆大夫以及三公子的私属，一举铲除了骊姬一党，这对于太子申生的故旧来说，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也正因如此，不少贵族都对里、丕的为人赞许有加，让他们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可观的人望，从而成为晋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权臣。惠公若不是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是断然不可能回国即位的，而当他一朝权位在手，里、丕二人可翻云覆雨的权势又令其感到十分忌惮。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惠公如果耳聪目明，应该对半个世纪前郑大夫祭仲连立四君的故事不会感到陌生。如今里克、丕心腹党羽遍布朝野，权势熏天远胜当年的祭仲，他们既然有迎立惠公的能力，自然也就有将其拉下君位的权势。尤其是惠公回国前为取得他们的支持，又许之以汾阳和负蔡的百万田土，若是将这些许诺全部兑现，更是会增加他们左右朝局的资本；可如果不能兑现先前的许诺，难保他们不会向祭仲学习。

晋惠公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难题时，他也算是继承了其父嗜杀的执政风格，当机立断选择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斩草除根。

在封建土地制度盛行的时代，擅杀权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你是一国之君，杀人也要按照“基本法”，想要除掉卧榻之侧鼾睡的权臣，总得有个像样的借口，而晋惠公抬出的挡箭牌，便是天子的法度和霸主的威势。

为了避免因诛杀里克、丕郑而造成动荡，晋惠公首先使出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他将丕郑支到秦国去，令其以国内政局未稳、大夫意见不一为由，要求暂缓割地。

丕郑前脚刚刚离开国境，惠公后脚就踹开了里克的家门。里克深知自己已在劫难逃，但还是满怀愤懑地质问道：“如果没有我带人杀死了奚齐和卓子，你怎么可能坐到今天的位置上？”

很快就有人带来了惠公的答复：“你说得没错，没有你我就做不了国君。可你有没有想过，只短短的两个月，你就先后杀死了两任国君，一名受命托孤的大夫也被你逼迫至死。做你的国君也太难了吧！”

里克听罢冷笑一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说罢伏剑自杀——这就是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来历。

为了平息民怨，更为了稳住反对派，晋惠公在除掉里克后，又上演了一出苦情戏。他做出一副后悔的姿态，表示自己并不是真的想让里克死，而且还埋怨郤芮说：“都是你的错啊！里克是寡人的社稷重臣，寡人一犯糊涂就把他给杀了，你当时怎么就不阻拦一下呢？”

郤芮毕竟是惠公的智囊，他很是知趣地替国君背下了这口“黑锅”，国人也大都因此放下了警觉。但如此故作姿态，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郭偃对此就很不以为然，他说：“郤芮不能为国家长远打算致使国君错杀里克，这就是不忠，他必然会受到国君的惩罚。”同时他对惠公的举措也颇有怨言：“国君不经深思熟虑就胡乱杀人，这是不祥的征兆，必会遭受天谴、断子绝孙，祸乱恐怕就要来临了！”

丕郑之死

无论郭偃如何义愤填膺，至少在眼下，祸乱还轮不到惠公和郤芮身上。除掉里克之后，与里克“同罪”的丕郑，自然也就成了下一个目标。

里克被杀之时，丕郑正在秦国出访，身上背负的是惠公请求暂缓割让土地的使命。

前往秦国的路途漫长而乏味，丕郑难免会多思多想，怀疑惠公是否也会依样画葫芦，赖掉许诺给自己的七十万田土。尽管他不知道惠公接下来究竟会怎么做，可疑心一起，便很难消除了。

他带着疑虑赶到雍城，在把晋惠公缓贖河外之地的要求转述给秦穆公的同时，也阐明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理解。在他看来，依如今的情形判断，晋惠

公显然不会轻易将“河外列城五”割让给秦国，秦国若不想再被玩弄于股掌间，就必须驱逐晋惠公，迎立公子重耳回国。

至于具体的方略，丕郑早有打算：惠公最为倚重的智囊，莫过于郤芮、郤称和吕甥三人。郤芮一直随从惠公在外流亡，郤称和吕甥则是惠公的内主，长期为惠公出谋划策，正是有他们的存在，才使得交割土地的事务变得波折起来。为今之计，秦国应下重金将此三人诱至秦国，只要除掉他们，晋惠公必定孤掌难鸣，届时丕郑发动国人与秦军里应外合，驱逐惠公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心中纵有万千怨念，此时也只能直面现实。秦穆公得知自己苦苦筹谋的成果就要泡汤，顿时如鲠在喉，他冷眼看着丕郑在朝堂之上慷慨陈词，心中万分焦虑却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只得按照丕郑的计划，派大夫冷至随其一同回晋国复命。

行至绛都郊外时，丕郑才听说了里克被杀的消息。为防万一，他先是找到七舆大夫中的共华询问局势。里克之死令共华也感到了阵阵寒意，但当惠公对里克之死表达了忏悔之意后，他又天真地以为晋惠公只是迫于齐桓公的压力才出此下策，想必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而劝告丕郑说：“国君只杀掉了里克一人，我等留在国内的人都没有受到牵连。你奉命出使秦国，想必国君也不会责难于你的。”

可令丕郑和七舆大夫都没想到的是，惠公的智囊团果然还是技高一筹。他们之所以留着七舆大夫不杀，还做出悔过的姿态，就是为了麻痹众人，以引丕郑上钩。而当丕郑携秦使回国之时，郤芮便已经有了决断：“秦国使者言辞恳切，所携带的礼物比之丕郑带去的更为丰厚，显然是有所图谋！”于是便在朝堂上果断出击，一举擒杀丕郑。

在小说家冯梦龙的戏说中，丕郑的死据说又与屠岸夷有关。屠岸夷本是东关五的门客，里克图谋弑君时被策反，在朝堂上杀死了卓子，成为里、丕之党的重要人物，并被委派与重耳接头。里克死后，屠岸夷看到风向不对，又迅速调转枪口与惠公合谋暗算丕郑。丕郑本打算里应外合再次发动政变，却不料寒冬料峭之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计谋还未成行，就追随里克去了。

丕郑之死，让共华深感内疚。他原以为国君并没有要杀丕郑的意思，这才劝他放心入朝，谁知正是受到自己的误导，丕郑才葬送了一条性命，这不禁让他黯然神伤。

事发之后惠公图穷匕见，作为里、丕二人的重要盟友，七舆大夫显然也无法幸免了。然而共华有着重义轻生死的君子之风，当共赐劝他及早逃亡时，他却断然回绝道：“既然夫子因我之谋而死，我又岂能独活？此时若是选择逃亡，便是自陷于不智、不信、不勇，有此三恶，又当去往何处呢？”

所谓的“七舆大夫”，主要是贴身护卫国君并充当仪仗队的贵族。当时的国君出行时，除了自己乘坐的戎车之外，还有七乘副车跟随，七舆大夫就是负责这七乘副车的官员。彼时担任七舆大夫的除左行共华外，还有骊姬之乱时曾奉命攻打夷吾的右行贾华，以及叔坚、骖猷、累虎、特宫、山祁等人。

因为其身份特殊而敏感，里克和丕郑在发动政变时就率先策反了七舆大夫，以便于谋刺国君。尽管七舆大夫最终并未直接参与刺杀行动，可他们的背叛终究还是让惠公如芒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

丕郑死后，他的儿子丕豹逃往秦国并进行游说，说如今晋侯民心尽失，正是拉他下马的大好时机。尽管秦穆公也为河外列城被赖掉而心怀不满，但

丕郑之死却为他敲响了警钟，让他愈发深切地认识到，如今的晋君并没有那么好对付。故而当丕豹再三请求出兵伐晋的时候，秦穆公却反问道：“如果晋侯夷吾真的不得人心，真的没有民众的拥护，他怎么可能杀掉里克、丕郑这些人而不引起反叛呢？”

这话问得丕豹哑口无言。看到丕豹哀痛的表情，穆公也不想失去这样一颗棋子，于是便安慰道：“现在晋国局势稳定，反对者不是被杀就是逃亡，单凭秦国的力量是无法驱逐他的，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晋惠公以其声名为赌注，仅用了短短半年时间，就荡平了献公去世后的纷扰与混乱，令晋国重新回到了和平安定的大好局面。如今人心思定，人们对于这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都倍感珍惜，都不想再生枝节。

然而，这些手段毕竟悖逆了世道人心，难免又会令人心不安，从而衍生出新的不安定因素，使得刚刚回归稳定的晋国又将面临新的危机。《国语》中记载了一段当时的“舆人之诵”，也即老百姓编造的讽刺诗，诗曰：

“佞之见佞，果丧其田。诈之见诈，果丧其赂。得国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怨，祸乱其兴。”

意思是说：“讨好的人被捉弄，到底没有得到田地。欺诈的人被欺诈，终究没有得到好处。那贪心得国的人，到头来将要遭到灾殃。那丢了田地而不去报复的人，祸乱就要临头了。”诗歌讽刺了秦穆公和里克、丕郑这些在乱中取利的人，同时对晋惠公的作为也有颇多不满，在这场纷乱的历史大剧中，没有一个参与者是无辜的。

初入中原

晋惠公夷吾以口头许诺割让“河外列城五”为条件，得到了秦穆公的支持，回国夺取了君位，可屁股还没坐稳就赖掉了与秦国达成的协议，这让秦穆公大为恼火。但看到晋惠公短短数月就以雷霆之势消灭了国内的反对势力，将晋国原先的分裂局面恢复稳定，他又不免讶异于其高明的政治手腕，从此再也不敢轻视自己这个小舅子了。无奈之下，他也只好先放下成见，与晋惠公在一种貌合神离的状态下，共同携手走向中原，从而维持了两国数年的和睦局面。

恰在此时，中原的王室发生了一场叛乱。这场叛乱的起因颇有些俗套，又是因为后妈不喜欢嫡长子，想废长立幼造成的——考虑到这个时代的女性经常被用来“背锅”，其真实性还需要谨慎对待。如果要严格追溯起来，这件事虽是天子家事，却与称霸中原的齐桓公有着莫大的关系。

作为通常意义上春秋时代的首位霸主，齐桓公从王室手中接过了征讨不臣的大旗，带领诸侯南征北讨、屡兴盟会，这在周王室看来，很有些喧宾夺主的意味。尽管在管仲的约束下，齐桓公在行为举止上对天子颇多恭敬，但其内心的膨胀却是无法掩饰的。

公元前655年，也即晋国灭虢、重耳出奔的同一年，齐桓公在首止举行会盟。会盟期间，当时还是太子的周襄王因感受到了危机，害怕自己会像晋太子那样落个凄惨的下场，便跑去向齐桓公求助。作为天子的属臣，哪怕是地位再尊崇，也不该过问天家大事，可齐桓公偏偏就答应了太子的请求，还将其安置在会盟地的一处行宫里，让诸侯以天子之礼遇之。

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惠王（襄王的父亲）暴跳如雷。但由于不敢直接挑战霸主的权威，便只好在背后耍手段，破坏齐桓公所统领的诸侯联盟。不

久之后，原本还对霸主恭敬有加的郑文公就在天子的唆使下，连声招呼都不打就从会盟现场溜掉了。

此事激化了天子与霸主之间的矛盾，更让天子与太子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起来。但不管怎么说，周襄王还是顺利继承了王位，原本被惠后寄予厚望的王子带，则因为没能如愿，一直都对自己的兄长心存不满。几年后，王子带召集了盘踞在扬、拒、泉、皋、伊、洛的“戎族”一同反叛，大军攻入王城，并将王城的东门烧毁。

叛乱发生在晋惠公即位的第二年，也即公元前649年的夏天。为了展现秦晋两国坚不可摧的友谊，晋惠公和秦穆公共同出兵讨伐叛乱，介入了王室的纷争。到了这年秋天，在晋惠公的主持下，周王室和“戎族”讲和。但或许是由于王子带居中挑唆，调停未能取得成功，倒是让晋惠公跟“戎狄”也翻了脸。

到了次年（前648年），处于霸业末期的齐桓公也参与了进来。他一方面调停周襄王和王子带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劝和以晋国为主的秦晋联盟与“戎狄”。晋惠公因为初入中原，还没有齐桓公的号召力，同时也由于国内发生了连年的饥荒自顾不暇，只能服从齐桓公的调停，晋国第一次出兵中原的努力就此画上了句号。

泛舟之役

这次灾荒来得很不是时候。经过晋献公一世的征战，晋国已经具备了在中原争雄的实力，若是没有这次灾荒，或许惠公就能早几年开始冲击霸主的桂冠。可偏偏事与愿违，正当他想要在中原大展拳脚的时候，老天爷却给降下来连年的饥荒。无奈之下，晋惠公只好派人到秦国去买粮食，如此一来就又给秦穆公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因丕郑受难而流落秦国的丕豹情绪最为激愤，他一心想为父报仇，不仅不愿意卖粮食给晋国，相反还建议秦穆公趁火打劫，出兵灭掉夷吾这无信无义之人。

丕豹的观点刚一出口，便遭到了公孙枝的反对：“晋君对百姓不施恩德，百姓早已厌憎了他。此时晋国出现灾荒前来购买粮食，若是我们不卖给他，他就有借口让百姓将怒火发泄到秦国身上。倒不如把粮食卖给他们，让晋国老百姓看清楚谁对他们更好。这样一来，假如晋君不肯听命，我们前去讨伐晋国，老百姓也不会帮助他的。”

公孙枝的观点得到了百里奚老前辈的赞许：“对于任何国家天灾都无法避免，如今晋国会发生灾荒，将来秦国也难保不会。救援灾荒、周济邻国是符合道义的行为，按照天道行事总是没有错的！”

百里奚的观点透露出了先秦政治一个隐含的密码。救灾恤邻、守望相助不仅是一项美德，更是中原各国必须互尽的义务。尽管过去几年秦晋两国因“河外列城五”产生龃龉，但当晋国出现灾荒向秦国求救时，秦国也必须履行义务施以援手。秦国若是对晋国的苦难视而不见，就必定会被中原诸侯所诟病，这不仅会损害秦穆公的“人设”，更会对秦国在中原的声望地位造成影响。

这也就意味着，卖粮给晋国是符合秦国利益的举措。只不过作为道德表率秦穆公，话说得更加冠冕堂皇一些：“君是君，民是民，晋君固然可恶，可老百姓是无辜的，还是把粮食卖给他们吧！”

计议已定，秦国人做起事来也毫不含糊，他们不仅同意了晋国的请求，还一定要加码，让这件事产生轰动效应。几千艘运粮船浩浩荡荡地从秦国的雍都出发，沿着渭水、黄河以及汾水绵延数百里，一直抵达绛都城下。由于

这次的运粮行动发动的人力物力规模都极其庞大，场面蔚为壮观，人们还特意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泛舟之役”。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百里奚所言，灾荒也是风水轮流转，去年在晋国，今年就轮到了秦国。泛舟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晋惠公五年（前646年），秦国也发生了灾荒，于是也派出了使者向晋国求援。

晋惠公接到秦国求援信息，首先想到的，也是本着礼尚往来的精神，把粮食卖给秦国了事。但一名叫虢射的大夫却极力劝阻，他说：“赖掉了许诺给他们的土地，却要给他们输送粮食，这并不会减轻他们对我们的怨恨，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倒不如这次也不给了吧？”

听了虢射的话，晋惠公深以为然，于是决定不再卖粮给秦国。大夫庆郑急忙出面劝阻说：“赖掉秦国的土地已经理亏了，如今又不肯卖粮给他们，更是背弃了他们的恩德。如果我是秦国人，也一定会报复的。”

虢射反驳庆郑的观点时创造了一个成语：“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其内涵大抵是在说，秦晋关系已经从根上腐坏了，再去添枝加叶也毫无益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庆郑坚守大义，痛沉其害：“他人发生灾荒的时候吝惜粮食不肯相救，甚至还要幸灾乐祸惹怒邻邦，这些都是无德无信的表现，不仅会为百姓所唾弃，甚至可能会导致国家败亡。”

但在虢射的提示下，晋惠公似乎早已打定主意，因此对庆郑的苦心劝说充耳不闻，庆郑大怒道：“背信弃义，失去正道，总有国君后悔的时候！”

第三节 韩原之战

山雨欲来

在人们固有的印象中，秦穆公是一名急公好义的老好人，一位助人为乐的美君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别人，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伤害，却总能以广阔的胸怀谅解对方，用伟大的德行操守去感化对方。与之相对的，晋惠公则是一个忘恩背义的大恶人，一个不择手段的真小人。在想要利用他人的时候会毫无原则地空许诺言，在想要获取利益的时候又会毫不犹豫地背信弃义，甚至恩将仇报。这两个人总是相对而行，如果没有晋惠公的卑鄙，就不足以衬托秦穆公的伟大；如果没有秦穆公的善良面目，就无法映照出晋惠公的丑恶嘴脸。

然而事实上，在刀光剑影的政治舞台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晋惠公始终有人拥护，必有其可取之处；在道德光辉掩藏之下，秦穆公同样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高手。

关于“河外列城五”的争端，在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分析。这五座城池贯通崤函通道，是关乎秦晋两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利益所在。这就使得无论晋惠公有没有兑现承诺，有关“河外列城五”归属的争端，最终都只能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晋惠公与秦穆公的几轮斗法，归根结底是一场利益争斗。但与晋惠公善用阴谋和诡道不同，秦穆公是打舆论战的高手，最擅长的是以“阳谋”取胜。他从始至终都很注重舆论引导工作，明知道“河外列城五”不会那么容易获取，却还是要让晋惠公做出承诺，从而在道义上战胜对手。在借粮这件事上，也同样能看到他的政治手腕。

关于这年冬天发生在晋国的饥荒，《左传》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汇，叫“荐饥”。孔颖达疏引李巡注释说，“连岁不熟曰荐”，所谓“荐饥”，指的就是连年灾荒。也就是说，发生在晋国的这场灾荒并不仅仅是惠公三年这一年发生歉收，而是连续多年出现饥荒，使得晋国不得不向秦国买粮。

秦穆公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将粮食卖给晋国的同时，心中恐怕早就有了盘算。因此到第二年，当秦国出现歉收迹象之后，便迫不及待地给晋惠公出了一道难题。

史料中并没有阐明秦国发生灾荒的这一年，晋国粮食是否获得了丰收。但考虑到过去几年的连续歉收，即便当年粮食实现丰产，也很难说他们就已经摆脱了天灾的影响，又怎么可能有多余的粮食救济秦国呢？秦穆公明知对方手头并不宽裕，却还是急不可耐地去讨要欠下的人情，这与齐桓公“像放债一样施惠于诸侯”又有什么区别呢？

秦穆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将一个烫手的山芋丢到了对方的手里，让惠公在道德的拷问中艰难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晋国如果同意卖粮给秦国，其实力就会被间接地削弱；如果不同意卖粮，那便是不履行道义上的责任，正好给了秦国宣战的借口。

与此同时，这还会加深人们对于晋惠公“背信弃义”的印象。晋国的百姓会因此而耻于与之为伍，秦国的民众更是会因为真实的饥饿感而群情激愤、斗志倍增——这种切肤之痛比一场有渲染力的演讲管用一万倍。

但晋惠公似乎并不关心这些。或许在他看来，既然秦晋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既然这种表面上和平共处的关系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与其和秦国半推半就地凑合着过，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打一架。只有打败了秦国，断了

他觊觎河外通道的念想，晋国的南部边境才能彻底安定下来，晋国在中原的利益才能得到稳固的保障。

晋惠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有底气在的。从史料中的种种迹象来看，在献公早期，秦国的总体实力的确强于晋国。但正当晋国在献公的领导下大力扩张疆域的时候，秦国的政局却很不稳定，终于使得晋国后来居上，实现了对秦国的反超。

秦穆公即位后，得益于晋献公去世后的分裂局面，给了他干预晋国内政的机会，可一旦晋国复归统一，秦国就仍然不是晋国的对手。这也是为什么两年前茅秦联合勤王的时候，晋国在两国组成的联盟之中居于首位，秦穆公尽管有恩于晋，却也只能做晋惠公的陪衬。

整体实力的强盛，让晋惠公不免会有些膨胀，在处理政务时也就没有秦穆公那般深谋远虑。当秦国的使者到晋国来借粮的时候，经驪射那么稍一点拨，晋惠公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挑起战争的机会。这场战争注定会成为秦晋两国争夺西方霸权的关键一战，胜出者不仅能够在西方政治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还能通过稳固河外走廊的控制权，进一步获得争夺中原霸权的入场券，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然而晋惠公终究还是过于自负了，过度的傲慢让他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缺乏充足的准备，也让他失去了对政治逻辑的深刻洞察。当灾难来临之际，互相扶助、共度时艰是所有诸侯国都应肩负的义务，更是霸主竞争者所应当具备的基本修养。无论你处于何种情形，如若对邻国面临的苦难熟视无睹，都是犯了大忌，不仅会在外招来口诛笔伐，在内同样不得人心。

挑起战争的借口有很多，晋惠公却选择了一种最不得人心的方式。可以说，战争还没有开始，晋惠公就已经在无形的战场上落了下风。那么当真正

的战争来临的时候，他的表现又当如何呢？

幸而得囚

晋惠公六年（前645年），秦国终于发动了对晋国的战争。为了在敌我对比不利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胜算，秦穆公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充分的预演，从战略调度、战术布局、舆论宣传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谋划。

秦晋之间有两道重要的关口，其中偏北的一道是位于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的龙门渡口，其得名来源于“大禹凿山导河，鲤鱼竟跃龙门”的传说。此地素有“华北入陕第一镇”之名，是沟通晋秦的重要通道，后来三分晋国的韩氏、赵氏，其最初的封地韩、耿就是扼守这一通道的重要都邑。此地与“白狄”相邻，河西又有梁国作为秦晋之间的屏障，晋国在此地的防御主要是针对“戎狄”部族，因此力量相对薄弱。

第二个通道是位于陕西大荔的王城与山西永济蒲邑之间的黄河渡口蒲津渡，从此地出发向南不远，便是有“鸡鸣一声听三省”的风陵渡口。从风陵渡往东几十公里，又可抵达魏国始祖毕万的始封地——魏邑。当年骊姬劝献公派重耳守卫蒲城，就是要让其抵御可能来自秦国的袭击。这一带黄河流速减缓，有不少可供船只穿梭的水面，防御体系也更加复杂。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在王城、蒲城周边渡河作战的，晋国防御秦国的主要精力也大都投放到了这里。

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秦穆公对晋国的第一次攻击，却并没有选择传统的南线渡口作战，而是绕道北上，从敌军防御力量相对薄弱的龙门渡口跨越黄河进入晋地。晋国边防部队本来只肩负着守备“戎狄”的任务，如今却突然来了秦国的正规部队，自然是打不过的。于是他们一边派人回去送信，

一边延缓敌军的步伐，最后退守韩原（今山西河津与万荣之间）与秦军相拒。

秦军来势汹汹，晋惠公却只能仓促上阵。当秦军“三败及韩”，前方告急的士兵汹涌而至的时候，晋惠公才感到情况有些不妙。韩原到绛都的距离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且地势平坦，极利车辆驰骋，留给晋国方面的时间并不多。

这年九月（周历十一月），晋惠公自领上军，以郤步扬为御戎，家仆徒为车右；下军统帅由韩原当地的封君韩简担任，梁由靡为其御戎，虢射为车右；大军整顿完毕，匆匆赶往韩原应战。

战争开始前，晋惠公派韩简前去视察敌情。看到秦军个个都咬牙切齿的样子，韩简知道对方决心很大，回来之后就对惠公说：“秦军虽然人数不及我们，但斗士却比我们多，实在不好对付。”

见惠公面露诧异之色，韩简毫不客气地解释说：“您出亡的时候受过秦国的资助，回国的时候依靠过秦国的帮助，受灾的时候又接受过秦国的援助。秦国多次施恩于国君，却始终都没有得到回报，这让秦国人都认为国君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因此个个都义愤填膺，斗志昂扬。反观晋国则是军心懈怠，说斗志仅是秦国的一半都已经很乐观了！”

晋惠公慨叹一声道：“普通人尚不能轻易侮辱，更何况一个国家呢！”

不过饶是如此，晋惠公派韩简前去约战时，口气依然充满了傲慢。他说：“寡人不才，能集结军队却不能解救他们。君若不肯收兵回去，你我只有一战了！”

秦穆公听了之后十分冷静，派公孙枝前去应答：“晋君还没有回国的時候，寡人曾为你担惊受怕；回国之后国内局势不稳，寡人也曾为你辗转反侧。现在你地位稳固了，寡人敢不接受作战的命令？”

韩简在两个国君之间来回传话，既看到了秦穆公的决心，也看到晋惠公的傲慢，不免为战争的结局担忧起来：“但愿这次战争之后我还能活着回来。”

军队的士气和主将的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战争的胜负，但主要还是看实力。特别是在春秋早期，一切战事都要遵循既定的规则，诡诈之道还很少为人们所采用，因此军队人数的多寡和器械的精良与否在战争中的作用尤为显著。

当时秦国大夫公孙枝就对此战持悲观态度，他在战场上仍不忘劝谏穆公，说：“过去您不接纳重耳而立了夷吾，已经是铸成大错了。如今立了晋君不如意就举兵讨伐，假如此战失利，岂不是更加让人耻笑吗？何不等着他自己败亡呢？”

秦穆公反驳说：“当年我之所以未能扶植重耳，的确存有私心，但重耳一再推辞，我也是没有办法。如今夷吾对内诛杀里克、丕郑，对我国则背弃盟约，他如此背信弃义，上天必定会帮我战胜他！”

惠公被俘

尽管秦穆公笃信上天会主持公道，但在战争初期，战事的发展却明显对秦国不利。晋国凭借人数和武器的优势处于上风。下军主将韩简也一度将秦军团团围住，秦穆公左冲右撞无法突围，身上的六层皮甲都被射穿，眼看着就要被晋人给抓住了，可偏巧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当此韩简围攻秦穆公之时，晋惠公拉车的一匹小驷却陷在泥潭里出不来了。这时刚好庆郑的战车从旁边经过，晋惠公赶紧喊他过来帮忙，庆郑却幸灾乐祸起来。

原来从惠公不听庆郑之言拒绝卖粮给秦国那时起，两人就有了矛盾。

本次出征前占卜国君车右的人选，结果是庆郑最合适。晋惠公认为庆郑过于不逊，就没有让他来，而是选了家仆徒做自己车右。庆郑认为国君对自己存有偏见，心里很不痛快。

之前郑国曾献给惠公一匹马（小驷），身材小巧，鬃毛润滑有光泽，走路来也步履安稳，很得惠公的疼爱。此次迎战秦国，晋惠公想用这匹马拉战车，庆郑就嘲讽说：“自古以来打仗所用的马都是本国产的，本国的马匹熟悉水土道路，且受主人调教，熟悉彼此的习性也好操控。外国产的马则刚好相反，一旦发生什么危险，互相之间不熟悉，着急起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到时候可有您后悔的！”

庆郑这尖酸刻薄的话把惠公气得不行，不过由于大战在即，也没有跟他生这个气。可事情就是这么巧，还真让庆郑这个乌鸦嘴给说着了，仗打到一半，果然这宝贝宠物马就陷到了泥坑里。

现在看到自己的话果然应验了，庆郑心中得意，忍不住出言讥讽道：“忘恩负义、不听劝谏、违背占卜，本来就是自求身败，如今还逃什么呢？”说完竟自顾自地驾车走了。

玩笑虽然开得有些过，可总算也无碍大局，但接下来庆郑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兴冲冲地扑到战场上，猛然间看到韩简正在围攻秦穆公，就大喝一声：“别打了，国君正陷在泥地里出不来呢，你还不赶紧去救！”

这一声吼惹出了大麻烦。韩简当时已经快要擒住秦穆公了，可听闻国君有危险，便一刻也不敢耽搁，急忙放弃包围带着部属去救援国君。更要命的是，听到庆郑呼叫的可不止韩简一人，何况即便秦人没有听到呼叫的具体内容，看到韩简回撤，他们也会一窝蜂地上前追赶。

庆郑这一嗓子喊得不是时候，韩简这一撤军也犯了兵家大忌。早年士蒍在劝说献公的时候就举例子说，上下军各有各的作用，下军是不可以作为上军辅助之用的。只有当两军作为独立的单元，在内部互相补充协助时，才能让敌人找不到缺口，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两军互为辅助，一旦上军出现了缺口，下军急匆匆地赶来补救，两军之间难以协调，就会耽误大事。士蒍的担心在献公时期没有应验，却不幸在惠公身上应验了。

韩简自己知道回撤的目的何在，但晋军其余各部却并不知晓。看到此情此景，他们只会误以为韩简战败了，由此就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战场上的局面发生了惊天逆转，其结果是晋军溃散，而晋惠公本人也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施救而做了秦人的俘虏。本来胜券在握的一场战争让庆郑这么一搅和，结果完全改变，秦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来了一次以弱胜强，这也太出乎意料了！

眼看着国君被秦人俘虏，晋国的大夫也都放下了武器，披头散发、拉着帐篷，准备要跟着国君去秦国吃牢饭。秦穆公见众意汹汹，忙派人劝说道：“大家何必如此忧愁呢？寡人与贵国国君西去秦国，只不过是实现晋国那个妖梦罢了，难道敢做得太过分吗？”

大夫们听到这个答复，都三拜稽首回答说：“秦君头顶皇天，脚踏后土，您说的话皇天后土可都听着呢，我们就等着您的消息了，希望您能够履行诺言！”

那么这个劝退晋国大夫们的“妖梦”究竟是什么呢？晋惠公此去秦国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狐氏妖梦

晋惠公“初登大宝”之时，为了扫清敌对派系，先后杀掉了支持重耳的里克、丕郑和七舆大夫，而对于原本属于太子申生的私属，则完全采用怀柔的政策。

为了安抚申生党人，惠公于即位当年（前650年）秋天，按照国君的礼节重新安葬共太子（申生谥号共，又称恭太子）的遗体。但由于申生去世已五年有余，尸体早已腐烂，因此改葬之时棺槨中散发出阵阵恶臭。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却被人借题发挥，不久国内便流传起一首讽刺晋惠公德行的诗歌《恭世子诵》，诗曰：

贞之无报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

贞为不听，信为不诚。

国斯无刑，输居幸生。

不更厥贞，大命其倾。

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

猗兮违兮，心之哀兮。

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

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

镇抚国家，为王妃兮。

诗的大意是说：晋惠公想要补救过去的葬礼，可无奈他无德无信，盗取君位，反而使臭气逸出。有他这样的人在，晋国注定会走向沉沦。我们讨厌这样的国君，对未来的日子感到恐惧，想要离开国家远走他乡，可无奈故土难离，内心哀伤。多怀念身处狄国的温润公子，十四年后他就会回来，驱逐这个令人讨厌的人，镇抚国家、辅佐天子，成为我们的依傍。

从后半段的内容看，诗歌精准预言了重耳回国的时间，显然不是当时人的作品，因而这起舆论事件所产生的效果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重耳的外公狐突还不死心，于是便进一步发挥，专门策划了一次“妖梦”事件来煽动舆论。

据狐突自己的说法，有一次他到曲沃下国（下国、新城皆指曲沃）的时候，遇到了太子申生的鬼魂。大概是由于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狐突曾经担任过御戎，并劝他及早逃离，鬼魂对这段往事念念不忘，就还让他为自己驾车。车辆行驶途中，申生悲愤地说道：“夷吾对我太无礼了，我已经请求上帝允许，把晋国并入秦国，让秦国人来祭祀我。”

狐突虽同情申生也痛恨夷吾，但却并不希望灭绝晋国的社稷，因此就劝说道：“我听说神明不能享受其他宗族的祭品，百姓也不能祭祀其他宗族的鬼神。如果晋国归秦，恐怕你就得不到祭祀了，要不再好好考虑一下？”

申生迟疑了一会儿，说道：“好吧，那我就再去找上帝问问。至于结果，七天以后你到新城西边，会有一名巫师把我询问的结果告诉你的！”说罢就消失不见了。

七天之后，狐突若有其事地去到新城西面，果然见到了一名巫师。双方会面以后，巫师以申生的口吻说道：“上帝已经允许我惩戒有罪之人了，处罚的地点就在韩原。”

这次的见鬼事件虽说设计得很精巧，但也有不少漏洞。比如，既然申生已经见到了上帝，却为何连“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这样的“常识”都需要狐突来提醒？既然狐突能够见到申生的鬼魂一次，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再见面第二次，还非要让巫师来转达意见呢？

这就是狐突制造舆论的策略了。他之所以要让巫师转达，而不是申生的鬼魂再次降临，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并且为此做见证。如果没有人见证第二次的会面，光凭狐突的一张嘴说自己见了申生两次，人们显然不会相信。可如此一来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如何保证第二次的会面不穿帮呢？

这其中有许多技术难题需要处理。狐突不是大魔术师，也没有那么多“专项经费”来支持他的行动，没有办法让第二次会面所见到的“申生”掌握鬼魂突然出现又凭空消失的技能，于是就只能另辟蹊径，指定了巫师的出场以取信于人。

至于说狐突所制造的舆论事件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无法臆测，但仅凭这些显然无法动摇晋惠公的地位。可也不知为何，这个“妖梦”流传甚远，竟然传到了秦穆公的耳朵里。更加巧合的是，后来秦穆公也果真是从北方通道出兵，与晋国在韩原展开决战，还真的就把晋惠公给擒获了。这么多的巧合凑在一起，还真让人们怀疑，这狐突是不是真的见过申生的鬼魂，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就是上天的旨意呢？

当晋惠公兵败被俘之时，晋国大夫一齐向秦穆公施压，就是要让他知道：我们的国君德行再坏，可也毕竟是一国的主君，你杀掉他一个人容易，

却很难将整个晋国连根拔起。

晋国贵族空前团结一致的态度，使得秦穆公心存不安，只好把战事附会到“妖梦”上。而那个“妖梦”并没有提到要杀掉国君，因此晋惠公或许本来就没有性命之忧。

归君质子

晋惠公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雍都，秦国上下皆欢欣鼓舞，但唯有一人却为此忧心不已，这个人就是晋献公的女儿秦穆姬。

秦穆姬也叫伯姬，是共太子申生同父同母的姐姐，也是夷吾和重耳的长姐。在她大约二十岁的时候，亲弟弟申生被陷害自尽，其余兄弟四处逃散，自己也在不久后被嫁到了异域他乡，成了政治联姻的工具，其中的苦楚不言而喻。穆夫人在秦国生活了十年时间，一共生了四子，分别是太子瑩、公子弘、公子简和公子璧。

穆夫人与晋惠公之间曾经闹过不愉快。原来早先晋惠公回国时，穆夫人曾嘱咐他要善待贾君（据推测应为申生之妻），并且要把流亡在外的兄弟们都召回国内。可晋惠公回国以后却没有顺从姐姐的心愿，非但没有把兄弟们收罗回来，还因照顾得太过热心，竟把贾君收入房中，这让穆夫人对他颇有怨言。

可当晋国兵败的消息传来，那些许怨意到底敌不过姐弟情深。他们这一群姐弟从小就陷入了政治纷争当中，从来都是聚少离多，如今与父母早已天人永隔，群公子在外流亡，穆夫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依靠的娘家人，也只有夷吾这个不靠谱的弟弟了。

她深知秦人对夷吾怨恨之深，明白一旦夷吾到了雍都，群情激奋之下谁也难保他的周全。为了逼迫秦穆公允诺，她甚至带着孩子登上高台，做出要自焚的架势，同时派人捧着丧服给秦穆公带话说：上天降下灾祸让两国刀兵相见，如果国君你敢把我弟弟带到雍都来，我马上就自焚。请国君裁夺！

这可让秦穆公犯了难。他听从夫人的指示，在半路上停了下来，并将夷吾囚禁在灵台（雍都以东，今陕西鄠邑区），然后聚拢了一众大夫，商量该怎么处置这个已沦为阶下囚的小舅子。不少人联合起来提出要把晋惠公带回雍都向国人宣示。

秦穆公当然不能同意：“你们这不是存心让寡人难堪吗？我们俘虏晋侯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回报，倘若带着他回去，却要让寡人承受丧妻之痛，那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见众大夫都闭口不言，大概是气儿还没有理顺，秦穆公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别忘了我们回国之前晋人的态度，他们一起向寡人施压，用皇天后土来警告寡人，寡人也亲口答应会履行诺言。倘若我们只顾着发泄自己的愤怒，一点都不考虑晋人的情绪，就会加深他们对秦国的仇恨啊！”

曾经“考察”过晋惠公的公子絳献上一计：“放逐会引起诸侯的愤怒，送还则是会留下祸患……至于恢复他的地位，又难免会让他们君臣同心，也不合适。所以我的建议是直接把他杀掉，这样就可以避免邪恶在晋国聚集！”

公孙枝急忙劝阻道：“万万不可啊！我们这次打败了晋国，晋国的贵族们深以为耻，如果再杀掉他们的国君，恐怕更会激起他们的愤怒。到时候儿子想给父亲报仇，臣子想给国君报仇，这种情绪一旦激发出来，别说是秦国了，天底下又有谁不感到害怕呢？”

公子縶傲然回应道：“这些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仅是要把夷吾杀掉，还要在晋人之前抢先立公子重耳为君。夷吾的无道无人不知，重耳的仁德也是天下皆知。我们战胜了大国，是威武；杀无道而立有道，是仁德；还不给自己留下后患，是智慧。这有什么不好？”

公孙枝厉声反驳道：“羞辱了一国的士人，却告诉他们我们要立有道之君来管理他们，你觉得这样的事情能行得通吗？假如行不通，就难免为诸侯所耻笑，这算不得是威武。再说杀了弟弟立哥哥，难道做哥哥的就会对我们感恩戴德吗？他若感恩戴德，还能称得上是仁义吗？可若他不感恩戴德，那又意味着我们再次施恩却没有取得成功，这如何称得上是智慧？”

听到这里，秦穆公也有些不耐烦，于是便问道：“那究竟该如何呢？”

公孙枝回答说：“史佚曾说过，不要首先发动祸患，不要依靠动乱谋利，也不要加重别人的愤怒。在晋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杀掉他们的国君，并不是明智之举。倒不如把晋侯放回去恢复他的地位，同时与晋国缔结盟约，让他们将太子送来作为人质，这样岂不是更为周全？”

第四节 惠公之惠

朝于国人

听闻秦国通过了与晋国进行谈判的决议，沦为阶下囚的晋惠公终于松了一口气，急忙派自己的心腹郤乞回国，去请吕甥前来主持与秦国的谈判。

吕甥听了秦国的情况也稍稍释怀，但他又深知，若是无法取得国人的支持，难免还会生出变数来。为了确保国君能顺利归来，他决定召开一次国人大会。

大会上，郤乞按照吕甥提前准备好的说辞，以国君的名义给众人以赏赐，同时声泪俱下地说道：“回来之前，国君让我务必把他的话带给各位。他说：‘孤虽然侥幸能够回国，但此行已然辱没了宗庙社稷，实在无颜面对国人。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这个罪人的用心，卜选一个良辰吉日，让太子接替我继任国君吧！’”

郤乞代表国君又是封赏又是认罪，一番煽情下来竟然让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吕甥在台下继续鼓动道：“国君自己在秦国受苦，不但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反而在考虑大家的苦衷，如此深情厚谊，我们该如何回报他呢？”

此言一出，就连惠公的反对派都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众人议论纷纷：“我们该怎么做呢？”

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吕甥便登上台去，用嘶哑的声音喊道：“韩原之战使我们兵甲尽毁，但我们可以招募士卒、修缮甲兵，辅助太子即位，以为国君后援。诸侯听说我们有新君即位，如今君臣和睦，还有了强大军力的保

障，必定不敢有所觊觎！他们会和我们站到一起，支持和勉励我们！那些仇视我们的国家，看到我们这么快就重整旗鼓了，也一定会有所忌惮！秦国人迫于压力，难道说还敢为难我们的国君吗？”

在这次的朝国人大会上，吕甥提出了两项重要的改革措施：作爰田、作州兵。关于这两项措施的具体内容，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说明，一直以来人们也都是针对当时的历史细节进行推测，其中有很多争议至今都没有定论，在这里我们也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所谓的“作爰田”，有时也写作“制辕田”，一般来说就是拿出大量的公田以赏赐国人，这与当年贿赂里克、丕郑以求回国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但由于此番韩原战败，国内贵族并未建立功勋，以此来赏赐国人未免显得名不正而言不顺。为此，吕甥特意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做法，就是将土地与爵位脱钩，在剥离其政治属性后，以单纯的财产属性赏赐群臣，以激励他们建立功劳。

这种在危急关头采取的变通做法，无意中促进了晋国土地制度的一次革命性转变，还误打误撞地拉开了春秋列国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些举措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由天灾人祸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带来的经济危机得到极大缓解。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发展，原先井田衰败的集体农庄开始向小地主经济过渡，初步形成了土地私有制的雏形。

到战国时期，商鞅借鉴魏国已经实行了三百年的“爰田”制，在秦国大力推行“制辕田、开阡陌”的政令，为秦国经济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小农经济体系也由此拉开序幕，而这一切的根源皆肇始于此。

所谓的“作州兵”，吕甥的本意是考虑到韩原战败之后兵员大幅减少的情况，希望能将征兵的范围从原来的“国人”群体扩展到“州”的范围内，以诱使各地封君缴纳更多的贡赋、提供更多的兵员，从而为惠公的顺利回国保驾护航，但也在无意中带来了军事上的巨大变革。

一直以来，晋国的军事制度都是沿袭西周小国寡民时的习惯，遇到有外敌入侵或者需要对外征战的时候，国家都会在“国”的范围内征召士兵。但伴随着国家规模的日益扩大，落后的征兵制度便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从而成为阻碍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

到晋献公时期，为了应对国家规模扩大后边防问题突出的新形势，晋国开始在靠近重要关口的地区设置县级行政单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周朝诸侯国土都有国、野的区分，距离都城百里之内称为“国”，居住其间的民众被称为“国人”，其概念可以与希腊、罗马的“公民”相类比，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国”之外有“郊”，“郊”之外有“野”，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就被称为“野人”，通常既不享有政治权利，也无法应征入伍。

与“国”“野”的区分类似，所谓“州”“县”也是处于不同地区同一等级行政区划的不同称谓，晋国所设置的县便是从都鄙制中的“县”演变而来的。按照通常的解释，县的本意是“悬”，由于这些地区大都位于边境，列国互相征讨或间有“戎狄”入侵很容易让这些土地得而复失，人们通常都不愿意领取这些土地作为自己的封地。而公室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将这些“县”划为国君的直辖区，并委派大夫前去管理。

为了应对不时之需，“县”所在的地方通常都会有独立的武装；而“州”内各邑的封君虽享有土地的治权，但却并无集结兵力的权力。因此

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有设“县”的地方通常还能进行抵御，可一旦边境防线被突破，敌人进入了“州”的范围之内，就再也无法组织有效防御了。

就拿韩原之战来说，晋国在龙门渡口附近就设置了一些“县”，这种地方上的武装用来抵御“戎狄”小规模袭击倒是不成问题，但当秦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举全国之力倾巢来犯的时候，其中的弊端也就显现了出来。

战争初期，边防县邑的兵力无法应付来犯的正规军，防线也一再被突破，用书中的原话说便是“三败及韩”。假如韩、耿两地的最后防线也被突破，那么从韩原到绛都之间便是一马平川任驰骋，再也无力组织有效的防御。而在这个过程中，预警消息以缓慢的速度传到国都，国君临时征召士兵百里驰援，很可能会贻误战机。

如今吕甥将征兵的权力进一步拓展到“州”的范围内，在扩大了公室征兵范围的同时，也在信息传输系统无法快速健全的前提下弥补了原有军事制度的缺陷，无形中推动了晋国整体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为后来晋文公时期的称霸大业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王城之盟

安顿好国内局面之后，吕甥于当年十月（前645年周历腊月）前往秦国，在王城（今陕西大荔）与秦人展开了谈判。谈判的具体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了，史书上只记载了秦穆公和吕甥之间的一段对话。当时秦穆公试探性地问道：“晋国国内和睦吗？”

吕甥故意叹了一口气说道：“唉！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各持己见，怎么可能和睦啊？”

秦穆公听了微微有些得意，谁知吕甥接着又说道：“小人（底层的士）们不知道国君的罪过，只是以国君被俘为耻。再加上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所以都很痛恨秦国，宁愿抛家弃产也要立公子圉为国君，极力要求公子圉重整军队找秦国报仇。为了能够报仇，就算是闹得国破家亡甚至投身于‘戎狄’也在所不惜。君子（贵族）们懂得忠信礼仪，知道是因为国君犯了错，所以才招致这样的后果。他们都说，秦公对我们有恩德，我们怎么能对他有二心呢？所以都厉兵秣马等待着秦君的答复。双方一直都较着劲，所以闹得很不和睦。为了能够调和他们的矛盾，不得已耽搁了这么久才来。”

吕甥这一席话看似是自我贬低，故意抬高吹捧秦穆公，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警告。言外之意是晋国的底层民众都摩拳擦掌，就想找你报仇，可全是我们的君子压着呢！君子们都在等你的答复，可也不是空等，他们也是在修缮兵甲的。大家对你的信任是有前提的，你之前答应了我们只是对国君稍做惩戒而不下杀手，如果你出尔反尔，那小人们请战的热情可就压不住了！

秦穆公早就见识过吕、郤二人的口舌之能，故而也不多加分辨，只谦辞道：“就算你不来，我也会把你们的国君送回去的。只是不知道，你们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吕甥继续用两分的方法回答说：“小人们情绪悲观，认为国君得罪了秦国，肯定是回不来了。但是君子们识大体，知道您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当初我们的国君能够回国继承君位，就是因为受了您的恩赐。您能够接纳他，能俘虏他，如今他已经认罪了，自然也能释放他。您的德行是如此宽厚，您的刑罚是如此威严，天下心怀不轨的人都会感到害怕，而那些尊敬服从你的人也都怀念您的恩德。”

眼见自己的一番吹捧触到了秦穆公的兴奋点，吕甥随即趁热打铁：“通过这一战，您已经打出了称霸天下的威名。倘若您接纳我们的国君却不能安定他，甚而还要废掉他的君位，只能将恩惠变成怨恨。如此因小失大，我想您也不会这么做的吧？”

这一席话句句都碰到了秦穆公的心坎上。要不是想做中原霸主，秦国就不会向东发展，与比自己强大的晋国死磕而赌上自己的国运。这次的军事大捷，让秦穆公的霸主梦更近了一步，于是他便点头说道：“君子言之有理！”

因为韩战的失利，晋惠公做了一个多月的阶下囚。如今谈判胜利结束，秦穆公使用七牢的待遇来款待他。古代三牲备为一牢，所谓的三牲指的是猪、牛、羊三种牲畜。七牢是侯伯之礼，也就是说，为了宴请诸侯国君，就要杀掉七头猪、七头牛和七只羊。秦穆公以七牢之礼招待夷吾，就表明已经恢复了他的国君身份。当年夏历十一月，晋惠公终于结束了客居生活，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晋国。

庆郑之死

这次的秦国之行，是晋惠公一生的耻辱，除了成为阶下囚带来的痛苦与羞辱之外，最大的损失莫过于霸业之路从此止步，以及自献公以来晋国集权化政策的失败。这一战拼光了晋国自献公以来积累的军力和财富，使得锋芒毕露的晋惠公不得不从头开始积蓄力量。而战争造成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让他知道，哪怕拼尽全力，自己恐怕也等不到晋国成就霸业的那一天了。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一直与自己作对的庆郑。过去庆郑屡次出言不逊，晋惠公都没有太放在心上，最多故意冷落他也就罢了。然而庆郑却不知收敛，竟然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不听调令，造成丧师辱国的严重后果

果，这是永远都不能饶恕的。因此当他回到晋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庆郑开刀，以洗刷自己的耻辱。

话分两头，我们再来说说庆郑。

庆郑言语狂悖，跟晋惠公合不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若说他完全不顾大局、不考虑国君安危，却也不尽然。无论是从心理认同上，还是利益诉求上，庆郑都没有让晋国打败仗的理由，更不希望晋惠公真的出事。所以在战场上跟惠公闹别扭，不过是想借机发泄一下不满情绪罢了。

晋惠公陷入泥淖的时候，晋军对秦军正占据着绝对优势，韩简带着人马亲自围攻秦穆公，只要再坚持那么一会儿，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胜局了。在此情形之下，庆郑本以为开一个无碍大局的玩笑，让一直都看不惯自己的国君吃那么一点苦头也不会有什么差池。然而当晋军因为自己的一声呼啸出现溃退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也必须要用生命做出补偿。

战争结束后，庆郑一直都焦躁不安地留意着吕甥在秦国谈判的动静。他早就打定了主意，假如谈判失败了，就亲自带家人去讨伐秦国，誓死也要把国君救回来。

一个多月后，惠公要回国的消息终于传了回来，庆郑一颗悬着的心才总算踏实了。此时有大夫蛾析劝他：“国君就要平安回来了，你也该放心了吧？既然他已经无事，现在也该是考虑你自己问题的时候了，还是趁早出国避难去吧！”

国君回来之后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结局，庆郑心知肚明，但出于内心深深的自责，他还是决心要耐心等待，并且大义凛然地回应说：“因为我的

错误让国君陷于失败，失败了又不能自裁以谢罪，是让国君丧失法度，这不是臣子该做的事。臣子的举动不合于臣道，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蛾析看他心志如此坚定，也只能言尽于此了。

十一月底，惠公到了绛都郊外，听说庆郑竟然没有跑，就在城外停了下来，让家仆徒去召他前来问话。庆郑到了之后，惠公咬牙切齿地问道：“你难道不害怕吗？怎么还有脸留在这里！”

庆郑回答说：“这些年所发生的桩桩件件，都是由于国君不懂得知恩图报，不知道听取劝谏、选用良将造成的。如果战败了又不能处死有罪的人，今后还如何管理国家？我庆郑在此恭候，就是为了让国君明正典刑，也算是成全国君并为我自己赎罪吧！即便国君宽容不杀我，我也会自杀的。”

惠公早就气得咬牙切齿了，听了这番话更是气愤难平，当即下令要将其处死。蛾析急忙劝道：“庆郑已经认罪了，还请国君开恩，放过他这一次！好让他戴罪立功，日后找秦国复仇来洗刷国君的耻辱！”

听闻此言，为惠公驾驭战车的梁由靡不答应了。在当时能够成为国君的贴身御戎，不仅是莫大的荣耀，更意味着无限远大的前途。想当年，赵夙、毕万因随献公出征立功而封疆裂土，成为多少异姓大夫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鼓动着他们勇往直前、建功立业。

梁由靡也怀着同样的愿景，自他被选中为国君御戎的那一刻，他就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想象，而这一切却都因庆郑的失误而被无情击碎，变成了梦幻泡影，他怎能不大动肝火？庆郑贻误战机导致的溃败，损害的不仅仅是国君一个人的利益，更有晋国上下众多贵族的利益。梁由靡作为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贵族，自然也对其恨之入骨，坚决不同意赦免庆郑。

家仆徒在一旁心中犯难，他知道惠公对庆郑的恨意有多深，可也知道杀掉一个庆郑容易，但要再收拢人心就不那么容易了。家仆徒本想调和一下，建议让庆郑自裁以谢罪，国君还可以博得一个宽宏大量的名声。可惠公仍然坚持己见，怒道：“绝对不允许庆郑自杀，必须将他当场处死！”

司马说只好领了惠公的旨意，召集军士宣读了庆郑的四条罪状：“韩之战前全军宣誓，扰乱军阵违抗军令者死，主将被俘部下没有拼死相救者死，散布谣言惑乱军心者死！今庆郑扰乱军阵、违抗军令，其罪一；擅自进退，不听调遣，其罪二；贻误战机，放跑秦君，其罪三；国君被俘，不拼死营救，其罪四。”

罪状宣读完毕之后，庆郑被当场斩首示众，晋惠公在亲眼看到这一切之后才安心进入都城——这一天是惠公六年夏历十一月二十九日。

惠公施政

晋惠公回国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天灾。惠公即位初年，晋国经历了持续多年的自然灾害，因此才须向秦国买粮。而秦国在公开表示慷慨的同时，又趁晋国尚未恢复的时机，借口自己遭遇天灾向晋国买粮，最后导致了韩之战的爆发。

战争结束后，晋国持续多年的天灾似乎并没有结束，如今又逢人祸，境况自然是雪上加霜。晋惠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又向老恩主买粮。秦穆公如今名利双收，自然也就更大方了，同时还颇有些感慨地说道：“我虽怨恨他们的国君，却也怜悯他们的百姓。而且我还听说，当初唐叔虞受封之时，箕子就曾说过，他的后代一定会昌盛的。晋国恐怕不是我们可以图谋的，还是姑且树立恩惠，等待有才能的人吧！”

为了摆脱危机带来的长期影响，晋惠公这次没有再失信于民，而是认真兑现了吕甥做出的许诺，即“作爰田、作州兵”政策，使得晋国很快就走出了天灾人祸的阴影。

史料中对晋惠公后来的为政举措没有太多的记载，这固然是因为晋惠公屡次失信，不符合儒家仁义君主形象，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受到两个政敌的影响。人们为了吹捧秦穆公、尊崇闪耀着霸业光辉的晋文公，总要选择一个反面教材来做对比。晋惠公同时遭遇了两位身披光环的主角，其所作所为自然就被全面否定，其创造的功绩也被彻底掩盖了。当史家以“成王败寇”和朴素的“因果报应论”为基调来回顾历史，自然会有针对性地摘选史料，晋惠公被脸谱化几乎是在所难免的。

但若要仔细推敲，晋文公重耳在即位第五年就打败楚国成就了霸业，如果没有惠公时期的准备，单靠那几年的励精图治，恐怕也无法把晋国引向了霸主之路。

除天灾之外，晋惠公面临的还有一个顽固的老问题，那就是重耳势力的反扑。

晋惠公初即位的几年间，以铁腕手段治理国家，迅速凝聚起人心，也让敌对势力销声匿迹，从而稳固了自身的统治。但随着战争的失败和自身权威的扫地，躲在“狄国”的公子重耳难免就会幸灾乐祸，甚至是落井下石。

惠公回国的第二年（前644年），就有“狄人”从吕梁山区出兵在绛都以北地区横冲直撞，先后扫荡了今临汾市境内、汾河以西的狐厨、受铎，随后又向东渡过汾河夺取昆都，斩断了晋国本部与北方霍、杨、贾等地的联系。

惠公虽然权势不振，可对付这些没有组织纪律的“狄人”还是有一套的。因此这次的侵略行动并没有给晋国造成太大的损失，反而让惠公再次意识到这个兄长实在是太不让人省心了。于是到次年（前643年），晋惠公再次委派寺人披乔装打扮混入“戎狄”去刺杀重耳。这次的刺杀行动虽然又没有成功，但却迫使重耳慌不择路再次流亡，也算是暂时清除了时刻潜伏在自己身旁的威胁，使其得以安心梳理内政外交事务。

韩之战后，秦穆公如愿以偿以国家外交盟约的形式，确定了秦国对“河外列城五”无可争议的主权。另外《史记》中还经常出现河西八城的记载，不少人都以河西八城和河外列城五为同一区域的指称，但此说并无依据。

如前所述，“河外列城五”地处中条山以南的崤函谷地，是秦国一直觊觎的战略通道，其地虽在“河外”但并不在“河西”，因此并不能简单地与“河西八城”画上等号。

秦晋两国在黄河西岸、陕西省东部有不少相互重叠的统治区域，这些土地犬牙交错，多年来也一直是两国之间的缓冲区。晋国拥有这些城池可以作为遏制秦国东进、维护晋国西垂安定的前哨阵地；而秦国一旦得到河西列城，就可以将晋国的势力彻底赶出河西。

韩之战前，秦国多次打败晋国的边境军队，到了韩原才与晋军主力决战。因此，“河西八城”的提法倘若真实存在的话，也极有可能是通过战争手段获取的。在这次谈判中，晋国因为战败受制于秦，不得不承认了秦对此地的实际占有权，这与“河外列城五”并不能等而论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交割给秦国的土地中还有一座位于晋国腹地的城池解梁城，其重要性在前文也有论述。秦国由此获得了在晋国腹地驻军，并派官吏征收赋税的权力，足见秦穆公野心之大。

但或许是由于受到了晋人的抵制，秦国并未在河东站稳脚跟。韩之战两年后（前643年），晋惠公如约将太子圉送往秦国为质，秦穆公便做了个顺水人情，将河东之地悉数交还晋国，有关这次战事的后续事务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陆浑之戎

秦国以正义之名发动战争，又以战争的胜利名正言顺地得到了土地，且再次施恩于晋，使得秦穆公的形象愈发高大。但战后这几年，秦穆公显然感受到了扩张过快带来的副作用，于是便将秦国势力从晋国腹地退出，专心地巩固其在河西及河外所取得的利益。

晋惠公十年（前641年），晋惠公曾避居的梁国被秦国吞并。据《春秋》三传所述，梁国君主梁伯是个沉湎酒色、荒淫无道的昏君，他喜欢大兴土木，经常会以各种借口修筑城池，或者增修防御工事。但由于没有那么多的人口来充实新城，这就使得梁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许多无人居住的“鬼城”。国人对梁伯的好大喜功苦不堪言，不愿意替他出力，他就自己散播流言，说“有人要来攻打我们了”，人为地制造紧张感。

晋惠公九年（前642年），梁伯修建的“鬼城”新里被秦国占据，这大约是给他带来了新的灵感，于是在第二年的土木工程中，他就使用了“秦将袭我”的借口。然而，他显然低估了人们对秦国的恐惧程度，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就引起了全城恐慌，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难，生生地把都城也变成了一座“鬼城”——梁国就这么亡了！

春秋时期但凡出兵伐国都要有合理的借口，秦国灭同姓梁国自然也不能例外。梁国作为一个依附于秦晋的小国，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没有话语权，自然就只能任由胜利者来编排了。

但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是，据《秦本纪》记载，秦国在灭掉梁国的同时，还灭掉了位于今陕西大荔县境内的芮国。梁国与晋国的韩、耿之地相望，而芮国又与魏、蒲之地相望，都是控扼黄河渡口的重要据点。可见秦穆公之灭梁、芮，与晋献公之灭耿、魏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目的恐怕也是为了巩固其已经占据的河西之地，并为进一步经略河东做好准备。

这些频繁的军事行动不仅给晋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让生活在秦晋之间的“戎狄”苦不堪言，这其中就有一支被称为“瓜州之戎”的部族。

“瓜州之戎”据称是晋惠公的母族所在，因受到秦国的压迫，不得不向晋惠公求救。但彼时晋惠公受制于韩原之战的失败，无力帮助他们抵制秦国的讨伐，于是便着手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迁戎”行动。晋惠公十三年（前638年），在秦国的协助下，晋国将这些“戎狄”迁移到黄河以南、洛阳以西的伊川（也就是陆浑，今天的河南嵩县附近）地区。此后，这些部族便被冠以新的名号，也即“陆浑之戎”，又因陆浑地处黄河以南、秦岭北麓，故而又叫作“阴戎”。时至今日，在嵩县境内还有很多以“陆浑”命名的地方。

“陆浑之戎”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族，他们初到伊川之时，那里还是一片“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原始森林，周边更有扬、拒、泉、皋和伊、洛之戎四处活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但他们硬是“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在秦岭地区扎根立足。

不过，晋国的“迁戎”行动在当时曾招致一些负面评论。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就追述了一段往事，说是在平王东迁的时候，周朝大夫辛有路过伊川，看见这里田地荒芜、文明颓败，居住其间的人们不得不披头散发在野外祭祀，心中莫名悲伤。于是便叹息道：这里原本是被礼仪浸润过的地

方，可如今却让持守礼仪的人们失去了荫蔽，只能在野外祭祀。恐怕用不了一百年，人们就会连野外祭祀的礼仪都忘掉，这里就会变成戎人居住的地方了。

古人征引这段往事作为附注，不仅仅是为了表明辛有预言的准确，还有为晋惠公的负面“人设”添砖加瓦的意图。在他们看来，伊川地区礼乐文化受到摧残，及至最后被“戎人”占据，晋惠公显然难辞其咎。

不管怎么说，对于晋国来说，陆浑之戎的迁徙的确是极大的利好。被迁徙的戎族有感于晋惠公的恩义，在此后的百余年间成为晋国“不侵不叛之臣”，他们就像是晋国安插在秦岭的一根楔子，有力地阻遏了秦国的东进和楚国的北扩，使得秦岭这一片三国相争的要冲实际上成了晋国的附庸。尤其是在后来的崤之战中，晋国所以能全歼秦军，“陆浑之戎”功不可没。姜戎氏在回忆起这段关系的时候曾经有个比喻，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道出了双方配合之默契。

此外，“陆浑之戎”的内迁对伊洛地区的农业开发也助益颇多。这些“戎狄”部族身处诸夏之中，大量吸收了中原的礼乐文化，生产方式也逐渐向农耕文化过渡。将近百年之后，这片被周王室荒置的土地终于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一片欣欣向荣的沃土。詹桓伯指责晋国诱“戎狄”以逼华夏，晋人倒也乐于“补过”，顺手便灭掉了“陆浑之戎”，将晋惠公苦心经营的战略宝地纳入了晋国的版图。从这些影响来看，晋惠公的确是下了很大的一盘棋。

可惜的是，晋惠公苦心经营的成果却并未被自己的子孙后代所享用，仅仅在迁徙“陆浑之戎”一年多以后，晋国的政权就落入了他的兄长重耳之

手，而他自己却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背信弃义的骂名，对他来讲，这何尝不是一场悲剧呢？

第五章 晋文公流亡之路与称霸前的列国局势

第一节 备尝艰辛

渭水惊魂

晋惠公八年（前643年）一个惬意的春日里，正当公子重耳与“狄国”的君主在河畔田猎时，突然间从密林中蹿出了一个迅疾如风的杀手。重耳与“狄君”拔剑抵御，与杀手战作一团，眼看对方武力高强，自己实在无力招架，重耳只得跳上一辆戎车奔逃而去。

不久后，公子的随从纷纷追赶上来，重耳的惊魂才算有了些许安定，他喘着粗气说道：“我遇到寺人披了！”

提起这个寺人披，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虽是宦官，可身形功夫却端的了得，做事也雷厉风行很有章法。十二年前，他奉献公之命攻打蒲城，国君命他一日到达，他却星夜兼程，半晌就到了蒲城之内，打了重耳一个措手不及。重耳抵挡不过逾墙出逃，他紧追不舍，生生地把重耳的袖子砍了下来。

此次寺人披的出现，正是奉了惠公之命，前来暗杀重耳的。惠公给了他三天的时间，而他却一刻都等不得，只用了一个昼夜就从绛都赶到了渭水。

两次与寺人披交手，重耳都被他凌厉的攻势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即便是已经奔逃到了安全地带，可一回想起刚才的情景他仍然心有余悸，也让众人都惊出了一头冷汗。

狐偃回顾了这几年的经历，想到他们之所以逃到狄国，就是希望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国内的局势，为日后公子回国即位提供便利。然而当八年前里克发动政变时，他们却因为担心国内的乱局，使得公子与国君之位擦肩而过。

这些年来，他们从未放弃过努力，一直苦苦寻找着机会。两年前，韩原之战爆发，夷吾作战失败被秦人俘虏，又给重耳带来了新的希望。曾经考察过他们兄弟的公子絳，当时也转变了立场，不断地在秦穆公面前说重耳的好话。然而由于夷吾再次出让了大量的利益，取代夷吾回国即位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

或许正是受到了重耳的影响，去年“狄国”突然出兵汾河河谷，占据了几座重要的城池。但这次行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招致了夷吾的怨恨，于是就有了寺人披乔装打扮前来刺杀的事情。

依照寺人披说一不二的性格，如果不能完成使命，是绝对不会罢休的。眼下他正在四处活动，狄国是断然不能回去了；加之秦国似乎已经放弃了重耳，自然也是靠不住的。这就使得重耳不得不认真思量：下一步究竟何去何从呢？

众人围着篝火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最后还是狐偃提议道：“我们还是去齐国吧！”

听到这句话，重耳心中不悦：当初说不去齐国的是你，现在说要去齐国的还是你！你不是说齐国不会帮我们吗？

不过狐偃自有他的一套说辞：“当初我们之所以到狄国来，并非是用来享受安乐的，而是为了成就大事。当时我曾说过，齐楚两国距离太远，而狄国

与晋国距离更近易于抵达，狄人四处树敌故而乐于帮助我们，在狄国居住有利于抓住时机，所以才留了下来。

“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夷吾的地位已经稳固，短期内无法撼动，我们再留在‘狄国’也没什么意义了，反而会因为生活太滋润而丧失斗志，可齐国就不一样了：齐侯年纪大了，已不复当年的风采，可他依旧怀念当初的盛况，因此就有了亲近晋国的念头。尤其是管仲去世之后，他身边尽是一些谄媚小人，没有人帮他出谋划策。时间长了，难免就会重新考虑管仲的忠告，和远方诸侯搞好关系，以求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此时我们前去投奔，岂不正合他的心意？”

被寺人披逼到这个份上，就算是狐偃的说辞再苍白无力，重耳也别无选择了，因此也只得听从狐偃的劝说，重新踏上流亡的旅途。但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件心事未了，那就是与和他相守了十余年的妻子告别。

重耳的妻子名叫“季隗”，是一名出身“赤狄廆咎如”的女子。早年“狄国”与廆咎如交战，俘获了两名女子，分别叫叔隗和季隗。这其中的“隗”是他们宗族的姓，晋国早年建国受封时曾领有“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这其中的“怀姓九宗”据说就是“隗”姓的戎狄部族后裔。“叔”和“季”则是她们在家里的排行，翻译过来就是隗家的老三和老么。

“狄国”的君主把这两名俘虏赠给了晋国的流亡者，重耳自己娶了妹妹季隗，生下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他的随臣赵衰则娶了叔隗，生下了后来左右晋国局势多年的枭雄赵盾。两人情同兄弟还娶了一对姐妹，颇有点像孙策和周瑜之间的关系。

在与季隗告别的时候，重耳满怀深情地许下诺言，说：“你再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后我还没有回来，你就找个人嫁了吧！”

季隗显然也舍不得他离开，因此颇为恼怒地说道：“我如今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怕是就要进棺材了！”可当她想到重耳的鸿鹄之志，心知不可能永远把他留在身边，便只好默默地擦干眼泪，转过头来微笑着说道：“你去吧，我会等你的！”

五鹿获土

遥别了相守多年的妻子儿女，如今二十九岁的重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生活了十二年的狄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漫漫旅途。然而，旅途才刚刚开始，他们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拜寺人披所赐，重耳仓皇出逃，完全没来得及做任何准备。他们一路走一路收拢部众，等最后聚拢起来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随行人员已经逃亡了不少。而更让重耳无法忍受的是，负责管理资产的竖头须竟然也不见了踪影，临走的时候还将他们这些年积累的贵重物品全都带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整个团队都炸开了锅！如今他们已离开狄国的土地，环绕他们的是一片几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想要再寻些物资不知要付出几多艰辛。没有了行李盘缠，他们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缺衣少食的困境，更是处处隐伏的危险。

可自己选择的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被称作晋文公五贤士的狐偃、赵衰、贾佗、魏犇、胥臣，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被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谋。在他们的悉心保护下，公子重耳穿越了晋中“蛮夷戎狄”杂处的原始森林，走出了荆棘丛生的茫茫大山，终于来到了广阔的平原上。

进入华北平原之后，他们首先来到了卫国地界。重耳打算以晋国公子的身份拜访卫国的国君，顺便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资助。然而经历了几个月的风餐露宿，一行人个个都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俨然是一群乞丐。重耳拜见卫君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找到一个能够识别他们身份，并且愿意引荐的人。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他们找到的引荐人名叫宁速，他接受了重托，将重耳引荐给了卫文公。但彼时的卫国正面临着“狄人”和邢国的联合入侵，国中上下闹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流亡公子，二话不说就要把他们撵出门去。

宁速急忙劝谏说：“礼是国家的纲纪，亲是团结的纽带，善是德政的基础，失去了这些国家就无法稳固，就无法抵御外敌。如今晋国公子是个贤能之君，他的祖先唐叔与我们的祖先康叔都是文王武王的后裔，国君若真对他们不管不顾，就等于是抛弃了根本，恐怕不合适吧？何况在武王的后裔中，只有晋国还算昌盛。在晋国的诸公子中，又数这位重耳最有德行，将来能守住晋国祭祀的，也必定是这个人。假如有朝一日他返国即位，讨伐对他无礼的国家，卫国岂不是首当其冲吗？”

宁速苦口婆心说了半天，卫文公却全然没有理会。公子重耳到卫国“走亲戚”，盘缠路费没讨着，反而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空着肚子继续赶路。

他们沿着黄河到达五鹿（今河南濮阳南，河北大名东），重耳看到一群农夫正在田埂上吃饭，就让狐偃去要些吃的来。没想到这些农夫还有些瞧不上他们，没好气地从地里掀了一块泥巴递给狐偃：“吃吧！”

堂堂的一国公子，一心想要承继大统的未来霸主，竟然落到了鄙视链的最底端，简直是奇耻大辱！重耳哪儿能受得了这个气，挥起马鞭就要打农

夫，狐偃脑中灵光一现，连忙制止道：“公子千万不要动怒，这可是上天授予公子的啊！”

西周时，天子册封诸侯通常都会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仪式上，天子会郑重其事地把一抔黄土授予被册封的诸侯，象征着赐予其土地。狐偃这么一说，重耳仿佛也感应到了天意：上天让五鹿的“野人”授土给自己，这不就是象征着是要把这块土地赐予自己吗？

想到这里，重耳急忙跪倒在地，行再拜稽首之礼。稽首可是当时最高等级的大礼，通常是在重要的场合臣拜君的时候才会用，日常会面中并不常见。具体的做法是臣子屈膝跪倒，左手按住右手置于膝盖前，慢慢地用头触地并稍作停顿，然后再缓慢地起身。

先秦时讲究“礼不下庶人”，国人中的平民见了达官贵人从来都不需要跪拜行礼，更何况这些平日里连达官贵人的影子都见不到的“野人”，更是不知礼为何物。看着这个衣衫不整的贵人公子趴在地上郑重行礼，农夫们都大笑起来。

但重耳才不管这些，这件事给疲惫的重耳打了一针兴奋剂，他暗暗发誓决不能辜负了上天的眷顾！重耳始终都认为五鹿是上天赐给他的领土，于是在他即位之后不久，就把五鹿纳入了晋国的版图，这些都是后话了。

信任危机

人总要吃饱喝足了才会有力气。可是中原大地不像太行山区那般有很多山珍野味可以吃，重耳口干舌燥腹中空空几乎都要晕倒了，这救命的粮食还是没有着落。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传说中介子推割股奉君的故事。

据说介子推看到公子身体虚弱，却又找不到吃的，就背地里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片肉，混了些野菜做成鲜肉汤让重耳吃了。重耳知道后很是感动，抱着介子推血淋淋的大腿哭了半天，然后指天盟誓，说只要自己能够回国，一定要重重地封赏于他。

割股啖君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未来的路途中他们还是会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饿死人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此时的重耳团队内部，因为饥饿也逐渐产生了嫌隙，估计又有不少人中途逃跑了。大家实在担心竖头须“窃藏以逃”的故事重演，于是就商量着找一个靠得住的人，负责看管那为数不多的粮食。商量来商量去，最终这个重任就落到了赵衰的身上。

可还没过几天，一行人正有气无力地走着呢，突然有人发现管粮食的赵衰又不见了，装粮食的口袋也不见了！这下所有人可都急了：别看赵衰这家伙平时挺老实的，没想到关键时候也会耍滑头，竟然不声不响地把粮食全都偷走了，这不是想饿死人吗？

突发事件能够激发人的潜力，刚才还饿得浑身无力的一群人，突然间就精神亢奋了起来，全都抄起家伙打算去找赵衰算账。不过刚走出不远，就看见赵衰端了一壶米粥，晃晃悠悠地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经过一番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赵衰力气本来就不大，这几天又饿得实在发慌，更是身体孱弱举步维艰。赵衰是个实诚人，他没有埋怨大家，依旧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此时尽管手里端着一壶米粥，但却舍不得吃，又怕洒了浪费，一路上小心翼翼，所以才被落下了。

这件事情在《左传》上只用了短短的十二个字来记录，但却反映出了重耳团队中出现的信任危机。在困苦之中的一群人，表面上团结一致共渡难

关，可内心里却是各有盘算，互相猜忌。为了消弭人们之间的裂痕，必须要“灌鸡汤”“打激素”，否则这个团队很快就会分崩离析。狐偃把野人的那一堆土奉为至宝的举动，其用意就是在激励这个团队，让大家都相信上天是眷顾公子的，如今的磨难只是上天的考验，只要能够坚持到最后，就一定会赢得辉煌的未来。

如果说之前的十二年中，狐偃的智谋还有所欠缺的话，这次的流浪则让他实现了智慧的升华，使得他在团队管理和竞争策略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再像之前那样短视。经过此番磨难，狐偃也才算是表现出了他足智多谋的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

第二节 中原乱象

齐桓之死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跋涉，以重耳为首的流亡团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繁荣富庶的齐国。此时一代霸主齐桓公已经病入膏肓，却还沉浸在过去的荣耀之中无法自拔。听说晋国的流亡公子来了，他不由分说就赏赐了二十乘车马（八十匹马），还把宗室的女子齐姜嫁给了重耳。

之前晋献公前往葵丘会盟时，周公宰孔就曾经说过，齐桓公“好示务施”。诸侯但凡来参加会盟的，保证能让你空手而来，满载而归。而狐偃也有分析，齐桓公如今怀念当初的荣耀，但又没有了管仲的辅助，自然也乐见有人对自己投怀送抱。因此尽管与重耳素昧平生，可赏赐起来却一点也不含糊。

晋公子重耳收到齐侯的赏赐之后一下子就阔了起来，再也不是那个忍饥挨饿到处要饭的叫花子了，也不枉受了这大半年的罪。

但话说回来，他们来的时机说巧也巧，说不巧也不巧：巧的是他们赶在内乱之前到了齐国，依着齐桓公的性子还能给他们不少东西。不巧的是此时已经是齐桓公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了，根本不可能为他们的事情操心。这就使得重耳团队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齐国安顿下来，等着齐桓公死掉，然后寄希望于继任的国君帮助他们回国夺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念头，最终也还是落空了。不久之后，齐桓公被易牙、开方、竖刁等人组成的内侍集团软禁，并于当年十月初七日被活活饿死在宫墙之内。在他死后，内侍集团秘不发丧，假传他的命令在国内大开

杀戒，并矫诏立了公子无亏为太子。而齐桓公的尸体则静静地躺在宫内逐渐腐烂，以至于生出的蛆虫都能爬出宫门。

直到两个月后的十二月初八日，内侍集团自以为控制了大局，才发出齐桓公已死的讣告，公子无亏以太子的身份宣布继承父位，成为新的国君。

无亏的矫诏即位引发了国人的不满，几个公子为了争夺君位展开了一阵厮杀，内乱的序幕由此徐徐拉开。直到第二年（前642年）三月和五月，宋襄公遵照齐桓公的嘱托，两度带领诸侯大军扶植原先的太子公子昭即位为齐孝公，齐国的局势才渐渐稳定下来。

宋襄图霸

齐孝公地位稳固后，于当年八月安葬了齐桓公，但却再也无力恢复霸业，这就使得中原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东方诸侯迅速分化出了几个不同的阵营，呈现出一派乱哄哄的景象。

因为有齐桓公的托孤之责，宋襄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齐桓公霸业的延续者，于是便信心满满地东征西讨、屡屡邀集诸侯会盟。他的诸般举动让司马子鱼感到十分担忧，于是就不断劝说，但宋襄公却始终不予采纳。

公元前639年春季，也即晋惠公十二年，宋襄公首先照会了齐、楚两国，在鹿上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到秋天，他又依照鹿上会议的精神，在宋国孟地召开国际会议，楚、陈、蔡、郑、许、曹等六国应邀参会。

这次会议由宋国召集，参会的却大都是楚国的附庸，因此对宋襄公来说等于是兔子进了狼窝——哪里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可宋襄公偏就自信心爆棚，不管别人怎么劝，就是坚持不肯带兵，还说什么：“是我在三国盟会上提出不准带兵的，又怎么能食言呢？”

宋襄公言而有信，可楚成王就不这么实诚了。果然会议召开不久，楚成王就下令将宋襄公抓了起来，并带着他前去攻打宋国。好在有司马子鱼坚守不战，楚国没占到便宜，只好把宋襄公押解了回去。

宋襄公在盟会上被“蛮夷”所俘，中原诸侯不免产生了兔死狐悲之感。于是这年冬天，一向人缘不错的鲁僖公出来做和事佬，在薄（毫）地举行会盟，表达了中原诸侯请求释放宋襄公的美好愿望。迫于压力，同时也为了取信于天下，楚成王也做了个顺水人情，把已经没什么用处的宋襄公给放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宋襄公在楚国吃了不少苦，从此开始忌惮起强大的楚国来。可他又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因为害怕遭人耻笑，就强撑着颜面假装不怕。

第二年（前638年）夏天，因郑文公到楚国去拜见楚成王，宋襄公终于找到了报仇雪恨的机会，于是便邀合卫、许、滕等国的兵马联合伐郑，也算是给楚国人找点晦气。楚成王也毫不相让，迅疾整顿军马，浩浩荡荡地向宋国开拔而来，一场历史上最为滑稽的战争——“泓水之战”就此打响了。

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数次拒绝了公孙固战略战术上的建议，坚持要与楚国来一场公正的较量。结果不出所料，双方交战不久宋军就开始溃败，宋襄公的护卫队被全数歼灭，他自己的腿上也中了箭。

战败之后，国人都怨恨他不听从子鱼的意见，宋襄公不得不祭出了仁义大招，于是就有了他名留青史的那段话：“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这也就是春秋时期的作战四原则：善待敌方伤员，善待头发花白的老兵，不据守关隘险阻取胜，不能不宣而战。

宋襄公称霸不成，反而招致了一次围困之苦，一次兵败受伤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到第二年五月就驾鹤西去了，而楚国则是迎来了几百年来最为辉煌的时刻。如果说降服当年的“小霸王”郑国是楚国敲开中原大门的得意之作，那么这次在中原的首次大捷——泓水之战就是楚国的成名作。

有了这样的成绩，楚成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到自己最大的跟班面前去炫耀武力。担惊受怕的郑文公不知道楚人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就把自己的两个夫人聃氏、姜氏派到柯泽去慰劳楚军。楚国人让她们参观了战俘营，并把斩杀宋军所割下的左耳朵都抬出来给她们看，其用意大概是在警告郑国，不要仿效宋国的背叛之举。

楚成王在郑国吃吃喝喝，宴席之间不顾中原的礼仪规定，和美女搂搂抱抱，吃饱喝足了之后，还顺手把郑国的两个侍妾给牵走了。胜利的喜悦让楚成王失去了分寸，他举止失当，受到世人诟病，也更加深了人们对楚国“蛮夷”身份的印象。相较之下，宋襄公表现出的仁义形象却备受推崇，宋国虽然战败了，却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同情和对楚国同仇敌忾的决心，这恐怕是宋襄公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

第三节 周游列国

乐不思归

回到正题，再说重耳团队的际遇。

重耳一行到达齐国没多长时间，就遇到了齐国的内乱，几个公子之间你打我、我打你，忙得不可开交，谁也顾不上理会那个流亡到此的晋国公子。后来齐孝公在宋襄公的帮助下继承了君位，齐国内部也算是大体安定了。但战乱之后的齐国国力衰弱，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霸主雄风，自然也就没办法帮助公子重耳回国即位。

但这似乎丝毫都不影响重耳的幸福生活。齐国街市的盛况、商业的繁华、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国物产，让出身山区的重耳大开眼界。此时的重耳就好像是到了江东地的刘玄德，突然贪恋起齐国优容的生活来了。他的这个心思让随从流亡的那些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私底下就开始议论：万一公子真的赖在这里不走了，该怎么办？

要知道，跟随重耳出奔的都是些有理想的青年，他们之所以死心塌地跟随重耳出奔，大都是奔着前途去的。在西周盛行的宗法制度框架内，通常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家业，嫡长子之外的余子由于没有宗族土地、财产和爵位的继承权，成年之后通常都会分配很少的田土成家立业。他们虽然生于贵族之家，却与贵族的荣光无缘，只能在宗族内部或者其他公子、大夫家里做家臣，几代之后就完全沦为庶民了。

跟随重耳出奔的诸位就恰恰都属于这一类型，由于无法继承家业，他们只能离家出走另谋出路。比如重耳的舅舅兼心腹狐偃，他是狐突的次子，其兄长狐毛与重耳虽然也是舅甥关系，但由于能够继承狐突的家业，并没有随

重耳出奔。其次是赵衰，谥号成季，字子馀，伯仲叔季，季为最末，大概他在家里是排行最末的。他的哥哥（存疑）赵夙早年随献公出征获封耿县，这些封地赵衰显然是无法继承的。另外还有胥臣，也叫作臼季、司空季子，说明也是家里排行最后的；魏犇谥号武子，又称武仲州，当是家中排行第二。其他人因为所留资料不多无法确证，但大体上应该也属于类似情形。

跟随重耳出奔，对于这些宗族庶子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特别是在太子申生死后，重耳就是献公的长子，只要重耳能够当上国君，他们就有机会凭借从亡之功成为有封地的领主，那些失去的荣耀就统统都会回到他们身边。虽然重耳在与夷吾的角逐中先负一场，可只要还存有一线希望，就绝对不能放弃，这也是他们跟随重耳的动力所在。他们就像是寻找宝藏的冒险家，寻找创业公司的投资客，就算是所瞄准的项目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可只要有一次赌对了，就能够迅速扬名立万，成为众人追捧的“大亨”。

可现在呢？如果公子没有了进取之心，甘愿在齐国做一名异姓大夫，那么这些随从们就依旧只能是家臣的地位，这样的处境与没有流亡还有什么区别？历经了万苦千辛最后却一无所得，这样的结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况且，韩原之战爆发后，晋惠公为了取得国内的支持，在吕甥的主导下实行了“作爰田、作州兵”的系列改革，使得国内贵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得到了极大提升，这些正在进行的改革对于这些流亡者也同样具有诱惑力。如果他们不跟随重耳出亡，而是留在国内，就算是地位上没有太大的提高，至少会比在齐国拥有更多的私有财产，这就无形中大大增加了重耳的团队成員的机会成本。

但讨论归讨论，这些话又不敢直接跟公子去说，他们便只好找狐偃商量。一群人把狐偃拉到了桑树林中，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甚至有人直接提出了散伙，你醉你的温柔乡，我回我的高老庄，从此以后大家就井水不犯河水了。

狐偃一听心中焦急，好歹重耳也是自己的亲外甥，他一路上用各种美好的愿景把大家团结起来，不畏艰难冲破险阻到了齐国，就是为了让大家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今最困难的时期都已经过去了，如果就这样半途而废，之前所有的苦难不就白受了吗？更何况，重耳孤身在外，不管是要做晋国的国君还是要做齐国的大夫，都需要有人辅助帮衬，大家要是就这么走了，重耳很可能就会在齐国待不下去。所以无论如何，他都必须要想办法把人留住，就算是前途渺茫，该画的饼还是要继续画，要不然二师兄就真的要分行李了。

狐偃在桑林之中费尽口舌苦心相劝，众人忙于争论，却不知他们的话，全被一个采桑的侍女听见了。

在目送他们离开后，侍女悄悄地跑到重耳的妻子齐姜那里，把他们刚刚的议论全给抖搂了出来。齐姜是一个很有心眼的姑娘，她知道此事关系重大，不管他们的想法靠不靠谱，自己支不支持，都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否则若是有人不小心把话传到了齐侯的耳朵里，难免会牵连到自己的丈夫。于是她当机立断就把那个侍女杀掉了，然后找到了重耳问道：“你的随从打算跟你一起离开齐国，这事被一个侍女听到了，我刚刚把她杀了，你就放心吧！”

重耳大概是真的不想离开，又或者是担心齐姜在有意试探，于是便矢口否认，说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想法。齐姜实在为他感到着急，就耐心劝说

道：“你心存远大的志向，岂可因为留恋妻子、贪图安逸而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呢？”她还引用了不少名言警句，列举了武王、管仲等成就大事的例子，劝说重耳在大事面前不要犹豫退缩。

可无论齐姜怎么劝说，重耳就是死活不认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会留在齐国，没有其他的想法。无奈之下，齐姜只好找到了狐偃，并设计把重耳灌醉了，趁着夜色把他丢到车上拉出城去。

重瞳骈胁

重耳本以为自己会在齐国的豪宅里醒来，睁眼就能看见齐姜那甜蜜的笑脸，可当他真的醒过来时，却只看见了黑色的天幕和闪烁的星辰，差点以为是屋顶让人给偷了。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原来自己正躺在颠簸的马车里，奔跑在冰冷的原野上，于是急忙大喊让他们停下来。

还没等车停稳，他便跳下来夺了一把长戈，边跑边喊着狐偃的名字骂道：“你连问都不问一声就把我拐出来了，将来若是事情不成功，我就是吃了你的肉都不能泄恨！”

狐偃知道他会来这一出，也是撒腿就跑，而且还逗趣地回答道：“如果你不能回国夺位，我狐偃还不知道会死在哪里呢！如果死在豺狼虎豹的口中，哪儿还轮得着你吃我的肉！可如果你能够夺得君位，晋国上下的美食应有尽有，你想吃什么都行！我狐偃的肉腥臊难闻，给你你都不一定爱吃！”

两人你追我赶跑了半天，到最后实在没力气了，都瘫倒在地。众人纷纷凑上来劝解，重耳才渐渐消了气。随后大家讨论起了以后的行程，在众人的强力要求下，重耳只好同意先到宋国去碰碰运气。

这一年是晋惠公十一年（前640年），他们流亡的第十六个年头。三十二岁的重耳离开齐国再次踏上征程，开始了游历中原的旅程，从此就再也没有长时间的停歇，直到最后回到国内。

依照周代的礼仪，重耳每到一国都会找一个居中引荐的人，这个角色就类似于大客户销售中的教练，又或者是线人、中介。通过中间人的引荐，他们才能够名正言顺地拜访国君、寻求结盟，过去在卫国遇到的宁速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曹国他们所找到的中介是僖负羁。按照传统的解释，僖负羁可以说是一名治家有方的典范，不仅自己是声名在外的贤臣，就连他的妻子都有慧眼识人的本领。看到重耳团队君贤臣明，个个都有十八般武艺和治国之才，其妻子便料定重耳一定能得国。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僖负羁不仅愿意引荐重耳去见曹共公，私底下对重耳也是礼遇有加，经常去给他送礼。

而与重耳相比，曹国的国君曹共公却是不折不扣的昏君。他不任用贤能的僖负羁，反而把一些无才无德的人拔擢为大夫。更令人气愤的是，曹共公听说重耳天生有“重瞳骈胁”之相，竟不顾对方的情绪，非要看个究竟。

所谓的重瞳，一般是说眼睛里有两个瞳仁（或者说是眼中有痣），重耳的名字大概也是由此而来。历史上记载有重瞳的人物有仓颉（面长四目）、虞舜（名重华）、重耳、项羽（重瞳子）、吕光、高洋、鱼俱罗（隋朝柱国，有双瞳）、李煜，等等。重耳的另一个异于常人的特征是天生骈胁，所谓的骈胁是指肋骨紧密排列，就像是一整块骨头一样，和重耳一样有骈胁畸形的，还有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

人群中出现重瞳和骈胁这类遗传病的概率很低，由于古代统计资料不完善，史书上出现这些记录的大都是有地位的人，于是后世就把这些本属于遗

传病范畴的畸形特征，附会成了真命天子和圣人的象征。在春秋早期的史料中，还很少有关于这种畸形的记载，恰好重耳就是一个集重瞳和骀骀于一身的异类，这就引起了曹共公这个“好奇宝宝”的无穷兴趣。

重瞳的特征长在眼睛上，还能很方便地查看，可骀骀这种畸形是藏在衣服里的，想要一探究竟就没那么容易了。曹共公想看看重耳那异于常人的胸部，可又不好意思当场提出来，于是就让人给安排好，趁着重耳洗澡的时候带着一群人隔着帘子偷看，这可就出大事了。

骀骀这种生理畸形对于日常生活恐怕有很大的影响，重耳也是深受其害，通常都不愿意示人。曹共公不顾及个人隐私，执意要偷看他洗澡，对于重耳来说绝对是极大的侮辱：在朝堂上看眼睛我就忍了，可你偷偷摸摸地看我洗澡，这事是说什么也忍不了的。你自己偷看也就算了，还带着女眷在一边饶有兴致地聊了起来，那就更不能答应了。偷窥事件发生后，重耳恼羞成怒，从此与曹共公结下了不解的仇怨，为他后来伐曹埋下了伏笔。

焉能尽礼

重耳过曹受辱的故事流传甚广，曹共公昏庸和僖负羁贤能的人设也已深入人心，不过要细细考察起来，如此鲜明的人设却未必符合实际。

春秋时期各国内乱不断，公子公孙流亡国外的事例屡见不鲜。尽管对于本国而言，流亡公子或许是负罪之身，但其他诸侯出于政治考量大都会为他们提供庇护。公子公孙的地位比普通大夫要高，在收容的同时还必须要按照相应的礼节和规格待遇为其提供便利。比如齐国，重耳刚到就要送出八十匹马作为见面礼，居留期间的吃穿用度，更是难以计数。这些常规的支出对于大国来说或许不是什么问题，可若是国家实力弱小，常年收纳流亡公子就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

不幸的是，曹国是个小国，而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却恰恰处于中原交通枢纽，这就意味着列国公子出亡大都会把曹国作为落脚点。长此以往，曹国人难免就会给自己算笔账：流亡的公子数不胜数，可经过流亡还能最终返国得位的只是少数。相比于收容这些破落户所付出的代价，收益微乎其微。既然不可能对每个公子都以礼相待，国人又没有慧眼识珠的本领，那么最佳的选项就是采取严格措施，对所有流亡公子一视同仁，从而让后来者望而却步。

正如曹共公在拒绝僖负羁的提议时所说的：“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谁不过此！亡者皆无礼者也，余焉能尽礼焉！”从本国立场出发，曹共公拒绝接纳重耳的理由非常充分，可受人之托的僖负羁却未必能把心态放平。

关于僖负羁，史料中留下的记载极其稀少，我们所能知晓的事迹也只有礼遇重耳这一桩。就是这一桩助人为乐的好事，便使僖负羁在千古留名的同时，也受到了后来成为霸主的晋文公的特殊关照。城濮之战爆发前，晋国攻陷陶丘，晋文公特别下令约束士兵，不得惊扰僖负羁的宅邸。与此同时，他还在曹共公面前为其抱不平，指责曹共公“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简直是昏庸透顶。

“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透露出了一个常被人忽视的信号：与卫国的宁速，以及重耳后来造访宋、郑两国遇到公孙固、叔詹这些在本国享有崇高地位的人不同，僖负羁在曹国并没有什么地位。

僖负羁是否真的贤能我们无法妄下定论，但当一个人地位卑微或者不受当政者重视的时候，其说话的分量自然也会被人看轻。曹共公既然在平日里都对他不理不睬，当他提出让国君会见晋国流亡公子的时候，其劝说自然也很难被采纳。更何况，曹国素有“不纳亡人”的国策，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曹共公也的确没有必要为一名素昧平生的流亡公子大开绿灯。

然而事实是，曹共公最后不仅见了重耳，还利用地主之便利闹出了一桩偷看别人洗澡的风波。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疑问：曹共公是如何得知重耳有骀胁特征的？又是谁给他提供的这些便利呢？

答案很可能正是被诤以贤能的僖负羁。

结合以上的疑问，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种猜测：

重耳一行抵达曹国四处寻找线人，却求告无门，最后只能勉强找到一个缺乏声望的僖负羁。僖负羁本人不受重用，也从来没有什么人高看过他一眼，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有位大国的公子寻上门来，给他奉上了价值可观的礼物，请求代为引荐。

人生中第一次受人重视，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的财礼，让僖负羁受宠若惊，于是他想都没想就欣然应允了。然而当他真正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却发现果真是千难万难，任凭他想尽了所有办法，恐怕就连他自己与国君见上一面都很难，更别说是忠人之事了。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正面路线走不通，他便只能另辟蹊径。或许是与晋公子相处得久了，对方放松了警惕，僖负羁无意间便窥见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于是便以此为路引，将这个信息透露出来以勾起曹共公的好奇心，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大概是曹共公偷窥时太过于放肆，让重耳感到出奇地愤怒，同时也让作为中间人的僖负羁感到十分为难，因而才在妻子的劝说下，以食盒盛装礼物向重耳赔罪。重耳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见此情景也不好发作，只好收下了食物，将其中的玉璧退还给了僖负羁，这件事也就这么了结了。

也就是说，僖负羁很可能并没有如人们所说的那般真的对流亡的重耳礼遇有加，反而是为了得到充当中介的好处给曹共公提供了方便，使得重耳在曹国受辱。

后来晋国伐曹之时，魏犇和颠颉在火烧僖负羁宅邸时曾说过一句话：“劳之不图，报于何有！”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不替有功劳的人着想，还报答个什么恩惠？”用以作为呈堂证供也算是恰如其分。可假如僖负羁人品本没有那么贵重，文公的优待也只是一种政治策略的话，那么“劳之不图，报于何有”这句话的指向，就未必是文公本人了。我们也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接受了他人的请托而不能忠人之事，这样的人有什么可报答的？”其中的逻辑同样可以自治。

君明臣贤

书归正传。

重耳一行离开曹国后，便直接扑向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宋国，并找到了大司马公孙固作为线人。公孙固对重耳同样盛赞有加，他说：“晋公子在外流亡十几年，自小就心性善良且不骄傲自满，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也从来不敢有所懈怠。跟随在他身边的人，如狐偃、赵衰、贾佗，或仁惠而善谋，或文敏而忠贞，或多识而恭敬，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公子对待他们谦恭有礼，遇事也总是虚心向他们请教，将来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国语》记载中各国中介人对重耳的评价大抵雷同，但侧重点却也是有分别的。在卫国和曹国期间，尽管也提到了重耳君臣的贤能，但更多的还是空泛地从“礼”的角度阐述，认为晋国属于文昭武穆的后裔，同为姬姓的国君应该善待这些亲戚。而从曹国离开之后，中介人劝说的重点就逐渐转向了对重耳以及随从的几位贤士的评价了。其中的缘由，

大概是伴随着晋惠公病情的日渐加重，晋国局势走向扑朔迷离，使得不少人开始重新评估重耳回国复位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则是重耳团队在齐、宋居住期间，其行为举止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从而也受到了更多重视。

重耳在宋国居住期间，正是泓水之战前夜，宋襄公正需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仁义，于是就按照齐桓公的标准，不多不少也赠给他二十乘的车马作为见面礼。但在帮助重耳归国的这个问题上，宋襄公却犹豫了，直到泓水之战结束，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重耳在宋国待了一段时间，目睹了宋襄公一步步地滑入深渊的全过程。泓水战败后，他确信宋国无力帮助自己复位，便开始琢磨着去寻求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将来的准霸主楚成王的帮助。但或许是为了避嫌，重耳在离开宋国之后又向西折返，专门跑了一趟郑国，而这一次，在自家的亲戚面前，他们又碰了一鼻子灰。

在郑国，他们托关系找到了叔詹作为线人。叔詹在劝说郑文公时，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上天要襄助的人，别人再怎么赶也是赶不上的。有三个征兆预示着重耳有可能成为晋国国君。第一，古语有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以同姓婚媾而生却能活到今天，必然有神相助。第二，如今晋国内政不宁，而他又经历过那么多磨砺，必定会有所成就。第三，在他的随从中，至少有三个人称得上是人中龙凤，他们才干突出却愿意跟随落魄公子四处流浪，可见这位君子必有过人之处。”

结合这三点，叔詹认为重耳必定能回国即位。即便是不考虑这些，晋国和郑国都是王室宗亲，先君在平王时期还有着夹辅王室的功劳，有公族子弟流落在外互相照应一下也是应该的。因此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郑国都应该对

这位公子加以礼遇。但彼时郑文公大概是被楚王送来的耳朵给吓傻了，时刻都充满了亡国的忧虑，根本没有心情接见他们。

相比于卫国的宁速和曹国的僖负羁，叔詹对中原局势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他担心重耳一旦得国会对郑国不利，于是就劝说郑文公，如果不能以礼相待，就一定要把他们杀掉。郑文公觉得这个建议是小题大做，一个流亡团伙能兴什么风作什么浪？便又拒绝了。几年后，郑国果然招来了晋国的讨伐，这恐怕是郑文公做梦都想不到的。

无以为报

重耳在郑国没能落脚，只好转道南下奔楚国而去。此时的楚成王在中原风光了一把之后，心情好得不得了，整日里喜滋滋地向周围的人讲述自己战胜宋国的丰功伟绩。听说晋国流亡公子来了，就兴致勃勃地把他请了来，以国君之礼来款待，席间又开始山南海北地讲了起来。

重耳毫不客气地接受了楚王的超规格礼遇，提前过了一把做国君的瘾。不过楚成王毕竟是正牌国君，他在主席台上夸夸其谈的时候，重耳还必须得装作很陶醉的样子随声附和。这番装腔作势让兴致正高的楚成王十分受用，宾主把酒言欢，一时间其乐融融。

不过话说回来了，重耳四处流亡可不是要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不是来喝你几碗酒、蹭你几碗饭的，言谈间便有意无意地做出暗示，希望楚成王能帮自己一把。

楚成王一听到这个马上就回过神来了。他也不立即作答，倒是反过来先问重耳：“如果有机会回到晋国承继君位的话，你想怎么报答我呢？”这句

话的用意很明了，送你回国也不是不可以，我大楚国青春鼎盛，如日中天，这么点小事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可在办事之前，咱们总得先谈谈条件吧？

重耳流亡将近二十年，心智谋略各方面都长进不少，唯一不变的就是始终不以国家利益作为交换条件。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何况，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所谓的国家城邑甚至百姓都是贵族的私产。两个大贵族之间做生意，你来我往是再正常不过的，还提升不到道德的高度。可重耳就是有这么一股执拗劲，跟葛朗台一样爱财如命，对于荣誉的重视也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始终不愿意向人低头。

当年正是因为重耳在秦国面前坚持绝不出让国家利益的原则，搞得秦穆公没办法跟他继续谈下去，才选择了支持夷吾，让他不得不流亡在外。如今楚成王提出要谈条件，也未必会有割让土地的要求，可能只是想让他低个头、服个软，回国后能尊楚成王一个盟主的名号。

只可惜，重耳终究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笃定自己一定会进取中原，因此坚持不肯投其所好。当楚成王一再追问的时候，重耳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楚国美女如云，玉帛珍器不计其数，鸟羽、牛尾、象牙、皮革这些稀罕玩意儿更是楚国的特产，天底下最珍贵的也就是这些东西了。楚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晋国物产匮乏，能用的都是楚国剩下的东西，实在没有什么能够用来回报你的，说起来真是惭愧啊！”

重耳这种不肯低头的性子，倒是很有君子的风骨，值得当代的学人好好学习，但作为当事人的楚成王可就不乐意了：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知道我想要什么！他表情严肃地再次发问：“这些我自然知道，可我还是想看看你的诚意！”

看到楚王的表情和说话的态度，重耳知道不能再绕了，稍作沉吟之后，重耳突然起身作揖，对楚成王说：“如果托您的福，我真的回国即位了，将来晋楚在中原相遇，我愿意退避三舍。如果还是得不到原谅，我也只能手执武器，背上箭囊，与君周旋了。”

这显然不是楚成王希望得到的答案，没想到重耳竟然这么不识抬举，硬是把他的好意搪塞了过去。

最后的谈话很不愉快，重耳因为执守信条，把唯一有意愿且有能力相助的楚国也得罪了，等于是把自己逼入了绝境。放眼天下，有实力的诸侯国就这么多，重耳已经走遍了所有的大国，终究没有找到真心愿意帮助自己的人：秦国因为重耳的不肯让步，已经多次把他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齐国、宋国虽对其颇为礼遇，可毕竟实力不济；郑、卫、曹这些国家，既没有能力，也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好不容易到了楚国，结果话不投机，眼看着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正当重耳百无聊赖地看着日出日落消磨时光，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突然从遥远的北方飘扬而至。这年（前637年）冬天，秦穆公突然派人到楚国来请晋国公子重耳到秦国一叙。这个消息就如同惊天的炸雷一般，惊醒了重耳，惊醒了狐偃、赵衰，也惊醒了楚成王以及楚国的大小贵族们。

第四节 终成夙愿

怀公乱政

这年（前637年）九月，重耳的弟弟，执政十四年的晋惠公夷吾，带着满身的伤痛和无尽的苦闷英年早逝，享年仅三十四岁。对于流亡多年的重耳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这其中唯一的变数在于，夷吾虽然去世了，却还有诸多子嗣在世，只要秦国还愿意继续支持，重耳就难以成事。可偏巧在这个节骨眼上，重耳的侄儿子圉，也就是晋惠公送往秦国做人质的太子圉，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重耳送来了一份大礼。

说起太子圉，还要先提一下他的身世。早年夷吾在郤芮的建议下出奔梁国寄居，让身处晋秦夹缝之中的梁人着实大吃一惊。梁国原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或许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接待过有着如此身份的人了，自是不敢怠慢。不久之后，梁君女儿梁嬴便奉命嫁给了夷吾，并为其生了一对龙凤胎，也就是后来的太子圉和他的妹妹公主妾。

这两个孩子名字的寓意都不是很好，“圉”专指的是养马的奴仆，“妾”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大户人家的奴婢。晋惠公尽管流落在外，但身为一名大国公子，当然不会为了好养活而故意给孩子起贱名，其中必有什么来历。

有好事者回忆起那段往事，说这两个名字是一次占卜的结果。当年梁嬴怀孕以后生产很不顺利，过了预产期很长时间还没有把孩子生下来，这让夷吾十分着急，于是便让梁国国君请来了卜招父和他的儿子为其占卜。二人神

神道道地算了半天，判断出梁嬴肚子里有一对“龙凤胎”，不过这两个孩子的命都不太好，男的将来会做奴仆，女孩儿会做奴婢。

晋惠公当时的处境艰难，对未来的预测十分悲观，于是就很实诚地给两个孩子分别取名圉和妾。这件事情不管真实与否，反正这两个孩子的命运的确不佳，太子圉后来到秦国做了人质，据说就连公主妾也随着到秦国做了奴婢。

按照晋惠公流亡的时间来算，从惠公流亡到公子圉入质秦国，前前后后也只有十年多的时间，因此公子圉彼时还只是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背井离乡客居他国，身旁既无贴心人照应，也无谋士献计献策，其中的孤苦可想而知。这段经历带给他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也为他以后的失国埋下了伏笔。

秦穆公大概也知道太子圉的不容易，又或许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仁厚的形象，继续巩固所谓的秦晋之好，在子圉入质后不久，便把自己的一个女儿怀嬴嫁给了他。秦晋两国在和约和联姻的约束下再次进入了和平期。

晋惠公十三年（前638年），泓水之战爆发的同一年，晋惠公突然病危的消息传到秦国，让身为质子的太子圉五内俱焚。他内心焦躁不安又毫无谋略，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赶快逃回到父亲身边，其他的事情——包括秦国的态度——早已顾不上考虑了。

准备逃亡之时，太子圉原本想带妻子怀嬴一同离开，可怀嬴却始终不肯。在告别的那个夜晚，她诚恳地回应道：“你身为晋国太子却在秦国受辱，这些苦衷我都知晓，你回国心切我自然也能够理解。可是君父让我嫁给你，是为了让你安心留在秦国，我不能完成君父的使命已经有过错了，又怎

么能跟你回去呢？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该走就走吧，我不会向父亲告密的！”

怀嬴不肯跟从，太子圉只好独自回国去了。这个举动恐怕免不了要遭受父亲一顿训斥。晋惠公布局这么多年，就是在为儿子的将来铺路，结果他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回来，定然会因此得罪秦国。可事已至此，即便是再送太子回去也无济于事，晋惠公只好把他留在身边。

惠公去世后，太子圉即位，是为晋怀公。由于缺乏威信，又担心有人会跟流亡者暗通款曲，因此一上台他就下达了一条命令：凡晋国贵族，一律禁止跟随逃亡在外的公子。他还规定了一个时限，随同流亡的人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回国都可以免罪，否则就绝不宽赦。

这条禁令显然是冲着重耳来的。我们知道，晋献公屠杀桓庄之族，导致晋国公族枝叶凋零，已经没有了旁系的君位竞争者。晋献公共有九个儿子，其中太子申生受诬自杀，其余有六个被驱逐出境，国内仅剩的两个幼子也死于里克之乱。被驱逐出境的六个人当中，除了夷吾回国夺取了君位之外，包括重耳在内的其余五人都一直在外流亡。而根据《国语》引述郑国大夫叔詹的说法，在这十几年中，另外的四个也音讯全无，如今公室子弟尚且在世的就只剩下了重耳一人，怀公所指的“亡人”便也只能是他的伯父重耳无疑。

然而，晋怀公即位之时内无强力辅佐、外无可靠后援，使得国内局势阴晴莫测，没有人愿意表明态度，果然过了期限之后还是没人响应号召。晋怀公惊恐之下选择了孤注一掷，对反对势力展开了大清算，其中就包括重耳的外公狐突。

狐突是晋献公妾室狐季姬的父亲，也是狐氏大戎中有地位的贵族。晋献公与狐氏大戎和亲之后，他也随着自己的女儿来到晋国为官，并带来了自己

的两个儿子，分别是狐毛和狐偃。据《左传》的说法，二人均随重耳在外流亡，不过依照《竹书纪年》的记载，重耳回国之时，曾有狐毛、先轸出兵相拒，似乎身为宗子的狐毛并未外出。但不管事实如何，这对怀公而言都是不能容忍的，因而特别要求狐突将儿子召回国内，岂料遭到了狐突的断然拒绝：

“自古以来，儿子出仕之前，父亲都要教导他们忠于自己的主君，一旦策名委质成为人臣，就不能三心二意。如今我的儿子已经侍奉重耳多年，若要将其召回，岂不是要让他抛弃为臣之道吗？若果真如此，就算是他们回来了，您难道会愿意任用这种不忠不义的臣子吗？如果您执意滥用刑罚以图快意，举国士大夫皆有死罪，狐突不敢贪生，请君自便吧！”

狐突作为一名百岁老人，诚心诚意地讲了这么多大道理，怀公却是一句也没听进去，还是坚持斩杀了狐突。此举使得人心更加离散，不少原本保持中立的人也开始反对他，这些都加速了他灭亡的步伐。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秦国入侵，晋怀公还对秦国采取了强硬态度，特别加固了黄河沿岸的防御措施。秦穆公本来就因为太子圉不告而别而恼火，如今看到晋国的针对性措施，更是下定了决心要教训他，于是便有了征召重耳入秦的举动。

生死一线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重耳在楚居留期间，楚成王自是有所耳闻。不过，考虑到重耳在楚时所表现出的执拗和倔强，楚成王大概以为秦穆公不会将其列为扶持晋君的首选，因而也没有太在意。孰料局势变化让人眼花缭乱，这么一个不招人待见的流亡公子突然成了宝，这可叫怎么回事？

楚国贵族因为这件事情吵成了一团。以令尹子玉（成得臣）为代表的一派坚决不肯放人，甚至还要求楚王把重耳杀掉。或许在他们看来，诸侯列国的公子王孙能够以谦卑的姿态周游列国且事事亲为的，重耳恐怕还是第一人。如今他在外流亡多年，备尝人生百味，对各国政局都有详尽的了解，一旦成为一国之君，对于楚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楚成王也深知此理，但却不敢动手。重耳团队从一开始就很注重形象的打造，无论是重耳本人，还是团队的其他核心成员，都有着非常明晰的个人形象，且具备很多当时为世人所推崇的美德。有着如此良好的口碑，诸侯就算是心里不买他的账，表面上却要一力地支持有着如此美德的君子，这种压力让楚成王想杀却又不敢杀。

在去年的泓水之战中，他就吃过这种亏。由于宋襄公善于做宣传工作，临死前还摆了他一道，用仁义道德给楚国挖了一个坑，其结果是楚国虽然胜了，却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楚国虽然强大，要想进取中原，却不得不按照规则行事，不能肆意妄为，这也是中原强势文化给楚国带来的压力。如今面对一个一无所有却带有“主角光环”的流亡公子，强大如楚成王也无可奈何。

更何况，在楚成王看来，如果楚国注定无法征服晋国，“那也是自己修为不够”，就算是杀掉重耳也无济于事。“假如上天不想帮助楚国，杀了一个重耳，难道晋国就不会有更贤明的君主了吗？”反过来讲，如果上天愿助我一臂之力，就算是再多几个像重耳一样的人，也不会改变这个结果，杀他岂不是显得多余了？所以还是顺其自然吧！

楚成王的一席话展示了一名王者的雍容气度，也体现出了一种超脱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朴素群众史观。可子玉却总是计较于一时一地一人的得失，始

终放不下心里的疙瘩。于是他便退了一步，说就算是不杀重耳，最起码也要把狐偃留下。他狐偃就是重耳团队的核心运营者，失去了狐偃就等于让重耳失去了主心骨，还能让他以后在面对楚国的时候投鼠忌器，从而降低威胁。

楚成王何尝没这么想过，可狐偃也是一个带有多重光环的君子，又岂是他们能够留得下的。因此他说：“如果明知有错还要加以效仿，那就是错上加错了，这不符合礼啊！”思虑再三，楚成王实在不敢再四处树敌，于是便以重金馈赠重耳，同时派兵护送他到秦国，以对秦晋两国表示亲善态度。

这段时间里，重耳和他的随臣们也都捏了一把汗，生怕楚王逞一时意气把他们给杀了。即便是听闻楚成王已经同意派兵护送，一路上也是战战兢兢，丝毫不敢松懈，生怕中途出现变故。直到离开楚国地界被秦军接到了，这些提心吊胆的流浪者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这场博弈当中，不仅仅是重耳和他的随从，就连晋国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秦国一心想要废掉晋君子圉，而若是重耳也在楚国遇害，晋国的君位继承就成了问题。如此一来，晋国要么会面临被吞并的命运，要么会陷入公族内战的旋涡，这也是晋献公大刀阔斧清除公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首次得到体现。

秦楚两国围绕晋国君位的博弈，最终使得重耳能够躲过劫难并回国即位，这其中不能不说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历史就是这样，危难和机遇总是并存的，多年历练终究让重耳变得更加智慧，重耳即位也让晋国从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婚媾怀赢

流亡团队到达秦国之后，秦穆公为安抚重耳，一口气送了他五名宗室女子，其中就有被晋君子圉留在秦国的妻子怀嬴。起初重耳并不知道怀嬴的身份，只是把她当作一般的媵侍看待，谁知就因为这一时的疏忽，差点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话说有一天，怀嬴捧着盥洗的器具在一旁伺候重耳洗脸。重耳常年在外流亡，生活环境与宫廷有很大差异，因而许多礼节都已经生疏了。这次，他还像往常一样，在简单盥洗之后习惯性地甩了甩手，一不留神把水甩到了怀嬴的身上。

怀嬴被子圉抛弃，本来就心情不悦，如今捧着毛巾伺候人，不但没有得到体谅，反而被甩了一身水，便感觉重耳是在嫌弃她，于是就生气地质问道：“秦晋两国实力相当，你凭什么看不起我？”说完就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重耳看这姑娘脾气这么大，心想来头一定也不小，八成是回去找秦穆公告状了。为了抢得先机，也顾不得体面，赶紧脱去上衣，袒胸露背去向秦穆公请罪。

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秦穆公原本没有曹共公的好奇心，此刻却毫不费力地就看到了重耳重瞳骀骀的异相，心中惊讶不已，急忙说道：“寡人这几个闺女当中，数这个孩子最有才干了。子圉抛弃她之后，寡人本来想把她嫁给公子你的，可又担心让公子背上恶名，只好让她做你的媵妾，没想到还是有了疏漏！寡人对公子是很重视的，让公子受辱实在是寡人考虑不周。想如何处置这个孩子，就全听公子的了！”

重耳这才知道，原来伺候自己的女子是侄子晋怀公的妻子。重耳本想把她退回去，可这个想法刚冒出来，随从的那帮人就炸锅了。

其中一个随臣名叫胥臣的，是一个崇信天命德行的神秘主义者，他以为重耳是担心自己与侄子德行犯冲，就长篇大论进行了一番推演，最后告诉重耳：“你和子圉如今就是路人，娶他舍弃的人，以成就返国的大事，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些话也不知道重耳有没有听进去，反正心里就是不乐意，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舅舅狐偃。狐偃是个坚定的实用主义者，说话也简单粗暴，他反问道：“你都要抢你侄子的国君之位了，娶他的妻子又算得了什么？只要秦国愿意帮助我们，他给什么你接受就是了！”

话糙理不糙，可重耳总还是觉得别扭，于是又把目光投向赵衰。赵衰先抛出了理论依据：“《礼志》有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

其大意是说：我们有求于人，就要先接受别人的请求；想要得到别人的爱，就要先付出自己的爱；要想让对方满足自己，就要先满足对方。对别人没有恩德，又怎么好意思让别人帮助自己呢？

继而他又补充道：秦国现在想联姻，你接受他们的好意，可以拉近感情。这么好的事就怕办不成，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赵衰的话道出了其中的利害，也让重耳感到脊背发凉：事关重大由不得推辞！秦穆公故意把怀嬴送给重耳，其中本就有试探的意思，假如不接受其好意，返国的大事恐怕就又谈不成了。

慎重权衡之后，重耳不仅欣然接受了这个侄媳妇，还郑重其事地向秦国下聘礼，大张旗鼓地以正式的婚仪迎娶怀嬴。这让从姐夫升格为老丈人的秦

穆公感到十分满意：看来重耳这孩子虽然抠门的习性没怎么改，可在待人接物上终究还是长进了不少啊！

朝堂歌礼

既然重耳接受了怀嬴，表达了诚意，双方也就有了继续合作的基础，秦穆公于是就以国君之礼设宴款待重耳。重耳很看重这次宴会，赴宴前特地要求舅舅同自己一同前往。考虑到宴会上可能有赋诗的环节，狐偃建议重耳携更有文学才华的赵衰随行赴宴。

在第一天的宴会上，秦穆公就对大夫们强调了“五耻”的原则，也就是“以礼而不终为耻、以中不胜貌为耻、以华而不实为耻、以不度而施为耻、以施而不济为耻”。

这席话一方面是在奉劝国内仍存异议的大夫，既然已经决定了要扶植重耳为晋君，就不能有始无终、敷衍了事。另一方面也是在向重耳传达一个信号：既然我国要助你夺位，就肯定能成功。这五耻的原则，不仅仅秦国人要遵守，你回国之后也要遵守，可千万不要学你的弟弟，要不然你老丈人可是会翻脸的哦！

第二天的宴会上就有了赋诗言志的环节。宴会开始，秦穆公首先赋了一首《采芣》。这首诗本来是王室公卿对于诸侯朝见天子时盛况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对来朝诸侯的赞颂和仰慕之情。秦穆公自比王室公卿，而把重耳比作朝见天子的诸侯，其中用意不言自明。赵衰在一旁和道：“国君以天子接待诸侯的礼遇来接待重耳，重耳怎敢有苟安的想法，又怎敢不下堂拜谢呢？”重耳依命下堂拜谢，秦穆公也降阶与重耳对拜。

两人对拜之后，返回座席，赵衰让重耳赋一曲《黍苗》来回应。这是一首底层的徒役赞颂召公营建谢邑、安定王室的诗歌，在如今的场合则是来颂扬秦穆公平定西戎、辅佐王室的功劳，很有拍马屁的味道。同时，诗中的第一句“芄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则是借召伯劳师的故事，表达了对秦穆公帮助自己归国的殷切期盼。

重耳赋完之后，赵衰和道：“重耳对秦君的仰望之情，就犹如久旱的禾苗盼望甘霖一般。若是托贵国的福，让重耳这棵小禾苗长成丰收的嘉谷，并奉献给宗庙，必当感激不尽！秦君能够继承先祖的遗志东渡黄河，振兴王室，也是重耳所热切期望的！”

接下来赵衰又进一步说：“重耳能够受秦君恩赐，享有封国成为晋民之主，一定会对秦君您言听计从。只要秦君能够放心地任用重耳，四方诸侯还有谁敢不听从您的号令呢？”

赵衰把扶植重耳归国的事上升到了王道霸业的高度，让秦穆公不由得骄傲了起来。但他还是很谦虚地推辞说：“这是天命要授予公子君位，寡人不敢专天之功。”于是又赋了一首《鸛飞》。这首诗取自《小宛》之首章，以怀述祖先、思念父母之意，表达了自己对晋国内乱兄弟相残的旧事，以及重耳流亡多年经历的深切关怀。诗中还有“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句子，表示自己作为往日的姐夫、今日的岳父，同时也是伯舅之国的君主，愿意像蜾蠃一样照顾重耳和他的国家。

重耳赋了一曲《沔水》作为回应。这首诗据说是作于平王东迁之后，诗人看到天下祸乱不息、豺狼当道，心中忧虑，故愤而为此诗。重耳借诗之境，表达了对乱世之中礼崩乐坏、危机四伏的担忧，其中的愁苦郁积胸臆、无人诉说，因此愿意与秦穆公一道，或者说是愿意辅助秦穆公一起扫荡天

下，还万世太平。诗的首句“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则是再次强调了自己将来会服事秦穆公的意愿。

秦穆公一听心潮澎湃，于是赋了一首《六月》。这首诗讲述的是周宣王征伐玁狁的事迹，正在农忙时节，贵族们整顿好军马随时准备出击讨伐戎狄，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战胜戎狄最后凯旋。秦穆公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天下纷乱不可怕，我已经整顿好军马，随时准备送你回国，这次的行动也一定会成功的！

赵衰听到这首诗，知道大事已定，于是提醒重耳拜谢，重耳施礼已毕，秦穆公下堂辞谢。赵衰这才赞道：“秦君把辅助天子、匡正诸侯的使命交付给重耳，重耳怎敢不遵从有德者的号令呢？”这场宴会就这样在重耳和秦穆公互相行礼的热烈气氛中宣告圆满结束。

终成夙愿

夏历十一月末，秦穆公整顿大军，护送着重耳直抵王城，进据黄河西岸。在将要渡过黄河时，这群流亡十九年的游子，望着河上忙碌的渡船和对岸熟悉的土地，不由得热泪盈眶：那个让他们心心念念盼望了十九年的光辉时刻，终于到了！他们为能够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而欣喜若狂，为坚守多年的梦想终将实现而涕泪沾巾，也为将要享受的荣华富贵而心生忐忑。

正当众人涕泪交加之时，狐偃却不合时宜地拿出一块祭祀用的玉璧交给重耳，说：“臣跟随国君舟车劳顿、巡游天下，所犯下的过错实在太多了。这些罪过我狐偃心知肚明，国君又岂能不知？臣不想因此而死，请国君允许臣离开吧！”

重耳听了之后赶紧把他扶了起来，劝慰道：“我定能与舅舅同心同德，就让河神作为见证。”随后把玉璧投入河中献祭给河神，以明心迹。

当重耳即将返国的消息传回晋国，国内贵族的情绪也被调动了起来，比如专职占卜记史的董因便一早来到黄河岸边相迎。渡过黄河之后，秦国大军围令狐（今山西临猗县西部），入桑泉（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东北）、攻臼衰（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西北），三城将士都未做抵抗，直接举了白旗。腊月初四日，惊慌失措的晋怀公紧急调派狐毛和先轾驻军庐柳（今山西临猗县北）御敌。

但晋怀公或许忘了，狐毛是狐偃的哥哥，而他们的父亲又刚刚因不肯征召狐偃回国而被杀，在如此紧要关头，狐毛又岂肯全力御敌？比较难缠的是先轾。依照后来的表现，先轾对秦国似乎总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抵抗秦国入侵的态度也相当坚决。为了说服先轾，秦穆公派公子絳前往庐柳，与其举行会谈并晓以利害。经过公子絳以及狐毛的一番苦劝，先轾与秦军交换了一些条件，这才同意对方进据郇地（今山西临猗西南）与己方结盟。

夏历腊月十一日，狐偃携部分秦国大夫前往郇地，与先轾、狐毛以及其他晋国大夫盟誓，宣布效忠重耳。十二日，重耳也抵达郇地，接管了前来抵御的晋国军队。大概是公子絳与先轾有言在先，秦军推进的步伐也到此为止，两天之后，秦穆公如约启程回国，之后所有的事务就都是晋国内部处理了。十二月十六日，重耳带领军队进入曲沃。

在秦穆公护送重耳回国的同时，周朝也派出了太宰文公和内史兴前往晋国，代表王室来行册命之礼。重耳派上大夫到边境迎接周朝使团，自己也亲自到郊外慰劳天子使臣，并将其安置在宗庙住宿，用九牢也即上公之礼招待他们。

一切工作安排妥当，人们便开始为就职典礼做准备。十二月十七日，武公的宗庙里一片肃穆庄重的气氛，正中摆放着晋献公的神主牌位，所有的大夫都站立两侧，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庄严时刻。随着内史兴的一声呼号，周朝太宰代表天子亲自主持即位典礼，为重耳加冕。按照不成文的约定，重耳免不了要三辞君位，臣子们也都再三相劝。在众人一致的拥戴之下，他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君位，并涕泪交加地发布了即位诏命，正式成为晋国的君主。

从这一刻开始，让晋国走上辉煌巅峰的晋文公时代，终于拉开了帷幕。

第六章 周礼保守主义的复兴和晋文公改革

第一节 危机四伏

火烧公宫

公元前636年，在夏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在外流亡达十九年之久的重耳终于回国即位，并于五年后在城濮一战成名，成为开创晋国霸业的一代雄主。但正如他的弟弟惠公即位之初面临里克、丕郑的威胁一样，重耳回国初期的日子也不太平。就在他即位刚满一个月的时候，就差点死于一场蓄意制造的宫廷大火，而制造这场火灾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惠公的左膀右臂——吕甥和郤芮。

吕甥的本名据说叫“饴”，字子金，因为封地在吕，又是国君的外甥，习惯上将其称作吕甥（这与狐偃是重耳的舅舅而被人称作“舅犯”是一个道理），在一些史料（如《史记·晋世家》）中，又被称作吕省。除了有这两个常用名之外，他还有一些拗口的名号，比如吕饴甥、瑕吕饴甥、阴饴甥、瑕甥。之所以有那么多名字，与他有着众多的封邑是分不开的。

在春秋早期，一个人拥有多个封地还是很稀罕的事情。我们知道，在里克发动政变之后，吕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夷吾，与郤称一道在国内为夷吾回国事宜进行运筹。后来竞争陷入僵局时，也是他第一个提出要请秦国介入晋国事务，为惠公的顺利即位提供了便利。惠公兵败被俘之后，是他在国内主持日常事务，并与惠公派来的郤乞一道筹划“朝国人大会”，提出了“作爰田、作州兵”的政策；是他主持了与秦国的谈判，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晋惠公的性命，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晋国。因为有着如此卓著的功勋，吕甥后来又得到了瑕、阴（献公时还曾受封夏阳）等封地——这诸多的封地就像是一个又

一个军功章，让吕甥自豪不已，同时也羡慕旁人，人们有时会把这些封地连缀起来称呼，于是才有了那些拗口的名字。

惠公的另一个重要心腹郤芮（字子公），也是一个拥有众多封邑的超级富豪，其所在的郤氏家族，更是当时少见的豪族。

关于郤氏的由来，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出自曲沃代翼时期的晋鄂侯之后，因鄂侯之名而立为郤氏。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依据，人们更多的还是认可以地名得氏的说法，而其封地还要回溯到献公时期的郤叔虎（不少史书中又将其称为郤豹）。由于他既善于察言观色，又智勇双全，在讨伐狄祖国的战役中立下功勋，因此受封于郤邑。或许是因为郤氏家教出色，献公去世之后，整个郤氏家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先后涌现出一大批风云人物。

比如惠公的近臣郤乞，在韩之战后随晋惠公在秦国做了一个多月的俘虏，且在最危难的时候被委派回国与吕甥密谋争取国人的支持，足见其在惠公班底中的重要地位。郤义的儿子步扬，在韩之战中曾担任惠公的御戎，因军功被封到步邑。这二人的地位已经极其尊崇了，可要与郤芮和郤称比起来，仍逊色不少。

郤芮、郤称大概早在惠公幼时就已经策名委质成为公子家臣了，当十几岁的惠公受申生牵连流亡国外时，郤芮也紧紧跟随，其地位可以类比重耳团队中的狐偃。郤称虽没有从亡经历，却时时刻刻都在国内为其主君密送消息，为其归国细致谋划、扫平障碍。里克之乱爆发后，又是他和吕甥一起第一时间密派蒲城午去梁国送信，使得惠公在内部局势不利的情形之下，仍然能够顺利夺位。

晋惠公在位的十几年间，包括吕甥、郤芮、郤称在内的“三剑客”，凭借其忠心与智谋，成功地晋级为执政集团的核心成员。也正因如此，丕郑在策划驱逐惠公时，才将他们三人列为重点清除对象。

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这三人的生死荣辱从一开始，就是与惠公紧紧绑定在一起的，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流亡归来的晋文公做到真正地顺从。晋文公回国后不久，怀公自知大势已去，便一路向北逃到了高粱，不久后被人刺杀身亡，更让他们感到万念俱灰，不惜一切要与新君拼个鱼死网破。

晋文公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晦日），吕甥、郤芮趁夜举兵包围公宫，放火焚毁了宫室。然而让他们惊讶的是，这次的举事竟然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公宫的卫士全都人间蒸发了，在熊熊的大火之中逃出来的，也只有少数的宫女和寺人，根本就没有国君的影子！

二人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急忙抓了一些宫人进行审讯，这才得知国君刚在不久前潜行出宫，于是火速带兵沿着大路追赶。追到黄河岸边时，倏然看见漆黑的河面上，正有一叶扁舟仓促地向对岸划去，便顾不得可能会引发的外交争议，命令全体士兵渡河追击。

二人刚刚渡过黄河，便猛听到一阵喧闹，刹那间四周火光冲天，将这几百人的小队团团包围。吕甥和郤芮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就被扑上来的秦国军士给控制住了。

他们被带到了王城，这才发现他们所要追杀的国君，正在大殿上悠然地看着自己。吕甥、郤芮自知已是难逃一死，便也无所顾忌，他们咬牙切齿地问道：“你是如何知晓我们的计划的？”

纳投名状

正如当年惠公除掉丕郑时，利用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屠岸夷一样，在吕甥、郤芮图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们的阵营中也同样有一位重要人物向敌人递了投名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递投名状的不是别人，正是屡次陷重耳于危难的杀手——寺人披。

提起寺人披，想必大家都已经不再陌生，他与晋文公之间曾有过两次不愉快的经历。有过两次被追杀的经历，重耳一听到寺人披的名字就忍不住头皮发麻，即便如今已贵为国君，听说此人求见，心里仍是咯噔一下。

晋文公拒绝接见他，还派人在寺人披面前把之前的那些个事儿都数落了一遍，最后训斥他说：“在蒲城被你砍断袖子的那件衣服还在呢，趁国君还没治罪，你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重耳本以为寺人披听了之后会灰溜溜地逃走，谁知他竟是振振有词：“臣还以为国君此次返国，也该懂得为君之道了。如果还没有懂，恐怕您又要遇到灾难。自古以来，臣子对待国君的命令都不应该有二心，国君想要除掉什么人，臣下当然要尽力而为。无论是蒲人、狄人，还是当时身处蒲城、狄国的国君您，跟我有什么仇怨？无非是在位国君的隐忧罢了！我所效忠的只有君命，现在您就是我的国君，难道您就没有避居外的敌人了吗？齐桓公不计较射中带钩的旧事，任用管仲辅佐自己，最终才能成就霸业。如果国君还计较这些事，那都不用劳烦您动口，臣下自己会走的。只不过，离开的可能就不止我这样一个受过刑的小臣了！”

晋文公从这些话里品出一些味道，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于是急忙延请寺人披入内。寺人披也递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投名状，也就是吕甥、郤芮火烧公宫的计划，让晋文公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

惠公即位时，有里克、丕郑权倾朝野，如今的晋国同样有吕甥和郤芮把持朝政；与里、丕之党遍布朝野的局面相似，吕甥、郤芮在惠公一朝也积累了丰厚的资源，使其有足够的资本与国君抗衡。

晋文公与晋惠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秉持着父亲的集权思路，意欲打造一个君主集权制的国家，但两人采取的手段不同。

尽管早在回国之前就对吕甥和郤芮心存芥蒂，晋文公却并不想贸然以国君的权威将二人杀掉。他在国外流亡多年，目睹了晋惠公和秦穆公斗法的全过程，这些鲜活的事例让他认识到，做任何事情，仅仅依靠自身的道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斗争策略和宣传工作结合起来。当身为吕、郤集团核心成员的寺人披出面检举时，以谋逆的罪名杀掉二人并不是什么难事，可这样做却很可能给敌人留下攻击的把柄——当年惠公斩杀庆郑而遭人非议的故事便是前车之鉴。晋文公最终选择了郑庄公处理共叔段时所采取的策略：养寇自重，让他们自掘坟墓。

在得知吕、郤行动的具体时间后，晋文公便提前与秦穆公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行动之前就悄悄地溜出宫去，给吕、郤留下了一座空城。一旦吕甥、郤芮将火烧公宫的行动付诸实施，就等于是坐实了自己的罪名，国君处置叛臣也就有了真实的依据。这个时候，晋文公便一路撒下鱼饵，诱使吕、郤带兵追至王城，从而借道德上的“圣人”秦穆公之手将二人斩杀。

这一系列的动作干脆利落且不着痕迹，显示出了经过多年流亡的晋文公如今老谋深算的一面。尽管他想做的事情与晋惠公毫无二致，可由于策略得当，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也让那些准备借题发挥的人无话可说。而秦穆公亲手为晋国摆平了内乱，更是增进了秦晋两国之间的关系，使得“秦晋之好”更上一个台阶，也为晋文公进取中原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物是人非

吕甥、郤芮的叛乱虽然得以平息，可由此带来的心理震撼却迟迟无法抹平，每每看到那片宫室的断壁残垣，晋文公总是心有余悸。回想起这十九年来的经历，刚刚回到故乡就遭遇一场生死考验的重耳，难免也会如贺知章一般，产生一股无法抑制的感伤之情。当年离开晋国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尽管父母皆在高堂，却不得不带着童年的记忆走上流亡之路。一朝回归故乡，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如今的他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了，过去的记忆正伴随着风沙慢慢消逝。年少时崇敬的师长已然谢幕，熟悉的面孔都已老去，孩提时无拘无束的玩伴，如今却都随着地位的变化而生疏起来。即便是自己的亲舅舅——狐偃的哥哥狐毛——面对这么一个阔别多年的外甥，也很难说会有多少亲切感。

十九年的时间足以冲淡他原本稀疏的人际关系，而过去晋惠公的铁腕手段更是对其党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变故之后，如今能够在国内呼风唤雨的权贵、掌握着大量土地财富的各地领主、手持干戈警护宫廷的卫士，都变成了重耳无从交心的陌生人。大夫们虽说也都愿意向他效忠，可终究还是谈不上有什么过硬的交情，甚至有的人还会因为再次引入秦国的力量而产生不满，这就使得他很难获得国内居守贵族无条件的支持。

何况，与通常父死子替或兄终弟及的传统权力传递模式不同，晋国君位从晋惠公传递到晋文公的过程类似于一场革命，是一场敌对势力之间的权力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观念，都会让那些在惠公时期发挥了作用的人，在看待这位新君的时候产生不同的观感。

对于那些过去站在惠公立场上与重耳为敌的人来说，新君的即位本身就是对他们人身安全的一种威胁；对于在惠公时期得势而获得封地和高位的人来说，君位的更替和职位的调动都可能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可以这么说，那些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的人，即便能够做到毫无二心，可在君主制的权力结构下，他们的权势天然就是一种错误。

人心难测，在不断延伸的猜疑链上，不仅国君会猜忌大夫，大夫也会对国君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就算是不偏不倚的中间力量，也难免会因为各种原罪与国君暗中较力。这种莫名其妙的猜忌让国君与国人之间总是隔着那么一层厚厚的屏障，这不仅让晋文公寝食难安，更让国人倍感压抑，这恐怕也是吕甥和郤芮在迎回新君之后又选择叛乱的一个显著因素。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晋文公即位初年的一个奇特景象，朝堂上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却是风起云涌。人们日日如常地穿梭于封地与朝堂之间，神经却时刻紧绷着，以应对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意外。这种局面之下，晋文公究竟该作何打算呢？

社稷之守

寺人披的突然造访，在挽救了晋文公生命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好处。不久后人们便发现，那个曾经让国君恨之入骨的寺人披，非但没有被新君问罪，反而比以前更加威风了，这可羡煞了旁人。

晋文公对寺人披的既往不咎，与刘邦称帝之后特意将自己最痛恨的雍齿封侯的做法颇有些类似。这个举动无形中给那些有原罪的大夫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君连这样一个数次欲置自己于死地的对手都能不计前嫌，那还有什么样的过错是不能饶恕的呢？这其中感触最深的恐怕非竖头须莫属了。

竖头须早年也是重耳流亡团队的一员，曾担任“会计”兼“仓库保管员”的职务。重耳在狄国遭遇寺人披刺杀，众人四散奔逃，竖头须也与大部队走散。后来大概是看到复国无望，便“窃藏以逃”抛弃重耳，从而将整个团队推入了危难境地。竖头须的所作所为，对流亡团队所造成的伤害，与其他人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自然也就显得尤其可恨。

当晋文公回国即位的消息传来，竖头须便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不知自己会以何种方式结束这凄惨的一生。以往的那些贵族子弟犯了错，若是无法在国内立足，都会选择流亡国外，他国公室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往往也会收容他们。可竖头须就不同了，他的身份是寺人，也就是宫中的宦官、贵族的奴仆，一旦得罪了主子根本就没有退路。好在晋文公回国后事务太过繁忙，无暇跟一个微不足道的寺人找晦气，让已知必死的竖头须又苟延残喘了些许时日。

竖头须在无尽的煎熬中度日如年，我们可以想见，当他听说了寺人披的事情，是多么欣喜若狂。尽管他没有投名状，还是想效仿寺人披，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竖头须进宫的时候，晋文公正在仆人的服侍下洗头发，听说竖头须想要觐见，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心里说：你不来我倒差点把你给忘了，当年就是因为你窃藏以逃，差点将我饿死在深山里！你不快去逃命，竟然还好意思觑着脸来见寡人？他当即让人出去回绝竖头须，说寡人正洗头准备睡觉呢，没空见你！

竖头须说：“洗头的时候人心就倒过来了，心倒过来想法也就反了，难怪国君不肯见我。跟随流亡鞍前马后伺候国君的那些人，固然是有功之臣要

加以封赏，可留在国内的人守护社稷，又有什么可怪罪的呢？身为国君却跟我一个小人物为仇，很多居守之人会因此而感到害怕的啊！”

竖头须这一席话可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为了稳定人心，晋文公立刻接见了竖头须。

第二节 问诊国策

寻问根由

春秋早期的中原大地就像是一个丛林社会，在这个被孔夫子痛心疾首地形容为“礼崩乐坏、纲纪不存”的混乱时代里，以臣弑君、以子弑父的人间惨剧屡见不鲜，兼并灭国的事件层出不穷。孔夫子敏锐地觉察到，天下之所以会陷入混乱，归根结底是权威的缺席和规则的缺位，于是便寄希望于重塑天子权威来恢复秩序。但以宗法为纽带的周礼秩序，是一个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不稳定结构，其底层的结构一旦崩坏就很难重建。

制度的崩坏总有其内在的逻辑，宗法秩序的崩坏，实际上早在其创制之初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我们知道，周王朝的建立本身就是以下克上、以臣弑君的结果：本是商王朝属国的周部族，趁着淮夷兴风作浪之际，一举灭掉了商朝并取而代之，实现了华丽变身。

但当周部族的首领变成了周天子，他们过去的创业故事就变成了前车之鉴，特别是在经历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之后，防患于未然、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就成了周王朝执政者心中的基本方略。

在西周立国早期，在周天子中央权威和礼乐制度的约束下，诸侯国的规模都十分有限。比如，在早期晋国周边不出百里的区域内，就密密匝匝地分布着十几个大小不等的诸侯国，每个诸侯国统治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与我们今天的一个县或一个乡镇不会相差太多。

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是十分和谐的。我们可以想见，当一个国家的体量仅维持在一个乡镇规模时，人们较容易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到了丰收的季节，所有人一起庆祝；遇到了天灾人祸，所有人聚在一起祭祀祷告；国家承

平之时，所有人都能共享太平盛世；有了外敌入侵，所有人都会拿起武器一起战斗。

在这样的国家里，上至国君，下至庶民，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差距也不会太悬殊。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相识，国人是郊外田野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国君就是在村口大槐树下叼着烟斗的老村长。放羊牧马的人们赶着牲口回家的路上，或许还会特意到国君的门前遛遛弯，聊一些家长里短，道一些飞短流长。人与人相处免不了会有些磕磕绊绊，通常情况下也不过是拌拌嘴、抬抬杠，如果实在是冲突双方火气太大动了手，到了国君面前一样能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化解。

然而，这种如田园牧歌式的恬静生活，在气候的剧烈变化面前开始瓦解。于是很快人们就发现变天了，粮食开始歉收了，北方的“戎狄”也如潮水般涌来，原本仰仗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天子，如今也如丧家犬一般东奔西跑。人们只好自发地组织起来，与周边的村落、国家一起结成联盟，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守护辛苦耕耘的成果。

这场气候的剧变激发了人们的自觉意识，但也无声地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了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天灾人祸的接连打击之下，周王的权威渐渐丧失，直到骊山的烽火彻底摧毁了天子身上的光环。与此同时，在与“戎狄”的斗争中也产生了一大批野心家，他们不再满足于小国寡民的状态，不再满足于做个叼着烟斗的老村长。为了更加有效地动员地区力量抗击外敌，也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兼并周边国家，从而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区域性政治实体。

当气候转暖丰沛的雨季再次来临，卸下戎装的人们却恍然发现，从前的一切都回不去了。原本小国寡民的均和状态遭到严重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一

个又一个如巨无霸一样的超级国家。国土面积的急剧扩张和人口的暴增，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在制度层面上，传统的国家机器无法对如此大规模的土地进行管理，使得过去以“井田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开始衰败。旧制度衰败了，新的制度却一直未能确立，这就给各国内部管理带来了不少的混乱，从而为内部冲突埋下了祸根。

在经济实践中，国家规模扩大带来的另外一个效应，便是贫富分化的骤然加剧，以及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由于不同的贵族在军事征服过程中表现不一，其获得的封地面积也异常悬殊：对于那些功勋卓著的大夫，国君经常会把新征服的国家打包进行封赏；而贡献不那么突出的，则要么费尽心思讨到一两个邑沾沾喜气，要么就是守着祖上留下的一亩三分地勉强度日。

同样是公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出现了有人富可敌国，有人披头跣足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流转，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被慢慢放大，不可避免地激发了人们的不平衡心理，浮躁和焦虑的气息开始在整个中原蔓延。

政治上，那些刚刚掌握了千里沃土的新兴诸侯，面对过去难以想象的广袤疆域，难免会像一夜暴富的土豪一样内心膨胀，将调整各阶层关系的周礼秩序破坏殆尽。国君不再严格遵守周公所制定的继承制度，变更储君的做法越来越随意，这让许多本无希望继承君位的公子公孙看到了希望，他们对于君位的觊觎也变得越来越无法掩饰。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诸侯们开始与王权分庭抗礼。

社会层面上，随着大国的不断征服扩张，他们与传统小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明显，灭国夺邑对于这些新兴国家来说不再是什么难事，可灭国之

后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而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熟人社会被由陌生人组成的大型社会所取代，贵族与平民之间，以及处于不同地域的民众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迅速降低，国人群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加剧国家陷入分裂的风险。

文化观念上，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周礼便成了中原诸侯的执政依据。这套以维护王室地位为初衷的制度设计，最大的特点是讲究任人唯亲，国君或者地方封君在任命选拔各级官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这个人的学识、才华抑或是功劳，而是他自己亲缘关系的远近。亲疏远近无差别的，就需要衡量候选人的地位，地位尊贵的自然要优先考虑。

受此影响，各国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政治活动中，都形成了庞大的公族势力。对于在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守旧势力来说，官员任免、土地分封的首要原则应当是爱亲尊贵，国家得到利益之后，所有的亲戚都应该按照与国君关系的远近一体均沾才是。

但随着战争日趋频繁激烈，一个新兴的军功阶层开始兴起，他们崇尚武力、热衷于征服，认为以军功获得封邑才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所信奉的法则必然会对旧制度、旧观念构成强烈的冲击和挑战。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旧制度和新观念同时并存，又让新旧势力同时都感到不满。

公卿矛盾、君位争斗、阶层固化、族群分裂、观念冲突.....这些由于国家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矛盾不断积累，彻底撕裂了原本和谐有序的小共同体，而大的共同体在不断的碰撞和摩擦之中动荡不安。于是出现了让孔子痛心疾首的局面，各新兴诸侯国内部陷入了持续的混乱之中，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郑国。

郑国在春秋初年是一个与晋国并驾齐驱、夹辅王室的大国，且几乎在晋国曲沃代翼内乱开始的同时，爆发了共叔段的叛乱。不过由于当时执掌权柄的郑庄公应对及时，这场祸乱很快得以平息，郑国也在其领导下日益强盛，先后打败了东方诸国和周天子，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小霸主。

然而，郑庄公终究还是未能处理好纷繁复杂的国内关系，在他去世后郑国很快就陷入了内乱。此后的几十年间，庄公的几个儿子昭公忽、厉公突、子亹、子仪等人轮流上岗，反复争夺君位，终于让这个早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一流强国跌落为二流诸侯国，完全没有了春秋初年的大国风采。

在其他诸国，类似的事例也不胜枚举——齐国有桓公小白与公子纠争位的事件，齐桓公去世后又现五子夺嫡之乱；鲁国有庆父之难；宋国有华父督、南宫之乱；卫国有新台丑闻；等等。

层出不穷的内乱和丑闻在中原大地上上演近百年，各国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手段来制止争端，但结果却并不理想。直到齐桓公称霸之后，一个国际性的“可信承诺机制”才建立了起来，在霸主权力的强力干预之下，始于春秋初年的内乱狂潮才算是有所收敛。但对于晋国来说，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属性，使得发生在其内部的冲突与列国相比又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其最终走向也就与其他诸侯截然不同了。

献惠改革

晋国早期的国土主要位于山西南部的临汾、运城盆地，在其国土周遭，东有太行、太岳群山阻隔，南有中条山与黄河天险并行不悖，构成了其与东方列国之间的天然屏障。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东方诸侯很难越过天险长途跋涉对晋国政局造成影响，这也是后来狐偃所称“表里山河”的缘由所在。

晋国地缘政治的特殊性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说是为晋国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可靠的屏障，使其先人一步步入大国的行列，且能避免受到外部势力的侵扰；从坏的方面讲，这种优势条件和过早的扩张发育也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晋国内部危机爆发的时间要比其他国家更早，且很难通过外部势力的干预得到解决。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逻辑就在于，东方列国之间的势力盘根错节，很多矛盾在爆发之初就已经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干预，通常不会发展成难以控制的长期危机。但晋国就不同了，早期形成的整体实力使其一旦发生内乱，周边诸侯无力对其形成有效干预。而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又使得东方列国干预晋国事务的成本陡然增加。就算是因曲沃代翼导致晋国国力衰弱，虢、郑等国也只能在短期内插手晋国内战，无法长期左右局势。甚至后来处于霸业巅峰时期的齐桓公，对于晋国的超然姿态也只能听之任之，不敢像对待中原诸侯那样随意讨伐。

更雪上加霜的是，晋国所在区域既远离原来商朝统治的核心区，与周王朝的传统统治区域也有一定的距离，自古以来就是鱼龙混杂之地，使得晋国内部的族群构成比东方列国更加复杂。

唐叔虞受封前，唐国的统治阶层据传是尧帝的后人祁姓陶唐氏。唐国灭亡后，其部族的主体被迁往宗周境内，但散居当地的祁姓遗民数量仍相当可观。在领有祁姓族群的民众之外，周成王还曾授予唐叔虞“怀姓九宗”，也就是“隗姓”“鬼方”的后裔。曲沃代翼发展到中期时，所谓的“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仍然在晋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见其并不简单的是“被殖民”对象，而是深度参与到晋国的社会治理当中去的。除了具有代表性的祁姓、隗姓部族之外，根据如今我们掌握的资料可以推断，晋国所在

的临汾、运城盆地还散居着数量可观的允姓、姜姓、嬴姓、真姓等各类部族。

此外，在西周末年的气候剧变之下，不少王室大夫或因家国为“戎狄”所灭而不得不寄人篱下，或因感受到宗周局势的微妙变化而寄居他国。晋国以其地利之便收容了不少从宗周逃难而来的贵族，这其中既有异姓贵族如嬴姓赵氏、梁氏，祁姓杜氏（士氏），姒姓董氏，也有同出姬姓的原氏、毕氏等（为了叙述方便，本书将外来贵族一律称为异姓大夫），这些族群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晋国的政治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

公族势力根深蒂固，原住民族群的影响不减，异姓贵族又平地崛起。身处多元文化交汇之地，诸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传统习俗、不同政治观念的族群凑在一起，难免会因各种原因酿成冲突。伴随着国家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同的文化群体在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更加强烈的阵痛。

与此同时，这些族群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晋国统治阶层的文化观念。这固然可以让他们得以兼收并蓄，融合各种文化的长处，但同时一些极端的观念也被吸纳进来，使得同样的冲突到了晋国往往会走向极端。

各种因素综合下来，就构成了一幅只属于晋国的特殊画卷：东方列国公族夺嫡的事件屡见不鲜，但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这种冲突演变成曲沃代翼这样的七十年内战；东方列国针对公族问题也采取了一些反制手段，却没有哪个国家能制造出如晋国这样的恶性屠杀事件。

面对愈演愈烈的内部冲突，晋献公以及其后即位的晋惠公都试图予以化解。比如在晋献公时期，为了弱化封建世袭制度、强化君主集权，曾仿照秦、楚先例，在边境地区设置由国君直辖、异姓大夫代管的县级军事行政

区。为消除公族坐大对君权构成威胁，他先后制造了聚邑之围和骊姬之乱，在斩杀、驱逐近支公族的同时，还颁布了“国无公族”的法令，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推行下去。

晋献公的冷血嗜杀，与奥斯曼帝国长期奉行的“杀害兄弟习惯法”颇有类似，虽不近人情，却也算得上是化解冲突的一剂猛药。只不过越是超出常规的猛药，其副作用也就越明显，强人政治虽能带来一世太平，却也有其先天不足。因为政治强人对社会矛盾的强压并不意味着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只能是把解决问题的任务无限后延。一旦下一任国君无力控制局面，压抑多年的沉疴痼疾便会借尸还魂，与新的矛盾合流从而酿成更大的灾难。晋献公在世时，以他的个人权威还能压制民众的不满情绪，可一旦他的个人权威丧失，那些因新政而导致利益受损的公族群体必然会群起进攻，让国家回到比之前更加严峻的动乱之中。

历史的发展也一再验证了这一逻辑。伴随着一代强人晋献公的去世，诸公子对君权的争夺愈演愈烈，进而引发了被称为“五世昏乱”的长期动荡。公族势力虽偃旗息鼓，但君权与卿权的冲突却并没有结束，而是换了一种形式，以里克、丕之党制霸朝野的形式粉墨登场。在这个过程中，由对献公政策不满以及申生之死引发的一系列观念冲突也开始爆发，更是加剧了国家内部的分裂。

也就是说，里克之乱的爆发，奚齐、卓子的被杀，骊姬的受戮，表面上看是人们在发泄对骊姬乱政的不满，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由失序而引发矛盾的全面爆发，人们的愤怒不过是在为内心的焦灼和恐惧寻找发泄的出口罢了。

晋惠公回国时，以公族为主体的国人都迫切希望晋国政治能够重回周礼的轨道，姐姐秦穆姬也曾谆谆教导，指望着他能够纠正父亲的过失，将诸公子召回国内。如果他能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最终的结果或许也不至于那么凄惨。可晋惠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继承了父亲献公诛杀桓庄之族的狠辣手段，喜欢用简单粗暴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首先是在解决君权危机以及观念冲突时，他非但不愿改弦更张迎回诸公子，还派人到狄国击杀重耳，不免令人大失所望。在位期间他也任用了一批远支公族，比如郤氏、韩氏，可这种重用只是出于对各个家族所做贡献的回应，所遵循依然是“因功受赏”的逻辑，与国人的期许还有很大差距。从种种迹象来看，惠公对“国无公族”政策的坚持，以及由此引发的国人群体的不满，是他们父子二人最终失国的一项重要原因。

在解决君卿冲突方面，晋惠公以雷霆之势消灭了权势熏天的里克和不郑，顺势剪除了潜伏在身边的七舆大夫，在极短的时间内稳固了自身的地位。这种手段虽然高效，但伴随很严重的后遗症。晋惠公没有父亲说一不二的权威，无法让离心大夫心悦诚服，便只能扶植自己的心腹，其结果就是制造了新的强卿，从而对后来者的地位构成威胁。

不过凡事都要一分为二，晋惠公虽说声名狼藉，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在他执政的十四年间，晋国先是经历了连年的天灾，后又遭受了韩之战丧师辱国之痛，国家军事、经济遭受全方位的重创。为弥补这些过失，晋惠公在执政后期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其中对后来晋国政局影响最大的，就是将吕甥主导的“作爰田”“作州兵”等政策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下去。

有关“作爰田”“作州兵”的具体内容，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介绍。总而言之，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剥离了依附于土地上的政治属性，极大地鼓

励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军事上，在扩大征兵范围的同时，将征赋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封君手中。这些举措虽不利于君主权力的集中，但却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晋国的经济、军事力量，进而推动国家整体实力的发展壮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晋惠公执政的十四年划分为两个时期：韩之战之前，国内各种矛盾得以充分释放，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期；韩之战结束后，经济、军事政策的改革让高度紧张的社会情绪得以缓解，可以视作逐渐消化冲突的缓释期。

这两段时期对于晋国的发展极端重要，对于后来各项措施的推行也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国内民众饱受秩序混乱带来的苦难，都期望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重耳返国后，一个新的秩序也就呼之欲出了。

为君之道

晋文公回国时，对于究竟如何才能化解这种紧张感，起初也毫无头绪。他原本的想法是：在外流亡的十九年间，跟随自己的那些人个个都劳苦功高，如果没有这些人鞍前马后地伺候，没有这些人日夜思虑出谋划策，我恐怕根本就活不到今天，也就不会有如今的荣耀富贵了。

再者说了，能够跟随流亡十九年的时间，受尽艰难险阻都不离不弃，足见这些人忠肝义胆，他们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如今我一朝返国身居高位，理所当然就要论功行赏，让他们“大者封邑，小者尊爵”，以回报其忠心和付出。

至于国内留守的大夫，他们本来就跟我关系疏远，十几年里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死活，似乎也没有讨好他们的必要。如今我初登大宝，国内情形

尚不了解，政治局势尚难掌控，让知根知底的人担任重要职位、控制关键部门才能放心，这也是人之常情，总没什么错吧？

然而寺人披和竖头须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大错特错！”

寺人披首先指出：“事君不贰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明训能终，民之主也。”这番话既是在为自己辩解，说侍奉君主忠心不二才是人臣之道，我以前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错误，同时也是在劝导晋文公：身为国君，就要把国君的职责放在首位，把私人好恶放在一边，这才符合古来圣贤的教导。你如今已经是所有晋国人的国君，不再只是一个流亡团队的首领，只有适应了这种转化，以国君的思维去处理国事，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

而竖头须则提出：“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我竖头须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是在为所有留守国内的人请愿。于你私人而言，他们或许没有随亡的臣子那般亲切可信，但于国家而言，这些居守之臣是保家卫国的功臣。如果没有他们尽心守国，你即便是当上了国君，得到的也只会是一片破碎的山河。如果仅仅因为个人感情的远近，就大肆恩赏从亡者，挾伐居守者，你很快就会失去民心。

事实上，对于回国之后究竟该如何封赏，如何处理与国内留守贵族的关系，不仅是寺人披、竖头须有不同意见，在流亡者内部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我们所熟知的介子推。

由于清明节传说的广泛流传，今人对于介子推的名号大抵都不会感到陌生。在那些妇孺皆知的故事中，介子推曾有“割股奉君”的感人举动，在重耳最危难的时刻，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在重耳回国后，他却

因不愿居功受禄而隐居绵山，晋文公派人搜寻不得，放火烧山，居然把他给烧死了。这些传说虽不足为信，却至少表明了人们对介子推品格的尊崇，但对于介子推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封赏，人们却所知甚少。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不妨把视线再拉回到一个多月前，也就是重耳一行在黄河岸边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当时面对着滔滔河水，众人皆涕泪横流，狐偃却捧着玉璧跪倒在地，向重耳请罪。重耳马上表明心迹：“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说着就把玉璧丢进了黄河之中。

狐偃假意请罪，实则邀功，重耳故作不知，二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面对如此虚伪的场面，介子推忍无可忍，于是便离开了。

据说在离别的渡船上，回首远望公子站立的方向，介子推曾淡然地说道：“惠公父子俩得罪人太多，国内国外都不支持他们，失国是必然的。只要上天还不想让晋国灭亡，就必定会有人主掌国政。献公的九个儿子如今只剩下了重耳一人，他不做国君还能有谁来做？”

在他看来，自己虽跟随文公流亡了十九年，还有传说中“割股啖君”的举动，可实打实地讲，在国君回国即位这件事上是没有功劳的。公子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地位，那都是上天的垂怜，如果非要论功行赏，那功劳也应该是上天的。自己明明没有功劳，却非要借机求赏，这不就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吗？偷盗别人的钱财还会被人骂成是贼寇，如今有人要偷窃本属于上天的东西，这又该怎么定性呢？

然而令介子推失望的是，如狐偃这样的人，他们不仅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还为能够无功受禄而沾沾自喜。国君明明知道他们在欺世盗名，却还要假装不知道，对他们大肆封赏，这又算得上是什么呢？上下之间互相欺骗，难以和他们这些人相处啊。

介子推在离开之后便带着母亲隐居深山。起初母亲也不理解儿子的选择，便一再追问：“你都追随他流亡十九年了，为什么到最后梦想成真了，反而不愿接受封赏了呢？”

介子推回答说：“明知他们不对却要效仿，岂不是比他们更无耻？我既然已经表达了不满，就绝对不会接受国君的馈赠！”

母亲还是不甘心，就劝道：“就算是你不接受封赏，至少也要让他知道你的想法吧？就这样默不作声，你心中执守的理念，又有谁能知晓？白白委屈了自己却又不能弘道于天下，这又是何苦呢？”

介子推却不以为意，他说道：“言语，是身体的装饰。身体将要隐居了，还需要装饰它吗？这样是在乞求富贵啊。”

爱有差等

介子推固然清高，但他的观念有些守旧了。他的所思所想，正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观念冲突。重耳和夷吾一样，对父亲论功行赏的做法深信不疑，对摒弃公族的观念也毫不拒斥，但这恰恰是如介子推这样的保守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

在他们心目中，“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爱有差等”是人的本性，是最符合天道的制度设计，也是每个执政者都必须遵守的准则。

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一名有德的君主就应该奉行天道伦常，将周礼“爱亲尊贵”的原则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坚决抵制“因功受赏”等不良思想的影响。与国君亲缘关系疏远或者地位卑贱的人，哪怕是有莫大的功劳，也不应该凌驾于亲贵的头上。否则人人都会为了改变地位而参与争斗，这个

世界还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可追随重耳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不是地位卑贱的家中庶幼，就是关系疏远的“外来和尚”，有什么资格大言不惭地要求封赏？

介子推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主义者，以自己信奉的观念为至高准则，严格地用这个准则来约束自己和评价他人。若是他泉下有知，看到后世“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事例不胜枚举，不知又当如何。

但正如《国富论》中讲到的，社会是由无数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人们在实现利益的过程中，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促进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社会观念的成熟，从而为更多人带来福祉。逐利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守旧者还是革新者，都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只是与守旧者的“清高自洁”不同，革新者大多都以强烈的逐利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跟随重耳出亡的人（如狐偃）固然是如此，没有追随重耳出亡的人亦是如此，这其中并无高下之分。

无论是竖头须的直言劝谏，还是介子推的政治理想，在当时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有功于国是为忠，有恩于私是为义。重耳作为一名流亡团队的首领，在感情上愿意亲近追随自己的人无可厚非；但身为一国之君，就要首先抛弃个人恩怨，不能如寻常人一般恣意妄为，无论是因为怨恨而公器私用，还是由于恩情而以公谋私，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随从流亡的那些人固然是劳苦功高，可居守国内的却更加不容忽视。他们既用家族的血泪守护了晋国的江山，同时又以世代功勋控制了国内的大部分资源。无论是站在家国天下的角度，还是仅仅为了稳固自身的地位，重耳

都必须要有公私分明，绝对不能因个人感情引发居守者和流亡者之间的派系冲突。

另一方面，重耳身为国君须尽力调和国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异姓大夫所提供的动力固然强大，可公族大夫潜藏在水面下的滚滚波涛也随时可能让国家倾覆。

在公族受到打压的这半个世纪中，整个社会已经积聚了大量的怨气，使得晋国这架老爷车在急速的行进中难免会有所晃动。过去拥戴惠公父子的人如今之所以会转而向重耳抛出橄榄枝，还是期望他的到来能够一扫过去的阴霾，让沉寂多年的公族重新焕发生机，这或许才是造就重耳贤名的真实原因。重耳既然接受了人们的推崇，就必须承担这贤名背后所承载的政治理想。这也就意味着，在他回国即位之后，不论是否真心情愿，都必须要对这种呼声加以重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调节复杂的利益分配也很难一蹴而就，需要在配套的政治和军制改革中缓步推进。这些都需要当政者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将自己摆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认真梳理国内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相互纠缠的利益群体中，寻找一个尽可能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第三节 渐进改革

郭偃之法

晋文公即位之后，针对晋国内部存在的各种弊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到其即位第四年冬天的“被庐之蒐”时才基本定型，历史上一一般将其称为“被庐之法”或“执秩之法”。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少人都将这些变革归功于一个叫郭偃的人，因此又将这次的新政称为“郭偃之法”。

郭偃其人长期在晋国担任卜师的职务，有时也被称作高偃、卜偃。晋献公即位初期，他就以能掐会算著称，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做出过惊人的预言。到惠公主政时期，郭偃大概是对其施政纲领颇为不满，因此便经常捧着龟甲说一些风凉话。这些酸话大体上也都被当作预言收录，终于成就了郭偃伟大预言家的光荣称号，以至于其在文公时期的伟大贡献都被遮盖了去，甚至到后来渐渐湮没无闻。

春秋战国时代，郭偃的名号还十分响亮，诸子百家的论述中一度将其与相齐的管仲并称，提高到决定晋文霸业成败的高度。如《韩非子·南面》篇有言：“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墨子·所染》篇也将其与当世辅霸贤臣并列，说“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郭偃虽是卜史出身，却也知道推行变法改革并非是一件易事。《国语》记载了晋文公与郭偃的一次对话，晋文公曾感慨说：“当初我还以为治理国家很容易，如今才知道这件事有多难！”郭偃劝勉，说道：“国君以为容易

的时候，往往就会面临很多困难；当你意识到这其中的难处时，恰恰就很容易下手了。”

自古以来，但逢改革必然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对此郭偃提出的见解是：“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君书》）。简言之，国君想施行改革就必须要有“独断专行”，如果要顾及所有人的意见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独断专行”，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护航。对于改革可能出现的阻力和威胁，《韩非子》曾引用管仲、郭偃故事，说“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在推行改革之时，国君能有军队傍身想必是极好的。特别是当他想要掌握绝对权力，试图进行利益重组时，必然要动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难保不会有人拼个鱼死网破。

与后世的职业化军队不同，春秋前期各国实行兵民一体，军人主要来源于贵族内部，那些通常所说的“二军”“三军”的军事力量，实际上也都是到战时才征召起来的临时武装。平日里或许会有一些在宫中担当警卫力量的士兵，但数量绝对不会太多，否则吕甥、郤芮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想到要去宫里放火。

那么，该怎么解决武力不足的问题呢？

晋文公还真有办法，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借助外援。吕甥、郤芮火烧公宫一事爆发后，在借用秦国之手铲除敌对势力的同时，他还故意向秦穆公示弱，从而争取来一支关键力量，一支由三千名士兵组成的卫队，也就是《左传》所称的“纪纲之仆”。

三千人的队伍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绝对不容小觑。春秋时期规模较大的诸侯国普遍只有三军的建制，士兵数量最多不超过四万人；而秦晋两国在当时还都只有两军，总兵力也就两万多人。在常备军没有组建的情况下，三千人的兵力跟任何一个地方封君比起来都要威风得多，也足以将所有人都震慑住。正是依靠着这三千人的强大支持，晋文公才在毫无根基的晋国站稳了脚跟，他经历十九年流亡所获得的政治智慧，以及郭偃所倡导的改革措施才有了施展的机会。

不过，由于当时还没有编写成文法的惯例，郭偃的变法思想也没有如《管子》一般形成系统性的论述，“执秩之法”的具体内容已不再为人所知，我们也只能从诸子百家的论述中寻找蛛丝马迹。

《战国策》中记载赵孝成王时事，曾有一无名氏提到“燕郭之法，有所谓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优爱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于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内，则大臣为之枉法于外矣。故日月暉于外，其贼在于内，谨备其所憎，而祸在于所爱。”

这里的“桑雍”指的是桑树上因蠹虫蛀食而形成的痈肿物，而“桑雍者”则指的是嬖臣、妇人、侍从和伶优等对国事无所助益却受国君宠爱的人。他们常常会利用自身的荣宠，趁着国君酒酣耳热之时提出一些非分的要求，这些人的欲望如果能在宫内得到满足，那么大臣就能在外为非作歹、贪赃枉法了。太阳和月亮虽光辉普照，可内部却依然有黑点，国君天天防备那些憎恶的人，却不知祸患常常来自自己溺爱的人。因此贤明的国君一定要公私分明，切不可因宠爱而对身边的人过于放纵。

《韩非子》也同样引用了这段话，并进一步延展说，臣子与国君之间没有骨肉亲情，他们之所以愿意服从，不过是迫于权势罢了。在侍奉国君时

候，他们往往会窥测国君的意图而动。君主喜爱儿子，他们就利用这个儿子获取私利；君主宠爱小妾，这个妾室便会成为他们贪利的工具。赵武灵王死于沙丘之变、晋献公陷于骊姬之乱，不就是由此导致的后果吗？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即便是没有小人的挑唆，你所宠爱的人也会因为担心日久失宠做出弑君篡位之举，这些都是为君者不得不严加防范的。

郭偃提出这些见解，在提醒晋文公防范君权旁落的同时，自然也有作为居守派大夫的私心，其中的倾向与寺人披和竖头须是同源的。不过若仅是如此，还不足以令晋国摆脱混乱，进而夺取中原霸权，那么郭偃变法还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经济改革

《国语》中有一篇“文公修内政纳襄王”的文章，列举了文公即位后的一系列举措，但其中并未提到郭偃的名号。其具体内容是：

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穡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栢、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总的来讲，这些改革内容主要包含三个维度：分别是经济制度改革、法律制度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

经济改革方面，文公通过减免债务、赋税和劳役，救济资助贫困之人等方法来减轻底层民众的负担，鼓励开展农业生产；通过开放山林水泽专利，修缮道路、减轻关税的方式鼓励发展工商业。这些举措都大大地激发了国内的经济活力，为新政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此基础上，晋文公确立了“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的新经济制度。这种分配制度看似没什么新意，但对于当时的晋国却意义非凡。

过去的一百多年间，原本维系社会各阶层正常秩序的纽带被切断，各阶层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尊卑贵贱的法度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分配制度都荡然无存。特别是在土地制度上，依靠宗法结构维系的井田制早已破败，但对于新的土地制度，各国都还没有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在晋国，吕甥所推行的“作爰田”则剑走偏锋，完全破除传统井田制的藩篱，强化了贵族的土地私有权，从根本上满足了国内大夫的经济诉求。

但问题是，过去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公田中获得的利益，如今井田制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公室便丧失了正常的收入来源。在没有新的可替代方案出现之前，公室要想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保持对地方封君的绝对优势，就得想方设法扩充收入来源。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国家还没有那么多的职业官吏，国君无法直接管理底层的农民，税收这种事显然是没办法推行的，于是公室保留尽量多的自留地便成了无奈之举。但如此一来，国君与民争利，又会打消贵族的积极性，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是很不利的。

由于韩之战后，晋惠公为了换取国人的支持而“作爰田”，将公室的土地几乎都给败光了，晋文公刚刚回国又无法削夺大夫的土地，于是他便干脆另辟蹊径，参照天子的规章确立了“公食贡”的国家财政制度。

这套制度明确了国君在原则上不保留自己的土地，只从大夫手中收取贡赋，从而将国君从与各地封君类似的大地主身份中解脱出来，确立了国君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大夫的采邑之内，士役使庶民劳作创造财富，工商业者通过帮助贵族贩运货物获得收益，皂隶则按照职务领取口粮，官宰则能得到一定的俸田。至于大夫如何从士役的手中收取粮食，是采用井田制也好，使用税收手段也罢，那就要各尽所能了。

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也算是春秋时期第一次从官方的角度，对国内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界定。这套制度既有西周封建经济的影子，又能依据自身实际进行灵活调整，使得晋国从原始国家形态向行政自觉的国家形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让晋国走向强大的一个重要举措。

严明法纪

晋文公的“被庐之法”有时也被称为“执秩之法”。关于“执秩”二字，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执秩”本身就是一部法令，比如在《国语》中，曾提到有晋国大夫士会“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但也有人认为“执秩”其实是一种官名，如《左传》在提到狐偃“三德”时，曾说“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其中的“执秩”通常便被理解为执秩官。

如果不严格追究的话，“执秩之法”与“执秩之官”也算是相辅相成，两种说法实际上并不矛盾。“执秩之法”确立了一种新经济制度，也建立了以“亲亲上恩”为原则的官僚体系。这些体系一经建立，就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管，否则便很容易流于形式，设立专门的“执秩之官”也算是应有之义。同样，设立“执秩之官”，必然要肩负某种职责，以“执秩之法”确定其“执秩”的具体监管范围和尺度，也是理所应当。

除了要以周礼的尊卑秩序来维护等级制度的有序运转外，“执秩”机构还有一项重大任务，便是完善并严格履行刑罚制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当时通行的法律习惯，仲裁一个人是否有罪，其决定权通常是在社会舆论手中。贵族大夫犯了事，只要国人认为其“有德”，愿意继续支持或者容忍，便可以继续留在国内任职；就算是他犯了弑君的严重罪行，重新迎立一个国君同样可以将事情掩盖过去。

假如一个人得不到国君的支持和国人的谅解，就算他是无辜的，也是犯了“无德”的罪行，想要逃避处罚便只能流亡国外。对于这种失去权势的人，如果不是有政见相左或有利益冲突者必欲杀之而后快，通常也不会被斩尽杀绝。

在这种不成文的制度约定下，人人都可以是法官，只要理由足够充分，获得的支持足够多，谁都可以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杀掉或驱逐自己不喜欢的“无德”之人而不必受法律制裁。反而是国君缺乏独断能力，并不掌握对大夫生杀予夺的大权，假如未能取得大众的支持而随意杀人，也会遭到非议。

这样的事例在晋国并不鲜见。远如早年的共太子申生，按说并没有犯过什么严重的错误，但只因君父不喜欢，便有了“无德”的罪过，晋献公对其处置的措施，也不过是希望其流亡国外罢了。近有晋惠公对里克、丕郑和七舆大夫的处置，尽管他们犯下了弑君乱政的罪行，但只要国人愿意支持他们，国君便不能随意处置。再如后来在韩之战中扰乱军政、导致兵败的庆郑，司马说列出的四条罪状，桩桩件件皆有实据。但惠公因此而斩杀庆郑，不仅未能肃清纲纪，反而给自己落下了残暴不仁的罪名，甚至连其子怀公最后的失国，都与此相关。即便是晋文公回国初期，面对郤芮和吕甥的叛乱，

也不敢随意施行刑罚，只能待其发动叛乱之后，才敢借秦穆公之手对其进行清算，否则难免会惹人非议。

这样的社会形态，以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理解，简直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却正是遵循天道自然的体现。在这种观念的制约下，军队纪律涣散导致战争失败，国君要承担责任，大夫扰乱秩序影响了作战部署，国君反而不能随意追责。即便是有为进取的国君，也难免会因此束手束脚，无法大力整饬纲纪，也无法对官员的实绩进行监督考核。只要这样的观念不破除，哪怕是国家财力再雄厚，三军将士再骁勇善战，也终究无法抵消作风自由散漫造成的破坏。军队的战斗力无法有效发挥，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便只能听凭“天命”了。

晋文公经过了长期的流亡，亲眼看到了诸多的战争事例，细心对比了各国制度之优劣，自然也意识到了严明法纪对国家发展和战争胜败的影响，因而也有意地完善了军纪刑罚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在史料中同样缺乏系统性的描述，但也未必无迹可寻，如《左传》在讲到城濮之战时，曾举过这么几个例子：

城濮之战前，晋军攻陷陶丘，晋文公严令禁止袭扰僖负羁的宫院。但这道命令刚发布不久，僖负羁的家就被人给烧了，而烧杀僖负羁宫院的不是别人，正是魏犇和颠颉。这两人都是晋文公的随亡之臣，特别是魏犇，在世所流传的所谓晋文公“五贤士”的不同版本中，都是赫然在列的股肱之臣。至于颠颉，虽说没有魏犇那么威名远播，可在某些版本里，他的大名也是有一席之地的。但即便如此，晋文公为了严明军纪，还是义无反顾地杀掉了颠颉并通报三军；魏犇虽留下了一条性命，但在此后似乎也并未得到重用。

魏犇在此战中原本担任的是国君车右的职务，因身负重伤无法继续作战，文公便指派了舟之侨暂摄。舟之侨本是虢国大夫，晋国讨伐虢国时，因不能容忍虢公丑的昏庸无道而投奔晋国，如今一朝荣升国君车右，便开始得意忘形了。晋国刚在城濮战胜楚军，他不等大军班师便擅自回国报喜，把自身的职责忘了个一干二净。等到晋文公准备要走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护卫擅离职守，一怒之下回国后便将其斩首示众。

此外，还有一个叫祁瞒的人，负责掌管中军大旆（通常指前军使用的旌旗）。在一次行进途中，晋军于沼泽中遭遇大风，导致左边的大旆丢失，晋文公便以“奸命”为由，命司马将其当场处死，并以茅茷取代其职责。

从具体的罪行来看，相比于里克、丕郑等人的弑君之举和庆郑的胡作妄为，颠颉、舟之侨与祁瞒所犯的错误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正因为有了“执秩之法”的保障，使得晋文公杀鸡儆猴的做法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据，从而避免了他像惠公一样落下恶名。不仅如此，《左传》还借用君子之口对文公的做法大加褒奖，说：“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也就是说，晋文公执法公正不失偏颇，以此安定四方惠及诸侯，因而能够使百姓顺服，这与对惠公的评价可谓有天壤之别。

太史公在《循吏列传》中还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叫李离的人（或许是里克的后人），在文公时期担任大理的职务。他在审理一起案件时，因个人判断失误而枉杀无辜，于是便将自己拘禁起来并判了自己死刑。

文公听说后对其深表同情，说：“官职有贵贱，刑罚有轻重，出现这样的失误，是下属官吏的失职，你怎么能全揽罪责呢？”

李离回答说：“臣在接受高官要职时，并没有将高位让给下属；臣领取高额俸禄的时候，也没有将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将罪责推诿于他人，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文公很是无奈，于是就问道：“照你这么说，下级犯了错误上级就要担责，那么作为你的上级，你犯了罪，是否寡人也应该担责呢？”

李离回答说：“法官依照法律规定断案，出现错案冤案便要亲自受刑，枉杀无辜自然更应以死偿命。您之所以任命我做法官，是因为相信我能够体察入微，做出公正裁决。如今我失职枉命，是我辜负了您的期望，又怎么能怪罪您呢？”最终他还是没有接受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这个故事在先秦诸子著书中并未记载，直到汉代才被人发掘出来，事情的真伪还有待考证。但从故事中反映出来的细节来看，文公时期的法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性，具体的刑罚措施也开始遵循规则，不再如前代那样仅凭“公道自在人心”来进行道德评判了。“执秩之法”的确立，使得晋国的法制建设开始步入了正轨，对于国家社会形态塑造所产生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

官方定物

晋文公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公属百官，赋职任功”，也即“正爵秩”“命职官”，以法令的形式明确官职爵禄的法定等级，从而进行封赏活动。而在这其中，又有一个重要原则，总结起来便是“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这十二字方针。

我们首先从“官方定物”四字入手。按照韦昭的注解：“方，常也。物，事也。”所谓“官方定物”便是“立其常官，以定百事”。

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春秋以前各国实际上并没有常设的官职，当时所谓的百官大多数还都只是“临时工”。关于这一点，黄海在《论中国古代专职法官在战国时期的出现》一文中曾经指出，在传世的文献记载中，古代的专职法官有三种，在虞舜时期称士，在夏朝称理，在周称司寇。这些记载与出土文物呈现出不少矛盾甚至抵牾之处，因此作者推断，专职法官制度在当时很可能还未成型，至少在西周时期，所谓的“司寇”应该还不是一种常设的职官。

这与当时的国家形态有很大关系。周初封建诸侯，将所有地域分割成大小不等的碎片，交由功臣贵戚进行治理。天子并不需要亲自对偌大的天下进行直接管理，平日里打交道的也就是那么几百号的诸侯而已。天子之下，每个诸侯所统辖的范围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治理起来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封建君主再将所得领土按照“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的原则层层分配，与其有直接上下级关系的人就更少了。

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秩序下，“君上之君，非我之君；臣之臣下，非我之臣”，每个人都只需要管理好与自己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少数人即可。一国之君既是最高行政首长、军事统领，也是最高法官、最高文化权威、最高宗教领袖，国家大小一切事务包括祭祀礼仪、宫室营建、法律事务都由其全权负责。国君忙不过来的时候，最多是委派一两名卿士帮助打理，专业化官僚队伍的作用还无法显现。

正是由于行政制度和官僚系统的不健全，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不足，因此对国君的个人素质要求甚高，在早先的商王朝才会有父死子替、兄终弟及等继承制度交替出现的现象。即便是到了周王朝草创初期，嫡长子继承制度已然确立，已经成年的周成王也不得不依赖叔父周公的辅佐才能治理天下，其原因就在于此。

但到了西周中期，随着王室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在卿士的帮助下很多工作还是难以推行，于是便会在事务繁杂之时多找几个人搭把手，从而出现了职业化官僚制度的雏形。

王室的情形尚且如此，西周时期只有地方百里的诸侯，就更用不着常设职务来管理国家了。但到春秋时期，随着各国规模的扩大，内外事务也日益繁杂，国君分身乏术，于是便有了将部分权力分配给一些亲近的人，甚至选拔专业官僚的做法，大体上是走了一遍过去周王室走过的老路。比如晋国的士氏家族、里氏家族，都是典型的法官出身，但由于他们的职事具有临时性特征，对专业性也不会有太高要求。多数情况下，他们还都是全能型人物，在国君需要时可以一肩挑起司空甚至卿士的职务。此时的官员队伍距离职业化、专业化的官僚体系还有很大的差距。

晋文公的贡献就在于，他将过去几百年来形成的临时性社会分工进行了梳理，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一批专业化、规范化的常设性官僚队伍，以取代过去的临时机制，并对其职责分工进行明确细化，从而大大提升了国家行政系统运行效率，这一创举可以说是空前的。

正名育类

其次我们要谈到的是“正名育类”。

所谓“正名”为“正上下服位之名”，“育类”则是“长美好良善之德”。孔夫子常言“名不正则言不顺”，无论是分封赏赐还是授予官职，都必须要有有一个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规则，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以维护分配秩序的公平正义，这是一切制度能够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也是后世儒家所一直倡导的根本准则。在当时的条件下，晋文公还很难找到更容易执行的分配

原则，便只能把被尘封多年的夏政、周礼等老古董搬出来作为依据，从而创制了“执秩之法”。

在这其中，最紧要的便是确定亲疏远近的名分。过去一百多年间，伴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以及公族内乱迭兴，摒弃公族、任用异姓已经成为晋国不可动摇的根本国策，但由此带来的族群冲突和文化隔阂也愈发深重。而晋文公因有多年流亡的特殊经历，居守贵族和随亡之臣间的利益纷争也同样不容忽视。如何以一种相对公平的规则安抚各方势力，便成了晋文公归国之初的当务之急。

在处理不同族群之间冲突时，晋文公特意淡化“因功受赏”的色彩，实行“昭旧族、爱亲戚”“尊贵宠”“友故旧”的政策，将国内的贵族按照亲疏远近分为三个梯队：

其中的第一个梯队，让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姬姓公族，如胥、籍、狐、箕、栾、郤、栢、先、羊舌、董、韩十一族执掌“近官”，也就是相对重要的职务。

亲戚都安排妥当之后，才轮得到外国流亡来的姬姓贵族，比如魏氏和荀氏。这些人虽不是晋国公族，但同是姬姓，相比异姓贵族血缘关系又要近些，因此便会按照功劳或者才能选拔其中的“诸姬之良”掌管“中官”。

外来的姬姓贵族分配完官职，剩下的就只有苦命的异姓贵族了，比如嬴姓赵氏和祁姓士氏家族，就只能担任一些无足轻重的职务，也就是所谓的“远官”。

这种利益分配的方法，将重要职位向与国君亲缘关系较近的公族倾斜，以照顾公族亲贵的愿望，可以缓解国人的不满以及他们与异姓贵族之间的矛

盾。而在各个梯队内也不会讲什么平均主义，而是按照献公以来“明贤良”“赏功劳”的新政思想来“赋职任功”，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各方的感受。

在处理派系冲突方面，晋文公依照竖头须所言，以“居者为社稷之守”尊这些居守之臣为“内主”。他不仅没有居高临下地追究他们过去的罪责，反而是放低了身段给他们戴高帽尽力拉拢。后世史料中被称为“文公内主”的栾、郤、狐、先等家族，实际上都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尤其是郤氏家族，先前几乎是阖族投效于惠公麾下，到文公归国后还掀起了一场政变试图颠覆新政府。火烧公宫事件爆发后，其核心成员郤芮被诱杀，可郤氏家族仍然执掌着大片封邑，是当时国内最有权势的家族，也是晋文公的首要拉拢对象。

晋文公在“赋职任功”之时大力迎合公族的愿望，又通过美化宣扬其他贵族功劳的办法满足了居守派的利益诉求，从而将原本对自己心存芥蒂的各方势力全都团结到自己的旗下。这些举措对于稳固其自身地位是有积极作用的，但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显然是在开历史倒车，对于过去常受重用的异姓功臣来讲，也有欠公平。

这些族群满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在过去几十年间披肝沥胆、挥洒热血，为晋国的强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如今新君刚一回国就卸磨杀驴，将“任人唯亲”的原则放在“任人唯贤”之前，这脸是不是变得太快了些？这样的政策取向，分明是给他们设置了一个天花板，无论他们付出了多少辛苦，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身份在所谓的“中官”与“远官”序列中争取，无法跳出身份限制取得更高的位置。长此以往，不仅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让那些有功之臣离心离德，还可能会制造更严重的分裂，酝酿出新的对立集团，这显然也是晋文公不希望看到的。

而对于那些曾经追随他在外流亡的随臣们来说，这的确不是什么好消息。他们之所以能披荆斩棘、任劳任怨追随他东奔西走，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凭借往日的功劳获得封地和爵位。可重耳刚一回国获得了君位就翻脸不认人，为了迎合那些尸位素餐的公族，以前许过的诺言、承诺过的封赏就全不作数了，怎能不让人寒心？

在周礼的框架内完全做到一碗水端平，对于古人来说着实是一件很犯难的事情，不过这种问题终究还是难不倒我们英明神武的晋文公。晋文公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有着鲜明实用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他在恢复古制的过程中，还将春秋以来晋国自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法，其中也包括献惠以来一些受人诟病的政策都融合了进来，取长补短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规范，这便是他接下来要着手实施的一项重要任务。

被庐之蒐

晋文公四年（前633年）冬天，晋国贵族齐聚被庐（绛都东部山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次的行动被称为“被庐之蒐”。

“蒐”礼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军事礼仪，有时也被记作“搜”礼。《左传》提到春秋时军事礼仪的称谓，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其中的蒐礼便是春季农闲时间举行的活动。

一般情况下，举行蒐礼包含了阅兵和田猎两项活动，主要是对临时召集的军队进行检阅，并训练士兵的协同作战能力。但是从晋文公时期开始，晋国的蒐礼便被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同时承担了颁布法令和人事调整的功能。

晋国的军制，在晋武公取得晋侯地位时还只有一军的规模；到晋献公十六年，才进行扩编，建立了上、下两军体制。通常情况下，军队出征时国君

会亲自统率上军，下军的统帅则临时指定大夫担任。不过，晋献公并不是一个严守成规的君主，有时连上军也会交由大夫统率，担任上、下军的统帅便是所谓的“卿”。

此后的二十多年间，晋国内部乱象频仍，军队规模一直都维持在两个军的水平上，卿的数量和人选也无一定之规。到晋文公谋求霸业之时，这种混乱无序的规制和二军的常备规模，显然已经与现实需要不相匹配了。

这一年，楚国大军包围宋国的消息传来，为了与楚国抗衡，解宋国于危难之中，晋文公决定在被庐举行蒐礼。在这次的蒐礼上，晋文公在原有军制基础上建立了中军，从而创立了“三军六卿”体制。这其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以中军统率上军，上军统率下军；每军均设立一名统帅和一名副帅，统帅曰将，副帅曰佐，三军将佐由六人担任。

晋国实行军政一体，三军将佐既是军队统帅，也是行政首长，因此又被称为“六卿”。六卿之中又以中军将为尊，称为正卿，又称元帅，出征在外是为三军统帅，征战归来就是一国的执政，是集军政大权于一体的国家首长，与后世的宰相有些类同。其后依地位高低排序分别为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每人在卿职之外往往还会兼任其他具体的行政职务。国君加上六卿组成的小团体，是制定国家一切政令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与明朝时的内阁、清朝的军机处有些类似。

确立了三军六卿的内阁体制后，接下来便是要选拔六卿，而重中之重自然是推举中军将的人选，也就是“谋元帅”了。按照晋文公最初的设想，他自然是希望从流亡派的贵族中选择一人来担任中军将，可居守国内的贵族却不买账。为了打破僵局，还是赵衰提出了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人选：郤穀。

作为晋国的第一任中军元帅，郤穀其人在此前的生平史料中无任何记录，上任之后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表现。这样一个毫无亮点的人为什么能够从人才济济的晋国政坛脱颖而出呢？

按照《左传》的说法，赵衰举荐郤穀的原因，是因为他年届五十且为人敦厚，平日里喜爱礼乐诗书，谨守道德礼义，能够善待百姓，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君子。这句话从明面上理解，举荐他是因为郤穀符合儒家倡导的君子形象，能够服众，可实际上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家世好。

之前我们曾介绍过，郤氏家族经过惠公时期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同时拥有多个封邑的大族。此时尽管郤芮已死，其家族所拥有的土地财富仍然不可小觑，在不少贵族心目中还是很有威望的。提升郤穀的地位，利用其领头雁的作用，拉拢其背后依附的庞大族群，对于国君地位的稳固显然大有裨益。

君主拉拢豪门巨族是常有之事，这点我们丝毫都不会感到意外，可如果他还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政客，就容易让局面失控。好就好在，郤穀虽坐拥庞大的产业，却是个庸碌无为之人，这倒很符合国君的心意；而将他推举上位，既能让其他的贵族看到国君的诚意，也能缓解不同群体之间的争斗，真可谓一举两得。

于是乎，在各方激烈的博弈之下，一个并不怎么出彩的郤穀，就成了晋国史上的第一任执政官。而晋文公为他选定的副手，也就是担任中军佐的郤溱，则更是一个缺乏存在感的隐形人。

中军将、佐尘埃落定，已经算是向居守派妥协了，接下来的四个席位就应该安排流亡派来加以平衡了。而在这其中，备受恩宠的赵衰自然还是晋文

公的首选。不过，如此好意赵衰却不愿接受，他推辞说：“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

所谓“三德”，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的是文公回国之初便急不可耐地想要进军中原谋求霸业，其舅父狐偃极力劝阻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意思是老百姓还不懂得道义，没能各安其位，此时不是用兵之时。于是晋文公便出兵安定周襄王，回国后又让利于民，鼓励生产，让百姓生活都安定了下来。

看到百姓皆安居乐业，晋文公又想出兵，狐偃再次劝阻，说：“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意思是老百姓还不懂得信义，仍然不是用兵之时。晋文公于是就在讨伐原国时展示信义，如此上行下效，社会风气为之扭转，就连做生意的人都开始明码标价，不再贪利了。

看到扭转风气立竿见影，文公便又按捺不住了，狐偃第三次出面劝阻，说：“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意思是老百姓还不知道礼仪，没有产生恭敬之心，所以还是不能用兵。晋文公便又按着狐偃的意图，举行了这次盛大的蒐礼，通过建立执秩之官、完善法律制度、明确岗位职责的方式，让老百姓懂得敬畏并明辨是非。

安定襄王示民以义、伐取原国示民以信、被庐大蒐示民以礼，赵衰提到这些意在表明，晋国之所以有了挑战中原霸权的勇气，靠的就是“义、信、礼”这三种德行，而这一切又都是狐偃的功劳。这个理由冠冕堂皇，但结合前后的情形来看，或许并非出自赵衰的本心。

上文曾经提到，在两代先君重用异姓贵族的政策导向下，国内公族群情激奋，晋文公不得不抬出周礼的原则来进行安抚，由此又让异姓贵族感觉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作为异姓贵族的一员，赵衰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敢贸然出

头。假如他听从国君的安排进入了六卿，势必会受到公族的冷落和排挤，而同为异姓的其他难兄难弟也会因此对他产生怨恨，让他里外不讨好，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如果国君非要在流亡的兄弟中选择一个人来平衡的话，那么国君的舅舅狐偃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按照赵衰后人赵武的说法，狐偃这个人私心太重。文公回国之前，他就在黄河岸边装腔作势，让介之推很看不惯；回国之后，他一心只考虑家族利益，又把与国君之间的生死情谊全放到了一边。赵衰推掉了上军将的职务之后，晋文公别无选择，只好让他来顶替，可狐偃却假装高风亮节，推荐了自己的哥哥狐毛，还说：“狐毛的智慧远超于臣，且年龄也比我大，如果狐毛没有得以入选，臣不敢窃居高位。”无奈之下，晋文公只好任命狐毛为上军将，同时将狐偃排在第四位，好控住上军佐的职位。

在确定下军将、佐的人选时，晋文公还是有意把赵衰安排进去，可赵衰却再次拒绝了国君的好意，他说：“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他们都比我更适合担任这个职位，还是先考虑他们吧！”

这句话当然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中的政治意图。这其中最首要的一点恐怕还是赵衰看重了栾氏、先氏在国内的影响力，这与他推荐郤穀的本意是相同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那就是第三方势力对于这次人事调整的影响。

在任何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国家里，国民的利益诉求和观念传统都不可能完全趋同；在任何一个舆论场中，参与讨论的群体都不可能非左即右；甚至在许多竞争激烈的政治事件中，占据人群绝大多数的中间群体才往往是制胜的关键。

同理，如果我们对此次人事调整中的中军、上军人选进行分析就会发现，郤氏和狐氏两个家族恰恰是代表了惠公旧党和文公近臣两个不同的派别。这种政治派别的分野并未随着惠公父子的没落而消弭于无形，反而一直到了十几年后的夷之蒐时仍然在发挥作用。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所谓的惠公旧党和文公近臣之间的冲突并不仅限于拥护谁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念。在实现了郤氏和狐氏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平衡之后，为了取得更多国人的支持，就必须争取中间群体的支持，这也是赵衰选择推荐栾枝、先轸统率下军的用意所在。

于是乎，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晋国的第一届内阁就出炉了，其中的六卿职位分别由郤穀、郤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担任。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族群属性上，晋国首届六卿所有席位都被公族所占据；在政治派别上，流亡派的贵族只有狐偃占据了一个席位，名列第四位，以狐氏家族为代表的文公势力勉强与以郤氏为代表的惠公旧党分庭抗礼。这种安排尽管很符合周礼，却是一种不平衡的体系，对于想要实现集权的晋文公来说，显然是不完备的。

举善援能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更是一种寻求动态平衡的艺术。这种权力结构的形成，是国君与大夫、居守派与流亡派、公族与异姓大夫互相角力的结果。尽管从短期来看，晋文公在这场博弈中并没有取得多大胜利，居守派贵族和公族相对于国君和外来群体占据了绝对优势，但这种优势也并非是不可改变的。晋文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修改底层权限的后门，使得他可以借助个人威望的不断提升来扩大在内阁中的影响力，进而对纷繁复杂的利益集团进行调整——这正是他发动城濮之战的内在需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后的几年里，晋国的六卿体制又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其十二字方针中的“举善援能”，也即推举良善之人和贤能之士，开始逐渐得以贯彻。

首先是晋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爆发前，担任元帅的郤穀在攻打曹国时死于阵前，晋文公临阵超拔内阁排名第六的先轸为中军将。与此同时，趁着战场上的混乱，他还特别安排公族大夫胥臣出任下军佐，算是又为流亡派争取了一个席位。

伴随着城濮之战的全面胜利，晋文公一跃成为中原霸主，以臣召君挟持天子参与践土主盟，着实出了一把风头，在国际上的威望也达到了顶点。战争的胜利一扫韩之战失败的阴霾，让国人振奋不已，民众的情绪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晋文公趁热打铁，于城濮之战的次年再次进行了一次军制改革，也即“作三行”。

所谓的“三行”，指的是中行、右行、左行三个方阵，其统帅分别是中行将荀林父，右行将屠击，左行将先蔑。至于其具体形式，史书上一笔带过未做详细说明，后世研究者众说纷纭却总难得出让人信服结论。

一般的说法认为，三行是区别于战车方阵的步兵队伍。如春秋末年时，晋国大夫荀吴曾有“毁车以为行”的做法，就是将原来的车兵改为步兵。再加上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述，晋国“作三行”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御狄”，对付常年活动在深山老林里的“戎狄”时，抛弃熟悉的战车，发展适应环境需要的军制，这也算是言之成理。

不过也有论者认为，所谓的“行”也并不一定指代步兵方阵。比如在献、惠时期，常伴国君左右管理副车的“七舆大夫”中就有共华、贾华担任左行、右行等职务。晋文公所建立的三行，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三军罢

了。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只有天子才能保有六军的建制，诸侯僭越建立六军不符合规制，故而只能以三行来作为替代。

不论其真相究竟为何，三行存续的时间都很短，到晋文公八年（前629年）时，仅仅存在了两年多时间的三行就被裁撤了。这一年，晋国在清原举行大蒐，将原来的三行拆解为新上、下两军，再加上原来的三军，晋国的正规军达到了五军规模。

在此之前，担任上军将的狐毛去世，晋文公第三次邀请赵衰入阁为卿。可赵衰仍旧推辞，又推荐了先轾的儿子先且居，还说：“先且居在城濮之战中表现极为优秀，俗话说‘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先且居兼具这三种品质，不能弃之不用。再说了，箕郑、胥婴、先都都还没有入阁为卿，我又怎么能先他们而入呢？”

从赵衰推举的名单来看，无论是先且居也好，箕郑、胥婴、先都也罢，都属于公族的范畴，可见其顾虑仍然没有消退。晋文公不便勉强，再次按照他的意思把先且居推到了上军将的位置上。

这件事情发生后，晋文公有感于赵衰的忠义，盛赞他三次辞让卿位，同时推荐上来的人选都是“社稷之卫”，如果还不让他做卿就是“废德”之举，于是就专门为他举行了这次的清原大蒐。赵衰盛情难却，只好接受了新上军将的卿位，而他所看重的箕郑、胥婴、先都则紧随其后，分别跻身新上军佐和新下军将、佐的位置。

这次调整后形成的五军十卿完整内阁序列分别为：先轾、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

这其中只有赵衰一人是异姓卿，其余位置都由公族担任；但在政治派别上，狐偃、赵衰、胥臣、胥婴皆出身流亡派，比之内阁刚刚建立时的局势，流亡派和居守派基本上已经可以平分秋色，君臣之间的权力博弈再次达到了均衡状态。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晋文公在人事任免上的职权大大增强，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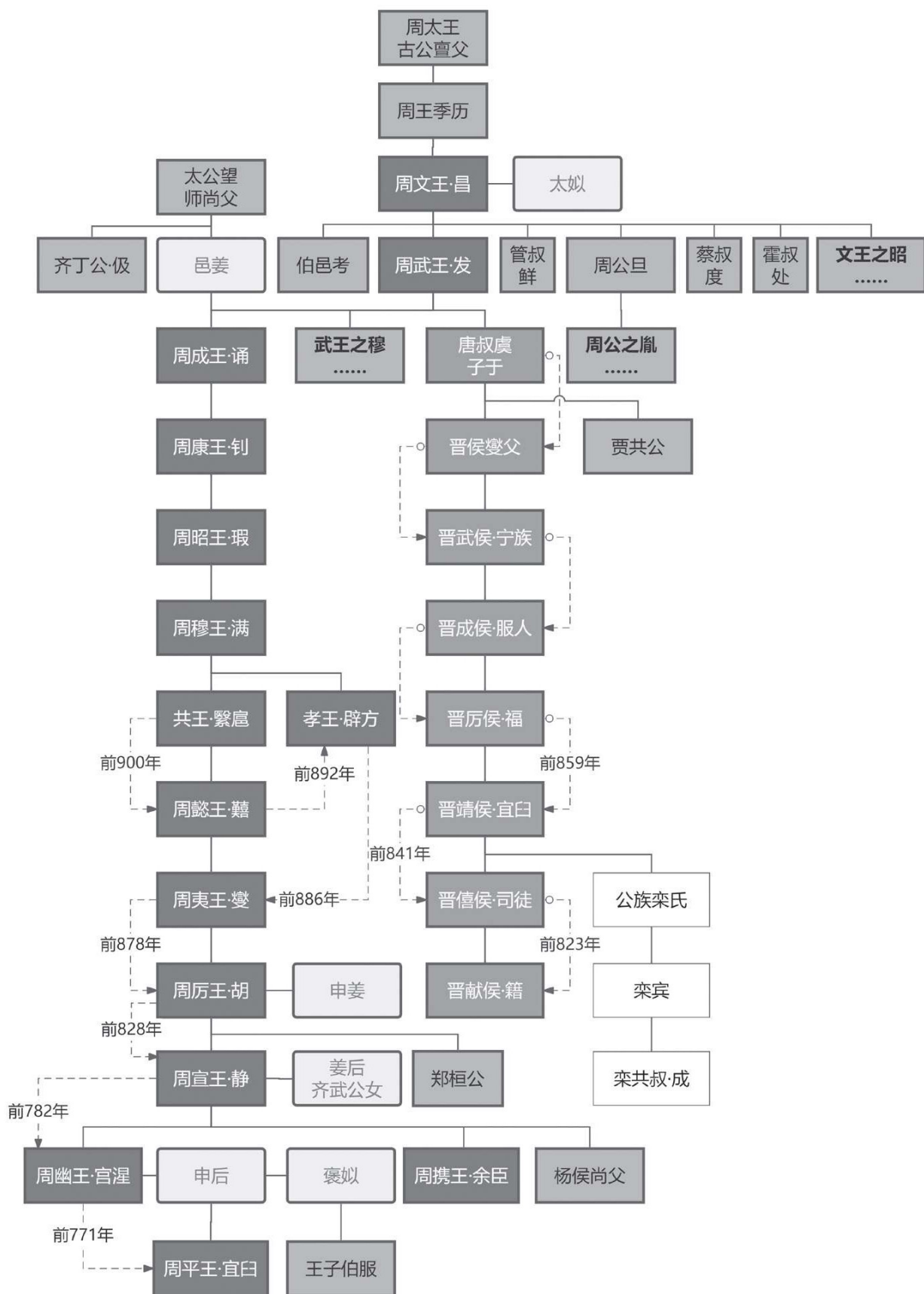
晋文公去世前，他的舅舅先他一步离开了人世，上军佐的位置再次出现空缺。担任上军将的先且居有感于当年赵衰的热心举荐，于是便推荐其顶狐偃之缺。晋文公从其所愿，郑重其事地进行了他国君生涯中最后一次人事调整，拔擢赵衰为上军佐。这次，赵衰也担忧流亡贵族群龙无首，决定挑起重担，接受了这个职位。

通过恢复旧族地位、建立官僚系统、重构经济体制、融合各类族群、规范竞争机制、严明刑罚规则等做法，晋文公终于开创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新局面。特别是三军六卿体制的建立，规范了献、惠时期任贤使能的竞争机制，为所有群体提供了公平竞技的舞台，充分调动了各阶层的积极性，让他们各显其能，从而将竞争所产生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这种制度设计又相当于是一个凝聚人心的大熔炉，将各派政治势力——不管是居守派、流亡派也好，公族、异姓大夫也罢——之间冲突的焦点转移到对元帅地位的争夺上，模糊了政治派别之间的界限，最大限度地凝聚合力，将晋国打造成一个真正可以俾睨群雄的超级强国，开启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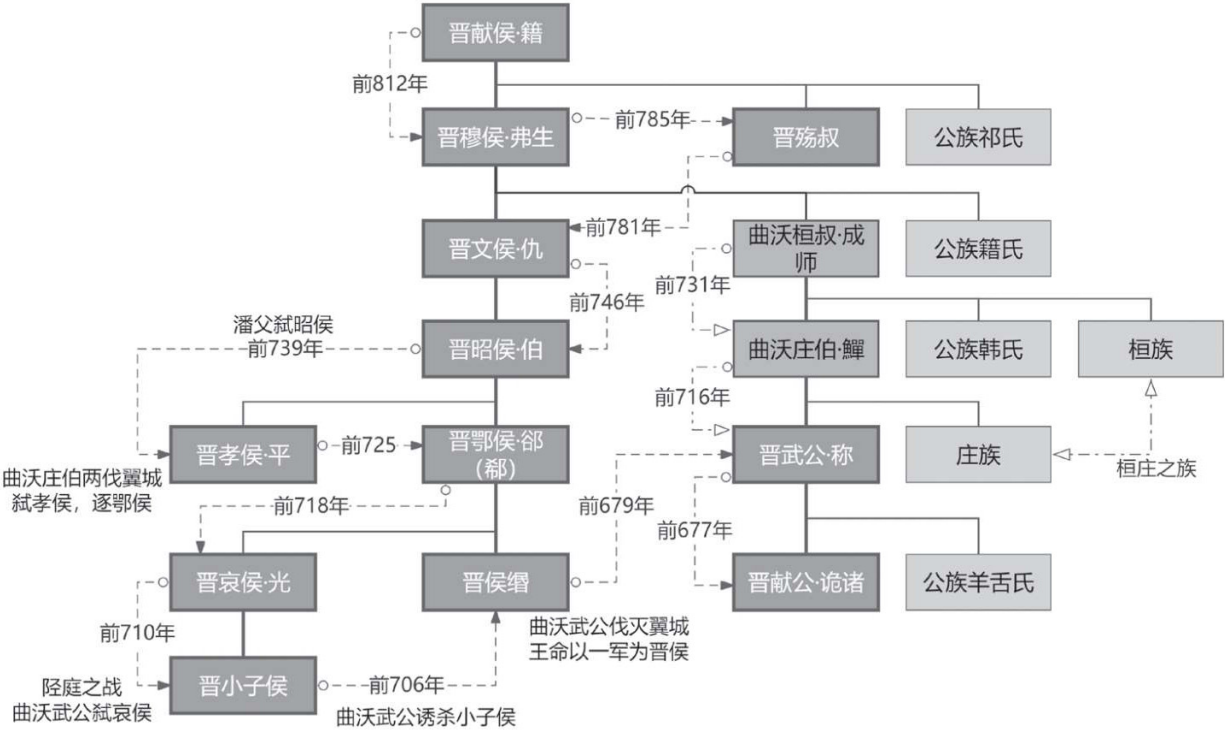
在这持续百年的争霸战争中，一幕幕悲喜剧也开始上演：这其中有昏君庸臣，也有贤君良相；有不择手段的小人，也有谦卑和善的君子；有高居庙堂的世家大族，也有委身陋室的市井小民；有耿直不屈的董狐笔，也有随风摇摆的投机客；有令人向往的君子之风，也有惹人厌憎的钩心斗角；有催人泪下的真情流露，也有激人愤慨的恩怨情仇……

这一幕幕的悲喜剧之下，是被时代裹挟的芸芸众生，他们都在命运的驱使下，在不同的历史关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共同为后来的人们谱写了一曲曲恢宏壮丽的诗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历史图景。历史总有许多精彩的片段，每每读到这些故事，在嗟叹之余，或许更应该深思的是：这些用生命谱写的诗篇、用热泪描绘的图景，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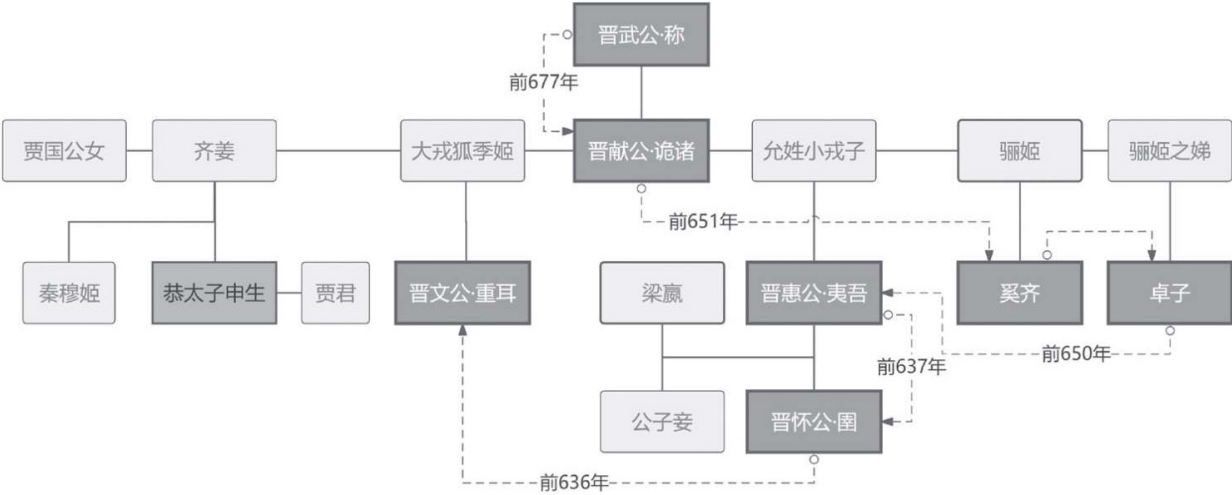
附录



附图1-1 西周时期周朝王室及晋国君主世系



附图1-2 曲沃代翼时期晋国及曲沃君主世系



附图3-1 “骊姬之乱”及“五世昏乱”人物关系示意



第一章 城濮之战与践土会盟

第一节 东出中原

报施救患

晋文公回国后的这几年，中原大地的政治格局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从宋襄公图霸失败后，不甘寂寞的卫国就成了东方世界最为活跃的因子。这个一度被“狄人”攻灭的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渐渐强盛了起来，而与之相比，同样遭到“狄人”侵扰的患难兄弟邢国却是江河日下。正好两国的关系最近不甚融洽，卫国便一心想要灭掉邢国，不料却遭到了齐国的阻挠。

原来卫国也是在齐桓公的主持下才得以复国的，可到齐桓公死后，卫国竟然打起了老恩主齐国的主意。在齐国操控国政的卫国公子开方，把齐国的许多土地都割让给了卫国，引发了后来即位的齐孝公强烈不满，自然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卫国灭邢。两国的战车在邢国的土地上碾来碾去，让邢国人苦不堪言。更苦的是，齐孝公忙活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能护住邢国周全。到晋文公二年（前635年），邢国竟然真的就被灭掉了。

除了齐国，卫国还总是与郑国闹得很不愉快。郑国的国力在齐桓公称霸之前一度是最为强盛的，不仅齐国不是对手，就连周边几个大国联合起来，都讨不到任何好处。然而此时的郑国却颇有些疲弱，在围绕滑国归属而产生的几次交锋中，始终都占不到任何便宜。

不过，卫国虽四处树敌，却并非没有朋友。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与齐国的关系一向也不怎么和睦的鲁国，这些年来就与卫国过从甚密。就在卫国灭邢的同一年，鲁国与莒国闹矛盾，卫国前去调停，三国结为

友好同盟，先后于当年秋冬时节在洮地和向地举行了两次会盟，这让被晾在一边的齐孝公感到十分不痛快，于是便接连不断地侵扰鲁卫边境。

与卫国硬碰硬的打法不同，鲁国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时候，惯于使用借力打力的招数。眼见齐国大军来势汹汹，他们一方面派展喜去犒劳齐军，以拖延其深入的步伐，另一方面则安排东门襄仲和臧文仲到楚国去搬救兵。而那边厢，卫国听说鲁国受到侵扰，也不管对方有没有求救，直接就发兵攻打齐国去了，以至于搬救兵的人还没到楚国，齐国就已经仓促撤军了。

鲁国人找上门来的这个节点，正是楚国最为强盛的时候，尤其是泓水之战后，中原诸国几乎是“闻楚色变”。借着这股势头，楚国先后将郑、宋、鲁、陈、蔡、许、曹诸国都纳入了自己麾下；再加上后来楚、卫联姻，等于是已经将大半个中原收入囊中。这样的成绩，恐怕是连经常名列“春秋五霸”行列的楚庄王都望尘莫及。

然而俗话说“盛极必衰，乐极生悲”，正当楚人为此感到无比骄傲的时候，宋国却突然倒戈投奔晋国去了，这让楚人十分不满。令尹子玉（名成得臣）是个急性子，三番五次地去找楚成王，想要发兵讨伐宋国。可偏偏楚成王是个慢性子，不管他说什么，就是一副“我不想搞事情”的窝囊样，坚决不肯出兵。

子玉心中焦急，径直约了司马子西（斗宜申）一起发兵攻打宋国。大军包围缙邑（今山东金乡）期间，鲁僖公欢天喜地地带领军队前来会合，并唆使子玉攻打齐国，占领了齐国重镇谷邑（今山东东阿）。

楚军驻扎谷邑，使得齐国政局再次陷入混乱，齐桓公的那几个儿子又开始蠢蠢欲动。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六月，齐孝公在内忧外患中辞世，他的弟弟公子雍及七个不知名的公子都投奔了楚国。楚成王把七公子安置到

楚国做了大夫，只把公子雍留在了谷邑，让易牙辅佐其与身在临淄的其他公子对峙。

令尹子玉（成得臣）对此仍不满足，他追求的是让楚国彻底征服整个中原，因此必须要将宋、齐这两块难啃的骨头都拿下，为此他又于当年冬天调集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围攻宋都商丘。眼见联军兵临城下，曾与晋文公有过私交的公孙固急忙去向晋国求救。

接到宋国求救的消息，晋文公一刻也不敢耽搁，召集诸大夫入朝议政，商量是否该救援宋国。

在当下这个时节里，“恐楚症”是中原各国的通病，晋文公也不能例外。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被宣召进宫的诸大夫对此竟没有丝毫忧虑，反而一片欢欣雀跃：等了这么多年，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先轸更是借用当年晋文公流亡宋国时的故事说道：“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就在此一举了！”

事实上，晋人这种积极姿态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势在必行。多年来楚国对于中原的经营，使得以礼乐文化为傲的华夏诸侯尽皆沦陷，也让尚未臣服于楚的齐、秦、晋等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看楚令尹子玉那股锐意进取的劲头，在征服了宋国和齐国之后，难保其兵锋不会指向秦、晋两国。这也就意味着，晋、楚两国将来必然会在战场上相遇，这其中的差别只在于：当两国交锋的时候，晋国是否还有可以退避的战略空间？是否还有盟友为其摇旗呐喊？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晋国一方面在被庐建立三军，任命郤穀、郤溱统率中军，狐毛、狐偃统率上军，栾枝、先轸统率下军，担任三军统帅，另一方面则针对当前的局势，展开了周密的部署。一切布置妥当，晋国三军

便于是年冬天出中条山，沿着黄河北岸向东挺进，意气风发地走向了中原战场，准备介入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之战。

侵曹伐卫

春秋时期列国林立，大国之间相互争锋，既有当面锣、对面鼓的战术对抗，也有避实就虚、曲线作战的战略游戏。而当战争规模超过一定数量级，或者战争胜负影响很大时，对抗双方往往会更加谨慎，采用诸如“围点打援”“围魏救赵”之类的策略，在运动战中寻求战略缓冲、选择作战时机。

比如在宋楚泓之战中，面对宋国的挑衅，楚国并没有派兵直接救援郑国，而是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攻打宋国以迫使其回师。而在包括城濮之战在内的晋楚历次大战中，进攻方都是先围困对方的盟友迫使其前来救援，然后再通过与对方的接触选择合适的时机展开决战。

在出兵援宋大略方针已定的情况下，晋国的公卿大夫们仔细分析了当前敌强我弱的态势，梳理了中原各国的邦交关系，并对进军中原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初步推演。

当此之时，楚国在中原盟友众多，宋国已处于其盟友的包围之中，重兵突进式的直接救援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即便不考虑其联盟关系，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楚国在包围宋国的同时，还另外派出了一支军队与鲁国合兵一处，驻扎在齐国的谷邑，与宋国的联军主力形成犄角之势。如果晋国贸然向宋国进军，极有可能引起谷邑驻军的联动，从而受到夹击，被楚军包了饺子。

除此之外，国际政治最讲究名正言顺，军队出征必须师出有名。尽管当前晋宋关系良好，但彼此之间并无盟约，晋国没有必须出兵救援的义务。而

晋楚两国山高水远，彼此之间毫无交集，没有充足的理由便扬言救宋伐楚，在道义上并不占据主动。

针对以上问题，狐偃胸有成竹地提出：“曹国刚刚与楚国交好，而卫国则与楚国有婚约，如果我们出兵讨伐曹、卫，楚国必定会前来救援，如此可解宋、齐之危局。”

这个建议可以说正好切中要害。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卫、曹之君皆未加以礼遇，以此为由讨伐曹、卫可谓名正言顺，即便是楚人有再多不满，也挑不出理来。而从战略角度考虑，曹卫两国地处中原要冲，其东、北接鲁而连齐，西、南临郑而近宋，占据此战略要地，既能够以围魏救赵的策略诱使围困宋国的主力前来决战，又可以就近监视谷邑方面的动态，并在必要的时候牵制其行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晋国人虽然自信满满，却还没有膨胀到以为自己能够“吊打天下”的地步，他们的策略是尽量保存实力留待与楚国决战。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他们对于曹、卫两国的态度是不同的。对待相对弱小的曹国，晋文公毫不含糊地把自己早年流亡时的不幸遭遇搬了出来，作为介入中原事务的借口。而对卫国晋文公并没有提起当年碰了一鼻子灰的旧事，只是和和气气地去向卫国人借道。

这一次，晋文公又碰了一鼻子灰。这事说起来倒也不难理解，于卫国人而言，晋卫两国的确同是文昭武穆、王室后裔，可如今中原战火弥漫，晋人早不借道、晚不借道，偏偏挑选了这个时候借，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去找楚国晦气的。这就使得借不借道变成了在两大强国之间选边站的问题。

当时各国普遍都认为楚国的强盛是无法逆转的趋势，整个中原都已经沦陷，区区晋国又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为了不得罪楚国，卫国拒绝了晋国

借道的请求。

开弓没有回头箭，眼看借道不成，晋军只好迂回到棘津渡过黄河，准备在曹国部署兵力。但在进入曹国之后，晋国人突然回过味来了，于是又迅速改变战略部署，分兵北进，先行对卫国展开侵扰。

不打不知道，卫国虽然能跟齐国、郑国死磕，但与晋国一交战，马上溃不成军。伐卫的军事行动进展得十分顺利，到文公五年正月初九日（夏历去年十一月份），晋国就攻取了卫国的五鹿（在今河南濮阳南），并于次月进军敛孟（在今河南濮阳东南），实现了牵制谷邑的战略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卫国因无法抵挡晋军的攻势，便向其盟友鲁国求援。鲁国起初也不知虚实，便派公子买带兵救卫，但在得知晋国实力之后立刻就变了卦。鲁僖公忙召回军队并杀掉了公子买向晋国示好，可一扭头却又告诉楚国说，是因为公子买临阵脱逃才杀掉他的。

齐国方面，因楚军一直占据谷邑，令其国内的局势变得特别紧张。混乱之中，卫公子开方杀掉了齐孝公的儿子，立了齐桓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潘为君，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继位之后，担心楚国会扶植公子雍抢夺自己的君位，因此也一刻都不敢懈怠。等到晋国进军敛孟与楚军互相遥望时，齐昭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赶忙派人去与晋国结盟。

眼见无法抵挡晋军，卫成公这才感到后悔，便想借机与齐、晋两国一同结盟，谁料竟被晋人严词拒绝。既然求和不成，那就向楚国求援吧！可卫国贵族却又不愿意跟晋人死磕，为了讨好晋国，他们竟然合起手来把卫成公赶到了襄牛（又名襄陵，为宋襄公葬地。在今河南睢县）。

北路军在卫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围攻曹国的那一路进展却很不顺利。曹国在中原属于三流诸侯国，实力并不强悍，但晋国人打着“复仇者联盟”的旗号，气势汹汹围攻曹国都城陶丘，曹国人面临亡国绝祀的灭顶之灾，自然要拼尽全力做殊死搏斗。进攻曹国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晋军不但没能拿下陶丘，反而把晋国第一任中军大元帅卻縠给搭进去了。

卻縠死后，晋军士气受到很大挫伤。在这个关键时刻，晋文公不计前嫌，将曾带兵阻击其回国的先轸，从排名最末的下军佐直接超拔为中军将，带领大军继续猛攻陶丘。

这场持续数月的围城战，让无数的晋军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对晋人表示羞辱，也为鼓舞国人的士气，曹国守军将晋军尸体陈列于城头之上。看到曹国人如此羞辱阵亡将士，晋人皆义愤填膺，于是纷纷建议将营地转移到曹国人的公墓，这可把城里的那些人都给吓坏了。

当时的崇信祖宗神灵，欺凌祖墓是对国人最大的侮辱，曹国人拼死抵抗，为的就是保存祖宗社稷。于是他们赶紧把晋军尸体装进棺木以赔罪，而先轸则突然下令进攻，趁曹国人运送棺木的机会，晋军攻入了陶丘，围攻曹国的战役终于告一段落。

第二节 城濮之战

子玉其人

此时正是晋文公五年（前632年），周历三月初八日。

晋国出兵数月，先后攻克了卫国、曹国，迫使依附于楚的鲁国开始左右摇摆，受楚逼迫的齐国也与晋国结盟。原本声势浩大的楚国阵营被迅速瓦解，仍然跟随其左右的就只剩下了郑、陈、蔡、许四国，军事行动初见成效。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申叔（申公叔侯）所带领的谷邑驻军，还是令尹子玉（成得臣）亲率的围宋部队，对晋国在北方所展开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全都无动于衷。也就是说，战争打了两个多月，晋楚双方的主力部队还没有正式接触。

在史书中，令尹子玉是一个“刚而无礼”之人，为人刚愎自用且不懂礼义，根本不适合担当一国统帅。《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在出兵伐宋之前，楚成王为了检验令尹的治军水平，让前任令尹子文（斗穀於菟）和现任令尹子玉分别进行了一次军事操练。老令尹子文的演习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没有处罚一人就把军队治理得井井有条。新令尹子玉则用了一天的时间，其间鞭打了七个人，还用箭射了三个人的耳朵，这才把军队调教得像一回事。

子玉的成绩虽比不得子文，可到底还是不错的，因此人们都向老令尹表示祝贺，一个叫蔦贾的年轻人却不以为然地说：“您的贤能众所周知，却把朝政大权传给了子玉，说是为了国家安定，可安定于内而失败于外又有何用呢？子玉其人刚而无礼，统领的兵车只要超过三百乘，恐怕就回不来了。由

于你的推举导致对外作战失败，这有什么好祝贺的呢？如果他真能得胜回来，再祝贺也不迟！”

蒍贾是否真的说过这席话我们无从知晓，这话也并非全然可信。楚国当时的政局，正是若敖氏权力炙热之时，前后两任令尹子文和子玉，以及此次出征的左军统帅子西（斗氏，名宜申）、右军统帅子上（斗氏，名勃）都来自若敖氏家族。若敖氏的一家独大，难免会引发其他家族的不满，作为若敖氏的政敌，蒍贾的话多少还是有些斗气的成分。

除此之外，《左传》中还记载了一个颇富神话色彩的故事，说是子玉给自己打造了一套“琼弁玉缨”（镶嵌了珠玉的马冠马鞅，也有人将其理解为子玉自戴的冠带），制作得精美绝伦，以至于连河神也艳羡不已，故而特地托梦给他说：“只要你把这套琼弁玉缨送给我，我就赐给你孟诸的水草地。”

孟诸是宋国的土地，河神许诺赐以“孟诸之麋”，意即会保佑其伐宋功成，然而子玉却不肯允诺。他的儿子成大心以及左军统帅斗宜申感到十分不解，于是就派荣黄前去劝解。荣黄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只要能够有利于国家，哪怕是去死都无不可，更何况是献出美玉呢？跟国家大义比起来，这些都不过是粪土罢了！如果能使军队取胜，有什么可惜的呢？”

然而子玉似乎是名坚定的无神论者，对荣黄的劝说丝毫不为所动。荣黄怒不可遏，出来之后就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道：不是神明让令尹失败，令尹根本就不把百姓的事情放在心上，实在是自取其败啊！

战前斗智

事实上，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子玉虽说身上毛病不少，但其军事素养和政治觉悟并不差。早年公子重耳也即后来的晋文公在楚国流亡时与他有过几次照面，当时子玉刚刚从子文手中接过令尹的职位，担心重耳回国会对楚国不利，曾多次建议楚成王将其杀掉。如今晋国在中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其目的就是为了激怒楚军，让他们主动挑起战事。然而子玉却一反常态不为所动，执意要先打下宋国再说，继续加紧攻势。日趋严峻的军事形势让宋国人感到十分吃力，也让晋文公忧心忡忡。

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对手只是寻常将领，子玉也不见得会输，可偏偏他碰到的是著有兵书《孙轸》且以谋略著称的军事家先轸，这一战就有看头了。

为了迫使楚军放弃宋国引兵北上，先轸秘密派人到宋国活动，说服他们给齐、秦两国送去厚礼，希望这两国能劝说楚国撤了商丘之围。这个计策的绝妙之处在于，楚军包围商丘已有小半年，商丘城破已经指日可待，在这种关键时刻任谁也不可能轻易放弃。而一旦他们拒绝了齐、秦两国调停的提议，就等于同时得罪了东西方的两个大国。当时总共就四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有三个就跟楚国不对付，你说楚国这仗还怎么打？

不过，这其中也存在不确定因素，齐、秦两国作为调停方，他们既可以为晋国办事，也可以为楚国所用。尽管从目前的局势来看，楚国实际上早已向齐国宣战，而秦国则跟晋国同气连枝，可他们之间也并不是没有矛盾。只要还没有摆明立场，他们未必会真的介入晋楚之间的冲突，甚至在适当的时机，还会为了自身利益被楚国拉拢，选择与晋国决裂。万一这事让子玉想明白了，然后见招拆招玩起了外交战，晋国就有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个时候晋国该怎么办呢？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断绝楚人的念想，排除掉齐、秦两国被策反的可能性，为晋国创造一个占据绝对优势的外部环境。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先轸利用列强调停的机会，公然把曹、卫两国的土地分给了宋国，从而给楚人造成一个假象，让他们以为齐、秦两国的调停是在配合晋国的行动。如此一来，即便是子玉有心接受调停，他手下的将士们也不答应。

这一连串外交戏法让楚人眼花缭乱，坐镇大后方的楚成王一看情况不妙，知道晋国人设的这个套，子玉十有八九得往里跳，就急忙带着亲兵撤退回国，驻扎到申县观察局势。临走之前，还特意传话给子玉和申叔，让他们分别从商丘和谷邑撤军。

俗话说“当局者迷”。子玉身为三军统帅，在这种时候发布撤军的命令并不容易。在先轸的一再刺激下，他明知局势已经对己方不利，却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楚成王也知道子玉的难处，故而循循善诱劝导他说：“晋侯在外流亡十九年，艰难险阻都已尝尽，民情真伪也尽辨知。上天给了他年寿，又帮他去除了祸患，就是为了成就他，这岂是人力所能阻止的？古语有云，‘适可而止’‘知难而退’，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然而对令尹子玉来说，他最大的敌人不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而是隐藏在朝堂之上。蒍贾说他刚而无礼，且不会治军，这既是在表达对若敖氏专权的不满，也是在讥讽子玉是个无能之人。流言纷纷让子玉如鲠在喉，明知前路多坎坷，也始终不愿低头。

假如在这个节骨眼上撤军，正应验了那些人对他的质疑和挖苦。他们不会设身处地地去理解这个决策背后的原因，只会变本加厉地嘲讽若敖氏怎么

出了这样一个无能之辈。那些潜藏在阴影中的敌人会趁机发难，挑战令尹的权威，动摇若敖氏的根本。

子玉不想做若敖氏的罪人，更不能忍受这样的屈辱，他需要打一场胜仗来洗刷耻辱，这就意味着战争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能半途而废。他拒绝了成王诏令，同时含着泪水对使者说道：“我并不敢说一定要建功立业，只不过是想借此堵住奸邪小人的口罢了！”

看到令尹如此冥顽不灵，一直以来对其颇为迁就的楚成王终于也发怒了。他只给了子玉少量的军队，这或许是为了减少损失，但也或许是想借刀杀人。可对子玉来说，这些问题都已经无暇考虑了，他必须要强打精神，尽全力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思忖之后，子玉派宛春为使向晋军提出议和的条件，提出只要对方恢复了卫侯的君位，并把私分的土地还给曹国，就答应解除宋国之围。

这番交涉也算是有礼有节：我楚国攻打宋国是有那么一点霸道，可你们晋国无端讨伐曹、卫也不能说是完全占理吧？咱们大家各退一步，恢复中原的秩序，岂不是皆大欢喜？

但晋人却并不买账，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劈头盖脸地斥责来使：子玉好无礼！他一个楚国的臣子，与我们的国君谈条件，一下子提出了两个要求，而自己却只做一个让步，这也太没有诚意了！看来这仗是非打不可了！

狐偃的这番话将晋国的意图暴露无遗，若果真如此答复，那么先轸苦心孤诣营造出来的舆论环境就会毁于一旦。为了尽可能地创造对晋军有利的条件，先轸提出：子玉的要求尽管不合于礼，可我们却必须要答应。因为楚国人提出的要求可以安定三个国家，假如我们不答应，就意味着是我们执意要

将他们继续拖入战争的泥潭。如此一来，就意味着楚国施予三家恩惠，我们结了三家的怨仇。不能安定别国就是无礼，结仇太多就无法作战，将来晋军还如何取胜呢？更何况，我们这次出兵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解救宋国，不答应楚国的条件，就等于是抛弃了他们，这又该如何向诸侯解释呢？

看到在座的似乎还有人不理解，先轸旋即提出两条计策：第一，条件是一定要答应的，但不是对楚国，而是对曹、卫。我们私下里与曹、卫结盟，恢复他们的土地和地位，这样原本是楚国施与两国的恩惠，就变成了我们主动的给予，从道义上我们更胜一筹。第二，则是要把宛春扣留下来，子玉知道之后一定会暴跳如雷，不顾一切地前来讨伐。到时候，我们再徐徐图之，岂不更好？

退避三舍

子玉并不是不懂计谋的莽汉，他派宛春前去议和，恐怕就是为了陷晋国于“非礼”的境地，从而为自己争取主动。他以己度人，认为既然自己对已经取得的战果不肯放手，那么晋国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眼前的大好局面。可跟老谋深算的晋国人比起来，子玉的那点小心思简直是太天真了。

晋国私下里恢复了曹、卫的地位，就等于是答应了议和的条件，一举而施恩于三国。与此同时，他们又鼓动曹、卫断绝与楚国的关系，并扣留了求和的使者，以此来激怒子玉，从而将挑起战争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楚国。

在这场战争中，晋国方面各种诡诈之谋层出不穷，同时又牢牢地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使得子玉无论是在外交环境上还是在战争形势上都落了下风。事已至此，子玉已无路可退。他把满腹的委屈、怨恨以及对晋国人的不满都压在心底，毅然选择了一条充满了危机的道路。

在先轸不断的诱导之下，子玉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晋国人却越发从容。他们不断地激怒对手，却又不与之交战，反而是引着楚军在中原大地上四处奔走。当子玉带着大队人马跨越千山万水，从商丘赶到陶丘，想要跟晋军决一死战的时候，看到的却是晋军撤退时留下的滚滚烟尘。

这种做法别说是楚国人了，连晋国的将士都很不理解，他们遍览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时期的历次战争，还真没见过仗竟然可以这么打！有军吏壮着胆子问道：我们的国君亲临战阵，而对方带队的却只是一名大夫。让我们的国君躲避对方的一名大夫，这未免也太屈辱了吧？再者说了，楚军长途奔波赶到此处，早已是疲惫不堪，为什么不趁他们疲惫的时候袭击，反而要退走呢？

对此，狐偃给出了一个很合乎“礼”的解释，他说：“师直为壮，曲为老。”理直才能气壮，理亏就会气衰，这跟他们是不是长途跋涉没有关系。当初国君在外流亡时，曾受过楚国的恩惠，因此便许诺要“退避三舍”以报答楚王的恩情。倘若我们背弃恩惠、食言自肥，就会让敌人义愤填膺充满斗志，这样一来我们理屈、楚人理直，“老”（疲惫）的就是我们了。反之，我们的国君带兵退却，而他们的臣子却紧追不舍，理亏的自然就是他们。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对待“恩惠”的态度上，晋文公与晋惠公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当初晋惠公回国时，尽管秦穆公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但这毕竟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且秦穆公已经履行了他的承诺，晋惠公的违约哪怕是有再多的借口，也终究会落人口实。而晋文公则不同，他当年提出以“退避三舍”作为报答时，其前提是楚成王能帮助他回国即位。但后来楚成王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晋文公即便不报答他也是无可指摘的。如今在战场之上，晋文公提出以“退避三舍”来报答楚成王的恩惠，既展示了自己的仁义形

象，从而为晋国的军事行动获取了充分的正当性，又可以借此掩盖其真实的战略意图，这显然要比晋惠公的莽撞蛮干机巧得多。

在不断追击与退避之中，楚军将士的斗志渐渐被拖垮，而令尹子玉却因为求战不得，变得更加气急败坏。楚军渐次被引到晋军预先设定的战场上，在那里，秦国公子小子憖和齐国大夫国归父、崔天正带着本国的军队，从卫国的斂孟缓缓南下，准备要跟晋军合兵一处，共同向楚军发起挑战。

战争的真实进度正符合先轾的预期。四月初一日，晋文公、宋成公和齐、秦两国大夫在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镇）会合。追击多日的令尹子玉顾不得修整军队，就派斗勃下了战书，战书的文辞很是逗趣，说的是：“我们的战士想跟你们的勇士切磋一下。晋君只需靠在戎车的横板上观看即可，得臣也想借您的光一饱眼福！”

听到子玉如此谦卑的措辞，晋人自然不能失了礼数。晋文公于是派下军将栾枝去答复说：“您的意思我们国君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国君因为时刻不忘贵国君主的恩惠，所以才退避至此。本以为大夫已经退兵了，毕竟臣子是不敢与国君对抗的。可如今既然您不肯退兵，寡君也只能奉陪到底了。那就麻烦您回去跟你们的勇士通报一声，让他们都抖擞起精神，准备好战车，忠诚于国事，明天早上就比试比试！”

临战心怯

尽管晋人一再激怒楚军，引导子玉率先宣战，可当战争真的要来临的时候，却还是感到忐忑不安。以往晋国的对手都是如虞、虢、魏、耿、霍那样的小国，就算有那么一两次打不赢，也不会危及国本。晋国唯一参与的一场大战，还是十多年前在韩原与秦国的冲突，而那次战争的结果，可以用惨败来形容——想起当年惨败的场景，不少人至今还心存余悸。

可如今他们面对的又是谁呢？是当时人们所知范围内最强大的国家，一个让中原诸侯都闻之丧胆的超级强国。迄今为止，整个中原还很少有谁敢于跟楚国叫板，即便在齐桓公称霸的时候，有众多诸侯的拥戴，也只是把对方吓退了事。中原国家与楚国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是发生在宋国的泓水之战，而那场战争的结果，想必所有人都清楚。

泓水之战爆发的时候，晋文公当时还正以诸侯公子身份在宋国流亡，他目睹了楚军碾压宋军的全过程，那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场面惨不忍睹！每忆及此，晋文公就忍不住全身发抖，他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上，而自己则化身为宋国的一名士兵，面对着楚人举起的屠刀，只能瑟瑟地举起双手，乞求对方手下留情。

当战事日渐临近，这种恐惧感就愈发让人战栗，以致夜深人静的时候，晋文公竟然做了一个噩梦。梦中他跟楚成王搏斗，不幸被打倒在地，战胜的楚成王就像是一只饥饿的老虎，趴在自己的身上啃食脑浆。而这个时候，晋文公却四肢麻痹、口齿失灵，动也动不得、喊也喊不出，最后把自己吓醒了。

为了平复他内心的恐惧，狐偃劝慰说：“楚王俯身，就是要服罪的意思；而国君您仰望苍天，正是得到了上天的垂爱。如此大吉之兆，有什么好担心的？”

晋文公的情绪显然没有平复下来，过了些许时候，他隐隐听到营帐外将士们在唱歌，歌词中有一句“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文公听了疑心士兵要造反，狐偃鼓励国君说：“决计战吧！战胜了必定可得天下诸侯的心，如果战败，晋国表里都是山河，谁又能奈何得了我们！”

晋文公还是想打退堂鼓，可这种话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他只能不断地寻找借口，转而叹息道：“可是楚国对我有恩啊！”栾枝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楚国给予的都是些小恩小惠，可他们却吞并了汉水以北的姬姓诸国，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如何能因为这些小惠而忘记了过去的耻辱呢？还是和楚人一战吧！

尽管在历史上晋文公威名赫赫，可他和普通人一样，面对危险会胆怯、会恐惧。可他从不曾忘记自己肩负的使命，流亡多年，也依然不改初心。也正是这份使命感，使得他无可逃避，只能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勇往直前，最终从一个到处碰壁的失败者变成了人生大赢家。这也正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不逼一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出奇制胜

晋文公五年周历四月初二日，夏历正是“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晋楚两军在城濮摆开了阵势。

关于城濮之战双方实力对比，研究者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对其具体兵力规模的说法不一而足。有认为晋楚两军势均力敌的，但也有说晋军只有楚军一半的，至今无有定论。

按照史料记载，晋国此次三军悉数出动，按每军一万两千五百人来计算，总兵力约有四万人；出战的兵车数量总计为七百乘，按照每乘配备七十五名甲士来计算，则有五万余人。另有齐、秦、宋等国的“助威团”从旁待命，其兵力规模不详。

楚国方面，由于主将子玉不听指挥，楚成王只给他留下了若敖氏六卒和西广、东宫的部分兵力。其中的六卒为一百八十乘，再加上西广、东宫的车

驾三十乘，总计也就是二百一十乘。楚国的左军是围攻宋国的申、息两县军队，据推测应该在三百乘上下；而右军则是陈蔡联军，其规模与中军应该不相上下。因此统合起来，三军合计也在七百乘左右。考虑到楚国右军主力是陈、蔡等国联军，其数量或许会多于中军，但其战斗决心和协同作战能力却要打个折扣。因此，即便是楚军兵力多于晋军，双方实际战斗力也不会太过悬殊。

在进行战争部署时，考虑到这是晋国建国以来所参与的最大规模战争，且为了避免重蹈韩之战轻敌败北的覆辙，晋军格外审慎。

首先是在战略上，他们抛弃了以往全军对阵迎敌的惯例，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手段，将三军分成了五个独立的单元。其中，中军由先轸、郤湫统帅，对阵楚军主将子玉所统率的若敖氏六卒，中军战车、军士数量旗鼓相当，可以确保对垒时不至于出现太大的纰漏。

这个布置也算是中规中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另外两军就不同了。下军被分为两部，一部由下军将栾枝率领，对阵左军统帅斗宜申（子西）所率的申、息两县军队；另一部由下军佐胥臣统率，对阵右军统帅斗勃（子上）率领的陈蔡联军。

将下军一分为二以对阵楚国左、右两军，兵力上显然不占优势，可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别忘了晋军最大的特点就是狡猾，狐氏两兄弟带领的上军特意被空出来，并不是要让他们去观光旅游的，而是作为奇兵做了特别的安排。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散布在军阵的右翼和中军之前，负责机动作战，保证上下两军在具体作战时有回旋的余地。

除此之外，还有齐、秦、宋三国的军队。诸侯联军难以统一协调，先轸在最初的布置中并没有将其作为参战部队来看待，他们只需要跟国君护卫队

一起列于军阵后方，陪着晋文公观战便是。也只有当三军主力出现纰漏的时候，才需要他们配合作战。

在具体的战术上，晋军同样放弃了以往贵族战争的刻板作战方式，大胆地采用了多方阵协同作战的新战术。这些作战安排，子玉恐怕是完全没想到的。如果宋襄公泉下有知，看到了晋军采用的非传统作战方式，也一定会痛骂晋文公是中原文明的败类。

双方部署已毕，春秋历史上南北之间的第一场世纪大决战就伴随着隆隆鼓声揭开了大幕。

战争开始后，首先出动的是下军佐胥臣率领的战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楚右翼的陈蔡联军。右军统帅斗勃看到滚滚烟尘顺着凛冽的北风朝着自己呼啸而来，却也不甘示弱，在战车上挥舞着鼓槌，带领全军驱动战车向北方奔腾而去。可双方的烟尘刚刚混同在一起，就猛然听到战马的嘶鸣此起彼伏，原来是陈蔡联军的战阵瞬间就被击溃败散了。

斗勃被溃退的战车裹挟着寸步难行。他怒不可遏，挥舞起长戈想要阻拦那些临阵脱逃的人，却无济于事。斗勃勉强能够驱车向前，可还没走出多久，就连他的战车也失去了控制，紧接着就看到一群老虎拉着战车向他直冲过来。

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些拉车的绝对不是什么老虎，只是披着虎皮的战马。可他的战马却吓破了胆，不管驾车的人如何鞭打，还是没命地往回跑。斗勃明知对方耍的什么伎俩，却无法阻挡大军的溃散，只能在战马的牵引下奔逃而去。而为了防止溃退的乱兵窜入中军阵地扰乱部署，管束前军的上军将狐毛迅速派出两支小分队对失序的陈蔡联军进行阻隔和驱离。

战场的另一侧，栾枝所率领的部队则与楚国申、息两县的精兵对峙。申、息两县是楚国北略中原的桥头堡，也是若敖氏家族的大本营，从那里走出来的战士都有着很高的战斗素养，对待这样的精兵，自然要采用符合他们身份的战术。

战不多时，栾枝便佯装战败，撤退时还派人用战车拖曳着树枝扬起尘土来迷惑对方。左军主帅斗宜申不知是计，带领了申、息两县子弟全军出击，结果被晋国中军以公族之师拦腰截断。

当此之时，狐毛所率领的前军调转车头，从背后围堵其退路，与佯装败退的栾枝所部形成夹攻之势；狐偃所带领的机动部队则从外侧包抄，与中军形成夹攻之势。晋军以近三倍于敌军人数的优势，将追击的楚左军分割包围了起来，胜负可想而知。

当此左右两翼被晋军击溃之时，子玉奋力向前，却发现自己钻入了晋军的口袋。已经无力回天，他只能忍痛下令收兵，这才避免了中军遭遇重创。于是，在数月的铺垫和较量之后，仅仅经历了几个小时的激战，永载史册的城濮之战便以晋军的完胜宣告结束。

第三节 践土会盟

人莫予毒

眼下的这个初春注定将会成为一个彪炳史册的时刻，然而对于子玉来说，这却是个落寞的季节，他的一切注定要随风而逝。

正当他带着军队从遥远的北方有序撤回的时候，昔日的营地已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那些昨日里还匍匐在楚军脚下的中原人，此刻却在晋人的引导下，用楚军留下的粮食庆祝胜利。坐镇后方的楚成王得知战败的消息，也派人前来责问：“申、息两县的子弟伤亡惨重，大夫就这么回来，怎么向两县的父老交代呢？”

不过子玉并没有听到这些责难，他的儿子成大心以及司马斗宜申知道他内心煎熬，早早地就把成王派来的使者拦住了。只是，子玉是个明白人，都不消楚王的提醒，他自己也知道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了。

申、息两县子弟是若敖氏乃至楚国的命脉所在。这次战争中，晋人似乎早就盯紧了若敖氏的命门，特意在战场上以三倍兵力对其进行合围，使得两县子弟损伤惨重。

他之所以没有选择“乌江自刎”，是因为还肩负着重大的使命，那就是把中军的若敖氏六卒完完整整地带回去，也算是给族人一个交代。为此他一路上时时小心、处处戒备，直到将大军带回安全地带后才慢慢松懈了下来。

子玉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将领，只可惜生不逢时。他恰恰在晋国刚刚改制的时候担当了楚国令尹的角色，又遇到了一个军事天才先轸和一个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让人摸不清底细的晋国。晋国在城濮之战中采用的各种复杂的军

事技术，在以往的战争中从未出现过，仅靠经验很难应对。或许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莫过于避而不战，可彼时楚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又不允许他退避。

尽管如此，当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他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冷静，为若敖氏保留了最后的火种。也正是因为这些缘故，晋人对这样一个手下败将多少还心存忌惮，不敢掉以轻心。可子玉无法面对自己的惨败，终于还是在营帐中自尽了。听到子玉自杀的消息，晋文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兴奋地说道：总算没有人再来加害于我了！

晋国在城濮之战中取得大捷的消息，很快就在中原大地上不胫而走。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一直在西方世界韬光养晦的晋国突然爆发了，仅仅用半天时间就把人人敬畏的超级大国给打败了。那个多年前无人乐见的流亡公子，突然间就变成了“拯救中原”的超级英雄，真让人生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沧桑巨变之感。

此时对于各诸侯国来说，最要紧的不是乱发感慨，而是要赶紧去巴结新霸主——这其中最有紧迫感的还是郑国。因为在不久之前，郑国还紧紧地团结在楚成王的周围，充当其侵略中原的马前卒，楚国横扫中原的军功章上，也有郑国的一份功劳。更要命的是，当年公子重耳经由郑国入楚之时，郑文公对他很是轻慢，而他的弟弟叔詹更是提出过杀人灭口的计划。一想起这段往事，郑文公就不由自主地冒冷汗。

眼下还不是忏悔的时候。一收到战场上的消息，郑文公就马上派人去盯紧晋国军队的走向，等到他们进入了郑国境内，受命前来请罪的子人九（子人氏，名九，郑庄公之后裔）早已恭候多时了。

晋文公正在兴头上，骄傲得根本顾不上搭理那些陈年往事，很爽快地答应了郑国的请求。为表郑重，他还特派下军将栾枝到郑国去，与郑文公就两

国结盟的具体事务达成了初步共识。五月初九日，也就是战争结束一个多月后，晋、郑两国国君在衡雍（郑地，在今河南原阳以西、践土东北方向）举行了盛大的结盟仪式，宣告两国正式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

原先依附于楚的鲁、陈、蔡等国纷纷向晋国递出了橄榄枝，晋文公也都来者不拒。卫成公虽然流亡在外，可他知道大势已去，也同意弟弟叔武代表自己去向晋国投诚。其他的诸侯如齐、宋、莒等国自然也不能免俗，纷纷带上了厚礼，向晋文公表示祝贺。

整个中原都喧闹了起来，所有人都围绕在晋文公周围，为他所取得的胜利而兴奋不已。于是乎，晋文公打算为自己举办一个史无前例的庆功仪式，昭告天下。

四月二十七日，大军刚刚抵达郑国的衡雍，晋文公就忙不迭地开始操持会盟有关的事务，并擅自做主要在践土为天子兴建一座行宫。半个月后，行宫初具规模，晋文公又举行了庄严的献俘仪式，将城濮之战中抓获的战俘千人、兵车百乘移交给周襄王。

献俘仪式上，晋文公特意采用了周平王时的规制，以郑文公担任天子的襄礼，再现了当年晋文侯接受天子诰命的场景。面对此情此景，周襄王虽面上堆笑，心里却没有半丝欣喜。他不仅为周平王当年的遭遇感到难过，更为自己如今的境遇而感伤不已——因为，这样的场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大约是在三年前的同一个季节里，他曾在同样雄伟的大殿上，见证过一场同样的盛会，并以同样的心情，面对过同样一个人。在那场庄严肃穆的盛会上，眼前这位有着重瞳特征的臣属，曾经大言不惭地向自己提出过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让他至今都记忆犹新。只是他不知道，在今天这场盛会上，

在建立了如此伟业之后，这个欺世盗名的奸诈之徒，又会让自己许下什么样的承诺呢？

大义勤王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当时，位于中原腹地的东周王室再次爆发动乱，曾经意气风发的周襄王被自己的弟弟赶出了都城，寄居在郑国汜地。绝望之下，他不得不向天下发布诏令，号召诸侯前来勤王，而晋文公就是唯一一个奉诏前来讨逆的诸侯。

这场发生在晋文公初年的东周王室内乱，便是早在晋惠公即位初期就已经爆发了王子带之乱的赓续。当年晋惠公和秦穆公就曾携手干预，但因为齐桓公的中途插手，秦晋两国之间又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便只好退出了这次行动。齐桓公那时已处于霸业末期，只想做个和事佬，对于天子的诉求不很热心，周襄王因此大怒，甩开了齐桓公，亲自带兵去攻打王子带，迫使其逃到了齐国。

王子带在齐国居留了十余年的时间，其间齐桓公曾派仲孙湫到成周去试探周襄王，却因天子怒气未消只好作罢。到晋惠公十三年（前638年），也即宋楚泓之战当年，在周朝大夫富辰的不断游说之下，周襄王才勉强同意让王子带回到他的封地甘（成周以南）。

在这十年里，周襄王也没闲着，他敲打不着自己的弟弟，便把怒气都撒到了那些参与叛乱的“戎狄”身上。齐桓公为了尽霸主之责，曾数次召集诸侯会盟，抽调军队驻守成周，也算是给天子加油打气。但到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诸侯分化为一盘散沙，再也没有人给王室做主了，周襄王这才知道自己的实力原来是真的不行，于是便赶紧与“戎狄”联姻，从“狄人”那里娶了一个王后——也就是隗后。

问题就出在这个隗后的身上。这个常年生活在“戎狄”之中的少妇，受不得中原礼乐文化的诸多约束。等到王子带回来后，她大概是觉得这个年轻的王子比天子更有魅力，不知不觉间就给无上尊贵的天子戴了一顶“绿帽子”。

直到两年后，也就是晋文公回国即位的那一年（前636年），此事才被发现。周襄王大怒，准备要拿弟弟问罪，可王子带听到风声之后早就溜之大吉了，恼怒的襄王只能废掉隗后以解心头之恨——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

王室与“戎狄”联姻以来，双方关系还算融洽，那些本来不怎么服管教的“戎狄”，也都因此服服帖帖地为王室效力。现在周襄王不声不响地就把王后给废掉了，“戎狄”可就不答应了。

要说起来，周襄王废后虽事出有因，可选择的时机却着实不利。当时周襄王还在跟郑国闹矛盾，起因是由于滑国在郑和卫之间来回摇摆，让郑国很生气，于是便出兵讨伐。滑国转头就向天子求救，天子于是派伯服和游孙伯去劝阻郑文公。郑文公埋怨周襄王偏袒卫、滑，一怒之下竟把天子的使臣给扣留了。

周襄王废掉隗后的时候，也正是他跟郑国矛盾闹得最凶的时候。彼时颓叔和桃子带领“狄人”的军队讨伐郑国，半路上听闻王后被废，当场就向“狄人”投诚了。

于是乎，天子的大臣伙同“狄人”一起拥立了王子带为天子，带着天子的大军回军攻打天子。这一招组合拳可把王城里的天子给打蒙了，周襄王哪儿能抵挡得过，赶紧收拾了行李逃跑。不过，好在王子带在成周没有多少人望，不久之后，成周的国人就将其赶跑，重新迎回了周襄王。

王子带心有不甘，回去之后又纠集了更多的“狄人”卷土重来，再次把王室的军队打得大败。王子带将朝政交给大臣打理，自己和隗后居住在温地（今河南温县西南）。周襄王自己跑到了郑国的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其得名即源于此），而他的大夫们，包括周公、原伯、毛伯、富辰全做了俘虏。逃亡在外的周襄王孤立无援，而郑国又因为之前的矛盾不愿意帮忙，于是他只得派出使臣向诸侯求援。

此时的东方诸国正在酝酿着权力洗牌，根本无暇顾及王室，这恰好给求取中原而不得的秦、晋两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地说道：“想求得诸侯的拥护，没有比勤王更快捷有效的途径了。这既是大义之举，又能够宣信于诸侯，我们岂能落于人后？继文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机会就在眼前了！”

为了占取勤王的先机，晋文公一面派人到黄河渡口阻拦秦穆公，一面以重金买通阻拦在交通要道上的“革中之戎”和“丽土之狄”，亲自带兵取道轵关陁，直奔中原。大军于晋文公二年（前635年）三月二十九日抵达阳樊（今河南济源东南古阳城），稍作停顿后又兵分两路，右师包围王子带所在的温地，左师则前往郑国迎接周襄王。

四月初三日，在晋国军队的拥护下，周襄王终于回到了阔别多日的成周。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王子带被晋军擒获，并在隰城（位于今河南武涉境内）被公开处死。至此，绵延十多年的王子带之乱才算画上了句号。

始启南阳

周襄王回归成周的第二天，晋文公前去朝觐，受到了超高规格的礼遇，这让晋文公颇有些飘飘然。他自以为对王室有功，总觉如惊弓之鸟一般的天

王该对自己言听计从才是，于是便提出了一个非分之请。至于是什么样的非分之请，史书上只写了两个字：请隧。

这两个字语焉不详，因此后世对其含义有不少争议，其中有说法认为是请求死后能享受“隧葬”之礼。所谓“隧葬”，顾名思义，就是在墓地中打一条隧道，将棺槨抬入安葬。周朝的时候有规定，诸侯国君的葬礼只能用绳索悬挂放入墓坑之中，即便是要打通道，也只是能露天的“羨道”，“隧葬”是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此时晋文公竟然提出将来要以天子的礼仪下葬，显然是要坏规矩。

另外一种说法则认为，所谓“请隧”指的是扩大行政区划的范围。周时诸侯国土有国、野的区分，国的行政区划为比、闾、族、党、州、乡六级，野的区划为邻、里、鄣、鄙、县、遂六级。具体的关系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鄣，五鄣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礼制规定，王室有六乡六遂，大国是三乡三遂，次国二乡二遂，小国一乡一遂。由于征兵的主要对象是国人，因此以乡作为征兵的主要对象，一乡出一军；对应的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不过，周礼的很多规定，比如“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之类的说法，在西周时期一直都未曾出现过，显然不是早已有之的规定，而是春秋后期的人们所制定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型，所谓“六乡六遂”恐怕亦是如此，因此后一种说法很可能不成立。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旗物”“祀典”等说法，观其大意也同样都指向晋文公妄图僭越天子的规制。但正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周襄王尽管很狼狈，可你要提出与天子享用同等级别的礼仪，这种要求还真不敢答应，否则曲沃代翼的悲剧很可能就会在天子身上重演。他义正词严地回绝了

晋文公的请求，指出：“王室有规章制度，没有取代王室的德行而出现了两个王，以叔父的观念恐怕也是无法接受的吧？”

面对晋国的勤王之功，周襄王就算有再多不满，也只能忍气吞声，僭越的要求非拒绝不可，实在的封赏却是免不了的。

晋军的这次行动几乎横扫了周王畿内黄河北岸的所有土地，在晋国的威势之下，周襄王只能含着泪把阳樊、温、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原乡）、州（今河南沁阳东南）、陘（今河南沁阳西北）、攢茅（今河南修武县大陆村）、鉏（今河南滑县东）、緄（今河南沁阳西南）八座城池一并打包赏给了晋国。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这八座城池位于晋国本土以南，地处太行、王屋与黄河之间，故而被晋人称为“南阳”之地。

南阳之地早先从属于周武王时的司寇苏忿生，王室东迁后，其虽在王畿之内，却不受王室管辖。早在八十年前，也即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与郑庄公闹矛盾，曾用苏氏的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郕、刘、蔿、邰四邑，狠狠地坑了郑国一把，这十二座城邑与如今的阳樊等八邑便有很高的重合度。后来到晋惠公即位那年，苏氏因与王室闹矛盾，又与狄人虚与委蛇，结果被灭，这些土地才算回到了王室的怀抱。才过去十五年，这块土地又被晋国盯上了，天子虽然不舍，却也只能忍痛割让。

有了周王的诏令，晋国就放开手脚开始接收黄河北岸的大片土地了，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住在这些城邑中的贵族原本都是王室公卿，很多城邑的领主都是公爵，比之晋国国君的侯爵还要高出一等，如今却全都成了晋侯的臣民，自然会有所反抗。不过在正史中晋文公一直是仁君的形象，所谓“仁者无敌”，拿下几座小小的城池完全不在话下。

在接收阳樊时，城内百姓不服，晋文公调集大军准备强攻，这时有一个叫作仓葛的人在城头上大喊道：对待中原国家要用德行感化，对待四方夷狄才会用军事手段。如今你用对待夷狄的方法来对付华夏贵胄，谁会服从你？这里所居住的可都是王亲国戚，你难道要将我们全部俘虏吗？

晋文公听了心中一惊：我是仁义之君，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于是就把包围阳樊的军队撤掉了，让不愿意归顺晋国的百姓有序撤出，终于赢得了民心。

有了这样一次成功经验，晋文公便在原国如法炮制。在出兵攻打原城时，他下令只让军队带三天的口粮，其用意就是告诉士兵：我们只准备打三天，三天之后不论战果如何都是要回国的。

三天的围攻结束，原城依然坚不可摧。晋文公正打算如约撤军，这时有城内的探子出来报告说，原国最多只能坚持两天了，再等等吧！探子本以为晋文公会满心欢喜地继续围攻，却不料他义正词严地说，信用是国家之宝，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保障，如果失信于国人，就算是得到了原国又能如何？说罢便按照原计划班师。

据说原国人听说这件事后，都被晋文公所感动，于是就追上了晋军，主动投诚。

相关故事有很多版本，散见于诸子百家的各种论述之中，不过其真实性令人生疑。这些故事太过理想化，展示了仁义道德在战争中的神奇作用，与武王伐纣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尚书》中为了证明武王仁义有德，安排了商纣军队阵前倒戈的桥段，但没有把故事接顺，后面又有“血流漂杵”的记载。孟子看了这段实在不敢相信，就说了那句“尽信《书》不如无

《书》”的名言，认为以武王的仁义之师，讨伐残暴的纣王，怎么可能会出现血流成河的惨状呢？

对于文公伐原的相关记载，我们同样要秉持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怀疑精神，去甄别其中的疑点。要知道，周襄王赏赐南阳之地的時候还是四月初，而晋国征服原国的时间却是在这年冬天。打败王子带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而攻取八座城池却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可见仁义并不是万能的，要想吞下这块肥肉终究还得付出一些代价。

以臣召君

晋国求取黄河北岸土地显然是早有预谋，这可把周王室给坑惨了。在当时土地不仅是一个贵族身份的象征，更是一个封建领主权力的合法性的来源，一个人土地的多寡往往与其在国际国内政治事务中的发言权紧密相关。

春秋时期，诸侯在不断地兼并扩张中声势日益壮大，与之相对的，周王室却因土地缩水、扩张无力，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逼仄。到了齐桓公的时代，堂堂天子便开始被人呼来喝去，地位也生生地从天下共主变成了“吉祥物”。可不管怎么说，齐桓公虽然经常“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从来不会借机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天子凭借着祖宗留下来的丰厚家底，日子过得虽说不如往日，到底还有些底气。

如果说在齐桓公称霸时期，王室还敢游走于列国之间分化诸侯、挑衅霸主，那么在晋国勤王之后，天子就再也没有左右国际政治的能力了。南阳这几座城池几乎占了周王室所能控制土地的一半，割让南阳之地，使其经济实力和在诸侯中的影响力都大为削弱。从此以后，周王室便复兴无望，彻底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三流国家，直到最后被人们完全忘却。因此，晋国的勤王与其说是辅助王室，倒不如说是在坑害王室。如果再结合春秋早期晋文侯

的作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周王室的衰微，晋国称得上是第一大“功臣”。

正因如此，当周襄王再次见到这位长着重瞳的“叔父”时，不仅无法对他解除困扰中原多年的“荆蛮之祸”的“义举”感到欣慰，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厌恶和恐惧。

献俘仪式两天后，也即晋文公五年五月十二日，周襄王在成周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来回敬晋国君臣。王室大夫尹氏、王子虎及内史叔兴代表天子向晋文公颁布策书，以九命之礼册命其为侯伯，也就是诸侯之长。并赐予他“大辂之服、戎辂之服”，也就是天子所用的金车、兵车以及配套的服饰；“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是赐给晋文公的红色和黑色的弓箭，使他得专有征伐的威权；“秬鬯一卣”是专门用以祭祀的美酒及酒器，“虎贲三百人”则是专门护卫晋文公的精兵。此外，据后来周景王的回忆，此次赏赐还包含有所谓的“戚钺”，也即奉王命得专杀伐所用的斧钺。随后，周襄王庄严地宣告，从此以后，晋侯得以王命安抚四方诸侯、征讨不臣。

受到天子如此隆重的礼遇，晋文公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然要把面上的事情做到足够周到。首先是在往献俘的过程中，他按照礼仪规程三次朝见天子，以示对天下共主的尊崇。在接到天子策命的时候，他又三次表示推辞，最后恭敬表态：“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表示愿意肩负起天子所赋予的崇高责任。

朝见结束后，他又于十六日（又或二十六日）邀请王子虎及齐、鲁、宋、郑、蔡、卫、莒等国国君在践土行宫举行盟誓，宣誓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声明到场的诸侯要停止侵害、各司其职，共同辅助王室。紧接着在这

年周历的冬天，晋文公又在温地召开会议，齐昭公、宋成公、鲁僖公、郑文公、蔡庄公、陈共公，莒、邾等国的国君以及秦国大夫再次会聚一堂，共襄盛举。由于这两次会盟都在践土行宫周边举行，且会议议程也一脉相承，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此也不加区分，将这两次的盟会合称为“践土会盟”。

春秋时期是一个霸权迭兴的时代，诸侯会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根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出现在史料中的会盟记录就有406次之多。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小规模聚会，相邻的几个国家聚在一起表现一下睦邻友好，或者就某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展开一次讨论，这种形式的会盟既不需要知会天子，更不需要得到什么授权。比较受人瞩目的是关乎霸权的会盟，主持会议的盟主为了获得合法性，通常会主动向天子报备；而天子不管是情愿或者不情愿，也会很知趣地派出全权大使参加会盟，时不时地还会赏赐一些胙肉，表现对盟主的认可和关怀。

但不论是以上哪种情况，也不论会盟究竟有多隆重，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地位尊贵的天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屈尊纡贵，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去给那些诸侯捧场。也就是说，诸侯去往都城朝见天子这是正经事，可若是让天子去封臣的土地上会见诸侯，这就不是一个臣子该做的事了。因此，召请天子恐怕也是晋文公对诸侯宣威的一部分，就是要给天下人一个大大的下马威，其中用意不言自明。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举动才着实让人不齿，更刺痛了孔夫子维护王道正义之心。为了替天王挽回面子，他在“作《春秋》”时特意将原文改写为“天王狩于河阳”。也就是说，天子之所以到了温地，只不过是出去打打猎散散心，恰好碰到了诸侯会盟的大事，就顺道过去发表了一通演说，也算是天子体察下情的表现。如果说其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就是天王打猎的

时候没安安生生地待在自己的地盘上——虽说是有越界的嫌疑，可比起被人招之即来总是要好听一些。这是典型的“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

从中我们似乎也能感觉到孔夫子对于晋文公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晋文公在中原皆已沦陷的情况下，拼上了身家性命挽狂澜于既倒，再次避免了“吾其披发左衽”的悲剧，这份功劳不能不认；但在对待天子的态度上，相比于前任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就一言难尽了，这与他之前所表现出来的仁义形象也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齐桓公一切举动都以礼仪仁义为准绳，对周天子毕恭毕敬，甚至有一次天子因其年迈都已经准许他不必下拜了，可为了维护君威，他还是坚持“下阶再拜稽首”。可晋文公就不同了，自勤王伊始就明目张胆地向天子索要隧礼妄图僭越，僭越不成就改为敲诈勒索，到了践土会盟的时候又“召”天子参加会盟，连最基本的礼仪规则都弃之不顾。这样的霸主对于中原文明究竟是福是祸呢？

正因如此，孔子对晋文公的总体评价是偏负面的。首先是对于“天王狩于河阳”这件事，他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这种事是反面典型，后人千万不能有样学样；另外，他对齐桓、晋文的为人做派给出了一个终极评价，也就是“晋文公谄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谄。”基本上等于是对晋文公所谓的“贤名”予以了彻底的否定，他在流亡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美德也都因此被打上了问号。

第四节 重整山河

所谓外主

齐桓公在成就霸业的过程中，惯以恩威并施的手法获取诸侯支持，晋文公也是如此。

晋国多年来在西部闷声发大财，除了与秦国有过那么几次交锋之外，很少参与国际事务，中原诸侯很难确切地了解到晋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晋国初出中原便搞了一个大动作，通过秀战术、打硬仗的方式，让中原各国都真切地领会到了他们的军事实力。强大的执行力，说干就干的行事风格，所向披靡的战斗力，不拘一格的作战方式……晋国在城濮之战中的表现，与齐桓公温温吞吞、避重就轻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在列的诸侯都给镇住了。

而在感情上，尽管晋国也是姬姓诸侯的一员，是王室的股肱之臣，但在经历了多年的独立发展之后，中原诸侯难免会产生一种生疏之感。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其与楚国这样一个“大门口的野蛮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对于这样一个一直以来奉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施行“国无公族”制度的异类，诸侯普遍还是难以从心底接受。

为了能够让诸侯产生认同感，晋国在谋求霸业的过程中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意识形态上，晋文公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贴合了周礼“爱亲尊贵”的原则，有益于拉近与东方诸侯的关系。同时，他们从一开始就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以讨不臣，先后完成了平定王室内乱和抵御楚国入侵两大任务，以实实在在的功业博取了

诸侯的敬畏。晋国以文化为本、以武力为基，将自己塑造成中原文化的守护者，逐渐将自己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共同体，从一定程度上打消了诸侯内心的疑虑。

另外，晋文公跟秦穆公打了二十几年的交道，自然也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宣传手法。

前文曾经提到，后世流传晋文公流亡期间曾有栾、郤、狐、先等居守家族为“内主”，在国外也有一批所谓的“外主”，这其中就包括齐、楚、秦、宋这四个国家。但平心而论，这些国家在晋文公流亡期间虽然都曾给予过一定的礼遇，但要说都是支持其回国复位的“外主”，恐怕是言过其实了。

就拿秦国来说，在重耳、夷吾争夺君位的过程中，曾两次放弃对重耳的支持，使得他不得不长期流亡。齐国、宋国虽说都对其有所赠予，但却从未产生过要支持其复位的念头，甚至当重耳准备离开齐国时，还因为担心齐人强留而殚精竭虑。楚国就更别提了，重耳刚一造访就开始提条件，秦国派人前来迎接时又想杀人灭口。也就是说，在流亡期间，齐、秦、楚三国对于重耳的态度并不友善，那么当他回国之后又为什么要将其奉为“外主”呢？

对比晋文公流亡期间先后造访的七个国家就不难发现，被奉为外主的齐、楚、秦三国，都是春秋时代处于第一梯队的大国，各方面实力都很雄厚；即便是最为弱小的宋国，也有着争霸的野心。这些国家或者是财大气粗，或者是想要施恩求霸，都或多或少对重耳有所赠予，这其中利益交换色彩很明显，双方都心照不宣。

但在回国之后，为了宣扬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强调所谓的“天命所归”，为其称霸背书，晋文公还是违心地把齐、楚、秦、宋这些对自己虚与

委蛇的国家，描绘得德行高尚、大公无私，将他们奉为了自己的“外主”，宣扬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鼎力支持，才让自己最终得偿所愿，重新返国为君。

至于那些没有对重耳加以礼遇的国家，那就对不起了。尽管他们拒绝流亡团队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外敌入侵，比如经济拮据，但这些都不重要了。晋文公对这些国家都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凡是不礼遇自己的，国君就一定是昏君，大臣一定是庸臣。而这也就为他在中原四处征伐提供了正当性，这恐怕才是他塑造所谓“外主”的真实意图吧！

围许伐郑

霸业格局业已形成之后，晋文公经略天下的脚步却并未停止，反而是以处处透露着杀伐决断的凌厉之气在国际上不断发力。接下来的几年里，那些过去曾与晋国敌对的国家便纷纷以切肤之痛体会到了什么是“霸主之威”。温之会结束后不久，曾经甘为楚国鹰犬的许国，便成了晋文公借以示威的第一个靶子。

许国是一个处于郑、楚之间的小国，早年郑国霸道的时候就经常敲打许国，甚至一度将其灭国。后来楚国北上中原征服了郑国，许国人本以为有了靠山，却不料还是摆脱不了受人欺凌的命运。

城濮之战爆发时，正是楚国北上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许国只好鞍前马后为其效劳。即便是后来楚国败了，深受欺辱的许国仍惧其余威，因此当诸侯纷纷去往践土拍马屁时，许国人却不敢凑热闹，这下可惹恼了新晋霸主。

晋文公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刚刚结束了湿地会盟的诸侯很快就换上了戎装，带着几万联军气势汹汹直奔许国而来，将其国都围了个水泄不通，以讨伐其助楚的不臣之罪。

俗话说“杀鸡焉用宰牛刀”，许国只是一个小小国，其体量别说跟晋、楚这样的大国比了，就算是与早年被晋献公灭掉的那些小国比都不一定能赢。如果真的只是讨伐许国，随便派一两个诸侯前去就足够了，如此兴师动众，正说明这次出征讨伐许国是假，检验会盟的成果、考验诸侯的成色才是真。

也正因如此，诸侯联军围攻许国时也都是出工不出力。战争持续了好几个月，至于最后的结果，史书上也没有明说，倒是联军不慌不忙地在翟泉开起了大会。

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次年（也即晋文公六年，公元前631年）夏天，会议的召集者是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参加会议的有王室大夫王子虎、宋国大夫公孙固、齐国大夫国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国大夫小子憖。至于鲁僖公，或许是嗅到了温地会盟的火药味而心生恐惧，于是便有意无意地滞留在翟泉，不合时宜地参加了这场以大夫为主导的会盟。

大家凑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战争的矛头很快又指向了郑国。半年后，晋国派了小股部队入侵郑国，以试探其防御能力。第二年，也就是晋文公七年（前630年）九月初十，秦国积极响应晋国的号召，会同晋军大举讨伐郑国。

郑国与许国比起来国力要强盛一些，但其命运却并没有比许国好多少。早年齐楚争雄之时，郑国就被齐桓公、楚成王推来搡去弄得左右为难。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下，郑国人很快就学会了见风使舵，因此当中原舞台上又突然多出来一个更加凶悍的霸主时，郑文公毫不犹豫地就向晋文公投怀送抱了，可即便如此也依然逃不脱被征讨的命运。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晋文公如今可是响当当的中原霸主，他想要讨伐谁还真不愁找不到借口。尤其是过去流亡的经历，不仅给他带来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成了他发动对外战争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这次也毫不例外，晋文公再次揭开了自己血淋淋的伤疤，祭出了复仇的大旗，声言郑国“无礼于晋且贰于楚”，必须要接受应有的惩罚。

郑文公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晋国军力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小小郑国哪里是对手！及至秦晋联军兵临城下，郑文公早早就备好了礼物让人到军中探望。谁想晋文公根本不吃这一套，送来的礼物连看都没看直接就给扔了出去。

郑国的使者被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叩头求饶，晋文公也不为难他，只是冷冷地说道：“只要你们将叔詹交出来，寡人就即刻退兵！”

晋文公之所以会提出这么一个要求，大概是缘于当初他作客郑国时，叔詹劝说郑文公礼遇重耳不成，就动了杀人灭口之心，让重耳险些命丧郑国。如今晋文公成就霸业，自然要来寻一寻叔詹的晦气，这可就给郑文公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叔詹既是郑文公的亲弟弟，又是一国执政，郑文公于公于私都不想失去他。面对晋国的这一要求，叔詹却毫无惧色，他正义凛然地说道：“如果臣一人的命可以换来百姓安定、社稷稳固，拿去又有何不可？”说罢便昂首阔步地走向了晋国的军营。

晋文公在见到叔詹后，先是怒火中烧一通数落，随后还扬言要把叔詹给煮了。叔詹连忙说道：“请让我把话说完再死吧，这是我最后的心愿。”晋文公答应了他的请求。

叔詹拱手作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当年您路过郑国时，我曾经劝说寡君，让他对您加以礼遇。我说晋公子十分贤明，他的随从都具有做卿的才

干，一旦返国，必然成为诸侯的盟主，那时郑国将大祸临头。然而寡君却抛弃礼义，违背宗亲关系，冷落了您，做出像曹共公偷窥一样的蠢事，这自然是自取其祸。我当年的明断是智慧，今天牺牲自己挽救国家是忠诚。

叔詹一边为自己辩解，一边缓缓地走向煮了滚水的鼎镬。最后他用手轻抚炙手的鼎耳大声呼喝道：“我一人死不足惜，只可叹从今以后忠心侍奉君主的人，都要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了！”说罢便准备往开水里跳。

一个人只要有所偏好，就一定会有其弱点。晋文公最看重的便是自己的仁义之名，叔詹的一番说辞可以说是直击要害。杀掉叔詹本来就不是大军出征的主要目的，既然叔詹已经把话说到这里，若还要坚持怕是会有损于自己的声誉。想到这里，晋文公赶紧让人把叔詹拉住，不仅免了他的死罪，还以厚礼相赠，恭恭敬敬地把他送了回去。

秦晋联合围郑的战事后来不了了之，这其中虽有叔詹的功劳，但作用最为突出的当然还是我们所熟知的烛之武老先生了（后文将会提到）。因秦穆公阵前背盟，晋文公孤掌难鸣，只好也解围而去，但在临走前，他还是给郑国人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那便是立公子兰为太子。

早年郑文公重演晋献公旧事驱杀诸子，有多名公子因此死于非命。眼见国内局势窘迫，其妾室燕姑所生的公子兰便也出逃在外，后流落到晋国。晋文公讨伐郑国时，本来打算带他随军出征的，但子兰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祖国生灵涂炭，便请求在东部边境候命。秦穆公背盟之后，晋文公不得不撤退回国，但作为解开围城的条件，郑国必须要迎回公子兰并将其立为太子。

郑文公虽心不甘情不愿，可慑于晋国的军威也只能从命。郑文公死后，正是这位公子兰继任成了郑国的国君，也即后来的郑穆公。晋国此次围郑的战役虽说搞得灰头土脸，却也不算是一无所获。他们既达到了敲打郑国的目

的，又成功地左右了郑国的储君，算是暂时稳住了郑国这一重要门户，保证了晋国在中原门户的影响力。

元咺之讼

郑、许两国因服事楚国而遭到惩罚，为楚国充当马前卒抵挡跟随晋国的曹、卫两国，自然也不能逃避责难。晋文公五年冬天的温地会盟，有一个重要的议题便是审理卫国大夫元咺状告国君无端杀人一案。

有关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还有一段前情提要需要交代。城濮之战前，卫国因不借道予晋遭到了猛烈攻击，卫成公也因此被国人驱逐到了襄牛。战争结束后，卫成公情知大势已去，便急慌慌地跑到楚国去寻求庇护。

然而此时的楚国政局也是一派忙乱景象。令尹子玉死后，其所在的若敖氏家族受到了打击，楚国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局面。一直觊觎若敖氏权力的蒍氏，正在图谋跟若敖氏抢班夺权，国内斗争形势激烈，根本无暇顾及逃命而来的卫成公。卫成公无法取得楚国的支持，只好又灰溜溜地跑到陈国，远远地向晋国认罪，并特意委派元咺扶持他的弟弟叔武暂摄国政，参加正在举行的会盟。

晋文公一战而霸，心情正好，对待以往的敌对国尚且宽容，因此看到卫成公的认罪态度不错，便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他归国的请求。到今年六月，也就是战争结束两个月后，卫成公便得以回归故土。欣闻国君归来，国内贵族皆欢天喜地，他们在宁俞的带领下专程赶到宛濮（今河南长垣西南）迎接，宣誓继续奉卫成公为君。

这本来是好事一桩，卫成公顺利归国，只要能安安生生地依附在晋国的威权之下，也不会有什么变故。然而，卫成公是带着满腔的怒火回来的，非

要把国内势力进行一番整肃，这就又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卫成公在外流亡期间，本来就因害怕得不到霸主的原谅而整日里提心吊胆，后来更是风闻元咺已经把叔武立为国君，便失去了理智，竟然把一直忠心耿耿跟随自己的元咺之子元角给杀了。

等到要回国的时候，卫成公与宁俞等贵族盟誓，表示要对随亡和留守的人都一视同仁，宣称自己会在某月某日回国都复位，让宁俞先回楚丘进行安排。

宁俞是个实心眼，不知道卫成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就奉了命先行回国。见到宁俞大摇大摆地回到都城，把守城门的长牂心里欢喜，便和他同乘一辆车进了城，一路上还兴致勃勃地打听国君的消息。其他的贵族和守卫也都为这么一件大事而兴高采烈地凑在一起议论，把都城的守卫工作都抛在了脑后。

谁也没想到，宁俞前脚刚走，卫成公就尾随他也回到了国都，比预先约定的时间早了好些天。等城门守卫都被宁俞吸引了去，卫成公的前驱公子歆犬、华仲就悄无声息地进了城门，直奔叔武的宅邸而去，并假传消息说国君已经回来了。

正在洗头的叔武闻听喜讯兴奋得不得了，急忙用手抓着湿漉漉的头发跑出来迎接国君。结果到了门口，没有看见国君的影子，只见到一支羽箭朝着自己扑棱棱地飞了过来。叔武还没有醒过神来，就被那一支羽箭射穿了喉咙，当场毙命。

这时卫成公的车驾才缓缓地从小门处驶来，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尸体，就装模作样地抱着弟弟的大腿放声大哭。看到这个场景，射杀叔武的公子歆犬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卫成公派来的人杀死了，擅杀叔武的黑锅自然也就让他背起来了。

卫成公的复仇名单中，还有辅佐叔武的元咺。可元咺这个人很机灵，早就听到了叔武被杀的消息，便也趁着城门没有守卫，披头散发地就跑到晋国去告状。这就是元咺状告卫成公杀人一事的由来。

在周朝的礼法体系之下，或者说在几乎所有人类早期文明中，不同人群之间地位高低贵贱有着明显的区分，不同阶级之间享有的权利也有着云泥之别。特别是在强调君权神授的话语体系之下，国君的权威更是不容亵渎，怎么可能容许臣子与国君站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抗辩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君臣之间一旦发生嫌隙，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采取私力救济的手段，其结果要么是国君将对抗的大夫处死，要么就是大夫将看不惯的国君干掉，那种通过武力抗争让国君站在谈判桌前的均势通常都很难达成。

晋文公让卫国君臣坐在法庭上辩论的做法，可不是要倡导人人平等，而是想借此强化自身权力，以便获取诸侯内部争端的裁定权。不过，尽管春秋时期君臣纲纪已然遭到破坏，以臣讼君也算是有先例可循，但在礼法层面上阶级秩序还是得严格遵守。于是乎，这场官司就被提交到了周王室。在具体审理过程中，身为国君的也不必亲自出庭，而是委托了三名代理人应诉，其中前文多次提到的宁武子宁俞为辅助，卫国大夫针庄子作为“代理被告”出席，大士（即治狱官）士荣担任“辩护律师”。

在晋国的强压之下，整个抗辩过程从一开始就倒向了元咺，最终的结果也毫无悬念。“执行庭”为了制裁卫成公，把他抓起来送到成周收监。他的代理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代理律师”士荣被当场处死，作为“应

诉代表”的针庄子被砍去了双脚，只有宁俞因其父之前引荐过重耳才免去了处罚。

践土审判之后，元咺在晋国的支持下取得了卫国的执政大权，并把卫成公的弟弟公子瑕立为国君。但在他心里，被关在成周大牢里的卫成公，却总好像是悬在自己的头顶的一把剑，让他每日里战战兢兢过得很不安稳。在此期间，或许是由于元咺的鼓动，又或许仅仅是恨意难平，晋文公多次要求天子将卫成公杀掉，但都被拒绝了。

周襄王的理由很有等级秩序的色彩：“自古以来身居高位者制定政令，臣下以令执行不违背礼义，这才是正当的秩序。君臣之间互相诉讼本来就不合礼制，如果人人都要如此效仿，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的秩序也就荡然无存了。现在叔父主持诸侯事务，让君臣对簿公堂便已经是违背礼义之举了，如今更是为了臣子要杀掉他的国君，岂不是错上加错？”

晋文公虽说跋扈，却也不会显露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去与周王争辩，而是私下里派人去鸩杀卫成公，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宁俞的作用了。

宁俞虽免于处罚，但对晋文公也并无感激之心，还是忠心耿耿地追随国君前往成周，每日为其送水送饭，恪尽职守保护国君。他一直随侍卫成公身边，凡事都亲力亲为，对国君的保护也是全方位的，可谓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当他得知晋国准备暗害国君之后，就贿赂了放毒的人，让他把剂量减小，这样卫成公有了中毒的症状又不致毙命。

被他这么一折腾，估计过不了几天，整个成周的人就都知道了卫成公的病症，这就将晋文公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卫成公都已经成这样了，众目睽睽之下再继续投毒显然是不可能了，可是霸主的权威该如何维护呢？

就在这空气近乎凝滞的尴尬时刻，向来喜欢和稀泥的鲁僖公终于出手了。鲁国作为周公后裔、礼仪之邦，在诸侯中虽然武力不怎么样，可威望却一点也不弱。在这微妙的气氛中，鲁僖公不失时机地从自己的府库中拿出二十对玉璧，分别献给了周襄王和晋文公，恳请天王和霸主释放卫成公。

鲁僖公的这个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二十对玉璧一出手，既维护了霸主的面子，保全了周天子的法度，又施恩于卫，救了卫成公的命，进一步巩固了鲁卫联盟，可谓是左右逢源。

再说卫成公绝处逢生，可依然不改原先那副做派，不久之后，那个被他引为心头大患的元咺终究还是死在了他的手上。不过，由于事情安排得很周密，这次的事件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话柄，晋文公也不好发作，只好把这件事压了下去。经过了两年多的生死磨难，卫成公此时才算是重新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恩威并施

卫成公在成周历经劫难险些丧命，其经历不可谓不多舛。但要从家国得失的角度来看，卫国的遭遇反而要比同病相怜的曹国要好许多。

城濮之战前，曹共公奋力抵抗晋国，战败后被软禁了大半年，日子过得很不痛快。后来在诸侯伐许途中，晋文公得了一场重病，臣属们四处寻医问药却一直都不见起色，这就给他带来了一个难得的翻身机会。

当时的医学不发达，筮、史、巫、医不分家，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不管是占卜、巫术也好，神话、预言也罢，只要能跟鬼神打上交道的，都能有幸入驻“太医院”。

曹共公的随身太监侯孺是个忠心护主的人，得知晋文公生病他突然灵机一动，买通了晋国请来的筮史，让他把晋文公得病归结为因为灭同姓的曹国而受到上天惩罚。晋文公正病魔缠身，也不管是不是神的旨意，赶紧安排让曹共公复了国。

小聪明玩一两次可以，但时间一长就不灵验了。曹共公从牢狱之灾中解脱了，可他应受的惩罚却并未因此而结束。两年后的文公八年（前629年）春，晋文公病体痊愈又回过神来，便通告天下要举行典礼，从曹国分割出一大片土地分赏给诸侯。

有这样的好事，诸侯自然也是欣然前往。当时鲁国派出的代表叫臧文仲，他受命之后不慌不忙地去往晋国，半路上夜宿在一个叫重的地方。重地宾馆的仆隶知道他的来意，就私下里劝道：“晋国刚刚称霸，想稳固自己的联盟，因此才肢解不臣的国家分赏给听从的诸侯，而诸侯想攀附晋国，也都会争先恐后前去领赏。晋国不会以职爵次序来进行封赏，而是谁先到谁就能拿大头，所以我劝你还是快赶路去吧！鲁国爵位高去得又早，这次的封赏还有谁能比得过你？可若是在路上耽搁了，让其他国家抢了先，这机会也就没有了。”

鲁国人平日里看起来一本正经，可心思并不简单。城濮之战之所以会爆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鲁国人引狼入室，而且在战争初期，他们还曾派兵入卫与晋国对抗。但因为时机赶得好，鲁国非但没有受罚，反而得到了济水以西、洮地以南的大片土地，在列国之中获利最多，这还真是不公平。总而言之，鲁国人很高兴，晋文公因为他们的奉承也感到很高兴，臧文仲大喜过望，回国后便劝谏鲁僖公将重馆的仆隶破格提拔成了大夫。

曹国处于列国的夹缝之中，土地本来就不怎么宽裕，如今更是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成了这场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从此以后，这个春秋早期尽管算不上强大，但也曾常年活跃在中原政治舞台上的国家渐渐黯淡无光，再也无法与周边列国分庭抗礼。

从称霸后的这些作为来看，晋文公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维护公平正义的人，甚至他对曹、卫等国的睚眦必报，对魏犇、颠颉、介子推等人的不思封赏，还常被人讥讽为小肚鸡肠。如果仅从人品来评判，恐怕还是太小看我们这位霸主了。

孔子评价说“齐桓正而不谲，晋文谲而不正”。晋文公在国际政坛上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赏是罚，大多都有深远的考虑。他曾经历过波折和磨难，知道今日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因此颇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特别是当他目睹齐桓公死后齐国霸业衰微的过程之后，为了避免这一幕在晋国重演，早早地就开始为霸业的持续发展做谋划了。

晋文公在处理卫成公一案的过程中粗暴蛮横，在处罚曹国时严厉苛责，对待郑、许等国也颇为无理，却唯独对引狼入室的鲁国网开一面，这些举动看似不近人情、不明是非，但其中都隐含着共同的逻辑：那就是要将“治乱世用重典”的规矩用到诸侯的身上，故意将曹国拼死抵抗的案例当作反面教材，将郑、卫等国一些细枝末节的做法有意放大，以向诸侯做出警示。

受到封赏的国家固然是欣喜万分，可也不得不为曹国受到的惩罚而感到战栗，从而死心塌地地追随在晋国的身后。这几件事所产生的效果，堪比大禹处决防风氏所带来的心理震慑作用，这对于稳固晋国的霸权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此外，晋国对待周边各国的态度也有一定的规律，简单概括来说便是“远交近攻”：对距离较远的国家，如鲁、陈、蔡三国，哪怕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也可以既往不咎，甚而还会因为他们的一时殷勤而厚加封赏；而那些毗邻晋国的诸侯，如郑、许、卫、曹等国却动辄得咎，就算是有一点点的小毛病也会被抓着不放。晋文公正是以此来告诫这些邻国，以晋国今日的实力，随时都可以对他们施加威胁，因此也就不要妄想去依附他国，破坏如今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了。

这种政治手腕在处理有关僖负羁、元咺等卿大夫事务上也有所体现，他通过抬高亲晋派贵族声誉，进一步渲染自己的“贤能”之名，同时也宣扬一种风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舆论导向在晋国强大的武力加持下，也在无形中重塑了各国内部的政治势力，从而在诸侯内部形成了维护晋国霸权的利益同盟。这种联盟一旦形成，势必会长期影响各国政局和政策走向，从而为晋国霸业的经久不衰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可以说，晋国的霸业之所以没有像齐国那样昙花一现，反而在此后百余年间长盛不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章 “秦晋之好” 神话的彻底破灭

第一节 秦晋决裂

公元前627年春夏之交，正是一个草长莺飞、花繁叶茂的美好时节。在晋国南部有一个叫桃林要塞的地方，此刻也正是花团锦簇、群芳争艳，一片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然而与这幅景象极不相称的是，在不远处的崤山谷地，隐隐却透露出了一股肃杀之气——此刻正有两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埋伏在山谷的两侧。

位于山谷北侧的，是由晋国新任国君晋襄公亲自统领的五军将士；山谷的南侧，则是由陆浑地区的“姜戎氏”所组成的队伍。

春日里的暖阳温顺地洒落在被微风吹动的枝叶上，隐绰横斜的疏影之下，手握矛戟的将士们都凝神静气，虎视眈眈地瞭望着山谷里的一草一木，满心焦急地等待着战斗的号角吹响。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阵车马喧嚣终于打破了山谷中的寂静，人们的神情再次紧张了起来。紧接着，便看到有一支队形散漫的军队，从山谷的东侧缓缓进入。统领这支部队的将领有三人，分别是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

这三人的名字颇为古怪，但却都是地地道道的华夏贵族。其中的孟明视，字孟明，单名一个“视”字，追其族源，乃是姜姓百里氏，其父亲正是鼎鼎大名的“五羊大夫”百里奚。西乞术和白乙丙的叫法与此类同，他们分别以西乞、白乙为字，以术、丙为名，二人的父亲据说是百里奚的同僚蹇叔。

说到这里，双方的情形便也了然了，当下进入埋伏圈的，正是来自秦国的军队。宋襄公以礼作战的几条原则言犹在耳，春秋历史上第一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以埋伏战为主要形式的战争，就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局面下悄然开启了。

但问题是：秦国原本地处河山以西，他们的军队为何会从东方进入崤山？晋国与秦国有着多年良好的姻亲关系，晋文公对秦穆公的扶立之恩更是常怀感激，又是什么原因会让缔造了“秦晋之好”的两个国家反目成仇，让晋国对素来和睦的友好邻邦痛下杀手呢？

穆公背盟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三年前。

晋文公七年（前630年）周历九月，在经过几次试探之后，晋文公约了秦穆公到黄河南岸相会，共同出兵围攻郑国的都城新郑。晋军驻扎的地点在新郑以北不远的函陵，而秦军则驻扎在汜水南岸，与晋军遥相呼应。

两军分立驻扎，为郑国人拆散其联盟提供了机会。郑国人对付不了晋国，便去找秦国打开缺口，而打开这个缺口的关键人物，便是一名叫烛之武的老人。

这个故事因被选入了中学教材而广为人知。说的是郑国有位叫佚之狐的大夫，在危急关头向郑文公举荐了烛之武。烛之武久不受重用，如今接到使命，不免要发几句牢骚，说：“我年轻的时候尚且不中用，如今都垂垂老矣，恐怕更是无能为力了！”

郑文公很难为情地低头认错：“寡人不能及早地重用先生，如今形势危急才想起先生，的确是我的过错！”随后又对其晓以利害：“毕竟家国一

体，如若郑国灭亡，先生恐怕也会受到拖累啊！”

烛之武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看到郑文公言辞诚恳，便临危受命。到了晚上，这位耄耋老人在夜色的掩护下，用绳子绑在腰上从城墙上偷偷缒下，前往秦国军营。

见到秦穆公后，烛之武毫不避讳地说道：“秦晋两大强国围攻郑国，郑国自知必会亡国。可若是灭掉了郑国而对秦国有利，寡君也就不敢派臣下来烦劳执事了。”

接着他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分析道：秦国与郑国之间隔着一个晋国，就算是您灭掉了郑国，也很难将郑国作为您边境的城邑来统治，只会让晋国变得更加强大，这您也都是知道的。秦晋本是可以相互匹敌的国家，可一旦晋国如愿灭郑，就等于是变相地削弱了秦国的实力。倒不如保全郑国以作奥援，将来哪天您想东进中原了，也好有个跳板。就算是碍于晋国的强大，一时半会儿您无法东进，可总是要派人来往于东方列国啊！您就当是给自己寻一个歇脚的地方，这对您也没什么坏处吧？

话说到这里，便已经点到了秦穆公的痛处。不过，考虑到近年来秦晋之间的表面关系一直维系得不错，单凭这点还不足以让秦穆公下决断，于是烛之武换个角度，挑拨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您曾帮助晋惠公取得君位，为了表示感谢，他曾许诺割让河外的焦（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瑕（今河南灵宝西北，属三门峡）等列城给秦国，可他一回国就派兵筑城抵御秦国——这件事情可是刚刚过去不久，您不会忘了吧？

围绕河外列城五引发的纠纷就发生在二十年前，这一幕幕场景仿佛犹在昨日，秦穆公当然不会忘记。可就算你说破了天，这些也都是他与晋惠公的私人恩怨，跟今天的事完全扯不上关系啊！但烛之武就有这个能耐，他把晋

惠公的个人性格进行了引申，让秦穆公感觉到晋惠公之所以这么做，并非他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晋国历代国君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的体现。

见话已奏效，烛之武趁热打铁，进一步晓以利害：眼下晋国已然称霸中原、威服诸侯，权势威望已经达到了顶点，却依然不满足，可见他们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他们今天可以向东扩张觊觎郑国的土地，那么明天就有可能向西扩张。若果真到了那一天，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除了秦国，臣下真不知道还能有谁！您勤勉治国日夜操劳，却给晋国做了嫁衣，臣下真为您感到不值啊！

一席话令秦穆公冷汗涔涔，更是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历史上人们都将“秦晋之好”作为美谈而世代流传，也常常以此祝愿一对佳偶喜结连理。然而这对于身处历史漩涡当中的利益相关者而言，所谓的“秦晋之好”恐怕很难说有多么和谐美满。特别是对于一手缔造了“秦晋之好”佳话，且全程参与了这场友好关系的秦穆公来说，以“秦晋之好”来为人送上祝福，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诅咒。

每当回想起与晋国交往的种种，这些年被压抑的痛楚和不快便喷涌而出，让秦穆公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秦穆公即位之初便有一颗称霸中原的雄心，为此他在西方苦心经营，灭梁芮，服群蛮，拓疆千里，称霸西戎，建立了一个足堪睥睨群雄的超级大国。他征战一生、建功无数，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在与晋国争夺崤函通道的过程中慢人一步，终究还是让晋人抢得了先机。就是这走慢的一步，成了他一生的隐痛，使得他不得不接受晋国的联姻，不得不摆出一副公正的姿态，去帮助晋人稳固内政，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好人”。

特别是在晋献公去世之后，秦晋两国之间的恩怨情仇可以说是剪不断、理还乱，秦穆公在与晋惠公的斗智斗勇中更是吃尽了苦头。尽管经过韩之战他扳回了一局，将河外的大片领土收入囊中，但终究还是落于下风，以至于处处被动。

晋惠公父子套路之多、诡诈之奇让他感到心力交瘁，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看似忠厚老实的重耳身上。为了得到自己无条件的支持，那个流亡公子还狠狠地拍了自己的马屁，在朝堂歌礼之上赋《黍苗》《沔水》，表达了愿意对自己言听计从，辅助自己荡平天下的意愿。

因为这份许诺，秦穆公不仅亲自带兵护送其回国即位，在他遇到危难的时候及时为其化解，还送给他三千人的护卫队作为纪纲之仆。正是依靠这三千人的强大支持，晋文公才由毫无根基到站稳了脚跟。

秦穆公如此苦心孤诣，为的就是将来有朝一日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可那个表面温顺谦和的重瞳公子，究竟回报了什么呢？

晋文公二年，王子带之乱再次爆发，秦穆公满心欢喜地带着大军东进，准备在中原建功立业。可大军刚到黄河岸边，却发现晋文公派来阻拦自己的人早已恭候多时了。那个声言要辅助自己定鼎天下的重瞳公子，用尽各种花言巧语说服自己把唾手可得的尊王之功让给了晋国。

为了帮助晋文公战胜楚国，他还派出大量军队侵占郢国，以从侧面牵制楚人的注意力。不仅如此，晋文公五年晋国侵曹伐卫、与楚决战的过程中，秦国更是派出了有生力量，为其效命。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秦穆公生生地把那个流亡公子捧成了中原霸主，而自己却不知不觉间被反客为主，从

挑大梁的主角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如今重瞳公子已然称霸，自己却还要像个跟班一样，忙前忙后给他照应着，如今更是为了他流亡期间遇到的那么一点糟心事，劳师动众前来助阵。

秦穆公不由得纳罕起来：寡人究竟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把好端端的康庄大道走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寡人辛苦一世操劳半生，非但没能成就夙愿，怎么反倒成了他人称霸的帮手？人生的剧本经常会走样，可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也太离谱了？

想到晋国一日千里的发展态势和不可一世的骄横姿态，秦穆公更是感到阵阵寒意，他为秦国未来的道路感到担忧。尤其是想到自己两鬓斑白，青年时所持理想仍如镜花水月一般可望而不可即，更是忧心如焚。

在这个幽深的夜里，烛之武的话就如同一颗火种，瞬间点醒了秦穆公，让他回到了自己雄心勃发的青春年华，回到了那个誓言要涤荡天下的豪情时刻。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出生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秦穆公，此时已经年过五十；即便从他即位的公元前659年算起，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尽管他也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年，然而这长期被压抑在心底的苦闷，终究还是在烛之武的煽动下，如烈火烹油般燃起了埋藏多年的雄心壮志。也在这个时刻，秦穆公终于打定了主意，要结束这荒诞的剧情，开启一个崭新的“副本”。

送走烛之武之后，秦穆公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两军阵前与郑国结盟，并留下杞子、逢孙、扬孙三名大夫为郑国守城，将郑国置于秦国的保护之下；而秦军主力则在他的带领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撤军回国了。

战场形势发生突变，晋军上下都气愤不已。作为这次战争的组织者，狐偃更是咽不下这口恶气，他在觐见时力劝晋文公攻打秦军，但晋文公却选择了隐忍不发。看着秦军扬长而去所荡起的飞尘，他怅然若失地回应说：“不必了！秦君对我是有恩的，没有他的支持，我就无法获得今日的成就。依靠了别人的力量又反过头来恩将仇报，不是仁义之举；失去了同盟的国家，不是智慧之选；因为一时意气而制造乱局，也不是勇武的表现。我们也撤吧！”

弦高犒师

因秦国中途毁约导致伐郑一役无果而终，两国之间矛盾算是彻底摆上了台面。不过由于晋文公的克制和隐忍，在此后的两年里也算是相安无事。然而到晋文公九年（前628年），时年不满四十五岁的晋文公突然病逝，让两国之间的本已生满嫌隙的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不久之后，两国积郁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而引爆两国矛盾的焦点依然是郑国。

这年四月，在位四十五年的郑文公溘然辞世，郑国的顶层权力进入了青黄不接的混乱时刻。大丧之时，人心思变，少主新立，人心未附，国内的防御力量也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驻守新郑的秦国大夫杞子认为这是一个乱中取利的好时机，于是便写密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让我掌管新郑北门的钥匙，如果速派大军偷袭，我们里应外合，可以一举拿下郑国！”

秦穆公收到信后很是激动，可是又担心晋国干预，因此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八个月后的十二月初九日（周历），称霸不到五年的晋文公撒手人寰，他才终于舒了一口气，将伐郑一事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当他就此事向大夫征求意见时，却被蹇叔当场泼了一盆冷水：秦与郑相隔千里，大军劳师远

征，到了郑国之后人困马乏，根本不可能取得偷袭效果。更何况，数万人千里行军，怎么可能不走漏风声？郑国得到消息有了防备，便更难攻取。君上若只凭一时意气贸然行事，最后却落得无功而返，军人们定会产生背离之心。此事万万不可！

然而秦穆公哪里还能听得进去？称霸的雄心早已迷住了他的双眼。在他看来，成就霸业的机遇从来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今晋郑两国都处于国丧期间，必然防备松弛，如此良机可谓千载难逢，若是就这么轻易放过了，下一次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人生如白驹过隙，在那个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三十岁的时代里，一个已经年届六旬的老人，究竟能有多少的时光可以从容地等待呢？

蹇叔看正面劝阻秦穆公不住，于是便换了策略，在军队出征时哭哭啼啼地去给孟明视和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行。他先是拉着孟明视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孟明啊，这次恐怕就是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一路上多保重吧！

秦穆公听了之后很是生气，大军既已出征，这个时候就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了！他派人去责备蹇叔说：“你知道什么？如果你只得享中寿，现在你坟头上的树估计都要合抱粗了！”

蹇叔听了不为所动，又拉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哭着说：晋人必定在崤山抗击我军，那里有两座山陵。它的南陵，是夏后皋的坟墓；它的北陵，是文王曾经避过风雨的地方。你们一定会战死在这两座山之间，老父我恐怕要到那里去收尸了！

大概是因为知道有内应，秦军将这次的伐郑之行看得过于轻松，就不把打仗当回事了，一路上嘻嘻哈哈、吵吵闹闹，完全是一副无组织无纪律的出

游模样。

过了崤山，就到了周王室的境内。秦军行经成周的北门，按照惯例应该去甲束兵、下车步行以向天子行礼。秦军倒是也照办了，除了驾车的御者之外，所有人都摘下头盔下车，朝着成周的方向致敬。不过令人侧目的是，他们并没有脱去甲衣、包起兵器，而且在行礼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扶着车比画了一下，然后就马上又跳上车去，显得极其不庄重。

听说秦军路过，周襄王带了自己的小孙子王孙满在城头上观看，见此情景难免心中有气。倒是王孙满不屑地说道：“秦军这是要去吃败仗了吧！”周襄王问其原因，王孙满回答说：“秦军轻狂而骄横。轻狂者少谋，就会陷入险境；骄横者无礼，就会缺乏纪律。都要上阵作战了还如此自由散漫，可不就是取败之道嘛！”

秦军在到达滑国地界时，恰好有郑国商人弦高到成周做买卖，远远瞧见有一支军队开拔过来，就知道要出大事儿。慌忙之中，他赶紧派人回郑国报信，而自己则把要贩运到成周的货物都拿出来，冒充郑国使者前去犒师，他从容道：“我们国君听说贵军要行经敝邑，特派下臣前来犒赏您的随从。国君还说了，敝邑虽然不宽裕，但只要您在敝邑停留一日，我们就给你们供应粮草，你们若是准备离开，我们也会一路派人护送。”

秦军将领一听这话都面面相觑：难道郑国人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行踪了？郑国一旦有了防备，仗可就没那么容易打了！三名主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没主意了。

要说紧张，实际上弦高比秦军将领要紧张多了。弦高只是一个做小本买卖的生意人，此去成周所带的货物不过四张熟牛皮外加十二头活牛，而秦军则派来了三百多乘战车，合计下来少说也有上万人。虽说诸侯间送礼有“轻

物为引”的传统，可你这点礼物是不是也太寒酸了一些？万一谎言被秦军看穿了，自己小命不保不说，秦军加速前进，赶去送信的人可能都会被追上，到时候一切都完了。

可秦军到底是心虚，这么明显的破绽，竟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已经认定郑国知晓了他们的计划，这种情况下若还要去攻打郑国，那岂不是自讨苦吃？但大军千里远征，消耗粮秣不计其数，若果真空手回去了，也很难向国君交代。这个时候，他们恰好看到了滑国的都城，干脆就发兵围城，把滑国灭了了事。

再说郑国方面。刚刚即位的郑穆公子兰接到消息，起初还不怎么相信，于是就派人去杞子驻地查看，发现他们果然正厉兵秣马准备作战。郑穆公倒吸了一口凉气：真是天佑郑国，保佑我免遭灭顶之灾啊！

面对这场突发事件，郑国人丝毫不敢怠慢，他们一方面差人去向晋国求救，一方面指派卿大夫皇武子去与三位驻守新郑的秦将周旋。

皇武子到了秦军驻地，对杞子等三人说：“各位久留郑国，敝邑的果肉物资都快要耗尽了，正不知该如何提起，恰好就听说你们准备离开。郑国有一处原圃（在今河南中牟境内，为郑国猎场），里面的珍禽异兽和秦国的具囿（在今陕西凤翔境内，为秦国猎场）一样丰富，你们可以到里面自行猎取一些麋鹿。你们满载而归，我们也能有个喘息的时机，您看这样可好？”

听完这番话，杞子等人心知郑人已经掌握了秦军动向，再待下去怕是连命都保不住了。但他们又不敢返回秦国，毕竟这次的计策是他们献的，大军远道而来却无功而返，秦穆公必然会责罚他们。事已至此，杞子只得逃奔去了齐国，而逢孙和扬孙则狼狈地逃到了宋国。

地缘冲突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晋国。

早在前些年秦穆公背盟而去的时候，晋文公为钳制郑国，特意要求郑文公签订盟约，将流亡晋国的公子兰迎回并立为太子，算是为控制郑国埋下了一颗棋子。到郑文公死后，公子兰继任为郑穆公。其与晋国关系本就密切，如今又知秦国欲对郑国行不轨之事，自然要向晋国求援。

得到秦国大军东进的消息，担任中军将的先轸极力主张出兵。他说：“秦君贪婪不义且罔顾蹇叔的劝阻，执意劳师动众轻率东出，对我们而言绝对是天赐良机！正所谓天赐不取，必受其咎。失去了天赐的机会是为不祥，放跑了敌人会带来祸患，所以这次一定要讨伐秦军！”

下军将栾枝却有些疑虑：“秦君对先君的大恩尚未报答。如今先君尸骨未寒，就想攻打对他有恩的人，你眼里还有先君吗？”

栾枝的想法或许有些迂腐，但也算是在贯彻落实晋文公在世时的指导思想。当初秦穆公把事情做绝了，晋文公都没有跟他翻脸，提出的理由之一便是有恩必偿。因此在栾枝看来，晋文公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如果在场诸君都还对他怀有忠心的话，就不应该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将他推入忘恩负义的道德困境。如今，秦国的恩惠还没有报答，你们就要跟他的恩人翻脸，这可不忠不义之举啊！

我们无法臆测晋文公是不是真的如此坦荡，但若回到当时的局势，他所顾虑的恐怕还不止这些。晋文公之所以这样做，更多的还是吸取了晋惠公当年轻敌冒进的教训，故而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刻意维持现状，力图通过长期的实力消长暗中与秦国角力。

这其中的逻辑在于，尽管早在晋献公在位末期晋强秦弱的态势就已经形成，但两国实力并不悬殊，晋国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完全打败秦国。即便是能在一两次战争中侥幸取胜，可只要你不能做到一战而溃敌，无损于秦国的整体实力，秦国就必然会报复。如此一来，晋国就不得不与秦国长期纠缠，从而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脱身，这种长期战争势必会严重损耗自身的精力。局势真要发展到那一步，谁也难保齐、楚两国不会乘虚而入，从而影响晋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甚至葬送晋国几代人前仆后继创造出来的大好局面，刚刚取得霸权的晋文公显然不愿因小失大。

但问题在于，地缘政治所带来的特殊性使得秦晋两国之间的矛盾总是无法调和，“秦晋之好”这种和平局面也不可能长期维系下去，晋文公对于秦国的妥协态度终究也只能是一时之策。

首先是争夺地区霸权的需要。晋国始封之地在河汾以东，而秦国最初获得的土地则是在岐山以西，原本并不接壤。但伴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张，最晚到晋献公时期，两国的势力范围便已经在河西有了很大的重合。这种一衣带水的邻里关系，无论是对于大国还是中等诸侯国，实际上都不是什么好事。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在同一区域内同时出现了两个规模相当的大国，就必然要争出一个雌雄短长。东方的齐鲁、中原的郑宋、西方的秦晋，这几对欢喜冤家在春秋几百年历史中不断争斗，便是这一地缘政治导致的必然结果。

其次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晋国疆域素来有着表里山河的地理特征，东方列国如齐、楚，若想要威胁晋国本土，除了要穿越中原屏障之外，还必须要渡过黄河，克服太行、中条天险，这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晋文公才敢在立足未稳的时候，与令中原各国战栗

的楚国针锋相对，甚至赌上自己的国运，这一地缘条件是其他诸侯国都不具备的。

但话分两头说，这种优势只是相对于楚国和中原诸侯而言的，秦国却不受此法则的限制。之前我们提到过，秦晋之间有两条重要通道，一条是位于北端的龙门渡口，另一条是位于南端的蒲城、风陵渡口。这两处通道水面开阔、水流平缓，无法对规模浩大的军队形成有效阻隔。

当晋国实力强大时，可以从韩原或者蒲城发兵，扫荡河西的丰腴之地；而当秦国实力强大时，他们也可以将王城和上梁作为桥头堡，越过黄河水面直接入侵晋国。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列国政治环境下，秦晋两国都是唯一能够对对方本土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

秦晋之间这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关系，一直到战国时期仍旧发挥着作用。三家分晋之后，魏国所占据的正是晋国的传统版图，在分析秦与魏的关系时，商鞅曾做过一个比喻，说：“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反映的正是秦国与河东政权之间这种互相克制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关系的主导下，秦晋两国的君主但凡有余力，就一定会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黄河对岸。比如在晋献公时期，晋国便频繁越过黄河，在洛水东岸攻城略地；而在调停晋国君位归属之时，秦穆公也曾试图在河东建立据点。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以确保本土安全不受对方的威胁。

最后是争夺中原霸权的需要。每当人们论及战国史，崤山函谷关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可当提到春秋史的时候，对于同样的战略要地重视程度却远远不够。

崤函谷地既是晋国南下的重要通道，也是秦国东进的必由之路，是两国争夺中原霸权的核心利益所在。自秦穆公即位以来，两国无论是互通有无、相扶相携也好，还是刀兵相见、大打出手也罢，其核心诉求都在于此。

尤其是韩原之战后，秦穆公顺利从晋国手中夺取了崤函通道的控制权，这就给晋国争夺中原霸权增添了不少麻烦。比如晋文公平定王子带之乱时，他们本可以通过虞坂古道和茅津渡直入中原，但就因为崤函通道被控制在秦人手中，使得他们不得不重金贿赂盘踞在轹关陁内的“戎狄”才得以挺进中原。只要崤函通道还一直控制在秦人手中，即便是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霸业，恐怕也无法真正安心。

综合以上因素我们不难发现，秦晋之间的核心利益是尖锐对立的，矛盾也是无法调和的。这也就注定了“秦晋之好”的佳话无法长存，绥靖政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最终的分道扬镳也不可避免。

郭偃之谋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先轸自始至终都对秦国持有强烈的戒备心理，也随时随地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打破双方之间的均势。如今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劝阻，将这么一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送出了国境，这难道还不是最好的时机吗？

话虽如此，可栾枝的疑虑却也不无道理。他的这句话看起来好像不难理解，但却一口气抛出了两个棘手的问题。

首先是正义性的问题。秦穆公对晋文公有扶立之恩，而到晋文公去世为止，晋国实际上都还没有报答秦国的恩惠，这个时候攻击秦军，岂不显得晋人忘恩负义了？

对于这个问题，先轾的回答简单而干脆：“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我们国君去世了，秦人不来吊丧，这是没有把秦晋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眼里。出兵讨伐我们的同姓国家，是目中没有晋国。是他自己无礼在先，难道就因为对我们有过那么一点点恩惠，就可以坐视不理了吗？

紧接着，先轾又进一步回应道：“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今天你念及先君的恩义放他们一条生路，说不定明天就会回来给我们制造祸患。为子孙后代谋福利，这才是对先君最好的报答，哪里不具备正当性了？

其次是合“礼”性问题。春秋时期虽说“礼崩乐坏”，可表面上的礼仪总还是要遵守的。莫说是在本国国君的丧期内，即便是出征时遇到敌国国丧，领军的将领也必须得撤军回国，以便让敌国从容地把丧事办完。晋国现在正处于丧期之内，晋文公的尸骨还未入殓，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动刀兵的，否则的话，那就是真不把先君放在眼里了。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难缠的问题。秦穆公正是看准了这个时间差，认定晋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丧期内出兵，这才敢倾尽全国之力长途奔袭郑国。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那么晋国即便是作战取得了胜利，也会遭受广泛的质疑。就算你们无所谓，可这事要传扬出去，老百姓会怎么看，军中将士会怎么想，其他国家又该怎么议论你们？你们就不怕众口铄金，就不担心诸侯举旗造反？

但这些阻碍对于素来不走寻常路的晋国人来说还真不是什么事：假如我们就是遵循了先君的遗愿呢？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先轾，而是有着“神算”之名的郭偃。

据说在晋文公九年（前628年）周历十二月初十日，也就是晋文公去世的第二天，绛都郊外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

那一天，天上不知有没有下起蒙蒙细雨，人们在一片哀歌之中，心情沉重地扶着晋文公的灵柩，准备前往曲沃。可队伍刚刚离开绛都，棺材里就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据当时在场之人回忆，那声音沉闷而嘹亮，就好像是有一头牛在棺槨中号叫。

人要见鬼或许不稀奇，可如果白日见鬼，见的还是国君的鬼魂，那可就不一样了。扶灵的人们被这号叫吓得面如死灰，纷纷拜倒在地，一个劲儿地向死去的先君叩头。

正当此时，大夫郭偃突然站了出来，向众人解释道：“诸位不必惊慌，先君这是在向我们发布命令，说不久之后会有从西方来的军队过境侵袭，如果出师攻击，必定会取得大捷！”

郭偃又叫卜偃，是负责占卜问神、沟通天人的神职官员，此前多以预言家的身份现身说法，在仍崇信神祇鬼怪的时代里拥有很高的威望。郭偃在晋文公时期的主要贡献，是主导了以“执秩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改革，是一个能与管仲齐名的贤臣，深得晋文公的信赖。正是因为他有着特殊的身份，有着与日俱增的政治声望，人们对他能够听得懂棺材中所发出的声音深信不疑，自然而然地，也就认为这真的是“先君显灵”在向人们发布命令了。

从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晋文公虽表面上不愿与秦穆公撕破脸皮，但对秦国的防范之心却从未松懈过。早在秦晋两国尚处于蜜月期的时候，晋国对秦国的秘密工作就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了，以致秦穆公要偷袭郑国的决定还没有出炉，散布在秦都雍城的间谍就已经将各种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回了国

内。也正是在有了翔实情报的基础之上，郭偃才能够临机应变，将一个人们无法理解的现象，转化为晋国对秦战争的“动员令”。

有了这样一个铺垫，在丧期内开战的伦理困境也算是迎刃而解了。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该如何把握好这次机会，给秦军以最致命的打击。

崤山血雨

先轸是一个极富谋略的军事家，在他主政期间，所有作战都会经过精密部署，尽可能以最小的损失取得最佳的战绩，这次也毫不例外。他特意将作战地点选定在秦军班师的必经之路——崤山；作战的方式也选择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形式——埋伏战，就是要最大可能地歼灭敌方的有生力量。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晋国五军十卿倾巢出动，总兵力接近对方的三倍。还未成年的晋襄公被五军将佐裹挟着，将白色的丧服染成黑色，以梁弘为御戎，莱驹为车右，前去伏击秦军。

即便如此，先轸还是感到不放心，他特别派人与陆浑地区的“狄人”联络，动员“姜姓之戎”与晋军紧密配合，共同对秦军的必经之路进行了合围。

一切布置完毕，晋军埋伏在崤山山谷的北侧，姜姓之戎埋伏在山谷南侧，两军严阵以待，就等着秦军前来自投罗网了。在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日夜之后，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车马声，千里奔袭无功而返的秦军终于慢慢地走进了晋军布置的口袋阵内。

正如蹇叔所言，“勤而无所，必有悖心”。秦军因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再加上连日来行军的劳累疲惫，此刻大都满腹牢骚，自然也就毫无防备

之心。蹇叔嘱咐儿子们的那些话，估计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只想着能早日回归秦土，却完全没有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危险。

这其中当然也免不了有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正如蹇叔劝说秦穆公时所言：“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秦军以三百乘兵车跨越两千里长途奔袭，根本就无法做到完全保密。如今晋军一次性出动了五个军六万余人，同时还联络了活跃于陆浑地区的“姜姓之戎”，究竟怎么做才能确保消息不被秦军提前获知呢？秦军在出征之前，蹇叔就曾提到过，崤山山谷地形险要，有可能遭遇晋军伏击，可见秦国人也并不是完全糊涂的。如何能够让秦军如愿地走入晋军的埋伏圈，还不起防备之心呢？这些都需要下足够的功夫，不过由于史料阙如，此处就不做臆测了。

等秦军完全进入崤山谷地，晋军将士们一直期盼的号角声终于吹响了。山谷中的秦国军士完全愣了神，还没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见滚木礮石、矢风箭雨如飞蝗一般铺天盖地而来。

他们顿时被吓傻了！

几百年来，中原大地上发生过的战争不计其数，可还从来没有哪次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他们所熟知的战斗方式，要么是像宋襄公所描述的两军对垒、不鼓不成列的君子之战，要么就是以城墙为依托的攻坚战、防御战。即便是自号“蛮夷”的楚国，在与中原国家展开斗争的时候，也都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进行的。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而展开的歼灭战，这还是第一次。

也正因如此，中原各国军队都没有防备埋伏的意识。猛然遇到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战争形式，哪怕是训练有素的不败之师，也都会手足无措，更何况是这支纪律涣散的疲惫之师呢？

秦军在晋、戎两军的夹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顿时山谷中哭喊嘶叫的声音震彻天地。军士们四处逃散，却囿于地形的限制无处可逃，人马车辆互相踩踏碾压，死伤不计其数。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地形地利选择得当，这次的战斗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晋军也没有遇到过于激烈的抵抗。《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在讲到这场战事的结局时，语气极为平缓地叙述道：“然而晋人与姜戎要之穀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者。”

“匹马只轮无反”，就是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除了走在队伍前列的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主将被晋军生擒之外，其余所有将士无一人生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此次秦军出征的人数，史料上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我们只知道在过成周北门的时候，秦军有“超乘者三百乘”。而在战国时期秦相吕不韦所编著的《吕氏春秋》一书中，这个数量则增加到了五百乘。但无论如何，三百乘都应该是秦军此番出征使用战车的下限。

依照前文所述，古代的战车上通常会有3名甲士，分别是甲首、御戎和车右。但这并不是一乘战车的全部配置，战车之后往往还会有若干步卒跟随，称为步甲、车徒。其中的步甲大概是用作替补，故而地位要显著高于车徒。步甲和车徒的数量在不同时期差异巨大，依照西周时期的军制，车后跟随的有步甲7人、车徒20人，也就是一乘战车共配员30人。但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征赋方式的变化以及步兵战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旧制逐渐被打破，随车的步卒数量也不断扩增。到春秋中后期，这个数量甚至达到了72人，此外还有负责后勤补给的“守车”人员25人，也即一乘战车所配备的兵员达到了百人之巨。

崤之战爆发之时，秦国一乘战车究竟配备多少兵力，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但可以作为参考的是，比之更早的齐桓公时期，齐国的兵车就已经出现了50人的编制。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晋国，我们知道在城濮之战中，晋国出动的兵力是中、上、下三军，出动的兵车为七百乘。依照之前的介绍，春秋时一军的规模约在1万—1.25万人之间，三军的总数便是3万—3.75万人，以此来推算，晋军每乘兵车的人数恰好就是50人左右。

若秦国的兵制与齐、晋相仿，那么此次出动的战士人数就应该在1.5万人左右；而若以每乘75人的大数来计算，此行的人数则有2.5万人；而如果采信《吕氏春秋》的记载，则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2.5万人以上。

在数字的推算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的是，秦军此行的原本目的是要攻取郑国。郑国虽不及秦晋强大，却也不是省油的灯，早在八十年前晋国小子侯主政的时代，郑庄公就已经开始雄霸中原了。在其射王中肩的“繻葛之战”中，郑国更是一下就出动了三个军的兵力，人数也达到了3万人以上，而彼时的晋国恐怕还很难凑齐一个军的队伍。即便是考虑到经过长期内乱，以及齐楚两国多年的打压，郑国军力大不如前，却也不是任谁都能随随便便灭掉的小国、弱国。秦穆公哪怕是再自负，哪怕是仗着有人做内应，恐怕也不至于天真到只派区区几千人就想占领郑国吧！

除此之外，秦军在计划泄露之后，就地灭掉了滑国，也是不应该忽视的细节。古代攻城作战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通常围城的部队数量总要大于守城的军力，否则就很难攻取。滑国虽小，却也不至于毫无抵抗力，秦军想要攻取滑国，不经过激烈的战斗也是办不到的。

因此从各个口径来计算，秦军此次出征的人数都应该在1.5万人之上，也就是一个半到两个军的建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知道，秦晋两

国在韩原交战时，秦穆公倾尽全力所组织起来的军队，与晋国军队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而在当时，晋国依旧维持着晋献公时期的两个军，也即2.5万人的建制。这也就意味着，此次为了能够征服郑国，秦国几乎是将全国常备军力全部派了出来。

而在崤之战中，先轸以歼灭战的形式在崤山设下埋伏，致使东征的秦军“匹马只轮无反”，就等于是将秦国的有生力量全部消灭了，由此对秦国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这一天，是晋襄公元年，也即公元前627年，周历四月十三日。

第二节 穆公幻灭

拜赐之师

崤之战结束后，秦军将领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被押解回绛都。四月二十五日，作战归来的晋襄公着墨色丧服，郑重其事地安葬了自己的父亲。也正是从此刻开始，晋国的丧服便一律改成了黑色。

正如当年秦穆姬为了晋惠公而作势登台自焚以威逼秦穆公的旧事，如今风水轮流转，当初因政治联姻被迫改嫁重耳的文嬴，也开始为故国的命运而感到担忧了。

为了挽救秦军三帅的性命，文嬴不顾嫡母之尊，跑到宫中向晋襄公苦苦哀求：“这三个卑鄙小人离间我们两国的关系，我的父亲早就对他们恨之入骨了，就算是把他们生吞活剥了都不解气。他们横竖都是个死，倒不如把他们送回秦国，让我的父亲亲自处决，也好解他的心头之恨，你说呢？”

晋襄公当时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太多的政治经验，更经不起“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考验，一时心软就把秦军主将都放走了。等到先轸去朝见的时候，问起该如何处置秦军战俘，却听到了这样的结果，顿时火冒三丈，大骂道：“武人们拼尽全力才在战场上抓住他们，你却因为深宫妇人的几句话就把人给放了！如此毁弃战果而助长敌人的志气，我看晋国离灭亡也就不远了！”说完之后也顾不上礼节，在国君面前唾了一口，扬长而去。

面对先轸的无礼，晋襄公非但不敢发怒，反而还得乖乖地派自己的师傅阳处父去追赶。阳处父日夜兼程追到黄河边上，却看到那三人已经登上了船，正准备要渡河西去。面对这般情景，阳处父急中生智，忙解下了战车左边的一匹马牵到岸边，谎称这是晋国国君的赏赐。

秦军三帅这一路上马不停蹄地奔逃而来，就是害怕晋国人回过神来会反悔。如今好不容易虎口脱险，就算是你把黄河水抽干了也不能回去，又怎么能让你用一匹马就给骗回去？为首的孟明视于是叩头说：“承蒙贵国的恩典，没有用我们的头来祭鼓，而是允许我们回国受戮，在下实在感激不尽！回国以后，若是能得寡君明正典刑，也算死而无憾了。倘若侥幸得到寡君的恩赦，三年之后必将拜谢贵国的恩赐！”

孟明视一行回国的消息传到雍都，秦穆公早早就穿着素服住在郊外迎接他们。君臣相见，涕泪交加。秦穆公对着他们号啕大哭，说：“都怪孤一意孤行、鲁莽从事，没有听从蹇叔的劝谏，致使三位身受囹圄之辱，这都是孤的罪过。”

此次东征，秦国上万子弟命殒崤山，沉浸在悲痛中的国人自然会将所有罪责都归结到孟明视的身上。但秦穆公终于还是顶住了所有压力，声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会因为一次的过错就彻底否定一个人，继续任命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执掌军政。

这都在预料之中。无论孟明视在东征途中犯下了多少错误，派兵伐郑的错误决策也毕竟是秦穆公自己做出的，他必须为此负首要责任。秦穆公主动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既体现了其作为一名君主的开阔胸襟，以此来感化国人、收买人心，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国人的向上精神，鼓舞他们同仇敌忾、奋发雪耻，这符合秦穆公的一贯做法。尽管秦国没有晋国强大，可是一旦群情激愤，斗志被激发出来，晋国未必能够占到什么便宜。也正因为如此，先轸才在晋襄公面前说：“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

“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这是在黄河岸边拜别阳处父时，孟明视留下的豪言壮语。他也能说到做到。在秦穆公仁德的感召之下，

孟明视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决意要洗雪前耻。复仇心切的孟明视并没有耐心地等到约定的时间，仅仅两年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要兑现承诺了。

晋襄公三年（前625年）春，孟明视带领新组建的军队誓师东征，决意要洗雪两年前崤山之败的耻辱。得到秦军犯境的消息，晋襄公迅速整顿五军，以王官无地为御戎，狐鞫居为车右，亲自带兵抵御秦军。

不过，这场战争虽是秦国挑起的，战争发生地却是在秦国境内。二月初七，两军在彭衙相遇，秦军再次大败。由此可见，崤之战后，晋军并未放松对秦国的警惕，故而还未等孟明视进入晋国，就已经被晋军阻滞于国门之外了。

到当年冬天，晋国又以霸主身份召集了郑、宋、陈三国伐秦，一举攻占了彭衙以及附近的汪邑（均在陕西白水附近），孟明视发愤两年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秦晋两国百姓或许会有不同的观感。于晋国而言，他们讥讽孟明视不自量力，戏称这次伐晋的军队是“拜赐之师”，而发生在年初的那场彭衙之战，自然也就同样被戏谑为“拜赐之役”了。而于秦国而言，连续的失败让他们的信心再次遭到了重创，更加深了百姓对孟明视的愤恨。在汹汹民意面前，秦穆公还能对他既往不咎吗？

穷寇勿迫

彭衙之战的丧师失地，使得秦人对孟明视的忍耐降到了极点。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秦穆公对其过失竟仍持既往不咎的态度，而且还继续任用其修明政事、重施于民。秦穆公德行如此高尚，胸怀如此广博，不免令儒家士子为之倾心。

有鉴于此，《左传·成公二年》借赵衰之口感慨道：“念德不怠，其可敌乎？”秦国虽然战败了，可他们却能化悲痛为力量，沉下心来进一步修明德政，这样的敌人简直太可怕了，如何能够抵挡呢？假如秦军再来进犯，我们一定要避其锋芒，不可与之接战啊！

事实上，《左传》在对这件事进行评价时却有意回避了一个细节：这次战争结束后，孟明视虽在表面上仍受“重用”，但显然已经失去了秦穆公的信任。第二年（晋襄公四年，前624年）五六月间，秦国再次大举出兵伐晋，而这次带兵的主帅已经不再是一败再败的孟明视了，而是由秦穆公亲自担纲，这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其中的逻辑也很容易理解。崤之战后，秦穆公保全了孟明视等人，给了他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本指望着他能以哀兵打一个翻身仗。可最后的结果却是，孟明视伐晋的军队还没有走出国境，就被人“反推”到了家门口，导致秦国再次遭受奇耻大辱，这显然让秦穆公对他彻底失去了信心。

但为了继续感化国人，让他们将对孟明视的仇恨转化为与晋国死磕到底的决心，他只是解除了孟明视带兵的权力，并让他专心于扩充国家财政。而孟明视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自然要竭尽所能榨取国人财富，使得秦国的政治机器超负荷运转，以期在未来的决战中战胜晋国。

经过短暂的准备，秦穆公尽起大军，从蒲津渡强渡黄河、破釜沉舟，向晋人展示出他们必死的决心。经过之前的几次失败，秦军士气高涨、众志成城，他们沿着涑水谷地一路北上，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兵锋所指无人敢挡，一直打到了绛都的郊外。

在秦穆公拥护者的眼中，这场战事是胜利的一战、荣誉的一战，打出了秦军并吞山河的气势，打出了秦人不屈不挠的风格，展示了秦穆公在经历挫

败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若要实事求是地回归原典，这场战争所取得的成绩却着实差强人意。秦军在晋国境内横冲直撞，除了攻取王官及郊邑（皆在山西闻喜境内）之外，并没有取得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成果。之所以会有如此反差，与晋军所采取的反击策略有莫大的关联。

《孙子兵法·行军》有云：“粟马肉食，军无悬瓠，不返其舍者，穷寇也。”孙武将自断后路、自陷绝境的军队称为“穷寇”。这场战争秦穆公舍弃了孟明视而亲自挂帅，在渡河之后又破釜沉舟，就是要向全体军民、向世人宣示，他早已下定了鱼死网破的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这正是“穷寇”的表现。

正所谓“穷寇勿迫”，面对这样的亡命之徒，便是你有诸葛之智、张飞之勇，也断然不能和对方硬拼的。避而不战并不意味着怯懦，也并不表明对手就那么不可战胜，而是意味着：即便你战胜了，所付出的代价也会超乎想象。面对这样一股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你又何必跟他们硬拼呢？

除了士气的因素之外，作战场所的选择也会对战争的胜败产生影响。

现代体育比赛常常讲究“主场优势”，然而在实际的战争场景中，地理形势上的“主场作战”恰恰是兵家大忌。秦国大军深入晋地，于晋军而言是处于“散地”，士卒顾念家中的妻儿，又背靠故土自觉有后路可退，便没有死战的决心，一旦遭遇挫折就容易四处逃散。反之，于秦军而言则是“重地”，军士因深入敌境，前后左右全是敌人的城池土地，自知无退路可言便只能拼死一战。

身处“重地”的军队，因缺乏稳定的粮草补给，就需要就地抢掠粮草。克制这样的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壁清野，深沟高垒，坚守不战，令对方难以久持从而不战自溃。

晋惠公当年韩原兵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不懂兵法的亏。时隔十几年，晋国人虽然还没有成熟兵法的指导，却已经懂得避敌锋芒的道理，因此对于秦军的挑衅保持了极为克制的态度。秦穆公盛气而来，带领军队在晋国的城池之间横冲直撞，没料到对手根本不吃这一套。

秦军原本就缺乏粮草补给，如今又抢不到战利品，没过几天军心便涣散了。秦穆公四处求战不得，只好悻悻然地经虞坂古道从茅津渡河，在崤山谷地为四年前阵亡的将士修筑了一座公墓才回国。

晋襄公五年（前623年），晋国军队大举入秦，重兵包围阊、新城（都在陕西澄城境内），算是对上年王官之战的报复。而秦国因复仇心切，在已经损伤全部主力的情况下，不思休养生息，反而大肆掠取民力，榨取国人财富，政治机器经过短时期的高速运转，已经失去了再战的能力，面对晋国的挑衅也只能隐忍不发。至此，崤之战后秦晋两国间的恩怨情仇，经过两个回合的交锋算是告一段落了。

英雄遗恨

崤之战后，秦穆公经过多年的运作和准备，与晋国进行了两个回合的战争，却都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晋襄公七年（前621年），心力交瘁的他怀着霸业未成的绝望离开了人世。

《史记·秦本纪》在王官之战后叙说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人们对此的理解大都认为是穆公见谋晋无望，于是

便挥师西进，从而成就了“霸西戎”的功业。但实事求是地讲，从王官之战到秦穆公的去世，中间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功业并不现实。因此《史记》中的这段记载，应该是对他一生征伐“西戎”所创造功业的追叙。

事实上，秦穆公在弥留之际，心中所惦记的依旧是那未竟的争霸事业。为了在死后继续任用贤能之士，让自己在黄泉之下还能够延续生前的梦想，秦穆公死后竟用了177人为自己殉葬，其中还包括当世贤人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和针虎。

为了哀悼这些贤能之士，同时也为了表达对秦穆公丧心之举的鄙夷，秦人曾作《黄鸟》一诗，其大意是说：黄鸟时而停留在枣树枝头，时而停留在桑树干上，时而停留在荆棘丛中，“交交”的鸣叫中充满了哀伤。黄鸟的哀鸣所为者何？为的是替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兄弟鸣不平。他们都是百里挑一的俊才，都有着为人称道的德行，却不得不殉身于这阴冷的墓穴之中，怎能不让人战栗不安？如若老天有眼，我倒想问问，为何要如此残忍地对待我们的良人？如若能够赎回他们的性命，只怕会有上百人都愿意替他们去死的啊！

《左传·文公六年》更是借用君子之口评论道：“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

秦穆公声名在外，后世儒家也大都把他作为道德楷模来供奉，甚至还要将其列入以仁义为典范的“春秋五霸”之列。但在“君子”看来，其作为非但不足以为人所效仿，反而是应当竭力远离的坏典型。

《左传》中引用了《诗经·大雅·瞻卬》中的一句诗，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贤人的陨落，是国家的灾难。先代的圣王知道自己寿命有限，因此会在生前选拔贤能，为他们制定服制、礼仪、法度和准则等，引导他们成为万民的表率。这样一来，即便是圣王离开了人世，这些贤人也会将他们的法度传递下去，国家在这些贤人的治理下，同样可以走向昌盛。

然而，秦穆公的做法却严重背离了先圣王的教导。由于他的私心，在世的时候没有为秦国留下清明的法度；为了报复晋国，又急功近利，对百姓施加重赋，透支了秦国的经济力量。而到他去世的时候，不但没有给国家留下希望的火种，还以殉葬之举斩断了秦国多年来尚贤任能的风气，可谓自废武功。这些做法不仅称不上是有所成就，反而使得这个在岐丰之地艰难崛起的大国日渐衰落，其未能成就霸业，也是势所必然。

第三节 夷董之

太傅矫命

随着一代强人秦穆公的去世，秦晋之间的连续冲突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不过，发生在晋国内部的历史大剧，似乎才刚刚拉开序幕。

晋襄公六年（前622年），也即秦穆公去世的前一年，晋国老一辈的军事家先且居、赵衰、栾枝、胥臣相继去世，卿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历史时刻，晋襄公决定在五军的基础上舍弃两军，重新恢复三军的建制，并于第二年春在夷地举行大蒐礼。

自晋文公四年（前622年）确立三军六卿体制以来，举行大蒐礼进行人事任免已形成了惯例，这次也毫不例外。按照晋襄公的初步设想，他计划将士穀和梁益耳直接空降为中军元帅和中军佐，其余的人选则按照原来的位次循序提拔，也就是由箕郑父和先都分别担任上军将和上军佐。

士穀和梁益耳都属于异姓大夫，在史料中留存的事迹并不多。依据当前所能知道的情况，士穀应当是晋献公时的重臣士蒍之子，在晋襄公主政时期再袭司空职务。

士穀还是春秋时期最早以大夫身份主持诸侯盟会的人，早在晋襄公三年（前625年），晋、宋、鲁、郑、陈五国相约垂陇（在今河南荥阳东北）举行盟会，商讨伐卫事宜，士穀便是该次盟会的主持人。当时士穀并非卿士，却能主持盟会，而应邀参会的除鲁国外，其余各国均是国君亲自参会，可见其在晋襄公心目中的地位。

梁益耳虽没有什么事迹记载在册，但能够被襄公看中，属意让其担任中军佐，显然也不是寻常人等。

晋襄公提出让他们统领中军，或许有这么两方面的考虑：一来，士穀和梁益耳都属于异姓大夫，异姓族群在晋献公时期曾受到重用，到晋文公时期却被打压，晋襄公正好可以利用他们的诉求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二来，晋文公的改革尚未完成，任用异姓大夫为卿恰好可以平衡两方面的势力，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动力，这也算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更是一种寻求动态平衡的艺术。晋襄公在提出这个设想的时候，恐怕也知道被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可即便如此，卿大夫们顾及国君的颜面，总归还是会有所退让，最后的结果哪怕不理想，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晋襄公的计划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

这个名叫先克的年轻人，在此前的史料中并没有什么辉煌的事迹。之所以能够以一己之力推翻国君的决定，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是先轾的孙子、先且居嫡子。祖、父两代所取得的功业和积攒的影响力，足够为他参政议政、影响朝局提供坚实后盾。

对于晋襄公提出的内阁人选，先克首先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其理由听起来倒也合情合理：狐、赵两家追随晋文公多年，对于晋国的称霸事业有很大贡献，中军的人选自然应该在狐氏和赵氏中挑选。

晋襄公不服气，在蒐礼上据理力争，但因先氏背后力量过于强大，最后还是未能坚持己见，不得不同意让狐射姑出任中军元帅，赵盾出任中军佐。

而他所属意的士穀和梁益耳不仅没能入主中军，反而是连六卿的门槛都没有摸到。

担任中军将的狐射姑，又名贾季、狐夜姑，是前朝大夫狐偃之子。担任中军佐的赵盾，谥号赵宣子，又被称为赵孟、宣孟，是赵衰与赤狄廆咎如部落首领之女叔隗所生的儿子。赵衰随重耳流亡齐国后，赵盾随其母滞留在狄，一直到八年后才被接回晋国。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到晋襄公七年夷之蒐的时候，赵盾可能只是刚刚三十出头。

狐射姑和赵盾在夷之蒐之前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与晋文公时期就已经开始统领军务的箕郑父和先都，以及晋襄公属意要任用的士穀和梁益耳比起来，属于是绝对的后生晚辈。然而正是这两个后生晚辈，硬是通过各种运作把他们这些“宿将”都给挤了下去，这场新人与老人之间的交锋，并没有经过太多波折就已经胜败分明。

按说先克的目的达到了，两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一夜间就跻身中军行列，事情到这里是不是也就该结束了？然而并没有。因为先克真正想要举荐的并不是狐射姑，而是与先氏关系更为密切的赵盾。

而晋襄公的盘算也正在于此。既然无法为士穀、梁益耳主持公道，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与相对弱势的一方结盟，以对抗先、赵两家组成的联盟。这样下来，狐射姑为了对抗赵盾，也必然要投桃报李，使得国君依然能够在六卿架构中发挥绝对影响力。

然而让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君臣博弈的关键节点上，自己的阵营里却出了一个重要的叛徒。这个叛徒不是别人，正是父亲在世时为自己精心挑选的太傅，一直以来被自己敬重仰慕的老师——阳处父。

彼时阳处父从卫国出访回国，刚想在湿地休养一段时间，却听到夷之蒐出台了重大人事任命，自己所属意的赵盾虽跻身中军行列，却要屈居狐射姑之后。阳处父显然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于是便以太傅的身份发布命令，又在董（今山西闻喜）地重新举行蒐礼。在这次蒐礼上，晋襄公有意扶持的狐射姑落败，被迫与本已确定为其下属的赵盾进行了位置互换，被降为中军佐。

消息传到绛都，本来就已经心力交瘁的晋襄公，顿时方寸大乱。夷之蒐人事任命被人顶撞就不说了，如今的董之蒐更是被自己的师傅矫诏混乱人事布局，使得自己联结狐氏以牵制先赵联盟的企图完全落空。

这种只手通天无处不在的势力，让晋襄公深感恐惧，不免对赵盾更增敌意。董之蒐结束后不久的八月十四日，正值二十岁上下鼎盛年华的晋襄公却突然毫无征兆地病故了，这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但不管怎么说，襄公已死，国家还要正常运转，就必须另立新君——也正是在新君人选的问题上，狐、赵双方爆发了全面冲突。

重耳情史

晋襄公去世时，留下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叫公子夷皋，也即后来的晋灵公；另一个叫公子捷，是后来建立复霸大业的晋悼公的祖父。

历史上“主少国疑”通常都是危险的信号，连续两代“主少国疑”则往往是国家衰微的征兆。果不其然，在少年君主晋襄公英年早逝后，两大权臣狐射姑和赵盾便以国君之位作为棋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人物关系，我们需要先“插播”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聊一聊霸主的“浪漫情史”。

事情还要从三十多年前讲起。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时年仅十七岁的公子重耳因受申生的牵连，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在这十九年间，重耳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尝尽了人间冷暖人生百味，可唯独在感情生活上依旧顺风顺水。流亡期间，他先后娶了九名妻妾，再加上回国后从王室娶回的女子，其后宫阵容应该不会少于十位。

其中最早的，大概是一名叫杜祁的女子。按照春秋时期对女性的称谓习惯，“杜祁”顾名思义是祁姓杜氏之女，与晋献公时期的大夫士蒍和杜原款应当有些亲缘关系。史料中关于杜祁的生平事迹没有太多的记载，只是从赵盾和狐射姑的争论来看，她在文公妻妾中年岁最长，而且生了个儿子叫公子雍，在诸公子中年岁也是较长的。从中我们大概可以推测，杜祁应该是与重耳青梅竹马，得知自己钟情之人被迫流亡在外，她便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

重耳流亡初期，狄国与赤狄部落的一支廆咎如交战，俘获了他们首领的两个女儿，分别叫叔隗和季隗，并将其送给了晋国的流亡者。重耳娶了比自己小四岁的妹妹季隗，生下了两个儿子分别叫伯儵、叔刘，在诸子当中应是排名老大和老三，杜祁的儿子公子雍则排行第二。

重耳在狄国居留了十二年，后因遭到弟弟晋惠公的追杀，无奈抛家弃产跑到了齐国。齐桓公为了宣扬自己的仁德，就把宗室女子齐姜嫁给了他。后来重耳在齐国乐不思蜀，还是在齐姜的帮助下，狐偃等一帮随臣才把他灌醉了骗出齐国的。不过，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女子，在重耳即位后似乎并没有去往晋国，因此在史料中也没有留下子嗣记录。

除此之外，重耳还娶了一位名唤逼姑的女子，并生了个儿子叫公子驩（一作欢），在晋文公死后即位为晋襄公。重耳迎娶逼姑的事在史料中同样

没有记载，故而我们很难确认逼姑的身份。不过，考虑到姑姓诸侯本来就很少，能够得到确认的只有南燕国、尹国、鄂国、雍国、密须国等少数几个国家，且大都分布在河南东部及山东西部郑、宋、卫等国所在的地区。至于逼姑家族的氏，大概与宋国附近一个妘姓诸侯偃阳有一定的关系。根据这些条件，基本可以推测重耳与逼姑的相遇应该是在宋国流亡前后。

离开宋国后，重耳先后辗转了郑国、楚国，最后到了秦国。秦穆公有心扶植他成为晋君，就一口气送给他五名女子，其中就包含被晋怀公抛弃的怀嬴。这五名女子具体为他生了几个儿子不太清楚，有记录的是其中一个叫辰嬴的女子，生了个儿子叫公子乐。

关于文嬴、怀嬴、辰嬴之间的关系，过去不少人认为，这或许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称谓：怀嬴的“怀”字是她前夫晋怀公的谥号；既然嫁给了晋文公就不应该以前夫的谥号来称谓，因此死后被称为文嬴；而辰嬴的“辰”字，则是她的本名。

不过，从晋文公初年消灭吕甥、郤芮之后又从秦国迎回夫人的记载来看，怀嬴在文公回国之前就已经被确立为夫人，也就是正妻。再加上，以夫君谥号冠以己名也是夫人才有的特权，怀嬴、文嬴同属一人，是为晋文公夫人，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至于辰嬴，按照赵盾和狐射姑的讨论，她在晋文公妻妾中位份是最低的，不太可能是文嬴又或怀嬴本人，只是随同出嫁的一个媵女。至于有人说她曾经“嬖于二君”便认定其就是怀嬴本人，这点实际上毫无依据。春秋时期公室女子出嫁，素来以一女二媵为常，即便她曾经嫁于晋怀公，也完全可以成为怀嬴媵妾的身份，如果仅凭“嬖于二君”便认定其为怀嬴，这便是无稽之谈了。

晋文公即位之后不久，平定了周王室的内乱，稳定了周襄王的王位。或许就是在这次的行动之后，周襄王为表感谢而将王室的一名女子嫁给了晋文公，并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黑臀。这名女子的身份据说并不是王子，而是王孙，因为没有名字流传，就姑且按照当时的命名习惯，称之为王姬好了。

总算下来，晋文公有史料记载的妻妾一共有十个，分别是：杜祁、季隗、齐姜、逼姑、五羸女和王姬。众多妻妾也为他带来了不少子嗣，其中有名字记录在案的有六个，分别是：伯儵、公子雍、叔刘、公子驩、公子乐、公子黑臀。

中国古人崇信多子多福，但对于春秋早期的各国公室来说，多子未必多福，晋文公也深以为然。特别是在亲历了“骊姬之乱”，目睹了齐桓公诸子夺嫡和郑文公驱杀诸子的乱象之后，他对父亲所确立的“国无公族”政策更是深感认同。因此回国之后，晋文公尽管听从谏言，在任用官职时回归了周礼“尊贵爱亲”的原则，可在对待诸公子的态度上，却依旧把“国无公族”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下来。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未能继承国君之位的公子，不久后都会被遣送到国外去。

其中，季隗的两个儿子伯儵、叔刘，以及杜祁的儿子公子雍，在诸公子中最是年长，按理来说在选太子时，应当优先考虑才是，但晋文公并没有打算把他们接回来。《左传》给出的解释是，狄人把季隗送到了晋国，但要求把这两个儿子留下，晋文公感觉盛情难却，就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也算是保全了霸主的面子。至于公子雍，应当是回到了国内，但不久之后，还是依照“国无公族”的政策要求，被送到了秦国。

排行第四的公子驩，也即逼姑的儿子，后来被晋文公立为太子，晋文公死后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晋襄公。倘若我们之前的推测不错的

话，重耳与逼姑是在宋国流亡前后相遇，那么公子驩出生的时间就应该是在公元前638年前后，这也是前文认为晋襄公即位时只有十几岁的根据之一。

晋文公在世时，曾经郑重其事地为他物色太傅人选。当物色到阳处父的时候，曾向胥臣征询过意见。胥臣对阳处父的为人并不看好，因此含糊其词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但最后并未被采纳。选择太子不论年齿，死后留下了一个未成年的继承人；选择太傅又不听劝谏，给太子圈定了一个并不忠心的老师——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晋文公人生中最大的败笔。

除此之外，晋文公还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辰嬴的儿子公子乐，另一个是王姬的儿子公子黑臀。他们都是在重耳回国后出生的，到晋文公确立继承人的时候，年纪都还太小。晋文公去世后，这两个孩子就按老规矩被送出国去，其中公子乐去的是陈国，而公子黑臀则被送往成周。

依照狐射姑与赵盾的争论，晋文公在世时似乎还对诸多的妻妾进行过排名，其目的或许也是为了排定诸子的继承顺位，以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争端。这其中，排首位的自然是其夫人怀嬴（后来又称文嬴）。怀嬴之后，杜祁在诸多妻妾中本是最为年长的，但由于她宽厚仁慈，看到文公对逼姑母子青睐有加而不愿争宠，自愿排到了逼姑之后；由于狄国在晋国政治中的分量很重，杜祁又屈居于季隗之下，在文公的后宫中排名第四，逼姑和季隗则分列第二、第三位。其余人等我们只知道公子乐的生母辰嬴位居第九，因此猜测王姬有可能位列第五，剩下的三位秦国媵妾分列六到八位。

狐赵之争

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赵盾与狐射姑的争端。

晋襄公去世之后，本来是嘱咐他们要安心辅佐公子夷皋即位的，但为了争夺权势，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国家危难、宜立长君为由，排除了襄公幼子夷皋的继承权，并决定要在晋文公的诸公子中另立新君。

在确定支持对象时，赵盾先声夺人选择了杜祁的儿子公子雍。他的理由很清楚，公子雍乐善好施，在诸公子中最为年长，且深受晋文公的喜爱，如今更是在我们的老朋友秦国生活，算是集齐了善、长、爱、旧四大优势。所谓“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有了这四项“德行”，还怕不能安定晋国吗？

狐射姑大概是反应慢了些，猛听到赵盾已经抢先发言，不由得感到有些紧张。他眼睛骨碌碌转了半天，脑子里迅速地把诸公子的资料过了一遍，似乎也没有什么好选的了，只好忙不迭地搬出了公子乐作为棋子：“我看还是立公子乐最好，他的母亲辰嬴先后侍奉过两位君主，立了他有助于维护国内团结。”

狐射姑提出的理由要说完全没有根据倒也不尽然，只不过在如今的这个场合实在有些站不住脚，反而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而这恰好也正是赵盾用心之所在。

晋文公的诸公子中，除了伯儵、叔刘之外，就属公子雍最为年长了，剩下的公子乐和公子黑臀在当时都还未成年。在赵盾抢先选择了公子雍之后，狐射姑实际就已经没有更好的选项了，这个时候无论他选择谁，恐怕都比不上公子雍更能够立得住脚。因此，对于狐射姑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被赵盾牵着鼻子走，与其选择公子乐，还不如直接转头支持晋襄公的太子夷皋，至少还能落下一个尊奉先君的名声，并借此笼络一批拥护晋襄公的力量。最后即便是赢不了，也不至于会败得那么惨。

然而，狐射姑对此显然毫无准备，仓促之下一个不小心，就落入了敌人的圈套。果然，他的话刚说出口，赵盾就反唇相讥，说：“辰嬴地位卑微，在九位夫人之中排名最末，且侍奉过两个君主，是为淫；公子乐出居的是远在天边的蕞尔小国陈国，不能作为倚靠，是为辟。综合起来就是‘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如何能够安定呢？”

反过来你看看我选的人：“杜祁为了后宫团结先后相让于逼姑、季隗，最后名列第四，是为大义！公子雍，先君正是因为疼爱他，才让他出居秦国。而他自己也不负所望，在秦国兢兢业业，如今已经位列亚卿。他们二人‘母义子爱，足以威民’，这不就是新君的最佳人选吗？”

至于狐射姑又是怎么反驳的，《左传》没有继续往下写，反正是你来我往争执不下，谁也不肯相让，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启动了“速度与激情”模式，开始抄袭齐国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驾车赛跑的老故事。

赵盾派出的使者，一个是在六卿中有一席之地在先蔑，另一个则是曾担任过晋文公车右的士会，两个人接到命令，马不停蹄就奔往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也派了人去陈国迎接公子乐，至于所派何人，史书上没有具体说明，但想必身份也不能太低。

这原本是一个比谁快的游戏，可偏偏赵盾不按套路出牌，私下里破坏了游戏规则。他效仿管仲射杀齐桓公的故事，派人在郟地（今河南济源西邵原镇）截杀了公子乐，导致狐射姑顿时失去了手中的王牌。

仓皇之下，狐射姑首先想到的竟然不是该如何化解危机，而是怨恨阳处父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他安排自己的族人狐鞠居（续简伯）扮演了一回刺客，杀掉阳处父以解心头之恨，而这更是给赵盾带来了打击报复的理由。

不久后，赵盾首先诛杀了狐鞠居，又迫使狐射姑逃奔赤狄潞氏，狐氏集团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彻底落败。驱逐了狐射姑后，赵盾让自己的好搭档先克担任中军佐；箕郑父为上军将，以原来曾担任过中行将的荀林父为上军佐；先蔑和先都统率下军，新的三军六卿格局初步定型。

这个时候已经是晋襄公七年的十一月了，从年初举行夷之蒐开始，到狐射姑最终出奔赤狄，这场政治斗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个月。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若是按照常规的剧本，本应该尘埃落定了，可偏偏赵盾不是一个遵循套路的人。就在大家翘首期盼新君回国的时候，赵盾却突然改了主意，结果又生出了不少事端。

第四节 再起波澜

令狐之战

原来，当狐、赵二人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晋襄公的遗孀穆嬴得知自己的儿子将被废弃，便不依不饶地抱着公子夷皋在朝堂上大哭大闹。众大夫议事完毕退朝，她就继续抱着孩子到赵氏宫中，哭责赵盾背离先君遗言，废嫡立庶、败坏纲常。在穆嬴的死缠烂打之下，赵盾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决定要重立夷皋为君。至于他改变心意的原因，可不是要顾念先君的托孤重任，而是另有盘算。

首先，站在个人立场上看，赵盾跟公子雍虽说都在狄国流亡过一段时间，但却未必会真心希望公子雍回来。他之所以提出国家有难、宜立长君，无非是想借此跟狐射姑斗法，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没有再继续坚持的必要。

其次，赵盾在夷之蒐和董之蒐中先后借助先克、阳处父之手更改国君的决定，这对于任何君主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假如他真的把公子雍迎回来立为国君，那么他在朝中的地位，就跟当年的里克、丕郑，以及吕甥、卻芮没有什么区别了。新君必然会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对赵盾实在不是什么划算的买卖。反过来说，一个幼弱的君主显然要比年长的君主更容易控制，就算是想要闹情绪，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才有可能具备这个能力，这对于赵盾来说显然是极大的利好。

再次，晋襄公正值青春年华却突然暴毙，这件事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总会感觉有些蹊跷。就算是因为晋襄公身体不好，或者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可那些富于联想的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从阴谋论的角度去揣度，这种事情你是说不清的。也只有遵从先君遗愿立夷皋为君，才有可能洗脱嫌疑。

最后，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晋国的惠、文二君都是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国即位，外来的君主难免会跟自己的恩主达成某种协议，这就使得晋国在处理内外关系的时候，总要考虑秦国的感受。而秦国在扶植晋君时为了达成所愿，也总要派出大量的军队进入国境，向国内的大夫施压，从而令晋国贵族备感耻辱。尤其是有了之前的几次教训，秦国的继任国君秦康公为了杜绝权臣逼君的故事重演，更是郑重其事，派出几万大军护送公子雍入境。还说什么：“当年晋文公回国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人保护，所以才有了吕甥和郤芮的叛乱。”为此，他特意效仿秦穆公故事，给公子雍加派护卫，其指向再明确不过了。

总之，在对内外形势进行再三权衡后，赵盾终于决定还是“遵从”先君的指令，将太子夷皋送上国君的宝座，从而结束了晋国长达半年的无君局面。这个被扶上君位的幼子就是后来的晋灵公。

可问题是，赵盾改变心意的时候，秦国军队已经沿着当年晋文公回国的路径，渡过黄河进入了晋国境内。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想要好言好语地把秦康公劝回去，显然是不可能了。那该怎么办呢？要说起来，赵盾这个权臣的角色绝非浪得虚名，只要能够达成目的，他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既然秦国人是他请来的，如今自然也得由他来善后，而他善后的办法简直不要太粗暴，甚至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晋灵公元年（前620年）三月底，赵盾命上军将箕郑父驻守绛都，自己以中军将的身份，以步招御戎，戎津为车右，亲率三军至堇阴（今山西万荣西

南)驻扎。当时秦军还不知晓这几日晋国内部发生了什么，更不知晓晋军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因此防备很是松懈，却不料遭到了晋军的突然袭击。

四月初一日夜间，正是朔月时分，赵盾发布战前动员，说：“秦国人虽然是我们请来的，可我们要接受他们，他们就是客人，如果不接受，他们就是敌人。如今既然已经决定不再接受他们，就不要再犹豫，要兵贵神速、先声夺人，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随后赵盾利用信息优势，趁着夜色突袭驻扎在令狐（今山西临猗境内）的秦军。秦军猝不及防，全军溃败，在漆黑的原野上一路奔逃到刳首（今山西临猗西）才停下脚步。

随着秦穆公和晋襄公的相继去世，秦晋两国的争端本来已经告一段落了。然而由于赵盾在令狐突然背信、不宣而战，再次以野蛮行径重创秦军，引起了秦康公的极大震怒。与晋惠公的背信弃义以及崤之战的不宣而战比起来，赵盾在令狐之战中的所作所为显然更加令人发指。这也使得秦晋两国旧怨未平，又添新仇，本来已经平息的秦晋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再次上演了。

河曲之战

令狐之战爆发的次年，也即晋灵公二年（前619年）夏，秦军大举伐晋，攻取位于河西的武城（今陕西华县），掀起了秦晋之间第二轮冲突的高潮。两年后的灵公四年（前617年）春，晋国又起兵报复，攻取秦国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原梁国都城）；同年夏，秦国又反过来讨伐晋国，夺取北征（今陕西澄城南）。

晋国与秦国战事不断，内部又出现了混乱，无暇东顾，让楚成王的儿子楚穆王看到了希望，于是便趁机北上中原，迫使郑、陈屈服。随后又通过外

交手段，诱使宋、蔡、许等国就范，城濮之战后一度归于平静的中原局势又出现了不小的波澜。

中原各国惶惑，晋国霸业岌岌可危，秦康公更是浑水摸鱼，接连向东方派出了使者，试图趁机耸动诸侯背叛晋国，在报复晋国的同时达成秦国入主中原的宏大叙事。

比如晋灵公三年（前618年），秦人到鲁国“归僖公、成风之襚”。所谓“归襚”是对已故之人赠送衣物、车马等随葬品的一种礼仪，通常都是在吊丧时进行；丧事结束之后再去馈赠，难免会有些不合时宜。而秦国到鲁国去归襚时，已是鲁文公九年，他们所要吊唁的鲁僖公去世已然十年，这就显得尤为突兀了。

《左传·文公九年》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多少也有些难为情，不过考虑到秦国路途遥远、消息闭塞，且与东方诸侯之间的外交往来较少，因此尽管来得晚了一些，却也算是记挂着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便只好说这件事是合于礼的，应该予以记录。

通过这次“归襚”的试探，秦康公自觉鲁国并不排斥自己，于是便于三年后派西乞术再访鲁国，正式行聘问之礼。在鲁国这样一个崇尚周礼的国度，西乞术恐怕也不忘投其所好，历数晋国这几十年来各种违礼的举动，以拉拢鲁国与其一同讨伐晋国。

但秦国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鲁国大夫东门襄仲对西乞术不忘先君时的友好，不远千里到访、展示互信的举动表示十分感动，对其聘问期间所展示的礼仪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临走时还以厚礼馈赠，但却刻意回避了其联合伐晋的提议。

作为一部以鲁国为第一视角的史书，《春秋》记录秦国对鲁国的聘问是理所当然的，但并不代表西乞术此番出行就仅仅拜访了鲁国。而与鲁国的表现类似，东方诸国当时受到楚国的胁迫，仍需有霸主为自己主持公道，自然也就不愿意顺从秦国挖晋国的墙脚了。

秦康公瓦解东方联盟的努力未果，只好于晋灵公六年（前615年）冬独自出兵讨伐晋国，攻取了位于河东的羈马。不久后，赵盾统率三军六卿悉数出征抵御秦军，双方在河曲（羈马、河曲均在今山西永济境内）拉开了阵势。

在进行作战部署时，上军佐臾骈认为秦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建议赵盾筑垒固守以消耗对方。秦康公求战不得，果真焦虑不已，只好向令狐之战后流亡到秦的晋国大夫士会询问对策。士会对晋国内部的人事极为熟悉，他一眼就看出这是臾骈的计策，于是就建议秦康公派人到赵穿的阵前挑战。

赵穿属赵氏旁支，同时也是晋文公的女婿，既有赵盾的照顾，又有外戚的光环，因此多少有些跋扈。按照士会的说法，是“有宠而溺，好勇而狂”，严重缺乏军事素养。更重要的是，赵穿为人孤傲，与上军佐臾骈素有嫌隙，秦军到他阵前挑战，他必定会中计。

十二月初四日，秦康公依计派人到上军赵穿所部阵前挑战。赵穿受不得激，当时就带兵出营追击，但无奈秦军跑得太快，最后竟一无所获。回来之后，赵穿不住地埋怨臾骈懦弱怯战。这个时候有人多嘴劝了一句，说：“我们这是在等待战机啊！”这句话反而更激起了他对臾骈的逆反心理，遂不顾将令率部出战，结果又因部属太少，很快就被秦军包围了起来。

消息传到营中，可把赵盾给急坏了。一直以来，赵盾都对赵穿寄予了厚望，此时又生怕他有个什么闪失，于是也就顾不得深沟高垒了，果断下令全

军出击，还说：“秦国如果抓住了赵穿，就等于是抓住了我们的一个卿，如果就这样让他们得胜而归，我们的脸面还往哪儿搁？”

这次的交战，两军都是点到为止。晋军在救回赵穿之后，就撤军回防了。而秦康公经过与晋军短暂的接触，也意识到自己不是晋军的对手，便下定决心要撤军回国。但他又担心晋军会趁机追击，于是就派出使者假意向晋军约战，说：“今天这仗打得不过瘾，明天我们再战一场如何？”

《孙子兵法》说：“辞强而进驱者，退也。”上军佐臾骈深悉兵法奥义，他看到秦国使者心神不宁、声音失常，就断定秦军一定是惧怕晋军，想要连夜退却，如今派使者前来约战不过是虚晃一枪。臾骈因此建议不如将计就计，趁他们夜间撤军的时候再来一次突然袭击，将其逼到黄河岸边好一举击溃。

可赵穿这人，也正如士会所说的那般，似乎就是成心跟臾骈过不去。听说臾骈要对秦军落井下石，他立刻就拉着下军佐胥甲一起挡住营门，大喊说：“那么多死伤的兄弟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你们就把他们丢弃了，是不够仁慈。明明已经跟对方约定好了作战时间，却非要提前把人逼到险地，这是不勇敢！”总之就是不想让臾骈的计策得逞。

一群人好说歹说，可赵穿就是那么任性，死活就是挡着不让追击。遇到这样的“猪队友”，赵盾也实在没办法节制，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秦军趁夜逃走，河曲之战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封堵政策

秦晋关系可以说是春秋历史上最难破解的局。与秦、晋之间的明争暗斗比起来，晋、楚之间的纠纷简直就是过家家。两者区别在于，秦晋两国是山

水相依的邻邦，其矛盾是关乎核心利益的生死之争，所爆发的冲突也与仅仅争夺势力范围的争霸战争有着天壤之别。

人类早期文明充满了野蛮和蒙昧的味道，但在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内部，采取有限度战争素来都是各个文化圈内的共识。至少在春秋前、中期，中原诸侯内部乃至与楚国之间的战争，大都能很好地遵循宋襄公作战四原则。在这个以贵族为主要兵力来源，作战注重礼仪规则的时代里，战争所造成的伤亡通常都不会太严重。即便是在晋楚担纲唱主角的一百年间，两国为了角逐中原政治的主导权拼得你死我活，多数情况下也能点到为止，胜利一方通常都不会对失败者赶尽杀绝。

但对待秦国，为了压制这个最致命的敌人，晋国先后开启了埋伏歼灭战、夜袭战等各种突破了当时人们认知底线的战争形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大有不把对方当自己人、将其排斥在中原文化圈之外的意思。

尤其是崤之战，晋国以埋伏战的形式全歼秦军有生力量，如此战争形式在整个春秋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秦军一战损失将近两万人的军力，这个数量在战损不过百余人的春秋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要在战国时期找一场同等性质的战争的话，那就只有秦国攻打赵国的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与赵国主力尽丧后一蹶不振的命运类同，经此一役，秦国军力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秦晋之间实力的天平开始彻底倾斜。此后直至春秋时期结束，秦国在与晋国的对峙中都没能再次占到上风。

这场战争宣告了一直以来貌合神离的所谓的“秦晋之好”正式终结。从此以后，秦晋两国就从表面欢好的亲家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掩藏在暗潮

之下近二十年的秦晋利益冲突终于撕破了最后一层遮羞布，被正式摆上了台面。

将一个文明国家贬斥为野蛮，将一个文化人鄙夷为粗坯，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羞辱更能激起仇恨了。晋国对秦国的蔑视以及对秦战争的不择手段，使得秦人对晋人的怨念和敌意，比所谓的国仇家恨要深许多个数量级。

在此后的岁月中，不管各国间局势如何变化，秦国都始终坚持与晋国死磕到底的基本国策几百年不动摇。甚至于当晋国被一分为三，历史进入了攻城拔地的战国时代，秦国与继承了晋国衣钵的三晋之间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的蚀骨仇恨，也从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秦国后来得以快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晋国人亲手打下的死结，也终于成了他们自己的噩梦。河曲之战后，秦康公见识了晋国军力的强盛，也亲身领会了晋人在战争中展现的智谋——抑或阴谋。他自知已经无法与晋国相抗，于是便放弃了以往大军团直接冲突的方式，转而采取了类似于合纵连横的斗争策略。

一方面，他将早先侵袭都国时俘获的楚大夫斗克等人送还楚国，在楚庄王伐灭庸国的过程中也出兵相助，从而在晋楚对峙的国际秩序中彻底倒向楚国一方，共同对晋国的中原利益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则是联络晋国西、北方向的“白狄”，与东部山区的“赤狄”遥相呼应，通过小规模、多频次的袭扰，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晋国的边境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来自四面八方的侵袭让晋国不堪其扰，无心集中精力在中原施展影响力，其存续了二十多年的霸业也出现了空前的危机。为了能够缓解边境地区受到的压力，赵盾曾听从赵穿的建议，打算“以战促和”，缓解与秦国的矛

盾，但却遭到了秦国的断然拒绝。晋国热脸贴了冷屁股，不仅没能达成和解的目的，反倒是提醒了秦国，让他们反过头来配合楚庄王在东方的行动，对晋国掀起一场全面战争的高潮，这也就为后来晋国在邲之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议和之路行不通，晋国只能转变策略，从拉拢利诱改为全面封堵。首先是在晋灵公七年（前614年），因秦国曾多次从瑕地（今河南灵宝西北）入侵，晋国派詹嘉驻守瑕地，扼守桃林要塞以实现秦国的严防死守，开启了据守关隘进行阵地防御的先河。

晋国的封堵政策从当时来看应该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秦国所占据的丰镐地区原本是宗周故地，在西周时期算是中原科技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域。然而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受到了晋国的封锁，丰镐地区的科技文化却止步不前，最为直观的证据，就是当地出土的青铜器物较之东方各国有着不小的差距。

而就在同一时期，东方各国在激烈的军备竞争和互通有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小波“技术革命”的浪潮，科技进步速度加快，文化观念日新月异，生产发展欣欣向荣，艺术成就层出不穷，各方面都在跨越式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个局面一直到战国时期才被打破。在政治上，原本盛极一时的晋国被一分为三，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魏国以其一己之力封堵秦国几十年，却终究因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将政治重心东移，进而使封堵秦国的防线出现了松动。

在文化上，中原地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量士人游走于诸侯之间。当他们的观念无法为其他诸侯接受的时候，便纷纷将目光投向了相对落后的

秦国。而秦孝公为了富强图霸，相比于文化繁荣、经济富庶的东方诸国，更有决心和动力破除固有观念招揽天下英才。这也正契合了这些士人的内在需求，为他们建功立业提供了一块难得的价值洼地。

这些到秦国镀金的人才，不仅包含商鞅、张仪这样的饱学之士和郑国这般的能工巧匠，更有诸多籍籍无名的普通学者和不那么出类拔萃的普通工匠。他们在整个中原大地或许不是最优秀的，但由于秦国相比于东方诸侯有着更为巨大的后发优势，即使才学不那么突出的人也较易在这块洼地上取得成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秦国的向心力，从而构成了秦国最终走向强盛的外在动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第三章 晋国的中原霸业中衰

第一节 无为霸主

赵盾执政的二十年间，秦晋争斗不休，国内政局变幻莫测，周遭势力虎视眈眈，怎一个乱字了得。然而，如果要站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上，或许这二十年还算得上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在他开始执政之前，晋文公成功地通过平定王子带之乱和城濮之战，先后完成了尊王、攘夷的两大功业，从齐桓公手中接过了霸主的旗帜，从而开启了晋国霸业的先河。崤之战后，晋国又以一国之力单挑两大强国而立于不败之地，更是让列国叹为观止。在晋国强大武力的震慑下，在恩威并施手段的引导下，天下政治秩序变得井然有序。

与此前乱哄哄的景象不同，文公称霸后的三十年间，中原大地呈现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面貌：

一度威逼中原令人战栗的楚国，尽管并未丧失战斗力，却也因北伐受挫消停了不少；“北狄”侵扰的情形虽时有发生，但在中原诸侯的合力围剿之下，也渐有偃旗息鼓之势。

诸侯国间以大侵小的现象虽然无法全然禁止，但战争的烈度已显著降低了，以“灭国绝嗣”为目的的战争暂时退出了中原政治舞台，各国间互相攻伐的情形也明显减少。

各诸侯国内部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安定局面，以子弑父、以臣弑君的现象不再是各国政治的主流，偶尔出现那么一些小波澜，也能够迅速得以平息。

从这些成绩来看，晋国虽说在自身建设上有所欠缺，却也算是完满地履行了中原霸主尊王攘夷、定纷止争等各项使命。但若以造成的影响而论，赵盾执政的这二十年则不仅是失败的，而且还为此后晋国政局的长期动荡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襄公霸业

崤之战爆发后，由于秦穆公屡番兴兵报复，晋国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秦国的牵制，故而在中原霸业上用力稍显不足。再加之按照以往的经验，中原霸主很少有能够“连任”的，尤其是在晋文公去世之后，晋襄公年少即位难以服众，使得人们难免会产生晋国霸业也无法长期存续的想法。在这种消极预期的引导下，一些原本就对晋国有所怨言的诸侯国便产生了叛逆的念头，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数卫国。

卫国在春秋早期也算是一个颇为活跃的国家，但由于卫宣公不知节制，制造出一场影响深远的“新台丑闻”，其国势也就渐渐衰弱了，及至晋献公在位中期，更是因遭受外族蹂躏而险些灭国。在齐、宋等友邦的支持下，卫国得以在楚丘复立，又经卫文公的励精图治，国势才振作了起来。

然而就在卫国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城濮之战爆发了。卫国因在晋、楚之间站错了队，于战前受到晋军荼毒，再次遭受了重创，以至于后来在“狄人”不断侵扰下，不得不将都城迁往帝丘。而在践土会盟之后，晋、卫两国在关于卫成公地位的问题上又闹了不少矛盾，让卫成公备受折辱，这就使得他在内心里很难真心服从晋国的领导。

事实上，早在晋文公尚在位时，卫国对晋国的虚与委蛇就已经显现了出来。当时诸侯纷纷前往晋国朝见，可卫国不仅不肯履行朝见的义务，甚至还不经请示就派大夫孔达侵扰郑国，公然挑战霸主的权威。

为了防止卫国的叛逆行径引发“破窗效应”，晋襄公于即位次年（前626年）通告诸侯伐卫。而为了突出战争的正义性，在时任正卿先且居的建议下，晋襄公先行在温地朝见了周襄王，以为天下诸侯做出表率。

五月初一日，先且居、胥臣带兵包围卫国重镇戚邑（位于今河南濮阳以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大军占领戚邑并俘获其守将孙昭子。

面对大国的讨伐，卫成公束手无策，只得派出使者向陈共公求救。陈国本就是一个小国，地狭土偏又常受楚国威胁，陈共公自然不敢贸然派兵与晋国对抗。但念及陈、卫两国长达百年的友好关系，也只能急公好义方显英雄本色。他思忖了半天，最后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让卫国出兵反攻晋国。卫成公与陈共公心有灵犀，当即就煞有介事地派出大夫孔达，带兵悍然对晋国发动了袭击！

是可忍孰不可忍！晋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此等挑衅，因此立刻就采取了反制措施。当年秋天，晋国首先号召诸侯要分割戚邑的土地。到了第二年，又派司空士穀邀合宋、陈、郑等国的国君，以及鲁国大夫公孙敖在垂陇（郑邑，在今河南荥阳东北）举行会盟，以声讨卫国的不臣之举。

正当卫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去年给卫成公出主意的陈共公终于出手了。他特意到卫国走了一遭，将去年侵略晋国的大夫孔达抓到了盟会现场，以向晋国说明情由。其意大概是在表明，过去伐郑侵晋的举动都是孔达一手造成的，跟卫成公没有丝毫的关系。

这么一来，卫成公既不需要低头，也不需要认错，就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在座诸侯见既然抓到了罪魁祸首，也就没有了征讨的理由，不解散还等什么？

在对卫国用兵的同时，晋国还不忘敲打一下鲁国。

鲁国早年与楚人过从甚密，在城濮之战时又左右摇摆，意志很不坚定。可在瓜分曹国土地的时候，却因为积极争取，反而得到的好处最多，这件事也让鲁人颇为沾沾自喜。

就地缘政治而言，鲁国夹在齐、楚之间，向来缺乏安全感，三心二意倒也是常事。等到晋文公过世，鲁国以为天下又要易霸主了，于是便急不可耐地讨伐郑国，大概是想趁这个权力的空窗期充实一下自己的力量。

诸侯之间互相攻伐是对盟约最大的蔑视，未经霸主允许便私动刀兵更是对其主持订立盟约的公然践踏。而与此同时，更让晋国恼火的是，晋襄公即位之后，鲁国不仅没有前来朝见，反而是三番五次地与齐国联络感情，这未免也太不把继任的霸主放在眼里。

为了对鲁国的三心二意表示惩戒，晋国于襄公三年（前625年）以鲁文公即位后不来朝见为由派人前去责问。鲁文公受到责难不敢反驳，只好硬着头皮去朝见晋君，可晋襄公偏又避而不见，只派了自己的太傅阳处父与之结盟，且不允许他参加伐卫的垂陇之会，很是将鲁国羞辱了一番。

好在这种关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晋襄公四年，秦晋之间的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秦穆公准备要与晋国决一死战，使得晋国国内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晋国担心一味用强会导致诸侯离心，便主动向东方诸侯求取和解，同鲁、卫两国重修旧好。鲁文公再次赴晋改立盟约，受到了隆重的款待；而卫国被用来“背锅”的孔达也得以顺利回国。此后的两年，晋国内部发生变故，有关鲁、卫的事务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泝水诤敌

尽管晋国与秦国的战争如火如荼，但在整个列国政治版图上，晋国最大的对手当还是楚国。城濮之战后，晋楚关系跌到了冰点，有那么好几年两国都没有什么往来。直到晋文公九年（前628年），楚国派斗章出使晋国，两国关系才出现了和缓的迹象。

然而到晋襄公即位后，与楚毗邻的许国因担心晋人无法提供庇护，先行一步与楚国结盟。此举引发晋国震怒，于是就邀合陈、郑等国，于晋襄公元年冬出兵伐许，试图将其重新拉回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楚成王显然也不肯示弱，当即派出了令尹子上起兵围陈救许，迫使陈、蔡两国与楚议和。之后楚军又转而攻打郑国，试图把流亡在楚的公子瑕立为郑君，以改变郑穆公子兰的“一边倒”政策。

但没承想，大军在攻破郑国都城远郊的桔柣之门的时候，公子瑕的战马受惊，拉着战车直接冲入了池塘中。满怀着雄图大志的公子瑕乘兴而来，结果还没进入新郑的城门，便在一场意外中殒命，这也直接导致楚人更立郑君的计划完全泡汤。

尽管在郑国的行动出师不利，楚国到底还是在陈、蔡的战场上稳住了局势。为了能扳回一局，晋国统帅阳处父带兵伐蔡，却不意与回师救援的令尹子上相遇，双方在泚水（今河南平顶山市境内沙河）两岸夹河对峙。

阳处父只是晋襄公太傅，并非五军十卿的核心成员，故而所带兵力较弱，与令尹统率的楚军主力自不可同日而语。他不敢贸然与楚军接战，但为了晋国的颜面又不能轻易认输，于是便虚晃一枪，故意派人去向楚人下战书说：“常言道‘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如果你们要打，我就回退三十里，给足你们渡河列阵的空间，什么时候开打就全听你的了。可要是你不愿意打，就让我缓口气吧，大家也别在这儿空耗钱粮了，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假如对面列阵的是宋国军队，楚军肯定二话不说就要渡河列阵了，可如今面对的偏偏是以狡猾著称的晋军，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正当子上打算渡河列阵之时，一旁的大孙伯急忙劝阻说：“晋国人一向诡计多端，不讲信用，万一趁我们渡河时搞突然袭击，到时兵败如山倒，再后悔就来不及了。不如就让他们缓口气吧！”

令尹子上（斗勃）在城濮之战中曾担任右军统帅，而他的助手大孙伯（成大心）则是子玉的儿子，两个人都亲历过晋军“退避三舍”的旧事，自然不敢相信对方会老老实实在原地待着。听了大孙伯的一席话，令尹子上不由得冒出了一身冷汗，于是就下令全军后退三十里，其意在告诉阳处父：这次我们来腾地方，你们渡河列阵可好？

可子上毕竟还是太淳朴了，他虽曾见识过晋人的狡诈，却不知道他们的狡诈是要“逆天”的。楚军刚开始后撤，河对岸的阳处父就向各处宣扬：“楚国不敢与我们交战，他们逃走了！”——然后就一副凯旋的姿态撤军回国了。

商臣弑父

双方这次接触，子上实际上是建了大功的，不但达到了救援许国的目的，还迫使陈、蔡与楚结盟，从而在晋国霸业版图的完美曲线上划开了一道醒目的缺口。而阳处父则不然，他除了在口头上占了点便宜之外，军事上可以说是毫无建树。反而是因为他的出征，让晋国在失去许国的同时，又丧失了抵御楚国北上的两个重要盟友。

然而意外的是，战争结束后，阳处父还是那个阳处父，令尹子上却不再是原来的子上了。而这一切的缘由，还要从久远以前的一段旧事开始说起。

公元前672年，也即晋献公即位的第五年，当时还只是一名公子的楚成王弑其兄堵敖，即位为王。楚成王年轻时妻妾成群、儿女众多，但唯独对商臣宠爱有加，于是就想将其立为太子，为此还特意向众臣征询过意见。

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大夫的子西对此不以为然，曾直言劝谏说：“王上现在正值青春鼎盛，宫中宠爱的妃子又多，实在不宜早立太子。何况按照楚国的习俗，一向都是立年轻的公子，即便不考虑这些，万一哪天您有了新宠想要改立幼子，就很容易引发祸乱啊！”

以上进言尚且中肯，但子西接下来所说的话则直接表达了他本人对商臣的不满：“商臣眼睛像胡蜂，声音像豺狼，生性残暴不仁，不适合立为储君！”

子西的直言不讳并没有改变楚成王的决定，却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招来了仇恨。

此番泚水之战子西无功而返，商臣正好利用国人对若敖氏的不满，派人大肆造谣传谣，说子西之所以避敌不战，是因为收了晋人的贿赂。为了一己私利使楚国遭受耻辱，简直是罪大恶极！楚成王早就为城濮之战时子西的无能感到恼火，如今听了商臣的说辞更是深信不疑，一怒之下竟然把子西杀掉了。

不过，子西虽然死了，但他早年劝说楚成王的那些话到底还是应验了。到泚水之战爆发的公元前627年，楚成王在位时间已达四十五年，年龄更是到了七十岁上下。年老的楚成王有了新欢便忘了旧爱，果然萌生了废长立幼的念头。商臣听到了一些风声，但又无法辨别真伪，只得去找他的老师潘崇询问对策，而潘崇则建议他从姑姑江芊那里套套消息。

江𦍋是楚成王的妹妹，早先曾嫁到江国去，据说是因为江国与秦国结好，楚国为了报复打算将其吞并，于是就提前把江𦍋召了回来，可见楚成王对她的关爱。按照潘崇的嘱咐，商臣设宴款待江𦍋，并故意在宴会上羞辱她，惹得江𦍋暴跳如雷，说话也就无所顾忌了。她厉声怒喝道：“你这个贱种，难怪王兄要杀掉你立公子职为太子！”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既把商臣骂了个狗血淋头，又把他想要了解的事情交代了个清清楚楚。商臣挨了一顿骂，好歹弄清楚了父亲的用意，于是就在潘崇的鼓动下起兵造反了。政变爆发时，楚成王正在大殿上用餐，看到自己的儿子满脸杀气，知道是躲不过去了，于是便哀求道：“让我吃了熊掌再去死，可以吗？”

商臣害怕父亲故意拖延时间，于是断然拒绝了这个并不算过分的请求。楚成王潜然泪下，满怀悲愤地在大殿中悬梁自尽，据说死后还差点被冠以“灵”这样一个“乱而不损”的恶谥。

通过杀父弑君篡位的商臣就是后来的楚穆王。楚穆王即位之后，先后灭掉了江（位于今河南息县）、六（位于今安徽六安）、蓼（位于今河南固始）等国。晋国也曾南下救援过江国，并进逼沈国（位于今河南上蔡），但由于冲突范围大抵都在楚国的势力范围内，晋国的救援很难奏效，事情也只能作罢。倒是在楚穆王的威逼之下，原本归附了楚国的陈、蔡、许等国因担心遭到灭国之祸，又纷纷投入了中原联盟的怀抱，算是给晋襄公霸业的完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结好诸侯

晋襄公去世前后，晋国诸卿大夫围绕六卿权力归属展开了激烈争斗，国内局势一地鸡毛。因国内斗争不断向外扩展，又催生了令狐之役的不宣而

战，进一步将晋国拖入了无休止的战争泥潭。再加上狐射姑怂恿下的“赤狄”蠢蠢欲动，北方“白狄”时时寇边，将晋国边境也搞得鸡飞狗跳。这些变故极大地消耗了晋国的精力，使得他们在调停列国纷争时多少有些乏力。

在此情形之下，楚国大夫范山敏锐地觉察到“晋君少，不在诸侯”（《左传·文公九年》），力劝楚穆王经略北方。楚穆王遂于晋灵公三年（前618年）从狼渊（今河南许昌西）出兵北犯郑国，俘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又接连攻伐陈国，迫使郑、陈两国与楚结盟。

晋灵公四年，志得意满的楚穆王邀集已经归附的陈、郑、蔡三国分别在息地和厥貉（今河南项城西南）举行会见，扬言要大举讨伐宋国。眼看楚人气势汹汹，局势迫在眉睫，宋昭公无法招架，只好听从司寇华御事的建议，乖乖地带上礼物亲自登门慰劳楚军。

宋国人的谦恭态度更激发了楚穆王的骄纵之心，遂又带着这几个国君到宋国的孟诸（亦作孟渚，古大泽，在今河南商丘东北、虞城西北）行猎。而在行猎期间，楚穆王还变本加厉，让郑穆公和宋昭公分别在左右两侧圆阵，此举无疑是将宋、郑两国当成了自己的臣属而非独立的国家，令两国君臣都倍感屈辱。这还不算，在行猎当天，因宋昭公不愿以臣属身份接受命令，楚穆王更是令左司马文之无畏当众鞭打他的仆人以示羞辱，让堂堂一国之君颜面无存。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当此晋国深陷对秦战争泥沼之际，郑、宋、陈、蔡的国君受尽屈辱，可苦于找不到可以为他们做主的强权，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和血吞，任由楚人作威作福。

楚国的蛮横令诸侯深感不安，晋国对列国事务的无所作为更让他们倍感失望，一时间天下局势又现出了云谲波诡之势。在《左传》的记载中，鲁国

就先后与秦、楚两国有过被动的接触，其他国家恐怕也不能免俗。不过出于谨慎起见，大多数国家都还在观望，并没有立即表明立场，但这也足够令晋人心惊了。

为了维持霸权地位，防止有人趁机朋比为奸，破坏好不容易达成的霸业联盟，赵盾扶持晋灵公继位后不久，便召集了齐、宋、卫、陈、郑、许、曹等诸侯在扈地（郑邑，在今河南原阳西）举行会盟，这也是赵盾以大夫身份主持诸侯会盟的开始。

由于鲁文公在扈之盟时没能及时赶到，且早先曾私自讨伐邾国，晋国派人到鲁国责问，迫使鲁文公派东门襄仲到衡雍（郑邑，在今河南原阳西，践土东北）与之结盟，算是立威。而为了取信于诸侯，在郤缺的建议下，晋国同意将晋襄公时期占领的卫国匡（今河南长垣）、戚之地归还卫国，将申地一直到虎牢的土地归还郑国，是为施恩。

但即便如此，诸侯在配合晋国协同作战方面仍表现得颇为迟疑。比如晋灵公三年（前614年）楚国伐郑之时，赵盾曾联合鲁、宋、卫、许等国前往救援，但因各国吃不准晋楚局势的未来走向，故而行动都极为迟缓，等联军抵达郑国时，楚军早已得胜班师。晋灵公五年（前616年），因四国从楚，晋国曾让郤缺和鲁国的叔仲惠伯在宋国的承匡（今河南商丘睢阳区）相会，但会谈似乎也没有什么结果。

直到晋灵公七年（前614年），随着河曲之战后晋国对秦战略的转变，赵盾才终于抽出手来，开始顾及东方局势。而也恰在此时，一心图谋北上的楚穆王突然去世，又给晋国收服诸侯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各诸侯国鉴于形势的逆转，便也纷纷向晋国示好。

晋灵公七年冬，嗅觉灵敏的鲁文公率先朝见晋君，其后卫、郑等国也纷纷寻求鲁文公的帮助，借由鲁国的关系与晋国重新结盟。到晋灵公八年的新城之盟时，除蔡国因毗邻楚国而没有参会外，其余在穆王威逼之下叛晋服楚的诸侯又纷纷回归。

伐宋无果

在结好诸侯的同时，晋国还忙里偷闲解决了一次王室的纠纷。

这次纷争在史料中没有具体的展现。我们只知道在晋灵公八年（前613年）春季，因周顷王去世，周公阅和王孙苏两人争夺权柄，相持不下。直到半年后官司打到了晋国，在赵盾的调解下，双方各归其位，事情才算是落定了。

此次事件虽影响不大，但其中透露出的意味却足够深长。王室内争需要借由诸侯国大夫之手才能解决，这恐怕也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可见王室的权威已经无法挽回地衰落了。

尽管局势看起来一片大好，可晋国重新东略时的表现却总让人感觉不怎么用心。比如晋灵公八年的邾国内乱，邾文公去世后，邾人立了齐姜所生的太子貊且为邾定公，却把晋姬所生的捷菑驱逐出境。为了给国君亲戚讨回公道，赵盾在新城举行会盟，随后亲率八国近八百战车前往征讨，最终却因为名不正言不顺而撤军。

如果说对于邾国的讨伐，还是“起乎情止乎礼”的话，那么接下来对于齐国和宋国的两次征讨都无功而返，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宋国的内乱发生在晋灵公十年，不过其内乱的因子却是早就种下了的。泓水之战后，宋襄公因伤病不治，于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去世，其子王

臣继位，是为宋成公。宋成公继位之后，背楚而亲晋，引发楚国的声讨，拉开了晋国称霸中原的序幕。

到晋灵公元年（前620年），宋成公去世，其弟公子御杀掉了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自立为君。后来宋成公的幼子杵臼又联合国人杀掉了宋公御，继位为宋昭公。

宋昭公本来很有人望，但经历了这么一场变故后，对公族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担心群公子会像叔父一样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便想效仿晋献公诛杀“桓庄之族”的故事，在国内展开大清洗。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计划还没有开始实施就被泄露了，得到消息的穆、襄后裔迅速包围了公宫，迫使当时的六卿出面，代表公室与公族进行和解。

公族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就得知消息并对公室取得胜利，恐怕离不开宋襄公夫人（周襄王姐姐王姬）的支持。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宋襄夫人本身就是公族势力的幕后操纵者。因为她对宋昭公从来都不甚满意，反而对宋昭公的弟弟公子鲍青睐有加。

据史料中的提法，公子鲍为人乐善好施，对下喜欢慰劳孤寡老人和灾民，对上则与桓公以下的公族和执政的六卿关系紧密，简直就是一个有为青年的美好典型。此外，公子鲍还是一个十足的美男子，以至于连身为君祖母的宋襄夫人都有些按捺不住。即便公子鲍一再拒绝其暧昧请求，可还是能让她死心塌地地帮助他夺权。

此番宋昭公与公族虽达成了和解，但宋襄夫人的背后运作却并没有止步。第二年，她又以宋昭公对自己不敬为由，联合戴氏发动叛乱，杀掉忠于宋昭公的襄公之孙孔叔、公孙钟离和大司马公子印，得知消息的司城荡意诸则挂印出逃去了鲁国。

这次事件究竟是如何摆平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总之，此后的几年间，宋襄夫人一直都与宋昭公处于明争暗斗之中。到晋灵公十年（前611年），宋襄夫人彻底掌控了宋国的军政大权，于是就设计准备在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时候将其杀死。

宋昭公虽不掌握实权，但对此事也并非一无所知。然而，他似乎早就厌倦了这尔虞我诈的生活，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反抗，便干脆将公室的所有宝物都分给了忠于自己的臣子，让他们都尽快离去，以免受到牵连。失去左右保护的宋昭公依旧按照原先的日程安排到孟诸打猎，行走到半路的时候，被君祖母派来的刺客帅甸攻杀。政变成功之后，宋襄夫人立即扶持公子鲍继任君位，是为宋文公。

宋国发生的政变是公然违反君臣秩序的重大事件，作为中原霸主的晋国自然不能袖手旁观。第二年（前610年）春季，赵盾派自己的副手荀林父与卫、陈、郑等国组成联军伐宋，大军浩浩荡荡，气势蔚为壮观，让宋文公好不惊惧。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凶神恶煞的“执剑人”竟然与他握手言和，在众多诸侯面前承认了宋文公地位的合法性，其弑君篡位的罪行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讨齐无功

齐国的内乱要比宋国早两年，其爆发的原因也更加复杂。简单来说，这次君位之争实际上还是齐桓公去世后的历史遗留问题。

早年，齐桓公的六位如夫人给他留下了六个儿子。其中，公子无亏与内侍勾结饿死了亲爹并矫诏即位，但不久后就被其他公子杀死。公子昭在宋襄公的协助下，即位为齐孝公。齐孝公在位不到十年，于城濮之战前不久去世，其子被卫公子开方杀死，公子潘被立为齐昭公。而公子雍则在战前投靠

了楚国，准备借势夺位，但在楚军战败后就不知所踪了。到晋灵公八年（前613年）五月，在位二十年的齐昭公去世。与之前的剧本一样，齐昭公的儿子——齐君舍刚刚即位，就被公子商人杀掉了。

到此为止，齐桓公的六个公子就只剩下了公子商人和公子元了。公子商人杀掉自己的侄子，担心公子元将来会有样学样套路自己，因此假意要出让君位。但公子元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对商人的打算早就心知肚明，也看不惯他那副惺惺作态的嘴脸，故而回应道：“你觊觎君位都这么久了，又何必推辞？若是我保证能安心侍奉你，你能免我一死吗？”

得到了公子元的保证，公子商人随即宣布即位，是为齐懿公。公子元也履行承诺没有继续为乱，只不过出于对其人品的厌恶，他从来不以“公”相称，而是将其称为“夫己氏”，也就是“那个人”。

齐懿公即位后，很快就因为前任国君齐昭公夫人子叔姬的安置问题，给自己惹来了一桩大麻烦。子叔姬是鲁国宗女，齐昭公在世时便不怎么受宠，如今唯一的儿子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再留在齐国显然已经没有意义了。大约是接到了子叔姬的请求，不久后鲁国便派人前来迎其回国，可齐懿公却并不想放人。无奈之下鲁国只好向周天子提出请求，希望能以天子的道德权威，说服齐国将其放归鲁国。

彼时天子在成周正好无事可做，就应了下来，特意委派单伯到齐国说情。可意想不到的，齐国压根就不给天子留面子，单伯刚到齐国便被扣留了。鲁国一看坏了，这连周天子的话都不管用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们才想到去找当时的霸主晋国主持公道。

霸主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齐国慑于晋国的武力，勉强同意释放单伯，但子叔姬仍旧被扣留在齐国。不久后，齐懿公大概是埋怨鲁国到处告自己的

黑状，故而出兵攻打鲁国，鲁国只好再次派季文子到晋国去求救。

接到鲁国的求援后，晋国终于要动真格了。晋灵公九年（前612年）十一月，晋灵公亲自出马，召集了宋、卫、蔡、郑、许、曹等国国君在扈地举行会盟，图谋声讨齐国的无礼行径。然而，这次讨伐联军气势汹汹而来，最后却灰溜溜地走了。至于其撤军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晋灵公收受了齐国的贿赂——这未免也太儿戏了。

这次事件更加激发了齐国的野心，在此后的几年里，齐懿公接连侵伐鲁、曹等国，晋国皆无所作为。晋灵公十二年（前609年），齐懿公被大夫杀死在申池（在今山东淄博临淄区齐故城小城区）；鲁文公去世后，其次妃敬嬴与东门襄仲合谋杀嫡立庶、排除异己，晋国也同样无动于衷。

两次征召诸侯联军皆无功而返，对齐鲁两国发生的乱局又视若无睹，这些都对晋国的公信力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晋国的霸业就在这样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下走上了衰亡之路。当此之时，楚国却在一代强人的带领下蒸蒸日上，一个触底反弹的神话开始渐渐浮出水面。而带领楚国走出低谷的不是别人，正是在诸多“春秋五霸”排行榜中都占据一席之地的南方霸主——楚庄王。

第二节 问鼎中原

一鸣惊人

楚庄王即位于晋灵公八年（前613年），按照《史记》的记载，庄王继位初年，不仅在进取中原方面毫无作为，反是因耽于酒色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坏典型。

为了把享乐主义进行到底，他还下了一道死命令，如果敢有犯颜直谏者杀无赦。可朝中关心家国命运的正直人士实在太多，区区这么一道诏令显然挡不住他们的进谏之路，这其中就包括伍子胥的祖父伍举。

伍举进到王宫的时候，朝堂上钟鼓之声不绝，莺歌燕舞不断，楚庄王左拥右抱，大殿之上一片淫靡之色。见此场景，伍举只觉周身不适，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最近有人给我出了一个谜语，臣才疏学浅实在猜不出来，所以想讲给大王听。”不等楚庄王发问，他就接着说道：“说是土山上落了一只奇怪的鸟，三年不鸣不飞，这究竟是什么鸟呢？”

楚庄王听了之后很是不屑地笑道：“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我明白你的意思，你退下吧。”

听了这番话，伍举心里顿时敞亮了许多：原来大王也不是什么糊涂人啊！于是便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事后楚庄王并没有要改过自新，反而更加放浪了。要照这种做派发展下去，楚庄王恐怕也要走上晋灵公的道路了。大夫苏从看到伍举这来软的不行，就干脆来硬的。他直接就跑到朝堂上搅乱了歌舞

奏乐，搞得楚庄王很不开心，怒声斥问道：“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

苏从早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镇定自若地回答说：“君上的命令微臣自然知道，但如果我的死能够让吾王幡然悔悟，臣哪怕是万死也毫不足惜！”

或许是因为苏从外挂了主角光环，听了这番话，楚庄王不但没有恼怒，反而自觉地停止了歌舞作乐，开始一本正经地处理国政。从此以后，他尚贤任能，诛杀佞臣，修整国政，普惠百姓。没过几年，楚国便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先后灭掉了庸国，打败了宋国，征伐陆浑之戎，观兵于周疆，成为一代雄主。

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生动地刻画了楚庄王韬光养晦时的精彩画面，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也是《史记》叙事的独特之处。但若要从实际历史去考量，书中描摹的场景却并不真实。

因为一来伍举主要生活在春秋的后半段，直到公元前533年，《左传》中还有他向许国国君授田的记载，而那个时候距离楚庄王即位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事实上，不仅伍举本人不可能出现在楚庄王初年的朝堂上，就连他的父亲伍参在当时也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角色，这样的故事显然不会发生在他们父子身上。

而从另一方面讲，“一鸣惊人”的故事也并非楚庄王的专属。在《史记·滑稽列传》之中，太史公就将同样的故事又讲述了一遍，而这次故事的主角却变成了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和一个叫作淳于髡的赘婿。可见连太史公自己都已经搞不清楚，这样的故事究竟该套在谁的头上了。

依照《左传》的记载，楚庄王即位时面临的内外局势，要远比《史记》所描述的还要凶险得多。其时楚庄王的年岁尚不满二十，而他面临的却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对内有若敖氏对君权的侵蚀和压迫，对外则有周边“蛮族”的虎视眈眈，其从韬光养晦到励精图治的道路更是充满了艰险。

首先我们来看外部环境。

就在楚庄王即位的当年，周边的“群舒”就开始闹起了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到第三年，也即晋灵公十年（前611年），“群舒”的叛乱还未摆平，楚国腹地又遭遇了一场大饥荒，与楚毗邻的“群蛮”和“百濮”大抵也都受到天灾的影响，他们在庸国、麇国的鼓动下群聚起来，兵分四路到楚国“打草谷”、抢粮食。正当楚人焦头烂额应对不暇的时候，早先被晋惠公安插在秦岭地区的“陆浑之戎”也开始趁火打劫。

各路敌军从不同的方向蜂拥而来，让以往不可一世的楚国猛然陷入了绝境。为了避免“戎族”侵扰带来亡国之祸，楚国只好紧闭申息二县北门，并打算把郢都所在的沃土全部丢弃，将都城迁到阪高（今河南当阳西）。

若果真如此的话，楚庄王恐怕就要变成第二个周平王了，他在历史上的那些丰功伟绩也将不复存在。好在楚国人才济济，还有人时刻保持着清醒，这个人就是当初批评令尹子玉“刚而无礼”，如今正担任工正一职的蒍贾。他对那些持逃跑主义论调的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我能往，寇亦能往。”

这句话与电视剧《汉武帝》那句“寇可往，我亦能往”正好相反。对于这句话人们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相对积极的解释是：既然我们的地盘“蛮族”能来，那么“蛮族”的地盘我们也可以去。但如果结合现实处境来看的话，这种理解多少有些不太合宜。蒍贾此言是为了断绝人们想要迁都

的念头，因此他的意思更有可能是说：我们能跑到的地方，“蛮族”也能追过去，与其来回迁都躲来躲去，倒不如背水一战予以坚决反击。

在他的坚持下，楚国放弃了迁都的念头，转而出兵抵御南部“蛮族”。果然不久之后，以“百濮”为首的南方“蛮族”就纷纷散去了。

三路“蛮军”退却，接下来需要集中全力对付的，便是最难啃的庸国。庸国位于楚国的西北方向，其国都上庸大致在今湖北竹山一带，是位于秦、楚、巴、蜀之间的一个大国，早先与楚国恩怨不断的麇、夔等国原本都是其附庸。

为了能够一举击溃庸国，解除周边邦国对楚国的威胁，楚庄王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国之力。与此同时，楚人还与秦国、巴国取得了联系，共同对庸国构成了合围之势。

战斗正式打响之后，在潘汪建议下，楚庄王采用了先祖楚厉王征服陴隰时使用的骄兵之计。他让楚军不断地和庸人接战，但每次交战都只许败不许胜，让对方以为楚军疲弱便不再设防。多次败退之后，庸人骄横而楚人激愤，楚庄王便在临品（今湖北丹江口）会师，与秦、巴两国一道对其发动了最后的总攻。于是，这个在江汉流域盘踞上千年的大国，终于在三国围剿下宣告覆灭。

皋汭之战

“灭庸服群蛮”的战事发生在楚庄王即位的第三年，这大概也是所谓“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灵感来源。然而事实上，与内部的敌人比起来，所谓的“群蛮”还只是癣疥之患，此时楚庄王的处境并不比晋灵公更好，他手中的权势更是远远没有达到可以一鸣惊人的程度。

楚庄王在国内面对的最大敌人，是所谓的若敖氏家族，也就是楚国早期君主若敖的支系子弟及其后代形成的势力。他们长期垄断着令尹与司马两个重要职务，不仅其他家族无法插手，就连国君也往往受到他们的牵制。

最早在楚厉、武王时期，若敖氏便已经显山露水，先后有斗祁和斗伯比出任令尹。楚成王即位后，令尹的职务传承到了斗伯比的儿子斗穀於菟（子文）和成得臣（子玉）手中。城濮之战后，斗穀於菟的儿子斗勃（子上）、斗般（子扬），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大孙伯）、成嘉（子孔）等人前仆后继，都担任过令尹这一要职。至于司马的职务，则是由斗穀於菟的弟弟子良，以及子良的儿子斗宜申（子西）、斗椒（子越）全盘掌控。

除了垄断令尹、司马的职权，若敖氏家族还占据了楚国最重要的两个据点——申、息二县。这两个县位于如今河南南阳境内，大约在楚文王时期设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县级行政单位。

当时楚国擅自称王，对标的是坐在王城里的周天子，其所设立的“县”大致是与中原的“国”同级，因此县的长官通常被称为“县尹”或“县公”。但与周王室治下的国不同，楚国的县由楚王直接控制，县里的军力和财政都由中央支配调遣，县公并非世袭罔替的封君。

申、息两县靠近中原，既是楚国北上中原的桥头堡，又是抵御诸侯南下的北大门，在楚国的地位非同一般，自然也很受若敖氏的偏爱。在若敖氏掌控政局的几十年里，申、息两县的县公虽也常年轮换，但大抵都是在若敖氏家族内部流转，申、息两县的武装基本上也就成了若敖氏的私家武装。

若敖氏权倾朝野的煊赫之势，恐怕是晋国的六卿合起来都不敢比的。他们垄断朝纲，目空一切，天然就是有着集权冲动的君主们的眼中钉。而他们

恃权傲物、恣意妄为的行径，又进一步激化了君卿之间的冲突，一场关乎未来权力走向的生死决战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场冲突最早在成得臣为令尹时就显露无遗。成得臣屡屡违逆上意，楚成王却无法约束，只能任由其在中原战场上丧师辱国。城濮之战后，楚成王借机逼死令尹子玉，裁撤司马子西的职务，试图依靠以蔦氏为代表的老牌贵族向若敖氏发难，却还是没能阻挡若敖氏家族继续掌控朝政的大势。

到楚成王后期及楚穆王主政时，君主与若敖氏之间的权力争夺更趋白热化。先有令尹子上（斗勃）与阳处父接战无功，被楚穆王大做文章诬杀而死；后有与斗勃搭档的原司马子西（斗宜申），因城濮战败遭到贬谪而心存不满，多次欲起事谋弑国君，终因事情遭到泄露而被杀。

不过，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垄断一切的若敖氏也并非铁板一块，在与王室斗争的过程中，其家族内部也出现了剧烈的分化。先是在城濮之战后，斗穀於菟的儿子斗勃接任令尹，引起成得臣之子成大心的觊觎，后者遂与当时的太子商臣合谋诬杀了斗勃而接任令尹。

楚庄王即位当年，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担任令尹。因群舒发动叛乱，成嘉与太师潘崇引兵出征，造成了国内兵力空虚。受命驻守郢都的公子變和斗克（字子仪）因与成嘉等人有怨，派人尾随大军到前线刺杀成嘉。事情泄露之后，二人惊慌失措，竟然将刚刚即位的楚庄王劫为人质。

斗克等人劫持楚庄王离开郢都，在逃经庐邑（今湖北襄阳西）时，被庐地大夫戡梨及其助手叔麋诱杀，劫持事件很快得到平息，但还是把涉世未深的楚庄王吓得够呛，让他萌发了要彻底整肃朝纲的想法，这大概也是楚庄王采取韬光养晦策略的直接诱因。

成嘉死后，令尹的职位又回到了斗穀於菟的儿子斗般（字子扬）的手中，司马的职务则由子良的儿子斗椒（字子越，又称斗越椒）担任。但这位司马对于家族世袭的职务似乎并不满意，总想更上一层楼，于是就联合时任工正的蔦贾（字伯嬴），诬杀了自己的堂兄弟令尹子扬，终于一跃攀上了令尹的大位。

事情发展到这里也就进入了高潮。早在斗越椒出生之时，据说也有“熊虎之状”“豺狼之声”，斗穀於菟曾预言其会给若敖氏带来灾难。待斗越椒坐上令尹之位，或许是与司马蔦贾分赃不均，两人很快又爆发了全面冲突。公元前605年（晋成公二年），也即楚庄王即位的第九年，令尹子越率先发难，带领若敖氏族人攻杀蔦贾。然而，双方的斗争并未因蔦贾之死而停止，反而是打击面越来越大，战火不知不觉间就烧到了楚庄王的头上。

面对楚王斗越椒也毫不含糊，他进一步驻军烝野，拉开阵势向楚庄王发起了挑战。楚庄王手中兵微将寡，自然无力与其抗衡，只好央求用楚国三代君王的后代做人质以寻求和解，谁知却被其断然拒绝了。

无奈之下，楚庄王只好整合了全部力量，在皋浒（今湖北襄阳西）与若敖氏展开决战。战斗中，斗越椒远远地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从楚庄王的车辕上掠过，穿透了鼓架，又钉在了铜钲（青铜铸造的随军乐器）之上；而另外的一箭则直接穿透了车盖。

《史记》中说：“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可令尹子越却端是力大无穷，从战场另一端射来的箭，到达庄王车驾时力度不减，在穿透鼓架之后竟然还能钉在铜钲上，把庄王左右的将士全给吓蒙了。

见此情景，楚庄王忙激励将士们说：“当年先君文王攻克息国的时候，得到了三支神箭，斗越椒偷去了两支，刚才他已经都用完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楚庄王精彩的阵前演讲，成功地让随从的将士们打消了退却的念头，他们一鼓作气、奋勇杀敌，终于击败了斗越椒。

皋浒之战后，被压抑多年的楚国贵族终于得见天日，众人一怒之下几乎将整个若敖氏全族屠灭。留在楚国的只剩下两支后裔，在此后湮灭于历史长河中。而斗越椒则有一个儿子逃到了晋国，被封到苗邑，故而被称为苗贲皇，在后来晋楚争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为后话。

楚庄王即位初年，内有天灾人祸，外有群舒和百濮的叛乱，时局可谓是多灾多难。特别是若敖氏的叛乱，险些让准备“一飞冲天”的楚庄王折断了羽翼，也险些将楚国拉入崩溃的边缘。但也正所谓“多难兴邦”，多灾多难的斗争形势终究还是激发了楚人走出困境的惊人斗志。楚庄王正是以此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楚国上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为接下来北伐中原建立功勋铺平了道路。

而这个时候，恰好也是晋国在和平安定的局面中渐渐出现“世卿世禄”苗头的关键节点。这两个实力相当的大国，此时就像是两列相向而行的列车，在这一刻的擦肩而过后，又匆匆地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自此以后，楚国开始朝着周礼规范的方向亦步亦趋，而晋国则在“礼崩乐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中的意义的确耐人寻味。

郑国叛晋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晋楚争雄的历史上，郑国就像是一个监测晋楚“输出能力”消长的晴雨表，总能敏锐地捕捉到风向的细微变化，并显示在其外

交态度上。假如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郑国突然宣布转变立场，往往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即将来临。

当晋国躺在晋文公的功劳簿上享受霸权带来的红利时，当赵盾带领众卿在两线作战的压力之下东奔西跑的时候，楚庄王“灭庸服群蛮”的风声就已经飘然北上，深深地牵动了郑国人惶惑的内心。

或许于众多诸侯而言，晋国是他们生活的这个大杂院中一个严厉的大家长，楚国则是一个持枪闯入敲诈勒索的暴徒，跟随在晋国的身后对楚国奋起反抗，带给他们的既是温暖也有荣耀。但对于夹在大国之间常年受人欺凌的郑国来讲，与一个有时也会展现出温情一面的暴徒比起来，行为暴虐的家长并不更值得敬重和爱戴，朝晋暮楚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当晋国这个大家长因无力承担其使命而威信尽丧，甚至开始喜怒无常的时候，郑国就打定了要“离家出走”的主意。

晋灵公十一年（前610年），或许是因为晋国在伐齐、伐宋两次战争中的无力表现，郑穆公预感到晋国已经衰弱，无法为自己抵挡来自楚国的威胁，其对待晋国的态度便出现了摇摆。晋国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当年谋求平宋的扈之盟上有意冷落郑穆公，以此来向郑国提出警告。后来还是郑国大夫子家致信赵盾据理力争，希望晋国能够设身处地理解郑国夹在大国之间的艰难处境，这才说动了赵盾同意与郑国交换人质以示互信。

就在他们互换人质的第二年，齐国懿公被杀、鲁国东门氏杀嫡立庶、宋国武氏之乱等异常事件接连爆发。这本该是晋国重塑霸主形象的极佳时机，郑国更是巴望着晋国能有所表现，也算是能给自己吃颗定心丸。然而晋国似乎根本就没有要干预的打算，这就不能不让郑国大失所望。于是到晋灵公十三年，他们便再次背弃了盟约，主动向楚国示好。

这样的背叛显然是不能容忍的，赵盾也不允许在自己的治理下让国家失去霸主的光环，于是便开始软硬兼施，试图挽回郑国早已凉透的心，一场围绕郑国归属而展开的霸权争夺战开始上演了。

这场争夺战持续了十年时间，晋楚之间也拉锯了四五个回合。其中的第一回合始于晋灵公十三年，也即公元前608年。郑穆公主动与楚国结盟，楚国此后又北上讨伐陈、宋两国。赵盾为救援两国而带军伐郑，与楚国大夫蔿贾在北林相遇，晋军遭遇了与楚军直接对抗以来的第一次失败，其将领解扬也被楚军俘获。

楚军凌厉的攻势让晋国感到十分不安，为了缓解多线作战的压力，赵盾听从了赵穿的建议，出兵讨伐秦国的附庸崇国，以图在秦国救崇的过程中与其结盟。然而此举不但没有达成和解的目的，反而促成了秦楚之间的进一步联合，晋国的对外政策遭遇了空前的失败。

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年），楚国发动盟友对晋国开启了大规模作战。第一方面军由郑国公子归生带领，在大棘（今河南柘城一带）打败了宋军，一战缴获战车四百六十乘，俘虏二百五十人，并斩杀了乐吕、俘虏了宋军主将华元，还割去一百名战死者的耳朵。第二方面军，由秦人从侧面策应楚人在中原的行动，出兵攻占晋国的焦邑。楚国主力部队则是在斗越椒的带领下，驻扎在郑国边境，以逸待劳等着晋军自投罗网。

这一轮攻势着实是眼花缭乱，让赵盾左支右绌，失去了应有的优雅风度。他先是出兵河外，解了焦邑之围，又从阴地（晋地，在今陕西商州至河南嵩县，黄河以南、熊耳山脉以北一带）会同诸侯攻打郑国，等到他师老兵疲的时候，却瞅见斗越椒正饶有兴致地等着自己。

面对敌军大旗，如果避之不战，很容易被人讥讽为胆小鬼；可在敌逸我劳的形势下，如果继续深入与对方接战，晋军必败无疑。面对两难局面，在荣誉与生死之间，赵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而为了挽回颜面，他以助长若敖氏为乱为由下令撤军回国。到第二年（前606年）晋成公继位后，晋国才又趁楚国攻伐“陆浑之戎”的机会，强行将郑国拉回到自己的战线上。

观兵周疆

但好景不长，仅仅几个月后，楚国就打败了晋国引以为屏障的“陆浑之戎”，第二回合的争斗就此开始。

这一战楚庄王追亡逐北，驱赶着“戎兵”抵达洛水，并在成周郊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以向龟缩于王城的天子耀武扬威。更让当时中原诸侯感到难堪的是，当天子派遣王孙满出城劳军的时候，楚庄王竟然盛气凌人地问起了九鼎的轻重。

九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问鼎的轻重，就是在赤裸裸地挑衅天子，表达其欲取代周王室而主宰天下的雄心伟愿。二十年前曾预言过秦军必败的王孙满，如今已长成一名善于外交辞令的官员，他在慰劳楚军时不卑不亢地回应道：“天命在德不在鼎。以前夏后有德的时候，让九州的官长进贡铜器铸成九鼎，以鼎作为德的依托来护佑百姓，并接受上天福佑。夏桀昏乱失德，商人受德，鼎自然也就迁到了商朝；商纣暴虐失德，周人受天命，九鼎就迁到了周朝。如果有德行为依托，就算是鼎再小，也是重的；若无德昏乱，就算有再大的鼎也是轻的。天授明德，是有固定期限的，当年周成王定鼎于郊廓（今河南洛阳）时曾进行过占卜，天命曰周人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眼下周人之德虽然已经衰微，但仍有天命庇佑，鼎的轻重，还是不要问为好！”

这段话是王孙满在紧急情况下随机应变做出的回答，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周人的天命观，但能否说动楚人就不得而知了。《春秋》经传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尊严，对楚人后来的反应并没有再作描述，但周人割肉安抚楚人恐怕也是必然的。

楚庄王在成周所表现出的骄横姿态，陡然激发了郑国人潜藏心底的“华夷观念”和反抗意识，使得楚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武力优势无法彰显，也为随后的争夺战平添了不少的阻力。再加上此后几年间，楚国爆发了“若敖氏之乱”和“舒、蓼”的叛乱，而郑国则是在郑穆公死后出现了短期的动荡，使得楚庄王几番伐郑都没能取得预想的效果。

然而我们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不加强自身建设，总是等着敌人犯错的话，那么这种优势就无法保持。果然到晋成公六年（前601年）冬，楚庄王既平定了国内的动乱，又连续剿灭了舒、蓼，会盟吴、越，彻底稳固了后方，遂从吴、越回师，不费吹灰之力就又把陈国夺了回来，并进一步压迫郑国。

为了挽回当前的颓势，晋国于晋成公七年秋合邀宋、郑、卫、曹等诸侯在扈地举行会盟。会后，由中军佐荀林父带兵伐陈，新上任的正卿郤缺亲领大军救郑，鼓舞郑国军队在柳棼击败了入侵的楚军。

不过，这一次的扈地会盟中却发生了一个意外，回国即位刚到第七个年头的晋成公猝然离世，大夫们拥立晋成公之子公子獯（又名据）接任君位，是为晋景公。晋成公的突然去世，使得晋国内外局势陡生变数，中原各国也开始观望。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荀林父伐陈之役不克而终；郑国尽管击败了楚军，却还是不得不与楚国和解。

国人大临

这几轮的争夺下来，楚国咄咄逼人的势头和晋国在应对楚军方面的乏力都显现无遗。不过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晋国军力虽显出了疲态，可究竟还未到衰败的程度，晋景公即位之后围绕郑国展开的几次小规模争夺战中，晋国都占尽了上风。

但问题是，与其他诸侯国仅仅需要向霸主纳贡和出兵助战不同，郑国不仅要常年履行纳贡的义务，当楚国势大试图北略之时，还要充当晋楚交战的主战场。两个大国打仗，战场却选择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这种事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

郑国的执政子良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夹板气，故而愤愤不平地说道：“晋楚两国不务德政，只知道以武力争夺，苦的可是我们郑国人。既然如此，以后谁来我们就跟谁讲和。反正他们也都不讲信用，我们又何必言而有信呢？”

郑国的本意无非是想花钱买平安，与持续不断的战争蹂躏比起来，受两个大国的双重剥削也就没那么憋屈了。因此，当楚国来讨伐的时候，他们就与楚国签订盟约，楚国一走，他们立刻就又跟晋国结盟了。一心想要扫荡中原的楚庄王当然不能认同这种做法，因而当得知真相之后，便愈发怒不可遏了。

于是到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春，楚庄王尽起大军，声势浩大地朝郑国开拔过来。见楚庄王一副赶尽杀绝的势头，郑国人难免心里发怵，于是便拼死抵抗。

经过十七天的围城，郑国终于还是抵挡不住楚人的强攻，于是便在宗庙中就是否该向楚军求和进行占卜，得到的结果却是不吉利。既然求和之路走

不通，便只能号令全民出动，并将所有的战车军械列于街巷，决心与楚国玉石俱焚。当他们再次占卜的时候，祖先和神灵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这种紧要关头，郑国所能依赖的也唯有祖宗和神灵，既然他们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于是身处国都的所有郑人都聚集到祖庙内号哭，守城的将士听到之后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放声大哭。哭声震天动地，悲情感人肺腑，就连驻扎在城外的楚庄王听到了心中也不禁犯怵，吓得急忙撤兵而去。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之前郑国执政子良已经定下了“两边倒”的政策，为什么政策执行不到一年，他们便改弦更张，要跟楚军拼死相抗了？当面临楚国的强攻之时，他们又为何会如此悲观，以至于搞出了“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样一场闹剧呢？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去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也就是楚庄王“灭陈设县”的风波。

事件的起因源于陈国的一桩丑闻，故事的核心人物是一名众所周知的美女——夏姬。夏姬据说是郑穆公与少妃桃子所生的女儿，长大后嫁予陈宣公的孙子夏御叔为妻，并生一子名叫夏徵舒。

大约是晋成公在位年间，夏御叔不知何故英年早逝，只留下了他们孤儿寡母在封地株林（今河南柘城）过活。然而夏姬的美貌实在过于惊人，以至于想要隐姓埋名过一段安生的日子都成了奢望。不久后，当时的国君陈灵公便找上门来，与其随行的还有孔宁、仪行父两名大夫。

陈灵公是出了名的荒淫之君，孔宁、仪行父则是远近闻名的无德之臣。这三人日日公开宣淫于夏姬之家，事情在国内传得沸沸扬扬，让夏徵舒感到

十分难堪。可陈灵公却丝毫不以为意，依旧乐此不疲地拿他们母子寻开心，终于闹到了不可收场的地步。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压制的情绪总会有爆发的一天。到晋景公元年（前599年）五月初八日，夏徵舒终于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马厩里将陈灵公一箭射杀，随后便自顾自地坐上了国君的宝座。

受到惊吓的孔宁、仪行父逃到楚国去告状，可楚庄王对此却并没有理会，到第二年春天甚至还跟夏徵舒在辰陵（今河南西华西北）举行过会盟。但也不知是何缘故，仅仅几个月后，也就是晋景公二年的冬天，楚庄王突然以讨伐夏氏之乱为由入侵陈国。

陈国老百姓都以为是好事，于是便围在街头“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完全没有抵抗的意思，楚庄王轻轻松松地就把夏徵舒给杀了。但让人想不到的是，楚庄王在任务完成后竟然就那么霸着不走了，还堂而皇之地将陈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

陈国人大为愤慨，你不是来讨伐少西氏之乱的吗？怎么就把我们陈国给灭了？消息传出之后，中原士人更是震惊不已，一时间整个天下舆论哗然，谩骂诅咒之声不绝于耳。这时恰好有一位名叫申叔时的大夫从齐国出使归来，途中他注意到了诸侯的反应，因此对楚庄王的做法不以为然。

当时楚庄王自以为得意，正满面春风地在朝堂之上接受拜贺，申叔时不好劝谏，于是只能神色凝重地向楚庄王复了命，随后不发一言就退下去。于是他就责备申叔时说：“夏徵舒无道弑君，我带领诸侯替天行道取得了成功，诸侯、县公都在向我表示祝贺，为何独独大夫不发一言呢？”

申叔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朝他拱了拱手，随后面无表情地问道：“您还能给我申辩的机会吗？”

楚庄王一时哑然：我又没想要杀你，这又有何不可？

申叔时说：“夏徵舒罪大恶极，的确该死；国君替天行道，也是大义之举。可您以讨罪扬善为由进军陈国，却因为贪图富贵而将其设置为县，恐怕不妥吧？”为此他还特别举了个例子，说有人牵牛把别人的庄稼都给踩了，这固然是有错的；可若是您不由分说直接把犯事儿的牛给没收了，这惩罚是不是太重了？

申叔时的意思是说：诸侯之所以愿意跟着你讨伐陈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你能够主持正义。可现在的情况是，你以正义之名却净干贪婪的事儿，以后还有人会相信你吗？楚庄王一听这话，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赶忙认错，并重新恢复了陈国的社稷。

从楚庄王继位以来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他对于楚国未来的具体走向还没有清晰的规划。一方面，他观兵周疆、灭陈设县，反映了他试图完成祖先宏愿、取代周室的雄心；而恢复陈国的社稷，似乎又显示出他在现实政治面前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接受以霸业秩序为主导的中原政治范式——然而这对于不少依旧沉浸在灭国思维里的楚人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也正因为如此，当楚庄王最终决定恢复陈国的时候，还特别要求从陈国每个乡里抽调一个人出来，集中迁到楚国安置在一个以夏徵舒之名命名的夏州。楚庄王如此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炫耀什么灭陈的武功，更多的恐怕还是为了给守旧的国人一个交代。

灭陈设县的事情发生在去年十月份，而楚军大举讨伐郑国则发生在本年的春季，两者相去不过三四个月，这于郑国而言是近在眼前的教训。而当楚军兵临城下的时候，陈国复国的消息很可能还没有传到郑国；即便是传到了，郑人也很难相信楚国的诚意。

也正是因为担心重蹈陈国的覆辙，郑国人才没有像往常一样，一见到楚国大军来伐就开门投降；当战事陷入困局的时候，他们才会郑重其事地在宗庙中占卜，以预测开门投降或者玉石俱焚哪个更吉利，并最终上演了一场“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的闹剧。

但楚庄王并不理解这种心态。按照以往的经验，大凡出现这种景象，要么是因为国君去世了，要么就是对方决定要鱼死网破、血战到底。如果是因为国君去世，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楚人就不能乘人之危。可如果是准备鱼死网破，那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楚国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即便是拼尽全力打下了郑国，得到的也只会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死城。不管是哪种情况出现，对于楚国都是不利的，倒不如暂且退兵以避免郑国人的锐气。

看到楚军退却，郑国人赶忙抓紧时机修缮城墙，并派人向晋国求援。不过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在此生死存亡关头，郑国内部竟然出现了叛徒。有一位名叫石制的大夫，希望借助楚国的力量扳倒郑襄公，并扶植公子鱼臣为君，于是他便跑到楚军营中，将郑国的底细交代了个一清二楚。楚庄王知晓内情后立刻回军，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苦战了近三个月，才最终攻克了郑国国都新郑。

第三节 战云密布

先穀违命

楚军伐郑的消息早就传到了晋国，按照常理，晋国应即刻派兵前往救援才是。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郑人与楚军在新郑鏖战的三个多月里，晋国竟然一直按兵不动。直到这年（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六月，新郑保卫战已经以失败告终，他们才缓缓地从绛都开拔，准备解新郑之围。

晋军此次出兵派出了豪华阵容：荀林父为中军将，先穀为中军佐，士会、郤克统领上军，赵朔、栾书统率下军。除此之外，三军还各设两名军大夫，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担任司马。

大军抵达黄河北岸时，得知了郑国已然投降的消息，新任元帅荀林父当即决定收兵回国，打算等楚军退却之后再找郑国兴师问罪。这一想法符合晋、楚两国的一贯做法，也得到了时任“内阁”三号人物上军将士会的认可。在他看来，用兵之道贵在选准对方的弱点再作行动。若是对方在德、刑、政、事、典、礼六个方面的表现都合乎常道，就是无法抵挡的。紧接着，士会便从这六个方面对楚国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态度。

政治上，楚庄王依照“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左传·宣公十二年》）的原则，明确界定等级秩序，制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使得士农工商各依其时、各安其业，因此军队虽连续多年作战，百姓却并不感到疲惫，更没有人怨恨国君穷兵黩武，这是政令得当且合乎礼制

的表现。经过改革之后的楚国，可以称得上是政治秩序清明、经济运行良好，社会和谐安定、人民生活富足，国人积极进取、军队斗志昂扬，处处都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军事上，楚庄王新创了一种荆尸之阵，将军队分成前、后、左、右、中五个方阵。主帅自居中军负责制定作战策略，右军跟随中军行动，左军负责后勤补给，前军负责开路探查敌情，后军以精兵压阵拱卫中军。他任用孙叔敖为令尹，这个人在治军方面很有一套，统一了传递指令的旌旗和号令规则，使得各方阵可以协同配合、遥相呼应，军队战斗力得以大大增强，这是善于运用典章。因为郑国有二心，他们出兵讨伐；后来郑国顺服了，他们就赦免其罪行，德政和刑罚也就都树立起来了。

综合起来，楚国“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面对着这样一个焕发新生的国家和一支锐意进取的军队，晋国很难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当下最优之选，莫过于避其锋芒待时而动，而不是在敌人气焰正旺的时候，与之正面冲突。

士会是一个能够洞察人心且善于奇谋巧计的人。河曲之战中，秦康公正是用了士会的计策，才避免了一场惨败；也正是因为对士会的智谋感到担忧，赵盾才不得已将其召回。此番士会对楚国内情的分析，尽管有些内容未必能够站得住脚，但在当时的语境之下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然而士会的分析却无法说服“内阁”排名第二的先穀。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想要撤军的时候，他却突然站了起来，傲慢地说道：“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诸侯，是因为我们的军人都有血性，我们的执政大臣统御有方。现在郑国已经被楚国攻克了，你们却不去救援，因此而失去诸侯，不能说是统御有方。楚军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你们不去追击敌军，反而在这里讨论撤军，

也不能说是有血性。就因为我们的无能，让晋国失去了诸侯的支持，将霸主之位拱手相让，对于我而言还不如死了算了。”

先穀用血性、勇敢、爱国这些充满煽动性的词汇，极力贬斥主张撤军的荀林父和士会，言辞铿锵、气势逼人，可把在场的人给唬住了。在一连串的质问之后，先穀尤嫌不解气，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已经兴师动众到此了，若是仅仅因听说敌人势大就畏缩不前，这不是大丈夫的所为。诸位可都是军队的统帅，如今却尽做些缩头乌龟的事儿，我先穀实在不齿与你们为伍！”话刚说完，就径直带着自己所统领的中军一部渡河而去。

听到先穀擅自渡河的消息，荀林父的弟弟也即下军大夫荀首感到非常震惊，连连惊叹道：“先穀恐怕要出事了！”他还用《周易》的爻辞反复推演，最后得出结论说：“一支孤军离开大部队擅自行动，一旦遇到敌人就必然会陷入凶险境地，彘子也会因此成为罪魁祸首，就算是侥幸回到国内，也一定会大祸临头！”

荀林父此刻已然是急火攻心。当年在河曲之战时，赵穿不顾将令擅自应敌，就差点吃了大亏，要不是赵盾引兵前去救援，后来做出弑君之举的赵穿说不定就回不来了。如今相似的情景再次重演，赵盾那一句“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左传·文公十二年》）便突然在他耳边响起。如果此时他坐视先穀孤军深入遭遇不测，将内阁二号人物陷入危难，那么他这个中军统帅的位置怕是就要到头了。

可问题是，那时的秦军在崤之战、令狐之战中两受重创，整体实力早已不比当年，晋国人根本不必担心无法取胜，所要考虑的不过是成本而已。而如今面对的楚国却大不相同，晋国即便是上下一心也未必就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还有一个从中作梗的先穀呢！

究竟是选择及时止损，放任先穀与楚军接触，还是豁出命去令全军出动，对于荀林父来说不啻为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

正当荀林父逡巡不决时，时任三军司马的韩厥挺身而出，力劝荀林父带领三军渡河，他给出的理由也的确让荀林父无法拒绝：“身为中军统帅，下属不听调令，以至于丧师辱国，甚至是失去诸侯的拥护，这样的罪责太过严重，您一个人恐怕是担不起的。倒不如让三军渡河，你解救了先穀，算是大功一件。即便是不幸与楚军相遇交战失利，六个人共同分担罪责，总好过你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吧？”

韩厥的话可谓是直击要害。荀林父原本顾虑的只是战事的成败，并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处境。如今听了韩厥的分析，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我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一节呢？

皇戎劝战

在韩厥的劝说下，荀林父决定渡河南下，在追上先穀之后，大军驻扎在敖、鄆两山之间（今河南荥阳北），再商议下一步的决策。而当此之时，楚庄王刚刚带军北上，在黄河岸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

自楚武王自尊王号以来，楚国历代先君一直都将北上中原、饮马黄河作为毕生的夙愿。历经数代人几十年筚路蓝缕的艰苦奋斗，到楚成王时，楚国的疆土才终于扩展到了中原的边界。然而不幸的是，楚国的触角刚刚伸到郑国，就被崛起称霸的齐桓公挡了回去。到齐桓公去世，宋襄公图霸，楚成王泓水一战击败宋国，眼看着梦想就要实现了，可谁料想半路又杀出一个晋文公，使得楚国的宏图大业再次功败垂成。城濮之战后，楚国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雨，才终于在楚庄王的手中实现了饮马黄河的愿望，这是多么艰辛和不易！

楚庄王原本打算在黄河岸边祭祀先祖之后就回国。毕竟围攻郑国的战役打得太辛苦，再加上去年伐陈一役，就算是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这连年的损耗。不料原本驻足不前的晋军竟然全数渡过了黄河，摆开了想要决战的架势，这就使楚庄王颇感踌躇。

经过几日的思虑，楚庄王还是决定避开晋军。但撤军的命令刚刚下达，就有“嬖人”（大王宠信的侍臣）伍参闯了进来，一再请求与晋军展开决战。令尹孙叔敖不以为然，在一旁面色阴沉地说道：“去年入陈、今年入郑，又不是没有打过仗！若是跟晋国打仗却又不能取胜，你的肉够吃吗？”

伍参反唇相讥道：“如果作战能够取胜，就是你孙叔敖没有谋略；若是不能得胜，我的肉早就被晋军吃了，哪里还能轮得到你啊？”

孙叔敖不想跟他起无谓的争执，扭头就走出了营帐，并下令全军继续南撤。伍参一心想要求战，看着大军越往南撤，心里也就越着急，于是他就私下里去找楚庄王，说：“晋国的元帅刚刚上任，对于政令还不熟悉；次帅先穀刚愎不仁，根本不听荀林父的命令；另外的三个将军想专掌晋政却又办不到，于是便各执己见、各行其是。领头的六卿内部不和，其余三军将士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因而无所适从。就这么一支军队，又怎么可能会赢呢！”

伍参见楚庄王不为所动，于是就使出了大杀招，他说：“他们六卿再怎么说是都是臣子，而您贵为君主，怎么能躲避他们呢？这将置我们的祖先社稷于何处啊？”

楚庄王一听这话，火气“噌”一下就上来了，当即就命令大军驻扎在管地（今河南郑州北），而且还派人去把令尹叫回来，让他把车头全都转向朝北，对晋军严阵以待。

楚庄王这么一停不要紧，可把郑国人给紧张坏了。之前几年晋楚两国虽交锋不断，却很少出现主力部队正面对决的场面，这次就完全不同了：晋军本来不想渡河的，可到头来还是过来了；楚国人本来是想撤军的，可又突然就停下来了。这个时候郑国人难免会犯嘀咕，他们这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

为了摸清楚双方的底细，郑国派出卿大夫皇戌为全权大使，前往晋军大营去劝战。皇戌一进大营就扑通跪地，痛哭流涕地倾诉道：“我们郑国之所以跟楚国结盟，为的是保全宗庙社稷，并不是对晋国有二心了。”然后他又开始鼓动晋军，说：“楚军屡胜而骄，且其长期在外军心疲惫，早已不设防备。如果你们能趁机攻击楚军，郑国愿在后方策应，他们必败无疑！”

主战的先穀正愁说不动其他人呢，听皇戌这么情真意切地哭诉，也忍不住擦了几把眼泪，然后声情并茂地附和说：“对呀！打垮楚军、降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一定要答应皇戌的请求！”

听了先穀的话，赵同、赵括也在一旁起哄说：“先穀之言极是！大军不辞辛苦长途奔波，不就是为了寻找敌人、战胜敌人，从而得到诸侯的拥护的吗？就不要犹豫了！”

荀首听了他们的话，在一旁低声叹道：“原同（赵同因封地在原，又称原同、原叔）、屏括（赵括因封地在屏，又称屏括），这是在自取祸乱啊！”

倒是下军佐栾书很有些耐心，站出来条分缕析地劝导主战的先穀和赵氏兄弟。他说：“我听说楚王自克庸以来，无时无刻不用若敖、蚡冒等先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故事告诫国人要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楚王治军亦是如此，他曾经告诫将士们说，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取得胜利，想当年商纣王百战百胜，可最后却一战败于周人，因此一定要懂得胜而不骄、败而不馁的道

理。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楚王本心如此，我们哪里能看出他们屡胜而骄了，骄从何来呢？”

接着他又说道：“先大夫狐偃曾经教导我们说，两军对垒，理直则气壮，理亏则气衰。如今我们师出无名，又结怨于楚，我方理亏而楚国理直，如何就能判断他们气衰了呢？更何况，根据我们的探查，楚军可谓是戒备森严，他们将国君的警卫分为左右两广，每广有战车三十辆分为两队守卫巡逻。右广自晨起至中午，左广自中午至黄昏，到了夜间还有国君的近臣按次序值夜，丝毫看不出他们有所懈怠。”

最后，他还揭露了郑国此番前来劝战的真实意图，他说：“郑楚两国会盟，由楚国的贵人、楚穆王之师潘崇之子潘尫前往郑国结盟，而郑国则派了贤人子良做人质留在楚国，可见双方对此都很重视，这次的结盟也是很有诚意的。因此在我看来，郑国派人前来劝战，无非是因为在晋楚之间疲于应对，有了这个机会就希望我们两国尽快展开决战，等我们分出个胜负了，他们好决定到底跟谁，这是在拿晋楚两国的国运来做赌注啊！这对郑国来说自然是有好处的，可对晋国未必有利，所以皇戌的话不能轻信。”

栾书说完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即下军将赵朔在一旁拍手称快：“栾书讲得太好了！如果能按他说的行事，晋国何愁不能长治久安！”

战和不定

郑国的使者刚走，楚王派来的少宰就已经到了营前，准备要向晋国求和。他言辞谦逊地向晋军统帅表达歉意：“寡君少时遭遇不幸，因此不善于言辞，并非有意冒犯大国。只是因为听说之前郑国人不太懂礼，两位先君成王和穆王曾来往于此教导他们安定国家，所以便想效仿先王，不想引来诸位的误会，实在是愧疚得很啊！你们要没什么事，就请回吧！”

晋国上军将士会在一旁起身作揖，十分客气地回敬道：“昔日周平王，曾下过诏命给我先君晋文侯，让我们与郑国一起夹辅王室，不要废弃天子的命令。如今郑国不行使命，寡君感到匪夷所思，因此特别派我们前来质问。原本是没打算劳顿贵国往来迎送的，不料刚好碰到你们也在，这怎么好意思呢？在这里就先谢过贵国君主的好意了，烦请侯人代为转达！”

既然大家都是误会，有事也就好商量了。士会与楚国的少宰一起就两国友好事宜做了一些探讨，随后又百般恭维将其送出了大营。

如果双方就这么一直客客气气的，这仗还真就没法打了，可偏巧这事就被先穀给撞上了。听到士会那番说辞，先穀当场就勃然大怒，认为士会对楚人低三下四，简直把晋国的脸都丢尽了。于是他就找来了赵括，让他追上楚使并传话说：“我方代表言辞失当，他的那些话都不是寡君的本意。寡君派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要把贵国的痕迹从郑国的土地上抹去，而且还一再叮嘱我们‘不要躲避敌人’。作为臣子不敢逃避国君的命令！”

在这场与荀林父针锋相对的角斗中，先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还有几个得力的帮手，分别是赵同、赵括、赵旃和魏锜。

这其中赵同、赵括是赵盾同父异母的弟弟，因为跟先穀的关系好，就总跟着起哄。另外一个赵旃则是赵氏侧室赵穿的儿子，因为想求一个卿位而不得，就总想着把事情闹大，自己好建功立业提高一下地位。

至于魏锜，此人是晋文公近臣魏犇的儿子。他的父亲因为杀了曾善待公子重耳的曹国大夫僖负羁而获罪，后来尽管免去一死，却也因身负重伤不得不离开了政坛。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到赵盾颁行假公族制度的时候，魏锜连个公族大夫的位置都没捞到，因此便心存怨恨，总希望晋军输掉这场战争。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楚国伍举还是晋国的先穀等人，但凡是主战派都是在这个国家里不得志的人。而那些已经身居高位的，比如楚国的令尹孙叔敖、晋国的荀林父都极力想避免这场战争。

不同的是，楚庄王功业卓著、一言九鼎，他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哪怕是令尹、司马也不敢反对，他所做出的决策任何人都必须严格执行。而荀林父虽有城府，能够运用手腕熬到中军元帅的位置，可终究还是因为常年受赵氏集团打压而威信不足，根本镇不住这些要上房揭瓦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有先穀这么一个中军佐罩着，这些不得志的人就更加不把荀林父放在眼里了，这也是伍参认为此次必定能战胜晋国的原因所在。

言归正传。

《孙子兵法·行军》有云：“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楚庄王这次派人求和是假，试探晋国的虚实是真。但凡头脑还有点清醒，就不应该把三军卿大夫之间的矛盾直接暴露在楚人面前。哪怕是你一心想要主战，可以使用的办法多的是，更改外交辞令是最不可取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先穀之所以不断地搅局，或许是因为他根本没打算赢得这场战争。相反，他就是要让荀林父出丑，让他承担战败的罪责——这种人简直就是楚国的好朋友啊！

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才发现自己在对方阵营里竟然还是有帮手的，既然如此，那就更应该好好地谢谢这个朋友。于是，他一方面继续派出使者前往晋军营中求和，故意示弱以弱；而另一方面，等使者取得了双方结盟的初步意向后，又出其不意地派了一辆战车前往晋军营前致师。

所谓致师，按照郑玄的说法是“致其必战之志”（裴骃《史记集解·周本纪》引）。作战之前，人们会先派出勇力之士到对方阵前挑战，以炫耀自己的武力，并显示其战斗的决心。

楚庄王此次派出致师的有一乘三人，其中许伯驾车直冲晋军大营；主将乐伯拈弓搭箭射杀数人；在车辆掉头许伯整理马匹的时候，车右摄叔又冲进晋军大营，趁其不备连杀数人，并割了他们的左耳，然后跳上战车就往回奔。

晋军原本与楚人商定了结盟的日期，因而也没有设下防备，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辆战车，一下子就被打蒙了。直到他们又闯出大营扬长而去，人们才反应过来，于是赶紧组织人马兵分两路追击。

致师的楚军将领乐伯连续射杀了不少追兵，但晋军依然穷追不舍，到最后箭也不够用了，却还是没能甩掉追军。正在危难关头，乐伯猛然看见从树丛中跑出一头麋鹿，于是转头射了一箭，箭从麋鹿的后背插入正中心脏。

眼见麋鹿倒地而亡，车右摄叔轻快地跳下战车，徒手抱起麋鹿的尸首，献给了前来追击的晋国将军鲍癸，并致辞说：“现今还不到打猎的时令，不能奉献珍禽猛兽慰劳贵军，只好把这头麋鹿奉上略表心意，请不要推辞。”

春秋时的人们向来尊崇君子之风，鲍癸看到对方恭恭敬敬地奉上了麋鹿，便下令停止追击，很有风度地向对方表示感谢。在回程的路上，他还不忘赞叹说：“车左善于射箭，车右善于辞令，都是君子啊！”

第四节 两棠之役

不宣而战

致师的三名将领用一头麋鹿化解了危机，缔造了一段有关君子之风的佳话，也为晋军中的主战派提供了继续捣乱的素材。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魏锜和赵旃紧紧咬住这个事件大做文章，纷纷提出要到楚军阵前致师甚至是挑战。

荀林父当场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可他们还不死心，转而又提出要作为使者前去向楚人求和。荀林父明知他们揣着什么心思，可终究还是扛不过无休止的质疑和挖苦，只得同意让他们前去。

这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预感到情况不妙了。二人刚刚走出大门，“内阁”四号人物上军佐郤克就说道：“二憾往矣，弗备必败。”（《左传·宣公十二年》）让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前去求和，这事恐怕是不能善了了，我们还是提早做好防备吧！

谁知话刚出口，先穀就阴阳怪气地说道：“郑国人劝我们与楚军作战，你们不听。现在楚国人求和，你们又不能真心诚意。既然连个确定的命令都没有，又为何要做防备？”

听了这番混账话，士会心中已是忍无可忍，却还是耐心地劝解道：“即便是寻常的会见，派军队守备以防不测也是惯例，更何况是在两军阵前呢？提前做好准备总是没有错的！假如魏赵二人激怒了对方，他们趁机掩杀过来，我们毫无准备，很可能就会导致全军覆没。反过来说，楚国如果愿意与我们和解，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再撤去戒备，也不会影响大局。”

荀林父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了，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心知肚明。可他也知道，先穀的所有怨气都是冲着自己来的，不管他说什么，先穀都会起头反对。与其如此，倒不如什么话也不要说，由着其他人去做就是了。因此当上军将士会和中军大夫赵婴齐提前安排防务的时候，先穀并没有出面阻止。

说完了先穀，我们再来看“二憾”。

魏錡离开了中军大帐，直接带了几名勇士杀到楚军大营。致师完成后，魏錡掉头狂奔，楚国大夫潘尫之子潘党带人追击。半路上刚好从树林中蹿出六只麋鹿。魏錡便效仿乐伯故事如法炮制，也射了一头麋鹿回去献给潘党，说：“身在军旅，恐怕尝不到什么新鲜的肉食吧？我刚好打了一头麋鹿，就让您的随从尝尝鲜吧！”

而赵旃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到达楚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大概是以为对方防备已经松懈了，于是就派部下进入楚营进行骚扰，而他自己却在营外铺开了席子，坐在上面大吃大喝了起来。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藐视！楚庄王早就为没能擒获魏錡而愤懑不已了，这个时候又看到赵旃如此做派，二话不说就坐上了值班的左广的战车亲自追赶。

赵旃一看这架势，跳上战车就往回跑。可惜他赵旃车马不如人，跑了半夜也没能甩掉楚庄王，眼看着就要被追上了，情急之下也顾不得体面，干脆弃车跑进了路旁的树林里。楚庄王的车右屈荡也跳下车，追到树林里跟赵旃一阵肉搏，最后虽没把人擒获，却也将他身上的铠甲、下衣都撕了个干净。

话说荀林父派魏锜和赵旃往楚营求和，等了许久还没得到他们回营的消息，就寻思着大事不妙，于是急忙派人前去接应。晋军这种“绝不抛弃一人”的想法本是好的，可坏就坏在，接应部队带的是阵地防御用的屯车，这种车车体笨重、行动缓慢不说，还特别容易荡起灰尘。根据尘土形态判断敌军动向，是古代职业军人一项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一旦有战车大规模出动，在远处很容易就能看见“高而锐”的尘土扬起，这个时候就需要加强戒备了。

赵旃前去楚营挑战的时候是周历六月中旬，夜里皓月当空，楚人隐约看到对面高高扬起的尘土，只知道晋军出动了大量兵车，却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目的。但问题是，自己的大王出营追击赵旃至今还没有任何消息，无论真实情形如何，这个时候都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眼看情形危急，潘党也顾不得多想，他登上高台振臂一呼：“晋国人掩杀过来了！快去接应大王啊！”孙叔敖更是高呼着“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和“先人有夺人之心”的口号，下令全军出击。一时间楚军倾巢而出，迎着晋军的方向“车驰卒奔”，一场决定双方命运的世纪大战，就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稀里糊涂地开打了。

断指可掬

楚军不宣而战，大兵向晋军扑面而来，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身为中军主帅的荀林父的反应竟然是“不知所为”——这实在不像是一个中军元帅应该有的表现。

不过若是要设身处地站在荀林父的立场上考虑，也未必能够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孙子兵法·地形》中曾讲到六种形势，说“故兵有走者，有弛者，

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败之道也”，此次的晋军上下可以说是至少占了三条。

这几个败局反映在这场战争中，其核心实际上就是“不服”两个字。荀林父虽说并非无能之辈，但由于长期受赵盾压制，在朝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即便赵盾已经去世很多年，荀林父也顺利晋级成为六卿的最高首脑，可那些凭借政治联盟上来的“卿二代”们，却还是瞧不起他这样一个缺乏威望的领导人。这就导致了晋军虽说有着完整的领导体制，可还是出现了“其佐先穀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涣散局面。

荀林父清楚地认识到，在军纪涣散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和楚国人打仗的。可错就错在，当赵旃的挑战间接诱发了楚军倾巢出动，战争已经全面打响的情况下，荀林父似乎还沉浸在议和的思维惯性里没有跳出身来，一时间仓皇失措，竟然下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军令：

“全军撤退，先渡河者有赏！”

这道命令下得如此突兀，不仅晋人不理解，连对面的楚人都猜不透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要知道行军打仗最忌讳的就是背河作战，这种地形在《孙子兵法》中又被称为“绝涧”，凡是行军碰到这种地形，一定要躲得远远的，千万不要在河边迎战敌军。那些所谓“背水一战”的案例，都是有奇兵侧面支应时才会采用，在完全没有后手的情况下背水作战，无异于自寻死路。如今敌人已经扑到眼前，荀林父若果真要退兵的话，也应该是向其他方向分散，而不是贸然指挥大军朝着大河退却，否则就等于是要把这些将士逼往绝境。更重要的

是，即便是逼不得已必须向河对岸撤退，也要安排专人殿后，以拖延敌军的行军速度，这样前军撤退时才不至于仓皇失措。

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害怕先穀阻挠，荀林父压根就没敢提这些事。其余诸多的将领中，也只有两个人不怎么惧怕先穀，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其中，上军将士会预先安排上军大夫巩朔、韩穿在敖山布置了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齐则在河边准备了大量渡船。因此当晋军如潮水一般退却的时候，只有士会、郤克所统率的上军和中军赵婴齐所部没有出现惊慌失措的场面。

无组织撤退已经是致命伤了，而荀林父所下的命令“先渡河者有赏”，更是让情况变得不可收拾。有些人命令听得真切些，知道荀林父的用意是让大家尽快渡河，于是便一路狂奔等着领赏。可在当时的混乱情形中，更多的是不明就里的盲从者，看到全军撤退，他们便以为是晋军已经战败了，因为害怕追兵掩杀就没命地狂奔，以至于让那些奔着领赏去的人看了也都慌了神。

接下来的场面可想而知，所有人都争先恐后混成一团，互相抢夺船只。已经上了船的人为了能尽快脱离危险，不等后面的人靠近就急忙开船离岸。而没有上船的人则跳入水中，攀着船舷想要爬上去。船上的人害怕他们把船给弄翻了，干脆用刀猛剁，以至于被砍下的手指头都堆满了船舱——用《左传》中的原话说就是“舟中之指可掬也”，如此血腥的场面，恐怕要比崤之战时的“匹马只轮无反”更让人不寒而栗。

这样混乱而惨烈的溃退持续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慢慢消停下来。晋军仓皇出奔的场面，让楚人听了看了，都感觉赢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因此在追到邲地时便停了下来。他们满怀怜悯地倾听着远处敌人溃逃渡河时那震天动地的喧闹声和哭喊声，整整一晚上都心绪难平、无法安睡。

君子之风

当中军和下军不战而溃、争相渡河的时候，士会和郤克所率的上军凭借着七路伏兵，自觉自愿地充当了他们的坚强后盾。面对这样一个可敬的敌人，楚庄王特意整合了唐国军队和潘党所率的四十辆战车组成方阵，与晋国上军对战。

郤克之子郤锜想要迎战楚军以挽回颜面，但士会却一口回绝道：“楚军士气正旺，左拒虽然不足为虑，可若因此将对方全军都吸引过来，单凭我们上军是无法招架的。倒不如收兵离开，以与众卿一起分担战败的罪责，同时还能保全将士的性命，这没什么不好的！”

与此同时，下军也有一支部队在混乱中保持了良好的秩序，甚至还一度对楚军造成了冲击，迫使楚庄王不得不派大夫工尹齐率领右方阵进行阻击。带领这支军队的将领正是荀林父的弟弟、下军大夫荀首，他之所以不愿意跟风撤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他的儿子荀罍。

战斗开始后不久，荀罍在乱军中走散，下落不明，这让荀首忧心如焚，于是便奋不顾身地带着私属和下军一部返回战场，而那个于战前扰乱秩序的大夫魏锜则承担了为其驾车的职责。

荀首在找寻儿子时左右开弓射击敌军，不少楚军将士应声倒下，端是威风八面。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荀首却有个微妙的习惯：如果看到箭的质量好，就会随手放在魏锜背后的箭袋里，然后找那些质量不好的箭再行射击。

这个动作被魏锜看在眼里，便以为荀首是爱惜蒲柳，不肯把好箭射出去，于是便吼道：“战场上如此凶险，这么多人陪你前来冒险，你不着急找你儿子，反而爱惜蒲柳！董泽的蒲柳有的是，你能用得完吗？”

荀首又岂能不知其中的利害？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已经抱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荀罃被楚人擒获了，他就需要拿地位相当的战俘来进行交换。在没有遇到足够显要的筹码之前，这些好箭自然不能轻易浪费。他颇感悲愤地回道：“不抓到别人的儿子，怎么用来交换我的儿子？利箭当然不能随便射出去了！”

由于楚军的连番阻击，荀首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自己儿子的下落，内心自然是充满了忧惧和失落。不过好在他射死了楚军将领连尹襄老，抢到了对方的尸体，同时还生俘了楚庄王的弟弟公子谷臣。多年以后，当他得知荀罃在战斗中被楚将熊负羁俘获以后，就是凭借这一生一死两名俘虏，将自己的儿子交换了回来。

除了荀首，晋军中不少将士也都表现出了在残酷杀戮的战场上温情的一面。比如说赵旃，虽然他一心主战且希望晋国战败，可当他看到自己的父兄因为缺乏好马几乎陷入敌阵的时候，依然不忘舍己救人，将自己的好马让给他们。

而当他驾着劣马拉的战车返回去接应其他人的时候，不想又与楚军遭遇，差点被敌人擒获。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一不做二不休，再次弃车跑进了小树林。

不过与两个逢氏的年轻人比起来，赵旃的精神终究还是要逊色一些。赵旃在小树林里躲了半天，等楚军过去之后，就从林子里跑出来，想找人载上自己。这时恰好有逢大夫带着两个儿子逃奔过来，赵旃就使劲地朝他们呼救。

逢大夫远远地看到赵旃在树林边上叫唤，他本有心相救，怎奈战车空间太小，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于是咬咬牙就当没看见。与此同时，他还特意嘱

咐自己的两个儿子说：“不要回头张望！”

逢大夫护犊情深，只可惜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晚了，两个儿子听到呼救，早就循声回头看到了赵旃，还急切地对父亲说：“快停车啊，赵叟在后面！”

逢大夫心里万分纠结，可终究还是拗不过儿子，只好含着泪让他们下车。临走时，他愤怒地指着一棵大树说道：“要死就给我死在这儿，我好给你们收尸！”

等到战争结束，逢大夫回到战场来找寻自己儿子，果然就在这棵树下发现了他们叠压在一起的尸体。

另外，《左传》中对这次战争一个细节的描述，也令人不禁捧腹。说是两名楚军战士在追击途中，发现有一辆晋军战车陷在泥里无法行动，就跳下车来指导他们抽出车前的横木。晋人照做之后果然就把车修好了，但不久之后这辆战车又出了故障，拉着战车的四匹马一直绕着转圈就是走不了。楚人又追了上来，再次指导他们拔掉车上的大旗，扔掉车辕上的横木，这才再次脱身。

这几个人上了车之后，竟然厚着脸皮冲着那助人为乐的楚军战士笑道：“楚国不愧是大国，就连逃跑都比我们有经验，我等真是自愧弗如啊！”

这场战争发生在邲地（今河南荥阳北），因此被称为“邲之战”，又因泌水入荥阳称“蒗荡渠”，可写作“两棠”，有时也被称为“两棠之役”。邲之战虽被视为一场决定了霸业秩序逆转的大战，却丝毫都没有大战该有的样子：

战争开始的时候，楚庄王正在野外追逐赵旃，还没有来得及对楚军进行任何部署；晋军上下尽管明知赵旃和魏锜是去挑战的，却还在等着求和的结果，没有预先做好应战的准备。

战争毫无预兆地开启之后，两军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较量，就又草草结束了。而楚军为了应对战争所准备的輜重和粮草，到了战争结束后才缓缓抵达战场，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晋军虽然战败，可他们的兵员损失几乎全都是自己人拥挤踩踏、自相残杀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与楚军接触造成的损伤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晋军溃退争相渡河的时候，如果楚军趁机掩杀，晋军的损失恐怕会更大，其效果不亚于晋国伏击秦军的崤之战。但楚庄王并没有这么做，晋军渡河的一夜时间，楚军都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这样一次毫无章法的遭遇，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一场没有交战的战争。但不论如何，晋国在邲之战中的惨败，终究还是打破了晋楚之间维持多年的平衡，局面开始朝着有利于楚国的方向发展，使得原本就内外交困的晋国，内外局势变得愈加垂危。

当晋国的霸业之路一朝倾覆，脆弱的中原文明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和平安定时期之后，再次落入了大门洞开的危局。东方列国又开始为了各自的利益蠢蠢欲动，多年来一直对中原霸权志在必得的齐、秦两国，更是摩拳擦掌，试图向霸主的宝座发起冲击。

面对如此危难之境，晋国究竟如何才能摆脱低谷，重塑霸业的辉煌呢？

第四章 齐楚联盟对晋国的挑战

第一节 忍辱负重

郤克受辱

公元前592年，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八年，同时也是士会代替荀林父执政的第二年。这一年，晋景公决定召开一次盛大的会盟。而为了彰显对东方大国的尊重，他特意安排“内阁”二号人物郤克出使齐国，邀请齐顷公参与盟会，礼数不可谓不周到。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在这样一次重大的外交活动中，竟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使得两国关系迅速跌至冰点。

关于这次外交事件具体情节，《左传》上只有寥寥数笔，只说是当郤克朝见齐顷公时，突然从帘子后传出了妇人的笑声。郤克顿时恼羞成怒，于是便留下了副使栾京庐等待回复，自己愤愤然地回国去了。临走前他还指天立誓，说：“不出了这口恶气，此生绝不再渡过黄河！”

为了将这种带有羞辱意味的气氛充分烘托出来，富于文学想象力的太史公在《史记·晋世家》中又添了几笔，从而创造出一个画面感极强的场景。说是郤克在出使途中，恰好遇到了同往齐国朝见的鲁国使臣季孙行父和卫国使臣孙良夫，于是就结伴同行。

漫漫长路有三两人同路相伴，聊一聊家长里短，谈一谈家国大事，可以化解旅途中的孤独，也能为枯燥的旅程增添一些乐趣。可不巧的是，同行的这三个人恰好都有那么一点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腿脚有点跛，而孙良夫则是个“独眼龙”。

齐顷公听闻晋、鲁、卫三国派出的使臣各具特色，突然好奇心大发，于是便想在这三个人身上搞一出恶作剧。于是乎，齐国的朝堂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场面：一个跛足的侍者带着一个跛子使者，一个独眼龙侍者引着一个独眼龙使者，还有一个驼背的侍者领了一个驼背的使者，几队使臣迈着滑稽的步伐就上朝来了。

起初几位使者对这样的安排也不以为意，看着和自己有同样缺陷的侍者，心中或许还会有所感叹——列国常年征战，难免会有人因作战而落下残疾，齐顷公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这些为国致残的人们安排一些轻省的体力活，也算是人尽其才、无可厚非——可当他们在朝堂上见面之后，场面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教育。齐顷公之所以会将政治视若儿戏，在朝堂上公然戏弄列国使臣，离不开他那位有着同样恶趣味的母亲——萧桐叔子。按照先秦女性称谓通常的拆解办法，其中的“叔”应当是排行，“子”是她娘家的姓，“萧桐”据传有可能是国名，地望在现今安徽宿州下辖的萧县，是依附于宋国的一个子姓诸侯国。

按照春秋时期的习惯，在举行朝会和重大典礼时是不能有妇人参与的。但也不知是做儿子的孝心可嘉，还是做母亲的不顾大妨，齐顷公在宣召使臣觐见之前，特意在朝堂上挂上垂帘，让自己的母亲带着一帮妇人躲在帘后看稀罕。如此作为已然是极不庄重了。偏偏当郤克与列国使臣一道面面相觑时，躲在帘子后的一众妇人还笑出声来，这未免也太轻佻了！在如此庄重的场合受到这般羞辱，郤克心中会酝酿出何其猛烈的怒火可想而知。

战国时的唐雎与秦王曾经有过一场对话，秦王说“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唐雎则回应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

步”（《战国策·魏策四》），有些壮烈之士在发怒时甚至还附带有“彗星袭月”“白虹贯日”“仓鹰击于殿上”等“特效”，可见愤怒本身就是具有极强破坏力的攻击性武器，应该极力避免。

郤克贵为士会之下的晋国二号人物，他的怒火虽比不得天子之怒，起不到“火星撞地球”的奇效，却也不会仅仅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那么简单。受到羞辱之后，他并没有给齐顷公改过自新的机会，而是径直打道回国，愤愤然地向国君提出了要攻打齐国的请求。

此时距邲之战结束才不到五年，正是晋国势力最为疲弱的时候，在楚军锋锐正盛的时节与齐国交恶并不符合晋国的利益。然而，郤克毕竟是晋国“内阁”的二号人物，他的颜面不能不顾及；同时作为诸侯曾经的盟主，晋国的威严更不能任人随意亵渎。在这两难之间，晋景公又该如何抉择呢？

九月围城

晋景公的父亲晋成公是晋文公与周王姬之子。根据之前的推算，晋成公出生的时间应该是在晋文公回国之后，因此到公元前600年去世时，年龄最多不超过三十五岁。这也就意味着，晋景公即位的时候二十岁上下，正是意气风发且充满了理想的年纪。

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他即位的第三个年头，晋国就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军事挫败。当武力的神话被打破，头顶的光环突然暗淡了，平日里始终伴随着的鲜花和掌声就会迅速离场，怀柔政策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这时，不仅齐国这样的大国不愿意再委曲求全地活在晋国的阴影下，就连平日里毕恭毕敬的小国也都对晋国有了轻慢之心。

为了维护中原霸主地位，晋国在战败后曾安排中军佐先穀在清丘举行会盟，约定各国要继续在晋国的领导下“恤病讨贰”、共克时艰。可以想见的是，这场会盟响应者可谓寥寥，前来参与的只有宋、卫、曹三国。齐国不仅不来参会，反而趁着晋国新败，开始向莒国频频举兵。而鲁国则是因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齐国的压力，在此后的几年里四处奔走，试图在后晋国时代中原权力的空窗期内找到新的靠山。

而即便是参与盟会的国家，也未必就能与晋国一条心。就比如卫国，当宋国为了力挺晋国而出兵伐陈的时候，卫国竟打着维护陈、卫两国先君誓约的名义，公然背弃盟约与宋国对着干。

晋国派去责难的使者在卫国盘桓不去，扬言如果他们不能给出满意的结果，晋国就要出兵讨伐。盛压之下，曾经多次为国“背锅”的孔达再次出马，用自己的生命冰释了晋人的怒火，但与此同时也浇灭了卫国亲近晋国的火苗。在他死后，卫国向全天下发出通告，把罪责都推到了孔达身上。但在背地里，却又让孔达的儿子继承了父位，而且还将公室的女子下嫁孔氏，晋国对此也只能听之任之。

患难时刻方显真情。值得庆幸的是，当东方列国纷纷背离晋国的时候，还有一个国家始终都站在晋国一边，那就是刚刚提到的宋国。晋景公三年（前597年）冬，楚庄王趁着战胜的余威出兵攻打萧国，其他的诸侯对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宋国不惧楚国兵威，联合蔡国驰援萧国。清丘之盟后，也是宋国第一个站出来，出兵讨伐背叛盟约的国家。

然而，对待这样一个忠实履行盟约职责、义无反顾地在前方冲锋陷阵的盟友，晋国却无法像往常一样为其提供坚实的后盾。晋景公四年（前596年）夏，楚国以宋国救援萧国为由出兵讨伐，作为盟主的晋国却无力出兵救援。

作为反制，第二年荀林父通告诸侯伐郑，到头来也只是在新郑城外搞了一次阅兵活动就草草了事了。

晋国在邲之战后所展示出来的无力感，更加坚定了楚庄王北上中原的决心。于是到晋景公五年（前595年）秋季，楚庄王特意委派早些年曾在孟渚公开羞辱过宋昭公的申舟（文之无畏）出使齐国，并明令其不许向宋国借道，以此激怒宋国，以换取出兵的理由。当年九月，申舟被杀的消息刚传到郢都，楚庄王便尽起三军，杀气腾腾地直奔宋国而来。

然而，尽管有着周密的布置和准备，楚军伐宋的战事还是进展得极不顺利。在此后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宋楚双方围绕商丘的城防工事展开了反复争夺，树叶黄了又绿，山野枯了又荣，商丘城却依然固若金汤。

在此期间，宋国向晋国告急的使者如北归的麻雀接踵而至，求救的文书如雪片般纷至沓来。晋景公心焦如焚，他本有心相救，可又囿于国力受损，不敢以倾国之力与楚军正面抗衡，一时间也陷入了两难之境。正当此时，有一名叫伯宗的大夫以“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左传·宣公十五年》）为比喻，向晋景公阐明了现状，建议晋国当避敌锋锐，待机而动。为了让晋景公放下心理包袱，他还苦口婆心地劝导说：“川泽纳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那些在我们看起来无比美好的事物也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山川水泽也会藏污纳垢，美玉白璧难免也有微瑕，国君又何必追求事事完美呢？

晋景公听从了伯宗的劝谏，但或许是还抱有一丝侥幸，他特别委派一名使者解扬到宋国传话说：“晋军已经出发，不日便可抵达。”

解扬在出使途中不慎被郑人擒获并送往了楚军大营，楚庄王对其威逼利诱，试图让他更改口信劝降宋国。解扬起初不肯答应，但在楚人的轮番劝解

之下，他突然计上心来，先假意答应了楚人的要求，然后借着楚军的楼车，在商丘城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有了解扬带来的口信，本来疲惫不堪的宋人士气陡增，生生地将楚军给拖垮了。眼看着播种的时节已经到来，围城依然看不到希望，楚军将士都想念起家里的良田来。这种思乡的情绪一旦开始萌芽，就会迅速蔓延开来，到最后甚至连楚庄王本人也不由得萌生了退军的念头。

进退两难之间，楚庄王听取了申舟之子申犀的谏言，又接受了申叔时的建议，下令在商丘城外修盖房屋、翻耕田土，做出要打持久战的姿态，这才迫使宋国人放弃抵抗。城中宋人早已“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见此情景更是陷入了空前的绝望，最终不得不向楚国屈服。

伐灭赤狄

在当时列国中，除了晋、楚、齐、秦这几个“实力玩家”之外，能够对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无非就是郑、宋、鲁、卫、陈、蔡区区几国而已。如今主要大国纷纷转变了风向，给晋景公造成的打击可想而知。一朝权势尽丧的无力感，众叛亲离的落寞感，让他不得不痛定思痛，沉心静气地反思过去几十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

在三军六卿竞争体制下，晋国的贵族并不缺乏进取心，他们有着蓬勃的朝气、势不可挡的锐气，还有令行禁止、骁勇善战的士兵，所以才能够凭借城濮一战而定霸天下。然而也正是由于对自身武力的盲目自信，不少人轻敌冒进，最终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尤其是晋文公去世之后，晋国先后对秦国发动了崤之战和令狐之战，又将狐射姑驱逐到赤狄，导致晋国军力长期受到秦国与“赤狄”的牵制，晋国军队就如同“救火队长”一般，总要在不同的战场之间疲于奔命，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其整体力量的发挥。

为了挣脱四面受敌的困境，从晋成公时期开始，也曾进行过一些尝试。他们一方面通过阵地防御的方式，实现对秦国的围堵，另一方面则是与北方的“白狄”部族达成协议，共同抵御秦国的威胁。晋景公即位之后，“白狄”部族因不堪忍受“赤狄”的侵扰，纷纷提出要归附晋国。为了团结北方部族，刚刚即位的晋景公在郤缺的建议下，曾亲自前往与之会盟，这也成为晋国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与“白狄”相处的主要模式。

然而，由于晋国内部政治斗争日趋激烈，晋景公还没有来得及集中精力逐一解决其周边的威胁，“邲之战”就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爆发了。面对战场上的失利，晋景公也一度陷入了迷茫之中，不知下一步该如何举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前文提到的大夫伯宗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为身处困顿的晋景公指明了方向。

晋景公六年（前594年），当楚庄王尽起大军围攻商丘的同时，位于晋国东部山区的“赤狄潞氏”爆发了内乱，担任执政的酆舒起兵作乱，打伤了其首领潞子婴儿的眼睛，还杀掉了晋景公嫁给潞子婴儿的姐姐伯姬。

一方面是长期拥护晋国称霸的铁杆盟友宋国，一面是与自己一母同胞的姐姐，究竟该挥师何方，晋景公久久难以抉择。面对两难处境，伯宗一方面劝谏晋景公要懂得“含垢”忍辱，放弃对宋国的救援，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动攻打“赤狄”。当有大夫以“酆舒有三俊才”为由力阻东征之时，伯宗却坚持“狄有五罪”，终于力排众议，鼓舞景公做出了东征“赤狄”的决定。

春秋时期的“赤狄”主要生活在晋国东部山区，其中比较知名的有皋落氏、潞氏、留吁、甲氏、铎辰、廆咎如六部。这些部族有不少早年曾盘踞在晋国的核心区域，比如其中的皋落氏，在晋献公时期曾活跃在今山西垣曲附

近。随着晋国实力的扩张，“赤狄”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渐渐迁徙到晋国本部以东、卫国和齐国以西的太行山区，也即如今的长治、潞城一带。

这片地域山岭纵横、海拔较高，素有“天下之脊”之称，战国时期列国争夺的上党郡就位于此地，以当时的生产力条件还很难予以开发。但恶劣的生存环境并没有难倒那些不畏艰难险阻的先民们，与被迁移到秦岭山区的“陆浑之戎”一样，这些“赤狄”部族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经过多年的开垦，终于在这片狼虫虎豹群居的深山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渐渐发展出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部族。

这些聚落与晋、齐、卫等国相邻，就趁着地利之便，与周边各国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文明程度已非纯粹的游牧部族可比。相应地，其组织能力、军队战斗力也都要远远高于那些原始状态的部族。

正是因为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条件，这片土地成了一个武装分子的“培养基地”，一代又一代的“狄人”从这里走出大山，走向广袤的平原，对中原文明构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更对晋国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狐射姑出奔给“赤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实力也就更加强悍。在其接连不断的侵扰之下，晋国东部的压力也骤然加大，以至于晋国的贵族们不得不召开专门的会议来进行讨论。

到了晋成公时期，“赤狄”四处劫掠更加频繁，以致与他们同历风雨的难兄难弟“白狄”都不堪其扰，不得不去寻求晋国的保护。当时晋国正在极力挽回霸主地位，晋成公只能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政策，将自己的女儿伯姬嫁入潞氏以换取喘息的机会。直到这次晋国在邲之战中失利，晋国霸业全面崩

盘，晋景公在伯宗的劝导下痛定思痛，决定要先解决背后的隐患，这才将讨伐“赤狄”的事务提上议事日程。

晋景公六年（前594年）六月十八日，正卿荀林父带兵攻打潞氏，在曲梁（今山西长治潞城区北部石梁村）首战取得大捷，并于八日后将其完全剿灭。潞氏的执政酆舒仓皇出逃到卫国，不久后被卫人抓获，并引渡回晋国明正典刑。潞氏所占据的原本是黎国（今山西黎城县境内）的土地和城池，晋国灭潞后，将黎国后人接回复国，但此时的黎国，实际上也只是晋国的一个县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讨灭潞氏的同时，晋国还顺势剿灭了一个“长狄”（又称酆瞞）部族。这个影响中原长达二百年的部族，经过宋武公、齐襄公、卫惠公、齐昭公、鲁文公的接力讨伐，分别擒获其首领缘斯、侨如、焚如、荣如、简如，终于在晋景公六年的讨伐中彻底走向了覆灭。

荀林父灭潞氏，也算是将功补过，了了自己的一桩心愿，回国之后就宣布告老致仕，让士会接替自己的位置。士会上台之后，趁着兵威继续扫荡“赤狄”，于景公七年（前593年）先后灭掉了甲氏、留吁和铎辰三部（均位于今长治屯留区），被灭的“赤狄”诸部余民散入麇咎如。

麇咎如原本活动于山西中部太原市附近，晋文公流亡期间，“狄国”曾与麇咎如发生过战争，晋文公的妻子季隗就出自该部族。晋文公复国后的几十年间，麇咎如逐渐迁徙到了长治、晋城乃至河南安阳一带活动。这次麇咎如虽然收罗了“赤狄”诸部残留，却没有机会发展壮大。仅仅五年后，代士会执政的郤克便联合卫国大夫孙良夫再次举兵，麇咎如溃败，残部逃到了河北地区。

江山如此多娇，形势一片大好。晋国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廓清了“赤狄”在长治、晋城一带的势力，消除了威胁晋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与此同时，晋国还打通了通往东部平原的交通线，将其与本部连缀在一起，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重要粮食产地的控制。看到这丰硕的战果，晋景公紧蹙的眉头不由得舒展开来，眼神中流露出了久违的喜悦。

第二节 晋齐首战

齐顷图霸

在伯宗的指引下，晋景公紧抓主要矛盾，对内尽力调和各族群之间的关系，试图缓解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对外则进行了战略收缩，致力于为晋国发展寻求一个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好的愿望总会被一些意外所打断。正当晋景公准备大刀阔斧开始改革内政的时候，齐顷公不失时机地冒出头来，与楚国联合起来试图分割晋国在中原的利益。

齐顷公名无野，是齐桓公之孙，齐惠公之子，也是一个有志于恢复霸业理想的君主。

多少个月朗星稀的夜里，他曾不止一次地回想过齐国的往日辉煌。那时的齐国还是响当当的中原霸主，他的祖父就是在这片沃土上，带领中原诸侯东荡西驰、南征北战，那是何等荣耀！

这段时光并不遥远，但似乎又像是经历了几个世纪。在齐国年轻一代的记忆里，他们的君主就像是走马灯一般，在几个兄弟之间不停轮换，齐国的政坛也变得乌烟瘴气。这就使得当时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竟然还曾有过政治清明的时代。

但齐顷公不会忘记。在富足而消沉的人生旅途中，他见惯了叔伯之间无休止的厮杀，厌倦了这毫无生气的晦暗景象，痛心于国家的沉沦和国人的颓废，于是便决心要用自己的肩膀，扛起家国复兴的重任。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时势偏爱造英雄。若是中原的霸权不出现中断，或许齐顷公也只能在无尽的等待中走向黄昏，无所事事地了此一世，并将所有的梦想都寄托到后人的身上。谁料想就在他继位的第二个年头，晋国就在邲之战中被打得一败涂地，一时间中原诸侯纷纷背盟而去，中原的秩序几乎又恢复到齐桓公去世后的那种混乱场面。面对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齐顷公岂能无动于衷？

对于一个贵族来说，失败并不是耻辱，害怕失败并因此止步不前才是真的耻辱。与战场上的失败比起来，齐顷公更不愿意做一个连试都不敢试的胆小鬼。尽管他知道自己未必是晋国的对手，可为了赓续姜姓宗族的光荣与梦想，他决定要闯一闯。

不过，齐顷公也并非一味蛮干。在真正向晋国发起挑战之前，他还需要在内政外交上同时发力，以全面提升齐国的政治实力和外交影响力。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寻找一个能从侧面制衡晋国的帮手——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帮手自然非楚国莫属。

于是乎，一时间使者的车驾在临淄与南郢之间穿梭不息，公然宣示着两国之间如胶似漆的亲密关系。由于史料缺失，齐国与楚国沟通的细节我们已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早在楚庄王刚刚表露出图霸中原的意图之时，齐楚两国就已经开始频繁往来了。比如若敖氏之乱爆发时，曾有斗氏大夫箴尹克黄出使齐国；楚国灭陈设县之后，申叔时从齐国赶回谏言恢复陈国；楚庄王去世后，申公巫臣携夏姬出逃晋国的计划，也是在其完成了与齐国联合发兵的使命之后才得以实施的。

齐顷公一发威，最紧张的莫过于鲁、卫两国。正如郑、宋是阻挡楚国北上的屏障，鲁、卫两国也是齐国东山再起绕不过的门槛。因此当齐、楚两国

的使者开始不断联络的时候，鲁国和卫国不免感到焦躁不安。

为了抗击齐国入侵，鲁国先是于晋景公六年（前594年）开始正式实行“初税亩”，以“履亩而征”取代过去以井田为基础的征赋制度，从而扩充公室的财政力量。四年后，他们又开始“作丘甲”，以进一步扩充兵员、提升军事力量。

鲁国的这些举措与晋惠公“作爰田”“作州兵”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与晋国在经济、军事改革之后国力得以迅速恢复不同，鲁国的体量毕竟太小，仓促上马的制度改革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想要维护边境的安定和国家的安全，还须依赖霸主的保护。

也正是因为如此，鲁国外交政策的一贯宗旨就是将“抱大腿”贯彻到底，不管天下局势如何变化，也不管城头的大王旗变成了何等颜色，都要在远方找一个保护人。无论这个国家是晋国、楚国还是后来的吴国、越国，只要能够打得过齐国，就都比没有强。

断道之会

鲁国的这些表现从侧面反映出了齐顷公咄咄逼人的势头，或许正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齐国的威胁，晋景公才在完成了对“赤狄”的征讨之后，决意要举行一次会盟，希冀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压制齐顷公的野心。

然而从齐顷公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的性情似乎颇有些急躁，总是表现出一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郤克出使齐国的时候，齐楚之间的联盟还未稳固，周边的鲁、卫两国也并没有向其效忠，他似乎就已然把自己当成了天下的霸主，迫不及待地表现出了对晋国的轻蔑态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晋景公却是一位极其善于隐忍的君主。任由齐顷公如何乖谬行事，他都始终坚守先内后外、韬光养晦的既定方针，不愿意在中原大地上轻启战端。故而当郤克怒气冲冲地赶回晋国，强烈要求讨伐齐国时，晋景公却一口回绝道：“就算你有再大的怨气，也不该烦扰国家呀！”

郤克正在气头上，不等国君说完就又表示：“不烦扰国家，那我带着自己的私属去攻打齐国，这总没问题了吧？”

景公一听这也不行啊，你好歹也是我国的次卿，怎么能让你冒这么大的险呢？就又拒绝了郤克的请求。可郤克积压的不满情绪迟早要找到一个发泄的窗口，如果不能让齐国人吃点苦头，就必然会在其他地方找补回来。

“不逞于齐，必发诸晋国。”这也正是当时晋国的中军将、郤克的直接上司士会最担忧的事情。作为郤克的同僚兼上司，士会对其秉性再了解不过了，如果他真要肇乱于内，这是谁也无法阻止的。与其如此，倒不如就让他打一打齐国，这样一来，冤有头债有主，郤克心里的气理顺了，国内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也不至于遭到破坏。

出于这些考虑，担任执政还不到两年的士会决定告别政坛，于半年后把中军将的位置留给郤克，好让他以执政卿的身份发动一场针对齐国的战争，以消弭可能发生在内部的祸乱。

而在士会正式退休之前，晋国依照原定计划于景公八年（前592年）夏在断道（今河南济源周边）举行了会盟。这次齐国派出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作为代表出席会议，但由于担心受到晋人的责难，高固在走到斂孟（今河南濮阳东）后就私自逃回了齐国，最后到场的三名大夫又因被拒绝参

会而纷纷逃散。郤克显然不能忍受齐人的轻慢，于是便派出大军四处搜寻，最后分别在温、原、野王等地将齐国使者全都抓了回来。

彼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受景公委托出使列国，回国途中听闻齐国贤人晏弱被拘，于是便特意前去探望。在详细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他回去就跟晋景公商量，说：“霸主之所以能够和诸侯，其关键在一个‘信’字，而我们如今的做法，却完全是与此背道而驰。齐侯正是因为担心受到冷遇，所以才派了四名臣子前来相会。这几个人在出发前，就不断有人告诫说：‘国君不参会，他的臣子就一定会被晋国人抓起来。’高固深以为然，所以还没到晋国就逃走了，但其他三个人仍然甘愿冒着危险前来。我们没有好好接待人家，反而将忠臣抓了起来，这岂不是验证了齐国人的说法了吗？长此以往，前来参加会盟的人受到伤害，半路逃走的人有了借口，从此诸侯畏惧，恐怕晋国的霸业就难以恢复了！”

晋景公深明其中利害，可他又拗不过郤克的倔脾气，一时间也是骑虎难下。苗贲皇为国君分忧，悄悄地安排看管的人故意放松警惕，让齐国的使者找到机会逃跑了。

这次会盟让晋国人感到十分泄气，其中的原因除了来自齐国的羞辱之外，与诸侯对晋国的怠慢也是分不开的。按照《春秋》的记载，此次前来参会的国家只有区区四个国家，分别是鲁国、卫国、曹国和邾国，传统的东方大国如郑、宋、陈、蔡都没有派人参会，可见诸侯对晋国实力的恢复终究还是存有疑虑。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局面，晋国认为有必要展示一下声威以儆效尤，为此特于第二年春季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晋景公大约是担心郤克会趁

机报复，于是便亲自跟随大军到了阳谷（今属山东），迫使齐顷公在缙地（今山东兰陵）与之会盟，并把公子强送来做了人质就退兵了。

联军伐齐

缙地会盟让齐国服了软，不过要说战争会因此而消弭，恐怕还言之过早。断道之会的混乱无序和伐齐之战的虚张声势，并没有向世人展示出晋国回归中原的决心，反而是将他们内部的彷徨与冲突展露无遗。

会盟过后，齐国对待鲁、卫两国的态度并未发生转变。在齐国的强压之下，鲁国原本打算借助楚国的力量与之抗衡，可不巧的是，当年恰逢楚庄王去世，楚国在大丧期间无暇为鲁国分忧。无奈之下，鲁宣公只好又厚着脸皮派公孙归父向晋国请求援助。到鲁宣公去世后，臧孙许又第一时间赶到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举行会盟。

鲁国与晋国之间的频繁接触，让齐、楚两国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冒犯。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春季，齐顷公在尚未等到楚援的情况下，悍然出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攻取了龙邑（今山东泰安东南），并长驱直入兵压巢丘。

与鲁国的圆滑世故不同，卫国被晋、齐两国夹在中间，生存环境逼仄，却很有一股“战斗民族”的气质，即便是面对盛气凌人的天下霸主，也很少会主动示弱。卫国这种桀骜不驯的国民性格，也为自己惹来了不少麻烦，远如晋文公时期卫成公所遭受的劫难，近如“职业背锅侠”孔达的死，都是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

如今看到自己的铁杆盟友受到欺负，卫国的战斗精神迅速被激发了起来，还未等到鲁国求救，就已派出了援军。齐顷公早就料到他们会有此举，因此卫国大军刚刚抵达齐卫边境，就被严阵以待的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不

仅如此，齐军还突破边界一路掩杀，几乎把整个卫国掀了个底朝天。卫国救鲁不成，反而自己也深陷齐军的包围之中，主将孙良夫在石稷、仲叔于奚等人的掩护和接应下撤回到新筑城（今河北大名），随后又与鲁国的臧宣叔会合，马不停蹄地赶往晋国求援。

相比于城濮之战前与鲁、卫两国的交锋，齐军的这次出击攻势凌厉，显然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其不臣之志也是昭然若揭。可饶是如此，晋景公的态度却依然很暧昧，这就让郤克感到十分窝火。

三年来，郤克始终不忘自己在齐国受辱时的情形，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了复仇的机会，自然不肯轻易罢休。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晋景公勉强同意拨出七百乘的兵力供其驱使。但郤克对此犹不满足，又请求道：“七百乘是当年城濮之战时的战车数量，当时先君贤明、大夫敏捷，所以才能够取得胜利。郤克不才，自知连给先大夫做仆人的资格都不够，所以请求发车八百乘！”

这番指桑骂槐之语让晋景公听得很不舒服，但事已至此，他不愿再跟郤克起争执，最终还是遂了他的愿，给他调拨了八百乘兵车了事。

在鲁人臧宣叔的接引下，郤克带领三军与鲁、卫、曹联军会合，其时已经是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的六月。听闻晋军已至，侵入卫国的齐军急忙撤退回国，但在撤到齐卫边境的莘地（今山东莘县）时，还是被联军给追上了。齐军在联军的尾随下，于十六日抵达靡笄山（今济南千佛山），与齐顷公所率的主力部队会合后才停下脚步。至此，晋、齐这两个近百年来先后撑起中原霸业旗帜、在危难之中挽狂澜于既倒的大国，在维系了近半个世纪的和睦关系后，终于在战场上相遇了。

大军驻扎停当，齐顷公立即就向晋军下了战书，说：“您带领贵国军队屈尊进入敝邑，敝军虽然不够强大，但也不敢推辞，愿意在明天早晨与各位

相见。”

郤克也派使者回敬道：“我晋国与鲁、卫本是兄弟之邦，前些日他们派人来见寡君，说有大国在他们的土地上释放怨气。寡君不忍心让兄弟之国受此凌辱，因此派我们来向大国请求，同时命令我们不能长期逗留在您的土地上。战场之上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您的愿望定然是不会落空的！”

齐顷公自是不遑多让，颇有些傲慢地回复道：“这次的比武是寡人一直以来的心愿，大夫如果应允，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不应允也没关系，反正咱们迟早是要见面的！”

宣战流程刚一走完，齐顷公就迫不及待地让高固前往晋军驻地致师。高固在履行外交使命的时候临阵脱逃，可到了战场上却也有一股悍勇之气。他命人驾着战车在晋军营地横冲直撞，而他自己则张弓搭箭连连射杀敌人。等带来的箭都射完了，他就因地制宜，从地上捡起石块攻击敌军，同时还趁乱抓了几个战俘，并抢了一辆战车返回营地。为了展示自己的勇武以鼓舞士气，他把桑树根系在抢来的战车后面，在营地内来回奔跑呼号，高声呼喊着：“欲勇者，贾余余勇！”意思是，缺乏勇气者可以来买我多出来的！

这场战事发生在齐国腹地，按照孙子“散地则无战”的原则，或许齐顷公应该坚壁清野、避而不战，将深入重地的晋军拖垮后再寻机挑战。然而齐顷公实在是太急躁了，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向对方发起了挑战。

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六月十七日清晨，天还未亮，齐顷公就把所有的士兵都叫了起来，并下令：“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意思是先消灭了敌人再回来吃早饭。说罢，还不等扈从给战马披上战甲，就率先冲向了敌营。

起初，由于没有料到齐军会发起闪电战，晋军仓促迎战，的确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晋军上下伤亡惨重，就连中军主将郤克都被流箭射中，与他同车的御戎也身负重伤，情势对晋军极其不利。

在这种危急关头，将帅的军事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郤克为人性情火爆，可毕竟身经百战，其在军中的威信也要比当初的荀林父强不少。面对齐军的突然袭击，他仍然能够保持镇定，按部就班指挥作战。在他的节制下，晋军抵挡了齐军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很快就恢复了阵形。

不过郤克到底还是年纪大了，又加之失血过多，后来渐渐有些支撑不住，于是便随口抱怨道：“疼死我了！”他本以为下属会安慰他一下，却不料驾车的解张却回应说：“交战刚开始，就有一支箭从我的手心射入，贯穿整条手臂到了肘部，我把箭杆儿折断了继续驾车，车轮都已经染成了黑红色，我都没说疼，你就忍着点吧！”

车右郑丘缓倒是没有受伤，听见主将和御戎都在诉苦，也忍不住要发牢骚。他说：“从开战到现在，一旦遇到危险，我就得下去推车，这有多辛苦你知道吗？”说话间郑丘缓转过头来看了郤克一眼，发现鲜血从他的肩上一直流到了脚下，染红了整个战袍，又不由得担心起来：“不过您的确是伤得有点重啊！”

解张正神情紧张地驾车，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还是坚持说：“我们这辆车的旗号和鼓声是整个军队的耳目，决定了军队的进退。这辆车只要有一个人还在，就能指挥战斗。军人身披盔甲，手执干戈，本来就该抱定必死的决心，仅仅是伤痛还没有到死的地步，就一定要尽力而为，怎么能因为一点点的伤痛而败坏了军国大事？”

话虽如此，眼看着郤克挥舞鼓槌的手越来越无力，鼓声也越来越微弱，解张也紧张了起来，只好从郤克手中接过鼓槌，一边执纆绳驾车前行，一边抡起战鼓指挥进攻。双手节奏不一致就容易出现不协调，在隆隆的鼓声下，战马也失去了控制狂奔起来，牵引着全军将士也都追随着主帅的旗帜奋力冲锋。

齐国人豪爽直率，素来崇尚勇武而不善用巧计，这既是他们得以壮大的资本，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战斗力的发挥。早在齐桓公称霸之前，齐国就曾被鲁人曹刿用计摆了一道，用将士的鲜血和生命印证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一个道理。时隔近百年之后，齐国人直截了当的性情丝毫都没有改变，在急性子的齐顷公引领下，更是将这种率真的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几轮有组织的冲锋没能攻破敌阵，使得那些连早饭都没顾上吃的将士们再无战意，终于在联军的反攻下败下阵来。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齐军的阵形被打乱，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三军将士只能没命地四散奔逃。而联军则在郤克的指挥下穷追不舍，与齐军绕着华不注山（在今山东济南市区东北）玩起了“旋转木马”，从而上演了一出“三周华不注”的趣事。

韩厥建功

韩厥是晋国的三军司马，有关他的故事，我们后面会有详细的叙述。在这次战争中，韩厥亲自驾着战车追击齐军，好巧就遇到了齐顷公的车驾。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常理，一个战车上主将应当站在车左的位置射杀敌人，而这次出战，韩厥却执意要亲自驾车，而这要归因于一个梦。

据说在开战的前一夜，韩厥梦到了自己去世多年的父亲子舆，在梦里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明天作战的时候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韩厥

不解其意，但仍然听从父亲的话，居中亲自驾车。后来在追击的过程中，他的车左和车右先后被射杀，使得他对那个梦更加深信不疑。

后来晋军一个名叫綦毋张的将领落了单，看到韩厥独自赶来，就跳上了他的战车。韩厥正在聚精会神地驾车，无暇与綦毋张说话，但当对方想站在车左或车右的位置时，他都会故意用肘把他推开，搞得綦毋张无可奈何，只好站到他身后。有了綦毋张的协助，韩厥还腾出手来把刚刚被射杀的车右的尸体摆好。

韩厥的这些举动被齐顷公的御戎邴夏看在眼里，便提醒国君说：“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个君子。”

齐顷公被追得很狼狈，却也不失贵族风度，只见他拈弓搭箭，后面便有追兵应声伏倒。听到邴夏的话，他反而对韩厥更添了几分敬意，于是反驳道：“明知是君子还要射他，这不合于礼，我不能这么做。”

齐顷公的一念之仁不但保住了韩厥的性命，还产生了蝴蝶效应，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影响。不过当下更让他感到后怕的是，因为对韩厥的惺惺相惜，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

齐顷公的车驾在快要到达华不注山下的华泉时，被树木绊住无法行动。这在春秋时代的战场上本来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只要车右下车把树枝截去，把损坏的部件修好，车照跑马照跳，威风的锣鼓还可以敲起来。可是当齐顷公和邴夏把目光投向车右的时候，那个名叫逢丑父的大力士却不自觉地羞红了脸颊。

原来在头天夜里，逢丑父在车上小憩时，不慎被一条蛇咬伤了，整个手臂都使不上劲。他不想因此失去担任国君车右的荣誉，因此就怀着一丝侥幸

心理，把事情隐瞒了下来。可谁又能想到，战场局势变化莫测，一国之君竟然被人追着四处逃窜，偏偏在这紧要关头车还抛锚了，这可如何是好！

眼看着韩厥的战车越来越近，齐顷公的车驾却纹丝不动，逢丑父情急之下，只好与齐顷公换了衣服，扮作国君的样子在大树之下正襟危坐，等着对方前来。

韩厥追了大半天终于抓到了敌军大将，欣喜之情自不言而喻，而当他得知坐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齐顷公本人时，更是大喜过望。为了表示谢罪，他急忙让人找了几件玉璧和酒器，恭敬地捧着美酒向冒充齐顷公的逢丑父跪下叩头，说：“寡君派臣下来齐国是为了给鲁、卫两国请命，因此一再告诫不允许我们长期逗留。下臣不幸身在军旅，不能逃避责任，只能在战场上尽力而为，免得有辱两国君主的使命，并无意为难君上，还请君上体谅。”

听了韩厥的话，逢丑父知道他不认识齐顷公本人，心下稍安，于是就装模作样对韩厥说了一番外交辞令。过不多时，他又计上心来，让齐顷公去为他打水。齐顷公恭顺地领命去往华泉，可由于晋人看管太严没能逃脱，只能打了水回来。逢丑父一看这不行啊，接过水一把丢在了地上，没好气地说：“这么浑的水你让寡人怎么喝！”齐顷公再去打水，总算又找到机会跑掉了。

韩厥带着假的齐顷公得胜回营，郤克听闻之后大喜过望，心想总算是可以一雪前耻了。可当他果真见到了俘虏，却一下子愣住了：这不是齐侯啊！

到这个时候逢丑父才如实相告，郤克又气又恼就要杀人泄愤。逢丑父大呼：“恐怕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为国君受难的人了，就让人们时刻都铭记着我的教训吧！”

这番说辞很有当年叔詹的风范，郤克只好命人收手，且补充说：“一个人用生命来保全自己的君主，杀了他不吉利，还是留他一条性命，以此来勉励勤勉事君的人吧！”

这是出自《左传·成公二年》的记载，但《公羊传·成公二年》的说法却与之截然不同，说是逢丑父身份被揭穿后，郤克就问了一句话：“欺三军者，其法奈何？”众人齐声道：“法斫！”意思就是当斩，然后代君任患的齐国子民逢丑父就被晋人以晋国法令砍了头。围绕着逢丑父到底该不该杀，儒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实在是牵涉甚广，就不继续延展了，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齐顷公的表现。

齐顷公以打水的借口逃走之后，在郑周父和宛伐的保护下回到了大营。想到逢丑父有可能会因为欺瞒晋军而被斩首，齐顷公心中实在不安，于是就打点人马，展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拯救逢丑父”的军事行动，从而创造了在敌营中“三入三出”而毫发无伤的传奇。

不过，齐顷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不是因为武艺有多高强，而是联军囿于其尊贵身份不敢伤害他，甚至连受中原文化熏陶浸染的“狄人”也都对其颇为关照。当齐侯闯过“狄人”营地的时候，为了防备别人误伤，这些狄人还自发地组织起来，用戈和盾打造了两堵护墙，让这位不速之客在这两堵护墙围成的“高速公路”中自由穿行。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齐顷公终究还是没能救出逢丑父，只好满心愧疚地带着残兵从徐关（在今山东淄博）进入临淄，殿后的齐军则从丘舆（位于今山东青州）过关，退守马陉（今山东淄博临淄区西南）以诱导晋军。而晋军则长驱直入，“一战绵地五百里，焚雍门之茨，侵车东至海”（《穀梁传·成

公二年》），几乎横扫齐国全境，使得齐国经历了立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浩劫。

爰娄之盟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齐顷公愿赌服输，他派国佐宾媚人带上纪甗、玉磬等贵重礼品赴晋军驻地求和，并允许将侵占的土地退还给鲁、卫两国。与此同时，他也预料到了可能会受到的刁难，故而负气地补充说：“如果他们还不肯罢休，那就随便他们怎么着吧！”

齐顷公的疑虑显然是有根据的，当国佐战战兢兢地把齐国的诚意展示出来以后，果然就遭到了对方的严词拒绝。郤克对当年受辱的往事念念不忘，因此在代表鲁、卫讨要了封地并索取了战利品之后，还不无傲慢地提出了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要求将萧桐叔子送往晋国做人质；二是要齐国“尽东其亩”。

这两个条件过于蛮横，齐顷公当然不会答应，作为具体承办人，国佐自然也要据理力争。他十分克制地向郤克解释说：“萧桐叔子是寡君的母亲，从一定意义上讲，天下诸侯皆为兄弟，齐侯的母亲也等于是晋君的母亲。郤子在诸侯中发号施令，却要用其母亲做人质来获取信任，将来若要行使王命，又当如何处理呢？”其言外之意是，假如天子对晋国不信任，您难道会将晋君的母亲送去做人质吗？

紧接着，国佐引用了《诗经·大雅·既醉》中的一句诗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意在表明孝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此来质问郤克：“用不孝来号令诸侯，这恐怕不符合道德准则吧？”

至于郤克所提出的“尽东其亩”，就是要让齐国将田垄改为东西走向，理想状况下可以让晋国的战车顺着田垄的方向随时进出齐国。对此国佐同样有一番说辞：先王因地制宜划分天下疆土，土地无论是东西走向还是南北走向，都是按照山川地理的走势来确定的，为的是确保获得好的收成。现在您不顾山川形势，只管自己兵车进出有利，恐怕不是出自先王的政令吧？四王五伯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安抚诸侯，靠的是树立德行惠泽天下，而您现在废弃先王政令，只为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又如何担当得起天下霸主的重任？

说完这些，国佐也向郤克表明了齐顷公的态度：郤子奉国君之命不远千里来到敝邑，我军虽然不够勇猛但也都奋勇出战。因为贵国君主的威严，我军战败服输，也甘愿接受惩罚。如果您能够赐福于齐国，让两国继续保持长期友好的往来，就算是把先君的土地和宝器赠予诸位我们也心甘情愿。倘若您不肯罢休，我齐国虽然不够强大，也只能收集残兵背城一战，拼尽全力与诸位周旋到底，即便因此国破家亡也在所不惜！

国佐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气壮山河，令鲁、卫两国大夫都不由得心惊胆战，他们纷纷劝说郤克：“齐军伤亡的都是他们国君亲近的人，您再这么强硬下去，对于晋国来说或许没什么损失，可齐国就要怨恨我们了。现在您拿到了齐国送来的宝物，我们收复了被齐国夺取的土地，您的功业和荣耀也都足够了！齐国和晋国都是受上天护佑的，晋国难道就能永远取胜吗？”

郤克此番伐齐的确有报私仇的因素，但身为晋国正卿，更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宣扬晋国的声威，重拾国人因邲之战而失去的信心。如今目的已然达到，也就没有再咄咄逼人的必要了，故而就让国佐带话给齐顷公说：“我们是为了给鲁、卫两国请命才带着兵车前来的，如今既然已经有话可以向寡君复命，自然要感谢您的恩惠，哪敢不唯命是听呢！”

这年七月，两军在临淄城外不远的爰娄（在今山东淄博临淄区）签订了和平协议，齐国许诺退还所侵占鲁、卫的土地，联军也从齐国境内撤出。至此，晋齐之间的首场战役以晋国方面的全胜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因发生在齐国的鞌地，故而被称作“鞌之战”。

第三节 信任危机

蜀地匿盟

鞏之战的直接受害者是齐国，但最感窝火的却仍是楚国。

楚庄王即位后，经过十几年励精图治，创造了“灭庸服群蛮”、北征“陆浑之戎”、平定“若敖氏之乱”的诸多功业，方才稳定了楚国的政局；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异常艰苦的战争征服了陈、郑、宋等国，打败了晋国，终于实现了楚人几百年来饮马黄河的夙愿。

然而，由于受制于“蛮夷”的身份，楚人即便是有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轻易得到中原诸侯的认同，这就使得楚国在中原的影响力如林间花树一般，得来不易却去得匆匆。

商丘之围三年后，征战一生的楚庄王怀着满腔的愤懑溘然辞世。他耗尽一生心力，奋力打破了以晋国为中心的中原政治秩序，却没能建立以楚国为中心的新秩序，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乱世。

楚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楚共王走上了历史的前台。面对民疲财竭的困顿局面，哪怕是不世的天才也难为无米之炊。为了能够保住已经取得的战果，辅佐楚共王的卿大夫也只能忍气吞声在中原寻求盟友，而这个需求恰好与齐顷公不谋而合。

然而让他们终究没有料到的是，齐顷公过于自负，对自身的实力有着不切实际的估量，还没有等到预先约定的日期，就贸然向晋国发起了挑战，最终酿成了鞏之战的惨败，从而使得楚国“联齐制晋”以称霸中原的梦想也化为泡影。

此外，鲁、卫两国在晋楚之间的立场选择，也让楚人极其恼火。过去几年间，鲁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楚国示好，希望能借助楚国的力量压制齐国。可楚庄王刚一去世，他们转眼间就与晋国结盟伐齐，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将楚国当成了“打狗棒”，想用就用，想扔就扔。至于卫国，则从来都对楚国的武功视而不见，这又怎么能让人忍得下去！

鞌之战爆发后，楚国国内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出兵救援齐国。为了一战打出楚国的声势，令尹子重（公子婴齐）在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战前动员工作，包括户口清查、减免税费、弱势群体救助、全国大赦等，以便抽调更多的兵力派上战场。

这一切工作完全就绪时，已经是鞌之战结束半年后了。楚国出动了包括国君警卫队在内的所有部队，拉拢了所有能够拉拢的盟国，就连许国和蔡国未成年的君主也让他们提前行了冠礼强行拉上了战场。当年冬天，楚国大军深入中原，首先侵入了卫国，随后驻军鲁国的蜀（今山东泰安）地，并以此为据点出兵攻打阳桥（今山东泰安北），故而这场战争也被称为“蜀之役”，又或“阳桥之役”。

由于楚军攻势凌厉，鲁、卫两国早早地就放弃了抵抗，并备好了礼物要向楚人求和。楚国大军刚到阳桥，鲁成公就已经把他的弟弟公衡送来做人质了，用以劳军犒师的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也已经抵达了前线。

楚国劳师远征到了鲁、卫的地界，已然是强弩之末，看到鲁人这么识趣，便欣然同意与之结盟。据《春秋》经传所载，受邀参与这次盟会的共有十三个国家，参会的代表包括鲁成公、蔡景侯、许灵公、秦国右大夫说、宋国华元、陈国公孙宁、卫国孙良夫、郑国公子去疾以及齐、曹、邾、薛、郕等国的大夫。除了晋国和一些东夷小国之外，当时中原地区能够叫得出名字

的国家几乎都参加了——晋国统领诸侯数十年，恐怕都没有享受过这般荣耀。

然而对于这样一次空前的盛会，《左传》却给了一个极端负面的评价，称之为“匱盟”。一方面，楚国在邲之战中战胜晋国的影响犹在，此番他们又倾尽国力大举北伐，诸侯迫于其军力不得不参与盟会；可另一方面，晋国在鞏之战中击败了齐国，又使得诸侯不得不慎重评估晋国重新夺取霸权的可能，因此在与楚国会盟时大都缺乏诚意。

会盟的成果同样不容乐观。当楚军撤退抵达宋国时，鲁国送去做人质的公衡就在中途逃脱了；到第二年春季，参与盟会的宋、鲁、卫、曹等国就在晋国的率领下大举伐郑；齐顷公更是亲赴晋国缔结友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亲自到晋国朝见的齐国国君。这些都表明了楚国声势浩大的联盟并不可靠，这次的会盟自然也就有名无实了。

收服郑国

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鞏之战结束一年半以后，为了赏赐在鞏之战中建立功勋的大夫，晋景公大肆扩编军卿阵容，建立了空前绝后的六军十二卿体制。

周代有“天子六军、大国三军”的说法，晋景公的做法显然是僭越了天子的规制。但无论是《春秋》还是《左传》，对于这次大规模扩编都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因此我们也很难窥伺到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但不管怎么说，鞏之战的胜利让晋人一扫邲之战失败的阴影，国中上下都备受鼓舞，国内扩张主义思潮有所抬头，恢复晋国在中原的利益也就成为题中之义了。

新的争霸周期一旦开启，首当其冲遭遇兵祸的自然还是郑国。此番联军伐郑，打的是报复邲之战的旗号。郑国的公子偃知道对方来者不善，于是就命令东部边境的军队设下埋伏，将联军打了个猝不及防。

尽管晋国是春秋时期搞“伏击战”的开山鼻祖，但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这种不入流的战术用在中原的战场上，自然也就没有防范的意识。不料他们刚刚想要扬威于天下，就被郑国人用自己首创的战法阴了一招，哪里肯善罢甘休？于是就积极备战，准备对郑国展开新一轮的报复。恰好在这个时候，郑国与许国之间发生了纠纷，让晋国找到了出兵借口。

郑国和许国之间的纠纷由来已久。早在一百多年前郑庄公在位时，就曾联合齐、鲁等国攻灭了许国，但由于许国曾是鲁国的附庸，郑庄公投鼠忌器，仍保留了许国的社稷。后来郑庄公去世，郑国内部变乱不休，许穆公趁机起兵赶走了郑国驻军，许国由此复立，同时也开启了郑、许两国之间长达两百年的恩怨情仇。

一直以来，郑、许两国同时受霸主节制，即便互有敌意也不敢公然对抗。但如今楚庄王突然去世，晋、楚两国又都疲态尽显，郑国就想趁这个机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于是便接连发兵攻打许国。

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年）冬，在完成了内部力量整合之后，晋军以栾书为元帅，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攻打郑国。楚国司马子反听闻晋国出兵，急忙带兵前来救援，结果晋军是退了，可许国和郑国却打起了官司。

这场官司一直打到了楚共王面前，但由于郑国背约伐许在先，郑悼公亲自赶赴楚国争讼也未能挽回败局。郑悼公争讼不胜，一怒之下就背叛了楚国，派公子偃到晋国去寻求结盟。

为了庆祝郑国的回归，晋国先是于景公十四年八月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随后又于当年冬天，召集齐、鲁、宋、卫、曹、邾、杞等国在虫牢（今河南封丘北）举行一次盛大的会盟，共同与郑国缔结盟约。

郑国一夜之间改换门庭，楚国自然要有所动作。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年）秋季，令尹子重带兵进攻郑国。作为反制，晋国执政栾书引兵救援，两军在绕角（今河南鲁山）相遇。楚军为避其锋芒撤回国内，而晋军则趁胜侵扰蔡国，引得申、息两县的楚军不得不回师救援，又与晋军在桑隧（今河南确山）相遇。不料楚军刚扑上来，栾书就以不宜“迁戮”为由下令撤军回国。

此后的几年里，晋、郑两国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郑国不仅坚决依附晋国，帮助他们抵御楚军的侵袭，还跟随着晋国大军伐蔡、围许、侵沈，给楚人制造了不少麻烦。

楚国多次武力征服未果，转而开始走“黑金”路线。晋景公十八年（前582年），他们派人带着财货重贿郑成公，终于换得郑国的暗中结盟。考虑到晋楚和议近在眼前，郑成公仍抱有一丝幻想，于是便亲自到晋国去解释情由，希望能够得到谅解。然而晋人却蛮不讲理地将他扣押下来，同时还出兵讨伐郑国。郑人投鼠忌器，不敢抵御晋军，就派出使者前去求和，谁知晋军竟不问情由，直接把使者也杀了。

眼看服软不成，郑国大夫公孙申决定转变策略，干脆出兵讨伐许国，以向晋国表明他们并不急于救回国君。这个想法本意是好的，晋国知道郑国要立新君，那么他们所扣留的国君就无法威胁到郑国，自然就会将他释放。但让公孙申没想到的是，还没等晋人对此做出反应，郑国内部就真有人动了改立国君的心思，结果就酿成了一场大乱。一直到第二年五月，郑人先后立了

两任国君之后，晋国才想到要把郑成公送回去，迫使郑国在修泽（今河南原武）与诸侯会盟。

政令不一

但也就在这段时期内，晋国内部却出现了极大的混乱。从内部表现来看，是由赵氏内部纷争引发了下宫之役，导致在十二卿中担任重要职务的赵同、赵括死于非命；而从外部表现观之，则是晋国对外政策明显出现了政令不一的现象。

比如在对待鲁国的态度上，早年晋国受鲁、卫之请出兵伐齐，通过鞌之战帮助鲁国夺回了被侵占的“汶阳之田”。鲁成公为感谢晋国，不仅亲自慰劳晋军，还特地赐给三军统帅以先路的戎车和三命之服，就连军中的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也都获赐一命之服。但在齐顷公朝见之后，晋国对鲁国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至于鲁成公第二次前往晋国朝见时，晋景公就没给他好脸色看。这还不算，到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晋国更是委派韩穿到鲁国去，要求他们把“汶阳之田”归还给齐国。

对此，鲁国执政大夫季孙行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左传·成公八年》）

中原霸主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艰巨的使命，他们必须要时刻将信用和道义摆在首位，以此来维持中原诸国安定有序，才能获得诸侯的拥护。假如这个霸主喜怒无常、朝令夕改，今天高兴了，把汶阳之田给了鲁国，明天不高兴了，又要转而割让给齐国，就会让人无所适从。长此以往，信用就无法树立起来，道义也无法得以推行，还如何维持霸业联盟的稳固呢？

“汶阳之田”是季孙行父的祖父季友的封地，他之所以明知事不可为却还要再三请求，就是不想让这块祖业落入他人之手，但他所提出的那番见解，却真切地反映了当时诸侯的真实诉求。可即便如此，季孙行父的肺腑之言还是没能让晋国改变决策，终于使得鲁国与晋国的关系渐行渐远。

晋国对鲁政策的转变如果要强行解释，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为了讨好齐国，同时也是在对鲁国私下结交楚国表示不满，可接下来晋人对宋、卫两国的所作所为就实在令人费解了。

晋景公十四年（前586年）冬季，宋国出现了由公子围龟引发的内乱，宋共公担心自己出国时间太长，国内的乱局会进一步发酵，于是就在虫牢会盟上提出不再参加此后的会见。这些提议即便是不合情理，宋人在盟会上当场提出，晋人大可以当面质疑。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晋国方面竟不分青红皂白，执意于第二年三月邀合卫国、郑国和伊洛、陆浑、蛮氏等“戎族”大举讨伐宋国。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大军在卫国驻扎期间，领军的副帅夏阳说看到鍼（同“针”）地的城池防卫空虚，竟然突发奇想准备发动偷袭以获取战利品。卫国人得知后大惊失色，急忙提高警惕、加强防卫，随时准备跟晋军战斗到底。好在晋军主帅伯宗是个明事理的人，及时制止了这场闹剧，这才没有引发激烈的外交冲突。

因晋国内部冲突爆发，且在对外交往时朝令夕改，诸侯无所适从，纷纷对晋国产生了二心。为了改善由此造成的被动局面，晋国内部的温和派也做出了不少补救动作。

比如晋景公十八年（前582年）春，晋国曾召集诸侯在蒲地举行会盟，试图重申马陵之盟的友好关系。但因心中多有怨气，诸侯对这次的会盟普遍都

不看好，比如鲁国的季孙行父就愤愤不平地质问道：“德行都已经放弃了，还重温旧盟做什么？”

恰在此时，鲁国与宋国缔结婚约，鲁成公将伯姬嫁给了宋共公，晋国就以此为契机，也替鲁国送去了陪嫁的媵妾，两国的关系才稍稍有所缓和。

晋国这一系列反常的动作，反映出其内部矛盾仍在不断加深。晋景公在位的十九年，正是晋国内部冲突持续激化的关键时期。作为这个国家真正的掌舵人，晋景公当然知道这些矛盾的根由所在，故而一直都在以或温和或强硬的手段调解冲突，同时极力避免与外部产生冲突。然而，在内外各方势力的综合作用之下，鞏之战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在激发晋国人信心的同时，也复活了他们心中的恶魔。不同派别、不同立场、不同阶层的人们开始为了利益互相扯皮，导致政令难以统一，对外公信力逐步丧失，更使得晋景公的努力变得举步维艰。

对于晋景公来说，霸业宏图还未能实现，邲之战前的各种老毛病就又借尸还魂，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感到痛苦了。可事已至此，再去抱怨过去的种种已经没有意义，人总要向前看，继往开来才能创造美好的明天。那么接下来，晋景公又会做出哪些努力呢？

第五章 从第一次弭兵会盟到鄢陵之战

第一节 华元弭兵

好恶同之

公元前579年，是晋厉公即位的第二年，在经历了近二百年的战乱之后，中原大地上终于迎来了一场和平的盛会。这年五月，晋国大夫范文子士燮与楚国代表公子罢、许偃在宋国举行隆重的会见。经过短暂的协商，五月初四日，双方代表在商丘城的西门外一起歃血为盟，共同宣誓：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贄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

盟会议定的内容主要有三项：

其一是明确休战原则，规定两国从今以后要好恶同之、互相扶助，不再以兵戎相见。如果有敌人侵害楚国，晋国应出兵救援讨伐敌人，如果晋国遭受侵害，楚国也同此理。

其二是约定共享霸权，两国要建立和睦友好的外交关系，保证信息和道路的通畅，出现异议时应共同协商解决。要共同履行扶危济困的义务，对不遵守王道正义者，应同心协力进行讨伐。

最后是有关违约事项的约定，两国要严格遵守这一协定，如有背叛此盟誓者必遭天谴，使其军队覆亡，国祚断绝。

由于这是晋楚两国首次就中原和平秩序达成协议，因此人们通常将这次盛会称为“第一次弭兵会盟”。

晋楚这对春秋时期最强劲的宿敌，在经历了五十多年的敌对状态后，能够放下敌意平心静气地坐在一起共商大事，这样的成果的确来之不易。在成就如此壮举的背后，既需要当政者有壮怀天下的气魄，更要有数不清的政治活动家奔走推动。而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有三个，第一位就是晋国大夫荀首。

荀首是荀林父的弟弟，被封于智邑，因以智为氏，成为后来的强卿家族智氏的始封之君。十八年前（前597年），荀首以下军大夫的身份参加了邲之战，他的儿子荀罃在此战中被楚国大夫熊负羁俘虏。为了找回自己的儿子，荀首拼死俘虏了楚国王族的公子谷臣，并抢回了连尹襄老的尸体，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以换俘的方式父子团聚。然而邲之战后，晋楚关系跌入冰点，此后多年没有正常的外交往来，使得荀首的心愿始终都无法实现。

不过，恐怕连当年的荀首都没有想到，身为下军大夫的他有朝一日能够顺利成为六卿之一，并在不久后成为排位第二的中军佐，而这个过程仅仅用了不到十年。

职位的迅速晋升，使得荀首能够以晋国次卿的身份提出交换俘虏的倡议。在国际力量的一致推动下，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楚共王终于同意了这项协定，让居留在楚国近十年的荀罃回归故国。

这个以私心起念的换俘过程既达成了荀罃多年来的夙愿，也无意间开启了晋楚走向和解的第一步，为第一次弭兵会盟的成功举行创造了基础。

南冠楚囚

此后的几年间，晋楚两国围绕郑国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一度使得两国之间的交往出现了中断。而晋国内部冲突的白热化，又使得其对外政策朝令夕改，让人很难产生稳定的预期，这个局面一直到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的“下宫之役”后才逐渐发生转变。这时，又有一个楚国人钟仪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诗人赵嘏有诗云“鲈鱼正美不归去，空戴南冠学楚囚”，以家乡的鲈鱼之美与客居长安似楚囚一般的生活进行对比，表达其厌倦官场的寂寥之志，寄托其思乡归隐的渴盼之情。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失败被捕后，在狱中也曾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以展示自己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其中“楚囚”这一典故的来源便是这位客居晋国的钟仪。

钟氏出自楚国王族后裔，是一个世代以乐师为业的家族，其家族姓氏便与当时的主要乐器编钟有关。不过，钟仪并没有继承家业成为乐师，而是进入了军政系统，担任了郢县的县公。晋景公十六年（前584年）秋，楚人因不满郑国的背叛而挥师北上，却不料被联军打败，钟仪也在这场战争中成为俘虏，后来几经辗转，被囚禁在晋国军队的府库中。

在孤寂虚空的羁旅生活中，钟仪只能凭窗南望故土以寄托思乡之情，无意间成就了“南冠楚囚”这样一个寂寥落寞的意象。不过，这种刻板化的印象并非钟仪生活的全部。在成为囚徒两年后，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

在位十八年秋冬之际，晋景公到军府视察工作，偶然间看到一位来自异国的囚徒。见他虽身陷囹圄却像要上朝一样，始终保持衣冠不乱、坐姿不倚，很有君子的风度，晋景公不由得心生景仰，于是不无感慨地问道：“那位戴着南冠的囚徒是什么人？”

随从的官员回答说：“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

晋景公命人把钟仪放了出来，跟他坐在一块儿聊起了家常，钟仪的回答都很得体。后来聊到了家世，景公问起他在楚国的族人，他如实回答说：“族人是负责奏乐的。”

晋景公顿时来了兴致，便又问他是否会奏乐，钟仪说：“这都是我们家族的职责，又岂敢荒废？”景公当即就让人拿来一组乐器，让他现场演奏。钟仪欣然领命，奏了一曲楚风。

奏乐完毕，他们才开始进入正题。景公问：“你们的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

钟仪起初一再推托，说：“这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可以知晓的。”在晋景公的一再追问下，他才勉强给出了一个含糊的答案：“我只听说，当年他做太子的时候，尽管有师保侍奉，却依旧早晚向公子婴齐和公子侧请教，其他的事情我就不了解了。”

钟仪提到的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分别指的是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婴齐和侧是他们的本名，子重和子反是他们的字，两个人都是楚庄王的弟弟、楚共王的叔父，为当时主导朝政的实权派。钟仪虽远在异国他乡，但提到他们的时候依然按照“君前称名”的原则，直称其名而不是字，体现了他时刻不忘尊君的操守。而说到对楚共王的看法，却只提到其当太子时的表现，既说明了楚共王是一位好贤且有上进心的人，同时又表示自己的评价客观公允而非出于谄媚，是没有私心的表现。

除此之外，晋景公在向士燮提起这件事的时候，士燮还赞叹说：“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成公九年》）所谓“言

称先职”，是因为钟仪虽然担任了郢县的县公，但在问及家人的时候，依然以其世袭的职业作答，称得上是一个“不背本”的人。至于“乐操土风”，是说他背井离乡多年，深受晋国音乐的熏陶，却始终以楚风明其志，可见其具有“不忘旧”的道德操守。这四个品质综合在一起，体现了他仁、信、忠、敏的人格特质，称得上是一位有德君子。

接力促和

这次简单的对话令晋景公心中无限感慨。他既为像钟仪这样的君子被迫流落异乡而感到难过，也为自己艰难的处境而感伤不已，更为这失去了秩序的世界而苦恼愤懑。这究竟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究竟什么才是人们追求的所谓正义，更是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谜题。

人们常说“春秋无义战”，可所有的不义之战却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们打着维护王道、伸张正义的旗帜，喊着保护礼乐文化、还黎庶以安宁的口号，掀起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先王礼乐衣冠的绝尘不返，是大家族之间持续不断的倾轧兼并，是小家小业惶惶不可终日的凄风苦雨，是君子南冠而坐的孤独寂寥，更是像他这样的君主在卿大夫如饕餮一般的胃口和权力挤压的夹缝中勉力求存。

晋景公与士燮对钟仪的评价，在儒家看来或许是在对“何为君子”进行理论研讨，但更为实际的用意恐怕还是在考察钟仪的为人。他们要选拔一个可靠的信使，以重启两国搁置已久的和平谈判。钟仪作为客居异乡的楚人，又有着可贵的品质，自然就成了他们宏大计划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事实上，钟仪也果然不辱使命。回国后他迅速将消息传到了楚王那里，也成功地劝服楚国上下同意与晋国和谈。仅仅几个月后，楚国就派出公子辰

来商讨和谈细节，次年晋国也以彘伐为使到楚国进行了回访，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然而遗憾的是，晋景公最终还是没有等到缔结盟约的那一天，他的死又给刚刚启动的晋楚和谈带来了巨大的悬念，也让那些对和谈翘首期盼的中原诸侯大感失望。

晋楚两国争霸五十多年，中原诸侯无不受其侵扰。他们除了要向盟主缴纳数量可观的贡赋之外，还要按时出兵跟随霸主东征西讨。而处于中原要冲地带的郑、宋、陈、蔡等国，更是常常要遭受战火蹂躏，真可谓苦不堪言。这些国家无不盼望着晋楚和议能够早日达成，好让他们免去这诸般的苦难。

从另一方面讲，晋国所面临的内政困局在中原普遍存在，晋景公在位时期又正好是各国内部大族崛起、君卿权力交替变异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国君还是世卿大夫，都希望尽快对内部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而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在环境。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促成晋楚和议的第三位关键人物闪亮登场，他就是来自宋国的华元。

华元是宋戴公五世孙，在宋国六卿序列中担任右师职务。晋景公五年（前595年）时，是他坚持杀掉楚国使者申舟，为宋国招来了楚国的讨伐；当宋人在九月围城的苦难中艰难支撑的时候，又是他只身夜闯楚军大营，在司马子反的床头上逼迫其同意与宋国定下盟约。

宋楚和议之后，华元曾亲自作为人质去往楚国，或许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与楚国令尹子重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又因为长期与晋国并肩战斗，使得他与晋国执政栾书也有着很深的私交。当晋景公去世后，彘伐在楚国取

得了巨大的外交成就，可回到国内却面临无人主事的窘境时，华元便下定决心要扛起这份重任，为中原地区的和平事业四处奔走。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华元居中斡旋终于产生了成效。晋厉公元年（前580年）冬季，秦、晋两国率先在令狐、王城举行了盟誓。紧接着第二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夫又在宋国西门之外举行了盟誓。同年冬天，晋、楚两国又分别派出郤至和公子罢到对方国都聘问，并举行正式的会盟，标志着“第一次弭兵会盟”正式达成。

郤至使楚

弭兵会盟的顺利举行，为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百姓带来了和平的讯息，其成果也得到了中原诸侯的一致认可。会盟结束后，郑成公亲赴晋国，鲁、卫等国则由晋国统一安排安排在琐泽（晋邑，在今河北大名东）举行会见。整个中原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人们对于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期许，全都满怀喜悦地盼望着一个安定祥和的大同世界的到来。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晋楚议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争议，双方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推动弭兵，看起来是利国利民利天下的好事，但其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晋厉公二年（前579年）的冬天，郤至作为晋国方面的代表被派往楚国进行聘问，楚共王专设享礼盛情款待这位来自北方的客人，其接待规格也超乎寻常。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次备受瞩目的享礼上，却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当时楚国负责接待工作的襄礼是司马子反。在举行宴会之前，他特意在地下室悬挂了钟鼓乐器，并安排了大量的乐师在宴会上奏乐。这看起来好像

是在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可当郤至进入朝堂听到突然响起的钟鼓声时，却着实被吓了一跳。

郤至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应，是因为当时楚人所奏的《肆夏》原本是天子宴请诸侯时才会用到的乐曲。春秋时期尽管“礼崩乐坏”，天子专属的乐曲也常被诸侯、大夫僭越，但这个过程毕竟是渐进的。至少在郤至所处的时代，这首乐曲还仅限于诸侯之间的相互宴请。郤至作为晋国的大夫，自然不敢接受如此高规格的礼仪，因此在听到钟鼓之声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退出来。

不过，司马子反显然是有意为之的。看到郤至惊慌失措的样子，他反而若无其事地催促说：“时间不早了，寡君还等着呢，您还是赶紧进去吧！”

郤至一再向他解释，说：“贵国君主不忘记先君的友好，下臣有此福分见证两国交好，已是幸运之至。然而贵国用如此盛大的礼仪来接待下臣，假如有一天上天降福，让我们两国的国君相见，贵国还能有什么更高的礼节来接待寡君呢？郤至实在不敢接受！”

郤至越是恭敬，子反越是无所忌惮。他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如果上天赐福，两国国君相见，恐怕也只能是用一支箭互相馈赠了，哪里还用得着什么钟鼓礼乐？”这句话包含着很深的挑衅意味，其言外之意是在说：两国国君即便是相见，也只能是在战场上，这种需要礼乐的场合恐怕是没有机会的。

郤至耐心地向子反解释了享宴之礼的来历，以及遵守礼制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不无痛惜地反驳说：“您这是取乱之道，恐怕不能作为法则吧？”不过，他最终还是经不住子反的一再催促，也只好说：“您是主人，既然做如此安排必有您的道理，郤至又岂敢不听从呢？”

聘礼结束后，郤至将这些话转述给了范文子士燮。士燮闻言，内心便已明了：看来这次的弭兵会盟在楚国内部根本就没有达成共识。

和平的乐曲还未奏响，战争的阴霾便已经笼罩了整个天空。作为晋国方面真正认同晋景公理念并积极付诸实施的具体执行人，士燮和郤至顶住压力，费尽心力撮合两国和议，到头来不仅不能消除兵祸，反而有可能加深两国的敌意，想一想不免脊背发凉。士燮不无担忧地说道：“不遵守礼仪的人，自然也不会遵守信义，看来我们是离死不远了。”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士燮的担心多少有些多余了，因为即便是弭兵会盟的首倡者和发起人晋景公，也并不认为晋楚之间的和平能够维持多久。既然弭兵会盟成效有限，也就意味着不论成功与否，不久的将来他们还是会在战场上相见。

晋景公不是孤注一掷的赌徒，自然也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一只篮子里。几乎在开启弭兵会谈的同一时间，他就已经在为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做准备。为此，他雄心勃勃地启动了另外一项计划。

第二节 联吴制楚

让我们将视线拉回到晋景公十六年（前584年）。正当中原各国为郑国的重新回归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东夷小国突然闯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一年春季，他们从遥远的蛮荒之地一路北征，打到了郟国（今山东郟城）；同年八月，他们又入侵了楚国边境重镇州来（今安徽凤台），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不已。

这个国家便是吴国。与春秋后期大放异彩的光辉形象不同，在早期的历史记录中，吴国只能勉强算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除了有关吴太伯的传说之外，人们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仅有的几次记录还是在齐桓公、楚庄王时期，为这两位大国雄主远征蛮荒之地的武功做了点不起眼的背书。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受人重视的国家，却突然发兵远征郟国、入侵州来，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今山东、河南南部区域，其发展势头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作为郟国的友好邻邦，鲁国执政季文子满怀忧虑地评价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原诸国的文治武功不但未能震慑蛮夷，反倒让对方入侵中原，而当今天下却没有人为此感到担忧，这是因为没有好国君的缘故啊！”

这席话不知道有没有传到晋国人的耳朵里，总之是到第二年的冬天，晋国卿大夫士燮突然造访，要求鲁国出兵郟国，讨伐其与吴国结盟的罪行。鲁国上下本想花钱消灾免去这趟差事，却终究扛不住晋国一再坚持，只好让叔孙侨如出面，会同晋、齐、郑组成联军，大举讨伐郟国。

纵观晋国多年来的表现，这次的做法似乎并无什么特别之处，无非还是在履行盟主的职责，确保中原国家的利益边界不受侵犯，这与季文子的想法倒是出奇地一致。但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结合晋国当时的政策综合

考虑的话，事情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要想搞清楚整件事的原委，我们还要从一个叫作申公巫臣的人说起。

夏姬绯闻

申公巫臣本是楚国王室后裔，半姓，屈氏，本名屈巫，字子灵，曾长期担任楚国北方重镇申县的县尹，足见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不过真正让申公巫臣这个名字为世人所知的，却是一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传奇故事。

楚庄王“灭陈设县”之时，夏姬被当成战利品掳到了楚国，而这一刻也是夏姬与申公巫臣旷世绝恋的开始。

申公巫臣与夏姬究竟是如何相知相爱的，我们无从探究，但与后世所有的传奇故事一样，美好的爱情总是充满了波折，申公巫臣与夏姬的爱恋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夏姬的美貌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此当她到了楚国之后，就掀起了一股“美的旋风”，就连英名盖世的楚庄王都忍不住想要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眼见竞争对手个个都位高权重，申公巫臣左推右挡，着实做了不少工作。他先是劝阻楚庄王说：“王上号召诸侯伐陈是为了讨伐罪恶，如果您纳了夏姬，天下人就会以为您是因为贪恋她的美色才如此兴师动众的，大王的一世英名岂不因此毁于一旦？”

后来司马子反也想要娶夏姬，申公巫臣就又出面劝阻，说：“夏姬是个不祥之人。郑国的公子蛮因为她而早死，夏御叔也因她而被杀，陈灵公和夏徵舒的死，以及孔宁和仪行父的逃亡都跟她脱不了干系，最后就连陈国都险

些毁在她的手上。你也是位高权重之人，天下美女应有尽有，何苦还要因为她而招来灾祸呢？”

尽管有这么多不吉利的事围绕着，可夏姬的美貌还是招来了一大批追求者，争先恐后地向夏姬献爱心。楚庄王着实看不下去，干脆做主把她许给了连尹襄老。

夏姬名花有主，事情却并没有尘埃落定。仅仅几个月后，晋楚两军在黄河南岸的邲地遭遇，楚军大获全胜，这本是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任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晋军仓皇逃窜的烟尘中，竟然有人出其不意地杀了个回马枪。连尹襄老在两军相交的瞬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扑棱棱飞过来的一支羽箭断送了性命，从此不仅与美娇妻阴阳两相隔，就连尸体都被晋军抢了去。

连尹襄老的意外去世，将原本有了归宿的夏姬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在楚庄王的支持下和申公巫臣的暗中帮助下，夏姬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压力，始终只对巫臣芳心暗许。然而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在位高权重的司马子反面前，仅凭申公巫臣的权势终究无法护她周全。面对变幻莫测的命运，孤苦无依的她又该如何摆脱苦海呢？

巫臣叛楚

岁月空回转，甘苦到白头。在无尽的忧虑中，夏姬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难熬的一段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因深陷宋国围城的泥潭，楚国的社会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楚庄王梦寐以求的霸主之路也戛然而止。正当楚庄王郁结难平的时候，突然有消息传来，说晋国主动示好，愿意与楚国交换战俘以结束当下的

断交局面。与此同时，夏姬也进宫请愿，说娘家人来信告知，晋国人准备把连尹襄老的尸体送到新郑，希望能允许她亲自去接回丈夫的灵柩安葬。

看到夏姬梨花带雨的愁苦模样，楚庄王被打动了。他召集了大夫们前来商议，想辨清楚事情的真伪。在问到申公巫臣时，他拍着胸脯说：“据我所知，这件事的倡议者是荀林父的弟弟荀首，早年他曾是晋成公的宠臣，新近又做了中军佐，在晋国是有权势的人物。之所以要提出换俘，是因为他的儿子荀罃在此前的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他对这个儿子很是宠爱，因此想以连尹襄老的尸体以及公子谷臣进行交换，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另外，荀首与郑国的皇戌有很好的私交，郑国人惧怕楚国，同时又想讨好晋国，也乐于做这个中介，我看没什么好犹豫的！”

不管怎么说，楚庄王最终还是同意了夏姬的请求，允许她到郑国去迎回襄老的尸体。临行前，夏姬对送行的人发下誓言，说：“如果得不到尸首，我是不会回来的！”

话是这么说，可实际上夏姬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再回到那个噩梦不断的地方。她在郑国住了下来，在那里她要等一个人，一个让她魂牵梦萦的君子。

这个人就是申公巫臣。

如果不是他说过的那句话——“只要你想办法回到郑国去，我就一定会去娶你”，她就不会想到要走这样一条路；如果不是他暗中怂恿郑国人配合，楚庄王也不会轻易相信晋国的诚意；如果不是他现身说法极力劝说楚庄王，夏姬也不会那么容易脱离苦海。

总之，申公巫臣说过的每一句话，夏姬都相信了，也愿意等待。终于有一天，申公巫臣突然造访郑国，郑重其事地向她的哥哥郑襄公提亲，算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当年许下的诺言。这门婚事得到了郑襄公的许可，但迫于国内的压力，申公巫臣一直没有将其公之于众，直到有一天他抛家弃产带着夏姬私奔了，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们才恍然大悟。

那还是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的夏天，申公巫臣受楚共王之托出使齐国，准备与齐国联合起来在中原搞一次大动作。行到半路时，巫臣遇到了将要前往郢都的申叔时和申叔跪父子，年轻的申叔跪不无讶异地对他的父亲说道：“怪哉！这个人的脸上虽有承担军事重任的戒惧之色，可还能隐约看到在桑中幽会情人时的喜悦之色，难道他是要带着别人的妻子私奔去吗？”

申叔跪看出了其中的异样，却并不知道巫臣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甚至就连随行的使臣都不知道巫臣此行的真正目的。离开楚国后，申公巫臣并没有直奔郑国，而是按部就班地去了齐国，又一如既往地与齐人讨价还价、据理力争，表现出了一名优秀的外交人员应有的职业素养。他与齐国达成了协议，并约定好了出兵的时间，圆满地完成了此行所有的使命，然后又与随行人员一起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然而就在他们快要抵达楚国边境的时候，申公巫臣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将这次外交活动的所有成果以及齐国赠送的财礼都交给了副使，自己却带着全部家财转道郑国去了。等他的副使终于搞明白事情原委的时候，申公巫臣大概早已成为晋国人了。

这个结果不仅楚国人会感到惊讶，就连申公巫臣本人都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他原本是打算去齐国的，出使期间也顺手为以后的生活打点好了一切。可当他带着夏姬踏上去往齐国的旅程时，却听说齐国早就在鞌之战中败了。

性情急躁的齐顷公还未等到约定日期就跟晋国人开战，让自己多年来联结齐楚的努力就这么泡汤了，申公巫臣的内心不禁五味杂陈。丢下一句“吾不处不胜之国”，申公巫臣便义无反顾地转头去了晋国。随后又在郤至的帮助下，受封为邢地大夫，也算是有了一个不错的待遇。

申公巫臣与夏姬这段旷世绝恋，经过十年的爱情长跑，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归宿，按照通常的剧情设定，故事发展到这里也就该大结局了。却不料他们的浪漫私奔彻底激怒了司马子反，一段王子向情敌寻仇的另类剧情开始上演。

巫臣奔晋的消息传回楚国，司马子反立刻找到了楚共王，愤然要求用重币收买晋国人，让他们彻底封杀申公巫臣，永不叙用。可楚共王却慨然说道：“算了吧！虽然这事他做得不厚道，可毕竟也是个忠于事功的人，为先王出谋划策立下过不少功劳。更何况，如果他能有利于晋国，就算我们送去重礼，晋国一样会重用他；如果他对晋国没有好处，晋国人自然会把他扫地出门，我们再去送礼岂不是多此一举？这事就此打住，以后不准再提了！”

可司马子反却咽不下这口气，最终还是联合令尹子重，把申公巫臣的族人全部诛杀。随后他们又坐地分赃，子反霸占了清尹弗忌和连尹黑要的家产，子重瓜分了子闾的家产，沈尹与王子罢瓜分了子荡的家产。申公巫臣听闻这场屠杀悲愤不已，于是便写信给子反和子重说：“你们贪得无厌、滥杀无辜，我今日在此立誓，将来一定会让你们疲于奔命而死！”

楚国内争

以上就是《左传》中有关申公巫臣叛逃的全部情节，不过，在新近公布的楚简《系年》的记载中，整个故事的剧情出现了很大的反转。文中记录了夏姬的名字，是一个上孔下皿的异体字，她的丈夫也不是公孙夏御叔，而是

公子夏徵舒，这就让故事起点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楚庄王灭陈之后的事情也有不同，说是楚庄王直接将夏姬许给了申公巫臣，却被连尹襄老抢去了，襄老死后，他的儿子黑要又强娶夏姬，申公巫臣反而成了受害者。黑要死后，申公巫臣本以为苦尽甘来，可以名正言顺地夺回所爱了，却不料又受到了子反的阻挠，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夏姬叛逃到了晋国。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已经无从判断，但不管是哪种说法，总归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巫臣叛逃楚国的原因就是贪恋夏姬的美色。后人在谈到夏姬的故事时，也通常只关心其足以倾国倾城的外在形貌以及由此引发的桃色事件，比如汉代的《列女传》就说：“陈女夏姬者，陈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

不过，这其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那就是夏姬的年龄问题。按照通常的版本，夏姬的儿子夏徵舒射杀陈灵公的事情发生在晋景公元年（前599年），能够挽弓杀人且引得楚国大军征讨，显然不是一个小孩子就能办到的。甚至在有些资料中，这年夏徵舒已经担任了陈国司马，那么他的年龄还要更大一些。在此基础之上来推算，这一年夏姬最少也有四十岁了，到十年后是否还有那样的姿色让申公巫臣甘愿抛弃宗族而私奔都是个问题。

为了让这个故事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人们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发挥想象，到明代冯梦龙著《东周列国志》时，《左传》上的片言只语已经演绎成了一个情节丰富的传奇故事。

在风花雪月的故事背后，《左传》实际上也提到了一个细节，直接点出了申公巫臣与子重之间发生冲突的来源。这场纠纷发生在晋景公六年（前594年）楚国伐宋一役之后，子重请求将申、吕两县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封邑。楚

庄王本来已经答应了，可申公巫臣却出来劝阻说：“申、吕是楚国的粮仓，也是抵御北方的重镇，应该由王室直属才便于调遣。如果将其划给私人，晋、郑两国很容易就能冲破这道防线，直入汉水，这对国家是不利的。”

申、息两县素来是楚国进据中原的桥头堡，也是抵御诸侯入侵的北大门，申县在楚国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赘述。另外的一个吕地，早年曾是齐国开国之君吕尚的封地，其地理位置与申县相近，都在如今的河南南阳地区，其战略地位恐怕不亚于申、息两县。

将边邑重镇封给功勋大夫并不意味着边防力量就会减弱，但地方封君由此坐大的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申公巫臣是申县的县尹，子重请封申县就等于是公然抢夺他的利益，于公于私申公巫臣都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由于资料有限，我们能够找到的例证也仅此而已，但这并不意味着子重与巫臣之间的冲突就仅限于此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申公巫臣能够压子重一头，凭借的是楚庄王在背后撑腰，一旦楚庄王去世了，一切都存在变数。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楚庄王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楚共王还不到十岁，这种“主少国疑”的状况在那个时代是权臣窃取君主权力的最佳时机。事实上，楚共王即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大权也的确是被令尹和司马所把持，使得楚国几乎重蹈了中原国家“卿大逼君”的覆辙。申公巫臣出奔的时间，恰恰是楚共王即位的第二年，这两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确很富有想象的空间。

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巫臣出奔后的事态发展。参与后来事变的不仅仅有子重、子反，还有当时的国之重臣沈尹与执行晋楚弭兵的王子罢；被杀的也不只是巫臣之族的子闾、子荡，还牵连到了清尹弗忌、连尹黑要。从斗争

的规模上看，这还哪里是私人恩怨，分明是两派敌对势力之间的火拼。主导这场火拼的主角正是令尹子重，司马子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从犯，而因陷入桃色风波流传千古的夏姬，不过是恰好路过，不小心成了陪衬剧情的花边新闻主角而已。

不管是因为什么让他们不惜一切做出如此惨烈的屠杀，申公巫臣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眼见情势危急，他也只能“借船出海”，流亡他国，而那些没来得及带走的族人和盟友则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胜利者屠戮殆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深仇大恨，申公巫臣在晋国立足之后便发下了毒誓，一定要让子重和子反二人疲于奔命而死。于是乎，春秋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场外交活动由此闪亮登场。

凿通勾吴

晋景公十六年（前584年），郟国与吴国结盟的消息传来，在晋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扬言讨伐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年夏秋之交，在晋国居住了五年的申公巫臣突然找到了晋景公，决定以他在楚为官多年的经验以及对吴楚关系的了解，为晋国开辟一片新的疆土，尝试一种新的可能。

巫臣的想法很大胆，思路也很新颖。晋景公尽管并不清楚这会给晋国带来什么，但还是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让他试一试。巫臣就这样带着晋国的期许，信心满满的同时又满怀忧虑地领着两之一卒（也即兵车三十乘）踏上了去往吴国的漫漫旅途。

联结晋吴是一项充满了风险和挑战的系统性工程。在前往吴国的路上，巫臣还对途经各国的防御情况进行查探，其目的大概也是为了防止楚国出兵阻断交通要道，让晋吴结盟的大业无法付诸实施。可当他走到了中原文化圈

的边缘，对“东夷”地区进行一番查探后却发现，这些边缘地带的城防状况和应急能力简直惨不忍睹。

有一次，站在莒国护城河的岸边，他有意无意地提醒渠丘公：“你的城墙该修一修了。”谁料对方根本没有当回事：“我们不过是一个边辟小国，身处蛮荒之地，又有谁会想不开来打我们的主意呢？”

“当然有。”巫臣在心里默念道，但他并没有说出来，而是朝着远方看去，意味深长地说道：“正是因为想要开疆拓土的野心家很多，才会有这么多大国立于天地之间。受到觊觎的小国，有的会加强防备，可也有很多不以为然。我听说就算是桀骜不驯的匹夫，到了夜里也会锁好门窗，更何况是一个国家呢？”

巫臣的担心很快就应验了。在他去往吴国后不久，楚国人果然杀上门来，大军围困莒国的渠丘。莒国人既没有坚固的城防，也没有应战的智慧，非要阵前逞能杀掉了楚国公子平，结果群情激奋的楚军仅仅用了十二天的时间就连续拿下渠丘、杀入莒城、攻破郚城，把莒国掀了个天翻地覆。

至于申公巫臣，在离开莒国后便如泥牛入海，再也没了消息。人们只是听说，在吴国他受到了吴王寿梦的盛情款待，他也倾囊相授，向那些“夷人”传授了排兵布阵之法，教会了他们射箭驾御之术，还把自己的儿子狐庸留在吴国担任行人。

经过他的辛苦调教，这个习惯了在太湖泛舟的“野蛮国家”突然拥有了一支纪律严明、阵容豪华的战车部队。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们接连侵巢伐徐，兵临州来，征服了很多原本属于楚国的附庸，甚至对楚国自身安全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应对吴国的侵扰，令尹子重、司马子反就如救火队长一般疲于奔命，一年之中在中原和吴越之间跑了足足七个来回。申公巫臣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当年的誓言，他与夏姬的爱情故事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也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尽管申公巫臣“通吴于上国”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真实效果要到十几年后才真正发挥出来，现在就夸大其词言说其“疗效”未免言之过早。晋景公十八年（前582年）举行马陵会盟时，晋国本打算邀请吴国参会，怎奈吴国根本不赏脸。甚至多年以后，面对晋国一再盛情邀约，吴国都保持着一个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态度。而《左传》列举吴国侵扰楚国的诸多战争，有很多都是在巫臣抵达晋国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与晋国联吴制楚的战略方针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晋景公积极支持申公巫臣的联吴计划，从根本上反映了他对楚国的不信任态度，这也意味着他与楚议和的诚意要打很大的折扣。更重要的是，不论其倡导和平的初心为何，一个宏大的计划一旦出台，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不再受创造者所控制。它会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与周遭的一切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从而变成一副完全不同的模样。

晋景公去世后，他所倡议的一系列鸿篇巨制在众多野心家的推动下，终于演变成了很大的一盘棋，晋楚弭兵与秦晋议和相互成就又相互影响，变成了一个拆分秦楚联盟、对其各个击破的组合利器。当一切尘埃落定，秦晋之间的协议就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晋国也抛弃坚持近三十年的封堵政策，决定向秦国宣战了。

第三节 战云纷飞

吕相绝秦

晋厉公三年（前578年）四月初五日，晋国使者魏相（又名吕相）突然气势汹汹地来到雍城，激情洋溢地向秦国君臣宣读了一篇震古烁今的外交宣言《绝秦书》，正式宣告与秦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

这段长达八百多字的檄文，回顾了从晋献公以来秦晋之间的一系列冲突，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无非是把秦晋近几十年来交恶的所有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推到秦国身上。其中，一旦遇到晋国有理的事情，吕相就会大肆渲染，比如著名的崤之战是因秦穆公偷袭郑国而起，吕相就指责说：“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左传·战公十三年》），简直是罪恶滔天，不讨伐不足以平民愤。遇到理亏的事情，吕相也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比如说众所周知的令狐之战，本来是赵盾邀请在先，秦康公护送公子雍在后，到了吕相这里就成了秦康公“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简直是无礼至极，让人忍无可忍。

除此之外，吕相还用了近半篇幅重点回顾了夹河之盟的有关细节。按照他的说法，秦晋会盟本是晋景公即位初期就打算要做的事，晋国人一直翘首期盼，希望秦国能来“安抚”晋国。可偏偏秦桓公狼子野心，不但对晋国伸出的橄榄枝不予理睬，反而还利用晋国讨伐“赤狄”的机会大举入侵。

吕相这里列举的历史事件，是发生在晋景公六年（前594年）的“辅氏之战”。当时晋国刚刚在邲之战中损兵折将，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了调解国内矛盾，晋景公命荀林父带兵讨伐“赤狄潞氏”。秦桓公趁晋国内部

空虚，于当年六月发兵大举进犯，横扫河、箕、郃等地。可让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的是，晋国的强大并不仅是国家力量的强大，更在于地方势力的不断深耕。秦桓公在辅氏驻扎没多久，就被地方封君魏颗带领的私人武装所击败，可谓颜面丧尽，只好灰溜溜地撤军回国。

辅氏之战极大地打击了秦国人的信心，秦晋边境这才享受了十年的安宁。到下宫之役后的晋景公十八年（前582年），他们才又趁着晋国内困外忧的机会，策反了“白狄”，与之合兵入侵晋国本土。

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恰好是启动弭兵谈判的起始年，晋国并没有对秦国采取报复手段，反而是借着秦国派医缓来给晋景公看病的机会，重新启动了与秦国和谈的步伐。而据吕相的说辞，当时秦桓公对战祸的蔓延感到后悔，曾派自己的儿子伯车（公子针，又称后子）出面议和，说要与晋国“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晋景公大人有大量、不计前嫌，同意了请求，但因为重病缠身，事情还没谈成就去世了，这才把会盟时间拖到晋厉公即位之后。

到晋厉公元年（前580年），两国议和之事在楚国与宋国的合力推动下，终于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双方一致同意于当年冬天举行高级别的“首脑会晤”，共同开启“秦晋之好”的新篇章。

秦晋会盟的准备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起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然而当会盟那一天真的到来时，意想不到的麻烦终于还是出现了。其中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晋国选择的会盟地点在河东一个叫令狐的地方，恰好就是当年赵盾夜袭秦军的令狐之战发生地。我们无法确知晋国人选择会盟地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但由此给秦桓公带来的心理暗示却是显而易见的，这让他

很难相信晋国人的诚意。因此，当晋厉公在令狐苦苦等待对方前来的时候，秦桓公却在黄河西岸的王城驻扎，迟迟不肯渡河。

会盟还没有开始，双方互信的基础就已动摇。无奈之下，晋厉公只好与秦国使者史黶在令狐结盟，随后又派卻犇为使西渡黄河，到王城与秦桓公举行盟誓，一场备受瞩目的“和平会议”就以这种方式莫名其妙地收场了。

谈起这次虎头蛇尾的秦晋会盟，不仅是友邦感到莫名惊诧，连晋国人也感到惶恐万分。组织晋楚弭兵的晋国卿大夫士燮更是表示：“斋戒盟誓的本意是用以展示互信的，而选择一个合适的会盟地点是建立互信的开始。假如从一开始就抱着互不信任的态度，再做什么也都徒劳无益，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会盟有什么意义！”

这次毫无互信基础的盟会，因在黄河两岸分别举行，因此又被称为“夹河之盟”。按照《左传》的说法，会盟结束后，秦桓公刚一回国就背弃了盟约。至于是怎么背弃盟约的，又搞了哪些小动作来破坏两国关系，《左传》只是泛泛地提到，说秦国准备发动“狄人”和楚国进攻晋国，结果反而使得诸侯与晋国更加和睦。

秦桓公在晋楚弭兵的关键节点上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吕相当然不会放过对其大加挞伐的机会。

在吕相看来，秦国议和根本就是动机不纯，利用晋国人的淳朴善良结成盟约，背后却另有盘算。盟约墨迹未干，他们就怂恿晋国一起出兵讨伐“白狄”，背地里却向“白狄”告晋国的黑状，试图离间晋国与“白狄”之间坚不可摧的亲戚关系，要不是“白狄”之君深明大义，这事还真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仅如此，秦国还恶意挑唆晋楚之间的关系。当时晋楚两国本来是要结盟的，可秦国偏偏要唆使楚国背叛盟约，还好楚王是个正直君子，最厌恶的就是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伎俩，这才把事情和盘托出，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

最后，吕相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转述了晋厉公的谴责之言，说：“诸侯听闻此事，都为执事的作为感到痛心疾首，他们都摩拳擦掌地来找寡人，说一定要跟您讲个明白。寡人实在众意难违，只好带着诸侯前来听命，完全是为了请求盟好。如果执事能够顾念诸侯的感受，体谅寡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允许与我们缔结盟约，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如果非要一意孤行，寡人是实在才能有限，没有办法命令诸侯退兵。寡人不善言辞，说的话可能不太中听，但都是肺腑之言，希望执事慎重考虑。”

吕相的这番演讲可谓气势磅礴、振聋发聩。假如我们手上只有这么一份史料可供查阅的话，恐怕秦国人背信弃义的恶名真就永远都洗不掉了。外交辞令多有夸大不实之处，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并适当取舍。但总之，实际上早在吕相使秦之前，晋厉公就已经安排郤锜出使列国，将秦桓公背弃盟约的消息散布到了中原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并号召诸侯起师共同伐秦。

在那个时代，强权就是公理。晋国既然理据充分，诸侯当然要一呼百应。很快齐、鲁、宋、郑、卫、曹、邾、滕等国便积极响应号召，会同晋军及王室的刘康公、成肃公一起讨伐秦国。

吕相发表《绝秦书》一个月后，也即这年五月初四日，双方在如今西安北部泾阳境内的麻隧相遇。势单力薄的秦军独力面对声势浩大的联军，其结果自然也毫无悬念。秦军一战即溃，以至于连秦桓公的贴身车右不更女父都

成了晋军的俘虏。在击败秦军主力后，联军乘胜追击，在泾水西岸一路掩杀，一直打到了侯丽（今陕西礼泉境内）才停下脚步。

子反背盟

麻隧之战后，诸侯联军深入黄河以西达一百七十公里，打到了距离雍都不足一百公里的地方，这堪与当年鞏之战横扫齐国取得的战果一比，秦国由此受到的重创可想而知。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楚国这才回过味来。当年晋景公放回钟仪提出要与楚国休战的时候，他们不是没有疑心过，想不通晋国为什么要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服软，如今才算是看明白了。

邲之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晋国先是集中精力消灭了盘踞东山的“赤狄”，又以鞏之战的胜利将齐国积聚多年的财富一扫而空，彻底熄灭了齐顷公试图挑战霸权的野心。如今他们更是以弭兵协议将楚国架空于事态之外，楚国眼看自己最坚定的盟友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在中原列强铁蹄下备受蹂躏，却只能隔岸观火，什么都做不了。

晋国用近二十年的时间将威胁其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一一清除，将混乱的列国关系条分缕析、一一理顺，每一步都走得恰如其分，每一招都足以让人久久回味。每念及此，楚国人不免胆寒：在解决了一系列的难题之后，唯一能够对晋国构成挑战的还能有谁呢？他们又会用什么方式来对待楚国呢？

的确，于晋景公而言，他在提出弭兵倡议之时，是真心想要消弭战祸，以便为缓解国内的矛盾争取时间。晋国国内不少大夫，比如参与推动弭兵会盟的士燮和卻至，也都是真心实意地想要促成此事。

然而，对于国内的主战派而言，弭兵会盟只是分化瓦解秦楚联盟并对其各个击破的一个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在剪除齐、秦的挑战和威胁之后，早年因赵盾骄横跋扈、四处树敌而给晋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已基本消除。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必然是要向楚国动武，以彻底稳固晋国在中原的霸权。

而对于楚国来说，如今局势越来越朝着对晋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了，“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当前局势下，最好的办法是或许也学一学他们的先君楚庄王，韬光养晦以待时机，而不是贸然打破两国之间的和议。然而对于那些醉心于权力的政客来说，政治斗争的成败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楚国内部这一轮的政治斗争始于楚庄王去世后，当时楚共王年幼不能理政，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趁机垄断军政大权，并借此打击政敌、清除异己。在联手驱逐了申公巫臣之后，两个亲密无间的兄弟又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其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楚国的政策走向也忽左忽右，全然没有了章法。

楚国向来以令尹为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子重也的确在内外事务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以此推动了晋楚之间的第一次弭兵会盟。但作为子重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司马子反对此却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只是由于当时受到了来自吴国的频繁侵扰，子反分身乏术，只好勉强同意了弭兵的动议。如今吴国的威胁暂时得到了缓解，他自然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将是否遵守弭兵会盟的协议作为他与子重之间斗争的砝码。

也正因为如此，当郤至代表晋国前往楚国聘问的时候，司马子反才会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但如此行事毕竟不妥，正如当初邲之战时先穀的强横蛮干，司马子反的举动显然是将楚国内部不和的信号传递给了对

方。只不过，不同于先穀的外强中干，司马子反毕竟掌军多年，到最后终于压住了子重，抢到了楚国政坛的第一把交椅。

这个时候正是晋厉公五年（前576年），也就是弭兵会盟的三年后，司马子反拨开云雾见月明，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在掌握了朝政大权之后，司马子反首先要做的就是推翻子重的决议，撕毁弭兵协议，向北方用兵。

子反的态度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比如当时楚国名士申叔时就曾表示：“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左传·成公十六年》）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是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法、信用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仅凭你一腔热血逞一时之快，而对人民的诉求不管不顾，对天下大势不理不睬，对天灾人祸无动于衷，对已经签订的盟约置若罔闻，老百姓怎么可能拥护你，士兵们怎么可能和你同仇敌忾，战争又如何能够取得胜利？

但不论旁人如何劝说，子反还是一意孤行，吹响了北伐的号角。眼见自己无法说动子反，申叔时也只能慨然叹道：“你尽力去做吧，我恐怕是不会再见到你了！”

战火复燃

司马子反的北上战略与老一代的做法并无二致，依然是先以郑国作为突破口，然后东进伐取宋国，以逼迫晋国出手。一旦在中原打败了晋国，就可以以宋国为跳板，进一步争取齐、鲁、卫等国，完成楚国饮马黄河的夙愿。然而由于楚国背弃盟约，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其最初的进展并不顺利。

晋厉公五年（前576年）夏，楚军大举北上，入侵郑国，一直打到了黄河北岸的暴隧（今河南原阳），随后又向东南进军侵入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睢县）。郑国仗着晋国的保护，坚决反击，并出兵侵入楚国境内占领了新石（今河南叶县）。

司马子反偷鸡不成蚀把米，率军回国之后决定转变策略，从威逼改为利诱。他抓住了郑、许百年冲突这样一个老大难问题，将许国整体内迁至叶地，等于是把郑国一直垂涎的许地拱手相让。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拉拢郑国，还将邻近旧许的汝阴之田送给郑国，以换取郑国的结盟。

楚国下了这么大的血本，郑国要再不领情那就真说不过去了，于是双方便于晋厉公六年（前575年）春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北）结盟。不久后，郑国就在楚国的指使下入侵宋国，郑军在先败一阵的情况下尾随并伏击宋军，俘获其主帅将鉏、乐惧，这也标志着第一次弭兵协议的成果彻底破产了。

楚国公然背弃盟约中断和平进程的举动，很快就在中原引起了轩然大波，晋国即便是再不情愿也不能对此置若罔闻。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晋厉公决定出兵讨伐郑国。但在此时，晋国内部却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第一个反对出兵的是时任下军将韩厥。去年子反讨伐郑国的时候，栾书有意出兵报复，韩厥就出面劝阻说，子反如此意气用事，必然会外失诸侯、内失民心，与其出兵抵御，倒不如让他得偿所愿从而加重其罪过，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自食苦果了。

而相比于韩厥，时任中军佐士燮的态度则更为激烈。他主要是着眼于国内的局势，认为如果诸侯都叛离而去，国内各方势力迫于外部压力还会有所

收敛，这对于晋国反而是好事。否则的话，一旦国外的压力不复存在，暗潮汹涌的内部争斗就会全面爆发，这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士燮对祸乱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因此即便是大军已经开拔到了战场之上，他依然不改初衷，对主战者苦苦相劝。可惜任凭士燮磨破了嘴皮子，主战的将领始终都不肯听从。此时担任中军元帅的栾书更是坚决回应道：“绝对不允许在我等主政的时候失去诸侯！”

为了准备这场必将到来的大战，栾书先是于晋厉公五年（前576年）冬邀合齐、宋、鲁、卫、郑诸国执政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与吴国举行盟会，计划从东、北两个方向压制楚国。第二年郑国叛晋之后，又派新军将郤犇去卫国和齐国，派栾黶到鲁国，联络东方诸侯要求共同出兵伐郑。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晋国大军于晋厉公六年（前575年）四月十二日出兵，南渡黄河直逼郑国而去。到六月底，晋楚双方在郑国南部的鄢陵（今属河南）相遇。继城濮之战与邲之战后，决定晋楚实力消长的第三次大规模会战——鄢陵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四节 鄢陵之战

楚有六间

晋厉公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清晨，当晋军将士还在晨光熹微中酣睡的时候，响亮的号角声便已经从不远处悠扬而至，紧接着便听到如雷如震的车轮声和凝重有力的脚步声正向大营靠近。各军将佐穿戴起厚重的甲冑出门探望，但见在高高扬起的尘土中，排列整齐的楚军方阵已经直压晋军大营列开阵势，完全没有给晋军布阵留下任何空间。

战争还未打响对方就先声夺人，这在晋军当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面对如此危局，中军将栾书一面命人严防死守，一面召集众卿入帐商议对策。

士燮的儿子士匄是个急性子，众人都还未发声，他便已快步上前提议说：“既如此，那我们就填井平灶，直接在军营中布阵，把行列间的距离放宽，再与楚军对决。晋、楚两国都是上天赐予的，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

士匄的话还没说完，士燮就顾不得什么脸面，从军士手中夺了一支戈去追打自己的儿子，一边追还一边喊：“国家存亡都是天意，你一个小娃娃瞎掺和什么？”

鉴于楚军气势正盛，且诸侯援军还未赶来，栾书也无意与楚军速战，于是就顺着士燮的意思说道：“楚军如此轻佻，只要加固营垒拒不出战，三日之内他们必然会退却。到时我们趁机追击敌军，就一定可以取胜。”

栾书的话音未落，就遭到新军佐卻至的反驳：“依我看，楚军有六个必败的理由，我们不可以坐失良机。”卻至所列出的“六间”，主要是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个角度，是说楚王用人不善。首先，担任统帅的司马子反和令尹子重平日里就互相厌恶，到了战场上就互相拆台，这就很容易让下属无所适从。其次，楚军的亲兵用的都是旧族，但旧家子弟未必就是强兵。郤至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是楚庄王在位时期采用的制度。当时楚国刚刚根除了盘踞朝堂多年的若敖氏，这些长期受到冷落的“亲”和“旧”一朝扬眉吐气，都有着很强的战斗力。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时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楚人却依旧拘泥于二十多年前的用人制度，未免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第二个角度是从军纪上找问题。郤至指出，参与战斗的郑国军队虽然列了阵但并不齐整，而“蛮族”的军队则根本就没有阵形可言。士兵在阵列中不停喧闹，各阵式互相联合的时候喧嚣更甚，各军之间互相观望，且缺乏战斗意志，这样的乌合之众显然也不足为虑。

最后一条，则是与当时的观念有关。古人认为每月最后一天的“晦日”是不吉利的，这一天不仅不能打仗，就连单纯的行军都不可以。楚人选择布阵时间不避讳月末，这是不懂天时，因此必败无疑。

另外《国语》中记载，郤至在夸耀自己的战功时又提出了“楚有五败”，分别是：背弃宋国的盟约；德行不足却以土地贿赂诸侯；不能用精壮之士反用懦弱幼稚之人；设置辅臣却不听谏言；军纪散乱。而晋国则刚好与之相反，有五个必胜的理由，也即“五胜”，分别是：开战责任不在晋国，所以理直气壮；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各军统帅精明强干；军队纪律严明；诸侯都站在晋国一边。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还不加以利用，那就真是白费了上天对晋国的眷顾，因此他强烈要求在营中列阵。

巢车对答

正当晋军上下互相争执的时候，楚共王早已亲自登上了楼车，在距离营垒不远的地方俯瞰他们的一举一动。他就如同球赛的解说员一般，不停地将对方动态向全军进行现场直播，从晋国逃亡到楚的大臣伯州犁则站在楼车下面，对其行动的具体原理进行详细解说。

早在晋军将佐入帐商议之前，楚共王便已看到晋军战车来回穿梭煞是热闹，于是惊呼道：“战车在营地左右驰骋，这是在做什么？”

伯州犁解释说：“这是在传令召集军官议事。”

过了片刻，果然看到有人陆续走出营帐，向中军大帐聚集。楚共王便又惊呼：“都聚集在中军了！”

伯州犁不紧不慢地说：“这是要谋议军机了。”

伯州犁进行这番解说时，正是郤至提出“楚有六间”的时候。晋军内部否决了栾书固垒以待的方针，听从了郤至的提议，决定要与楚军展开决战。大事商议已定，便进入了开战前的一系列程序，见此情景，楚共王高声喊道：“他们把幕布张开了！”

“这是要在先君神主前进行占卜。”

“幕布又撤了！”

“要准备发布命令了。”

“现在营中无比喧闹，而且还尘土飞扬的，寡人也看不清他们在做什么！”

“那就是要填井夷灶，准备在营内布阵了。”

楚共王饶有兴致地站在高处，俯瞰晋军在滚滚烟尘中挥铲扬镐、清理阵地，又耐心地等着他们套上车马、排成队形。忙活了半天终于看到他们都上了战车，本以为就要开战了，谁知车左和车右又带着兵器跳了下来，对此他感到很是不解。

“这是要宣布作战号令。”伯州犁解释道。

“哦！”楚共王将信将疑，片刻之后又追问道，“发布命令之后是不是就要开始作战了？”

“不一定！”伯州犁不慌不忙地回答。

“号令宣布完毕，左右都上车了，接下来……咦？怎么又下车了？”

“这是要进行战前祈祷。”

伯州犁是晋景公宠臣伯宗的儿子，去年其父亲受到“三郤”的迫害而死，他只得在毕阳的保护下投奔楚国，因此对晋军部署了如指掌。他在楼车下不仅把晋军战前动员的细节解说得一清二楚，还把晋厉公的亲兵构成告诉了楚共王。而在晋军中，也同样有一个了解楚军内情的人，把楚共王亲兵的情况告诉了晋厉公，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苗贲皇。

苗贲皇原是若敖氏末代令尹斗越椒的儿子，皋浒之战后因在楚国无法立足，遂只身投奔晋国并被封到苗邑，因此便以苗为氏。苗贲皇也是极负盛名的贤臣，在鞏之战前曾劝说晋景公释放齐国的使者，并指责郤克“勇而不知礼，矜其伐而耻国君”。鄢陵之战中，他更是提供了楚国中军不少细节信息，且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不少人认为楚国中军人才济济，且军阵厚实，担心难以抵御，苗贲皇根据自己对楚国的了解献计说：“楚国的精兵不过就是中军的王族而已，左右两翼往往都很脆弱。如果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攻打其两翼，等左右军溃退之后，再集中力量攻打中军，就一定能够取胜。”

好整以暇

战争开始后，晋军依据苗贲皇的计策，对楚军展开了强大攻势，很快就将其左右两翼打散了。负责屏卫中军的郑成公无法抵御，只得狼狈奔逃。偏巧在逃奔途中，遇到了鞏之战中差点俘虏了齐顷公的晋军司马韩厥。

郑成公的御戎石首惊慌失措，驾车时屡屡回头张望，这个动作恰好又被担任韩厥御戎的杜溷罗看到，杜溷罗于是便嚷道：“郑君的御戎惊慌失措，注意力不在马上，追上他们根本不是问题！”

往日情景再浮现，韩厥内心也有颇多感慨，急忙喝止道：“之前我就差点羞辱了齐国国君，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于是就舍弃了郑成公，转而去追击其他人。

过了没多久，新军佐郤至也遇到了郑成公，他的车右蒯翰胡也很兴奋，建议说：“我们派一辆轻车从小道上阻击，咱们从后方追上去，前后夹击，必能生擒郑伯！”

郤至也不想辱没国君，回答说：“伤害国君是有违礼法的，我们不要追了！”

韩厥和郤至不想辱没郑君，可不代表其他人也都有这个觉悟。连续的追击把郑成公吓得够呛，也让他的御戎和车右感到心惊胆战。为了逃避晋军，御戎石首首先提出：“以前卫懿公逃亡时，由于不愿丢弃旌旗，结果在荧地

战败身死。”意思是说，国君的名誉固然重要，可若是因此而丢掉了性命，恐怕受辱更甚。于是他就把旗子收起来放在装弓箭的袋子里，好让这辆载着国君的战车不那么显眼。尽管如此，不少晋军将士还是穷追不舍，担任车右的唐苟为了保护国君只好留下来断后，最终战死沙场。

晋人集中兵力攻打楚军两翼，很快就取得了突破。战争开启不多时，全军便直逼中军而来。

两军贵族在大战之中也不忘君臣之间的礼仪。身为晋国新军佐的郤至在战场上多次与楚共王的亲兵遭遇，每当遇到楚王，他都会下车脱帽行礼。楚共王也不失礼，在避过晋军锋芒之后不住地赞叹说：“刚才战事激烈的时候，有一位身穿红色甲冑的人，见到不谷便远远地趋拜行礼，真是个君子啊！”为了表示答谢，他特意派工尹襄带着一张弓前去问候他是否受伤。

在会见楚王使者时，郤至依旧恭敬如一。他脱下头盔向使者致敬，并回应说：“外臣郤至跟随寡君作战，身披甲冑，不便拜谢贵君之命。但劳请使者回禀，郤至并未受伤，感谢贵君的关爱。”随后向使者行肃拜之礼。

栾书的小儿子栾针担任晋厉公的车右，在战场上看到一面大旗频繁往来，便对晋厉公说道：“楚人都说那面旗子是令尹的旌旗，车上的那个人恐怕就是子重吧。当年臣出使楚国的时候，子重曾问道：‘晋国的勇武表现在什么地方？’臣回答说：‘好以众整。’他又问：‘还有呢？’臣回答说：‘好以暇。’”

栾针所说的“好以众整，好以暇”，正是成语“好整以暇”的最初来源。所谓“好以众整”是说晋国军队的强大勇武，靠的不是单打独斗、好狠斗勇，也不是人多势众，而是严明的纪律和按部就班的行事作风；“好以暇”是说就算事情再多再杂乱也不会惊慌失措，能够从容不迫、沉着应对。

正是因为有着严整有序、从容不迫的优良作风，晋国才能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脱颖而出，并最终摘取中原霸主的桂冠。

“而如今，”栾针紧接着说道，“两国兵戎相见却不派使节，就不能说是按部就班；处理政事不能信守承诺，也不能说是从容不迫。因此臣请求遣使向子重敬酒。”

栾针的建议得到了晋厉公的允准。于是乎在打得昏天黑地的战场上，晋国的使者从刀光剑影中穿行而过，将上好的美酒送到了子重的手里，并诚挚地向他表示问候：“寡君身边没有得力的助手，让栾针持矛侍奉左右，因此不能亲自前来犒赏您的随从，特派某前来代他向您敬酒。”

子重手捧美酒，也恭敬地回应说：“夫子在楚国时曾与我有过一番谈话，今天竟然特意为此赠予美酒，果然是信守承诺的君子啊。”说罢便举杯一饮而尽，在使者退出后继续击鼓指挥作战。

敌对双方君臣在战场上你来我往，也算得上是一道奇观。不过外交礼仪与军事规则毕竟是不相容的，若人人都如此礼尚往来，战场就变成了团拜会的现场，战争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谓“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对政治、军事的认识也有着天壤之别。那些业已身居高位的人，往往对朝堂上的名分更为看重，血肉横飞的战场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是他们纵横捭阖的另一个舞台；而身份低微的人无法为肉食者谋，就只能在战场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取荣华富贵。

比如，当韩厥还只是三军司马的时候，他会为了建立功勋而不惜一切，可一旦入阁为卿，便开始对辱没国君的事情忌惮起来，哪怕是敌国之君就在

眼前，也不愿意因急于建功而惹人非议。也正因为如此，当韩厥和郤至放走了郑成公，当郤至和栾针与对方君臣礼尚往来的时候，那些素来奋勇的刚毅之士，却依旧在用鲜血染红的战袍为家族的兴盛而搏命，魏錡就是其中的代表。

魏錡射月

魏錡在史料中的首次出场，是在二十多年前的邲之战时，当时他求取公族大夫不得，因而与赵旃一起扰乱军行。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魏氏家族镇守西南，忠实地执行了封堵秦国的政策，有着辅氏一役大败秦军的光辉战绩，有吕相绝秦气势恢宏的外交宣言，可他们的身份与地位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跻身“公族大夫”行列的美梦依然遥遥无期。如今魏錡早已不再年轻，却也只能冲锋在前，最终还因此葬送了性命。

据说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夜，魏錡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自己射中了月亮，但一不留神却跌进了泥塘里。梦醒时分他呆坐了半晌，随后特意找人进行占卜。来人对梦境进行了一番推演后说：“以姬姓为太阳，那么月亮代表的就是异姓，你射中的月亮必是楚王无疑了。但是梦的后面，你自己跌进了泥塘，说明你此战一定会战死。”

到了作战的时候，魏錡拈弓搭箭一箭射出去，果然就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楚共王捂着鲜血直流的眼睛疼得哇哇直叫，他让人火速召来养由基，随手抽了两支箭让他为自己报仇。

养由基是个极负盛名的神箭手，有关箭法高超如百步穿杨、百发百中 etc. 成语，起初都是他的专属，甚至连后世飞将军李广射石的故事，都是借用养由基“射石饮羽”的典故而来。可在这鄢陵大战的当口，楚共王的眼睛都被人射瞎了，身为臣子的养由基却有些犹豫。

原来就在前一天，养由基和潘尪的儿子潘党一起比赛射箭，一箭射透了七层犀甲。他得意扬扬地拿着被射穿的犀甲去楚共王面前显摆，说：“国君有我们这样的臣子在，还有什么可怕的！”

但在楚共王眼里，身为将军就要有个将军的样子，如果仅仅得意于一技之长，忘记了自身本来的职责，于公于私都是很危险的。因此他当场就给养由基泼了一盆冷水，劈头盖脸地骂道：“真给我们楚国丢脸，明天早上开始作战，你们就会死在这武艺上！”

因为楚共王这一通臭骂，养由基内心怨恨，不论战场上局势如何风云突变，他都始终都不肯射出一箭。可如今国君捂着流血的眼睛给自己下了命令，哪怕有再多怨言，也总不好在这个时候置气，他悻悻地领走两支箭，出去只射一箭，便正中魏錡的脖子。可怜魏錡绞尽脑汁奔走一生，就这样一梦成讫，留下了一个光耀门楣而不得的遗憾，在鄢陵战场上中箭毙命了。

楚军夜遁

苗贲皇的计策为晋军取得完胜战绩奠定了坚实基础，魏錡“射月”的壮举又极大地摧毁了楚军的斗志，战争的结果不言自明。这场持续了一整天的战争，到了夜色朦胧的时候也渐渐步入了尾声。

楚军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且战且退，一直退到了一处险地，养由基却依然不肯射箭。大力士叔山冉独力难支，只好苦苦哀求养由基协助自己，这才击退了晋军的攻势。

在这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刀光剑影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可暗中的较量还在持续。楚军主帅司马子反让将领们“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晋国方面则是由苗贲皇发布通告，要求“搜乘

补卒，秣马厉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左传·成公十六年》）

如果粗看双方的措施，无非都是要补充兵员辎重、修缮车马器械，准备来日再战，其中并无太大的分别，但最后造成的结果却不大一样。晋国方面的反应只有四个字——“晋人患之”。与之相比，楚国方面的反应则相对激烈一些。

这其中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子反纯粹只是按部就班地安排休整事宜，并无更多的打算，晋国人打探到消息，也只是感到对方实力尚存仍可一战，即便有所担忧，这种情绪也只是局限于统兵的将领。而苗贲皇所做的显然要比子反更加深入，他在发布命令的时候，特意强调要厉兵秣马、饱食备战，对于伤病的情况一概不提，给人造成一种晋军并无太多伤亡损耗的假象。随后，他还故意放松了对俘虏的看守，让他们把这些信号带回去在军营中广为传播，以瓦解其再战的决心。

苗贲皇的连环计很快就产生了实效，大批俘虏回营带了同样的讯息，使得楚军上下人心惶惶，再无斗志。面对纷然众议，司马子反无计可施，只得借酒浇愁，等到楚共王发现事态不妙，急匆匆地召其商议的时候，他早已醉成了一摊烂泥，泼都泼不醒了。对此楚共王也只能感叹：“这是上天要让楚国失败啊！”说罢连夜拔营而去。

大军退到瑕地时，楚共王突然想起了城濮往事，担心子反自寻短见，急忙派人传话说：“先大夫子玉在城濮丧师之时，国君不在军中，战败之责理应由他一人承担。今次之战，都是不谷的过错，大夫不要太过自责！”

子反听到这番劝慰，内心感激，对王使再拜稽首道：“吾王若能赐臣一死，也算是成全了臣的名节。更何况今次之战军士败逃，本就是罪臣之过

啊！”

子反本就打定了以死谢罪的决心，可他的对手却还是不放心。共王的使者刚走，令尹子重就派人前去斥责：“当初让军队覆没的人，他的结果想必你也知道，该怎么做，你自己考虑吧！”

此时的司马子反已是心如死灰，面对昔日的政敌，他也只能淡然回应道：“就算没有先大夫的例子，就算你不来交代这些事情，我也不会贪生而忘义。因为我的原因导致丧师辱国，我又有何面目苟活于世呢？”说罢便从容赴死，结束了这充满血与火的一生。

第六章 从悼公复霸到第二次弭兵会盟

第一节 复霸战略

鄢陵之战是晋楚之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晋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厚积薄发，终于再胜楚国，一举洗刷了邲之战失败的耻辱，重新赢回了属于晋人的光荣与梦想。然而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让晋国霸业迅速振兴，反而因为外敌的衰弱而陷入了一场牵连甚广的内乱之中。

晋厉公七年（前574年）十二月，在中军元帅栾书的操纵和引导下，晋厉公的宠臣胥童、夷羊五、长鱼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车辕之役”，位居八卿之列的郤锜、郤犨、郤至列尸朝堂，就连中军元帅栾书和中军佐荀偃也被人拘押，几乎殒命。不久之后，在位仅七年的晋厉公又被栾书、荀偃派人劫杀，终于酿成了弑一君、杀四卿、亡一大夫的系列惨案。

内乱结束之后，寓居在成周的晋襄公后裔孙周被迎回国内，是为晋悼公。晋悼公即位之后，大力整肃国内政治生态，使得晋国内部环境发生了极大改观。在此基础上，他又调整了对列国的策略，并由此向复霸大业发起了最后冲击。

晋悼公的外交政策大体上延续了晋景公的战略思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创新，概括起来有四句话，那便是：巩宋安鲁、胁齐弱秦、联吴和戎、疲楚服郑。

巩固宋盟

晋国开始染指中原霸权的一百年间，其最忠实的盟友毫无疑问便是宋国。自宋襄公在泓水败北之后，宋国人始终都坚持“联晋却楚”的政策不动

摇，这种坚持几乎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地步，与郑国灵活多变的外交态度形成强烈反差。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楚人“郑昭宋聋”的说法。就是说宋国人顽固不化的样子就跟聋人一样，外面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权当没听见，可不像郑国人那样耳聪目明，善于听风辨音、察言观色。战国时期的不少寓言故事在讲到宋国人时，往往会赋予他们一个呆萌蠢笨的形象，毫无顾忌地向他们开起了“地图炮”。宋国人的这种鲜明特征，实际上也让他们成了判断晋楚双方力量强弱，以及晋国在中原影响力的一个风向标。

另一方面，宋国处在中原的十字路口，是扼守齐、楚交通，贯通晋国与东方鲁、邾、莒、杞等国联系的重要枢纽，宋国防线一旦失守，也往往意味着晋国中原战略的全面溃败。尤其是在“联吴抗楚”大战略的指导下，宋国又被赋予了联结晋吴的地位，其在中原事务中的权重也就更加显著了。

然而就在晋悼公即位的当口，宋国却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鄢陵之战的前一年，也即晋厉公五年（前576年）。当年宋共公去世，宋平公即位，宋国第一大势力集团“桓族”的首领司马荡泽想削弱公室的力量，于是就杀死了宋平公同母弟公子肥。出自“戴族”的执政华元无法阻挡叛乱，只好出奔晋国避难。华元在宋国地位崇高，且有协调晋楚弭兵之功，“桓族”左师鱼石担心他的出走会引发连锁反应，于是不顾盟友反对，星夜兼程，在黄河边上把华元请回国内。谁知华元刚一回国便兴师问罪，发动“戴族”的司徒华喜、“庄族”的司城公孙师率领族众攻杀司马荡泽，“桓族”五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逃到了楚国。

五大夫在国外住了三年，到晋悼公即位元年（前573年），楚国趁晋国内乱、新君初立的机会，指使并联合郑国侵宋，先后攻取了宋国的朝郟、城郛、幽丘、彭城，并将叛逃到楚的五大夫送到彭城。宋国不甘示弱，当即派“戴族”的司马老佐和司徒华喜率军平叛，可大军出师不利，司马老佐围攻彭城数月不下阵亡当场，还引来了楚军的救援和讨伐，华元只好向晋国求援。

这个时候，韩厥刚刚取代栾书成为正卿，正是需要立威之时，因此便倡议：“想求得别人的拥护，就一定要为其付出辛劳。成就霸业、安定疆土，就要从宋国开始了！”

晋悼公也深以为然，于是便亲自率军驻扎在台谷（今山西晋城），并派人到各国请求出兵。这年十二月，晋悼公邀宋平公、卫献公、邾宣公及齐、鲁两国大夫在虚朮（今河南延津）会盟，商讨救援宋国事宜。而韩厥则带兵赴宋，在靡角之谷和楚军相遇。楚人讨伐宋国的目的是想转移彭城的压力，遇到晋军之后也不作纠缠，径直撤军回国了。

到第二年周历正月，晋国依照虚朮盟约，联合宋、鲁、卫、曹、莒、邾、滕、薛八国组成联军，围攻彭城。不久，彭城投降，晋人将彭城五大夫带回囚禁在瓠丘（今山西垣曲），一场延续多年的内乱宣告平息。

晋悼公刚一即位就组织了一场大规模会战，在进一步巩固了晋宋同盟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晋国维护礼制的决心，使得其他诸侯更加顺服。

除此之外，彭城之战十年后，也即晋悼公十一年（前563年），晋国复霸大业已经接近尾声，诸侯在相地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盟会。为了笼络宋国，荀偃和士匄在盟会上提议伐取偃阳封给宋国大夫向戌。诸侯联军攻打偃阳的战争很是艰苦，向戌感到难以承受，因此建议将偃阳转赠给了宋君。尽管这场

战争起初并未得到上位者的首肯，但晋国不惜代价馈赠盟国的举动，还是让宋国感激涕零，更让两国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安抚鲁国

鲁国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作为周公后裔、周礼的直接继承者，鲁国在文化上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但与中原诸国的境遇类似，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缺乏扩张空间，也缺乏强大的武力，因此总是缺乏安全感。更让鲁国不安的是，紧邻的齐国是一个扩张欲极强的国家，为了能够制约齐国，鲁国通常会采取积极且具有鲜明导向的外交政策，那就是绝对不允许中原出现权力真空期。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极端矛盾的鲁国：一方面对楚国的态度很是傲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最早便是出自鲁国人对楚国的评价；而另一方面，一旦晋国无法对齐国形成制约，也会毫不犹豫地“非我族类”的楚国投怀送抱。

鲁国的这种外交性格，在邲之战前后体现得最是淋漓尽致，也因此给晋国留下了极坏的印象。特别是随着鞌之战后晋、齐关系逐渐转暖，晋国对鲁国的态度也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两国关系再次跌入了低谷。

在此期间，鲁国因为各种原因不敢公然背离盟约，可晋国却始终对其抱有不信任态度。为了向晋国做出解释，鲁成公于晋景公十九年（前581年）亲自赶赴晋国，却不料被扣留下来，直到晋国派往楚国的使者来伐回国后才得以释放。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鲁成公在晋国期间恰逢晋景公去世，晋人不由分说便让鲁成公为晋景公送葬。按照当时的礼制，诸侯国君去世，盟国只需要

派一名大夫前往吊唁，派一名卿去送葬即可，晋国此举无疑是在贬损鲁国国君，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破坏自然也是无法估量的。好在鲁成公被扣留时正好是晋楚弭兵的关键时期，有了会盟成果“护体”，鲁国也就不怎么计较这些旧账了。

此后的几年间，尽管有郤犏、郤锜的无礼举动，两国之间还是维持了几年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但到鄆陵之战后，晋卿郤犏卷入了鲁国内争，与叔孙侨如沆瀣一气，无端扣留鲁国执政季孙行父，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外交冲突。这场危机尽管在栾书和士燮的努力下得以化解，可终究还是将晋国政令不一的老毛病暴露了出来。

晋国内部不和，诸侯动辄得咎，对于晋国的忠诚度自然也就打了折扣，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并未随着晋厉公的死而有所减少。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晋悼公刚一即位，鲁成公就怀着满心忐忑再次踏上了朝见晋君的旅途。

让他意想不到的，这次的晋国之旅并未受到任何刁难，反而让他产生了一种如沐春风之感。晋悼公为了争取诸侯的支持，一改过去高高在上的姿态，与诸侯建立起平等的外交关系。如遇小国之君来朝，晋君不再像天子一般在都城接见，而是亲自到郊外迎接；各国使臣前来朝聘，晋国也尽可能地以礼相待，同时还会派专人对来访国进行回聘。但有征伐大事，晋国向各国请求援兵时，派去的使者都变得谦恭有礼，战事结束之后，他们还会特意派人去感谢出兵。

晋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让鲁成公彻底改变了对霸主的刻板印象，对这位新君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久之后杞桓公到鲁国朝见时，鲁成公就把自己的感受说了出来，杞桓公听后大喜过望，急忙收拾行李去往晋国朝见，还大张旗鼓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悼公。

鲁成公去世后，鲁襄公继位，晋国又特意派卿士荀罃前往聘问，显示出了对鲁国极大的尊重。悼公四年（前570年），年仅六岁的鲁襄公朝晋，在会见悼公时一时激动乱了礼数，竟然以稽首之礼相拜。这要放在过去，晋国人恐怕就笑纳了，可这一次担任襄礼的荀罃却辞谢不受，还说：“有天子在，寡君不敢接受如此大礼。”

看到晋悼公如此开明，鲁国人也就不再那么拘谨了，以前只敢私下里想一想的事情，现在也敢公开地提出来了。比如晋悼公五年（前569年），鲁襄公再次到晋国朝见，就破天荒地向盟主提出了一个请求，要把没有军赋的郕国划给鲁国作为附庸。晋国起初不肯，但在鲁国大夫仲孙蔑的一再请求下也不再坚持，终于还是让他们如愿以偿了。晋悼公对待诸侯的温和态度，终于让素来缺乏安全感的鲁国打消了左右摇摆的念头，成为晋国忠实的盟友和坚定的支持者。

胁齐入盟

在晋、楚角逐的战场上，齐国、秦国都属于和晋、楚体量相当的大国。对于晋国来说，他们虽然无缘晋级“决赛”跟自己争雄长，但其亲疏向背却能显著影响双方的强弱均势，因此也不敢太过轻慢。有鉴于两国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的差异以及对晋国国家安全影响程度不一，晋国对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也截然不同。

总体来说，秦国的强大会对晋国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两国之间的冲突也更为激烈。自河曲之战后，晋国对秦国封堵抑制的政策就已基本定型，在晋悼公时期也没有发生太大的转变。

至于齐国，与晋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也不会对晋国构成致命威胁，因此很少发生直接冲突。两国之间最主要的矛盾在于，作

为一个长期介入中原事务的东方强国，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原霸主，齐国的历代君主都有一个恢复往日荣耀的夙愿，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对晋国俯首称臣。只要晋国对外控制出现松懈，齐国就一定会跳出来挑战晋国的霸主地位。

对待这样的大国，晋国就像是放风筝一样，既不能放任他们坐大，从而挑战自己的权威，也不能逼得太紧，以免激起他们的叛逆心态。因此我们经常看到鲁、卫等国因为犯了一些小错误而受到惩戒，却很少看到齐国受到如此折辱。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刻意维护齐国的面子，晋国还不得不牺牲盟友的利益。

比如在晋景公时期，齐顷公趁着晋国新败的机会，与楚国联结意欲瓜分中原利益，晋国便组织诸侯联军发动了鞏之战。战后齐顷公向晋国服软，晋景公马上就转变立场与其称兄道弟，为此不惜冒着诸侯背离的风险，将鲁国的“汶阳之田”割让给齐国。

晋景公去世前后的十几年间，受益于弭兵会盟的成果以及晋国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晋、齐两国的关系还算融洽，此后晋国主导的几次战役，齐国也都积极参与。但鄢陵之战后，晋国内部忧患如山雨欲来，上至国君下至卿大夫都心不在焉，在国际事务上明显力不从心，终于酿成了一系列的惨案。而当“车辕之役”尘埃落定，看到被迎立回国的晋悼公又是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齐灵公的心思难免就不安分起来。

晋悼公元年（前573年），诸侯会盟于虚朮图谋安定宋国，齐国派大夫崔杼参会，但次年联军助宋伐彭城一役，他们却没有派兵参战，这种做法显然已经触碰到了晋国的底线。事后晋国谴责齐国背盟，齐灵公担心遭到声讨，只好派太子光到晋国为质，方才消除了晋国的怒火。

不过，齐国也是面服心不服，此后几年里仍然是小动作不断。比如晋悼公三年（前571年）刚一开春，齐国就擅自讨伐莱国；诸侯在戚地（今河南濮阳西北）会盟，齐国不仅自己不参会，还指使其附庸滕、薛、小邾等国也都缺席盟会。晋卿荀偃为此感到十分恼火，于是委托鲁国大夫仲孙蔑传话给齐国，让齐国派人到虎牢筑城，而且还警告说，如果实在请不动，晋国将会带着军队去请。齐国知道拗不过晋国，只好在当年冬天带着自己的附庸参与了戚地的第二次盟会。

可即便如此，齐灵公还是不肯服从。悼公四年（前570年）的鸡泽（今河北邯郸东）之盟，晋国派士匄到齐国请求盟会，齐灵公还是表现出一副很不乐意的样子。士匄于是便明言道：“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其言外之意是，齐国要不参会的话，就会成为诸侯要“谋”的“不协”。齐灵公犹豫再三，终究不敢与晋国撕破脸皮，只好与士匄在齐国郊外举行了会盟，并派太子光到鸡泽与各国国君举行盟誓。

齐国三次违背盟约，晋国都没有发兵讨伐，而是摆出了三顾茅庐的架势，连哄带吓、软硬兼施，终于让心思浮动的齐国人回心转意。到鸡泽会盟的时候，包括晋国在内的与会各国都是由国君亲自出席，唯有齐国是由太子光作为代表参加会盟。从这些安排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晋国对齐国的特别关注，也能体察出他们对于这样一个大国的宽容，这种待遇恐怕不是随便哪个国家就能享受到的。

吴入夏盟

围堵秦国、挟制齐国战略的实施，保证了晋国在与楚争霸时两翼的安定，避免了腹背受敌局面的出现；而为了在与楚国的对抗中占据主动，晋悼公还延续了晋景公“联吴制楚”的方略。

晋国与吴国的沟通，始于晋景公时期的巫臣使楚，不过在景、厉两朝，吴国对晋国的态度还不明确，甚至有时还存有敌意。比如晋景公十八年（前582年）春，晋国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期间特地邀请吴国参与盟会，吴王或许是对晋国突如其来的示好感到狐疑，因此并未赴会。一直到六年后，也即晋厉公五年（前576年）的十一月，晋国才如愿在钟离与吴国举行了第一次会盟，但会盟成果似乎并不理想，两国之间也没有形成合力。

鄢陵之战后，吴国曾趁着楚国新败，在舒庸的协助下入侵楚国，但很快就遭到了反击，引导吴国作乱的舒庸也被楚人灭国。

悼公四年（前570年），令尹子重重整旗鼓，亲自带精兵讨伐吴国，攻克要塞鸠兹（今安徽芜湖东南），一直打到衡山附近。初战告捷让子重有些自得，于是便派邓廖带兵侵袭吴国，不料被预先设伏的吴军拦腰斩断，遭遇惨败。主将邓廖被俘，所带兵马几乎被全歼，最后只有大概十分之一的人得以幸免。

为了掩饰战败，子重回国之后大张旗鼓地在太庙庆祝。可吴国人却不给他面子，仅仅三天后就追到了楚国境内，占领了重镇驾邑（今安徽无为）。如此一来，前方兵败的消息就再也掩盖不住了。子重受此刺激，郁郁不欢，不久之后就因心脏病突发而亡。

吴军胜楚的消息传到晋国，让晋悼公精神为之一振，于是就把搁置多年的“联吴制楚”策略重新摆上了台面。是年六月，晋国在鸡泽举行会盟，为表对吴国的重视，悼公特派荀会到淮上迎接吴王。可吴王似乎仍旧没有打消疑虑，会议延续了几个月，荀会也在淮水边上等了几个月，却一直都未能等到吴王的身影。更让晋悼公感到难堪的是，诸侯在鸡泽空等数月，吴王甚至连一句解释都没有，全然不给中原霸主留一点情面。

从晋景公时期开始，晋国派申公巫臣带着中原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理念援助吴国，向他们传授排兵布阵之法、射箭驾御之术，而当晋国需要的时候他们却百般推托，几次三番拒绝中原霸主的盛情邀约。可即便如此，晋国人仍旧保持着谦和的态度，甚至还要专门安排人去迎接，这种超高待遇恐怕让齐国看了都会萌生醋意。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放肆，在接受了大国馈赠的同时，还敢于一再跟堂堂中原霸主叫板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先秦历史中的一桩公案。在有关“假道伐虢”的章节中，我们曾介绍过吴国与周王室之间的关系。按照久远的传说，吴国虽地处荒僻之地，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姬姓诸侯国，始创之君正是出自周王室的太伯。

不过对于以上故事，历来就有不少学者持怀疑态度。太伯出奔时周人还只是岐丰地区的一个小部族，为了避位而去到千里之外的东海之滨，既无必要，也缺乏可操作性。而在太伯、仲雍死后，周人在承认吴国地位的同时，又跨越千山万水将他们的子孙分封到距离宗周不远的虞国，似乎也缺乏合理性。特别是有人还指出，“吴”和“虞”在古代音同字近很容易混淆，因此吴太伯所奔的吴国，很有可能就是山西平陆的虞国，有关吴王世系的传说，也极有可能是有人利用这一点牵强附会杜撰来的。那么，他们杜撰这个故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春秋时期，中原诸侯素来看重“华夷秩序”，在他们眼中，即便是与中原打了几百年交道且已发展出高度发达文化体系的楚国，也无法摆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蛮夷”身份，更何况是文化更加落后的吴国呢？当晋国想要接纳吴国加入华夏联盟的时候，其他中原诸侯却未必情愿，这种态度传递到吴国，难免也会让他们产生抗拒情绪，从而不愿以低人一等的姿态与诸夏合作。

晋国想要让诸侯与吴国互相接纳，化解双方之间的不合作情绪，就需要给他们创造一个交流的基础，有关太伯与吴国关系的说法，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期内各方互相妥协的结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晋悼公的民族包容政策针对的不仅仅是吴国，还包括许多过去不为夏盟所接纳的“东夷”小国。以往极少参加中原会盟的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自晋悼公时期开始频繁出现在会盟场合，在有关鲁国的史料中，也多次出现滕、邾、小邾等国君“始朝公”的记载。可见这些过去被视为“蛮夷”的国家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中原秩序中来，这就带来了一次民族融合的趋向。

总而言之，经过十几年的讨价还价，吴国终于从一个充斥着“野蛮”气息的“化外之邦”实现了华丽转身，一跃成为与中原大国地位平等的姬姓诸侯国。鸡泽会盟两年后（前568年），吴王寿梦郑重其事地派遣寿越到晋国，解释不能参加会盟的原因，并表达了与诸侯结好的愿望。晋悼公也顺水推舟，让鲁、卫等国先行在善道（今江苏盱眙）与之举行了会见，然后又一再叮嘱他们注意下次会盟的时间。

经过几个月的周密部署，吴国终于如约而至，参加了当年九月在卫国戚邑举行的列国会议；悼公十一年（前563年），诸侯又在柵地（今江苏邳州北）与吴王寿梦举行了会见，晋、吴、齐、鲁、郑、宋、卫、陈、曹、莒、邾、滕、薛、鄆十四诸侯会聚一堂，可谓盛况空前。这也标志着从晋景公十六年（前584年）开始实施的联吴策略，经历了约二十年的风雨波折后正式成型，晋国试图从侧面牵制楚国的意图也终于得以实现。

魏绛和戎

通过一系列内外政策的改革，晋国内部环境团结向上，外部联盟进一步稳固，战略联盟更加充实，霸业复兴也指日可待。正当晋国上下摩拳擦掌，意图在中原疆土上挥斥方遒的时候，从遥远的北方又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晋悼公五年（前569年），“北戎”无终国执政嘉父派遣孟乐到晋国，通过魏绛进献虎豹之皮作为礼物，请求与晋国讲和。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晋悼公认为这或许是“北戎”衰弱的信号，于是便对魏绛说：“戎狄贪婪无信、不讲礼义，与其跟他们讲和，倒不如趁机讨伐他们。”

此次前来求和的无终国是“白狄”的一支。从晋成公时期开始，晋国为封堵秦国东进，长期与“白狄”保持友好关系，甚至有时还会互通婚姻。但这些部族也时常会被秦国策反，转而成为威胁晋国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晋悼公并不愿意与之讲和，但魏绛却有不同意见，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因为我们的亲善态度，诸侯都依附于我，如今就连陈国也前来求和了。但是这些诸侯也都在看着我们的举动，如果我们依旧能保持善待诸侯的态度，他们自然会心悦诚服；反之如果我们对外跋扈，他们就会怀有二心。假如我们这个时候对戎狄用兵，一旦楚国趁机伐陈，我们没有过多精力救援，就等于是丢弃了陈国，中原诸侯也会因此而背叛我们。戎狄不过是化外之民，得到了戎狄却失去了华夏，这个账太不划算。”分析完局势后，魏绛突然又问了一句：“您没有听说过有穷国的后羿吗？”

悼公被这一问搞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于是反问道：“后羿怎么了？”

魏绛于是就讲了一段夏朝的故事：夏禹之子夏启杀害伯益建立夏朝，到他的儿子太康的时候，由于沉迷于声色犬马，不修政事，导致四夷背叛。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趁机兴起，掌握了夏朝政权，并扶植太康的弟弟仲康为

傀儡。仲康死后，其子相被后羿驱逐到斟寻氏和斟灌氏，帝位被后羿所得，这就是“太康失国”的来历。

然而一朝为君，后羿继承的似乎不仅仅是夏朝的帝位，更继承了太康声色犬马的毛病，篡位没多久就抛弃了身边的贤臣，信任一个被伯明氏驱逐的佞人寒浞代其打理政事。这个寒浞也是个善于逢迎的主儿，后羿箭术高超喜欢打猎，寒浞就投其所好让他专心打猎。后羿宠信后宫，寒浞就依靠这些女人吹枕边风，让他消息闭塞、麻痹大意。一心沉迷享乐的后羿满以为有了寒浞就能一切尽在掌握，却不知他的好帮手正在民间广施财物以收买人心，并最终夺取了政权。

到了这个时候，正在外打猎的后羿似乎还不相信，于是就准备回国看个究竟。没想到他身边的人也都被寒浞收买了，那些人把后羿杀掉之后，还把他的肉煮熟了让他的儿子吃，他的儿子不忍心，结果就被寒浞杀死在有穷国的城门口。

后羿一死，他的国家和后宫就全都被霸占了，后宫的妻妾们为寒浞生了一堆儿子，其中有两个分别叫作浇、豷。寒浞担心启的后人会反攻倒算，就派浇带兵灭了斟寻氏和斟灌氏，仲康之子相死于乱兵之中。所幸的是，相的妻子后缙刚怀了孩子，听到兵乱后从墙洞里爬了出去，逃回到娘家有仍氏避难，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少康。

少康据说很有才干，他在有仍氏的地盘上招兵买马准备复国，但似乎难以抵御寒浞之子浇的追杀，又逃到了有虞氏。少康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屡败屡战，最后终于在有虞氏以及夏朝旧臣的辅助下打败了有穷氏，恢复了夏朝的基业，史称“少康中兴”。

魏绛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表情凝重地对晋悼公说：“从前周朝的辛甲做太史的时候，命令百官必须劝诫天子的过失，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惨剧发生。《虞人之箴》里说过，辽远的夏禹遗迹被划分为九州，开通了许多大道，百姓有屋可以居住，有庙可以祭祀，而野兽也有他们丰美的水草。百姓安居乐业，野兽自得其乐，大家各得其所，互不干扰。然而后羿身居帝位，却总是贪恋打猎之乐，只想着飞禽走兽，却忘了国家的忧患。因此，身为一国之君，对于武力征讨不能看得过重，太重视武力对于国家的壮大并无裨益，希望您三思。”

魏绛主管的是山泽田原事务，因此在劝谏的时候“三句话不离本行”，把晋悼公说得泪流满面。晋悼公于是下令，从此以后寡人要勤勉于国事，外出狩猎不再随性而为，要按照时令，尊重自然。

当然了，这些都不是魏绛的本意。在他看来，“戎狄不过是化外之民而已”，他以后羿好猎而亡国作比，是要劝导晋悼公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统御诸夏之上，尽力稳固中原的联盟，而不是分心去讨伐“戎狄”。但晋悼公对此显然仍有顾虑，于是又问道：“难道除了与戎人讲和，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魏绛紧接着提出了跟“戎人”讲和有五个利好：“戎狄”逐水草而居，重财货而轻土地，我们可以用财货直接换取他们的土地，这是其一。“和戎”之后边境再无袭扰，百姓可以安心耕作生产，可以大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其二。“戎狄”侍奉晋国，这会对四邻诸侯产生震慑作用，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从我们，此为其三。其四，以和平的方式安抚“戎狄”，将士不必四处奔波，军械不会损坏，这对保持晋国国力大有裨益。其五，有鉴于后羿的教训，利用道德法度治理国家，处理与诸侯国的关系，可以重建晋国

的信用，自然会让远国来服而让邻国安心。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们为什么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呢？

魏绛的一番话着实打动了晋悼公那颗年轻而躁动的心，于是当即派魏绛与无终及各部“戎狄”讲和。在收服齐国、压制秦国的基础上，魏绛的“和戎”政策进一步巩固了晋国的后方安定，为晋悼公进取中原打造了坚实基础。

七年后，也即悼公十二年（前562年），经过多年的拉锯战，郑国终于放弃挣扎依附了晋国，这也标志着晋悼公的霸业达到了顶点。为了表示诚意，郑国向晋悼公赠送了盔甲武器齐备的各式兵车一百乘，同时还有配套齐全的两架歌钟，附赠精通音律的乐师三名，以及擅长歌舞的美女十六人。看到如此盛况，二十五岁的晋悼公不由对魏绛大发感慨：“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襄公十一年》）于是就将乐器美女中的一半赠送给了魏绛，让他分享此中的快乐。

魏绛一再推辞，说这都是国君的威严和大夫们的功劳，我实在不敢接受这样的赏赐。晋悼公坚持说：“如果没有你，寡人恐怕没有办法既安抚戎狄，又渡过黄河称雄天下，你还是接受吧！”

第二节 疲楚复霸

服郑安陈

晋厉公六年（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是晋楚之间三次大规模决战的最后一次，以楚军败退告终。然而与以往“唯强是服”的灵活态度不同，这次战争结束后，郑国并没有欣然依附晋国，反而因感念楚共王为救援自己而被射伤眼睛的恩情，成了楚国最坚定的支持者。

为了迫使郑国转变态度，战后晋厉公曾在宋国的沙随（今河南宁陵一带）举行会盟，号召诸侯伐郑。可让人意想不到的，郑国当国子罕竟然趁荀罃率领下军入侵陈、蔡未返的时机，于七月二十四日夜间发动突袭，导致齐、宋、卫三国溃不成军。不仅如此，到第二年（前574年）正月，郑国为政子驷（公子駮）还带兵入侵虚（今河南偃师）、滑两地，公然向晋国发起了挑战。

郑国的狂妄行径引起了诸侯的极大震动，卫国大夫北宫括率先出兵救援晋国，晋国也邀请王室大夫会合齐、鲁、宋、卫、曹、邾等诸侯伐郑，随后又在柯陵（今河南许昌南）举行会盟。郑人对此毫无畏惧，他们一早就将太子髡顽和大夫侯孺送到楚国做人质，楚国也投桃报李派公子成、公子寅带兵戍守郑国。等到诸侯前来讨伐的时候，令尹子重更是亲率大军救援，迫使联军退兵。到这年十月，联军再次包围郑国，又是在楚国大夫公子申的救援下退却。

彼时正是“车辕之役”爆发的前夜，晋国君卿大夫都在酝酿一场剧变，对中原事务很不用心，因此几次出征都没有什么成果。到晋厉公被杀后，楚人利用晋国君位交替的时机，指使郑国入侵宋国，并将叛逃的五大夫安置在

彭城。但他们没想到，晋国很快就恢复元气，并在韩厥的带领下平定了宋乱，甚至还乘胜追击连续侵陈伐郑，一度占据楚国的焦、夷两地（均在今安徽亳州一带）。楚、郑两国也不罢休，旋即对宋国展开报复，先后入侵吕、留两地（今江苏徐州、沛县附近），并占领犬丘（今河南永城）。几个回合下来，双方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晋悼公三年（前571年），郑成公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六卿要与晋国死磕到底。当时担任为政（六卿排位第二）的子驷有感于晋国兵力太盛，不太理解其用意，郑成公便解释说：“楚王为了救援寡人被射中了眼睛，如果背弃他，就等于是忘记了他们的功劳和自己的誓言，岂不是要让天下人唾弃？”

郑成公即位于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年），在他即位前后，郑国一改常态连续出兵讨伐许国，可见当时的郑国上下普遍蔓延着一股忧患意识，这与晋楚两国连年争霸造成的荼毒是分不开的。为了劝服郑国，楚共王先后两次拿出丰厚的财礼和土地贿赂郑成公，甚至还特地将许国内迁到楚地。这在郤至看来或许是“德薄”的表现，但比起晋国动辄以武力相逼，楚国的做法显然要更厚道些，也更符合郑人的内在需求。再加上鄢陵之战中，楚共王为了救援郑国而被射瞎了眼睛，这就让郑成公对楚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郑成公去世后，晋悼公派遣荀罃连续两次在戚地举行会盟，商讨对付郑国的办法。郑国大夫顶不住压力，于是都建议与晋国和解，但子驷秉持先君临终遗言，坚决不肯服从。郑国坚决依附楚国的态度让晋国很是作难，为了迫使他们服软，晋国采用了鲁国大夫仲孙蔑的建议，让诸侯联军在郑国西北重镇虎牢（位于今河南荥阳）筑城，并辅以重兵来遥制郑国。

在联军重兵的胁迫之下，郑国人日日提心吊胆，而正当他们不知该去向何方的时候，楚国内部却传递出了一些微妙的气息。先是右司马公子申，因

与令尹子重及子辛（公子壬夫）不和，被二人杀死；不久之后，令尹子重又因大意败于吴国，最后犯了心脏病去世；接替他即令尹大位的子辛对小国大肆盘剥，使得陈国不堪忍受，主动派大夫袁侨到鸡泽请求会盟。这一连串的事件把楚国内部集聚的矛盾都暴露了出来，也让一心想依附的郑国失去了靠山，只好顺势向诸侯举了白旗。

晋悼公四年（前570年）六月，晋国邀合诸侯在鸡泽举行会盟，与先后归附的陈、郑两国举行盟誓。面对突如其来的被动局面，楚国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先后派遣司马公子何忌、彭名两度率军侵陈，后来又指使顿国进行侵扰。但陈国始终不肯屈服，甚至还对顿国组织了一次反击。而晋国也以牙还牙，派荀莹带兵讨伐许国，以分散陈国所受到的压力。

到晋悼公六年（前568年），吴国也加入了进来，晋国的声势更加壮大，于是便邀集十三国诸侯在戚地举行了会盟。此次会盟的规模直逼二十年前的蜀之盟，且会盟的成果显然要比蜀之盟更加实在。

晋国在中原迅速扩张的势头让楚共王看了分外眼红，于是便派人到陈国去质问其叛离的原因。陈人如实告知，说是子辛贪欲太盛，楚共王一怒之下杀掉了子辛，任命子囊（公子贞）为令尹。

对于陈国可能的叛离，晋国实际上早有预料。上一年楚国大军包围陈国的时候，正卿韩厥就曾表示：“当初周文王带领背叛殷商的国家侍奉纣王，是因为他知道时机未到。可如今我们却反了过来，想要留住陈国，难啊！”

待到楚共王杀子辛而立子囊，晋国上军将士句也很务实地分析说：“陈国我们恐怕是保不住了！楚人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又立了子囊担任令尹，必然会改变子辛的所作所为，讨伐陈国也在情理之中。陈国迫近楚国而远离

晋国，随时都可能会遭到侵袭，百姓为了安居乐业，也会讨好楚国以消除兵患。倒不如尽早放弃陈国，免得常年出兵引发诸侯的不满。”

二人的判断概括起来就是说，晋楚争霸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势力边界。陈、蔡、许三国迫近楚国，晋国就算是降伏了他们也很难维持，楚国轻易就能夺回去。更何况，如今郑国的顺服都尚未稳固，却要得陇望蜀谋求陈国，那不就是在自寻烦恼吗？

不过，人毕竟是有损失厌恶的，假如陈国压根就没有入盟，晋国或许也不会为此而感到惋惜；可如果是得到了再失去，就会感到难以接受。正如魏绛在建议“和戎”时所指出的，只要陈国加入了联盟，晋国就必须负责到底，如果放任陈国投入楚国怀抱而不管，会给其他诸侯留下不负责任的印象，这对晋国的争霸事业显然是不利的。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晋国还是鬼使神差地动员诸侯出兵戍守陈国，并连番打退了楚国的侵袭。令尹子囊见北上无法建功，就暂时退回国内休整。此后的两年里，楚国也都没有对陈国用兵，晋悼公与楚共王第一回合的争锋就此告一段落。

郑人背盟

晋悼公复霸的第二阶段战争始于晋悼公八年（前566年），这时担任正卿刚满七年的韩厥功成身退，将军国重任交给了荀偃，而楚国在经过两年的休整后也再度北上，准备恢复对陈、郑两国的控制，争霸战争由此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这年冬天，楚国令尹子囊重兵围陈，悼公在鄢地（今河南鲁山）会盟诸侯，再次商议救陈。然而正如当初士匄所预料的，正当陈哀公北上参加诸侯

会盟的当口，国内却有人导演了一出大戏。导演这出闹剧的是陈国的大野心家庆虎、庆寅两兄弟（合称“二庆”）。他们一方面安排哀公的同母弟公子黄到楚国去访问，暗地里则沟通楚人将其扣留，然后再派人送信给参加盟会的陈哀公说：“如果你不回来，恐怕国内会有人趁机生乱。”陈哀公担心被人夺了权，于是也顾不得其他，偷偷跑回去救火了。

与此同时，郑国内部也发生了变乱。按照《左传》的说法，郑僖公做太子的时候，于晋厉公六年（前575年）携子罕一同访问晋国，结果对子罕不加礼遇；后来和子丰一同到楚国朝见，又对子丰很是无礼。在他继位后，子丰去晋国朝见，想要向晋国控告以废掉其君位，但被子罕制止了。

有子罕这样的宽宏大量，两人不再追究僖公的无礼，或许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可郑僖公偏偏收不住他的公子脾气，在一次公务活动中，又对担任襄礼的子驷无礼。旁人一再劝说，可郑僖公偏就听不得忠言逆耳，竟把进言的人也给杀掉了。子驷无法忍受屈辱，就在参加鄆地会盟的途中，派人趁夜杀了僖公，而对外却宣称国君是得急病致死。

子驷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国内的群公子，他们想除掉子驷，谁料又被子驷占了先。晋悼公九年（前565年）四月，子驷罗织罪名杀掉了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四公子，一举铲除了反对势力，并立了五岁的郑简公为君，理所当然地成为郑国只手遮天的权臣。

《左传》单纯从道德角度进行批判，认为郑僖公的死是罪有应得。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场惨案显然是公室与穆族之间争夺权势所引发的悲剧。其中情由究竟如何，在这里先按下不表，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子驷本就有着强烈的亲楚倾向，如今为了避免晋国的诛讨，叛晋服楚也就是顺理成章

的事了。而为了免除因背叛盟约所带来的道德压力，子驷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首先是在晋悼公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郑国在未取得晋国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派兵入侵蔡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并于当年五月邢丘（今河南温县东）会盟时将战俘和战利品都奉献给了晋国。而当楚国尽起大军前来报复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与楚国缔结了盟约，同时还派王子伯骕去向晋国解释说：“我们不是真心要依附楚国的，只是贵国君主命令我们重整军备、加强操练，随时准备讨伐不臣。蔡国人不服从贵君使命，我郑国也不敢贪图安逸，因此召集军队讨伐蔡国，俘虏了司马燮，在邢丘的会盟时献给了贵国，可楚国却发兵讨问我们为什么要对蔡国用兵。我们本不想与楚议和，可他们焚烧我们城郊的防御设施，侵略我们的城池。为了抵御楚人的侵略，我们男女老幼全民上阵，可终究不是他们的对手。国家危在旦夕却无处申告，父兄子弟四散逃亡，百姓悲痛愁苦，不知该向谁寻求保护，便一致要求屈服于楚国。我和我的几位同僚都无法约束，所以特来向您报告。”

子驷的这些伎俩当然逃不过晋国人的眼睛，只是他们既然能考虑得如此周全，自然也就想好了应对的办法，光从口头上谴责显然毫无意义。荀偃于是就派行人子员责问说：“贵国受到楚国的讨伐，却不派一个使者来通禀，反而立刻就表示了屈服，其中真相恐怕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既然贵国有这样的愿望，我们也不敢反对，但请转告贵国君主，寡君准备带着诸侯和你们在城下相见，希望能够认真考虑一下。”

无信之盟

晋悼公十年（前564年）冬，经过大约一年的准备，晋国再起大军围攻郑国。此次联军分工明确，将郑国都城三面包围：荀偃、士匄率领中军及齐、鲁、宋联军围攻其郛门（东门）；荀偃、韩起率领上军及卫、曹、邾联军围

攻其梁门（西门）；栾黶、士魴率下军及滕、薛联军进攻其北门；而赵武、魏绛则带领杞、郕联军负责砍伐路边的栗子树供给军需。

几天之后，联军在汜水边进行休整，荀偃又向全军下令：“修理好作战的器具，准备好粮草，将老弱病残送回国内，伤重无法远行的送到虎牢休养，剩余的全军精壮继续对郑国实行包围。”

看到这样的阵势，郑国人知道是躲不过去了，急忙派人去求和。联军围绕是否该接受议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其间荀偃首先提出了“围点打援”的策略。他认为，郑人之所以敢于戏弄晋国，无非是仗着晋楚之间的均势，假如晋国能够再次打败楚国，郑国必然顺服。因此，他建议不要与郑人讲和，而是继续实施包围，等楚军前来救援时与其展开决战，便可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收服郑国。

这个建议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其中的风险不容忽视。过去几十年里，晋楚交兵互有胜负，谁也无法保证此次相遇就一定能战胜楚军。而对于诸侯而言，参军入伍的大都是有土地的贵族，若非情势所迫，谁也不想拿子弟的性命开玩笑，因此对荀偃的建议都不置可否。

有鉴于郑国靠近晋国而距楚路远，楚军每次出征所耗费的车马钱粮要远甚于诸侯联军，荀偃便想出了一个消耗楚军实力的办法：“先王曾教导我们，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倒不如与郑结盟然后退兵，以引诱楚国进攻郑国。”

至于该如何对付楚国，荀偃的建议是将晋国的四军以及诸侯联军分为三组，轮番与前来伐郑的楚军交战。楚国为了征服郑国，就会接连不断地出兵，而他们劳师远征所要面对的，却永远都是以逸待劳的诸侯联军，几次阵仗下来必然人困马乏，难以为继。

在荀罃的主导下，这年的十一月初十日，晋、齐、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国与郑国在戏地（今河南登封）举行会盟。这是一次极其隆重的盟会，时年只有七岁的郑简公及郑国六卿悉数到场，与此同时，他们还带来了卿大夫的嫡子，一国精英人物汇聚一堂，与诸侯把酒言欢。

不过，由于晋国方面预料郑国早晚会再次背盟而去，在制作盟书的时候就很不用心。盟书制作完成后，晋国大夫士弱又不无傲慢地宣读誓词：“从今天盟誓以后，郑国如果不对晋国唯命是听或是存有二心，就将遭到盟书中记载的报应。”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盟书只要求郑国无条件服从，却并未就晋国应尽的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其中的羞辱意味显而易见。郑国执政卿子驷不甘示弱，快步上前当众发言：“上天降祸给郑国，让我们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大国不仁不肯施加恩惠于我，却总是发动战争胁迫我们与之结盟，让我们的神灵不能安享祭祀，百姓不能尽享其成，男女老少形容消瘦却无处诉说。今天盟誓之后，郑国当服从合于礼仪且实力强大的国家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如果有其他的想法，有如此盟。”

子驷言语之间明确表露出对此次盟誓不屑一顾的态度，让晋国时任上军将荀偃勃然大怒，当即要求修改盟书。可子展却反驳说：“盟书已经报告给神灵了！如果对神灵说过的话还可以修改，那对大国是不是也可以随时背叛呢？”

与荀偃急躁的性情比起来，中军主将荀罃的气度就恢宏了许多。他反过头来劝说道：“用盟约来要挟他人本就不合礼仪，不合礼仪又如何做盟主？更何况，如果我们不修文德，别说郑国，国内的百姓也会抛弃我们。反之，

只要我们肯休养民力、和睦民心，远方的人们也都会来归顺，区区一个郑国又算什么？收服郑国不是一日之功，又何必急在一时？不如先跟他们结了盟，然后休整军队再来，总有一天郑国会服膺于我的。”

正如这次会盟选择的地点所预示的那样，“戏之盟”终于还是变成了一场儿戏。会盟结束一个月后，晋国就又带领诸侯围攻郑国，随后从阴阪（今河南新郑西北）渡河撤军。郑国的子孔想趁晋军疏于防范进行偷袭，但被子展劝阻了。

不久后，楚军也前来讨伐，子驷毫不犹豫地就和楚军讲和了。子孔和子驷对此大惑不解，于是就质问说：“我们刚和晋国结盟，如今口血未干就背弃盟约，这合适吗？”

子驷和子展轻描淡写地回答道：“盟誓时我们说的本来就是要‘唯强是服’，并没有说一定要服从晋国啊。现在楚军来袭，晋国不能救援，那么楚国就是强权。既然如此，我们与楚国结盟不就是在遵守盟约吗？更何况，晋军以战事要挟与我们结盟，本来就毫无诚信可言，就算是不遵守，神灵也不会怪罪我们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与晋国结盟不到两个月的郑国又重新回到了楚国一方。

战时经济

这次军事行动之所以虎头蛇尾，与当时中原地区正在经历的一场自然灾害有莫大的关系。根据《左传》的记载，晋悼公六年（前568年）秋和九年（前565年）九月，鲁国先后举行了两次盛大的雩祭，其原因都是天旱。

诸侯围郑这一年，也就是晋悼公十年（前564年）初，宋国发生了一场火灾，司城乐喜调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才将其扑灭。同样是在晋悼公十年，秦国

在楚国的策应下大举入侵晋国，而晋国的反应却是“晋饥，弗能报也”，也就是说晋国也正在遭遇饥荒。

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让各诸侯国都苦不堪言，而持续不断的争霸战争又在联军中滋生出一股强烈的消极厌战情绪。如今诸侯劳师远征却无功而返，更是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展露无遗，使得各方力量都不得不及时对下一步的战略战术做出调整。

在这次遍及整个中原地区的天灾面前，郑国所受到的影响尽管不比其他诸侯更大，但在晋楚两国的循环夹击之下，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也因此最先做出了改变。

在晋悼公十年的戏之盟上，担任郑国执政的子驷面对困境巧妙周旋，再次明确提出了“唯强是服”的战略方针。其用意就是要利用晋楚两国急于求成的心态待价而沽，在减少自身消耗的同时尽力损耗晋楚两国的国力，这就等于是将比拼国力的争霸战争转变成了纯粹的消耗战。到最后更强的一方固然可以压服郑国，但也会因此元气大伤，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国力；而弱者更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对郑国构成威胁。

面对郑国的战略转向，晋国显然不能坐以待毙。在高度紧张的竞争环境中，晋国的卿大夫惯于不拘一格，以开放的心态处理现实中的难题。在他们的影响下，诸侯也都积极参与“头脑风暴”，频频献计献策，在各个环节中寻找最优解决方案。比如鲁国大夫仲孙蔑，之前就曾提出“城虎牢以逼郑”的计策。诸侯长期在虎牢驻扎，既可以免去军士们奔波劳役之苦，又能够实现对于郑国的长期压制。与之相比，楚国却依旧要按照一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做法，每每从远在千里之外的郢都调兵遣将来回奔波，自然会在这场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

如今面对诸侯普遍存在的厌战情绪，以及郑国欲冷眼旁观的现实情境，晋国必须改弦更张，停止不计成本加大投入的做法。为此，晋悼公再次掀起了一股大讨论的热潮，臣子们提出了不少应对眼下危机的解决之道。

按照春秋时期的外交惯例，小国侍奉大国，往往要按照大国所规定的期限和数量缴纳贡赋。过去晋国对诸侯任意驱使，随意索要巨额贡纳，让小国不堪重负，怨言颇多，赶上这青黄不接的年景，怨恨情绪更是会不断滋长。为此，晋国重新规定了朝聘的期限和贡纳的数量，对于职责太重的国家，就减轻他们的负担。最早在晋悼公九年（前565年）时，鲁襄公前往晋国朝见，晋悼公就优先为鲁国重新制定了朝聘的数目。到当年五月举行的邢丘之会，这项优待政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与盟会的齐、郑、宋、卫、邾等国的贡赋数量都得到了减免。

这些减轻诸侯负担的举措，极大地改善了晋国与东方列国之间的关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晋国自身的财政紧缺状况。为此，曾提出“和戎之策”的魏绛再次献计，决定在国内开展经济改革。《左传·襄公九年》将其举措概括为：“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祈以币更，宾以特性，器用不作，车服从给。”

简而言之，魏绛的改革措施主要是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开源方面，他建议以提高流动性的方式激发经济活力。具体做法就是让公室和中上层的贵族把多余的财物拿出来，借贷给那些濒临破产的底层民众，使得原先积滞的财货和粮食能够迅速流通。考虑到贵族之家的私心，晋悼公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方面是自己率先垂范，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强制手段，迫使贵族“苟有积者，尽出之”，最终达到“国无滞积，亦无困人”的效果。为了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国家还需要进一步放开经济管制和山川水

泽的专利，不禁止百姓牟利，这就是“公无禁利，亦无贪民”，以扩大国家的经济基础。

节流方面，魏绛主要是从简化礼仪方面入手。先秦时期，贵族在进行宴请或者祭祀时都非常奢侈，通常情况下天子祭祀要用一“会”，也即三份牛、羊、猪齐备的“太牢”，诸侯祭祀时也要用到一份“太牢”。卿大夫祭祀规格不一，地位较高的会使用相对昂贵的牛，地位低者则用羊、猪齐全的“少牢”。在宾客接待方面，诸侯与卿大夫互相宴请时的享礼与燕礼所使用的食材也都是以“牢”为单位的，而且很多时候还要陈列大量摆而不食的“体荐”和“折俎”。考虑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贵族之间为了攀比而超越规格也是常有之事，因此而造成的浪费也就更加严重。

魏绛的改革措施着重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纠正，他建议在祭祀时用皮币代替牺牲，举行宴会的时候也不要动辄使用“太牢”这样一整套的肉食，而是减少到一种牲畜，节省无意义的开销。在日常生活中，贵族也要注意节俭，尽量不要添置新的器物，车马服饰只要够用就行，不必每每追求奢华新奇。

这些经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晋国的经济危机，《左传·襄公九年》因此评价说：“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也就是说，这些措施刚刚推行了一年，国家就有了法度，使得楚国无法与晋国抗衡。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法度”并非常法，既不符合与身份相匹配的礼制精神，也违反了人之本性，只是在连年灾荒的特殊情况下作为应急措施使用，因此就有了“战时经济”的色彩。

郑国盗乱

战时经济体制能够在短期内调动起全国力量，为争霸战争提供保障，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配套的战略作为支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争端，哪怕是贯朽粟陈的黄金帝国也会被拖垮。眼下连年天灾带来的经济危机，也让晋国不得不对过去的战略进行反思，从而对这场绵延日久的战争有了新的认识。

争霸战争归根结底是两国国力的竞争，郑国一时的归属只是一种迷惑心智的假象，能够从战略上彻底压服对方才是解决争端最持久有效的办法。如果看不清这一点，只是一味争强好胜地向郑国频繁用兵，就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正因如此，晋国执政荀罃才顺势提出了“疲楚服郑”的总体思路。这个策略在具体执行时又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在局部战术上，针对郑国“唯强是服”的策略以及楚国距离郑国路途遥远、奔波不易的现状，荀罃早在戏之盟举行前就提出了“车轮战”的方针。晋国不必急于迫使郑国归服，而是以虎牢为根据地，将联军兵力一分为三，轮番对郑国构成侵扰，以引诱楚军长途来袭。

而在战略层面上，晋国在保持对郑国施压的同时，加快了与吴国战略联盟的达成，从而在楚国后方开辟一个新的战场。通过正面战场和侧面战场上的不断侵扰，调动楚军在更大空间上来回奔波，所产生的成效显然要比郑国郊外的车轮战更加显著。

所以当郑国与楚国签订盟约之后，满以为晋国人会怒不可遏赶来报复，却不料对方根本不按套路出牌。晋国人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从容地邀合诸侯与吴王寿梦在楚国东部的柤地举行了一次会盟。为了鼓舞东方诸侯跟随晋国争夺霸权的决心，同时也为了畅通晋吴交通线，还特别向宋人献上了

一份大礼，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偃阳国。在做完这一系列部署之后，他们才缓缓移兵虎牢，重新对郑国构成合围。

晋国的这一系列动作引起了楚国的极大恐慌，为了阻滞晋吴之间的沟通，令尹子囊于晋悼公十一年（前563年）六月亲自带兵北上，与郑国大夫子耳合兵伐宋，随后又挥师东进，侵扰鲁、卫两国边境，试图切断晋吴交通线。然而，楚国这次北征非但没能达成目标，反而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那就是在郑国国内酿成了一场影响巨大的民变。

按照传统的叙事套路，这场发生在晋悼公十一年的郑国“盗”乱，是因子驷为人跋扈所致。子驷虽然位列六卿，却喜欢跟下属争风，其中有一个名叫尉止的与他不和，他就利用职权处处刁难对方，不是故意减少其所属的兵车数量，就是跟其争夺战利品。而在国内，子驷为了疏通自家的灌溉水渠，竟然侵占了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的土地。

这五个不得志的家族不能容忍其暴虐行径，于是就联络之前被子驷杀死的四公子党羽发动了叛乱。叛军在街市上突然发难，将准备进宫议事的子驷、子国、子耳当场杀死，随后又闯入公宫劫持年幼的郑简公躲进北宫。事发之后，子国的儿子子产沉着应对，集结了七十辆战车攻打北宫，后在子蟜等人的协助下攻杀尉止和子师仆，其余祸首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奔宋国，战乱才得以平息。

值得一提的是，郑国也有六卿体制，但与晋国不同，其六卿是由当国、为政、司马、司徒、司空、令正六个官职组成。少数情况下也可能不设为政，而是以司马为次卿，最末设少正的职务。子驷担任当国之后，垄断了国中一切事务，因此也就未设为政，采用后一种六卿体制。前一年的戏之盟时，六卿职务分别由公子（子驷，驷氏）、公子发（子国，国氏）、公子嘉

（子孔，孔氏）、公孙辄（子耳，良氏）、公孙蚤（子蟜，游氏）、公孙舍之（子展，罕氏）担任。在这一次内乱中，位列六卿前四的只有司徒子孔事先得到消息幸免于难，其余三人都被乱军杀死，对郑国所造成的打击可想而知。

楚国因一时激愤，不顾郑国内部忧患一再指使其侵宋、伐鲁、攻卫，终于酿成了一场灾祸。而在晋国方面，早在盗乱爆发前不久，他们就已经携诸侯陆续赶到郑国，并在虎牢、制、梧三地筑城。待楚国令尹子囊前来救援的时候，新任执政子孔早已与晋国讲和，而晋国也投桃报李，将他们所戍守的重镇虎牢还给了郑国。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诸侯联军绕道抵达郑国南部的阳陵（今河南许昌北），与前来救援的楚军隔着颍水对峙，这就让夹在中间的郑人感到惶恐不已。当此进退两难之际，郑军统帅子蟜敏锐地察觉出了双方战略意图上的差异，认为楚军统帅令尹子囊求胜心切，而晋国则坚持荀偃“游而不击”的方针，联军更是已经抱定了撤退的决心，此时投靠楚国显然更有利于双方罢兵休战，于是便带领郑军趁夜渡过颍水与楚国结盟。后来晋人的反应也果如其所料，到十一月二十四日，诸侯联军即离开颍水北上，在郑国北部进行了一番扫荡之后就全军解散了。

萧鱼之盟

自晋国执行联吴制楚、疲楚服郑政策以来，楚国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他们不仅要经受诸侯车轮战的考验，更要在东方与中原两个战场之间来回奔波。几次三番下来，楚国军队师老兵疲，后勤粮草供应不暇，逐渐显出疲态，这就让郑国人看到了希望。

眼下楚弱晋强的局面已经形成，只要能让晋国下定决心，楚国自然不敢与其争锋。但问题是，晋国的总体战略是要拖垮楚国，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总是欲擒故纵，这就让郑国感到很难办。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晋国心甘情愿地拿出撒手锏，以彻底打消楚国最后的念想呢？

提出解决方案的人名叫公孙舍之，也就是身居六卿之列的子展。他建议效仿当初子驷伐蔡的故事，主动出兵挑衅宋国，从而引动诸侯出兵讨伐。等到楚国前来救援，郑国就在晋、楚之间频繁切换立场，让他们互相争斗。等楚国彻底被晋国压服，也就到郑国彻底归附晋国的时候了。

计议已定，郑国遂派人向宋国挑衅，宋国的向戌闻警入侵郑国，不久郑国又反攻侵入宋地。郑国的挑衅果然引发了诸侯的联动，晋悼公十二年（前562年）四月十九日，齐国太子光和宋国向戌率先驻军新郑东门；当晚，晋军抵达新郑西郊，随后向东侵伐许国故地。之后卫国的孙林父也带兵攻打郑国北境，对新郑形成合围之势。

诸侯联军来势汹汹，但到了郑国之后就又恢复了往日的做派。他们在郑国西部、北部频繁转移，随后又在新郑南门举行了一次阅兵仪式，却完全没有要动武的意思，这就使得郑人一直找不到“被迫”投靠的机会。直到后来北部边境又有后续部队渡过济隧，郑人担心弄巧成拙，这才顺势向诸侯求和。

当年七月，晋国邀合前来助威的齐、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在亳地与郑国举行会盟。与前次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同，这次的会盟由中军佐士句亲自主持，盟书特别强调了诸侯之间的对等关系，重申了华夏联盟的一贯主张，也即：同盟国家不得

囤积粮食、垄断利益，不得收容庇护作奸犯科的奸邪之人；要履行互相救助的义务，共同抵御灾荒、安定祸患，同好共恶、辅助王室。

为了强化盟约的神圣性，盟书还列举了包括司慎、司盟和名山、大川的主神，以及叫不上名字但也接受人类祭祀的各路神魔，还有三代的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的祖宗都来见证，如果有人违反盟约，就让他失去百姓、亡国灭家。

不过，事情到这里还不算结束，楚国并不愿意就此放手，仍要用尽力气做最后一搏。盟会结束后不久，他们就在秦国右大夫詹的协助下，浩浩荡荡地开进郑国，随后又挟制郑国一起入侵宋国。

这年九月，诸侯再次发兵围郑，并在新郑东门外再次举行阅兵以炫耀武功。郑简公迅疾派出大夫良宵、大宰石臬为使向楚王致歉，说：“孤为了保全国社稷，不能再侍奉您了。如果您能够用玉帛美器安抚，或者使用武力威慑晋国，以便让两国再度携手，那将是孤最大的愿望。”

听了这些言辞，楚共王着实气不打一处来，细软玉帛楚国当然是不会给的，但论及武力，此番联合秦国出兵已经是竭尽所能了，自然也不是晋国的对手。难道就这么败下阵来了吗？楚共王心有不甘，却又无能为力，只得把郑国的使者拘留了以出气。

而这边厢，郑简公同时派出王子伯骕到晋军大营内求和，晋人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到九月二十六日，晋卿赵武作为晋国方面的代表进入新郑与郑简公结盟；十月初九日，郑卿子展又出城和晋悼公结盟，两国之间正式达成谅解。十二月初一日，上述十二国诸侯又与郑国在萧鱼（位于今河南许昌）举行了正式会盟，标志着晋悼公复霸大业的最终完成。

第三节 晋齐争锋

迁延之役

在春秋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晋悼公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本是晋襄公裔孙，一名在成周安享富贵的远支公族，却阴差阳错地在晋厉公死后被迎回国内继承了晋君之位。即位之时，晋悼公还只是一个虚岁十四的孩子，却出人意料地以强硬手腕整顿国内秩序，调整外交策略，迅速消除了“车辕之役”带来的影响，并带领国人取得了复霸大业的成功。

萧鱼会盟的成功举行，再次将晋国的霸业推向了巅峰，同时让晋悼公的个人威望攀升到了极点。然而，楚共王并不甘心丧失在中原的利益，于是便于次年冬天，派令尹子囊联合秦国庶长无地出兵讨伐宋国，驻军杨梁（今河南商丘东南），但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杨梁之役后，在位三十一年之久的楚共王在自责和忧虑中去世。临终前，他执着于鄢陵之战的失败，痛心于中原霸权的丧失，曾嘱咐大夫在“灵”和“厉”中为自己酌情挑选谥号，但并未被令尹子囊采用。

楚共王去世之后，楚国与吴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先是吴国趁楚国有国丧出兵侵扰，养由基与司马子庚就近阻击，在庸浦（今安徽无为西南长江北岸）设三处伏兵大败吴军。到第二年秋天，令尹子囊从棠地（今江苏南京六合区）出兵讨伐吴国，由于对方坚守不出，子囊求战不得，只好撤军。可就在他们回军的路上，吴军却突然从皋舟（今江苏南京六合区东南一带长江滨）的险道上拦腰截击楚军，使得他们首尾不能救应，最终大败而归。这场战争使得公子宜谷成了吴人的俘虏，子囊也因此羞愤而死，成为间接死在吴国人手中的第二任令尹。

吴楚之间的这两次交锋互有胜负，谁也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但却足以引起楚国的高度警惕。要知道，仅仅二十多年前，吴国在楚国眼中还只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蛮夷”小国。可自从有了申公巫臣的牵线搭桥，他们的军事实力就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以至于到如今竟然可以与楚国正面对决。若是再坐视其发展壮大，将来事态究竟会演变到何种程度，真是不可想象。

而从另一方面讲，如今的吴国之于楚国，正如当年的秦国之于晋国。尽管对方力量有限，却近在肘腋，是关乎楚国核心利益乃至生死存亡的心腹大患。跟这些隐患比起来，中原国家不过是疥癣之疾，霸业宏图也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因此，在楚共王去世后不久，楚国的战略重心就出现了重大转移。一方面，他们释放了之前扣留的郑国使者良宵、石旻，标志着楚国已经放弃了通过武力争夺郑国的企图。而另一方面，新任的令尹子庚（王子午）遵照子囊的临终嘱托，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对吴战争之上。

按照我们通常的设想，晋国霸业的极盛时期，也应该是其权威最盛的时候，诸侯国应该都积极地团结在霸主周围，不敢有丝毫违逆才是。然而现实却与我们的直觉正好相反，晋悼公实现复霸大业的时刻，也恰恰是晋国话语权急速衰落的开始，这一点在晋悼公十五年（前559年）讨伐秦国的“迁延之役”中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萧鱼会盟前后，秦国曾先后四次出兵干扰晋国的复霸大业。其中第一次发生在晋悼公十年（前564年），秦景公派士雅（晋国正卿士会次子，仕秦）出使楚国，要求联合讨伐晋国。楚人尽管不看好这场战争，但还是驻军武城以为声援，从侧面呼应秦国对晋国的入侵。

及至两年后，眼看着晋国的势头越来越无法阻挡，令尹子囊又反过头来向秦国请求援兵，以侵伐郑、宋两国。萧鱼会盟之后，秦景公又派庶长鲍、庶长武带兵分批进入晋国，晋国下军佐士魋大意轻敌，结果在栢地（今山西永济西南）遭遇夹击而败北。次年，两国又联合起来发动杨梁之役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但终究还是没能逆转晋国复霸的势头。

当时正是晋楚之间比拼消耗最为关键的时刻，故而面对着秦国接二连三的挑衅，晋国只是在晋悼公十一年（前563年）由荀息带兵对秦国进行了一次小规模袭扰。及至争霸胜利，晋国自身已被连年的战争和天灾折腾得气血全无，就将报复秦国的事务搁置了几年。一直到晋悼公十五年（前559年）四月，晋国国势稍稍振作，这才终于邀集诸侯对秦国展开了讨伐。

这一战晋国四军六卿全部出动，东方诸侯齐、鲁、宋、郑、卫、曹、莒、滕、薛、杞、小邾也悉数到场增援。战争初期，联军仗着人多势众，着实让秦国吃了不少苦头，但当他们推进到泾水河畔时，却怎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至于原因，据说是由于齐国统帅崔杼以及宋国统帅华阅、仲江的消极怠惰，导致其他诸侯相互观望迟迟不肯渡河。

晋国大夫叔向为此到各军进行查访，在会见鲁国统帅叔孙豹时，对方咏了一首《匏有苦叶》诗。这首诗描绘了一名女子在渡口盼望情郎前来求婚的场景，女子内心焦急想要渡河去迎接心上人，可当船夫招呼她的时候，却又言不由衷地掩饰着自己的想法。叔孙豹大概是想用这首诗来表达一个态度，他本人是愿意渡河追击的，只是当众人都在观望之时不便于强出头罢了。

《国语》对此还做了进一步的延展，说是叔向听了之后就向舟虞和司马解释道：“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苦匏虽然不能食用，但带在身上却可以帮助你渡河。无论采取何种解释，叔孙豹的想法都已不言自明，叔向

于是就以晋国的立场，为鲁、莒两国的军队准备船只，让他们率先渡过了泾水。

诸侯不肯渡河，着急的可不只有叔向一人。郑国近些年刚刚摆脱了大国拉锯的命运，领军大夫子蟜（公孙蚤）不想因为自己的迟缓引来猜忌，于是便四处活动，最后怂恿着卫国大夫北宫括一起去游说其他诸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人们终于不再犹豫，纷纷渡过了泾水。

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此番遭遇联军讨伐，秦景公吸取了麻隧之战的教训，不敢与对方正面接触，转而采取了在泾水上游下毒的阴招，导致联军死伤惨重。面对秦人的野蛮行径，司马子蟜怒不可遏，就带着郑国的军队继续追击，而为了防止郑军再遭秦人暗算，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

联军一直追击到了栒林（今陕西渭南华州区东），却还是没能迫使秦人屈服。晋军统帅荀偃决定继续向西行军，于是就在阵前下达战令：“明日一早鸡鸣时刻开始套车并填井平灶，全军唯我马首是瞻！”偏偏在这个时候，晋国内部又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接到荀偃的指令后，时任下军将栾黶不屑地讥讽道：“晋国的命令还从来都没有这样发布的，你的马怎么走我是管不着，我只知道我的马是要朝东走了。”说完，也不等荀偃有所反应，就径直带着自己的部属回国了。

栾黶的撤退引发了连锁效应，担任下军佐的魏绛二话不说就跟着他退出了战场。当时晋军仍旧保留着四军的编制，然由于新军无帅，所部由下军直接统领，因此栾黶和魏绛带走的几乎是晋军一半的兵力。在诸侯一片哗然声中，荀偃眼看着自己的将令无法得到贯彻，手下统率的主力部队还被带走了一半，却也只能黯然自嘲：“是我的命令有误，想来真是惭愧。我们还是及早撤军吧，免得被秦军俘虏！”

梁之会

这场爆发于晋悼公十五年的对秦战争，是继麻隧之战后发生在秦国境内的第二次大规模会战。战争轰轰烈烈地开场，磕磕绊绊地进行，最后却以闹剧收场，因此被人戏谑地称为“迁延之役”。正是由于诸侯在阵前的迁延不进，以及栾黶在作战时迁延而去，将晋国在诸侯中尴尬的处境和国内无法弥合的矛盾完全显露了出来，同时也为晋悼公少年英主的光辉形象抹上了一层阴影。

令人唏嘘的是，晋悼公却再也没有时间来为自己的形象增光添彩了。仅仅一年后（前558年）的十一月初九日，在位不满十六年、时年只有二十九岁的晋悼公突然去世了。众臣拥立还不满十五岁的太子彪即位为君，是为晋平公。晋国霸业恢复仅仅四年后，就再次陷入了主少国疑的旋涡。

公元前557年春，在为晋悼公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之后，晋平公旋即换上了常服，按照惯例在曲沃举行了一场祭祀典礼，随后带领三军沿黄河顺流而下，与早早等候在溴梁（今河南济源）的鲁襄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成公、许灵公，莒、邾、薛、杞、小邾等国国君，以及齐国大夫高厚举行会见。

会见期间，晋平公在温地举行了一场宴会，与参会各国国君同声唱和、把酒言欢。宴席上晋国让诸侯大夫献舞，且要求“歌诗必类”，也就是要有符合舞蹈主题的诗歌吟唱来配合。然而，在如此庄重的场合上，偏偏就有人不愿意歌功颂德，还故意表现出“歌诗不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对盟主的不满，这个人便是齐国大夫高厚。

见此情景，晋国中军元帅荀偃勃然大怒，说：“看来诸侯是有别的想法了！”盛怒之下，他强令高厚与诸侯大夫结盟，谁知高厚却不肯从命，直接

就从盟会上逃跑了。结果如此盛大的一次盟会，最终参与盟誓的只有晋国的荀偃、鲁国的叔孙豹、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宁殖、郑国的公孙蚕和小邾国的大夫，与会的各国国君都只在一旁看了个热闹。

高厚在盟会上的种种表现，明白无误地传达了齐国对晋国的不服从态度。而据《左传》的解释，齐国之所以会突然产生二心，是源于一场外交事故。

这场外交事故发生在晋悼公十五年（前559年）冬天，当时因卫献公被孙林父驱逐出国，晋国组织诸侯在戚邑相会以谋求安定卫国。会上中军佐士匄向齐国借了仪仗装饰用的羽毛，事后却没有归还，结果就引发了齐国的不满。

这种解释尽管很符合春秋时期的礼仪观念，实际上却混淆了因果、倒置了本末。爱惜羽毛只是晋、齐交恶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而并非根本原因，真正让他们关系走向决裂的，还在于两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

前文提及，由于齐国的国力较为强盛，晋国不能像对待其他诸侯一样对其予取予求，故而通常都会采取包容平衡的策略，既不要求其每役必从，也不允许其妄自称尊。晋悼公即位初期，就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将齐国勉强约束在联盟的范畴之内。

但这些毕竟都只是表面功夫，齐国在对晋国表示顺服的同时，背地里的小动作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在晋悼公七年（前567年）时，齐国就无视晋国作为盟主的权威，悍然出兵灭掉了莱国。晋悼公五年（前569年），晋国从鲁襄公所请，将郕国划为鲁国的附庸，而齐国当年就指派莒、邾两国出兵伐郕，并于两年后将其彻底吞并。从晋悼公九年（前565年）开始，他们又指使莒国、邾国接二连三地侵伐鲁国，不断地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挑战霸主

的底线。而到了“迁延之役”爆发时，齐国大夫崔杼更是从中作梗，引导诸侯消极应付，这些显然都是被晋人看在眼里的。

面对齐国的一再挑衅，晋国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但在客观现实面前，他们又不得不做出妥协。一方面，晋悼公即位之后高强度的争霸战争，已经严重损耗了晋国的国力，诸侯内部更是厌战情绪高涨，无力承担另一场高消耗的争霸战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各国内部封建制危机爆发，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冲突加剧，人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自然也就不愿意为所谓的霸主事业徒耗精力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晋国对齐国的反制都仅局限于敲打其扈从，而不敢直接采取武力压迫的手段。比如晋悼公十五年的向之盟，晋国就拘捕了莒国公子务娄；晋平公元年（前557年）的溴梁之会上，又拘捕了邾宣公、莒犁比公，数之以暗通齐、楚之罪，并责令其归还侵占的土地。

然而，晋国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并不能打消齐国挑战其霸权的决心。尤其是在戚邑会盟前后，周灵王主动提出与齐国联姻，前来赐命的大夫刘定公更是以其先君太公望辅助王室、师保万民的旧事来勉励齐灵公，让他继承发扬太公的功德为王室效命。受此鼓舞，齐灵公精神更加振奋，故而便于晋悼公十六年（前558年）夏亲自带兵讨伐鲁国，包围了成邑（也作成邑，今山东汶上），可见其对晋人的轻慢之心已经丝毫不加掩饰了。

湛阪之战

让我们再回到溴梁之会的现场。

会议期间高厚的公然逃离，以及盟誓级别的一降再降，让晋国上下都十分尴尬。齐国已然做到了这一步，若是不加讨伐，显然有损于霸主的威严；

可若真要兴师问罪，晋国又没有必胜的把握。盟会开成这个样子，已经足够让人不痛快了，更让人难堪的是，堂堂的诸侯盟主竟然又被许国玩弄了一遭。

事情的起因倒也不复杂。二十年前，楚国令尹子反撕毁弭兵盟约大举北上，为了收买郑国而将许国内迁到了叶地，使得许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如今晋国霸业已成，许灵公想要改换门庭，就在盟会时提出要举国北迁到晋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许灵公的请求让晋国感受到了被需要的幸福，于是便大张旗鼓地组织诸侯，准备替许国“搬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许国人却又突然反悔了。

原来，迁离叶地只是许灵公的一厢情愿，国内的民众满足于富足悠闲的生活，说什么都不愿意向北迁徙，这就再次把晋国架到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晋国虽不敢立刻就跟齐国撕破脸面，可对付区区一个许国还是不成问题的。不久，晋、鲁、宋、郑、卫联军就在荀偃的带领下抵达许国东北的栲林。

在对许国进行了一番侵扰之后，荀偃和栾黶又转移了战略目标，转而去侵扰楚国的边境，以报复几年前楚国侵宋的杨梁之役。不久，晋军与前来抵御的楚国大夫公子格在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北）遭遇，取得大捷。荀偃兴味盎然地在方城山（在今河南叶县）外巡游了一圈，这才返回与联军会合，再次讨伐许国。

此番荀偃之所以带兵讨伐楚国，恐怕也是看准了楚国无力报复的现状，这才试图以侵扰其边境的方式，挽回在齐国身上丢失的颜面。可逃避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晋军在湛阪所取得的大捷，终究无法掩盖其在溴梁之会上的外交失败，反而更让齐国看透了其虚弱的本质，更加肆无忌惮起来。盟

会结束后不久，齐灵公就接连统领大军讨伐鲁国，先后包围了成、桃、防等邑，并进一步鼓动邾国配合其行动，公然跟晋国唱起了“对台戏”。

可即便如此，晋国却还是不敢跟齐国动真格的。晋平公元年冬季，鲁国大夫叔孙豹（穆叔）受命到晋国请求援助，谁知晋人却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左传·襄公十六年》）为由搪塞了过去。叔孙豹哪里能听得进去这些话，于是就又向掌握实权的荀偃、士匄求助，可他们也只是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最后还是“口惠而实不至”，迟迟不见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

然而到了晋平公三年（前555年），局势却突然发生了转变。这年秋天，齐灵公再次起兵侵扰鲁国，还未等到鲁国使者前往求援，晋国便尽起三军直逼齐国而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荀偃梦讼

在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美好日子，伴随着秋蝉此起彼伏的噪鸣，担任晋国中军元帅的荀偃正在庭院中小憩，温暖的阳光穿越枝头轻柔地洒在身上，令人心旷神怡。然而，正当他沉浸在这舒爽的气氛中怡然自得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紧接着便见到有一队持戈的武士破门而入，还未等他有所反应，冰寒的戈戟便已经抵在了脖颈上。

伴随着场景的快速切换，荀偃被带到了一处奇异的宫殿中。房间里没有阳光照射，也没有烛火闪耀，昏暗中他只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正端坐在大殿的尽头，声泪俱下地控诉着。激烈的声音穿过长长的廊道传过来，荀偃隐约分辨出来：原来那人正是他十九年前弑杀的国君——晋厉公！

恍惚之中，荀偃只知道自己在一个声音的责问下，拖着长长的哭腔声嘶力竭地辩解，而对方则似乎早已洞穿了自己的内心，不停地回击、不停地质问，最终将自己的辩解批驳得体无完肤。审判拖沓而冗长，永远都没有尽头，让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同时也感到万分疲累。伴随着一阵浑厚的声音响起，荀偃一生的罪行都被人列举了出来，用变形的红色字体刻在了竹简上，悬挂满了整座大殿。这时，晋厉公突然发起狂来，他手持长戈，披头散发地冲上前来，挥手间便将荀偃的头颅砍落在地。

这时的荀偃早已不知什么是疼痛、什么是恐惧，他跪在地上将头颅捧起放在脖颈上，然后慌不择路地跑出殿外。这时迎面跑过来一个人，荀偃躲闪不及一头撞了上去。当头颅再次滚落在地，几经翻转停下来时，他才看清那个人的模样，是一个名叫巫皋的梗阳（今山西清徐）人。而就在这个时候，荀偃猛然惊醒过来——原来这是一场梦啊！

荀偃在年轻时曾与栾书联手弑杀晋厉公，如今死难者前来寻仇，“舞台效果”还这么恐怖，可把荀偃吓得不轻。而更让他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后来有一次他外出路过梗阳，恰好就遇到了梦中见过的巫皋，于是便将梦中所见和盘托出。听罢荀偃的描述，巫皋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而是平淡地说当时他就在此梦中。

这句话更把荀偃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巫皋却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继续向他解释梦境的含义：“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左传·襄公十八年》）什么意思呢？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如果要向东方用兵，必可获胜；坏消息是你今年必死无疑。

这段故事充满玄幻色彩，实在不足为信。但从中可以看出，过去弑君的罪行让荀偃耿耿于怀，因此当他预感到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便打算要向齐

国用兵，想用战功为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赎罪。

平阴之战

晋平公三年周历十月，晋平公亲领大军东渡黄河，与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国组成联军，声势浩大地向齐国开拔而来。

大军行进至黄河岸边时，荀偃用丝线将两对玉璧绑在一起投入黄河，向河神祷告说：“齐国仗着人多势众、山河险阻公然背弃盟约、凌虐百姓，曾臣彪（晋平公）将带领诸侯前去讨伐，官臣荀偃前后侍奉辅助。只要此战能够取得大捷，不让神灵感到羞耻，官臣愿此后永不渡河！唯愿神灵公正裁决！”

晋军渡河之时，齐灵公早已得到消息，提前带军在平阴（今属山东）南部的防门深挖堑壕。由于防门地势平缓，不足以阻滞联军，于是便有灵公内侍夙沙卫提议，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倒不如依凭泰山之险来阻遏联军。

当时晋军主将荀偃身负重疾不能作战，加之此次伐齐准备仓促，晋军的战斗意志实际上并不强，齐灵公若是能依照夙沙卫的提议，说不定还能抵挡一阵。但齐灵公和他的父亲齐顷公一样，空有一身的勇武却不懂变通，非要和晋军正面对决，战争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激烈的战斗，齐军死伤惨重，但由于防门城防坚固，联军一时半刻也无法攻取，于是他们就祭出了心理战的招数。当时有齐国大夫析文子（字子家）与晋国中军佐士匄相熟，战争进行当中，士匄特意找到析文子并向他透露了一个“绝密”消息：“你我交情不错，所以就不对你隐瞒了。鲁、莒两国都请求从本国带一千乘战车朝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攻打齐国，我们已经

答应了。估计过不了多久，两千乘战车就会抵达临淄城下，到时候齐国必亡。你何不考虑一下呢？”

析文子听出土句的意思是让自己预先谋划好退路，但作为齐国的臣子，在国家危亡关头，又如何能只顾着自己逃命呢？因此在告别了土句之后，他快马加鞭跑到齐灵公面前把这些话都倒了出来，让齐灵公更是惊惧。上大夫晏婴在一旁看得真切，责怪析文子说：“国君本来就没有勇气，如今你还非要把这些话传给他，他不吓死才怪！”

不过，惊惧过后齐灵公仍然抱有侥幸心理，以他这些年来获得的情报，晋国早已是国弱民疲，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如此声势呢？他登上巫山去瞭望敌方阵地，结果看到对面山坡上密密匝匝地站满了敌方的军士，山前道路上布满了晋军的战车和旌旗，山的后面尘土飞扬，更不知还有多少敌军正在集结……齐灵公登时就被吓破了胆：晋军集结这么多的军队，哪里是要讨伐？这分明是要灭我的国啊！

事实上，齐灵公此刻看到的景象，与九百多年后的淝水之战中，苻坚北望八公山时所看到的阵地如出一辙：晋军命司马排除山林河泽的险阻，在齐灵公目之所及的地方都插满了旗帜、站满了士兵。人数实在不够了，他们就用草垛来做伪装。晋军的战车也是如法炮制，所有的车辆都在道路上排开，每辆车上都只站一个人，剩余的位置也以草人顶替。这还不算，在山的背后，那些齐顷公所看不到的地方，晋军也用战车拖曳着树枝来回奔跑，荡起阵阵烟尘，就好像是还有大批军队正在赶来……

见到这如假包换的“草木皆兵”景象，齐灵公早已是魂不附体，哪里还有时间去辨别真伪？急忙下令让全军连夜撤退。

十月二十九日一大早，晋军中不少人都看到了平阴城内有成群的乌鸦盘旋，知道齐军已然退兵，于是便从容地进驻已为空城的平阴。晋军先锋州绰则带兵尾随追击齐军，俘获了殿后的齐国猛将殖绰、郭最。

在完成对平阴的占领之后，晋国本打算继续追击齐军，但鲁、卫两国为削弱齐国的边防力量，建议先攻取泰山周边的险要之地。荀偃从其所请，遂带兵于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九日先后占领了京兹、郛两座重镇。

到十二月初，联军又继续向临淄靠近，抵达秦周城外，并在临淄的雍门之外砍伐楸木以补充战备。按照《左传》的描述，联军对临淄的侵扰主要由中军佐士句之子士鞅执行。首先是在初二日，士鞅带兵攻打临淄西面的雍门。初三日，放火焚烧了雍门以及西郭、南郭等外城；而刘难、士弱等人则是在南面的申门外放火，焚烧了申池边上的竹木。初六日，他们又烧毁了临淄东、北两座外城；士鞅带兵进攻西北方向的扬门，州绰则带兵攻打东闾。

此番联军来势汹汹，临淄的四面外城在遭到劫掠之后又被付之一炬，眼看着整个都城都要陷落了。齐灵公震恐不已，于是便准备驾车逃往邮棠（今山东平度）。太子光和郭荣见状，急忙拉住他的车马，苦劝道：“诸侯联军行动快速，无非是想要掠取一些物资，很快就会退兵，有什么好担心的？国君作为一国之主，怎么能在這個時候逃跑呢？”

太子光虽不知晓敌方内情，但从进攻方式做出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晋军之所以要对齐军连续使诈，并在临淄城外大肆劫掠纵火，为的就是要震慑齐人，好尽快达成盟约。然而齐灵公方寸已乱，满心想的都是要赶快逃命。这让太子光感到十分恼火，于是当机立断斩断了马鞅，这才把齐灵公给稳住了。

齐国内争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如太子光所料，联军并没有继续围攻临淄，而是在焚烧了外城之后旋即解去，转而向齐国东南方向挺进。其兵势所及，最东端抵达了潍水西岸，最南到达了沂水北岸，几乎横扫了齐国全境。

到晋平公四年（前554年）春，因荀偃病情日笃，加之又有楚国侵郑的消息传来，联军便在没有与齐国达成盟约的情况下仓促西撤，在距离靡笄山不远的督扬（又名祝柯，位于今山东济南）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盟。会盟再次重申了“大毋侵小”的原则，并抓捕了邾悼公，命其将侵占的土地归还给鲁国。

会盟结束之后，晋平公先行回国，其六卿在鲁国接受了鲁襄公的宴请。鲁襄公感恩晋国的倾力相助，于是便仿照鞌之战的规格，赐六卿以三命之服，赐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以一命之服。此外，中军元帅荀偃还获得了鲁国包括“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在内的诸多贿赂。

这年二月十九日，荀偃刚刚渡过黄河，便在著雍病逝了，临终前仍执着于齐国未平之事。接替其继任中军元帅的士匄继承其遗志，先后发动了两次对齐战争，一次是由栾氏亲贵栾黶与卫国大夫孙林父联合出兵，第二次则是由士匄亲自出征。

不过，当士匄带兵抵达谷邑的时候，却听到了齐灵公已经病故的消息。本着“不乘人之丧”的原则，士匄只好退兵再寻时机。而随着齐灵公的去世，齐国内部也突然陷入了混乱，而引发内乱的正是我们熟悉的一个人物——崔杼。

平阴之战让原本骄纵狂妄的齐灵公受到极大刺激，待联军退却之后，他就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了劝阻他出逃的太子光的身上，于是便不顾劝阻废掉公子光，另立了宠妾戎子的养子公子牙为太子。

公子牙的生母名叫仲子，听到这件事后感到十分忧虑，她劝说齐灵公道：“光被立为太子已有多年，且常年参加诸侯的盟会，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如今平白无故地废弃他，难免会让诸侯认为齐国专横，且有轻视他们的嫌疑。废弃常规是不祥，冒犯诸侯则难以成功，您现在以难为之事冒犯不祥，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仲子虽是公子牙的生母，但终究不受宠爱，她的话齐灵公自然也没有听进去。不久后，公子牙还是被立为太子，齐灵公命高厚和夙沙卫做他的老师，原来的太子光则被流放到了东部边境。

公子光遭到贬斥，其老师崔杼的地位自然也就受到了影响，因此一直处心积虑地谋求政变。不久，齐灵公病重，崔杼终于找到了时机，就偷偷地把光接回来重新立为太子；待齐灵公死后，又将其推上了国君之位，是为齐庄公。

齐庄公重新得势之后，迅疾展开了一场报复行动。他先是将公子牙的养母戎子杀死并陈尸朝堂，后又在句渚之丘（今山东菏泽北）抓捕了公子牙，后又命崔杼将其太傅高厚杀死，高厚的采邑也都被崔杼兼并。

公子牙的少傅夙沙卫闻变，急忙逃到高唐据城叛变，但囿于其宦官身份，终究还是难以久持。到这年十一月，齐庄公在殖绰、工倭会的配合下攻入高唐，把夙沙卫剁成了肉酱，持续半年的动荡才告平息。

到了这个时候，齐庄公才终于腾出手来与晋国在大隧讲和。到第二年夏天，晋国又邀合齐、鲁、郑、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国君在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北）举行了一次盟会，标志着晋齐联盟再次达成。

然而，齐庄公之所以要与晋国讲和，只是由于齐国内乱未靖，并不是真正顺服。此后的几年间，他一边清算公子牙的党羽，一边暗暗地扩兵备战，伺机对晋国展开新一轮的报复。

齐人伐晋

晋平公六年（前552年）秋季，晋国爆发了一场内乱。担任下军佐的栾盈受到母舅的诬陷，被士匄调离新田到著雍筑城，随后又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驱逐出境，只得仓皇出奔到了楚国。

栾盈受逐之后，士匄先后在商任和沙随举行了两次诸侯会盟，三令五申要求与会各国禁锢栾氏，也即不允许任何人收容栾盈。但齐庄公或许是早就打定了要利用栾盈扰乱晋国的主意，因此在参会时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恭敬，回国之后更是收容了栾氏党羽——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到了第二年，栾盈在楚国不得志，于是便转道去了齐国，齐庄公同样将其奉为座上之宾。

齐庄公的种种表现在国内外都招来了不少非议。比如在举行商任会盟时，晋国大夫叔向就指责他“怠礼失政”，必然不能免于祸难。栾盈奔齐之后，齐国上大夫晏婴也曾劝导说，信用是立身立国的根本，既然已经接受了晋国的命令，就不该私下里接纳栾氏。但晏婴的一番肺腑之言终究没被采纳，事后只得愤愤不平地言道：“君主要保持信用，臣子才能保持恭敬。君臣上下执守忠、信、笃、敬，才是上天的常道。如今国君自暴自弃，恐怕是不能长久了！”

晏婴的谆谆教导，实际上是立足于国内的紧张局势，希望齐庄公能放弃无意义的争霸战争，集中精力解决齐国的内在矛盾。然而齐庄公却如齐国的

历代先君一样，都将恢复霸业作为第一要务，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能够搅乱晋国的机会，又岂能轻易放过呢？

齐庄公并没有为此等待太久。栾盈抵达齐国的半年后，也即晋平公八年（前550年）春季，晋国准备嫁女到吴国去。按照当时的习惯，诸侯嫁女可以由同姓诸侯致送媵妾，异姓的诸侯则无此义务。姬姓的晋国嫁女跟姜姓的齐国本就没什么关系，可齐庄公却非要主动为晋国致送媵妾，这让晋国实在无法拒绝。而齐庄公也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派析归父用篷车装着栾盈和他的同伙偷渡进入晋国，并将他们安置在栾氏根据地曲沃。

这年四月，栾盈带领曲沃的甲兵攻入新绛，由此开启了晋国长达半年的军事动荡。为配合栾盈在国内的行动，齐庄公于当年秋季尽起大军，在对卫国进行了一番袭扰之后，径直侵入晋国攻取了东阳重镇朝歌（今河南淇县）。

随后，齐庄公命人在郕邵（今河南济源西）戍守，以防止诸侯断其后勤，同时下令全军兵分两路插入晋国腹地。其中一路入孟门（今河南辉县西），经白陘进入长治盆地；另一路则自太行陘入晋城盆地，一直推进到距离新田不足百里的茆庭（今山西翼城东南）。但由于彼时士匄已基本控制局势，栾盈被围困在曲沃城内不得伸展。齐庄公见形势不利，不敢贸然挺进，于是便分别在茆庭和少水（又称沁水，今沁河）一带收集晋军尸体修筑了两座京观。

齐军撤退期间，邯郸赵胜带领东阳之师与鲁国叔孙豹带领的援军在半路夹击，俘获了晏婴之子晏婴。但由于晋国深陷内战漩涡，这次阻截并没有对齐军的整体行动构成太大阻碍。

对于这次伐晋战争，齐国内外都有反对的声音。当时把持朝政的崔杼以及上大夫晏婴都曾极力劝阻，认为这次钻了晋国内乱的空子落井下石，将来一定会为齐国招灾引祸。鲁国流亡大夫臧纥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您的行为就像是昼伏夜出的老鼠，听说晋国有乱就出兵打劫，可一旦对方安定下来，就又要想着如何侍奉。”这种行为很让人不齿。

事态发展不出所料，晋国的内乱很快就平定了。这年冬天，晋军攻克曲沃，栾氏合族被灭，只剩下栾魴等少数人逃奔宋国。齐庄公为此感到十分忧虑，于是就打算联楚抗晋，还与楚康王约定了会见的时间。但楚国的使者还没有离开齐国，齐庄公就得到了晋国已经出兵的消息，于是就又告知不能会面了，转而派陈无宇随楚国使者同行，向楚康王请求出兵协助。

崔杼弑君

晋平公九年（前549年）秋，晋国会合郑、宋、鲁、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国君在夷仪（今河北邢台西）举行会见，准备讨伐齐国。

此战尽管由于发生了水患没能成行，可还是把齐庄公吓得够呛，急忙派人到成周去帮助王室修筑城墙，以期如“吉祥物”一般的周天子能在晋国面前帮自己说句好话。得到齐国好处的周灵王不知是否有此好意，但这些对于齐庄公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很快齐国就发生了一桩弑君惨案，而制造这桩惨案的正是扶植其上位的崔杼。

话说崔杼的妻子原本是齐国大夫棠公之妻，因此常被人称作“棠姜”。棠公去世的时候，崔杼前去吊唁，一下子就被棠姜的美色吸引住了。恰好崔杼的家臣东郭偃是棠姜的弟弟，崔杼就通过他的关系将棠姜娶进门来。

然而正所谓“食色性也”，追求美好事物是人的天性，棠姜的美色很快也引起了齐庄公的注意。为了能够长期与棠姜缠绵，齐庄公隔三岔五就把崔杼派出去公干，崔杼虽心中愤恨却也无可奈何。

若一切都到此为止的话，事情还不至于闹到不可收场的地步。可偏偏齐庄公不知收敛，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崔家的主人，随手就把崔杼的帽子拿出来赏赐给别人。一如当年夏徵舒因受辱于陈灵公而做出弑君之举，齐庄公行为如此不堪，崔杼的弑君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晋平公十年（前548年）五月，莒国国君前往齐国朝见，齐庄公在北城设宴款待，崔杼推托有病没有参加享礼。齐庄公听说之后，就以探病的名义去与棠姜私通，不料却被崔杼设计困在了内室。齐庄公发现自己落入了圈套，于是急忙爬上高台请求免死；眼见得不到许可，他又退而求其次，乞求能在太庙自尽，以便在死后还能够进入兆域，却也未能如愿。

与士匄诛灭栾氏后的做法类似，在处理掉齐庄公后，崔杼也在国内展开了大搜捕。这次政变牵连甚广，朝中一千大夫几乎被一网打尽，许多豪门贵族就此衰落，由此在齐国形成了寡头政治的局面，使得君主权威彻底走向了衰落。

齐国发生内乱的时候，晋平公正在夷仪举行会盟，商讨讨伐齐国的具体方略。崔杼不失时机地派隰鉏赴会，向晋国请求和解，新任左相庆封则将贵族男女分开排列捆绑起来带到会盟地点，随后又把宗庙里的祭器和乐器送给晋平公。此外晋国各级官员，不仅到场的六卿、五吏、三军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的统帅见者有份，就连国内留守的官员也都收到了齐人送来的礼物。

齐国以一个大国却展现出如此屈辱的姿态，晋国也只能顺水推舟，同意了他们和解的请求。尽管这并不是齐国对晋国的最后一次挑战，但至少在当下，持续了十几年的晋齐交锋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第四节 弭兵终战

重建互信

晋齐争锋的这十几年间，由于楚国退出了争霸战争，中原地区的战争频次大幅度降低，诸侯国之间取得暂时的力量平衡。尤其是在齐庄公被杀后，唯一能够对晋国形成挑战的齐国也渐而偃旗息鼓，这就使得晋国的霸主地位愈发稳固，诸侯也就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了。

然而，由于霸业秩序的惯性使然，加之时任正卿士匄权力欲的不断膨胀，诸侯对于霸主的职责力役不但没有得到减免，反而有日益加重的趋势，这就让诸侯都颇有微词。

早在固宫（晋襄公的别宫，在今山西侯马）之役的前一年，也即晋平公七年（前551年），士匄就曾无端征召郑人来朝，时任郑国少正的子产（公孙侨）气愤不过，便在朝堂上当场质问晋国。子产首先回顾了晋悼公复霸时期的几次重要会盟，表示“郑国紧邻晋国，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草木和它散发出来的气味，郑国如何敢有半点差池？后来楚人不能争竞，郑人就以土地上的出产和宗庙中的宝器接受了诸侯的盟约，从此以后晋人但凡有对外征伐之事，郑人无不紧紧跟随，从来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便是在没有朝见的时候，郑人也是年年都来聘问，事事小心跟从，可谓勤勉恭敬。然而‘大国’的政令却没有定准，导致郑人国疲民乏，意外的事件不断发生，郑人日日都活在忧虑恐惧之中，又岂敢忘记自己的职责本分？”

紧接着子产义正词严地说道：“晋国若为郑国考虑，那么即便是你们不召见，我们自己也会前来朝见。反之若晋国役使无度，不体恤郑国的艰难，使得我们不能尽心尽力侍奉贵国，那就是要将郑国视为仇敌了。真要到了那

一天，我们郑人虽会感到害怕，但也会奉命而行，希望执事能够慎重考虑！”

子产对士匄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但却是对牛弹琴，完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此后的几年间，士匄忙于应付栾盈的作乱和齐国的讨伐，一直没有闲心来调整其对外政策；待一切归于平静，士匄因胜而骄，开始变本加厉地凌虐诸侯。

到晋平公九年（前549年）时，郑简公再来朝见，子产便托随行的子西带来一封信件，信上说：“在您的治下，诸侯四邻听不到您的美誉，却只知道有很重的贡品，侨因此感到十分困惑。要知道君子治理国家从来都不担心财礼够不够，只担心有没有好的名声。名声是德行的载体，而德行又是国与家统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了，上层建筑才不至于受到损坏。您若能用宽恕来弘扬德行，那么好的名声就会传布天下，远处的人听到后都会慕名而来，近处的人更是会因此获得安定。与之相反的是，财富的过度聚集只能是内部忧患的源泉，一旦有了忧患，您自己也会深受其害，这点道理难道您不明白吗？”

按照《左传》的说法，士匄听到这些话感到十分高兴，于是就减轻了郑国的贡赋。但从后来的情形来看，士匄做出的调整十分有限，晋国真正减轻诸侯的职贡力役，恐怕还要等到其继任者赵武上台的时候。

晋平公十年（前548年）七月，刚上任不久的赵武在重丘举行了一次会盟，宣布“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也就是大规模地减轻诸侯的职贡力役，同时提倡要着重于礼仪。

与此同时，赵武在接见鲁国大夫叔孙豹时，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了“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的愿望，由此开启了“第二次弭兵会盟”的进

程。在他看来，“齐国的崔氏、庆氏刚刚凭借弑君之举取得执政地位，正希望与诸侯改善关系。而楚国的令尹子木也有停止战争的想法，只要我们恭敬地执行礼仪，在与他交往时注意分寸，安定诸侯、弭兵休战离我们并不遥远”。

事实上，早在重丘会盟之前，晋国推动弭兵会盟的工作就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了。首先是在平公九年（前549年）五月，赵武的搭档——晋国中军佐韩起率先赶赴雍都与秦景公达成了和解；作为回报，秦景公也派出自己的弟弟公子针到晋国参加结盟。尽管因秦人芥蒂未消，和谈的结果并不稳固，可也总算是两国和平事业迈出的重要一步。

重丘会盟之后，弭兵的准备工作进入了加速阶段。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春，秦景公再次派公子针到晋国修约，标志着两国之间正式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当年冬天，韩起又受命到成周聘问，口称“晋国的士韩起前来向天子的宰旅奉献四时的贡品”，实际上是向王室传达当前的工作进展。与此同时，为了打破国际社会对晋国的不信任态度，赵武还特别策划了一场归还侵地的行动。

大约是在晋平公九年时，齐国大夫乌余叛逃至晋国，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批丰厚的“嫁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在齐国时的封地廩丘（今河南范县）。廩丘位于齐、鲁、宋、卫四国交汇之处，乌余归晋之前，还一路向南侵扰，先后占领了卫国的羊角、鲁国的高鱼和宋国的几座城池，晋国也都照单全收。诸侯对此都颇感不满，但迫于晋国内政走向不甚明朗，因此不敢贸然提出要求。等到赵武执政之后，这件事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晋平公十一年冬，赵武向晋平公提出建议，说：“晋国作为盟主，如果发现有人侵犯他国，就要施加讨伐，让他归还所侵夺的土地。如今乌余带来

的土地全是从他国侵夺而来的，可我们却因为贪图利益而不加讨伐，如此行事恐怕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希望能够将这些土地归还给诸侯。”

晋平公也正有此意，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赵武就推荐了一个叫胥梁带的人，说他不用带兵就能够完成任务。这个胥梁带据说是胥午的儿子，几年前胥午追随栾盈叛乱失败后，没落的胥氏又转入了赵氏的麾下，很受赵武的信任。

晋平公十二年初，胥梁带通知齐、卫、鲁、宋四国派人马前来接收所失城邑，但事先要求各方要严加保密。与此同时，他又通知乌余说，诸侯迫于晋国的威严，同意将占据的土地赠送给他，要他前来接受封地。乌余只知胥梁带未带甲兵，却不知其中有诈，于是便兴高采烈地带着部众前来准备受赏，结果被诸侯的军队一网打尽，其侵占的土地自然也都物归原主。

当然了，这次行动实际上做得并不彻底，至少因孙林父叛逃导致的戚邑归属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但晋国公开处置叛臣、归还各国侵地的举动，还是在诸侯间引发强烈的反响，在中原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基础，为接下来的晋楚弭兵创造了条件。

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今包括秦国在内的中原地区已经达成了空前共识，唯一的不确定因素便只在楚国一方了。那么，对于这次的弭兵会盟，楚国人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康王治政

随着晋悼公复霸大业取得成功，楚国的势力渐渐退出中原，其战略重心也转移到了对吴作战之上。而在其内部也出现了政局不稳定的迹象，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君权与卿权的冲突。

自楚庄王以来，楚国一直采用“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的用人政策，在共王时期担任令尹的子重（公子婴齐）、子辛（公子王夫）、子囊（公子贞），以及楚康王即位初期的子庚（公子午）都出自王室近亲。这套规则有效避免了若敖氏专权逼君局面的重现，但在运行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其中固有的缺陷也逐渐暴露了出来，这就使得楚康王不得不改弦更张，以减轻这些握有实权的公子对王权的侵蚀，而这自然也就给当时的令尹子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晋平公三年（前555年）时，晋齐平阴之战爆发。郑国执政子孔想要进一步实现专权，于是就趁郑简公带着三卿伐齐的机会与楚人联络，打算除掉与自己作对的大夫。令尹子庚犹记子囊的临终嘱托，于是断然拒绝了子孔的请求，但楚康王知晓后却借题发挥，派人责备他说：“主持社稷却不能用兵于外，死后就不能按照礼仪安葬。不谷即位至今已有五年，却始终没有出动军队，国人恐怕会认为不谷只顾自己安逸，全然忘记了先王的霸业。大夫何不考虑一下？”

康王的猜忌让子庚感受到莫大的委屈，他为自己辩解说：“君上这么说，莫不是在指责我贪图安逸？可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国家大局着想啊！”见楚康王态度坚决，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说道：“如今诸侯与晋国和睦，若是王上一定要干涉郑国事务，不如就让臣带兵试探一下。假如有隙可乘，王上就北上伐郑；若是不行，臣退兵回来就好了，王上也不会受到羞辱。”

子庚出兵北上的时候，留守新郑的子展、子西已经知晓了子孔的计划，于是就预先加强了守备，使得子孔不敢贸然与楚军会合。楚军在缺乏接应的情况下兵分三路，分别由令尹子庚、右尹公子罢戎、大司马蔿子冯带领，接连侵扰郑国北部边境和近郊，但都无功而返。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正是秋冬时节，楚军回师途中突然遭遇冻雨。衣衫单薄的士兵大都被冻伤，在军中服杂役的人更是伤亡殆尽，楚康王终于为他的任性付出了代价。

晋平公六年（前552年）夏天，令尹子庚去世。楚康王打算借机把令尹职权授予远支公族蔺子冯，但蔺子冯有感于子庚忠于国事却不受信任，担心自己也会不得善终，于是便装病以推脱任命。楚康王派医生前去探视，得知情形后也不便勉强，只好改派自己的叔叔子南（公子追舒）做了令尹。

子南上任后据说十分骄奢，他的宠臣观起俸禄不高，家里却有能拉几十辆车子的马匹，这让楚康王很不放心，仅仅一年之后就把子南杀掉了。子南死后，康王再次委任蔺子冯为令尹，蔺子冯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上任。为了避免重蹈子南的覆辙，他听从好友申叔豫的劝说，将平日里亲近的人全都辞退了，这才换取了楚康王的信任。

蔺子冯在楚康王的猜忌下上任，自然不敢坚持以前的政策。恰好在他任上，齐庄公出兵讨伐晋国，后又因担心遭到报复而有意与楚国结盟，蔺子冯顺势派蔺启强到齐国去约定会面的日期。但因为听到晋国已经出兵，齐庄公转而又改派陈无宇到楚国乞求救兵，楚国为此特意联合了陈、蔡、许三国出兵伐郑以救援齐国。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齐国发生了水患，晋国召集诸侯却没办法讨伐齐国，只好掉转马头直奔郑国而来。这样一来，原本只是为了帮助齐国牵制诸侯的楚军反而成了主要进攻对象，楚康王“好汉不吃眼前亏”，仓促之下只得撤退回国。

这场战争结束一年后，蔺子冯在令尹任上病逝，他的儿子蔺掩出任司马，原来担任莫敖的屈建（字子木）荣升令尹。屈建在任期间，对外修整军

备，平定了舒鸠的叛乱，诱杀了吴王诸樊，极大地挫伤了吴国的士气；对内实行了系统性的经济普查，记录土地泽田、山林水产的情况，根据土地的质量，区别高地、盐碱地、水淹地，重新进行土地划分，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土地和税制改革，缓解了国家财政压力。这一系列改革举措受到了广泛赞誉，但与此同时，作为远支公族的屈建和蔦掩同时担任令尹和司马，这种情形也是五十年来的首次，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楚康王用人政策的转向。

楚才晋用

楚王通过控制令尹的职权来对全国的贵族实行控制，令尹之下有司马、莫敖，地方上有连尹、箴尹等主官，其地位高低并无一定之规，且通常情况下都不能世袭。在这个制度框架下，王室控制多数资源，各级长官难以形成以世袭为基础的稳定格局，也无法通过长期积累的方式侵蚀君权。这就使得楚国顺利避开了中原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进而成为春秋时期君主集权制度最为稳固的国家。

但与此同时，楚王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也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上位者势单力孤，为了稳固地位就必然要聚集一批党羽，而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倒台，也会有一大批人受到牵连。结果就是每次权力的重新洗牌都会造成大量贵族流亡，又使得楚国成了春秋时期人才外流最为严重的国家。

如今楚康王着意调整用人政策，自然也会导向对近亲公子的打压甚至迫害，大量贵族的外流也在所难免。在屈建担任令尹的时候，就发生了申公王子牟失势出逃的事件，其女婿伍举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从而不得不流亡国外。伍举出逃之后，本来打算赶往晋国安身，谁知在郑国碰巧遇到了蔡国大夫声子（公孙归生）。声子同情其遭遇，于是就提出要帮助其返回楚国。

在完成外交使命之后，声子回到楚国复命。其间聊到在晋国时的见闻，屈建好奇地问道：“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比起来，谁更贤明？”

声子当即卖了个关子，说道：“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不过他们的大夫却要比楚国的强，个个都是做卿的材料。”

这话当即引起了子木的兴趣，于是就进一步追问其原因。声子不紧不慢地回答道：“这就好比是杞木、梓木、皮革这些东西，晋国本来是没有的，他们现在所使用的都是从楚国运送过去的。楚国人才众多，然而却是在晋国得到任用。”其言外之意是说，晋国的那些贤明的大夫，全都是楚国流失的人才。

声子的话指向特别明确，但子木似乎并未理解其中的含义，反而又问道：“难道他们的亲戚都不堪重用吗？”

声子回答说：“有是有，但更多的还是楚国人。”接着声子开始述说自己的观点：“治理国家要把握一个尺度，无论是赏赐还是刑罚都不可滥用，赏赐过分了，容易让坏人得志；刑罚太滥了，就会让好人跟着遭殃。因此在施加刑罚时，宁愿放掉有罪的人，也不可因此而错杀一个好人，否则好人一旦受到牵连，最终受害的还是国家。而楚国的情况却恰好与此相反，因为刑罚过重，导致那些本应受到重用的人才四散逃离，成为他国的重要谋士，这难道不该反思吗？”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声子列举了析公、雍子、申公巫臣、苗贲皇等因受内乱牵连而出逃，随后又成为晋国谋士反过来危害楚国的例子，并指出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楚多淫刑”。

声子的见解振聋发聩，令屈建不由得“愀然”而叹。看到时机已然成熟，声子便趁机为伍举脱罪，说伍举不就是这样的牺牲品吗？屈建顿时醒悟，急忙向楚康王保举，这才恢复了伍举的地位。

伍举素来以才德著称，有关楚庄王“一鸣惊人”的故事就是借用了他的名号，再加上其后人伍子胥的武功传奇，更使其在后世声名大噪。由于伍举的地位超然，蔡国大夫声子的讲话也着实精彩，使得人们往往热衷于谈论故事的表面意思，惊叹于声子精湛的语言艺术、盛赞屈建的从善如流，但却忘了这件事发生的前提是申公王子牟的获罪，而这正是楚康王排斥近支公族的典型例证。

声子劝说屈建，其本意或许是在为伍举谋划，但也是有感于“楚多淫刑”的现状，希望能够改善楚国内部的紧张局面。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国内政走到了如今这个局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愿意改变德行就能扭转的。声子尽管看到了制度缺陷带来的影响，却无法阻止势头的继续蔓延，这也就为楚国后来的变乱埋下了伏笔。

齐集商丘

政治上混乱外加吴国的不时侵扰，使得楚国积极向上的扩张势头一去不返，但也的确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外部环境，以重新梳理和调整纷乱的国内局势。因此当晋国提出要弭兵休战的时候，楚国是真心欢迎，也乐于积极与晋国展开协商，此次蔡国大夫公孙归生的出使，就是为此而来。

在当下这个时节里，晋楚之间议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据《左传》记载，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宋人伊戾诬杀太子之时，就提到了有楚国使者正要前往晋国。

同样是在晋平公十一年，秦楚联军曾两度讨伐郑国，其中的第二次是为了完成许灵公的心愿。当时许灵公的态度十分坚决，声称如果不能讨伐郑国，他就不回去了。谁知话音刚落，许灵公果真就死在了楚国。楚康王怜悯其一片赤诚，于是就尽起大军讨伐郑国，也算是帮他完成了最后的心愿。

郑国大夫子展听闻楚军入侵，急忙准备要出兵抵御，但子产却说：“眼下晋楚讲和在即，楚国却冒冒失失地来进攻我国，无非是追求些虚名罢了。倒不如让他们称心如意地回去，这对于弭兵之事或许还能有所助益。”

子展听了之后深以为然，就没有部署军队迎击。楚军在郑国境内不紧不慢地拆了一堵城墙，抓了九个没有进城的郑国人，然后回去安葬了许灵公，用他们劫掠的战利品告慰许灵公的在天之灵，事情也就这么马马虎虎地过去了。

晋楚之间的会盟呼之欲出，热衷于虚名的宋国左师向戌看到这个机会，便积极地在晋、楚、齐、秦之间奔走。在到访晋国时，晋卿韩起表示乐见其成，他说：“战争是残害百姓的祸事，是国家财货的蛀虫，也是小国不堪承受之大灾难。尽管永久地消除兵祸并无可能，但至少也值得尝试一下。否则一旦让楚国抢占了先机，并且据此来号召诸侯，恐怕会让我们丧失盟主的地位。”于是就同意了向戌的提议。

向戌此行受到的唯一阻碍，是当他到访齐国的时候，齐国尚且不肯放弃争霸的图谋，故而有所迟疑。不过，在陈文子倡议之下，齐国终于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获得了四个主要大国的准许之后，向戌又匆匆赶往列国，向各国通告了会盟的日期，并开始积极筹备即将到来的弭兵大会。

会议召开的时间在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夏天，《左传》用了很大篇幅来记述各国代表参会的具体经过，足见其重要性。

至七月初四，楚国及其盟国陈、蔡、许，晋国及其盟国齐、郑、宋、鲁、卫、邾、滕、曹都已经抵达参会地点。晋楚两国就相关议题进行了多轮磋商，议和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议定于七月初五日，各方代表在宋国城西的蒙门外举行正式的结盟。

晋楚争盟

晋平公十二年七月初五日，商丘城西门外人头攒动，喧闹非凡。包括晋、楚、齐、宋、郑、鲁、卫、陈、蔡、曹、许、邾、滕等在内的各国诸侯（秦国未见记载）齐聚一堂，准备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盟会。前来参会的各国都用临时筑起的篱笆作为分界，晋楚两军各自驻扎在队伍的两头。

然而，会盟开始前，晋国下军佐荀盈（伯夙）敏锐地觉察到一些异样，于是就提醒赵武说：“楚国方面的气氛很是不妙，我担心他们会突然发难。”

赵武轻描淡写地说道：“怕什么？如果楚国真有什么异动，我们直接向左进入宋都，他们也拿我们没办法。”

但不久后，又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包括子木在内的所有楚国代表全部带甲上阵！在他们宽袍大袖的华服掩盖之下，所有人都穿着皮甲，显然是有备而来。

作为当今头号大国晋国的执政卿，赵武对近百年来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故事都谙熟于心。当他听到这个消息，首先想到的便是宋襄公的故事，心下大惊。

他急忙向叔向询问对策，然而叔向对此却毫不在意：“这有什么好怕的？我听说，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一旦做出不守信用的事情都会不得好死，更何况是堂堂大国执政？在诸侯会盟这么重要的场合，子木要真敢做出什么不守信用的举动，将来还能善了吗？因此我倒觉得这个时候该他担心才是。退一步讲，就算是他丧心病狂真要动手，我们还可以依靠宋国的防卫设施予以抵挡。到那个时候，中原诸侯同仇敌忾一往无前，他就是再多来一倍的人也无济于事，反而更加有利于诸侯的团结。”

作为土生土长的晋国人，楚国太宰伯州犁对于晋国此次会盟的诚意看得很清楚，反而有些不理解子木的举动。他曾劝谏说：“诸侯之所以要与我们结盟，是因为怀着对我们的信任，可你如今的举动却恰恰又是怀着不信任的态度，这样如何让诸侯心悦诚服呢？”

然而子木却很不以为然：“晋楚之间缺乏信用已经很久了，又不是今天才有的！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就尽管去做，我只求一切如愿，至于信用这东西不要也罢！”

会盟开始之后，双方忧虑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倒是为谁先歃血而争执起来。晋国认为自己素来都是诸侯盟主，从来都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晋国之前歃血的，因而要求主盟。可楚国人却不服气，说你也曾提到过，晋楚是地位对等的国家，如果每次都让你们晋国来主盟，这岂不就等于是说我们楚国不如你晋国吗？更何况，一直以来都是晋楚交替主持诸侯会盟，你晋国已经主持多年了，也该轮到我们楚国了吧？

眼看着时间唰唰地就过去了，光是由谁来主盟这件事情就争执了半天。这个时候叔向就站出来劝说赵武：“诸侯归附晋国所崇尚的是我们的德行，而不是主盟者的地位。只要我们致力于德行，诸侯自然会欣然前来，又何必

争这么一个主盟者的虚名呢？更何况，诸侯会盟时由小国主持结盟也是常有的事，就让楚国来充当一个小国盟主，不也是合情合理的吗？”

赵武听了心想也罢，眼下诸侯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表现，倘若晋国能再退让一步，尽早促成双方的弭兵，这于诸侯便是大恩德一件，人们自然会有所感念的。这么一想，心下释然，于是就同意让楚国先歃血。

这次盟会能够顺利举行，与晋国执政赵武的谦和礼让有莫大关系，这也让在场的诸侯看在眼里，心服口服。想来以晋国的霸姿态，在如此重大的场合下自甘居于楚国之下，必然要有宽广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因此，各国在记叙此事的时候，都依旧把晋国放在楚国的前面，将其奉为实际上的盟主。

初六日，宋平公设下享礼同时招待晋楚两国的大夫，也是让赵武做了主宾，而争得主盟位置的屈建却只能居于次席。双方第一次面对面坐在一起，自然都想在气势上压对方一头。在这次宴会上，子木就故意说了一些刁钻的话题，使得赵武无法应对。幸好赵武的随从叔向学识渊博，在一旁代为应答，并借机刁难子木，使得子木也无言以对。子木因此对叔向很是折服，回国之后，跟楚康王说起会盟时的见闻，就不住地称赞说：晋国难怪能够称霸诸侯，有叔向这样的人物来辅佐卿士，而我们却没有与他相当的人，终究不能和他们相争啊！

会议详细议程和具体细节在《左传》中没有太多体现，唯一的细节是鲁国原本打算降低自身规格，在举行会盟时向邾、滕两国看齐。但由于宋国和齐国分别要求将滕国和邾国列为各自的附庸，使得两国失去了参与会盟的资格。鲁国使臣叔孙豹不愿与之为伍，坚持参加了会盟，因而受到了批评，《春秋》也故意没有写他的氏。

到初九日，会盟终于取得了重大成果，于是宋平公亲自与诸侯大夫在城西的蒙门之外举行盟誓，标志着这次晋楚弭兵协议的正式生效。

未来可忧

自晋文公五年（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始，晋楚围绕中原霸权展开了长达87年的争斗。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两国在中原战场上不断交兵，光是直接的冲突就有12次，围绕郑、宋、陈、蔡等国归属展开的间接战争更是难以胜数。

长期的争霸战争不仅消耗了各自的民力财力，也让诸侯列国苦不堪言，而这一切终于在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落下了帷幕。自此之后，晋国“一家独霸”的局面结束，进入了晋楚“两极共霸”时期，硝烟弥漫的争霸战争也由此进入了尾声。为了区别于晋厉公二年（前579年）举行的弭兵会盟，人们通常将这次的会盟称为“第二次弭兵会盟”。

与第一次弭兵会盟的各怀鬼胎不同，第二次弭兵会盟中尽管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但总体而言各方都诚意满满，会盟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会盟结束之后，往日势不两立的南北霸主也严格遵守了弭兵的约定，共同维系了长达四十年的和平局面。奔忙于两国之间的各诸侯国也都握手言和，中原地区的战争频率大为减少，看起来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然而，对于这样一次空前成功的会盟，却并不是每个人都乐见其成。就在会盟结束后不久，与向戌同列宋国朝堂之乐喜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正是由于有晋楚两国的武力威慑，人们才能够上下一心、团结和睦并安定他们的国家，诸侯小国正是借此得以生存。一旦失去了威慑，人们难免就会沾沾自喜，祸乱也就由此而生了，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亡国灭家的结局。”

在乐喜看来，战争和兵器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它们就跟刑罚一样，是用来威慑不轨而宣扬文德的。圣人由于武力而兴起，作乱的人因武力而被废弃，使国家兴废、存亡、昏乱和昌明的手段，都是通过它们来推动的，又如何能够轻易去除呢？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向戌推动弭兵的作为，乐喜认为这不过是以欺骗来蒙蔽诸侯，不但无功，反而是有天大的罪过。

实际上，向戌的观点也并非他的首创。早在三十年前，当楚国司马子反公然撕毁第一次弭兵协议向中原用兵时，晋国时任中军佐士燮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当时，为了劝阻栾书与楚国开战，士燮曾一再表示：“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在他看来，外部威胁是保持国内安定秩序的稳定剂，一旦失去了外部的忧患，内部的冲突就必然会蜂拥而至。

不同之处在于，当初晋楚之间的均势尚未打破，士燮推动弭兵是为了保留楚国这个外部的敌人，让国人在戒惧之中保持团结。而如今晋强楚弱的局面已经形成，各国因失去了外部的威胁已然内忧纷起，若是再以弭兵盟约的形式将这种格局进一步确认下来，必使得各国内部致乱者有恃无恐，从而诱发更加剧烈的灾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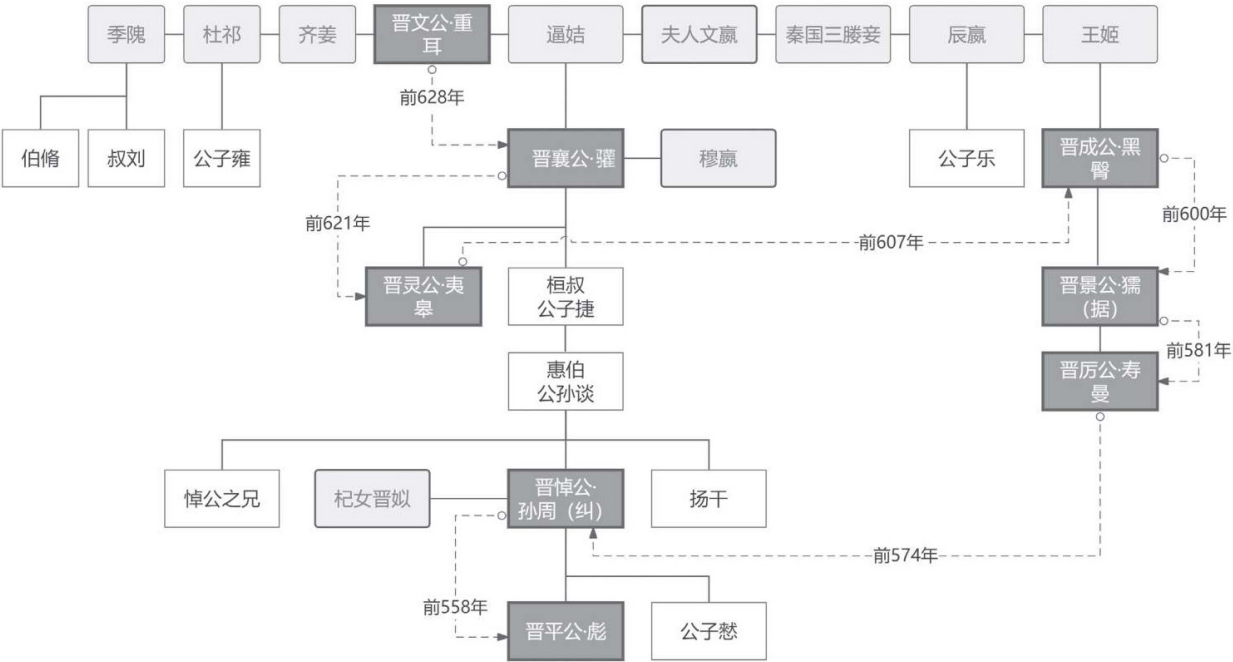
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实际上并不难理解。早在弭兵会盟举行之前，中原各国都已经不同程度地爆发了系统性的封建制危机，相继落入了孔子所忧虑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陷阱：在晋国，随着固宫之役的尘埃落定，以范、中行、赵、韩、魏、智组成的六卿集团正在成为政治秩序的主导者；在齐国，是陈国流亡公族田氏力量的不断壮大；在鲁国，是“三桓”集团对公室权益的倾轧；在郑国，是“七穆”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在宋国，则是戴族和桓族的共治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卿族世家，大夫阶层开始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并进一步成为列国秩序的制定者。也正因为如此，当楚国的令尹屈建遇到难决之事，还需要派传车往来请示的时候，晋国方面却只需要赵武一个人就能拍板定夺，鲁国的叔孙豹也可以不经请示就自行更改国君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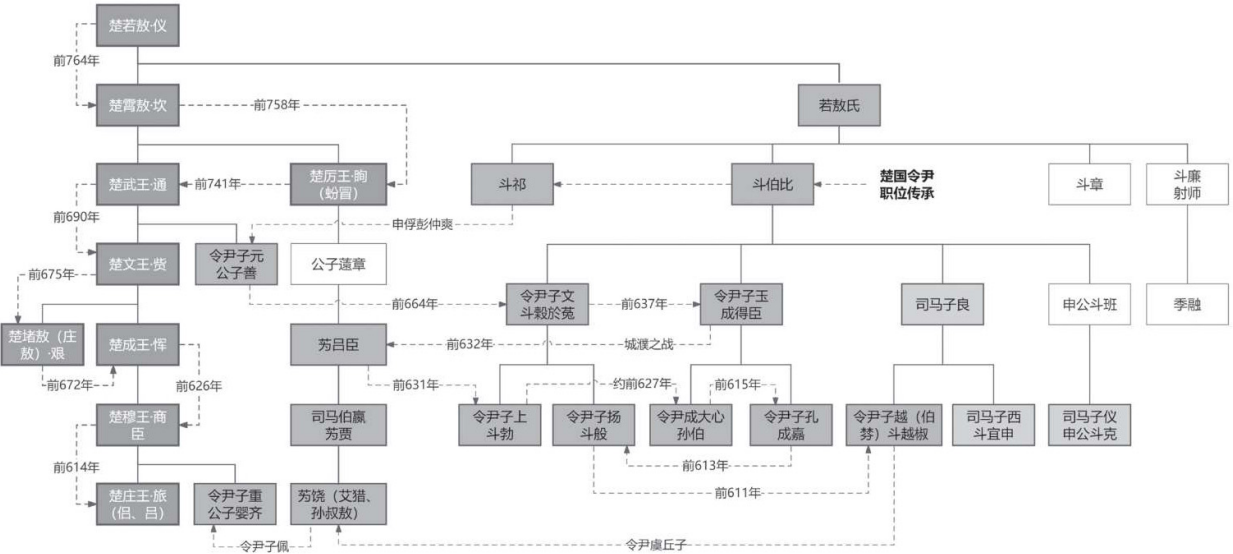
当弭兵会盟的尘埃落定，楚国的军力便不再是中原诸侯所面临的普遍威胁，各国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戏码，必然会成为下一部历史大剧的主要剧情。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弭兵会盟，不过是一个迷惑世人的面具，伴随着国与国之间战争的戛然而止，整个中原大地很快就会迎来一个更加细密的权力重新洗牌的过程。而在这个充满了阴谋和血腥的战场上，所有人都会被卷入其中并付出相应的代价，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这也正是乐喜为将来的前景感到忧虑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着重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在晋楚争霸的近百年间，晋国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晋文公所开创的制度设计，最终演变成了今日的这副局面？这其中，又有哪些深层次的逻辑链条？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各个家族又是如何应对的？将来，他们又是经过了何等残酷的搏杀，才最终走向“三家分晋”的历史结局的呢？

附录



附图2-1 春秋中期晋国君主世系



附图3-1 春秋前期楚国君主及若敖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第一章 嬴姓赵氏在晋国的兴起

第一节 赵氏孤儿

故事缘起

在《史记·赵世家》中，记载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故事最初发生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晋国大夫赵朔率领下军救援郑国，与楚庄王在河上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回国后，晋景公为表彰其勇武，就将自己的姑姑（晋成公的姐姐）庄姬嫁给他为夫人。然而树大招风，赵朔卓著的功勋和日渐显赫的地位，却引来了另外一名大夫屠岸贾的嫉妒和不满，于是就想设计陷害他。

屠岸贾据说是晋灵公时的宠臣。当初，晋灵公本人对赵朔之父赵盾把持朝政十分不满，多次想要将其除掉却始终未能得手。屠岸贾为人谄媚，于是就投其所好，帮助灵公“斩妖除魔”，却不料事情败露，晋灵公反而死在了赵氏侧室赵穿的手上，作为晋灵公宠臣的屠岸贾也因此失宠。后来赵盾的势力愈发煊赫，屠岸贾的失落之心也与日俱增。

到晋景公时，屠岸贾在朝中做了司寇，掌管刑狱、纠察之类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权势，便想要给自己的旧主报仇雪恨。但彼时赵盾已然去世，屠岸贾就将目标瞄准了赵朔，想趁他羽翼未丰的时候一举解决掉与赵氏多年的恩怨。

他先是处置了杀死晋灵公的凶手，文中虽然没有明说是谁，但根据前后文推断，当属赵穿及其党羽无疑。而在审理弑杀晋灵公的旧案时，他故意让受讯的人将赵盾也牵扯了进来，以表明晋灵公之死，赵盾才是头号凶手。

然而，赵盾实在是太正直了，正直到你根本找不到一点瑕疵。屠岸贾威逼利诱所得到的证词，似乎并没有确证赵盾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因此也就不能通过合法的渠道声讨赵盾的弑君之罪。无奈之下，屠岸贾只好遵循自古以来奸臣们所惯用的套路，用尽手段诋毁抹黑赵盾的形象，并在朝中四处宣扬其“莫须有”的罪行，公开拉拢朝臣与其一同讨灭赵氏。

有一次他遇到了时任三军司马的韩厥，刚刚寒暄了几句就开始搬唇弄舌，他对韩厥说：“赵盾虽然不知情，但仍然是逆贼之首，其罪责难逃。作为臣子杀害了自己的国君，他的子孙却还要在朝为官，有了这样的先例，还怎么教导国人惩治罪人呢？请与我一起诛杀逆贼。”

韩厥是一个明辨是非的君子，不仅不受他的挑唆，还据理力争为赵氏辩解：“灵公遇害之时赵盾在外，我们的先君认为他无罪，所以才没有杀他。如今却要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愿滥杀无辜，随意滥杀就等同于作乱。更何况，就算是要诛杀罪人，也要有国君的首肯，你打算在国内兴大事却不让国君知道，这是目无君主的表现，你这样做又当如何教导国人、惩治罪人呢？”

屠岸贾丝毫不为所动，心中冷笑：我每天大张旗鼓地要灭赵氏，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国君恐怕也早有耳闻了，国君都不出来阻挠我，你凭什么要干涉我的行动？

韩厥知道自己无法改变屠岸贾的想法，只好去给赵朔通风报信，可赵朔却坚决不肯逃跑。他谢过了韩厥的好意，并恳切地叮嘱说：“这事我早知道了。他真要作乱，我跑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我相信，只要有你韩厥在，我赵氏的香火就不会断绝。不过既然你也来了，我就以小人之心再次郑重地请求您，一定要尽力保全我赵氏的宗庙，这样的话，就算是死我也安心了。”

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看着赵朔正义凛然的样子，韩厥不禁心中悲戚，就答应了赵朔的请求，从此以后称病不出。屠岸贾看到大家都被他的权势吓得不敢说话，也就放心大胆地筹划起来。

天不绝赵

这年夏天一个微风和煦的清晨，当赵氏宗人在庭院内外辛勤劳作时，一队全副武装的精壮甲士正蹑手蹑脚地穿行在下宫之外巷道里，密切地注视着下宫的大门。在熹微晨光的照射下，密密匝匝的干戈和刀刃闪出的亮光，穿透了街道两旁的树荫，映照在下宫外的矮墙上。带领这队甲士的不是别人，正是踌躇满志的屠岸贾，他们所要灭杀的目标正是在宫墙之内的赵氏宗族。

过不多时，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哨声，巷道中的甲士蜂拥而出。他们撞破了下宫斑驳的木门，推倒了赵氏府苑青灰色的围墙，就像是铺天盖地的飞蝗一般，拥进了赵氏宫苑的每一个角落。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宫苑中的卫士猝不及防，一时间喊杀声和惊叫声混杂在一起，让寂静的街道也顿时喧闹了起来。赵氏的私属和仆人们面对这样的变故都仓皇失措，只能顺手抄起身边的木棍、门闩和各种青铜器物奋起抵抗。然而这些抵抗在训练有素的甲士面前显得有些多余，很快院落中的人就被斩杀殆尽。

人们常说，人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来不及与你最爱的人告别。赵朔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多少次都想与自己的妻子依偎在一起，对她做出万般的叮嘱，和她道出辛酸的再见。可他终究还是忍住了，他不想让怀孕的妻子因此担惊受怕，让她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一直都活在不安和惶恐之中，因此只能把这声“再见”隐藏在心中。

当清脆的哨声响起，轰隆的脚步声渐渐逼近的时候，他知道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于是就迅速安排了府中最精壮的勇士护送着妻子离开，而他自己则端坐在庭院中，等待着屠岸贾的到来。

在赵朔面前，盛气凌人的屠岸贾历数赵氏家族的罪恶，都被赵朔义正词严地堵了回去。屠岸贾恼羞成怒，又开始不断以言语羞辱，可赵朔始终都不为所动，最终选择了慷慨赴死。与赵朔同宗族的赵同、赵括、赵婴齐也都在这次事件中殒命，煊赫一时的赵氏家族就这样覆灭了。

逃出生天的赵庄姬跑到了宫里，责问自己的侄子为何要诛灭赵氏。可屠岸贾权势熏天，身为国君的晋景公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只能在事后进行了一番责问就草草了事了。当然，晋景公也不敢把姑姑跑回宫里的消息告诉屠岸贾，只能悄悄地把她藏起来。

赵庄姬在宫中待产的事情屠岸贾尚不知情，但有两个人是知晓的，一个是赵朔的朋友程婴，一个是赵氏门客公孙杵臼。

程婴与赵朔素来交好，算是一起对天起誓过的生死之交。但赵氏灭门案发生之后，程婴并没有履行誓言与赵朔同生共死，于是公孙杵臼就去责问他：“你为什么还不死？”

程婴回答说：“赵朔的妻子有孕在身，如果生出来的是男孩，我就亲自抚养他长大，好复兴赵氏；如果是个女孩儿，这说明天要亡赵氏，那时我再去死也不迟。”

后来天遂人愿，赵庄姬顺利地产下了一名男婴，取名为赵武。但可怕的是屠岸贾得知了赵庄姬产子的消息。他便不顾君臣有别，蛮不讲理地带人闯入公宫搜查。

赵庄姬自打逃入公宫，就犹如惊弓之鸟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如今她刚刚生子，情绪波动更是剧烈。听到外面有人要来害她的孩子，便不顾身体虚弱把孩子藏在裤裆里，并不住地祷告说：“等他们搜进来的时候，如果上天想要赵氏宗族灭绝，就让这个孩子哭出声来；若是想保全赵氏遗孤，就不要让他哭。”

上天庇佑，等屠岸贾带着人进来搜查的时候，这孩子果然没有出声。屠岸贾搜寻半天，也没找到赵氏遗孤，只好悻悻离开，从而让赵氏孤儿成功躲过了一劫。

舍生取义

事情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

赵氏遗孤降世的消息不会凭空而来，屠岸贾意识到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持续的搜捕仍在进行当中。程婴为此感到十分忧虑，于是就对公孙杵臼说：“这次搜查没有找到，以后一定还会再去搜查，总得想个办法啊！”

公孙杵臼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而是冷不丁地问了一句：“死和扶立遗孤，你觉得哪件事更难？”

程婴看着公孙杵臼坚定的眼神，叹道：“想死还不容易？可扶立遗孤的事儿就难多了！”

公孙杵臼于是慨然道：“赵氏先君待你恩重，你就把这最难的担子挑起来吧，我去做那件容易的。”

程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公孙杵臼是想以自己的性命换取赵氏孤儿的安全，不禁悲从中来，怅然叹息道：“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两个人合计来合计去，似乎还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依照这条绝路来走。于是他们就依计将孩子偷偷带出宫来，逃到了深山之中。

这当然瞒不过屠岸贾的耳目，很快就有追兵闻讯赶到了藏婴的山脚之下。这时程婴突然跑了出来，对追赶他们的将军说：“你们追得这么紧，我是实在跑不动了，我可以告诉你们赵氏孤儿的藏身地，但有个条件，就是你们必须要给我千金赏赐。”

听闻这么轻易就能找到遗孤，诸将都喜不自禁，于是就爽快答应下来，好让程婴供出藏婴之地。此时公孙杵臼正在山中的一处院落里，为了防备屠岸贾的袭击，还特意安排自己的私属利用地形进行防御。不过这些私属在训练有素的重兵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很快诸将就攻破了防御圈出现在他面前。

眼看难逃一死，公孙杵臼只能对着程婴破口大骂：“程婴，你这个见利忘义的无耻小人！你忘了当年赵朔是怎么待你的了吗？当初下宫之难你不能随赵氏而死，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保护赵氏孤儿，如今却为了区区小利出卖我，出卖了赵氏家族唯一的血脉！你若还有良知，就剖开你的心看看，你这样做能对得起谁？”

骂完了程婴，公孙杵臼又转而向诸将求情：“苍天啊！赵氏孤儿究竟有什么罪？我愿替赵氏孤儿去死，只求你们留他一条生路吧！”诸将一言不发，直接就把公孙杵臼和他怀里的婴儿一起杀掉，回去向屠岸贾交差去了。

屠岸贾以为赵氏孤儿已死，从此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不料真正的赵氏孤儿藏在他所不知道的深山里，由程婴抚养成人，并最终在十五年后对自己展开了复仇。

离合悲欢

赵氏孤儿复仇的故事，就要从晋景公说起了。当初屠岸贾屠灭赵氏，虽然并不是他主使的，但毕竟他也是知情的，因此一直深感愧疚。到了晚年时，他突然生了一场重病，巫师为其病因进行占卜，得到的结果是因大业的后代子孙不顺利所致。

景公很是纳闷，就四下询问这是怎么个情况。当年与赵朔定下契约的韩厥趁机进言说：“大业的后代子孙在晋国的只有赵氏，他们从晋文侯的时候就开始出仕晋国，距今也快两百年了，一直都相安无事，但却在您在位的时候断绝了祭祀。卜辞上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晋景公听了十分泄气，无奈地说道：“赵氏已经灭门，就算我想恢复他们的祭祀，可找不到他们的后人，终究还是于事无补啊！”

韩厥赶紧把赵氏孤儿藏匿的原委全都说了出来，晋景公听后大吃一惊：“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把他请回来！”也就是说，晋景公完全是把赵氏孤儿当成了一剂“速效救心丸”，至于功劳不功劳的，已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韩厥可不管这个，十五年来，他一直都为无法履行对赵朔的承诺而深感自责，如今终于等到了机会，哪里肯轻易放过？不久，程婴和赵武就被秘密接进公宫，等到贵族们进宫探视病情，晋景公就让韩厥以重兵包围，胁迫他们与赵武见面。

突然的变故让在场之人皆面如死灰，于是纷纷辩解说：“当年下宫那次事变，都是屠岸贾一手策划的。他假传君命，蒙蔽臣僚，我们都是因受到蛊惑才犯下了此等错误！赵氏满门忠良却受奸人陷害，而我们却做了帮凶，早就有心要补过了。如今既然有了君令，我等更是义不容辞，哪里敢有丝毫犹豫？”

晋景公也不管他们到底是虚情还是假意，当即令他们攻打屠岸贾。这帮人追随屠岸贾的时候很是听话，背叛起他来也是毫不犹豫，很快就将屠岸贾灭了族。一生骄横跋扈的屠岸贾在发动下宫之难十五年后，终于为自己当年的暴行付出了代价。

诛灭屠岸氏后，晋景公把原属于赵氏的封地复赐予赵武，并恢复了赵氏原有的地位，程婴隐藏了十五年的心愿终于得偿。这原本是皆大欢喜的结局，然而等到赵武成人行冠礼之后，程婴却无论如何都不肯安享清福，决意要自杀。

面对这样一个含辛茹苦呵护自己长大的长者，赵武的心都要碎了。他痛哭流涕地跪在程婴面前极力劝阻，却终究无法改变程婴必死的决心。看着泣不成声的赵武，程婴语重心长地说道：“当年下宫之难发生时，我本该随着赵氏宗族一同去的，可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想要留着这条贱命来扶立赵氏的后人，以报答赵氏对我的知遇之恩。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承袭了祖业，恢复了爵位，这是美事一桩。但是你的先祖、你的祖父、你的父亲他们并不知道，当年舍生而去的公孙杵臼也不知道，总得有人下去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知道赵氏的祭祀又恢复了，也好一起高兴高兴不是？”

听闻此言，赵武更是泪如雨下，他哀求道：“要早知您会离开，我宁愿不要这土地和爵位，宁愿身受劳碌之苦，也要在您身边尽孝，让您安享天年，为您养老送终。您对我多年的抚育之恩我都还没有机会报答，如果就这么走了，我赵武岂不就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了吗？您怎么能忍心就这样抛下我，让我忍受一生的负疚和自责呢？”

程婴平静地抚摸着赵武的头发，关切地说道：“孩子，你总要长大的，赵氏门楣的光大、祖业的兴盛终究要靠你来完成。我一个老头子，做一些劈

柴烧水的活儿还可以，建功立业、征伐沙场的事情我帮不了你。抚养你长大就是我一生的夙愿，我的愿望已经达成了，也该为自己考虑了。公孙杵臼是我一生的挚友，他之所以先我而死，是因为他相信我能达成所愿。如今我完成了我们共同的愿望却不跟他说一声，他会以为我还没有完成任务，他就会怨恨我，我又怎么能忍心让他独自承受孤苦呢？君子之交淡如水，但这份情谊可以超越生死，也许你现在还不能理解，但总有一天你会懂的。”

赵武终究还是没能劝住程婴。就在那天夜里长亮的灯火中，忍辱负重十几年的程婴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为报答程婴的养育之恩，赵武按照父丧的礼节为其守孝三年，并专门从自己的封地中划出一片土地作为程婴的祭田，此后赵氏宗族都没有断绝对程婴的祭祀。

事件溯源

赵氏孤儿的故事每每读来都让人感到悲戚，其中公孙杵臼和程婴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更是令人唏嘘不已。得益于元代戏剧家纪君祥的改编，这桩定格于两千多年前的悲剧又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广为传唱的不朽经典。伏尔泰所创作的悲剧《中国孤儿》以及陈凯歌近年来导演的同名电影，都是以此作为底本进行创作的。

然而若要深究其本源，赵氏孤儿的叙事尽管足以打动人心，却未必符合历史的真相。在同样出自《史记》的《晋世家》，以及年代更为久远的《春秋》《左传》的记载中，“下宫之役”的叙事线条就有了别样的面貌。

在这个与《赵世家》平行的时空中，下宫之役爆发的时间从晋景公三年转移到了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参与诛杀赵氏的也不再是所谓的司寇屠岸贾，而是变成了位列卿行的郤氏、栾氏；在这场劫难当中，受到诛杀的也只有赵同、赵括二人，赵朔和赵婴齐均不在其列，而赵庄姬更是从一定程度

上转化为加害者的角色；赵氏灭门之后不久，晋景公就采纳了韩厥的建议恢复了赵武的封地，并没有所谓的十五年复仇之说；至于公孙杵臼为赵氏舍生，程婴含辛茹苦抚养遗孤十几年的传说，更是全不见了踪影……同样的历史场景下竟产生了如此迥异的两种叙事，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呢？

辨别二者的真伪事实上并不困难，研究者对此已多有论述。对《赵世家》叙事质疑的焦点，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自晋文公设立三军六卿体制以来，卿的职权一直都是由军事统帅担任，司马、司寇、司徒等传统职务均列于六卿之下，在世俗政治当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司寇”权倾朝野的现象。其二，屠岸贾作为“赵氏孤儿”系列事件中的主要反面角色，仅出现在《赵世家》《韩世家》相关记载中，在其他史料中根本无法觅其踪迹。如果他真是晋景公时期炙手可热的人物，其行藏不可能被消除得如此彻底。如果说历史上屠岸贾确有其人的话，其作用很可能也只是作为中下级的军官，在赵氏灭族事件中承担了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其三，故事中出现的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物，他们所扮演的门客一类的角色以及表现出的“匿孤报德”“视死如归”的行为，在春秋时期还并不普遍，倒更像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社会风俗，因此也极有可能是杜撰的人物。

当然了，以上的这些质疑并非不刊之论，对这些论点展开的批驳也大都都有其合理性，但总体上并不能改变《赵世家》《韩世家》中有关“赵氏孤儿”的叙事不足采信结论。因此，当我们需要通过“下宫之役”来分析晋国制度变迁的逻辑线条时，还是应该以《左传》和《晋世家》作为主要依据。

《左传》对整个事件的记载并不复杂。首先是在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年）的冬季，赵婴齐与赵庄姬通奸东窗事发，年后赵同、赵括两兄弟联起手

来，准备放逐赵婴齐。赵婴齐向两位兄长恳求道：“因为有我在，所以栾氏才不敢向我们发难。若是将我放逐出去，两位兄长恐怕就要有忧患了。况且每个人都各有其能，也各有其所不能，留着我来对付栾氏又能有什么坏处呢？”

此外，赵婴齐还做过一个梦，梦里有位上天使者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就降福给你！”醒来之后，赵婴齐特意向士渥浊询问，但士渥浊也并不知晓这个天使的来历。后来他派人告诫赵婴齐：“神灵降福给仁爱之人，对于淫乱者只会降下惩罚。如今你行淫乱之事却没有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了。多祭祀神灵，难道就能免祸了吗？”

这两件事最后的结果都是一致的，赵婴齐的恳求没有被赵同、赵括接受，他自己也没有听从士渥浊的劝导，最后只得流亡去了齐国。

事隔三年以后，也就是晋景公十七年夏天，赵庄姬突然出面举报赵同、赵括谋反，并且还请来了栾氏、郤氏来为自己作证。晋景公于是下令讨伐赵氏，随后就发生了这场惨绝人寰的灭门事件，赵同、赵括均死于非命。事发之后不久，晋景公就在韩厥的劝说下恢复了赵武的爵禄土地，赵庄姬也由此安然度过了一场危机。

与《赵世家》跌宕起伏的叙事比起来，这出夹杂着家庭伦理和政治阴谋的历史剧的确算不得精彩。但透过表象去窥探本质，在这寥寥数笔的描摹之下，却也隐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其中既有赵氏家族内部与日俱增的权力争斗，也有国君与卿大夫以及卿大夫之间日益严峻的政治博弈。贯穿于其中的，则是晋国宗族观念的微妙变化，以及政治制度的转型变迁。想要揭开下宫之役爆发的真实原因，就必须回到历史的原点，去寻找这一切变化的内在逻辑。

第二节 冬日之日

赵氏族源

晋国的赵氏是嬴姓氏族后裔，《赵世家》对其先祖来源的记述十分简略，只说了四个字：“与秦共祖。”翻查《秦本纪》可知，秦赵两家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名叫女脩，是传说上古五帝中帝颡顼的裔孙。有一次，她在织布的时候吞了一只玄鸟的蛋，却不意受孕而生子，取名大业。

关于这一点，白国红在《春秋晋国赵氏研究》中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该氏族是出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少皞氏，活动区域大体位于泰山以南的汶水、泗水流域，鲁国都城所在的曲阜便是这一区域的重心。又因少皞氏所在区域在上古时期属于奄地，“奄”“偃”“匱”与“嬴”字古音通转，故而便以嬴为姓。

大业又叫皋陶，在虞舜时期担任“士”的职务，其地位仅次于大禹，排名位于商朝的始祖契、周朝的始祖弃之前，最早的刑法据说就是由他制定的。大业后来娶了少典氏之女名女华的，生了一个儿子叫大费，也叫伯益。伯益据说有一项特异功能，就是能够听懂鸟兽语言，因此在舜时担任“虞”的官职。

在有关远古氏族的传说中，伯益的主要功劳是跟随大禹平治水患，并且利用治水经验发明了水井，教授百姓种植稻谷，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正因其功勋卓著，大禹本打算死后禅位于他，但大禹的儿子夏启却不肯相让，于是双方就起了冲突。后来，伯益在斗争中落败，此后便失去了踪影，而他所在的部族也因为两族之间的恩怨，终夏一朝都没能再度进入权力中枢。

伯益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领鸟俗氏；一个叫若木，领费氏。商汤伐桀时，费氏部落的首领费昌投奔商部族，为商汤驾车，在鸣条之战中建立了功勋。商朝中期，帝太戊又让鸟俗氏的中衍为其驾车，并将王室之女嫁与中衍，这支嬴姓氏族以后也世代为商王朝服务，成为一方诸侯。

商朝末期，中衍的后代中有一个叫胥轩的，与姜姓申国联姻，生一子中湣。中湣的儿子蜚廉一生致力于为商朝抵御“西戎”，后来受商王委托到北方联络方国，但使命还未完成商朝就已经败亡了，蜚廉只好在霍太山设坛祭祀纣王。到周成王三监之乱时，蜚廉又试图联络淮夷各部反周，被周公打败并杀死。

蜚廉死后，周公将霍国改封到霍太山，从而夺取了嬴氏族人的立足之地。蜚廉的儿子恶来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被杀，另一个儿子季胜则投降了周王室，但并不受器重。后来，季胜的儿子孟增有宠于王室，被赐封地皋狼（今山西离石），号称宅皋狼。作为嬴姓氏族在周朝所获得的第一块封地，皋狼之地一直都为后来的赵氏看重，春秋后期三家分晋的直接起因，就是智伯瑶向赵襄子讨要皋狼之地而引发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孟增之后有衡父、造父，到造父时期，嬴姓氏族有了很大发展。由于他们在殷商时就一直以善御著称，造父便被周穆王任命为御戎，随驾西巡见西王母、东征徐偃王，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被封到赵城（今山西洪洞）成为诸侯。造父因此以赵为氏，这就是后来晋国赵氏的来源。

我们再说被周人所杀的恶来，他留下了一个儿子叫女防，之后又经旁皋、太几、大骆几代人，传到非子在位的时候，因同宗的造父受宠得氏，他们引以为荣，便也以赵为氏。因此说后来的秦国是嬴姓赵氏，将秦始皇称为赵政，也没什么错。

非子本来并非大骆的嫡子，但由于在犬丘（今陕西兴平）养马声名鹊起，周孝王对其很是欣赏，就想让非子做大骆的继承人。不过，这个想法遭到了大骆岳家申侯的反对，周孝王为了安抚申侯，只得将非子封在秦地，成为王室的附庸。

非子之后，经秦侯、公伯传到秦仲时，“西戎”为乱，犬丘的大骆嫡系被“西戎”攻灭。周宣王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结果秦仲也死于非命。周宣王又召集了秦仲的五个儿子，给了他们七千士卒征伐“西戎”，终于取得了成功。秦仲的长子就是后来的秦庄公，在平王东迁时，其子秦襄公正式受封为诸侯，从而建立了秦国。

当非子的后裔逐渐在犬丘站稳了脚跟，并因此受封得国的时候，造父一系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造父之后六世的奄父（字公仲）为周宣王御戎，在千亩之战时随王师出征遭遇惨败，奄父奋力驾车助天子脱险，但似乎赵国也被“戎狄”灭掉了，奄父只好追随周宣王进入王室。而到周幽王时，宗周附近“戎狄”活跃频繁，内部矛盾一触即发，很多有预见性的大夫纷纷向东迁徙。奄父的儿子赵叔带据说也因周幽王荒淫失国，开始到晋国为官，这是赵氏进入晋国的开始。

仕晋历程

赵叔带奔晋之始，晋国的规模还很小，国内的封地也大都是封给国君支系的公子公孙。而当历史进入春秋时期，东方诸侯都在相互兼并中不断扩张势力时，晋国又陷入了七十年的内战中，其发展也极为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异姓贵族，赵氏在入仕晋国的初期，还很难有所作为，直到赵叔带之后五传到赵夙，赵氏才开始拥有自己的封地。

赵氏获封，与晋国当时的局势密不可分。一方面是在晋献公时期，晋国开始大规模对外扩张，获得了大量疆土可用来分封。另一方面则是“国无公族”制度的产生，晋献公剿灭桓庄之族，开始大量任用异姓势力和远支公族，与赵氏同属外部势力进入晋国的祁姓士氏、姬姓魏氏等家族都因此获益，这就为赵氏的发展在制度上铺平了道路。

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赵夙随国君出征，伐灭霍国，霍公求奔齐。霍国所在的霍太山与赵氏有着深刻的渊源，因此晋献公很可能是打算将其封给赵夙的。但由于后来晋国发生大旱，据占卜者说是因为霍太山的山神作怪，晋献公只好派赵夙把霍公求请回来主持霍太山的祭祀，而赵夙则被改封到耿县（今山西河津东南）。但不管怎么说，赵氏正是凭借着这块土地，开始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赵氏的获封立家始于赵夙，而其发展壮大则自赵衰起，然而史家对赵夙与赵衰两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这其中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出自《史记·赵世家》，认为赵夙生共孟，共孟又生赵衰，也就是说二人是祖孙关系。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有先天不足，司马迁将赵夙生共孟的时间确定在鲁闵公元年（前661年）；而仅仅六年后，赵衰就已经随重耳流亡了，由此反证赵衰的年龄实际上与赵夙相差不大，这就与前说有了自相矛盾之处，自然是不足取信的。

第二种出自《世本》，认为赵公明生共孟及赵夙，赵夙生赵衰，也就是说二人可能是父子关系。这种说法的主要论据是从赵盾和赵穿的关系倒推回来的，而其中的依据又是将赵盾与赵穿误记为堂兄弟关系。但在韦昭等人的注解中，已经明确赵穿实乃赵盾之侄，故而以错误的前提反推的结论自然也无法成立。

推翻了以上的两种观点，实际上最后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本书采用的就是第三种说法，也即《国语》中所提到的：“赵衰，其先君之御戎赵夙之弟也。”

在论及重耳流亡事时我们曾提到，赵衰字子余，号成季，是家中幼子，这就决定了他无法直接继承父爵成为大夫，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另谋出路。而到成年之时，恰逢太子申生举步维艰，显然不足以为依靠，又使得他只能在其余诸公子中选择追随对象。为此他特意进行了一次占卜，并根据占卜的结果侍奉了公子重耳。

赵衰追随重耳后不久，“骊姬之乱”即告爆发，重耳也因受到牵连不得不流亡国外。由于赵衰与重耳年龄相仿，又颇善于文辞，因而在流亡时两人的关系就十分亲近。再加上流亡途中，赵衰极尽所能帮助重耳应对重重考验，为其最后回国即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颇受晋文公的信重，晋文公对其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比如晋文公举行被庐之蒐时，每每遇到不决之事都要征求赵衰的意见：赵衰认为郤穀有德有义，晋文公就任命郤穀、郤溱为中军将、佐；赵衰认为狐偃有“以德纪民”之功，晋文公就任命狐毛、狐偃为上军将、佐；赵衰认为“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晋文公先后任命栾枝、先轸、胥臣在下军担任职务。城濮之战后狐毛去世，赵衰认为先且居有功，晋文公就把先且居提拔为上军将。赵衰多次辞让卿位，晋文公也从来不会怨恨，反而是一再相劝，到后来甚至还特意为其举行了一场清原之蒐。

传统史料通常会将晋文公与赵衰这对搭档描绘成君明臣贤的典范，对赵衰数次谦让卿位的举动更是盛赞有加。但依照我们之前的分析，赵衰之所以一再辞让卿位，与其当时所处局势有极大关系。晋文公回国初年，因在国内

缺乏支持、地位尚不稳固，故而大力提升公族地位、抬高居守贵族的贡献，在提拔六卿之时也以公族、居守作为首要条件。赵衰既非公族，也非居守派贵族，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自然不敢贸然忝居高位，成为众矢之的，其推让卿位以求自保也在情理之中。

而在这个过程中，赵衰也无意中实现了以退为进，逐步为赵氏家族日后的昌盛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遍数晋文公时期进入五军十卿行列的大夫，郤穀、郤溱，狐偃、狐毛，先轸、先且居，栾枝、胥臣，先都、箕郑父、胥婴等人或多或少受到过赵衰的举荐。这些人获得权位之后，自然会感念赵衰的恩德，这就为他进入卿列后的快速晋升以及日后赵盾的上位打造了坚实基础。其中，赵衰结交的最有力的盟友，非先氏莫属。

结好先氏

先氏是晋国早期公室的一个分支，但具体族源已不可考。到晋献公时期，太子申生奉命讨伐东山臯落氏，曾有先友、先丹木分别担任申生和罕夷的车右，而先轸据说就是先丹木的儿子。

先轸是春秋早期最负盛名的军事家，《汉书·艺文志》曾列举东汉时已经失传的兵书著作，其中有《孙轸》五篇、图两卷，据称就是由他所著。晋文公建立三军六卿制时，先轸受赵衰举荐担任下军佐，在卿列中排位第六名。仅仅几个月后，中军将郤穀在围攻曹国的战役中去世，先轸凭借其卓越的军事谋略受到晋文公赏识，被临阵超拔为中军将，带领晋军以奇谋巧计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晋文公去世后，又是在他的主导下，晋军首开先河发动了以歼敌主力为目的的崤之战，彻底斩断了秦国东进中原的幻想。

正因为有着如此卓越的军功，太史公司马迁对其情有独钟，故而在《晋世家》中将其列入晋文公“五贤士”之列。但据《左传》所言，其时先氏实

为晋文公“内主”，因此并未随从流亡。而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在晋文公归国之前，他还曾受晋怀公指派，带兵到庐柳抵御秦军，可见所谓“内主”一说也未必能够站得住脚，这些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有过论述。

先氏能够跟赵氏交好，与赵衰的“三辞”卿位有着莫大的关联。首先是在晋文公四年（前633年）的被庐之蒐时，晋文公有意让赵衰进入卿列，但赵衰却两度推辞不受，其中的第二次便是推举栾枝和先轾来统领下军。也就是说，先轾能够进入卿列，并得以在战场上施展才华，离不开赵衰的辞让和举荐。

城濮之战后，时任上军将狐毛突然去世，赵衰第三次辞让卿位，同时不失时机地以“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为由，极力推举先轾的儿子先且居直接擢升内阁排名第三的上军将。赵衰三次辞让卿位，其中有两次都是举荐了先氏，自然也就为两家的持续交好创造了条件。

除此之外，史料中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也为赵衰用心笼络先氏提供了佐证。事情发生在晋文公二年（前635年），晋国凭借勤王之功获得了南阳的八座城池，但对于这些土地究竟该交由何人镇守，晋文公却拿不定主意了。随侍在侧的寺人披有意提醒，说：“听闻以前赵衰带着饭食从小路追赶您，自己都快饿晕过去了，却一口都不敢吃。”经他这一提醒，晋文公当即就有了主意，于是便封赵衰为原大夫，封狐毛的儿子狐溱为温大夫。

故事讲到这里就戛然而止，至于后续究竟如何，书中并未交代。而实际上，就在这次封赏的两年后，也就是城濮之战爆发时，统率三军的先轾就已经开始被冠以“原轾”的称号。一直到三十多年后的邲之战时，其后人先穀还常被人称为“原穀”，可见赵衰当时并没有接受任命，而是将原大夫的职务辞让给了先轾。

个中原因事实上并不难理解，赵衰之所以要辞让原大夫的职务，与他辞让卿位的初衷是一样的，都是不想在未建尺寸之功的情况下贸然接受封赏、无端招致别人的忌恨。而从这件事中所反映出的一个信号是，赵衰与先轸之间的个人交往，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这样一来，赵衰对于先轸既有举荐拔擢之恩，又有转赠封地之义，两家之间的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了。

《诗经》上说：“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赵衰对先氏父子的鼎力支持，也换来了先氏对他的器重与信任。晋文公八年（前629年），在国君的一再坚持下，赵衰终于为卿担任新上军将，在十卿中名列第七位。不久后狐偃去世，先且居不失时机地提出要补充副将，晋文公便以“三让不失义”为由，将赵衰提拔为上军佐，与先且居组成搭档。到先轸、郤溱去世后，两人更是携手双双进入中军，分别担任中军将、佐，直到晋襄公六年（前622年）两人先后谢世。

先轸父子与赵衰在文、襄时期相互帮助、相互提携，由此建立的深情厚谊自是旁人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后来举行夷之蒐的时候，先且居的儿子先克会冒险顶撞晋襄公，竭力支持毫无政治经验的赵盾出任中军将了。

扶助郤氏

与先氏类似，郤氏也是晋国公室的一个分支。有关郤氏家族的由来，在之前的章节中已有过详细介绍。晋文公回国之后，原先党于晋惠公的郤芮因担心遭到报复，故而伙同吕甥试图制造政变，不料被晋文公抢占先机诱至王城，最终死于秦穆公之手。

但即便如此，凭借在晋惠公时期打造的声势以及所拥有的众多封邑，郤氏家族在晋文公时期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晋文公在被

庐大蒐上“谋元帅”的时候，赵衰才举荐了其宗族中声望较高的郤穀、郤溱出任中军将、佐。而赵衰也正是凭借这次举荐，初步获得了郤氏家族的青睐。

不过，郤穀、郤溱二人出任卿职时间并不长。其中郤穀去世于晋文公五年（前632年）二月，担任中军将时间不超过半年；郤溱去世时间不明，但最晚到晋襄公三年（前625年）的“拜赐之役”时，其中军佐的职务就已经由赵衰取代，在任时间不超过八年。

郤穀、郤溱去世之后，偌大的郤氏家族群龙无首，无论是公室还是郤氏家族自身，都亟须重新选择一个代理人来维持二者之间的联系，郤芮的儿子郤缺（郤成子）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重新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据《左传》记载，火烧公宫事件爆发后，郤芮原有的封邑被罚没充公，他的儿子郤缺虽未受到株连，却也被褫夺了爵位，贬为庶民，一度在冀邑的郊外以务农为生。有一次，文公近臣胥臣路过冀邑郊外，看到一对农家夫妇在田野中相敬如宾，场面十分庄重。胥臣感到十分好奇，于是就上前询问，这才知道田中的农夫便是郤芮的儿子。看到他即便身在草莽，也依然保留着贵族的风度，这令胥臣感到十分钦佩，于是回去后便将其举荐给了晋文公。

晋文公犹记得当年火烧公宫的场景，因此有些疑虑：“他的父亲罪大恶极，让他来担任大夫合适吗？”

胥臣回答说：“当年虞舜惩办罪人，流放了鲧，可后来却起用了他的儿子禹；齐桓公对管敬仲恨之入骨，可最后却是因为他才成就了霸业。如果郤缺的确是贤良之人，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而不是去计较他的父亲做了什么坏事。”

因为胥臣的举荐，郤缺后来被任命为下军大夫，实现了人生中最不可能的跨越。到了晋襄公元年（前627年），他又在箕之战中生擒“白狄”君主，立了大功，借此重新获得了冀邑的封地，并被任命为卿。从此以后，他的人生轨迹便开始狂飙突进，直至最后登顶中军将，创造了实现人生完美逆袭的励志传奇。

在这段励志故事的开端，胥臣的举荐可以说是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这次偶遇，那么后面的所有故事都不可能发生。然而吊诡的是，郤缺对胥臣似乎并无感恩，反而是在成为元帅之后，首先将胥臣之孙胥克的卿位废掉，为的只是将赵盾的儿子赵朔排进六卿序列，可见其早已投入了赵氏麾下。

至于郤缺为何会恩将仇报，《左传》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解释，我们只能据史料中的蛛丝马迹进行推测。依照之前的种种迹象来判断，胥臣尽管博学多智，但在晋文公心目中的地位显然比不得赵衰。因此他虽然举荐了郤缺，却没能打消晋文公的疑虑，因此郤缺之所以能够出任大夫，最后很可能是在赵衰的推动下才勉强达成的。

其次，郤缺在箕之役中立了战功，晋襄公也把冀邑复封于他，但却只是给了他一个卿的虚名，并没有授予实实在在的职权。这也就意味着，国君对于郤缺罪臣之子的身份始终是介怀的，也就无法真心诚意地对其委以重任。郤缺尽管重回朝堂，可周边人却总是以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这就好比是把一个刺配的犯人放到了闹市中让人围观，这种滋味恐怕比在田里劳作还要难受。

郤缺真正走出父亲叛乱造成的阴影，重新光耀郤氏家族的门楣，还要等到赵盾执政之后。最晚到晋灵公六年（前615年）的河曲之战时，郤缺便已经

出任上军将，摆脱了有名无实的窘境，成为真正掌握实权的下卿，这份恩情自然要记在赵氏身上。

施恩韩氏

作为异姓贵族家中的庶子，在过去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中，晋文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赵衰都一一踏过；晋文公遍尝的人生百味，他也都曾尝尽；晋文公所辨知的民情真伪，他也有着亲身体会。因此在回国之后，他不仅乐于结交国内的世家大族，对于处于弱势甚至边缘地位的群体，也都能给予特别的关怀。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韩厥和阳处父的关照。

根据史料中的普遍说法，韩厥所在的韩氏家族属于是如假包换的“桓庄之族”。其始封之君名叫韩万，谥曰武子，是曲沃桓叔的幼子。曲沃代翼时期，韩万曾担任过晋武公御戎，并于径庭之战中擒获翼哀侯和栾共叔。晋武公统一晋国之后，他被分封到韩国故地，从此便以韩为氏。

韩万获封后不久，晋国便进入了狂飙突进、大破大立的晋献公时期。晋献公主政的二十六年间，晋国以“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成绩从一个“偏侯”一跃而跻身为中原大国，为晋文公的霸业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得益于晋献公积极的扩张政策，不少人也因此受益，从一介庶民一跃成为手握实权的地方封君。

然而在对待亲族方面，晋献公却以狠辣著称，在位期间先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聚邑之围，将桓叔、庄伯的旁支子嗣诛杀殆尽，后又以骊姬之乱驱杀诸公子，并制定了“国无公族”政策。在晋献公摒弃公族政策的指引下，韩氏家族“桓庄之族”的身份便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

或许是由于在晋武公时期就已经别出大宗，韩氏家族在后来的“聚邑之围”中并未受到牵连。不过尽管如此，他们恐怕还是会因“桓庄之族”的覆灭而心有余悸，这就使得这一脉公族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不得不刻意保持低调，以避免引起国君的猜忌。

比如韩万之子据说名叫伯胜，谥号赅伯。“赅”意为“以财物枉法相谢”，无论是行贿还是受贿都一律称之。从这个谥号来看，伯胜的生活应该是相当腐化堕落的，其在当时的名声也很不佳。考虑到伯胜所处时代的背景，以放纵奢侈的生活方式自污大概也是他寻求自保的一种方式。

晋献公死后晋惠公即位，公室对公族的管控有所放松，再加上秦晋之间的冲突在韩原爆发，伯胜之子韩简（韩定伯）临危受命，担任下军将，也算是有了卿的地位。这本来是个光耀门楣的大好时机，可偏偏时运不济，战争以晋国的全面失败告终，就连晋惠公本人也被俘虏了去。韩简不仅没能凭借这场战争实现家族振兴，反而因战败受到牵累而再次受到冷遇，不得不继续在韩原蛰伏。

晋文公回国后，命运再一次垂青于这个落寞的家族。晋文公为了笼络国内居守贵族，一改过去疏远公族的政策，建立了以周礼为根本的制度框架，包括韩氏在内的十一个公族受到重用，郤氏、狐氏、栾氏、先氏更是借此机遇把持了新组建的三军六卿体制。然而不幸的是，在第三代宗主韩简去世后，第四代宗主子舆身体孱弱，早早地便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一个幼子韩厥苦苦支撑家业。在这一波晋国历史上最好的红利期到来的时候，韩氏家族不但没能凭风借力得到蓬勃发展，反而因为无人主政而愈发显得风雨飘摇。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韩原与赵氏的封地耿县相邻，在韩氏家族陷入低谷的时候，善于笼络人心的赵衰及时伸出了援手。后来韩厥回忆往事的时候就

曾提到：“昔吾畜于赵氏。”正是由于赵氏的恩养，韩厥才得以平安顺遂地长大成人，并在赵盾的举拔下出任三军司马。

也正是有了赵氏的支持，这个后来三分晋国的强卿家族才度过了其发展史上又一个艰难的时刻，最终一步步走出阴霾、走向辉煌。有了这莫大的恩情，可想而知韩氏家族会对赵氏产生什么样的感情。从赵衰抚养韩厥开始，直到后来三家分晋，两家一直都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很少会发生龃龉。这种长期的联盟关系，是谁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一切又都是赵衰打好的基础。

拔擢阳氏

赵衰对阳处父的关照，主要表现在为其谋求官职一事上。

从史料的各种记载来看，阳处父应该颇有才华，但由于早年地位低微且缺少门路，竟一直未能得志。后来晋文公回国，他见国君的舅舅狐偃权势滔天，便投到了狐氏门下，以求能得偿所愿。然而三年过去了，狐偃对他不理不睬，更别说帮他寻个一官半职了。无奈之下阳处父只好又转投赵氏，赵衰欣赏其才华，只用了三天时间就让他当上了官。

赵衰帮助阳处父谋求官职的过程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在《国语》中有一个《胥臣论教诲之力》的故事，或许可以从侧面为我们做一个参考。在这篇以对话为主的故事中，晋文公打算让阳处父做太子欢（驩，也即晋襄公）的太傅，于是便询问胥臣的意见。

胥臣似乎并不看好阳处父，但又不好直接反驳，只能含糊其词地回答说：“这主要取决于欢的本质。本质好而又有贤良的人辅导，就可以期待有所成就；如果本质邪恶，就算是有圣贤前来教导也无济于事。”随后，胥臣举了周文王的例子，说他在娘胎里就没让母亲受过累，出生之时也没让母亲

感受到任何痛苦。孩提时代，父母、保傅、师长、兄弟都没为他操过心，长大以后，又能做宗族、妻儿的表率，同时任用天下贤良之士。即位之后，更是不耻下问，善于虚心纳谏，对待神灵和祖宗也极为恭敬，所以百姓赖以获得安宁，这些都不单单是教诲的作用。

晋文公听得有些不耐烦，于是就进一步追问道：“照你这么说，后天的教养也就没什么作用了？”胥臣回答说：“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文采，而是为了让其本质更加美好。”言外之意就是阳处父除了能增益太子的文采之外，对他今后的成长不会有什么教益。

不得不说，胥臣对阳处父的评价还算是十分中肯的。按照史料的记载，阳处父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华而不实”，这个评价最早出自一个叫宁嬴的馆人。事情发生在晋襄公即位六年，当时阳处父受命出使卫国，回来时在宁地（今河南获嘉县西北）的馆驿暂住歇息。管理旅店的宁嬴见他仪表堂堂，很有君子风范，便想要跟从他成就一番事业。

但是同行还没多久，宁嬴就又回来了。他的妻子很是不解，就打趣道：“你不是说阳处父是有德君子吗，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舍不得离开我啊？”

宁嬴十分气恼，没好气地回答说：“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之前没跟他没讲过几句话，只看到他仪表堂堂所以极为倾慕；可实际交往了几天后，发现他浅薄的灵魂根本配不上那高贵的皮囊。

紧接着，他指出了阳处父两个缺点：第一，君子要懂得用刚柔并济的办法来克制人的本性，可阳处父却不懂得这些道理，只会一味地以刚强取胜，必然不能长久。第二，就是华而不实，他的观察力很敏锐，这就让他看起来

很有才智，可实际上内心修养不足，于是便处处压低别人，这样很容易聚集怨恨并招来灾难，不是长久之象。

综合起来，宁嬴认为阳处父恐怕不得善终，跟着他不但享受不了荣华富贵，反而还有可能受其拖累招致祸患，所以就回来了。

作为从亡晋文公的“五贤士”之一，胥臣恐怕也正是看到了阳处父的这些缺点，这才认为他的教养对太子没有什么益处。但或许是碍于赵衰的举荐，胥臣又不便直接否定阳处父的作用，最后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以回避晋文公的提问了。

但话说回来，既然阳处父的这些缺点连宁嬴也能够看得出来，胥臣也能够提前得知，可赵衰为什么还要举荐他？晋文公为什么最终还是将其任命为太傅了呢？或许在他们看来，阳处父做太子老师，只要能教会他文辞就足够了，至于谋略和为君之道，自然有晋文公的言传身教，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知人善任吧。

第三节 夏日之日

军功阶层

站在赵氏家族发展的立场上看，如果说赵衰是一名精耕细作的耕耘者，那么赵盾就是一个财大气粗的收割者。

赵盾是赵衰与屠咎如女子叔隗所生的儿子。他自小生在“戎狄”、长在“戎狄”，在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又长期与父亲分离，没有接受过礼乐诗书的熏陶。这使得他逐渐养成了刚烈的性情，与温文尔雅的父亲赵衰放在一起，就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与赵盾竞争执政之位的狐射姑在逃亡到“狄国”时，曾对此有过一个独到的评价，他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

冬日之日，犹如雪中送炭，能让人在严寒中体会到一丝温暖，令人感到可亲可敬，这正是赵衰性情的真实写照。而赵盾则恰恰相反，他擅于争名夺利、独断专行，对待敌人手段残酷，对待朋友也毫无顾忌。就好比是酷暑时的阳光，让本已汗流浹背的旅人更添焦灼感，令人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

赵衰对国内氏族的谦恭有礼，为赵氏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足够强大的政治资本，使得赵盾执掌晋政的概率大为提升。在晋襄公七年（前621年）的夷之蒐上帮助赵盾击败先克，以及在董之蒐上擅自更改任命的阳处父，都是赵衰在世时所培植起来的势力。

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赵盾凭借其老辣的权谋、残忍的手法、凌厉的气势和无底线的行事作风，与国内外各方势力频频角力，在短期内垄断了一切军

政大权，成为炙手可热的执政，荣登列国“大夫秉国政”第一人的宝座，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进一步下移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赵盾、先克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获取政权，除了赵衰多年的辛勤耕耘之外，与当时晋国国内的政治风向也不无关系。

我们知道，晋文公归国之初，面临的情形并不乐观。但由于当时国内利益集团分化严重，晋文公便以恢复公族地位为突破口，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举措。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短期内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环境，并借此出兵中原，以城濮一战实现了对中原霸权的绝对控制，由此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辉煌。但与此同时，高密度的对外战争和不断的军事胜利，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在国内缔造出一个勋威卓著的军功集团。

军功阶层的兴起往往意味着国君权力会受到压缩。晋文公在位之时，以他的个人威望以及与流亡团队间的个人情谊，还能与这些卿大夫保持一个君礼臣忠的和谐局面；可一旦这个威望素著的拓荒之君不在了，新君幼弱无法掌控全局，就很容易引发无法控制的灾难。尤其是在“国无公族”制度的约束下，国君没有近亲子弟的帮衬，一旦国君幼弱，产生的效应便会被成倍地放大。

这种局面与王朝草创初期的情形颇有些类似，一个王朝是否能够社稷永固、国运绵长，第二代帝王的作为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勃兴勃亡的秦、隋二朝，都是因第二代君主未能处理好建政之后的社会矛盾，招致了国家的破败。即便是国祚较为持久的汉、唐、宋、明等朝，在二代君主即位前后，也都出现过影响深远的混乱局面。

晋文公虽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作为参考，但对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性也有着充分的认识。他对太子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不仅早早地就开始为太子物色老师，为他提供最好的教育，还身体力行地学习读书和治国的道理，希望用自己的实践指导太子避开随处可见的陷阱。

彼时晋文公正值壮年，他能用短短几年时间就建立不世的功业，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无上光荣的日子能够长盛不衰。他始终都相信，自己足够的时间将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也有足够的时间将太子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接班人。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晋文公自以为能掌控一切，可有很多事情终究是人力所无法操控的。这其中，最让他感到无力的是，他斗得过强大的楚国，斗得过险恶的人心，却终究斗不过一场突然降临的疾病。

史料上并没有具体说明晋文公究竟因何而死，他经历了十九年的流亡岁月才终于回到国内，却仅仅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不到九年。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自己孜孜以求所创造的霸业辉煌，没有顾得上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没有来得及将尚未完成的改革措施推行下去，便毫无征兆地离开了人世。而这个时候，被立为太子的公子欢或许才刚满十岁，就不得不以其幼弱的肩膀扛起国家的重担。

自古以来，“主少国疑”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是被历史一再印证的普遍规律。那些手握重权的辅政大臣，哪怕是与前任国君有再深厚的情谊，也会不可避免地利用职务便利增加自己手中的筹码。即便是毫无私心的公允之臣，在面对幼年君主时，也难免会流露出一股盛气凌人的气势，这些都会成为将来激化君臣关系的导火索。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晋襄公与先轸之间的冲突。作为春秋早期最负盛名的军事家，先轸先后主导了城濮之战和崤之战，在短短五年内先后击败了楚、秦两大强国，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两百年的列国政治格局。不过，在将先轸的威望捧到极点的同时，这两场战役的胜利也让他滋生了骄纵之心，而他与晋襄公之间的冲突也就此显现了出来。

崤之战后不久，晋襄公因听从文嬴之言擅自释放秦军三帅，先轸得知后暴跳如雷，不顾君臣之大防对着晋襄公破口大骂，随后还“不顾而唾”，当场给国君甩了好一顿脸子，可见他究竟还是没有把这个端坐高堂的孺子当回事。

先轸事后也意识到自己言行太过出格，有心想要弥补错误。不久后的晋襄公元年（前627年）八月，位于吕梁山区的“白狄”入侵晋国，双方在箕地相遇，晋国大夫郤缺生擒“白狄”首领，晋军由此取得大捷。

战争到此本来也就结束了，但先轸却突然惭愧地说道：“匹夫在国君面前放肆而没有受到惩罚，难道不该自我惩罚吗？”说罢便免去甲冑孤身冲入敌阵“送人头”，果然就被对方砍死了。

赵盾秉政

先轸以死谢罪挽回失礼的过错，体现了第一代创业者心中所残存的君臣之义。但伴随着家族财富和权力在代际之间的传递，礼义终究会让位于既得利益，君臣之间的感情也就不会那么纯粹了。

晋襄公即位初期对国家大事没有插手的机会，只能怯生生地看着功勋卓著的老臣们四处扬名立万，自己却只能像个吉祥物一样任人摆布。这些都对

晋襄公的心理状态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为他后来的决策埋下了伏笔。

俗话说，年轻就是资本。晋襄公虽斗不过这些专横的强卿，可只要假以时日，机会总是会有的。为此，他特意培植了如士穀、梁益耳、箕郑父、先都这些在晋文公时期并未得到重用的力量，准备有朝一日将晋文公时期造就的功勋阶层逐步替换掉。而到他即位的第六年，一批晋文公时期的老臣先且居、赵衰、栾枝、胥臣等人相继去世，这就给晋襄公着手进行人事调整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随着秦晋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晋楚在中原利益冲突的沉渣泛起，军功阶层的发展又经历了一个新的阶段。到他准备着手亲政的时候，国内早已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以他的资历根本无法撼动，这也就注定了他试图通过“大换血”来巩固权力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

夷之蒐时，晋襄公原本想将士穀和梁益耳推上中军将、佐的位置，同时让箕郑父和先都分别担任上军将、佐。但晋襄公的设想刚一提出，就遭到了以先克为首的军功集团的强力阻挠，其原本的人事调整计划全部泡汤。

为了挽回败局，晋襄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军功集团”之中选择了相对弱勢的狐射姑结盟，试图以此对抗先、赵两家组成的联盟。然而让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师傅阳处父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出手搅局，自作主张在董地举行大蒐，将狐射姑和赵盾的位置进行了调换，使得自己联结狐氏以牵制先赵联盟的企图完全落空。

而在襄公去世之后，赵盾和狐射姑为了争夺权势，竟然将国君之位当成棋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在此期间，为了彻底压倒狐射姑，赵盾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通过残酷而野蛮的政治手段，先后导致了文公的两个儿子

公子雍、公子乐死于非命，狐射姑举族投奔赤狄，先蔑、士会出奔秦国，阳处父、续鞠居断送了性命，秦晋两国更是因为令狐之役的不宣而战再次进入了冲突的高峰期。

赵盾雷厉风行的性格固然可以让他快速集中权力，但也不可避免地为自己树立了不少敌人。其中，在夷之蒐上受到排挤的士穀、梁益耳，以及争取上军职位而不得的箕郑父、先都，都是对其怨念最深的。

如此一来，在晋灵公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赵盾、先克为首的执政联盟，一派是以箕郑父、先都为首，以士穀、梁益耳为辅的反对联盟。另外还有一个名叫蒯得的大夫，因怨恨先克为人霸道，抢夺了他的菑阴之田（位于今山西万荣），从而站在了反对派一边。

反对派因在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取权位，就产生了军事政变的念头。晋灵公三年（前618年）春，这五人联合起来鼓动民众作乱，于当年正月初二日杀死了中军佐先克。

事件爆发后，赵盾迅速做出反应。他先是于半个月后，也即正月十八日捕杀了先都和梁益耳；两个月后的三月二十八日，又将屠刀伸向了箕郑父、士穀和蒯得。一场剧烈而短促的内乱，在赵盾的铁腕之下迅速得以平息。

五大夫之乱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新的内阁成员迅速凋零殆尽。按照令狐之战时晋军的部署，狐射姑出奔后任命的六卿分别是：

赵盾、先克，箕郑父、荀林父，先蔑、先都。

其中，排名第五的下军将先蔑，早于晋灵公元年（前620年）的令狐之战后出奔秦国。而在这次叛乱中，排名第二的中军佐先克为叛乱者所杀，排名

第三、第六的上军将箕郑父和下军佐先都先后受诛。刚刚组建不到三年的六卿团队，如今就只剩下赵盾和荀林父两个人了。

为补充卿位空缺，赵盾只得提拔荀林父为中军佐，并以郤缺、臾骈统率上军，栾盾、胥甲统率下军。由此组成了河曲之战时的三军六卿新序列，也即：

赵盾、荀林父，郤缺、臾骈，栾盾、胥甲。

在这个新组成的内阁中，政治倾向明显党于赵氏的有两个人，即担任上军将、佐的郤缺和臾骈。郤缺的具体事迹在前文中已有过介绍，这里需要着重一提的是上军佐臾骈。

按照通常的说法，臾骈起初似乎是狐氏的家臣，但在夷之蒐上却受到了狐射姑的羞辱，故而转投赵氏。到狐射姑出奔之后，为了对失败者给予“人道主义关怀”，赵盾决定将其眷属都送到“狄国”，而护送狐氏家眷的重任便落在了臾骈的头上。

臾骈的臣属得知自己护送的是狐氏家属，个个都群情激愤，想要杀尽狐氏以图快意，可臾骈却坚决不同意，还出面劝阻说：“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无论你跟他有多大仇怨，都不该报复在其家人的身上。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阐述说：“这次护送狐氏家人出境，是赵盾他老人家派给我的公事。他老人家要对狐氏施以恩惠，而我却因为自己的私心报复私怨，这是对他的不忠；借着他的权势去报私仇，也算不得是勇敢；为了一时的怨气而增加狐射姑的敌意，也不是明智之举。他老人家一定是相信我不会做这不忠、不勇、不智之事，所以才对我委以重任，我怎么能辜负他呢？”

臾骈的这番话有理有据有节，但至于是不是赵盾的真实用意，其中的关节便不好妄加揣测了。但总之，臾骈以赵氏臣属的身份却能身居上军佐的高位，可见赵盾对其信任之深。

除此之外，担任下军将、佐的栾盾和胥甲，分别是晋文公时期的下军将栾枝，以及流亡派大夫胥臣（司空季子）的儿子。这两人在史料中留存的事迹不多，但从赵衰举荐栾枝、胥臣的过往来看，栾、胥两家与赵氏的关系也不会太差，也都给赵盾的执政提供了强大助力。这也就意味着，在新一届的内阁集团中，如果还有人能够对赵盾形成制衡的话，唯一的可能也就只有排名第二的中军佐荀林父了。

荀氏简史

荀林父所在的荀氏家族也是姬姓，但并不属于晋国公族，其得氏始祖是晋献公时期的重臣荀息，又称原黯。其来源根据称呼可知，应该是出自王室直属的原国。原黯入仕晋国时恰逢七十年曲沃代翼内乱的最后阶段，因辅佐晋武公建立了功勋，在内战结束后被封于荀地，后来便以荀为氏，而原黯也开始以荀息的称号出现。

荀息的主要事迹有两件，最让他声名大噪的是晋献公晚年的“假途伐虢”之战，荀息略施巧计就将虞、虢两国兼并，由此也展示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然而以荀息的才智，竟也是一个愚忠之人，只要是国君留下的意旨，哪怕明知是错的也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

晋献公晚年在立嗣问题上接连出错，逼迫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出逃国外，引发了三公子党众的不满。他自知骊姬的幼子难以服众，恐怕无法保持君位，于是便在临终前托孤于荀息，命其保护太子继位。荀息明知晋献公交给他的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忠心耿耿的他竟然不假思

索，当即立誓表示不辱使命。晋献公死后，权倾朝野的里克、丕郑决定举事杀死奚齐，事前还曾向荀息通了气，可荀息死忠的决心不变，最终还是在里克发动政变后自裁以向晋献公谢罪。

荀息的做法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因而即便以死殉君，却也未得到《左传》的认可。左氏反而借君子之口批评说：“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玉圭上的斑点还可以磨掉，可话一旦说出口，再想挽回就没那么容易了。荀息的悲情结局，过于执守承诺或许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太轻易许诺了。

荀息之后，整个荀氏在晋惠公时期都无所作为，一直到城濮之战时，才有荀林父以晋文公御戎的身份出现在史料当中。而据《世本》《太平御览》等古籍记载，荀林父实际上是荀息之孙，他的父亲名叫逝敖（又或舞鬻），而他的母亲则是冶氏一个被丢弃的女奴。

晋文公五年（前632年），晋国在城濮大胜楚军，因此“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被任命为中行将。这个三行的编制只存在了不到三年，到晋文公八年就被全部裁撤，改为新上、下两军，荀林父也就成了晋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担任过中行将的大夫。大概是为了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职位，荀林父后来便以中行为氏，成为晋国中行氏的开创者，故而又常被称为中行伯、中行桓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荀林父与原下军将先蔑的关系。先蔑以及参与五大夫之乱的先都，与先轸、先且居父子应为同族，但政治取向却并不一致，因此一般猜测其应该是先友的后人。晋文公组建三行时，曾以先蔑为左行将、屠击为右行将，与荀林父也算是早有渊源。三行被裁撤后，此三人似乎都未跻

身卿列，直到晋襄公去世之后，荀林父和先蔑才双双进入六卿，并于狐射姑出奔后分任上军佐和下军将。

赵盾与狐射姑争权时，担任下军将的先蔑曾受赵盾指派，与士会一道去往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出发前，荀林父念及双方长期的同僚之谊，曾好言相劝道：“夫人和太子都在国内，却要舍近求远去国外寻求新君，这事一定行不通，我担心会因此给您惹来麻烦啊！身为您的同僚，就必须尽到同僚的职责，所以建议您以生病为借口，派一个摄卿前去以保全自己的地位，何必亲自蹚这趟浑水呢？”

然而先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终究还是应下了这个差事，结果还真被荀林父言中。令狐之战赵盾带兵夜袭秦军，先蔑自知已不容于晋国，便只好与士会一起逃亡到秦国，从此再也没能回国。

荀林父顾念同僚之谊，冒着见罪于赵盾的风险极力劝阻先蔑，以儒家的观念而论是为“忠”。在各派势力互相残杀的混乱局面下，能够时刻保持理智的头脑，做到持中守成，也可以称得上是“智”。当六卿之中其余将佐为了权势纷纷上阵搏杀的时候，荀林父却又依靠其过人的洞察力独以自保，又当得起一个“敏”字。

荀林父凭借自身沉稳的性情和深远的谋略，不仅避开了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还因此由一个普通大夫一跃而成为晋国政坛上的二号人物，这可以说是他的幸运。然而，祸福总是相伴而生的。在令狐之战后形成的新一届内阁当中，上有赵盾只手遮天，下有郤缺、臾骈、栾盾、胥甲暗中掣肘，荀林父即便再有雄心也终究无法施展，这又是他的不幸。

面对赵氏“执政联盟”的孤立，荀林父并没有选择逆来顺受。但正如宁嬴在评价阳处父时所引用那句话，“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深沉的人要以

刚强的手段来克制，爽朗的人却要用柔弱来克制。荀林父深悉“扬长避短”“以柔克刚”的道理，故而一直都是以柔软的手段与赵盾角力，其结果自然也就与只懂得以暴制暴的箕郑父、先都等五大夫截然不同了。

比而不党

赵盾执掌政权的方式过于霸道，稳固权力的手段更是充满了血腥，不少在斗争中利益受损的家族慑于其强悍手腕不敢公然反抗，但内心的愤恨和不服从却是无法掩饰的。尤其是在组建六卿团队时，赵盾拔擢郤缺、舆骈，任用栾盾、胥甲以孤立荀林父，更是为他招来了任用私人、党同伐异的批评。有关这一点，在河曲之战时赵盾处置韩厥一事上就有所体现。

这则故事被记载在《国语》中，说是河曲之战爆发时，赵盾将韩厥推荐给了晋灵公，将其任命为三军司马，可谁知韩厥“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烧到了赵盾的头上。

当时，晋军在河曲刚刚驻扎不久，有赵盾的亲信驾着他的战车在军中横冲直撞，韩厥见到后二话不说就把人抓来杀掉了。事情发生后，旁人都以为韩厥难逃劫数，于是就纷纷议论道：“他早上刚被主君升了官，晚上就杀掉了主君的亲信，这个司马的职位怕是当到头了！”

可没想到，赵盾听说之后不怒反喜。他把韩厥叫了过来，当着众人的面说道：“我听说侍奉国君要做到‘比而不党’。出于忠信，为国推举正直的人才便是‘比’；反之，如果徇于私情，推举的人才不堪重任便是‘党’。当初将你推荐给国君时，我还担心你不能胜任，让我落下结党的名声，这样的话我也就没脸做这个执政了，因此才派人来试探你。如今看到你能做到‘军事无犯、犯而不隐’，我也就放心了。你多努力吧！只要能够坚持这么做，那么将来执掌晋国的，除了你还会有谁呢？”

在对韩厥表示鼓励的同时，赵盾还不忘向大夫们宣扬：“诸位可以祝贺我了，我推荐的韩厥正直无私。只要有他在，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免去结党营私的罪行了！”

赵盾这席话可以说是一个“危机公关”的典型案列。河曲之战发生在晋灵公六年（前615年），距离五大夫之乱才刚刚过去三年，赵盾狠辣乖戾的名声还未止息，而由于士会逃秦、狐射姑奔狄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却已经开始显现。反对力量也正是以此作为切入口，不断地制造舆论以逼压赵氏，故而才会有赵盾“结党营私”的不利言论甚嚣尘上。

如今韩厥在战阵上明令军纪，公然处死了赵氏亲信，于旁人而言或许是触了赵盾的逆鳞，可对赵盾本人来说却不啻于是雪中送炭。在赵盾压力最大的时候，韩厥的做法为他在舆论上做出反击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可谓是正当其时。

然而遗憾的是，赵盾话音刚落，就很快被自己人打了脸。

在进行战争部署时，赵盾采取臾骈“深垒固军以疲敌”的计策坚守不战，而秦康公则采用了晋国流亡大夫士会的建议，专门派人到赵穿阵前挑战。赵穿受不得激，连番孤军出战，使得赵盾情急之下只能带领全军出营救援，原有的作战部署也被完全打乱了。

这还不算，后来秦康公因惧怕晋军战力准备连夜撤军，于是特派使者到晋军营内假意约战。臾骈看出秦国使者神色慌张，料定对方一定是虚张声势，于是就建议全军趁夜突袭秦军，结果又是赵穿拉着下军佐胥甲一起挡住了营门，导致晋军坐失良机。

赵穿是赵氏的侧室，依照先秦史专家白国红教授的结论，应是赵夙的孙子、赵盾的堂侄，且一直都是被赵盾当作“卿”来培养的苗子。而与赵穿一同阻挡营门的胥甲，也同样是赵盾的私属。赵盾举荐这两人在军中任职，如今又因为他们的专行无忌而错失战机，显然是犯了结党营私的大错，由此造成的负面舆论可想而知。

河曲之战后，国人对胥甲、赵穿进行追责的声音一直都未曾止息，赵盾有心袒护赵穿，故而一直强压着未做处置。一直到五年后，因郑国出现了摇摆情绪，晋国责而不成，只好派巩朔到郑国修好，同时将公室的两个女婿赵穿和公婿池送往郑国为质，以换取郑国的信任，也算是对赵穿进行了惩戒，但不久之后就又把他召了回来。

而对于胥甲，赵盾的惩罚显然更加严厉。晋灵公十三年（前608年），赵盾以“讨不用命者”为由，将其放逐到了卫国，从此以后胥甲便不知所踪，他的位置则由其子胥克取代。到晋成公六年（前601年）赵盾去世后，党于赵氏的新任执政郤缺为了将赵朔塞进内阁，便以胥克有蛊疾为借口将其废掉。胥氏因此而被排挤出卿列，这也就为后来郤氏的灭族埋下了伏笔，这些都是后话了。

诸浮会议

河曲之战后，在应对人们“讨不用命者”的声浪之外，赵盾所面对的最大压力，莫过于因士会和狐射姑的流亡而给晋国带来的威胁。在各方强压之下，赵盾不得不于晋灵公七年（前614年）夏天，在绛都城外的诸浮举行了一次高级别的秘密会议，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

会议召开时，赵盾简要地帮大家温习了一下当前面临的困境：如今晋国东有“赤狄”蠢蠢欲动，西有秦国频频举兵，两国时刻威胁着我们边境的安

宁。而帮助他们的也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在“赤狄”的是贾季（狐射姑），在秦国的则是随会（士会）。这两个人都很熟悉晋国的内情，有他们为敌国出谋划策，恐怕我们就要疲于应付了。为了缓解晋国双线作战的压力，我想请大家议一议，究竟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呢？

赵盾的话音刚落，中军佐荀林父便开始畅所欲言，他说：“不如将狐射姑请回来！狐氏本就有勋劳在身，同时对外事也了解颇多，将他请回定能减少外患。”

但上军将郤缺却并不这么认为，马上就出口反驳道：“狐射姑曾经为乱，而且有重罪在身。”其言外之意实际上是在说，狐射姑曾与赵盾争夺政权，野心已然被撑大了，但凡对晋国过去几年的斗争有所了解，就不应该忽略这一点。如若把他召回来，他绝对不会安分守己、甘居人下，到时候难免又会是一场腥风血雨。

相比之下，召回士会就要稳妥很多。在郤缺看来，士会有着“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的个性，是一个外柔内刚、能屈能伸的真君子。更何况，士会本来是没有罪的，出奔秦国纯属情非得已，让他回来也是名正言顺。那么，郤缺为何会做出如此判断呢？

士会，又称士季，谥武子，因被封在随、范等地，故而又称随武子、范武子，其所在的祁姓士氏家族是唐杜氏的一支。晋献公在位时期，士会的祖父士蒍因诛杀“桓庄之族”受到晋献公青睐而被授予司空职务，并主持了绛都的营建工作。到后来的骊姬之乱中，士蒍以及其同宗的杜原款都倾向于太子申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充当了太子保护者的角色。但随着士蒍去世，杜原款又缺乏智谋，太子最终还是被骊姬陷害致死，士氏家族的发展也由此步

入低谷，在晋献公晚期到晋文公时期都无甚表现，其间的两代宗主士缺（士成伯）及士穆子更是严重缺乏存在感。

到了晋襄公时期，士缺的弟弟士穀因受到晋襄公重用而复任司空，并在晋襄公三年（前625年）的垂陇会盟上，首开以大夫身份主持诸侯会盟的先例。在这次会盟上，士穀的表现十分得体，因此受到了《春秋》的表彰，后来更是一度成为晋国执政的热门人选。

然而以士穀非凡的才能，以及在晋襄公心目中的地位，其最终命运却令人唏嘘。在后来晋襄公七年（前621年）的夷之蒐上，由于受到赵、先联盟的连番阻挠，士穀的执政之梦化为泡影。士穀因此怨恨赵盾，遂与其余四名大夫一同发动叛乱，最终败亡——这个因怨生恨而枉死的冤魂，正是士会的亲叔叔。

士会是士缺的幼子，士穆子的弟弟，第一次抛头露面还是在晋文公时期。当时他随军参加城濮之战，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官职，后来担任晋文公车右的魏犢、宫之奇先后因违抗军令被罚、被杀，士会才临时上阵被指定为代理车右。

伴随着晋国霸业的狂飙突进，士会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也因风借势，步入了事业发展的快车道。及至晋襄公去世前后，史书在提到他时常以随会、随季相称，可见此时的士会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进阶为一名拥有封邑的大夫了。

夷之蒐后的那段混乱时期，正是士会成长的关键阶段。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士氏家族再次遭到打击，其叔父士穀因叛乱被杀，自己更是因卷入狐赵之争而遭赵盾算计，不得不流亡秦国。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导致整个士氏家族都与赵氏为敌，士会对于赵盾的怨恨恐怕并不比狐射姑少多

少。也正因如此，赵盾才有所犹豫，在士会和狐射姑之间狐疑不定。荀林父也正是抓住了赵盾的这个心理，才极力为狐射姑鼓吹。

然而，荀林父心中的小九九，又岂能逃得过赵氏党羽敏锐的嗅觉？他的话刚一出口，就被赵盾一手提拔的郤缺给否决了。在郤缺看来，作为家族中没有继承权的幼子，士会能够获得如今的地位，全是靠自己过人的智谋和卓越的军功换来的。一个人能够一步一步从底层爬上来，便应深知富贵来之不易，回来之后也更懂得安分守己，不至于再酿出什么祸端来。

计赚士会

郤缺的分析句句在理，既打消了赵盾的疑虑，也同时说服了在场的所有人，由此诸浮会议的主要议题也就有了明确的结论。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让士会回到晋国。以士会对晋国深入的了解，以及他在河曲之战中所表现出的才智，秦康公显然不会轻易放人。如此一来，想要如愿召回士会，就必然要费一番周折。

为了达成目的，赵盾使出了一招苦肉计。他先是命魏寿余带领魏氏族人发动叛乱逃到秦国，然后再假装震怒将其家人全都抓起来。等到时机成熟，他又故意放松看守，让部分人趁夜出逃。出逃的家人历经艰险、跋山涉水到达秦国之后，对着秦康公一通哭诉，也使得对方不再怀疑其叛逃的真伪。

在取得秦康公信任后，魏寿余就开始鼓动，说要把魏地划入秦国。魏地位于黄河北岸，西距控扼秦晋关钥的蒲城、风陵渡口只有咫尺之遥，是秦人垂涎几十年都未能得手的宝地。面对这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秦康公哪里还有什么抵抗力？霎时间喜出望外，惊喜地询问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接手魏地。

魏寿余有些难为情地说道：“找一个熟悉河东情况，能够跟当地官员说得上话的人跟我一起去，这事就会好办些。”

秦康公四下里看了看，恰好就瞅见士会正在一旁站着，就说：“那就让士会跟你去吧。”

士会急忙上前推辞道：“晋人都如虎狼一般，倘若他们食言，不肯放我回来，那该如何是好？我士会死不足惜，连累了妻子儿女也不足惜，可若是让君上您竹篮打水一场空，那时可后悔也来不及了！”

秦康公不是看不到其中蕴含的风险，只是这么一大块肥肉放在眼前，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念，还是决定要赌上一把。为了安抚士会，他拍着胸脯保证道：“这些你都不必顾虑。倘若晋人不肯放你回来，寡人绝不为难你的家眷，定会将他们送回晋国！”

有了这个保证，士会这才放心地跟随魏寿余前往晋国。但让秦康公没有想到的是，早在朝堂会见之时，魏寿余便伺机踩了一下士会的脚，士会对此早已心领神会。这个细节被秦国大夫绕朝看在眼里，却并没有当场揭穿。只是在送别时，绕朝赠给士会一条马鞭，并冷冷地说道：“你不要欺我秦国无人，以为你们的算计无人知晓，只不过我的话寡君不肯听而已。你我就此别过，后会无期了。”

渡过黄河之后，魏地人见二人安然无恙，皆欢欣雀跃，随即便簇拥着士会回到了国都。而到了这个时候，秦康公才知道自己中计了。但他没有因此怨恨士会，而是依旧遵照之前的约定，将其家人送回晋国。

不过，根据后来的史料推断，秦康公终究还是有所保留，并没有真正做到“尽归其帑”。比如后来经常活跃于国际舞台的秦国大夫士雅，据说就是

士会的次子。这些被滞留在秦国的族人后来改为刘氏，据好事者说，汉室开国之君刘邦就是这支刘氏族群的后人，其中的真伪究竟如何，就不好评价了。

另外，根据某些史料中的说法，士会在回国之后，对绕朝临别时的那番话感到十分后怕，担心他将来会危害晋国，因此便再施离间计，终于借秦康公之手拔掉了这颗眼中钉。

士会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回国后不久就进入了六卿的行列，为孤立无援的荀林父提供了莫大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士会流亡秦国的这段经历终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再加上其“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的个性，使得他无论如何都不会与赵盾起直接冲突。甚至我们可以说，他能够在流亡多年之后回归故土，在很大程度上还要感念赵盾的好处，这也就冲淡了人们对赵盾“党同伐异”的想象，进一步巩固了赵盾的权力。

在君主制体系之下，君主与卿相之间的权力冲突从来都是永恒不变的命题，当卿相手中的权力过于炙热，就意味着君主的权力受到了抑制。在赵盾独断专行、主持国政的这十几年间，不仅荀林父的才能无法施展，就连身为主君的晋灵公也严重缺乏存在感。战国时期纵横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天下只知有某君而不知道有国君”的离间话术，用在如今的晋国可谓恰到好处。

君卿之间关系的不对等，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冲突。作为晋国真正的主人，面对赵盾的专断独裁，晋灵公不可能无动于衷。那么，他究竟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削夺赵盾的权力，最终又会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第二章 世卿世禄制的形成与危机

第一节 赵盾弑君

宫廷夜宴

公元前607年，是晋灵公在位的第十四个年头，也是赵盾担任执政的第十五年。这年九月的一天，为犒赏赵盾带兵拒秦伐郑之功，晋灵公特地命人准备了一席丰盛的晚宴，盛情邀请他入宫把酒言欢。

这次宴会，晋灵公准备了不少娱乐节目，宫廷内一时间莺歌燕舞、钟鼓齐鸣，气氛欢乐而祥和。赵盾受邀赴宴不胜荣幸，于是频频举杯，与在场的大夫一起向国君表达诚挚的敬意和美好的祝福。

觥筹交错之间，赵盾心甚欢愉，不知不觉间便多饮了几杯，到掌灯之时已然微醺，走起路来也有些飘飘然了。这个时候，晋灵公突然对赵盾说：“寡人听闻你的剑是一把利剑，能给寡人瞧瞧吗？”

赵盾不知其中有诈，便带着剑欣然上堂。戎右提弥明发觉情形有异，忙喝阻道：“臣子陪侍国君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符合礼数了，更何况是在君前拔剑？还不快退下！”见赵盾迷迷糊糊听不真切，提弥明急忙上前，拉起赵盾转身就走。

就在此时，晋灵公将象觚重重地摔到地上，紧接着便听到殿外有隆隆鼓声响起，急促的脚步声从四处逼近。赵盾正要逃出大殿，谁知却被一条从檐下冲入的烈犬给撕咬住了，提弥明迎头上去就是一脚，直把烈犬踢得颌骨尽裂。赵盾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一边向外逃跑，一边回头质问道：“有忠臣良将不肯任用却要用狗，狗就算是再凶猛又有什么用？”

眼下显然不是逞口舌之快的时候。赵盾入宫时穿着宽袍大袖的华服，行动极其不便，他们很快就被赶来的甲士团团围住。提弥明护卫他且行且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战死。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围捕赵盾的甲士中突然冲出一人，倒戟抵御其他的甲士，为赵盾争取了不少时间，赵盾这才狼狈地逃出重围。慌乱之中，他仍不忘询问勇士的姓名，那人顾不得回头，只是高声喊道：“你还记得翳桑那个差点饿死的人吗？”

关于“翳桑之饿人”，《左传》插叙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赵盾到首阳山（位于今山西芮城与永济之间）打猎，在翳桑小住时遇到了一个叫灵辄的人饿倒在地上，就急忙前去救助。那灵辄虽已经饿得不成人形，却十分节制，赵盾给的食物他只吃了一小半，剩下的全都打包了起来。赵盾很好奇，于是就询问其原因，灵辄回答说：“我在外学习三年没有回家，如今快到家里了，却不知母亲是否还健在，所以就想把这些留着回去给母亲吃。”赵盾被他的孝心感动了，于是就让他全部吃掉，又另外赠给他一簋干粮和肉，让他带回家去给母亲吃。只因为这一饭之恩，灵辄在危急关头甘愿舍身，足见其忠义和勇气。

赵盾从公宫仓皇出逃，只管像没头苍蝇一般，命人马不停蹄地驾车向南奔逃。在颠簸的车驾上，他仰望璀璨而渺茫的星空，看着黝黑的群山向身后疾驰而去，内心充满无限悲凉。他不知自己究竟会流落何方，又会以何种样貌苟活于人世間。

他不甘心就此一败涂地，更不能甘心从此流落惶惶如丧家之犬。更重要的是，那个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的国君又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存在，一旦让他掌握了军政大权，在天下霸主权势的威逼下，又有谁敢收容自己呢？

然而不久之后，也就是这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当晋灵公正在他耗费巨资修建的桃园行宫庆祝功成之时，赵盾的堂侄赵穿突然发难，将其杀死。

董狐直笔

事变发生之时，赵盾正停驻在边境上，当赵穿弑君的消息传来，他毫不犹豫选择了折返，继续回国执政。这一做法引起了不少贵族的愤慨，其中就有著名的太史董狐。他不畏惧赵盾的权势，毫不客气地将“赵盾弑其君”这几个字刻在竹简上并公之于众。

春秋时太史记录的事件，特别是国君继立亡故等大事，通常都会宣示朝野并传告诸侯。诸侯得到盟友的通告也会据实照录，成为藏于各国宗庙中的权威记录，并世代流传下去。

董狐如此记述，赵盾自然不会服气，他辩解说：“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我赵盾难道是忍心弑君的人吗？

看他如此惺惺作态，董狐厉声责问道：“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你赵盾逃亡未出国境，回来之后明知谁是凶手却又不惩办，就只能认定你才是真正的弑君者了。

《穀梁传》同样引用了董狐的话，不过与《左传》略有不同，其原话是：“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

在这段话中，董狐首先指出了赵盾的两项失职之罪。其一，身为正卿没能履行劝谏君主的职责，使得国君剑走偏锋酿成冲突，间接造成了后来的灾难，对国君的死负有间接责任。其二，在赵盾逃亡尚未出境的时候，其身份

依然是一国执政，国内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祸乱，身为执政都难辞其咎，更何况是弑君作乱这样的犯上之举呢？

与此同时，董狐还进一步指出，就算是你流亡的时候，因为混乱无法控制国内秩序，你不愿意承担弑君的责任还勉强说得通。那么当你回到国内重新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也总该有所表现，对弑君者加以惩处，以正视听吧？

再退一万步讲，大家都知道弑君者赵穿是你的堂侄，也知道你舍不得杀他，可即便如此，你把他抓起来，或者流放到国外去，以你的权威，这总不是什么难事吧？可你并没有这么做，你刻意袒护赵穿，任由弑君者逍遥法外，只能说明你与弑君者是同谋。两人同谋，就应该写地位高的，这难道有错吗？

董狐严密的逻辑推理让赵盾无言以对。

赵盾在政治上作风狠辣，对待政敌从不手下留情，但却十分顾念亲情，对自己的亲人十分关爱。特别是赵穿这个堂侄，在河曲之战时因为其任性蛮横，晋国整个战略部署完全被打乱，可即便如此，赵盾还是冒着丧师折将的风险出动全军去营救他。如今赵穿为自己出头做出了弑君的恶行，不管之前有没有得到自己的授意，他都不可能为了洗脱弑君的罪名而把赵穿明正典刑。既然如此，倒不如听之任之，硬着头皮把这个罪名担下来好了。

不过，赵盾在承担罪责的时候也很懂得避重就轻，董狐质疑赵盾的重点在“反不讨贼”这四个字上，可赵盾偏偏紧紧抓住了“亡不越竟”这四个字，并无限感慨地说道：“‘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意思是说，我赵盾之所以背上了弑君的罪名，并不是因为真的杀了国君，而是为了尊重史官的书写传统，心甘情愿把责任揽了下来。如果我逃亡

的时候故意多跑几步路，或者说听到国君被杀的消息后装聋作哑，先去国外转一圈再回来，就不必背上弑君的罪名了。

对于赵盾的自辩，《左传》可谓是赞赏有加，但以我们当代的观念来理解，如此辩解很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毕竟，晋灵公死于赵穿之手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只要你没有讨伐弑君者，那么无论你是否越过了国境，就都有同谋的嫌疑，二者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难不成他出一趟国回来，就真能因此而洗脱罪名了吗？

赵盾作为正卿，只要还没有逃离国境，就必须承担正卿所肩负的职责。国君在他的任上被人杀害，本身就是他的失职，倘若再不加诛讨，就证明他是认可弑君者行为的，就无法逃脱弑君的嫌疑。反之，如果出了国境，那么赵穿杀人的行为就与他无关了，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权力实际上被罢免了，国内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在其权责范围之内。哪怕是回去没有诛讨赵穿，顶多算是德行有亏，弑君的罪名自然与己无涉了。

这就好比孟子所说的“五十步笑百步”，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同样是逃跑，跑了五十步和一百步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孟子又为何会拿出这么一句话来举例呢？其原因就在于，春秋时期两军交战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逐奔不过百步。”当你追逃的敌人已经跑出百步之外，就不能继续追了，否则即便是俘虏了敌人，也会因丧失荣誉而遭人耻笑。

同样，对于被追击的人来说，只要能将敌人甩开到百步之外，就意味着你已经脱离了战场，接下来哪怕是就地生火做饭、喝酒吃肉也没有人管你。但逃出五十步就停止的人则不同，这个时候他仍处于交战范围之内，仍然有可能被敌军俘获。在这个时候他停下了脚步，证明他的勇气还没有完全丧失，还有信心与追击的敌人一战。

因此，尽管在我们看来，五十步和一百步好像没什么区别，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却恰恰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胸襟和胆气。在崇尚贵族荣誉的春秋时代，尽管二者都是战场上的失败者，但跑出五十步的人仍值得敬重，而跑出一百步的人却是不折不扣的胆小鬼，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对赵盾是否弑君的“量刑”同样遵循此理。当国内发生政变之后，赵盾若逃出了国境，这意味着他是真的害怕了，这个时候发生赵穿弑君的事件，自然与他无关。然而事实是，他在逃到国境之时并未再向前走一步，而是为了保住权位留在国内，可见彼时他的头脑仍是清楚的，赵穿弑君的举动即便不是出于他的授意，也跟他脱不开干系了。

弑君有理

不管怎么说，从各个口径来看，“赵盾弑君”的罪名都算是坐实了。儒家意识形态中，礼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定尊卑、明贵贱、辨等列、序少长、习威仪”。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弑杀君上可是十恶不赦的罪名。既然赵盾担负了弑君的罪名，那么在微言大义的《春秋》语境中，赵盾该不该被口诛笔伐，好让他遗臭万年呢？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春秋》的确是孔夫子所作，那么当他写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这几个字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态度。因为按照《左传》常有的解释，“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在发生了如弑君这等严重政治事件时，名字被写在竹简上千古留名可不是什么好事，“做好事不留姓名”才是最好的。

具体到赵盾弑君这件事上，如果《春秋》写上“晋人弑其君夷皋”，那么这个“君”夷皋铁定就是个暴君、昏君了，弑君者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自然是皆大欢喜。如果《春秋》写的是“晋赵盾弑其君”，情况则正好相反，被写上名字的赵盾显然就是乱臣贼子，而被弑的国君则是一位好君主。

事实上，孔子对赵盾和晋灵公这对君臣显然是都没什么好感。他既为晋灵公作为的“不君”感到失望，更对赵盾行径的“不臣”充满了愤慨，因此毫不犹豫地把两个人的名字都写了上去，以证明他们都是有罪的，都要受千夫所指、万人唾骂。

孟子也坚信“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一出世，必然会起到“天雨粟，鬼夜哭”的效果。他相信舆论的力量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可以让那些乱臣贼子无处遁形。不过，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也并不总是一致的，至少在“以臣弑君”一事上，孟子就有他自己的想法。比如当齐宣王问到“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种弑君行为是否具备正当性时，孟子的回答是：“弑仁者，谓之贼；弑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孟子看来，君臣纲常伦理正常运行的前提是国君有道。假如国君当得太不像话，对仁义之士大开杀戒，那他只能称得上是独夫民贼，算不得君主。因此说周武王伐纣，我只听说周武王杀掉了一个独夫民贼，可没听说他弑君啊！这些理论和他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观念一脉相承，其目的无非是想劝导当国者要爱民亲民，要求仁求义，以成就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但在君主集权的古代社会，此番言论显然不会为当政者所喜爱，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努力不会为当世的君主所采纳。尤其是其“独夫民贼”的宏论，更是为“弑君有理”的论调提供了理论基础，多少有点大逆不道的味道。因此当后世明太祖朱元璋读到这样的言论时，自然会龙颜不悦，并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

孟子之所以形成如此观念，恐怕与战国时期的思想风潮有很大关系。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原先的霸主晋国早已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吕氏齐国也变成了田氏的齐国，原先的四家臣属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受天子册封的正牌诸侯。

“礼崩乐坏”之后原本的等级秩序遭到了破坏，但地球照样转，人们的生活有可能还变得更好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去反思，是不是孔子的那套理论压根就没用呢？特别是在面对赵、韩、魏、齐这些得位不正的主子时，即便是宣扬孔子学说的儒生，也总得考虑在位者的感受，不得不为现行秩序的合理性寻找依据，这恐怕也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产生的源泉。

也正是因为这个思潮在战国时期很有市场，无须孟子的说教，“三传”的作者就都很自觉地向这方面靠拢了。他们不约而同地背离了孔子的思想，为这些篡位者的先祖们摇旗呐喊。对此，史学家童书业曾有过一段评价，说《左传》扬臣抑君的倾向尤为明显，特别是孔子在世时对季氏等弄权者深恶痛绝，《左传》中却处处透露出褒奖的意味。

在赵盾弑君一事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苗头。比如《公羊传》就为赵盾的行为进行了一番辩解，说：“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赵盾可是大大的忠臣哪！《左传》更是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也就是说，孔子对这件事的评论是，董狐和赵盾都是好人，董狐直言不讳不避权贵，精神可嘉；赵盾维持法度，甘愿担当弑君的罪名，也是好样的。

有这么一群博学大儒的背书，原本因弑君而受到《春秋》讥讽的赵盾，其形象突然间竟高大了起来，俨然成了为民除害、行侠仗义的美好典范。只是，在弑君罪行已然形成的基础上，要想为赵盾正名，撑起他“良大夫”的美好形象，仅仅宣扬其道德情操显然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更多的事实作为证据支持，才能够在“弑君有理”的理论框架内彻底洗脱赵盾身上的污名——如此千钧重任自然要靠晋灵公来完成。于是乎，在战国年间流传的故事中，一个令人惊叹的顽劣君主形象便跃然于竹简上了。

灵公不君

为了深入刻画晋灵公荒淫无道的形象，叙述他残国害民的斑斑劣迹，《左传》真可谓是不遗余力。

起初，作为一名霸主之国的国君，晋灵公似乎对国家大事不怎么感兴趣，反而是对艺术有着很高的追求，特别喜欢在墙上画彩绘。但问题是，任何兴趣爱好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在物质资料极其匮乏的春秋时代，从事绘画艺术更是需要消耗大量的民财。为了能将这项事业进行到底，晋灵公便不断地向民众收取重赋，闹得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

闲暇时间，晋灵公还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就是喜欢用弹弓打人。为此，他还特意在宫墙内修筑了一座高台，然后把朝臣们聚拢在一起，一边搞“实弹射击”，一边看他们龇牙咧嘴躲避弹丸的滑稽模样，玩得特别开心。

晋灵公行事如此乖戾，人们自然会有所不满，但顾念其国君的身份，也大都敢怒不敢言。时间长了，晋灵公便被娇纵得愈发顽劣，以至于发展到随意杀人取乐的地步。

据说有一次，宫里的宰夫把没有煮熟的熊掌给端了上来，晋灵公吃了之后大概是腹中不适，于是就当场就把他杀了，同时还将其尸体肢解了放在一种用草绳编成的畚箕中，让宫女用头顶着从朝堂上走过。

赵盾当时正立于朝堂，猛然见到畚箕外耷拉着一只手，就急忙拦住宫女询问。听宫女如实说了之后，他简直肺都要气炸了，当时就怒气冲冲地准备赶往后朝训斥灵公。

同立朝堂的士会了解赵盾的脾气，担心他这一去会激化君臣矛盾，于是便劝阻说：“您是执政，如果您的话他都不听，其他人就都不敢再进言了，还是先让我去劝谏吧！”

士会进入内朝见到国君，恭恭敬敬地伏地行礼，可晋灵公却假装没看见他。士会也不生气，站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再次伏地行礼，如此往复，一直到了屋檐之下，晋灵公这才无可奈何地转过头来说：“我知道错了，会改正的！”

士会只得恭敬地回应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君上能够善始善终是我晋国的福气啊！”

晋灵公当场答应得很诚恳，可事情过后忘得也很彻底，没过多久就又恢复了本色。眼看士会的话也没起到作用，赵盾只好亲自上阵，苦口婆心讲了

不少大道理，可对方偏一句都没听进去。不仅如此，在经历了几次劝谏之后，晋灵公对其感到十分厌烦，厌烦到甚至要派刺客去杀他。

被派去的刺客据说名叫鉏麇，此人到了赵氏宫中，大概是蹲了一夜也没找到机会。一直等到凌晨，看见赵盾的卧室门打开了，才急忙拿着匕首准备上前行刺。只是在行刺之前，他忍不住多看了一眼，也就是这片刻的迟疑，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按照《左传》中的说法，赵盾是一位品德极其高尚的君子。为了给天下臣民留下一个好印象，他早早地就起来穿戴打扮，衣服上的每一个装饰，冠带上的每一颗珠玉，都要仔仔细细检查一遍，可谓是恭敬之至。收拾停当后发现时间还早，赵盾就坐着小睡了一会儿，在小睡的时候，依旧是正襟危坐，生怕把衣服给弄皱了，那副虔诚的态度简直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鉏麇是一个有担当、有情怀的刺客，眼前的场景让他不由得对赵盾敬佩万分，以至于突然良心大发，心说：“如此恭敬的君子，心念家国百姓，是真正的万民之主，我怎么能杀这样的人呢？”他既不想杀掉心念百姓的执政，又不想违背国君的指令，两难之下只好选择以死相报，最终竟撞在一棵大槐树下死掉了。

派刺客暗杀没能成功，晋灵公只好自己动手。他提前豢养了一只烈犬，等到烈犬驯养成熟，就假意在宫中宴请赵盾。而在背地里，则是预先埋伏了甲兵，准备在大宴之上围捕赵盾。可谁知他机关算尽太聪明，最后竟作茧自缚，自食苦果，也算是罪有应得吧！

诱过于君

人们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述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偏见，对真实发生的事件进行取舍，以此来印证自己的结论。《春秋》推崇德行仁义，自然就会把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带入历史事件中，一旦爆发了生死冲突，就必然要分出双方德行的优劣。晋灵公诸多“不君”的行径，实际上就是在此前提下对史料进行摘选的结果。

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回看这些故事，实在是漏洞百出。且不说广受诟病的鉏麇触槐而死的桥段是子虚乌有，即便是以上所列举的事项都是实情，也很难证明晋灵公就一定是个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

首先，依照我们之前的介绍，晋襄公去世的时候，晋灵公还只是个嗷嗷待哺的孩童，若不是母亲穆嬴每天抱着他穿梭于朝堂和赵氏的府邸之间哭诉，他根本就不可能继承君位。以此来推断，到十四年后被赵穿杀死的时候，其年龄最多也就是十七八岁，而这恰恰是《春秋》三传极力想要让人们忽略的前提。

因此，喜欢以弹弓取乐、喜欢涂彩绘等荒诞行径，不过是一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甚至是低幼状态的“熊孩子”搞出来的恶作剧罢了。即便是杀掉厨子的举动，在我们今天看来难以接受，但在等级森严且殉葬制度尚未完全废除的春秋时期，残杀奴仆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罪行。这些行为再恶劣，跟赵盾先后导致了狐射姑、先蔑和士会的出奔，晋文公两公子及先克、阳处父、续简伯之死，以及二卿三大夫叛乱的系列事件比起来，其对世道人心的影响都微不足道。何以到最后十几岁的晋灵公落下了“不君”的罪名，而弑君引乱的赵盾却获得了“良大夫”的美名了呢？

其次，即便我们抛却这些不论，单以晋灵公的顽劣而论，赵盾也同样难辞其咎。当初穆嬴在朝堂上哭诉时提到，先君晋襄公在去世前曾言辞恳切地

嘱咐赵盾：“这个孩子将来如果能够成材，我就是受了您的赐予；倘若不能成材，我在地下也会怨恨你的。”

赵盾肩负晋襄公的托孤重责，那么给国君选称职的老师，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事实上，赵盾罔顾自身重担，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让一个本来应该接受良好教育的少年国君，在自由散漫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熊孩子”。而当国家政治出现混乱的时候，又将所有的罪责都一股脑儿地推给了一个尚不能自主的孩子，如此作为本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又如何能够当得起“良大夫”的头衔呢？

最后，一味地进行道德说教，只能将真实的矛盾与冲突爆发的内在逻辑掩盖起来，这也是三传“德性论”叙事的一大缺陷。倘若刨除了道德外衣实际上不难发现，赵盾与晋灵公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还是权力之争。当晋灵公尚且年幼时，还没有参政议政的意识，赵盾对其有所管控也无可厚非。但伴随着年岁的渐长，晋灵公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亲政自主的意愿，然而这个时候，赵盾却不愿归政放权，难免就会造成君臣之间的嫌隙，由此产生的权力纠纷显然不是仅凭道德就能一概而论的。

事实上，晋灵公夺取权力的手段，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特例。近如楚庄王与若敖氏之间的冲突，远如后世康熙帝和鳌拜的斗法，都与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当君主幼弱，国家权柄完全被操控于权臣之手时，君主想要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就只能示敌以弱，甚至还会故意放大自己的缺点来迷惑对手。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假设：假如楚庄王在与若敖氏争权的过程中死于非命，假如康熙帝抓捕鳌拜的行动失败了，那么他们

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恐怕比晋灵公好不到哪里去，那些“一鸣惊人”的美好传说也就不流传下来了。

而反过来讲，若是假以时日，晋灵公真的能够一局定乾坤除掉赵盾，谁又知道他会不会成为晋文公之后又一名有作为的君主呢？晋国未来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有可能因此而改写。

然而，历史毕竟不容假设，赵盾在晋国的专权程度要远甚于若敖氏，其心思缜密程度更是对方无可比拟的。比如在危难时刻挽救赵盾的灵辄，在现代学者韩席筹看来不过是赵盾安插在公宫的心腹，可见赵盾对晋灵公控制之严密。这就使得晋灵公无论在朝堂内外都没有多少胜算，也注定将会成为这个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叙事中一个可笑的失败者。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晋灵公的失败已经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了，更是整个晋国公室走向悲剧命运的起点。此后百余年间晋国公室的凋零，乃至最后为三家所瓜分的结局，在这一刻也就注定了。

第二节 世卿世禄

成公归国

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年）十月初三日，桃园弑君案爆发仅七天后，晋文公与王姬所生的儿子黑臀便从寓居多年的成周回到了晋国，并被确立为晋国的新任国君——晋成公。

按照我们此前的推断，王姬嫁到晋国的时间应该是在晋文公勤王之后，晋成公出生的时间应不会早于晋文公二年。因此，到他回国即位的时候，年龄大约有二十七八岁，是晋文公之后最为年长的国君了。然而，与年幼继位的晋襄公和晋灵公相比，晋成公尽管年富力强，可地位却显然更为尴尬。

按照晋国的政治传统，所有未被确立为太子的公子都会被送到国外，年幼时的晋成公也不例外。自打他的兄长欢被确立为太子，年少不经世事的黑臀就被远送到了外婆家，从此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寓居生涯。本以为晋国的血雨腥风抑或风花雪月从此就与他再也没有半点关系了。他只想在天子的都城做一个逍遥的寓公，在安乐富足的生活中消磨一生的光阴。

谁能料到，兄长在位不到七年就英年早逝，另外的两个兄弟在卿族的斗争中也死于非命，而侄子更是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就死于权臣之手。公室子弟凋零殆尽，自己这样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看客，竟然因缘际会变成了香饽饽，被人从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推上了熙来攘往的历史前台。

晋成公回国后的程序，与父亲三十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先是在郊外接受大夫的朝拜，然后在曲沃的武宫朝祭先祖后宣布即位，随后再赶回绛都，开始正式处理政务。

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他再次踏上晋国的土地，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时，一切都已物是人非。遥想起三十年前父亲回国时，身后还有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臣属追随，他们饱含着对故乡的眷恋和辛酸的泪水，热切地去拥抱朝思暮想的故土。面对艰难的处境和混乱的局势，君臣之间齐心协力、百折不挠，终于将局面掌控在自己手中。他们奋力调和了国内各阶层、各族群之间的矛盾，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如同一盘散沙般的民众拧成了一股绳，共同缔造了晋国最为光辉灿烂的时刻——其中就包括那位声名远播的贤臣赵衰。

然而三十年后，晋成公则是孤身一人，像囚徒一般在弑君者赵穿的引领下，心情沉重地来到了一个近乎完全陌生的地方，走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牢笼，去领导一群盛气凌人的臣属。

他在国内毫无人望，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从旁协助；他在诸侯间没有朋友，仅凭着所谓霸主的虚名很难让人为自己两肋插刀。而他所要面对的，却是以杀伐决断和残酷冷血而著称的铁腕野心家赵盾，一个手上沾满了国君和公子的鲜血、沾满了大夫和贵族的鲜血、沾满了秦晋两国将士鲜血的屠夫，一个踩着累累白骨走上权力高峰的中军元帅——而这个人恰好就是赵衰的长子，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对于国内大夫来说，他们的内心也同样五味杂陈。当迎接晋成公的车驾从成周返回，华贵的车盖从地平线上逐渐隐现的时候，所有人的内心都充满了忐忑。看到晋成公落寞的身影，人们自然也会想起晋文公刚刚回国时的孤独身影，同时不自觉地联想到他日后所创造出的辉煌成就。

这种强烈的反差在不同的人看来会有不同的感受。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君，有人会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变革而感到欢喜，自然也会有人对此而感到

忧愁。而在对未来感到忧虑和彷徨的人群中，赵盾或许就是最为特殊的那一个。

当晋成公在武宫举行朝祭时，不知他可曾想到过当年聚邑城中互相吹捧的桓庄之族；当晋成公摆驾进入公宫时，不知他有无念及抚摩着汾阳、负蔡的田册等待死亡的里克和不郑；当晋成公高坐朝堂接受重臣朝拜时，不知他是否忆起了熊熊火光之中面目狰狞的卻芮和吕甥。

算起来，到晋成公回国时，赵盾执政已经有十五个年头。当初三十余岁、意气风发的他，如今已年近五十，也算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人生近黄昏，总会不自觉地顾影自怜。此时的赵盾尽管大权在握，心中却很难说有多少喜悦，尤其是在经历了刚刚过去的那场宫廷夜宴之后。战场之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名利场上也没有谁能够一直开挂。见惯了血海厮杀，赵盾深切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权倾朝野、呼风唤雨固然可以带来一时快意，可谁也无法保证手中权势能长盛不衰，家族基业能万古长青。君主生杀予夺的权力，随时都可以将自己到手的一切都打回原形。

作为周礼世界的第一大“魔王”，赵盾显然不会满足一时的煊赫，他必须要趁自己尚能左右政局的时候，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在为自己的既得利益保驾护航的同时，也为子孙后代构建一座坚实的堡垒，以抵御随时可能复兴的君权。这座堡垒就是饱受诟病的世卿世禄制。

晋之乱制

站在晋国公室的立场，如果说晋文公是苦心孤诣加强君主集权、维护公室权益的“面壁者”的话，那么赵盾就是深悉其内心弱点，善于见招拆招，捍卫私家权利的一个不折不扣的“破壁者”。

早在确立其领导地位的董之蒐上，赵盾就宣布了一系列的为政举措，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赵宣子之法”。“赵宣子之法”的具体内容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左传》对其为政举措也只有简略的记载，其中提到：

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沔，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这段话的字数不多，但信息量却很丰富。所谓“制事典、正法罪”，就是要制定办事章程，修订刑法律令。晋国从小国寡民的状态发展到大国的过程，可以类比为一个公司由小变大的过程。小公司办事靠人情，大公司办事靠章程，但由于没有什么成熟的管理学理论可以参考，晋国虽然发展壮大，却没有建立可靠的办事章程，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甚至会引发矛盾、酿成冲突。

晋文公在位期间，曾对这种混乱的现象进行过一定的规范，但他的做法只是搭建起了一个框架，制定了一个总体上的原则，没来得及细化规程，因此还存在很多漏洞。这就好比是一个公司建立了组织结构，也任命了一大堆管理人员，但岗位职责没有细化，行政财务制度没有健全，手续流程没有明确，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依旧没有章法可循。

赵盾的做法就是在晋文公新政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细化，晋文公要“赋职任功”“官方定物”，赵盾就规定各级卿大夫管理的权限、明确办事的流程；晋文公有“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的政策举措，赵盾便以“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来进一步强化等级秩序，重设废弃的官职，提拔被埋没的人才。这就等于是把晋文公新政中的漏洞都打上补丁，行政系统的运行规则被进一步捋顺了。

在此基础上，赵盾依据新制定的法令开展“辟狱刑、董逋逃”的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对过去拖而不决的积案、悬而未决的疑案进行一次大清理，对违反了法令却未受到制裁的逃犯进行追捕，以起到稳定社会、安定民心的作用。

另外，他还提出了“由质要、治旧沔”的措施。所谓“由质要”就是改变过去熟人社会的一些习惯做法，规定在公私事务中，但有公开的财物往来都要订立契约、建立往来账目，这样一旦有了纠纷也有据可查。所谓“治旧沔”，按照孔颖达的注疏：“法有不便于民，事不利于国，是为政之沔秽也，理治改正使洁清也。”也就是要清除一些不符合国情民情的弊政，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宽民利民。

如果单从以上的这些分析来看，夷（董）之蒐和被庐之蒐也算是一脉相承的。赵盾虽然为人蛮横霸道，可总归还是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应该受到表彰。而且从《左传》当时的语境来看，赵盾默许赵穿做出弑君的举动，孔子都能称赞他“古之良大夫也”，如今他制定如此良法，孔夫子还会提出批评吗？答案却与想象中不同。

赵盾去世大约一百年后，正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彼时赵盾的后人赵鞅与中行氏宗主荀寅一道在汝滨修筑城池时，向当地百姓征收铁赋，铸造了一尊铁鼎，然后将法律条文铸刻其上，这便是晋国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刑书》。孔子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这部法令的强烈愤慨，说夷之蒐的成果是“晋国之乱制也”。

孔子反对这部法令，其首要的原因在于，夷之蒐上晋国三次更换中军将，引发了后来长达三年的混乱，这与赵宣子所颁布的法令有着莫大的关

系。因此，所谓的“赵宣子之法”根本就是祸乱之源，是不足以用来指导政治生活的。

其次，晋国自唐叔虞立国以来，一直遵守宗法制的原则，让卿大夫按照贵贱等级的差别各守本分，百姓也能敬重这些上位者，于是就有了法度。后来到春秋时期秩序混乱了，贵贱等级的原则没人遵守了，晋文公就作被庐之法、设立了执秩之官来监督大家各归本位，国内秩序恢复如初，这才当上了诸侯盟主。而“赵宣子之法”则完全抛弃了礼法原则而使用刑法，这在当时是逆天悖时的乱政，是不足以效仿的。

换句话说，晋文公之所以能够称霸，靠的是“以礼治国”，而“赵宣子之法”则恰恰相反，靠的是“以法治国”。赵盾行政的重点更多的是关于刑法内容的制定，在经济上也更倾向于对卿大夫私有产权的保护，这些条款对国君权力的稳固是不利的，更与晋文公以强化国君的集权能力为主旨的“执秩之法”背道而驰。由大夫主导立法权，且改革的内容又与宗法制原则相背离，其结果就是彻底打破了宗法制的堡垒和国君在制度上的护身符，从而造成公室权力的加速下滑，这种种作为足以将赵盾推上“礼崩乐坏”第一功臣的宝座。

话虽如此，要说赵盾完全不把宗法制当回事，倒也不尽然。正所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礼法的原则巨细靡遗，我只选择对我有利的。赵盾在以法制打破国君护身符的同时，回过头来却用宗法制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金甲圣衣，这副铠甲便是从晋成公时期开始实行的“假公族制度”。

重建公族

统观晋文公所设立的“执秩之法”，实际上是一套“尊亲爱旧”和“尊贤尚功”并行的“双轨制”系统。一方面，他遵循守旧原则，任命胥、籍、

狐、箕、栾、郤、栢、先、羊舌、董、韩十一个正牌公族执掌近官，其余“诸姬之良”和“异姓之能”则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则是创设三军六卿体制，为所有贵族提供一个可以公平竞争的职官系统。

这套制度设计在当时的情境下，完美地解决了新旧制度不相兼容的问题，为争霸事业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对于试图巩固私家利益的赵盾看来，“执秩之法”无异于是为异姓大夫套上了一个沉重的枷锁，使得他们在与公族的竞争中总要付出更多的艰辛。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异姓大夫在晋国建功立业、大放异彩，但无论他们在军中的身份有多尊贵，在这个以宗法制度为准绳的国家里也终究是外人，他们只能在疆场上卖命，却不能参与国君的核心决策。比如晋文公所设立的“近官”序列中，有一些负责宫廷事务、协理宗族关系的职务，通常都只能由公族大夫来担任，异姓大夫无论如何都不能插手。

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宫廷夜宴上便有所体现。尽管晋灵公在外朝的职权有限，但负责公宫守卫的都是他的私属，这就给了他足够的底气来发动一场针对当朝执政的政变。每每想到这些，赵盾便心有余悸。只要君权还能够与卿权分庭抗礼，还有凌驾于卿权之上的可能，只要国君对卿的任免以及权力行使甚至生杀予夺还能够发号施令，那么作为国君身边人的“近官”系统自然不可小觑。

此外，在鬼神信仰大行其道的春秋时期，宗教权力天然要高于世俗权力。那些如卜、祝、筮、史等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实际权威的官职，由于掌管着沟通天地鬼神的职能，其宗教地位天然要比军中元帅高一截。正因如此，尽管赵盾掌握了军政大权，在世俗政治中能够做到呼风唤雨、予取予

求，却在与一名史官的斗法中败下阵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将“赵盾弑其君”五个字刻在竹简上，任由其将自己的恶行宣告诸侯而不敢发作。

为了破除“近官”系统对异姓大夫的种种限制，赵盾在晋成公归国后不久就鼓动国君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

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

这项法令恢复了自晋献公以来被废弃的“公族大夫”职务，但与以往的任人规则不同，新设立的“公族大夫”不再以血缘的亲疏远近作为选人标准，而是以地位的高低贵贱作为准绳。

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与国君有血亲的广义“公族”，还是自外而来的“异姓大夫”，只要能够坐到“卿”的位置上，那么他们的“適子”（也就是被确立为继承人的儿子，通常为嫡长子）就有可能被授予田土，并获得“公族大夫”的职衔；他们的“余子”（也即适子之同母兄弟）都能被授予“公族余子”的称号，又称“公路”；其庶子则可列为“公行”。如此一来，就构成了一支由远支亲族和异姓贵族构成的所谓“假公族”群体。

与晋文公的制度设计恰好相反，“假公族制度”的确立，除了能够缓解紧张的君卿关系之外，于巩固君权而言显然毫无益处，但对异姓卿族来说却是极大的利好。

一方面，该制度打破了异姓卿与传统公族之间的身份界限，使得他们能够毫无阻碍地进入“近官”系统，享受“公族大夫”带来的权益。与此同时，他们没有血亲带来的羁绊，又不必为君主的权益摇旗呐喊。

另一方面，赵盾所构建的假公族并非对所有人都开放，只有具备了一定权威的人，只有权势显赫的勋贵子弟，也即“卿之適子”才有可能跻身公族大夫之列。这就为公族大夫设立了相当高的门槛，使得一些原来具有近官身份的正牌公族，因为缺乏军政权力而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特权；而在三军六卿体制中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则既可以享受军政大权带来的红利，亦可以凭借公族大夫的身份进一步巩固既得利益。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导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世卿世禄制的确立。

卿位世袭

周礼虽然秉持“亲亲上恩”抑或“爱亲尊贵”的原则，明确在选拔官员、任命卿相时，要以与国君血缘关系的远近和地位尊贵与否作为首要判断标准，但对“世卿制”却一直都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比如在《公羊传·隐公三年》中曾提到：“世卿，非礼也。”世代承袭卿大夫的职务并不符合周礼精神。齐桓公举行葵丘会盟之时，与到场诸侯举行盟誓，也曾明确提出“士无世官、官事无摄”的准则，可见当时的人们早就发现了“世官”制度的危害，对“世卿”的出现更是充满了警惕。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大都遵循这个原则，在任命卿职时，主要是从与国君关系最为亲近的公子当中选择。只是由于公子的身份太过于招摇，经常会因其血缘对国君的地位构成威胁，这才渐渐被各国君主疏远。但即便如此，为了防范卿大夫权力过盛，防范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肆意主导国君的废立，各国君主依然有意地回避卿大夫地位的世代传递。

比如在晋献公、晋惠公时期，晋国的卿位就从不固定，在短短四十年间，先后有士蔿、申生、里克、荀息、罕夷、韩简、吕甥等多人出任卿职。晋文公设立“三军六卿”体制时，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将卿位的世代传递作为

必要选项，其所依托的主要选拔方式，是通过蒐礼上贵族大会协商来确定六正人选，而国君的意见显然会占更大的比重。

但晋文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制度设计只有在国君威望较高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一旦国君幼弱无法发挥影响力，这个漏洞反而会成为卿大夫挟制君权的利器。而不幸的是，晋文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会在正值壮年时突然离世，更想不到在他去世后的二十年间，晋国竟然会连续出现两名幼年继位的国君，这就给卿大夫利用漏洞扩充权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作为晋文公这一系列制度设计最成功的“破壁者”，赵盾既然发现了这个漏洞，就决不允许被其他人利用，转而侵蚀自己的利益。因此，当晋襄公试图利用君主的优势来重新调整六卿人选时，他便不遗余力地鼓动先克、阳处父等人破坏襄公的人事布局。而当他全面掌管了军政大权，更是逐步关闭了六正人选自由竞争的大门，转而在自己的利益联盟之内进行选拔。

最早在五大夫之乱发生后，赵盾就先后将党于赵氏的卻缺、舆骈、栾盾、胥甲编入卿列，其中的栾盾和胥甲都是上一任卿士的子嗣。到晋灵公十三年（前608年），由于与胥甲有隙，赵盾将其流放到卫国，但仍旧立了他的儿子胥克为卿，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卿位的世代传递的惯例。

晋成公即位初年，伴随着“假公族制度”的确立，卿位世代传递便也有了法理上的依据，世卿世禄制的推行也就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于是我们便看到，在晋成公主政的七年间，赵盾和他的继任者卻缺先后将先克之子先穀、赵盾之子赵朔、栾盾之子栾书拉入卿列。只不过由于六卿位置实在有限，他们权衡再三后不得不以蛊疾为由把胥克从内阁中踢了出去。而卻缺死后，荀林父虽与其立场不同，但对世卿世禄制的创举却深表赞同，因此也将卻缺之

子郤克（郤献子）拉了进来。由此也就形成了邲之战时的新一届六卿，其序列分别是：

荀林父、先穀，士会、郤克，赵朔、栾书。

在这一届六卿中，除了荀林父和士会是首代创业者之外，其余四人都是依靠父勋进入内阁的“卿二代”。这也就意味着，子袭父勋进入卿列已成为常态，原本贵族会议君臣共举六卿的制度，正式被世卿世禄制取代了。

经过这样一轮变革，原本自由竞争的三军六卿体制完全变成了铁板一块，六卿变成了一个纯粹独立于君权之外、自主运作的政治实体。即便是君主野心再大，也无法干涉这个既已形成的规则，这就在无形中给国君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如果说设立假公族制度还是在以迎合周礼原则来假意向周公致敬的话，那么以卿位世袭为核心、以军功受赏为羽翼的世卿世禄制，则无异于是在公然向周公宣战。赵盾将这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循环：地位越高就越容易获得封赏，拥有的土地越多就更能够巩固其卿的地位，卿的地位越稳固其子弟与国君在法理上的关系也就越亲近，进而也就更有利于提高其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

这种以巩固卿权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为军政体制固化开了一道后门。晋文公所创设的人才自由流动体系仅仅存续了不到三十年，就再次回到了阶层固化的藩篱，晋文公为保障君权的所有努力也终在赵盾的猛烈攻击下彻底破产。

从此以后，卿大夫的权力和财富便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不仅会让国君的权力愈发逼仄，更会对普通大夫的权益构成侵蚀。当卿位固化成为现

实，普通大夫因失去晋升渠道而进阶无望，便只能依附于世卿大族寻求保护；那些已经分宗立祀脱离大宗的卿族余子、庶子也不得不矮化其自主地位，寻找大宗抱团取暖。由此，便在国家之下形成了以世卿为核心的几个利益集团。相互独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国君与世卿集团之间的纵横捭阖，便成为此后一百多年间晋国内政的主要议题。

在日趋激烈的内斗中，公室的权益日损，卿族的权益日盛，使得国君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加难以有所作为，只能任由列卿在倾轧兼并中此消彼长，而这也为后来的六卿专政乃至晋国最终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在完成这一系列布局后不久，年仅五十上下的赵盾就溘然辞世了。晋成公四年（前603年）春，与卫国大夫公孙免合兵入侵陈国，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史料中。最晚到晋成公六年（前601年）秋季，原本担任上军将的卻缺便已经开始执政了。从夷之蒐举行的晋襄公七年（前621年）开始算起，赵盾把持晋国政局的时间长达二十年，而这二十年也正是晋国政治制度异化的关键时期。

但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正如晋文公无法预料自己的身后事一样，赵盾虽然打开了侵蚀君主权力的潘多拉魔盒，却未必能让自己的后人安然坐享其成。在他去世二十年后，由其施政造成的弊端便结出了苦果，下宫之役那一场悲壮的血案，差点将勃兴的赵氏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期间，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第三节 景公治政

晋成公七年（前600年）九月，晋成公在扈地会盟诸侯时去世，其子据（又名獯）即位为晋景公。晋景公即位时只有二十岁上下，正是年轻气盛、充满理想抱负的年纪，然而当他真正想要有所作为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一个束手束脚的局面。

在他即位之前，主掌政权长达二十年的赵盾刚刚完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的颠覆性变革。他首先创立了假公族制度，以设立公族、公路、公行的方式，将卿大夫的势力侵入到了国君的私域；与此同时，他又一手复活了为礼法所不容的世卿制，彻底阻断了国君在六卿人事任免上的通道。面对如此困局，哪怕是晋文公再世，恐怕也会感到束手无策。

让晋景公感到忧心的还不止这些。

按照赵盾最初的设想，他创设的这一系列制度，除了能防止国君对六卿人事的干预，还能封堵普通大夫升迁的渠道，算是给自己的既得利益上了一道双保险。以后哪怕是子孙愚钝不肖，至少可以凭借世卿的地位保住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业。

然而从世卿世禄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赵盾的盘算显然打得太乐观了。这种制度设计看似是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抬高了普通大夫进入卿列的门槛，可只要国君还有扩张君主集权的冲动，只要人们打破藩篱追求上进的野心未曾泯灭，就总会有人想方设法挤进这个小圈子里。一旦他们的野心无法得到满足，由此而造成的冲突变得不可调和的时候，更加激烈的政治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

世卿危机

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前597年）春季，楚庄王带领大军接连侵陈伐郑的消息传来。按照常例，晋国哪怕不能直接与楚军对抗，也应当出兵以袭扰楚国盟友的方式来转移楚军注意力才是。然而吊诡的是，陈国灭了又复，新郑解了又围，晋国却迟迟按兵不动。一直到当年六月，郑国已然城破并与楚人结下了盟约，晋国大军才在荀林父的带领下缓缓抵达黄河北岸，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就在楚国出兵伐郑的时候，刚刚执政不到四年的卻缺去世了。伴随着一代强人的相继落幕，晋国国内政局开始变得异常混乱，贵族们围绕三军六卿的职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这一轮权位争夺在六卿集团内部，主要表现为先穀和荀林父的争斗。我们知道，早在五大夫之乱爆发后，荀林父便已经顺位晋升为中军佐，在六卿中的排序仅次于赵盾。但由于受到赵盾的压制，在此后的二十年间，荀林父的主张一直得不到施展。后来好不容易熬到赵盾去世，谁知又被担任上军将的卻缺越级，足见其在赵氏执政联盟中的尴尬地位。

先穀的身份不太明确，据推测应该是赵盾同党先克的儿子，因封邑在原、隰，又被称作原穀、隰子。夷之蒐时，赵盾之所以能够得居高位，与先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此驱逐狐射姑之后，赵盾便将先克推到了中军佐的位置，与其一同执掌政权。而在同一时期，先氏家族还有先都、先蔑也都跻身于六卿行列。一个家族三人为卿，在六卿之中占据一半的席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过正如若敖氏在楚国的境遇一样，先氏家族权势逐渐壮大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先克这一系与先都、先蔑所属的支系之间关系并不和谐，使得先氏家族在经历了短暂煊赫之后，很快就盛极而衰走上了没

落的道路。在后来不到三年间，先蔑因迎立公子雍在令狐之战后逃逸，先克被叛乱的五大夫所杀，而先都则是因为参与叛乱死于赵盾之手。先氏一门三卿迅速凋零，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寂寂无闻。

大约是为了感念先克的恩情，到赵盾执政后期抑或郤缺执政时期，先克的儿子先穀又被安插到了六卿的行列。到郤缺去世之前，其职位应该是上军将，在赵氏执政联盟内部，是仅次于郤缺的二号人物。如今郤缺已然去世，若按照循序递进的原则，本该由担任中军佐的荀林父进位为中军将。然而排在其后的先穀大约是想效仿郤缺的故事，试图再次越级接任中军将的职位，由此便与荀林父爆发了激烈冲突。

三军六卿之外，对当前地位感到不满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出自魏氏家族的魏锜，一直想要求取一个“公族大夫”的头衔，但由于进入“公族大夫”行列需要相当高的门槛，以魏锜的身份又无法达到，于是就对“假公族制度”抱有强烈的不满。而出自赵氏的赵同、赵括，以及赵穿之子赵旃，他们的奢望则是希望能进入卿的行列。但如今六大家族共同执掌国政，赵氏家族每增加一个卿位，就意味着有人会像胥克一样被踢出局。但在当下这个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恐怕没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成就他人，这就使得他们的诉求很难得到满足。

在这场人事布局当中，晋国的诸卿大夫究竟爆发了哪些冲突已经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先穀并未如愿越过荀林父成为中军将。而为了安抚那些野心勃勃的世家子弟，晋景公在保留原有三军六卿体制之外，又在六卿之下设立了六大夫：由赵括、赵婴齐担任中军大夫，巩（士）朔、韩穿担任上军大夫，荀首、赵同担任下军大夫。

也正是因为内部矛盾无法调和，当郑人与楚军在新郑鏖战的时候，晋国却迟迟不肯发兵；后来大军好不容易出动，又因为将帅不和，难以协调步调；而在两军已经对垒的情况下，三军六卿六大夫之间又龃龉不断，终于导致了邲之战的全面溃败。

这也就意味着，在邲之战中打败晋军的并不是楚军，而是晋国内部的权力争斗，而这一切的根源又在于那些不得志者对现有体制的不满。如若制度的建设不能顺应社会的需求，国家的施政纲领不能化解内在的冲突，那么晋国公室的复兴和中原霸业的重振就只能是镜花水月。面对这种进退维谷的复杂局面，晋景公又该用什么手段来破局呢？

赏善罚恶

邲之战的惨败，使得晋国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降到了冰点，原本依附于晋国的诸侯纷纷表现出了疏离的态度。及至晋景公六年（前594年），唯一的铁杆盟友宋国也在楚军长达九个月的围攻下屈服，更是严重挫伤了晋人的信心。

如果从霸业成败的角度看问题，邲之战的失败对晋景公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正所谓“祸兮福所倚”，倘若从恢复君主权威、加强君主集权的视角来看，战争的失败反而带来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窗口。

所谓“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在韩非子看来，君主想要建立自身的权威，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无非是“赏罚”二字。赵盾之所以能够权倾朝野，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赏罚大权，如今晋景公想要重塑国君权威，也必须要在这两个字上下功夫。

起初，作为统领三军的中军元帅，荀林父自认为责无旁贷，主动承担起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请求国君将自己明正典刑。晋景公虽不情愿，但为了严明法纪，本想同意他的请求，但有一个名叫士渥浊（士贞子）的大夫却站出来劝阻道：“当年城濮之战时我军大获全胜，可文公依旧面带忧色。众人不解，文公于是就解释说，‘成得臣（令尹子玉）仍在，我们的忧患就没有真正消除；困兽犹斗，何况是一国的执政呢？我担心他会再兴兵戈来报复我们’。直到成得臣自杀后，文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说‘楚国人不会来找我们麻烦了’。成得臣之死，对于晋国来说是又一次胜利，于楚国而言却是一次更加严重的失败，因此两代人都不能与我争锋。如今晋国战败，是上天要警戒我晋国，倘若真的将荀林父处死，那不是与楚国之前的作为一样了吗？若果真如此，我担心晋国也将会长期无法振兴了。荀林父为人忠厚，进思尽忠以报国家，退思补过以谢君恩，是宗庙社稷的保卫者。一两次的战败不过是如日食月食一般，并不能真正损害日月的光辉，怎能因此就轻易就杀掉一名股肱之臣呢？”

士渥浊是祁姓士氏大宗士穆子的嫡子，也是士会的侄儿，而在士会背后站着的又是整个六卿。之前在有关邲之战的章节中我们曾提到过，当先穀违背命令擅自渡河的时候，荀林父之所以要带领全军接应先穀，是因为他听取了韩厥的建议，让六卿共同承担战败的责任。而当全军出现溃退的时候，士会本可以靠着敖山设置的七道伏兵建立功勋的，但他也以与众卿分担罪责为由选择了撤退。这也就意味着，荀林父的个人得失早就与三军将佐的荣誉绑定在了一起，倘若荀林父因此而受刑，那其余将佐也必然要受到一定的处罚。

因此我们说，士渥浊在这里表达的，与其说是他自己的意见，倒不如说是六卿的集体意志，是为了帮助晋景公打消顾虑，好让他可以顺水推舟免除荀林父的死罪。但这对先穀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当他发现自己的盟友

集体为荀林父求情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似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他。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先穀依然做他的中军佐，甚至晋景公还特别派他主持了清丘会盟。但到了第二年（前596年）的秋天，先穀却不知为何竟召来了一支“赤狄”的军队，一直打到了晋国的清地。

至于先穀是怎么“召赤狄”入侵的，《左传》上没有半句多言，杜预作注时解释说，有可能是因为先穀在国内不得志，所以召“赤狄”入侵准备搞叛乱。而在《史记》中，太史公似乎是望文生义，认为是先穀害怕遭到清算，就自己投奔了“戎狄”，并与之合谋反侵晋国。但也有人不同意以上的说法，认为“召”的形式有很多种，也许先穀是故意挑起晋国与“赤狄”之间的纷争，迫使“赤狄”入侵呢？

但无论其真相如何，先穀终究为他的任性付出了代价，也算是向那些在战争中枉死和落下终身残疾的人给出了一个交代，只是这个代价似乎太过于沉重了。

当年冬天，在历数了其在邲之战中的行径和“召狄”伐清的罪状后，六卿中的二号人物先穀被公开处决，其家族也被尽数屠灭。这个曾经出现过先軫、先且居这样的英雄人物，创造过一门三卿辉煌历史，缔造了四代为卿皆至中军神话的煊赫家族，在一夜之间骤然陨灭，成了晋国卿族内斗史上第一个被灭门的强卿之族。

在此之前，大多数卿族内斗往往还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政治斗争的矛头通常都只针对政敌本人，极少牵连其亲族。然而先氏的灭族仿佛打开了一个考验人性的潘多拉魔盒，原本贵族之间的风度和礼仪在此后的政治斗争渐

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不加节制的流血冲突和毫无底线的灭门惨案。卿族倾轧愈演愈烈，斗争的外延也无限扩大，如何在这种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谋求自保，将成为各大家族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晋国的历史也从此进入了一条充满了血泪的不归路，而这恐怕也是世卿世禄制带来的必然结果吧。

士会修法

在完成了有关邲之战的追责工作之后，晋景公旋即又开始对国内的秩序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一方面，他以在邲之战中有所建功为由，将荀林父的弟弟荀首从下军大夫的位置直接拔擢进入六卿。另一方面，则是听从了伯宗的建议讨伐“赤狄”，随后以奖励灭潞功臣为由，将“狄国”的一千户臣民赏赐给荀林父，以奖励保荐之功为由，赏赐士渥浊以瓜衍之县（今山西汾阳孝义一带）。

晋景公的这一系列举动，极大地打击了赵盾所建立起来的执政联盟的声势，进一步壮大了以荀氏、范氏为首的反对力量在六卿中的地位。但毕竟权力的制衡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想要彻底稳固君主的集权，归根结底还必须有配套的制度设计。

然而在晋景公所处的时代，在人们有限的政治实践中，似乎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思想武器能够如周礼一般，既拥有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又能够凝聚最大共识。于是乎那个一再被抛弃的古代理想制度，总会时不时地被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思想家和政客们从布满蛛丝的“故纸堆”中搬出来，掸去表面的浮尘，重新包装后继续用来指导人们的政治生活。

晋景公七年（前593年）春，在平灭“赤狄”诸部后，晋景公即刻派人风尘仆仆地赶往成周，在将晋国“攘夷”的功绩传达给天子的同时，请求天子同意任命士会为晋国的正卿兼太傅。

按照几个世纪以前定下来的规矩，诸侯的卿都需要得到天子任命才算是合法的。可大家也都知道，自打“礼崩乐坏”之后，这套手续已经很久没有人认真履行了，如今晋人冷不丁地来这么一出，还真让人“受宠若惊”。面对大国的“合礼”请求，周定王自然是不敢也没有理由拒绝的。于是到这年三月二十七日，晋景公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以天子之命正式授予士会晋国的中军将兼太傅的职权。

如果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晋景公的做法或许有些多余，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意义。据说就因为走了这么一道程序，晋国境内的治安秩序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以前为害四方的盗贼都不敢在晋国的土地上撒野了，所有的坏人一夜之间也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都去哪儿了呢？去秦国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效呢？《左传》引用晋国大夫羊舌职的话说：“吾闻之，禹称善人，不善人远，此之谓也夫。”从前大禹喜欢重用善人，那些坏人就因此感到害怕，从此滚得远远的；老百姓也都开始做善事，不敢再存有侥幸心理了。

与此同时，这一年王室还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起因是王孙苏因与召戴公、毛伯卫争权，派王子捷把对手全给杀了。召、毛之党不甘心失败，于是就故意在成周纵火，并趁乱把王孙苏赶出了王城。在晋国急欲与王室搞好关系的当口上，这件事情究竟谁是谁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讨得天子的欢心。刚刚受命为正卿的士会不辞辛劳，亲自赶赴王室调解纷争，很快就将这场乱局给扑灭了。

为了酬谢晋国定鼎江山的功劳，周定王特意让原襄公主持享礼，宴请士会。席间士会瞧见有人把带着骨头的肉放在专门的器皿中摆到了宴会大厅

里，这种做法颇有些古怪，于是就私下里找人询问其中的缘由。这个举动成功地吸引了天子的注意，周定王把他叫到身旁，亲自讲解说：“季氏，这你就不懂了吧！天子设享礼招待公侯的时候有‘体荐’（也称房烝），就是要将牲口切成两半，将其一半盛于俎中放置在典礼上。这些‘体荐’只能作为典礼之用，不能食用的。在设宴礼招待卿大夫的时候有‘折俎’（也称殽烝），则是把牲口肢解掉，也放置在俎中陈列于典礼上。这些可都是王室的礼节啊！”

《左传》将这件事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就过去了，这让编纂《国语》的作者感到不太满意，于是又添油加醋地扩展了许多内容，不过总体上还是让天子像导游一样，带着士会来了一场“奇幻之旅”。

作为士蔿的裔孙，以掌管法律事务立家的士师家族的后人，士会对于本该烂熟于心的周官礼仪竟然如此陌生，也难怪乎人们会说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世道了。好在士会虽贵为正卿，却也是位不耻下问的君子，他就像是一个刚刚进入大城市的农村娃一样，对王室的礼仪感到十分好奇，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锤炼新本领。士会勤奋好学的劲头让天子过足了“教师爷”的瘾，一高兴起来就收不住手，对其倾囊相授，把士会想要了解的或者他自己想要显摆的事情都和盘托出，可是让士会大饱耳福了。

这是一次美好的宴会，事后回想起来，不仅天子会感到骄傲，王室的大夫也都会产生一种由衷的喜悦感。不过，若是我们仅仅是将士会的做法理解为奉承天子的话，那也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实际上，士会此行的真正意图是去向天子“取经”的，接下来，他要完成一件国君交代给的大事，也就是“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可惜的是，但凡是涉及体制改革的内容，《左传》上都语焉不详，我们很难从中确知士会究竟是怎么修订法度的。不过，参考《国语》的记录可知，士会的这套法律体系是以晋文公的执秩之法为蓝本，参考夏、商、周三代的典籍修订而成的。因士会的谥号为范武子，他的这套制度设计在后世又被称为“范武子之法”。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晋国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修法。其中晋文公的“执秩之法”主要意图是要加强君权，而“赵宣子之法”则反其道行之，是为卿权扩张进行铺路的。“范武子之法”是晋国历史上第三次法律修订，在修法时抛弃时间较近“赵宣子之法”，转而采用四十年前的“执秩之法”，显然体现的是晋景公的意志，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

韬晦哲学

作为卿大夫的代表，士会说起来也算是“赵宣子之法”的受益者，他之所以能够保有如今的地位，也是得益于赵盾所确立的“假公族制度”以及“世卿世禄制”。可他为什么要站在国君的立场上，特意制定有益于君权的法令来实现“自我革命”呢？这恐怕和他过去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

士会年轻的时候正是晋国上下壮怀激烈，铸就霸业辉煌的黄金时代，他见证了晋国由一个边陲国家一举跃升为中原霸主的不易，也体会到了晋文公变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夷之蒐变成了永远的未来，此后那场绵延日久的流血冲突，尤其是卷入狐赵的斗争而被迫流亡的经历，更是让他见识了政治斗争的血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回国之后，尽管他得到了赵盾的赏识并重新拥有了高官厚禄，可内心中对于流血斗争的恐惧却一直都挥之不去。

更让他无法接受的还有先穀的死。与之前的历次斗争不同的是，先穀骄狂所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更牵连到整个家族，是以整个先氏家族数百年的血脉为他一个人的过失赎罪。这样的惩罚未免太过残酷了，对士会造成的视觉冲击和心理触动之大更加无法想象。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见证了他们一步步地攀上高峰的艰苦历程，羡慕过他们炙手可热的权势富贵，更目睹了他们瞬间从高处跌落的惨烈。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都会产生一种看破红尘的感悟，只是这种感悟先穀是无福消受了，只能让旁观者去慢慢体会。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们总是会嫉妒腰缠万贯的富贵人家，钦佩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仰慕德行美好的谦谦君子，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都如浮云一般永远都充满了变数。任你拥有再多的荣华富贵，创造了再伟大的功绩，收获过再美好的赞誉，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都是不稳固的，都无法保证家族的祭祀能够得到永续。尤其是在近年来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没有人可以超然世外、独善其身，一旦流血冲突的战火复燃，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至于如何才能永续安定，已近暮年的士会自有他的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许在他看来，所谓的名利都是虚无缥缈的存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算是留给子孙，他们也未必能守得住。只有当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诱惑时，能够压制自身的欲望，不去为了转瞬即逝的利益而争斗，这个世界才能够承平有序。

他倡导回归本源，向往周公设计的理想世界、大同社会；相对于积极进取去获得更多的财富，他更信奉一种类似于道家哲学的处世之道。在此基础

上，清静无为的政治态度，抱朴守拙的人生智慧，谨慎周全的行事作风，不居功自傲的为人品格，也就成了铭刻在士会身上的独特烙印。

人在年老的时候总会有些怀旧，如今的严峻形势难免会让士会更加怀念年少时光，顺带着爱屋及乌，对晋文公的执秩之法怀有不一般的憧憬，这恐怕也是他不遗余力地推行“范武子之法”的原因所在。

然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伴随着郤克从齐国朝堂上带回来的怒火，晋景公谋求以温和手段化解国内矛盾的机会窗口也瞬间关闭了。晋景公八年（前592年）秋季，刚刚完成了“范武子之法”修订工作的士会，因担心郤克怒火无处发泄而肇乱于内，主动宣布退居二线，刚刚开始还不到两年的体制改革进程倏然中断。而伴随着鞌之战的胜利，国人一扫邲之战失败的阴霾，民众信心指数急剧蹿升，积郁多年的情绪得到了释放，不少人的骄狂情绪也有所回头。

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士会的内心充满了忧虑，于是便时常教导儿子要懂得抱朴守拙。比如在他退休之前，他就曾语重心长地教导士燮：“人在大喜大怒的时候，行为就很少能够合于礼法，离经叛道的倒是很多。君子的喜怒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能遏制，就一定会兴起祸乱。我之所以选择致仕，是为了让郤克在齐国发泄他的怒火。否则我担心他会在国内掀起波澜，从而危及范氏的存亡。”同时他一再叮嘱：“我退休之后，你和这些大夫们相处的时候，一定要恭敬从事，小心小心再小心。”

退休以后，士会对儿子的教导也从未有过松懈。《国语》中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士会经常会守在门口等待儿子下朝回家。有一次士燮（范文子）回来得迟了，他就忧心忡忡问道：“怎么回来这么晚啊，没出什么事吧？”

只见士燮眉宇间充满了喜悦，不无骄傲地回答说：“朝中来了一位秦国的客人，在朝堂之上讲了不少隐语，在场的大夫们都回答不上来，只有我答对了其中的三条！”

士燮本以为会得到父亲的夸奖，却不料他话音刚落，士会就怒不可遏地举起了手杖，一棍子抡过来打掉了他的发簪，边打边骂道：“不知轻重的小子，你懂什么呀！你以为就你聪明吗？大夫们不是不能回答，是故意谦让长辈父兄不肯作答罢了！我一天没教训你就敢卖弄学识，在朝堂上三次掩盖他人的才华，要不是我还在晋国，你小子可就危险了！”

经过持续的强化教育和长期的耳濡目染，士燮也逐渐养成了事事谨慎的习惯。鞏之战结束后，晋国大军得胜回朝，国中上下欢欣鼓舞，士会还像往常一样拄着拐杖在门口等着士燮归来。可他左等右等，一连等了好几天都没见到儿子的影子，直到中军和下军都已经刀枪入库，士燮所带领的上军才姗姗来迟。见到儿子后，士会同样以一种充满急切却又不乏温情的语气问道：“你不知道我一直在盼着你吗？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见到阔别已久的老父亲，士燮满含着泪水回答说：“出征有功，国人必然欢天喜地地迎接我们。如果我抢先回国，就一定会收获更多的关注，这就等于是在代替统帅接受荣誉。我不敢居功，所以来迟了。”

听了儿子的这番话，士会喜笑颜开：“你能这样谦让，我就放心了。只要能一直保持谦和的态度，我们范氏就能免于祸难了。”

大军出征凯旋取得丰硕成果，晋景公无论如何也总得有所表示，于是每当有将领回朝，他都会说一句鼓励的话：“这都是你的功劳啊！”士燮回朝复命的时候，他同样用这句话来勉励，但士燮却回答说：“我军之所以能够

取得胜利，都是因为郤克善于节制，荀庚的领导有方，我士燮又有什么功劳呢？”

事实上，在这样一个阴晴莫测的政治环境下，不仅仅是士会，整个晋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面对国君的勉励，暴脾气的郤克同样表现出了不凡的气度，他回答说：“这都得益于国君平日里的教导，诸位将帅的齐勇同奋，下臣哪里有什么功劳呢？”士燮的直接下属栾书也推辞说：“栾书不过是遵从士燮的指示，再加上士卒肯于用命，又怎敢居功呢？”

执政方阵

鞏之战后，三军将佐各自推功，成就了一段君臣和谐的佳话。然而，在这如童话叙事一般的表象背后，蕴藏的却是一股人人自危、但求自保的味道，足见国内的斗争形势已然十分严峻。

总括晋景公时期晋国政局上存在的尖锐矛盾，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

其一是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权力划分。君主一心想要集中权力，于是便想方设法限制私权，掌握“赏刑”的权柄和制定“范武子之法”就是晋景公采取的主要手段；而卿大夫为了扩张私权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其自运行的体系不断侵蚀君主的权力。一张一弛之间，君卿矛盾就被激化了。

其二则表现为世卿家族与普通大夫之间的冲突。世卿家族想要牢牢地守住既得利益，而普通大夫则一心想要冲入世卿构成的小圈子。双方一攻一守，关系也就日渐紧张。

其三，则是世卿家族内部的纷争。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晋景公时期爆发的两场重要战役中的六卿排序。首先是晋景公三年（前597年），邲之战爆发时的排序为：

荀林父、先穀，士会、郤克，赵朔、栾书。

而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鞏之战爆发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半个六卿序列，其中：

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

这场战争晋国六卿并未全部出动，剩余的席位一共有三个空缺，分别是中军佐、上军将、下军佐，这三个位置的人选事实上并不难确定。

在有关申公巫臣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到的讯息是，在楚庄王去世之前，荀林父的弟弟荀首就已出任中军佐。楚庄王去世于晋景公九年（前591年），距离鞏之战的爆发还有两年，因此荀首在鞏之战时担任中军佐是毫无疑问的。

而有关上军将的位置，《左传》中也提到，鞏之战大军班师之后，晋景公向士燮表示庆贺，士燮推辞说：“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其中的“克”指的是郤克，“庚”指的是荀林父的儿子荀庚（中行宣子）。从士燮的语气中可以看出，荀庚显然是他的上司，也就是上军将无疑。

这里唯一不好确定的是下军佐。按照邲之战时的排序，当时的栾书只是下军佐，而他的上司也即担任下军将的则是赵盾的儿子赵朔。而到鞏之战时，下军将以上已经没有了赵朔的位置。在以往的政治实践中，没有巨大污点而遭到降级在晋国是没有先例的，可见在此之前赵朔就已经去世了。那么下军佐的位置由谁来接替了呢？

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晋国以封赏鞏之战的功臣为由召开了一次盛大的表彰活动。在这次表彰活动中，晋国在原有三军的基础

上增添新中军、新上军、新下军，建立了空前绝后的六军十二卿体制，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骘、赵旃全都位列卿士。这里面并没有赵同的名字，但在此后的诸多历史事件中，赵同的名字却一直都排在赵括之前，可见其地位是高于赵括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赵朔去世之后，接替他担任下军佐的正是赵同。

如此一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明确鞏之战时的六卿排序，依次为：

郤克、荀首，荀庚、士燮，栾书、赵同。

从这个排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邲之战到鞏之战，栾书的位置只是从下军佐升迁为下军将，而士会的儿子士燮则是直接空降到了上军佐的位置。与此同时，士会致仕之后，荀庚的位置向前晋升了一次，跻身为上军将。这也就意味着，在其父荀林父致仕之后，荀庚接任的也是上军佐。同样，荀首的位置晋升过两次就直接升到了中军佐，可见其初始位置也是上军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再联系到邲之战时郤克在六卿中的排序，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历史进入了晋景公时代，晋国六卿在世卿世禄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演化出了一个小循环的模式。上一任的正卿去世或者退休之后，他的继承人会直接空降为上军佐，而不是从下军佐开始一步一步向上升迁。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实际上并不难理解。晋国的六卿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终身制的，升迁的过程也经常执行循序提拔的规则。除非是遇到了特殊的情况，抑或某个人的才能特别突出，否则这种规则便不会被轻易改变。

但人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在医学尚处于摸索阶段的先秦时期，即便是贵为一国之君、一国执政，也很容易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性命。如果六卿成员都严格按照规程步步高升，处于下军位置的人很有可能此生都无缘攀到中军将的位置上，这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尤其对于那些已经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来说，若是手中的权势无法顺利地延续到下一代，那么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也就失去了意义。

为了摆脱这个让人绝望的困境，不少掌握有现时权力的人便开始寻找捷径，而在现行六卿体制中设置壁垒，就成了他们缩短等待时间最直接的手段。而将上军佐设置为这个壁垒的锚点，恐怕也是他们经过反复博弈后，最终找到的一个最容易接受的方案。这种现象在后来二三十年的历史中还会反复出现，本书中我们将其定义为“上军佐壁垒”。

“上军佐壁垒”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将掌握六卿职位的家族划分为两个集团：一个是世代轮替掌握核心权力的前四卿组成的集团，他们将真正掌握实权的中军将之职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不允许他人染指，我们姑且将这四个家族称之为“执政方阵”；另一个则是位于四卿之外的其余家族，这些人虽然也都是世卿，但所谓的卿士地位，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安慰奖，要想真正地进入最高决策层，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这里称之为“替补方阵”。

“执政方阵”的形成，意味着最高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在加速侵蚀公室权力的同时，也加剧了世卿家族内部的矛盾。居于“替补方阵”的两大家族，会为了获得进入“执政方阵”的门票而暗中角力，自然就使得处于“执政方阵”的四大家族感到人人自危。为了避免被淘汰出局，他们也必然要想方设法压制对方的敌意。

如此一来，我们将晋国内部的三大冲突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景公乃至厉公时期的一大奇特景象：普通的大夫阶层为了能够进入卿列，总要拼尽全力对六卿家族进行围追堵截；居于“替补方阵”的家族为了更进一步，则想尽一切办法挖“执政方阵”的墙脚；“执政方阵”欲求不满，又不断强化私家权力以侵蚀国君的权柄。

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如果人们想要追求进步，排位靠前的卿大夫家族就必然会有人被淘汰出局。这种淘汰机制类似于“轮盘赌局”的游戏，所有身处局中的人都是被猎杀的对象，谁也不知道下一枪会不会瞄准自己。而正所谓“枪打出头鸟”，邲之战后先穀家族的覆亡，就是这种机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有了先穀的前车之鉴，居于中间地位的六卿家族难免会生出深切的危机感。他们时时刻刻都处在“前有豺狼，后有猛虎”这种腹背受敌的状态之中，一旦有所不慎就很容易落入圈套，从而步先穀的后尘而去，又哪里还敢恣意骄狂呢？这恐怕才是三军将佐纷纷表现出礼让谦和态度的根本原因。

为了消除这种人人自危的局面，晋景公也曾想过不少办法，比如鞏之战后建立的六军十二卿体制，其本来目的就是要缓解日益紧张的内部冲突。然而只要列卿与普通大夫之间的鸿沟尚未形成，国君还有对卿大夫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勇敢者的游戏”就不会停止，内部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还是在所难免，各方之间爆发激烈冲突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也正是“下宫之役”爆发的宏观背景。

第三章 下宫之役探微

第一节 赵氏内忧

原同屏括

在晋景公时期这种人人自危的微妙气氛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耳聪目明，及时识别到危险，并尽力放低身段做到藏巧守拙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赵盾的两个弟弟赵同、赵括。而据史料中所提供的线索，似乎正是由于他们的放纵骄狂，最终引发了下宫之役的惨案。

提到赵同、赵括这两个人，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世。根据《左传》的记载，赵衰一共娶了两名女子，一个是在“狄国”所娶的叔隗，生子赵盾；另一个则是回国后晋文公许配给他的公室女子赵姬，生子赵同、赵括、赵婴齐。这名公室的女子据推测应是晋文公的女儿，但也不排除是晋文公同母姐妹的可能，因地位比较尊贵，故而称为君姬氏，又或赵君姬。

赵君姬在嫁入赵家之后，并没有仰仗自己的身份作威作福，相反她不止一次地劝说赵衰将叔隗母子接回来，并将他们奉为赵氏内子（嫡妻）和嫡长子，而她自己 and 三个孩子则屈尊做了侧室，这就在宗法上为赵盾继承赵衰的地位提供了依据。

有感于赵君姬的深明大义，赵盾继承家业之后也算是知恩图报，对自家兄弟倍加呵护。到晋成公确立假公族制度的时候，赵盾十分恳切地向国君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把公族大夫的名额让给了君姬氏爱子赵括，而他自己则以“余子”的身份仅列为“旄车之族”，足见在政治上以冷血著称的赵盾确实也有温情的一面。

不过，依照假公族制度的约定，“乃宦卿之適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也就是说，只有卿的嫡子才能出任公族大夫。赵盾把公族大夫的身份让给了赵括，理论上就等于是将赵氏嫡系的身份还给了君姬氏之子，这就为后来赵氏家族的内讧埋下了伏笔。

此外，赵氏还有一支侧室，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赵夙这一系。按照通常的世系表，赵夙生共孟（有资料显示其本名为赵武），共孟生赵穿，赵穿生赵旃，这一支因受封于邯郸，故而别为邯郸氏。

邲之战爆发之前，赵同和赵括的名字都只出现过一次，而且都是以陪衬的角色出现，赵婴齐和赵旃则是到邲之战中才有所记录，因此都没有什么实质的表现。而到了邲之战时，赵括、赵婴齐、赵同已分别担任了中军大夫和下军大夫的职务；赵旃虽没有明确的职务，但从其求卿不得的表现来看，地位应该也不低了。在这场战争中，赵同、赵括、赵旃与先穀沆瀣一气，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只有赵婴齐的表现还算稳重一些。

邲之战结束后，国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先氏的灭族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然而赵同、赵括似乎根本感受不到这种变化，抑或是先穀的覆灭反而更激发了他们的仇恨情绪，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并未收敛其骄纵的个性。比如在晋景公六年（前594年）时，荀林父带兵大破赤狄潞氏，赵同受命前往成周献捷。在献捷过程中，赵同的表现很不恭敬，至于是怎么不恭敬的，史料并未具体交代，只是引用了刘康公的一句话说：“不到十年，原叔一定会有大灾难，上天已经夺走了他的魂魄！”

如果沿着这样的一条线索走下去，赵同、赵括最终死于骄傲狂悖，似乎也算是罪有应得。但《左传》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视角，表明下宫之役的

爆发还另有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赵朔的妻子赵庄姬的一桩丑闻。

宗主之争

赵朔谥号赵庄子，按照妻以夫谥的习惯，他的妻子就被称为赵庄姬。关于赵庄姬的身份，《赵世家》称其为晋成公的姐姐，也就是晋文公的女儿。但依照晋文公去世的时间计算，到赵武出生的时候，她的年龄最少也该有四十岁了。有鉴于赵武是赵庄姬的独子，四十岁生子在古代又比较少见，因此说她是晋成公的女儿、晋景公的姐姐或许更合适一些。

赵庄姬最大的烦恼是老公死得太早。无论是在《赵世家》的传奇故事中，还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下，到赵朔去世的时候，他的嫡长子赵武都还是只是个牙牙学语的孩童。而与父亲赵盾在世时的风头无两不同，子承父业的赵朔却是一个极其缺乏存在感的人。

《左传》中关于赵朔的记载只有两次：一次是在晋成公六年（前601年），郤缺为了把他塞进六卿的队伍而废掉了胥克，这时赵朔担任的是下军佐，六卿排名最末；第二次是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年）邲之战时，赵朔的位置向前移了一步，担任了下军将的职务。在名噪天下的邲之战中，他唯一的表现就是在下属栾书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后，说了一句赞叹栾书的话，此后便再无音讯。

赵朔在史料中无所表现，但作为大独裁者赵盾的继承人，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的话，《左传》中应该不会了无痕迹。因此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下宫之役爆发之前，赵朔就得病去世了。从邲之战到下宫之役满打满算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赵朔究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史料上没有具体说明，我们也只能透过其中细节做一些简单的推测。

按照前文的叙述可知，到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鞏之战爆发的时候，晋国六卿序列中已没有了赵朔的位置，可见最晚到这一年他就已经去世了。至于其去世时间的上限，我们可以根据赵武的年龄进行反推。

依据《左传》的记载，第二次弭兵会盟之后，时任正卿的赵武曾召集诸侯在澶渊举行过一次会盟。鲁国大夫叔孙豹在盟会结束后曾对其同僚表示，说赵武的年龄尚不满五十，却表现得像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者。叔孙豹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在晋平公十六年（前542年），我们就按最激进的虚岁五十来计算，赵武出生的时间最早也只能是公元前591年，也即晋景公九年之后。据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赵朔的去世要早于鞏之战爆发的晋景公十一年，晚于郤克使齐的晋景公八年。

这里的关键在于，赵朔不仅仅是赵盾的儿子，赵庄姬的丈夫，赵同、赵括的侄子，他还是晋国最高领导层成员。他的早逝在晋国政坛上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意味着赵氏有可能会失去在六卿中的席位。

赵氏宗族人才济济，定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按照后来的卿位排序来看，赵同很快就进入卿列，填补了空白。而到鞏之战的次年，晋景公以奖赏功臣为由对军队进行扩编，在原来三军六卿体制的基础上增加了新中军、新上军、新下军，春秋历史上列国仅有的一次六军十二卿体制就此诞生，赵括、赵旃同时为卿。

赵氏一门三卿，这样的荣耀若是放在以往，绝对是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然而时移世易，如今同样的荣耀于整个赵氏宗族而言，却变成了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这种威胁在赵氏家族内部，主要体现为对宗主权力的争夺。

当初赵盾在世的时候，依托于君姬氏的高风亮节和自身的武功威势，当仁不让地挑起了大宗的担子。赵盾去世之后，尽管赵朔在宗族内外都缺乏威信，但在郤克、栾书等人的保护下，赵同、赵括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然而，随着赵朔的早逝，这一切都产生了巨大的变数。

首先是在晋成公设立假公族制度的时候，赵盾为了报答君姬氏的恩情，将公族大夫的身份让给了赵括，使得赵括在法理上具有了赵氏大宗的身份。现如今赵同、赵括、赵旃又同入卿列，其身份更是比尚在襁褓中的赵武高出了不少。而若要论起辈分来，赵同、赵括都是赵盾的弟弟，赵武更是得喊赵同、赵括一声爷爷。如此一来，原本在赵氏宗族内部处于事实宗主地位的赵朔一系，如今在法理上和事实上都变成了赵氏的小宗，由此给赵庄姬带来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在晋国的政治实践中，宗主权在大家族内部进行转移并不是什么少有的事情。比如赵衰就曾取代其兄长赵夙成为赵氏家族的大家长；狐偃这一支系也曾超越其兄长狐毛，成为狐氏家族的领头人；士会所开创的范氏更是取代了其兄长士穆子，成为祁姓家族事实上的宗主。

有了这样的先例，赵同、赵括大概也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应该顺理成章。毕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年富力强同时具有法理优势的他们，怎么看都比赵武更适合去领导赵氏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只要赵庄姬肯稍稍相让一步，一家人“和气生财”，就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可赵庄姬是谁呀？她可是当今国君的姐姐，是赵庄子的内子。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君姬氏那么好的脾气，怎么可能允许别人爬到自己的头上？为了保住赵武的宗主地位，她什么事情都敢做，什么事情也都能做得出来，这也

就注定了赵氏家族内部的争斗不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那么，赵庄姬为了保住赵武的地位，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

东窗事发

在感受到赵同、赵括的威胁后，赵庄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在家族内部寻找盟友。而遍历赵氏宗族内有职权的人物，能够为她提供助力的候选人并不多，其中最得力的恐怕也就只有赵盾的另一个弟弟赵婴齐了。

赵婴齐又称赵婴，是赵同、赵括的同母兄弟，因受封于楼地，故而也常被冠以楼氏，称作楼婴。与之类似的是，赵同、赵括的封地分别为原、屏，故而在论及晋国内部事务时，《左传》特意将赵同称为原同、原叔，将赵括称为屏括、屏季，以将其与赵朔、赵武这一系区分开来。

尽管与二赵一母同胞，但与这两位兄弟的张扬个性比起来，赵婴齐可以称得上是个另类。在邲之战时，赵同、赵括配合先穀扰乱军队的整体部署，而身为中军大夫的赵婴齐则不动声色地在先穀的眼皮子底下，预先准备了撤退所用的船只，使得其所统率的中军一部免于在混乱中倾覆。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赵婴齐不仅比赵同、赵括更有大局观，在谋划布局方面比他的侄儿赵朔也高明不少。他在很多事情上都能提前做好通盘打算，算是这个行将末路的强卿家族中难得一见的明白人。

在关于大宗地位的争夺上，赵婴齐并没有选择跟自己的亲兄弟站在一起，反而坚定地站在赵庄姬一边扶持赵武，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两人之间的私情或者一时的冲动就可以解释的。分析赵婴齐此时的心理状态，他之所以会做出如此决策，恐怕也是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考虑。

自赵盾去世之后，整个赵氏家族在政坛上的地位都没什么起色。尽管早先赵朔曾在六卿中担任下军将的职务，鞏之战后赵同、赵括、赵旃也都进入了卿列，但都没能进入前四卿的行列。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整个决策层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与赵盾时期一呼百应的局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赵氏地位不如人，但得益于赵盾时期的用心经营，却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光是现在我们能够统计到的，就有赵夙时期获封的耿地，赵同所封的原地、赵括所封的屏地、赵婴齐所在的楼地、赵旃所在的邯郸。此外，赵盾主掌晋国将近二十年，他所在的这一支应该也有自己的封地。

赵氏既有在十二卿中的地位，又有广袤的封地领邑，其宗族权势虽不及以往，但在财富量级上却不落下风，难免会招来其他家族的忌恨。与此同时，在晋景公修订“范武子之法”，急欲扩张公室、抑制私权的大背景之下，在十二卿中占据了三个席位的赵氏已然成为其眼中钉、肉中刺，稍一不慎就会有倾覆之忧。在这种上有国君猜忌、下有大夫觊觎的局面下，赵氏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倘若再失去了背后的依靠，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赵庄姬的优势正在于此。一方面，她是国君的亲姐姐，只要有她在，国君就不会轻易对赵氏下手，而其余的家族也会看在公室的颜面上，不敢对赵氏有所动作。另一方面，她毕竟是赵朔的正妻，赵武也毕竟是赵盾的合法继承人。赵盾在世时对郤氏、栾氏曾多有照拂，后来郤缺上位后也曾对赵朔多有关照，而赵朔与栾书更是长期在下军共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如今赵盾、赵朔虽已不在，但他们所笼络的关系、积攒的人脉依旧在发挥着作用。就算是人走茶凉，关系淡漠了，他们看在赵盾的面子上也总会对她们孤儿寡母有所照顾。眼下正是赵氏宗族势力虚弱、

最需要外援的时候，以赵庄姬为牌面来保留郤氏、栾氏这两支，总好过赵氏一家单打独斗吧？

但无论赵婴齐是怎么想的，他有意帮助赵庄姬的行为终究还是无法得到赵同、赵括兄弟的谅解。到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年）冬，兄弟二人就以与赵庄姬通奸为由将其赶出了家门，无奈之下，赵婴齐只好投奔齐国而去。

赵同、赵括不顾国君姐姐的颜面揭破所谓“通奸”的丑闻，又驱逐了赵庄姬最得力的助手赵婴齐，这就等于是向赵庄姬公然宣战了。这样一来，站在赵庄姬背后的诸多支持者，上至晋景公，下至郤氏、栾氏乃至众多受惠于赵氏的普通大夫，都会因此而对他们采取敌意态度，这就等于是将赵氏原先的盟友全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倘若赵同、赵括的强横仅仅停留在赵氏内部的话，或许最终的结局也不会那么惨烈。然而，赵氏兄弟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同时也对当下所面临的危机缺乏警惕。

从后来的种种表现来看，赵同、赵括显然不认同赵婴齐消极求稳的策略，他们更倾向于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去解决赵氏当前面临的危机，也就是将进攻当作防御的手段。而当他们的野心渐渐显露了出来，就必然会引起其他君卿大夫的一致戒惧，这就注定会使得他们的进取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正因为如此，赵婴齐出奔齐国时才不忧虑地说道：“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左传·成公五年》）正当赵氏内部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早有一双眼睛在远远地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赵婴齐的出走，让本已出现衰微迹象的赵氏大宗失去了最后一层护甲，一场针对他们的阴谋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那么，这个“栾氏”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赵婴会认定他将对赵氏不利呢？

第二节 下宫之役

栾书为政

栾氏是一支历史悠久的公族，其族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期的晋国君主晋靖侯。曲沃代翼时期，晋靖侯的庶孙栾宾被指定为曲沃桓叔的师傅，被一起分配到了曲沃。栾宾的事迹史料上无载，倒是他的儿子栾成（栾共叔）在三十多年后站在了曲沃的对立面，最终在侵扰曲沃的径庭之战中被晋武公捕杀。

栾共叔去世后的七十年间，栾氏从史料上消失了，一直到晋文公四年（前633年）“作三军”时，才有栾枝（栾贞子）的名字再次出现。栾枝的事迹主要发生在城濮之战期间，在回答楚军的挑战时，既能放低身段表现出晋国的谦逊，又不至于过于贬低自己，在外交辞令上拿捏得很是得体。在战场上，作为整个计划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他有效地按照预定的计划演好了佯装败退的戏码，将晋军第一场系统性的配合作战演绎得淋漓尽致。综合看来，栾枝算是一个有学识辞令，有武力智谋，但中规中矩或者说略有些保守的一个人，赵衰称其“贞慎”也不无道理。

栾枝曾经受赵衰举荐，且二人长期在军中共事，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到赵盾剪除了五大夫之乱后，栾枝的儿子栾盾便被举拔为下军将。栾盾在任期间晋国内外兵劫连连，可无论是腥风血雨的国内斗争，还是斗智斗勇的秦晋纷争，似乎都与他没有半点关系。他就这样不温不火地在六卿中占据了一个职位，然后凭借着“世卿世禄”的东风，把位置顺利地传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重磅人物——栾书。

栾书谥号为栾武子，他的第一次出场也是晋景公三年（前597年），与赵盾之子赵朔同在下军共事，在六卿之中排名最末。邲之战中，栾书曾引经据典从多个角度驳斥先穀的言论，并对战前局势进行了一番分析，让他的上司赵朔听了深以为然，于是连连称赞说：“栾伯善哉，实其言，必长晋国。”

从以上的这些经历来看，自从晋国建立了三军六卿体系，栾枝、栾盾、栾书三代人接续传递，其在六卿中的席位几乎没有出现过中断，这在之前所有出现过的世卿家族中可以说是独一份的。但与此同时，栾氏家族在六卿中活跃了将近半个世纪，却没有任何让人记忆深刻的表现。当其余几大家族如先氏、郤氏、赵氏、荀氏、士氏纷纷出现执掌国政的强人时，栾氏三代卿士也没有出任过比下军将更高的职务。

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遭逢如此境遇，栾氏一族竟然全都能做到安之若素。眼看着正卿的地位在几大家族之间轮番转移，栾书久困下军行列，却从来都没有显示出有任何不满情绪。

除此之外，根据《国语》后来的追述，栾书出任卿职二十多年却不蓄私产，自己名下田产不过百顷，举行祭祀的时候连成套的礼器都无法置备齐全。而在执行政令的时候，他能够做到依法依规，没有弊端，以至于其德行能够泽被后世，令人长久怀念。

或许也正是这种不与人争且刚正不阿的特质打动了晋景公，到鞏之战的两年后，也即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年）冬季，当中军将郤克宣布致仕之时，当时还只是下军将的栾书就突然被超拔为新任中军将，意外地走上了人生巅峰，而他原来的上司荀首、荀庚、士燮的位置都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结果的确出人意料。在以往的历次人事调整中，从下军将以下直接超拔为正卿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先轸在出任正卿之前，只是六卿中排名最末

的下军佐；晋襄公在位时期，也曾想直接任命没有卿职的士穀为中军将，而赵盾更是凭借蛮横手段直接坐上了中军将宝座。但这些破格调整大都有其特殊性，要么是战争时期需要更有谋略的元帅，要么就是六卿职位出现了大批量的空缺。但此次的人事调整却与这些特例毫无关联，那么显然晋景公对栾书的任命就别有深意了。

但这样一来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原本的十二卿之中，居于“执政方阵”的四个位置分别由郤克、荀首、荀庚、士燮掌控。倘若将栾书从下军将的位置直接超拔为中军将，那么栾氏必然会挤占四大家族的位置，他们又有谁会愿意主动发扬风格呢？尤其是在郤克即将卸任的关头，他的继承人郤锜（郤驹伯）显然不可能再依据惯例空降到上军佐的位置上，这也就意味着郤氏很有可能会被挤出“执政方阵”。以郤克说一不二的性情，他能同意这么做吗？

郤克之愿

在过去几十年所形成的政治传统中，上一任中军将对于选谁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往往有很高发言权。郤克为人刚烈、做事果决，很有当年赵盾的强人风范，显然不可能对自己的身后事毫无安排。因此，尽管这次对栾书的任命是出于晋景公的授意，可没有他的点头也是很难通过的。至于郤克为什么会支持栾书，史料上并没有太多的说明，但从当时的形势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在过去几十年间，郤氏从属于由赵盾所组建的执政联盟，与荀林父分属不同的阵营，这个分歧到了晋景公时期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不同的是，自邲之战遭遇惨败之后，晋景公有意扶持赵、郤联盟的反对派别。他一方面诛杀了党于郤氏的先穀，另一方面又将荀林父的弟弟荀首安插到六卿的行列，使得郤氏的处境愈发艰难。

在此，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所形成的六军十二卿体制，担任六军将佐的分别是：

郤克、荀首，荀庚、士燮，栾书、赵同；

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躒、赵旃。

在这个排序中，位居“执政方阵”的荀首（智庄子）、荀庚（中行宣子）分别是荀林父的弟弟和儿子，士燮则是士会的儿子，都从属于郤、赵联盟的对立派别。一旦郤克退出了政坛，那么按照循序提拔的惯例，整个中军都会落入到荀氏集团的手中。这个时候，就算是按惯例让郤锜如愿空降到上军佐的位置，两大派别之间的权力分配也会出现严重失衡，这是郤克无论如何都不愿看到的。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郤克就必须在四卿之外选择一个可靠的盟友来占据中军的位置。但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儿子郤锜挤出“执政方阵”的序列。因此，在提拔盟友来接替自己的同时，还必须削弱对立派别的力量，也就是将其余三卿中的一支剔除出去。这里唯一的悬念就是，究竟该将谁剔除出去，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达成目的呢？

解决问题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条是和平的方式，五大家族协商解决；一条是暴力途径，通过流血冲突来实现优胜劣汰。在当前的环境下，无论是身居高位的晋景公，还是处于漩涡中的五大家族，恐怕没有谁会希望将权力斗争演变成武力冲突。

这场协商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据《左传》记载，到晋厉公三年（前578年）麻隧之战爆发时，荀首的儿子荀罃（又称智罃）已经出现在了下军佐的位置，表明最后被剔除的是中行氏的旁支智氏。

但问题到这里依然没有解决。协商的结果虽然有了，但当时荀首仍在中军佐的任上，郤克不可能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就强制让荀首退休。这也就意味着，郤锜最终晋升到上军佐仍需要一段等待的时间，倘若在这段过渡期内发生了什么变故，郤锜很有可能会被永远排除在“执政方阵”之外，这对于郤克来说显然也是无法接受的。因此，想要保证自己的意愿能够顺利实现，继任中军将的人选就至关重要了。而在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的选项并不多：一个是下军将栾书，一个是下军佐赵同。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窥知郤克做出选择的依据，但从现有的史料来分析，赵同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一方面，郤氏、栾氏虽与赵氏交好，但他们真正信赖的是赵盾、赵朔父子，如今赵同、赵括公然侵夺赵庄姬在宗族内的权益，这与郤氏的意愿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从邲之战的表现来看，赵同与专断独行的先穀同气连枝，而当先氏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郤克并没有伸出援手，这就使得赵同难免会对郤氏有所埋怨。再加上赵氏兄弟骄狂的性情，连自保都尚且不能，又如何能指望他们来维护郤氏的利益呢？

无论如何，经过再三权衡，性情更为沉稳的栾书最终成为郤克青睐的对象，由此也就形成了六军十二卿体制形成以来的第二届阵容，分别是：

栾书、荀首，荀庚、士燮，郤锜、赵同；

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躒、赵旃。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栾书受到提拔的时间与赵氏丑闻爆发的时间几乎吻合，这显然也预示着栾书与赵同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也就是说，几乎就在栾书受到提拔的同一时间，一场针对赵氏的阴谋就已经开始了，赵婴齐也已经意识到栾书将对赵氏不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双方会产生如此深的矛盾，以至于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呢？对此《左传》同样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在这里我们不妨从性格的角度来做一分析。

前文我们曾提到，赵盾在执政时虽然对待政敌手段残忍，可对自家人却还是充满了温情。一直以来，他都对自己兄弟和子侄宠溺有加，即便他们犯下了天大的错误，赵盾也都能够理直气壮地纵容袒护，甚至不惜背上弑君的罪名。

赵盾对待亲属无原则的纵容，让他们养成了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的傲气，从属于赵氏侧室的赵穿、赵旃无不如此。而赵盾说一不二的权势，也让这些过惯了优裕生活的子弟不愿意屈居人下，惯于颐指气使。尤其是赵盾去世后，“赵氏家族势力的发展呈现出了急躁冒进的势头”，赵氏子弟如赵同、赵括、赵旃纷纷要求加入卿列。而一旦愿望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与先穀联手来扰乱军行，连荀林父这样的职场老人都不放在眼里了。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一直籍籍无名的栾书又岂能入得了他们的法眼？也正因为如此，当邲之战中郑国的皇戌前来劝战，栾书对其言论做出一一反驳之后，赵同、赵括马上就站出来起哄，可见二人对栾书的轻蔑态度。

即便是栾书正式成为中军元帅，赵同、赵括与栾书在对楚作战方面的分歧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这似乎意味着，二赵对于栾氏轻视、敌对的态度显然没有随着对方地位的变化而有所收敛，这也就进一步加剧了双方之间的冲突。

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栾氏家族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使得栾书养成了善于隐忍的性格，但在隐忍的背后，也往往蕴含着睚眦必报的意味。当自己的

地位尚且低微的时候，栾书自然不会去计较赵氏兄弟的跋扈，可一旦掌握了权力，以往受到的轻蔑和嘲讽就会变成促使他复仇的动力。

迁都新田

晋景公十四年（前586年）夏天，引发赵氏丑闻的赵婴齐刚刚被放逐到齐国，国内便发生了一起灾异事件：位于今陕西韩城的梁山突然崩坍，从山上滚落的碎石和泥土壅塞了黄河河道。

在古人的观念中，山崩地裂并不是什么寻常的自然现象，这种灾异的出现往往隐含着人君失德、国家将亡的征兆。在原始的历史记录中，有“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传说，到西周末年更是出现了“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的重大历史悲剧。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梁山处于黄河以西，与位于今天山西河津的韩原隔河相望，早年是嬴姓诸侯梁国所在地，晋惠公即位之前曾在此避难。晋惠公末年，梁国被秦穆公吞并成为秦地，到晋襄公时期又被晋人夺取，此后便成了晋国的地盘。因此当梁山出现崩解的时候，就不能不引起晋人的高度重视。

晋景公为此急派传车召伯宗进宫问事。伯宗闻讯片刻也不敢耽搁，当即乘坐传车日夜兼程奔往国都，不巧在路上却被一辆载满货物的重车堵住了去路。伯宗心焦如焚，担心误了时辰，便一再催促他们赶快把路腾出来，谁料押车的人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这车太过笨重，与其等我，还不如趁早绕小路走得快。”

伯宗看他谈吐不凡，再加上心里也没个主意，正好跟他闲聊几句。谈话间得知他是绛城人，还知道国君要召伯宗问话，便有意无意地向其询问看

法。押车人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梁山上土壤松软出现崩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自然现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国家虽然以山川之主为尊，可遇到山崩川竭的大事，能做的无非也就是减少膳食用度、裁撤歌舞音乐、穿素色衣服、坐普通的车子、离开寝宫到郊外居住，命祝、史等官员向神祇贡献祭品、诵读祭文以祭祀山川之神。这些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就算是伯宗去了，又能有什么花样呢？”

人民群众在日常劳动实践中总结了大量人生经验，比起那些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夸夸其谈的人更加讲求实际，看待这些日日如常的自然现象比贵族们要通透明白许多。押车人的这番见地让伯宗大受启发，便想将其引荐给晋景公，可对方并不领情，伯宗只好把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晋景公，算是有了个交代。

至于晋景公有没有相信押车人的话，国内的大夫们是不是同样看得开，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是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晋景公突然就开始谋划迁都事宜。对于这样一个动议，大夫们众说纷纭，一直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建议迁到郇瑕氏之地，也就是如今山西临猗附近，理由是那里土壤肥沃富饶，且靠近盐池有山泽之利，国家可以很方便地从中获利。

晋景公看着众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着实有些头疼，于是便宣布罢朝，向大家作了个揖就退了出去。当时担任新中军将的韩厥在公室兼任仆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打理宫中事务，于是便跟着国君去往燕朝。在经过路门之时，韩厥突然发现景公正在院中候着，等他靠近了才不动声色地问道：“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韩厥在回答时提出了两方面的意见：其一，郇瑕氏地方土薄水浅，容易聚集污秽肮脏的东西，居住其间会让人罹患风湿、脚肿以及各种心理疾病。与之相比，新田的土厚水深，又处于汾河、浍水相交的地方，污秽的东西就容易被水冲走，人民可以在此安居而免于疾病之苦。其二，郇瑕氏固然是物产丰饶，卿大夫也都愿意在此安家，可这对于公室来说却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国都富饶，会鼓励民众骄奢淫逸、争财贪利的风气，反而不利于公室财富的聚集。

在儒家的政治理论中，有一套统治百姓的方法，用《国语》中的原话说便是：“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圣王治理百姓，不会选择肥沃丰饶的土地，反而会特意找一块贫瘠之地定居。其中的逻辑就在于，老百姓生活困顿，他们就会思考改善生活的办法，从而在思考中逐渐形成美好的品德；反之，如果老百姓生活富足，他们就会沉溺于安乐享受，反而会生出各种邪念来。因此，只有让百姓都劳碌起来，才能实现长久的统治。

韩厥的谏言同样体现了这一思路，卿大夫本就奢靡成风，国君想要抑制都无从下手，若果真迁到了郇瑕氏之地，面对盐池丰厚的利益，他们又岂能不动心？在卿大夫的带动下，老百姓自然也会跟风争利，由此带来的结果不仅会使得他们“淫而忘善”，更会侵夺本属于公室的利益，这对于君主的集权显然是不利的。

当初太卜郭偃曾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既然卿大夫与公室的出发点不同，利益诉求又截然相反，那么就应该以国君的意见为主，而不是被卿大夫绑架。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晋景公力排众议，剔除了郇瑕氏这个选项，最终迁都新田，完成了利益重组的重要一步。

革弊布新

历朝都城选址或者迁都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无外乎以下几种：一是选择战略要地或形胜之地，对外可以肩负起“天子守国门”的重任，对内可以防止地方藩镇借机壮大，与中央抗衡；二是选择经济文化中心，在农业富庶、经济活力旺盛的地区就地取材，可以有效地扩充中央财政，以维护国家官僚体系的顺畅运行；三是选择交通要道，在便于人员往来、物资流通的同时，既能加强中央对全国资源的调度的能力，又能使得中央政令辐射全国，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力。

参照以上标准来看，晋国迁都新田的选项似乎并不符合这些特征。韩厥提议的新田在今山西侯马境内，距离故绛不过区区几十里远，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交通便利性上与故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战略布局上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而反观大夫们所看重的郇瑕氏之地，其地靠近蒲城、魏县以及当初秦国急欲索取的解梁城，战国初年霸主魏国的都城安邑也距此不远。定都郇瑕氏的话，向南可以通过虞坂古道和茅津渡直抵南阳、直插中原，向西可以通过蒲坂渡口直捣河西，可以缩短与秦、楚之间的空间距离，在战略位置上显然要比新田更加优越。晋国如此大动干戈实施动迁，却放弃了战略要地选择了一个毫无特殊性的地方，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究竟是在迁都，还是在挪窝呢？

结合当前晋国的政治环境，我们大可以参照后世北魏孝文帝的案例来做一分析。孝文帝一意孤行迁都洛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试图推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化改革。这项改革既涉及文化习俗的改变，也牵扯利益格局的转化，必然会受到老牌鲜卑贵族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在旧都平城的势力盘根错节，只有将他们所依赖的传统势力连根拔掉，改革才有可能顺利推行。

晋景公与北魏孝文帝有着同样的困扰。自晋文公去世后四十年来，晋国政治形态逐步变异，六卿家族在故绛形成了稳固的利益网络，各大家族既互相依存又相互制约，其中的利益关系犬牙交错，很难理得清楚。都城士、农、工、商不是从属于此家，就是隶属于彼家，唯独不属于公室，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构成了维护卿家势力的群众基础。如果迁了新都，却未能削弱私家势力，那么这个都城的选址无论有多理想，都不合晋景公的心意。而新田所在的区域尽管距离故绛不远，但这里的百姓却是典型的“公家人”，对公室的认同感更强，也更容易接受教化，是公室推行改革最坚强的群众基础。

晋国迁都新田的时间是在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年）四月十三日。考虑到迁都事项牵涉众多，从动议到筹备、从奠基到完工都需要耗费时日，因此这场讨论很可能在赵婴齐奔齐、梁山崩塌之后就已经展开了，从中也可以看到迁都新田与赵氏丑闻之间微妙的关联。

由此我们便可以梳理出晋景公在位期间施政的整体脉络：面对日趋激烈的国内冲突，晋景公总是尝试使用温和的手段来缓解矛盾；只有当这些办法都无法奏效的时候，他才会强硬起来。从邲之战前的妥协到清之战后对先穀痛下狠手；从制定范武子之法、建立十二卿制，到将卿大夫在故绛的利益连根拔起；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反映了他在处理问题时由温和转向强硬的内在逻辑。

如今迁都的举动更像是一个预警信号，标志他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整肃国内政治风气；同时也是在向那些侈卿发出最后通牒，预示着一场狂风骤雨即将来临。如果在这种强烈的暗示面前都无动于衷，依然骄横跋扈、我行我素，那就等于是将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自取灭亡。而赵同、赵括兄弟恰好就是这种看不清形势的愚者。

在春秋时期各国内部的斗争史上，“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为君仇”，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当此晋景公一心扩充君权的大背景之下，拥有众多封邑且权势日盛者更易受到国君的猜忌。而在“世卿世禄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中，普通大夫对世卿家族权势和财富的觊觎，又常使得列卿无不战战兢兢。赵氏同时兼具了众多封邑的财富和一家三卿的权势，本就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然而当众卿都无不谨慎求全的时候，赵同、赵括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对外公然挑战“执政方阵”尤其是执政卿栾书的权威，对内则不断侵蚀赵盾一系小宗的权益，自然就同时激发了国君、世卿集团、大夫阶层以及赵庄姬的一致排斥，这便是下宫之役爆发最重要的推动力。

结合以上这些分析，下宫之役的整个逻辑链条便渐渐清晰了。首先是从宏观背景上看，普通大夫对世卿世禄制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纷纷将发泄怒火的枪口转向了获利最多的六卿家族。在世卿集团内部，有的家族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断扩充权力，而自身利益受到挤压的传统强族也急欲伸张权益，从而加剧了卿大夫之间的对立情绪。为了缓解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晋景公先是采取了诸多温和的手段来抑制卿权，但当他认识到这些努力都无法奏效的时候，整肃国内政治风气的手段也就强硬了起来。

在这样一个关乎生死的重要关头，原本强盛的赵氏家族却不合时宜地陷入了分裂状态。出自赵盾一系的小宗势力和由赵同、赵括组成的大宗势力在行为观念、政治立场等各个方面都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尤其伴随着赵朔的去世，小宗势力从此式微，更使得这种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到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年），赵同、赵括不顾赵庄姬的颜面，捅破了她与赵婴齐通奸的丑闻，等于是彻底撕破了脸，将家族内部矛盾完全公开化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赵庄姬恼羞成怒，不惜联合栾氏、郤氏诬告赵同、赵括谋反，而这也正好与晋景公试图加强集权的意图不谋而合。在四股力量的联合推动下，形成于晋景公即位初年的“轮盘赌局”终于到了下一个触发点，一场惨烈的政治事变由此爆发。到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六月，各方势力联合出兵包围赵氏下宫，讨灭了赵同、赵括之族并将其土地罚没充公，赵氏内部的冲突便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第三节 景公之死

赵武继祿

“下宫之役”爆发后，赵氏的土地被尽数罚没，并被晋景公赏赐给了祁奚。而按照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小宗之于大宗既是从属关系，更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赵盾虽曾长期居于执政地位，但在法理上他所在的这一支系仍属于赵氏的小宗。因此当赵同、赵括被诛灭时，赵武凭借其母亲的荫庇可以幸免于难，但其所属的土地却也都被罚没了。

而与之相反的是，赵穿、赵旃这一支系，由于早在赵盾主政时期便被置为“侧室”，因此就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独立性。相对于跟大宗之间的从属关系，其与公室的臣属关系显然要置于首位，因此并未受到牵连。下宫之役爆发后的几年间，赵旃也一直都保留了其在卿列中的职务。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赵庄姬所乐见的，因此不久之后，曾身受赵氏恩养的韩厥便上表直言：“以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他们的土地爵位竟然无法为子孙所继承，这恐怕会让那些为善者感到害怕。夏商周三代的贤王之所以能够保持几百年的福禄，并不是说他们的后人就没有不肖之徒，而是因为他们的功业和德行太过伟大，足以庇护后人。如果君上能够善待赵氏的孤儿寡母，用以表彰那些为国家立过功勋的人，不正好可以昭明君上惩恶扬善的德行吗？”

韩厥的话虽然听起来拗口，但不无道理。这些年来国内政治局势之所以这么紧张，与先氏灭族带来的冲击是分不开的。如果在对待赵氏的时候能够一码归一码，不搞连坐、不搞清算，就能够安抚大家的紧张情绪，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日益严重的对立关系。

与此同时，韩厥也有他的私心，作为这次内阁调整中唯一入围的新势力，他的身旁还缺乏强有力的保护，而他与赵氏的这段情谊，使得他可以背靠赵氏强大的宗族力量来为自己撑腰，这总好过以韩氏一家的力量苦撑。

晋景公也是个听劝的人，果断采纳了韩厥的建议，恢复了赵武的土地、爵位。而赵衰对于寒门氏族的保护和温情，也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不管怎么说，在君权疲软近四十年后，晋景公终于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强化了自身的权力，而韩厥也用自己的肺腑之言为赵家留下了复兴的希望，为韩赵两家延续二百多年的战斗友谊涂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郤氏和栾氏也均如其所愿，栾书的执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而郤克希望郤锜进入“执政方阵”的愿望也得以实现，总还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不久之后，伴随着中军佐荀息（智氏）、新上军将巩朔（士氏旁支）、新上军佐韩穿以及新下军将荀躒（荀氏旁支程氏）的相继离世，六军十二卿的庞大体制也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晋国于是就裁撤了新中军、新上军、新下军的编制，重新组合了一支新军，形成了四军八卿的新格局。新一届八卿组成为：

栾书、荀庚，士燮、郤锜；韩厥、智罃，赵旃、郤至。

然而，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美好的憧憬总是会被无情的现实击碎，完美的大团圆结局通常只是下一场无底线斗争的开始。对于晋景公来说，人生巅峰只是一瞬，存在于荣耀背后的只有后人无尽的戏谑。

甸人献麦

犹记得那还是一个六月天，晋国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去年播种的冬小麦跨越了整个寒冷的冬天，终于到了收获的时节。在这个充满了喜悦的日

子里，举国上下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在金黄的麦田中奔跑歌唱，不知不觉间一首熟悉的曲调便穿越了时空，响彻人们的脑海，那首《诗经·周颂·丰年》是这样唱的：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秭。

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按照周人的习惯，粮食丰收以后通常会先向祖先和神祇献祭，祈求来年五谷丰登，然而这一年却是个例外。六月的季风刚刚来临，晋景公便迫不及待地让甸人献上新鲜的麦子，并安排了厨师烹煮，准备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能先人一步大饱口福。在等待饭食上桌的片刻时间里，他还郑重其事地差人把桑田的一名巫医带上殿来，不无得意地问道：“你不是说我吃不到今年的新麦了吗？我这就吃给你看。”

要说晋景公还真有一股子小孩子气，不就是吃口麦子的事嘛！年年都有新麦上市，这有什么好得意的，至于要跟一个巫师怄气？不过，这事儿还真有可说道的地方。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几个月前。当时晋景公做了一个噩梦，梦中见到一个长发委地的厉鬼在自己面前捶胸跳跃说：“你不顾大义杀了我的子孙，我要为他们报仇，上天已经准许我的请求了，你就等着瞧吧！”晋景公感到十分害怕，于是就躲到内室，结果厉鬼直接撞破了内室的门，向他直扑过来。

晋景公被吓得不轻，醒来以后就大病不起。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当时的医学水平不够发达，医生和巫师还是同一个职业，他们只能尽量去找那些口碑比较好的巫医来为国君诊病，刚好被请来的就是如今跪在殿下的这位。不过在当时，据说这位巫医还真有两下子，到了寝宫他也不害怕，不等晋景公

自述，他就已经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梦境。晋景公听罢极为惊讶，于是问道：“怎么样？——我还有救吗？”

巫医只说了一句话：“君上恐怕是吃不到今年的新麦了！”

不管晋景公信不信，反正后来他的病情是越来越重了。所谓“病急乱投医”，人们四处为其寻医问药，消息很快就穿越国界传到了秦桓公的耳朵里。秦桓公虽然跟晋国人不对付，可还是本着仁爱之心，派出了最好的大夫医缓前来诊病。

秦晋两国路途遥远，医缓还没到晋国，景公就又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到病魔化身成两个小孩儿，其中一个说道：“医缓是名良医，我担心他会伤害我们，怎么办才好？”另一个小孩回答说：“我们就躲在膏的下面、肓的上面，他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医缓到了之后，仔细排查了景公的病情，最后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病处于膏肓之中，针灸不能到达那个深度，药物也难以产生效果，已经无法医治了。”晋景公想起梦中小儿之言，不由得感叹道：“真乃良医啊！”

陷厕而卒

事已至此也无他法，晋景公差人向医缓馈赠了丰厚的礼物，并特意安排了人马护送他回去。事了之后，他郑重其事地把国事都托付给了太子州蒲，让众臣拥立其做了国君，也就是后来的晋厉公，他自己则落得一身清闲，安心养病去了。

可到了这年六月，晋景公的病情不但没有恶化，似乎还渐渐好转了。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当初请的那位巫医，心中愤愤：庸巫啊庸巫！寡人就是因

为听了你的鬼话，以为自己活不了几个月了，这才把国君的位子让出去！现在寡人身体好了，大权却全都给了儿子，你让寡人将来以何面目见人？

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太上皇”这个职务自古以来就是离间父子亲情的利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国之君一旦沦落到这个份儿上，通常都不得善终。且不说人的权力欲是没有止境的，单说面子这一关就实在过不去。当年晋献公在猜忌太子申生的时候就说过：“人还没死就把国政交给了儿子，会让人耻笑的。”如今晋景公因为轻信一个骗子巫医的胡言乱语就让出了国君之位，这事要传扬出去，可不得让人笑掉大牙了嘛！

晋景公于是便怒气冲冲地将巫医抓了回来，准备要狠狠地治他的罪。可事不凑巧，偏偏这个时候，晋景公突然感觉肚子胀气，急忙往厕所跑，没想到这一去就再没回来。晋景公得意了半晌，新麦已经摆到了嘴跟前，结果还没等下口，就以一种令人难堪的方式驾鹤西去了。

当晋景公在茅坑里挣扎的时候，巫医的脸上已经大汗淋漓，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太上君”的发落。在朝堂上服侍长君的人们则心中窃笑，脑海中如放电影一般演绎着巫医可能会面临的“一千零一种死法”。只有一名寺人看到国君迟迟不归，隐隐有些担心，急忙跑出去寻找，这才发现晋景公已经惨死在茅坑里。

寺人忠心耿耿，顾不得景公满身的污秽，费力地把他拽上来背回到寝宫。大夫们得到消息的时候，国君陷厕而卒的糗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想捂是捂不住了。倒是背景公回寝宫的那位小臣，据说头天夜里曾梦到自己背着晋景公登天，大概是没有预料到晋景公真的会升天，他还沾沾自喜地跟旁人说起此事，结果就被一顿闷棍送去给晋景公殉葬了。

这件事发生在晋景公十九年（前581年）的六月初六日。尽管故事过于离奇，可其中所涉及的各种梦境、预言都配合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整体构思也不可谓不严谨。从晋景公梦中所见来看，厉鬼怨恨晋景公杀掉了他的子孙，似乎与刚刚发生的下宫之役有一定的关联。后来又有两个小儿躲在膏肓之间，又似在暗指赵同、赵括两兄弟，更加深了人们对这种猜测的印象。也正是因为有这个暗示，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中，司马迁便直接将晋景公生病的原因写成了大业的子孙作乱所致。

凡是有悖于常理的故事，其中的逻辑越是严谨、前后关联越是顺畅，就越是有阴谋的成分。这个故事在迷信鬼神的古代或许会让人深信不疑，可放到今天，我们就必定要怀疑其中造假的成分了。

晋景公去世的时候，距赵同、赵括被杀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即便他们还有余党能够兴风作浪，可想要把故事编圆不出纰漏，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即便这件事跟赵氏的覆灭有关，也不太可能是二赵的余党兴风作浪，很可能是在朝中具有很大能量的人。

至于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已经不得而知。时隔两千多年，仅凭残存的一点资料想要决断这样一桩公案显然是不可能的，更没有必要。

可以确证的是，晋景公在位期间，赵氏的中衰对于君权的扩张有一定的助益，但效果并没有预想中那么明显。毕竟晋国的问题要比楚国复杂得多，楚国除掉了若敖氏的势力就足以保证君权的回归，可晋国却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宗族林立，六卿体制也早已成为自主运行的独立系统，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晋景公尽管极力做出改变，然而受制于赵盾所设下的藩篱，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到晋厉公时期，君卿之间的权

力斗争再次升级，流血冲突愈演愈烈，君主权力在达到一个巅峰之后再次衰落，这种总的趋势恐怕不是一两个君主就能够扭转的。

不过话说回来了，下宫之役对于赵氏来说的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若长远来看，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次灾难使得赵氏能够将姿态放到最低，从而躲过了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顺利地将香火延续了下去。而在晋景公、晋厉公时期崛起，一时间不可一世的栾、郤家族，在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旋即陨灭，成为卿族斗争的牺牲品和后来者崛起的垫脚石。在后世崛起并主导历史走向乃至瓜分晋国的，反而是此前一直沉寂无声、默默无闻的家族，其中当然也包括如今陷入衰落的赵氏，这样的结果恐怕是谁也无法提前预料的。

第四章 车辕之役与晋厉公之死

第一节 车辕之役

士燮之忧

晋景公在位期间，对内以德刑相辅，大力度开展集权运动，君主权威相比于灵、成时期有了很大的提升。对外则是及时做出了战略调整，一方面放低姿态与“白狄”结盟共同抵御秦国，维持了西部和北方边境的安定；一方面又积聚力量灭掉了盘踞在东山地区的“赤狄”部族，清除了对其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外部力量。而在恢复中原霸权方面，他先是通过鞏之战扭转了邲之战后的不利局面，后又通过联吴制楚和弭兵之约重塑了晋国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这些作为都为晋厉公时期的对外开拓奠定了良好基础。

及至晋厉公即位，晋国内外形势逐渐向好。晋厉公携晋景公所创造的大好局面，一手破除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合纵联盟，一手构建诸侯协力制楚的连横之势，将楚国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并最终通过鄢陵之战的胜利，形成了对楚国的绝对优势。二十年忍辱负重，一朝厚积薄发，晋国的复霸大业已是触手可及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一幅团结一致、积极进取的奋斗画卷，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欣然接受的。当鄢陵之战的尘埃落定，所有人都为这样一场扭转乾坤的世纪之战欢欣雀跃的时候，却有一个人默然立于马前，怅然若失地说道：“国君幼弱，诸臣不佞，究竟有何德何能可以承受如此辉煌的战果呢？”

与当年邲之战时那些希望晋国战败的“不逞之徒”不同，此番因为战胜而感到不安的，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长者，他就是曾经主导弭兵会盟、如今八卿排位第二、担任中军佐的士燮（范文子）。

自楚国司马子反撕毁弭兵协议，决议出兵北伐以来，晋国上下群情激愤，朝堂内外充斥着好战的声音，只有韩厥和士燮两个人对出兵中原持反对态度。不过，与韩厥相对温和的态度比起来，士燮反战的态度显然更加坚决。无论是在君臣议政的朝堂之上还是在战鼓烈烈的两军阵前，士燮始终都不遗余力地鼓吹自己的观点，力图让众位同僚回心转意。

战争爆发的两个月前，当郑国叛晋伐宋的消息传来，众人商议是否该讨伐郑国时，士燮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照我看来，如果诸侯都背叛了，对于晋国恰恰是好事。如果只是区区郑国背叛了我们，我倒认为这反而是忧患的开始。”

然而担任中军将的栾书却不以为然，听到士燮的建议，他轻描淡写地回应道：“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左传·成公十六年》）说罢便毅然决然地带领大军奔赴黄河而去。

士燮一再劝阻没能奏效，只能跟随大军一路南下，可他还是心存侥幸，认为总会有机会劝说栾书回心转意的。因为以士燮从政多年的经验，栾书担任执政以来一直都在避免与楚军接触。比如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年）的桑隧遭遇战，当时六军十二将佐大都是积极请求与楚军开战，唯有荀首、士燮、韩厥三人要求避战，栾书毫不犹豫地采纳了三人的建议，选择避而不战。

事后有人问起这件事，说：“圣人与众同欲，所以才能成就大业。如今请战者占大多数，反战者不过三人而已，您舍弃大多数而采用少数人的意见是什么道理呢？”

栾书的回答很让人费解，他说：“倘若每个人所表现出的‘善’是均等的，自然应该跟从大多数。”但现实中“善”在人群中的分布有多有少，栾书认为这三位卿士的“善”更多一些，有他们三位来主张，就已经可以说是“众”了。

关于这段话，后人大都按照“从善（贤）不从众”来理解，若果真如此的话，被撇在一边的其余八卿不知该做何感想。但不管怎么说，这段话因为被写进了圣贤书，还是受到了广泛的追捧，进而成为指导政治实践的一大利器。栾书更是在两年后故技重演，因而获得了“从善如流”的美名。

但问题是，带有道德色彩的善恶、贤愚、是非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在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形态，这也就使得所谓的“从善不从众”“从善如流”往往具有鲜明的人治色彩。只有当主政者全知全能且毫无私心杂念的时候，这个原则才能得到有效运用，避免民粹主义的泛滥，否则就只能成为为政者个人意志的镜像，沦为独断专行的工具。

栾书显然不是执行这一原则的最佳人选，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即便是自己所开创的原则他也能弃之如敝屣。事实上从一开始他所依从的都只有国君的主张。当初晋景公不愿跟楚国起冲突，所以栾书就极力避战。两年后，因鲁国汶阳之田的纠纷，诸侯又起了二心，正是需要立威的时候，他就顺势发动了侵蔡伐沈的战争。而到了晋厉公主政时期，他所面对的君主变成了一个年轻好胜的少年，自然就要极力主战以迎合国君的喜好了。因此，当众人围绕是否该向郑国用兵而展开争论的时候，同样是韩厥和士燮的劝阻，栾书就不再“从善如流”了。

德不配位

大军于晋厉公六年（前575年）四月十二日出发，当年五月渡过黄河，不久后便收到了楚共王亲率大军前来救援的消息。按照一般套路，一旦楚军介入，晋军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郑国了，这个时候再来劝说，或许栾书就会听从建议。有鉴于此，士燮及时进言，说：“我们还是假意避开楚军，以缓解国内的忧患吧！我也知道统领诸侯、复霸中原一直都是您的梦想，但由此所造成的后果却不是你我所能承担的，还是留待后人来做吧。只要我们能勤勉和睦侍奉国君，保证国内无忧，还怕以后没有机会吗？”

然而士燮的拳拳之心最终还是没能打动栾书，大军继续向前推进，到今年六月，终于与楚军在鄢陵相遇。事已至此，士燮只能做最后的努力，不过这次迎接他的不是栾书变色的脸，而是新军佐郤至傲慢的心。

几年前主持弭兵会盟的时候，郤至本是与士燮一条心的，可当他得知楚国并无和议之心的时候，便很快就转变了观念，投入到主战派的阵营中去了。此番面对士燮的劝阻，郤至列举了晋国过去的几次惨痛教训，说：“韩原之战，晋惠公不能振旅；箕之役，先轸不能反命；邲地一败，荀伯不能进取中原，这些都是晋国的耻辱。先君在位时的情况恐怕您也是知晓的，如今倘若我们再去躲避楚军，岂不是又增加了一次耻辱吗？”

言至于此，向来性情温和的士燮也被激怒了。他满是愤慨地回应道：“先君夙兴夜寐、屡次征战是有原因的，当时秦、狄、齐、楚虎视眈眈，如果我们不拼死征战，子孙将无立锥之地。如今三强顺服，能够与我们抗衡的也就只剩下楚国一家了，这跟当年的局势完全不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无内忧也无外患，否则外部安定了，内部就一定会生出祸患来。留下楚国这个外患让我们引以为戒，岂不更好？”

遍览士燮言论，他之所以反对伐郑，反对与楚军开战，其核心要义就是这句“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也就是说，只有圣人才配得上海清河晏的太平盛世，如果你只是个德行不足的凡人，外宁内安就成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体，必然要有所舍弃。晋国没有君临天下的王者之德，却偏偏想要干王者才能做到的事情，希望诸侯都来依附。殊不知这恰恰是祸乱的根源，正因为有诸侯的依附，国内政治环境才会变得这么糟。问题出在国外，尚且有补救的余地，可若是发生在国内，那可就难以应付了。

在《国语》中，士燮还形象地打了个比方，说德是福的基础，德行不够而享有太多的福气，就好像地基没有打好，却在上面筑起了高墙，不知道哪一天它就倒塌了，这就是德不配位的必然后果。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舍弃外部的虚名而换来国内的欢乐祥和呢？

但对于“德行”这种虚无缥缈的存在究竟该如何判别，普通人就算是想破脑袋恐怕都弄不明白。为此士燮特别对晋国德行不足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其中的核心要点是晋国法治的混乱。

士燮在他的表述中将刑罚划定了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刑罚是针对普通民众的刑事处罚；再高一层次的刑罚主要针对的是大夫阶层，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监察体制”，贪污受贿、违抗君命都属于这一层次的处罚对象；最高层次的刑罚就是战争，用以处罚诸侯、大夫不尊王道的罪行。

在士燮看来，在国家治理当中，大夫们犯错造成的后果往往更加严重，而老百姓触犯刑法大多都是出于对在位者的怨恨。因此圣人治国，往往会对百姓多施恩惠以消除百姓的怨恨之心，对大夫则会使用严刑峻法来规避风险。这样一来，大夫们不犯错，老百姓也就不会产生怨恨，国内政治昌明，

自然会内和而外威。只有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方能振武于外，去惩罚国外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以维护王道正义。

可现在晋国的法治状况究竟如何呢？士燮直观地解释说，处理刑事案件、用来惩罚百姓的刀锯用得太多，以至于都供不应求了，可用来惩罚大臣的斧钺却放在仓库里生了锈。也就是说，如今晋国用来处罚贵族犯罪的“监察机制”用得太多，而针对百姓的刑事处罚过严过苛。

维持国家长治久安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做到一碗水端平，如今晋国连最基本的公平正义都做不到，凭什么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了你的荣耀而卖命？就连国内的法治建设都搞不好，又怎么好意思去与其他诸侯争霸？在民怨沸腾得不到伸张的情况下出征于外，就算是打胜了，那也是纯属侥幸。一个依靠侥幸来治理的国家，怎么可能没有内忧呢？

除此之外，士燮还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自己的忧虑。他做了一个假设，说：假如我们战败了，就当我说什么也没有说；可如果战胜了，以我们国君的脾性，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士燮笃定地说道：如果战胜了，国君一定会自矜自傲，处处炫耀自己的智慧和武功，进而怠教而重敛，对自己的宠臣和姬妾大加封赏。他用来封赏的土地会从哪里来？自然是要向大夫索取。可大臣们又有几个人能够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土地奉献出来呢？最终的结果，恐怕会进一步将分配土地的基本经济秩序打破，从而产生变乱，危害所有人的权益。

说一千道一万，士燮最终要强调的就是“内睦而后图外”，如果不能消除内部的不和睦因素而贸然举兵，变乱随时都可能会发生。只可惜他终究是孤掌难鸣，他的良苦用心也无人理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僚在亢奋的军歌中，一步步走入了自设的陷阱。

到了这个时候，士燮也只能默默祈祷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自己能够全身而退。因此当楚军压阵营前，他的儿子士句提出“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的时候，士燮忽然想到了自己当年“三掩人于朝”而被父亲责骂的旧事，于是便像父亲当年一样“执戈逐之”，并责骂道：“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士燮谋求自保的举动被苗贲皇看在眼里，让这个经历过生死兴衰的楚国亡臣不由得顾影自怜，说士燮真是“善逃难哉”！不过，恐怕连苗贲皇也不得不承认的是，士燮对于祸乱的恐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当晋军从鄢陵凯旋，所有人都在欢庆胜利的时候，士燮却一个人枯坐灯前，命令族内的宗、祝为自己祈死，并不住地默念道：“国君骄横奢侈而又战胜强敌，是上天故意要让他放纵。灾难即将到来，唯愿那些爱我的人都能够诅咒我，让我快快死去，以保佑宗族无及于难，这将是范氏之福！”

到第二年的六月初九日，鄢陵之战结束一年后，一心求死的士燮终于与世长辞。而就在他去世半年后，也就是晋厉公七年（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场蓄势多年的政治剧变终于爆发。这场巨变就像是一个被释放的恶魔，所到之处人人战栗，几乎将所有的强卿家族都席卷其中。而释放出这个魔鬼的不是别人，正是士燮所一直信赖的战友，有着“从善如流”美名的中军将来书。

一家三卿

在有限的史料中，我们所看到来书是一名享有盛誉的君子，他既有“从善不从众”的美名，也有“实其言必长晋国”的智慧，更有“诸侯亲之、戎狄怀之”的伟大德行，不仅同袍战友会对其赞誉有加，就连他的对手多年后回忆往事的时候，仍然对其心存敬畏。

他还是一个强势的执政者，在近三十年的从政生涯中，总能在最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策，使得他的个人经历很少会出现致命的污点。在全军皆溃的邲之战中，他一语戳破郑国意图挑起晋楚战争的狼子野心，也曾参与了后来包括鞏之战在内的几次重要战争，立下过汗马功劳。

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年），一直在下军位置上徘徊不前的栾书，一跃被擢升为中军将，创造了一个轰动一时的职场励志传奇。此后的十五年间，他又以大国执政的身份，通过两次和平会盟、两次重要会战，先后战胜了秦、楚两大劲敌，一举将晋国这辆吱呀作响的“老爷车”从幽深的谷底送上了扶摇直上的复霸之路。

如果他的人生之路到此为止，或是执政生涯到此结束，那么他的一切光辉事迹定然会永载史册，没有人敢质疑半分。可就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利欲熏心，在最后几年晚节不保，制造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惨案，让原本伟岸的形象就此惨淡谢幕。其中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由他与“三郤”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演化出的一场政治事变——车辕之役。

所谓“三郤”，指的是晋厉公时期郤氏家族出任卿职的三名大夫郤锜、郤犇和郤至。其中的郤锜前文已有介绍，他是晋景公时期正卿郤克（郤献子）的儿子，因封邑在驹，故而又被称为驹伯。郤犇、郤至出自郤氏旁支的步氏，追溯其立家者应该是与郤芮同辈的郤义。

郤义是晋惠公时期重臣郤芮的同辈兄弟，本人在史料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迹，他的儿子步扬也只是在晋惠公时期担任过国君御戎。步扬身后留下了三个儿子，分别是步招、郤犇和蒲城鹄居。其中的步招大概是嫡子，直接继承其家业，在令狐之战时曾担任赵盾的御戎。郤犇因受封于苦（苦成）邑，因此常被人称为“苦成叔子”，又因单字一个“家”字，被称为“苦成叔

家”，论辈分算是郤克的堂兄弟、郤锜的堂叔。蒲城鹄居虽无事迹可查，但名号却很响亮，大概是受封于蒲邑，算是一个如闲云野鹤一般的人物。蒲城鹄居又有两个儿子郤至和步毅。其中的郤至谥为昭子，又因受封于温邑又被人称为“温季子”，他与郤犇是亲叔侄，与郤锜是堂兄弟关系。至于步毅，则是在鄢陵之战中担任过晋厉公御戎，与栾书的幼子栾针共同辅佐晋厉公。

晋景公在位时期大力抑制卿族势力，但相对而言，其对待公族的态度还算温和，在位期间对栾氏、郤氏等世卿，以及韩厥、伯宗等出自公族的大夫都颇为倚重。受晋景公任人政策的影响，郤氏家族在晋厉公时期再次迎来了一个爆发期。

首先是郤克去世的时候，郤锜沿袭父职进入卿列担任下军将，在十二卿中排名第五。大约是郤克在卸任前有所安排，等到荀息去世后，郤锜顺利顶替了智氏在“执政方阵”中的位置，成为上军佐，而他的堂兄弟郤至也在不久后得以进入八卿序列。由此也就形成了晋厉公时期的八卿序列，分别是：

栾书、荀庚，士燮、郤锜；韩厥、智罃，赵旃、郤至。

三年之后，到鄢陵之战爆发前（前575年），荀庚、赵旃相继卸任，荀庚的儿子荀偃接任上军佐，郤锜的位置向前顺延成为上军将。赵旃卸位后空缺的位置并没有留给邯郸赵氏后人，而是让郤犇接替。八卿序列又变为：

栾书、士燮，郤锜、荀偃；韩厥、智罃，郤犇、郤至。

到此为止，四军八卿的位置被栾、范、郤、中行、韩、智六个家族瓜分。其中郤氏家族独得三席，几乎占据了最高决策层的半壁江山，而郤锜的地位更是仅次于栾书和士燮，在八卿之中排名第三。

鄢陵之战次年（前574年），中军佐士燮在恐惧中谢幕。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八卿序列会再次出现调整，从而形成新的内阁排序：

栾书、郤锜，荀偃、士匄；韩厥、智罃，郤犨、郤至。

郤锜成为地位仅次于栾书的中军佐，由此“三郤”的权势也就进入了极盛时期。

猎杀三郤

晋景公在位时期，郤氏和栾氏是互相扶持的亲密战友。郤克卸任之前，将一直不得志的栾书从下军将的位置直接拔擢到了中军将，而栾书也投桃报李，顺利地将郤锜送入了前四卿的位置，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谓不亲密。然而也不知是从何时起，栾、郤两家的关系急转直下，最后竟演变到了互相残杀的地步。

统观《左传》《国语》中的记载，“车辕之役”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栾书对郤至的嫉妒所起。

鄢陵之战爆发时，楚军凌晨直压营前列开阵势，完全没有给晋军留下任何布阵空间。面对楚军的压迫，栾书主张采取固垒以待的保守方针，打算等齐、鲁等国的援兵赶到之后再与楚军展开决战。然担任新军佐的郤至却颇有些不以为然，他列举了楚军必败的几个理由，由此获得了晋厉公的认可。但与此同时，郤至也因犯下了以下掩上的致命错误，招致栾书的怨恨。

战争结束后，栾书便开始算计郤至。他首先在国内制造对郤至不利的舆论，以引起国君的猜忌。不久后，晋厉公就听到了楚国战俘公子茂的供词，说这场战争之所以会爆发，都是因为郤至密召楚王来犯的结果。而且郤至根本就不愿意拥护晋厉公的领导，反而想借机发难除掉晋厉公并拥立孙周为

君，所以才在诸侯援军未至、郤犇与栾黶在东方乞师未归的时候贸然挑起战争。

晋厉公对此将信将疑，便找来栾书问话。栾书对这些传言不但没有提出任何疑议，反而还添油加醋地将郤至在战场上与敌方使者来往的细节摆了出来，以进一步增强国君的疑虑。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一个建议，让晋厉公派人到成周去监视孙周，以确认郤至是不是真的跟他有所往来。

栾书所提到的孙周，是晋厉公的一个远房亲戚，其祖父乃是晋襄公的次子、晋灵公的弟弟公子捷，算起来跟晋厉公也算是三代之外的旁系血亲了。不过依照当时的情形来看，晋国公室枝叶凋零，一旦晋厉公出现意外，这个八竿子才能打得到的亲戚却又是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当栾书提到“孙周”这个名字，晋厉公难免会提高警惕，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对郤至的忠诚产生了怀疑。

栾书在晋厉公面前煽风点火的同时，也早早地做出了两手安排。一方面他鼓动晋厉公派郤至到成周去献捷，另一方面则派人秘密前往成周，安排孙周接见郤至。郤至自以为光明磊落，到了成周之后对约访之人来者不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中了栾书的圈套。晋厉公派人前去打探，果然就听到两人会面的消息，于是便对郤至动了杀机。

郤至对此浑然不知，回来之后依旧不改过去的行事作风。在后来一次田猎活动中，晋厉公先和妇人们一起搭弓过了把瘾，然后才让大夫们上场打猎。对于晋厉公娇宠嬖妾、轻慢大夫的举动，郤至本就心有不悦，偏偏当他打了一头野猪准备献给国君的时候，寺人孟张又将猎物夺走占为己有，更加将他激怒。郤至于是二话不说，把孟张射杀于当场，气得晋厉公急叫：“季子欺寡人太甚！”

田猎事件之后，猎杀郤氏的计划便进入了倒计时。被列入猎杀对象的除了郤至之外，还有他的同宗叔伯、担任新军将的苦城叔子郤犇，以及郤克的嫡子、郤至的堂兄弟，彼时担任中军佐的郤锜。

承担猎杀计划的也有三个人，分别是胥童、夷阳五和长鱼矫。这其中的夷阳五因被郤锜抢夺田土而怨恨郤氏；长鱼矫则是与郤犇争田，因力有不逮不仅丢掉了土地，自己连同父母妻儿还被郤犇绑在车辕上示众，受到了极大的羞辱。

值得一提的是胥童，他是晋文公时名臣胥臣的后代，其祖父胥甲、父亲胥克在赵盾时期都曾位列六卿，但皆未得善终。胥甲因与赵穿扰乱军行，受赵盾排挤被发配到了卫国；而胥克则是在赵盾去世后，被郤缺以蛊疾为由废去了卿位，将腾出来的位置安排给了赵朔。经过这么两次事件，胥氏家族从此没落，胥童更是因此无缘卿位，自然对郤、赵两家恨之入骨。冤有头债有主，如今赵氏已然衰落，胥童便将复仇的目标锁定在了郤氏，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三个人既是晋厉公的“外嬖”，又与三郤有旧怨而存复仇之志，因此积极促成晋厉公的“倒郤”运动。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胥童和夷阳五召集了八百名甲士，准备强攻郤氏府邸，可长鱼矫却轻描淡写地说道：“想要除掉郤氏，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只要国君给我找一名勇士即可。”晋厉公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还是听其言，安排清沸魑供其调遣。

十二月二十六日，长鱼矫和清沸魑假装闹纠纷，在郤氏门外互相撕扯并抽戈相向，吵嚷着要找郤氏分辨。三郤只顾着防备胥童的八百甲士，对这二人并未起戒心，因此便如往常一般认真地询问案情，仔细梳理来龙去脉；在

问话完毕后又退到亭榭中，就案情细节进行商讨，分辨是非曲直，准备做出最终判决，全然不知危险即将到来。

正当他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长鱼矫手持长戈悄悄地摸了过来，乘其不备将郤锜、郤犇当场刺杀。郤至一看情形不对，急忙跳上车去准备逃跑，结果又被长鱼矫追上，被他从车上拉了下来，血溅当场。

一家三卿一日之间尽数毙命，其尸体也被陈列在朝堂上作为警示。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屹立不倒的郤氏家族，就以这样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以郤氏百年家族长盛不衰的煊赫，最后竟然栽倒在一个受过“车辕之辱”的小人物手中，真让人百感交集，因此这次事变就被称作“车辕之役”。

厉公之死

不过，事情到了这里还远没有结束。

车辕之役爆发后，参与倒郤运动的胥童、长鱼矫等人尤感不够过瘾，干脆列兵持甲，在朝堂上公然将当朝执政栾书以及他的副手荀偃全部劫持，想让晋厉公把他们通通干掉。晋厉公看了看三郤的尸体，又看了看脸色煞白的栾书和荀偃，心中有所犹豫，就推辞说：“一日之内便有三卿横尸朝堂，寡人不忍心再开杀戒了。”

长鱼矫正色道：“国君不忍于人，可别人却未必如国君这般心善。”眼见晋厉公心思笃定，不愿节外生枝，他便又补充说：“既然君上心意已决，而臣下也做出了逼迫国君的举动，自知难逃刑罚，故请求逃亡国外。”说罢便愤然离开，从此浪迹天涯。

事后，晋厉公特别派人向栾书和荀偃道歉：“寡人有讨于郤氏，如今他们都已伏诛，这件事也就过去了。至于朝堂被劫的事情，并非寡人本意，希望大夫不要放在心上，两位还是各复其位继续为国尽力吧！”

栾书、荀偃命悬一线，哪儿还敢计较？他们急忙向使者再拜稽首并回答说：“国君讨伐有罪之人而能免臣一死，实在是天大的恩惠，臣唯有万死以报君恩，哪里还敢有所怨言呢？”

话虽如此，栾书到底还是心有余悸。当初他陷害郤至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同样的罪责竟然会落到自己头上。这次的事情虽然有惊无险，但也给他敲响了警钟，让他知道国君的动作不会到此为止。特别是在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候，参与劫持事件的胥童并未随长鱼矫流亡，反而堂而皇之地被晋厉公任命为卿，不免让栾书对国君的真实用心感到怀疑。

后来的事态发展也正如长鱼矫所言，“君不忍人，人将忍君”，君臣之间的利益边界一旦被划破，就再也难以弥补了。在这种忐忑心情的驱使下，一个惊天的计划开始在栾书的心中酝酿。

不久之后，当晋厉公到大夫匠丽氏家中游玩的时候，栾书和荀偃突然发难，在途中将其劫持。车辕之役一个月后，也就是这年的闰月二十九日，二人将国君宠臣胥童杀死，可对于如何处理晋厉公这样一个烫手山芋，却没了主意。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要找一个有贤名的人来做主，于是一再召请士匄（士燮之子）、韩厥前来谋划，但二人都拒不出面。韩厥更是语气强硬地回应说：“靠弑君来建立威信，就算是成功了也会身负恶名，这种事我做不到。想当初赵氏对我有养育之恩，即便如此，当赵庄姬想要除掉赵同、赵括的时候，我也能顶住压力不出兵。（言外之意是：二位对我韩厥既无养育之恩，

又无知遇之德，凭什么就认为我一定会帮助你们？）你们几位既然连国君都不愿意侍奉，又哪里能用得着我韩厥呢？”

荀偃闻听此言勃然大怒，当即准备发兵攻打韩氏。栾书担心斗争扩大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急忙劝阻说：“韩厥为人果断刚毅，办事密不透风，说话逻辑性强，还能赢得百姓的支持。所谓犯顺不祥、伐果不克，打他的主意难有胜算，我看还是算了吧！”

经过几天的筹谋，栾书、荀偃用尽威逼利诱的各种手段，终于物色到了一个敢于担当弑君罪名的人，这个人是荀氏旁支、程氏开创者荀驸的后人，名叫程滑。到次年周历正月初五日，执掌晋国仅七年的晋厉公被程滑所杀，死后还被他们以薄车一乘草草地葬于旧都翼城东门之外的一处荒地上，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

第二节 三郤之罪

伯宗之死

经过几个月的腥风血雨，这场蓄势多年，波及几乎所有上层人物的政治事变，以弑一君、杀四卿（包括胥童）、亡一大夫的结局惨烈收场，给国人造成的心理冲击显然要大大超过之前的历次事件。

按照《左传》及《国语》“成王败寇”的一贯思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也往往会沦为失德无良的代表，因此郤氏家族尽管遭人暗算，晋厉公虽然死得不明不白，但若从史书中观其行状却也并非全然冤屈。书中列举了大量有关晋厉公及“三郤”的罪状，从而为他们一朝灭顶的事实找到了恰当的依据。

“三郤”在晋厉公时期表现极为活跃，除了跟长鱼矫、夷阳五等人有恩怨外，他们被指控的最为严厉的一条罪状莫过于陷害忠良了。被三郤陷害致死的大夫名叫伯宗，鄢陵之战时在楼车下为楚共王解说的晋国亡臣伯州犁便是他的儿子。

根据史料记载，伯宗祖上有一个叫公孙伯纠的人，因此后人以伯为氏，是晋国正宗的公族。又因为伯州犁有一个儿子叫作郤宛，人们据此推定伯氏有可能是郤氏的一个旁支，或许跟郤称还有一定的关系。

伯宗是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智者，颇受国君的赏识，特别是邲之战后晋国内忧外困，晋景公但有重大决策总要听取伯宗的意见。比如晋景公六年（前594年）楚军包围宋国时，伯宗创造了如“鞭长莫及”“藏污纳垢”“瑾瑜匿瑕”等成语，力劝国君要懂得隐忍；同年，潞氏执政酆舒杀害晋景公的姐姐，又是伯宗提出“狄有五罪”，劝说晋景公要抓住时机一举剿灭赤狄。

后来到晋景公十五年（前585年）的时候，梁山发生崩塌的异象，晋景公首先想到的也是传召伯宗进宫商议对策。

但以伯宗的才华与智识，却不是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当士会因儿子士燮“一日三掩人于朝”而对其大加责罚的时候，伯宗对此种情况不仅丝毫不以为意，还颇有些沾沾自喜。

《国语》中就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次伯宗下朝回家时面露喜色，妻子问起原因，他洋洋得意地回答说：“今天在朝上对答，大夫们都称赞我像阳处父一样机智善辩。”

他的妻子听后默然应道：“阳处父为人华而不实，喜欢高谈阔论且缺乏谋略，因此才遭遇杀身之祸。大夫们拿你跟他比，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得意的？”

伯宗很不高兴，便想证明给妻子看，就说：“你就这么不相信我？过几天我请大夫们来家里做客，到时候你听一听就知道了。”

妻子看他心意已决，只能依着他操办了一场宴会。席间伯宗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夸夸其谈，在场的众人也都随声附和，对其赞不绝口。他的妻子在一旁静静观察，看到伯宗面对这么一群如狼似虎的政客，不知收敛性情、公然卖弄学识，她不由得为丈夫的安危更感担忧，于是语重心长地劝说道：“那些大夫的确不如你。可我也听说，自古以来人们都会嫉妒那些才智高于自己的贤者，你地位不如人却处处显露才华，我怕将来会有人算计你！”

伯宗早就被虚荣心冲昏了头脑，听了这些话依然我行我素。妻子实在担心，便在每次上朝之前都反复提醒：“俗话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

没有人会喜欢别人凌驾于自己头上，你这个人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还是小心为好。”

到最后看伯宗劝不动，她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坚持要给儿子准备一条退路。伯宗于是找到了贤者毕阳，后来也正是在毕阳的保护下，伯州犁才顺利逃到楚国。

实际上不仅仅是伯宗本人，他的后人也大都是这样一种性格，他们有才华有智谋，却总是事事出头而不懂得自我保护。从之后的历史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伯宗的儿子伯州犁、孙子郤宛、曾孙伯嚭都曾位极人臣，在楚国和极盛时期的吴国担任重要职务，可最终的结局都很凄惨。伯宗自然也无法逃脱这个宿命，终于在晋厉公五年（前576年）遭人陷害而死，而施害者据说正是与其同宗的三郤。

伯宗的死，让同为晋景公一朝受到拔擢的公族韩厥产生了兔死狐悲之感，他不无愤慨地说道：“善人本是天地的纲纪，却总是落得凄惨下场。三郤如此逆天行事，恐怕迟早也会走向灭亡吧！”

赵文子冠

除此之外，史料中还列举了大量事例来描摹三郤的性格特征，以证明他们的灭亡纯属咎由自取，其中最为生动的是一个叫《赵文子冠》的故事。这件事发生在车辕之役前，其中记述的是赵氏孤儿赵武举行了冠礼之后依次去拜访列卿大夫，诸位大夫对其进行劝诫勉励的一些言论。

在拜见栾书的时候，对方盛赞赵武一表人才，并回顾往事勉励道：“当年我有幸侍奉庄主（赵朔谥号庄子），他英俊潇洒、气度非凡，只可惜在实务方面稍有欠缺，希望你以后能在务实方面多多努力！”

士燮则三句不离戒惧，对他说：“希望你以后能戒骄戒躁，时刻保持警惕之心。贤能的人受到宠信会更加警惕，只有智慧不足的人才会恃宠而骄。自古以来，有雄心的君主会奖赏那些敢于进谏的臣子，而贪图享乐的则会惩罚他们。古时圣王在建立德政之后，会专门听取百姓的意见，考察百官的职事。为了能让自己不受蒙蔽，他们会让乐师诵读前代的箴言，让在列的百官时时献诗讽谏，还会专门到民间采风收集舆论动态，一旦有了错处就及时纠正。这些都是保持戒惧具体实用的方法，多学习一些总会对你有帮助。”

韩厥作为赵武的保护人，主要在为人处世上提出建议：“学会保持警惕就是成人了，而成为成人的关键在于亲近善人。如果你一开始就与善人打交道，善人再推荐善人，不善的人就无法靠近你了；如果一开始就跟不善之人混在一起，物以类聚，很快就没有善人再与你亲近了。这就好比草木的生长一样，同类总是聚集在一起。人戴上冠冕，就好像是宫室有了墙壁，只要时时勤拂拭，不要让污秽聚集就足够了。”

曾在邲之战中被楚人俘虏的荀罍对赵武也寄予厚望：“好好努力吧！作为成子（赵衰）、宣子（赵盾）的后人，如果到老还只是一名大夫，那将会是你的耻辱。当年成子善文、宣子忠诚，二人勤勉事君，终于成就大功。你要能集先祖之大成，将来必定能取得成功。”

栾书工作务实，士燮但求谨慎，韩厥善于治事，荀罍更加通达，四个人因应自身的人生感悟对赵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此大夫张老曾总结说：“不错！栾伯（栾书）的话可以让你不断精进，范叔（士燮）的教诲可以恢宏你的德行，韩子（韩厥）的告诫能助你成就事业。有了这些人的谆谆教导，再加上智子（荀罍）所提到的先主庇护，基础已经完备，以后能否成就事业就要看你自己的志向了。”

但是当赵武再去拜见三郤的时候，整个画风就变得不一样了。他们非但没有要勉励的意思，反而说话夹枪带棒，丝毫都不顾及听者的感受。

比如在面见郤锜的时候，对方先是夸了一句“美哉”，紧接着便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年轻人比不上老者的地方还有很多啊！”郤犇则漫不经心地说道：“现在想要当官的年轻人多的是，你说我该怎么安排你呢？”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郤至，他酸溜溜地说了一句：“尽管比不上旁人，退而求其次还是可以的。”

张老在评价这番言论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三郤说的那些不过是将死之人的胡言乱语罢了，又何须理会呢？”

悲情管姜

这段故事明晰地勾勒了三郤的脸谱化形象：郤锜倚老卖老，郤犇贪得无厌，郤至傲慢自大。这样的刻画尽管生动，却仍不足以勾起人们的憎恶情绪，为了达到劝人向善的奇效，还需要列出具体的事例来供人们鞭挞。

其中，郤锜尽管是郤氏家族的宗主，留下的事迹却是最少的。在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他都仅仅是充当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唯一一次以他为主角的论述，出现在晋厉公三年（前578年）。

当时晋国打算召集诸侯伐秦，郤锜作为使者被派往鲁国请求出兵。据说在这次外交活动中，郤锜的表现很不庄重，用书中的原话说是“将事不敬”，因而惹得孟孙氏宗主仲孙蔑（孟献子）大怒，说他肆意妄为，完全不把国君的诏命放在心上，更不把鲁国的君臣放在眼里，这种人是活不久的。

与缺乏存在感的郤锜比起来，身为长辈的郤犇可以说是劣迹斑斑、罪行昭昭。有关他的罪状主要有三件，第一件发生在晋厉公元年（前580年），是

受命到鲁国去缔结盟约时态度傲慢且强“娶”豪夺的事情。

那次鲁国之行，郤犇全然把公事撇到一边，无端向鲁国大夫公孙婴齐（子叔声伯）求娶妻子，而他所要求娶的女子正是公孙婴齐同母异父的妹妹。这名女子因出自齐国大夫管于奚之后，在这里我们姑且将其称作管姜。

说起管姜的身世，还不得不提到一件旧事。多年以前，鲁文公的公子、鲁宣公的同母弟叔肸与一个不知名的女子未婚同居生了公孙婴齐。叔肸想纳这位女子为妻，却遭到他的嫂嫂、鲁宣公之妻穆姜的强烈反对。

后来这名女子背井离乡流落到齐国，嫁给了齐国大夫管于奚，这才生下了管姜以及公孙婴齐的另一个弟弟。可也怪她命不好，在生下两个孩子后不久就守了寡，生活日日不如意，便只好托人将两个孩子送回鲁国。

彼时叔肸已经去世，公孙婴齐便代父收养了这两个孩子。等他们长大了，就安排弟弟做了大夫，让妹妹管姜嫁给了鲁国大夫施孝叔，也算是给他们寻到了好的归宿。

郤犇求娶妻子这件事之所以让人感到不可理喻，原因就在于，管姜当时早已嫁为人妇，夫妻二人琴瑟和谐，哪里有夺人所爱的道理？

更何况，公孙婴齐乃是鲁国上卿，既有公孙的身份，又是具有崇高的政治声望，而郤犇当时在晋国只是一名普通大夫，在列国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并不比公孙婴齐高。他仅仅仗着晋国使者的身份，就让这样一个久负盛名的君子做有违礼法的事，等于是在公然欺侮鲁国上卿，自然也在鲁国上层掀起了轩然大波。

可郤犇是骄纵惯了的人，完全不顾及此事会造成什么影响，无论公孙婴齐如何劝解，都始终不肯退让半分。无奈之下，公孙婴齐只好忍痛“棒打鸳鸯”。

鸯”，硬着头皮把自己的妹妹要了回来，再嫁给了郤犇才算了事。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一段后话。管姜在临别时问她的前夫：“鸟兽还不忍心丢弃配偶，你就这么忍心让我走吗？”施氏无奈地回答说：“我总不能因此和你殉情或者逃亡吧？”管姜听了之后以泪洗面，只好跟随郤犇到了晋国。

等到车辕之役爆发后，管姜带着在晋国生的两个孩子回国，施孝叔亲自到黄河边上迎接。夫妻离散七年之久，见面之后本该互致安慰才对，可施孝叔却突然开始显现英雄气，当场就将这两个孩子投进黄河里淹死了。

管姜心如死灰，静静地看着这一切，随后对施孝叔说道：“当年你不能保护自己的爱人而让她离开，现在又不能爱护别人的孤儿而将他们杀掉，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说罢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施氏。

关于郤犇的第二桩罪发生在晋厉公四年（前577年）。早先卫国大夫孙林父与国君不和，逃到晋国避难，七年之后卫定公出访晋国，晋厉公欲让他们二人见面，可卫定公却坚决不肯听从，事情也只能作罢。但到后来，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晋厉公突然让郤犇出面，硬是把孙林父送回了卫国。在这次出访活动中，卫定公设享礼款待郤犇，却不料郤犇的反应十分冷淡。当时负责襄礼的宁殖（宁惠子）就说：“苦成叔子恐怕命不久矣！享礼是用来‘观威仪、省祸福’的，苦成叔子一脸傲慢的样子，这难道不是取祸之道吗？”

郤犇乱鲁

如果说以上两件事还都是小节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件事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他的行为无状了。

话说鄢陵之战前（前575年），晋国决定讨伐郑国之时，曾派郤犍出使齐、卫，栾黶出使鲁国，向东方列国请求援军。但由于楚军压营列阵，晋厉公听从郤至之言提前开战，致使诸侯联军都未能及时赶到增援。

战争结束后，齐、卫两国军队还是按照约定日期赶到，可他们左等右等，却迟迟未能等到鲁国派来的军队。原来此时的鲁国也正处在卿族内斗的旋涡中，鲁成公为了处置危机一再延迟出兵，这才耽误了时日。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也简单。鲁成公在位时期，出自三桓的季孙氏宗主季孙行父（季文子）、孟孙氏宗主仲孙蔑联合臧叔许（臧宣叔）把持军政大权，让同样出自三桓的叔孙氏宗主叔孙侨如（叔孙宣伯）心存不满，就想要除掉其他几家独揽大权。后来叔孙侨如与鲁成公的母亲穆姜有了私情，便试图通过裙带关系影响国君决策，从而达成自己的目的。穆姜陷入黄昏恋无法自拔，对叔孙侨如自然是言听计从。

鄢陵之战爆发前，鲁成公接到伐郑的指令，便按部就班地带兵出征，谁知在送行的时候，母亲竟突然提出要求，让他除掉季孙氏和孟孙氏。鲁成公不愿听从，便敷衍说晋国正在危难之中，得先帮他们解决了困难，回头再来商议国内的事。穆姜听出了儿子的言外之意，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这时刚巧看到鲁成公的庶弟公子偃和公子鉏从旁走过，穆姜就指着他们说：“你不同意不要紧，别忘了他们也都是有继承权的。”

如此赤裸裸的威胁竟然出自母亲之口，鲁成公真为她的执迷不悟感到震惊。言者或许只是一时气话，闻者却不能等闲视之，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鲁成公假意按照原定计划出兵，但在抵达一个叫作坏隤的地方时，特意停下来安排仲孙蔑回去加固宫室的防卫，并增派兵力驻守。等一切安排妥当去与晋军会合的时候，已经比预定时间晚了许多。

穆姜的这一举动叔孙氏不知事先是否知晓，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让国君与孟孙、季孙两家的关系更紧密了。窗户纸已经捅破，想要再和睦相处已经不可能，叔孙侨如心有不甘，干脆孤注一掷，真的开始打起了国君的主意。

到今年秋天，诸侯在沙随举行盟会。叔孙侨如特地派人带着礼品找到了郤犇，让他向晋厉公进言，说鲁侯之所以在这场战事中迟到，是因为想要坐山观虎斗，只等晋楚两家打出个胜负来，正好前往依附胜利者。

这套说辞倒是很符合鲁国一贯做法，因此对于郤犇的转述，晋厉公丝毫都没有怀疑。结果当鲁成公兴致勃勃地赶来，准备与诸侯一起商议伐郑事务时，却实打实地吃了一个闭门羹。

尽管受到冷落，鲁成公还是得出兵跟随晋国伐郑。而这一次穆姜又故技重演，鲁成公再次设守后行，又耽搁了好些时日。更让情况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出兵延误没有跟上大部队，当他们抵达郑国东部的时候，诸侯联军已经移军西部驻扎，鲁国军队不敢直接从郑国境内通过，只好停留在督扬等待接应。为了应对可能受到的责问，在等待接应的那四天里，鲁军统帅公孙婴齐水米未进。等到晋国使者来了，也是恭敬地等他们都吃饱喝足了，自己才去用餐。但可惜的是，无论他表现得如何诚恳，终究也抵挡不住背后有人捅刀子。

这次，叔孙侨如又派人联络郤犇，对他晓以利害，说：“鲁国有季孙氏和孟孙氏，就好比晋国有栾氏和范氏，一国的政令都出自他们之手。可是他们如今却商量说：‘晋国的政令出自不同的家族，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倒不如跟着齐国和楚国，哪怕是亡国，也总好过跟着晋国像个无头苍蝇似的乱撞好。’如果晋国还想要在鲁国行使意志，就把季孙行父扣下杀掉，我在

国内杀掉仲孙蔑。只要除掉这两家的势力，从此以后鲁国由我掌管，定然会一心一意侍奉晋国。有了鲁国作为表率，其他的小国也定然不敢造次。可如果放季孙行父回国，鲁国必然会叛晋而去的。”

这番话既是在明示季孙氏对晋国的不忠，同时似乎也是在以己度人暗示郤犇：你之所以壮志难酬无法施展抱负，就是因为有像栾氏、范氏这样的家族压制着，既然你我同病相怜，那就应该互相扶助才是啊！或许是这番话的确刺痛了郤犇，果然他又在背后搞了不少小动作，并于当年九月在军中逮捕了前来助阵的季孙行父。

国家执政久滞不归，让本来就内心忐忑的鲁成公更加不知所措了。他特别委任公孙婴齐为全权大使前往晋国，请求释放季孙氏，而自己则心焦如焚地在郚地等待消息。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郤犇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的企图，还试图用高官厚禄、城池土地来收买公孙婴齐，希望他回去之后能够配合叔孙氏刺杀仲孙蔑。

公孙婴齐在列国中的声名可不是凭空而来的，怎能为这点蝇头小利就置国家大义于不顾呢？他不仅不肯接受郤犇的馈赠，还转而向士燮寻求帮助，通过士燮向执政栾书说情，才终于将季孙行父带回了鲁国。

这么一来，叔孙侨如的计谋完全大白于天下，接下来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季孙回国之后很快就将罪魁祸首叔孙侨如放逐到了齐国，并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叔孙穆子）接回来继承家业。就这样，一场如闹剧般的政治风波，在栾书、士燮的干预下得以平息，而郤犇则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最后为挽回颜面不得不接受季孙氏的盟约。

第三节 大预言家

勇而知礼

与郤犇和郤锜的蛮横不同，郤至给人们留下的总体印象还是很清正的。或许是因为郤至为人豪迈、野心太大，根本不屑于小打小闹，因此唯一一次出现在“头条新闻”上便捅破了天。

事情发生在晋厉公元年（前580年），郤至与坐镇王城的天下共主争夺鄆田（今河南武陟一带），且态度十分强横。天子争抢不过，只好派大夫刘康公和单襄公气势汹汹地到晋国去讨要说法。

鄆田乃是温地的别邑，而温地又是郤至的食邑，因此在郤至看来，鄆田归属自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便理直气壮地叫板说：“温地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封邑，怎么能够随意丢弃呢？”

王使引经据典反驳说：“当初周武王克商，将天下土地分封诸侯，苏忿生正是凭借这块土地而成为王室司寇的。后来苏氏投奔狄人，又因与狄人有隙而转奔卫国，从而失去了这块土地。到周襄王时，为了慰劳晋文公勤王之功，将苏氏故地赐予晋国，这是温地归属于晋国的开始。自此以后，温地曾先后归属于狐氏和阳氏，最后才落到您的头上，怎么能说一直是您的土地呢？况且说，要论起‘自古以来’，那么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属官的封地，又能有你什么事呢？”

听完王使这番话，晋厉公恐怕早被绕晕了，干脆就劝说郤至放弃算了。至于郤至是如何辩解的，这件事究竟如何收场，后文都没有交代，我们自然也不敢随意猜测。但总而言之，郤至毕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场纠纷也没有酿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因此，要单看这件事的话，郤至虽说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可终归还是能够讲得通道理的。而如果要结合其他事例来看，似乎还会给人产生一个感觉，郤至不仅没有表现出郤锜和郤犇那样的强横，反而还有些可爱。

这几件事在本书其他部分都有过介绍。比如第一次弭兵会盟后，晋楚双方互派使节参加盟誓，郤至作为晋国方面的代表到楚国聘问，其间司马子反傲慢无礼，而郤至却表现得谦恭得体。鄢陵之战爆发时，郤至先是以“伤国君有刑”为由放过了郑成公，此后又在遇到楚共王时“免胄而趋风”，不仅受到了楚共王的赞许，还得到了《国语》中“君子”极高的评价，说他是“勇而知礼”。

事实上，“勇而知礼”不仅仅是郤至的行事原则，更是深深地铭刻在他的骨子里的人生信仰。当车辕之役即将爆发时，“三郤”实际上早就听到了风声，而且还就此进行过一次密谈。当时郤锜暴跳如雷，扬言要尽起郤氏宗族和党羽，与国君拼个鱼死网破。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郤至提出了三个观点：

第一，大丈夫立于天地间，所依靠者无非信、智、勇三个字。守信的人不会背叛国君，智慧的人不会残害百姓，勇武的人不会犯上作乱。《国语》中的表述略有不同，说是勇武的人不会作乱，智慧的人不会欺诈，仁义的人不会结党。总体上都是在说，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不能丢弃做人的原则为所欲为。否则一旦做出叛逆的举动，最终性命不保不说，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世人唾骂，落得个人神共弃的下场，这是很不明智的。

第二，郤氏家族之所以能有今天这般壮大，全是仰仗国君的恩赐，你所有的族人，所有的家产，所有的私人武装都概莫能外。如果仅仅因为听到了一些风吹草动，就仗着国君的赐予而反叛国君，那跟白眼狼有什么区别？这

不就是在变相地告诉世人，我们郤氏就是对国君不忠吗？与其如此，倒不如慨然处之，好歹也能让劳苦大众免于兵祸，也算是给自己死后留下一个好名声吧。

第三，“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国君想要杀掉臣子，那是他的权力。如果我们的确有罪，国君能让我们活到今天已经算是天大的恩赐；反之如果我们无罪而被诛杀，国君也会因此而众叛亲离，国家也会因此而不得安宁。国君要是连这些都不计较了，那我们徒劳挣扎又有什么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郤至对礼的坚守简直到了一种执迷不悟的程度。他恪守忠信礼义的原则，就算是在战场上也不忘向他的敌人致敬，即便是国君的“屠龙刀”都已经杀上门来了，他还是一如既往不愿因此做出叛逆之举，足见他阔达恢宏的人生气度，这样的坚守不能不让人为之动容。

按理来说，像郤至这样勇而知礼、仁而好义，集万千优点于一身的人，这个世界也的确不该辜负他。尤其是按照《左传》的叙事逻辑，知礼的人都该有好报才是，为什么偏偏郤至就不能善终呢？史料中同样对此给出了合乎情理的答案。

民恶其上

郤至最大的问题，也是士会、士燮父子尽量避免陷入的泥潭，那就是恃才傲物。他与伯宗一样，都是天资聪颖且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但却都不是合格的政治家。

他个性张扬、为人洒脱，总认为人生就应该快意恩仇，活得潇潇洒洒，要靠真才实学攀登人生巅峰，而不是整日里钩心斗角、尔虞我诈，靠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去博取荣华富贵。

他不仅在战场上炫耀才华、力压栾书，在成周献捷时也毫不掩饰对栾书的轻蔑态度。他曾宣称晋军之所以能够在鄢陵取胜，全是有赖自己的智谋过人，而栾书和士燮不过是两个庸人，身为主将不知方略，差点坐失败楚的良机。

他早已把正卿的位置当成了囊中之物，为了给自己登临执政之位提前造势，郤至还在成周四处活动来延揽声誉。他曾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说：“我郤至如今虽然只是新军佐，在八个人里排位最后，可要论起才华来，我要排第二，就绝对没有人敢排第一，中军将的位置舍我其谁？晋国若是用了我郤至做执政，什么楚国、越国哪里还敢嚣张，肯定夹着尾巴年年来晋国朝拜。”

鄢陵一战晋国一扫过去的阴霾，一战打出了大国雄风，而郤至又居功至伟，在其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些龟缩一隅浑浑噩噩的天子近臣们早已对其趋之若鹜。郤至刚刚出现在天子的朝堂上，王城里就掀起了一阵旋风，甚至就连天子卿士王叔陈生都对他赞誉有加，逢人便说：“郤至这人可了不得，将来一定能够执掌晋国大权，而且在他的执掌下，晋国必定会走向更大的辉煌。”他还劝说王城的大小贵族们，要趁着郤至没有上位的时候赶紧巴结，以便等他真的执掌晋国了好有所照应。

但在这一片狂热之中，也总有人保持着难得的冷静，要给骄傲自满的郤至泼上一盆冷水，这个人就是邵桓公。当郤至登门拜访并提起自己的志向时，邵桓公曾劝说道：“你的确很贤能，也有成为执政的资质。但我听说，晋国卿位向来是循序提拔的，恐怕您的愿望不会那么快就能实现啊！”

郤至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什么次序不次序的，那不过是唬人玩的罢了。想当年先大夫原轸就是从下军佐的位置提拔为正卿的；赵宣子无尺寸之

功，却也能一步登天；如今的栾伯，也是从下军将的位置直接升为中军主帅。我的才华远高于他们三个人，他们能办到的事情，我卻至一样可以做到，您就瞧着吧！”

邵桓公看他执迷不悟，便也只能点到为止。后来他又将这番话转述给了单襄公，对方也不由得苦笑一声，评价说：“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说的恐怕就是卻至这种人吧。”

单襄公引用了几句谚语和诗句，其中一句“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与伯宗妻子所说的“盗憎主人，民恶其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他说：“圣人之所以推崇谦和礼让，君子之所以不敢恃才傲物，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人都有高人一头的欲望，也都不喜欢别人凌驾于自己之上。你越是想赶超别人，就越会遭到排斥，这都是人之天性。因此真正知礼的人，遇到跟自己地位相同的必定会再三谦让，为的就是不掩盖别人。”

与之类似的还有《尚书》中的一句：“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意思是说，即便是身无长物的普通百姓，也只能亲近而不可居高临下地俯视，否则就会受到百姓的憎恶。圣人正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才将民心放在首位，以求得国家安定，如此方能长久地享有福禄。对待百姓尚且如此，那么为官作宰的时候，就更应该注意谦让了。因此单襄公才说：“被普通人怨恨后果尚且难以预料，更何况是手握实权的侈卿呢？卻至在晋国八卿之中地位最低，却要处处凌驾于其他七人之上，其结果无非是招致这七个人的怨恨。将来他又该如何应对呢？”

佻天不祥

关于卻至为人的第二大缺点，在单襄公看来，是狂妄无知。他对自己“勇而知礼”的名声颇为自得，也曾自夸有三件大功：“三逐楚军之卒，

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在战斗中三次追逐楚军，这是“勇”；遇到楚王必下车快步向前，这是“礼”；能够俘获郑伯却放了他一条生路，这是“仁”。但单襄公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郤至根本没有弄明白所谓的“勇、礼、仁”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中原诸侯讲求礼仪，但礼仪也有国礼和军礼的分别。所谓“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军礼强调果敢刚毅，重视的是纪律，国礼强调爵位尊卑，重视的是名分，在不同的场合要有所区分。如果是在外交场合，对所在国君臣或者来访的使者以国礼相待，这是值得称赞的。但若到了战场上，全军的唯一目标就是消灭敌人、迫使对方屈服，所有脱离了这个中心目标的所谓礼仪都是虚伪的。

具体来说，在战场上“以义死用谓之勇，奉义顺则谓之礼，畜义丰功谓之仁”，为了王道正义这个核心目标的实现而舍生忘死才能称之为“勇”，为了成就大义而严守军法才是“礼”，为了让道义的光辉不断发扬光大而建立功勋才是“仁”。

当全军都在为组织目标奋力拼杀的时候，你放弃了杀敌建功的机会擅自释放郑君，这是“贼”。在战场上与对方国君礼尚往来，那是“弃毅行容”，就是“羞”。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跟仇敌亲近，就是对全军将士生命的不负责任，是为“佻”。

关于这一点，《左传》还曾讲到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年）时，郑宋两国在大棘交战。其间有一个郑国士兵掉到了井里，宋国大夫狂狡发扬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用戟把他拉了上来，不料对方上来以后非但没有表示感谢，还把他给俘虏了。

对于这件事，《左传》中的君子就批评说：“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在战争中杀死敌人才是果敢，能以果敢之心建功立业就是刚毅，能将果敢、刚毅的精神内存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称之为“礼”。狂狡置家国大义于不顾而偏重小节，属于“失礼违命”，被俘也纯属咎由自取。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宋襄公在泓水战场上不听从子鱼的建议，一再申明所谓的“仁义”原则，显然也是有悖于军礼的行为。当然，这都是另外的话题了。

不仅如此，单襄公还指出了郤至的第三个缺点——太过自我。他说：“这次晋国之所以能够取胜，是因为上天憎恶楚国，因此才让晋国打败他们以示惩戒。郤至自以为是靠自己的智谋战胜了楚军，那岂不是在贪天之功吗？而所谓的仁、礼、勇，是成千上万的百姓和普通士卒用他们的血肉筑成的，也不是郤至一个人的功劳。”

这个世界上没有英雄，有的只是恰好站在时代潮头，为时势所造就的幸运儿，以及踩在累累白骨上最终摘取胜利果实的幸存者。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过去几十年来晋国各阶层、几代人共同努力换来的结果，是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无名英雄创造的功业。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如果没有这二十年来的谋篇布局，没有百姓的辛劳付出和将士们挥洒的鲜血，哪怕你长出了三头六臂也无法鼎定乾坤。人们热衷于给予那些凯旋者鲜花和掌声，却并不代表他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包揽所有的荣誉，更不代表人们要对那些死难者的血泪熟视无睹。

郤至在鄢陵之战中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可他若还有那么一点自知之明，能够如鞏之战后各军将佐那般谦和礼让，人们还会顾念其舍生忘死的勇

气而给予他几分尊重。可如果他因为压住了栾书就开始自鸣得意，因为取得了成绩就开始沽名钓誉，其结果只能是“佻天不祥，乘人不义，不祥则天弃之，不义则民叛之”。

因此，单襄公毫不客气地评价说，郤至不仅不懂得“仁、礼、勇”的真实含义，还恬不知耻地玷污了这三个神圣的词汇。所谓“奸仁为佻，奸礼为羞，奸勇为贼”，用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综合以上的评价，单襄公给出了最后的结论：“郤至有佻、羞、贼三桩罪过却还想要上位，这就是典型的刀都已经架到脖子上了竟然还全不自知。要我说啊，他别说升迁了，将来能够保住一命就已经算不错了。到时候恐怕不止郤至，王叔陈生这些拼命巴结他的人，也会跟着遭殃啊！”

观容知心

单襄公对郤氏家族的命运充满了悲观情绪，其预测也并不仅限于此。在后来举行的柯陵会盟上，鲁成公为郤犇干预鲁国内政之事忧虑万分，故而向单襄公大倒苦水。单襄公抚慰他说：“晋国必将会发生内乱，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鲁成公疑惑不解，便问道：“寡人是担心受到晋国责难，你却说晋国将有内乱，不知道您是从天道得知的呢，还是根据人情世故推测出来的？”

单襄公轻笑说：“我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盲人乐师，更不是负责占卜的太史，怎么可能知道天意如何呢？我只是根据他们的言谈举止进行推断的。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耳、目、口、足都是其内心的窗口，由此表现出的举止、神色、言谈、步态都是其内心的表征，可以根据这些细节见微知著。如今郤犇言语冒犯无礼，郤犇言辞隐晦曲折，郤至言谈中总离不了矜功自伐。说话

太冲就容易造成误伤，总绕弯子的人绵里藏刀会诬妄他人，自我吹嘘的人会掠人之美、掩人之能。郤氏如今受宠于晋，一门之中就有三卿五大夫，官高禄厚本来就容易遭人嫉妒，可他们非但不知谨言慎行，还要处处招人怨恨，哪有不亡的道理？”

作为一名颇负盛名的预言家，单襄公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二十多年前，他曾预言过陈国的灭亡，如今与鲁成公会谈，不仅预测了三郤的灭亡，预测了齐国国佐之死，同时还对晋厉公的最终命运做出了同样精准的预言，认为晋厉公也会像三郤一样，成为晋国内乱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刚刚听到这个预测的时候，鲁成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单襄公于是解释道：“诸侯会盟是国之大事，由此可以观察兴亡。倘若国家没有灾祸，那么国君在盟会上的举动就一定无可指摘。然而晋侯目光飘忽望远，走路时脚又抬得很高，目光和举止很不协调，看起来魂不守舍，心中一定有所盘算，这也就证明了晋国内部一定不太平。我听说‘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国家要想兴旺，这四者缺一不可，都必须谨慎对待。而晋侯的这些做法会让其德、义日渐消损，四者已疏失有二，定然会带来灾难，甚至殃及整个国家，所以我才断定他活不久了。”

事实上，早在鄢陵之战爆发前，那个忧国忧民忧家业的士燮也曾做出过同样的预测，他曾反复提到“德不配位”的主张，认为晋国德行不够，是不能承担天下承平的福报的。

按照《左传》《国语》中的固有逻辑，其结果也真如二人所料，因鄢陵之战战胜楚国，晋厉公更加不可一世，开始没节制地向宠臣、爱妾赏赐田地。等到土地不够用了，他便开始打其他大夫的主意。而也正因为“三郤”家大业大又不懂得节制，自然就成了其首选目标，车辕之役由此爆发。

按照这个叙事逻辑，后来胥童和长鱼矫之所以要把魔爪伸向栾氏和中行氏，恐怕也是因为他们恃宠而骄，不满于仅仅瓜分郤氏的土地，这才酿成了最后的灾难。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行动尽管没有得到授意，最终也因为晋厉公的阻止而没有执行，但他们的贪得无厌显然也是被纵容的结果，因此晋厉公终究也要为此负主要责任。

第四节 内乱之源

姑成家父

《左传》和《国语》通过说理和举证等方式将厉公及“三郤”的丑恶之事揭露出来，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脸谱化的塑造，奠定了后来两千年里对“车辕之役”是非因果进行评判的主要基调。在这种叙事逻辑的指引下，人们天然就认为三郤的灭亡具有某种合理性，栾书弑杀晋厉公似乎也具有了某种正义性。

但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全善全恶的人，人性总是复杂立体的，当史料中对一个人的评价出现了“一边倒”的好评或者差评的时候，也往往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地方。就拿郤犇来说，在传统史料中，他骄横无知、贪得无厌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但近年公开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有一篇题为《苦（姑）成家父》的文本，却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郤犇。

在这篇以“苦成叔家”为主要叙事对象的简文里，一改郤犇往日的不堪形象，将其塑造成了一名公正无私的“铁面青天”。在他主政的一亩三分地上，无论是权贵还是草民，他都能够一视同仁，即便是国君的亲信犯了错，也往往逃不过他的法网。但他所侍奉的国君却是个暴虐无道的君主，不仅自己为非作歹，还纵容手下人兴风作浪，终于使得百豫地方百姓群起反对晋厉公的统治。

为了挽回晋厉公的声誉，郤犇亲自带领族众前往百豫进行治理。他一方面教导百姓遵纪守法，安抚并压制他们的反抗情绪；一方面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亲自选拔官员，建立国君与百姓之间的桥梁，借此约束并纠正晋厉公的行为，让其暴行无法在地方施展。

经过他的有效治理，百豫地区很快就实现了“君有道、臣有节”的理想状态。但晋厉公非但没有因此回心转意感谢他，反而因为他的勤政爱民让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他愈加憎恶了。

当朝执政栾书也看不惯晋厉公的做派，不过他并没有试图去改变一个暴虐成性的君主，而是打算效仿赵盾另立新君。由于三郤一直维护晋厉公，栾书担心自己的计划会受到阻挠，于是便挑拨离间，打算拉拢三郤入伙儿。在见到郤犇后，栾书说：“人生在世本来就很难，如今国君荒淫无道，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付出。你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最后反而让他对你更加忌恨了，你究竟是图什么呢？”

郤犇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既然接受了这份重任，就应该为国家长远考虑，就要公正无私、尽心尽力完成使命，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只要是符合道义的事，哪怕让我现在去死，我都无怨无悔。”

栾书拉拢不成，便去向晋厉公进谗言，说：“三郤家底丰厚，拥有众多部属却不听从您的命令，这样下去，我担心他们会成为国之大患啊！”

晋厉公本来就不喜欢郤犇，如今又听栾书这么一说，心志也就更加坚定了，决定让长鱼矫去除掉三郤。郤锜听说后，就对郤犇说：“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以我们的部属与国君对峙，如果成功了，晋国的政权就会牢牢地把握在我们手中；即便是失败了，也能全身而退，反正总会有人收留我们的。”

郤犇又严词拒绝了他的提议：“我听说，为臣者只有当国君满意了，自己才能有所请求。当初我们努力工作，为的就是能够长久地保卫国君，为其抵御灾难；国君看重我们并对我们委以重任，也是因为认为我们能够治理好国家。如今我们辜负厚望而遭到厌弃，挽回国君信任没有其他办法，唯有继

续秉公办事而已。如果我们不思己过却要趁机对国君不利，这是罪大恶极的不义之举，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况且说，就算我们能够全身而退，作为不能侍奉君主的叛臣，天下为君者又有谁肯收留呢？”

郤犇如此坦诚，晋厉公却不为所动，消灭三郤的计划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不久之后，长鱼矫从宫中外出，去到百豫随意抓捕了几个人回来，引得郤犇大怒，就将其一家人都绑起来带到了朝堂上。

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晋厉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待郤犇走后，他便对强门大夫发泄怒气，强门大夫以谄媚事君，建议把内库里的囚犯都放出来，并发给他们武器，好让他们剿灭三郤。晋厉公依计而行，让强门大夫带着囚犯释放了长鱼矫，并通过长鱼矫杀掉了三郤，郤犇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他一心要维护的国君手中。

当然了，故事的结局总是一致的。栾书看到晋厉公亲自剪除了自己的羽翼，自然是兴奋不已，很快就向公室发难，晋厉公也终于尝到了自作自受的滋味。

多怨有庸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以另外一个视角叙述了车辕之役的来龙去脉，认为郤犇之所以遭到晋厉公的忌恨，主要是由于其为官公正无私，在具体行政的过程中触到了暴君的逆鳞。与此同时，在原本叙事结构中只是有那么一点私心的栾书，在这里则被进一步丑化，变成了意图弑君谋国的奸雄。

至于事件的触发点，则是变成了由长鱼矫随意抓捕百姓而起，郤犇也是为了端正法度才将其与家人一同抓捕，这与传统史料中郤犇与之争夺田土的叙述也截然不同。而在得知晋厉公将要作难时，郤犇所说的那番话，基本就

是《左传》中郤至言论的翻版，也隐约地反映出了郤氏家族对待国君的态度。

一直以来，不少人都对上博楚简的真伪持怀疑态度，其中文本的真实性至今还没有定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中的内容拿来作参考。事实上，无论是《左传》《国语》，还是上博楚简，它们的创作者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同样，无论是古代历史的亲历者，还是我们如今社会热点事件的参与者，在观察一个人或者一个事件的时候都有其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在信息获取上的偏差，也即观察者未必能深入了解人物和事件的全貌。由于人脑机制本身的原因，即便是全程参与了整个事件，也无法将事件原貌完全还原出来。而当记录者无法亲历历史事件时，这种局限性就会变得更加明显，从而使得所谓的“信史”也往往存有失真的部分。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观察者的主观偏见。立场不同的人，看待同一问题的角度会千差万别，这种主观偏见经常会促使他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加工筛选，对有利于所论述观点的事实进行选择性的记录而忽略其他的细节。当这些经过了多层加工的信息历经千年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很可能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如果我们还是执着于一家之言，就未免有管中窥豹、断章取义的嫌疑。

《左传》《国语》采录士燮、公孙婴齐等人的言论中都提到，晋厉公在取得鄢陵之战的胜利后，一定会“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从而“夺诸大夫田”；而胥童给晋厉公提出的建议也是“必先三郤”，可见并不是因为他们果真犯下了多大的罪过，也未见得晋厉公就果真听信了栾书的陷害之言。晋厉公“作难”的终极目的是要复兴公室、强化集权，剪除侈卿的威胁。

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其针对的目标也并不仅限于三郤。长鱼矫斩杀三郤之后，胥童等人在朝堂上贸然劫持栾书、荀偃，实际上是将晋厉公的真实目的暴露了出来，这也难怪栾、荀二人会因此感到恐惧了。

至于为什么三郤会成为晋厉公发难的首要目标，其原因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曾经提到的，在春秋时期各国内部的斗争史上，“族大多怨，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为君仇”，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这条铁律依照胥童的话来说，是“敌多怨有庸”；用单襄公的话来说，是“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用公孙婴齐的话说，是“非多怨民无所始”；用我们当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无脑炫富”容易激发人们的“仇富”心态。

那么问题来了，郤氏家族到底强盛到什么程度，以至于让身为国君的晋厉公如坐针毡，让身为正卿的栾书坐立不安，非要置之于死地呢？

族大逼君

依照我们之前的介绍，郤氏的强大首先表现在其权力的旺盛。在晋厉公后期的八卿序列中，郤氏以郤锜、郤犇、郤至独占三个席位，几乎占据了最高决策层的半壁江山。其中郤锜的职位更是一度达到了中军佐，其权势显然比下宫之役爆发前的赵氏更为炙热。

除此之外，单襄公在预测郤氏命运的时候也曾提到：“夫郤氏，晋之宠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惧矣。”从中可知，除“三郤”之外，郤氏家族还有五人同时在朝中担任大夫，这就构成了所谓“一门三卿五大夫”的格局。

不过，这还并不是郤氏家族权力网络的全部，他们不仅在军政系统中有着重大发言权，在其他事务上的地位也同样不容小觑。比如郤犇，早在他升

格为卿之前，就曾奉命与秦桓公缔结盟约，并多次出使齐、鲁、卫等国处理外交事务。鄢陵之战后，《左传》更是明言，说郤犇“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进一步明确了他在东方外交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他能够插手干预鲁国内政的底气所在。

至于郤至，史料中虽未明确其具体职权，但从他的一系列表现来看，似乎与楚国有着撇不开的关系。最早在晋景公初年，郤至似乎就已经开始与楚国打交道，并在申公巫臣叛逃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到晋景公晚年，他更是与士燮一起主导了第一次弭兵会盟，并亲自前往楚国缔结盟约。鄢陵之战中，他之所以能与楚共王礼尚往来，恐怕与此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样一来，郤犇负责东方外交，郤至负责楚国事务，两个人基本上就垄断了晋国对外的一切通道，使得其他家族很难有施展空间。

这还不算，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车辕之役的全过程的话应该会注意到，长鱼矫之所以敢在郤氏府内行凶，靠的可不是“千里走单骑”那般的勇力，而是利用了“三郤”不设防的心理。

比如其中有一个细节，说长鱼矫和清沸魑“抽戈结衽，而伪讼者”，随后趁三郤“将谋于榭”的机会将他们刺杀。长鱼矫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引起三郤的注意，三郤又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受理此案，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地位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三郤没有处理诉讼事务的职权，他们又何必在明知晋厉公将要对自己动手的情况下自找麻烦呢？这可不仅仅是他们“目空一切”这四个字就能解释得了的。

郤氏强盛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其封邑的众多和财富的集聚。从前文对人物的介绍中，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郤氏家族的部分产业，其中至少有郤、冀、驹、步、蒲、温、苦七个封地。后世的叔向在评价郤至的时候也曾提

到，“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也就是说，郤氏家族的财富土地和私家武装已经与公室达到了同一个数量级，距离富可敌国也只是一步之遥了。早在鞌之战爆发前，曾在齐国受辱的郤克就曾扬言要用自己的私家武装去攻打齐国，这绝对不是狂妄者的一时义愤，而是有着真实依据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三郤的势力已经覆盖了行政、军事、司法、外交等诸多领域，几乎掌控了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其财富量级更是远超当年的赵氏，甚至可以与公室媲美，自然会引起国君的忌恨和其他家族的不满。

这实际上也表明了，像郤氏这样的家族，哪怕他们什么都不做，也会因为庞大的资源储备和武装力量，成为国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对于同列朝堂的其他宗族也是同样的道理，郤氏宗族无处不在的权势足以让他们感到惊惧，其可堪与公室比拟的巨量财富，也足够引起野心家的垂涎和觊觎。

尤其是栾书，身为执政却无外交职权，在军中又处处受到三郤的挟制，自然就会对这个曾经有恩于己的家族感到忌惮。而三郤在利用职权谋害伯宗牵连到栾氏子弟的时候，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栾弗忌死难不能干预，更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然而即便是已经如此强大，郤氏家族却丝毫没有衰败的迹象，三卿五大夫尽管清高傲慢，却并无纨绔子弟所具有的那些不良习惯，反而是个个都充满了进取心。尤其是郤至，尽管他在八卿之中地位最低，却最是足智多谋、志向高远，全然没有把自己这个顶头上司放在眼里，怎能让栾书不感到忧惧？这恐怕才是导致郤氏覆亡的真正原因。

制度之困

栾书的忧虑，也正是晋厉公的忧虑。尽管在所有的史料中，这位被冠以恶谥的君主早已声名狼藉，成为暴虐无道的象征，但平心而论，在现存史料中我们还很难看到他究竟做了哪些不得人心的事情。至少跟他的堂叔伯晋灵公比起来，晋厉公并没有那么多需要耗费笔墨大加挞伐的例证，人们也只能把他发动车辕之役前在盟会上的心不在焉当作是呈堂证供。

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不当之处的话，或许是跟三郤一样，进取心太过于强烈了，用《国语》中的原话说，就是“唯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也”。其中的“功烈多，服者众”，如果用在胜利者的身上，是雄才大略的表现，用在失败者身上，就成了穷兵黩武的罪证。而所谓的“无德”也是在这种“成王败寇”的思维惯性引导下，那些充当事后诸葛亮的人过度解读罢了。

与他有着同一谥号的周厉王，在当时的贵族阶层看来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但在今天看来，或许还称得上是一个敢于较真碰硬、向既得利益者发起挑战的改革家。因此，当我们切换立场，站在当时人们奉行的君臣伦理的角度上，对于晋厉公的评价或许就会截然不同。

晋厉公一生奉行的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晋景公打压豪强政策的延续，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去大族不逼”，也就是打击侈卿以扩张君权。但与父亲在位时的局面相比，他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恐怕更加严峻，至少在晋景公时期，还没有出现如郤氏这种在财富和武装上都可以与公室分庭抗礼的侈卿。一个郤氏尚且如此，如果要加上诸如栾氏、荀氏、范氏这些老牌贵族，当他们都以同样的势头扩张起来，哪里还会有公室生存的空间呢？

想要化解这种危机并非全无道路可选。早在晋献公主政时期，用职业官僚管理公室土地的试验就已经开始推行了，选卿制度也有了初步的设想。但

问题就在于，任何制度都有其惯性，任何组织或者团体都有其路径依赖，既得利益阶层的抵制和反弹更是任何改革都无法绕过去的门槛。

尤其是在西周封建制的框架内，礼法制度是一种双向性的伦理规范，国君在君臣关系中虽处于主导地位，但卿大夫对君权的制约力量也同样显著。而作为在封邑上拥有独立治权的实体，卿大夫与国君之间天然会存在离心倾向，这就使得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解释礼法原则时，更倾向于保护私家利益，同时有意显现并蚕食君主的权力边界，从而进一步摧毁君权作为统治根基的神圣性。

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没有赵盾的独断专行，世卿世禄制的回潮、卿大夫权力的集中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这与人们的思维惯性以及新制度模型诞生之初的不完备有着莫大的关联。

这种种乱象将封建制的系统性危机暴露无遗，也让晋厉公产生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既要解决迫在眉睫的“三郤”问题，同时也要为削弱侈卿做长远的谋划，无论最终的改革方案是什么，“夺诸大夫田”都将是必然的选项，只是其原因绝对不会是“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的结果。

事实上，在紧张情绪逐渐蔓延的晋厉公时代，人人都能感受到一种诡异的气氛，身在棋局中的其他家族，如栾氏、范氏、荀氏，也难以逃脱受人敌视的命运。比如叔孙侨如在利用郤犇驱逐政敌的时候，就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心理向郤犇暗示，说：“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以士燮的时时忧惧，也难免会“无辜躺枪”，更何况是其他家族呢？列卿之间互相警戒、互相防范、互相敌视的紧张情绪，就如同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充盈在人们的生活中，让人丝毫都不敢放松警惕。

面对国君强烈的进取心，卿大夫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这种情况也正如士燮所言：“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晋厉公的改革一定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抵制，没有谁愿意任人宰割，也没有谁愿意主动退让，将已经到手的利益拱手返还给公室。只是面对随时可能会爆发的危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来自范氏的士燮首先选择了保留外患以缓解内忧，而在战争无可避免地爆发之后，他又及时转变策略，以一死来换取范氏的安定。出自荀氏的荀偃、荀罍以及荀驵的后人们则选择了断尾求生，他们早早地分了家，分别以中行氏、智氏、程氏等几个互不统属的独立家族的面目出现。

“三郤”虽然给人留下了狂妄的印象，但并非看不清形势，只不过是在寻求自保的过程中，选择了一条与荀氏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们吸取了赵氏覆亡的教训，为了避免出现家族内讧给人以可乘之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对外。因此我们便看到，尽管三郤之中郤犇的辈分最高，郤至的能力最强，郤锜最缺乏存在感，可他们却都能坚定不移地团结在郤锜的周围，共同为郤氏家族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然而，这一做法无异于将整个郤氏家族推向了风口浪尖，让他们在成为众矢之的的同时，也成为国君所忧虑的对象。

与以上众人的被动自保不同，栾书显然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更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他似乎是想到了“大禹治水”的经验，既然危机不可避免，不如就干脆加以疏导，将这祸水引到别人的头上，以刺破那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的泡沫。

为此，他不惜背叛了亲密的战友，断然拒绝了韩厥和士燮的提议。这不是因为他不懂得“外宁必有内忧”的道理，恰恰相反，他正是想要利用这一点，想要通过离间晋厉公与“三郤”的关系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只不过让栾书没有想到的是，他精心设计的罗网，差点让自己作茧自缚。经历了这样一场惊魂时刻后，那种生命不由自主的恐惧感，未来不受掌控的焦虑感，盟友纷纷疏离的孤独感，都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里，让他突然意识到了晋厉公的野心，更促使他最终做出了弑君的举动。或许在举起屠刀的那一刻，栾书还在不断地自我安慰：既然为了国家安定总要有人做出牺牲，那这个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国君呢？

第五章 晋国诸卿利益格局重组

第一节 悼公新政

先声夺人

春王正月，日影南移，北国迎来了一年中最为寒冷的时节。在充斥整个视野的苍黄萧瑟中，却有一支装饰华贵的车队，正迎着料峭的寒风从成周缓缓驶出，驶向更加辽远的北方。

几天后，车队抵达了新绛郊外的清原，国内大夫闻讯纷纷赶来，让这片本来空旷的原野顿时变得拥挤起来。当这个经过了长途跋涉的车队渐渐出现在地平线上，所有人的内心都忐忑起来。

车队刚刚停稳，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便缓缓登上了高台，在众人的注目下发表了一段简短而不简单的讲话：

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所福也。

说话的这位少年被人称为“周子”，正是去年栾书陷害郤至时所利用的晋国公族孙周（也叫孙纠）。晋厉公殚精竭虑除掉郤至之后，晋国的国君大位终于还是落到了他的身上。而这一年，他才仅仅十四岁。

从他国迎立新君即位，这在晋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孙周之前，晋惠公、晋文公、晋成公都有在外流亡或者寓居的经历。不同的是，过去那些被迎立的国君，无论与前任关系是亲是疏，至少都有一个公子的身份，其继位

并不会让人感到突兀。但每每提到这位新君孙周，却总给人带来一种莫名其妙的窘惑之感。

孙周是晋襄公后裔，其祖父是晋襄公次子公子捷，号称桓叔。晋襄公去世时，晋灵公和公子捷都尚年幼，但依照晋献公不蓄养公族的基本国策，即便是年幼的公子也必须避居国外，因此晋灵公一继位，其弟公子捷就被送往了成周。

公子捷在成周生有一子，名谈，按照当时的命名规则，应该称为公孙谈，有时也简称孙谈。公孙谈在车辕之役爆发之前已经去世，留下了三个儿子：其中最为年长的是一个“不能辨菽麦”的“无慧”之人，还有一个叫杨干的小儿子才不过总角之年，今日回国为君的孙周是他的次子。

由此算来，孙周按照辈分该是晋厉公的堂侄，但已经是三代之外旁系血亲了。正是因为亲缘关系的疏远，使得晋国之于孙周显得无比陌生，这种感觉恐怕要比当年的晋成公要更甚几分。

在孙周有限的人生阅历中，他只知道晋国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也是他永远都回不去的故乡。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国度，去领导一群桀骜不驯的侈卿豪强。因此，当栾书安排他与郤至会面的时候，孙周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其用心，更不会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内政能与自己产生什么交集。然而造化弄人，那次会面仅仅一年之后，那位年富力强且志得意满的堂叔竟突然死于非命，使得当年公族抢破头想要争取的国君宝座，就这样出其不意地落到了自己身上。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那位曾言中三郤和晋厉公最终命运的知名预言家单襄公却丝毫都不感到意外。按照史料中的说法，孙周年幼时曾拜在他的门下学习诗书礼仪，单襄公对于这个聪慧且早熟的弟子青睐有加，认为他

在侍奉老师的时候能做到“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是一个懂得“慎、成、端、正”的有德君子。听说了有关晋国的消息，孙周“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这是不忘本的表现。他的品性可以称得上是“文”，有文德就能得到天地的护佑，以后最起码能够成为一国之君。单襄公因此断言，孙周将来一定能主掌晋国。

单襄对于周易八卦有着很透彻的理解。他回顾了当年王姬因梦而为其子取名黑臀的来历，分析了晋成公回国时得到的卦象，再结合孙周所具备的各种美好德行，得出了梦、卦、德互相印证的结论。

更有甚者，他还大胆地提出，说孙周“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是一个兼备了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等十一种美德的君子。

单襄公在此处所做的论断并不只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评价，因为在当时的天人观念之下有“天六”“地五”的说法，合起来就组成了“十一”这样一个天地的常数。所谓天有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地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十一”这个常数素来都是天子的专利，旁人哪怕有再大的野心也不敢轻易染指。单襄公作为王室卿士，不顾礼教大防而将此大数用在一个士子身上，甚至认为其文德能与周文王旗鼓相当，可见其对孙周的期许有多高。因此当王叔陈生围着郤至打转的时候，单襄公却独独看上了孙周这支“潜力股”，临死前还特意嘱咐儿子要善待孙周，可见老夫子终究也是不能免俗的。

能够得到单襄公如此高的评价，孙周必有其过人之处，而其出场亮相也的确不同凡响。在来到晋国后的第一场公众演讲中，他开头便说了这么一句

话：“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

这句感慨天意的话看似寻常，却透露着不寻常的意味。当年晋文公回国之前，介子推就认为其得国乃天意所归，随亡之臣若借机讨赏那就是在“贪天之功”。孙周常受单襄公的熏陶，自然也懂得如何以天道为自己至高无上的君权“赋魅”。因此，在会见前来迎接的大夫时，他开宗明义就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我孙周之所以能够回国即位，靠的是上天的眷顾，与你们的拥立毫无关系。你们不要看我年纪轻，就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倚仗拥立之功恣意妄为，我孙周绝对不是可以任由你们摆布的傀儡。

表明态度之后，他接着说道：“人们之所以要迎立国君，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如果拥立了国君却不服从君命，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在《国语》引述的文字中，孙周还打了一个比方说：“接受了国君的命令却悖逆行事，就好比是把收割的庄稼给烧掉。如果因为谷子没有成熟你们烧掉它，那还情有可原；可如果谷子成熟了还要烧，那就是你们暴虐。同样的道理，孤既然受各位重托，就必定会竭尽所能去做一个明君。如果孤的确不成器，就算是被废了也无怨无悔；可若是认为孤做得还可以，但却又想以暴虐的姿态来侍奉，是不是就太专横了？”

最后，孙周又正色道：“如果你们还用得着孤，今天就在这里立下誓言；若是用不着孤，也最好今天就下个决断。臣子恭敬地听从国君的命令，这才是神灵所保佑的。”

孙周的“开场白”措辞严厉，也着实给了在场的大夫们一个下马威，让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对这个孩子的看法。只是在这种时候，他们还来不及细细琢磨，只能把头压到最低，并用最洪亮的声音回答：“迎立您回国是群臣的心愿，臣等自然唯命是听，不敢有所违逆！”

这一天是公元前573年周历正月（夏历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孙周与众大夫在清原歃血盟誓，旋即进入新绛，暂住在伯子同氏家中。十一天后，也即正月二十六日，入曲沃武宫拜祭先祖，并于二月（夏历去年闰月）初一日正式继任为晋国的国君，是为晋悼公。

整饬卿制

晋悼公回国时所面临的政治局面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一方面，随着君卿争斗持续深入，逐渐形成了几大豪强轮流执政的寡头政治局面。政治寡头的形成不仅对君权构成了威胁，也逐渐将中下层贵族的上升通道堵死，使得原本流动性充足的晋国朝野渐渐又显现出阶层固化的迹象。

另一方面，卿大夫之间的斗争形势也越来越残酷，过去那种仅限于游戏参与者个人的有限度竞争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关乎整个家族生死存亡的烈性斗争。为了能够在日趋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占据绝对优势，游戏参与者往往会罔顾公序良俗互相攻讦，所采取的手段也越来越没有底线，使得整个国家的政治风气乌烟瘴气，也更加剧了国内紧张局势。

对于这种病入膏肓的内政局面，孙周似乎早就开好了药方，刚一回国就采取了大量措施，着手打破原有的政治生态。为了缓和紧张气氛，稳定肇乱者的情绪，他将内乱的责任都归罪到前任国君晋厉公身上，并下令驱逐引导厉公作乱的所谓“不臣者七人”，与胥童、夷阳五一起制造车辕之役的近臣都在被驱逐之列。

不过，此举并不等于承认了栾书、荀偃弑君的合法性，这与晋成公处理赵盾弑君一事时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晋悼公要逐渐恢复国君在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就必然要获取人事任免的权力。而当此之时，国内各大卿族慑于车辕之役带来的高度压力大都噤若寒蝉，悼公正好利用了这段时期内人们

的恐慌心理，在八卿之中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逐步对世卿的排序进行了革命性的调整。

不过，对于其具体的调整方式，《左传》中语焉不详，我们也只能依照《国语》的相关记载，大体上描摹出这一进程：

首先是晋悼公即位元年（前573年），由于位列八卿的“三郤”尽数陨灭，序列出现了不少空缺，晋悼公特意选拔了吕相、士魴、魏颉等一批新人充实进来。由此形成了其即位之初的八卿序列，分别是：

栾书、荀偃，士匄、韩厥；吕相、荀罍，士魴、令狐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左传》中并没有明确士燮去世后士匄的具体职位，但依照之前“上军佐壁垒”的惯例，士匄的初始位置应该不会脱离“执政方阵”的序列。再加上栾书和荀偃弑君之时，曾先召士匄、后请韩厥，可见士匄当时的地位是高于韩厥的。因此郤锜被杀之后，士匄就晋升为上军将，而韩厥则顺位填补了上军佐的位置。

这个序列只持续了十个月左右，到是年十一月，栾书从执政的位置退出，晋悼公超拔韩厥直升为中军将。至于栾黶的初始位置，根据当时鲁国大夫臧武仲的叙述，当时的下军佐由士魴担任，这也就意味着栾黶最高也只能是新军将。因此这个序列就又变成了：

韩厥、荀偃，士匄、荀罍；吕相、士魴，栾黶、令狐颉。

晋悼公二年（前572年）左右，下军将吕相去世，晋悼公将“赵氏孤儿”赵武补充到八卿序列，担任新军佐；四年（前570年）左右，新军将魏颉去世，晋悼公又提拔魏絳为新军佐。此时的八卿又变成了：

韩厥、荀偃，士匄、荀罍；栾黶、士魋，赵武、魏绛。

晋悼公八年（前566年）十月，韩厥宣布退休，晋悼公第二次超拔中军将，以荀罍接任执政，韩起担任上军佐，而原本担任中军佐的荀偃则贬为上军将。八卿序列为：

荀罍、士匄，荀偃、韩起；栾黶、士魋，赵武、魏绛。

晋悼公十四年（前560年），荀罍和士魋先后去世，晋悼公决定在绵上举行大蒐仪式。又因荀罍的儿子荀朔英年早逝，其孙智盈还不满六岁，士魋的儿子毳裘也还年幼，于是就先不设新军将帅，所部并入下军调遣。到第二年，也即迁延之役结束后，晋悼公干脆裁撤了新军，重新恢复了三军六卿的体制。最后形成的六卿格局为：

荀偃、士匄，赵武、韩起，栾黶、魏绛。

从这几次的调整中我们可以看出，晋悼公完全打乱了之前业已形成的惯例，在卿列排序上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

首先是在正卿的选拔上，晋悼公一再突破之前循序提拔的旧例，先后两次将韩厥、荀罍从上军佐的位置超拔为中军将。这种因功叙职的做法，在增强国君对世卿家族掌控力度的同时，显著降低了卿大夫依靠资历获取执政地位的预期，进一步鼓励他们在内外事务中发挥才智，为复霸事业的最终达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是打破了以往卿位可上不可下的惯例，着手对内阁进行整顿，有弑君前科的栾氏和中行氏都是他借以立威的“建信木”。比如晋悼公元年（前573年）冬天，把持朝政十几年的栾书从中军将的位置卸职，其去向也成了一个谜，而其继承人栾黶则是被下放到了新军将的位置上。时任中军佐的荀偃

尚年富力强，且在弑君事件中只是个从犯，晋悼公于是从轻发落，暂时让他保持原地踏步。到晋悼公八年（前566年）韩厥退休后，荀偃又被降为上军将，这在晋国历史上当属首次。

起用旧族

为了获取广大贵族阶层的支持，晋悼公还特意起用了一批沉沦的旧族。比如晋文公在位时期，曾有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等十一个公族掌握近官职位。但随着朝堂局势的演变，胥、狐、郤、先等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籍、箕、柏、羊舌、董等氏族渐渐不显，如今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公族就仅剩栾氏和韩氏两家。而即便是这两家，也都是在晋景公时期才开始显达的新贵，公族枝叶的凋零可见一斑。

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中下层的贵族往往是谨守礼仪的中坚力量，也是国君赖以抵制侈卿豪族的群众基础，两者自然会结成利益联合体。历代国君都希望能通过扩大中小贵族的实力，来对上层的寡头形成制衡。

但在过去，国君所倚仗的这个群体有一个不太体面的总称——“外嬖”。人们特意将其与宫中女眷的称谓“内嬖”并立起来，使得这个称呼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然而事实上，包含在这个范畴内的，不仅有像晋献公时期扰乱朝纲的梁五和东关五，晋厉公时期导君为乱、受人唾骂的“不臣者”，更有如智氏的始君荀首、被三郤陷害的伯宗、以司马身份进阶为卿的韩厥等有良好声誉的大夫，并不能一概而论。

“外嬖”之所以受人非议，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将士们在沙场上浴血奋战、争取功名的时候，很多无尺寸之功的“外嬖”却公然接受封地成为大夫，甚至平步青云进位为卿，轻轻松松地就实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人生理想。国君仅凭一己好恶对他们特别关照，不仅不能重塑国君的公信

力，反而会破坏正当的竞争秩序，摧毁了劝人向善的公序良俗，成为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毒瘤。

对于那些痛心于礼崩乐坏的君子来说，要想让国家秩序承平，国君就应该好好地约束自己，要么按照周礼的原则任用亲族，要么正心诚意地“亲贤臣远小人”“弃嬖宠而用三良”。早年晋文公之所以不敢对自己的随亡之臣大加封赏，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这方面观念的制约。倘非如此，国君的野心越大、进取之心越强，就越会显得无道昏庸，晋厉公以革新面目示人，最终却不得善终便是一个明证。

晋悼公充分吸取了晋厉公悲剧带来的教训，因此并没有采用以往培养“外嬖”与世卿对抗的方式，转而以擢录功勋为由，越过八卿直接着手进行中下级军官的任免，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对卿大夫御戎和车右的控制。

在早先的传统中，即便是国君也没有固定的御戎，只有到了战时才会通过占卜等方式临时指定，直到晋文公时期，国君御戎才成为常设职务。此后随着国君权威的日渐式微，卿大夫们有样学样，也都有了固定的御戎。晋悼公则再三申明政令，撤销了这一不合礼法的惯例，设立军尉进行统一的监管和调配。

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国君御戎的权力有所扩大，他不仅要在战时执行国君的意志，更要肩负“校正”职责，负责其他御戎的日常训练和思想工作。相应地，国君车右也被赋予了“司士”的管理职权，负责训练和教导卿大夫的车右。除此之外，还专门设立乘马御驯养军马，各军的战车马匹也由公室统一调配。

将御戎、车右的任免和管理权限集中到国君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卿大夫用人的权力。同时，卿大夫的御戎和车右由个人的亲信变成了公室

指派的专人，其行动就会受到掣肘，可以有效避免强卿专行独断、任意行事，进一步提升了国君对卿大夫的制约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不见经传的贵族开始浮出水面：弁纠和荀宾分别担任晋悼公的御戎和车右，祁奚和羊舌职被任命为中军尉和中军尉佐，魏绛被任命为司马，张老被任命为侯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上军司马，程郑为乘马御。晋悼公四年（前570年）祁奚退休后，晋悼公还借祁奚的举荐，将祁午和羊舌赤推上了中军尉、佐的位置。

修法论礼

在军政事务之外，晋悼公作为一个“兼具各种美德的完人”，对于“礼”的作用尤为重视。他对假公族制度的运行进行了规范，先后以“荀家惇惠，荀会文敏，廛也果敢，无忌镇静”为由，任命荀家、荀会、韩无忌、栾廛等人为公族大夫，让他们教导卿家子弟恭、俭、孝、悌等美德。除此之外，晋悼公还多管齐下，对晋国的法制进行了大规模的编修，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以士渥浊为太傅编修“范武子之法”，以右行辛为司空编修“士蒍之法”。

有关“范武子之法”的内容，之前曾做过介绍，这部脱胎于晋文公“执秩之法”的法令，本来目的就是要剥离“赵宣子之法”中不利于君主的因素，重建礼法秩序，为晋景公加强集权提供法律支撑。只是由于士会执政时间太短，其所修订的法律多有不完善之处。晋悼公命人重修“范武子之法”，其用意一来是要进一步完善法令、巩固君权，二则是要剔除其中过激的部分，以图缓解君卿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于所谓的“士蒍之法”，《左传》上并无只言片语的叙述，我们只是从后来的史料中看到，士蒍在晋献公时期担任司空，“以正于国，国无败

绩”。时隔近百年，在晋国战无不胜的当下，晋悼公将这套老古董搬出来，显然不是要追求什么“国无败绩”，更不是要让司空为其大兴土木追求奢侈生活，因此其重点就只在“以正于国”这四个字了。

翻查士蒍的生平事迹，其中最值得一书的就是帮助晋献公诛灭桓庄之族一事。时晋献公受桓庄之族的逼迫，士蒍翻覆之间便将其尽数清除，达到了强干弱枝的效果，为晋献公集权以及后来“国无公族”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所谓的“士蒍之法”恐怕就是在这段时期内出台，并为晋献公的集权服务的。

如今的晋国虽已无公族的忧虑，但产生了一大批掌握有广土众民的“假公族”虎视眈眈，其情形与晋献公当年的处境颇有相似之处。晋悼公重提“士蒍之法”，恐怕也是想借鉴其中限制公族的法令，用以制衡由“假公族”构成的世卿集团。

与士会修订法律时的作为类似，晋悼公最初任命的正卿韩厥也有过一段问礼的记录。晋悼公五年（前569年）时，有鲁国大夫叔孙豹来晋国访问，晋悼公设享礼接待他。席间，晋国的乐师先后演奏了《肆夏》和《文王》中的两首诗，他都毫无反应，直到最后演奏到《鹿鸣》一诗时，他才突然起身，很是庄重地三拜以致谢。

韩厥对此十分好奇，于是就派人询问：“您奉了君命来到敝邑，敝邑按照先君之礼招待您，可您却舍弃重大的礼节，单单拜谢细微的，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呢？”

叔孙豹回答说：“《肆夏》中的那首诗是天子招待诸侯之长时所用的音乐，《文王》中的那首诗是两国国君相见时使用的音乐，使臣身为大夫不敢接受如此高规格的礼仪。而《鹿鸣》一诗是贵国国君用来嘉奖寡君的诗句，

使臣当然要替寡君拜谢了。至于《四牡》，那是国君用来慰劳使臣的，《皇皇者华》更是劝人向善的诗，使臣岂敢不拜？”

此事在史料中一笔带过，并未说明韩厥受教之后做了些什么，但身为晋国正卿却特意咨询礼仪的细节，从中也可以窥见晋悼公以礼仪制衡卿权的用心。

一个国家的强大，单单依靠贵族的力量和政治的清明是远远不够的，在壮大中产阶层的同时，晋悼公还不忘加固底层的统治基础。对于底层的士和庶人，他都给予了一定的优待，《左传》将其概括为“施舍、己责，逮鰥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为民，欲无犯时”。

具体来说，就是要赐舍财物，免除民众对国家的债务，公室提供财力、物力赈济灾民和贫苦百姓，给鰥寡孤独等弱势群体予以优待。为增进民众的安全感，他还特意减轻赋税、宽恕罪过，让过去因为贫苦而沦为盗匪的人能够各安本分，以营造一个和谐安定的底层环境。

以往无论公室还是卿大夫都过于奢靡，在使用民力方面不加约束，使得底层贵族和平民黎庶怨声载道。晋悼公提倡移风易俗，节约器用，节制欲望，尽量不在农忙的时候征召劳力从事奢侈性的营建。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同时获得了底层民众的拥护，为晋悼公的集权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节 世卿联盟

刑善礼让

依儒家史料的固有逻辑，晋悼公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很快就收到了奇效，晋国内政环境在短短几年内就发生了极大的改观。《左传》对此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说晋国举拔的官员都尽职尽责，处理事务的时候能做到不改变常规。授予的爵位不超过德行，师不欺凌正，旅不逼迫师，百姓没有指责的话。社会运行规范有序，等级秩序严丝合缝，人们崇德尚礼、互相谦让，一片盛世欢歌的景象。

到晋悼公八年（前566年）进行人事调整时，内阁诸卿之间甚至还出现了鲜见的竞相谦让上位的盛况。当时中军将韩厥宣布告老，原本应由担任中军佐的荀偃来接替他的位置，但荀偃却一再谦让，不仅将中军将的位置让给了荀罍，还把中军佐的位置让给了更年轻的士匄，自己反而降了一级做了上军将。中军以下，栾黶和士魴年龄虽大，可也很懂得让贤敬贤，他们将上军佐的位置让给了韩厥的儿子韩起，二人仍旧担任下军将、佐之职。魏绛功高德劭，和戎之策由他所献，可他却认为赵武更加贤能，所以把新军将让给了赵武，自己只屈居新军佐之职。

这种奇特的景象就连楚国的令尹子囊听了都赞不绝口：晋国的卿把职位让给善人，他们的大夫也不失职守，士努力教育百姓，庶人致力于农事，商贾工匠和寻常皂吏都能各安其业，终于造就了“君明臣忠，上让下竞”的大好局面，这样的国家又有谁能够与之抗衡呢？

到晋悼公十四年（前560年）的绵上治兵时，这一幕又奇迹般地重演了。按照晋悼公的计划，他原本是想让诸卿循序提拔，也就是让士匄、荀偃统领

中军，韩起、栾黶统领上军，赵武、魏绛统领下军。然而议题刚刚摆上台面，士匄就突然提出：“伯游比我年长。当初之所以顶替他担任中军佐，是因为我与智伯相熟，所以才做他的辅佐，而不是因为我的贤能。”既然有人这么慷慨，晋悼公倒也不便说什么，于是便按照士匄的提议，任命荀偃为中军将，以士匄为中军佐。

中军将领已经确定，那么接下来就应该确定上军将佐的人选了，然而还没等晋悼公提名，韩起又突然开口，说赵武比自己更适合担任上军将的职务。晋悼公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意，于是转头又问栾黶：既然韩起不乐意，那你来做这个上军将可以吗？

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栾黶，可他却恭谨地回答道：“臣不如韩起。既然韩起愿意推荐赵武，国君还是按他的意见办吧！”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晋悼公也不能勉强，只好又按照韩起的意见，任命赵武为上军将，韩起为上军佐，剩下的栾黶和魏绛，就让他们统领下军。

这番上下竞相谦让的景象，与之前卿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不断流血冲突的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诸侯对此可谓好评如潮。《左传》中的君子更是连连点赞，说：“让”是礼仪的主体，士匄能够守礼谦让，他的下属也都纷纷效仿，即便是以栾黶的专横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空前团结，几代人都因此受益，这是取法于善的缘故啊！君子并引用《尚书》中的一句话说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以此来说明高位者拥有谦让和善等品德对于家国天下的重要性。

历史上一般都将晋悼公视为一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他的治理下，晋国终于打垮了楚国，实现了霸主伟业的二次复兴。君子崇尚古代传说中的理想

世界、大同社会，难免会将复杂混乱的现实政治理想化，把晋悼公时期的晋国描摹成一个政治清平、和谐美满的盛世图景，把晋国复霸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人们道德境界的提高。

可当我们跳出晋悼公所处的历史时期，把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就会发现，晋悼公所建立的宏图伟业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他死后君权旁落的现实也告诉我们，晋悼公在处理内部关系方面的表现，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这与他圣明伟岸的形象显然是不相匹配的。

外部的忧患消除之时，往往也是内忧兴起之日，这是鄢陵之战爆发之前士燮最感担忧的问题。历史的发展一再为这个结论提供了佐证。

伴随着争霸战争的高歌猛进，以及车辕之役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退，诸卿家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私相授受的风气逐渐沉渣泛起，卿大夫们内心长期被压抑的魔鬼也被释放了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家族都因循历史传统或者现实处境重新站队，使得晋国进入了一个权力重新洗牌的进程。而晋悼公十四年的绵上治兵，实际上就是这个新的政治架构正式成型的时刻。这也就意味着，晋悼公中后期晋国“上让下竞”的局面，只是其利益重组过程所浮现出来的表象，而这种重组又与诸卿大夫对过去及未来的想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只是从道德层面来理解发生在晋悼公时期的局面，就难免会把这些久经沙场的世卿想得太简单了。

为了搞清楚这种新格局形成的脉络，以及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还要从诸卿家族过去的发展历程中来探个究竟。

祁姓范氏

车辕之役爆发后的这几年，是晋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的几十年间，上承赵盾主政所造成的影响，晋国一直都存在着以赵氏为首的“执政联盟”和以荀氏为首的“反对联盟”两个互相对立的派别。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格局当中，范氏和荀氏以其地位的相对弱势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就为两家后来的进一步交好创造了条件。

到晋景公时期，伴随着世卿世禄危机的爆发，赵氏“执政联盟”内部频发内讧，原本强盛不可一世的先氏、赵氏、郤氏三大家族先后遭遇毁灭性打击。晋悼公即位之后，栾氏家族也因弑杀晋厉公而遭到了“软处理”，终于使得这个垄断朝堂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联盟分崩离析。而在过去刻意保持低调的荀氏和范氏，反而在各方重压之下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成为晋悼公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世卿家族。

晋悼公主政时期，由范氏、荀氏所派生出的三个家族分别由士匄（范宣子）、荀偃（中行献子，字伯游）和荀罍（智武子，字子羽）主掌。其中的士匄是士会之孙、士燮之子，于晋厉公七年（前574年）进入卿列，依照之前的惯例，最初担任的是上军佐的职务。

鄢陵之战后，国内矛盾集聚到了一个临界点。眼看着祸乱已然无法避免，士燮万念俱灰，内心绝望到了极点，只能默默地为范氏家族的命运而祷告，并让族内的宗祝为他祈死。后来事态的发展果如士燮所料，在他去世后不久，晋国就发生了车辕之役等一系列变乱。

在整场事件中，胥童之流之所以要抓捕栾书、荀偃，概因二人在当时诸卿之中地位最高。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假如士燮没有自祷去死的话，那么遭到拘捕的很可能就是他本人了。这样的局面一旦发生，无论他做出何种选择，范氏家族都无法逃出这个吞噬人心的漩涡，其结局要么是身败名裂、家

破人亡，要么就是如栾书、中行偃一样成为遭人唾弃的弑君者——由此也可以看到士燮的良苦用心。

但与其祖父士会、父亲士燮时常戒惧谨慎的态度不同，年轻时的士匄多少有些莽撞。比如鄢陵之战爆发时，楚军压营列阵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使得晋军没有腾挪的空间来从容布阵。当三军将佐为此忧心不已的时候，士匄却快步冲入大帐，建议大军直接填井平灶，在军营中摆开阵势来抵御楚军。

这个计谋在战术上没什么错处，而且后来晋军也的确采取了这个方略，但由于他的态度太过无礼，已经犯了“掩人之能”的官场大忌，引得父亲士燮怒不可遏，当场抽戈追逐要教训他。士匄当时并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但在父亲死后，他亲身经历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这才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当栾书扣留晋厉公前来召请的时候，士匄坚决不肯应召。

士匄在晋悼公初年为人还算低调，几次与齐国、鲁国在外交上的交锋也都很得体，大体上延续了其祖、父的为政风格。比如晋悼公四年（前570年）时，晋国准备在鸡泽举行会盟，因担心齐国不来参会，故而特派士匄到齐国聘问。其间与齐灵公交涉时语气柔中带刚，言辞恰到好处，既达成了胁迫齐人结盟的目的，又不至于让齐灵公太过难堪。

晋悼公九年（前565年）时，士匄受命去鲁国答谢鲁襄公的聘问，鲁人设下享礼款待，双方互相赋诗作答，宾主其乐融融。临别之时，鲁国正卿、季孙氏宗主季孙宿大概是有意巴结晋国，于是便赋《彤弓》一首。通常情况下，当诸侯有功于天子，王室会赏赐彤弓以示表彰，《彤弓》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这种赐命仪式的记载。士匄作为晋国的卿士，显然没有资格领受如此褒奖，于是便移花接木，将季孙宿对自己的奉承当作是对晋悼公的期望，同时回应说：“当年城濮一战，晋国先君文公在衡雍奉献战俘，因而从周襄王

那里得到了彤弓的赏赐，以作为子孙后代的珍藏。士匄作为先君官员的后代，哪里敢不接受您的命令？”

作为范氏的第三代宗主，士匄对于前代创业艰辛的经历并无太多体会，因此当政治局势出现松动的时候，不免就产生了骄狂情绪。特别是在担任中军佐之后，原本谨慎的作风便开始消退，整个人都变得浮躁起来。

比如晋悼公十一年（前563年），晋国与吴国在柤地举行会盟，回程行经宋国边境，士匄伙同荀偃要求灭掉当地一个妘姓小国偃阳，以封给宋国大夫向戌。中军将荀罃起初不同意，还斥责他们说：“偃阳城虽小却很坚固，我们带领诸侯联军至此，攻下来不算什么功劳，可攻不下来却未免让人耻笑。”但在二人的苦苦哀求之下，荀罃最终还是点了头。

攻打偃阳的战争很是惨烈，诸侯联军围城月余都未能将其攻克。眼看着雨季就要来临，荀偃和士匄担心路途泥泞不便回师，于是就生出了退缩之心。荀罃当即怒不可遏，命令他们七日之内必须攻下，否则就提头来见。二人自知理亏，便身先士卒亲上战阵，终于又用了五天将其攻克。

战后因为向戌的推辞，晋国把偃阳赠予宋国，宋平公在楚丘款待晋悼公，并以《桑林》之舞来为晋国君臣助兴。《桑林》一诗最早是商汤祭祀桑山之神时所用，在周朝属于是天子专享的娱乐节目。宋国本为殷商后裔，在周王朝又属于“三恪”之一，在礼乐上使用更高的规格无可非议，但晋国作为普通的诸侯就没有此等荣耀了。荀罃于是便向宋人推辞不受，可士匄和荀偃却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宋国私下里用了《桑林》之舞，导致晋悼公受到惊吓生了急病，他们二人又想唆使荀罃回宋国去请求祈祷，结果又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范氏家族在晋悼公时期跟士匄同列为卿的还有一位士鲋，他是士会之子、士燮的同母弟，也就是士匄的亲叔叔。因被封在彘地另立门户，因此又被称作彘季、彘恭子。

晋厉公被杀之后，士鲋曾与荀罃一道受栾书指派去成周迎回晋悼公。晋悼公即位后，认为士会（范文子）当年创立新法以安定晋国，这部法律至今都让人受用无穷；士燮（范文子）一生勤勉安定诸侯，如今和平安定的国际秩序便是他的功劳。这两位长者为晋国谋求霸业的复兴创造了如此优良的条件，他们的功劳德行不应该被人忘记，因此就让士鲋肩负起捍卫宗族的重任，在八卿中任新军将的职务。

士鲋在任期间主要承担的是一些琐碎的外交工作，参与军事行动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甚至到晋悼公十二年（前562年）时，还因对秦军疏于防范，被对方前后夹击吃了一次败仗。士鲋去世后，由于其继承人彘裘年幼，晋国此后不再设立新军，重新回归三军建制，士鲋的后人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卿列，由其所立的小宗彘氏在未来的生存中也只能依附于强大的范氏，并随范氏的兴衰而共存亡。

另外还需要一提的是，士匄所在的范氏原本只是祁姓士氏家族的一个小宗，其始封之君士会当时的大宗士穆子的弟弟。由于士穆子极少参与军政，故而史料对他的事迹缺乏记载，直到晋景公时期，才有其长子士渥浊（士贞子、士贞伯）开始频繁出现。

史料中有关士渥浊最早的一次记录是晋景公三年（前597年），彼时主将荀林父身负邲之战战败之责，主动向国君请死。晋景公本打算杀掉荀林父以平息众怒，但在士渥浊的劝说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在后来的几年间，士渥

渚又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晋景公十三年（前587年）预言了赵婴齐的逃亡，第二次是在次年，他又预言了郑悼公的命数。

到晋悼公时期，士渚渚因“帅志博闻而宣惠于教”被任命为大傅，承担完善国家刑法礼仪的重任。士渚渚之后有士弱，谥号为庄，在晋悼公时期担任理官，主理司法事务。士弱之后有士文伯，与范宣子士句同名，字伯瑕，在赵武执政时期担任辅臣；有士景伯，称司马弥牟，辅佐韩起执政。另外还有个士富，其身份不详，在晋悼公四年（前570年）时被任命为侯奄。士氏的大宗在士弱之后就渐渐衰弱，逐渐成为小宗范氏的附庸。

大宗之外，还有一个小宗巩氏，其代表人物是巩朔，在其生活的历史时期内应该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晋灵公十一年（前610年）时，晋国与郑国发生纠纷，就是以巩朔为使与郑人进行谈判。晋景公三年（前597年）的邲之战，巩朔与韩穿同任上军大夫，并受士会指派在敖山前设置了七支伏兵，确保了上军的顺利撤退。鞌之战后，两人携手进入卿列，在新上军分别担任将、佐；晋厉公即位前后，两人又相继卸任，此后再也没有参与内外事务的记录，巩氏大抵上也成了范氏的附庸。

姬姓荀氏

得益于祖、父时代的长期积累，范氏与荀氏的两个分支中行氏、智氏都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关系。而或许是由于年龄相仿，士句与中行氏的宗主荀偃的关系又尤为密切。

这里的荀偃是荀林父（中行桓子）之孙，荀庚（中行宣子）之子，谥号为中行献子，字伯游，是中行氏的第三代宗主。荀偃的年龄比士句大一些，出仕也要早几年，大约是在麻隧之战后不久，他代替其父进入卿列，并担任

上军佐的职务。鄢陵之战后，随着士燮的去世和三郤的覆灭，荀偃顺位晋升为中军佐，距离中军将的位置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受到栾书的牵累，荀偃在车辕之役中无辜“躺枪”，差点被晋厉公的近臣杀掉，后来在惊恐之下又随同栾书做出了弑君之举，因此在晋悼公时期受到了一定的压制。所幸与其同宗的智氏宗主荀罃在车辕之役中保持了足够的定力，故而因祸得福受到了晋悼公的重用，从而为中行氏的复兴创造了机遇。

说起荀罃，有一段往事便不能不提。自古以来，举凡是英雄人物的出场，大都不同凡响。荀罃的出场也格外与众不同，他第一次走入人们的视野的时候，是以战俘的身份出现的。

话说在邲之战爆发时，荀罃随其父亲荀首在下军服役，战争开始后不久便被楚国大夫熊负羁所俘。他的父亲荀首为了将他寻回，坚持带领下军所部重返战场，最后带着连尹襄老的尸体和战俘公子谷臣返回国内。到楚庄王去世前，他的父亲荀首已经位列中军佐，于是便开始操作两国交换战俘的事宜，荀罃也在离乡九年之后终于得以返回故土。

回国之前，荀罃与楚共王曾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当时楚共王曾问道：“你怨恨我吗？”

荀罃回答说：“当时两国交战，下臣不能胜任战士的职责，因而做了您的俘虏。贵国没有用我的血来祭祀神灵，反而肯让我回国接受处罚，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又怎么能够怨恨您呢？”

楚共王又问：“那你感激我吗？”

荀瑩又说：“两国各为自己利益考虑，摒弃恩怨释放战俘以谋求和好。这是两国之间的大事，下臣并未请求您的恩赐，又有什么可感激的呢？”

话说到这里本应适可而止了，可楚共王当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不知道如何转换话题，因而依旧按照原先设计好的问话继续问道：“回国以后，你会如何报答我？”

荀瑩生长在晋国霸业衰微的年代，从小便受晋文公时期英雄故事的熏陶，听到这样的问话便有似曾相识之感，于是便答道：“臣没有什么可怨恨的，您也没有什么恩德，无怨无德，不知如何报答。”

楚共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便又问了一次：“话虽如此，但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荀瑩正襟危坐，坦然说道：“因为您的威严，能够让我这个阶下囚回国接受惩罚，若是寡君将臣处死，也算死得其所。如果托您的福，寡君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处置，将我在自家的宗庙处死，臣也死而无憾。若是寡君垂怜，允许臣戴罪继承宗子地位，并侥幸承担国之大事，带领军队保家卫国，那时如若遇到了贵国的军队，臣也不敢违背礼义有所回避，必竭尽全力效忠国家，绝无二心，以尽到为臣子的职责，这就是对您最好的报答。”

荀瑩的这番话可以说深得晋文公当年之精妙，对答得体、不卑不亢，展示出了一名贵族应有的操守。楚共王听后不由得大发感慨：“我们终究还是无法与晋国相争啊！”于是就向荀瑩赠送厚礼，送他回到了晋国。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时期的人们看重个人的身份地位，如果一个人在本国有着崇高的地位，那么他即便是成了他国的战俘，也不会被关在监狱里，

而是会被软禁在某位大夫的家中，并按照原有的规格提供食宿。因此荀罃在楚国客居时，除了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之外，与外界的交往并没有完全断绝。

在此期间，他曾结交了一位来自郑国的商人。这名郑商与其志趣相投，不忍其长期寄人篱下，便打算找机会将其藏在装衣服的货袋里偷偷带出楚国。但计划还没有实施，两国之间就已经达成谅解，荀罃也因此得以重返故国。

后来这名商人到了晋国，顺便拜访了刚刚回国的荀罃，荀罃将其奉为上宾，就如同是他已经救了自己一样。这个商人不敢接受此等礼遇，便推辞说：“虽然你我曾有过约定，但你能够回国并不是我的功劳，小人如果慨然接受你的恩惠，岂不就是在欺骗君子吗？”说罢便与荀罃告别，只身前往齐国去了。

荀罃回到晋国后不久，其父荀首便去世了，最晚到秦晋麻隧之战爆发的时候，他便因袭父职进入卿列，担任下军佐。车辕之役爆发后，荀罃与士魴一道受栾书委派，到成周迎接晋悼公回国即位，其地位也从原来的下军佐被越级提拔，与士匄一道统领上军，从而跟士匄建立了一定的私交。

及至晋悼公八年（前566年）韩厥退休后，荀罃又被进一步委以重任，担任晋国的中军将。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坚定地执行“联吴制楚”之策，另一方面则在中原战场上施展“疲楚服郑”的“魔法”，使得楚军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被频繁调动，最终疲于应对，不得不退出了中原争霸战场。

与时刻保持谨慎的韩厥比起来，荀罃绝对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与当时多数卿大夫相比，他的战略智慧也是无可比拟的。可以说，晋悼公复霸的伟业能够顺利达成，荀罃绝对功不可没。然而正所谓“职场得意、情场失

意”，当荀谥在争霸的前线一路高奏凯歌的时候，其家庭生活却总是让人感到惋惜。

由于早年长期滞留在外，荀谥直到回国之后才娶妻生子，到其担任执政的晋悼公八年时，其长子智朔大概也就是二十多岁的样子。二十多岁正是诗一般的年华，可智朔偏偏就在这朝气蓬勃的年纪便英年早逝了，只留下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一朝白发送黑发，荀谥的内心满是悲痛，尤其是当他看到智盈嗷嗷待哺的样子，更是不由得为家族的未来担忧起来。按照《左传》的记载，到晋悼公十四年（前560年）荀谥去世的时候，他的长孙智盈才刚满六岁。让这样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领导一个偌大的家族，且不说其他家族会趁火打劫，光是来自家族内部的凶险恐怕都难以应对。

为了能够让智氏家族拥有光明的未来，也为了让子孙后代在这个残酷搏杀的战场上存活下去，荀谥必须要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一个能够无私守护这个家族的人，而这个人自然非中行氏的领袖荀偃莫属。

荀偃受荀谥临终嘱托照顾智盈，实际上也意味着他成了中行氏和智氏两个家族的领袖。士匄与荀谥、荀偃本来就有着很好的私交，如今又有了荀谥的托孤，他自然要鼎力支持，因此就与出自荀氏的两个家族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这也是在绵上治兵之时，士匄将正卿之位让给荀偃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三节 新贵联盟

由于荀氏和范氏都是在晋灵公时期就已经显达的老牌贵族，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姑且将这两个家族所组成的联盟称为“世卿联盟”或“旧卿联盟”。

与“世卿联盟”形成竞争关系的，是韩氏和赵氏所结成的同盟。相比于权势煊赫的范氏和荀氏，到鞏之战后才进入卿列的韩氏家族显然要弱势许多，而其进入排名前四的“执政方阵”更是要晚到车辕之役爆发后。赵氏家族虽早在晋文公时期就已经显达，然经过下宫之役的重挫，其势力早已大不如前。而当赵武受晋悼公拔擢重新进入卿列时，也不过二十岁上下，影响政局的能力更是十分有限，无论是财力还是权势都显然无法与“世卿联盟”抗衡。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依照进入卿列的时间，暂时将韩、赵两家组成的联盟称为“新贵联盟”。

司马韩厥

后世常把“秦晋之好”视为友好和谐的典范，不过要说起春秋时期最坚不可摧的家国友谊，赵氏与韩氏之间的友好关系绝对是要排第一位的。

韩氏与赵氏之间的友好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襄时期。当时韩氏第四代宗主韩舆早逝，韩厥幼年失怙又缺乏强力后盾，整个家族都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正当韩氏危难之际，长袖善舞的赵衰不失时机地伸出援手，这才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及至成人以后，又恰逢赵盾主政，韩厥受赵盾举拔出任三军司马，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政治生涯。

从河曲之战爆发的晋灵公六年（前615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鞏之战后建立六军十二卿的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为止，韩厥担任三军司马的时间长

达二十七年，为官期间一直以执法严明、不阿权贵而著称。

首先是在河曲之战时，韩厥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赵盾的亲信立威。以当时赵盾杀伐决断的性情，人们大都认为韩厥恐无法善了，可最后的结果却大出所料。赵盾不但没有责怪韩厥，反而因其帮自己洗脱了结党营私的罪名而倍感欣慰。

赵盾的赞许让韩厥倍受鼓舞，也使得他刚正不阿的为政风格广为人知。二十多年后的晋景公十一年（前589年），当郤克带领大军东渡黄河，准备要对其三年前齐国朝堂受辱一事展开报复的时候，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大军在卫国驻扎期间，郤克的亲信犯了军法，韩厥申明政令，决定要将其明正典刑。郤克闻听之后急忙驾车前去阻止，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事已至此，郤克便顺势派人将死者尸体示众。身旁的人对此很不理解：“你难道不是来救人的吗？”郤克回答说：“我这么做也是为韩厥分担一些指责吧！”

作为一名优秀的执法者，韩厥的这些举措的确值得赞赏，但在含沙射影的名利角斗场上，公私分明、忠信耿直的品格有时也会成为前进路上的羁绊。远如文襄时代的阳处父，近如景厉时期的伯宗，都是因性情刚强而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而韩厥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够维护好自己忠直的“人设”，在实际事务中还十分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特别善于结交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并以此积蓄自己的力量，这大约也是受到了赵衰性情的熏染。

比如在邲之战爆发前，面对先穀孤军深入的突发状况，荀林父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正是在韩厥的劝说下才下令全军渡河接应先穀。尽管此战以晋军的溃败告终，但由于有六卿共担罪责，原本被孤立的荀林父非但没有受戮，反而因祸得福，借机铲除了自己的政敌。

鞌之战爆发前，韩厥曾梦到父亲对自己说，作战时不要站到车的两侧。韩厥起初不理解这个梦的含义，等到车左、车右全被射杀后，他似乎才从中品出味来。后来有大夫綦毋张丧失车马，韩厥把他拉上车后不断用肘示意，始终都不让他站到危险的位置上。

鞌之战后，齐顷公亲自前来朝见晋景公，这本是一件和和美美好的事，可郤克却要故意闹个不愉快。当时诸侯会面通常都会有个授玉的仪式，客人来了要先献上一块玉，等到要走的时候主人再退回去，说一些互致友好的话。郤克在退还玉璧的时候趁机奚落齐顷公，说：“您之所以要来朝见寡君，不过是为了博后宫妇人一笑，寡君又怎么好意思收您的礼物呢？”

这句话一说出口，场面顿时变得十分尴尬。齐顷公无助地向四周扫视了一圈，最后将目光落到了韩厥的身上。韩厥会意，急忙起身行礼：“齐侯可是认得韩厥？”

齐顷公回答说：“衣服好像不一样了。”

韩厥端起酒杯快步走上台阶，回答说：“那日臣在战场上奋力血战，为的就是让两位国君把酒言欢啊！”这才替齐顷公解了围。

对于一个人如何才能立身于天地间，韩厥自有他独到的见解。后来赵武举行成人礼前来拜见时，他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为人处世的要义很简单，其一是要时刻保持戒惧之心，其二便是要结交善人。只要做到了这两点，就算是以后不会有什么大成，至少也能让你避开劫难。”这既是他自小从赵衰那里得来的精神财富，也是他用一生的实践提炼出来的处世哲学，更是他希望后生晚辈能够时时遵循的戒律。从这一点上看，韩厥与时刻心存戒惧之心的士会、士燮父子也算是心有戚戚焉。

正因时时抱持谨言慎行、与人为善的态度，韩厥的品质受到了广泛赞赏，因而被授予了仆大夫的职权，与伯宗一起成为晋景公的左膀右臂。到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时，他又凭借着鞏之战中的功劳，在新组建的六军之中担任新中军将一职，实现了从普通大夫进身为卿的身份跨越。下宫之役爆发后，他的地位又向前提升，并于荀息去世后升任下军将，在八卿之中排位第五。

与此同时，韩氏家族还有一位韩穿，其事迹与前文介绍的巩朔有很大的重合度，也曾在六军中出任要职。不过到晋景公去世前后，韩穿便不见于史料，他的这一支也从此退出了晋国的权力中心。

公族穆子

按照之前的分析，晋国的六卿体制在进入晋景公时期后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也就是“上军佐壁垒”。上一任正卿离任之后，其接班人通常都会直接空降到上军佐的位置上，从而将中军将的职位牢牢地锁定在排名前四的家族之内。

当然了，作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上军佐壁垒”也总有例外情况发生。比如晋景公在位中后期，为了平衡公族和异氏卿，曾与郤克联手将位于“执政方阵”之外的栾氏与中行氏旁支智氏的位置进行了对调，实现了世卿力量的和平转换，但随后这一秩序就又恢复如常了。

在“上军佐壁垒”的作用之下，居于下军将及以下位置的卿士几乎无缘进入执政行列。甚至在某些状况下，他们就连其现有的地位都无法保证世袭罔替地传承下去。比如晋景公时期进入十二卿行列的巩朔、韩穿、荀驩、赵旃，以及晋悼公时期提拔的魏颉、吕相、士鲂等人，在他们去世之后，其原

来的位置要么是被其他家族占据，要么就是被直接裁撤了。也就是说，只要排位没有进入前四，你所得到的卿士地位就只是一个“安慰奖”。

按照这样的规则，以新中军将之职进入卿列的韩厥，其政治生涯大概率会止步于下军将的位置。甚至更悲观一些，他去世后所留下的位置还有可能会落入他人之手。

然而，现实生活总是因各种意外而变得多姿多彩。韩厥以其超长的寿命以及戒惧谨慎的态度，不但顺利地度过了车辕之役前后那段激烈的岁月，还借此意外地突破了挡在他前面的屏障，迅速跻身上军行列，成了“执政方阵”中的一员。而更让他想都不敢想的是，晋悼公回国即位当年，他又突然越过了荀偃和士匄，直接被超拔为中军将——而这一切仅仅用了不到一年，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意外。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卿位来得太过侥幸，韩厥在此后的几年间一直都保持着一种诚惶诚恐的态度。在任期间，既没有做出什么傲人的成绩，也没有犯下可供人指摘的错误，以至于当人们提起晋悼公时期的著名人物时，往往也只能想到“疲楚服郑”的荀偃和提出“和戎之策”的魏绛。韩厥就这样四平八稳地在中军将的位置上坐了七年，然后挥一挥衣袖，将卿位和宗主位置都让给了次子韩起，寂寂无闻地退出了历史的前台。

按照史料中的相关表述，当韩厥打算要退休的时候，原本是想传位给长子无忌的。但由于无忌生有“废疾”，也就是身患残疾，自认为不适合担任家族领袖，于是便吟诵了两句诗来辞让。其中第一句是“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表明自己并不是不想担起大任，实在是才能有所欠缺。第二句是“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自己身有废疾，必不能事事躬亲，这样的领袖又如何让百姓信服呢？

无忌还表彰自己的弟弟韩起，说他与贤者田苏常有交往，田苏对其仁德一直都赞不绝口。能恭敬地对待自己的职位，并以此来体恤百姓，是为“德”；能端平己心是为“正”；纠人之曲是为“直”；将这三者合而为一就是“仁”。韩起能够做到这些，自然也能得到神灵的降福，将他立为卿难道不好吗？

在《国语》的记载中，无忌还反思了过去的行为，说自己身为公族大夫，论智慧不能匡正国君，论仁义不能救君于危难，论勇武当国君遭弑时不能以身殉国，怎么敢站在朝堂上玷污公室、辱没宗族呢？

韩厥将这些话转述给了晋悼公。晋悼公听后深受感动，赞叹说：“虽然不能为君死难，但能勇于让贤，这难道不是仁德吗？”于是就从其所请，让他的弟弟韩起（韩宣子）担任上军佐。同时，为表彰其德义，又尊其为首席公族大夫，无忌也因此获得了“公族穆子”的称号。

公族穆子让贤韩宣子的故事看似简单，可其背后所隐藏的信息却很耐人寻味。可以说，韩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平地崛起，从一个弱小的公族发展为后来可以三分晋国的强卿，韩厥此次的布局功不可没。

韩厥退休之前最感忧惧的问题，就是担心自己辛苦得来的执政地位不能顺利地传给下一代。假如按照过去二十多年来形成的惯例，上任中军将的接班人空降为上军佐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可这个规则在晋悼公主政初期却发生了变化。晋悼公利用车辕之役后人们的恐慌心理掌握了人事任免大权，对于卿位排序更是有着绝对的话语权。荀偃的一再降级，栾氏地位的冷处理，韩厥、荀偃的例外超拔，无不显现出晋悼公对卿大夫予取予夺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韩厥想让韩起直接空降为上军佐虽有先例可循，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这就给韩起未来的地位带来了巨大的变数。

韩厥似乎已经察觉到了公室走向衰微的征兆，意识到如今晋悼公的集权不过是公室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在公室走向没落之前，在自己还能掌握实权的时候，将韩氏家族的位置锁定在“执政方阵”之内。否则，若是任由韩起如栾黶一般落入了下军的位置，那么将来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韩氏很可能就会被上军与下军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限制住，从此再也无法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因此，史料所展现给我们的那个兄友弟恭的场景，也就是韩无忌谦让弟弟的感人叙事，恐怕也是他们经过内部协商之后合力上演的一出戏，以此用仁德之名堵住悠悠众口，也让晋悼公不得不接受他的安排。

韩起之谋

韩厥之所以要冒这个险，也是韩氏家族相对弱势的地位使然。且不说那些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就已经活跃在核心决策层的老牌贵族，即便是跟晋悼公时期才进入卿列的魏氏以及尚未进入卿列的祁氏比起来，韩厥所在的家族都显得过于弱小了。这种逼仄的局面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以至于当韩起后来再次担任执政的时候，还依然在为自己的“贫困”而感到忧虑。他们就像是冒冒失失闯入狼群的羔羊，与周遭强卿林立的环境显得多少有些格格不入。这就使得韩厥、韩起父子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以韩氏家族弱小的实力，如何在弱肉强食的政治舞台上存活下来？

他们想到办法很简单：与赵氏结盟。

赵氏家族原本是一个煊赫的世家，其第一代宗主赵衰是文公最为倚重的臣子，曾多次推辞卿位却依然能让晋文公不改初衷。到晋襄公主政时期，他更是凭借着豪华的气场坐到了中军佐的位置上，地位仅次于先且居。而赵盾更是靠着一身胆气，在腥风血雨的政治舞台上闯出了一条血路，一力主政晋

国二十余年，并亲手推动了世卿世禄制在晋国的落地成型。赵盾去世之后，赵氏家族在赵朔的领导下逐渐开始走下坡路，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以赵同、赵括、赵旃“一门三卿”的盛况，成为当时晋国政坛上最为闪亮的家族。

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赵氏家族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辉煌之后，终于还是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及下宫之役爆发前后，赵盾的异母弟赵婴齐被逐，赵同、赵括兄弟受诛，赵氏大宗只剩下了孤儿寡母苦苦支撑家业。到了晋厉公时期，名列十二卿之中的邯郸氏赵旃的卿位也无以为继，终于使得赵氏家族彻底退出了卿的行列。

当赵氏家族陷入中衰之时，韩厥义无反顾地为赵氏出头，劝谏晋景公恢复了赵武的爵禄和土地，并悉心呵护赵武长大成人，以衔食反哺之义报答赵衰、赵盾父子当年的养育之恩，以其忠义之心谱写了两个家族相扶相携、患难与共的壮丽诗篇，更为两个家族此后百年间的长期友谊打造了坚不可摧的底座。

晋悼公即位之后，着意起用大批沉沦的旧族，赵武借着这股东风被选入卿列担任新军佐。赵氏家族在历经劫难后浴火重生，终于以新的面貌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两个家族几乎在同一时刻步入了发展快车道，但也有着同样的忧患：韩氏家族有着较高的地位，但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其地位很难得以稳固，需要依托赵武所继承的庞大家业为自己保驾护航；赵氏家族财力丰厚，但由于久离政坛，既缺乏人望也欠缺经验，正需要一个身处高位的人为其引路。双方各有所短、各有所需，这也就注定了他们在此后的路途中必须抱团取暖，为两个家族的持续发展共谋出路。

在晋悼公十四年（前560年）的绵上治兵活动中，晋悼公原本打算按照通行规则循序提拔，将韩起晋升为上军将、栾黶进位为上军佐。但韩起却突然“发扬风格”，坚持要将上军将的位置让给担任新军将的赵武。赵武的年龄比韩起要小很多，从政期间也没有建立过特别的功勋，韩起如此举动显然有私相授受的嫌疑。

但对于晋悼公而言，他显然更希望韩起与同为公族的栾黶结成同盟。因此当韩起提出要举拔赵武时，晋悼公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转过头来先询问了栾黶的意见。可栾黶显然明白韩起的目的和决心，知道自己无法与赵武争抢，只能赌气地推辞说：“臣不如韩起。既然韩起愿意推荐赵武，国君还是按他的意见办吧！”

这样的结果显然早在韩起的预料之中。试想一下，假如韩起贪恋一时的权位，按照晋悼公的意见升任上军将，那么紧随其后的栾黶必然会顺延晋升为上军佐，这样的结果虽为晋悼公所乐见，但却并不符合韩氏自身的利益。倘若这个时候韩起再举荐赵武越过栾黶来担任自己的副手，就显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即便是他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找出一万条理由，晋悼公乃至紧随其后的栾黶也会有一万个理由来反对，这就使得其成功的概率大为降低。可假如他控住上军佐的职位，把本来会归属于自己的上军将让出去，则反而会显得高风亮节，排在后面的栾黶就算有再多的不满，也只能认命，这恐怕才是韩起谦让赵武的根本意图所在。

第四节 互助联盟

公族栾氏

范、荀、韩、赵四大家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结成了两个新的联盟，自然会排斥联盟之外的家族。而在这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恐怕就是栾氏了。

回顾栾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其实不难发现，在整个世卿家族的成长历程中，他们在多数时候都是受排挤的对象。即便是有过辉煌的时刻，更多的也只是扮演了一个“工具人”的角色。

早在晋文公时期，栾黶的曾祖父栾枝就已经位列六卿，与郤氏、先氏、赵氏、狐氏、胥氏等老牌贵族并驾齐驱，成为辅助晋文公获得霸业的先驱。而几十年后，当其他家族纷纷落入尘埃，唯独栾氏仍顽强地战斗在政治舞台上。如此久远而绵长的家族史，足以让其族人感到由衷的自豪。

但与此同时，一个巨大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那就是长久以来他们始终无法得到中军的位置，这既是栾枝、栾盾一生的宿命，也是栾书前半生的噩梦。这种情形到了鞏之战后才出现了转机，从政以来一直默默无闻的栾书在郤克致仕之后被火速提拔，成为栾氏家族参政以来的第一位执政卿。

栾书之所以能够被晋景公和郤克委以重任，这与当时国内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是分不开的，由此也就注定了他之后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在他执政的十几年间，国君与卿大夫、公族与异姓卿、世卿与普通大夫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又使得他总会受到其余家族的压制。

为了摆脱处处受限的不利地位，在任期间栾书先后发动了两场影响深远的政治事变，而他自己也因受到国君“外嬖”的觊觎而险些遭遇毒手，并由此引发了后来震惊朝野的弑君事件。

晋厉公被杀之后，栾书原本想效仿赵盾故事，从国外迎回一任国君以继续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时还只是一名十四岁少年的晋悼公，竟然有着远超常人的智谋和胆略。他对礼法和权术的运用远远超过了比他年长一倍的晋成公，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就将栾氏的地位打回了原形。

晋悼公元年（前573年）十一月，在鄆陵之战中担任下军将的韩厥开始执政，这意味着栾书的执政生涯就此结束。与荀偃的处境类似，栾氏家族也因其弑君之举而受到了惩戒；但与荀偃所受到的降级处罚不同，作为弑君案的主犯，栾氏所遭受的惩罚显然更重一些，这就使得继承栾书地位初入卿列的栾黶（栾桓子）并没有如愿接任上军佐的职务，而是不得不从新军将的位置开始干起。

在“上军佐壁垒”这个潜规则的作用之下，一个卿士的初始位置是在上军佐以上，还是在下军将以下，其间有着天壤之别，其未来的命运更会大相径庭。在晋悼公尚能主导卿位排序的时候，一切都还有转圜的余地，只要能够抓住机遇，从下军以下的位置擢升为上军乃至中军的统帅，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可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这样的状况还能维持多久，一旦卿位自由竞争的环境消失了，那么栾氏的地位将会被永久定格，这样的结果是栾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要想获得执政的地位，保证栾氏家族的基业长盛不衰，对于栾黶来说，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摆脱“替补方阵”这个令人尴尬的位置。然而，

现实总是残酷的，他的理想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坚决抵制。而在这其中，对其晋升造成最大阻碍的，正是被晋悼公寄予厚望的韩氏家族。

首先是在晋悼公八年（前566年）时，韩厥为了保住自己在“执政方阵”中的地位，与他的长子无忌在朝堂上上演了一出好戏，使得晋悼公不得不做出妥协，让韩起依照过去的惯例担任了上军佐。随后在晋悼公十四年（前560年）的绵上治兵时，韩起宁愿自己不上进，也要保举赵氏那个稚气未脱的孤儿来填补荀罃留下的空白。有了这么两次不愉快的经历，再加上过去栾书发动下宫之役的旧事，我们可以想见栾黶与韩起、赵武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四处树敌

让栾黶感到不快的还有同出荀氏的两大卿族——中行氏和智氏。车辕之役爆发前的将近半个世纪里，栾氏与荀氏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二者之间本就存有隔阂。后来晋厉公遭弑、晋悼公即位，栾氏和中行氏都因为参与弑君而遭到不同程度的惩戒，但最后的境遇却判若云泥。

在荀罃和士匄的合力保举之下，亲身参与弑君的荀偃不仅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到绵上治兵时还被推举为中军将；而只是受到父亲牵连的栾黶却一直都不得志，这不能不让他感到沮丧。也正因为如此，在荀罃和荀偃先后主政的十几年间，栾黶一直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比如晋悼公十一年（前563年）时，郑国因发生了“盗乱”事件而不得不与晋国讲和，楚国令尹子囊不肯放弃郑国遂出兵救援，与诸侯联军在阳陵对峙多日。

主将荀罃坚持“疲楚服郑”的策略，不想与楚军起正面冲突，于是就打算要先行退兵，可栾黶却蛮横地拒绝了将令。他就如同邲之战时的先穀，满是豪气地说道：“逃避楚军是晋国的耻辱。当着诸侯的面而增加耻辱还不如一死，我打算独自进军！”说罢也不管其余将领有何见解，便气势汹汹地带兵迎着楚军去了。

眼看属下不听调令，荀罃也做出了与荀林父一样的决策，率领大部队紧跟着栾黶抵达颍水北岸与楚军相持。但不管怎么说，栾黶一个人的骄横终归左右不了多数人的意志，这一点郑国人也是看在眼里的。因此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郑人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跑去跟楚国结了盟。这下栾黶更坐不住了，他强烈要求要教训郑国，要不是荀罃的强力阻止，恐怕还不知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这次栾黶还只是跟荀罃闹别扭，问题还不算太严重，可到了晋悼公十五年（前559年）的“迁延之役”时，他的蛮横行径可以说是把所有人都惹毛了。

当时诸侯联军在泾水东岸迁延不进，晋国大夫叔向费了好大劲才劝动诸侯渡河追击。后来由于秦人仗着纵深优势不肯讲和，荀偃决定继续追击秦军，于是就在军中下达命令：“明日一早鸡鸣时刻开始套车并填井平灶，全军唯我的马首是瞻！”可栾黶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说：“晋国的命令还从来都没有这样发布的，你的马怎么走我是管不着，我只知道我的马是要朝东走了。”说完就带着自己的部属回国了。

眼看自己的将令无法得到贯彻，荀偃虽心中愤恨，却也只能黯然自嘲：“是我的命令有误，想来真是惭愧。我们还是及早撤军吧，免得被秦军俘虏！”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讲完。

栾黶有一个弟弟栾针，早年曾担任过晋厉公的车右。鄢陵之战爆发时，晋军的营垒前有一片泥沼，军车出动大都或左或右地避开了。但晋厉公的战车被栾、范两族的军队拱护着出行，没能及时躲避，一个不小心就开进了泥坑里。

见此情景，身为执政的栾书准备让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战车，却不料话刚出口，就听到栾针直呼父亲的名字：“栾书你给我退下！国家大事巨细靡遗，岂可由你一人包揽？侵犯他人的职责是冒失，丢弃自己的职责是怠慢，擅离主帅职守是扰乱，若敢过来就是犯了三条大罪，你能当得起吗？”栾针不顾父亲的脸面当场一顿斥责，让栾书很下不来台，从中也可以看出作为车右力士的栾针所具有的直率性格。

虽然直率，栾针却并不是一个莽夫。当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栾针看到了子重的旗帜，便对晋厉公说道：“当年我出使楚国，子重曾问过我，晋国的勇武表现在哪里？我对他说，好以众整，好以暇。”所谓的“好整以暇”，就是既严整有序，又从容不迫。说完这些之后，栾针就向晋厉公请求道：“现在两国兴兵，互不派遣使者，就不能说是严整有序；临到大事不讲信用，就不能说是从容不迫。因此我请求派遣使者向子重敬酒。”有趣的是，同样是礼尚往来，栾针事后安然无恙，而郤至却因此获罪，可见栾书到底是有些偏私不公。

栾针性情果敢且爱憎分明，从来都不会因为顾念亲情，就对家国大义置若罔闻。迂延之役中，他对兄长栾黶肆意妄为的行径深感不齿，他当场发作道：“这场战役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洗雪栌地之战败于秦军的耻辱。如今我们劳动诸侯却无功而返，这必将会成为晋国新的耻辱。我兄弟二人身在行伍

却不能尽力，难道就不该感到羞耻吗？”说罢就带着自己的部属冲入敌阵，最后战死沙场。

栾黶并没有预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可事已至此再也无法挽回，他就只能把怒火烧到士句的儿子士鞅头上。由于三年前的栢地之战时的晋军守将士魴是范氏族人，士鞅怀着国家和宗族的双重屈辱，也随同栾针冲入了敌阵。但当栾针战死后，士鞅却全身而退，安然无恙撤退回国，这就给栾黶找到了借题发挥的机会。

他怒气冲冲地对范氏宗主士句说道：“我弟弟本来不想前去，是你儿子怂恿他去的。如今我兄弟战死，你儿子却活着回来了，这分明是你儿子杀死了我弟弟！这个仇我一定会报，如果你不想他死，就趁早把他赶出去！”

士句不愿与栾氏撕破脸皮，只好让士鞅躲到秦国去避难。好在范氏在秦国还有亲戚，也就是当初士会留在秦国的儿子士雅，或许正是在士雅的推动下，秦景公又将士鞅送回了晋国，并帮助他恢复了职位。

在士会、士燮主掌范氏家族期间，栾、范之间的关系虽说不甚密切，可至少没有太多的隔阂。尤其是根据后来的史实来看，两个家族还有姻亲关系，栾黶自己的夫人栾祁便是士句的女儿。在这短短几年间，栾黶是如何与范氏交恶的，其中的原因已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在晋悼公十五年的迁延之役后，栾针的死将两个家族的矛盾彻底引爆了。

知过不隐

士鞅在秦国时，曾经与秦景公有过一段对话。当时秦景公很关心晋国的政局，就问他：“晋国的大夫谁会先灭亡？”

士鞅回答说：“我估计会是栾氏吧！”

秦景公大概是对晋国内政有几分了解，故而又追问道：“是不是因为他太过骄横了？”

“您说得没错。不过依我看，栾氏的灭亡倒也不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或许会在栾盈的身上应验。”

秦景公十分好奇：“这是何故？”

士鞅回答说：“栾书对百姓有恩德，人们将他的恩德铭记在心，自然不会对他的儿子怎么样。这就好比是人们思念召公，就会爱屋及乌地去保护他留驻过的甘棠树，更何况是他的儿子呢？但是到了栾盈掌权的时候，栾书的好处已经被人们忘却了，而栾黶制造的怨恨却占据了人们的心头，即便是栾盈广施好处恐怕也不能挽回什么，因此栾氏会在栾盈的身上败亡。”

依照史料中提供的这些线索，栾黶既与新近崛起的韩、赵不和，又在迁延之役中忤逆上意让荀偃难堪、驱逐士鞅让士匄心生怨恨，还在诸侯面前将自己的骄横气息暴露无遗，使得他已经足够与先穀、赵同、赵括、郤犇等人同列，实在是集齐了导致宗族灭亡的“七颗龙珠”，也难怪士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过，这个结论虽看起来合情合理，同时也很好地契合了后来的事态发展，然而若是站在当时的角度看，这样的结论却并非那么显而易见，也未必就能反映公室以及国内大夫的心声。因此，士鞅的这番分析，很有从后来的事实进行反推的嫌疑。即便是他当时真的说过这番话，恐怕也只是其对话中的一小部分，难以确切地为栾黶的真实性情做注脚。

事实上，与谤满天下、誉满天下的郤氏家族比起来，以众口一致的“差评”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栾黶，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足够低调了。《左

传》在阐述其败亡原因时，并没有连篇累牍地罗列其专横跋扈的事实，可见其形象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其最终的败亡而被刻意丑化了。

《左传》刻画了栾黶的负面形象，但对于其正面形象的描述也并未全然无迹可寻。比如晋悼公初回国时，曾任命荀家、荀会、栾黶、韩无忌等人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在谈到这四个人的优长时，悼公的评价是：“荀家为人朴实宽厚，荀会好学聪明，栾黶果敢决断，无忌沉着镇定。当富家子弟生性骄横难以矫正时，就需要让朴实宽厚的人加以教育，让他们变得虑事周全而不再懈怠；让好学聪明的人加以辅导，让他们变得性情柔顺而明事理；让果敢决断的人加以告诫，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过失而不再隐瞒；由沉着镇定的人加以修正，让他们更加稳重专一。”

这就好比是唐太宗所说的“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栾黶在这里扮演的就是一个让人“知得失”的镜子，只有时时督促检点，才能做到“知过不隐”。从这个角度上讲，栾黶与他的弟弟栾针并无相异之处，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恐怕就是太过于耿直了。

当然了，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对待先秦史料中主观评价的部分，我们要持以审慎怀疑的态度，既不宜过度迷信，也不能全然否定。倘若以上两种互相矛盾的评价，无法帮助我们找到栾黶与众卿家族产生隔阂的真实原因，那就不妨从另外的视角切入，以探寻其中隐藏的秘密。

姬姓魏氏

迁延之役中，当栾黶因意气之争而公然拒绝荀偃的指示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因此感到愤慨，时任下军将魏绛就毫不迟疑地站在了栾黶的一边。当他带着下军佐部缓缓退出战场时，随行的左史疑惑地问道：“您不等中行伯了

吗？”魏绛轻描淡写地说道：“他老人家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服从主将，我的主将就是栾黶，因此跟从栾黶才是对待他老人家的最好方式。”

作为辅助晋悼公实现复霸大业的功臣，史料中对魏绛有很多溢美之词，他并无任何强横的表现。倘若栾黶果真是不可理喻的蛮横之人，以魏绛的睿智卓识大概不会盲目跟从，这其中真相就很耐人寻味了。

与荀瑩、荀偃所在的荀氏家族类似，魏绛所在的魏氏家族于晋国公室而言，也是同姓异氏的王室远亲。其先祖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文王的庶子毕公高，周初被封到毕国（今陕西咸阳西北）为伯爵，并在周成王时担任过重要职务，是与周公、召公齐名的王室重臣。但后来也不知是遇到了什么难事，毕国一夜之间便覆灭了，其子孙也都散落各地，在西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恢复地位。到了春秋时期，毕国的后代实际上都已经沦为庶民了。

晋献公时期，有毕氏子孙毕万在成周定居。当时晋国刚刚除掉了桓庄之族，大量任用异姓大夫，毕万似乎是从中看到了机会，便想到晋国碰碰运气。为此他特别延请了周室大夫辛廖为其占卜，得到了一个公侯的卦象。辛廖据此认为其在晋国必能繁荣昌盛，作为公侯的后代，也定能恢复他们最初的地位。

得到这样的指示，毕万旋即动身前往晋国，并以其勇武受到赏识，担任了晋献公的车右。直到一百多年后六卿旷日持久的内战中，处于艰危时刻的赵氏宗主赵鞅，还曾以毕万的勇武来勉励士卒。晋献公十六年（前661年），晋国连续对外用兵，接连灭掉了霍、魏、耿三国，毕万在这次战役中立功受赏，获得了魏县大夫的职务，由此成为晋国魏氏家族的首任封君。

毕万在受封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到后来晋献公废长立幼闹出了大乱子，重耳、夷吾纷纷出奔流亡，毕万后人魏犇（谥号武子，又称武仲州）有幸成

为重耳流亡团队的一员，名列追随晋文公流亡的五贤士之一。

这本是魏氏家族发展的机遇，但由于受到国内居守贵族的压力，晋文公回国后不得不按照亲疏远近安排职务，作为外来势力的魏犇并未因从亡之功进位为卿，只是在晋文公四年（前633年）时被任命了一个车右的职务。魏犇大约是因为因此心怀不满，到城濮之战爆发前，他伙同颠颉洗劫并火烧僖负羁的宅邸，结果差点被晋文公处死。好在魏犇也算是粗中有细，在关键时刻强忍着伤痛向晋文公证明自己尚可以用，这才勉强保住了性命，但其政治生命却也由此终结了。

魏犇去世后，魏氏家族出现了三个分支，继任魏氏宗主的据说是魏悼子。《左传》中并无魏悼子的事迹留存，只是《史记》中记述说他将魏氏的大本营搬到了北方的霍地。在此期间，曾有魏寿余受赵盾指派，以诈降之计将流亡秦国的士会赚回国。

魏氏的第一支小宗是由魏颉所开创的令狐氏，其封邑令狐位于山西临猗县境内，与大宗早先的封地距离较近，因此也算是镇守西南边疆、抵御秦军入侵的重要堡垒。

晋景公六年（前594年），新败于邲的晋国开始征伐“赤狄”，晋军主力全部被调往潞氏战场，国内出现了空虚。秦桓公趁此机会入侵晋国，大军横扫河、箕、郃等地。眼看主力部队无法及时回击，驻守河东的魏颉当机立断，率领魏氏亲兵西渡黄河打击秦军，在辅氏（今陕西大荔东）打败了秦军。

关于这一战还有一个传说，据说魏犇晚年时很喜欢一个小妾，总想着死后要给她留条好的出路，于是便托付魏颉说：“我死后，一定要找个好人家把她给嫁了。”但后来魏犇病危，弥留之际又舍不得让小妾嫁人，就又把魏

颖召来，说：“等我死了，就让她为我陪葬吧。”但魏颖认为父亲病重时神志不清，所说的话属于乱命，因此并没有遵从父亲最后的遗嘱，而是将小妾嫁了出去。

等到辅氏拒敌之时，秦将杜回勇猛无敌，让魏颖感到一筹莫展。正当此时，战场上突然出现一位老者，他用打成结的草绳遮拦杜回，并将其绊倒，魏军将其擒获，这才取得了大捷。

战争结束后，魏颖在梦里又见到了那位老者，老人对他说：“我是你嫁出去的女子的父亲，你能够执行父亲清醒时的话，因此我结草以为报答。”这就是成语“结草衔环”中“结草”故事的来历。

令狐氏抵御秦人有功，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却一直不能进取。直到晋悼公元年（前573年），魏颖的儿子魏颡（令狐文子）才被晋悼公任命为新军将。但魏颡为卿时年事已高，在新军任上只待了四年就去世了，其卿位也没有延续下来。

魏氏的第二个分支是吕氏，其开创者魏锜因受封于吕、厨等地，故而又被称为吕锜、厨武子。晋景公初年，魏锜由于求公族大夫不得而心生怨念，在邲之战中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不过，当后来下军大夫荀首回军救子时，魏锜亲自驾车助其射杀连尹襄老、俘获公子谷臣，作战中的表现也称得上是勇敢。鄢陵之战时，魏锜急于立功冲锋在前，亲手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但自己也被楚王身边的神射手养由基射中颈部而死。

魏锜死后，继承家业的是魏相，也叫吕相、吕宣子，秦晋麻隧之战前振聋发聩的《绝秦书》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吕相在晋悼公元年被任命为卿，担任下军将，不过同样是年事已高，在卿位上只坐了几个月的时间，自然也就没有机会施展抱负了。

在吕相和魏颀去世之后，默默无闻的魏氏大宗开始崛起，挑起大梁的正是大名鼎鼎的魏绛（魏庄子）。

魏绛在晋悼公元年（前573年）被任命为中军司马，据《国语》介绍，晋悼公对他的评价是“勇而不乱”。与早年担任司马的韩厥类似，魏绛也是一名刚正不阿的执法者，刚一上任就办了一件极为棘手的案件。

这件事发生在晋悼公四年（前570年）的鸡泽会盟时，晋悼公的弟弟杨干扰乱军行，魏绛当机立断，斩杀了杨干的御戎以正军法。当时晋悼公正因吴国未来参加会盟而懊恼，偏偏魏绛又来给自己添堵，当时便怒不可遏，扬言要将其处死。后来在士魴、羊舌赤、张老等人的力劝之下，晋悼公读了魏绛的上书，不仅平息了愤怒，还光着脚跑出来向魏绛认错。这次事件之后，晋悼公认为魏绛能够严格执法，利在百姓，就在太庙设宴招待魏绛，并将其提拔为新军佐。

魏绛为卿后，先是提出了“和戎”的政策，稳定了晋国的后方环境；后又在经济困难时期提出了“战时经济政策”，使得晋国挺过了复霸之前最为艰难的时刻。这些功绩使得魏绛与荀偃齐名，成为辅助晋悼公复霸的两大功臣，当复霸大业完成之后，晋悼公亲自从郑国献上的乐器中分出一半赏赐给他，以示荣宠。

不过饶是如此，魏绛终究还是由于缺乏盟友，在卿列中的地位始终无法得到提升。尤其是在旧卿、新贵已然组成联盟的情况下，其所在的魏氏家族也成了受人排挤的对象，栾黶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魏绛一样也没落下。讽刺的是，魏绛这种因不得志而生出的无奈，在《左传》的叙事体系之下，竟然被描摹成了谦和礼让的表现，使得他有再多的无奈也无处宣泄了。

所谓“同病相怜”，魏绛为了给家族的长远发展求得保障，便只能与同样遭受排挤的栾黶搭伙，组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联盟。在本书中，我们将这个联盟称为“互助联盟”。

在此基础上，我们回过头来再去审视士鞅在秦国时做出的预判，实际上就不难发现，栾氏之所以不会在栾黶身上败亡，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人们对于栾书德行的怀念，而是栾、魏两家坚不可摧的互助关系让对栾氏怀有敌意的人不得不存有忌惮。因此，尽管范氏早就有心对栾氏采取敌对措施，却也只能等着魏绛去世，或者栾、魏两家的防范心理有所降低之后才敢有所行动，这也是栾黶敢于直面对抗旧卿联盟的底气所在。

第五节 危机将至

周礼悖论

晋悼公在晋国的地位，有点类似于周宣王在周王室的地位。在他们即位之前，由于国家对外扩张乏力，多数的土地又都被集中到了世袭贵族手中，由此造成了卿大夫的专政和君主权力的萎缩。面对带有系统性特征的制度危机，西周王室和晋国都出现过雄心勃勃的君主，他们致力于打击世袭贵族，试图通过政治上的变革重塑君主权威，但都因遭到贵族势力的反扑而功败垂成，最后也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厉”的恶谥。

晋悼公即位后所采取的措施，与周宣王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一方面与贵族达成了某种妥协，将施政的重点由向内转为向外，使得紧张的内部局面暂时得以缓解；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有限度的改革，从而营造出了一种带有虚无色彩的强盛局面，也即所谓的“宣王中兴”和“悼公复霸”。

这种看似强盛的表象极具迷惑性，很容易让人产生君主权力又获得复兴的错觉。但伴随时间的推移，动乱带来的阴影迟早会消退，原本被刻意掩盖的腐肉脓疮也会冲破浮在表面的雕饰而完全显露出来。通常到了这种时候，那些过去悬而未决的弊病早已将其根脉扎进了地表下更深的土层，那些过去刻意回避的矛盾更是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而这也正是晋悼公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

晋悼公即位之初，之所以能够以十四岁的稚龄压制住飞扬跋扈的侈卿，将其为政举措顺利地推行开来，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他回国的时机。彼时距离晋厉公被弑刚过去十天，距离三郤的覆灭也只过去不到两个月，在经历了

一系列的惨案之后，所有的大夫都犹如惊弓之鸟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都担心这种乱局会持续蔓延下去，进而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斗，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拨乱反正，整肃政治风气，尽早结束动乱。孙周的出现恰好契合了人们的心理，这也就使得他可以在合法的框架内与世卿周旋，巧妙地褫夺其手中的权力。

但凡事都有其两面性。车辕之役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为晋悼公自由裁量提供便利的同时，也阻碍了其真正施展抱负的途径。

首先是在选择施政方向时，晋悼公不得不向那些杯弓蛇影的卿大夫做出妥协。按照士燮“不有外患，必有内忧”的预判，晋悼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着手解决侈卿威胁君权的问题，而不是去追求什么复霸大业。当士燮声嘶力竭地表达出对内部祸患的忧虑时，作为一个近乎“完人”的君子，晋悼公不可能意识不到问题的严峻性。然而，正因为他是从外部被迎立回国的，这就注定了他不得不和当年的晋文公、晋成公站在同样的起点上，从而与国内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达成某种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争霸战争就成了其案前的首要选项，那些迫在眉睫的国内利益分配问题反而被搁置了起来。

其次，是在决定未来路径的时候，晋悼公可选择的空间实在有限。正如我们一再提到的，对于晋悼公以及晋国历代想要实现集权的君主来说，想要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现实难题，除了周礼之外他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具有完备性的理论体系。可当历史发展到春秋中后期，原本用来维护君主权益的周礼反而变成了诸侯君主们心头上最大的烦恼。吊诡的是，这种变化实际上正是春秋初年各国君主为限制天子权力而制造出来的。

当初周公制礼作乐之时，创制了以土地分封、宗法制度、礼法秩序和天命观念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来维护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到了春秋时

期，诸侯君主们为了维护扩张所带来的利益，逐渐掌握了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使得这些用来塑造天子完美形象的理论体系，反过来变成了绑缚天子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新的框架之下，天子无论做什么都会招来诸侯的口诛笔伐，而诸侯们却可以对自己的行为任意解释，从而不断侵蚀天子手中的权力。

对于天子所面临的窘境，当代文史作家刘勃在《失败者的春秋》一书中曾有过一段形象的描写：

天子想要扩大军备，贵族说不好，耀武扬威那是粗鄙的行为，您需要的是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天子向诸侯国寻求经济支持，诸侯也说不行，这不符合礼制的规则。鲁国还会在《春秋》上一本正经地记载：天子违背礼法。天子不能随意向诸侯征求财物，诸侯也不能向天子供应车马。

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诸侯为自己的“佳作”自鸣得意的时候，根本意识不到，今日天子所遭逢的悲惨处境，有一天也会落到自己的子孙后代头上。

到了春秋中后期，随着礼乐征伐权力的进一步下移，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又被转移到了卿大夫手中，过去那些逍遥快活、为所欲为的诸侯君主们终于作茧自缚，也开始尝到了动辄得咎、无所适从的苦头。

这种情形在春秋中期实际上就已经有所显现。就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赵盾弑君案，晋灵公想要除掉权臣，人们会说他是“不君”的表现；赵盾逼压公室，包庇了参与弑君的赵穿，到头来却荣获了“良大夫”的美名。而在卿大夫阶层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给赵盾的弑君之罪赋予正当性，竟连晋灵公少时贪玩的事迹也都被拿来当成了呈堂证供，这在后来的帝制时代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的约束之下，无论是如晋景公一般心思缜密的君主，还是如晋悼公这般具有诸多美德的“完人”，恐怕都不敢贸然越雷池一步，这就无形中为君主集权编织了一道天然的罗网。面对如此困境，除非是出现如晋献公那种浑不吝的君主，否则谁也无法对当前的政治格局造成实质性的改变，这也是春秋中后期中原各国君主共同的无奈。

卫人出君

与赵盾弑君具有同样性质的案例，在春秋中后期的中原大地上层出不穷，其中最鲜明的例证莫过于发生在晋悼公末期的孙林父驱逐卫献公的政治事件。

在《左传》的记载中，孙林父的品行与郤犇可谓旗鼓相当，也是一个在国内外都不怎么受欢迎的人。比如晋悼公八年（前566年），孙林父受命到鲁国聘问时，就对鲁人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恭敬。

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卿大夫与本国国君同行登阶之时，应该落后国君一个台阶。鲁国与卫国地位相当，那么卫国大夫与鲁国国君同行时，自然也应该落后一个台阶。但孙林父或许是欺鲁襄公年幼，在登阶之时偏要跟鲁襄公并列而行，这就让鲁国大夫叔孙豹感到十分惶恐，于是急忙趋行上前阻止说：“诸侯会见的时候，寡君从来都没有走在过卫国国君的后面，如今您却没有走在寡君的身后。寡君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还请大夫稍停一下吧！”

倘若只是无心之失，听到有人劝阻自然会及时更正，可孙林父却偏像没听到一般，依然我行我素，这就让鲁国君臣十分恼火。

事实上，孙林父的这种跋扈姿态并非偶然为之。早在晋景公在位时期，当时的卫国国君卫定公就十分嫌恶孙林父，遂将其驱逐到了晋国。但这次流

亡不但没有达到打击孙林父的目的，反而让他攀上了晋国侈卿的关系，到晋厉公四年时，他就在晋人的支持下强行返回了卫国。

孙林父与卫国公室关系不睦，但唯独与卫定公的夫人定姜关系密切。当时面对晋国的强硬姿态，卫定公本来是铁了心的不想与孙林父会面的，但在夫人定姜一力劝说之下才勉强松了口。

卫献公继位后继续奉行卫定公政策，刚刚回国的孙林父也知道这个新君不好对付。为了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不测，就预先把自己在卫都家中的珍宝器物都放在了采邑戚地，同时更加卖力地维系与晋国诸卿大夫以及定姜的关系。

卫献公对其跋扈姿态忍无可忍，但由于其背后有晋国的支持，故而一直都不敢发作。及至晋悼公复霸成功，诸侯对待晋国的态度都出现了解怠，卫献公这才狠下心来，要着力解决孙氏对公室的威胁。

按照原定的计划，卫献公打算通过释放敌意迫使孙林父流亡，因此就设下了两次极不友好的宴会。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孙林父恐怕是早有预谋，在收到国君传达的信号之后，非但没有逃亡，反而聚集了孙氏的私家武装直接进入了国都。卫献公派出了几批使者试图与其达成和解，但派去的使者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孙林父的毒手。无奈之下，卫献公只得自行流亡到了齐国。

卫国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政治事件，各方势力谁也无法置若罔闻。但让人费解的是，之前对孙林父一直都颇有微词的《左传》，此时竟将声讨的枪口瞄准了卫献公，对孙林父的过错反而只字不提。

书中特意提到，卫献公在流亡途中曾派祝宗向先祖报告，说自己并无罪过，但其嫡母定姜却在一旁冷嘲热讽，还一口气罗列了他的三条罪状，其中除了最后一条是为自己鸣不平，其他的两条都是在给孙林父喊冤。不久后，鲁国派出使者臧孙纇到齐国去表示慰问，也提到说卫献公的言语就好像是粪土，都已经流亡在外了还不知悔改，可见其人品之差。

卫献公被迫流亡的消息传到晋国，不免让晋悼公产生了兔死狐悲之感，因而便有心干预卫国的内乱。然而当他向臣僚表明态度的时候，众人也都无一例外地站到了孙林父的一边。

当时担任中军将的荀偃因有弑君的前科，不敢明目张胆地包庇乱臣，只是说了一句“卫国人已经立了新君，讨伐也未必能够如愿”就草草应付过去了。宫廷乐师师旷没有这个心理包袱，于是洋洋洒洒数百言，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卫献公是如何失德的，直让晋悼公无言以对。

后来在士匄的主导下，晋国曾专门主持了一次会盟来商讨卫国的问题，但会议的地点却选在了孙林父的根据地戚邑，其倾向性也就再明确不过了。因此尽管有晋悼公的过问，这件事终究还是不了了之，若不是后来被孙林父扶植上台的卫殇公过于亲齐引发了晋国的不满，卫献公恐怕就永无回国之日了。

世家纷起

当卫国爆发了烈性的逐君事件之时，中原各国也都以不同的形式酝酿着一场“礼崩乐坏”的历史大剧。这场蔓延到整个中原的封建制危机，实际上是春秋早期各国内部危机的变种。当时，面对公子公孙肆意侵夺公室权力、擅行废立国君甚至是篡夺君权的乱象，各国公室普遍都采取了一些反制和矫正的手段。其中最典型也最极端的案例，就是发生在晋献公时期的“聚邑之

围”和“骊姬之乱”，晋献公以“诅无蕃群公子”的方式彻底斩断了公子公孙对君权的觊觎。

在晋国之外，这样的手段也屡见不鲜。比如郑文公即位之前，郑国诸公子争立，使得旧有的公族势力逐渐衰退；而到他即位之后，又将自己的儿子或驱杀或放逐，使得郑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无公族”的趋势。后来郑穆公的儿子郑襄公即位，也曾动过驱逐群公子的念头，在公子去疾的劝阻下才终于作罢，而也正是由于这一念之差，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产。宋昭公在位时期，也曾有过清除公族的努力，但由于公族势力根深蒂固，又有宋襄夫人的从中作梗，剪除公族的政策还未施行，就遭到了公族势力的反扑。

列国剪除群公子势力的努力尽管不够彻底，但在霸主权威的引导下，各国内部自我修复机制逐渐开始发挥作用。到春秋中叶，无论是君主地位的更替，还是卿大夫家族内部权力的传承，大都回归到了“嫡长子继承制”的范畴，因继承制度混乱带来的亲亲相杀不再是中原各国内政的主流。

人类社会总是动态发展的，前一个时代里治病救国的良药，到了下一个时代或许就成了摧毁整个系统的毒药。尤其是在春秋战国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里，社会变革激烈而迅猛，君卿关系的高下易位往往只在须臾之间。

由于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原本用于稳固君主地位的早期官僚体系，到了春秋后期就变成了超然于君主权力之外的独立系统。只是相比于春秋初年公子公孙相爱相杀、父子叔侄争斗不休的闹剧，春秋末年所爆发的封建制危机是建立在世卿世禄制的根基之上，因而也更具有系统性的特征。

晋悼公在位前后的这十几年间，鲁国的“三桓”早已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们趁着鲁成公、鲁襄公两代君主幼年即位的机会，蛮不讲理地驱逐了

东门氏，又将公室的土地和军队一分为三，全都划归了私家所有。郑国六卿也开始处心积虑地侵夺公室的权益，为此不惜弑君并制造流血冲突，垄断国家军政大权的“七穆”家族即将粉墨登场。宋国的桓族为削弱公室，肆意谋杀了国君的同母弟，由此酿成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内乱，戴族的华氏、乐氏、皇氏和桓族的向氏踩着战乱的余烬登上了权力巅峰。齐国公室为削弱国、高两个世卿家族的权力，联合庆氏、崔氏发动了一系列的政变，但最终却造成了崔、庆两大家族尾大不掉的局面。

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晋悼公目之所及能看到的，只有苦难的诸侯在强卿夹缝中苟延残喘的景象，难免会让他产生与晋景公当年发起弭兵会盟时同样的感伤。面对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个人的主观意愿作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即便以晋悼公的雄才大略，也难免会陷入无意识的恐慌之中。

但不管怎么说，晋悼公还凭借着复霸功业塑造的崇高威望，在诸多因素掣肘下暂时将局面压制在可控范围内。尽管在其执政后期，卿大夫之间拉帮结派的苗头再次显现，不同派系之间的攻讦也日趋激烈，可总归没有发生太过激烈的政治事件。

然而让人颇感无奈的是，晋悼公所继承的似乎不仅仅是晋国的君主之位，同时还继承了晋国公室短寿的基因。

遍览晋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春秋中期晋国的历代国君，无论是从在位时间看，还是从最终寿命上来看，似乎都要比其他诸侯短得多。

从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到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去世这将近一百年时间里，先后有十一人登上过晋君的宝座。除去奚齐、卓子以及晋怀公这些不逾年而亡的君主，先后登临君主之位的也有八人，平均每十二年就要进行一

次君位更替。与之相比，同时期的楚国只出现了四位君主，分别是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楚共王，鲁国则有鲁僖公、鲁文公、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五位君主，历任君主平均在位时间都接近二十五年。

而从君主的寿命上看，一个莫名的诅咒似乎也正隐隐地发挥着作用。早年晋献公迎娶骊姬时，曾有人以“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来劝阻，这个说法虽然饱含迷信色彩，但又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晋国的国运。先不说奚齐、卓子死于兵乱，后来的晋灵公、晋厉公年纪轻轻就被大臣弑杀，就算是史书上认为正常死亡的国君，其寿命也并不绵长。

比如晋文公十七岁开始流亡，在外流亡十九年后回国即位，可在位时间却只有九年，去世的时候还不满四十五岁。其弟晋惠公在其回国前就已经去世，时年恐还不足三十五岁。晋文公的两个儿子晋襄公和晋成公在位时间都只有七年，按照之前的推算，其去世时的年龄分别在二十和三十岁上下。晋成公之子晋景公在这几代君主中算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但要仔细推算下来，其去世的时候恐怕也不会超过四十岁。也就是说，这几任君主的平均寿命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十岁。

这也就意味着，春秋中期的晋国君主大都是少年时即位，在位期间饱受世卿压制，经过一番折腾好不容易对政局有了一定的把握，结果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就已经驾鹤西去了。这种君主频繁更替的现象，使得晋国如同后来的东汉王朝一样，政局一再陷入主少国疑的怪圈之中，从而加速了君权下移的步伐。

对于晋悼公来说更是如此。他即位的时候才十四岁，且早早地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智谋，然而最终也没有逃脱早已设定好的宿命。在他即位的第十六年时，因邾国侵伐鲁国，晋悼公本打算约会诸侯讨伐邾、莒，却不料得了一

场重病，只好将会期推迟。及至是年冬天，在位不足十六年、时年仅二十九岁的晋悼公竟然因此病故了。而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公子彪，也即后来的晋平公还不满十五岁。

在这君卿力量对比发生逆变的关键时期，随着一代少年君主的英年早逝，依靠复霸成功而为公室塑造的威望也轰然倒塌，晋国的政局再次被拖入到了阴晴莫测的旋涡之中。从这一刻起，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各方暗流的蠢蠢欲动，一场新的危机也就喷薄欲出了。

第六章 封建制危机全面爆发

第一节 公族之觴

众附亲离

晋平公即位后的几年间，晋国国内的政治排位又发生了几次微小的变动。

大约是在晋平公二年（前556年）时，骄横不可一世的栾黶退出政治舞台，其子栾盈（栾怀子）接棒进入六卿担任下军佐；魏绛的排位则向上一大步，担任下军将。晋平公四年初，荀偃在伐齐回师途中去世，其子荀吴入卿担任上军佐；原来的中军佐士匄则晋升为中军将，成为晋国新一任执政；统领上军的赵武、韩起，其地位也都得到顺位提拔，分别担任中军佐、上军将。最后形成的六卿排位分别是：

士匄、赵武，韩起、荀吴，魏绛、栾盈。

这个排位与过去相比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排位前四的执政方阵依然由范、荀、赵、韩四大家族把持，魏氏和栾氏依然在下军位置上打转。但也正是在这看似平静有序的权力传承背后，一场伴随着疾风骤雨的政治斗争也开始酝酿了。

所有的一切还要从栾黶去世的那一刻说起。

关于栾黶去世的具体时间，史料中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结论。我们只知道在晋平公元年六月，栾黶还曾随荀偃进攻楚国，以报复发生在晋悼公时期的

杨梁之役：到晋平公三年的平阴之战时，他的儿子栾盈便已经和魏绛一起协同作战了，显然栾黶已经退出了六卿行列。

晋平公六年（前552年）时，栾氏家族爆出了一桩丑闻。栾氏的主母栾祁与管家州宾通奸，还把不少家产都记到了州宾的名下。眼看着家族几代人积攒的基业就要被母亲败光了，栾盈感到十分着急，就总想着要做什么。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事件被披露之后，自己的生身母亲非但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反而为了保护州宾“大义灭亲”，第一时间就跑到了执政士匄的面前，控告自己的儿子意图谋反！

在史料中，栾盈的母亲一般被记作“栾祁”。栾为栾黶的氏名，祁为其娘家的姓，如今执掌晋政的士匄正是她的父亲。而考究州宾的身份，倒也不算是外人。根据后来的记载来看，州县是栾豹的封地，因此州宾以及勇士州绰实际上都是栾氏的亲族。

倚老卖老的栾黶在外强横，在管理家族内务时恐怕也是个独裁者。强权的领导者往往喜欢任用执行力强的副手，而栾黶所任用的“家老”就是这位州宾。州宾借着家老的地位垄断了不少权力，在栾氏宗族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可谓游刃有余。到栾黶去世之后，他便凭借着手中的职权，开始明目张胆地侵夺栾氏的产业。

这种家臣侵夺宗主利益的现象在春秋末期并非特例，后来在鲁国扰乱政局的南蒯、阳虎都是其中的典型。州宾的事迹虽然不多见，可要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他在栾氏家族内部扮演的角色，显然与南蒯、阳虎在季孙氏家族内部扮演的角色类似。而更让栾盈感到棘手的是，州宾在假公济私扩充自身权力的同时，还搭上了主母，使得栾盈即便想要有所举动也会投鼠忌器，时刻都得顾及母亲的感受。

然而，人们所处位置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会千差万别。对于栾盈来说，让他最感紧张的是州宾肆意侵夺家产的行为，因此必须想方设法收回属于宗主的权力。可对于栾祁来说，她并不会从政治的角度看待问题，她只知道，栾盈一旦要处置州宾，那么自己通奸的事情就会被暴露出来。尤其是在州宾的怂恿下，她的担心往往会被无限放大，而揭发栾盈的严重性又会被无限降低，使得她在权衡利弊之后，甘愿为了保全自己的声名而选择揭发自己的儿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女子的地位虽低，却对那些所谓的“三从四德”并不在意。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她们并不忌惮突破道德的局限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举动来。

比如《左传》中曾讲过一个“人尽可夫”的故事，说的是春秋初年时，郑国大夫祭仲专权，让郑厉公十分忌惮，于是便想要将其除掉。在施行暗杀计划的时候，郑厉公任用了出身于母族雍氏的雍纠。这个人虽是祭仲的女婿，但在为国君效命方面是从不含糊的。然而不巧的是，或许是雍纠太缺乏保密意识，这件事被他的妻子雍姬提前知道了。

雍姬刚刚得知这件事的时候内心也很矛盾，一边是生她养她的父亲，一边是海誓山盟的夫君，实在不知该做何选择，于是就跑去问自己的母亲：“父亲和丈夫究竟谁才是最亲的人？”

母亲的回答出人意料，她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意思是说，身为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丈夫，而父亲却只能有一个，这两者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听了母亲的回答，雍姬当即就把丈夫出卖了。祭仲一听这还了得，赶忙安排人把雍纠给杀了，郑厉公也因此不得不流亡国外。

对于栾祁来说，在关乎家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她更倾向于支持自己的父亲。因此当栾盈计划除掉州宾的苗头开始显现，栾祁便先下手为强，跑回娘家去向父亲检举自己的儿子。她在向父亲控诉时这么说道：

“栾盈认为他父亲的死与您脱不开干系，是您想要在晋国专权，所以阴谋算计害死了栾黶。我曾亲耳听到盈说过：‘当年我的父亲赶走了士鞅，可士鞅没多久就又回来了，士匄他不但不对他加以责罚，反而更加宠溺，让他担任和我一样的官职，恐怕是想让士鞅快速进步好继续专权晋政吧？士匄此人心狠手辣，害死我的父亲而在国内专政，若是再跟着他，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栾盈对您如此忌恨，我实在担心他会伤害到您啊！”

栾祁还请来了士鞅为自己作证。士鞅曾被栾盈的父亲赶出国去，自然就添油加醋地说栾盈的坏话。士匄得到了栾盈的罪证，便故意设下圈套，将栾盈支到位于东南边境的著地筑城，随后突然发难将其驱逐出境。

当年赵庄姬陷害赵同、赵括的时候，尚且知道拉着别家的人来作证，士匄如今要陷害自己的亲外孙，却只需要自己的女儿出面检举，自己的儿子出面作证，如此安排也太不体面了。栾盈这么一个富有才华的少年，就这样被自己的亲妈伙同亲舅舅给出卖了，随后还被自己的亲外公驱逐，不得不踏上了流亡之路。

士匄其人

栾氏和范氏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这一点我们无须赘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今晋国诸卿之中，要说起目空一切来，恐怕无人能出士匄之右。荀罃去世之后，虽说荀偃担任了执政，可在他执政的这几年里，所有的外交事务几乎都由士匄独揽，荀偃很少抛头露面。

比如晋悼公十五年（前559年）的向之盟，有包括齐、鲁、宋、郑、卫在内的十四国大夫参会，主持盟会的便是担任中军佐的士匄。这次盟会上，士匄以暗中与楚国通使为由，拘捕了莒国公子务娄；随后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将诸侯不朝晋的原因归结于“戎子驹支”泄露机密，扬言要把他抓起来。

这个被称作“戎子驹支”的人是陆浑地区一支“姜姓戎”的首领。他当场驳斥了士匄的无端指责，并坦承正是因为有晋国的恩情，“姜戎氏”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晋国的一边，为晋国的霸业鞠躬尽瘁，从无怨言。几十年来，但凡有晋国主持的行动，姜戎氏从未缺席，这就好比是捕鹿，晋国人抓住了它的角，各部“戎人”拖住它的后腿，跟晋人齐心协力将其扑倒，不能说是不尽力。

驹支还指责道：“如今你们晋国各地的官员做事有了过失，这才导致诸侯生了二心，怎么反倒要把责任栽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各部‘戎人’饮食、服饰和中原不同，言语、财货也都不相通，又能做什么坏事招你如此怀疑呢？你既如此行事，明天的会议我看还真没有参加的必要了！”末了，驹支赋诗一首拂袖而去，反把士匄惊得目瞪口呆。

驹支所赋之诗为《青蝇》，光从名字来看就知道必然没有什么好的寓意。这首诗正是以青蝇比喻进谗言的人，并进一步指出谗言带来的危害，着实把士匄讽刺了一把。众目睽睽之下，士匄也觉得理屈词穷，只好向驹支表达歉意，并盛情邀请他参加这次的会盟。

也就在同一年，卫国发生了孙林父逐君事件，作为诸侯盟主的晋国，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而士匄就是负责处理卫国问

题的全权代表。与此同时，士匄还因为与齐国起冲突，故意“假羽毛于齐而弗归”，导致晋齐之间的矛盾被彻底引爆，间接地引发了后来的平阴之战。

士匄与荀偃关系密切，荀偃将一切事务都交由他来处理也算是在情理之中。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荀偃尚有一丝公忠体国之心，与之相反，士匄却是一个私心极重的人。《国语》中记载了一个士匄与大夫争夺土地的故事。大夫之间互相争夺利益这种事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士匄争执不过，竟然想要发兵攻打对方，要不是有叔向和訾裕的劝说，还真说不定会因此酿成一场大乱，由此可见士匄为人的强横。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平阴之战后，《左传》以一种“死不瞑目”的叙事手法，间接地反映出荀偃对伐齐之事无果而深感不安，希望士匄能继续未竟事业的心理。然而士匄却并不知晓其内心所思，还以为他是在为身后事担忧，于是便一再保证以后一定会善待荀吴；倒是栾盈心细如尘看出了端倪，表示一定会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这才让荀偃放下心来。

回想起这件事情来，士匄并不会为自己的私心过盛而反省，反而为栾氏出了栾盈这样一个聪慧的家主而深感不安。除此之外，更让士匄感到忧心的还有栾盈乐善好施的品性。栾盈从小就喜欢结交士人，在底层贵族中有很高的声望，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无不让士匄感到忧心难安。

栾氏与范氏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如今栾盈所展现出的才华更让他感到危机重重，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下定了决心，与其等着栾盈发展起来对范氏宗族构成威胁，倒不如趁他刚刚执掌家政羽翼未丰的时候就除掉他。

可即便如此，士匄也没敢立刻就对栾氏下手，因为这个时候魏氏宗主魏絳，也正用自己的羽翼护佑着栾氏宗族的安全。然而岁月无情，魏絳的铁翼

再坚强，也终究敌不过似水流年。不久，魏绛死于下军将任上，年轻的魏舒担起了魏氏的重担，这就为士匄向栾氏发难提供了机会。

去枝绝本

这时正是晋平公六年（前552年）秋季，栾盈在著地筑城的时候遭到突然袭击，无奈之下只好一路向南逃奔。

国内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变故，作为这个国家名义上的主人，晋平公不可能不知晓、不过问，只是他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左传》中并未提及，倒是在《国语》中留下了一段《阳毕教平公灭栾氏》的故事。

《国语》的作者推崇士匄、贬低栾盈的色彩十分鲜明，因此叙述这段故事的本意也是要宣传阳毕之贤，从而为士匄驱逐栾氏的正义性寻求支持。但若仔细分析其中的话语，我们似乎也能从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中嗅出威逼利诱的味道，同时也能品味出晋平公在处理争端上的无力感。

与《左传》的叙事略有不同的是，《国语》对这起事件中的一些细节做了调整，说是栾盈被诱往著地筑城后，其同党箕遗、黄渊、嘉父大约是察觉出了其中的异常，于是便先行作乱，想替栾氏驱逐范氏。但由于范氏防守严密，三人政变失败，因此才尽被诛戮，这就使得士匄从一个主动发起政变的始作俑者，变成了出于正当防卫目的被动搅入乱局的受害者。

箕遗等三人畅行祸乱之罪既定，晋平公只好将其党羽尽行驱逐，但在驱逐栾盈一事上，晋平公却始终不愿松口。这时就有一个名叫阳毕的人前来游说，他先是循循善诱地启发道：“这次祸乱虽然平息了，可祸乱的本根还在那里。枝叶不断生长，本根也就更加茂盛，祸乱自然也就难以止息了。如果想要彻底消除动乱，就必须要用大斧砍去它的枝叶，断绝它的本根。”

阳毕所指的“本根”实际上就是栾盈，其意是在说箕遗、黄渊、嘉父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兴乱，是因为有栾氏的支持。如果任由栾氏壮大不予修整，那么将来必定会产生更多的祸乱，甚至会威胁到公室的生存。因此，消除祸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斩草除根，将栾氏这棵大树连根拔起，那些兴风作浪的人就会因为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难以有所作为。

但对于阳毕先入为主的论断，晋平公显然是不认同的。他很不客气地指出：自晋穆侯以来，晋国内部祸乱不止，并非今日才有。而祸难的根本在民心不足，当政者背弃百姓招致祸患，可不是什么乱由栾氏所起。从这些表述来看，晋平公的立场是同情栾氏的，他并不愿意亲自下达清除栾氏的命令。

眼看无法说服晋平公，阳毕只好转变方式，说：“国君手中掌握着权威，就要明确教令、惩恶扬善，就要扶植那些世代有功于国的贤人，驱逐肆意妄为、损君乱国的佞人。只有这样才能申明国君的权威，使百姓畏其威而怀其德，对国君的命令无有不从，不敢苟且偷安，更不敢图谋作乱。”

在阳毕看来，栾氏就是损君乱国的典范：“当年栾书颠覆晋国大宗，杀害厉公而增加自家的权势，若是这样的罪行都不得到惩罚，那还如何树立国君的权威，如何劝民向善呢？”

与此同时，他还对晋平公施以利诱，说：“尽管我们灭掉了栾氏，但如果能够重新起用瑕嘉（詹嘉）、原轸（先轸）、韩万、毕万（魏氏）的后代，赏赐扶持他们，那么百姓就会怀念国君的恩德。如此一来，国君的权威和恩德全都树立起来了，百姓也就知道了国家的政策导向，以后即便是有人想要作乱，又有谁会跟从他们呢？”

可任由阳毕怎么说，晋平公就是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看来，栾氏是“根红苗正”的公族势力，与公室是唇齿相依的利益共同体。范氏在对栾氏“去

其枝叶，绝其本根”的同时，也等于是在剪除公室的枝叶。一旦栾氏被剪除了，公室也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屏障，未来的生存环境势必会更加艰难。如今范氏的说客以为公室分忧为名，明目张胆地要晋平公亲手剪灭公室枝叶，话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真真是其心当诛。然而，晋平公又不敢公然与范氏撕破脸面，只好又反驳说：“栾书曾拥立先君，栾盈本身也没有过错，我们为何就非要灭绝栾氏呢？”

阳毕回答说：“治理国家不能只图眼前的权宜之计，否则百姓就会认为国家法度都是可以变通的，便得不到有益的训导。谋划国家大事也不可以因为有私恩便隐蔽罪过，否则人人都论起祖上的功业来，政令也就无法推行了。长此以往，和没有国君还有什么区别？这对国家难道不是大害吗？您身为国君，难道就分辨不出其中的利弊吗？”

看到晋平公完全不为所动，阳毕心里也着急起来，于是便退而求其次：“如果您实在是怜惜栾盈，不忍对他太过苛责，那您至少也要公开驱逐他的同党吧？您舍不得跟他撕破脸面，您至少可以用治国的大道理规劝让他认识到错误自己离开吧？等他离开了，我们只需要做好防备以观后效即可。如果他死活都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肆意妄为试图报复的话，那么他的罪行就严重了，就算是灭掉他们的宗族也不为过。若是他还有一丝敬畏之心逃到了远方，那么我们就给他居住的国家多送些礼物，让他们多多关照，以此来报答栾氏家族过去的恩德，岂不是更好吗？”

阳毕的这番话颇有些试探人性的味道：尽管你是无罪的，但我们还是想测试一下你的忠诚度。如果你能经受得住考验，那么将来还是好朋友；若是你不幸未能守得住底线，我们可就不客气喽！但我们要说了，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每个人身上都有数不清的弱点，只要你给出的条件够苛刻，就没有

人能够经守得住底线。因此，凡是试图考验人性的人非蠢既坏，而阳毕显然属于“坏”的范畴。

话说到这个份上，晋平公也算是为栾氏争取了最大的权益。因为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争辩，也终究改变不了栾氏被驱逐的现实。而为了博得晋平公的首肯，阳毕在劝导时表也代士句提出了两条交换意见：其一是晋平公可以大量起用旧族来填补栾氏留下的空白，这是以前历任君主都曾做过的事情。其二是士句答应会善待栾氏，只要他肯出逃国外不再作乱，那么晋国可以向所在国赠送礼品，要求对方多加关照。

按照《国语》给出的美好结局，晋平公同意让阳毕和祁午去驱逐栾盈；而在栾盈出奔后，晋平公也如愿向全国颁布命令说：自晋文公以来，凡是对先君有功而其子孙却没有做官的，一律授予爵位官职，能够访求到有功者子孙的，一律给予奖赏。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安全声明

倘若《国语》中的叙述确有其事的话，我们也只能说晋平公毕竟还是太年轻、太幼稚了。让阳毕和祁午代表公室驱逐栾盈，就等同于是以国君的名义为栾盈的叛逆定了性，以后士句无论对栾盈做出了什么不人道的事情，都是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而阳毕代表士句所提出的那些条件，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头支票，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

我们首先看起用旧族这一条。如果是在景、厉时期，国君还享有一定的权威，卿族与普通大夫之间的权势和财富相差不大，那么政策一旦颁布，必定会一呼百应。比如受宠于公室的荀首、韩厥、伯宗以及后来被驱逐的所谓不臣者七人，他们即便不能担任卿职，也很乐于为国君卖命。

然而到了晋平公时期，局势已经与之前完全不同了，这就使得那些即便是有野心的人也往往对公室的宠幸避之唯恐不及，更不要说还要挤破脑袋去为国君谋福利了。六卿之中实力最弱的韩氏之所以敢于蹚这趟浑水，也是有赖于与赵氏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像他们这样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交情，在晋国这种残酷的斗争环境下是活不下去的。

这种迹象在晋悼公十四年（前560年）的绵上治兵时便已经显现，当时晋军还保留着四军八卿的体制，但因智罃、士魴去世，其继承人还都年幼无法担任军职，新军将佐的位置便空置了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晋悼公始终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填补这个空白，而那些惯于钩心斗角的大夫们也没有谁敢于毛遂自荐，最后不得不于次年将新军裁撤。

栾盈被驱逐之后，晋平公也找过一个人来填补六卿中的空缺，这个人便是出自荀氏旁支荀雅的后人程郑。若是放在以前，能够在六卿中占据一席之地，那该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美事，可程郑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喜反忧，每日里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把这个位置推让出去。有一次郑国使者公孙挥（子羽）到晋国访问，程郑与其有私交，于是便私底下向他请教：“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平安地降级呢？”

公孙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一时也答不上来。后来公孙挥回国，跟郑国的贤人然明说起了这件事，然明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这个程郑恐怕是命不久矣，即便不死估计也会流亡国外。”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其预料，到第二年程郑真的就死去了。

从晋平公九年（前549年）冬天被任命为下军佐，到晋平公十年去世，程郑为卿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过一年。从他向公孙挥询问的那段话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推测程郑是被从天而降的职位给吓死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程

郑的死或许与士燮求死的做法相似，都是用自己的死来换取宗族的持续发展。

事实上，不仅仅是在晋国，类似于程郑这样退避的做法在整个中原并不鲜见。比如齐国大夫晏婴，他在父亲去世的时候特意降低了守丧的规格，有人提醒他说：“这不是大夫该用的礼节。”晏婴却回答说：“只有卿才算是大夫，才能使用大夫的礼节，我还是免了吧。”

后来齐国发生了庆氏之乱，有鉴于晏子对公室的忠诚，齐景公打算封给他六十邑作为奖赏，但被他断然拒绝了。与此同时，与晏婴一同受赏的子雅也只接受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子尾则在接受之后不久又归还了封邑。

卫国的公孙免余有功于公室，卫献公准备赐给他六十邑，且任命其担任卿职。但公孙免余认为自己地位低微，如果有了与自己地位不匹配的俸禄是取乱之道，因而坚辞不受。在卫献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勉强接受了其中的三十邑，但却拒不接受卿的任命。

在郑国，出于七穆家族印氏的公孙黑肱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他在临死前将自己的大多数封邑都归还给了公室，只留很少一部分供给后人的吃穿用度和常规祭祀之用。除此之外，他还遣散了大量的用人和仆役，家里的一切活动包括祭祀都要从简。国氏的子产因伐陈立功，郑简公赐给他六个邑，他也坚辞不受，在郑简公的一再坚持下，最后也只接受了其中的三邑。

在宋国，曾经主持弭兵会盟的大夫向戌，一开始为自己能够推动晋楚和议而沾沾自喜，于是便向宋平公请求六十个邑作为赏赐。但后来听了乐喜的分析，他又突然深感不安，急忙又向宋平公推辞了封邑。

对于为何会选择以减少封邑的办法来谋求自保，晏婴曾一语道破真谛。在他看来，追求生活富足、器用不竭是人之本性，自己也不能例外。但人的私欲一旦得到满足，往往就会变得奢侈放纵、道德败坏，这样距离流亡也就不远了。因此，他之所以推辞赏赐，并不是因为不希望变得富有，而是害怕因此惹来杀身之祸，以至于连自己原有的财富都会失去。

在长达百年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各国大夫都普遍认识到了“族大多怨”“族大逼君”的危害，因此降低礼仪的规格、减少自己的财产封邑，这也成为居于中产阶层的大夫寻求宗族安定的一种普遍形式。

对于程郑来说亦是如此，他并不是不愿意成为六卿中的一员，只是在当下的时节里，卿族与普通大夫之间已经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得六卿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利益集团。仅凭着一个毫无实权的国君的宠幸，很难让他在短时间内实现财富与威望的快速增长，更遑论要越过那道看不见的鸿沟了。

而在栾盈被逐的节骨眼上，眼前发生的一切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让程郑深刻地体会到：以栾氏百年世卿的丰厚积累都无法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幸免于难，自己又哪里敢说就一定有保全自身的智慧呢？在此情形之下，以自己肉身的消亡来换取宗族的安定，也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这就好比是刘慈欣在《三体》中所阐述的“宇宙安全声明”，落后的文明一旦被暴露了，想要在宇宙中求得一席之地，就需要向高级文明表明自己是无害的，而唯一无害的可能就只有死亡。

禁锢栾氏

程郑的死对于晋平公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他从士匄那里换取的“起用旧族”的条件，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不仅如此，以其当前所拥有的权势，别说是起用旧族了，甚至连现有的公族都无法保全。

士匄以意图作乱为由驱逐了栾盈，罪魁祸首已然受到制裁，按理来说也就该收手了，然而对于士匄来说，这一切还都只是刚刚开始。由于栾盈在国内有着丰厚的人望，士匄担心他会利用国内的关系再杀一个回马枪，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国内展开了一次大清洗。

在这次政治事件中，除了前文提到的箕遗、黄渊、嘉父三人之外，受到株连的还有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黑等一千公族，与这些人有牵连的如伯华、叔向、籍偃等人也都被抓捕入狱，预先得到消息的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辛俞、羊舌鲋等人纷纷出逃国外。

遍数进入春秋以来晋国内部所发生的历次政变，斗争的激烈程度和牵涉的广度都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晋成公之前的历次政治斗争，大都只针对游戏参与者本人，并不牵累到家人，即便有人想要突破这个底线，也大都遮遮掩掩，不敢公然挑战公序良俗。而自晋景公时期开始，政治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向，此后的先氏、赵氏、郤氏几乎都遭灭族。而发生在晋平公六年的这次政治事件，则不仅牵连到了当事者的家人，还进一步波及了国内十几个家族，基本上已经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事件了。

而从个人身份上来看，受到牵连的大都属于正牌的公族，也即所谓的“公室枝叶”。这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有四个人，分别是被杀的羊舌虎（叔虎，羊舌职幼子），被拘禁的伯华（羊舌赤，羊舌职长子）、叔向（羊舌肸，羊舌职次子），以及流亡在外的羊舌鲋（叔鱼，羊舌职三子）。这四个人都属于羊舌家族，而羊舌氏又是晋武公之子伯侨的后裔，其与公室间的血缘关系比六卿中韩氏还要更近一些，是屏护公室最为有力的家族之一。

羊舌氏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氏族，族中贤人辈出，尤其是这次受到牵连的伯华、叔向，在列国都是极有声望的人。孔子对这两个人都尊崇备至，曾

有过“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有定矣”“叔向，古之遗直也”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叔向在当时还担任太傅之职，是晋平公的老师，连他都无法避开这次的事件，从中也可窥见晋平公在处理国内事务上的无力，而士匄的险恶用心更是昭然若揭了。

除此之外，在对待栾盈的态度上，士匄也并没有信守承诺。按照阳毕的说辞，栾盈出奔之后，只要放弃报复的打算，是可以对他网开一面的。然而事实上，栾盈于晋平公六年（前552年）秋季出奔，到今年冬天，士匄就在商任（今河北邢台任泽区东）召开了一次列国会议，而这次会议唯一的议题便是“锢栾氏也”，也即不允许任何人收容栾盈。

士匄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栾盈本人，而是包含了整个栾氏家族及其所属的封邑。鄢陵之战爆发前，士燮在劝阻栾书的时候，曾指责晋厉公“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为了给宫中妇人赏赐土地，必然会“夺诸大夫田”。然平心而论，遍观诸卿大夫的争斗史，这些卿族之所以能够拥有与公室对抗的资本，又何尝不是“夺诸大夫田”的结果？而当公室和普通大夫的财富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时，互相之间的倾轧兼并也就成了必然。

如今栾盈虽被赶出了国门，但整个栾氏家族却依然控制着大量土地，没有正当理由显然是不能随意褫夺的。更何况，晋平公本人对栾盈的遭遇持同情态度，假如有一天他突然宣布要给栾氏确立一个新的宗主，那么士匄原本的计划就全部泡汤了。要想达到消灭栾氏、侵占其土地的目的，就必须激怒栾盈，让他带领整个宗族造反，这也是士匄故意要留下栾盈性命，同时在盟会上一再宣称要禁锢栾氏的用心所在。

第二节 固宫之役

栾盈奔齐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看栾盈的行踪。晋平公六年秋季，栾盈奉命到著地筑城时，被士匄设计赶出了晋国。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不知该去往何方的时候，却又在天子脚下遇到了剪径的强人，随身所带的财物也被洗劫一空。

栾盈实在走投无路，只好通过王室使者申诉说：“天子的陪臣栾盈，因得罪了为天子守土的臣，本打算逃亡以躲避惩罚，可是在天子郊外却又获重罪，实在无处可逃了。栾盈只能冒死进言，希望天子能够体谅：当初栾盈的祖父栾书曾为王室效力，天子曾大为赞许，无奈父亲栾黶没能守住这份功劳，以至于让栾盈流落到此。如果天王还念着当年栾书的功劳，给栾盈留一条活路，陪臣自当感激不尽。但如果天子不顾栾书的功劳，只记得栾黶的罪过，不肯给栾盈改过的机会，那么陪臣也只能回国死在军尉的刀下，不敢劳烦天子了。臣直言不讳，如何处分，还请天子定夺。”

周天子既得罪不起晋国，也得罪不起晋国的卿大夫家族，毕竟栾盈虽被驱逐，可栾氏的宗族和封地还在。即便栾盈回不了国，万一栾氏又有了新的继承人来找麻烦，自己还是招架不住不是？于是周灵王赶紧劝说那些劫掠栾氏的人把东西都送回来，还派人大张旗鼓地把栾盈这个烫手的山芋送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才算心里踏实了。

离开成周后，栾盈先是去了楚国。但彼时楚国正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对付吴国上，因此不愿因区区一个栾盈而向晋国轻启战端，无法为他提供必要的协助，这就让栾盈很是失落。

无奈之下，栾盈只好在楚国暂住下来，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光。假如未来的日子一直都这样度过，就等于是向国内的敌人释放了安全声明，这对栾盈来说或许也不是什么坏事。然而栾盈却始终放不下心中的屈辱，更不愿意接受命运的不公，他一直敏锐地关注着北方的消息。直到第二年的秋天，一个满面风尘的使者突然打破了这平静的生活，又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原来，就在他被赶出国的那段时间里，士匄借晋平公的名义发布命令，所有栾氏的臣属皆不允许随亡国外，否则一经发现必定处死并曝尸示众。可尽管如此，仍挡不住人们纷纷出逃的步伐，这其中就包括名士辛俞。

辛俞在出奔途中被抓了回来，《国语》以晋平公的语气指责他，说：“国家已经发布禁令，你为何要明知故犯？”但从辛俞的说辞来看，责问他的显然不是晋平公，而是执掌政权的士匄。

面对责问，辛俞振振有词地反驳道：“正是因为遵守法令，我才出逃的。执政下达的指令一直都是‘不要跟从栾氏，而要跟从主君’，可国君也曾教导我们‘做大夫的家臣三代以上的就要像对待主君一样侍奉大夫，两代以下的就要像侍奉主人一样’，侍奉主人只需要尽职尽责即可，但侍奉主君就应不惜以死殉职。我辛氏在晋国无依无靠，自我祖父开始就已成为栾氏家臣了，自然要像侍奉主君一般以死相报。如今执政命令‘不听从主君的要遭杀戮’，我又怎敢因贪生怕死而背叛主君，从而给自己惹来官司呢？”

除了辛俞之外，在同一时期逃亡出境的还有两位勇士州绰、邢蒯。在他们刚刚流亡之时，乐王鲋曾建议士匄将二人召回来，但士匄却很轻蔑地说：“他们是栾氏的勇士，对我来说有什么用？”

乐王鲋说：“如果您做他们的栾氏，那他们就是你的勇士了。”乐王鲋的本意或许是想让士匄减少杀戮，多学习栾盈乐善好施的精神，好让栾氏的

死士景行影从地前来归附，但士匄却不愿意做一个广施恩德的长者，因此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州绰、邢蒯出逃后与知起、中行喜一道去了齐国。齐庄公在会见晋国亡臣时对他们还很轻视，于是就指着自己的两名勇士殖绰、郭最向他们介绍说：“这是我的雄鸡。”不料流亡在外的州绰却丝毫不顾忌主人的感受，很是不屑地讥讽道：“您认为他们是雄鸡，下臣也不敢反驳。但是在平阴的战斗中，我可是比他们二位先打的鸣。”

州绰所说的是平阴之战时的一桩旧事。当时齐灵公因首战败北而仓皇撤退，有齐国勇士殖绰、郭最为之殿后。州绰追击齐军奋勇当先，连射两箭都射在殖绰的肩膀上，而且巧的是，这两支箭一左一右地卡着殖绰的脖子，让他无法动弹，最后只能乖乖受俘。也正是因为如此，州绰认为自己比齐庄公的勇士更加勇猛，所以才说自己比他们先打的鸣。

后来齐庄公设置勇士的爵位，殖绰、郭最都想参加，州绰又提起平阴战后在秦周的一次战斗。当时州绰奉命攻打东闾，由于战马被绊住，盘旋良久不能前进，他便一边战斗，一边忙里偷闲地数了数门扇上的铜钉。他煞有介事地提起这件事，看着满脸尴尬的齐庄公，很有些轻蔑地问道：这勇士的爵位是不是也该有我一份呢？

齐庄公实在是被他气疯了，便回绝说：“你当时的作为可都是为了晋君啊！”州绰似乎并不介意这些，他只是想羞辱一下齐国勇士，也很不客气地回答说：“臣在齐国的确是初来乍到，但您的这两位勇士，如果把他们比作是禽兽的话，臣早已经食其肉、寝其皮了。”

州绰的这一系列的举动很是无礼，但似乎又是在故意试探齐庄公。齐庄公被州绰一顿羞辱，非但没有发怒，反而对其更加优待，这就等于是向栾氏

释放了一个愿意合作的信号。在得到这个信号之后，身在楚国的栾盈很快就收拾行囊，于晋平公七年启程去了齐国。

齐国大夫晏婴听闻栾盈到来，便急忙劝谏齐庄公切勿收留。毕竟晋国在商任会盟时有话在先，如果失信于晋国，难免为齐国引来祸患。但他的一番肺腑之言终究入不了齐庄公之耳，最终栾盈还是成了座上宾。后来晋国又在沙随（今河南宁陵东北，宋邑）举行诸侯会议，再次重申了禁锢栾盈的要求，但齐庄公早就打定了借栾盈扰乱晋国的主意，并不太理会晋国的主张。

到了晋平公八年（前550年）春，齐庄公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晋国准备嫁女到吴国，于是便利用这个机会，派大夫析归父以为晋国作媵为由，用篷车装着栾盈和他的同伙偷渡进入晋国，并将他们安置在栾氏根据地曲沃。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栾盈在内外势力的裹挟下，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场惨烈的内战也即将打响。

栾盈归晋

晋平公八年四月，栾盈在齐国送媵车队的掩护下，带着他的死党秘密潜入曲沃，并趁着夜色会见了一个名叫胥午的人，将自己预先制订的计划和盘托出。

说起这个胥午，也是名门显贵之后，往前追溯几十年，其所在的胥氏家族也是在晋国颇有影响力的一支公族。最早在晋文公流亡之时，就有胥臣（司空季子）常随左右，后被列为晋文公五贤士之一。城濮之战前，因中军将帅郤穀阵前去世，原本担任下军佐的先轾被超拔为中军将，而胥臣也因此被选拔为卿，担任下军佐。三年后，晋文公裁撤三行建立五军，又有胥婴被举拔为卿，与胥臣同时位居十卿之列。

胥臣、胥婴去世后，又有胥甲出现在赵盾所组建的六卿之列，担任下军佐。不过与前代的两位相比，胥甲多少有些轻狂浮躁，在著名的河曲之战中伙同赵穿扰乱军行，让赵盾很不满，于是便找了个借口将其发配到卫国了事，其职位则由其子胥克接替。不过，胥克在下军佐的位置上也没待多久，到赵盾去世后，继任的中军将郤缺为了将赵朔安插到六卿之列，以患有蛊疾为由废去了其卿位，胥氏家族也就从此没落了。

一个原本兴盛的家族突然跌落泥潭，这种事情无论放在谁身上都不会乐意，胥氏家族自此也就将赵、郤两家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后来赵氏在下宫之役中落难，而郤氏家族则如日中天，权势愈盛，让当时的公室以及执政栾书都颇为忌惮，胥克之子胥童便借机为晋厉公出谋划策，发动了著名的车辕之役。

车辕之役使郤氏合族覆灭，报了当年胥克被废的仇怨，而胥童更是因立下功勋被安插进了卿列，胥氏家族的复兴似乎也是指日可待了。然而让他怎么都想不到的是，由于此前曾在朝堂上拘捕栾书、荀偃，让这二人受到了惊吓，他们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国君也劫持了，胥童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刀下的冤魂。

经历了如此惨烈的事件，胥氏家族从此一蹶不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栾氏和胥氏之间也算是有血海深仇的，作为胥甲的儿子，胥童的叔父，胥午之所以会跌落为庶民，也是全拜栾氏所赐。按理来说，车辕之役到如今才刚刚过去二十年，胥午和栾盈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走在一起的。

但现实就是这么奇妙，栾盈虽然年纪不大，却十分善于结交士人，就连有着血海深仇的胥午都能被收入麾下成为忠实盟友，也难怪会让士匄寝食难安。而从胥午的角度来讲，他这个人比较崇信天命，认为上天决定废弃的家

族，凭人力是无法将其复兴的，因此对于家族的衰落并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怨恨栾氏。

也正是因为有着如此深刻的天命观念，当栾盈突然现身的时候，胥午的第一反应就是连连摇头，他说：“上天所要废弃的，谁能将其兴起？我并不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实在是你的想法不可能取得成功，就算是做困兽之斗又有何益处呢？”

但栾盈决心已定，他言辞恳切地回应道：“即便如此，我也愿意一试。哪怕上天真的抛弃了我，可只要想到还有你坚定地站在我身边，就没什么可后悔的！”

听到栾盈的话，胥午不觉有些悲伤，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士为知己者死”，栾盈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自己，同时还以如此重要的使命相托付，就等于是将生死完全交到了自己的手中，天底下还有什么样的信任能高过于此呢？

主意已定，胥午立即就开始为栾盈筹划了。他先把栾盈藏起来，然后请曲沃的士人们到自己府上喝酒。酒过三巡之时，堂上音乐突然奏响，悲怆的乐声在人们身边环绕，胥午似乎突然触景生情，不禁哀叹道：“如果栾孺子还在，该有多好！”

听到此言，众人不禁都有些悲戚。眼看着胥午说话间便泪眼婆娑，便有人上前解劝，这时胥午又问道：“如果现在找到了栾孺子，你们还会跟随他吗？”

这些士人在栾盈的麾下都感受到了贵族的尊严，然而栾盈一去，生活变得似乎不再像以前那般滋润了。此时他们心中大概都在想，以后恐怕再难遇

到像栾盈这样乐善好施的领主了，可就是这样的善人，为什么偏偏就不能在晋国立足呢？想到这里人们不禁悲从中来，有人嗟叹，也有人哭泣，更有人仗义执言，说道：“如果能找到主人，就算是为他拼了命也值得！”

胥午又三番五次地问道：“如果栾孺子回来了，大家准备怎么做？”所有人都纷纷表态，说：“只要能找到主人，随他一起拼命就是了，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听到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栾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痛哭起来。他从后堂走出，对着众人一拜再拜，而那些前来饮酒的士人们看到栾盈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也都抑制不住情绪，胥府上下顿时哭成一团。

在胥午的推动下，晋国上下的士子们广为串联，保密工作也做得十分周密。很快栾盈就整合了不少力量，旋即开始向自己的外公发起了回击。

拼死一搏

兵贵神速。待一切布置停当，包括曲沃在内的所有栾氏封地都迅速武装了起来，大部队气势汹汹直逼新田而来。早已事先串通好的下军将魏舒和七舆大夫，则利用他们在军中的地位暗中操作，光天化日之下将叛军直接放入都城。到了这个时候，士匄才得到消息，一时间六神无主，全然不知该如何应对。

当时乐王鲋（乐桓子）正陪侍在侧，看到士匄手忙脚乱，急忙上前帮助他稳定情绪，随后条分缕析地对比了双方的优劣。

首先，由于早年栾黶骄横跋扈、四处树敌，如今支持栾氏的有效力量实际上只有魏氏和七舆大夫。而栾氏与魏氏的同盟关系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完全可以用强力手段将其争取过来。与之相反，士匄本身就是执政，手中掌握

着对百姓行赏罚的职权，完全可以借此动员全国力量为己所用，在法理和兵力上都有很大的优势。

其次，栾盈从外偷渡回国，仓促之下准备得并不周密，他的优势只是打一个时间差，也就是趁范氏有生力量尚未集结起来的时候搞突然袭击。而想要瓦解对方的优势，只需要充分利用都城内现有力量拖延时间，一旦增援的兵力进入都城，栾盈就毫无胜算了。

有鉴于此，乐王鲋建议士匄立刻“奉”国君躲进固宫，这样一方面可以依靠宫城的防卫设施拖住叛军，另一方面也能以国君为挡箭牌，让栾氏亲兵投鼠忌器，这个时间差也就被消解掉了。

士匄闻言当机立断，分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栾盈起兵的时候，晋平公的舅舅杞孝公刚去世不久，晋平公的母亲悼公夫人正在服丧期间。士匄趁着公室姻丧的机会，换上了黑色的丧服，与两名妇人一起坐上车去往公宫，将晋平公挟持到固宫。

与此同时，士匄还派儿子士鞅出马，设法消解魏氏对栾氏的支持。当时魏氏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魏舒登上战车正要命令全军接应栾盈。这时，只见有一单车直入阵中，士鞅从疾驰的车上纵身跳下，随后不由分说就跳上了魏舒的战车，一手抓着车轼，另一手则用剑挟持魏舒，命令御戎驾车离开了军阵。

魏氏的军队全都傻眼了。眼睁睁地看着魏舒被士鞅挟持着扬长而去，却不知该如何应对。遭遇这突然的变故，魏舒也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正当他无比错愕的时候，只听得耳旁士鞅的声音响起：“栾氏率领叛军进入国都，

士鞅的父亲和大夫们都在保护国君无法抽身，因此派士鞅来迎接您，士鞅自愿担任您的车右。”

到了宫中，魏舒虽然知道自己处境不利，但还是怒气难消。士匄于是便亲自出来迎接魏舒，并承诺会将曲沃送给魏氏。面对这么大一块馅饼，魏舒的内心也的确有过艰难的挣扎，但最终还是利益战胜了仁义、恐惧战胜了道义，让他果断地放弃了与自己共患难的栾盈。

双方的军队在都城杀得昏天黑地，范氏的武装渐渐无法支撑。特别是栾氏有一个勇士叫作督戎，简直是一个见神杀神、见佛杀佛的魔鬼。士匄在宫墙上眼睁睁地看着他左冲右突，范氏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心中焦急万分。这时有一个名叫斐豹的奴隶凑上前来，说：“如果您能烧掉记录我奴籍的竹简，我就为您杀掉这个人。”

士匄突闻此言自是大喜过望，可如今军情紧急，我也不知道你的奴籍在哪个竹简上写着呢？这样吧，干脆我给你发个誓：“只要你能杀掉督戎，我一定请求国君烧掉你的奴籍，有太阳为证！”

既然堂堂执政都放话了，斐豹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于是便披挂上阵，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宫门，像一头野兽一般朝着督戎的方向杀了过来。督戎正杀得眼红呢，突然就看到有这么个愣头青左冲右突、杀人无数，时不时地还冲着自己比画，挑衅意味十足，当下便一路跟了上来。

斐豹知道督戎注意到自己了，于是便翻过一堵矮墙，在墙后面等着督戎。督戎也不知这厮卖的是什么药，也翻过矮墙去追，却怎么也找不到对方了。正当他抓耳挠腮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后心一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击中后心一命呜呼了。

尽管杀掉了对方一员猛将，但由于军队准备仓促，还是被叛军攻入了宫内。士匄带着国君躲在公台的后面，生怕对方进来要了自己的命，于是就对士鞅下了死命令，说：“如果对方的箭射到国君的屋子，你就死定了。”

在这关乎家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士鞅自然不敢轻敌怠慢，于是就带着步兵从旁杀出，直打了栾盈一个措手不及。士鞅在宫门的阻击有效地为范氏军队争取了时间。这段时间里，各家的援兵源源不断地赶来，局势也终于出现了逆转。

战事进行到这个阶段，栾盈就算是再不甘心，也知道大势已去，只得带着亲兵一路败退，而士鞅也毫不留情，跳上战车一路追击。追击途中，士鞅遇到了自己的发小栾乐，便有心劝他归降，还说：“如果我要死了，就要去向上天控告你。”

听到士鞅的劝阻，栾乐非但没有理会，反而拈弓搭箭就射向士鞅，被士鞅躲了过去。而就在他准备再射的时候，战车一个不小心撞上了槐树凸出地面的根，疾驰的战车顿时腾空而起，翻倒在地上。栾乐受伤倒地、呻吟不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追兵蜂拥上前，用戟钩打断了自己的手臂，最后活活疼死了。

栾盈带着受伤的栾魋逃入曲沃，而士鞅带着追兵穷追不舍，不过多时就将曲沃团团围住。这次的围城战役持续了半年之久，一直到当年的秋冬时节，孤城曲沃才终于被攻破，包括栾盈在内的栾氏宗族被屠戮殆尽，只有栾魋逃到了宋国。

死而不朽

曲沃的最终陷落，标志着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二百年、在六卿体制中存续了八十余年的栾氏家族正式谢幕。持续了十几年的栾、范冲突以范氏的全面胜利宣告结束，士匄在国内的权势也达到了顶点。

晋平公十年（前548年）五月十七日，齐国发生了崔杼弑君事件，在位不满六年的齐庄公死于非命。与士匄的做法类似，崔杼旋即在国内展开了一场大清洗，包括栾氏旧臣州绰在内的十余名齐庄公党羽遭到清算。两天后，崔杼立齐庄公之弟杵臼为齐景公，并在随后的夷仪之会上以一种极其耻辱的方式向晋国请求和解，标志着十余年来齐国对晋国的挑战也告一段落。

随着这两场冲突的结束，晋国内部政治格局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固宫之役的爆发，彻底击碎了公室的权威，使晋国政治的天平完全倒向了骄奢的世卿，从此以后公室再也没有了与六卿对抗的资本，晋国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这些成就的取得，让士匄不禁感到飘飘然，原本就有所显现的骄狂情绪便更加无法抑制了。就在栾氏覆灭后的第二年，鲁国大夫叔孙豹访问晋国，士匄亲自接待了这位来自远方的贵客。宴席之间，士匄漫不经心地提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古人经常说‘死而不朽’，这是什么意思？”

这副洋洋自得的姿态让叔孙豹很不舒服，很想给范氏做一个不祥的预言，但出于贵族自身修养的约束，最终还是忍住了。倒是士匄内心懈怠，本就没想着让他回答，在卖了个关子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解释道：“士匄从前的先祖们，在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时是御龙氏，在商朝时是豕韦氏，在周朝时为唐杜氏。周朝衰亡以后，晋国做了华夏联盟的盟主，这时又有我范氏。所谓的‘死而不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叔孙豹听罢颇感无语，不过为了避免此等歪理邪说贻害世人，他还是对士匄的说辞作了一些修正：“据在下所知，你所提到的这些叫作‘世禄’，与人们常提到的‘不朽’恐怕还相差甚远。早年鲁国有一位先大夫名叫臧文仲（臧孙辰），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可时至今日，他所说过话仍时常被人们当作箴言广为传颂，所谓‘不朽’，说的就是这个吧！”

紧接着，叔孙豹抛出了儒家所倡导的三不朽，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他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莫过于树立德行、泽被后世；其次是建立功业、经世济民；再其次则是言传后世、启迪人心。即便是国家已经倾覆、宗族已经灭失、个体已经消亡，这些完全超越了个体生命、宗族成败和物质得失的德行、功业和学说，仍旧能够穿越漫长而久远的时空激发人们的共鸣，给人带来奋进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才是真正的“不朽”。

叔孙豹最后回到正题，说：“至于您所提到的那些，不过是保存了氏族传承和宗族祭祀，这在任何国家都很常见，并不能说是不朽。如果说您祁姓宗族发展到今日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也不过是官做得比别人大，俸禄比别人多，仅此而已。”

听完这些话，士匄究竟是何反应，史料上并未阐明，而从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显然没有把叔孙豹的话放在心上。在随后的几年里，士匄的权力欲依旧在不停地膨胀。依照《左传》的一贯思路，当身居高位者出现了骄狂放纵或懈怠苟安的情绪，即便没有面临重大灾难，也往往是人之将死的预兆。

果然在这件事发生的两年后，一代强人士匄就不声不响地谢幕了，那个在下宫之役中存活下来的“赵氏孤儿”赵武，开始正式登上了执政的位置。也正是从此刻开始，为了集中精力处理国内关系，有关弭兵会盟的各项工作

也有条不紊地推进起来，晋国的历史又将步入一个新的纪元。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身为一国之君的晋平公又该有些什么作为呢？

第三节 晋君少安

好营重赋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当中，晋平公给人留下的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形象。在他担任国君的二十六年间，不但晋国公室的权威开始急剧下滑，就连维系了长达百年的霸业也走上了末路穷途。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败家子，能够将晋国历代先君打下的基业败得如此彻底，没有些发展到极致的特殊爱好显然是不能服众的。为了证明晋平公是导致晋国走向衰落的元凶，史料连篇累牍提供了大量例证，而这其中的第一桩罪证就是喜欢营建宫室。

得益于弭兵会盟带来的和平局面，到晋平公在位的中后期，诸侯之间互相攀比似乎成为一股风潮，而兴建宫室便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这段时期兴建的宫室中，在楚国有著名的章华台，落成于晋平公二十三年（前535年）。而在章华台兴建之前，楚国的宫殿就已经很豪华了，到楚国朝见的鲁襄公对其宫殿的华美感到十分艳羡，回国之后便照猫画虎仿造了一座楚宫，最后就死在这座新建的宫殿里。

在跟诸侯比阔这件事情上，晋平公也是不遑多让的，一出手就兴建了两座宫殿，而且规模都殊为宏大，远比章华台和鲁国的楚宫气派得多。其中一座是铜鞮宫，位于晋国都城新绛东北的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宫殿规模宏大，宫城绵延数里，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在晋平公十六年（前542年）前就已经建成。

这座宫殿若论营建技巧、艺术水准或许不能和后世的皇家宫苑相提并论，但规模宏大，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可即便如此，晋平公还是感到不甚满意，于是便又于在位的第二十四年（前534年）开始兴建虎祁

宫。虎祁宫的整个工程历时长达六年，到其子晋昭公即位的第三年才告落成。工期如此漫长，工程如此繁复，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显然不在少数。

晋平公喜营宫室，耗费的钱财仅仅依靠公室本身的土地收益显然是不够的，自然会加重百姓的税赋。百姓怨声载道，可又没有申诉的渠道，于是便搞出一些古怪的事情来进行讽谏。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在虎祁宫兴建的当年，晋国北部的魏榆地方竟然发生了石头开口说话的怪事。

这件事引起了晋平公的重视，于是便找来乐师师旷询问其中缘由。师旷的回答让平公颇感错愕：“石头当然是不会说话的，只不过是有人说话的在利用它做文章，否则的话就只能是百姓听错了。”

会说话的，可以是神灵，也可以是凡人，这句话说得十分隐晦。不过，师旷倒是没有顺着神仙显灵的套路去吓唬晋平公，而是从民情民意的角度分析：“如果国家事务违背了农时，百姓就会心生怨恨诽谤，就会借着不会说话的东西说话。如今您的宫室高大奢侈，百姓的财力用尽，生计难以维持，怨恨聚集起来，石头说话不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嘛！”

师旷以石头说话的传言为契机，暗讽晋平公不顾民间疾苦，陈述恣意享乐、兴建宫室的危害，然而晋平公并没有听进去，虎祁宫的营建工程依旧按照原计划进行。听闻此事，一直尽心竭力维护公室利益的叔向也免不了暗自伤神：“宫殿落成之日，恐怕就是诸侯背叛之时，晋国的末世真的到了。”

事实上，因晋国大兴土木而深受其害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百姓，诸侯列国也大都苦不堪言。弭兵会盟之后，诸侯需要同时向晋楚两国进贡，这种愈来愈重的负担早已超出了人们承受的极限。然而，晋楚两国不但不体恤诸侯的疾苦，反而为了能够尽可能地收敛钱财，频繁征召诸侯来朝，每次前来还都必须带着足量的礼品，否则的话就会派人前去责问。

如今看到他们顶着盟主的光环却不能锄强扶弱、主持正义，反而把自己节衣缩食供养的贡赋都用来挥霍奢侈，诸侯列国对晋楚两霸的不满愈发强烈。早在晋平公十六年，就发生过一起外国使臣破坏使馆的恶性事件，而引发这场风波的不是别人，正是郑国著名的贤臣子产。

这年六月，子产陪同郑简公访晋，但恰逢鲁襄公去世，晋国为鲁丧暂停了礼乐外事活动，只能安排他们先到使馆暂住。晋国能为盟国丧礼暂停礼乐本无可厚非，郑人也依照行人的指引到使馆暂住。可当他们到了使馆之后却顿时傻眼了，晋国给安排的住处局促狭小，内部墙体倾颓、屋顶破败，显然已有多年未经修缮了。不仅如此，郑简公堂堂一国之主，在这矮小的馆舍中住了小半年，晋人好似是将他们忘记了，竟一直都没有召见。子产心中愤懑，干脆下令把宾馆的围墙全部拆毁，然后将财礼晾晒在院子里。

晋人早知道子产口齿伶俐，且行事不依常规，可如今的举动还是令人大感意外，于是便派那位与范宣子同名的士匄士文伯前来责问。士文伯先是掩盖了晋国方面的失职，说：“由于晋国刑法不完备，日里常有盗贼横行，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人修缮馆舍、加高加厚围墙，以便为来使提供一个安全的居所。”紧接着又指责子产说：“如今您为了自己的方便拆毁了围墙，就算是您带的人足够保卫自身安全，可有没有考虑过以后他国的使者来了该怎么办？素闻您是一个做事周全的人，可寡君实在想不通您如今的做法究竟是为了什么，特派遣下臣前来询问。”

看到有人前来问话，子产也是毫不客气：“我们郑国地狭民贫，又处在大国之间，大国索求贡赋没有定时，敝邑也只能时时刻刻准备好财礼，以便随时前来朝见。如今执事事务繁忙，我们无缘得见，又不知何时才能得以接见，故而不敢贸然进献财币，只能将其暂存在宾馆之中。这些财币本是要进献给贵国的，因此可以看作是贵国府库中的财物，若是不经过在庭院里陈列

的仪式，就不敢奉献。而为了尽量保存好这些财物，我们也是殚精竭虑，丝毫不敢懈怠，既害怕其暴露在外因日晒夜露而受损，又担心藏在室内因干燥或潮湿而朽坏，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无异于是在加重郑国的罪过。想来想去，只能将其装车停放在院内，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财物不受损害。”

这段话虽然只是陈述事实，但也已经显露出对晋国索求无度的不满。在做完这番陈述之后，子产才开始放大招：“我听说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宫室十分矮小，没有可供观望的台榭，而客人居住的馆舍却修建得富丽堂皇，就好像是国君的寝宫一样。宾馆内的库房、马厩、墙壁以及馆外的道路都时常派人修缮，从来不会出现车马没有停放的地方、财礼没有放置的处所这类现象。除此之外，晋文公还特意安排专人为宾客提供配套服务，有人专门为车轴加油，有人全程负责打扫卫生，负责养马、供应牲畜的人也都各司其职。除此之外，还派人日夜巡逻，以保障客人的安全，对宾客嘘寒问暖、善加引导，让人宾至如归。宾客在客馆中不用担心安全，也不用为财物的存放而操心，一切都井井有条，就这样，晋文公还生怕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周到。”

“可如今呢？”子产有些按压不住自己的情绪，“贵国新建的铜鞮之宫绵延数里，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而诸侯的使者却住在低矮狭小的客馆中，与奴隶待遇相同。大门低矮狭小，车子进不去，又不能翻墙而入；国境之内盗贼四处行动，而法度松弛不予禁止；宾客觐见没有定时，等待接见可又不知何时才能获命。如果不拆毁围墙，所带的财币就只能放在馆外，任由盗贼掠取，这难道不是在加重我们的罪过吗？敢问执事，你们准备让我们该怎么做？鲁国的丧事，对于敝邑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我们只求能尽早获得接见，及时奉上财礼，只要能够完成使命，我们可以修好了围墙再走，这是贵国对敝邑的恩赐啊！”

子产的这一席话暴露出了晋国在晋平公治下的一些乱象：国际上，对诸侯随意征召驱使没有定时，对来朝使者怠慢无礼，财礼贡赋索求无度，诸侯叫苦不迭而毫不理会，盟主的职责已然抛弃。而在国内，则是对民众大肆盘剥，致使国内治安状况每况愈下，盗贼横行扰乱乡里，而晋平公不思治理，只顾个人享受，难免会引起民怨。

当时的执政赵武听到了子产这番话，深感惭愧，急忙再派士文伯去向郑人表示歉意，同时派人修筑馆舍，又说服晋平公对郑简公以礼相待。但从后来的效果来看，晋平公显然没有将这次的事情放在心上，于是不久后又开始了虎祁宫的营建。

对于这件事，无论是国内的大夫还是东方的诸侯，大都持鄙夷的态度。比如晋平公二十四年（前534年）夏天，诸侯纷纷前往晋国，对工程的顺利奠基表示祝贺。期间晋国大夫史赵与郑国大夫游吉相遇，一见面史赵便抱怨道：“如今的人们这都是怎么了？分明是需要吊唁的事情，可大家却都来祝贺，如此互相欺骗也太过分了吧！”游吉则颇感无奈地回应道：“有什么办法呢？恐怕不仅仅是我，全天下人都会前来祝贺的。”

好色荒淫

晋平公横征暴敛、纵欲无度，导致民怨沸腾、诸侯离心，因而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左传》更是将其列为导致晋国公室权威衰落、霸业秩序无以为继的双重元凶。与古代众多荒淫失国的君主一样，除了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营建宫室这些营生，晋平公生平还有两大爱好，一为好色，二为好音。

关于晋平公好色的言论，史料中虽着墨不多，但言辞却很是犀利。比如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时，因孙林父带着戚邑主权叛逃引发了晋、卫之间

一系列冲突，晋国为包庇孙氏而在澶渊会盟中拘捕了卫国大夫宁喜、北宫遗。卫献公为此亲自到晋国解释，却不料连他自己也身陷囹圄。

诸侯对此高度关注，齐景公、郑简公更是亲自赶到晋国去为卫献公说情，可都没能奏效，到最后还是卫国人送了一个美女卫姬过去，这才把卫献公给救了回来。《左传》因此给出了一个评价，说“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就是说君子通过这件事就知道晋平公是个荒淫无道的君主了。

晋平公每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知节制，到他即位第十七年时终于得了一场大病，而且还久治不愈。当朝执政赵武和上大夫叔向为此到处求神问卜、寻医问药，却始终不见好转。

后来恰好有郑卿子产来访，叔向向他询问，对方很不客气地指出：君子有“四时”，早晨要听取政事，白天要实地考察，傍晚要发布命令，夜里则休养生息。遵从这些规则作息才能够神清气爽，否则的话肌体就会壅塞，导致疾病的出现。同时，按照当时的习惯，人们在互相婚配的时候要遵循“同姓不婚”的原则，这是礼仪中大事。然而晋平公却不遵守这个原则，后宫中光同姓的侍妾就有四个，能不生病吗？

在子产看来，晋平公的病之所以久治不愈，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生活作息不能谨守四时规律、私欲无所节制导致的。如果想要病情有所好转，就要恢复健康规律的作息时，并将这四个姬姓女子都遣散了方可。

子产的话多少还给晋平公留了些面子，可他们从秦国请来的一位名叫和的医生就没那么客气了。医和在查看了晋平公的病情之后斩钉截铁地说：这个病是没办法治的。至于其原因，医和不紧不慢地解释道：这个病初看上去似乎有鬼神降灾的迹象，然则若仔细诊断就会发现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国君

患病的根源在于太过于亲近女色而无所节制，以至于魂魄都给勾走了，因此才会表现出像中了蛊一般神志恍惚的迹象。

晋平公一听这话就有些着急，于是就充满悲戚地问道：“难道女色就不能亲近吗？”

医和回答道：“亲近女色并不会必然导致重病，但若是毫无节制的话，就肯定会出问题。”

事后，晋平公听从子产与医和之言遣散了那四位姬姓的女子，可他对这件事的理解，也仅限于“姬姓女子不可亲近”这个层面上。为了填补后宫的空白，他转眼就从齐国娶了一个名叫“少齐”的姜姓女子，且对其宠幸有加。少齐在他的后宫里待了不到一年便去世了，他就又差人到齐国求娶，可见终究还是改变不了“好色”的性情。

医和在为平公解释病情的时候，还曾以先王对音乐以及四时、五节、六气的节制，来比喻对女色的节制。他说：“先王的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所以才有了五声音阶以及节奏的快慢以互相调和。音乐演奏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允许再演奏了，否则就会有繁复的手法和靡靡之音的出现，充塞人的耳目让人忘记了平和，这种音乐君子是不听的。”

医和的这段话虽说是用来打比方的，但无意中引出了平公的另一个爱好——好新声，也就是喜欢音乐。为了理清喜好音乐与国家衰败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有必要先从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讲起。

靡靡之音

故事发生在晋平公在位末期。有一次，卫国国君卫灵公到晋国去朝见，半路上在濮水边上的一处空地上安营。长夜漫漫，卫灵公为消磨时光，便坐

在岸边小酌寄情，不知不觉间便到了更深露重的时分。正当他在清冷的月光下，随着河上的浓雾游目骋怀的时候，思绪猛然间便被一阵钟鼓声给打断了。

他恍惚听到河面上传来了优雅而舒缓的乐曲，曲调的风格与当时中原流行的“新声”颇有些类似，其中隐隐然透露着一股难以捉摸的哀婉之情，让人不禁沉醉其间难以自拔。卫灵公很喜欢这曲中之意，便叫来侍从问是谁在奏乐，侍从们一听都傻了，说主公您怕是幻听了吧？这荒郊野地的哪儿来的奏乐声啊？

侍从的话还没说完，便轮到卫灵公惊诧了：这乐声如此真切，你们竟然都听不到？卫灵公约摸是感到这些仆从们不懂得音乐之美，便让人叫来了随行的乐师师涓，却不料师涓也无法感受到这优美的乐曲。

卫灵公怅然若失，对着幽深的夜色喃喃自语：“这或许是鬼神在弹奏吧！”转念他又对师涓说道：“这样吧，既然你们都听不到，那不如就让我按着刚才的曲调重新演奏一遍，你替我把曲谱记下来可好？”

“诺！”师涓急忙应承。他迅速着人带来乐器，并将他平日里记事所用的竹板拿来。一切安排妥当，便端坐在卫灵公的身旁，准备记下这神秘的曲调。

卫灵公磕磕绊绊地演奏了一遍又一遍，师涓也忍受着主君刺耳的曲调不断地调整曲谱，两个人折腾了大半天，才算是把曲谱录好。师涓得了曲谱，想学着弹奏，可曲调难度实在太太，整整练习了两天才算是勉强熟悉。

到了晋国后，晋平公在施夷之台设宴为卫灵公接风。卫灵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坚持要让师涓现场演奏这首新得的乐曲。可曲调刚奏到一半，坐

在一旁的晋国宫廷乐师师旷便急忙起身，一把按住琴弦怒喝道：“这是亡国之音，不能继续了！”

所谓同行是冤家，师涓见此情景当时就不乐意了：你这是怕我弹得比你好，抢了你的饭碗还是怎么着啊？与此同时，正陶醉其中的晋平公也不乐意了：我才刚进入状态你就突然打断，是不是有点太不礼貌了？

当然了，作为当时最有才华的盲人乐师，师旷的音乐造诣晋平公丝毫都不会怀疑，他只是好奇：既然你知道这首乐曲，可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演奏过？又为什么就不能演奏呢？

师旷掷地有声地说道：“当年，商朝的乐师师延为了讨好纣王，为他作了这曲靡靡之音，不久之后商王朝就遭受了灭顶之灾。纣王死后，师延逃到濮水自尽，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演奏过这首乐曲了。想必卫侯便是在濮水之上得到此曲的吧？”

卫灵公听了师旷的分析后连连点头，正待要问些什么的时候，只听见师旷接着说道：“先听到这个曲调的，他的国家一定会被侵削，您就别来祸害晋国了。”

听到此处时，卫灵公脸色大变，可晋平公却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这首乐曲的确很好听，您还是让他演奏完吧。”说罢便转头看向师涓。师涓此时早已战战兢兢，双手发抖、浑身冒汗，本来已经没有弹奏的心情，可在晋平公的坚持下，还是汗流浹背地弹完了。

晋平公听完之后还有些意犹未尽，就问道：“这是什么曲调？”

师旷回答说：“是清商调。”

晋平公赞叹道：“清商调是最哀婉动听的吧？”

师旷摇了摇头说：“清徵调的感情比这个更为深邃。”

晋平公顿时两眼放光：“真的，你会弹吗？会弹的话就赶紧给寡人弹奏一曲。”

师旷虽目不能视，却也一脸不屑地对晋平公说：“想听这首曲子，您还不够格。古代听清徵调的都是德行高尚的君主，您啊——德薄才浅，没资格听。”

晋平公一听这话顿时来气了：你还挺傲娇啊？竟敢说我的德行不够，还没资格听？我就听听音乐，你哪儿来的这么多废话？赶紧给寡人演奏一曲！

师旷拗不过，只好坐下开始弹奏。在弹第一遍的时候，婉转悠扬的乐声引来了十六只黑鹤，从南方不辞辛劳，飞到了施夷之台的门廊上。弹到第二遍的时候，这十六只黑鹤便展翅高飞，在天空中排成了一排，眼中都饱含着泪珠。弹到第三遍的时候，哀婉的音乐让这些黑鹤悲从中来，不由得翩翩起舞，并发出了阵阵哀鸣。乐曲的哀婉伴着黑鹤的哀鸣，合成了一曲响彻天际的合奏曲，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听罢这首合奏曲，朝堂里一片寂静，空气也凝结成了霜。晋平公沉浸在乐曲余味中久久回味，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空间，忘记了欢乐，也忘记了忧愁，似乎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如浮云一般无足挂怀。他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世上最美妙的音乐，便也顾不得国君之尊，在朝堂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末了还迎上去对师旷又亲又抱，并不住地赞叹：“简直太美妙了，真没想到天下竟然还有如此动人的音乐！”

谁知师旷却又是一脸的不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清角调可比这更动人呢！

晋平公一听这话，脸上简直像开了花，便怂恿着师旷赶快再演奏一曲。师旷颇有些为难，说这曲是真不能弹了：“我都说了您德行不够，清徵调本来都没资格听的，清角调那就更没资格了。要知道这首乐曲是黄帝在泰山上大会鬼神时所作，当时黄帝驾着象车、赶着六条蛟龙，有木神站岗、蚩尤开路，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那场面没有点德行是很难镇住场子的，我怕您听了会惹来麻烦。”

说这话就好比是对着一个饿了七天七夜的人显摆家里的粮食，这不纯粹找事嘛！晋平公当然不让了，可也不敢生气，生怕师旷一个不高兴不给弹了，于是便苦苦哀求道：“寡人都已经这么老了，平日里也没个别的什么爱好，就是爱听个小曲，你就满足一下寡人的心愿吧！”

师旷经不起晋平公的再三哀求，只好又演奏起来。这支曲子比上一支更加玄乎，在演奏第一遍的时候，顿时有黑云从西北方飘来——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这准是有妖怪来了。弹到第二遍的时候，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屋子里用来装饰的帷幕被大风撕裂，青铜器具被狂风吹倒而滚落一地，屋顶的瓦片也被大风卷了去——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风神、雨神和蛟龙出没，连神仙也来赶场了。

曲调至此，在座的人都惊慌失措、四散逃跑。晋平公由于穿着朝服，宽袍大袖也实在跑不动，只好就地趴下，抱着头躲避从屋顶掉下的瓦片。到这种时候，师旷演奏所用的乐器估计也被鬼神给卷跑了，因此也没办法再弹第三次，这次个人音乐会就在一片狼藉之中草草收场了。

事情的发展果如师旷所言。在这场惊天雷勾地火的音乐会之后，晋平公疾病缠身、几近瘫痪，余生都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与此同时，整个国家也都受到了拖累，从此大旱三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这个曾经称霸中原一百多年的超级大国，就因为这么一首乐曲便轰然倒塌了……

好音穷身

这个故事收录于《韩非子·十过》。如果说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刻画的诸葛亮是一个“多智近妖”的角色的话，那么在韩非子的笔下，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音乐家师旷便是名副其实的“真妖”了。韩非子充分运用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富有玄幻色彩的故事，将师旷卓越的音乐才华展现到了极致。这些当然不足为信，毕竟晋平公根本就没活到老的那一天，师旷就算技艺再精湛，也招不来妖神鬼怪，韩非子不过是借此向当时的君主陈述“好音”的危害罢了。

古代人没有太多娱乐活动可供选择，对于那些有权势的贵人们来说，能够用来放松消遣的方式大概也就是音乐、歌舞、表演了。喜好听音乐本无可厚非，可如果你听得无法自拔，其他什么事情也不管了，就属于娱乐过度了。这种行为就和我们如今的网络成瘾一样，时间久了总会有损于人的身心健康。因此韩非子便将其列为“十过”之一，认为“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为君者务必要加以节制。

与韩非子的妙笔互相映衬，同样是为了阐明沉迷音乐所造成的危害，《左传》则是以极其朴实的手法对“平公说新声”这件事进行了平铺直叙：

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

在师旷看来，音乐本身的功用是要传播教化、宣扬德行的。好的音乐可以让远人来服，让治下的民众不向远处迁徙；能够使百姓听了都勤劳致富，万物都因此而被感化。而那些靡靡之音不仅不能用来传播积极的风尚，不能向百姓宣扬教化、传播正能量，还会让人腐化堕落、荒废国事。作为一国之君，晋平公不应该总是听那些拿不上台面的流行歌曲，多听听正能量的主流歌曲才是他应该具有的修为。

对君子来说亦是如此。君子吟诵诗歌、聆听乐曲是用来表达心志的，用孔子的话说，便是“诗以言志”。就算是你听到哪首歌曲好听，可如果不符合心志，就不能听更不能唱。就好像是一个人虽然喜欢男女之事并乐在其中，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公开谈论，更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人讲荤段子。如果听到别人讲这些事，就算你不能马上喝止他，最起码也要把耳朵堵住，所谓“非礼勿听”是也。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晋平公的个人意趣却恰好与之相反。他不喜欢庄严宏大的古典音乐，只喜欢情情爱爱的市井小调；你说这些郑卫的新声是靡靡之音、亡国之曲，可他偏偏沉迷其中、不知悔改；你说爱好音乐要有所节制，他偏偏就不分白天黑夜歌舞升平，甚至在发生了礼制中要求撤除音乐的场合，他也从不去理会旁人的说法。

比如在他即位第八年（前550年）的时候，杞国国君孝公去世。按照礼制，盟国国君去世，晋国应当撤除音乐表示哀悼，也算是对盟国的尊重。此外，晋平公跟这位杞孝公还有另一层关系，他的母亲悼公夫人是杞女，去世的杞孝公或许就是晋平公的舅舅。于公于私，晋平公就算是不穿丧服，至少也应该在丧期内停止作乐，这也算是人之常情。然而晋平公却对于这些规制都置若罔闻，依旧马照跑、舞照跳，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因此饱受诟病。

后来到晋平公二十五年（前533年），同样的故事再次上演。当年六月，年仅三十三岁的荀盈在赴齐迎亲途中去世，灵柩从戏阳运回新田，等待下葬。听到这个消息后，晋平公依然每日饮酒作乐，毫无悲恸之色。当时负责国君饮食的膳宰屠蒯（杜蕢）看到后很是不悦，就主动提出要为在场的人斟酒。

在给乐工斟酒的时候，屠蒯神色凝重地说道：“作为国君的耳朵，您的职责就是要保持聪敏。我听说，每当有忌日来临的时候，国君会撤除音乐，学习音乐的人也会停止奏乐，这是古代圣人传下来的规矩。如今国家丧失股肱之臣，这本该是撤乐哀悼的日子，可您却置若罔闻，您这‘耳朵’是不是不太灵敏啊？”

紧接着他又走到晋平公宠臣嬖叔面前，用同样的语气问道：“作为国君的眼睛，您的职责就是要时刻保持明亮。我听说，在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在不同的时节也会推行不同的礼仪。如今国君的衣着外观不符合礼仪的要求，您却视而不见，您的‘眼睛’是不是不太明亮啊？”

随后他自己斟了一杯酒，转身举杯对晋平公说道：“作为一名负责膳食的官员，臣下的职责是为国君调和口味，以便让国君神志清醒、行止得体、命令得当。如今国君身边的人犯下失职之罪，可国君却并没有处罚他们，显然是臣下的罪过啊！”

屠蒯借着斟酒的机会，对晋平公身边的乐工和宠臣一通讯讽，认为他们看到国君失礼而不加劝谏，是耳不聪目不明。这番明显指桑骂槐的话让晋平公听到自然心中不悦，但又不能说什么，只好撤除了酒宴，对荀盈的死表示哀悼。

对于急于寻找“背锅侠”的政治评论家来说，晋平公的这两桩罪状可以说是来得太及时了。如果你只是对音乐有特殊偏好，就算是不加节制，因此而受损的也不过是你自己的身心健康，可在丧礼上寻欢作乐就不一样了，这是有着恶劣影响的政治事件。因为你对盟友丧礼的怠慢，因此诸侯对你离心；因为你对卿大夫缺乏应有的敬重，大夫们自然就不会把你当回事。诸侯离心背弃盟主，大夫失望不奉公室，都是你这个做国君的一手促成的，晋国霸权衰落和公室卑微的锅你不背谁背？

乐圣师旷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要想让一个人物品德败坏的形象深入人心，必然要有一个自带光环的对手作映衬才更具有说服力，而与无道昏庸的晋平公唱对手戏的正是著名的乐师——师旷。

师旷，字子野，按照有些史料的推测，他大概是出生在晋灵公时代，主要活动于晋悼公、晋平公时期。师旷在音乐上颇有造诣，著名的曲调“阳春”“白雪”据说便出自他的手笔。先秦百家每当提起师旷，均对其为人品格和音乐成就赞不绝口，因而被世人尊称为“乐圣”。

师旷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盛名，与他从小便双目失明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关于他目盲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他是先天失明，也有人说是因为天生爱动，他的老师卫国乐师高扬为了能够让他潜心学习乐理，就故意刺瞎了他的双眼。最能体现其伟大的说法是，师旷认为眼睛看到的東西会扰乱心境，不利于提升音乐上的造诣，因此有意用艾草熏瞎了双眼。

但不管怎么说，双目失明使得他的听力异常灵敏。晋平公三年（前555年）的平阴之战，作为乐师的师旷曾随军出征。当时齐军无法抵挡晋国的攻势，连夜潜逃，是师旷最先听到了乌鸦的叫声中透着欢乐，因此断定齐军已

经远遁了。不久后邢伯和叔向赶来向晋平公报告齐军逃跑，验证了师旷的推测。

师旷对音乐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乐理本身，还会根据音乐的节奏强弱、旋律曲调所表现的象征意义，来判断国家的兴衰成败。比如平阴之战当年，郑国的子孔联楚行乱，晋人不知是否该出兵救援，这时师旷就说道：“我曾经对比过南方和北方的民歌，南方的歌曲曲调柔弱，象征死亡的声音很多，因此可以断定楚人难以建功。”

除了精通乐理，师旷的心算技能也是超乎寻常的，且其记忆力也很超群。晋楚弭兵之后，悼公夫人征召诸侯为杞国筑城，本国也派了不少的劳役参与这次活动。筑城结束后，晋国劳役陆续返回国内，晋悼公夫人在慰劳他们时遇到了一位来自绛县的老人，因为家中无子，只能自己去服役。其间有人问到他的年龄，老者一时也答不上来，说自己一介草民，不知道纪年，只知道出生那年的正月初一正好是甲子日，到如今已经过了445个甲子日了，最末的一个甲子日到今天正好二十天。

老者给在场的众人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要知道晋国当时采用的是传统的夏历，闰年闰月很多且极不规则，仅仅根据这些信息很难推算老者的确切年龄。众人掰着指头算了半天没有头绪，只好安排官吏去朝堂里询问。

然而这个巨大的难题对于师旷来说根本不成问题，他在脑子里迅速计算了一下，马上就说出了这个老者的年龄，甚至连他出生当年发生的事情也都说得一清二楚。而当他把这些都讲完之后，一旁的史赵和士文伯才根据444个甲子又20天的算式，算出老者已经生活了26660天了，至于老者究竟年龄几何却仍是一头雾水。

师旷的这个计算速度着实让人惊叹，在场的鲁国大夫回国之后将这件事告诉了鲁国正卿季孙宿（季武子），季孙宿听罢感叹道：“晋国不能轻视啊！他们朝廷上君子很多，有赵孟做正卿，有伯瑕（士文伯，与范宣子士句同名）做辅佐，有史赵、师旷可以咨询，有叔向、女叔齐做国君的师保，还是尽力事奉他们吧。”

除此之外，在一些史料中，师旷还是个阴阳家，算是战国阴阳家的始祖；而且对兵法据说也很精熟，曾经著有兵书万篇、“宝符”百卷。到了元明时期，师旷更是进一步进军神坛，成了“顺风耳”的代名词。不过在儒家体系里，师旷最傲人的品格当是善于讽谏。

身为宫廷乐师，经常伴随国君左右，师旷有很多机会来实行劝谏。早在晋悼公时期，师旷的事迹便已经开始流传，比如当听闻卫献公被人驱逐出境的时候，师旷便以“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来劝谏晋悼公注重以民为本。到了晋平公时期，有鉴于国君无道，师旷的形象出现得也就更频繁了。

比如在《说苑》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次晋平公突发感慨，说：“我如今已年过七十，想要学习恐怕已经晚了吧！”

师旷听了之后在一旁回应说：“那你为什么不点蜡烛呢？”

晋平公一听有些恼怒，便反问道：“哪有臣子开国君玩笑的呢？”

师旷则正色回答道：“我不过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乐师，又哪里有胆量开您的玩笑呢？只是我听闻：年少的时候喜欢学习，就好似初升的太阳；壮年时喜欢学习，就好比正午的阳光；人到年暮时喜欢学习，就像是蜡烛一般明亮。蜡烛透出的光亮虽然微弱，可也总好过摸黑走路吧？”

儒家喜欢拿晋平公和师旷的故事讲道理，作为法家达人的韩非子也不愿缺席。除了以上讲到的那个靡靡之音的传奇外，在其所著的《难一》篇中，还讲过另外一个故事。据说有一次，晋平公与群臣饮宴，宴饮之间突然发出一声喟叹：“哎，其实当国君真的也没什么快乐可言，只不过是自己的话别人不敢违背罢了。”

听了晋平公的这番浑话，宫廷乐师师旷当场就抓起一把琴砸了过去。幸好晋平公身手敏捷，矮着身子向一旁翻滚才算躲了过去。只见那把琴啪的一声砸在了墙上给摔坏了。

晋平公惊魂未定，喘着粗气问道：“你这是在砸谁呢？”

师旷回答说：“刚才有个小人在您旁边胡说八道，我砸的就是那个人！”

晋平公怒道：“刚才说话的是寡人！”

师旷装作吃惊的样子说道：“啊，是吗？可我听刚才的话真不像是一个国君该说的话啊！”

旁人看到这个举动都怒不可遏，要求晋平公严肃处置师旷的悖逆行径，可晋平公却淡淡地说道：“不可以，太师这是为了让我引以为戒。”

师旷善于讽谏，不仅让晋平公心悦诚服，在诸侯间名气也很响亮，甚至有不少人还会特意赶到晋国来向他询问。比如有一次齐景公到晋国访问，宴席间三次向师旷询问：“太师将奚以教寡人？”师旷三次的回答都是同一句话：“君必惠民而已矣。”

齐景公回到住所，半醉未醒之间突然悟到了师旷的意思。原来啊，当时齐景公的两个弟弟公子尾和公子夏（据《左传》，此二人应为公孙蚤与公孙灶），常常厚施于民以笼络人心，民众纷纷投奔他们治下，使得公室人口急剧减少。师旷一再说要“惠民”，不就是让自己也向他们学习以争取民心吗？齐景公回国后利用公室丰厚的财产让利于民，果然没过几年，他的那两个弟弟就扛不住了，从此齐景公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会“抢班夺权”了。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借这些故事比较一下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在有关平公和师旷的故事中，儒家和法家所描述的故事大抵都是相通的，但其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却大相径庭。

比如说师旷摔琴的故事，如果只是看到这里的话，或许人们会以为韩非子是在表彰师旷敢于犯颜直谏的勇气，同时也在夸赞晋平公知错能改的气度。可事实恰恰相反，韩非子不仅不认可师旷的做法，反而认为这是“大逆之术”。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在这件事情上，晋平公固然是失去了为君之道，可师旷的做法显然也是违背了为臣之礼。

用惩罚的办法让犯错的人改过自新那是君主的特权，如果臣子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国君，便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为人臣者，君主有过就要劝谏，劝谏不成哪怕是挂冠而去等着君主自己悔悟，也绝对不能做出这等忤逆犯上的罪行。否则的话，如果人人都像师旷一样动不动就要对国君动粗，那不正好给那些弑君者找到了掩饰罪行的借口了吗？晋平公明知道他这是逆罪，却故意借此展示宽宏大量，更是不可救药。

师旷劝谏齐景公的故事也是一样。若要放在儒家世界观中，这绝对是明君贤相的典范，以仁义治国不就是一个有德之君应该做的吗？可在韩非子看来，这种做法纯粹是本末倒置。这就好比是一个猎人追逐猎物，明明可以坐

着快马大车轻松得到，可你偏要跳下来用双脚跟猎物赛跑，就算是你最后追到了猎物，自己也会累个半死。

国君掌管着国家大政，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有人胆敢跟自己争夺民心，你就动用国家机器处置他们就行了，干吗还要回过头来跟他们去争夺民心呢？那些有野心争夺国君之位的人多的是，他们玩起花样来也是名目繁多，你今天要跟这个争，明天要跟那个抢，你能应付得过来吗？因此，真正贤明的君主，就要严格法度，但凡有想要犯上作乱的人，你就要在萌芽中把他消灭掉，别真的等到他们坐大了，那就来不及了。

第四节 大夫多求

以乐怛忧

无论是以儒家“德行”的视角来看，还是从法家“刑罚”的角度分析，晋平公都称得上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君主。然而如果仔细推敲史料中的细节，我们不难发现，晋平公的人设可以说是春秋末期各国君主的共同写照。

如果你还记得楚庄王“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故事，知道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由来，就应该知道晋平公所谓的昏庸也并没有那么简单。人们之所以会将其想象成一个玩世不恭的昏君形象，与春秋史料抑君扬臣的价值取向有着莫大的关系，晋平公的个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们刻意塑造的产物。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晋平公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不妨通过其个人经历来一窥究竟。

说起来晋平公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根据《左传》的记载，他的父亲晋悼公回国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回国当年杞桓公听闻晋国新君施政温和，便主动前来朝见并做出了一笔极具价值的政治投资，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悼公。从这个时间顺序上来判断，晋平公出生的时间应该不会早于晋悼公二年，而他即位时也不会超过十五岁。

晋平公即位的年龄与其父亲相仿，但由于从小生长于温室之中，缺乏晋悼公少年老成的政治手腕，而他所面临的局面显然要比十六年前更加艰难。晋悼公回国时虽在国内缺乏根基，可得益于晋厉公被杀后紧张的政治气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卿大夫的控制。然而时机总是会转瞬即逝，及至晋悼公后期，伴随着复霸大业的成功，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的苗头便再次显现，即便以晋悼公这般威望也无法制约。

如今得天独厚的政治环境已然不在，晋平公年幼即位又缺乏政治手腕，在这些如狼似虎的卿大夫面前显然太过于稚嫩了。不过即便如此，晋平公也并没有选择放弃。比如在士匄驱逐栾氏的时候，他就曾与范氏党羽据理力争，试图保住栾氏的地位。固宫之役爆发后，他一方面起用大量旧族充实公室力量，另一方面又试图扶持程郑来填补栾氏覆亡后留下的空白，从而形成了晋平公九年（前549年）时的六卿序列：

范匄、赵武，韩起、荀吴，魏舒、程郑。

晋平公采用的手法，是自晋景公以来公室在平衡利益关系时所用的固有套路。然而或许是所托非人，抑或是公室力量太过弱小，他的一系列努力在强横的卿族势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以至于他的所有努力都化为了梦幻泡影。

次年，也即晋平公十年（前548年）的夏秋之交，赵武开始担任执政，士匄之子士鞅进入卿列。依据之后的执政次序来看，士鞅在此次的调整中似乎是排在了魏舒之后，但其与程郑的前后次序并不明确，六卿大体次序应为：

赵武、韩起，荀吴、魏舒，程郑、范鞅。

半年之后，因受宠信而进入六卿的程郑在忧惧中去世，致使晋平公试图与世卿博弈的企图完全落空。此时恰好荀罃（智武子）的长孙荀盈（智悼子）到了成人的年纪，晋平公也只能在六卿的胁迫之下，将其任命为下军佐，从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六卿格局，依次为：

赵武、韩起，荀吴、魏舒，范鞅、荀盈。

到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冬季，中军将赵武去世，韩起接替其职，并将其子赵成（赵景子）任命为中军佐，由此六卿序列依次为：

韩起、赵成，荀吴、魏舒，范鞅、荀盈。

经过这几次密集但微小的人事变动，晋国朝政大权彻底落入赵、韩、魏、中行、范、智六个家族手中，晋国的历史也由过去的“广义六卿”时代进入了“狭义六卿”时代，晋国公室更是滑入了急速衰落的轨道。眼看着旧族欺压公室的局面已经成型，弱小又无助的晋平公独力难支，心中怎能不愤懑忧郁？

在此后的岁月中，或者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雄心壮志，或者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苦痛，又或者是为了宣泄对强卿无声的抗议，晋平公只得每日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借酒浇愁，消沉度日。杞孝公去世时的非礼举动，正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将大多数的时光都沉溺在歌舞美色之中，在麻痹敌人同时也麻醉自己，以至于二十多岁时身体就被掏空了。

在纵欲无度的掩盖之下，晋平公仍在不断地等待机会，只是机会并没有那么容易寻找，他这一等就是十几年。到他即位的第二十五年（前533年），下军佐荀盈在去往齐国迎亲的途中突然去世，又给深感幻灭的晋平公带来了最后的一丝希望。

要知道荀盈出生于晋悼公八年（前566年）左右，去世的时候仅仅三十几岁，他的儿子荀跖最多也就十几岁，就算是六卿有再多不满，用一个年长的大夫代替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担当卿位，哪怕只是暂时的，这总不过分吧？

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晋平公毕竟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就在他准备要将自己的宠臣推上卿位时，一个在宫里负责膳食的厨子竟然也敢来指桑骂槐，这就不能不让人胆战心惊了。而且在故事的结尾，《左传》还意味深长地写了这么一段话：“初，公欲废知氏而立其外嬖，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跖佐下军以说焉。”由此也就形成了晋平公后期的六卿序列：

韩起、赵成，荀吴、魏舒，范鞅、荀跖。

也就是说，一个厨子的讽谏导致晋平公欲更立下军佐之事不了了之。当年八月，晋平公让荀跖担任下军佐“以说焉”。这个“说”字，既可以理解为“悦”，即取悦之意，也可以理解为“说”，即解释之意。至于他想要取悦谁，又或者是向谁解释，我们不便臆测，但显然不会是那位厨子。

公室将卑

对于晋国如今的局势，一直担任晋平公太傅的叔向可以说是感触颇深。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齐国派晏婴到晋国出访，并为晋平公请求继室，其间也拜会了叔向。两人私交甚好，在各自国内所处的地位也很类似，因此能够开诚布公地交流感情，在言谈之中他们都流露出了对当世政治的悲观失望情绪。

见面伊始，晏婴便开门见山，说：“如今可谓是季世（末世）了。就算我感情上再不认同，也不得不承认，齐国已经属于陈氏（田氏）了。”至于做出如此判断的原因，晏婴接着介绍道：

齐国有豆、区、釜、钟四种量器，换算时以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四区为一釜，十釜为一钟。陈氏为了笼络人心，特意制造了两种规制的量器，其中一种量器比正常的要加大四分之一。与我们痛恶的“大斗进、小斗出”截然相反，陈氏在借出粮食时用自家制作的大量器，收回粮食时则用公家的小量器——也就是小斗进、大斗出——以此让利于民。

陈氏从事商业活动也从来不以盈利为目的，他所经营的山林木材、鱼盐特产全都是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比如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上贩卖，价格比在山上直接出售的还低；从海边制作的食盐和捕捞的海产品运到国都，其

价格也不会比海边的收购价高。陈氏贩运财货不仅倒贴运费，出售商品的价格甚至低于收购成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低价倾销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除此之外，陈氏还特别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如果听闻治下百姓有了痛苦疾病，陈氏就用他们的私财厚加抚恤，对待他们就好像是对待自己的父母。陈氏如此厚施于民，百姓自然会对其赞誉有加，反观公室却是另外一副模样。

国君对百姓横征暴敛毫无节制，公室百姓所得收成的三分之二都要归于国君，能够留下用以吃穿用度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国君的积蓄放在仓库里全都腐坏生了虫子，而得不到给养的老人们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整日挨饿受冻、号寒啼饥。可即便如此，国君不仅不体恤百姓，反而滥用酷刑，随意对百姓施以刑罚。因受刑而残疾的人数不胜数，以至于在国都的市场上，正常人穿的鞋无人问津，而给伤残人士制作的假腿却供不应求（屨贱踊贵）。

双方对待百姓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百姓唯一能做的自然是“用脚投票”，公室可以说是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百姓去投靠陈氏。晏婴最后总结道：虞舜的后人箕伯、直柄、虞遂、伯戏，陈国始封之君胡公和他的夫人太姬，这些人都是陈氏的先祖，如今他们的鬼魂恐怕早已在齐国定居了。

听罢晏婴的陈述，叔向也感同身受，说出了自己对晋国政局的感受：“是呀！不仅是你们齐国，我晋国的公室恐怕也将面临季世了。卿大夫各自顾全自身利益，已经有多年不为国家出力了，以至于公室的军队没有统帅，军队的行列没有长官，战车没有御戎和车右，马匹被圈养起来不再驾驶战车，三军的建制形同虚设。百姓困倦疲惫、食不果腹，而国君却骄奢淫

逸、纵欲无度；道路上随处都可以看见冻饿而死的人，而宠妾的居所堆金累玉、积粟成山。国君不顾百姓的死活，只知道聚敛财富，以至于每当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就好像躲避仇敌一样，如此光景与齐国是何其相似！”

紧接着，叔向又讲到了目前公室的现状：“原本显赫的家族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氏，如今他们的后人均已沦为低贱的吏役，这些公族之家的没落使得公室无所依凭，政事全落到私家手中。面对如此境况，国君却丝毫都没有要振作的想法，反而整日里用享乐来排解忧愁。要再照这么发展下去，公室的彻底衰落恐怕就没几天了。”

郑国大夫子产在云梦回答楚灵王提问时，指出了晋国走向衰落的两个原因：其一是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二是大夫多求，莫匡其君。至于这两个因素孰为因果，子产并没有进一步阐明，但从叔向的表述中，我们很容易能分辨出其中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公室失去了公族的屏护，无力应对六卿集团的不断侵蚀，以至于“政在家门，民无所依”。晋平公对此束手无策，只能通过各种出格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助。由此可见，所谓“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故事之所以会在战国时期的史料中频繁出现，也的确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对于公室衰微已成定局的现状，叔向即便是有心扶持，也终究无济于事。因而当晏子问起下一步打算时，叔向不禁悲叹道：“我听说，公室将要衰微的时候，他的宗族就会像秋天的树叶一样纷纷凋零，当枝头的黄叶凋尽，公室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我羊舌肸的本宗原本有十一族，现如今已凋零殆尽，仅剩下羊舌氏一支了，而我也没有一个好儿子。在六卿虎视眈眈之下，我自己能有个善终便已经是侥幸了，哪里还敢还有别的企图呢？”

古之遗直

叔向本名羊舌肸，出生于一个公族世家，其家族的源流最早据说可以追溯到晋武公之子伯侨。在晋献公时期，有羊舌突受封于羊舍邑（今山西洪洞），因以羊舌为氏。羊舌突曾担任军尉的职务，主要负责军法事务，晋献公太子申生讨伐皋落氏时，一众人劝说太子逃亡，便是受到了羊舌突的极力阻拦，因此未能成行。羊舌突是一个个性耿直且观念保守的道德派，这种个性特征及道德观念对于太子有着深刻的影响，以至于申生到临死时还把他的话挂在嘴边，以表现对父亲的忠诚。羊舌氏的后人也大抵都受到其影响，因而尽管羊舌氏传承不远，却也出了不少文化名人和贤良之士。

羊舌突在晋献公之后便不见踪迹，直到晋景公时期才有羊舌职出现在史料中，到晋悼公时期被任命为中军尉佐，担任祁奚的副手。羊舌职的儿子中比较知名的有四：长子羊舌赤字伯华，为铜鞮大夫，又称铜鞮伯华，晋平公所修筑的铜鞮宫就在其封地内，可见公室对其很是信任；二子羊舌肸，字叔向，食采邑杨氏县；三子羊舌鲋，字叔鱼；四子羊舌虎，字叔虎。后来韩起访楚时，楚国大夫蘧启强所提到的“羊舌四族”，指的就是由此四人及其后裔所形成的家族。

史料对于羊舌赤和羊舌虎的记述不多，我们只知道羊舌赤在父亲死后受中军尉祁奚的举荐，接替父职担任中军尉佐。《说苑》中提到孔子对他的评价，说是“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有定矣”。在被问到原因时，孔子说他“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孔子并将其与周公同列，认为其“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可谓君子。

到晋平公六年栾氏和范氏冲突爆发时，整个羊舌氏都受到牵连，其中老大伯华和老二叔向被抓捕下狱，而老四羊舌虎则被当场处死。又因在史料记载中羊舌虎与一个叫作叔鞮的人并列，给读史之人带来不少困惑。有人怀疑

叔黑也是羊舌家族成员，但也有人认为羊舌虎与叔黑本为一人，不过这些都缺乏严格的证据支持，我们就不再分辨了。

政变爆发时，老三羊舌鲂因提前得到消息而逃往鲁国，受到季孙氏的保护，叛乱平定后返回国内，曾先后代理司马、司寇等官职。在史料记载中，羊舌鲂是个贪墨之徒，比如晋昭公三年（前529年）的平丘会盟，他曾向卫国贵族索要礼品，遭到拒绝后又放任手下在卫国境内肆意破坏。

卫国人对此很是不满，于是便派屠伯带着些食物和锦缎找到他的哥哥叔向讨要说法。叔向收下了对方带来的食物，但要求把锦缎送给羊舌鲂，并对来使说道：“羊舌鲂渎职怠命、贪得无厌，这样下去迟早是要出事的！不如这样吧，您回去以后就以卫国国君的名义将这些锦缎赐给他，他必然会有所顾忌。”

使者按照叔向的办法去赠送礼物，羊舌鲂大概是以为这件事已经捅到国君层面上了，害怕造成争端，果然当场就下令约束那些砍柴的人，事情总算有了个好的结果。不过，这次的事件似乎并未让他吃一堑长一智，不久之后，他就又因贪赃枉法而断送了性命。

事情发生在平丘会盟的次年（晋昭公四年，前528年），因掌管刑狱的士弥牟（士景伯）到楚国出使，执政韩起命羊舌鲂代理大理的职务，并让他清理积年旧案。这时羊舌鲂遇到了一桩邢侯和雍子争产的案件，当事双方均为楚国亡臣。其中邢侯为申公巫臣后人，在申公巫臣死后袭封邢地；雍子也因父兄受到诬陷而逃奔到晋，受封到鄆地。邢地和鄆地相邻，都在河南温县一带，因地产相邻而产生争执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这桩案子本来也没有太多疑点，因为衙署掌握的证据大都不利于雍子，但由于晋国内政混乱无人主事，这件事一直未能调解成功。

待到羊舌鮒重新提审此案的时候，雍子知其为人贪婪，因而便使出美人计，将自己的女儿送给了羊舌鮒。邢侯本来以为自己证据充分不会有差，却没想到对手暗箱操作愣是来了一个颠倒黑白，于是一怒之下便当场把法官和对手全给杀掉了。

邢侯的举动让时任正卿韩起十分震怒，于是又把案子交给叔向去审理。这下可就让叔向作难了：被杀的羊舌鮒是自己的亲弟弟，可杀人的邢侯也不是别人啊，那可是他的大舅哥，也就是说无论他做什么选择都会受到不小的压力。

不过，叔向是一个耿直的人，他直言道：“雍子自知理亏，却用自己的女儿贿赂以获胜诉，是为昏；叔鱼身为法官知法犯法，收受贿赂、亵渎法律是为墨；邢侯专杀，不经法律程序擅自杀人，是为贼。《夏书》中“皋陶之法”有言：‘昏、墨、贼皆为死刑。’因此，这三人的罪都是一样的，只需判决公开处死邢侯，并将叔鱼和雍子曝尸即可。”

韩起对叔向的判断深表赞同，于是就对三人施以相应的处罚。孔子闻听之后，也盛赞叔向为“古之遗直”，尤其是在处理关于羊舌鮒的三次事件时，能做到“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即便是杀死了自己的亲人，也能受到人们的称赞，这难道不是合乎道义的君子吗？

君子之交

叔向素来以博学聪敏著称于世，比如在弭兵会盟时，楚国令尹子木在宴席中故意刁难赵武，赵武回答不上来，于是便让叔向代为作答。叔向不但对答如流，成功化解了子木的刁难，还反过来出题为难子木，让对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后来子木回到国内，曾对楚康王说道：“有叔向这样的

贤臣来辅佐其卿，而楚国却没有与之相当的人，难怪晋国会称霸，我们终究不能与之相争啊！”到后来，叔向随韩起出使楚国，楚灵王也曾让敖叔出各种刁钻的问题来故意刁难晋使，却不料叔向无所不知，让楚人自讨没趣、好生尴尬。

当然了，先秦典籍之所以推崇叔向，不仅仅是因为他博学多知，更多的还是因为他的观念符合儒家传统。他推崇周公的治国理想，坚守德行、礼仪、信义、勤俭等美德，且一生都以维护甚至复兴公室为己任，哪怕是为此而粉身碎骨也从不畏惧。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存在让把持政权的六卿都颇为忌憚，多次都想置其于死地，晋平公六年（前552年）整个羊舌家族因栾盈受难便是其中最为凶险的一次。

关于这次牢狱之灾，还有一些细节值得关注。叔向下狱之后，有人曾打趣他说：“以您的见地也未能脱罪，恐怕还是不够聪明吧！”

叔向回答道：“比起死亡和逃亡来，牢狱之灾总要好些吧！”他同时反唇相讥说：“有诗说，‘优哉游哉，聊以度日’，面对时局无所作为、只求自保，恐怕这才是聪明吧。”

不久后乐王鲋前来探监，提出要向国君请求赦免叔向，但叔向对他的许诺并未有所回应，乐王鲋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以礼相送。旁人不解，都责问他为什么不抓住这个机会脱罪，叔向只是淡然说道：“这件事也只有祁大夫才能办到。”

管家不解其意，反问道：“国君对乐王鲋言听计从，而祁大夫并没有如此地位。为什么您不依靠乐王鲋而指望祁大夫呢？”

叔向说：“乐王鲋是个一切都顺从其君的人，这种事情他是办不到的。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难道会独独抛弃我吗？”

叔向所提到的祁大夫指的是祁奚，字黄羊。早年下宫之役爆发的时候，晋景公曾一度将赵氏的封地给了祁奚；晋悼公回国后，又任命其为中军尉。晋悼公四年时，祁奚决定提前退休，晋悼公问起接任的人选，他首先推举了一个叫解狐的人。后来解狐死了，晋悼公又来询问，他又推举了自己的儿子祁午。

按照史料中的说法，解狐与祁奚有仇怨，但他在举荐的时候却能做到不避仇恨，是为“外举不避仇”；祁午是他的儿子，他不会因为害怕旁人非议而避嫌，是为“内举不避亲”。除此之外，当他的副手羊舌职去世了，晋悼公又来询问的时候，他又推举了羊舌赤接任，同样也是出于公心。在推举人才的时候能不避亲仇，不偏私、不结党，一心只想着公室的利益，这样的人当然值得称赞。

乐王鲋则不同，他所顺从的君并不是晋平公，而是士匄。晋平公之所以对其言听计从，是因为有士匄在背后撑腰，也就是说他只是士匄的传声筒，并没有自己的原则。除此之外，乐王鲋也是一个十分贪婪的人，比如在后来的虢之会上，就曾发生过一段插曲，也就是乐王鲋向叔孙豹索贿的事件。

原来乐王鲋知道赵武一定会给叔孙豹求情，就想趁这个机会给自己捞点好处，于是便委婉地对叔孙豹说喜欢他的腰带。叔孙豹的随臣明白其言外之意，于是便劝说道：“奉献财货可以保证自身安全，你又何必吝惜这些身外之物呢？”

叔孙豹说：“诸侯举行盟会，是为了保卫社稷。假如我用贿赂的方法得到赦免，国家就会遭受进攻，这可就是灾祸了。国家就好比是屋子四周的

墙，可以用来保护你不受坏人的侵害，如果墙壁出现了裂缝，该是谁的过错？如果因为我使得国家利益受损，这样的罪过可就大了。当然我们可以把问题全推到季氏身上，可国家受到侵害，受损的终究还是自己。叔孙氏负责外交，季氏负责守国，一直以来都是鲁国的惯例，大国真要拿我开刀，也怨不得别人。”

但是转念一想，乐王鲋贪得无厌，如果什么都不给他，保不准他会给你使什么坏，于是他就从自己裳上撕下一块帛递给晋国的使者说：“我身上的带子恐怕太窄了，希望不要嫌弃。”

乐王鲋有心贪便宜却被鲁国人羞辱了一番，虽则恼怒却又不敢声张，只好在赵武面前说鲁国的坏话：“诸侯结盟还没有散会，鲁国就违背了盟约，如果我们既不出兵讨伐鲁国，又不能拿鲁国的使者来问罪，那还要盟约有什么用？晋国如果自己都不遵守盟约，还如何做盟主呢？”

赵武早就知道了乐王鲋索贿未果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揭穿，而是慢条斯理地回答说：“叔孙豹自己身处旋涡之中也不忘为国家考虑，宁愿为国家献出生命也不愿放弃职守，真可谓是‘忠、信、贞、义’的君子啊！有这样的人在，就可以让大国不丧失威严、小国不受到欺侮。这样的君子，难道能不加以保护反而让他遭受楚人的凌辱吗？善人遭逢祸难而不救，恶人位居高位而不除，都是不吉祥的，你就不要再说了。”

在叔向入狱这段时间里，乐王鲋之所以自告奋勇要为其求情，如果不是来试探的话，那么极有可能是来索求财贿的。但无论是出于哪种目的，以叔向的为人显然都是不可能答应的。后来的事实也的确证明了叔向的判断，当晋平公问起叔向之罪的时候，乐王鲋却回答说：“叔向不弃其亲，恐怕也是同谋吧。”

祁奚听说叔向入狱后，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当即坐上快车去拜见士匄说：“《尚书》上说：智慧而又有谋略的人，应当信任并善加保护。叔向出谋划策很少会出错，教育他人始终不知疲倦，这样的人是国家的柱石，就算是他的子孙后代有了过错也要赦免，以勉励尽心为国的人。若是因为叔虎的错误受牵连而死，这会让忠心为国的人感到困惑啊！”

士匄的本意是尽量去除公族的枝叶，因此才大肆牵连，并不想动摇自己的执政根基。如今颇具人望的祁奚不辞辛劳亲自前来请命，士匄自然不敢忤逆长者以惹来众怒，当日就与祁奚同乘一车去向晋平公解释。事成之后，祁奚并没有探望叔向，而是径直回家去了；叔向获释后也没有去拜谢祁奚，而是直接朝见晋平公。祁奚和叔向之间的这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大概就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晋政多门

当士匄权势炙手可热的时候，不少人都欲攀附其门下，比如乐王鲋、董叔；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仍旧依附公室，愿意竭尽全力为公室的复兴而努力，此时的叔向并不孤单。

然而自晋平公六年的大清洗之后，晋国政局变得扑朔迷离，不少人看到复兴公室无望，害怕自己的家族无法抵挡暴风雨的袭击，便纷纷与公室撇清关系，晋平公所信任的程郑自求降级便是一例。还有人总想趁着晋国在诸侯间权威犹在，想趁着最后的机会开足马力为自己捞取好处，一股贪婪的风气开始悄然兴起，羊舌鲋和乐王鲋便是其中的代表。

固宫之役彻底消解了公室的权威，也对晋平公的信心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自此之后，晋平公只能“以乐怗忧”，国家权柄完全落入六卿手中。在这方面，晋平公和齐景公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谁也比谁好不到哪儿去。

但与齐国只是陈氏一家独大的情形不同，晋国却有六个实力相当的家族，这六个家族又因诉求不同自动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讲到这里，便突然想到了克雷洛夫笔下的童话故事《天鹅、大虾和梭鱼》：

合伙的人们如果不是心一条，

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闹来闹去，白费力，

到头来只能是自寻烦恼。

有一次，天鹅，大虾和梭鱼，

想把一辆大车拖着跑，

他们都给自己上了套，

拼命地拉呀拉呀，

大车却一动也不动了，

车子虽说不算重，

可天鹅伸着脖子要往云里钻，

大虾弓着腰儿使劲往后靠，

梭鱼一心想往水里跳。

究竟谁是谁非，我们管不着，

只知道，大车至今仍在原处，

未动分毫。

这个曾被收入小学教材的故事所描述的景象，用来形容晋国当前的政局可以说不能再贴切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争夺话语权，在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时往往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就像是故事中的“天鹅、大虾和梭鱼”，拼尽全力拉着晋国这样一辆战车向自己希望的方向行驶，造成的结果便是国家政策摇摆不定、百姓不知所依、诸侯无所适从，就好像是那辆大车，“至今仍在原处，未动分毫”。

郑国大夫子产把晋国内部这种窘迫局面看在眼里，便知道晋国虚弱，已经无力再参与中原争霸了。也正因为如此，当他访问晋国的时候，才敢于频频就政令无常、朝聘无时、贡赋无度、馆舍无守等问题向晋人提出质问。到了晋昭公三年（前529年）的平丘会盟上，他更是在晋人面前据理力争，即便是背后有四千辆战车压阵也毫不畏惧。因为他知道，如今的晋国虽然看起来依旧兵强马壮，可实际上却只是“纸老虎”，只要你敢于跟他们较真碰硬，他们还真不敢把你怎么样。只是这种情形还有很多人看不明白，因此每当子产与晋国发生冲突的时候，都会有人在一旁为他捏一把汗。

比如在平丘会盟时，游吉就责备他说：“你难道就不怕晋国突然发动诸侯要讨伐郑国吗？”可子产却不以为然：“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当今的局势之下，恰恰是晋国迫切希望得到诸侯的拥护，而诸侯对于霸主的需求并没有那么要紧。诸侯背叛晋国，晋国拉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大动干戈？子产能够耐心地跟晋国的公卿大夫叫板，而不是直接宣布背叛晋国，就算是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

在这股浮躁的气氛当中，不仅仅是卿大夫们各有所图，就连晋平公自己的母亲即悼公夫人，都已经不再为公室的利益着想，这就让人感觉到不仅仅是悲哀了。

晋平公十四年（前544年）六月，也就是弭兵会盟的两年后，晋国突然征召齐、鲁、宋、卫、郑、曹、滕、薛、小邾等九国诸侯到杞国，为其修建新的国都淳于城。这个举动让诸侯都极为不满，期间卫国大夫太叔仪（大叔文子）遇到了郑国大夫游吉，便有止不住的牢骚：“竟然让诸侯来为杞国筑城，这也太过分了！”

游吉对此深表赞许：“是啊，晋国作为诸侯盟主，不担心周王室的衰微，却反过头来保护夏朝后裔，将来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些姬姓诸侯国全给丢弃了呀？如果连自己的亲戚都不能善待，还有人愿意和他们交往吗？”

郑、卫两国大夫因为不愿意为所谓的“夏肄”服劳役而牢骚满腹，可若是他们知道了鲁国人的遭遇，内心恐怕也就释然了。当他们还在淳于城工地上“磨洋工”的时候，原本跟随荀盈监督工程进度的三军司马女叔齐（也称女齐、叔侯、司马侯）却突然转道去了鲁国。女叔齐此行要向鲁国人提出一个让他们倍感屈辱的要求：归还侵占杞国的土地。

要知道，鲁国与杞国之间已经多年没有发生战事，尤其是自杞桓公与晋悼公缔结姻亲以来，鲁国人至少有三十年没敢找杞国的麻烦了，如今冷不防地要让鲁国归还侵占的土地，鲁国人都不知从何还起。

不过，作为这次治杞田事件的晋国特使，女叔齐在处理杞田问题的时候故意偏向鲁国，并没有按照预先要求足额足量完成土地交割。悼公夫人对此大为不满，当女叔齐回国复命，她怒骂道：“这个女齐一定是收了鲁国人的

好处，否则也不会如此行事！先君如果泉下有知，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做的。”

晋平公将这些话都转达过来，女叔齐却不服气，还为自己辩解说：“当今之世以大欺小本是常态，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虞、虢、焦、滑、霍、杨、韩、魏都是姬姓诸侯，如果不是吞并了这些国家，晋国怎么可能发展壮大？如果不侵削小国的土地，晋国怎么可能成为霸主？从晋武公、晋献公以来，晋国兼并吞灭的国家多了去了，难不成还要把这些土地全都还给他们？”

紧接着，他顾不得悼公夫人的脸面，口不择言地回答道：“鲁国本是周公之后，且世代与晋国交好，多年来朝见的使臣往来不绝，进献的贡品也从不间断。而杞国不过是夏朝的残余，没把他们的土地封给鲁国就已经很是宽待了，凭什么还要损害鲁国的利益以充实杞国呢？更何况，如果先君果真地下有知，他恐怕更愿意让夫人您亲自去办这件事，怎么可能用得着老臣呢？”

不少人在提及这件事的时候，通常都会按照文中所指，将女叔齐列为贪腐的代表。不过平心而论，如此断章取义恐怕对他太不公平了。与叔向类似，女叔齐也是一个以一己之力维护公室利益的“孤胆英雄”，他所做的这一切，大抵都是在为“以乐怗忧”的晋平公纾解忧愁，只是他的想法晋平公虽能够理解，却无法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

司马叔齐

女叔齐的名字按照一般的解释，其中的“女”通“汝”，是其封地的名称，同时也是氏名；“叔”代表宗族内排名，单名一个“齐”字。因其曾担

任司马、侯奄等职务，因此有时也被称作司马侯、女叔侯，后来在王子朝之乱中奉命镇守边塞的汝宽似乎就是女叔齐的后人。

在《左传》的记载中，女叔齐是一个颇具德义的君子，与叔向的关系十分密切。据说有一次晋悼公与女叔齐一起登台眺望，看着远方的壮阔景致，想到复兴霸业的光辉，不由得赞叹道：“人生真是快乐无穷啊！”

面对此情此景，女叔齐并没有顺着晋悼公的感叹大唱赞歌，而是泼了一盆冷水：“居高临下观景的快乐是有了，可德义的快乐还没有达到。”

晋悼公心中纳罕，于是反问道：“何为德义？”

女叔齐回答道：“时刻将诸侯的所作所为都记在心间，以他们的善行为榜样，以他们的恶行为镜鉴，行不逾矩，可谓德义。”

晋悼公又问：“那依你之见，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快乐呢？”

女叔齐说：“有公族羊舌肸熟悉《春秋》典籍，可以一试。”

晋悼公听罢，便命叔向做太子彪的老师。及至晋平公继位，叔向仍然担任晋平公之傅。后来赵武、韩起执政的时候，叔向也一直以顾问抑或智囊的身份陪侍左右，为其出谋划策。

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年），鲁昭公到晋国朝见，其间无论是朝堂会见、迎来送往，还是互赠礼物都搞得有板有眼，这让对礼仪不怎么上心的晋人很是开眼。事后晋平公就赞叹说：“鲁侯真是知礼啊！”但女叔齐却很不屑地问道：“这哪叫知礼？”

在女叔齐看来，礼是用来保有社稷、推行政令的，只有做到了君臣尊卑有序才是真正的知礼。而鲁昭公在迎来送往、礼尚往来方面所表现出的不过

是“仪”罢了，连礼的皮毛都没有够到。如今鲁国三桓逼君，公室权力被三家瓜分，公室军队被一分为四，百姓依靠三桓过活，鲁昭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君罢了。他无法约束政令，又不能任用贤人，在国际上对大国三心二意，对小国任意欺凌，这些都是不知礼的表现。鲁昭公放着正经的“礼”不去遵守，仅仅是谨守一些细枝末节的“仪”，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君主。

女叔齐这些话恐怕也是有所指的，相比鲁昭公来说，晋平公的地位显然更加尴尬。女叔齐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点与叔向是相似的。再加上叔向的出仕本就是受其举荐，因而两人之间多少便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

后来女叔齐去世，叔向吊唁时抱着他的儿子痛哭道：“你父亲在的时候，我们俩合作无间，他所倡导的事情，我一定会完成，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没有办不成的事。他这一去，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和我协力合作去服务公室的人了。”

叔向的话里有一句“比而事君”，其中的“比”有互相依附的意思，在多数语境中都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比如成语“朋比为奸”中，将其引申为互相勾结。孔子所说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说的就是君子不能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排斥异己。因此当籍偃听到叔向的话后，便在一旁问道：“难道君子也会比附吗？”

但叔向却有不同意见：“君子比而不别，亲近却不偏私。所谓的‘比’，是互相扶助、同心同德，其目的是为了成就事业；而‘别’则是说结党舞弊，营私忘君，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叔向之所以盛赞女叔齐，并为自己落下一个“比而事君”的名声，是因为他从女叔齐的死中感受到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息。在当下这个时节里，人人都只顾眼前的利益，没有人考虑国家的未来，只有女叔齐愿意为维护公室利益而承担罪责。这种精神令人悲悯，也让人感怀。与这样的君子同行，又哪里会感到羞耻呢？

我们再回到女叔齐治杞田的问题上来，女叔齐之所以要偏袒鲁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悼公夫人的做法不符合晋国的利益。晋国以盟主权威召集诸侯为杞国筑城已经引起极大不满了，如果再按照悼公夫人的计划，让鲁国将几十年甚至百年前侵占的土地归还给杞国，恐怕更会引起诸侯离心，这对晋平公在诸侯间和国内的地位都极为不利。

作为一名维护公室利益的旗手，女叔齐断然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不惜毁掉自己的声誉去做了一件不称职的事情。可即便如此，他对于鲁国的保护作用似乎总是有限的，就在这次外交使命结束后不久，晋国便操控杞国与鲁国举行结盟，以使得这次的成果能够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随后到晋平公二十三年（前535年），晋国又利用鲁昭公去楚国朝见的机会，强令鲁国将成邑交割给杞国，鲁国人对此虽有不满，却也只能在史书上过过嘴瘾，把杞文公称为“杞子”，以表达对其狐假虎威做派的不屑。

晋悼公夫人的做法虽然让晋平公感到悲哀，可不管怎么说，她所做的也只不过是利用晋国的影响力为自己的娘家谋取福利。其间尽管对晋国的权威造成了损害，可这种损害在晋国霸权衰退的大趋势之下已显得微不足道。此时真正能对公室权威造成致命伤害的，还要数六卿对公室利益的瓜分来得更加凶猛，而这将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话题了。

第五节 英雄迟暮

九原问答

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的一个傍晚，一位中年男子在随从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登上了新绛郊外的一片荒原。此时已近深秋时节，原野上充满了萧瑟的气氛，林间的草木也都变了颜色。铺满了山野的红黄枝叶，在秋风的吹拂下仿佛变成了飘扬的锦缎，让身处其间的人们都心旷神怡。

这片美丽的原野有一个同样富有诗意的名字——清原。九十年前（前629年），晋文公曾在这里检阅军队，第一次成立了五军十卿的建制，向世人宣示了一个奋发向上的国家正昂首阔步地走在中原霸业的舞台上。也正是在这次蒐礼之上，辅佐晋文公多年的赵衰终于接受了晋文公的邀约担任新上军将，从此开启了赵氏家族几百年的辉煌伟业。

而如今，在这红黄相间的树丛中，零星散布着许多孤独的坟茔，坟茔中沉睡的都是曾在这片热土上挥洒过鲜血的英豪。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开始用九原来称呼这片记述了晋人光辉历程的土地。

他们来这里的本来目的是要举行一场烝祭活动，以向这些故去的人们表达丰收的喜悦。然而眼前的这位男子却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在祭祀典礼结束、人们都散去之后，他决定继续登高远眺，来纾解内心的苦闷。

他驻足在一片高地上，如木偶一般怔怔地凝视着远处的天地。整个原野在夕阳的照耀下，仿若是洒满了殷红的血。红色的日头渐渐向群山跌落，五彩的晚霞就像是一团团绸缎，似乎是想挽回这坠落的夕阳，却终于还是无济于事。

秋风带着阵阵凉意从原野上滑过，让男子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站在身后的随从走上前来，向男子作揖道：“时间不早了，主该回去了。”

此时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闻名遐迩的贤大夫叔向，而他口称的“主”就是他所辅佐的晋国执政赵武。

听了叔向的话，赵武却并没有转身，他依旧紧紧地凝视着远方的霞光，喃喃地问道：“若是葬在这里的死者可以复生，我该跟谁同乘而归呢？”

听到这样一个突兀的问题，叔向不禁有些发愣。思忖片刻后，他慨然叹道：“或许是阳子吧！”

叔向所说的阳子，就是活跃在文襄时期的阳处父，曾担任过晋襄公之傅，在当时的政坛上有很高的威望。夷之蒐后，正是凭借着阳处父极力推举，年轻的赵盾才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年一跃而成为晋国正卿、中军将，而他自己则因此受到狐射姑的怨恨，最终死于狐鞫居（续简伯）刀下。

可以说，阳处父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未来成全了赵氏的崛起。如果没有阳处父，以赵氏嬴姓氏族的身份是否还能有如此辉煌的历史，接续其血脉的赵武是否还能够获得今日的地位，都将成为一个个未知数。因此在叔向看来，若是赵武真的想找个故人叙叙旧的话，大概非阳处父莫属了。

可赵武却不以为然，他轻声细语地回应说：“阳子为人廉洁清正，然而终究未能身免于难，他的智慧不足以称道。”

阳处父虽有文采却无真才，在过去的那个时代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华而不实”这个成语最早便是他的专利，这一点叔向不会不知道。他只是对赵武的心思有些拿捏不准，不知道他为何会有此一问，这才做出如此

回答，却未想这么快就被赵武否定了。既然如此，他又试探道：“那么，是舅犯吗？”

舅犯也即晋文公的舅父狐偃，曾跟随晋文公周游列国。流亡中他目睹了齐桓公霸业的衰落，宋襄公的争霸失败和楚成王的勃勃野心。这些经历让他逐渐成长为一名足智多谋的政客，在他的运筹和坚持之下，晋文公流亡十九年终于归国得位，进而称霸诸侯。晋国的才智之士很多，但若要论起对晋国霸业的影响最大的人，当非狐偃莫属。

然而赵武却并不认可，他又摇了摇头，说道：“子犯只贪图保全自身利益，却从不考虑曾与他共患难的国君在治国上会遇到哪些困难，他的仁义不值得称道。”

叔向讷然，赵氏的恩主和晋国的元勋都不是，那么在赵武的心目中，究竟谁才是那个智慧与仁义并存的君子，以至于让他心驰神往难以忘怀呢？叔向百思不得其解，他猜不透赵武的心思，便也不再追问，只是顺着赵武的视线向远方眺望。伴随着秋风流过九原的飒飒声，等待赵武给出最后的答案。

此时落日凄红的光线已经渐渐隐去，连片的红霞也缓缓暗淡了下来，整个世界都被远处群山中透出的微光所笼罩着。他们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原野中，任由秋风将夜幕洒向人间，眼眸中充满了虚无和黯淡的神色。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赵武才渐渐收回了目光，转头对叔向说道：“或许是随武子吧！他向国君进谏时总不忘记自己的老师，提及自己的行为也不会遗漏朋友，在侍奉国君、任用官员的时候，不会因为有利益关系或阿谀国君而违背自己的心意。在他的治下，真正贤能的人才不会被埋没，而不肖者也不会窃居高位。”说罢便转身离开，留下叔向一个人凝视着渐渐消弭的天际线黯然神伤。

往者可追

随武子指的是范氏第一代宗族领袖士会（被封于随、范，又称随武子、范武子），也是赵武一生中最为推崇的一个人。几年前的弭兵会盟时，令尹子木（屈建）就曾向他打听过对士会的看法，赵武当时的回答很是简略：“夫子家族事务井然有序，参与政务时也是竭尽全力，从不夹杂私心。他从不向国人隐瞒什么，家族中也没有什么可猜疑的事情。故而祝史在向鬼神陈情时，从来都不会说言不由衷的话，更不会向鬼神祈求什么。”

子木将这些话转述给了楚康王，楚康王也赞叹道：“随武子真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啊！他能够让鬼神和国人都心悦诚服，也难怪能够连续辅佐五任国君担当诸侯盟主。”

如今再次提到随武子，赵武依旧满是赞许。所谓“纳谏不忘其师”，将自己的智识归因于老师的教导，这是不过分炫耀自己的学识、善于韬晦守拙的表现，比起夸夸其谈的阳处父不知要高出多少。“言身不失其友”，将自己的功劳归之于朋友的协助，这是不愿居功自傲、乐于成就他人的表现，比起“贪天之功”“见利而不顾其君”的狐偃更是少了许多私心。“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能够守得住自己的底线，以公正之心侍奉君主、善待贤人，也正因应了“言于晋国无隐情”的说法，故而国人从来都不怨恨他，国君对他也不会有猜忌之心。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这个英雄也往往代表他毕生所要追求的完美人格。当赵武还是一个无知的孩童时，父亲赵朔就去世了，不久赵氏又遭遇了一场几乎导致家族覆灭的巨大危机。这场危机给年幼的赵武心头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晋国寡头政治的残酷性。它就像是一颗种子，早早就深植在赵武幼弱的心里，伴随着他年岁的渐长，也逐渐生根发

芽，直至最后长成了一棵难以拔除的参天大树，让他在此后的人生中无时无刻不心怀警惕。

下宫之难爆发的时候，晋国政坛上最为强盛的力量除了赵氏之外，还有郤氏、栾氏、范氏和荀氏四家。当郤氏和栾氏都积极参与覆灭赵氏的下宫之役时，范氏不仅能做到不偏不倚自外于这场政治风波，还以其深入骨髓的戒惧之心，远离了政坛上一切的纷争，而彼时范氏的实际控制人，正是赵武念念不忘的士会。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士会对于赵氏或许还有着“不杀之恩”。但若仅凭这一点的话，恐怕还不足以让赵武如此感念，毕竟在那场影响深远的危机当中，韩厥对赵氏的功劳要更大一些。真正让赵武服膺的，恐怕还是士会独特的处世哲学和他外化于行的生存智慧。

在下宫之难爆发之前，士会刚刚攀上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担任中军将。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就放弃了刚刚到手的最高领导职位，将政治舞台交给了更加好勇斗狠的郤克和充满野心的栾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他看到晋国内乱的端倪之后，就已经预料到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并不会随着赵氏的覆灭而终止。

政治斗争是充满了未知风险的博弈，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就算是再老练的政治操盘手，也会因预料不到的突发因素而功败垂成，栾书在车辕之役后遭遇的凶险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政治斗争没有永远的胜利者，尤其是在晋国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格局当中，就算是你赢了九十九次，只要最后一次输掉了，也一样会万劫不复。

因此在士会看来，保持家族长盛不衰的唯一法宝，就是永远不要卷入政治厮杀中去。在退休赋闲的那段时光里，他也从来都没有松懈过，总是叮嘱

自己的儿子士燮要远离政治旋涡。而士燮也没有让他失望，终其一生都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从而体面地躲过了栾、郤暗战带来的血光之灾。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为政无私而常怀警惕之心的士会，就已经走入了尚年幼的赵武的视线，成为引导他步入成年、走入仕途、迈向巅峰的引路人。

其后几十年间，参与下宫之役的郤氏和栾氏先后惨遭灭族之祸。更让赵武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在郤氏灭族之后，参与“倒郤”的中行氏也差点遭遇不测之祸，而晋厉公一念之仁的结果，就是让自己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晋国在晋厉公死后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调整期，然而随着复霸事业的完成，外部的威胁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时候，就如同士会父子所坚持的那般，外患消弭的时刻就是内忧爆发的开始，那头引发了晋国内部混乱的野兽再次被释放了出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尽可能地保全家族，就成了晋国列卿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了。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人的心中会有不同的答案，最后他们也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至少在赵武看来，唯有士会这样一个能够保守家业又没有政治污点的人，才是他心目中能力挽狂澜的英雄。正是在士会的影响下，赵武也渐渐养成了凡事不与人争的性格，尽量避免与其他家族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治家的过程中，他也总能效仿士会，树立了任人唯贤的政治风格，逐渐让家道中衰的赵氏恢复了往日的荣光。

然而，有一个不得不让人深思的问题是：年仅四十几岁正值壮年的赵武，却为何要一再地追忆他心目中的那个英雄呢？

不复此乐

当一个人开始频频地回忆起往事，往往意味着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个时候，总会让人想起那首贯穿于影片《星际穿越》始终的诗歌：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

激情不能被消沉的暮色淹没

咆哮吧，咆哮，痛斥那光的退缩

智者在临终时对黑暗妥协

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已经黯然失色

他们也不想被夜色迷惑

咆哮吧，咆哮，痛斥那光的退缩

彼时的赵武，就是一个对黑暗妥协的智者。可他不愿咆哮、不愿痛斥那光的退缩，只愿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那段时间里，诸侯间流传着很多关于“赵孟将死”的传言。最早的传言出现在晋平公十五年（前543年），也就是第二次弭兵会盟的三年后。那个时候的赵武正以晋国执政的身份，召集诸侯在澶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会盟。然而在这场盟会上，赵武的表现却让在场的诸侯都深感失望。按照与会的鲁国使者叔孙豹的话说，赵武“说话时总说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言语之间毫无远虑，不像是一个执掌国政的人。一个年纪不到五十岁的人，说起话来絮絮叨叨，倒像是已经八九十岁的人了”。

赵武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主持盟会，其结果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场原本为援助受灾后的宋国而举行的“国际人道主义”会议，经历了拖沓而

繁杂的议程之后，竟然无果而终了。一直以来在叙事上都颇为倾向于晋国的左丘明，对于这样的结果也感到很是不满。

澶渊会盟的所见所闻，让叔孙豹对晋国的政治走向感到担忧。他曾断言说，赵武恐怕命不久矣，而他一旦去世，“后赵武时代”的局面将会变得错综复杂，到那时，鲁国将何去何从也会变得扑朔迷离。

但让叔孙豹想不到的是，事态的发展总比自己预想的要快。他的话音落下还不到两年，在诸侯寻盟的虢之会上，赵武的“无为”就几乎让鲁国陷入了危难，更差点要了叔孙豹的命——而引发这场危机的就是季孙宿伐莒一事。此事激怒了富有野心的楚国令尹王子围，他在大会上声言要处死叔孙豹。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赵武的做法不是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反而是劝说叔孙豹逃跑，其原因也仅仅因为他不想跟楚国起正面冲突。若不是叔孙豹有着敏感的政治嗅觉，让他在关键的时刻为国坚守的话，鲁国的灾难恐怕就真的不远了。

虢之会后，与会的中原各国还在郑国逗留了些许时光，进行了一些仪式性的外交活动。叔孙豹全程见证了赵武在这些外交场合中的表现，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

当时赵武携诸侯大夫到郑国拜访郑简公，郑简公举办了一场接风宴会招待来自友邦的朋友。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郑卿罕虎（子皮）告知赵武礼毕，并说明几天后还会有一场正式的享礼。

赵武当即赋了一首《瓠叶》。瓠是葫芦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果实可以食用，但叶子不可食用，即便是穷人也只有到了饥荒的年景，实在饿极了才勉强会以瓠叶充饥。赵武以此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次的享礼一应礼节都要从简，千万不可铺张浪费。

罕虎理解了赵武要表达的意思，却不能理解其中的缘由，毕竟这个提法太过于突兀了，万一是自己想错了呢？无奈之下，他只好去向人情更为练达的叔孙豹询问意见，而叔孙豹却直言道：“你没有理解错，赵武就是希望降低规格，随后的宴会你只需以一献之礼接待即可。”

罕虎惊诧道：“真敢那么简单吗？”

叔孙豹说：“是他执意如此，你又有什么不敢的？”

所谓“献”是享礼时敬酒的礼仪，“一献之礼”包含“献”“酢”“酬”三个环节。先是主人向宾客敬酒，然后是宾客回敬主人；一个回合结束后，主人会再次将酒器斟满，宾主共饮。这样的流程就是“一献”。

在周代的礼仪当中，设享礼时进酒的次数是有严格划分的，上公有九献，侯伯七献，子男五献，一献之礼是没有爵位的“士”饮酒的规格。比如重耳流亡楚国之时，楚王以九献之礼来接待这位流亡公子，就是把重耳作为“上公”来看待，以表明其愿意帮助重耳复国。赵武作为晋国上卿，属子爵的贵族，自然应该使用五献之礼来接待。通常情况下，使用一献之礼来接待诸侯国的普通大夫都会被认为是失礼，更何况是接待晋国的正卿呢？

叔孙豹如此解释，罕虎也是半信半疑。他总以为赵武赋诗所表达的或许只是自谦的意思，并没有说明真的要用一献来接待。毕竟通常情况下，使用一献之礼来接待小国普通大夫都会被认为是失礼，更何况是接待晋国的正卿呢？万一郑国听从了叔孙豹的意见，结果让赵武发飙了，他可吃罪不起。因此到享礼开始的时候，郑国依旧准备了五献的用具。

罕虎不了解的是，作为一名出身礼仪之邦的外交世家，叔孙豹早已看透了赵武的心志，他做出的这些判断也不会没有根据。后来事情也果然如叔孙豹所料，当赵武看到五献的用具之后急忙推辞不受，并悄悄地对子产说：“我都已经事先跟上卿说好了的。”罕虎看到赵武的态度坚决，只好撤掉这些礼器，重新换上了一献的用具，赵武这才上座饮酒。

行礼完毕，在宴会上少不了又要赋诗唱和以明志。叔孙豹赋了一首《鹊巢》，这首诗虽然每个章节都是以“鸠占鹊巢”来起兴的，但其反映的却是贵族女子出嫁时有百辆车驾出行的盛大场面，以此来显示对方身份的高贵。叔孙豹的用意，或许是在提示赵武，不要忘记自己尊贵的身份，也不必处处表现自谦以压低自身的规格。毕竟在周代的礼制当中，刻意降低规格和无端的僭越一样，都是失礼的表现。

另外，鸠占鹊巢在这里并非贬义，而是说赵武所领导的晋国就像是筑巢的喜鹊，而鲁国就像是占据鹊巢的鸠，晋国不辞辛苦让鲁国安居乐业，对鲁国来说是极大的恩德。叔孙豹同时还表示出，希望晋国能够继续坚定不移地履行盟主的职责，为东方诸侯提供庇护。

赵武不知有没有听出其中的况味，只是礼节性地回答说：“武不敢当啊！”

叔孙豹接着又赋了一首《采芣》，这首诗说的是一位夫人尽职尽责供奉祭祀的事情，以表明鲁国会尽职尽责遵从大国的意愿。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说：“小国献上薄礼，大国能够俭省使用而不丢弃，如此礼遇，小国必当谨遵大国的号令。”

郑国执政罕虎赋了《野有死麇》的最后一章，这是一首爱情诗，准确来说是一首讲“偷情”的诗歌。尤其是最后一章，描写的是激情中的少女让男

子不要毛手毛脚，免得惹起狗叫，其中意趣令人捧腹。罕虎通过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晋国以礼义安抚诸侯，从不恃强凌弱，以后若能继续发扬风格，那将是诸侯最大的心愿。

赵武赋了一首《常棣》，以兄弟之间的相亲相爱、团结一心来比喻晋国和郑国之间的关系，并说道：“我们兄弟和睦安定，狗就不会叫了。”

说完之后，叔孙豹、罕虎和曹国大夫都向赵武下拜，说道：“有你们的保护，我们这些小国就可以安定了。”随后宾主之间觥筹交错，相谈甚欢，微醺之中，赵武不禁感叹：“恐怕以后我再难体会这样的欢乐了。”

朝不及夕

赵武或许真的再难体会这样的欢乐了。

此行赵武刻意降低规格，以及他最后所说的这些话，都表现出了他内心难以掩饰的焦虑。在赵武之前也曾有人有过这样的表现，那个人就是在栾氏灭族后担任过下军佐的程郑。

当时有郑国使者公孙挥到晋国聘问，程郑曾向其寻求降级的办法。公孙挥回国后谈起这件事，然明当场就得出结论：程郑恐怕就要死了。然明的判断对于赵武也同样适用，作为洞悉人心的著名外交家，叔孙豹对此也早有过评价。

然而事情到了这里，还并没有结束。作为备受瞩目的晋国正卿，他的一举一动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对于他的这些异常反应，也总会有更多的人表示关切。如果说在外交场合上自降规格、言语絮叨还只是赵武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苟且偷生、朝不谋夕”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赵武一行离开郑国后又行经王室，周景王特派刘定公在颍地慰劳，并在洛水边上给他安置了住处。面对碧波荡漾的洛水，刘定公情不自禁大发感慨道：“大禹的功绩和德行真是太伟大了，如果没有他千辛万苦治理水患，我们恐怕就该变成鱼了吧！”接着他又转向赵武，说道：“你我身披礼服、头戴冠冕，居于朝堂之上来治理百姓、安抚诸侯，无不受大禹的恩惠。如果能够继承大禹的功绩，保护天下百姓不受侵害，该有多好！”

面对这样的勉励，赵武只是微微一笑，喟叹说：“老夫也只是战战兢兢苟且度日，唯恐犯下什么罪过。每天都过着朝不谋夕的日子，哪里还能考虑那么长远的事情？”

这个反应让刘定公十分惊诧。赵武崇拜随武子的德行，可即便是想要效仿随武子，想做一个能长保家业的人，也不该是如此的活法。他的这些消极的论调，以及在郑国时一再降低规格的做法，都让刘定公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

在送走赵武之后，刘定公回到王室，对周景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道：“俗话说‘人老了会聪明些，但糊涂也就跟着来了’，赵武恐怕就是这样的人吧！作为晋国正卿主持诸侯事务，反而把自己等同于那些终日碌碌无为的下贱之人，这是要丢弃神灵和百姓了。丢弃神灵，神灵就不享受他的祭祀；丢弃百姓，百姓就不会为他效劳。神怒民叛，何以能久？我看赵武是时日无多了。”

就在赵武外出的时候，有一位秦国客人来到了晋国，他就是秦景公的弟弟公子针（字伯车），人们习惯上都叫他后子。后子在晋国居留多日，总算等到赵武回国，于是便上门去谒见。可赵武见到他后，只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便有些耐不住性子，突然问道：“您大约会在什么时候回去呢？”

听到这个突兀的问题，后子突然愣住了，停顿了片刻后还是如实回答说：“针害怕被国君放逐，所以才到了晋国，如果要回去的话，估计要等到新君继位的时候。”

赵武又问道：“那秦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

赵武的问题越来越不着边际，后子也只能硬着头皮回答说：“无道之君。”

“公子屈尊来到敝邑，一定是为了避开他吧？”

“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后子如实相告。

赵武接着问道：“那秦国会因此而灭亡吗？”

后子哑然失笑，说道：“怎么会？一个国家能够立足天地之间，必然有很多人辅佐国君。一代君主无道，还不至于把国家推向灭亡的境地。只有当几代的国君都荒淫无度时，这个国家才会走向灭亡。”

赵武仍不停地追问：“那国君会短命吗？”

“会的。”

“大约会有多久呢？”

“针听说，国家无道而粮食丰收，这是上天在辅助他。少则不过五年。”

听了这个回答，赵武突然失魂落魄地看着地上的影子发起呆来：“五年？那么长啊？我现在是从早上起来就开始等日落，等啊，等啊……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一天都这么难等，怎么可能等五年呢？”

看到赵武一个劲地发癔症，后子坐在那里手足无措，等了半天索性走人了。等出来之后，他就对人说道：“赵孟恐怕快要死了。君子宽惠慈爱而计谋深远，还恐怕事有不济。今赵孟主政晋国会盟诸侯，不思考如何才能建立长久的德行，反而荒废度日懈怠苟且。既想要混日子，又担心自己活不久，这样的人不是死之将至，就是祸难将临，又能活多久呢？”

良臣将死

同样看出这个迹象的还有秦国的医和。前文讲过，当时晋平公得了一场重病久治不愈，大家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向列国求助。秦景公得知后，便派出医和到新绛为晋平公看病。医和将平公的病因归结于饮食、享乐不知节制，于是便用天地、鬼神，四时、五节、六气等各种玄妙的理论来说晋平公要尊重自然规律，收敛自己的性情。但在此之外，医和还十分突兀地插入了一句：“良臣将死，天命不佑。”

赵武对于医和的那番玄妙的理论不甚了解，但对这八个字却甚是关心，等医和出来之后，就开门见山地问道：“您所提到的‘良臣’究竟所指何人？”

医和快人快语，丝毫没有回避，直言道：“说的就是您啊！主辅佐晋国至今已有八年，这八年中，内无乱政、外无兵灾，称得上是良臣。但是我也听说，国家的肱股之臣领受国家俸禄、承担国家大事，当灾祸出现的时候却无所作为，必然会遭受上天的惩罚。如今国君无所节制以至于病笃，眼看着就不能为国操劳了，这难道还不是灾祸吗？主身为正卿，眼看着国君堕落至此却不加劝止，难道不是失职吗？”

面对医和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赵武竟无力反驳，反而盛赞医和为良医。他深知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经过医和的一番训斥反而感觉泰然了许

多。

这种苟且偷生、朝不谋夕的焦虑感，来源于赵武内心中强烈的不安全感。经历了家族的中衰、见惯了政坛的厮杀、体会了世事的无常，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疲惫。他为此心焦，便试图效仿士会，通过一系列政策革新来保持内外的安定，极力避免因国家动荡而危及刚刚复兴的赵氏家业。因此，在赵武执政的这些年间，晋国以霸主之尊，主动推动了晋楚之间的弭兵会盟，宁愿让楚国占尽便宜，也要坚决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

在国内，他也同样践行士会的主张，尽量弥合各个家族之间的裂痕，不仅赵氏不会试图去主动挑起冲突，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他家族之间的冲突升级。因此晋国在经历了晋景公以来长达四十年的紧张局面后，突然间就在赵武和韩起执政的这段时期内，维系了近四十年的安定局面。

作为六卿之首，在用人方面，士会同样是赵武效仿的典范。据说赵武在执政期间，曾经举荐任用了数十位贤能之人，安排在国家的各个要害部门。但赵武并不会因为对这些人有举荐之恩就结党营私，将这些人变成赵氏的私器，反而尽量避免与他们有政事以外的往来。直到赵武去世，也从来没有托请这些人关照自己的儿子，让他们为赵氏服务。赵武死后，这些人前来吊唁时，也都是站在客人的位置，而不是以赵家私属的身份出现。

这些在国家重要部门占据要职的大夫集团，并不从属于某一个卿家，而是超然于六卿的体制之外，充当了六卿之间的缓冲力量，极大地减少了国君及六卿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赵武如此的做法，也是有一种戒惧心理在时刻警醒，让自己不要在位高权重的时候树立敌人，避免死后赵氏家族又重蹈赵盾和栾书的覆辙。

在治家方面，赵武也是以士会为楷模，对家族内部的事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保持家族的活力和竞争力。从有限的史料中，我们很难窥探其中的具体措施，但其成效却是颇为显著的。晋平公十四年（前544年）周游上国的吴国公子延陵季子，在实地探查了晋国内政之后，就对赵氏家族的改革成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有详细论述。

赵武为政期间励精图治，维护国内卿族关系，倡导国际和平盟会，在赵氏内部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举措对于保守赵氏产业都是大有裨益的。

但不幸的是，赵武从小体弱，成年之后又忧惧过甚，以至于年仅四十余岁就已经显出了耄耋之态。

当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便产生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感。为此他来到了九原，去吊唁他心目中的那个英雄，那个近乎完美的人生导师。与士会比起来，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缺憾，这些都让他感到愤懑不已。然而这种愤懑又向何人诉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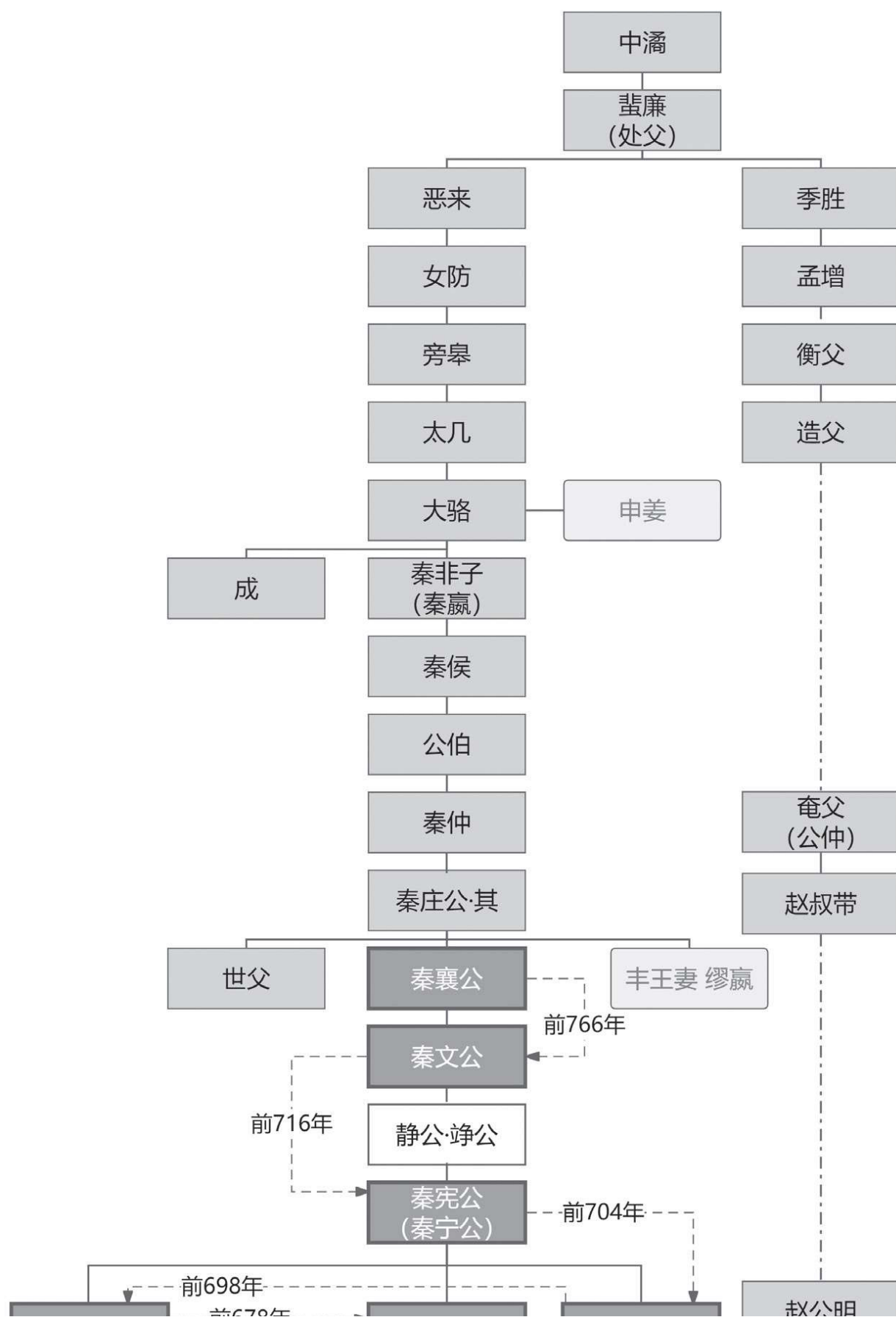
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的周历十二月初一日，在主持了秋季盛大的烝祭后，伴随着料峭的寒风，身体衰弱至极的赵武强打着精神驱车赶往南阳，在温地祭祀他的曾祖父赵衰。在赵氏的祖庙里，他向先辈们叙说了这一生的坎坷遭遇，讲述了自己从小孤苦无依支撑家业的不易，倾吐了自己殚精竭虑在强者的夹缝中图存的悲苦，也道出了对于身后赵氏未来的忧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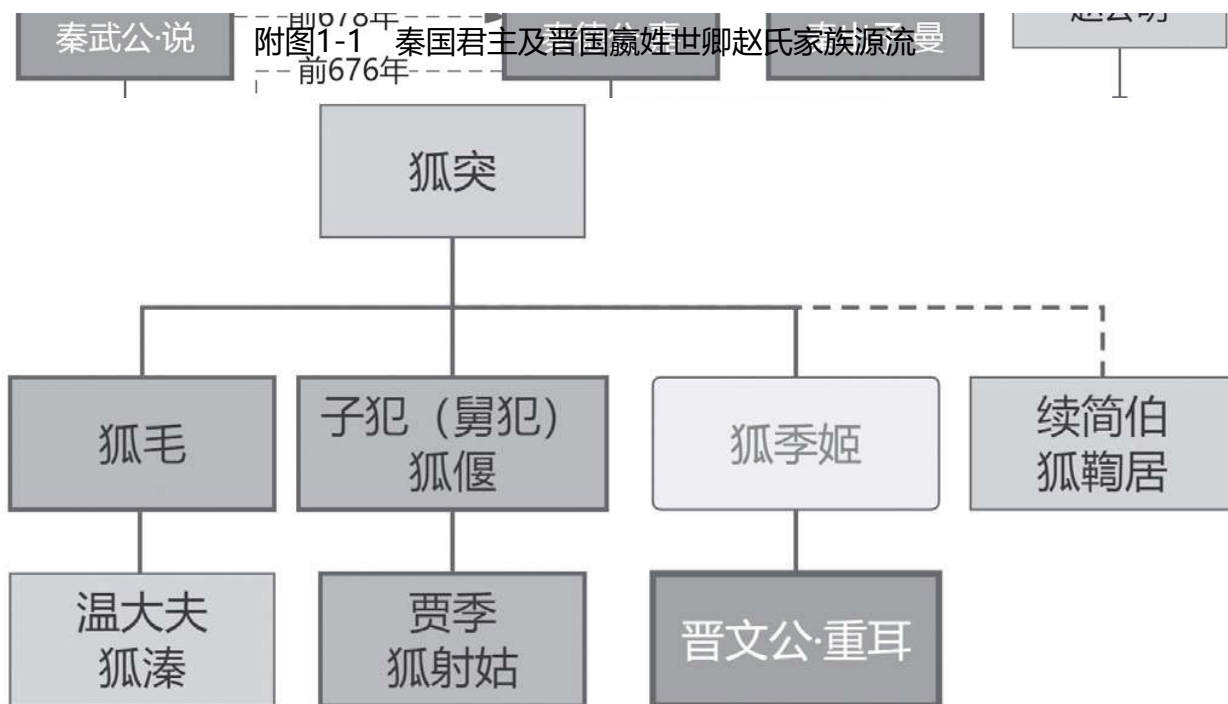
他有着宏大的志向，然而却生来有一副孱弱的躯体；他有未竟的事业，可上天却不肯给他更多的时间；他有着美好的愿望，但世事变幻，让他终究无法找到答案。苍天无语，鬼神无言，宗庙中的神位静静地看着他肝肠寸断地倾诉，却始终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回响。

祭礼结束后，赵武就住在了湿地，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眷顾。初七日，在一场疾厉的大雪之后，时年未满五十的赵武在湿地安然去世。他将自己勉力维持的家业，留给了二十多岁的儿子赵成（赵景子）；也将一个渐渐衰落的晋国，留给了他相伴多年的战友韩起（韩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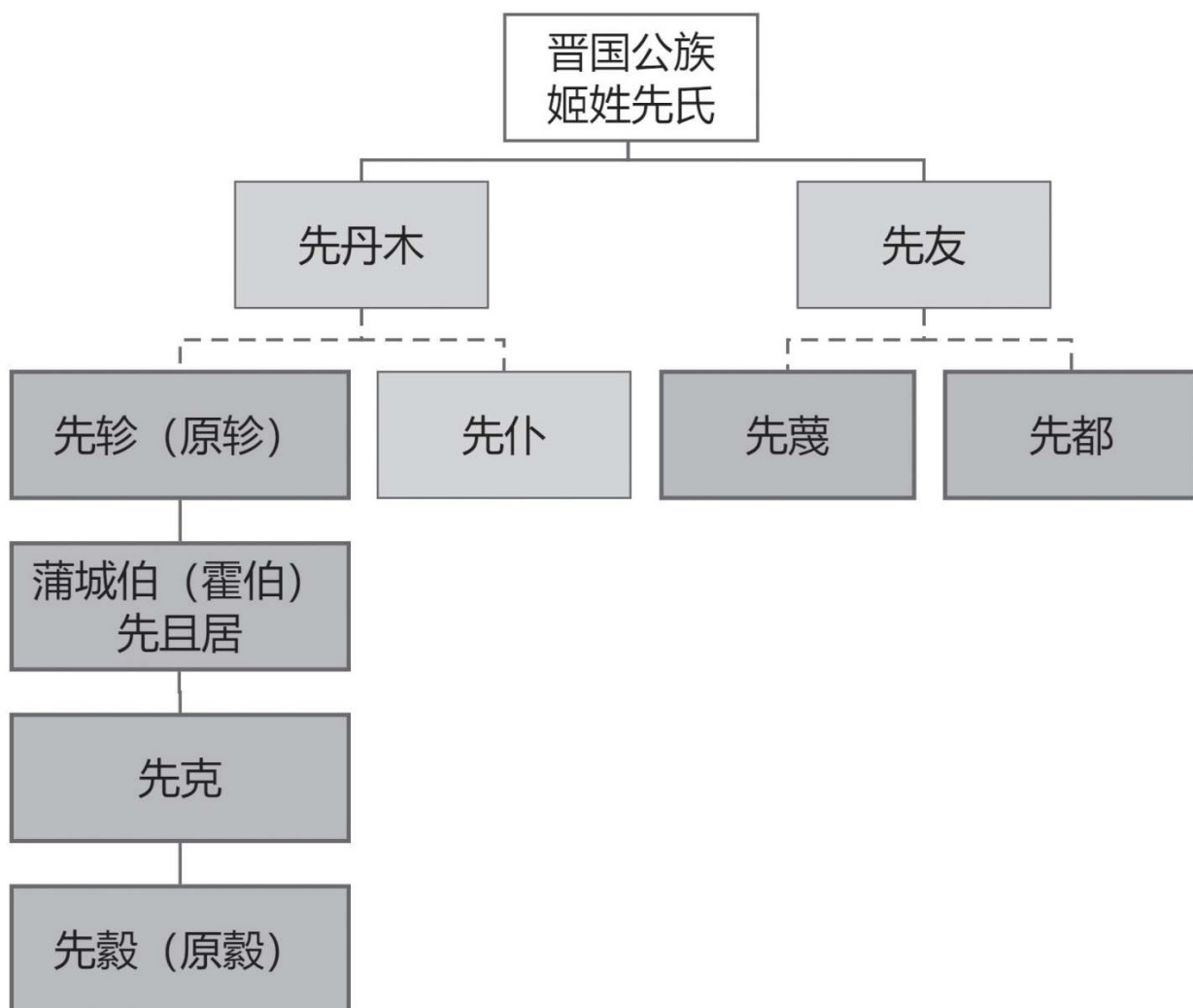
面对这样的一个结局，倘若死者可以复生，士会又是否愿意与赵武同行呢？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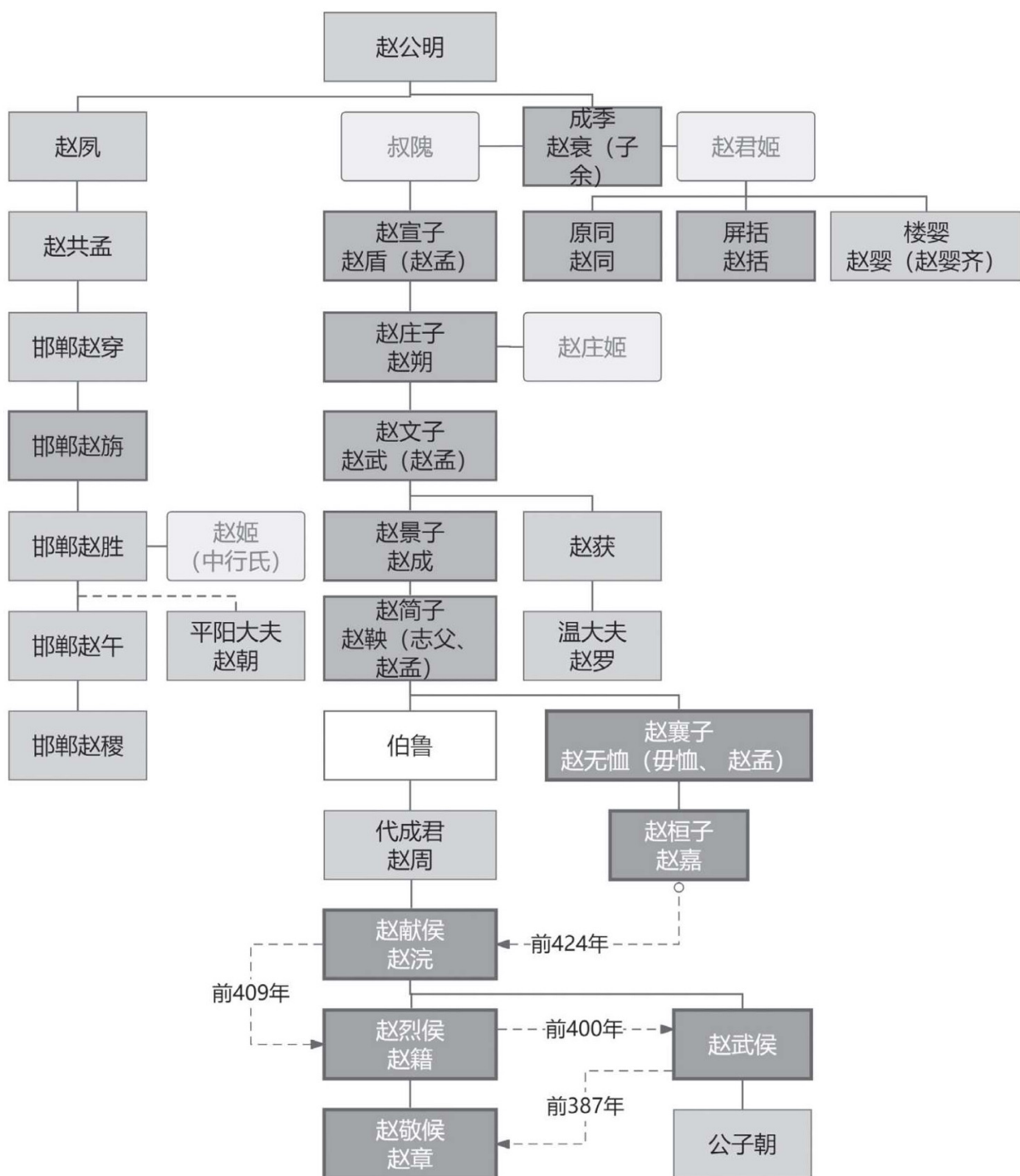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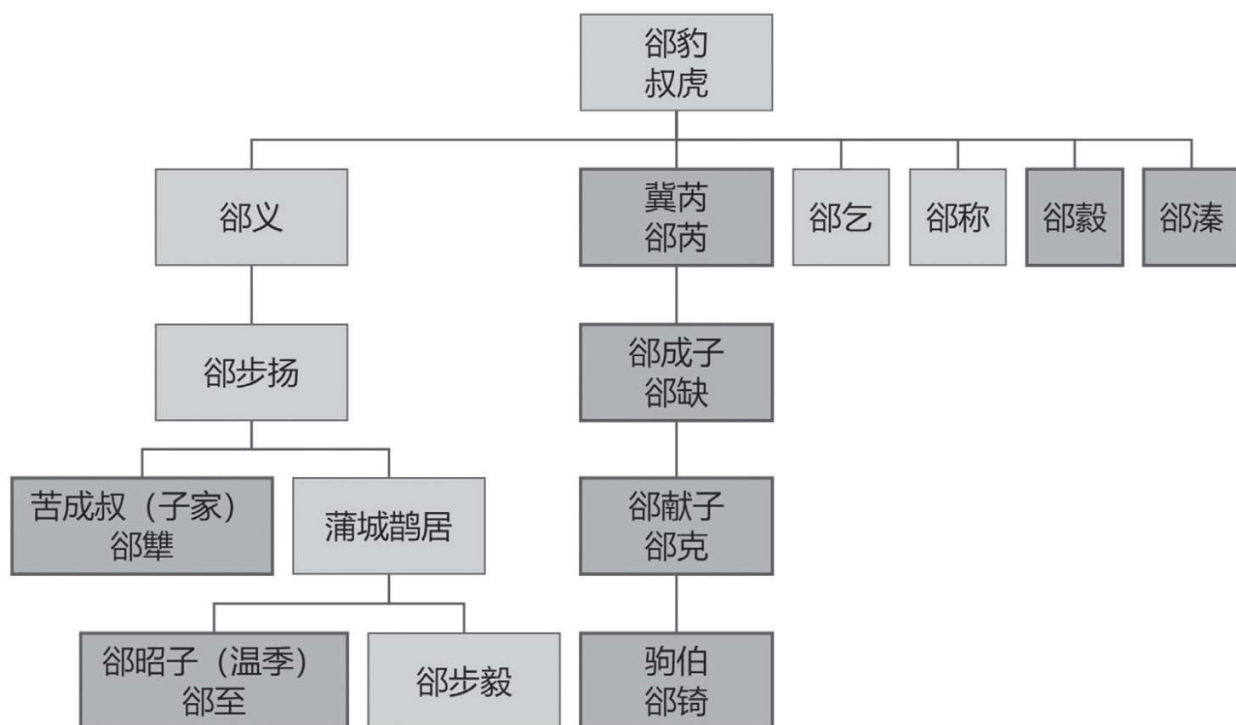
附图1-2 晋国公族狐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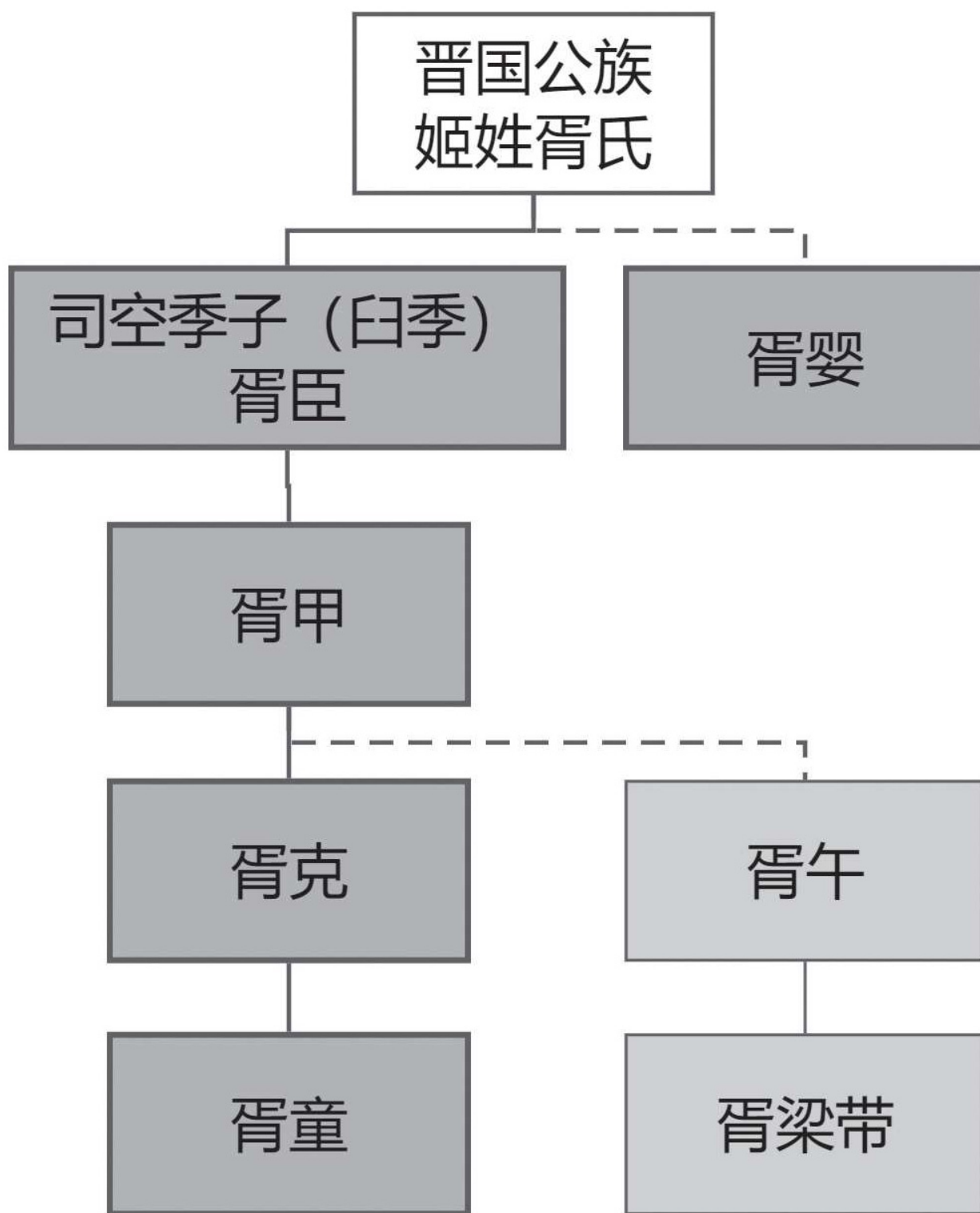
附图2-1 晋国公族先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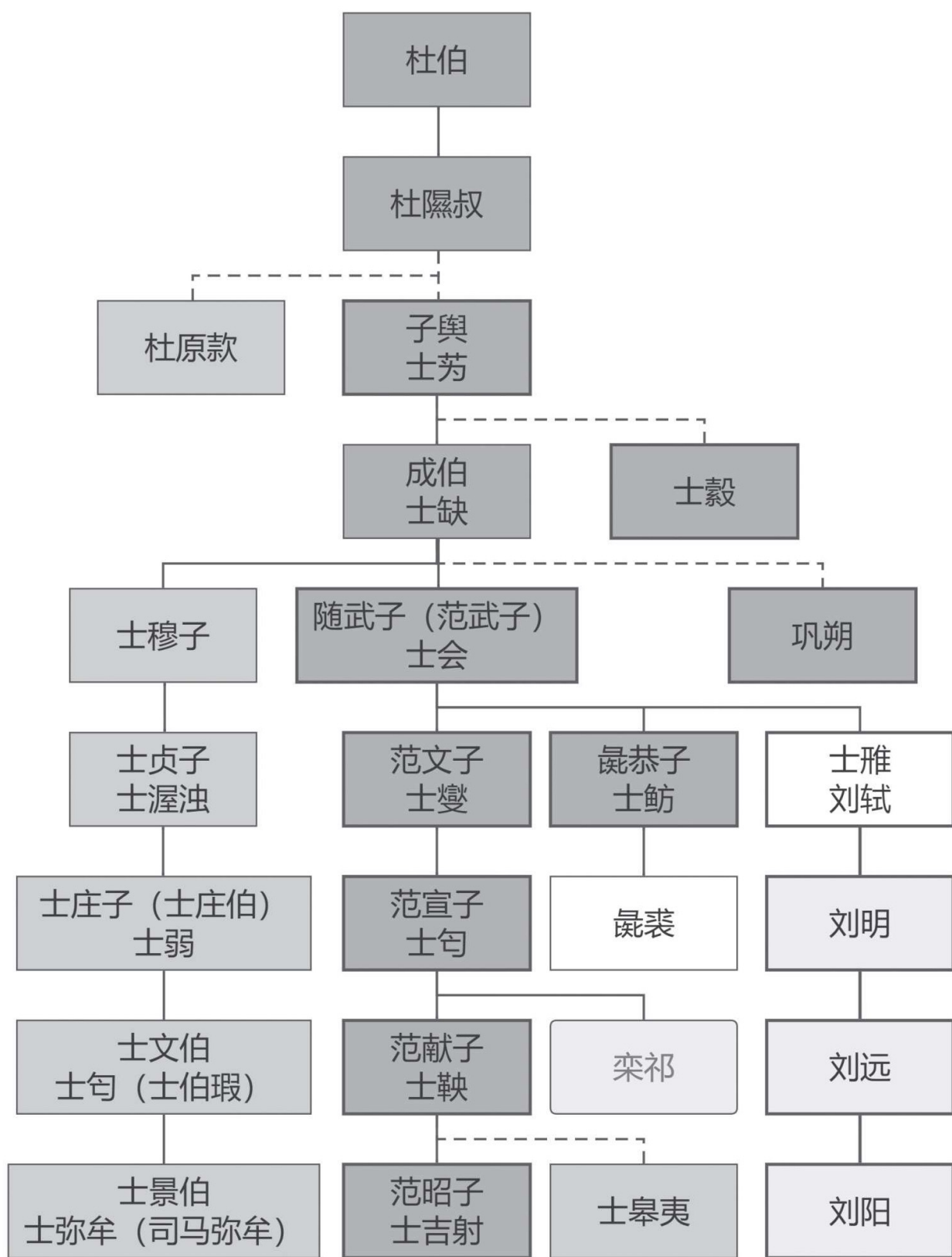
附图3-1 晋国嬴姓世卿赵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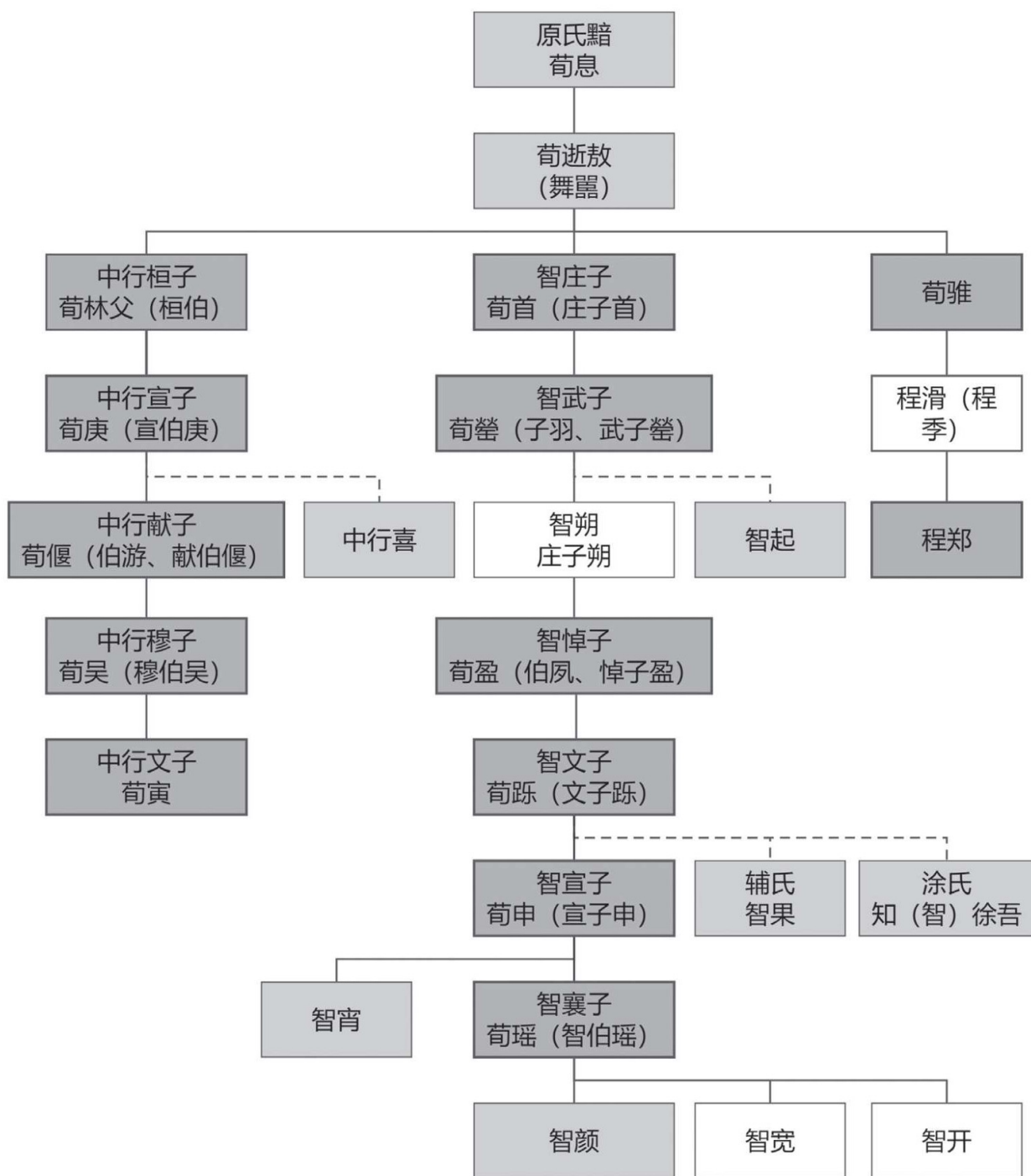
附图4-1 晋国公族郤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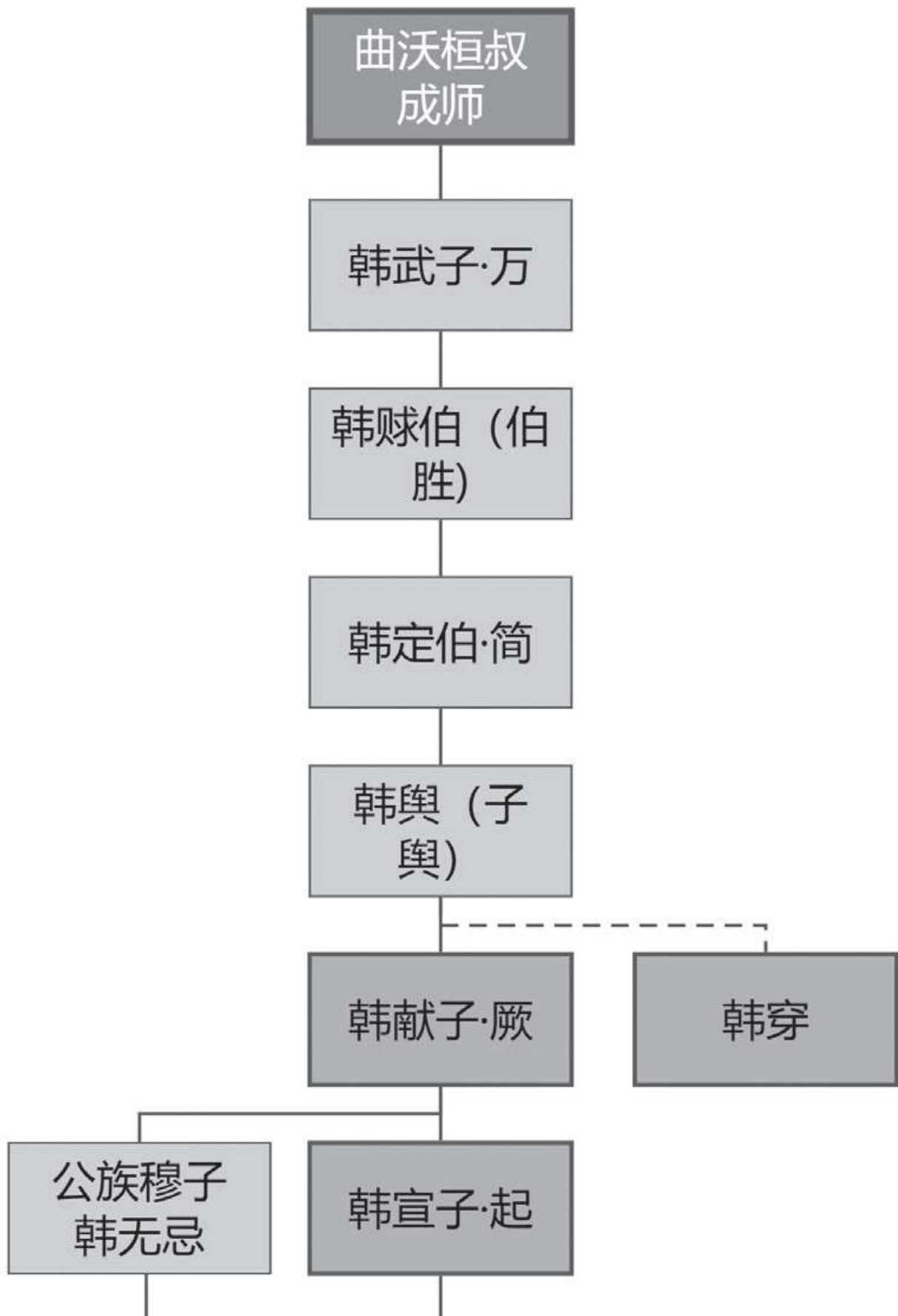
附图4-2 晋国公族胥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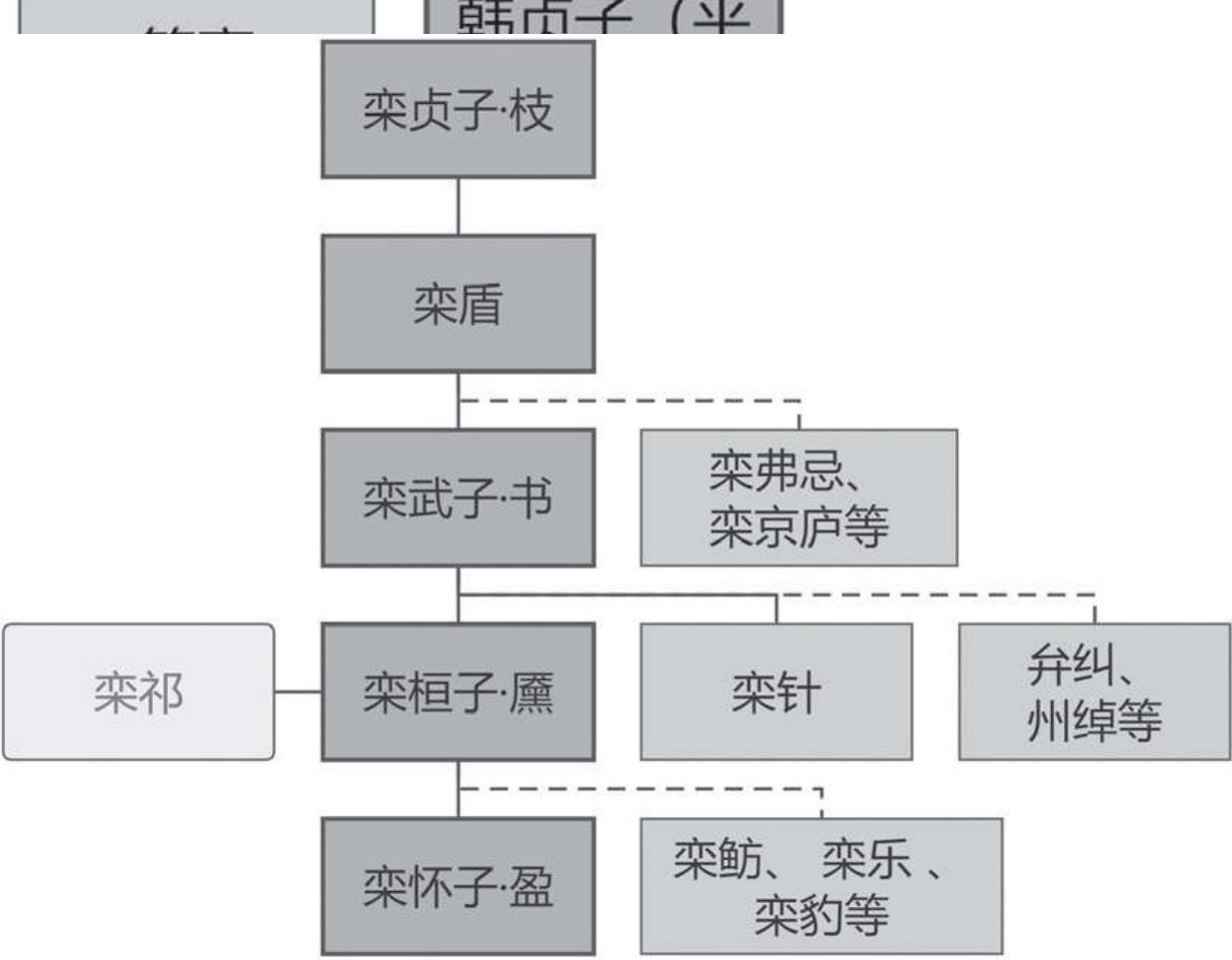
附图5-1 晋国祁姓世卿唐杜氏、士氏、范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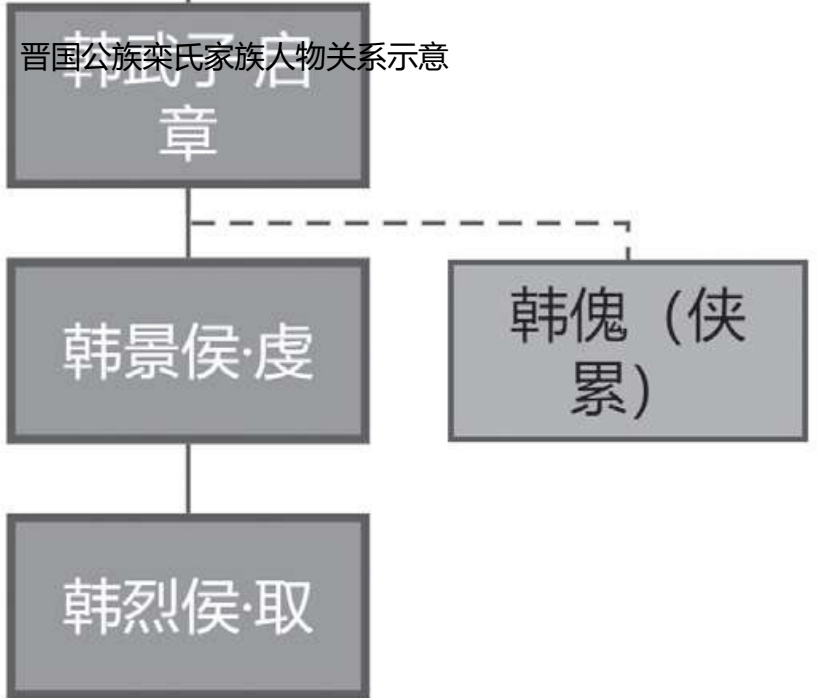
附图5-2 晋国姬姓荀氏世卿中行氏、智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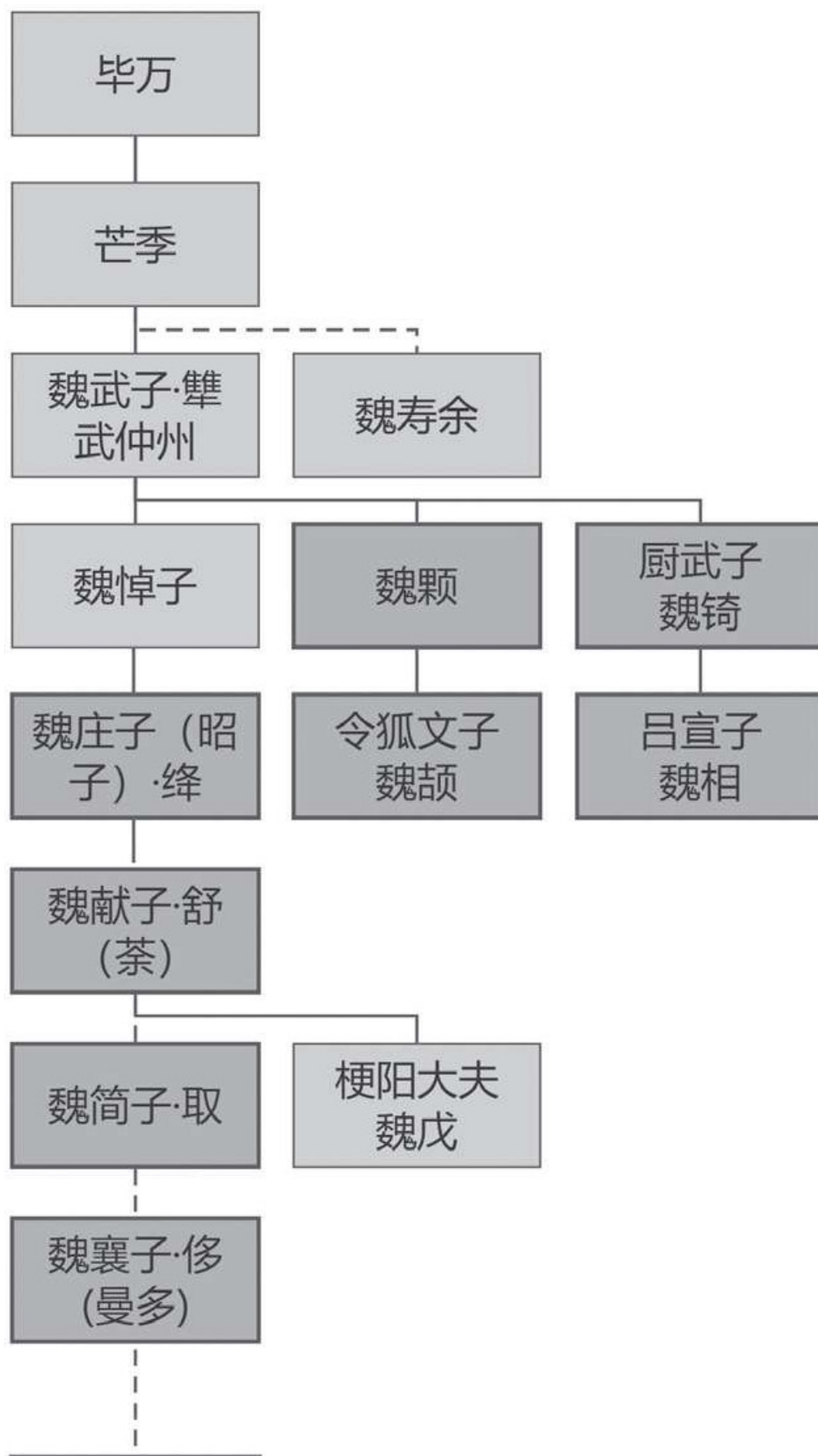


附图5-3 晋国公族韩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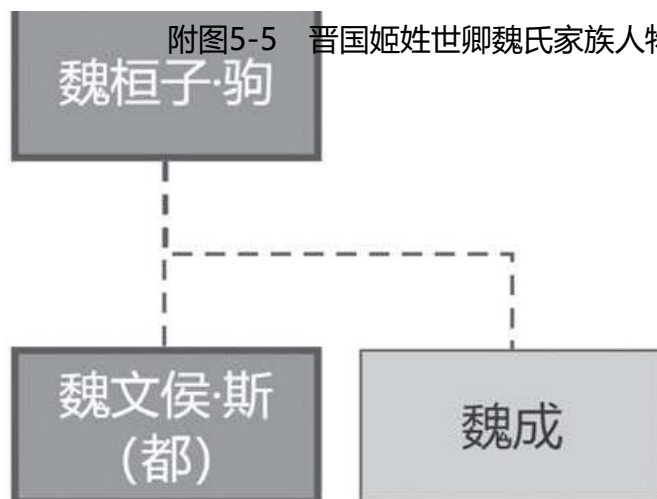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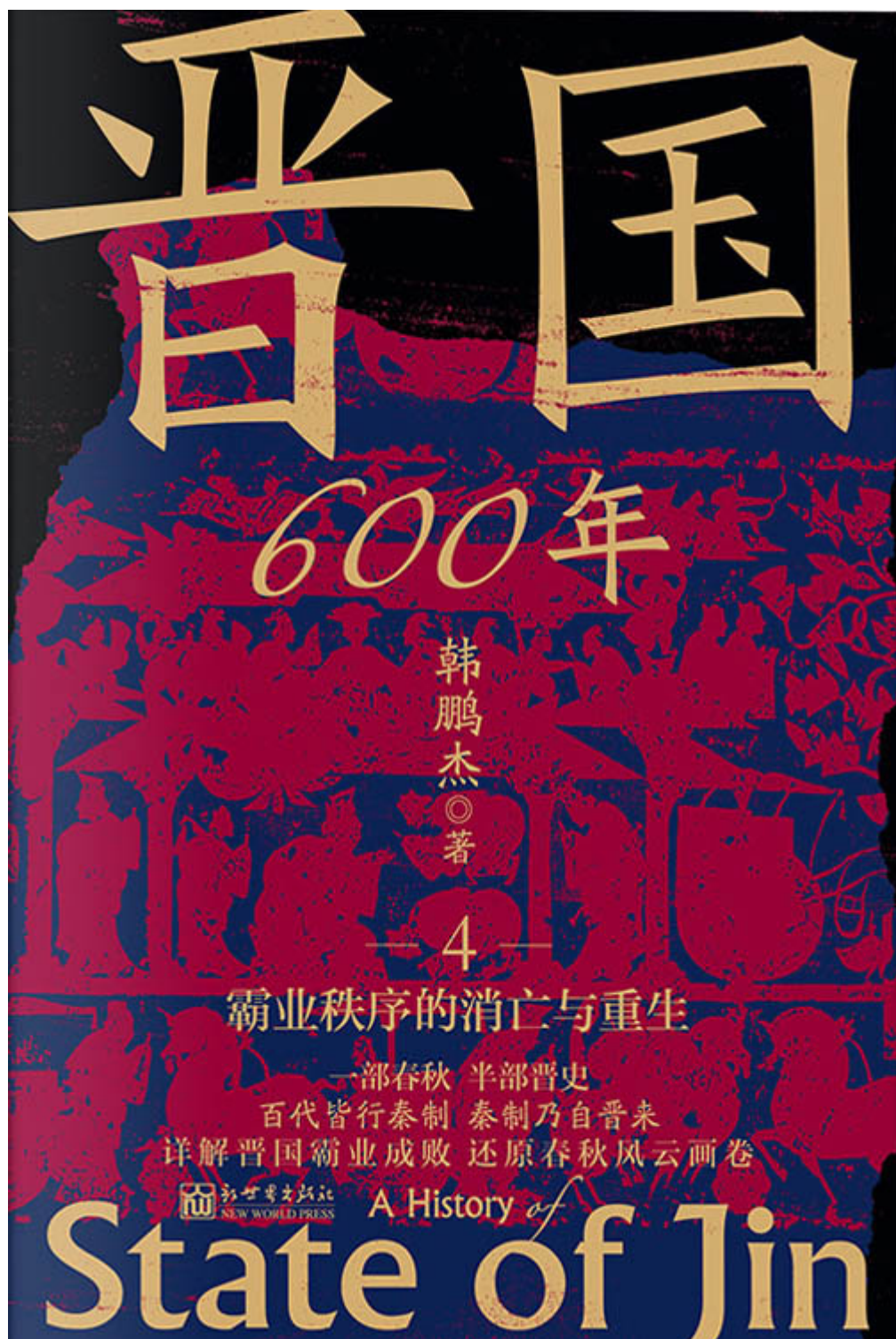
附图5-4 晋国公族栾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附图5-5 晋国姬姓世卿魏氏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第一章 晋国霸业的衰落

第一节 寻盟之会

韩起出使

晋平公十八年（前540年）春，刚刚接替赵武担任中军元帅的韩起，顾不得举行烦琐的就任仪式，就迅速打点行装奔赴东方，马不停蹄地对鲁、齐、卫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向列国通报自己执政的消息。

在拜访鲁国时，韩起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大史氏负责管理的宫廷藏书。在翻阅了《易》《象》《春秋》等典籍之后，不由称赞道：“周朝的礼仪都在鲁国了，看了这些我终于明白了周公的德行，理解了周朝之所以能够成就王业的缘故。”

在随后鲁昭公专设的享礼上，鲁国正卿、季孙氏宗主季孙宿赋《绵》之最后一章。这首出自《诗经·大雅》的诗讲述的是周朝先祖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徙到岐山后，在一片荒原中开辟土地、疏通道路，组建军队、营建城郭，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得周人族群发展壮大的故事。

至于诗的最后一章，则带出了周文王平虞、芮两国争讼的事情，预示着周人的德行日渐昌盛，已经逐步具备了翦灭殷商的能力。其中“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四句，据说象征的是文王有四名贤臣，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下，周人才得以星星之火绵绵不绝，终至于发展成燎原之势。季孙宿在这里赋《绵》之卒章，其意是将晋平公比作周文王，将韩起比作文王“四辅”，恭维的意味浓烈而厚实。

韩起听了之后，回之以《诗经·小雅·角弓》。这首诗据说是在讽刺周幽王近奸佞而远亲族，导致骨肉相怨、纲纪崩坏之事。韩起取诗中“兄弟婚姻，无胥远矣”之句，意指兄弟之国应当相互亲近和睦，这样才能团结民众，避免怨怼集聚以生出祸乱来。

季孙宿当即拜谢：“有您的这番心意，寡君就看到希望了！”

紧接着，他又赋了《节》之最后一章。《节》即《诗经·小雅·节南山》一篇，其所指的时代历来众说纷纭，但就诗中所述的情景来看，显然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当政的天子和官员不能持平，导致天灾人祸不断，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诗的最后一章，是作者“家父”说明自己作诗的本意，是为了追究这场祸乱的元凶，希望他们能改变邪心。

单从诗歌描述的情景来看，其中包含着很大的怨气，与当下赋诗唱和的场景显然是不相称的。但季孙宿所取的仅是“式讹尔心，以畜万邦”一句，意在夸赞晋国君臣德行高尚，足以造福天下诸侯惠及黎民百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人们在社交场合上运用诗歌时并不完全遵循其本意，更多的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截取自己需要的片段来表达心志即可。

享礼结束后，鲁人又在季氏府中设下饮宴。韩起看到院子里栽植的一棵树长得十分挺拔，于是便情不自禁地赞叹了几句。季孙宿当场表示以后会悉心管护这棵树，以感谢韩起赋《角弓》对鲁人的勉励，并赋《甘棠》一诗。

《甘棠》是一篇怀念召公的诗作。相传当初召公巡行乡邑，所到之处不占用民房，只在一棵甘棠树下停车驻马、搭棚过夜，决断曲直、教化百姓。国人感念其德、服其教化，所以爱屋及乌，以甘棠树作为寄托而不忍翦伐。

季孙宿前以文王四辅来作比，后又以召公之德逢迎，马屁都快拍到天上去了，让韩起自己都感到无地自容，于是急忙推辞说：“起愧不敢当，哪里敢跟召公相提并论？”

离开鲁国后，韩起旋即奔赴齐国，代表晋平公向齐景公送来了两国缔结姻亲的聘礼。逗留期间，他分别拜会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公族权臣子雅（公孙灶，栾氏）与子尾（公孙蛭，公族高氏）。

不久前，齐国刚刚发生了几场内乱。先是在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时，崔氏家族因继承人问题出现纠纷，一直觊觎崔杼地位的庆封从中浑水摸鱼，诱导崔氏二子发动内乱，随后又凭借崔杼的信任出兵平乱，致使崔氏家破人亡，崔杼也在绝望中自尽。

庆封掌握朝政大权之后，担心有人会兴风作浪，故而征召在外流亡之人举发崔杼余党，齐庄公的近臣卢蒲癸、王何由此得以返回齐国。这两人一面假意侍奉庆封之子庆舍，一面秘密联络了与庆氏有怨的公孙灶、公孙蛭以及陈氏等宗族，于次年十一月发动政变，迫使庆封经由鲁国逃到了吴国。公孙灶和公孙蛭本身就有公族身份，此番又借迁葬齐庄公、将崔杼尸体示众等举措迅速获得了国人的支持，同时还进一步打击了反对势力，逐渐取代了崔氏、庆氏在国中的地位，成为齐国真正的“话事人”。

两位公孙得以执政时均年事已高，都有心将权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如今韩起来聘，他们就分别将自己的儿子栾施（子旗）、高强（子良）叫出来见礼，其意大概是想让韩起以后能关照着些。但韩起对他们的评价却出奇地一致：“这不是能够保得住家族的人，实在不像个臣子。”

其时齐国大夫多嘲笑韩起，认为他身为大国执政，看人的眼光也不过尔尔。只有晏婴对这个判断深信不疑，他认为韩起是个君子，必然有他的独到

之处，只不过是这些人暂时看不出其中的蹊跷罢了。

回程途中，韩起又拜访了卫国，卫襄公同样设下享礼款待。其间，卫国大夫北宫佗（北宫文子）赋《淇澳》。这是一首赞扬卫国先君卫武公的诗作，北宫佗以卫武公之德来夸耀韩起，其溢美之情不言而喻。韩起则赋《木瓜》一首，诗中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之句，所要表达的寓意亦是不言自明。

这是一次波澜不惊的外事活动，然而细想起来却很是耐人寻味。

以往的晋国执政，其上任之时虽不需要像国君登基一样让各国君臣前来朝贺拜会，但通常都会巧立名目举行一次诸侯会盟，以向天下人宣示自己的地位，在位期间也很少会专门到列国访问。韩起以霸主执政的地位却要屈尊纡贵，以拜会诸侯的方式来通报自己为政的消息，这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奇闻一桩。

对于这样一次重大的外交活动，《左传·昭公二年》的叙述可谓平淡无奇。除了那些看似可有可无的细节外，我们只知道韩起到齐国的目的，是为了给晋平公行“纳币”之礼。至于到鲁国和卫国的行程，就好像纯属顺道路过一般。但实情果真会这么简单吗？

郑人朝楚

想要搞清楚这其中的因由，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七月，在宋国都城商丘西门外盛大的会盟仪式上，晋、楚这对春秋时代最强劲的对手终于握手言和，中原大地持续了百余

年的争霸战争也戛然而止。第二次弭兵会盟的顺利举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更为中原大地带来了长达四十年的和平局面。

然而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在同一个政治圈里出现了两强共霸的局面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不过，在当下的时节里，人们似乎还来不及去想这些高深莫测的议题，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情，那就是促成盟约尽快落到实处。

这次会盟所签协议中有一项重要条款，是让原先隶属于晋楚两国阵营里的诸侯分别到对方的盟主那里朝见，也就是履行“交相见”的义务。

这样的条款对于楚国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他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放弃过兼并的战略，但凡与楚国接壤的国家不是变成了楚王治下的一个县，就是沦为了彻头彻尾的附庸。因此，当中原各国举行弭兵会盟的时候，从属于楚国的诸侯实际上也就只有陈、蔡、许等区区几个小国了。

而作为中原诸侯的盟主，晋国则一直遵循齐桓公“尊王攘夷”“兴灭继绝”的争霸策略，其所笼络的宋、郑、鲁、卫等诸侯都是响当当的中原大国。东方的强齐、西方的秦国虽不能真心归附，可在晋国的压制下也始终不能有所作为；在南方，与楚国毗邻的吴国也与晋国为善。

在双方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正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晋国竟主动提出共享霸权的弭兵之约，将楚人为之争夺了上百年都没有得到的中原列国拱手送上，这份大礼着实已经大大超越了楚人奔放的想象力，让楚国上下都精神恍惚了好几个月。

好在这些楚人也都是经历过大阵仗的，很快就从惊喜中回过神来，并急不可耐地开始安排履约的事情。会盟当年冬天，楚康王就安排薳罢到晋国去

商定具体细节；紧接着到第二年（前545年）夏天，从属于楚国的陈、蔡、胡、沈四国国君就手拉着手到晋国去朝见了。

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齐、北燕、杞、“白狄”等国的君主。这其中北燕国和“白狄”地处北方，在当时还算是中原秩序之外的国家，听闻中原各国弭兵休战，都纷纷前来向晋国示好。齐国自外于晋楚盟约，本来没有前来朝见的义务，但由于此前的两任国君多次冒犯晋国，如今两国刚刚交好，自然要来巩固一下关系。

八国国君呼啦啦地同时来朝，搞得晋平公也有些应付不过来。好在楚国的盟友也不多，晋平公端起架子支应几天也就算过去了，可楚康王就没那么好应付了。

多年以来，楚康王一直幻想着自己能跟晋国国君一样，做一回货真价实的诸侯盟主，如今梦想就要实现了，心里还真有些小激动。也正因为如此，刚刚转过年来，他就催促着陈、蔡、胡、沈四国国君率先朝晋，楚国方面也就履行了盟约的义务，接下来就该看晋国方面的表现了。

然而让楚康王大感意外的是，左等右盼到眼睛都快望穿了，却没有等到哪怕一个诸侯国的君主前来朝见。好不容易到了夏天，边境上传来郑国来朝的消息，仔细一询问却发现，对方派来的只是一个名叫游吉（子大叔）的大夫，这可叫怎么回事？

楚康王当时就脸色铁青，命人到汉水阻拦郑国使团。游吉风尘仆仆赶到楚国，未曾想遭到如此待遇，心中自是愤愤难平，故而义正词严地质问道：“在宋国举行盟会时，贵国口口声声说要实行对小国有利的政策，以使得小国可以安定社稷、镇抚百姓，用礼仪来承受上天的福禄。这不仅仅是贵国的法令，同时也是与会各国共同的心愿。如今敝邑屡受天灾侵袭，国家疲

弱、民生凋敝，寡君不敢在危难时刻丢弃国家职责，因此才派游吉前来奉上财礼。可执事却一意孤行，执意让寡君餐风饮露、跋山涉水前来朝见以满足您的欲望，这恐怕不合适吧？”

但楚人根本不理会这些：“你们这些事情我们管不着，我们只知道在宋国举行会盟的时候，你们的国君是参加了的。如今你们的国君窝在家里不肯来朝见我王，这是瞧不起我们楚国呢，还是压根就没拿盟约当回事？寡君说了，您还是先回去吧，我们倒想问问晋国是否真的有履行盟约的诚意！倘若晋国真是这么要求的，您再回来也不迟。”

游吉还一心苦劝，说：“如果楚国一定要寡君亲自朝见，郑国只能唯命是从，只是担心会因此败坏了楚王的德行，影响楚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既然你们对此毫不在乎，我们又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多走几步路的事嘛！”

临到楚国却吃了个闭门羹，游吉的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回国之后，他向同僚们大倒苦水，还愤愤然地诅咒道：“这样一个不守信义只顾满足自己私欲的人，恐怕是活不了多久的。要我看，国君大可以到楚国走一遭，只不过，这一趟恐怕不是要朝见，而是给楚王送葬。楚人如此行事，显然不能号令诸侯了，这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没好气归没好气，楚国的事情还真不能不放在心上。郑国已经受够了晋楚拉锯的夹板气，这个时候就算是再多受一些委屈，也应该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维持下去。不久，游吉就再次踏上旅途，风尘仆仆地赶到晋国，向晋人报告国君将要到楚国朝见的消息。与此同时，郑简公也在子产（公孙侨，国氏）的陪同下踏上了朝楚的道路，以期尽早完成履约的义务。

然而事与愿违，郑人的诚意显然没能打动楚康王的铁石之心。他渴望的是万国来朝的虚荣景象，仅仅一个郑国前来朝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当郑

简公抵达楚国行完了朝聘的礼仪，楚人却迟迟不肯放行。郑简公虽懊恼，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满心焦虑地望着北方，等待着那些难兄难友们尽快赶到，好让自己早日重归自由。

拔葵而搦

相比起内心急躁的郑国国君，其他诸侯就从容了许多。当决定要履行交相见义务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直奔楚国而去，反而是“南辕北辙”地先跑到晋国去了。就比如鲁国，早在游吉出使楚国之前，就已派出孟孙氏宗主仲孙羯（孟孝伯）到晋国去汇报工作。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游吉从楚国回来又去了晋国，郑简公也早已启程到了楚国，鲁襄公竟然还躲在自己的宫殿里没有出发。

诸侯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其用意无非是两点：首先是要消除晋国的猜忌，毕竟这种事情之前从未发生过，他们也不清楚晋国对此究竟持何种态度。倘若未经请示就去楚国朝见了，日后晋人责问起来，你就是有理也说不清楚。其次是想要让晋人为自己撑腰，一个过去屡屡欺辱盟国同时在诸侯会盟时带甲上阵的国家，很难让中原诸侯放下芥蒂、产生毫无保留的信任。万一楚人又像孟渚之会那样刁蛮起来，有晋人在背后伸张正义，结果也不至于太让人难堪。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手续后，这一年也就快过到头了。到了这年十一月，鲁襄公才不紧不慢地带着庞大的使团踏上了前往楚国的旅程。在此期间，他还“不辞辛苦”地特意绕道郑国，打算和郑简公一起携手同行。得知郑简公已经出发，就又掉头回来与宋平公搭了个伴儿，相扶相守共同上路。前往楚国的行程道阻且长，餐风饮露的滋味并不好受，可他们却故意放慢步伐，磨磨蹭蹭，能耗得一时是一时。

经他们这么一折腾，郑简公可就遭罪了。他在楚国盼星星盼月亮，苦苦等了将近三个月，却还是没等到自己的难友们前来相会。而楚康王或许也是焦躁过度，还没来得及等到那个让他走上人生巅峰的荣耀时刻就去世了。这样一来，游吉一语成谶，郑简公的朝聘之旅果真就变成了送葬之旅。

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传出的时候，一直游山玩水故意拖延的宋、鲁两君才刚走到汉水边上。望着奔腾而过的汉水，两国君臣都停了下来，就是否该继续前往楚国朝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宋国是一个君权相对集中的国家，一切行动以国君本人的意愿为准绳，因而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在他们看来，宋人此番前来只是为了满足楚康王的虚荣心，又不是因为跟楚国有多好的交情。当前宋国国内还在闹灾荒，百姓还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哪里能顾得上楚人的感受？随即他们扯了行李就掉头回去了，留下鲁国人接着争论。

与宋国不同，鲁国公室的权力已经被三桓瓜分一空，大夫们做出决策时通常也都以私家利益为准绳。随行的叔孙豹（叔孙穆子，叔孙氏宗主）、叔仲带（叔孙昭伯）、荣驾鹅（荣成伯）都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次远行为的就是与楚国搞好关系，楚康王人在不在都不影响他们的目的。当时年纪尚轻的子服湫（一作子服椒，子服惠伯）有不同意见，谁料却遭到叔孙豹的嘲笑，说他是“始学者”，也就是刚刚开始接触政务，还不够资格发表意见。最后经过一番讨论，大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议定继续前往楚国履行朝见义务。

丝毫不出意外的是，在抵达楚国之后，他们果然就和先行到达的郑简公、陈哀公、许悼公一起被楚人给扣下了。这个时候，鲁襄公大概才想起了

宋国左师向戌这个“老油条”，这个多年以来一直奔波于晋楚之间的卿大夫，对于楚人的认识是多么深刻，自己真该多听听他的意见啊！

事实容不得假设。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该坦然接受选择所带来的后果。鲁襄公只好和他的难友们一起，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一个最难熬的新年。在朝的鲁国大夫等到新年的钟声敲响，终于确认自己的国君是无法回来过年了，只好取消了原定在祖庙举行的听政朝会。

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消息。等到正月里一切的事务都结束后，楚人大概是为了惩戒鲁国的迟到，竟然又提出了一项非礼的要求：让鲁襄公为楚康王“亲禭”，也就是亲自将鲁国赠送的衣物放置在灵柩的东侧。

通常来说，“致禭”是使臣前往盟国吊丧时的礼仪，楚人让鲁襄公亲自“致禭”，就等于是把他当成一个臣子，而不是地位平等的诸侯。这就让鲁襄公感到很是为难：不听他们的吧，楚人这么无礼，谁知道还会出什么幺蛾子？可听他们的吧，就等于是承认了楚国的预设，如此贬低身份又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这种两难的处境如果是让旁人遇到或许注定无解，可鲁国毕竟是礼仪之邦，楚人给他们出的难题，很快就被熟稔礼仪制度的叔孙豹给化解了。只见他将鲁襄公拉到一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派人把随行的一个巫师叫了过来。巫师听到吩咐，就用桃木棒和笱帚在灵柩上不住地挥舞着，口里还念念有词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明白的咒语。作法完毕，鲁襄公才缓步上前完成“亲禭”仪式。

初看到这个情形，楚人还真搞不懂这是在玩什么花招，就由着他们去了。事后才知道，原来巫师耍的那一套把戏，在中原被称作“祓殡”，也就

是扫除不祥，是国君莅临臣属丧事时所用的礼仪。这样一来，楚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却让鲁襄公占了自己的便宜。

四国国君在楚人胁迫下一直待到了这年（前544年）的四月，他们亲自将楚康王的灵柩送出郢都西门外，其随臣则一直送到墓地。葬礼结束后，他们又参加了新君郢敖的即位典礼，这才被楚人释放而重获自由。

当诸侯纷纷到楚国朝见的时候，流亡归国的卫献公正因国内乱局而悲伤不已，不久就撒手人寰了。一直到两年后（前542年），新继位的卫襄公才在北宫佗陪同下到楚国朝见。直至此时，第二次弭兵会盟约定的“交相见”义务才算是完成了。

东虢之会

“交相见”的义务既已履行，晋楚双方也就初步完成了盟约所规定的条款，接下来就需要重新就盟好后的国际秩序进行确定。于是在卫君朝楚的次年，也即晋平公十七年（公元前541年）春季，与盟各方又在郑国的东虢故地（今河南郑州北）举行了新一轮的会盟，也就是所谓的“寻盟之会”。

临到了会盟时间，晋国正卿赵武在祁午、乐王鲋的陪同下赶到了虢地。楚国也为这次会盟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其中团长为新任令尹王子围，随行人员包括贤臣伍举（椒举）及太宰伯州犁。

王子围是楚共王的次子，楚康王的弟弟，时任楚王郢敖的叔叔，素以骄横跋扈著称于世，且有着极大的野心。差不多就在楚康王去世前后，前任令尹子木（屈建）去世，王子围遂继任为令尹，四国国君在楚康王葬礼上所受到的羞辱，大概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正是因为有过这么一段过节，当时的诸侯都对其十分忌惮。在他们看来，举止任性的王子围俨然就像是孔子所说的那些无法分清真伪的鬼神，大家纷纷敬而远之。晋人自然也不能免俗，随同赵武出席盟会的祁午更是建议提前做好准备以防不测：“当年的子木以信义称著于诸侯，却仍然采取欺诈手段威胁，导致晋国被压了一头。如今的令尹是个极端不守信义的人，天下诸侯莫不了然于胸。如果再不加以防备，恐怕还会落得和在宋国时一样，这将是晋国的耻辱！”

作为赵武的谋臣，祁午还设身处地为赵武着想：“您担任正卿已经七年了，七年之中两次会合诸侯，三次会盟各国大夫，外安齐、狄，西平秦乱，东抚诸夏，筑城淳于，军队不感到疲惫，国家未出现弊病，百姓没有诽谤，诸侯没有怨言，上天也从未降下过任何灾害。您建立了如此卓越的功勋，树立了极其良好的声誉，千万不要因为此事而背上了污点啊！”

赵武听罢颇有些不以为然，回答说：“您说得句句在理，不过也不必为此担心。当初在宋国结盟时，子木有害人之心，而武有爱人之心，因此才让楚国凌驾在晋国之上。今天武本心未改，还会继续以信用为根本，即便楚国依旧不守信用，也不会对晋国造成伤害。这就好比农夫，只要勤于耕耘，哪怕是一时半会遇到了灾荒，最终也必定会遇到丰年。只要谨守信用，我们就不会长久居于人下！”

宋国会盟时屈建有言在先，说晋、楚两国要交互主持诸侯会盟。宋之盟楚国占了先，如今在虢地若要举行会盟，就必然要让晋人先歃血。但王子围为人跋扈，从来不愿落于人后，于是就想了个取巧的办法，说这次咱们就不歃血了，直接将过去约定的盟书内容重新宣读一下，然后放在牺牲上埋了就行了。

有会而无盟，自然也就不需要再争什么先后了。赵武本就是求稳之人，只要楚国不在盟会上生出事端，他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就答应了楚人的要求。

会盟举行当日，是周历三月二十五日，各国来使齐聚一堂，共同就重申宋国盟约的事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然而正当大家为这次胜利的会议而举杯同庆的时候，一阵庄严的钟鼓乐声突然从远处飘来。所有人都停止了讨论，思绪也随着铿锵有力的钟鼓声飞扬而去，而当看到门外所发生的一切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只见不远处有两名手执长戈的卫士，正踏着雄壮威武的步伐朝着会盟的高台走来。跟随在武士身后的是两队衣着华美的侍婢，手捧楚王的衣冠，踩着曼妙的舞步，一颦一笑间尽显高贵。紧随其后的是手持楚王仪仗和华盖的内侍，步伐齐整、场面庄严肃穆。这让所有人都为之惶惑不已：没听说楚王要亲临盟会现场啊？这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了？

正当大家都为之错愕不已的时候，却看到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信步走向高台的并不是什么楚王，正是这次楚国代表团的团长王子围。这个信号显然没有打消人们的疑虑，反而让他们感到更为费解，许多人甚至都怀疑自己是眼睛花了、脑子宕机了，赶紧擦了擦双眼、重启了大脑，才终于确认自己并没有看错。

原本人声鼎沸的大会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直到王子围的仪仗从人群间走过，才有鲁国大夫叔孙豹扶住自己几乎要惊掉的下巴，不由自主地赞叹道：“太华美了！这简直就是国君的派头啊！”

紧接着又听到郑国的罕虎（子皮）像解说员一般，止不住兴奋的情绪高声赞道：“快看！两个执戈的卫士走到前面来了！”

蔡国大夫公孙归生（子家）看着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嘟哝道：“公子住在蒲宫，那可是楚王的别宫，本来就有卫士，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子家的解释显然是画蛇添足，将王子围本来就不怎么美好的形象瞬间又放大了许多倍。一个王子住在楚王的别宫里已是僭越，在进行外交事务的时候还要把王宫的卫士也带出来，显然更是失礼。楚国太宰伯州犁大概觉察到子家的话有些不合适，急忙补充道：“这些都是为了参加盟会向寡君借的。”

所谓“越描越黑”，放在伯州犁这里怕是再合适不过了。听了他的辩解，郑国一位名叫公孙挥（行人子羽）的大夫轻蔑地说道：“是啊，只是借了恐怕就不准备还回去了。”意思是说公子围恐怕就要造反当楚王了，这些东西已是他的囊中之物，还用得着还吗？

伯州犁反唇相讥：“你这么闲，还是先操心一下贵国子皙要违命作乱的事情吧。楚国的事情与你何干？”

谁知公孙挥竟毫不示弱，又反唇相讥：“当璧的那位公子还在，你们就敢如此放肆，难道就不该感到忧虑吗？”

当璧犹在

公孙挥的这句话牵扯到了楚国的一段旧事。

话说早年去世的楚共王没有嫡子，但却有五个宠爱的儿子，其中楚康王是其长子熊昭，如今的王子围即熊围排行第二，另外的三子分别是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和公子弃疾。

楚共王对这五子宠溺有加，不知该立谁为太子，只好听从天意。为此他特意准备了一块上好的玉璧，让人带着遍祭楚国的名山大川，并郑重其事地祷告说：“请诸神在这五个孩子里面选出一个能够主持楚国社稷的人。谁能够正对着玉璧下拜，他就是上天为楚国选择的储君，我绝对不会违背今日的誓言！”

祭祀完毕后，楚共王带着宠妃巴姬秘密地将玉璧埋在祖庙的院子里，然后让五个孩子斋戒沐浴，依次进祖庙叩拜。试探的结果是：长子熊昭两脚正跨在玉璧上，是为“跨璧”；次子熊围的胳膊肘压到玉璧，是为“肘璧”；公子比和公子黑肱在离玉璧很远的地方就下拜了，显然是与王位无缘了；到最小的公子弃疾时，因为还不会走路，就专门有人抱着下拜，两拜都刚好是将头压在玉璧的纽上，这就是所谓的“当璧”。

如此一来，最符合楚共王誓言的就是最小的公子弃疾了。但楚共王自己就是幼年即位，在位时没少受到当时的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的压制，深知幼年为君的不易。他不希望弃疾重蹈自己的覆辙，更不愿意看到这几个儿子将来为了争夺君位而手足相残，因此到最后还是违背了当初的誓言，让最为年长的公子昭当了国君，这也就是楚康王。

以这段旧事而论，楚康王虽是长子，但在当时的观念中也算是得位不正，这恐怕也对他在位期间有意疏远公族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楚康王排斥公室子弟的做法自然引起了诸弟的不满，这其中又以王子围为最甚。或许在王子围看来，如果不选择当璧的弃疾为王，那么剩下的诸位公子中，肘璧的也总要比跨璧好些，因此早有心要争夺王位。而当楚康王去世后，君位又落到了彼时年纪尚轻的郢敖手中，这就更激发了王子围取而代之的野心。

对于王子围的“司马昭之心”，中原诸侯早已心照不宣。最早在郑敖继位之初，随郑简公在楚国朝见的公孙挥就做出了预言：“松柏之下，草是长不高的，将来王子围必定会取而代之。”

后来楚国大夫薳罢（子荡）到鲁国聘问，叔孙豹问起他对王子围的看法。薳罢闪烁其词，说：“像我们这样的小人，做官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只要勉力完成自己的职责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能通晓国家政务呢？”叔孙豹多次试探，都被他含糊其词掩盖了过去。事后叔孙豹就判断说：“令尹很快就要篡位了，薳罢为他掩饰内情，恐怕就是帮凶。”

随卫襄公朝楚的北宫佗见到王子围的豪华气派，也直言道：“令尹的言行已经和国君一样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动政变。”北宫佗同时还看到了其中的危机，判断说：“王子围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但由于他缺乏威望，百姓就不会效法。为百姓所鄙夷的人居于上位，就很难得以善终。”

因此，在很多楚人甚至是列国政要看来，楚国内政最大的悬念不是郑敖能不能坐得稳王位，也不是王子围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得以善终，而是“当璧”的公子弃疾将会何时上位，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上位，他的上位会给楚国乃至中原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在当下，尽管你王子围很猖狂，可我们根本不把你当回事啊！这也就是公孙挥敢于当面顶撞伯州犁的底气所在。

伯州犁并不是王子围的忠实拥趸，但却是一个很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在如此盛大的会盟场合，有人出言讥讽王子围，他自然也不能坐视不理，总想着给令尹找补回点颜面，谁知却让子羽给揭破了。这时齐国的大夫国弱（国景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在一旁说道：“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应该担心。”

倒是陈国的公子招有些幸灾乐祸，在一旁打趣说：“没有忧愁就办不成事情，他们恐怕还要为此高兴呢！”卫国的齐恶也说：“如果事先知晓了危机，这倒也未必会是什么坏事。”

宋国的左师听着这些人吵得不可开交，在一旁轻描淡写地说道：“大国发号施令，小国执行命令，其他的事情不是该我们操心的。”晋国的乐王鲋也深表赞同，说道：“《小旻》的最后一章‘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得很好，面对莫测的灾祸还是常怀谨慎为妙！”

穆叔敬命

众人在一旁议论纷纷，好生热闹，伯州犁在人群中吹胡子瞪眼、气急败坏，反而是居于舆论中心的王子围丝毫不以为意。相反，他之所以这样招摇过市，为的就是向中原诸侯宣示自己的志向，也并不忌惮国内的幼主听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王子围早已把自己当成了楚国的王，如今亲临会盟现场，自然就要摆一摆王者的威严。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然要在会盟上立威，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鲁国和莒国之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这就为他借题发挥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当叔孙豹在虢地参加盟会的时候，鲁国执政季孙宿突然发兵攻取了莒国郛地（山东沂水东北）。莒国马上就派出使者风尘仆仆地赶到会盟地点，向列国巨头痛陈鲁国欺凌弱小的无良行径。王子围接到控诉，当即派人传话给赵武说：“我们在这里重温宋国的盟约，会议还没有结束鲁国就悍然入侵莒国，这是在公然挑衅大国、亵渎盟约，应该立刻处死他们的使者。”

按理来说，无论是鲁国还是莒国都是晋国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就算是现在两国共霸了，要处罚也应该是由晋国说了算。倘若真的任由楚国处置自己的盟友而不能有所作为，就等于是默许楚国是唯一的盟主。如此一来，晋国不仅会丧失盟主的地位，失去诸侯的信任和拥护，更会让天下人耻笑。

但彼时的赵武，早已是一个昏昏然不知朝夕的将死之人了，根本就没想过要跟楚国作对，也对调解诸侯之间的纷争缺乏兴趣。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他竟然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就是去劝说叔孙豹逃离盟会：“令尹为人刚愎自用且好自尊宠，一心想要在楚国称王。现在他认为诸侯懦弱，因此想通过这次的会盟立威，不达目的是不会罢手的。我劝你还是赶紧逃走吧，万一他要真的发作起来，一定会危及你的性命！”

赵武的决定让叔孙豹感到万分失望，他强压着内心的激愤，恭恭敬敬地回答说：“被当众诛戮固然难堪，可若是因为他人的过错而牵连到自己，也就不会感到耻辱了。豹受命于君来参加会盟，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侵害。如果鲁国的确有罪，可参加会盟的使者却逃跑了，就必然会遭受讨伐，这样反而是危害了国家；而如果我舍身就戮，那么就没有人向鲁国兴师问罪了。只要能够安定国君、利于国家，生死又有何妨呢？”

这件事的难办之处就在于，擅自讨伐莒国的确是错在鲁国，按照盟约来处置其使者并无不妥，王子围虽则蛮横却也并非全然无理。但众所周知的是，鲁国现在的政局与晋国类似，一切政令皆出自家门。季孙氏之所以在盟会期间公然背约，除了贪图莒国的土地之外，也有借刀杀人以去除政敌的盘算。倘若还按照过去的习惯惩治使者，无疑是在助长邪恶而惩治良善，这显然不符合赵武的行事作风。正因为如此，叔孙豹才言辞强硬，将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赵武。

赵武虽则人老昏聩，可一旦被逼上了梁山，还是能稍稍振作一下的。他见叔孙豹心志坚定，无法说动，只好向楚国摊牌以表明自己的态度：“鲁国虽然有罪，但其执事从容不迫、不避祸难，正恭敬地等待大国的命令，如此君子是可以作为臣子楷模的。你若赦免他，就能够激励您的左右，让他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在困境中迎难而上，还有什么好忧虑的？我听说，忧虑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面对困难和灾祸时束手无策，不敢迎难而上。而能够礼遇贤人，你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戴；在诸侯会盟中赦免有罪、奖励贤能，人人都会不远千里地归附于你。能够做到这两点，忧患自然会离你而去。”

随后他又转回正题：“边境上的城池土地，列国争来抢去没有定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即便是在三王五伯的时代，圣王先君为各国划定疆界、设置官员、树立界碑、制定法令尚且难以规避这种情况的出现，更何况是这个诸侯相争的时代呢？鲁国和莒国争夺郕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只要对他们的国家没有妨害，大可不必烦劳诸侯，毕竟大家都已经对这些事情见惯了。您如果能够顺应民心，为天下做一个表率，还怕人们不会服膺于你吗？”

王子围本以为赵武软弱不敢示强，却不料在这件事情上态度却如此强硬，也算是探知了对方的底线。再加上赵武言谈中时时透露出为其“大业”着想的姿态，让王子围很满意，因此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赦免了叔孙豹。

令尹为王

与宋之盟类似，在结束了寻盟的主要议程后，来自各国的代表再次坐在一起举杯同庆、畅谈古今。这次的宴会由王子围主办，席间赋《大明》之诗首章。

这首诗是歌颂周朝开国大业的系列史诗中的一篇，主要意旨是通过追述文王之德，来阐明小邦周能够取代大邑商的原因。王子围取其首章“文王明明照于下，故能赫赫盛于上”的意象，以表达自己终有一日会顺应天意，以君主的身分出现在世人面前。到那时，你赵武虽为晋国正卿，却也要以臣见君的姿态来朝见大国圣主。

赵武也不遑多让，轻赋《小宛》的第二章。这是一首追念亡父亡母，并劝告兄弟小心避祸的诗歌。赵武取“人之齐圣，饮酒温克”二句，是说像我这样聪明睿智的人，就算是酒过三巡也能够保持应有的风度。后二句“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又是在讽刺王子围，像你这样自以为是的狂妄之徒，稍微喝点酒就会说胡话，就算当了大王又如何？最后“各敬尔仪，天命不又”二句则是说，天命不会更改，你所期盼的那些荣耀，终究还是会归属于“当璧”的人，如果你能有自知之明，还是保持谨慎为好，免得到头来落下身败名裂的下场。

王子围听了这一章不知做何感想，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他显然没有改变初衷。事后赵武曾询问叔向（晋国大夫羊舌肸，字叔向）：“令尹把自己当成了楚王。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叔向回答说：“楚王势弱，令尹强悍，估计会如他所愿。不过即便是成功了，也不会有好结果。”

赵武问其原因，叔向回答说：“正所谓‘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以强欺弱而心安理得，即便再强大也不符合道义，这样的人自取灭亡也只在瞬息之间。令尹一旦做了楚王，必然会自鸣得意，从而变本加厉地奴役百姓。又看到晋国势力衰弱，就一定会强令诸侯，如此一来更会滋长他的暴虐，从而将暴虐作为常道。这样的统治又如何能够持久呢？”

事情的发展也正如众人一再预言的那样，从虢地返回之后，王子围旋即加速了夺权的进程。他先是将有可能反对自己称王的宫厩尹王子黑肱、太宰伯州犁派到边境筑城，以进取的姿态压迫郑国，而他自己则以此为借口赶往郑国进行谈判。然而到当年十一月初四日，出行不久的王子围突然以探病为由折返回宫，在病榻前杀死了楚王郢敖及其两个王子，上演了一出春秋版的“陈桥兵变”，自立为王，是为楚灵王。

尽管中原各国对此都有预判，但当事情果真来临的时候，还是引起了一阵恐慌。如郑国大夫游吉在参加完郢敖的葬礼之后，就不无担忧地对子产说道：“准备行装吧！楚王为人骄汰奢侈且自恋成狂，必定要屡屡会合诸侯，接下来我恐怕少不了要常去楚国了。”

游吉的这种心态正反映了当时中原诸侯普遍的焦虑情绪。过去几年里，他们面对楚人的骄横一再忍气吞声，为的就是尽快促成宋之盟约能够落到实处。但倘若这种忍辱偷生状态成为常态，躲过了争霸战争却还是躲不过楚人的欺压，那么弭兵会盟的成果也就毫无意义了。这个时候，他们难免就会回忆起过去的时光，怀念起那段在晋国的领导下窘迫但并不卑微的日子。

然而，反观晋国这些年来的表现，却着实是让人失望透顶。自打弭兵会盟举行之后，晋国就开始进入了一种完全“躺平”的状态，只享受盟主地位带来的利益，却不愿意承担任何应尽的责任。

以往晋国强盛的时候，诸侯但凡有一丁点投靠楚国的心思，晋人就会像乌眼鸡一样非要问个明白。如今诸侯要去履行交相见的义务，晋国完全不设任何门槛；盟友在楚国受到了欺压，跑回来想要让晋国做主撑腰，他们也装聋作哑不管不顾。

各国发生了灾荒、内乱甚至是弑君的事件，晋国充耳不闻，就好像完全跟自己没有关系；可是当需要诸侯缴纳贡赋、提供劳役的时候，晋国比谁都清醒。

比如晋平公十四年（前544年），郑、宋两国接连发生饥荒，晋国作为盟主不加体恤也就罢了，反而还要征召民力去替杞国修筑城池，让参与筑城的诸侯大夫皆怨声载道。不仅如此，晋国还派人到鲁国去，要求将过去侵占的土地归还给杞国，让鲁人着实哭笑不得。

到了第二年，宋国又发生了火灾，鲁国早年嫁到宋国的共公夫人伯姬死于大火之中。晋国召集齐、宋、郑、鲁、卫、小邾等国大夫在澶渊举行会盟，商量着要给宋国提供援助。可最后的结果却是一粒米都没有送去，反而让宋国左师向戌白白浪费了许多盘缠。

再次年，郑简公携为政子产到晋国聘问，晋国以鲁襄公去世不便举行享礼为由，将他们晾在馆驿足足四个月。一直到子产忍无可忍将馆驿的围墙都给拆了，他们才想起原来还有贵客，这才设下享礼接待了郑国君臣。

一面是日渐骄纵，咄咄逼人的楚国，一面是朝不虑夕，得过且过的盟主，这样的情景着实让人感到有些恍惚。仅仅是在宋国举行了一次盟会，原本强盛不可一世的晋国，怎么就突然变得如咸鱼一般了？

不少人开始将问题的症结归于晋国正卿、执掌国政的赵武的昏聩，并将希望寄托在了其继任者的身上。比如鲁国大夫叔孙豹，在参加完澶渊的会见之后，回去就向孟孝伯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年纪尚不到五十的赵武就已经进入了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只关注眼前的琐事，对于时间稍久一些的事情就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内心懈怠至此，怕是离死不远了。

紧接着，他又对晋国的时局做出了判断，料定赵武去世之后接掌中军的一定是韩起。他同时表示：“韩子是个君子，但却为人懦弱，而国内的大夫又大多贪婪，要求和欲望没有个止境。晋国的国君一旦被架空，大夫们一定不会对鲁国予取予求。到那个时候，齐、楚又不足以依靠，鲁国恐怕将会陷入危难。”

叔孙豹希望孟孝伯能将自己的意见传达给季孙宿，好让他跟韩起搞好关系，提前为鲁国做些工作。然而不幸的是，叔孙豹所托非人，此时孟孝伯也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听到他的肺腑之言，孟孝伯只是哼哈了几句，说：“人生苦短，又有谁不是在得过且过呢？一大早起来就想着还不知道能不能熬到晚上，搞好了关系又如何？”

听了这些话，叔孙豹知道孟孝伯去日无多了，只好自己去跟季孙宿讲，可对方却全然没有把这些提醒放在心上。直到赵武去世，韩起亲自到鲁国聘问的时候，季孙宿这才感觉到有些着急了，于是就在宴会上拼命巴结韩起。那么，面对鲁人的刻意讨好，韩起又会是什么反应呢？

第二节 晋政多门

韩起忧贫

在与孟孝伯的对话中，叔孙豹既称韩起为韩子，认为其是一位君子，但同时又认为韩起懦弱，不能抑制“求欲无厌”的大夫。这种评价看似矛盾，但的确是韩起处境的真实写照。

一方面，韩氏家族因受晋景公、晋悼公的倚重而位列六卿，如今更是成为卿列中仅存的一支公族，多少都对公室有所感念，因而有着修复公室形象的强烈意愿。而从私利的角度分析，韩起所在的家族与公室实际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倘若没有公室在法理上提供的支持，那么韩起就无法通过正卿的职位获取利益。因此，当卿大夫纷纷为了私利而压迫公室的时候，唯有他能够为国君的利益奔走，在当时的语境下自然当得起“君子”的称号。

另一方面，韩起如今虽身居高位，但在列卿之中却最为“贫困”，而围绕在他身边的，不是累世为卿的豪强，就是世代功勋的大族。这种逼仄的局面又使得他在与其余诸卿打交道时总是缺乏底气，自然也就给人造成了为政“懦弱”的印象。

关于韩起所谓的“贫困”，《国语》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是有一次叔向去拜见韩起，见他因“贫困”而愁容满面、忧虑不已，于是就上前表示祝贺。韩起对此大惑不解，于是就问道：“我只有正卿的虚名，却没有正卿的财产，跟大夫们交往时，常常会因为手头拮据而感到窘迫。我正因此而忧虑不已，你怎么反倒要来祝贺呢？”

叔向回答说：“当初晋景公、晋厉公时的正卿栾书（栾武子）田产不足百顷，宫室之中连祭祀用的礼器都置备不全，可是由于他宣扬德行、遵循法

制，使得自己威名远播，四方都来归附，晋国也正是在他的治下走向了繁荣昌盛。不仅他自己得以安享晚年，就连他的儿子也凭借其余德得以善终。可他的儿子栾黶（桓子）却骄横奢侈、贪得无厌，违法乱纪、肆意妄为，借贷牟利、囤积财物……简直是无恶不作，就算是栾盈（怀子）一改他的作风，发扬栾书的美德，最终也未能幸免于难。

“晋景公时的卿大夫、郤至（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与其堂兄郤锜、小叔郤犇并称‘三郤’，三人并列卿位，可谓荣宠备至。然而他依仗着财富和宠荣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结果自己被杀，郤氏宗族也被灭绝。这样一个家族一朝陨灭，却没有一个人同情，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德行。”

叔向最后总结道：“由此可见，真正决定一个人、一个家族能走多远的，不在于财富的多寡，只在于德行的优劣。如今您有栾书那样的清贫，我认为你也能具备他的美德，所以才向您道贺。如果您不去修养自己的德行，反而因为财用不足而忧虑，我恐怕就要早早地准备哀悼了，哪里还会来庆贺呢？”

韩起听了之后急忙下拜稽首，说道：“在我韩起行将灭亡之际，您一语惊醒梦中人，让我的家族得以保全。这不仅仅是对我韩起一人的恩德，我先祖曲沃桓叔以下所有子孙都应该感激您的恩赐啊！”

以上叙述方式是先秦故事的一贯套路，就如同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无论他们遇到了多少艰险，最后一定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国语》《战国策》这些堪比童话的史料当中，听到谏言的人一定会对劝谏者的话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地践行忠告，最终走向大团圆的结局。

然而现实总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人们不会因为听了一句谏言就从此飞黄腾达，也不会因为不听忠言而走上穷途末路。作为在晋国政治丛林中搏杀出来的高段位选手，韩起显然不能因叔向这区区几句话，就改变自己对财富和权势的信仰。不过话说回来了，时人之所以拿韩起来做文章，至少说明在当时，韩起地位的窘迫是众所周知的。

在栾氏被灭后形成的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都是在晋献公、晋文公时期就开始发迹的旧族；智氏作为中行氏的近亲，虽晚至晋景公时期才开始兴起，但其创业者荀首只短短几年就出任了中军佐。这些家族兴起于晋国最为强盛的时期，经过逾百年几代人的积累，早已是家大业大地位稳固了。

其余两家卿族魏氏和赵氏，其先祖都曾追随晋文公流亡有功，也有着庞大的财富积累。其中的魏氏长期在蒲津前线抵御强秦，早在进入卿列之前就已经拥有了魏、霍、吕、厨、令狐等至少五个封邑，其家族内三个分支都有跻身卿列的实力；而赵氏虽遭受过下宫之役的劫难，但仅凭赵盾时期积累的丰厚家底，就足以让他们傲视群雄了。

唯独韩氏，作为桓庄之族硕果仅存的一支，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一直都很低调，因此尽管曾有韩厥在晋悼公时出任正卿为中军将，其旁支韩穿在晋景公时也曾为卿任新上军佐，可他们的财富积累到底无法与其他家族相提并论。也正是因为生活过于窘迫，在与大夫交往时连像样的财礼都拿不出手，这才使得韩起尽管年长，却又不得不依附于赵氏才能得以保全。

不过与之相抵牾的是，《左传》在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年）的记载中，曾借楚国大夫薳启强之口提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单以这个规模而论，韩氏的属邑在晋国当时五十多个县中所占的比例并不低。但需要注意

的是，蘧启强同时还提到了韩氏的族人箕襄、邢带，其所在的箕、邢两地在当时仍“名花有主”，并不归属于韩氏所有。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韩赋七邑”很可能是对韩起一生功劳的综述，被后人无意中安插到了蘧启强的话语之中。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韩起去世之时，从未进入过卿列的祁氏，其封邑也足足被划分成了七个县，跟两世正卿的韩氏比起来都毫不逊色。韩起绞尽脑汁操劳一生的成果也不过如此，那么其刚刚开始执政时的地位有多尴尬也就可想而知了。

贪婪正卿

叔向没有坐在韩起位置上，自然就不能理解韩起的忧虑。而后来羊舌氏的遭遇，实际上也证明了其观念早已无法适应当时的局势了。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名利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若是自身实力不济，仅仅依靠他人的庇护终究是难以长久的，这是被晋国近百年的六卿权力斗争反复验证过的铁律。正是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让韩起不得不精心筹划，这也就形成了他另一个鲜明的个性特征：贪婪。

关于这一点，《左传》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

晋平公八年（前550年）爆发的固宫之役，使得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二百年的栾氏家族彻底消亡，不少出身公族的世家也因卷入了栾、范纷争而遭到清洗，给急需更多土地发展壮大的六卿带来了一场狂欢的盛宴。

在士匄的主持下，这些家族所留下的土地大都被瓜分一空，但也有少部分优质资产由于竞争太过激烈一直悬而未决，其中争夺最为激烈的当非州县莫属。

州县地处周襄王封赐给晋文公的南阳地区，原本隶属于大夫狐溱治下的温县，后被一分为二，才有了州县的设立，后几经周转，到晋平公时期成为栾豹的封邑。南阳之地土地丰腴、物产丰饶，栾氏败亡之后，此地自然也就成了六卿眼中的珍馐，范氏、赵氏和韩氏都想将其据为己有。

首先是赵武提出了对州县的主权要求，他声称，温县是赵氏的封地，而州县原本属于温县，自己收回州县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但士匄和韩起却不肯相让，他们认为，州县从温县分割出去已有七八十年，而赵氏获得温县却是在郤氏覆灭之后才有的事情，距今不过一二十年，因此不存在物归原主这么一说。更何况，晋国将一县分割开来的情况并非只此一例，若是都按照划分前的状况来处理，岂不是全乱了套了？

看到两家反对如此激烈，赵武也不敢再坚持，只好放弃了争夺。这下轮到韩起和士匄做出姿态了：“我们不能只是口头上喊着要公平正义，背地里却给自己捞好处！”于是也放弃了争夺。州县的归属就这样被搁置了起来。

到赵武执政的时候，他的儿子赵获认为时机已到，希望能够借机夺取州县。但赵武一生谨慎，不肯因这一县的土地惹来忌恨，于是就训斥道：“韩、范二子的话是合于道义的，违背道义必然会引来祸患。我连自己的封邑都无法治理，何必要拿来州县为自己招灾引祸呢？从今往后，有再敢提及州县的一定处死！”

赵武家底丰厚，得不到州县对他而言不过是损失了一个“小目标”，可对处于创业期的韩起而言，却等同于丧失了“第一桶金”，意义自然大不同。也正因如此，韩起从未放弃过对州县的觊觎，为了达成所愿，真可谓是绞尽了脑汁、算尽了机关，甚至于连执政的脸面都可以不要。

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也就是他担任执政的第二年，郑国大夫公孙段（伯石）随郑简公到晋国聘问，朝聘期间因襄礼举止得体，受到了晋人的一致好评。晋平公于是授予公孙段策书，并赞扬说：“当初你的父亲子丰（公子平，郑穆公之子，郑国七穆之一丰氏的始祖）对晋国有功，寡人至今都不敢忘记。今将州县赐给你，以报答你们过去的功劳。”

《左传》中的君子对这件事赞赏有加，说以公孙段平日里的骄汰，一旦开始讲求礼仪尚且能够承受福禄，更何况是那些始终都坚守礼仪的人呢？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又迫不及待地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丰氏与韩氏素来交好，每次来晋国朝聘都不在公室设立的馆驿居住，而是住在韩氏的私宅里。此番公孙段能够获得晋国赏赐的土地，也是韩起在背后运作的结果。但公孙段毕竟是郑国的大夫，不可能长期地保有晋国的土地，因此归根结底，州县最终还是要归属韩氏的。

韩起如此大费周章，其用意就是将州县从栾氏的土地转换成别国大夫的封地。有朝一日丰氏将土地归还给晋国，就相当于新获得了一块土地，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据为己有，不再有任何心理负担。这就好比是如今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洗钱”的手段将非法资金变为合法收益，而韩起的手法我们可以称之为“洗地”。

丰氏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因此当公孙段去世后，其后继者丰施便很知趣地委托郑国执政子产将州县归还给韩起。子产的话说得很委婉：“过去贵国国君认为公孙段能够承担大事，因而赐给他州地的土田，可惜他无福消受，不能永享有这份殊荣。他的儿子不敢占有大国的土地，也不敢就这样推托了贵国君主的赏赐，所以只能私下送给您。”

公孙段去世的时间是在晋平公二十三年（前535年），距离其获得州县的赏赐仅仅过去了四年。这么短的时间显然没办法把事情掩盖过去，这就让人感到十分尴尬。

韩起有心让丰氏晚几年再归还州县，但子产却隐晦地劝说道：“这毕竟是大国的土地，以郑国丰氏的小国小家哪里敢长期专享？您如今身为执政，的确可以保护丰氏免于责难，可将来若有人拿关于边界的闲话问罪，敝邑因此受累倒是小事，可丰氏却也会因此遭受讨伐的啊！因此，由您来接受州县的土地，这不仅能让敝邑免于罪过，同时也是进一步保全了丰氏，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子产说这些话的时候，韩起进入卿列已超过了三十年，年龄至少也有六十岁了。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依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六十多岁的韩起已经算是“高危人群”了。万一哪天他不幸过世了，州县的归属失去控制不说，还有可能会连累郑国和丰氏。倒不如趁他精神正好把这件事情办妥了，大家各求所安，也就不必日日提心吊胆了。

子产虽没有直截了当地把话挑明，但韩起显然理解了对方的忧虑，因此就硬着头皮把州县收了回来。后来他将此事禀明了晋平公，晋平公也顺水推舟履行了一个正式的手续。可韩起毕竟还是做贼心虚，既想得到州县，又担心有人会借题发挥，于是不久后又拿州县交换了宋国大夫乐大心的原县，这才算稍稍舒心了一些。

晋齐联姻

综合以上的事例可见，韩起简直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既是一名为人称道的“君子”，但由于自身的“贫困”，在大夫“求欲无厌”的大背景之下又难以独善其身，总要显现出一些“贪婪”的特征；他有心要维持晋国公

室的利益，但面对“以乐怵忧”、耽于享乐的晋平公，以及各有所求的晋悼公夫人和诸卿大夫，又难免畏首畏尾很难坚持原则，故而就显得有些“懦弱”。这些互相矛盾的特征，也就构成了韩起执政时期的主要旋律，也就注定了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

韩起执政的前半程，主要的施政方向还是维持晋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而在晋楚已然实现弭兵的大背景下，如何有分寸地压制齐国，打消其对中原霸权的觊觎显然是最紧要的问题。因此在接替赵武执政后，他第一时间就奔赴东方列国进行聘问，为的就是要进一步稳固晋国在东方的战略存在。

自晋平公继位以来，齐国便越来越不掩饰谋求中原霸权的野心了，但苦于国内连番内乱，一直都未能与晋国争雄。到弭兵会盟前后，掌握政权的崔杼和庆封先后被灭族，国内政权渐渐落到了公族栾氏和高氏手中，其政局走向也变得扑朔迷离。

韩起并不知晓齐国接下来会不会再起争霸之心，但为保险起见，还是决定到齐国去走一趟。晋平公十八年（前540年）春季的齐国之行，其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达成与齐国之间的联姻。以晋国的霸主地位，又兼以韩起的执政身份，齐国自然无有不依的。回国后不久，他又派自己的儿子韩须到齐国迎接少姜，齐国则派上大夫陈无宇致送少姜入晋。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韩起费尽心机维护两国的关系，可身为国君的晋平公却不怎么买账。陈无宇抵达晋国之后，晋平公竟然以对方不是卿为由，派人在中都（今山西榆次或介休附近）将其抓了起来。

在此期间，嫁到晋国的少姜曾多次替陈无宇说情，指出当时各国奉行的一项规则“逆从送班”，也就是送亲的人要与迎亲的人地位相符。晋国派公

族大夫韩须到齐国迎亲，齐国因为畏惧晋国，还特意提高规格让上大夫前来送亲，怎么您还不满意了呢？

从少姜的解释来看，她显然误解了晋平公的意思。晋国前去迎亲的是公族大夫不假，可前去下聘的可是正卿啊！你不按照下聘时的规格选派送亲的使者，反而拘泥于“送从逆班”的原则，这难道不是对晋国有所怠慢吗？因此，不论少姜如何撒娇哄劝，晋平公就是不肯释放陈无宇。一直到半年后，嫁到晋国的少姜都因病去世了，送亲的陈无宇竟然还没有获得自由。

后来叔向也来相劝，说：“这件事齐国做得并没有错，是我们自己贪求得太过分了。我们自己不恭敬，反而把齐国使者抓起来，处事如此偏颇，还怎么做诸侯盟主呢？而且，当初少姜也希望您能放他回去的……”

少姜嫁到晋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十分受宠，平公还特别亲昵地不称其姓而称其国，将其称为“少齐”。可两人新婚宴尔还没来得及长相厮守，少齐就离他而去了，也着实让平公痛悔不已。因此听到叔向如此劝说，他也只能依从少齐的心愿，将陈无宇释放回国。

上演了这样一出闹剧之后，韩起不得不出面收场，努力弥合因扣留陈无宇造成的外交危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陈无宇刚刚回国不久，齐景公就派来了大夫晏婴，以极其谦和的语气，请求为晋平公再续良缘。

对于齐国的请求，韩起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因此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不仅如此，韩起还亲自到齐国去迎娶齐女，以示对两国关系的重视。

不过，在迎亲时还发生了一段插曲，齐国执政公孙蠃（子尾）看到少姜在晋国受宠，便想借此巴结晋国，于是就来了一手“狸猫换太子”，让自己的女儿与晋国结亲，而本来要和亲的公女则被另嫁了他人。

有人将此事告知了韩起，不料韩起却无动于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们此行就是为了搞好与齐国的关系，目的达到就可以了。若是刻意追究这些细枝末节而得罪了齐国的权臣，岂不是舍本逐末了吗？”

韩起本着务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于齐国权臣以宗女换公女之事不予追究，是因为他明白，以臣欺君已经是当时的政治潮流。韩起不是如叔向、孔子那样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对于已经无法恢复的礼仪不会特别追究，也不会去做逆势而为的无用之功。枝节上发生的错漏，只要不影响主要目的的达成，就都是可以容忍的。

归戚于卫

在与齐国达成联姻的同时，韩起并没有放松战略上警惕。齐国地处泰山东北方向，其西部边境的开放性较高，无法像对秦国那样，仅仅依靠扼守几个战略关口就能实现围堵。因此，想要遏制其谋求霸业的决心，就必须利用好鲁、卫两国的锁链作用，这也是他首次出访就接连拜访鲁卫两国的原因所在。

在与卫国的关系问题上，韩起主要是处理了一桩延宕多年的积案。

这件事还是要从卫献公的流亡说起。早在晋悼公十五年（前559年）时，卫国上卿孙林父和亚卿宁殖合力将卫献公驱逐到了齐国，并立公孙剽为君，是为卫殇公。其间晋悼公本有心干预卫国内乱，但执政的正卿荀偃（中行献子）与孙林父素来亲善，不愿为卫献公主持公道，此事也就只能作罢了。

后来到晋平公即位初年，晋国爆发了栾范之争，执政的正卿士匄（范宣子）召集诸侯在商任举行会盟，要求各国禁錮栾氏。齐庄公有意借此扰乱晋

国政局，故而在会盟时表现得很不恭敬。而卫殇公则是因担心齐国会拿卫献公做筹码，于是在会上刻意讨好齐庄公，这就让晋人感到十分不满。

到晋平公十年（前548年）时，晋国的内乱以栾氏的灭族宣告结束，而齐国也因发生了弑君事件而倒向了晋国，天下大势顿时变得明朗起来。晋国有心要处置卫殇公，就在夷仪会盟期间时，派魏舒、宛没将流亡多年的卫献公安置在会盟地，卫献公复国的愿望终于初露曙光。

晋平公十一年（前547年）二月，在卫献公的授意下，宁喜联合右宰谷对孙氏发动突然袭击。在拔除孙氏在卫都的大本营后，又从容地杀掉了卫殇公和他的太子角，并迎接卫献公复国。消息传到戚邑，孙林父自知大势已去，就带着封邑投靠了晋国。卫献公怒气未消，当即派兵攻打戚邑，孙林父则背靠晋国展开了反击。

到今年六月，晋国新任执政赵武召集诸侯在澶渊会盟，随后又组织诸侯联军攻取了卫国西部边境的懿氏六十邑给了孙氏。卫献公带着宁喜、北宫遗亲赴澶渊辩白，谁知却被晋人尽数拘留，并被带回晋国圈禁在士弱（士庄子、士庄伯）家中。

晋国的做法让诸侯都深感恐惧，齐景公和郑简公更是亲赴晋国为卫献公求情。齐国大夫晏婴在参加会见时，私下对叔向说：“晋国国君在诸侯中宣扬明德，一心一意为诸侯扫除患难、纠正过失，因此才能够称霸诸侯。可如今却为了臣子而拘捕一国之君，这恐怕不合适吧？”

叔向通过赵武把这些话传给了晋平公，然而平公似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反而历数了卫献公的几大罪状，坚决不肯放人，齐、郑两国只好继续出面协调。

在一次宴会上，齐国的国弱（国景子）赋了一首《辔之柔矣》。所谓“马之刚矣，辔之柔矣”，大国安定小国，就如同用柔软的缰绳来驾驭刚烈的骏马；而如果反过来，缰绳绷得太紧，就会使骏马变得疲弱不堪。郑国的子展则赋了一首《将仲子兮》，以“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劝说晋国要顾忌到各国舆论的压力。

晋平公也知道自己过分了，可若是就此放人，又总感觉撂不下面子，事情就这么搁置了下来。直到当年冬天，卫国将一位美女送到晋国，让晋平公好生欢愉，这才顺着台阶将卫献公放了回去。

此后的几年间，由于晋国忙于弭兵事务，执掌政权的赵武又浑浑噩噩、不理政事，因孙林父叛逃造成的戚邑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等到韩起执政，为了缓和与卫国的关系，这件事才被重新摆上了台面，这或许也是韩起到访卫国时双方磋商的重点事项。

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戚邑问题是士鞅（范鞅、范献子）的父亲士匄执政时留下的政治遗产，孙林父也是范氏一力要保护的人，若范氏不肯松口，韩起即便是跑断了腿也不会有实质的进展。而士鞅在诸多事务中一直以贪婪著称，让他把这块吃下去的肉吐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场漫长的博弈过程，其中具体的经过已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韩起访卫五年后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晋平公二十三年（前535年）秋八月，卫国国君卫襄公去世，其子元即位为卫灵公。这时有一个神秘人物突然出现在士鞅面前，对他说：“卫国对晋国一直很恭敬，可晋国却不加礼遇，包庇其叛臣而占取其土地，因此诸侯才有了二心。兄弟不和睦，互相不亲善，远方的人们谁还敢来归附我们？现在

卫国新君继位，若是不趁机跟他们搞好关系，这岂不就是在自绝于诸侯吗？”

士鞅似乎也感受到了诸侯的不满情绪，于是便找到韩起，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韩起听了大喜过望，表示自己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当即命其为全权大使前往卫国吊丧，并主持戚邑交接的事宜。

通过对戚邑问题的处理，我们可以窥探到韩起为政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圆滑。他一心想要修复晋卫关系，但又并不急于一时，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旁敲侧击，让士鞅感受到压力后主动提出与卫国和解。这样一来，戚邑问题圆满解决，又给足了范氏面子，真可谓一举两得。

鲁莒纠纷

在处理齐国问题时，晋平公虽然不怎么配合，但只要美女的盖头一揭开，他也就没什么好反对的了。处理戚邑的问题时，尽管中间夹着一个范氏，但只要能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们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范氏也不是什么不讲理的人。但在处理与鲁国的关系时，韩起所遇到的阻力就没那么简单了。

这种阻力一方面是出于晋悼公夫人的私心。前文我们曾不止一次提到，晋悼公夫人是杞国之女，弭兵会盟之后一心想要利用晋国的地位为自己的母国做一些事情。

晋平公十四年（前544年）时，悼公夫人一方面让晋平公组织诸侯到淳于为杞国筑城，一方面又指派女叔齐到鲁国去要求对方退还侵占的土地。大概是由于女叔齐在处置杞国土地问题时有所保留，到晋平公二十三年（前535

年)，悼公夫人又利用鲁昭公去楚国朝见的机会，强令鲁国将成邑交割给杞国。

这一系列做法引起了诸侯强烈的不满，更让鲁国感到痛心不已，但面对大国的逼迫，他们也只能打碎了牙和血吞，将这件事强忍了下来。

另一方面的阻力则来自鲁国内部。大约在晋厉公即位前后，鲁国三桓主政的格局就已经初步形成，面对三桓家族的强横，公室早已没有了还手之力。而在三桓内部，由争权夺利导致的纷争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早在鄢陵之战结束后，当时的叔孙氏宗主叔孙侨如（叔孙宣子）就曾利用他和鲁成公母亲穆姜、晋国大夫郤犇的关系，试图驱逐季孙、仲孙两家而独揽大权。但事情没有取得成功就被驱逐到了齐国，鲁人迎立其弟叔孙豹接掌叔孙氏。

叔孙豹回国后，有心弥合公室与三桓之间的关系，但季孙氏又开始图谋独掌政权。在任的季孙宿为侵夺公室权益，先是利用鲁襄公年幼即位的机会，将公室军队一分为三，全都交由私家掌管；将国民分为十二份，三家得其七，公室得其五。后来鲁襄公去世，他又强立贪玩而不知礼的公子稠为鲁昭公，并四分公室而取其二，彻底架空了鲁国公室。

在侵蚀公室权益的同时，季孙宿为了进一步取得对叔孙、仲孙两家的优势，又开始利用莒国的内乱接连收纳其叛臣、侵占其土地，这其中最鲜明的例证就是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讨伐郟城一事。当时，晋楚两国正与诸侯在虢地举行“寻盟之会”，叔孙豹作为鲁国方面的代表参加会见，差点就因此事死在了楚国令尹王子围的刀下，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按照盟约的规定，晋国本应就此事讨问鲁国的，但赵武为了与楚国争锋而不得已保护了叔孙豹，这就使得鲁人认为晋人是支持自己的，从此以后就变本加厉，加大了对莒国的侵略力度。

季孙宿的这些作为让叔孙豹深恶痛绝，但为鲁国整体利益考量，他还是特意提醒过季孙宿，让他尽早跟韩起搞好关系，好提前为鲁国做些有益的工作。

然而，季孙宿对此却不以为然，直到后来韩起开始执政并到鲁国聘问时，他才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拼命地巴结韩起，但毕竟为时已晚。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到来的责问，季孙氏转而利用晋国内部的派系冲突来谋取利益，从而与晋国的范氏达成了同盟。

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年）秋季，莒国派人到晋国诉讼曲直，恰好当时鲁昭公正在晋国访问，晋平公就想要将其扣留以斥其罪。

范氏宗主士鞅得知后，径直找到韩起并厉声责问道：“趁着他人前来朝见的机会将其扣留，这无异于是在引诱。作为盟主不能光明正大地以武力征讨，却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来自我满足，这不就是怠政吗？如果真想解决这件事，你现在就把他放回去，来日大大方方地用武力征讨，也好显示盟主的威严！”

士鞅的这顿羞臊让韩起很没脾气，只好把鲁昭公放了回去，至于所谓的武力征讨，自然也是没影的事了。有了范氏的支持，季孙宿可谓是春风得意，第二年还亲自到晋国拜谢，等于是诱导晋国承认了季孙氏对莒国土地的占有。

到晋平公二十六年（前532年）七月，继任的季孙意如（季平子）不仅出兵伐莒攻取了郚（今山东沂水）邑，回国后还在亳社用战俘作为牺牲进行祭祀活动。鲁国一再冲击晋国的底线，而晋国却不能施加报复，韩起在处理诸侯事务时的无力感可见一斑。

第三节 诸侯皆贰

征朝不时

当晋国在鲁莒纠纷问题上遭遇挫折的同时，因其内部政出多门，对诸侯征朝不时、索求无度带来的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这其中最鲜明的例证，莫过于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春季，诸侯针对为少齐送葬一事所引发的讨论。

按照春秋时期的礼法规则，诸侯国君或妻妾去世时，别国前来吊唁和送葬的规格都是有一定之规的。如遇诸侯国君去世，需安排大夫吊唁，卿参加送葬；夫人去世，士吊唁，大夫前来送葬。若非正妻去世，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别国可以不来参加吊唁和送葬，即便是参加，通常级别也不会高于夫人。

少齐并非晋平公的正妻。一般情况下，诸侯若想表达重视，安排士前来吊唁、大夫前来送葬，就已经算是超高待遇了。然而，惯例在强权面前是可以被随便打破的，正因为恩威难测，别国在安排吊送规格时都有些不知所措。

因此，尽管这只是宠妾的葬礼，郑国还是安排了六卿之一的印段（子石，其祖子印为郑国七穆之一）前来吊唁，到少齐出殡的时候，又有卿士游吉前来送葬。而此时的鲁国似乎要比郑国更为焦虑，少齐去世的消息刚刚传到鲁国，鲁昭公就亲自出马了。好在晋国虽有些不可理喻，但让一国之君为宠妾吊唁这种事情还是做不来的，到底把鲁昭公劝了回去。

如此做派不仅让诸侯感到难堪，就连国内大夫都不无愤慨。比如在会见各国使者时，晋国大夫梁丙、张趯就很为游吉打抱不平，说：“您身为郑国

的卿，却要为了一个宠妾的葬礼而屈尊，真是太过分了！”

游吉也愤愤不平地回应道：“我也是不得已啊！想起以前文、襄称霸的时候，他们的情况从来不敢劳烦诸侯，诸侯的朝聘礼仪也都有规定的期限：要求三年一聘问，五年一朝覲，有事情就会见，有不和睦才结盟，不会无缘无故地要求诸侯频繁朝见。可如今呢？一个宠妾的丧事，列国不敢按照常规的礼仪安排合适的人前来送葬，即便如此还怕招来责问，又怎么敢怕麻烦呢？”

诉罢苦衷，游吉继续发他的牢骚：“以后我少不了还要经常到此奔波呢！齐国看到少齐如此受宠，肯定还会送女子前来，到时我恐怕还得前来祝贺吧！”

张趯对此深以为然，于是便安慰说：“所谓物极必反，晋国如此造作，以后必然衰退，失去诸侯拥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待到那时，即便诸侯想要自找麻烦，晋国也没那个号召力了，您也就不必再为此费心了。”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齐国得知少齐在晋国受宠，也的确又送来了女子为晋平公续弦，只是这次送来的不再是宠妾，而是变成了夫人。游吉即便是想来走这一遭，他的身份都已经不够格了，只能劳驾位列六卿之首的当国子皮（罕虎）亲自前来道贺。

由于没能再次见到游吉，张趯心里万分失落，于是就派人传信给游吉说：“自您回去之后，小人扫除先人的破屋子，随时准备着迎候您前来下榻。如今见到的却是子皮，心中别提有多失望了！”

游吉对此也只能苦笑：“游吉身份低贱，由于畏惧大国、尊敬夫人，不敢前去露脸，所以让您失望了。而且当初您也说过，‘恐怕以后都不必为此

费心了’，照此情形来看也的确如此。只怕以后我们很难再相见了！”

不过，游吉的预测终究还是有些纰漏，因为他没有预料到，除了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些大事之外，有些临时性的庆典也是需要庆贺的。仅仅五年后，晋平公心血来潮，准备兴建虎祁之宫，于是就巧立名目征召诸侯来朝，游吉只好跟随郑简公再次踏上了朝聘的旅程。

平公之丧

寻常的朝聘都需要如此大动干戈，遇到了国君的葬礼，诸侯自然更是不敢怠慢。

公元前532年七月初三日，在位二十六年的晋平公突然去世，这就让郑简公深感不安。前次少齐去世时已经安排了卿级别的大夫前去吊唁和送葬，如今国君去世，自然就要再高一个规格，这该让谁去呢？数来数去，好像也只能亲自出马了。

如此高规格地劳顿诸侯，让身为执政的韩起感到很过意不去，于是急忙派人到边境上把郑简公劝了回去。郑简公见晋国态度如此平和，总算舒了一口气，返程的路上高兴得不得了。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他这一回来，可怜的游吉就知道自己是躲不过去了，只好又收拾了行李去参加吊唁。

吊唁仪式结束后，到这年九月，鲁国大夫叔孙婼、齐国大夫国弱、宋国大夫华定、卫国大夫北宫喜、郑国当国罕虎，以及许、曹、邾、莒、薛、杞、小邾的卿大夫们都纷纷赶到晋国，去参加平公的葬礼。因为不堪忍受来回奔波之苦，此次前来送葬的人都揣着一个小心思，那就是希望能直接朝见新君。郑国当国罕虎为此还做了充分的准备，提前将祝贺新君继位的财礼也都带上了。

不过郑国为政子产却不以为然，奉劝他还是趁早打消了这个盘算。在没有晋国明确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带着财礼前去是很不明智的。

春秋时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而要送的财礼大多是青铜器物、布帛粮秣之类的实物资产，需要大量的人力护送。子产为罕虎算了一笔账，说每次运送财礼需要一百辆车，为了护送这些财礼，又需要至少一千个人跟随。这一千个人去了吃穿用度都要花钱，如果晋国不同意你们朝见新君，估计你们还要耽搁更久，带去的财礼用不了多久就花光了，郑国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鲁国大夫叔孙婁深谙礼仪，也认为此事断不可行。国君丧葬乃是大礼，就算是晋国再不顾及礼制，国君在国内再没有地位，这种面子上的礼节也是不能荒废的。

果然，正当诸侯大夫在朝堂上请求面见新君时，晋国大夫叔向却以新君昭公（名夷）的口气出来辞谢说：“大夫们送葬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却又请命让孤与诸卿相见。如此盛情本不好推辞，然而孤在丧期之内，不知该用何等礼节与诸位相见。若是身穿吉服，丧礼尚未结束，恐怕不妥；若是以丧服相见，就等于再接受一次吊唁。孤实在是进退两难，还请诸位谅解！”

这一席话说得合情合理，大家也没有理由坚持请见，这可就把罕虎给害苦了。这个时候，他才想起子产的话来，心中不无懊悔地说道：“懂得道理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用来实践。《尚书》中说，‘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这说的就是人啊！我的境界到底不如子产。”

与君代兴

弭兵会盟之后，面对楚人的骄横姿态，诸侯本指望晋国能念着过去的盟约为他们主持公道。然而经过多年的试探，人们逐渐发现，如今的晋国早已

不同往日，除了对征收贡赋感兴趣之外，在谋求霸业方面早已无所用心。甚至在有些方面，晋国对诸侯的苛待比之楚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使得诸侯对晋国的态度逐渐怠慢了起来。

尤其是在晋平公晚年时，齐国执政大夫公孙蚘、公孙灶相继去世，其继承人栾施、高强嗜酒如命，结果被陈氏、鲍氏合力攻灭。在陈氏的有意放纵之下，大权渐渐旁落的齐景公便想从中原事务中寻找安慰，争霸之心也有所抬头。

晋昭公二年（前530年），齐景公、卫灵公、郑定公为恭贺晋君新立而到晋国朝见。晋昭公设享礼招待诸侯，宴会期间和齐景公玩投壶游戏。晋昭公先投，上军将荀吴（中行穆子）担任襄礼，赞道：“有酒如河，有肉如山。寡君中此，为诸侯师。”晋昭公一投中了，心里很高兴：“我还继续做诸侯盟主，多好！”

轮到齐景公投壶了，没有人给他襄礼，他就自己打气，说道：“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然后顺手一投，也中了。齐景公心里更高兴，这下我要取代你做诸侯的盟主了，真好！

这个情节大概就是后世传说中刘备和孙权试剑砍石的灵感来源，刘备自以为许愿灵验，却盖不住孙权也毫不逊色。但不管孙刘二人如何剑拔弩张，好歹他们还都是心照不宣，不过是心里自得其乐罢了。而这次的投壶游戏却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宣示于人的，这就让晋人感到好生尴尬。

这时在一旁观礼的士文伯（士句，与范宣子同族同名）便埋怨说：“您的话不恰当。我们本来就已经是诸侯盟主了，把这投壶当作一般的游戏就行，何必还要借此来宣示什么？平白让齐侯认为我们国君软弱，这次回去以后恐怕就再也不会来了。”

荀吴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可他是一个要强的人，又怎能轻易认错？听到士文伯的指责，他反倒充满不屑地说：“我们的军队统帅强而有力，士兵争相勉励，气势一如当年，齐国就算有野心又能做些什么？”

话虽如此说，诸侯的反侧还是让晋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尤其是按照《左传》的说辞，廐祁宫的落成让诸侯大感寒心，于是对晋国都产生了二心。为了挽回局面，韩起决定召集诸侯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以此来宣威于诸侯。用叔向的话来说：“诸侯不可以不示威。”只要让他们认识到晋国仍是他们可知世界中最强盛的国家，霸业秩序便有继续维系下去的可能。

平丘会盟

晋昭公三年（前529年）七月初，晋昭公亲赴良地（今江苏邳州）约见吴王余昧（又作夷末、夷昧），但吴王以水路不通为由辞谢不来。晋昭公自讨没趣，只好又折返到邾国南部，就地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次阅兵，参加检阅的战车总数达到了四千乘，比之晋文公时期的七百多乘的总战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可即便如此，对诸侯的威慑力也依然有限。

到八月初，晋昭公又移驾卫国，在平丘（今河南封丘与长垣之间）与周室大夫刘献公以及宋、鲁、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国君举行会见。

然而，自从有了投壶一事挑明了要跟晋国争雄之后，齐国便知道事情已没有了转圜的余地，于是明确表示不参加晋国召集的会盟活动。

韩起对此无计可施，只好让叔向去找王室大夫刘献公讨要计策。刘献公回答说：“结盟是为了表示信用，如果您能够守信，诸侯又无二心，又何必担心呢？对待齐国要软硬兼施、文武并重，倘若他们还是不肯就范，那么就

要让他们知道，天子的卿士会统领天子的军队，严阵以待，至于战事何时发起，那就只看齐人的态度了。”

叔向因此向齐人通报说：“诸侯纷纷请求重温过去的盟约，寡君不敢轻慢，故而亲赴此地，可您却认为不结盟更加有利。寡君对此很是疑惑，所以特来求教！”

齐人回答说：“重温过去的盟约是为了讨伐有异心的国家，如今天下太平、诸侯顺服，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叔向反驳道：“重温旧盟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护礼制，讨伐叛逆还只是其次。我听说，国家的衰败往往始于礼制的衰败，一旦失去了礼制的约束，紧接着就会出现上下失序、威严不昭、祭祀不恭等问题，最终国家事务也就没有了结果。因此贤明的君主往往会规定朝聘的制度，通过演习礼仪来表现威严、展示信义，让诸侯记住自己的职责，这样才能没有缺失。晋国肩负维护礼制的责任，生怕自己不能尽职尽责，因此才准备好牺牲等待贵国前来，以求能够勤于事功、不敢懈怠。然而您却说，‘我本来就打算废弃这些繁文缛节，又何必再结盟呢？’寡君愚钝，不知执事将欲何为？还请指点迷津。”

叔向打出了维护礼制的大旗，将齐国的做法视为废弃礼制，虽未直接挑明，却也透露出为维护礼制不惜向齐用兵的深意，不免让齐人感到恐惧，只好按着晋国的要求参与了盟会。

晋国对齐国的胁迫，主要是捏准了齐景公的软弱和齐国内乱不休的软肋，可一旦碰到较真的人，这些威胁恐吓的言辞就不再起作用了。比如在盟会开始时，之前曾三番五次数落晋国失职的子产，就在盟会上与晋人公开争执，从而为郑国争取了大量实惠。

子产首先指出了如今贡赋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他认为早年天子确定进贡物品的次序和轻重时，依据的都是诸侯的地位。地位尊贵者贡赋自然就重一些，地位低而贡赋重的通常都是甸服之内在王室任职的国家。

这里子产提到了周朝的一项制度。当时西周根据与王室的远近亲疏将天下诸侯分为九等，也就是所谓的“九服”，服制越低、距离越远，所需进贡的物品就越少、频次也越低。子产认为郑国属于第三等的“男服”，以区区小国之力却长期缴纳相当于头等“侯服”所对应的贡赋，这实在是失公平，因此要求晋国降低郑国的贡赋数量。

晋国早已习惯了依靠诸侯的贡赋过日子，如今虽履行的义务减少了，却又极不情愿减轻诸侯的压力。更何况，子产所提出的这些都是西周时的旧制度，非要套用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颇有些强词夺理的嫌疑，自然无法说服傲慢的霸主。

子产于是就继续争辩说：“诸侯之间弭兵休战，为的就是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使得小国得以生存，这次的会盟无非也是为这个目的而来。可晋国却一直抱持原来的态度，催缴贡赋的使者没有一个月不来的，而贡赋的数额又没有个限制，这岂不就是在逼迫着小国走向灭亡吗？哪里还有什么友好可言？”

后世秦末掀起农民起义风暴的陈胜振臂一呼，喊出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宣言，号召人们推翻暴秦，如今子产也几乎就要说出“天下苦晋久矣”这句话了。不管晋人如何固执己见或者威逼利诱，子产都不为所动。双方的争执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晋人实在熬不住了，只好让步，同意减轻郑国贡赋的数额。

叔鱼之谋

平丘会盟最重要的一项议题，是处理邾国和莒国对鲁国的诉讼。前文曾提到，韩起执政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鲁国执政季孙氏趁着莒国内乱的机会浑水摸鱼，侵占对方不少土地。晋国接到莒国的投诉，本有心惩治鲁国，却因遭到范氏的强力阻挠而不得不搁置起来。

后来到晋平公去世前，季孙氏的新任宗主季孙意如又悍然发兵侵略莒国，在夺取了郚邑之后更是在亳社使用活人献祭，严重践踏了盟主的底线。也正因为如此，当鲁昭公准备前往晋国“朝嗣君”时，晋人以“有平公之丧”推拒了鲁侯的朝见，转过年来又以讨问鲁国为由举行了这次平丘会盟。

晋国煞有介事的态度让鲁国十分不安，但却让莒、邾两国备受鼓舞，在盟会上再次提出控诉，说：“鲁国不分昼夜地出兵侵扰我国，我们几乎都要灭亡了。所以不能向大国进贡财礼，都是鲁国的过错！”

鲁昭公一心想要亲自面见晋昭公，可晋国却不给他辩解的机会。前来传达君命的叔向还毫不客气地告诉他：“寡君知道已经没办法跟你好好相处了，因此初七日的结盟活动就不敢劳驾您了。”

鲁昭公一听，这哪儿成啊？急得又是跺脚又是叹气，倒是子服湫（子服惠伯）在一旁不慌不忙地回复道：“你们的意思我们已经知道了。贵国偏听偏信蛮夷的控诉，却不听兄弟之国的解说，这是准备要丢弃周公的后代。想要怎么做，都随你们吧！”

叔向正色道：“俗话说，干瘦的牛也能把小猪压死。此行寡君带了装载甲士的战车四千乘，就算是无道之君也足以震慑天下了，更何况我们还是符合道义的，又有谁能够阻挡？而你们内有南蒯、子仲的叛乱，外有邾、莒、杞、鄫怒目而视。若是晋国凭借自己的武力，同时征召诸侯的军队，利用四国的愤怒来讨伐鲁国，必定会无往而不利。你们还是考虑一下吧！”

叔向也承认晋国的衰弱，可即便是衰弱的晋国，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鲁国，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面对如此威胁，鲁昭公也只好认怂，乖乖听从晋国处置。

会盟结束之后，晋国根据会盟所议，抓捕了鲁国执政季孙意如。鲁昭公有意跟随季孙意如到晋国去，但荀吴却警告韩起说：“我们抓了他们的卿大夫，却允许他们的国君前来朝见，这样恐怕有碍观瞻。”韩起耳根子软，听到有人劝阻，就急忙派士弥牟（士景伯）到黄河岸边把鲁昭公拦了回去。

季孙意如在晋国逗留了几个月时间，其间子服湫（惠伯）为助其早日脱身，继续挑唆晋卿之间的关系。在一次非正式的会晤中，他对荀吴说道：“鲁国在晋国的眼里，为什么还比不上夷狄小国呢？鲁国是兄弟之国，且土地广博，侍奉晋国勤勤恳恳，从来不敢有半点闪失。如果为了夷狄而抛弃兄弟，迫使他们投入到齐楚的怀抱，这对晋国能有什么好处？亲近亲者、扶助大国，奖赏能提供贡赋的、惩罚不尽义务的，这才是盟主应有的态度。有些话虽然不中听，但道理总是没错的。俗话说‘臣一主二、狡兔三窟’，如果晋国果真不值得依靠，鲁国又不是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国家，还请您多考虑一下。”

荀吴受人之托，也乐于忠人之事，很不客气地指责韩起说：“楚国伐灭陈、蔡我们不能救援，只知道在自己的窝里横，如今更是为了夷狄而抓捕亲戚，有你这样做事的吗？”

此番鲁、莒之间的诉讼皆因季孙氏而起，晋人以讨问鲁国伐莒之罪为由举行会盟，并在会上抓捕了肇事元凶，无论是从情理上还是程序上都无可指摘。但也正因其内部利益诉求不同，各家族之间互相制衡掣肘，国家政策很难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尤其是经过多年经营，季孙氏早就攀上了范氏这棵

大树，而中行氏又是范氏的盟友，他们若要着意保护季孙，无论是晋昭公还是韩起都无法坚持，最后只得按照荀吴的意见将其释放。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等韩起派人去传达命令的时候，背后搞动作的子服湫反而不依不饶起来：“寡君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真心诚意前来参加诸侯会盟，谁知道有人竟把他的卿给抓了起来，希望你们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若是鲁国的确有罪，鲁人不忌惮死生，愿意以死抵罪。可如果没有罪，你们在盟会上大张旗鼓地抓人，却又故意避开诸侯悄悄地放人，这恐怕是在逃避责任吧？所以，我们请求晋国再次召开盟会，公开赦免季孙！”

韩起还真没想到会碰到这么一个难缠的主儿，本想大事化小，结果还给你脸了，顿时火气腾腾腾地就往上冒。但我们也知道，韩起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鲁国人都以为他懦弱，他也从不辩解，只管闷声解决问题。遇到了什么繁难之事，他就找叔向寻求解决之道，而这次叔向则推荐了叔鱼，也就是他的弟弟羊舌鮒来解决此事。

早年士匄驱逐栾盈时，羊舌氏全族皆受到牵连，羊舌鮒脚底抹油跑得飞快，早早地就躲到鲁国寄住在季孙如意的祖父季孙宿门下。羊舌鮒既以贪婪而闻名，自然也就比其他人更懂得利用人性的弱点。

此番见到季孙意如，他就如见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般，深情地拉着他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演上了苦情戏：“当年鮒得罪了国君，为了逃避惩罚逃到鲁国，多亏了您的祖父施以援手，否则我当时就会流落街头了。正是因为有您祖父四处奔走，我这把老骨头才能够安然归国，季孙氏可以说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鮒虽然不才，但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必然会尽心竭力以报当年之恩。”

做完了预热铺垫，羊舌鲂自觉火候已到，便擦了一把眼泪，接着煽情道：“听说因为您不愿回去，他们正准备在西河修造一所房子，将您安置在那里。若是您就此终老西河，我还如何报答您祖父当年的再造之恩呢？”

季孙意如被晋人扣押期间，其属臣南蒯正占据费邑作乱。倘若他长久滞留晋国，必使得国人离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听了羊舌鲂那番鬼话，季孙意如马上就紧张起来，急忙打包行李回国去了。子服湫心里没有这样的负担，看到季孙意如临阵逃跑，心里虽有怨怒却还是不肯放下执念，非要等着晋人以礼相送。

公室将卑

晋昭公三年（前529年）的平丘会盟，是春秋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距第二次弭兵会盟召开的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刚刚到第十八个年头，离悼公复霸的公元前562年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十四年。晋国在盟会上竭尽所能地试图挽回霸主的尊严，可诸侯就是不买账，这也标志着韩起上任以来执行的盟后外交政策全面破产，晋国的霸业也在衰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会盟结束后的晋昭公五年（前527年）冬季，鲁昭公再次赶赴晋国，不料却被晋人扣押了，一扣就是半年。

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晋昭公即位后的几年里，鲁昭公曾两度想要朝见晋君，但都吃了闭门羹。其中的第一次是在晋昭公二年（前530年），齐、鲁、郑、卫四国同时提出要到晋国去“朝嗣君”，其余三国国君都受到了接见，唯独鲁昭公被晋人以“有平公之丧”为由推辞了。第二次是在次年的平丘会盟上，鲁昭公多次提出要面见晋昭公，晋人不仅不同意，甚至连会盟活动都不让他参加。后来季孙意如被晋人拘捕，鲁昭公再次提出到晋国朝见，又被荀吴以“执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为由推拒。

从《左传》的叙事来看，晋人推拒鲁昭公的朝见，似乎是在发泄对鲁国擅自讨伐莒国行径的不满。然而如果结合前后发生的事件来分析，我们似乎可以透过这些表象窥知一些更为深刻的秘密。

比如晋昭公二年的那次朝见，《左传》在叙述南蒯的叛乱时曾明确指出，党于南蒯的公子愁（子仲）曾将叔仲小和南蒯的计谋告知了鲁昭公，并随行前往晋国朝见，可见鲁昭公前往晋国显然另有目的。当平丘会盟举行之时，南蒯已经叛乱，鲁昭公急欲面见晋昭公，恐怕其本意也是想趁机控告季孙氏。但季孙氏早就已经打通了晋国范氏的关系，鲁昭公每每想前往晋国，都会被人以各种理由推拒，使其很难得到晋国官方的支持。

而当南蒯的叛乱尘埃落定，鲁昭公终于得到了接见，却不意被晋人扣留下来。至于他为何会被扣留，之后又为何被突然释放，《左传》都语焉不详。而且吊诡的是，与晋鲁之间过去几年的历次交涉不同，鲁昭公在晋国滞留期间，曾极力为鲁国说项的士鞅和荀吴均未出面开脱；而韩起更是为了避嫌，特意到郑国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等他回去的时候，鲁昭公也差不多在回国的路上了，其中的深意耐人寻味。

此次在晋国居留期间，鲁昭公的随臣子服回（子服昭伯，子服湫之子）目睹了诸卿的颓预骄奢的现状，回国后就对季孙意如说道：“晋国公室恐怕要衰落了。国君年轻而力微，六卿强大而奢傲，人们会逐渐习惯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所谓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人再想着扶助公室了，公室能不卑微吗？”

季孙意如起初对此不以为然，总以为这是小孩子的妄念，于是就嗤笑道：“小小年纪，哪里懂得什么国家大事？”

可任谁都想不到的是，就在鲁昭公回国后不久，在位仅六年的晋昭公于当年八月二十日突然去世，时年大约十岁的公子去疾即位为晋顷公，这无异于让本已衰落的晋国公室雪上加霜，子服回的话很快就应验了。

季孙意如于当年十月到晋国参加昭公的葬礼，回国之后突然对子服回这个小孩子肃然起敬，并不由得赞叹道：“子服回的话还是可以相信的，子服氏后继有人了！”

子服回独具慧眼，能够见微知著，这的确是子服氏的幸事，然而以他小小的年纪都能窥知玄机，可见晋国公室的卑微确已是无可挽回了，韩起对公室权益的维护也就走到了尽头。

得益于《左传》先入为主造成的印象，人们大都把晋国霸业衰退和公室卑微的原因归结于晋平公的荒淫无道。比如在提到举行平丘会盟的原因时，就特意指出“晋成虎祁，诸侯朝而归者皆有二心”。就是将诸侯产生二心的原因归结于虎祁宫的建成。再加之晋平公在位时期的种种荒唐行径，诸侯苦不堪言因之竞相背盟而去似乎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若是仔细梳理平丘会盟前后列国发生的诸多事件，或许我们还能找到另外的答案。因为就在平丘会盟举行的三个月前，也即晋昭公三年（前529年）五月，南方的楚国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原的大事件，直接导致了楚国国力的长期衰弱。那么，这两件事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

第二章 霸业秩序的合法性危机

第一节 楚国内乱

申地之会

不同于弭兵会盟之前的外交形势，在晋楚共霸的时代里，晋国在维护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还必须想方设法处理好与他们的新盟友——也即南方霸主楚国——之间的关系。而让韩起颇感棘手的是，以令尹之职弑君篡位的楚灵王，却并不是一个好相与的盟友。

纵观三百年的春秋史，在楚国历代君主之中，楚灵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另类。坊中流传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名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其典故就出自这位楚王。

只是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女子为争宠而保持身材不同，在楚灵王宫中因节食减肥而饿死的，却大多是站在朝堂上的士大夫，由此可见当时楚国集权程度之深。但与楚国士大夫争先恐后讨好不同，中原诸侯对这位即位后就改名为“虔”的楚王大都没什么好感，常常避之唯恐不及。

楚灵王在位的最初几年里，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无暇顾及中原，才让北方列国有几年消停日子。可这几年的光景实在太短暂，到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楚国就又开始重提让诸侯朝见的事情了。有了上次“交相见”的前车之鉴，以及虢之会的见闻，诸侯担心再受苦头，因而不敢轻易允诺。而楚国则不依不饶，不断派出使者到各国催促，又让诸侯感到十分害怕。

是年九月，不胜其烦的郑国当国罕虎，趁晋平公新婚致贺的机会，亲自赴晋解说事情的原委：“楚国每天都派人来责问敝邑，为何不去朝贺他们新君继位。寡君如果前去，害怕执事会说我们有心向外；可要不去的话，又违背了宋国的盟约。寡君实在进退两难，因此特派虎前来请示。”

时任执政韩起派叔向致信罕虎：“贵国大可不必如此忧虑。如果郑君心向寡君，去了楚国也无妨，毕竟这也是为了履行宋国的盟约。郑君愿意履约，寡君也就不会担心自己失信了。倘若是心里没有寡君，即便日日前来朝见，寡君也是会怀疑的。郑君还是放心地去吧，只要心意在此，去了彼处也不会影响晋郑两国关系的，又何必前来请示呢？”

在履行完这一整套的手续之后，郑简公于当年十月怀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朝楚的道路。与之一同前往的还有老冤家许悼公。让人丝毫不感到意外的是，楚灵王再次将两国国君扣留下来，让他们陪着自己到江南的云梦大泽打猎。与此同时，他还派出太宰伍举到晋国去，要求对方以其影响力向诸侯发令，这无异于是将晋国视为自己统领诸侯的代理人了。

晋平公虽不是什么雄主，可毕竟也是有些情绪的，楚国的态度让他十分恼火。然而正当他想要拒绝对方的无理要求时，却被大夫女叔齐（曾任三军司马、又称女齐、司马侯、司马叔侯）给制止了。

女叔齐的说辞与晋国历次示弱时所表达的观念并无二致，无非是说：“楚王正在胡作非为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与他们直接抗争。上天也许是想满足他的欲望，以此来增加他的劣迹，最后才会降下惩罚。国君不如就允了他们的请求，然后再好好地修明德行，耐心地等待着他的结局就是了。”

晋平公并不相信这些说辞，反驳说：“我们晋国有三不殆：山河之险、兵马众多、齐楚多难，为什么就不能对他们强硬一些，非要一忍再忍呢？”

女叔齐却说：“您说的‘三不殆’，在我看来恰恰是‘三殆’，仅仅依靠这些外在的条件，是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接着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些道理，比如：“四岳、三涂山、阳城、太室山、荆山、终南山，都是九州之内险要的地方，却并没有一姓可以长期占有；冀州北部是出产马匹的地方，但却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兴起。可见仅仅依仗地势和马匹并不能巩固统治，所以先代的圣王才致力于修德以沟通神人。”

女叔齐同时还讲了一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邻国的祸难，也不是我们幸灾乐祸的理由。相反，有很多国家正是在经历了祸难之后才得以巩固，并开拓了疆土，比如齐国发生了公孙无知之乱，而齐桓公因此成为霸主，齐人至今托庇其余荫；晋国发生了里克、丕郑的祸难，晋文公因此得以回国，并当上了诸侯盟主。而有些国家虽没有发生大的灾难，但却最终丧失了社稷、丢弃了疆土，过去遭到亡国之灾的卫国、邢国莫不如是。”

最后，女叔齐又安慰晋平公说：“殷纣王淫乱暴虐而亡国，周文王仁慈和蔼所以能够兴起。争取诸侯的朝见不过是一时的荣耀，您又何必跟楚国计较呢？”

晋平公被这一席话搞得云山雾罩，颇有些招架不住，于是就吩咐叔向去通报伍举：“寡君因有国家大事缠身，所以不能时常去觐见楚王。至于诸侯，他们本来就有朝见的义务，又何必劳驾您来我们这儿再跑一趟呢？”

尽管有晋国的许诺，东方的鲁、卫、曹、邾几国还是不愿往朝。按照子产的解释，是因为曹国害怕宋国，邾国害怕鲁国，而鲁国、卫国又害怕齐国，他们为了讨得晋国的欢心，自然就不敢去了。至于说其他的国家，本就受到楚国的威胁，如今又有了宋之盟，又哪里敢有所违逆呢？

晋平公二十年（前538年）夏季，楚灵王带领前来朝见的诸侯在申地（今河南南阳北）举行了一次会见。会见的情况也正如子产所料，前来朝见的除了郑简公、陈哀公、蔡灵侯、许悼公四国国君之外，就只有徐、滕、顿、胡、沈、小邾、淮夷这些不怎么知名的小国了。

这样的结果显然不符合楚灵王的预期，于是他就将怒火撒到了到场的诸侯身上。他先是故意冷落迟到的宋太子佐，又借口徐国国君是吴女所生将其拘捕。在送走郑简公和宋太子后，包括郑、宋大夫在内的诸侯及使臣仍被滞留在楚国，并被裹挟着出兵攻取了吴国的朱方、吞并了赖国。

这些无理要求让诸侯十分恼火，但迫于楚人的强横，又不敢有所违逆。当时参与会见的子产就愤愤不平地说道：“我不再为楚国的威胁而感到担忧了。骄纵又不听从劝谏，这样的人是活不过十年的！”宋国左师向戌也附和说：“没有十年的骄纵，他的邪恶就不会深入人心，我们不如就等着吧！”

韩起使楚

楚灵王的骄横并不仅限于对小国用强，对待晋、齐这样的大国，他也总会想尽办法予以羞辱。《晏子春秋》中关于晏婴出使楚国期间所发生的许多典故，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使狗国者，从狗门入”“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等等，都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楚与齐并非宿敌，因此楚灵王对齐国的羞辱也只是占一些口舌上的便宜，而他对晋国的羞辱则险些让刚刚担任执政的韩起遭遇劫难。

申地会见的当年，楚灵王派伍举向晋国请求诸侯来朝时，还让他提出了通婚联姻的要求，晋平公也一并答应了。第二年，楚灵王派令尹子荡、莫敖屈生到晋国迎娶晋女。

晋平公对这次联姻活动十分重视，亲自将女儿送到邢丘（今河南温县东），并委派正卿韩起与上大夫叔向到楚国送亲。在途经郑国的时候，郑大夫罕虎和游吉在索氏（今河南荥阳）设宴款待韩起一行。游吉对他们此行颇感忧虑，席间不住地提醒道：“楚王为人过于骄纵，您还是要警惕一些。”

叔向回答说：“骄纵过分是他自身的灾难，应该警醒的不是我们。只要我们恪守礼仪、保持威仪，信守承诺、谨慎行事，做事时多想一想两国的利害得失，楚王哪怕再骄纵，又能拿我们怎么样？”

不过，叔向显然还是低估了楚灵王的套路。当送亲车队刚刚抵达楚国边境，就遭到了楚人的怠慢——根本没人前来迎接。身为晋国执政的韩起，只好在无人指引的条件下，硬着头皮赶往郢都。而更让此行充满危机的是，此刻的楚国宫廷里，玩世不恭的楚灵王正在酝酿着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计划。

晋楚两国在长达百余年内基本上都处于敌对状态，因此两国之间互通使节的情形并不多见，以正卿为使节承担两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更是亘古未有。令尹子荡出使晋国，同时晋国正卿出使楚国，这也是弭兵之盟带来的和平局面下才可能会出现的盛况，也是有史以来两国之间最高规格的外交活动。

然而楚灵王对此却很是兴味索然。他不仅没有将韩起的出使视作两国友好往来的象征，反而当成了羞辱晋国的最佳良机。为此他设想了许多版本的

闹剧来折损晋国的颜面，但却没有一个令他足够满意。直到送亲的车队进入了楚国的国境，楚灵王才突然灵光乍现，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于是急忙召来众臣商议。

待到众人落座，楚灵王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晋国是我们的仇敌，只要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望就不用顾虑其他。现在他们派来的是上卿、上大夫，如果我们将其全部扣留，将韩起的腿锯掉让他做守门人，对叔向施以宫刑让他做内宫的司宫，这样一定能羞辱到晋国，诸位认为此举可行否？”

楚国的贵族们在楚灵王集权控制之下，都养成了遇事不开口的习惯。如今他这般说辞，众人皆知不可，但却依旧都保持缄默，谁也不敢提意见。看到这默然然的场面，太宰蕞启强有些坐不住了，于是愤而起身，朝着楚灵王作揖道：“我看可行！”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这句话给惊呆了。起初人们看到他起身时，还心想总算是有人出头了，于是都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却未料到他竟然对楚灵王的妄念深表赞同，便都又震惊且充满疑惑地望着蕞启强，等待着他的进一步解说。

楚灵王听到蕞启强对自己的想法表示赞同，也露出了得意的神色。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在大雪纷飞的夜里，一个北方装扮的贵族正颓废地倚在宫门口，眼中饱含着沧桑和悔恨。与他迎面站着的，是一个寺人装扮的汉子，脸上也写满了绝望。晋国的朝堂上更是乱作一团，年轻的晋侯正紧紧地皱着眉头，焦急地看着满朝大夫争执吵闹却一筹莫展。中原的那帮乌合之众也都跑到晋国去询问，给本已纷乱的朝堂更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想到这里，楚灵王不由得嘴角上翘：想必也该是我独霸中原的时候了！

可就在这时，停顿了片刻的蘧启强突然又说道：“只要有防备，为什么不试试？羞辱一个普通人还不能不做防备，何况羞辱一个大国呢？”

紧接着他从礼仪的角度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列举了晋楚之间历次战争的胜败，并指出那些原本的胜者都是因为不设防备而取败的：“城濮之战后，晋人不设防备，所以才在邲地一战败于我楚国。邲之战后，楚国对晋国的防备有所松懈，所以才在鄢陵之战中吃了败仗。鄢陵战后，晋国始终都没有松懈，且对楚国礼遇有加，使得我们无力报复，只能请求亲善。”

缥缈的思绪突然被打断了，楚灵王回过神来，转向蘧启强的方向，只见他神情激昂，正朝向自己厉声训斥着：“如今我们已经与晋国联姻，却又想着要羞辱他们，这无异于是在自寻敌人，又如何防备呢？若是因此而再败，谁来承担责任？如果没有人敢担责任，我建议还是不要轻挑衅端了。晋国对待楚国，在臣看来，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我们要求诸侯来朝，晋国积极协调；我们向晋国求婚，他们的国君亲自相送，而且还派了上卿、上大夫送到我国。如果这样我们还不满足、还要妄图羞辱他们，我担心灾难离我们也就不远了。”

蘧启强担心这些还压制不住楚灵王的野心，于是又补充道：“退一步讲，即便是我们扣留了韩起和叔向，晋国人才济济，我们也未必能讨到什么便宜。韩起之下，还有赵成、荀吴、魏舒、范鞅、智盈执掌晋政；叔向之下还有祁午、张趯、籍谈、女叔齐、梁丙、张骼、辅跖、苗贲皇等能臣辅佐。韩氏家族中，韩襄（韩起长兄无忌之子）为公族大夫；韩须（韩起之子）虽然年少，但也已经开始出使四方。韩起的儿子叔禽、叔椒、子羽，以及他同族的箕襄、邢带所掌管的也都是大族，难道我们能一个一个都骗过来把他们扣留了吗？

“韩氏征收赋税的有七邑，都是大县；羊舌四族，都是强盛大族。两个家族加起来足足有十家九县、战车九百；再加上其他家族的四十个县，战车四千乘，如此军力我就问你怕不怕！晋人如果失去了韩起和叔向，五卿八大夫还可以辅助韩须、杨食我（叔向之子，羊舌食我，字伯石，封于杨氏邑），在羊舌赤（叔向长兄）的谋划和荀吴、魏舒的带领下，向楚国发泄他们的愤怒，洗刷他们的耻辱，就没有不成功的。国君想要把亲善换成怨恨，违背了礼仪招惹来了敌人却又不设防备，这是想让群臣做晋人的俘虏啊！如果这样可以满足您的心意的话，我看可行！”

楚灵王一个自以为是的念头，引来了蘧启强如此长篇驳斥，饶是他狂妄傲慢惯了，此时脸上也的确有些挂不住，于是便低声道歉说：“都是不谷的过错，大夫不要再说了！”

在蘧启强的强力反对下，这场悄然罩向韩起和叔向并差点改变了他们命运和历史走向的危机才算是安然消散了。但晋国正卿好不容易来一趟楚国，不羞辱一番就让他们走了，楚灵王心里的那点小欲望似乎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就故意在宴席上用各种刁钻的话题来为难叔向。然而正如他故意刁难晏婴却反遭羞辱一样，叔向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博学多识，能言善辩，让楚灵王又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悻悻地看着他们的背影越走越远，心里的落寞无处向人诉说。

韩起和叔向此行虽说没有遭遇大难，可明面上受到的无理刁难还是显而易见的。晋平公得知后异常暴怒，后来恰逢楚灵王派五弟公子弃疾回访，他就打算用楚人的礼节来回敬楚国的使者。

然而亲身体会到楚人无礼的叔向却劝晋平公不要有样学样，他说：“楚人本来就不遵从中原礼制，为什么我们放着好的不学偏要学坏的？我们的做

法是要给百姓提供参考的，因此必须遵从礼仪，若是因一时的义愤照着不好的来做，还如何给百姓做表率？”晋平公听了这些话，只好打消了报复楚人的想法，并按照常礼派人到郊区迎接公子弃疾。

楚王宏志

楚灵王尽管个性张扬、声名暴虐，但若实事求是地讲，他也并非一个滴水不进的人，反而很重视人才，也乐于纳谏。活跃于春秋末期的贤人，如蘧启强、然丹（子革）、伍举、左史倚相等，都很受楚灵王器重。只是史书出于丰富人设的需要，很少刻画这些优良品质，以至于让我们对他形成了一个骄横暴虐的刻板印象。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差，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他所存有的一个巨大的野心，一个脱离了当时人们认知的宏大理想，一个来自楚人从蛮荒时代就产生的伟大愿望。

在楚国先代君主的心目中，他们原本生活在中原富饶的土地上，却被放逐到了荆棘丛生的“南蛮之地”，对居于政治中心的周王室一直心存怨念，因而进取中原、取代周王室也就成了他们生生不息、为之奋斗的理想。只是天不遂人愿，每当楚人意气风发地走向中原，准备实现理想抱负的时候，总是会被各种莫测的因素挡回来，以至于他们奋斗了几百年却依然在江汉流域苦苦徘徊。

尤其是当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弱，取而代之的是霸主权力的此消彼长。在中原诸侯的合力抵制下，楚人的理想变得愈发遥不可及，也让他们的初心渐渐模糊起来，甚至有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了。

楚灵王即位初期，看着中原诸侯在不断内耗中日益衰弱，看着往日的霸权渐渐退场，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理想，那就是和齐桓公一样，成为一个开创新时代、塑造新格局的新霸主。因此，在举行申地会盟时，当伍举列举了前代几次重要的盟会，如夏启的钧台之享、商汤的景亳之命、周武王的孟津之誓、周成王的岐阳之蒐、周康王的酆宫之朝、周穆王的涂山之会、齐桓公的召陵之师、晋文公的践土之盟，问他准备采用哪一种礼仪的时候，楚灵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吾用齐桓。”

与此同时，他还听从伍举的建议，特意向宋国左师向戌、郑国为政子产询问仪礼的细节；在举行会盟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举动合乎礼仪，又特别安排伍举站在身后，好随时提醒自己纠正错误。他的这些举动，其实都是有意在向诸侯示好，好让他们产生宾至如归的亲切感。

可问题是，诸侯之所以选择弭兵，就是因为他们对争霸事业都倦怠了，不愿意再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楚灵王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地产生了一种违背历史潮流的愿望，怎能让诸侯不心生戒惧？

申地会盟和此后伐吴的过程中，诸侯对楚国的敷衍、戏谑和嘲讽，让这个有着光荣而伟大梦想的“巨婴”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也让他对这些嘲笑自己的诸侯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于是不久之后，他便修改了自己梦想中的蓝图，不再寄希望于祈求诸侯的拥护，而是萌发了一个远超时代的理想——一统天下。

有一次楚灵王在州来（今安徽凤台）打猎期间，跟然丹（子革）聊起这件事，曾愤愤不平地问道：“以前我们的先王熊绎和齐、鲁、晋、卫等国的先君一起侍奉周康王，四国国君都分得了天子赐给的宝器，唯独我楚国没有。若是我现在派人到成周，请求一尊鼎作为赏赐，周天子会给我吗？”

然丹顺着他的意思回答说：“当然会给了！以前我们地位不如人，四个国家都因为身份尊贵得到天王的赏赐。可如今形势不同了啊，周朝和那四个国家都顺服于你了，区区一个鼎有什么好爱惜的？”

后来楚灵王又提到一些同样异想天开的问题，然丹都一一作答，说中原诸侯畏惧楚国，无论你提什么要求，都会依从。楚国大夫析父在一旁听了这番对话，对然丹十分不满。等楚灵王去了别处，他就指责然丹说：“您好歹也是有名望的人，可如今和国君说话却唯唯诺诺，就好像是王的回声一样。您这是准备要放弃楚国了吗？”

然丹显然不是楚灵王的应声虫，他只是想让楚灵王将自己的愿望都表达出来，自己才能有的放矢地劝谏。果然后来楚灵王回来，然丹就借着他夸耀左史倚相的由头，劝说楚灵王不要放纵自己的私心，如果执意去追求那些注定无法完成的事情，到头来只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楚灵王听了这些话，心里很不是滋味。等然丹告退后，他就落寞地坐在营帐里，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内心不断地挣扎。

后来他特意为这个理想进行了一次占卜，然而神祇却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这让楚灵王十分懊恼：想要成就霸业，诸侯不愿支持；想要得到天下，上天又不允诺。难道自己终究要困死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碌碌无为地活下去吗？他愤恨地将龟甲摔在地上，指着苍天责骂道：“连这一点点的好处都不给我，那我就自己去争取！”

伐灭陈蔡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甘心”这三个字。当理想和现实发生冲撞时，不愿意放弃理想，就只能与现实搏斗，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头破血流。然

而楚灵王终究还是越不过这道坎。自从决定了要与上天叫板，他就开始切实践行自己的理想，而其首先瞄准的目标，便是一直以来依附于楚国的陈国和蔡国。

晋平公二十四年（前534年），陈国国君陈哀公的弟弟公子过、公子招趁陈哀公病重，杀掉了太子偃师，而立其次子公子留为太子。陈哀公大怒，却被公子招发兵围困了一个月，陈哀公在绝望中自缢而死。二位公子遂扶植公子留即位，并派人到楚国通报君位继替的情况。陈哀公的第三个儿子公子胜不满于二位公子的暴虐之举，也同步跑到楚国去要求伸张正义。

楚灵王得知内情后，当即杀死了陈国使者，并派弟弟公子弃疾拥立故太子偃师之子公孙吴，联合宋国共同发兵讨伐陈国。这年十一月，楚庄王灭陈设县的故事再次上演，陈国遭遇了第二次灭国之难。

消息传到晋国的时候，晋平公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陈国这就算是亡国了？”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看到晋国毫无作为，楚灵王不免有些飘飘然，于是在晋平公去世后又故技重演，准备向蔡国动手。

晋昭公元年（前531年）春季，楚灵王进驻申地，并召请蔡灵侯前来朝见。有了陈国覆灭的前车之鉴，蔡国大夫心中忧虑，纷纷表示反对。蔡灵侯也着实为难，去了恐遭不测，可不去也是在给楚国以讨伐的借口，无论你怎么选择，其后果都难以预料。左右权衡之后，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结果真就被楚人给杀掉了。

不久后，楚公子弃疾带兵包围蔡国的消息传到晋国，执政韩起拿不定主意，征询叔向的意见。叔向对蔡国的命运持悲观态度，但与此同时，他对楚

灵王的结局也并不看好。在他看来：“依靠违背信义来获取利益，这种事情有再一没有再二。当初楚王带着公孙吴讨伐陈国，美其名曰是来帮助他们安定国家的。陈国人服从了他们的命令，所以就没有抵抗，结果却被灭了国。如今他们又诱骗蔡国而杀了他们的国君，就算是侥幸取得胜利，又岂能长久呢？”

紧接着叔向又搬出了之前那套理论，说：“当初夏桀灭掉了有缙氏而丢弃了国家，商纣王战胜了东夷而丢弃了生命。楚国疆域小、地位低，但却屡屡表现出远胜于桀、纣的暴虐，岂能没有灾祸呢？上天帮助这些不善之人，并不是要赐予福禄，而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恶行，然后再施以惩罚。因此在我看来，楚人这是自取其祸，以后也不会再兴盛了。”

听了叔向这套说辞，韩起感觉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再救援蔡国。可荀吴听闻后却大为不满，劈头盖脸地训斥道：“既不愿援救陈国，又不能救援蔡国，你是铁了心地要让诸侯看晋国的笑话吗？作为盟主不能救亡图存，还要我们这些卿干什么？”

韩起感到很是无辜，可他又不想因为这么一件事跟中行氏翻脸，只好顺着他的意思，召集宋、鲁、齐、卫、郑、曹、杞等国在卫国的厥慙（今河南新乡）举行会盟。

郑国大夫子产早就看透了晋楚两国的虚实，因此当国罕虎（子皮）准备出发的时候，他就劝告说：“你这次走不远的！蔡国势小而不顺服，楚国强大而无仁德，上天就是要抛弃蔡国并借此来积累楚国的邪恶，等他们恶贯满盈了再施以惩罚。因此蔡国一定会灭亡，而楚王也很快会遭遇劫难，这次的事情用不着那么操心。”

事态的发展也果如子产所预料，诸侯在卫国商议了许久，最后的决定竟然是派狐父到蔡国去请求楚国罢兵。楚国自然是不会答应的，到晋昭公元年十一月，经过大约七个月的围城，蔡国终于陷落并被设为楚国的一个县，而楚灵王也一步步地走向了灭亡的边缘。

蔡公之乱

担任令尹的时候想要篡夺王位，一旦篡权成功又想要独霸中原，一朝称霸梦碎，又开始试图夺取天下……楚灵王总是一步步地走在实现人生理想的路上。只是与寻常人的思路大相径庭，楚灵王一旦遭遇了挫折，不是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野心来。

他以欺诈手段连灭陈、蔡，又以强制手段四处迁徙陈、蔡、许、城父、胡、沈、道、房、申等地的民众，让这些远离故土的百姓都怨声载道。而他取得权力的过程中，又使用了残酷的政治手段，不断诛杀、打压异己，在国内也树立了大量潜在的敌人。

而要论起他最大的失算来，莫过于重用那个“当璧”的弟弟公子弃疾了。克陈灭蔡的两场战争，公子弃疾都是领军的主帅；陈蔡被灭之后，楚灵王特意派人加固了陈国旧都宛丘（今河南周口淮阳区域关一带）、蔡（今河南上蔡）与东西二不羹（一在今河南舞阳东南，一在今河南襄城东南）的城墙，并在这四座大城中各安置了千乘的兵力，以表现出向中原进取的姿态，公子弃疾即被任命为蔡县的县公。

楚国大夫申无宇对此感到十分忧虑，曾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择子莫若父，择臣莫如君。我听说五大不能在边，五细不能在朝，亲近之人不能在外，寄居者不能在内。如今您把弃疾安置在外，郑丹却安置在内，恐怕会生出祸患。”

申无宇所谓的“五大”，指的是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等。这些人权高位重且私属众多，一旦外放就很容易“另立中央”，建立“独立王国”。晋国的恭太子申生、曲沃桓叔以及当代的六卿，郑国的共叔段，楚国公子弃疾，齐国的公孙无知，卫国的宁殖、孙林父都属于“五大”的范畴。

“五细”指的是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等违背了礼制亲疏关系的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人”。这些人本身地位较低，但由于常伴君主身侧，往往能利用职权便利谗言惑主、扰乱朝政，甚至弑主杀君。齐桓公身旁的寺人貂、易牙、公子开方，晋厉公身旁的胥童、夷羊五，叔孙豹身旁的竖牛等皆属于“五细”之列。

申无宇这里强调的观点主要有八个字：“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公子弃疾既是国君的母弟、贵宠公子，又有“当璧”传言在，本身就容易聚集权势。如今你将他外放蔡国，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他若有什么不臣之举你无法监视掌控，有什么异动你也不能遥制扼杀，这就很容易诱发祸乱、危及国本。然而楚灵王或许是过于自负，并没有听申无宇的谏言，结果真的就惹出了一场大祸。

这场祸乱爆发于灭蔡设县的两年后，也即晋昭公三年（前529年）春季。蔡公弃疾的旧属斗成然（蔓成然）趁楚灵王经略吴国逾年未归的机会，邀合薳居、许围、蔡洧等在国内不得志的人，与曾遭楚灵王侮辱的越国大夫常寿过一道发动叛乱，攻取了固城和息舟。

而在蔡国故地，楚国贵族、追随蔡国大夫朝吴（声子之子）的观从以蔡公弃疾的名义，将流亡晋、郑两国的公子黑肱（子皙）和公子比（子干）召回，胁迫他们参与盟誓。随后又与蔡国大夫朝吴一道，鼓动蔡人追随蔡公起

事。不远处的陈国和许国，乃至不羹和叶地被楚国压迫的人们，也都在串联中爆发了惊人的斗志，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瞬间蔓延开来。

联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抵郢都城外，城内的军队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变乱，因此丝毫未予抵抗就缴械了。混乱之中，楚灵王的太子禄和公子罢敌被近卫杀死，他的弟弟公子比自立为王，以老四黑肱为令尹，老五弃疾为司马。

郢都的变乱成功后，观从即刻赶往楚灵王驻军的乾溪（今安徽亳州东南），向军中散布郢都已被攻破的消息。军中将士担心家中老幼，更担心失去俸禄，顿时都失去了斗志、纷纷四散逃亡。眼见大势已去，又听闻两个儿子被人杀死，楚灵王突然眼前一黑，从车上摔了下来。等缓过神来，他悲痛欲绝地问道：“人们爱自己的儿子，也都会像我一样吗？”

楚灵王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因此不管旁人怎么规劝，他都不愿意再起兵报复，而是沿着汉水漫无目的地过起了流浪的生活。

不久后，芋尹申无宇的儿子申亥四处跋涉，终于在棘邑（今河南永城西北）大门找到了狼狈不堪的楚灵王。楚灵王看到依旧有人忠于自己，不禁失声痛哭，便跟随申亥回了封地。然而亡国丧亲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太大，最终还是在申亥的家中悬梁自尽，草草地结束了这充满了痛苦的一生。

楚不为患

让我们将视线再拉回郢都。

此次叛乱是依靠蔡公弃疾的力量才取得胜利的，子干、子皙在国内毫无根基，却毫不谦让地当上了大王和令尹，这就让观从十分不安。他劝说子干杀掉弃疾以绝后患，但子干却不忍心再开杀戮，急得观从都快跳起来

了：“你对别人不忍心，可不见得别人也会对你心软啊！我是真不忍心看着你去送死。”于是就自请流亡去了。

观从走后，弃疾果然就开始不安分了。在无数个漆黑的夜里，人们常会听到有人在街市上惊叫：“大王回来了！”每次听到哥哥回来的消息，子干、子皙都紧张得要死。连续折腾几次之后，他们也就成了惊弓之鸟，精神几近崩溃。

当气氛酝酿到一定程度，也就到了该下杀招的时候了。五月十七日夜，弃疾再次派人到处喧嚣鼓噪说：“大王到了！”这次呼叫的人数量众多，其中还掺杂着许多真假难辨的消息，斗成然更是跑到宫里告诉子干和子皙说：“大王到了，都城的人杀了您的弟弟司马弃疾，就要杀进宫里来了，您还是赶紧拿主意吧！”

两兄弟哪儿见过这样的阵仗啊？顿时就被吓得六神无主。正当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又有人跑进来大喊说：“他们已经进宫了！”子干和子皙更是惶恐，于是就在绝望之中引颈自刎。这两个在外流亡多年的难兄难弟，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的果实，就被一个子虚乌有的消息给杀死了。

子干和子皙死后，弃疾假装恍惚地从家里溜出来，一看局势成了这个样子，那得赶紧平乱啊！于是他跳上战车，当仁不让地做了一回英雄。几个时辰之后，汉水中出现了一具穿着君王冠冕的尸体，人们都以为是楚灵王溺死了，于是急忙报告给弃疾，而弃疾则假装痛心疾首，将其收尸安葬了。

大乱平定后，弃疾即位为楚平王，并改名为熊居。他将自己的三哥子干葬在訾地，称之为訾敖。那个向子干通报假消息的斗成然（子旗）则被任命为令尹。

这场爆发于晋昭公三年夏季的内乱，从新设县的陈、蔡以及东部的吴越边境引爆，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席卷了楚国全境，使得楚国从经济到社会遭受重创。“当璧”的公子弃疾因此上位，但得到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人心离散的烂摊子。

楚平王即位之后，旋即改变了楚灵王时积极扩张的政策，转而采取了保守甚至是收缩的策略。他首先复封了陈、蔡两国，将楚灵王时期被四处迁徙的民众迁回了原地，同时派然丹和屈罢分别到西部、东部地区安抚百姓、休养民力，以恢复边境地区的安定。不久后，他又分别将许国、阴戎内迁到位于方城之内的白羽（原析地，今河南西峡）和下阴（今湖北老河口）；方城之外则修筑了郟城（今河南平顶山西北）以防范中原各国的入侵，等于关闭了进取中原的北大门。

鲁国大夫叔孙婁（昭子）得知这一切，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道：“楚国的意图已经不在诸侯了！他们这么做不过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完整，同时维系其世代传承罢了。”这样一个外交政策转趋保守的国家，已经无法对诸侯构成直接威胁了。

但正如士燮在鄢陵之战前做出的预判，“不有外患，必有内忧”，当外部的敌人被清除干净了，内部的乱局必然会随之兴起。这个预判不仅对晋国有效，对于以共同假想敌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中原列国来说也同样适用。当笼罩在中原大地上一百多年的乌云一夜消散，诸侯对霸主的需求感和依存度都显著降低，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纷纷对晋国产生了二心。

晋人很敏锐地觉察到了这股异样的气氛，于是就决定在平丘（今河南封丘东南）举行会盟，试图通过炫耀武力的方式来迫使诸侯继续维护其盟主地

位。然而，这些努力不但没能挽回诸侯的信心，反而更让人看到了晋国的虚弱。

作为六卿中仅存的公族，韩起为挽回局面，在平丘会盟结束后又做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个人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无论你有什么傲人的才华、多么蓬勃的野心，都无法抵挡历史发展的滚滚潮流。当霸业模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晋国霸权也就走到了末日穷途，任凭他一个人再怎么折腾也终究于事无补。

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到平丘会盟三年后（前526年），在位仅六年的晋昭公便溘然辞世，君位再次流转到了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公子去疾手中。也大概在这同一时期，一直全力辅佐他拱卫公室的叔向也离开了人世。看着幼弱的国君，回头再看看虎视眈眈的同僚，韩起感到心灰意冷，从此再也不愿过问这必将逝去的霸主伟业，晋国公室卑微的趋势也再无逆转的可能了。

第二节 无伯之害

鲁邾纠纷

晋昭公六年（前526年）春，当鲁昭公在晋国滞留，韩起为了避嫌而出访郑国的时候，齐景公带兵越过鲁国攻打位于洪泽湖西岸的徐国（今江苏泗洪县），迫使徐、邾、莒等国在蒲隧（今江苏睢宁西南）与之会盟。

当时鲁国大夫叔孙婼就感叹道：“诸侯没有盟主，是小国之害啊！以齐侯之无道，发兵攻打远方之国缔结盟约而还，竟然没人能够抵抗，这都是没有霸主的缘故啊！”他同时引用了《诗经·小雅·雨无正》中的诗句“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勩”。指如今的局势正如同西周丰镐二京刚刚覆灭的时候，天下祸乱频生永无止息，执政大夫离居异心，没有人再为百姓的疾苦而忧劳，这是一个怎样混乱的世道呢？

任何一种新秩序的出现，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霸业秩序兴盛的百年间，没有取得霸权的大国固然会倍感压抑，可对于小国来说却不啻于一种福音。尽管在霸主的威权之下，他们需要缴纳沉重的贡赋，并随时准备提供兵役劳务，日子过得不算安稳，但至少没有了亡国之虞。

同样，当霸业秩序难以维系，大国们自然是欢欣鼓舞，可那些身居大国之侧的小国却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之中。他们似乎又回到了春秋早期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里，看到了王室权威崩溃之后数百个诸侯国灰飞烟灭的惨烈场景。

过去的百余年间，他们习惯了依附于霸主的生存模式，因此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霸主不再争霸，诸侯不再听从盟主的号令。因为那也就意味着乱世即将再次降临，惨无人道的灭国战又将登场，不能不让他们感到莫名惶惑。

然而，“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并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意志就轻易地改变方向。无论是创造了百年霸业辉煌的晋国，还是期望霸业秩序能够永续流传的小国，在历史大势面前都宛如蝼蚁。

在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夜，与鲁国相邻且有长期积怨的邾国和莒国大概是最先居于青蘋之末的国家了。晋楚弭兵刚刚结束，鲁国就利用莒国的内乱不断蚕食侵吞其土地。莒国巴望着晋国能为他们主持公道，却不料晋国因为内部倾轧，竟然默许了鲁国对这些土地的占有。直到晋昭公三年，晋国在平丘接受莒、邾两国的投诉，在盟会上抓捕了鲁国执政季孙意如，鲁国对周边国家的侵伐才稍稍有所收敛。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久齐、宋等国也纷纷加入了“以大侵小”的战团，晋国对此无力约束，也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到晋顷公即位的第七年（前519年），鲁国与邾国之间又发生了纠纷。原来在去年的时候，邾国派遣工程队到翼地（今山东费县西南）筑城。当时正值雨季，工程队返回国都时需经过沂蒙山区，有三名将领担心下雨会被困在山里，于是就决定走鲁国武城境内的大道。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武城人早就得知了他们的行踪，并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等到工程队一行出现，直接就被武城人给团灭了，为首的三员大将也成了鲁国的俘虏。

这件事要细细追究起来，邾国人不提前借道的确是有错在先，但鲁国人对一支工程队下黑手也的确是做得过火了。邾庄公咽不下这口气，就亲自跑到晋国去告状；晋国人一听不得了，就派人到鲁国去问罪；鲁国人一听

说“我冤枉”，就派叔孙婼到晋国去解释；晋国人一看，“好你来了，今儿你就别走了”，就把叔孙婼给扣下了。

原告、被告同时就位，晋人就想要让两国大夫当面锣对面鼓地辩论。可偏偏叔孙婼是个倔脾气，不愿与邾大夫辩论，还说什么：“列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这是咱们周朝的制度，更何况邾国还是夷人呢！更不能屈尊我这卿去跟小国的大夫辩论了。”他要求让副手子服回代表自己出庭抗辩，可晋人又不同意，场面顿时就尴尬了，怎么办呢？

为了逼迫叔孙婼出庭，韩起想出了一条自以为很妙的计策：他预先把邾国人安排在公宫里，让他们趁叔孙婼进宫的时候将其抓起来。与此同时，他又把消息散布了出去，叔孙婼得知晋人如此偏袒邾人，说不定心里就会犯嘀咕：“这会不会又是季孙氏故意设的套，准备要借刀杀人呢？”然后就会将责任都推到季孙氏的身上，到时候我就来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件事也就算了结了。

可让韩起怎么都想不到的是，叔孙氏门风清正，在国家大义面前从来都不计较个人生死得失。得知晋国的安排后，叔孙婼不仅没有想着脱身保平安，反而将部众都留在客馆，自己不携带任何武器，就准备只身进宫朝见，这就又给韩起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正当大家为叔孙婼捏了一把汗的时候，士弥牟突然对韩起说道：“您的这个计策实在有欠考虑。倘若真把叔孙婼交到邾人手中，他定然是有去无回。鲁国丧失了叔孙婼，又怎会善罢甘休？盛怒之下一定会拿邾国出气。我知道您本意是为邾君打抱不平，可如果因此而让他无家可归，这不就是弄巧成拙了嘛！事情真要闹到不可收拾，您就是想后悔都来不及了。晋国作为盟

主，主要的职责是讨伐违背命令的国家，如果说互相抓人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也就干脆用不着盟主了，您说呢？”

要说这韩起的耳根子也真够软的，不管什么人前来规劝，他从来都不说一个“不”字。如今既然士弥牟有更好的办法，那就将这件事交给他就好了。

有了韩起的充分授权，士弥牟当即将叔孙婼和他的副手子服回隔离审查。在分别听取了他们的辩解之后，这才知道邾人本身也是有过错的，于是就将结果告知了韩起。

韩起听了脑袋都大了：按说邾国人的确不冤枉，可鲁国处置的手段也太过激了些。本该各打五十大板的，可问题是我一个人又做不了主，想要为难叔孙氏的还另有其人，你让我能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韩起决定还是要尽快把邾人打发回去，免得让叔孙婼真的死在了晋国。于是他就命令将鲁国使者全部羁押，而在押送的过程中，又故意让士弥牟驾着囚车从邾国人住的客馆前经过。随后又派人传话给邾庄公，大意是说：“鲁国人已经被我们采取了强制措施，这次的事情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的！你们就放心地回去等消息吧！”

看到晋国都已经做到如此地步，邾庄公也不敢在大霸主面前太咄咄逼人，只好先行告辞。

不以货免

邾庄公离开之后，韩起把叔孙婼送到自家的封邑箕地（今山西蒲县东北）保护起来，而子服回则在别邑另行安置。到了这个时候，故事真正的幕

后黑手，也就是季孙氏的盟友士鞅才算真正出场了。至于士鞅为何要执意为难叔孙婼，这还得从两年前的一件旧事说起。

话说在晋顷公五年（前521年）时，士鞅到鲁国聘问。季孙意如有心挑唆叔孙氏和范氏的关系，于是就让叔孙婼负责接待，同时命有司以“七牢”之礼来款待士鞅。

“七牢”“七献”都属于侯伯之礼，通常是招待诸侯国君时才会使用的，鲁国用此大礼招待晋国的卿已经算是逾矩了，其规格不能说不高。可季孙意如却故意安排人向士鞅透露了一个消息，说：“当年南蒯叛变失败，鲍国代表齐侯来归还费邑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七牢之礼来招待他的。”

士鞅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一听这个当场就炸了。他把叔孙婼叫过来，以一种极其夸张的语气朝他吼道：“齐国国小，而鲍国身份低微，如今你让我接受与鲍国等同的礼节，难道是瞧不起我晋国吗？”

这话让叔孙婼很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转念一想，他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可眼下当着外客的面又不好发作，只好让人增加了四牢，也就是以远超公侯规格的十一牢之礼来接待士鞅。

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就因为这件事，士鞅跟叔孙婼结下了梁子。如今叔孙婼落到了自己手中，不让他掉一层皮也太对不住季孙意如送来的这份大礼了。士鞅于是就派人去跟叔孙婼说：“我听说您戴的帽子十分华美，能不能送给我一顶呀？”

这里所谓的“请冠”实际上是春秋时期贵族“文明索贿”的惯用套路。比如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的虢之会上，晋国大夫乐王鲋向叔孙豹索贿时，就是以“请带”为托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当时叔孙豹就假装听

不懂，愣是从自己的裳上扯下一片帛派人送去，同时还致歉说：“身上的带子恐怕太窄了，您别见怪！”

如今叔孙婼遇到了跟父亲当年同样的难题，其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完全一致。他找人按照自己帽子的样式，做了两顶一模一样的，派人给士鞅送去，同时致歉说：“出来着急就只带了这些，您别见怪！”可见不以私相授受来处理外交问题，这在叔孙氏也是有家学渊源的。

士鞅可是倨傲惯了的人，遇到这种事不见怪才怪。

消息传到鲁国，鲁昭公是真着急了，赶紧派大夫申丰带着财礼到晋国去。叔孙婼得知申丰的来意，便派人传话说：“送礼这事是有门路的，来来来，你来见我，我就告诉你该怎么送！”

申丰一听乐了：你叔孙婼终于开窍了，我原来还以为你不食人间烟火呢！他乐不可支地跑去见叔孙，却不料刚进门就被打了个闷棍，再也不让出门了。

叔孙婼就是这直脾气，甭管谁想要找自己索贿，也甭管谁要为了自己去送礼，只要让他知道了，那是一概不许。就在箕地滞留期间，有看守想要跟随叔孙的看门狗，也被他拒绝了。倒不是说他连这一条狗都舍不得，而是在关乎国家利益的事情上，哪怕是一分一毫的私相授受在他看来都是不允许的。到后来离开晋国的时候，他就将那只狗杀了跟看守一起吃了肉。而且在走的时候，房内的一切设施都被他修缮得完好如新，就好像从来没有人在这里住过一样。

叔孙婼在晋国待了一年多，到今年冬天，鲁昭公准备亲自赶往晋国营救他。但大约是因为之前朝见晋国受过不少罪，等走到黄河岸边时，鲁昭公远

远看到晋国的土地就突然病倒了，亲自营救的事情也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后续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我们只知晓，到第二年春季，士弥牟突然来到箕地。叔孙婼不知其来意，于是就吩咐手下说：“如果我向左看并且咳嗽，你们就上来杀掉他；如果我向右看并且面带笑意，就不要动手。”

其意思大概是说，我叔孙婼并不惧怕死亡，但也要看究竟为何而死。如果是为国殉难，则死而无憾；但若因为季孙和范氏之合谋而死，那就死得毫无价值。因此，假如士弥牟是代表韩起而来，那么无论是去是留都无所谓；可若是代表士鞅来的，且果真不怀好意的话，那么我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

叔孙婼不做没把握的事情，士弥牟也没有徇私枉法之心。抵达鲁国使者的驻地之后，士弥牟当即致歉道：“寡君因为担当盟主职责不敢懈怠徇私，因此才劳累您在敝邑多待了些时日。为此特地为您的随从送来微薄的礼物作为补偿，并特派弥牟前来迎接您。”

三桓出君

晋顷公八年（前518年）二月，在晋国滞留一年有余的叔孙婼返回鲁国。然而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执掌鲁政的季孙氏内部却出现了内讧。与春秋时期诸多内乱爆发的原因一致，这次事件的起因也是源于一场家族丑闻。

话说季氏宗主季孙意如有一个名叫季公鸟的叔叔在这一年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寡妻季姒和一个幼子甲。季姒与家里的主厨私通，被管理家务的小叔子季公亥（公若）等人发现了。为了掩饰丑闻，她故意让婢女把自己打了一

顿，然后鼻青脸肿地去见已嫁给大夫秦遄的小姑子秦姬，哭诉说季公亥想要非礼她，她不同意，季公亥就恼羞成怒把自己给打了。

小姑子一听这还了得！就去找宗主季孙意如的两个亲兄弟公甫和公之，让他们把这些事转告给宗主。季孙意如听了也很震惊，可总不能拿自己的亲叔叔开刀吧？于是就将公亥的两个“帮凶”公思展和申夜姑给拘了，还准备把其中的申夜姑杀掉。季公亥向侄子苦苦哀求，说你杀了他就等于杀了我，可任他哭破了嗓子，最终还是没能保住申夜姑的性命。

季公亥因此对侄子意如产生了强烈的怨念，一怒之下就联络了鲁昭公的太子公为，公为又联络了公果、公贲两位公子，准备造季孙氏的反。两公子想把消息传递给鲁昭公，但因为平时联络不方便，只好让近侍僚相代为转告。

鲁昭公一生受制于季氏，如今得知季氏内部出现分裂，心中自是喜不自胜。但或许是忧心有人从旁窥探，他故意拿起寝戈追打僚相，却不料僚相胆子太小被打蒙了，跑回家去一窝就是好几个月不上朝。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回，僚相终于壮起胆子把公果的想法告知了昭公，但昭公只是不冷不热地说道：“这不是你这样的小人该操心的事。”

公果得到回复，只得亲自去向昭公解说。鲁昭公大约认为是认为公果的计策可行，于是就联系了臧孙赐（臧昭伯）、邠恶（邠昭伯）和子家羁（子家懿伯）等人，准备端掉季孙氏的势力。但让昭公犯难的是，这三人中只有邠恶已与季孙氏撕破了脸，全力支持自己，其余两人虽深表同情，内心里也都希望季孙氏倒台，但认为季孙氏掌握政权时间太久了，事情很难取得成功。

鲁昭公受尽了三桓的逼迫，不想就这样含恨终老，最终还是发动了政变。晋顷公九年（前517年）九月十一日，趁孟孙氏宗主仲孙貜（孟僖子）去

世、叔孙氏宗主叔孙婼外出未归的机会，对季孙氏发起了攻击。

由于事发突然，季孙意如毫无防备，家门轻而易举地就被攻破了。仓皇之中他只好带兵登上高台，向国君请求愿意接受审判，却被拒绝了；于是又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够在费地终老，鲁昭公也不答应。

子家羁担心逼迫太紧会适得其反，因此建议对季孙意如网开一面。但昭公及其党羽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只知道一味用强，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战局突然出现了反转。

在围攻季氏的过程中，鲁昭公及其支持者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只知道季孙氏和另外两家关系紧张，却低估了他们同为三桓、维护既得利益的决心。因而正当他踌躇满志要消灭季孙氏的时候，那两个他以为会与自己同仇敌忾的家族，竟然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反戈一击，而最先倒戈的恰恰又是长期与季孙氏不睦的叔孙氏。

鲁昭公发难的时候，叔孙婼并不在都城，但他的家臣司马懿戾却能在关键时刻做主。闻听季氏有难，他当即召集众人商议究竟该支持哪一方。众人不知所措，懿戾便启发道：“有季孙氏和没有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更有利？”众人不假思索地喊出了他们的答案：“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

懿戾看到众人意见一致，就带了族兵直奔季氏。这个时候公室的亲兵以为大功已经告成，便都脱下了皮甲蹲在地上晒太阳，却不料叔孙氏突然从西北角杀了进来，把他们打了个猝不及防。听闻叔孙氏已经出兵，继任孟孙氏宗主的仲孙何忌也当机立断，带兵掩杀公室逃兵，并将前来迎接自己的郈恶给杀掉了。

眼看大势已去，子家羁便想使出金蝉脱壳之计，将所有的罪责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以撇清昭公。但昭公早就受够了季孙氏的压迫，他宁愿选择流亡，也不肯再跟季氏呼吸同一片空气。到十二日，鲁昭公在公室墓地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祭拜仪式，遂携臧孙赐、子家羁等人一起走上了逃亡之路。

天之弃鲁

国内生变的消息传到阚地（今山东汶上一带），正在当地公干的叔孙婼急忙回到国都，季孙意如就向他询问消除影响的办法。叔孙婼十分恼火，没好气地说道：“凡人皆有一死，您驱逐国君而为天下所共知，子子孙孙皆要蒙耻，难道不可悲吗？我还能把你怎么样？”

季孙意如心情尚未平复，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又请求道：“如果你能想办法将国君请回来，如此情义恩同再造，意如定然没齿难忘！”

事到如今，叔孙婼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只身赴齐寻求解决之道。然而，他此行却同时受到了两方面的阻力，这也就注定了其努力不会取得成效。

首先是随从昭公出亡的那些人，他们既然已经参加了武装行动，就不可能再与季氏毫无芥蒂地共存下去，因此必须挟持着国君作为护身符。否则国君回国之时，就是他们四散流亡之日，以后再想找一个安适惬意的容身之所恐怕就很难了。

在鲁昭公的流亡队伍中，能够真心替国君着想的只有子家羁和左师展两个人。当叔孙婼赶到齐国与昭公密谈时，他们命令士兵严防死守，禁止任何人进入甚至靠近馆舍。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遭到了泄露，于是很快就有人

在叔孙婼回国的路途中设下了埋伏，准备将其杀掉。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派人对准备返国的昭公进行围堵，致使鲁昭公第一次回国的尝试宣告失败。

与此同时，当叔孙婼冒着生命危险为季孙奔走归君的时候，鲁国国内的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季孙意如从慌乱中平复过来，突然改变主意，又不愿意让鲁昭公回国了，这就让叔孙婼感到无比绝望。无奈之下，他也只能在家里斋戒，效仿晋国大夫士燮的故事让宗祝为自己求死，果然到十月十一日，郁郁寡欢的叔孙婼便去世了。

鲁昭公被逐出国门的事情传到宋国，宋元公打算亲自赶赴晋国去说情。可就在出发的前一夜，他突然梦到太子栾在宗庙中继位，自己和父亲宋平公穿着朝服站在下首。宋元公预料到自己行将就木，于是在朝会上预先安排了后事，果然出发后不久就死在了曲棘（今河南民权西北），为鲁昭公说情的事情也就没有了结果。

但若以前事而论，即便是宋元公到了晋国，以鲁昭公当时的心境恐怕也未必会接受其好意。

即位以来的二十五年间，鲁昭公至少有七次朝晋的记录，但却没有一次能顺顺当当完成。这其中晋平公十八年为少齐吊丧，晋昭公二年的朝嗣君、三年的平丘会盟，以及晋顷公五年、七年的两次朝见，都是刚刚抵达黄河岸边就被晋人挡了回来，故而未能成行。即便是得到接见的两次也并不如意，比如晋平公二十一年的朝见，因为季孙氏侵伐莒国，晋人接到投诉后差点将其扣留；而晋昭公五年的朝见，则是因平丘会盟之事被滞留了半年之久。能够受到晋国如此冷遇，在整个春秋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而若没有季孙氏从中作梗，恐怕也很难说得过去。

也正是由于遭遇了太多不公，鲁昭公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晋国抱有太多幻想，而是将希望寄托在齐景公身上。出亡之后，他首先来到了齐国的阳州（今山东东平县北），并特意赶赴野井（今山东齐河县东南）前去迎候齐景公。

齐景公本就有心恢复齐国的霸业，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如今欣闻鲁昭公来投奔，自感机会已经来临，于是便准备亲往平阴表示慰问。后来听到鲁昭公已到野井等候，齐景公更受感动，于是就在野井就地慰劳，同时还当场允诺会将临近莒国的两万五千户民众作为赠礼，嗣后还要整顿大军为鲁昭公洗刷耻辱。

齐景公的豪言壮语让鲁昭公十分感动，但子家羁却奉劝说：“失去了偌大的鲁国而领有这区区的两万五千户，谁还会助您复位呢？齐侯向来不讲信用，不如早点到晋国去。”然而鲁昭公不想再去碰壁，因而不肯听从。

这年十二月，齐景公出兵讨伐鲁国东部边境，首先攻取了原属于莒国的郛地，准备以此为基地将鲁昭公送回国内。季孙氏闻听大惊失色，急忙派人收买了齐景公的宠臣梁丘据。

梁丘据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就到齐景公面前进谗言说：“鲁侯复国的事情我们也不是没有尽力，可进展却很不顺利，据因此感到十分奇怪。后来回想了一下，宋元公为了鲁君到晋国去，结果死在了半路上；叔孙婼为国君复位四处奔走，竟然也无疾而终。不知道是上天要抛弃鲁国呢，还是鲁国国君得罪了鬼神所以才落到这步田地呢？不如您就待在原地，让臣下跟随鲁君作战，以战争的胜败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如何？”

齐景公一听这话心里也有些发怵，于是就由着梁丘据去了。齐军压境之时，鲁国尚未做好准备，成地（今山东宁阳东北）大夫公孙朝只好使用诈降

之计拖延齐军，等一切准备妥当他又转而推辞了齐人。后来双方在炊鼻（今山东宁阳一带）展开激战，齐国军士对送回鲁君一事不甚热心，而鲁人却大都愿为季氏效死，这就使得齐军很难占到什么便宜。

一战不利，齐景公仍不肯放弃，又于当年秋季邀合莒、邾、杞等国在鄆陵举行会盟，商议送鲁昭公回国的事宜。但还没等齐国有所动作，鲁国卿大夫仲孙何忌与阳虎就于第二年秋季攻打郛地，差点让鲁昭公失去了立身的根本。

攻打鲁国不能得志，齐景公的“三分钟热度”很快就消退了，再加之他对梁丘据所提到的那些天命观念深信不疑，在送还鲁昭公一事上的决心与态度也就发生了转变。

这段时间里，齐景公隔三岔五就设享礼招待鲁昭公。表面上看这是对鲁昭公的礼遇，可实际上不过是他当成了陪酒的客人，这就让子家羁感到十分不快：“每天不分早晚地就在他的朝廷上侍奉着，还设这些享礼干什么？想喝酒就明说啊！”

齐景公见鲁人看穿了自己的心思，干脆也就不再掩饰。宴席开始后，他故意让宰臣陪侍鲁昭公喝酒，同时还提出要让鲁昭公见一见齐国的夫人，也就是鲁昭公的孙女。这些做法引起了子家羁的不安，因为宰臣献酒是君主宴请臣属的礼仪；而在两君相见的外交场合，会见齐国夫人也不符合礼节。子家羁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急忙引着鲁昭公退避而出，这才避免了一场尴尬。

齐景公在宴礼上表现出的轻慢态度，意味着他早已不把鲁昭公当成一国之君来看待，更不可能再耗费精力助其复位了。事态进展到这个阶段，无论鲁昭公是否情愿，他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晋国了。那么晋国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寄居乾侯

晋顷公十一年（前515年）秋季，仲孙何忌攻打郟地之前，晋国在扈（今河南原阳西，郑邑）地邀合宋、卫、曹、邾、滕等国召开会议，重点商讨成周防卫事务。大会举行间隙，宋国大夫乐祁（司城子梁）与卫国大夫北宫喜（贞子）代表周边的一些小国，请求晋国以盟主的名义将鲁昭公送回。

但不幸的是，主持这次盟会的士鞅恰恰是季氏的盟友，既然季孙氏不愿意让国君回去，士鞅自然也乐见其不成，于是就狡辩说：“鲁国国君的流亡是季孙氏造成的吗？显然不是啊！当初季孙并不知道自已犯了什么罪，可国君非要向他发难，季孙因此请求囚禁和逃亡，但都没有得到允许。后来国君没有战胜他，所以自己跑出去了。受到攻击的时候，季孙氏完全没有准备，怎么能说是他赶走国君的呢？”

士鞅又分析了鲁国的局势，说：“季孙氏能够恢复禄位，完全是受上天的庇佑，否则的话如何解释国君的亲兵在战场上脱下皮甲玩箭筒的事情？叔孙氏害怕受到牵连，自愿和季孙氏站在一边，这也是上天的意志。鲁君流亡后，请求齐国的协助，然而三年了都没能成功，这难道不也是天意吗？季孙氏内受百姓的拥戴，自己也有十年的战略储备；外有淮夷的亲附，还能获得齐楚的援助；手中的权势几乎等于诸侯，可他骄傲了吗？没有啊！他并没有为此骄横跋扈，反而对待国君犹如国君仍在国内一样。所以在鞅看来，这件事实在难办啊。”

列举了送还鲁昭公的诸多困难之后，士鞅露出十分为难的神色，说：“想要将鲁国国君送还，这也是我士鞅的愿望。既然你们二位都是为国家考虑的人，那么士鞅不才，愿意跟随你们去包围鲁国。倘若事情不能成功，大不了就是一死，也没什么好担忧的！”

乐祁、北宫喜听了这些话，就知道晋国无心助鲁昭公复位，以宋、卫两国的力量，自然也没办法取得成功，只得纷纷告退。

后来鲁昭公受到齐景公的轻视，准备前往晋国求助。他首先住到了晋国边邑乾侯（今河北成安），并派使者到新田请求晋人前来迎接，但等来的却是责问的使者：“上天降祸给鲁国，使您长期淹留在外，也不派人来告知寡君一声，反而安安稳稳地住在甥舅的国家里。难道还要让寡君派人到齐国去迎接您吗？”

面对晋人的责难，鲁昭公真是有口难言。要不是你们屡屡阻遏我于国门之外，我又何至于要低三下四地去看齐人的脸面？如今却反过来责问我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向你们求助，其中的缘由难道你们知道吗？

可眼下正是求人的时候，鲁昭公也不敢辩驳，只得听从晋人的吩咐，退回晋鲁边境去等待召见。

鲁昭公离开后不久，晋国就发生了祁氏、羊舌氏之难，六卿忙于瓜分土地无暇他顾，足足把他晾了大半年。鲁昭公没有等到前来迎接的使者，只好悻悻然地返回郛地。而这一次，齐景公因其抛弃齐国而向晋国求助，态度变得更加恶劣了。

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春季，齐国大夫高张受命慰问鲁昭公，言谈间将其称为“主君”，等于是明确无误地将其当作卿大夫来看待。子家羁闻言心中愤恨不平：“齐侯如此轻慢国君，何必还要再次受辱！”说罢就带着鲁昭公再次来到乾侯。

这一去，鲁昭公停驻在乾侯就再也没有离开。在随后的两年里，齐国除了送些土地之外，再也没有为他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而晋国则干脆把他晾

在那里不管不问。

而季孙氏则虚情假意地每年给他送去马匹以及衣物等日常用品，鲁昭公气愤不过，就逮捕了送马的人，又将送来的马匹全都卖了换钱。季孙氏一看国君不领情，干脆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如此鲁昭公连这一点点的补给都没有了。

后来卫灵公把自用的名马送到乾侯，但后来这匹马一不小心掉进坑里摔死了。鲁昭公原打算将其收敛埋葬，但子家羁却劝说道：“随从之人都面黄肌瘦，不如就体谅他们一下吧？”鲁昭公虽则不忍，却也只能默许，可见其处境之艰难。

客死异乡

公元前512年六月，年幼继位的晋顷公在他即位的第十四个年头去世，时年仅二十岁左右，其子午即位为晋定公。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总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执政魏舒眼看着鲁昭公就要在晋国边境上扎下根了，如果还是毫无作为，恐怕会给自己招来非议，于是就准备武力护送鲁昭公回国。而毫无疑问，这次的行动又遭到了士鞅的阻挠。

士鞅依旧站在季孙的立场上辩解道：“鲁国人自己的事情，最好还是让他们内部消化，不见得非要动刀动枪的。我们不如先召请季孙前来迎回国君，如果他不肯奉诏，就证明他做贼心虚，确实是有失为臣之道，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攻打他也不迟。”

对于这样的提议，魏舒没有理由反对，而在他的心中也明确地知晓，这不过是范氏的缓兵之计。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魏舒似乎也没有心情理会，

他把事情全都交代给荀跖（智文子），随后便操心别的事去了。

故事的发展也一如所料，晋定公元年（前511年）春季，季孙意如接到士鞅的提示，急忙赶往晋国为自己开脱，同时表示自己一定会恭敬事君，绝对不敢有二心，随后又跟随荀跖抵达乾侯。在子家羁的劝说下，鲁昭公原本想跟随季孙回国，但他的随从们听说之后全都慌了，于是就怂恿鲁昭公一定要杀掉季孙意如。

在众人的胁迫下，鲁昭公只好勉为其难地向荀跖申诉，同时指着河神为誓说：“贵国念及先君的友好，肯赐惠照顾逃亡之人让他回去洒扫宗庙，那就不要让我见到那个人！此誓绝不违背，请河神作证！”

可荀跖对此却毫不关心，他捂着耳朵边跑边说：“寡君避罪尚且不及，又哪里敢与闻鲁国的祸难呢？下臣这就回去向寡君复命！”出去之后，他就对季孙意如说道：“你们的国君怒气未消，我看你还是先回去主持祭祀吧！”

众人见鲁昭公终于把季孙赶走了，就心满意足地散去了。子家羁趁机劝说道：“您现在只要驾着单车追上季孙，一切都还来得及！”

鲁昭公早有此意，于是急忙跑出门去准备离开，结果还是被人发现了。就这样，在流亡集团的挟持下，鲁昭公最终与季孙意如失之交臂，其回国的夙愿也化为泡影，从此以后便一蹶不振。

晋定公二年（前510年）冬，在外流亡了七年零三个月的鲁昭公，怀着对故国的思念和对季氏的怨念，黯然离开了人世。

第二年六月，叔孙婼之子叔孙不敢到乾侯迎接鲁昭公的灵柩，临行前季孙意如对其嘱咐道：“我多次与子家羁谈话，他的话很符合我的心意，希望

您能够劝他回国参与政事。”

抵达乾侯后，叔孙多次请求会见，但子家羁都对其避而不见，只是派人回绝说：“当初您还没有担任卿职，我就跟随国君出国了，如今国君没有留下遗命，我不敢私自见您。”

叔孙不敢辩解，只是说：“由于公衍、公为铸下大错，让臣不能侍奉国君，大家都希望先君的弟弟公子宋能够主持国家。另外，跟随国君出国的，谁能够回国全凭您来决定。子家氏没有继承人，季孙愿意让您参与政事，因此特来请求。”

当初攻打季孙一事是鲁昭公太子公为一力主导，公衍并没有参与。后来昭公见归国无望，就以公为掀起祸乱为由，废去了他的太子之位，转立公衍为嗣。其中用意大概也是希望以此换取季孙的谅解，以确保自己死后能让公衍继承君位。但季孙意如显然无意于此，因而就谎称公衍也参与了当年之事。

季氏公然违背昭公意愿，反过来又假惺惺地派叔孙不敢来听取意见，子家羁当然不能顺从，于是就轻蔑地驳斥道：“扶立新君的事情，有卿士、大夫和守龟决定，羁不过一介亡人，何敢过问？至于跟随国君的人，如果只是因为侍奉国君而出奔，想要回去的都可随意；和季孙氏结了怨仇的，想要离开也都自便，这些也都不是我能左右的。至于我，国君只知道我出国，却无法知晓我回国，我不愿欺瞒国君，所以只能选择逃亡了。”

鲁昭公在位一共三十二年，早年曾多次想要驱逐季氏，但都未能如愿。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想要求助于晋国，又因范氏与季氏的勾结，每每都只能“至河乃复”，始终无法得到盟主的支持。而当他因驱逐季氏失败而被迫

流亡之后，晋国又消极应付，最终导致一国之君客死他乡，在整个事件中都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而与之相对的是，齐景公尽管能力有限，但为了能够恢复霸业，至少在其流亡早期做过不少努力。当鲁昭公最终决定放弃齐国而迁就晋国的时候，齐景公虽心中不忿，却依然以阳谷之邑为其提供了一些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的齐国也的确比晋国更值得诸侯信赖。

与之类似的是，当鲁国发生驱逐国君的乱局之时，位于中原腹地的宋、卫等国也都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内乱，齐国在其中都发挥了比晋国更为积极的作用。如晋顷公四年（前522年）爆发的宋国华、向之乱，晋国尽管也派出了军队辅助宋国公室平乱，但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却是齐国。

晋国内部倾轧，导致政令不能统一，作为盟主的责任和义务无法得到贯彻，衰世景象可见一斑。当晋国不能履行其应有的职责，诸侯无法依靠其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对待晋国的态度由不满转向对抗便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节 霸政危机

东西二王

当中原各国乱象频生之际，一直寂寂无闻的周王室也不甘寂寞，以一场极其惨烈的内乱向世人宣示着他们的存在。而多少让人感觉有些俗套的是，这场爆发于晋顷公六年（前520年）的王室内乱，依然是一场因立储不当而酿成的政治风波。

周景王原本立了王子寿为储君，但就在几年前，穆后和王太子同年去世，使得王室没了嫡系继承人，只好改立了王子猛。但到了晚年，周景王宠爱庶出长子王子朝，就想改立储君，可世代身为王室卿士的单氏和刘氏却不同意。这其中反对声音最强烈的是单旗（单穆公）的家臣、刘摯（刘献公）的庶子刘狄（伯蚩），他因与王子朝及其师傅宾起积怨颇深，不仅不愿意让王子朝担任储君，还想要除掉二人以泄私愤。

根据王子朝后来的说辞，太子死后他王子朝就是最年长的王子，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这太子的地位根本就轮不到王子猛。而从周景王的意愿来看，他显然对王子猛也并不怎么中意，但由于单、刘两家垄断朝政，周景王无法约束，更立太子的事情也就一直拖延不决。

后来有一次宾起到郊外去，看到一只公鸡自断其尾，感到十分好奇。他的侍者就随口说了一句：“它大概是害怕自己被用作牺牲吧！”

宾起突然警醒，于是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周景王，同时评价说：“人牺实难，己牺何害？”意思大概是在说，让你不喜欢的人受到荣宠，就会给你带来各种麻烦，但若是受到荣宠的是自己喜欢的人，就没那么多不顺心的事了。

周景王对单、刘两家仍有忌惮，不敢轻易决断，因此听了宾起的话一言未发。后来思虑良久，大约是还想要随心所欲活一回，于是便计划在北邙山行猎时动手除掉单、刘。可坏就坏在周景王身体实在太差了，还没等到要动手，就因为心脏病发驾鹤西去了，其试图摆脱公卿约束的梦想也完全落空。

周景王死后，王子猛被单、刘扶立为周悼王。恰好周景王死后第四天，刘氏宗主刘子摯（刘献公）去世，由于没有嫡子，单旗便将刘狄（伯蚩）确立为刘氏继承人。刘狄主政之后，旋即以周悼王之命攻杀了宾起，结果就引发了王子朝的叛乱。

六月中旬，王子朝依仗周灵王、周景王的族人，以及失去了官职的工匠和旧贵族首先在王城发难，将刘狄驱逐到了扬邑。单旗发现京中有乱，急忙将周悼王带回了自己的家里，但当天夜里周悼王就被支持王子朝的王子还又偷偷转运回了王城的庄宫。单旗一看局势已经失控，于是也逃出王城奔命去了。

为了骗回单旗，王子还与召庄公（姬奭）挟持着周悼王一路追赶。他把迎周悼王回宫的责任都推给另一位王室大夫摯荒，杀掉了摯荒向单旗解释，并假装与之结盟。但单旗很快就知晓了他的阴谋，并于十九日再次出逃。王子还及周灵王、周景王的另外七个王子带兵追击，结果被打打了个全军覆没，八位王子全部死难。

王子朝看到情势对自己不利，便逃到洛阳西南部的京邑据守，与前来攻城的单旗、刘狄、巩简公、甘平公轮番拉锯。由于对方防守严密，攻击京邑的部队被接连打败，单旗只好带着周悼王辗转抵达皇地（今河南巩义）暂住，同时派人向晋国求援。而王子朝则乘胜出击，同时在王城和皇城与单、刘党人展开拉锯战，双方互有胜负，战事陷入了胶着之中。

接到天子方面求援的消息，晋国派出籍谈、荀跖率领焦、瑕、温、原等地的部队及“九州之戎”介入纷争，并于当年十月十三日将驻在皇地的周悼王送回王城。王子朝知道自己不是晋人对手，于是就避实就虚，先后在郊、社两地打败了王室军队和晋国带来的“陆浑之戎”。而更让单、刘感到忧心的是，到十一月十二日，周悼王竟突然去世，使得王师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挫伤。周卿士们只好改立周悼王弟王子匄为周敬王，继续与王子朝周旋。

为帮助王室军队摆脱被动局面，晋国的籍谈、荀跖、贾辛、司马督坐镇后方，由箕遗、乐征、右行诡带领部队渡河占取前城，进取京邑、郊地，王子朝所部出现了溃散。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至次年正月初六日，情势已经开始向有利于王师的方向发展了，周敬王于是就辞谢了晋军，准备单独与王子朝对抗。

然而晋军回国后，单旗和刘狄发现自己还是太过于乐观了。起初，他们趁着晋人取得的战果连续出击，又攻取了好几座城邑，并迫使王子朝退守尹地。但不久后，王室大军就开始接连遭遇溃败，而王子朝则顺势组织了大规模反攻，顺利进入王城。单、刘无法抵挡王子朝的攻势，只好带着周敬王退守刘狄的大本营刘地，不久后又避居狄泉。

晋顷公七年（前519年）秋季，尹氏辅佐王子朝在庄宫即位为王，周王室再次出现“二王并立”的局面。为示区分，当时的人们就将驻守王城的王子朝称为西王，而单、刘两家扶立的周敬王则称为东王。

黄父之会

王子朝的自立为王使得周王室的内部斗争的性质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在他称王之前，王室的纷争还只是王族与卿族之间的斗争，这与诸侯国内公族与世卿大夫的冲突并无二致。而一旦他自上王号，这种内争的性质就变成

了两个天王之间的合法性冲突，不可避免地给当时关心王室命运的诸侯带来极大困扰。

对于晋国来说尤其如此。之前他们派籍谈、荀跖介入王室纷争，是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天王，单、刘两家掌控了天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诸侯请求援助，而晋国也有为王室平定内乱的义务。可如今王子朝也当上了天王，也同时派出使者向晋国请求援助，那么这个时候晋国究竟该尊奉哪位天王的指令呢？

为了解决两王并立带来的合法性争议，晋国依循当时“小司寇职掌外朝之法”的政治传统，向成周的百姓问询是非曲直。晋顷公八年（前518年）三月十五日，士弥牟出现在成周城北的乾祭门外，对过往的百姓进行了一次随机的民意调查，并以此为依据做出了西王（王子朝）诉求不合理据的结论。

晋国的做法看似有理有据，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否能够做到公平公正还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因此，在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他们还必须要试探一下诸侯的反应。

同年六月，郑定公携大夫游吉出访晋国，其间士鞅有意探查郑国方面的口风，便在会谈中特意提及此事。然而游吉并没有给出正面的答案，而是闪烁其词地回答说：“俗话说，一个寡妇如果不关心自己的针线活儿，反而总是为宗周的陨落而操心，恐怕她自己也就要大祸临头了。如今郑国内部分扰不断，老夫连自己国家和宗族的事情都操心不过来，哪里还敢分心关心王室的纠纷呢？”

过了片刻他又补充说：“王室内部动荡不安，小国虽然会感到害怕但却无能为力，所以就只能有劳大国来操心了。”他同时引用了《诗经·小雅·蓼

莪》中的两句诗说：“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酒瓶子如果空了，那是因为罍中的酒没能注入，这是罍的耻辱。同样，“若是王室无法安定，恐怕也将是晋国的耻辱，您还是早作打算吧”！

游吉的话句句在理，但没有一句说到了正题上。倘若其与晋国的态度相同的话，恐怕没有必要如此隐瞒。与此同时，他最后对士鞅说的那段话，实际上也是一种警示：晋国介入王室纷争是迟早的事，可如果你是非不分帮错了人，最终受损的也必然是晋国的声誉，跟我们郑国又有何干呢？

然而士鞅对这些警示之言显然没有放在心上，不久之后他便找到韩起商议，准备于次年举行一次会盟，以统一诸侯的意志。

韩起与士鞅在政治立场上从来都是针尖对麦芒的关系，之前他打算会盟诸侯讨伐鲁国以重塑晋国的形象，可士鞅和荀吴偏偏要袒护季氏，让韩起始终不能如意。如今士鞅为了袒护与范氏世代姻亲关系的刘氏，又想要打出盟主的旗号来号令诸侯，韩起自然也是不情愿的。但出于其在六卿中相对弱势的处境，他又从来都不会把情绪写在脸上，因此并未否决士鞅的建议，由此也就形成了晋国内部的决议。

晋顷公九年（前517年）夏，担任下军佐的赵鞅（赵简子）受命在黄父（今山西沁水西北）与鲁、宋、卫、郑、曹、邾、滕、薛、小邾等国大夫举行会见。会上，晋国要求诸侯向周敬王提供物资和武力援助，同时商定于次年将天子送回成周。

对于晋国的决议，诸侯虽并不完全赞同，但在明面上大都曲意逢迎。可宋国的右师乐大心却是一个倔脾气，他并没有挑明反对晋国的政策，而是以宋国“于周为客”为由，拒绝给周敬王输送粮食。

当初举行平丘会盟的时候，郑国为政子产曾拿出西周的旧制度要求晋国减免郑国的贡赋，当时晋人与其争执了大半天，最终还是做出了让步。如今乐大心大概是想要效仿子产以减免宋国的义务，只可惜其学识和口才与子产相差太远，闹腾了半天招来的却是士弥牟的一顿训斥：“自践土会盟以来，宋国有哪一次战役不参加，又有哪一次会盟不参与的？历次会盟皆言明要‘同恤王室’，宋国从来都没说过什么‘客人不应该给主人送粮食’这样的浑话，如今却为何要逃避责任呢？您奉了君命前来参加会见，却使得宋国违背盟约，这恐怕不是一个使者该有的态度吧？”乐大心说不过士弥牟，只好拿了竹简回去，至于后来有没有履行盟约便不得而知了。

黄父之会前后，拥护周敬王的刘、单联军接连遭遇打击，情势急转直下。单旗拥护周敬王在西王大军的压迫之下连番辗转，惶惶不可终日，眼看着就无处可躲了，只好又到晋国告急。晋国经过大约三个月的准备，于晋顷公十年（前516年）七月底派荀跖、赵鞅领兵再次介入王室纷争。

十月十六日，在晋国军队的直接干预下，周敬王从滑地起兵，在不到一个月内就先后攻克了多处要塞，并进一步逼迫王城。眼看着大势已去，原本忠于西王的召简公（盈）急忙调转矛头，将西王驱逐出京师，并派人到尸地（尸氏，在今河南偃师西）迎接周敬王。

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敬王进入成周，在周襄王庙中与公卿大夫盟誓，并于十二月初四日进驻庄宫。持续了五年之久的“王子朝之乱”宣告结束。

讨晋檄文

晋顷公十年（前516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斗争失败的王子朝裹挟着周朝图书馆里的典籍文物，带着毛氏、尹氏、南宫氏等一千重臣以及召氏之族逃奔楚国，向诸侯发布了一道措辞严厉的长篇通告。

在这篇长达六百字的通告中，王子朝回顾了周朝数百年的兴衰，说：“当初武王克商，成王安定四方，康王休养民力并封建母弟作为藩屏来保护周朝，其用意一方面是要让诸侯共享文王、武王所建立的功业，同时也是希望，当子孙后代因为荒淫败坏而陷入危难时，能够有人拨乱反正、匡扶王室。”

王子朝列举了周朝的一些旧事，以此来感念诸姬在王室危难之际匡扶正义、屏护王纲的功德。他说：“后来夷王恶疾缠身，诸侯遍祭其境内的名山大川，为其身体复健而祈福祷告。厉王内心乖张、为政暴虐，百姓不堪忍受就将他驱逐到了彘地，诸侯都离开自己的国都来到王室辅助政务，一直到宣王长成之后就将政权交还给他。后来到幽王时期，上天不保佑周朝，使天子昏乱不顺以致失去了王位。携王想趁机谋夺天命，是诸侯废弃了他，并拥立平王东迁郑郕，王室因此得以安定。——这些都是兄弟共同辅助王室所开创的局面。”

王子朝随后又提到了春秋初年发生的两场内乱：“到周惠王即位的时候，上天不能安定王室，于是让王子颓生出了祸乱之心，同时也启发了后来的叔带，使得惠王、襄王连续两代天子都不得不离开王都外出避难。这时就有晋、郑两国站出来，驱逐了那些不端之人，让王室恢复了安定。——这些都是兄弟们能够遵从先王命令的例证。”

追述完前事之后，王子朝话锋一转，提到了一件带有神秘色彩的往事：“周定王六年时，有秦国的奸人降下妖孽，说：‘周朝会出现一个口上有胡子的天子，他也能够完成自己的职分，使诸侯顺服而享有国家，两代人都能谨守本分。但随后就会有人觊觎王位，诸侯不能为王室图谋，也会因此而受到乱灾的影响。’”

王子朝所提到的周定王八年，是晋成公在位的第六年（前601年）。当时《左传》曾记述了一个诡异的事件，说是晋国与白狄联合伐秦，抓获了一名秦国的间谍，于是将其斩杀于闹市。但神奇的是，六天之后，这名秦国间谍竟然死而复生了。

至于这名“秦谍”与王子朝提到的“妖孽”是不是一回事，我们便不得而知了。但总之，“妖孽”所说的话终于得到了应验：“后来周灵王出生时口上果然就长有胡须，继位之后也十分贤明，与诸侯关系密切，故而周灵王、周景王都能得以善终。”

话至此处，王子朝就开始痛斥如今的单旗、刘狄是如何倒行逆施、扰乱天下的：“他们带着一群不知礼法的人，专门在王室中制造混乱，以满足他们无止境的贪欲。在制造了一系列暴行之后，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叫嚣：‘先王登位时就没有什么常规可言，我们想立谁就立谁，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他们惯于褻渎神灵、污蔑先王，违背盟约、蔑视礼制，不行政令、轻慢刑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对于这次内乱的根源，王子朝也有自己的看法：“先王曾发布立储的规则：王后没有嫡子就选立年长的，年纪相仿则以德为先，德行相匹则以占卜听从天命。天子不偏爱，公卿无私心，这是古代的制度。穆后和太子寿早逝，那么就理应选择年长的立为太子，可单氏、刘氏偏偏要违背先王的命令立年幼的，这其中的是非曲直想必大家都心中有数。”

同时他还将枪口对准了晋国：“晋国作为诸侯盟主，明知先王的命令，却依然要帮助单、刘这些无德之人，放纵他们肆意行恶。如今不谷颠沛流离，寄居荆蛮还没有归宿，只希望能有一两位志同道合的兄弟舅甥顺从天

意，服从先王的指令，助我除去奸邪之徒，以维护纲常伦理。谨以此书明吾志向，希望诸侯能够认真考虑！”

晋为不道

《左传》虽全文照录了王子朝的檄文，但在感情上却将其视作强辩之词。书中摘引了鲁国大夫闵马父的一段评述说：“文辞是用来施行礼仪的。王子朝既违背了父亲的命令，又疏远了晋国这个大国，只一心想要做天子，文辞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对待《左传》中涉及主观评价的部分，一定要持以审慎怀疑的态度，否则就很容易掩盖问题的实质。

在这场持续多年的冲突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就是立嗣的合法性问题。《左传》为了证明王子朝不是天命所选，只是举出了一些怪力乱神的例子，而这些所谓的例证以当代的经验来看又显然是不足信的，很难推导出王子朝的行动不具备合法性的结论。恰恰相反，经过春秋初年近百年的混乱，中原诸侯为了避免因君位争夺酿成冲突，早已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而王子朝所提出的“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正是这一观念经过长期沉淀所形成的结论。

比如鲁襄公去世之后，季孙宿坚持要立鲁昭公即位，叔孙豹当时就提出过反对意见：“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长立。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楚平王去世后，楚国令尹子常也同样提出：“立长则顺，建善则治。”可见这些观念无论是在中原地区还是在当时仍被称为“蛮夷”的楚国，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即便是不考虑这些观念上的因素，即以私心而论，周景王的本意也更倾向于将王子朝立为太子。但王室之有刘、单，正如鲁国之有三桓。鲁国的三桓有驱逐国君、擅行废立的权势，公室公族皆不能反制；同样在王室，对于单、刘二氏独大的局面，周景王以及王室王族也没有制衡的手段。这就使得周景王即便贵为天子，也无法决定太子地位的归属，想要行废立之举，还要处心积虑地先除掉刘、单才敢于有所举动。可见在这场蔓延到整个中原的封建制危机当中，就连王室也无法幸免。

另外从战争进程来看，王子朝之所以能够一再压制刘、单联军，并不是说他指挥作战能力就有多高明，其主要优势还是在于其能够取得王室多数人的支持。支持悼、敬二王的只有刘、单两大强卿，而王子朝的支持者却包括了周灵王、周景王的诸多王子及其族人，尹氏、毛氏、召氏、甘氏等世卿家族，以及受单、刘两家排挤而失势的旧官和百工，几乎涵盖了当时成周各个阶层的民众，可见刘、单的专权在当时的王室是不得人心的。

从这里我们实际上也可以看出，士弥牟在成周执行的所谓“小司寇之礼”不过是走个过场，其最终执行的还是士鞅保护姻亲的决策。而当他们最终决定要帮助东王的时候，郑、宋两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国也都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不赞许的态度。这就意味着，在这场因王位归属引发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周敬王其地位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王子朝的这篇檄文所列述的也并非全是妄语。

晋国凭借强大的武力帮助单、刘两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国内的各卿家也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利益，这看似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从战争造成的长期后果来看，他们赢得了一场战争，却输掉了“整个世界”，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惨的结局了。

这封看似不起眼的讨晋檄文，虽说只是王子朝用以表达激愤之情的“战败感言”，但也实实在在地道出了诸侯内心的真实感受。在六卿宰执晋政的这些年里，晋国对诸侯横征暴敛、予取予求，对于他们所面临的苦难却视而不见。人们对这个昔日霸主的厌恶之情早已溢于言表，只是在晋国武力的威压之下，他们还缺乏一个彻底释放怨气的窗口。

如今他们压抑已久的心声终于经王子朝之口喷涌而出，这就像是洪水撞破了堤坝，从此便可放肆奔流，再也无法阻挡了。因为，跟随王子朝一起离开的，不只是他带走的臣工百官和王室数百年珍藏的典籍，更有维持整个霸业秩序正常运转最核心也是最底层的基础，那就是天子地位的合法性。

“尊王”和“攘夷”是霸业秩序得以维系的两个最主要的支柱，可如果当天子地位合法性的基础都受到了动摇，那么经由“尊王”获得天子授权的前提便不复存在。此时的晋国霸业就像是建在沙堆上的楼阁，经过洪水的冲刷，流沙随波而去，剩下的就只是几根残破的廊柱苦苦支撑了。然而即便是这几根可怜的廊柱，经过日积月累的虫啮风化，早已无法支撑这沉重的楼阁，霸业秩序的彻底消亡也就进入了倒计时。

行文至此，更觉世事多诡。

二百五十多年前，周王室第一次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在这场长达二十多年的纷争中，晋国的第十一代君主晋文侯以大义之名出师，却最终选择了得位不正的周平王，从而开启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如今这一幕再次重演，晋国列卿以“同恤王室”之名出师，却选择与单、刘等世卿合流，驱逐了更具合法性的王子朝。而这一次，晋人也必将自食其果，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召陵之会

晋定公六年（前506年），王室内乱硝烟刚刚散去了约十年，鲁昭公流亡故事的谢幕也过去了三年。这一年三月，中原诸侯在楚国境内的召陵（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东）汇聚一堂，举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盛会。

此次集会由王室卿士刘文公即刘狄（伯蚩）发起，参与的国家数量达到了十八个，几乎囊括了中原秩序以内的所有国家；参会人员的规格也足够高，晋定公、宋景公、鲁定公、卫灵公、郑献公、曹隐公、蔡昭侯、陈怀公、杞悼公、许男斯、莒郊公和邾、顿、胡、滕、薛、小邾等共计十七国国君亲自到会；齐景公虽未直接到会，但也派出了世卿国夏前来助阵。会盟的地点选择在楚国方城之外的召陵，是齐桓公当年大会诸侯的地方，其议题同样直指楚国。而且会盟的起因，按照一般的说法，也同样与蔡国有很大干系。

早些年，蔡昭侯带着两套制作精美的玉佩和华丽的皮衣去往楚国，将其中的一套献给了楚昭王。楚昭王设享礼宴请蔡昭侯，在享礼上，两人同时穿上了皮衣、戴上了玉佩，这让时任令尹的囊瓦（字子常）很是眼红，便去向蔡昭侯索取。蔡侯爱惜羽毛坚决不给，结果就惹怒了囊瓦，被对方羁押了起来。

无独有偶，不久之后唐成公也到了楚国，还带了两匹威武雄壮的肃爽马。囊瓦看到这两匹马“色如霜纨、其羽如练，高首而脩颈”，十分喜爱，便向唐成公索要，结果对方舍不得，就也被扣留下来。

到了三年后，也就是晋定公五年（前507年），唐国有人到楚国去，说唐成公本人乐不思蜀不想回家了，可跟他来的人免不了会想家，因此就想跟之前的侍从换个班、轮个岗。这个人见到唐成公后，把之前的几个随从灌醉了，然后偷了马献给囊瓦。囊瓦一看，心满意足，就把唐侯放了回去。

这件事情被蔡国人知道后，也学着唐国人的样子，把蔡侯戴的那块玉佩献给了囊瓦。至于那件精美的皮衣，在蔡侯身上穿了三年，估计已经失去了原来雍容华贵的味道，因此也就不好贡献了。

囊瓦拿到宝贝，装模作样地训斥一旁的官员说：“蔡侯之所以长期滞留我国，都是因为你们偷奸耍滑，没有准备好饯别的礼物。如果到明天还没有准备好，我就把你们全部处死！”

蔡昭侯并不是爱惜财物，而是看不惯囊瓦骄纵的样子。如今被滞留在楚三年，受尽了屈辱，心里更是十万个不痛快。在渡过汉水时，他将随身的玉璧丢入江中，发誓说：“此生此世，若是我再次渡过汉水往南，天打雷劈！”誓言许完，他就日夜不停地赶往晋国，以自己的儿子公子元及大夫们的儿子为人质，要求晋国为自己洗刷耻辱，这才有了这次盛大的会盟活动。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作为诸侯盟主的晋国，为了给小国出气而讨伐楚国的事例并不少见。可在弭兵会盟已经达成四十年后，冒着承担撕毁和平协议恶名的风险，为了一个平日里并不臣服于自己的蔡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盟会，也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

事出蹊跷，必有妖孽。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晋国召集此次盟会，表面上看是为蔡昭侯鸣不平，可真实的目的，恐怕还是想以重新高举“攘夷”旗帜的方式来重拾诸侯的信心，挽回晋国江河日下的声誉。

然而，晋国内部政出多门的局面已经形成，对诸侯予取予求的强横心态也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对其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会再为这个落寞的大国摇旗呐喊呢？更何况，在楚国衰落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大举讨伐，并不能激起人们对于这个昔日的“蛮夷之邦”的恐惧，他们所有的努力只怕注定会是一场空忙。

因此，对于这样一场盛会，各诸侯国并不看好。比如卫灵公在出发前，其大夫子行敬子便曾说过：“各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必然会争论不休，这次的会见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果然到这年五月，当诸侯移师皋鼬（今河南临颍，郑地）准备举行结盟仪式时，便开始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执不休，而这次的争论还就是因卫国而起的。

由于这次的会盟因蔡国而发起，且蔡国又是新归晋国，为了对此表示重视，晋国原本打算让蔡国在卫国之前歃血。卫灵公听到消息后感到十分疑惑，于是便派大夫史鱼（名佗，字子鱼，任祝史，又称祝佗）去向王室代表萇弘打听。萇弘如实回答说：“的确有这件事。”不过他又劝说卫国不要为这件事动干戈，毕竟蔡卫两国的始祖蔡叔和卫康叔本是兄弟，蔡叔的年纪要比康叔稍长，这样的排序也未尝不可。

在萇弘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于卫国人来说却是大问题。史鱼当即反驳说：“先王向来是尊重德行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按照年龄序齿排位的情况。”

他引经据典追叙了当年各国受封时的往事，特别是晋、卫、鲁受封的渊源，说：“这三国的始祖都是因为有良好的德行，才获得天子的赏赐。否则的话，文、武、成、康四代天王年长的兄弟子嗣还有很多，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得到这些呢？周武王有同母兄弟八人，只有周公、康叔、聃季三人在王室任职，这可不是按着年龄来安排的吧？我们再举个例子，曹国是周文王的后代，晋国是周武王的后代，若是按照年龄来论资排辈，那可得把曹国排在晋国前面了，可您觉得这样合适吗？”

史鱼同时还指出：“蔡国始君蔡叔曾连同管叔一起引诱商人侵犯王室，天子因此杀掉了管叔而流放了蔡叔。如果不是其子仲胡弃恶从善而受到周公的举荐，蔡国恐怕早就在诸侯之中除名了，这样有前科的国家怎么能排在卫国之前？晋文公践土会盟时，卫成公因与晋国有龃龉未能亲临现场，可即便如此，他的同母兄弟夷叔也是排在蔡国之前的。这些可都是在王室秘府中珍藏的，您要不相信可以回去查查看。怎么到今天反而要摒弃了德行，开始论资排辈了呢？”

莒弘也是有学识的人，可终究还是拗不过史鱼，只好让自己的长官刘文公去跟执掌晋政的士鞅商量，这才改变了歃血的次序。

诸侯只考虑自身利益得失，不能为晋国的理想切身考量，这些都在情理之中。可只要晋人自己能够做到精诚团结，为了共同的目标精心组织，最后的结果即便不会太理想，至少也不会太过难看。可偏偏就在这关键的节点上，在如此重要的会盟场合，晋人却再次因为自身的贪婪铸下了大错。

正当诸侯在召陵为伐楚计划进行谋划的时候，身为六卿之一的荀寅（中行文子，荀吴之子，中行氏最后一代宗主）却不合时宜地向蔡昭侯索取贿赂。蔡昭侯本来就因受到囊瓦的敲诈而愤恨不已，这才投靠晋国要求其主持公道，可如今就连晋国也不放过自己，心中未免更为恼火，于是便一口回绝了荀寅的无理要求。

荀寅虽不会像囊瓦那样毫无顾忌，可要给蔡昭侯下眼药也不是什么难事。遭到回绝后，他跑去跟主政的士鞅说道：“如今晋国外有中山国的侵扰，内有疟疾的流行，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而天下诸侯也怀有二心，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敌人，恐怕很难有胜算。更何况方城之战以来楚国从未得志过，平白无故地抛弃弭兵的盟约招来怨恨，对楚国来说并无大碍，可对晋国

来说损失可就大了。我们不但要承担失去中山国的后果，还要徒留一个劳民伤财的骂名，倒不如辞谢蔡侯为妙！”

按照士鞅和荀寅的人设，两个人都是贪婪无礼之徒，在自身的利益面前，一切国家大事都无足轻重，因此士鞅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而蔡昭侯则再次因为财物问题而在诸侯面前受辱。这么一来，替蔡昭侯报仇的事情没人管了，这次会盟自然也就虎头蛇尾，诸侯对晋国的不满更是愈发显现了出来。

吴军入郢

这边厢，晋国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气派的会盟活动，却什么事都没干成；那边厢，南方的吴国却悄无声息地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天下诸侯皆为之震动。

事情还要从召陵之会说起。由于沈国人拒绝应召参会，晋国在会盟期间指使蔡国灭掉了沈国（位于今河南平舆）。楚国眼巴巴地看着蔡国叛变投敌，还悍然灭掉了自己的兄弟，心里充满了委屈，但苦于对方人多势众，一时也不敢作声。等到他们开完会了、人也都散伙了，楚国这才整备了大军前去征讨叛逆。

蔡昭侯是铁了心要跟楚国对着干，如今既然晋国帮不了自己，那就另寻他途，转而请求吴国帮助其抵御楚军——而这也就引发了春秋历史上一场著名战役——柏举（亦作伯莒，在今湖北麻城一带）之战。

当时在吴国政坛活跃着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就是伍举的儿子伍员，也就是伍子胥；另外一个叫伯嚭，楚臣郤宛之子，伯州犁之孙，晋国大夫伯宗之

后。两个人都因受楚国佞臣费无极的迫害而出逃，其整个家族都被楚人屠灭，因此对楚国恨之入骨。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伍子胥，伍子胥在父亲被杀后，曾发誓一定要荡平楚国，因而投奔吴国。刚到吴国时，因戾气太重而不受重用，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他设计帮助太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夺取了君位，这才渐渐被看重。

而在楚国方面，楚平王吸取楚灵王过度进取的教训，在国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则在边境上到处修筑防御设施，却不主动出击，让吴国很难占到便宜。后来楚昭王即位，伍子胥借用晋悼公疲楚服郑的计策，建议阖闾将吴军一分为三，对楚国展开车轮式的骚扰，终于使得楚国不堪其扰，以至于后来对吴国的军事入侵都渐渐麻木了。

这次晋、吴两国联合诸侯伐楚，闹出了很大的动静，也的确让楚国紧张了好一阵子。好在他们雷声大雨点小，在长城外骚扰一通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等到晋军退了，楚国渐渐缓过神来，急忙出兵去敲打蔡国，奈何蔡国根本不惧，他们仗着背后有诸侯联军撑腰，反而早早地就与吴国通了气。

接到蔡国的求救信号，吴王阖闾亲率兵马乘舟北上，经淮水折转西进，与蔡、唐两国联合发兵进攻楚国本土。令尹囊瓦、司马沈尹戌闻警，亲自发兵抵御，双方在汉水两岸摆开阵势。

起先沈尹戌建议由令尹囊瓦正面吸引敌军火力，而他自己则带着方城山外的人马绕到吴军背后，烧掉停留在淮河岸边的船只，堵截吴军退路。等到事情妥当了，再由两军前后夹击，定能一举击溃敌军。

这个计策如果得到贯彻的话，楚军就算是赢不了，至少也不会败得很惨。可问题就在于囊瓦这个人贪心有余、智能不足，他不仅贪财，更贪图名利，但却没有建功之能。沈尹戌走后，他就在谋士武城黑和史皇的建议下，抢先对吴军发动攻击，妄图独占功劳。但渡河之后，他与吴军在小别山和大别山沿线接连数战，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克制吴军，心里一慌就想着要临阵脱逃。后来在史皇的责难下才勉强留了下来，可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还不如让他跑了的好。

十一月十八日，吴楚两军在柏举摆开阵势。吴王阖间的弟弟夫槩王带了五千兵士擅自出战，楚军早无战心，刚与吴军接触不久就四散溃逃了。吴军追着败兵一路掩杀，又在清发（今湖北安陆）将半渡的楚军击溃。

这一战彻底击溃了楚军的心理防线，囊瓦更是顾不得旁人的劝说，一路狂奔跑到了郑国。楚军兵士因为群龙无首，无法组织有效的阻击，只好都没命地逃亡。

在奔逃与追击的路上，经常是楚军安顿下来做好了饭，吴军就追上来了，刚刚做好的饭菜就成了慰劳吴军将士的战利品。就这样，一群饥肠辘辘、多日水米未进的楚军，被一群靠吃霸王餐混吃混喝的吴军一路追赶，一直追到了郢都城下。

楚军一路奔逃根本没有歇脚，郢都的人们自然也就无法提前获知消息了。因此当败军溃退到城下的时候，吴军也已接踵而至，郢都的防卫还没有来得及部署，就被吴军攻陷了。可怜的楚昭王当时就蒙了，一直沉迷在歌舞鼓乐中的他，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人连拉带扯地救出郢都逃命去了。后来看到吴军穷追不舍，针尹固用火象阵冲击敌阵，楚昭王这才逃得一条性命。

方城之战

吴军战败楚国、直取郢都的壮举震动天下，让中原诸侯对这个新近崛起的东夷国家刮目相看。而反观晋国在召陵之会时的表现，却总让人感到啼笑皆非，从而未免会产生一种沧海桑田的惶惑之感。

可问题是，既然故事注定没有结局，晋国为什么又要操办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会盟呢？如果仅仅是因为荀寅索贿不得就放弃了整场计划，让晋国在天下诸侯面前颜面丧尽，这岂不是太儿戏了？士鞅和荀寅就算是再蛮横、再愚蠢，在如此隆重的场合下，也不会不知轻重，非要自绝于天下吧？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士鞅做出了这么鲁莽的决定呢？

有鉴于《左传》叙述重伦理、轻逻辑的一贯套路，我们可以想见其如此编排的理由，不过是站在德行因果论的角度上，对会盟组织者士鞅和荀寅进行贬抑，以为其后来的失败做铺垫。为了突出论证效果，《左传》对于召陵之会的前因后果，以及会盟期间的事迹记录便十分粗糙，有大量的细节都被遮盖了。如果单凭这些简单的事实陈述来管窥全局，我们很难看透其中的玄机，好在近年来整理出炉的清华楚简《系年》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结合《系年》等文献的记述我们得知，此次会盟最主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给蔡昭侯报这三年拘禁之恨，而是一系列复杂因素综合促成的结果。

楚平王去世后，其子楚昭王年幼继位，政权落入令尹囊瓦之手，而囊瓦在历史上又以贪婪著称，使得原本附庸于楚国的陈、蔡、胡、许等国皆叛楚而去。尤其是在临近会盟之时，许国发生了内乱，许公佗投奔晋国。晋人为协助这些南方诸侯抵御楚国，因此便在汝阳（今属河南）筑城，同时还与楚国一道联结诸侯举兵，一直打到了楚国的方城山一带，随后才在召陵举行了这次会见。

晋国之所以要在弭兵盟约达成四十年后再起兵戈，与六卿家族的扩张思路和在中原的布局也是分不开的。

弭兵会盟之后，晋国凭借盟约护身，取得了相对宽松的外部发展环境，于是便积极地向北扩张，先后扫荡了位于晋中、冀中地区的无终、肥、鼓等国。而在遇到相对强势的鲜虞（中山国）时，其北伐的势头便遭遇了瓶颈，于是便又逐渐将战略重心南移到了中原地区。

到晋顷公元年（前525年），在韩起的授意之下，荀吴出兵伐灭了盘踞在河南西部的陆浑之戎，将其触角延伸到了秦岭地区。陆浑之戎被灭，使得原来居于晋楚之间的屏障不复存在，晋楚也就从遥遥相望的远邦变成了山水相依的邻国。两大强国一旦相邻，直接的利益冲突也会由此升级，这也就意味着第二次弭兵会盟的成果总有一天会走向破产。

晋国攫取楚国利益的第一步，自然是从拉拢、分离其固有的盟友开始，这也是他们对许、蔡等国施加保护的原因所在。这些做法尽管与之前争霸时采取的方式一致，但其目的却截然不同。为了巩固其在新占领土地上的利益，晋国这才以帮助蔡国复仇的名义，邀集诸侯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楚战争。

另外，从《系年》的表述来看，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国家显然不止十八国，至少作为伐楚主力的吴国，以及背叛楚国的唐、胡等众多江淮诸侯也都在其中。由于召陵之会做出了不再继续侵伐楚国的决议，这让吴国感到十分不满，因此并未参与后来的会见，《春秋》也因此没有予以记载。

面对如此众多的诸侯，楚国自然是不敢以硬碰硬，只能且战且退消极防守。而当大军推进至楚国方城一带时，就触及了楚国的核心利益，因此才遭到激烈的抵抗。当此之时，在中原诸侯尤其是晋国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

音，于是联军便退回召陵，就接下来的行动进行讨论，这也是召陵之会举行的一个大背景所在。

盛极而衰

召陵之会上诸侯最大的分歧在于，南方的吴国以及与楚有怨的陈、蔡、唐、胡等国都要求继续巩固成果，侵入方城以进一步打压楚国；王室大夫刘文公想要深入楚境消灭王子朝，自然也乐见其成；而中原诸侯则大多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而站在晋国自身的立场来看，楚国离晋远而距吴近，这次配合吴国的行动已然取得大捷，便应该及时收手。方城以内的土地本身不易攻取，即便是攻取了晋国也讨不到什么好处，其结果要么是让吴国取代楚国成为新的威胁，要么就是当诸侯联军退去的时候被楚国再次收复。无论哪种情况，对晋国来说都是徒耗人力、多费钱粮，因此更倾向于笼络诸侯北上，去攻打位于河北中部的中山国。

也正因为如此，荀寅才在盟会上提出：“吾自方城以来，楚未可以得志，只取勤焉。”

这里提到的方城之战，过去一直都认为是发生在晋平公元年（前557年）的湛阪（今河南平顶山西北，楚邑）之战，当时距召陵之会已过去了五十年。在这五十年间，楚国一直都没有对中原进行过实质性的侵扰，因此说“楚未可以得志”也未尝不可。但若结合《系年》的叙述，所谓的“方城以来”，很可能指的就是从去年冬季开始的“门方城”之战，这也就意味着，此番诸侯联军对楚国的侵扰到召陵会盟的时候早已接近了尾声，而晋国此次出征的战略意图也已然达到了。

当此之时，荀寅还提出晋国所面临的三大难题：一是“水潦方降”，不利出师；二是“疾疢方起”，军心不稳；三是“中山不服”，后方难安。

荀寅提到的这些理由，在史料中都能找到佐证，足以证明以贪婪成名的荀寅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在《左传》中，召陵之会举行前后，先后有陈惠公以及参与盟会的刘文公、杞悼公和郑国的游吉相继离世，似乎预示着这场疟疾就是在军中蔓延开的。而《系年》中也提到，召陵之会后不久，晋国出兵讨伐中山，结果同时遭遇了瘟疫和饥荒的侵袭，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记录都为荀寅“疾疢方起”“中山不服”等理由提供了佐证。

另外，在《左传》有关悼公时期伐灭偃阳一战的记载中，荀偃、士匄眼见久攻不克，遂生出退缩之心，提出的理由便是“水潦将降，惧不能归”。偃阳之战爆发于当年的周历四月，与召陵之会举行的时令相近，可见荀寅所谓的“水潦方降”并非无中生有。

可即便如此，召陵之会也并不是毫无成果。依据《春秋》经书记载，会后诸侯大军仍有“侵楚”的动作，蔡国大夫公孙姓也曾带兵伐灭沈国。皋鼬会盟之后，晋国又将许国迁徙到距离方城不远的容城（今河南鲁山东南）。与此同时，方城战役将楚国主力全都吸引到了中原战线，这就使得楚国核心区域的防御出现了巨大的漏洞，这也就给吴军深入楚境并取得柏举之战和攻入郢都的重大胜利提供了基础。

但吊诡的是，对方城之战和召陵之会所取得的成果，在政治立场上一直倾向于晋国的《左传》却只字不提，反而将笔触放在了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召陵之会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最大困惑就在于，过去的四十年间，晋国在诸侯事务上的表现尽管不如人意，但诸侯大都与其保持着一种虚与委蛇的

状态，凡有重大盟会，诸侯也都会派人参加。但在这次盛大的盟会之后，中原大地突然掀起了一股背叛晋国的浪潮，原先依附于晋国的中原诸侯纷纷投入齐国的阵营，在短短几年内就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晋联盟”。这样的变化发生得太过于突兀，以至于当人们回顾起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极大的疑问：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左传》的作者无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只能从会盟的枝节问题下手。比如谈到郑国背叛的原因时，《左传》就提到：“晋人假羽旄于郑，郑人与之。明日，或旆以会。晋于是乎失诸侯。”

晋人向郑国借用了装饰旌旗的羽毛，第二天他们将这些羽毛装饰在旗杆上去参加会议，因此就失去了诸侯——这个解释与五十年前齐灵公背叛晋国的理由毫无二致。但正如我们之前的分析，假借羽毛只是导致矛盾爆发的一个触发点或导火索，若是将其当成了带来问题的根本原因，显然是倒置了因果。

有关荀寅“求货于蔡侯”的论断亦是如此。《左传》既然无法解释诸侯叛晋的深层次原因，就只能将责任推诿到荀寅身上，用一场劳而无功的会盟来衬托士鞅和荀寅的无德无才。这样既解释了诸侯背叛的原因，又能为后来范氏、中行氏的覆灭提供佐证。如此的处理方式又恰好与其“因果报应”的主题相呼应，也算是深得“春秋笔法”的精妙所在了，但这就给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过程制造了不少困难。

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尊王”和“攘夷”是霸业秩序得以维系的两个最主要的支柱。十年前的王子朝之乱以再次动摇天王地位合法性的方式摧毁了“尊王”的根基，如今吴军入郢又以彻底剪除楚国对中原威胁的方式撼动了“攘夷”存在的基础。当维系霸主权位的两个基础都不复存在，持续了一

个半世纪的霸业秩序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正是诸侯纷纷背叛晋国的根本原因。

召陵之会后的第二年，楚人在秦、越等国的协助下赶走了吴国，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疆土，但再也无力对中原诸侯构成威胁。而与之相对的是，原先以霸主姿态保护中原诸侯不受外敌侵犯的晋国，却在短短的四十年间实现了快速扩张，一跃而成为中原各国普遍的威胁。为了防范晋国对诸侯土地财富的侵蚀，中原各国迅速调转矛头，将外交事务的重心转移到了对晋国的围堵和防范上来，历史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

而巧合的是，一百五十年前的晋献公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以召陵会盟确立了霸业秩序在中原的主导地位；而到如今的晋定公六年（前506年），晋定公则又以召陵之会宣告了霸业秩序的最终破产，这不能说历史又给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第三章 六卿瓜分公室与对外扩张的狂潮

第一节 荀吴伐狄

毁车为行

弭兵会盟结束之后，晋国公室逐渐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六卿各自为政的局面。在为家族利益互相争斗的过程中，六卿集团逐渐放弃了霸主的职责，转而走上了一条扩张主义的道路。而在这其中，与晋国毗邻的“白狄”自然首当其冲，成了六卿最先讨伐的对象。

晋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处于“戎狄”的包裹之中，因此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对“戎狄”的驱逐与兼并。

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曾有过两次大规模扫荡“戎狄”的高潮：一次是在晋献公时期，为了向外扩张疆土，晋献公灭国夺邑，通过武力手段统一晋南盆地，并将杂居在晋国腹地的“戎狄”驱逐到边远地区。第二次是在晋景公时期，因世卿世禄制引发的矛盾集中爆发，导致晋国在邲之战中失利。战后在荀林父、士会的主持下，晋国扫荡了东部山区的“赤狄”部落，将晋东南的长治、晋城盆地收入囊中。

“戎狄”在晋国发展的历程中，长期扮演着一个内部矛盾缓冲剂的角色。比如晋景公讨伐“赤狄”的行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内部冲突。与之类似的是，晋国在弭兵会盟之后开始的“伐狄”行动，也是在六卿矛盾集聚、内部压力不得缓释的情况下，主动寻求外部突破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与先前的“赤狄”类似，所谓的“白狄”也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包含了若干个聚落的庞大族群。这些聚落横跨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常年受到秦晋两国的侵扰，也因此经常会在秦晋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时而会跟随晋国参加中原的会盟和征讨，时而也会在秦国的怂恿下侵扰、牵制晋国的注意力。

晋国自晋成公时期开始，由于同时受到秦、楚、齐以及“赤狄”的压力，对待“白狄”的态度相对宽容，一直都是以结盟甚至联姻的手段来绥靖“诸戎”。在晋悼公争霸的高峰期，有北戎的无终国派人与晋国结好，晋悼公采纳了魏绛的建议与诸戎议和，为晋国向南争霸提供良好的后方环境。

“赤狄”覆灭之后，“白狄”国家与中原诸侯的交往日益频密，使得不少部落开始由游牧采集转向定居，逐渐建立了类同于华夏的城邦国家及政治制度。而随着戎狄城邦国家的发展，那些原本荆棘丛生的北方原始森林逐渐被开发出来，变成了富饶的良田，这对于急于扩充实力的诸卿来说，无疑有着很大的诱惑力。

在这一次的扩张大潮中，六卿之中贡献最为突出的是中行氏的首领荀吴。他在征讨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新的兵阵战法，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不少经典战例。

荀吴征伐的对象主要是分布在如今太原到石家庄一线的“戎狄”国家，目前可知的有无终、鲜虞（中山）、鼓、肥等。其中的第一战，就是攻打盘踞在大卤（今山西太原西南部）、曾主动与晋国结好的无终国。

这场战事爆发于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夏季，当赵武在郑国享受着最后的欢愉时，担任上军将、佐的荀吴、魏舒却正顶着骄阳，面对“戎人”的挑衅而束手无策。此战荀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北方落后的交通条件使得他们惯用的兵车战阵完全施展不开。

晋军的战车在中原大地纵马驰骋、所向披靡，可一旦遇到坑洼遍地、荆棘丛生的特殊地形，那些笨拙的战车便会经常抛锚，有时甚至还会成为将士们最后的葬身地。而无终人却能够利用其步兵的灵活性优势，随意侵扰入侵的敌军。倘若战事不利，他们还可以退守险地，这就让晋人感到十分气恼。

战车行动会受到限制，可人的思维却不受限，越是逆境越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担任上军佐的魏舒分析了敌我之间的形势，认为在当前的地形环境下，若还是坚持使用战车，就无异于是把困守战车的士兵变成了活靶子。对方只要把兵力分割为十人的小队，对被困战车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晋军就完全招架不住了。因此，想要战胜“狄人”，就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把军队全都改编为步兵，然后再以兵力优势发动突袭，岂有不胜之理？

荀吴对魏舒的计策深表赞同，但习惯了在战车上耀武扬威的将士们却接受不了这个改变，一时间群情激愤，场面一片混乱。为坚决地贯彻魏舒“改车为行”的策略，荀吴当即斩杀了自己的亲信示众，以弹压甲士的抵触情绪。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人在车下、心在车上”的情况出现，荀吴干脆下令将所有的战车都毁掉，彻底斩断了将士们的侥幸心理。

在作战部署上，荀吴将上、下两军两万余人重新整编为五个方阵：“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左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其中的“两、伍、专、参、偏”均为战车的编组单位，通常以25乘为一偏，50乘为一两，29乘为一参，81乘为一专，120乘为一伍。

按照春秋后期每乘75名的兵力配备来计算，作为诱敌前拒的一偏约为1875人，左右两翼分别为2175人和6075人，中军一两为3750人，后军则为9000人。这种阵形分布极不均衡，让无终人看了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于是纷纷嘲笑晋人不懂得步兵作战。

具体的作战过程史料中并未详载，我们只知道正当“狄人”纷纷嘲笑晋军的时候，荀吴发动全军进行突击，顺利灭掉了无终国，将太原周边地区收入囊中。

五伐鲜虞

大卤之战结束后，在战国七雄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北燕国才开始屡屡出现在史料中，而且一出场就爆发了严重内乱。

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冬季，北燕伯款因与大夫争权不利而出奔齐国，齐景公为平定燕国的乱局，派人到晋国请求出兵。但由于齐人大都不肯用心，因此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年，也没能把燕国国君送回去。

晋昭公即位二年（前530年），因唐地（又名阳，在河北文安、大城两县之间）百姓愿意接纳国君，齐景公于是再派高偃将燕君送回。荀吴则以与齐国大军会合为由，对位于东阳地区（晋国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的“白狄”鲜虞发动了突然袭击。

一般认为，鲜虞就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前身，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石家庄以北地区，国都原在正定国际机场附近，后逐步迁移到顾（今河北定州）、灵寿（今河北平山）等地。

鲜虞南部有两个附庸，分别是肥国和鼓国。鼓国国都昔阳，地在今河北晋州西部；肥国位于今河北石家庄藁城区西南部，在鼓国西部。据杨伯峻传注，在今昔阳县境内有肥子故国城，大约是肥国早先的定居地。另在河北东北部的卢龙县有肥如城，山东亦有肥城市，据推测应是肥国灭亡后其流民散居之地。

当荀吴意欲讨伐鲜虞之时，肥、鼓和鲜虞互成犄角之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晋国军力的发挥。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荀吴灵活借用了荀息的“假道伐虢”之计，但却反其道而行，来了个战略大迂回。

他先是以与齐军会合为借口北上燕国，然后在回军途中特意向鲜虞人借道。大军穿越鲜虞又进入鼓国地界，始终都高举和平的大旗，让三国军民都松懈了下来。但在向西折返经过肥国的时候，晋军却突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于八月初十日出其不意地灭掉了肥国，其国君绵皋也被晋军俘获。

灭掉肥国之后，荀吴大概是担心鲜虞会尾随追击，于是又派人对其进行了一番袭扰。等鲜虞人做好部署严阵以待时，却发现晋军早已远遁。

晋军的这次突袭让鲜虞人大感惶惑，因此一直紧盯着晋国动向。到了第二年，晋国为了向诸侯示威，尽起全国四千乘兵车远赴“东夷”之地与吴人相会。后因会盟不成，又先后在邾国南部和卫国的平丘举行了盛大会盟。

鲜虞人见晋国国内空虚，大约以为晋人不会再来侵犯，因而放松了警惕。谁知荀吴却不按套路出牌，在探知鲜虞不设警备之后，即刻在河北河南交界的著雍整顿上军，轻车简从一路向北绕过白狄属地到达燕国边境的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北），然后从其背后使用战车冲击，鲜虞人大败。

尽管鲜虞国力强大，并未因此一战而溃，但到底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晋昭公五年（前527年），荀吴再次出兵讨伐，吓得鲜虞急忙调集所有兵力进行防守。可谁知荀吴却是一个玩弄虚实的好手，正当鲜虞人为了防范对手而严阵以待的时候，荀吴却大张旗鼓地带着部队围攻鼓国都城昔阳去了。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几个月，可鲜虞人不知虚实，愣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兄弟被围攻，始终都不敢出兵救援。

围城开始后不久，鼓国内部发生变乱，有人出城找到荀吴，请求带着城里人哗变，与晋军里应外合攻下昔阳，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荀吴的断然拒绝。很多人表示不理解，纷纷质问他说：“我们明明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拿下鼓国，为什么就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呢？”

荀吴回答说：“我曾听叔向说过，喜好和厌恶都不过分，百姓就知道了行动的方向，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假如有晋人带着城邑叛变，我们内心会痛恨不已；可为什么当别人带着城邑前来投靠的时候，我们却偏偏会感到开心呢？”

也就是说，出征作战不仅仅要考虑眼前的利益，更要注重对国内的影响。有人带着城邑前来，他的举动是恶的，但却对晋国有功。如果不加以奖赏，这就是失信于人；可如果真的奖赏了他，就等于是惩善扬恶，又该如何教导百姓呢？得到了一座城邑却让国家陷入伦理困境，这非但不是福祉反而是败坏了德行，长远来看会得不偿失。

因此，在荀吴看来，出兵作战就要量力而行：“如果能力足够，我们就凭借自身的实力攻取；如果实力不济，就撤军回国，这没什么好考虑的。”

众人听了这些话都心悦诚服，于是就把叛徒遣送回去，让鼓国人杀掉叛徒，修缮守备，继续作战。

晋军围城三月，鼓国人难以支撑，便主动提出要投降晋国，但不料荀吴见了使者之后，竟然说道：“我看你脸色还好，说明仍有抵抗的能力，回去修缮你们的武备，咱们接着打！”

如果说之前不接受叛臣，是为了宣扬德行，还说得过去，荀吴现在的举动就实在让人费解了，有军吏因此就埋怨道：“得到城邑却不占取，反而要

一直劳顿百姓、损毁武器，有你这么效忠国君的吗？”

但荀吴自有他的一套逻辑：“如果狄人还未力竭我们就接受了他们的投降，那么百姓也会如此效仿，从而变得懈怠起来。得到一座城池却教导百姓懈怠，恐怕国家会陷入危难。反之，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们的投降，让百姓看到我们尊重敌人的忠心，就能让百姓懂得道义所在，从而竭尽全力为国尽忠，这样难道不好吗？”

荀吴说得头头是道，听的人也是一脸“你官大你有理”的表情，只好按住不提了。不久，鼓国终于支撑不住，便再次决定投降。这次他们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派了一个面黄肌瘦的人作为使者，向荀吴哭诉他们已经没有粮食了。这让荀吴实在无法推辞，终于接受了对方的投降。

荀吴带着鼓国国君鸛鞮（苑支）回到国都，在宗庙里进献了战利品后就把他放了回去。但没想到，鸛鞮投降晋国时心悦诚服，背叛起来也义无反顾，回去后不久就又和鲜虞纠缠不清。

事实总是这么喜欢捉弄人，荀吴的一番宣扬德行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鼓国即便再感念于晋国的恩德，在鲜虞强大的武力之下也不可能为了晋国拼命。我们似乎看到了很多人围坐在荀吴的身边看着他打脸的场面，荀吴于是痛定思痛，也不再想什么宣扬教化了，又开始使出了诡诈之术。

晋顷公六年（前520年）六月，荀吴亲自巡视东阳。他让军队伪装成用皮甲买米的商人，三五成群地在昔阳城门外休息，然后伺机逐渐渗透到昔阳城内，将鼓人完全蒙在了鼓里。

不久，荀吴兵临城下，与那些预先潜伏的士兵里应外合，再次灭掉了鼓国，鼓君鸛鞮也再次被带到晋国成为阶下囚。这次晋国没有再恢复鼓国的地

位，而是将其划为一个县，派大夫涉佗前往镇守。

荀吴通过五次战争先后灭掉了肥、鼓两国，剪除了鲜虞的两翼，使其完全暴露在晋国攻击范围之内。但由于其实力较为强盛，晋国也无法将其完全吞并，只能通过蚕食的方式逐步侵蚀其领地。在此后的百余年间，两国之间摩擦不断，这些在后文中还会提及。

鼓国归属

在与“白狄”的战争中，荀吴与他的副手魏舒屡出奇谋妙计，伐无终灭“群狄”，伐鲜虞灭肥、鼓，建立了赫赫战功，大大扩展了晋国的疆域。从战争中的诸多表现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之人，但唯独在攻取鼓国的过程中拖延不决，这就让人感到十分困惑。

比如第一次灭鼓的时候，有人要求里应外合助其攻破昔阳，他不肯接受；有人出城请降，他又以对方未到弹尽粮绝为由再次拒绝。当时他提出的理由是不希望国人效仿以生出懈怠之心，可转过头来到第二次灭鼓的时候，他就又设下了诈谋之术，似乎将之前所说的那些话全都抛之脑后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想要解开这些谜题，我们不妨从荀吴的职业历程中来看个究竟。

荀吴谥为中行穆子，是中行献子荀偃与一名郑国女子所生，因此也曾被称为“郑甥”。晋平公四年（前554年）春，荀偃在讨伐齐国的平阴之战回师途中去世，临终前士匄主动请命扶植荀吴为中行氏继承人，并举拔其为上军佐。士匄死后荀吴又顺位晋升为上军将，在六卿之中排名第三。

但随着士匄的去世，朝政被隶属于“新贵联盟”的赵、韩两家牢牢把持，荀吴在六卿中的地位从此止步不前。与之类似的是，与中行氏同属旧卿

阵营的范氏宗主士鞅，在其父去世后也只是获得了六卿最末的下军佐职位，后来因程郑的去世才升任下军将。

尽管从晋平公时期开始，晋国早已“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国君被卿大夫们撇在一边只能“以乐怛忧”，显现出了一幅混乱不堪的末世景象；可军政一体的政治机器依然在正常运行，作为军政首脑的中军将，也依然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

当荀吴在北方大举攻城略地的时候，担任晋国执政的正是以“懦弱”而闻名的韩起。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里，韩起为了挽回晋国的霸主地位，在列国之间来回奔走，但最终都因受到范氏、中行氏的压制而不能得志。但当回归到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时，他却总能以各种让人无法捉摸的老辣手段占得先机，这就让范氏、中行氏十分头疼。

比如晋平公十八年（前540年）春季，担任中军将的赵武去世，韩起顺利递补上位成为新任执政。在他的操控下，其余诸卿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循序提拔，反而是赵武的儿子赵成后来居上，成了仅次于韩起的中军佐。可以说，在赵武、韩起乃至魏舒执政的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旧卿联盟”一直都是被排挤的对象，这就使得他们在国内利益分配上很难占据主动地位。为了摆脱不利局面，他们就只能积极地推动外部扩张，这也是荀吴主动担纲伐狄统帅的根本动因所在。

但也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韩起除了为政懦弱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的性格特征，那就是“贪婪”。栾氏灭族之后，范氏、韩氏、赵氏因州县归属问题而剑拔弩张，以至于强横如士匄、谨慎如赵武都不敢轻易触碰。可韩起执政之后，不仅敢于对州县动手，还能通过各种偷梁换柱的手法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

也正因为其秉性如此，当荀吴、魏舒带领大军讨灭无终、征伐鲜虞，取得大量城池土地的时候，韩起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任由中行氏将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消化下去。而为了宣示自己对鼓国土地的志在必得，荀吴就故意拖慢战争的进程，以战争中所付出的艰辛来争取获得韩起的妥协。

但或许也正是因为二人之间矛盾未能调和，才有了后来鼓君鸛鞮被释放回国后公然叛晋之事。鼓人复国后又坚持了六七年的时间，直到双方就昔阳归属问题达成一致，荀吴才再次出兵将其纳入晋国版图，并将其交给一名叫作涉佗的大夫来镇守。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涉佗本人隶属赵氏侧室的邯郸氏，而邯郸氏与赵氏大宗的关系并不和睦，反而是与中行氏关系更为亲密。双方将昔阳划归邯郸氏，并交由涉佗管理，既能让荀吴感到安心，也能让从属于韩氏阵营的赵氏略感心宽，这也算是一个折中的办法。

陆浑归晋

当然了，韩起的套路还不止于此。

韩氏家族在六卿之中发育最为迟缓，至韩起成为执政的时候还依然在自己的“贫困”而忧虑。在位期间，韩起积极作为，奋勇赶超，从而塑造了一个“贪婪正卿”的形象，可这依然无法打消其对家族未来命运的忧虑。

既然数量不能与其他家族相提并论，那就要从质量上实现“后发优势”。为了尽可能地扩充财富和武装，韩起将目光投向了土地富饶、人口密集的河南平原。在执政主导土地瓜分的这些年里，韩起一直都很注重在晋国南阳地区的布局。除了前文提到的州县之外，申公巫臣受封的邢地也是在韩

起执政时被收入囊中的，这也就基本确定了韩氏家族向南发展的基调。而在这一波扩张浪潮中，韩起则将目光主要投向了南方的陆浑地区。

陆浑地区是位于秦、晋、楚三国之间的一块无主之地，早年晋惠公在位时曾迁徙“瓜州之戎”至此，并将其作为制约秦、楚两国的重要棋子。“陆浑之戎”在晋国争霸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秦晋崤之战中，晋国能够全歼秦国远征军，“陆浑戎”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然而当晋国逐渐退出争霸舞台，六卿家族开始各自为政时，陆浑对晋国的作用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反而成了列卿眼中的肥肉。早在晋悼公十五年（前559年）的向之盟时，士匄就曾借口“姜姓戎”与楚国有来往，欲拘捕其首领驹支。但或许是由于时机尚不成熟，士匄最终又与其和解，没有对陆浑下手。

但到了晋昭公在位时期，楚平王为了确保其北部边境的安定，派然丹诱杀“戎蛮子嘉”并尽占其地，使得其他的部落大为惊惧，纷纷向楚国示好，这也让晋国感到了深重的危机。事已至此，陆浑一定要灭，但灭掉之后土地归谁，这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

韩起对于陆浑的土地可以说是志在必得，为了能够如愿以偿，真可谓是煞费苦心，所用到的手段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话说有一天，韩起突然找到荀吴，含情脉脉地对他说：“昨夜我梦到你了，你知道吗？”

荀吴一听这话便浑身起鸡皮疙瘩。正当他无所适从的时候，只听得韩起又说道：“我梦到先君文公拉着你的手，郑重其事地将陆浑托付给我。我韩起不是一个不知轻重的人，但既是先君所托，我实在不敢辜负……”

荀吴简直要气疯了：明明是贪求陆浑的土地，却又不想弄脏了自己的手，反而指使我来代取。这种事情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你韩起怎么就能有这么厚的脸皮呢？

荀吴虽然称得上是个军事天才，可在政治上却总也不是韩起的对手，他久久地凝望着韩起那张无耻的老脸，明知自己远征疲惫完全是为人作嫁，却想不出一个拒绝的理由，只好怀着满腔的愤懑带兵出征去了。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韩起事先派屠蒯找到周王室，请求祭祀洛水和三涂山，这倒是让王室大夫们都感到有些意外。要说晋国对于王室早就没有那么多热忱了，前些年王室的穆后去世，晋国派荀跖前往会葬，其间，周景王明里暗里想让晋国给王室送些礼物，却不料晋人根本不予理会。随同荀跖前往的籍谈还强词夺理，因此落下了一个“数典忘祖”的骂名。如今晋国突然想起来要祭祀洛水和三涂山，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王室虽衰，却也有高人。大夫裒弘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对上司刘献公说：“客人的脸色凶猛，不像是为了祭祀而来。我估计他们不久就会进攻戎人，咱们还是提前做好准备吧！”

一直以来，天子对于晋国内迁“戎狄”的政策都颇有怨言，认为“陆浑戎”的内迁是在逼迫王室。如今晋国想要灭掉陆浑，江河日下的王室自然是喜出望外，便也摩拳擦掌准备着要趁乱捞一票。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晋顷公元年（前525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荀吴领兵从棘津（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滑县西南）徒步涉河，让祭史像模像样地用牲口祭祀洛水。陆浑不知道晋人的真实目的，因此也没设防备，结果被晋国打了个措手不及。仅仅三天之后，盘踞陆浑百年的“戎狄”就被尽灭。陆浑国君跑到楚国避难，余众四散逃亡，结果又被王室趁火打劫俘虏了不少。而韩

起则顺理成章地接收了陆浑，并装模作样地在晋文公庙中奉献俘虏，从而获得了这片广袤的土地。

荀吴披风沐雨用兵千里之外，北伐白狄、南征陆浑，极大扩展了晋国疆域，可以说这也是继献、景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向外扩张。但他千辛万苦换来的成果，真正落袋为安的并不多，反而是让韩起坐享其成，得到了最大的利益。

第二节 公族枝叶

祁氏之难

对于行将走向末路的晋国公室来说，在这个被称作“季世”的特殊时期里，能够有出自公族的韩起来担任执政，这既是一种幸运，同时也是一种不幸。

幸运的是，韩起执政时总要顾念自己的公族身份，因而对公室多少还留有余地，有的时候还会为了恢复公室的权威而奔走呼告。不幸的是，韩氏家族作为六卿之中的后起之秀，其家底实在太薄弱了，这也就使得韩起虽为公族，却要比其他人更加贪婪。执政期间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牟利，称得上是春秋时代以权谋私的最高“典范”，这对公室权益的损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我们也不必苛责古人，韩起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迫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应激反应。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六卿互相争斗、尔虞我诈的生存环境中，如果他果真听从了叔向之言，一心只去提高自己的德行修为，那么韩氏能不能熬过这个艰难的时节都是个未知数，更遑论要尽到保护公室的责任了。

不过，如花美眷敌不过似水流年，青松遒劲终也逃不过岁月变迁。凡人皆有一死，韩起也不例外。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政坛不倒翁韩起到了他入阁为卿以来的第五十三个年头，一直以来充当公族保护伞的他，也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年，一场针对公族的大规模清洗活动再次展开，已到弥留之际的韩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而无力阻挠。

事情的起因是大夫祁盈家里发生的一桩丑事。据说祁氏的家臣祁胜和郭臧有个特殊的癖好，就是喜欢玩“换妻游戏”。丑闻传得沸沸扬扬，让祁氏的宗主祁盈很是没面子，于是就想把他们抓起来问罪。

但当时的局势我们也知道，可以说早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晋国上至列卿、下至大夫每日里都战战兢兢，生怕给别人露出了什么把柄。偏偏这两个家臣还都是很有权势的地方实力派，事情搞不好就会生变，由此造成的后果更是难以预料。

为求万全，祁盈特意问计于晋平公时三军司马女叔齐之子司马叔游。叔游得知其来意后警告说：“世间嫉恨正直君子的无道之人很多，尤其是当他们居于上位的时候，就越是眼里容不得沙子，而你自己也就越不能为人所容。”

叔游还引用了《诗经》中“民之多辟，无自立辟”的词句来进行劝导。这句诗出自《大雅·板》，据说是“凡伯刺厉王”之作。早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宣淫于夏姬之家，有陈国大夫泄冶曾犯颜直谏，结果却招来杀身之祸。据说孔子在聊到这件事的时候，对陈灵公等人的行径未置一词，反而批评泄冶说：“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就是说泄冶不过是陈国的一介普通大夫，与国君没有血肉之亲，却妄图以一己之力纠正国家的法度，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如今叔游同样引用了这句诗，其意也是在告诫祁盈，臣民行为多有邪僻乃主君的过失，就算是用法严苛也无补于事。如今普天之下礼崩乐坏，上至天子诸侯，下至黎民百姓，皆已道德沦丧、无可救药。你既不能挽狂澜，恢复天下的礼乐秩序，又何必拘泥于这样的小事？想一想栾盈当初是怎么获

罪的，你的力量难道会比栾氏更强大吗？以栾盈的力量都不能纠正邪恶，你祁氏连卿都不是，又何必非要自立法度、引火烧身呢？

叔游的劝告可谓语重心长，然而祁盈早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总认为这件事不过是我祁氏的家事，又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就算是说破了天，那些居于上位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

以己之心度人，所看到的世界往往就会失真。祁盈终究还是太天真了，也显然低估了六卿的无耻程度。就在他抓捕祁胜、郈臧后不久，早已蠢蠢欲动的六卿，果然就开始对他下黑手了。

原来，祁胜的家人看到主子被抓，因护主心切就携重金找到已晋升为上军佐的荀跖，希望他能说说情，好让祁胜免于处罚。但荀跖却辜负了他们的心意，反而借机操控晋顷公，派人把祁盈给抓了起来。更为荒唐的是，后世岳飞被抓的时候好歹还有个“莫须有”的罪名，而这次的抓捕行动，荀跖竟然连个像样的罪名都懒得想。

祁盈不明不白地遭遇牢狱之灾，这可把他的家人给急坏了，于是也赶忙四处打点，看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可任凭他们如何努力，荀跖就是不肯放人，祁盈的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无奈之下，家臣们只好替他们的主子许下最后一个愿望：“既然我们的主君注定要死，那能不能请您垂怜，让他在临死前看到祁胜和郈臧伏法，也好让他能稍稍快意一些？”

这点要求倒是一点也不过分。对于荀跖来说，祁胜和郈臧的死活根本无关紧要，只要能把祁盈拉下马，其他的都无所谓，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巫臣之女

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正如当初栾氏灭族时有一大波公族受到牵连，如今荀跖的目标是“剪除公族枝叶”，自然也少不了要抽丝剥茧，牵出一大波的利益相关者，这其中就有叔向之子杨食我（字伯石）。在祁盈下狱后不久，荀跖又以杨食我协助祁盈为乱为由，将其逮捕系狱，并于当年六月将两人处死，二人所在的祁氏、羊舌氏家族也从此告别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故土。

《左传》虽然号称是为孔子的《春秋》作注解，但在价值取向上显然与儒家观念相左，对于荀跖枉杀祁氏、羊舌氏这件事也毫不例外。荀跖伙同其他家族合力剪除公族枝叶，其中的是非曲直在其叙述中已经是一目了然，可《左传》并未就此批评六卿借题发挥、栽赃陷害，反而是从“红颜祸水”的角度，将导致两氏灭族的罪状扣在了那个早已故去的夏姬身上。

也怪夏姬的美貌太过惊艳，以至于连她的女儿也有着倾国倾城的姿色，让以贤能著称的叔向都按捺不住心中的小鹿，一心想要娶她为妻。按照当时的称谓习惯，这里把她称作邢姜。

但叔向的母亲羊舌叔姬却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为了让叔向好好读书、天天向上，不要沉迷于美色而耽误了前程，她坚决要求叔向娶他的表妹，也就是他舅舅家的女儿。

年轻的叔向就是不乐意，他咕哝着对羊舌叔姬说：“我有那么多的庶母，可兄弟却很少，所以要引以为鉴啊！”

对于叔向的这番辩解，人们大多都理解为“舅舅家的女儿不容易生儿子”。但从前后文来看，叔向在这里所表达的，显然是在说舅舅家的女儿大多强势，所以才会出现庶母多但庶兄弟少的情况。

这番话让羊舌叔姬感到十分尴尬，别人骂人的时候还知道个指桑骂槐，你这倒好，说起自己的老娘来那可是指着鼻子直接开骂啊！她怒气冲冲地说道：“我娘家女儿强势又怎么了，总比巫臣氏家里那个克星强吧？她夏姬的美貌杀死了三夫、一子而亡一国、两卿，难道不更值得引以为鉴吗？”

不过羊舌叔姬好歹是个有修养的女人，话一出口就知道自己说得太重了。稍稍缓和了一下情绪后，她又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外表美丽的女子必定有她丑恶的一面。夏姬是郑穆公的少妃姚子的女儿，郑灵公子貉的同母妹妹。正是因为上天将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所以她的哥哥子貉早早地就死掉了，连个孩子也没有留下。再以前，有仍氏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名叫玄妻，乐正后夔将其娶回家里，生下一个儿子叫伯封。这个孩子的心地就跟猪一样，为人贪婪不知满足，脾气乖戾没有节制，人们都叫他‘封猪’。后来有穷氏的后羿将其灭掉，夔国也因此断了香火。”

这还不算，羊舌叔姬接着又列举了夏商周三代因美色亡国、恭太子申生因骊姬而死的故事，以劝诫叔向不要被美色迷昏了头脑。美色固然赏心悦目，但它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会在无形中改变你，若德行高尚还能扛得住，可你不行啊！

羊舌叔姬最后又做出了“结案陈词”：“我婆家的姑娘再差，顶多就是把你管得严一点，这不是什么缺点。可你要娶了夏姬的女儿，就算是生出儿子也得把你的家业败掉！你好好想想吧！”

如果你还记得韩非子为“平公好新声”而编的那个故事的话，就会发现这其中有不少相似之处。在当世人们的观念里，似乎“德”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力量，不仅“德不匹位”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就连“德不匹乐”“德不匹色”的后果都极其严重，“修德”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比“修仙”还

要困难。而叔向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夫，既然德行不够，就应该认命，不要学着别人去追求那些你高攀不起的美色。

叔向自晋悼公时期就因博学而担任太子傅，因此与后来继位的晋平公有着很好的私交。大概是平日里的谈话中曾经表达过对邢平之的倾慕之情，又或许是因为母亲的阻挠使得他只好向晋平公求助，总之在叔向打消了念头之后不久，晋平公突然下令，让叔向必须娶邢平之妻——用书中的原文来说，就是“平公强使取之”。

邢平之进门后，很快就如叔向所愿，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也即后来的杨食我，但羊舌叔姬却依然不买账。而且据说在孩子出生的时候，羊舌叔姬本有心去探望一下，可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一阵好似豺狼吼叫一般的哭声。在《左传》的记载中，曾弑父篡位的楚穆王商臣，以及导致若敖氏被团灭的斗越椒，都有着像豺狼一样的嗓音，做的事情也都不让人乐见，可见豺狼一样的声音在那个时代大概是狼子野心的标配。

至于为什么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发出豺狼一般的叫声，至今都还是“世界未解之谜”。但不管怎么说，当羊舌叔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心里咯噔了一下，说道：“声似豺狼的男子，必然有着超出一般的野心。让羊舌氏走向灭亡的，必然就是这个孩子了。”

这番预言可以说是把“红颜祸水”的论调又推向了一个高潮。以往人们对于红颜祸水的论述，还仅限于美色本身容易致人昏乱，可到了羊舌叔姬的口中，则不仅仅是美色本身会害君误国，就连她们的女儿以至于外孙都贻害无穷了。这样的论调又如何让人取信呢？

颠倒黑白

说起来羊舌叔姬也算是一个大预言家，史料中不止一次记述了她成功预测未来的事迹。不过，与单襄公等人喜欢通过一些细节来预测他人的命运不同，羊舌叔姬的预言则主要是针对自己的家族。

比如叔向的两个弟弟叔虎（羊舌虎）和叔鱼（羊舌鮒），一个是因为受栾氏牵连而死，一个则是因为贪财受贿而被杀，羊舌叔姬对她们的死也都曾做出过惊人的预测。

早年羊舌叔姬与羊舌职的诸多妻妾争宠，其中她最记恨的就是羊舌虎的母亲，因此坚决不让她陪侍丈夫羊舌职。儿子们有些看不惯母亲的做法，于是就纷纷解劝，不料她却辩解说：“我真的不是嫉妒她比我长得漂亮！只是我听闻，深山大泽有龙蛇生。羊舌氏本来就是一个衰败的家族，国内受到宠幸的大族很多，又有坏人从中挑拨，处境都已经如此艰难了，你们怎么还不警醒一些？我实在担心这样美貌的女子，会生下龙蛇来祸害你们，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她是如此深明大义，可到底还是架不住流言蜚语，最后也只能同意了儿子们的请求。后来这个女子就生下了羊舌虎，一个外表英俊且武力超群的美男子，后来因为与栾盈交好，在栾氏之乱中被士匄杀死，还差点连累整个家族为其陪葬。

至于叔鱼（羊舌鮒），也算是羊舌叔姬的亲儿子，可就是不得欢心。跟武姜讨厌郑庄公的原因不太一样的是，羊舌叔姬属于纯粹的“外貌协会”。别人家的女儿长得漂亮她不喜欢，自己的儿子长得太丑了也会心生厌恶。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个孩子简直是一个虎目猪嘴、鹰肩牛腹的怪物。

她看着自己的亲儿子，心中同时还感叹：“山间的沟壑尚可填满，而这个孩子的欲望却永远都无法得到满足，将来必定会因为贪财受贿而死。”其

结果我们也知道，羊舌鮒贪财索贿，最后终究因为笑纳了雍子的女儿而判决不公，被申公巫臣之子邢侯杀死。

若是这些预测都属实，那么羊舌叔姬显然是无愧于“预言家”这个称号的。按照以上的这些套路，羊舌氏的灭亡，早在杨食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还真怨不得别人。毕竟上天早已给出了很多警示，一个充斥着龙蛇、怪物、豺狼的家族，又焉有不衰败的道理？

但凭如今的常识论，这些预测显然是后人的臆测，无论是栾盈还是如今的祁盈，他们的受难本就是遭人诬陷，羊舌家族的人随同谋反更是子虚乌有。祁氏和羊舌氏之所以会遭遇灭顶之灾，不过是六卿为了瓜分他们的土地而制造的一桩冤案，这跟他们本人的品行又有什么关系呢？

《左传》为了撇清六卿的恶行，故意拔高了羊舌叔姬这个醋坛子的地位，如此颠倒黑白的功夫也算是清新脱俗，令人大开眼界。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以成败论德行，以结果导例证，这是先秦百家学说的通病。为了证明一个国家、一个家族乃至于一个个人的灭亡具有某种合理性，人们往往会穷尽所能获知的资料来为其提供佐证。而当固有的资料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时，那就要用神秘主义的学说来编造例证，从而使得那些在政治斗争中走向没落的团体和失败的个人，不仅要遭受政治上和肉体上的毁灭，更要在道德上被再毁灭一次。否则的话，若是这种因果链条无法构建起来，又如何让身居高位者采用自己的学说呢？

羊舌叔姬的这些预言故事，反映的实际上也是同一个道理。这些故事之所以会得以流传，也是在为羊舌氏的灭亡提供合理性的依据。以栾书做出了弑君的恶行，人们在灭亡栾氏时还要考虑他的德行，从而不忍伤害他的儿子，更何况是大有贤名的叔向呢？倘若连叔向这样的贤大夫都不能保全自己

的家族，那么又该如何以德行之论来劝人向善呢？因此，《左传》以这些怪力乱神的预言来为祁氏、羊舌氏的灭亡提供佐证，恰恰证明了祁盈和杨食我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罪行。

枝叶凋零

祁氏的发展源流较短，若是往前追溯的话，在晋惠公、晋文公时期有祁举、山祁、祁瞒等人，名字里都有一个“祁”字，但我们很难说他们就跟如今的祁氏家族有什么关联。这个家族可以确信的来源大概是在晋景公时期，彼时有晋献侯后代高粱伯之子祁奚（字黄羊）担任祁（今山西祁县）大夫，建立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祁氏。

祁奚作为公族大夫，在晋景公时期曾受到一定的重视，晋景公还曾一度将赵氏的土地转封给他。但在栾郤争斗的晋厉公时期，晋国内部体制僵化，普通公族很难有上升空间，祁奚也难有作为，直到晋悼公即位后，才被推举为中军尉。彼时祁奚已经年老，在中军尉任上只干了三年就宣布退休了，由他的儿子祁午接任，其间还留下“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的佳话。

史料中有关祁午的事迹并不多，但在楚国太宰薳启强的口中，他也被列为叔向之下八大贤臣之首，其家族产业颇为可观，可见究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到了祁盈这一代，其存留的事迹就更为简略了，因此我们很难评述祁氏家族在政治上的作为。

祁氏的祸乱之所以牵扯到了羊舌氏，概与两家素来密切的世交有一定关系。祁奚担任中军尉时，羊舌职就充当他的副手，祁奚退休后，又是祁午和羊舌赤分别担任中军尉和中军尉佐。两家人同在中军担任正副尉的职务，长期的相处使得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情谊。特别是叔向下狱之后，年迈的祁奚

不辞辛劳前往营救，虽说事后祁奚不受功，叔向不谢恩，但这种默契似乎更加表明两家人之间的感情是何等的牢不可破。

两家被灭族的时候，都留下了庞大的家族产业。羊舌氏族下的产业有三个县，分别是铜鞮（今山西沁县）、杨氏县（今山西洪洞）和平阳（今山西临汾）。而祁氏的产业足足有七个县，分别是祁县、邬县（今山西介休）、平陵（今山西文水）、梗阳（今山西清徐）、涂水（今山西榆次）、马首（今山西平定）、盂县。这些封地开发程度或许不高，但从数量上却足以与韩起所拥有的七个成县相比拟，光凭这一点，祁盈就有资格跟韩起平起平坐。这也无怪乎韩起身居正卿却还要哭穷，认为自己这个正卿，实在是做得有名无实了。

历史上有很多功臣贵勋为帝王所屈杀的案例，若按照古代的“忠奸二分”理论，其中不少的家族还是货真价实的忠勇之家。他们虽然没有弑君谋反的真实罪状，但却有足以弑君谋反的能力，因此他们的罪状就是“功高震主”，抑或是“族大逼君”。

与这些案例不同的是，祁氏和羊舌氏作为公室的臂膀，显然不会危及国君的权益，反而会对六卿瓜分公室的企图造成阻碍。《左传》在晋悼公十六年的记录中，曾记载过一个有关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故事，这个故事显然是与晋悼公以后整个中原社会的环境相呼应的。

坐拥如此丰厚的家产，又有着与六卿相悖的理想而没有能与之比拟的地位，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极其危险的。祁氏、羊舌氏之所以会走向覆亡，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充当了公室最后的屏障，关于这一点，时人实际上早有预测。

比如晋平公十四年（前544年），吴国贤公子延陵季子周游列国，在晋国居留期间与叔向相谈甚欢。看到晋国的政治局面，想到叔向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中求存之艰难，不免有些惺惺相惜，临行前还特意嘱咐说：“您多努力吧！国君奢侈而良臣众多，大夫皆富可敌国，政权终将落入大夫之家。您为人耿直，喜欢有话直说，一定要多为自己考虑，想一想如何才能免于祸难才是啊！”

叔向对此也很了然，他深知晋国的权力必将落入私家手中，只要公室还有剩余的土地，只要还有独立的大夫游离于六卿之外，各种形式的土地瓜分就不会终止。在与晏婴谈话时，他更是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公族的羊舌氏，终究难以逃脱“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的宿命，其身后的家族产业必然会被饿狼般的强家所吞噬。任凭他付出再多努力，在强横的六卿面前也不过是螳臂当车，换来的必将是“幸而得死，岂其获祀？”的结果。

可那又怎样呢？人生在世，总要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梦想，哪怕这个梦想不切实际，他也要凭借着内心中一股理想主义的情怀，凭借着“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默默地充当拱卫公室的最后屏障。

卿族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叔向去世十几年后，那些已经瓜分了栾氏的封地，巩固了周边新占领土地的六卿家族，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瓜分狂潮。而羊舌氏这样一心维护公室、始终不肯依附权贵的孤胆英雄，以及和他们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祁氏家族，最终不能容于六卿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举不失亲

两家灭族后不久，政坛常青树韩起也终于撒手人寰。这个时候，赵武的儿子赵成（赵景子）早已在四十岁左右先行离去，继任者是其第六代领导人赵鞅（赵简子）；而韩起的儿子韩须（韩贞子）似乎也先于其父去世了，继

任的是韩须的儿子韩不信（韩简子，字伯音）。两人彼时都资历尚浅，无法统御如魏舒、士鞅那些老资格的政客，韩赵联盟面临着后继乏力的尴尬局面，正卿之位只能按照排位顺延，落到了魏舒（魏献子）手中。

魏舒担任执政后，毫不犹豫地将祁氏、羊舌氏的土地划分为十个县，并主持了对这些土地的瓜分：任命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孟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司马弥牟为郛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

这个序列中有四个人比较特殊，分别是赵朝、魏戊、韩固、知徐吾，他们分别是赵氏、魏氏、韩氏、智氏的余子。这四家都从中获得了一个直属县，唯独范氏和中行氏被晾在了一边，未能染指其中的利益。魏舒对此颇有些疑虑，担心会激怒另外两家，因此很是心虚地向身边人询问：“我给了魏戊一个县，别人会不会认为我有私心呢？”

大夫成鱄很会揣摩上意，对魏舒极尽粉饰之能事，盛赞魏戊是一个“远不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义，在约思纯，有守心而无淫行”的君子，受封一县也是理所当然。

他同时认为，魏舒此次授官简直可以与周武王封国相提并论。周武王分封兄弟十五人，同姓诸侯四十个，这些都是至亲至近的人，也没有人说他的不好。因此举拔官员没有别的条件，只要是善之所在，无论亲疏远近都是一样的。相反，如果因为亲近而不推荐，导致国家错失一个难得的人才，这才是最大的失职。他甚至还大拍马屁，说魏舒的德行已经与周文王相近了，达到了严守度、莫、明、类、长、君、顺、比、文九种德行而不出过错，行为没有悔恨，所以能承袭上天的福禄，并利及子子孙孙的程度。

后来贾辛要到祁县任职，临行前魏舒特意将他叫到跟前，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当初叔向到郑国去，郑国大夫然明想要见见叔向，但因为长得丑，因此就跟着收拾器皿的仆人进去。后来他在堂下说了一句话，叔向正要喝酒，听到后马上就说道：‘这一定是然明。’于是放下酒杯走下堂来，拉着然明的手说道：‘当初贾国大夫貌丑，但却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他的妻子很不开心，因此三年都不说不笑。贾大夫于是就带着她去射猎，一箭就射中了一只野鸡，他的妻子才开始笑着说话。贾大夫因此问道：‘才能不能废弃，我若是不能射箭，你是不是一辈子都不说不笑了呢？’如今您其貌不扬，若是再不肯说话，我几乎都要错过和您见面的机会了。”

魏舒借此勉励贾辛，说：“您现在为王室出了力，我因此举拔你为祁县大夫。到了祁县，一定要敬守职责，不要损毁了你的功劳！”

据说魏舒举拔官员的事情传到鲁国，就连孔子对他的做法都赞赏有加，说他举拔官员“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以说是符合道义的了。后来又听到了魏舒勉励贾辛的那番话，孔子同时引用了《大雅·文王》中的一句诗“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长久地顺从天命，才能求得更多的福禄，认为这体现了忠诚。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孔子认为魏舒举拔人才合于道义，下达命令又体现了忠诚，恐怕他的后代会在晋国长期享有禄位吧！

不过，从孔子对待鲁国三桓的态度来看，他对于这些侵夺公室权益的世卿家族显然是深恶痛绝的。以魏舒为代表的四卿家族踢开公室，公然瓜分了公族的土地，这些举动若是放在鲁国，一定会被孔子指着鼻子痛骂的，何以同样的事情到了晋国，他反而要赞许了呢？

《左传》在为晋国的世卿辩护时，常会有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引用孔子言论的问题，这在有关赵盾弑君一事上就已经有所体现。因此孔子是否真的说

过这些话，又或者这些话是不是用来评述当前这件事的，应该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无论如何，伴随着祁氏、羊舌氏的覆灭，公室的地位再次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君卿冲突已经退居末席，六卿之间的直接对决将成为下一阶段晋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在这次利益分配中，范氏、中行氏被排斥在外，更加剧了他们的仇恨情绪，使得往日里表面一团和气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两个团体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升级，一场剧烈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节 新郑之行

韩起访郑

召陵之会举行的二十年前，也即晋昭公六年（前526年）三月，正当鲁昭公因平丘会盟之事而被晋国扣留之时，身为晋国执政的韩起却特意避开国内事务，对郑国进行了一次超高规格的访问。《左传》耗费了大量的笔墨对这次外事活动进行了长篇报道。

韩起一行抵达郑国后，郑定公第一时间举办了盛大的享礼为其接风。对这次的享礼，郑国上下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就连向来以敢于直言冒犯大国而著称的执政子产也一改常态，特意叮嘱有资格参与享礼的人一定要谨言慎行，切莫因鲁莽冲撞了尊贵的客人。

然而即便是他三令五申，到享礼开始的时候还是发生了意外。一个名叫孔张（公孙申）的大夫因为迟到了，慌慌张张地在客人中间穿梭找自己的座位。负责仪礼的官员急忙制止他，他就又跑到了客人身后，又被司礼官给挡住了。孔张在典礼中到处穿梭，不免将在场客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让他更是手足无措，悻悻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又退到放置乐器的地方。

他的这般慌张样貌，再次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也让在场的郑国大夫感到脸上无光。其中有一个叫富子的大夫私下里对子产说：“郑国本来就受大国的欺凌，若不是因为坚守礼仪，恐怕早就无法在列国中求存了。如今孔张的举动简直是丢尽了郑国的脸面，您难道就不感到羞耻吗？”

子产很是不屑地反驳说：“我作为国家执政，倘若发布命令不恰当，命令发出后又没有信用，刑罚偏颇不公平，诉讼放任混乱，朝会时不恭敬，命令没有人听从，从而招致大国的欺辱，劳动民众却没有效果，罪行到了身上

还不能自知，这是我的耻辱。可他孔张是谁啊？他是国君的堂侄，是子孔的后人、孔氏的掌门人。孔氏家族已经有几代人在朝中做官了，他们世代值守自身的职责，受命出使诸侯而不辱使命，为国人所敬重，为诸侯所周知。如果忘掉了自己该处的地位，那也是他自己的耻辱，跟我这个做执政的又有什么关系？若是把所有的罪责都归于我这个执政的身上，等于是说先王没有法度，这不是我一人可以承担的。您还是用其他的事情来规劝我吧！”

这段插曲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先按下不表，接着跟随《左传》的视角了解韩起下一步的行程。

据说韩起早先得到了一副特别精美的玉环，但美中不足的是，这玉环大约是由三块玉块组成，韩起手中只有其中的两块。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另一块在一名郑国商人手里，于是就想趁这个机会把那块玉块要过来。

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可子产却非要坚持原则，派人回禀韩起说：“郑国的府库中并没有您所要的玉块，因此寡君对您的要求实在无能为力。”

子产的回答特别强硬，让他的同僚游吉、子羽都感到担忧，因而苦口婆心地劝说道：“韩子也没有提过分的要求，您给他就算了！毕竟晋国和韩起都不是可以轻视的，我们紧邻晋国本来就生计艰难，若是再有人从中挑唆，让他们觉得我们有了二心；鬼神又在其中兴风作浪，以兴起他们的凶心怒气，到时候一切都晚了。何必为了爱惜一块玉惹他们生气呢？”

子产正色道：“正是因为对晋国没有二心，所以才不给他，因为这恰恰体现了我们郑国的忠实守信。我听说，治理国家最担心的不是怕不能侍奉大国、镇抚小国，而是担心不能用礼仪来使得两国彼此相安。若是对大国提出的所有的要求都要满足，只怕是会增加他们的贪欲，以至于变本加厉、予取予求没有了限度，最后很可能把我们的国本都挖空了。到那个时候，若是他

们又来索取，我们已经无法满足，后果岂不是更严重？因此我们必须奉行礼仪，合乎礼的要求就满足他们，不合礼制的就不能放纵他们，这样国家才成其为国家。否则的话，我们跟他们的一个边境城市还有什么区别？”

紧接着，他又从韩起的角度分析说：“再说了，韩子到底也是位君子，他担心的不是怕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好的名声。他奉命出使若是冲着索取玉环来的，那也就太贪婪、太邪恶了。若是不问对错满足了他的欲望，就等于是因为我们的纵容让他成为一个贪婪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罪过吗？因为一块玉而招来两种罪过，让我们失去了国家的地位，让韩子变成了贪婪之人，这也太不值得了吧？”

既然从国君这里要不到，韩起也不强求，他亲自找到了那个商人，提出要收购他的玉玦。作为当时中原地区最有权势的人，韩起也算是见惯了奇珍异宝，因此他所看重的东西也不会是什么凡俗之物，商人自然也不愿意出让。可如今晋国上卿前来索求，商人害怕给自己招来麻烦，就只好忍痛割爱了。但在成交之后，商人又增加了一个补充条款，要求韩起一定要把这件事跟郑国的君大夫们说一声。

这桩生意你情我愿，韩起自认为没有强买的成分，因此就将情况如实告知了子产：“前段时间我向执政请求得到那块玉玦，执政认为不合于道义，因此不敢再次请求。如今我已从商人手中购得，但商人要求一定要将这件事告知君大夫，所以起谨以此作为请求。”

不料子产却说：“我们郑国以商立国，早年先君桓公和商人们从周朝迁居而来，共同合作开辟了这片领土，并在此世代繁衍。商人有功于国，因此桓公曾与他们盟誓说：‘商人不得背叛国家，而国家也不能强买商人的东西，双方地位平等，不得强求或者掠夺；不管商人们得到什么宝贵的货物，

国家都不能过问。’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盟约在，我们才能互相支持，走到今天。如今您身负和平使命前来造访，却告诉我您要强夺商人的东西，破坏我们立国之初就定下的誓约，恐怕不合适吧？为了一块玉玦而失去诸侯，恐怕是您不能接受的；但反过来，若是因为大国的要求，我们变得毫无原则，就好像成了你们治下的边境都邑，我们也同样无法接受。侨实在不知道，献上这块玉玦能有什么好处，因此私下里开诚布公，希望您能够谅解！”

韩起听了这些才明白，那个商人为什么非要他跟君大夫们说一声。但此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他太熟悉子产的脾气秉性了，知道拗不过他，只好派人把玉玦送了回去，并道歉说：“我韩起虽然愚钝，但绝对不敢以此为两国招来祸患，因此特把玉玦退还。”临走的时候，韩起还特地私下里额外赠给子产马匹和宝玉，以拜谢他让自己“悬崖勒马”的恩情。

诗以言志

韩起在郑国逗留了大约两个月，到他启程回国时，郑国六卿又特地在郊外设宴为其饯行，席间韩起请郑国六卿赋诗以观其志。

这大概也是晋国正卿到郑国聘问时的标准动作。早在弭兵会盟当年，郑简公在垂陇（今河南荥阳东北）设宴款待赵武，赵武就提出让七穆的族长分别赋诗“以观七子之志”。

当时郑国的执政子展（罕氏公孙舍之）赋《草虫》。这是一首抒发女子见到丈夫远行归来喜悦之情的诗歌，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降”的诗句。赵武听后惭愧道：“好啊！这是百姓的主人，但武却愧不敢当！”

伯有（良宵）赋《鹑之贄贄》。这首诗据说是用来讽刺卫宣公与宣姜的诗歌，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的诗句，良宵以此来宣泄对郑国国君和执政卿士的不满。赵武听后又取诗之本意来回应说：“床第之言不出门槛，更何况是在野外呢？这不是使者该听到的。”

子西（驷氏公孙夏）赋《黍苗》之四章。这是一首民夫赞美召穆公营建谢邑之功的诗歌，其第四章有“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之句，以赞扬赵武促成晋楚弭兵，其功劳可比召公。赵武推辞说：“有寡君在，武又何敢贪功？”

子产（国氏公孙侨）赋《隰桑》。诗中有“既见君子，云何不乐”之类的句子，很明显是一首爱情诗，子产正是以此来表达对赵武的盼望之情。但赵武却推辞说：“武请求接受最后一章。”也就是“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意在表明我不敢以君子自居，但会将你的教导时刻藏在心间。

子大叔（游吉）赋《野有蔓草》。这是一首抒发浪漫爱情的诗歌，诗中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这种唯美的爱情誓言。游吉赋这首诗，总结起来就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见到你很高兴！”赵武当即回应说：“这都是受你的恩惠！”

子石（印段）赋《蟋蟀》。这是一首劝人勤勉的诗歌，其中有“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的诗句，赵武听到后不由得赞叹说：“这是能保住家族的大夫，我看到希望了！”

伯石（丰氏公孙段）赋《桑扈》，是一首描写天子与诸侯宴饮之诗。诗中有“彼交匪敖，万福来求”一句，赵武听后念道：“匪交匪敖，福将焉

往？”同时赞许说：“如果能保持如此作风，即便想要推辞福禄怕是也推不掉啊！”

七子赋诗完毕，赵武便私下里与叔向讨论道：“诗歌是用来表达志向的，伯有公开污蔑并怨恨自己的国君，还在宴会上引以为荣，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死于非命了！就算侥幸不死，也一定会逃亡。”

他同时还赞许了其余的几位大夫，说：“这些都是可以传递几世的家族。其中罕氏一定会最后灭亡，因为子展处于上位而不忘记降抑自己。印氏会在最后第二个灭亡，因为子石欢乐而有节制。”

如今韩起到了郑国，也要“观六卿之志”，郑人自然不敢怠慢。在宴会上，子鬻（罕婴齐）同样赋《野有蔓草》一诗，韩起颌首一笑，回道：“孺子善哉！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

子产（公孙侨）赋《羔裘》一诗，这是一首赞美古代君子的诗歌。诗中有“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之类的赞语，韩起听了连忙摆手：“起愧不敢当。”

子大叔（游吉）赋《褰裳》，这是一首女子戏谑情人的诗歌，但也有人认为其表达的是小国怀念大国协助安邦的愿望。诗中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诗句，韩起听了不禁捧腹，于是就回答说：“有起在这里，怎么敢让你再去找别人呢？”游吉忙拜谢，韩起这才正色道：“您说得太对了，正是因为有旁人总惦记着，我们才能一直友好相处下去啊！”

紧接着，子游（昶偃）赋《风雨》，这是一首歌咏夫妻重逢的诗歌，子游取“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之句，表达对韩起的盼望之情。子旗（丰施）赋《有女同车》，这也是一首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歌，诗中有“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的句子，是在形容韩起德行之美好。子柳（印癸）赋《莠兮》，则是一首男女互相唱和的诗，诗中“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很有一种“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的味道。韩起都一一答谢。

与弭兵会盟时的情形不同，此番郑国六卿赋诗，所选用的诗歌都出自《郑风》，也就是郑国本国的民歌。韩起于是赞叹说：“这几位大臣都是传了几代的大夫，他们赋《郑风》中表示友好的诗歌，以国君的名义赏赐于我，可见郑国在他们的治下终究会强盛起来的。我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

说罢韩起向六卿分别赠送了马匹，而且赋了一首《我将》，这首诗是“《大武》六成”中的第一篇，用以表现武王孟津观兵的壮丽场景。诗中有“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之句，表达了他顺从天意以靖乱的志向。众人在子产的带领下，纷纷拜谢韩起，说：“您能够平定四方，便是对我们的恩德，怎敢不拜谢呢？”

晋主大夏

随着车队的启程，《左传》对韩起此次出行的“专访”也宣告结束，其中并未提到他对郑国六卿的行为有过任何评价。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言外之意的话，无非也就是赞扬韩起从善如流，仅此而已。

但日本学者平势隆郎却从中看出了弦外之音，从而得出了一个让人颇感意外的结论。他认为，《左传》的真实作者极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的韩国人，其著述的目的是想反击由齐国田氏主导编写《春秋》所树立的话语权，并对田氏色彩浓厚的《公羊传》和《穀梁传》进行反驳，以证明韩国统治晋、郑之地的正当性。

平势隆郎首先引用的一个章节是《左传·昭公元年》，这一年是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也是赵武担任执政的最后一年。当年晋平公得了一场重病，人们为此进行占卜，据占卜结果说是因为实沈、台骀两位大神作祟所致。众人皆不得其要领，于是就趁子产访晋的机会向他询问。

子产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向晋人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说这个实沈是早年高辛氏（也即五帝中的帝喾）的幼子，素与兄长阏伯不和，经常互相攻击。帝尧看这兄弟两人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做主把老大迁到了商丘，也就是商人居住的地方。那里的主星是“心”宿，也即大火（天蝎座三星），所以大火星也被称为商星。而实沈则迁到了大夏，也就是后来唐国人居住的地方。大夏区域的主星为“参”宿（猎户座七星），实沈于是便成了参宿的主神。后来周公东征灭唐，将唐叔虞封到此地，因此实沈实际上也是晋国的保护神。

子产继续讲述了台骀的来历：话说早年金天氏（五帝中的少昊）有个做过水官（玄冥师）的后代叫昧，有两子，其中少子名叫台骀。台骀继承水官的职务，曾疏通汾水、洮水，修筑堤防堵住大泽，将百姓迁居到高地，后因治水有功被封到汾水流域，因此台骀也就被尊为汾水之神。原先在汾水流域有沈、姒、蓐、黄四个国家，世代祭祀台骀，后来晋人灭掉了这四个国家，也就顺带着把台骀请到自己家里来了。

话说到这里的时候，估计晋人脸上早就挂不住了。实沈是晋国的主神，而台骀又是汾水之神，他们竟然毫无所知，更别提还要祭祀这些神灵了。主神因为长年得不到祭祀，因此降灾给晋侯，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吧？但是，子产却说了，山川日月之神，只会给国家降下诸如雨雪风霜、水旱瘟疫这样的天灾，而不会对某个人进行“定向打击”，因此祭祀禳灾并不能让国君的病有所好转。

子产言之凿凿，神灵不会给个人降下灾患，可到六年后，也即晋平公二十三年（前535年）时，他很快就推翻了自己的结论。这一年晋平公再次生病，而子产又恰如其分地赶来为晋人解惑。已接替赵武担任执政的韩起向其询问，说：“寡君卧病已有三月有余，应该祭祀的山川之神都祭祀过了，可还是不见好转。如今又梦到黄熊进入寝门，这究竟是什么恶鬼？”

子产回答说：“国家有圣明的君主，又有您这样的君子担任执政，怎么会有恶鬼作祟危害国君呢？”紧接着他又介绍了黄熊的来历，说是以前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不力，被帝尧杀死在羽山，他的精灵化成了黄熊进入羽渊，成为夏朝郊祭的神灵。自此以后，夏、商、周三代对其都有祭祀，如今晋国统领天下——联想到你们之前连自己的主神都不知道——恐怕也是多年没有祭祀所导致的吧？

听了子产的这番解释，韩起便亲自到夏郊进行了祭祀，然后晋平公的病果然就好了！

六年前子产本着怀疑论的精神，认为神灵不会降灾给个人，可如今却又说晋平公的病的确是神灵所致，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又是什么缘故呢？

平势隆郎认为，《左传》通过这件事是想向受众传达一个观点，韩起在夏郊祭祀之所以能够取得奇效，是因为他从晋国公室手中承接了夏、商、周以来对夏郊神灵的祭祀。晋国继承三代余烈统领天下，而韩起则是继承了晋国的衣钵，继续保持对夏朝故地的统治，其合法性自然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就在神话系统的框架下，为后来的韩国统治晋国汾水流域的正当性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明君贤相

战国时期的韩国，其领土除了涵盖了晋国故地的一部分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郑国也即原先殷商部分区域的占领。因此，《左传》不仅要所谓大夏地区统治合法性做出诠释，对郑国主权的宣示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是与之前的方式略有不同，既然韩氏已经具备了继承三代余烈的合法性，对郑国主权的申诉便不必再过分依赖鬼神了，因此他们便创造了一个由“明君贤相”组成的特殊组合。

平势隆郎认为，《左传》对韩起其人有着很特别的关照，这一点在称谓上表现尤为明显。先秦时期，用作尊称的“子”通常有两种含义，最常见的一种是指代爵位。一些子爵的诸侯国君会以“国名+子”的方式称谓，如莒子、邾子、滕子等；地位较高国家的大夫也都是子爵，但并不会直接以“氏+子”如赵子、范子的形式称呼，而是要冠以谥号称为赵文子、范献子、韩宣子、魏武子等。第二种含义通常都是称谓那些德行高尚、有学识有涵养的智者，他们会被冠以“氏+子”称谓，比如孔子、晏子、老子。

晋国执政既非国君也非圣哲，能够安然享受“氏+子”这种特殊称谓的可谓寥寥。《左传》以如此方式称谓韩起，显然不是要将其塑造成一个圣人的形象，个中含义可想而知。既然韩起已经具备了一个明君的特征，自然需要有贤相来诚心辅佐，而担任“贤相”这个角色的，还能有谁是比郑国贤臣子产更合适的呢？

在《左传》的叙事之中，子产通常都是一个不畏强权、敢于为国家利益以命相争的人物，无论面对的人有多位高权重，他从来都不会退避忍让或者曲意逢迎。他曾在朝见晋君、会盟诸侯等重大场合与晋人据理力争，对于当世权臣的评价也极其犀利，可唯有在面对韩起的时候，这种“刺头”的个性却怎么都显现不出来了。

就比如晋昭公六年（前526年）韩起对郑国的这次访问，在举行享礼之前，子产特别下令到场的人要恪守礼仪，不得冲撞来访的客人。随后的六卿赋诗环节，包括子产在内的所有人都对韩起满是溢美之词。而后来六卿拜谢韩起的场景，犹如众臣拜见国君，这样盛大的场面在整个《左传》的叙事中是独有的——倘若这样的场景是真实发生过的，郑定公看到了不知该做何感想。

除此之外，关于此行《左传》还重点介绍了一个韩起买玉玦的故事。在平势隆郎看来，子产劝阻韩起收购玉玦的举动，其内在含义并非是说 he 不想顺从韩起，而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明，在当下这个时节里，将郑国并入韩国还为时尚早。

与此同时，子产还细细梳理了郑国的立国之本，以向其传达治理郑国的方式。这些谆谆教诲，就好像是一个臣子在教导国君治国理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景。

平势隆郎的推断或许不能够成立，但从韩起访问郑国前后的诸多表现来看，我们也很确实很难排除他已经对郑国产生野心的可能。

韩起为人贪婪，对土地财富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在其主政的最初几年里，韩起就以一种很不光彩的方式将州县控制在自己手中；后来申公巫臣的族人邢侯因专杀而受刑，其原先的封邑邢地也被韩起收入囊中。州县和邢地都位于如今的温县附近，与郑国的北部边境隔河相望。到访问郑国后的第二年，也即晋顷公元年（前525年），韩起又指使荀吴出兵伐灭“陆浑之戎”，将伊洛流域的大片土地收入囊中，而这些土地又刚好位于郑国的西南方向。

韩起的这些做法就如同是围棋布子，其家族产业大都分布在郑国的北部和西部，想要连缀成片，就必然要打郑国的主意。因此他此行的目的，从短

期来看，是在为明年讨伐陆浑的战争做准备，需要先来试探一下郑国的反应；从长远来看，则是要探查郑国内情，以为日后侵伐郑国的行动进行“可行性评估”。

从最后探查的结果来看，郑国六卿在子产的带领下团结一致，在饯行的宴会上也都赋“郑风”以表明心志，从中可见郑人对其也早有防范之心。韩起看到郑国上下一心，很难钻到空子，就只能暂时放下侵略郑国的打算，并拜谢子产赐予金玉良言的恩情，这恐怕才是韩起买玉事件的真实内涵所在吧！

第四节 反晋联盟

虚与委蛇

平丘会盟前后这段时间，既是春秋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晋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楚国爆发了蔡公弃疾之乱，国势急速衰落，使其再难对中原诸侯构成威胁。诸侯对霸主的依赖感降低，晋国屡征盟会而不得志，其对待诸侯的态度也就由原来的索取变成了敌视。另一方面，经过弭兵会盟后将近二十年的扩张，与晋国相邻的“戎狄”部族只剩下了鲜虞这块最难啃的骨头，使得晋国向“戎狄”要土地的政策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但在六卿相互竞争的环境下，大夫“求欲无厌”的现状无法在短期内得到遏制，就只能将扩张目标锁定在与之相邻的诸侯身上。可以想见的是，其中又以郑国感受到的压力最为紧迫。

陆浑被灭后的第二年，也即晋顷公二年（前524年），那是一个多事之秋。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大火星和彗星同时出现在天际，这个不同寻常的天象，让各国的预言家们都感到颇为紧张。

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彗星的出现意味着除旧布新，而当彗尾扫过大火星的时候，则象征着这次的除旧布新将会以火灾的形式呈现。鲁国大夫梓慎更是根据天文观测的结果，推断此次火灾出现的时间应当在大火星再次出现时，也即这一年的周历五月；爆发火灾的国家，也会是那些大火、祝融、大水等分野所在的宋、卫、陈、郑四国。

果然到了这年五月，中原四国相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火灾，郑国为了救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防止火灾殃及他国使者，子产还专门派人看守馆舍，禁止各国行人随意出入，又将新近前来行聘的使节劝返回国，其中也

包括自晋国投奔而来的公子公孙。与此同时，子产还打开武器库，将兵器分发给士兵，让他们登上城楼戍守，以防别有用心者趁机偷袭。

子产在灾患时刻实行的应急措施本来合乎情理，但却引发了晋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郑国强行驱赶晋国公子公孙，又分发武器加强守御，这显然是对晋国的挑衅，因此特地派人前来责难。子产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正如你们所言，敝邑的火灾，是贵国国君的忧虑。如今敝邑政事不顺而引来灾祸，又担心有邪恶的人趁火打劫，以引诱贪婪之人不利于敝邑，这岂不是在加重贵国国君的忧虑吗？如今上天垂怜没有灭亡郑国，一切都还好说；倘若敝邑真的因此灭亡，届时贵国即便是想要忧虑，恐怕也来不及了。郑国外有忧患，一切都只能依从晋国，故而从来都是一心一意侍奉，又哪敢有二心呢？”

子产的回答义正词严，其指向也十分明确。在郑国遭受火灾的这个节点上，你不派人前来表示慰问，我们也没意见，可你反过来责备我不该分发武器，这是不是也管得太多了？更何况，我们分发武器只是说要防备别有用心的人，并没有说对大国不信任，您不由分说就来责备我们，莫不是做贼心虚？

郑国发生火灾后两年，楚国太子建（子木）因受费无极陷害而出奔宋国。然而不巧的是，在宋国他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遇到了华、向之乱，无奈之下只好又逃到了郑国。在郑国居留期间，太子建受到盛情款待，可他对此却并不满足，不久后又投靠了晋国，并提出要与晋人里应外合灭掉郑国以换取一块更大的封邑。

可惜的是，太子建虽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却终究不是一个成大事的人。回到郑国之后，他丝毫都不知收敛性情，反而横征暴敛、恣意行乐，结果就

在晋国派间谍与他秘密联络的时候被人给告发了。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既然有人告发，那就要派官吏到实地查问证据，结果一不小心就发现了晋国间谍，太子建与晋人合谋的事情也就败露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晋国意欲侵略甚至兼并郑国的野心，在晋郑两国内部早已是路人皆知了。只是在形势尚未明晰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还要虚与委蛇，假装与对方和睦相处。

郑国叛晋

到晋顷公四年（前522年），在郑国执政二十余年的子产去世，接替其担任执政的游吉（子大叔）是一个宽厚之人，不像子产那般锋芒毕露。在与晋人打交道的时候，为了避免激化两国矛盾而为郑国引来灾难，也往往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王子朝之乱爆发的时候，游吉本身是不支持周敬王的，但在被问到对王室内乱的态度时，他却支支吾吾，刻意遮掩。

后来晋顷公去世，六卿忙于互相倾轧，对国君的葬礼都不怎么上心，诸侯自然也不会自讨没趣。与当年少齐和晋平公葬礼的隆重气氛比起来，如此情景总不免让人产生一丝凄凉之感。而在这哀婉的气氛当中，仍然有人坚持到晋国去参加吊唁和送葬的仪式，这个人便是郑国执政游吉。

当时担任晋国执政的魏舒本来没想到会有人来，可见了游吉之后难免也要显示一下威严，于是便责问他说：“当年悼公办丧的时候，贵国派了资历低的大夫子西前来吊丧，资历高的大夫子蟜亲自送葬，可如今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

魏舒的这一发问让游吉也感到莫名其妙。由于封建制危机的不断演化，郑国内部纷争比起晋国来毫不逊色，这就使得游吉这样一个性情温和的人，

虽贵为执政却也使唤不动其他家族的人，其在国内的地位比起韩起在晋国的地位也好不在哪儿去。尤其是他在处理晋郑关系时所坚持的绥靖态度，让国内不少人都大感不满，更使得其执政地位显得无足轻重了。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顶着国内的压力，以执政之尊完整地参加了吊丧和送葬的仪式，其规格和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然而就是这样的良苦用心，非但得不到晋人的体谅，反而还要遭人诘难，游吉内心可谓五味杂陈，满腹的苦楚不知该向何人诉说。

晋定公六年（前506年）的召陵之会后，为郑国利益四处奔忙的游吉，也终于走完了他孤独苦闷的一生，接替他执政的是一个叫驷歂的人。与游吉温温吞吞的个性不同，驷歂是一个铁腕的政治家，在对待晋国的态度方面，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硬派，甫一上任就马上以实际行动宣布与晋国彻底决裂。

这次的事件与过去的王子朝内乱还有一定的关联。王子朝之乱平定后，成周的局势并未就此安定下来，国中王子朝党羽作乱问题依旧困扰着周敬王。比如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曾追随过西王的大夫召伯盈、尹氏固和原伯鲁之子相继被杀，引发王子朝旧党的震恐，王子赵车因此据守鄆地叛乱。

晋定公七年（前505年）春，吴军入郢的消息让周敬王大喜过望，于是便趁楚人自顾不暇的机会，派人潜入楚国将王子朝秘密暗杀。这个做法又引起了王子朝党众的不满，不久之后他们就跟随着王子朝的堂叔儋翩在成周发动了叛乱。而郑国人则充当了儋翩的外援，发动大军先后攻取了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等地，同时还受晋国保护的许国给灭掉了，这就等于是直接向晋国叫板了。

对于郑人如此行事的原因，《左传》给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理由，说是在召陵举行会见时，晋人向郑国借用了装饰旌旗的羽毛，然后装在自己的旗杆顶上参会，这就让郑人大为不满，于是便背叛了晋国。

借口终归只是借口。《左传》惯于以偶然事件来为重要的国际事件定性，以一些礼仪、德行的标准来评定人物是非，却总会忽略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性。

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讲，驷歆本人与晋国也曾有过一段恩怨。事情发生在晋顷公三年（前523年），当时驷氏的族长，也就是他的堂兄驷偃（子游）去世，留下了一个幼子驷丝。为家族传承计，族内长老打算共同推举驷歆的父亲驷乞为宗主，可当晋人得知此事之后，却突然发起飙来。

驷氏确定宗主地位属于宗族内部事务，本来是跟晋国沾不到边的，但由于驷丝的母亲是晋人，他的舅家担心驷丝会吃亏，于是便派人前来责难。驷乞一听有晋人前来干预，心里就有些招架不住，吓得又是想跑路又是想跳楼，闹得家族内外鸡飞狗跳。要不是当时的执政子产有足够的定力能够吓退晋人，驷乞说不定就真出事了，驷歆也就不可能坐到如今执政的位置。

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段过节，驷歆对晋国向来没有好感。恰好他接任执政的时候，又赶上了吴军入郢这么一桩大事。这场震惊中原的大事变，不仅宣示了楚国的衰落，更意味着军事力量已经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实现了对郑国包围的晋国，将取代楚国成为郑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

正是在这些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驷歆执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游吉对晋国的绥靖政策，公然打响了反抗晋国扩张主义的第一枪。而他的这一举动，也瞬间开启了诸侯纷纷独立的潘多拉魔盒。在郑国的鼓舞下，

那些过去饱受威胁却一直不敢有所主张的国家，也纷纷举起了反抗晋国霸业的大旗，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的晋国霸业秩序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卫国叛晋

过去的百余年间，齐国每每想要挑战霸权时，都因诸侯对晋国的效忠而无法如愿。如今诸侯纷纷表现出与晋国离心离德的苗头，这就让蛰伏了四十多年的齐景公感到格外兴奋。

晋定公九年（前503年）秋，齐景公首先邀请郑定公在咸地（今河南濮阳东南）举行会盟，共商伐晋大计。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邀卫灵公、鲁定公入伙，共同组成反抗晋国的军事同盟。

与郑国的忧虑类似，作为与晋国山水相依的邻邦，卫国也是一个受晋国扩张主义危害甚深的国家。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晋国对卫国土地的覬覦较之对郑国还要早上许多年。

早在晋平公即位初年，晋国六卿便不顾舆论反对，公然袒护卫国叛臣孙林父，在接纳其封地戚邑的同时攻取了卫国西部六十邑赠与孙氏。后来有齐国大夫乌余叛逃到晋，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批丰厚的“嫁妆”，其中就包含齐、鲁、宋、卫等国的城池土地，晋国对此也都照单全收。这些土地尽管在赵武、韩起的斡旋下物归原主，但却已在诸侯尤其是卫国人心里埋下了无法消除的心结。

如今看到郑人因担心晋国的威胁而选择了背叛，卫灵公也不免心有戚戚焉，故而有心参与到这场会盟活动中来。恰好此时，鲁国季孙氏权臣阳虎为了帮晋人出气而带兵讨伐郑国，在路过卫国的时候不仅不借道，还大摇大摆地从卫都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穿城而过，让卫国人倍感屈辱。

卫灵公打算以此为由背叛晋国，怎奈国人自知武力值太低，根本经不起晋国的报复，因而坚决反对与齐国结盟。无奈之下，卫灵公只好假装派卿大夫北宫结到齐国辞谢，但私下里却安排人事先通报，让齐国抓捕北宫结并讨伐卫国，以此换来被迫与齐国结盟的假象。

眼看着卫国与齐国眉来眼去，最感到紧张的还是与卫国相邻的赵氏。晋定公十年（前502年）夏，赵氏领袖赵鞅派邯郸氏属臣涉佗、成何前往鄆泽与卫灵公举行会盟。

在这次盟会上，卫灵公特别提出要亲自操刀割牛耳。按照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春秋时会盟的规矩为“盟用牛耳，卑者执之，尊者涖之”，通常需要次盟者端着盘子盛放牛耳，是为“执牛耳”；而尊者则负责操刀，是为“涖牛耳”。卫灵公位尊而晋大夫位卑，这样的安排也并无不可，但这也就意味着卫国成了主盟国，晋国反而退居其次，又不符合以往举行会盟的惯例。

涉佗、成何只是性情粗野的武人，不知晓对方是有意挑衅，更不懂得什么外交技巧。他们当时就被激怒了，扬言说：“卫国不过就是一个和晋国温、原差不多的地方，哪里有资格跟诸侯相提并论？”说罢还很粗暴地推开卫灵公的手，牛血就淌到了卫灵公的手腕上。

堂堂一国之君受到外臣的羞辱，要是这都能不发飙那也太不正常了。卫国大夫王孙贾站出来怒喝道：“结盟是用以伸张礼仪的，我们国君亲临盟会，你们却如此行事，这个盟约还如何让人接受？”说罢就气势汹汹地领着卫灵公扬长而去。

好戏要演全套。卫灵公本来就想激发国人仇视晋国的情绪，正愁找不到借口呢，晋国的臣子就给送来了这么一份大礼，怎么可能不好好利用一下？

因此离开盟会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回国，而是驻在郊外等着国人前来慰问。每当有大夫前来，他都会声泪俱下，把涉佗、成何如何羞辱自己的经过添油加醋地诉说一番，然后再放低身段哀求道：“寡人有辱家国社稷，实在是没脸回去见列祖列宗了，你们赶紧占卜改立新君吧！不管最后选了谁，寡人都愿意服从！”

这一番苦情戏演得真叫个精彩，大夫们进退不得，只好上前解劝，说：“这不是您的错，您千万别太自责了！”

卫灵公从指头缝里看着大家伙儿急得团团转的样子，感觉火候尤显不足，于是便火上浇油：“还有更过分的呢！他们对寡人说，一定要让你的儿子和大夫们的儿子作为人质，此事才能罢休！”

卫灵公本以为用言语相激，大夫们一定会群情激愤，纷纷闹着要跟晋人掰腕子，可没想到他们依然不为所动：“如果真的有利于家国社稷，公子去就是了，臣下的儿子们哪有敢不鞍前马后效劳的？这您也别急呀！”然后就都回国准备去了。

卫灵公简直要气炸了，心说你们这群死脑筋也太不开窍了吧？我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们竟然还要服从晋国？

他赶紧找来王孙贾商议对策，王孙贾回答说：“若是卫国有难，工商业者必定也会利益受损，不如把他们都拖下水，然后再做计议。”

工商业者自然不愿意长途跋涉，因此到了出行之日，便都唉声叹气、怨声不断。卫灵公认为时机成熟，就让王孙贾振臂一呼：“如果卫国背叛晋国，晋国攻打我们五次，会危险到什么程度？”

众人都说：“五次讨伐还不足以打垮我们！”

王孙贾又问：“那我们就先背叛晋国，等到危险的时候再送人质，也不算晚吧？”

王孙贾这么一发动群众，让反对的大夫们也无话可说，大家只能遵从民意，背叛晋国。

卫国的反叛，让晋人十分窝火，于是就要求再次与卫国结盟，但被严词拒绝。这大概是百余年来最让晋人感到跌份的事情了，因此这年秋，执政士鞅便在讨伐郑国的间隙，联合鲁国对卫国进行夹击。但郑卫两国都铁了心要背叛，也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战争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反而促成了郑、卫两国在曲濮的会盟。

卫国叛晋的第二年（前501年）秋季，齐景公发兵攻打晋国的夷仪（今河北邢台西），卫灵公也带五百乘战车，准备攻打五氏（今河北邯郸西）以策应齐军。

然而让人犯难的是，卫军此行需经过中牟，而中牟（一说在邯郸与邢台之间，另一说在河南汤阴西）又有晋国一千乘的驻军，这让领军将领颇感担忧，于是就想占卜一下，看看穿越中牟是否吉利。不过，大概是由于龟甲没有处理好，到最后都烤焦了也没有出现裂痕，也就是说上天没有给出提示。怎么办呢？卫灵公说：“我军的战车相当于他们的一半，而寡人一人也能抵他们的一半，兵力相等，怕他们作甚？”然后真就大摇大摆地从中牟过境了。

卫军行经中牟之时，驻守城内的晋国将领本打算半路拦截，但被一个叫褚师圃的人给拦住了。褚师圃原本是卫国人，早年因发动叛乱杀掉了卫灵公长兄公孟縶而流亡晋国，此时也正在中牟服役。他之所以反对袭击卫军，并不是有心袒护，而是认为：“卫国虽然弱小，可因为有国君亲临，将士们斗

志昂扬，我们胜之不易。倒不如袭击齐军，齐军战胜而骄，领军元帅又地位较低，战胜他们要容易得多。”

中牟守军听从褚师圃之计放过卫军，直接对齐军展开攻势，果然就把齐军打败了，一战而缴获战车五百乘。这一仗，齐军本来是为卫国报仇而来，结果先胜后败，等于是无功。倒是卫军在卫灵公的带领下，攻破了五氏（寒氏）西北角并派兵驻守，导致邯郸大夫赵午的军队在夜间溃散，从而取得大捷。为了对卫军的胜举表达谢意，同时也笼络卫国为己所用，齐景公只好把齐国西部边境的濊、媚、杏等地送给卫灵公。

齐、卫联军侵袭晋地，攻打的都是赵氏的地盘，赵氏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因此赵氏宗主赵鞅于晋定公十二年（前500年）夏亲自带兵包围了卫国。但由于卫军闭门不战，赵军在帝丘城外盘桓良久也无法取胜，只好罢兵回国，并派人责问卫国人背叛的原因。

卫国人以涉佗、成何欺辱国君为由回报，赵鞅于是将涉佗抓了起来向卫国求和；但卫国人不同意，赵鞅又杀掉了涉佗，说这总可以了吧？卫国人看到赵鞅决心如此之大，若再不给面子也的确有些说不过去，于是就勉强与赵氏讲和，并向赵鞅进贡了五百家民户。赵鞅将这五百家暂时安置在邯郸，而也正是这卫贡的五百户，为晋国后来的内乱埋下了导火索。

鲁国叛晋

当郑、卫两国纷纷叛离晋国而投靠齐国时，与齐国毗邻的鲁国却始终不肯动摇。为了拉拢对方入伙，齐景公可没少下功夫。比如在咸地会盟前，他就将早先占领的阳关、郚地归还给鲁国，试图用温情感动对方。

然而鲁国接纳了这几座城池后，却并不给齐国脸面，惹得齐景公大怒，派国夏屡次三番出兵讨伐。鲁国人也不甘示弱，仗着背后有晋人撑腰，也三番五次入侵齐国，让齐人大伤脑筋。但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齐景公持续不懈的努力之下，机会还真让他给等到了。

齐景公向鲁国频繁施压的这段时间里，鲁国政局正处于一段不稳定时期。晋定公七年夏秋之交，季氏、叔氏两家宗主季孙意如、叔孙不敢相继去世，继立的季孙斯（季桓子）、叔孙州仇（叔孙武叔）以及孟孙氏宗主仲孙何忌（懿子）皆势弱，朝政大权落入了季氏家臣阳虎手中。

阳虎是春秋末期鲁国“陪臣执国命”的代表人物，虽出身低微，却能凭借个人能力平步青云，并将鲁定公和三桓领袖全都攥在自己手中。不过，尽管手中大权在握，阳虎还是不免要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因为他权力的取得有赖于一个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那就是三桓宗主的弱势。与此同时，阳虎获取权力的道路也充满了血腥，这就在无形中树立了不少敌人。种种的隐忧让阳虎寝食难安，生怕有一天会遭人清算，因此便想在主君幼弱之时先发制人。

晋定公十年（前502年）十月，阳虎联合了季寤（季孙斯之弟）、公鉏极（季孙宿长子的曾孙）、公山不狃（季孙斯的家臣）、叔孙辄（叔孙州仇之子）、叔仲志（叔仲带之孙）这批不得志的人，准备去除三桓势力并取而代之。按照其原计划，他们打算利用在蒲圃设享礼的机会，把季孙斯骗出并杀死在城外，然后再调集部队消灭另外两家。但由于动作太过明显，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人发现了异常。

初三日，在前往蒲圃的路上，季孙斯发现情形不妙，就悄悄策反了自己驾车的林楚，中途逃脱进入了全副武装的孟孙氏家中。阳虎的弟弟阳越急

忙追赶季孙斯，结果被孟孙氏的人射杀。眼见对方防守严密，阳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劫持了鲁定公与叔孙州仇，然后带领甲兵攻打孟孙氏，结果被其提前调集的成邑甲兵打败，不得不退守阳关和讎邑。

第二年六月，鲁人尽起大军围攻阳关，阳虎无法据守，只得逃奔齐国以寻求支援。但齐景公在鲍文子的劝说下，不但没有接受阳虎的请求，反而还将其抓了起来以向鲁国示好。看到齐国无心帮助自己，阳虎只好逃到宋国，后又几经辗转投奔晋国，归顺了赵氏。

齐景公的这一举动让鲁国人大为感动，于是便向齐国伸出了橄榄枝。双方于晋定公十二年（前500年）夏季在夹谷（祝其山，在今山东淄博博山区）举行会盟，齐景公应允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而鲁国也同意奉齐国为盟主。第二年冬天，鲁国又与郑国结盟，标志着鲁国正式背叛晋国，开始为齐景公的复霸企图服务。

宋国叛晋

诸侯纷纷表现出叛离的迹象，让晋人一时有些傻眼，他们四处捫摸了半天，发现如今能够跟自己说得上话的，似乎也就剩宋国一家了。都已经这种时候了，那也别矫情了，赶紧拉拢一下吧！可坏就坏在晋国内部倾轧不断、斗争毫无底线，以至于殃及池鱼，让宋国人也被伤透了心。

事情还要回到晋定公八年（前504年），当时郑、卫两国叛晋迹象显现，齐国意欲整合诸侯力量孤立晋国的意图也路人皆知。宋国司城乐祁为此感到忧心，便对宋景公说：“诸侯之中还愿意事奉晋国的也就只有宋国了，倘若不能及时派出使者与之联络，恐怕他们会怨恨我们。”

宋景公当时没说什么，可过了几天，却突然召见乐祁说：“我思来想去实在找不到别人了，要不就劳烦您去晋国走一趟？”

乐祁一听惊了：“呵，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您还敢让我去？”可国君执意如此，他也无法推脱，只好安排好家事之后，动身赶往晋国。

赵氏领袖赵鞅听闻有宋国使者来访，亲自出面迎接，并把他请到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介山之下）饮酒叙旧。乐祁受到盛情款待，也颇敬佩赵鞅为人，于是便奉献六十面杨木盾牌作为见面礼。

这件事看似稀松平常，可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就有些不简单了。按照乐祁家臣陈寅的说法，乐祁之前一直都依托范氏，可如今向赵氏献上礼品，就表明要改换门庭了。陈寅为此感到十分不安，认为范氏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消息传到士鞅的耳朵里，他马上就向晋定公诋毁道：“乐祁奉君命出使，还没有正式通报使命就与人私自饮酒，这是对两国国君的不敬，不能不做出惩戒！”晋定公本来就是個傀儡，你怎么说就怎么办呗，然后就把乐祁给抓了起来。

赵鞅后来为乐祁积极奔走，但都受到士鞅的阻挠，这件事就一直拖到了两年后。到晋定公十年（前502年），赵鞅实在是被逼急了，便在朝堂上怒斥：“如今诸侯纷纷背离晋国，愿意支持我们的也就剩宋国一家了。那些诸侯你好言好语相迎都不一定乐意来，这倒好，愿意来的还让你给抓起来了，这不是要让晋国自绝于天下诸侯吗？”

赵鞅话刚说完就准备放乐祁回国，可士鞅却又跑来捣乱：“我们都已经关了他三年了，无缘无故又放回去，宋国还是得背叛。”

考虑到乐祁此时已经年迈且重疾缠身，士鞅想了个变通的法子，他亲自去向乐祁道歉，并说了一段让人哭笑不得的话：“寡君担心晋宋两国关系恶化，以后不能再事奉宋君左右，因此就没让您回去。”言外之意是：您是维系晋宋两国友好的人质，身上责任重大，所以就只能受些委屈了。“如果您实在受不了这委屈，不如就让您儿子过来替代一下如何？”

听到这般蠢话，乐祁简直要气疯了，他的家臣陈寅更是怒不可遏：“万万不可！经过这么一桩事，宋国背叛晋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您要真让儿子来了，就等于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啊！您还是再等等看吧！”

眼看着乐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士鞅终究还是怕闹出人命，最后不得不将其释放。然而，乐祁终究还是没能离开晋国，在行经太行道时突然因病去世了。

消息传来，士鞅又出了一个昏招。他让人将乐祁的尸体扣留在州县，说：“有乐祁的尸体在，可以作为与宋国议和的资本。”而正是由于士鞅的这个举动，间接地引发了宋国的一场内乱，并由此将宋国彻底推向了齐国的阵营。

这场内乱的萌芽始于晋定公十一年（前501年）春季。为迎回乐祁的尸体，宋景公原本想派乐氏旁支桐门氏的族长乐大心亲自去与晋国结盟，然而乐大心却称病不去，宋景公无奈只好改派左师向巢前往。

在向巢使晋的这段时间里，乐大心每日里歌舞升平，完全没有为同宗之死感到哀伤的意思，这就让乐祁的儿子子明感到十分不满。待到向巢完成使命，子明又打算让他去郊外迎接一下，并指责说：“我还穿着丧服，您却每日钟鼓齐鸣、饮酒作乐，这是为什么？”

乐大心的回答很让人恼火，他说：“因为丧事不在我这里啊！”听了这些子明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而更让他感到怒不可遏的是，乐大心转头又跟旁人说道：“自己穿着丧服却生了孩子，我为什么不能敲钟？”

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子明难掩心中怒火，便直接去向宋景公告状，说：“右师将要不利于国！他之所以不肯去晋国，是为了准备发动叛乱，否则的话干吗没病装病？”

宋景公早被这连年不断的诸侯内乱吓破了胆，一听说有人要造自己的反，便秉持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信条，将乐大心驱逐到了曹国。

就因为几句不恭敬的话就被驱逐，乐大心感到万分冤屈，因此出逃之后一直观察着国内的局势，随时准备着要杀个回马枪。事实上，他也并没有为此等待太久。

晋定公十二年（前500年）冬，宋景公的同母弟公子辰与庶弟公子地因与向巢的弟弟司马向魑发生冲突而出奔陈国，并于次年春据守萧地（今安徽萧县）叛变。闻听消息，乐大心大喜过望，便于同年秋季从曹国返回，参与到叛乱的队伍当中来。

这场内乱持续了四年的时间，晋国由于内乱纷扰，无暇顾及宋国的乱局，倒是让齐国看到了机会，不失时机地向宋人伸出了援手。最后的结果是，公子辰兵败流亡鲁国，宋景公与齐景公则在洮地结盟，宣告了晋国称霸中原的联盟完全解体。

自此以后，一个以齐国为首，包含鲁、郑、宋、卫等中原主要国家在内的联盟基本成型，即将向晋国发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战。

第四章 霸业秩序的最终消亡

第一节 六卿关系图谱

邯郸叛赵

前文已述，晋定公十二年（前500年）时，为报复卫国侵袭五氏的战争，赵鞅亲率大军讨伐帝丘，后因战事不利，遂杀涉佗以求成于卫。卫人不敢得罪赵氏，只好勉强与其结盟，并进贡了五百家民户以表诚意，赵鞅将这五百家暂时安置在邯郸。

三年后，赵氏家臣董安于主持修建的晋阳城落成，赵鞅决定将卫贡五百家内迁，以充实晋阳的人口。邯郸大夫赵午接到命令后也未多想，就一口答应了。但等他回到封地，族内的长老们却不愿意将卫贡送往晋阳。在他们看来：“卫国之所以进贡这五百家的人口，是为了补偿邯郸、弥合与邯郸氏之间的裂痕。如果贸然将这些人口迁到晋阳，会恶化邯郸与卫国之间的关系。”

如此一来赵午不免感到为难。他已经答应了赵鞅，若是突然反悔，怕是会惹得宗主不高兴；可如果不反悔，就会得罪卫国，邯郸氏同样不讨好。怎么办呢？想来想去，邯郸的长老们琢磨出了一个自以为万全的主意，他们派人告诉赵鞅：“这事得慢慢来，您可以先让邯郸午侵袭齐国，齐国受到侵略必然会报复啊！然后我们再以防止齐国报复为由，将卫贡转移到晋阳。这样一来，您的目的达到了，又不至于让卫国人猜疑，两全其美啊！”

这个方案或许可以消除卫国人的猜疑，却无法消除赵鞅对邯郸氏的猜忌之心。于是不久后，赵午便被赵鞅召至晋阳囚禁。其随从发现情形不妙想要

进去探查情况，却被要求必须解除佩剑，其中有一个名叫涉宾的始终不肯解剑，双方一直僵持不下。

耗到最后，赵鞅干脆撕破了脸皮对他们说道：“我已经将赵午杀掉了。此事是我们二人的私人恩怨，与邯郸氏无涉。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确立新的继承人。”

涉宾回到邯郸，立刻就拥立了赵午的儿子赵稷，举旗脱离赵氏。当年六月，赵鞅指使上军司马籍秦出兵包围邯郸。赵氏内部发生了冲突，一直与赵氏有隙的范氏和中行氏便从中看到了机会。因此当籍秦奉命讨伐邯郸时，身为上军将的荀寅不仅不愿出兵助战，还反过头来与范氏密谋，准备要找赵鞅的麻烦。

得知消息后，赵氏家臣董安于十分忧心，建议赵鞅要提前做好准备。不过赵鞅却不以为然，他引用晋国的法律说：“最先引发祸乱的人应当处死。等到他们率先发难，我们后发制人也不算晚。”

董安于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因此还是固执己见，并向赵鞅保证说：“倘若真要有人追究，大不了就用我的人头来做解释，这样还可以让百姓免受战乱之祸。”

赵鞅之所以反对提前准备，是因为他知道，这场冲突积怨已久，并不是杀掉董安于就可以消弭的。正如十几年前叔游在劝说祁午时所引用的那句诗“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中，所有人都在盯着别人的错处，这就使得任何微小的冲突都不可能在家族内部得到化解。

除此之外，他还时刻铭记着郑国先任执政卿游吉在黄父会盟时提出的九条建议：“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

无谋非德，无犯非义。”也就是不要率先发动祸乱，不要依仗富贵，不要仗恃宠幸，不违背共同的意愿，不要傲视有礼之人，不要自负才能，不要反复迁怒于同一件事，不要谋划不符合道德的事情，也不要冒犯不合道义的事情。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为有所倚仗而骄矜傲慢，只能让别人疏远于你，是为取祸之道。持守为人的道义，不做违背大众意愿的事，才能取得更多的支持。

而今晋阳坚城已建成，也让赵鞅有了足够的底气抵御来自其他家族的袭击。因此当年七月，当范氏、中行氏合兵包围赵氏宫室时，赵鞅几乎未做抵抗，直接就按照预先的规划逃到晋阳固守。范、中行两家也穷追不舍，迅速调集兵力，以国君的名义包围了晋阳。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当范氏、中行氏穷凶极恶地围捕赵氏时，身处局外的智、韩、魏三卿也都时刻绷着神经，紧张地观察着战争的走向。四个月后，看到赵氏在两家的围攻下显出颓势，时任执政的荀跖才不紧不慢地找到被晾在一边的晋定公说：“国君曾诏命众臣说：‘始祸者死。’如今三卿发动祸乱，却唯独驱逐赵鞅，处罚太不公正，臣建议将他们全部驱逐。”

此时的晋定公早已是个傀儡，并无决策的权力，荀跖这么猛一恭敬起来，倒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不过，荀跖也没打算让他说什么，如此说辞不过为了取得行动的正当性，并获得仍臣属于公室的大夫的支持。在走完正式程序之后，他便伙同韩氏宗主韩不信（韩简子）、魏氏宗主魏曼多（魏襄子）裹挟着手足无措的晋定公，以讨伐叛逆的名义攻打范氏和中行氏。这样一来，一场原本发生在赵氏内部的冲突，很快就脱离了赵氏内争的范畴，蔓延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战争。

战争爆发初期，范氏、中行氏抵挡住了公室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展示出了强大的武力。但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他们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为了消除敌方势力，竟然冒冒失失地派兵攻打晋定公，这可就惹下大麻烦了。

对于以上举措，投奔在两家门下的齐国叛臣高强曾深表忧虑，也曾痛心疾首地劝说道：“俗话说‘久病成良医’，当初我就是因为攻打国君失败才逃亡的，你们怎么能重蹈我的覆辙呢？”

齐国有世卿国、高二氏，但这里的高强并非世卿之后，而是如假包换的齐国公族。高强的祖父是齐惠公之子公子祁（字子高），父亲为齐景公初年时的权臣子尾（公孙蛰），到高强一代时便以其祖字为氏，称为高氏。早年韩起访齐时，子尾让高强拜见韩起，韩起评价说高强不是一个能够保守家业的人。由于此番评价与他对另一个权臣子雅（公孙灶）的儿子栾施的评价相同，因而受到不少人的嘲笑，但后来的事实却验证了韩起的判断。

栾施、高强主政期间，因为有之前崔杼、庆封的前车之鉴，二人对陈氏有很强的防范之心，导致陈无宇多次离间栾、高两家都没有得逞。但野心家陈无宇并未就此罢手，到晋平公二十六年（前532年），他趁栾施、高强酒醉之际发动了突袭。二人病急乱投医，仓皇中直奔公宫，欲挟制齐景公以抵抗陈氏，结果遭到公室反击，只得仓皇出逃。

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对高强来说却似犹在昨日。他以自己为镜鉴来劝谏范氏、中行氏，认为攻打国君可以说是最愚蠢的决策，因为这会让他们失去国人的支持。与此同时，他还向两家主君提出建议，说：“韩、魏、智三家内部并不和睦，大可以将其各个击破，为什么要攻打

国君呢？如此一来，反倒促使他们三家团结起来，局势恐怕就对我们不利了！”

但范氏和中行氏或许是过于自负了，并未听取高强的意见，执意要与国君作对。如此一来，就激起了国内民众和中小贵族的斗志，他们紧密团结在智、韩、魏三家的周围，合力讨伐范氏和中行氏的叛逆行径。经过几天的激战，到十一月十八日，范氏、中行氏终于寡不敌众，逃亡到了朝歌。

经过四个月的坚守，赵氏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取得了另外三家的支持，从而扭转了对战初期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在韩、魏两家的主导下，晋定公赦免了赵鞅的罪行，并恢复其中军佐的职务。十二月十二日，赵鞅从晋阳返国进入新田，与国内主要势力在公宫举行盟誓，局势开始朝着有利于赵氏的方向发展了。

新旧对立

这场持续半年的混战还只是内战的第一个阶段，但却将国内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显现无遗。

按照《左传》中的叙述，晋国六卿之所以会出现泾渭分明的两个集团，源于各个家族相亲相恶的关系。其中，邯郸氏赵午为荀寅（中行文子）的外甥，中行氏和范氏又互为姻亲，故而结为一党。赵氏与邯郸氏有龃龉，韩不信（韩简子）与荀寅交恶，魏曼多（魏襄子）与士吉射（范昭子）相恶，因而韩魏两家党于赵氏；至于智氏，则是因为荀跖（智文子）有心要扶植自己的宠臣梁婴父为卿，让他取代荀寅的位置，故而站在其对立面。除此之外，范氏阵营中也有心怀不满者如士皋夷（范皋夷），他因在范氏内部不得志，于是想借此生乱并取而代之，故而与赵氏党羽亲近。

这些说法并不缺乏理据，但却有倒置因果的嫌疑。比如范氏、中行氏、邯郸氏互结姻亲，究竟是导致三家关系亲密的原因，还是因利益一致促成的结果，这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因而不能作为六卿失和进而引发战争的決定因素。要想真正搞明白这场战争爆发的内在逻辑，我们还需要回到更久远的年代，从“旧卿”与“新贵”两个联盟的范式中寻找答案。

在之前的有关章节中我们提到，在晋悼公十四年（前560年）的绵上大蒐时，晋国六卿依照各自的利益取向形成了三个互相独立的联盟，分别是以范氏、中行氏为首的“旧卿联盟”，以韩氏、赵氏为主的“新贵联盟”，以及由栾氏、魏氏组合而成的“互助联盟”，智氏则由于其宗主年幼只能依附于中行氏。

从晋悼公中后期到晋平公在位初年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旧卿联盟”一直牢牢掌控着中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居于优势地位。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对外，顺利铲除了晋国最大的公族栾氏，并借机清洗了一大批忠于公室的大夫。这一举动奠定了六卿分治的局面，不免让士匄（范宣子）感到飘飘然，于是就有“死而不朽”的骄狂情绪，但也隐隐然为旧卿家族地位的长期不振埋下了隐患。

到晋平公十年（前548年）夏秋之交，伴随着赵武（赵文子）升任为中军将，“旧卿联盟”进入了长达四十年的沉寂期。这一年，在晋国断断续续运行了半个世纪的“上军佐壁垒”被正式扫入了尘埃。接替士匄进入卿列的士鞅（范献子）在这次人事调整中只获得了一个下军佐的职位，后来还是因程郑的意外去世才得以升任下军将。而赵武去世后，在韩起的操控下，赵武时年仅三十岁左右的继承人赵成（赵景子）被推到了中军佐的职位，这就等于是阻断了荀吴（中行穆子）和士鞅上升的通道。

当然了，韩起对旧卿集团的伤害还不止于此。弭兵会盟后，但凡有对外征战事务，大都由荀吴担纲上阵，可在政治博弈的舞台上，他却总不是韩起的对手。当荀吴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时候，韩起却高立朝堂、坐地分赃，使得他辛辛苦苦打来的江山大都拱手送入了他人的腰包。

韩赵联盟以其在六卿中的优势地位不断侵蚀旧卿的利益，范氏、中行氏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他们不遗余力地破坏国家对外政策，让韩起在处理鲁国问题时总是左支右绌，其妄图恢复晋国霸业的企图自然也就难以奏效了。

但不同的是，荀吴以其讨伐“戎狄”的功业在死后仍留有美名，而士鞅给人留下的却只有贪婪蛮横的恶名。比如晋顷公五年（前521年）出使鲁国时，士鞅不顾规制让鲁国为其准备十一牢的超高规格享礼。两年后的鲁邾纠纷，他不仅从中作梗，还落井下石，向鲁国使者叔孙婼索贿，被对方好一顿羞辱。后来鲁昭公流亡国外，又是他收受了季孙氏的贿赂，使得晋国两次护送鲁昭公回国的提议都没有成行。

新老更替

史料中对士鞅的诸多指控或许未必可信，即便是照实直录，其背后的动因也未必有那么简单。但从其中透露出的讯息则是，自栾氏灭族之后，公室地位一落千丈，互助联盟分崩离析，旧卿与新贵两个联盟之间的利益冲突开始上升为这一时期晋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在旧卿与新贵对峙的这几十年里，晋国内部矛盾之所以没有演变为武力冲突，主要是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是由于在晋平公至晋顷公时期，晋国内外尚有大量剩余利益未瓜分完毕，这就在两个利益集团之间设置了一道缓冲层。再加上韩起为人懦弱

且圆滑，在他执政期间，但凡有利可图的地方他绝不放过，知道无力争取的他也懂得放手让利，这就很难让对方抓住他的把柄。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晋国正处于一段“老人政治”统治时期，除赵氏、智氏之外，其余四家的掌舵人都是悼公后期、平公早期进入卿列的“不老松”。

比如韩氏家族的宗主韩起，从悼公八年（前566年）开始进入卿列，平公十八年（前540年）担任执政，顷公十二年（前514年）才去世，其主政晋国长达二十七年，在六卿之中活跃了五十二年有余。而其刚刚掌政之时，年龄要比赵武还要大几岁，这就意味着到他去世的时候至少有八十岁了。范氏家族的士鞅，其进入卿列的时间虽要晚到平公十年，但其在军中任职的时间却可以往前追溯到悼公十五年（前559年）的迁延之役，而他去世的时间则要晚到晋定公十一年（前501年）以后，在政坛活跃的时间将近六十年。其余中行氏、魏氏的族长荀吴、魏舒皆年岁不可考，但在政坛活跃的时间也至少有四十年，去世的时候恐怕也都七十岁上下了。

政坛老人在处理内外事务时相对保守持重，他们既不会轻易引发激烈的冲突，也很难让旁人抓到把柄，这就使得晋国内政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但到顷公末期到定公初期（前512年前后），六卿家族开始进入了一个密集换代的阶段。

首先是在晋顷公八年（前518年）前后，中军佐赵成、上军将荀吴相继去世，其后继者赵鞅（志父，赵简子）、荀寅（中行文子）先后进入卿列。晋国的六卿序列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终于又迎来了一次调整，从而形成了新一届六卿序列：

韩起、魏舒，士鞅、荀跖，赵鞅、荀寅。

四年之后，到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在目睹了祁氏和羊舌氏的覆亡之后，主掌晋政二十多年的韩起（韩宣子）终于谢幕。据《史记》记载，接替其主掌韩氏的是他的儿子韩须（韩贞子），在任期间将韩氏的都邑迁居到了平阳（今山西临汾）。韩须去世后，其子韩不信（韩简子）继立，但具体更立的时间已无从考证。而晋国正卿的位置则落到了魏氏宗主魏舒（魏献子）手中，六卿再次循序递进：

魏舒、士鞅、荀跖、赵鞅、荀寅、韩不信。

到晋定公三年（前509年）春季，魏舒在大陆泽（巨鹿泽、广阿泽，在今河南获嘉一带）田猎期间去世，其孙魏曼多（魏襄子）继承其位，六卿次序又变动为：

士鞅、荀跖、赵鞅、荀寅、韩不信、魏曼多。

晋定公十年（前502年），士鞅在扣留了宋国大夫乐祁的尸体之后，又亲自带兵救援鲁国，并联合周、鲁讨伐郑国，此后便不见于史料。其子士吉射（范昭子）进入卿列：

荀跖、赵鞅、荀寅、韩不信、魏曼多、士吉射。

至此，之前的“老人集团”全部被子代甚至是孙辈的人替换，晋国六卿政治再次进入了一个朝气蓬勃但又风险剧增的时代。而与此同时，晋国对内完全瓜分了公族枝叶剩余的土地，对外扩张又达到了极限，再加上楚国的衰落导致国际政治云谲波诡，以齐国为首的反晋同盟开始聚集，这种种变数都让晋国内政隐现出深刻危机，这也是范氏、中行氏之乱爆发的大背景所在。

泛新联盟

晋国内部的权力划分是一个复杂的结构，除了常年针锋相对的范、中行、赵、韩四家之外，魏氏和智氏也是两支不容小觑的力量。如今既然内战已经爆发，他们定然不会坐视不理，而他们的参与又对战局的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幸的是，由于范、中行氏近年来的骄横作风，使得魏氏和智氏跟“旧卿联盟”产生了不少矛盾。

先说魏氏。

魏氏与中行、范氏的矛盾也算是陈年旧账了。在晋悼公后期形成的三个利益集团中，魏氏因受排挤一直无法晋升，故而对另外的五卿多多少少都有些怨恨。在后来范氏驱逐栾氏的战争中，魏氏原本与栾氏相互扶携，可就在战争爆发前，士鞅突然来了个单刀直入，挟持了魏舒，逼迫其放弃了栾氏。尽管魏舒以此换得了曲沃这座大邑，但校场被劫事件终究成了他背负一生的耻辱，这也就为魏氏与范氏关系的持续恶化埋下了伏笔。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魏舒接替韩起成为晋国执政。上任伊始，他就与荀跢一起主导了“剪除公族枝叶”的行动。在祁氏、羊舌氏灭族后所划分的十个县中，魏舒将其中四个县封给了韩、赵、魏、智四家的余子，唯独没有对范、中行两家的余子进行封赏。书中虽未记载两家人的态度，但由此产生的怨念可想而知。

另外，魏舒执政时期还发生了一起“铸刑鼎”事件，按照《左传》的分析，这件事是中军佐士鞅指使荀寅“干上命”所为，而参与铸刑鼎的赵鞅则是被迫裹挟其中。当此之时，范氏、中行氏恶意违逆上命，违背的实际上就是魏舒的命令，从中也流露出范氏、中行氏对时任执政魏舒的轻蔑态度，其关系自然不会太融洽。

更能反映魏氏与范氏矛盾的，还有魏舒死后士鞅“去其柏椁”的事件。

王子朝之乱平定后，周王室担心其余党继续为乱，于是就委托晋国主持扈之会，召集诸侯抽调士卒戍守成周。但或许是诸侯戍守成周时不肯用心，到晋定公二年秋季（前510年），周王室再派大夫富辛、石张到晋国去，请求修筑成周的城墙。

范氏与刘氏世代婚好，因此也乐于为其说项。当年十一月，在士鞅的劝说下，魏舒带着韩不信、士弥牟等人亲赴成周，在狄泉会盟诸侯。一切布置妥当之后，他将具体任务都交给了韩不信处理，而自己则跑到大陆泽去放火打猎。结果到第二年春季，魏舒在打猎完毕回程途中竟突然去世了。

魏舒死后，士鞅继任为执政。在主理丧事时，士鞅认为魏舒未能完成使命就跑去田猎属于失职，于是就撤去了其棺木外的柏木椁以示惩戒。继任执政惩戒已经去世的前任，这在晋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表明两家之间的矛盾早已不可调和。

我们再来看智氏。

智氏与中行氏的交恶，在史料中并没有太多的说明。我们只知道他们原本是同宗，两家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比之赵氏和邯郸氏还要亲近不少。晋景公时期，中行氏的创始人荀林父（中行桓子）执政时，着意提携他的弟弟荀首（智庄子）进入卿行，从而开创了与中行氏并驾齐驱的智氏家族。

在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智氏家族的发展可谓充满艰险。而尤其让人感到揪心的是，是第二代宗主荀罃（智武子）去世后，智氏先后有两代宗主荀盈、荀跖都是年幼而立。这其中荀盈出生于晋悼公八年（前566年）左右，出生后不久其父荀朔就英年早逝了。到晋悼公十四年祖父荀罃去世时，荀盈（智悼子）不过六七岁的样子，因此不得不依附于当时中行氏首

领荀偃（中行献子）。荀偃去世后，又是在荀吴（中行穆子）的扶持下，荀盈才勉强保住了在六卿中的地位。

待到荀盈长大，智氏总算迎来了复兴的曙光。然而不幸的是，晋平公二十五年（前533年），年仅三十三岁的荀盈在赴齐迎亲途中去世，又把偌大的家业留给了尚年幼的荀跖（智文子）。彼时晋平公又动了置换智氏的念头，在这样一个危难关头，又是荀吴扛起了保护智氏的重任，直到荀跖长大成人。

从以上的这些经历来看，智氏和中行氏本就同出一脉，且智氏家族因中行氏而兴起，又因中行氏而得以发展存续。若不是中行氏的保驾护航，智氏家族能否安然走过这近百年的历程恐怕都是个未知数，当其有朝一日发展壮大，也该对中行氏有所感念才是。可令人费解的是，到荀跖执掌家业的时候，两家的关系竟然急转直下。

这种矛盾最晚到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就已经有所显现。当时荀跖一手导演了祁氏、羊舌氏的冤案，而后执政的魏舒则主导了后来瓜分土地的进程。在当时瓜分的十个县中，魏舒没有给范氏和中行氏余子分封，却偏偏给了智氏，可见彼时荀跖就已经开始向赵、韩、魏靠拢，而与同为本宗的荀寅日渐疏远。

这种嫌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剧，以至于到十几年后范氏、中行氏之乱爆发时，两家人竟至于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左传》只是含糊其词地提到，荀跖宠信梁婴父，想借此机会将其推入卿列，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在有限的资

料中，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因而也只能凭借对人之常情的理解，去做一个简单的推断。

在君主制下，君主寿命的长短对于家国兴衰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近处看，晋国君权的速衰便与君主寿命过短密不可分；从后世看，东汉王朝的疲靡不振也与居帝位者长期年幼有着莫大的关联。智氏先后有两代宗主年幼而立，对其宗族的长远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好在彼时的智氏还有一门显赫的亲戚，在中行氏精心呵护下，智氏才在两代幼主的领导下不至于被边缘化，也避免了在后来的卿族瓜分土地的狂潮中被其他家族所灭的命运，顽强地延续了下来。

与此同时，历史的实践也往往证明，年幼即位的君主与辅政大臣之间的关系素来都不会太融洽。尤其是当保傅过于强势的时候，更容易激发君主的逆反心理，其对于幼主管教得越是严苛，等到帝王成人后自己的命运也就会越悲惨。荀吴与荀跖之间的关系虽与之不同，却也有着很强的可比性。

在晋国内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稍一不慎就会导致满盘皆输，因此卿族的家长必须要有过人的智慧和勇力。荀吴在战场上是智谋过人的常胜将军，在其家中也是说一不二的政治强人，在对荀盈、荀跖父子言传身教的过程中，难免会对其望之深而责之切，从而激起智氏少主的逆反心理，这也是智氏与中行氏反目的心理基础。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个设想。春秋末期各国卿家之间互相兼并蔚然成风，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各国内部斗争的结果必然是走向“田氏代齐”那样的结局，“三家分晋”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斗争的结果是万宗归一，中行氏和智氏就算是都活到了最后，也总要合二为一，那么就不如趁着中行氏强、智氏弱的机会，提前实现两家和平

归一。如此一来，就可以让荀氏家族保持更加旺盛的竞争力，显然要比各自为政、被人各个击破要好得多。

但对于智氏来说，他们显然不希望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在这样一个博弈过程中，中行氏越是强横，智氏的反抗情绪也就越激烈。尤其是到荀吴去世后，继任的荀寅为人贪婪而蛮横，使得荀跖对其更是厌恶，两家的关系也就越来越远了。

不论是以上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其最后的结果都是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景象：原本属于旧贵族集团且正把持晋国执政位置的智氏，在关键时刻反而倒向了赵氏所属的阵营。如此一来，赵氏、韩氏以及魏氏、智氏四卿就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在本书中姑且称之为“泛新贵联盟”。这对于范氏和中行氏来说，的确不是什么好消息。

逼反邯郸

在厘清了六卿之间的关系后，仍有一个问题至今依然无解：邯郸氏和赵氏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以至于赵鞅在明知其他卿族会干涉的情况下，还非要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来挑起冲突呢？这难道仅仅是由于赵鞅和赵午之间的个人矛盾引发的意外事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虽然无法从史料中确切地找出二者冲突的真实原因，但从中行氏与智氏交恶的分析中，也能粗浅地窥见一些隐含的逻辑。

按照本书所采用的观点，赵氏家族在晋献公时期出现了赵夙、赵衰两个兄弟，其中赵夙为长，赵衰为幼。赵夙早年随晋献公出征灭国被授予耿大夫之职，但后来因赵衰随公子重耳流亡成为国之重臣，赵氏大宗的地位便落到了赵衰一系，而赵夙一系则沦为侧室，后来又因受封邯郸而别为邯郸氏。

赵衰去世后，其子赵盾以跋扈手段集中权势，并有心栽培赵穿为卿；而赵穿也投桃报李，处处维护赵盾的地位，甚至不惜犯下弑君的罪行，这段时期是赵氏大宗与邯郸氏最为和睦的时期。

晋景公即位后，继承赵盾地位的赵朔早逝，其子赵武又年幼不能主政，导致大宗内部爆发了激烈冲突。赵庄姬通过发动下宫之役消灭了争夺大宗地位的赵同、赵括，但由此也导致大宗势力衰弱。邯郸氏第四代领导人赵旃本已出任卿职，但大约也是受此影响，在晋厉公时期被排挤出卿的行列。而与之相比，与中行氏同出荀氏的智氏家族却飞黄腾达，渐渐地稳固了在六卿中坚不可摧的席位。

每念及此，邯郸氏的后人恐怕多少都会有些怨念，其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萌发了。尤其是结合《左传》提供的线索来看，邯郸赵午是中行氏荀寅的外甥；而在通常的世系记载中，赵旃生赵胜，赵胜生赵午，从中可见邯郸氏与中行氏的联姻很可能就发生在下宫之役后大宗最为弱势的时候。

晋悼公在位时期，赵武再次被选入卿列，之后又在韩厥、韩起父子的扶持下渐渐复兴起来。但特殊的发展路径也带来了特殊的挑战，摆在赵武面前的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险峻道路。一方面， he 需要积极扩充力量以应对其他家族的挑战；另一方面，又必须要下大力气整合原有的力量，将沉重的历史包袱转化为真正能促使赵氏前进的动力。而在这诸多难题中，如何将本就具有一定独立性且又产生了分离倾向的邯郸氏收拢回来，就成了摆在他案前的一道重要且棘手的难题。

然而遗憾的是，赵武在政坛活跃的时间虽说长达三十年，但除去他在位初期的幼弱和晚年的昏聩，真正能够着手处理家族事务的时间并不多。至其

去世之后，其子赵成又严重缺乏存在感，在任上只待了二十年就将家业丢给了赵鞅。而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荀吴故意放纵鼓国叛乱随后又将其授予邯郸氏大夫涉佗镇守的事情。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窥见，中行氏与邯郸氏之间的亲密关系似乎并未中断，而赵武对邯郸氏的拉拢也显然没有产生持久的成效。

赵鞅即位初年，国内政局走向不明，自身地位也不够稳固，因此尽管知道邯郸氏与中行氏过从甚密，却也只能将这种不满压在心里。但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无论是在晋国朝堂上还是在赵氏家族内部，赵鞅的地位都已不可撼动。尤其是当士鞅去世后，赵鞅在六卿中也已升任为中军佐，这就使得他有了足够的底气来一举解决悬置多年的邯郸氏问题了。

也正因为如此，当卫国显现出叛晋的苗头时，赵鞅“意欲摧辱”卫灵公，才故意派从属于邯郸氏的涉佗、成何去与卫国举行会盟，其中显然也包含着离间邯郸氏与卫国关系的用意。而当卫国坚决叛晋不肯回头时，赵鞅又二话不说杀掉了涉佗以求成，似乎也是有意削弱甚至激怒邯郸氏。

由是观之，赵鞅恐怕一早就打定了要清理邯郸氏的决心，营建晋阳城、索要卫贡五百家都是计划中的一环。既然此事蓄谋已久，无论到最后赵午是否如期交付了卫贡，赵鞅都能找到新的借口。这是导致邯郸氏与赵氏交恶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 季世药方

子产刑书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末期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方位变革的时代，探讨有关赵氏与邯郸氏之间的冲突，还应该结合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来综合考量。

伴随着诸侯国君地位的衰落，整个中原的政治经济版图被骤然撕裂，各国都相继进入了一个大夫裂土分治的时代。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同时也为了避免以下克上、以臣逼君的悲剧在家族内部重演，这些掌握了国家大权的世卿家族纷纷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变革。其中最鲜明的变革，是国家的治理逻辑从“礼治”向“法治”的转变。

中原大地有记载的成文法典最早诞生于郑国。晋平公二十二年（前536年）三月，执政子产（国氏公孙侨）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刑书铸刻在刑鼎之上。这在中原大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习惯了礼法制度的旧贵族无法接受刑书的颁布，便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反对意见。

比如晋国大夫士文伯就以天象做出预测，说：“大火星出现的时候，郑国恐怕会发生大火灾了吧？如今大火星还没出现，他们就使用火来铸造刑器，将容易引起争论的法律铸刻其上。大火星如果象征这些，那不引起火灾还能表示什么呢？”

更早的时候，子产仿照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的先例，在郑国“作丘赋”，当时就有国人诽谤说：“他的父亲死在大路上，他自己又做了蝎子的尾巴，还在国内发布命令，这是要将国家引向何方？”

浑罕（子宽）将这些话告诉了子产，子产十分坚决地回应说：“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我个人的生死又何足挂齿？而且我听说，做好事的不改变其法度，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百姓不能放纵，法制不能更改，我既然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就不会再退缩了。”

意外的是，听到子产的豪言壮语，浑罕竟然丝毫都没被感动到，反而叹息了一声：“国氏恐怕会先灭亡吧！君子以凉薄之心来制定法令，尚且还会引发贪婪；而如今以贪婪之心制定法令，后果又会如何呢？”他同时还预测说：“郑国一定会在卫国之前先灭亡，因为靠近大国而没有法度。政策不遵循法度，反而任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百姓的诉求各不相同，又怎么可能尊敬上位之人呢？”

在这众说纷纭的反对声浪中，晋国大夫叔向（羊舌肸）的意见最富有理性，同时也更符合儒家的传统观念。在寄给子产的一封信中，叔向开门见山就表达了他对子产的失望情绪：“起初我曾对您寄予厚望，可如今看来还是太乐观了。”

接着他陈述了自己反对成文法的理由：“先王之所以要以事之轻重而不是刑律来裁定罪行，是因为担心百姓有争斗之心。可即便如此，还是不能制止犯罪，因此就以道义来预防，以政令来约束，以礼仪来引导，以信用来维持，用仁爱来奉养，然后制定爵禄官位来勉励顺服之人，严厉地判断刑罚以威慑放纵之人。”

而为了引导人们向善，先王又采取了一些教化的工具：“用忠诚来教诲百姓，以奖惩来引导他们，教会他们专业技艺，然后和悦地使用他们，严肃地俯察他们，威严地管理他们，用坚决的态度判断他们的罪行。同时还要访

求聪明贤能的卿相和明白事理的官员、忠诚守信的乡长、慈祥和蔼的老师，由此才可以驱使民众而不至于引发祸乱。”

上下有别，尊卑有序，一切按照等级秩序有序运行，这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样子。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上位者掌握着民众的生杀大权，判断一个人是非对错的法度规则是贵族的私器，必须像珍宝一样绝不外露。民众因为不知道法度的宽严界限和上位者的偏好，就会产生一种“天威难测”的恐惧感，从而在做出任何行动之前都必须“自我审查”。上位者政策宽松，便是对民众的恩赐；上位者政策收紧，民众也不敢抱怨。如此一来，天下百姓便只能每日战战兢兢，丝毫不敢逾矩，社会才能得以安定。

有鉴于此，叔向指出了公布刑法的危害：如果百姓知道有了明文法律，官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会丧失，那些犯了罪的百姓就会摘取法律条文中的规定，一字一句地挖掘其中的漏洞，好让自己免于惩罚，由此也就产生了争斗之心。如此一来，百姓就会只注重法律，而对上级的官吏缺乏尊敬。官员失去了体面，触犯法律的案件会日益增多，贪污贿赂的行为也会日渐盛行，国家还将如何治理？

他还向子产列举了三代失德的往事，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三部刑法产生的背景都是王朝的“叔世”，是不足以效仿的。

叔向因此痛心发问：“我听说，国家将要败亡的时候，必然会制定繁复的法律。这些道理您不是不懂，可为什么偏偏要设置毁谤政事的条例，制定多种法律条文，还要把这些律则铸刻到鼎上呢？我实在不理解，您难道就准备用这样的办法来安定百姓吗？我所担心的是，如果像您这样搞下去，郑国恐怕迟早有一天会在您的手中走向衰败。”

最后，他还是再次对子产寄予了厚望，故而引用《诗经》中的话说道：“只要肯效仿文王的德行，就可以安抚四方，获得万邦的信赖。我希望你尽早回头，废除这祸国殃民的法律，也好让您的子孙后代能够在郑国长享禄位。”

正如叔向信中所言，三代制定刑法的背景都是因为国家的衰败，但叔向在这里却倒置了其中的因果。他所列举的这些要素或许是事实，但在成文法典颁布之前，那些乱象就已经频繁发生了。刑法是为了应对衰至的世道人心而出现的，而并非是因为制定了刑法所以才导致了秩序的混乱。

春秋末期政治失序，国内贪虐横行，这是叔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他也曾倡行礼制，可最后努力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他祁氏、羊舌氏无故受冤。即便不颁布刑法，这样的悲剧就能够避免了吗？既然原本的礼仪规则无法约束人心，如果还不改弦更张创制新的规则，难道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所谓“乱世用重典，重病下猛药”。子产作为郑国的执政，不可能像叔向一样只是躲在六卿的背后袖手旁观，抑或在书斋里做理论上的推演。他必须在现实世界里直面当下的乱局，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去改变混乱的世道，以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承担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要为这个乱世开出一个药方，不管这个药方最终能不能产生疗效，能不能挽救日益衰败的郑国，总要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

因此，在回复叔向的信中，子产说道：“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但侨身居要职又才德有限，无法做到事事周全，所以不能惠及子孙。如今世道纷乱，侨实在想不出救世的办法，只能尽力而为。尽管我的做法会让您感到失望，但还是希望您能够给予支持，侨定当不忘您的大恩！”

邓析竹刑

刑书颁布之后，郑国内部接连不断的乱象的确有所收敛，但叔向信中所提到的弊端也开始显现。这主要是因为，早先的刑法属于贵族的私器，只要百姓不知道其判断的依据，即便刑法不够完善也不会引起争执。可刑法一旦公布，就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其中的漏洞自然就会显现出来。这时就有一名普通大夫勇敢地站在时代的前端，以实际行动来为漏洞百出的刑法“打补丁”，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律师”——邓析。

子产公布刑法之初，邓析就从中看到了机会，从此以后专门研究刑法的漏洞，并借用这些漏洞帮人“打官司”。邓析思维敏捷，善于巧辩，针对同一个案件，引用相同的法律条文，竟然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种极富诡辩色彩的逻辑思辨开启了刑名学说的先河，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申不害、韩非等人，都是刑名学说的集大成者。

刑名之学的核心是探究形体与概念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其方法论又可以概括为“循名责实”四个字。古人认为万事万物必有其名，人们可以根据事物的外形来确定名称，反过来也可以根据其名称来验证其外形，以考察其是否“名实相符”。

儒家学说也倡导“正名”，比如孔子就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应该名实相符，国君有国君的样子，臣子有臣子的样子。但到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君被驱逐了没有人纠正，大夫僭越了国君甚至天子的礼节也无人敢于约束。对于这样一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世道，孔子一直高声疾呼要“克己复礼”，但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刑名学家”肩上了。

在当时的法律专家看来，想要让社会生活回归正常轨道，就需要辨析名与实之间的关系，然后以国家的强制力来督促君臣上下履行其原本应该遵守的权利义务关系。不管你是“四世三公”的权贵家族也好，是“藿食衣褐”的平头百姓也罢，都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名和实来行事，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礼法约束力不够而引发的种种乱象。早年晋文公时期出现的“执秩之官”，从其职能上看，就是为达成这一目标而设立的。

郑国“成文法”颁布以后，邓析凭借着他敏捷的思辨能力，将“循名责实”的方法论运用到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一时间声名大噪，郑国但凡有打官司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他前来充当“辩护人”。因为要打官司的人太多，邓析一个人忙不过来，干脆就开坛讲学，搞了一个“律师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律师”。这些“律师”集合在一起，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纵横捭阖，搞得郑国有司几乎都运转不下去了，这就给子产的法治改革带来了空前的危机。

当然了，邓析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操的贵族，他的理想是要构建一个比子产刑书更加具体且宏大的法律体系。通过多年的司法实践，他凭借着手掌握的丰富的诉讼案例，起草了一部新的法典。这部法典所涉及的条文比子产的刑书更加详尽，其法律思想也更加激进，其逻辑也更经得起推敲，因为它最初是刻在竹简上的，因此被人称为“竹刑”。

事情搞到这一步就有些不好收场了。要知道，子产虽然公布了刑法，并且让渡了“司法解释权”，允许人们请“律师”，可好歹“立法权”还掌握在国家手中。邓析私造竹刑，公然挑战国家“立法部门”的司法权威，侵削国家的“司法主权”，这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因此到晋定公十一年（前501年），也就是成文法公布三十年后，在郑国法律界有着崇高威望的邓

析就被新任执政驷歠杀掉了，但他所编制的“竹刑”却被保留下来，被当作新的刑法典继续使用。

晋作刑鼎

在晋国，以叔向为代表的旧贵族是反对成文法的中坚力量。而伴随着叔向的谢幕，守旧势力因受到六卿的打压而渐至凋零，晋国成文法典的公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晋顷公十三年（前513年）冬，也就是六卿“剪除公族枝叶”后的第二年，晋卿赵鞅与荀寅在汝滨筑城，其间他们向当地百姓征收了一鼓（约四百八十斤）铁，用来铸造了一个巨大的铁鼎，并将士匄（范宣子）创制的刑法刻在上面，公之于众。

就如同当年叔向反对子产一样，晋国公布成文法的举动也引发了各国的广泛关注。据说孔子就由此哀叹说：“晋国估计就要灭亡了吧！他们本应该遵守唐叔虞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行为准则，卿大夫依照各自的位次来维持法度，保证贵贱尊卑不致混乱，百姓才能尊敬上位者，贵族们才能保守他们的家业。贵贱的差别没有错乱，这就是所谓的法度，晋文公也正是以此设置了‘执秩之官’、创制了‘被庐之法’，从而成为诸侯盟主。如今他们却抛弃了唐叔虞和晋文公的法度，将刑法铸刻在铁鼎之上公之于众。百姓知道了法律的规则，还如何去敬重这些上位者？贵人们还如何保守家业？贵贱没了次序，还怎么治理国家？”

孔子的这番感叹与叔向的说辞大体相同，表达的意思无非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当百姓敬畏上位者，国家才能保持安定团结。而刑法的公布则打破了原先的等级秩序，让高高在上的大夫与普通民众居于近乎平等的地位，贵族便失去了对民众生杀予夺的特权，国家必然大乱。

针对刑鼎上所刻的“范宣子之法”，孔子也同样提出了批评，说这部刑书是脱胎于“夷之蒐”时所创制的刑法，而“夷之蒐，晋国之乱制也”，是破坏礼乐秩序的乱法，是晋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怎么可以把这样的刑法当作常法呢？

这里提到的“夷之蒐”，指的是发生在晋襄公七年的那次人事调整，以赵盾、狐射姑为首的贵族联合抵制晋襄公的人事调整计划，使得晋国大权落入卿大夫之手，开启了赵盾执掌晋政的时代。这一年，赵盾主导编制了新的刑法，就是所谓“赵宣子之法”，这部法令并不遵从唐叔虞早年的法律精神，也与不久前晋文公时制定的“被庐之法”有显著的差异，其主旨大体上是在为私家利益保驾护航。晋国世卿家族的坐大以及公室地位的衰落，都与这部法典有脱不开的干系，显然不符合孔子所倡导的周礼精神。

赵盾死后，晋国内部矛盾开始隐现，晋景公派遣出自法律世家的士会（随武子、范武子，范氏得姓始祖）访问成周，让他依据周礼精神重新修订法律，编制了更加符合公室利益的“范武子之法”。但这部法律并未能解决公室与私家的矛盾，反而使得晋国内部冲突更加激化，甚至还导致晋厉公死于非命。晋悼公回国后，又让士渥浊（士贞子）担任太傅，再次修订法律，调和了原先两部法律中公室与私家的关系，国内矛盾才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短暂局面。

但我们知道，晋悼公复霸成功后，大夫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公室，公室地位下降已成定局。特别是在栾氏灭族之后，六卿各自为政，晋平公以乐愠忧，甚至连晋平公的母亲也自成一系。国内派系林立，民众无所适从，一时间整个晋国进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社会治安陷入瘫痪。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了应对国内的乱局，士匄（范宣子）又以“赵宣子之法”为底本，创制了所谓的“范宣子之法”。

子产与范宣子所制定的法令虽然名为“刑书”，但其中规定的并不仅仅包含“刑法”的相关内容，也有不少关于民事以及产权界定的条文。比如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就提到了子产为政的诸多举措，其中就有一项“作封洫”，便是对划定田土边界做出规定。这项政策是在其进行农业、税制综合改革，也即“作丘赋”时开始施行的，到“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时又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被确定了下来。“范宣子之法”作为一部脱胎于“赵宣子之法”的法典，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少保护私家利益的法律条文，对私有产权的确认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于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贵族来说，天下土地莫不归于天子所有，无论是子产的刑书还是范宣子之法，其中涉及私有产权的内容都是应该予以坚决反对的。在他们看来，各地的诸侯和封臣不论以何种手段获得土地，都必须得到上级领主的认可，即只有经过了封土授民的仪式，才算是正式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获得封地的诸侯和大夫，都必须要保持对上级的忠诚，听从领主的征召，定时向领主缴纳贡赋和提供人力资源。如果封君表现出了对领主不忠诚的行为，或者因其他原因而遭到处罚，领主甚至可以将封地收回，转封他人。

这种在礼制上约定俗成的规则，随着权力的下移越来越流于表面。比如西周末年天子失势，天子名义上仍可以支配天下所有的土地，但已经失去了执法的能力，只能任由诸侯肆意兼并，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诸侯手中。而到春秋末年诸侯失势，这种所有权自然也就顺势转移到大夫手中，诸侯再也无力对这些私家土地行使所有权。因此到这个时期，不通过国君而私下处置土地的事件便屡见不鲜了。

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已然开启，那些原本礼法框架下的土地最终所有者，上至天子、下至诸侯，都无法对大夫争夺土地和私相授受的行为进行干预。

但问题是，大夫对土地所有权的占有只停留在事实层面，是缺少法律依据支持的。若要想巩固他们对土地的合法占有，并在将来的土地纠纷中有所凭依，就必须有与之配套的法律来进行确认，这也是范宣子之法乃至子产刑书产生的一个基础。

履亩而征

当土地私有制成为现实，与之配套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税赋体制的改革也就成了题中之义。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竹简《吴问》，就对晋国六卿土地改革的具体形式进行过概括。

在这篇问答式的材料中，吴王阖闾对晋国的政治走向很感兴趣，于是就向孙武询问：“晋国的六卿谁会最先走向灭亡，谁又能活到最后呢？”

孙武给出的答案很明确：“范氏、中行氏会最先灭亡，智氏为次，韩、魏再次，而赵氏则会笑到最后，成为晋国的主人。”

孙武的主要依据是当时六卿各异的经济制度。依照西周时的旧制，一亩大约等于一百平方步，也就是宽一步、长一百步的土地为一亩。范氏、中行氏在传统的百步一亩的基础上稍作改良，以一百六十步为一亩；智氏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以一百八十步为一亩；韩、魏两家则更进一步，以二百步为一亩；而赵氏最为大胆，是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与此同时，孙武还指出了六卿家族税赋制度的差异。这其中，赵氏不向农户征税，故而无法从这些分授的土地中获取收入；而其余五家则都采取了五税一的固定税率。

按照当时的授田制度，一个成年男子可以获得一百亩的土地。在授田数量一定的情况下，亩制越大就意味着百姓获得的土地越多，公家所掌握的土

地也就越少。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百姓获得的土地越多就意味着越富有，这样很容易就能吸引附属于其他家族土地上的百姓前来投奔。

这样的政策看似不可想象，但若联想到齐国陈氏的“小斗进、大斗出”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赵氏之所以敢于如此行事，其目的与陈氏是一致的，都是试图通过让利于民的手段，最大限度地争取民心民力、获取竞争优势。

以公家的富裕程度而论，范氏、中行氏显然更加富有，智氏次之，韩、魏再次，而赵氏则最为“贫困”。这种做法看似是降低了赵氏的竞争力，但若从长远考量，却有着天大的好处。

在孙武看来，公家富有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使得主君志得意满更加骄横，难免就要多养门客追求排场；大臣们也会放纵奢侈，为了获取军功屡屡鼓动主君发动不必要的战争。这些做法都会进一步加重百姓负担，是自取败亡之道。因此，赵氏虽然贫困，但若是能够一直执行当前的制度，就一定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从以上分析来看，晋国六卿尽管为政风格差异巨大，但都在推行以大亩制和“履亩而征”为主要形式的综合改革。这既是晋国内部高度紧张的竞争环境倒逼出来的必然结果，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

从生产力角度来分析，西周以前的历史时期，由于农业生产大量依赖骨、蚌、石、木等原始农具，农业开发效率低下，生产时必须投入大量人力共同劳作，由此也就形成了以“井田”为主要形式的早期集体农庄。而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低效率的井田制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自晋惠公“作爰田”以来，晋国的私有经济就已经逐步开始推行。但由于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官员的薪酬仍有赖于食封，这就使得在实际发展进程中，小农经济真正取代集体经济尚缺乏技术条件和制度基础。

而到了春秋末期，由于不少世家大族如叔向提到的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氏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原先依附于这些大家族的旁支侧室失去了荫蔽而“降在皂隶”。这些拥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社会群体的出现，为职业官僚和技术官吏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同时也为废止井田制下的助法、改行按亩征收实物税的新制度创造了条件。

县郡体制

职业官僚队伍的发展壮大，还带来了另外的收获，那就是使得县郡制度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早在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在不断发展与斗争中都充分认识到封建制的危害，因此也探索出了不少制度设计来规避其中的缺陷，县郡体制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萌芽的。

县制最早发源于楚国，最初设置的目的是巩固新占领的土地和民众。这些位于边境上的土地，常常由于民众不服或者他国侵扰等原因在列国之间来回易主，因此很难将其作为世袭采邑分封给有功勋的大夫。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当时的人们就将这些新获得的土地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管理、调遣县尹或县大夫。

县大夫在辖地内可以调遣兵将，也可以收取食封，但并不享有县邑的所有权，可以有效避免土地在大夫手中过度集中，因此受到广泛青睐，成为一

种为君主集权保驾护航的新型政治制度。正是由于县制得到了严格实施，楚国才能在春秋公室俱卑的潮流中独树一帜，避免了君主权力为卿大夫侵夺的命运。

楚国设县后不久，晋国也于晋献公时期开始实行县制。比如晋献公十六年时，晋国伐灭霍、魏、耿三国，任命赵夙、毕万为大夫，耿、魏据说是最早一批县级行政单位。

晋献公设县的初衷或许与楚国是一致的，都是为化解封建制危机、加强君主集权而采取的应对措施。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晋献公死后晋国出现了“五世昏乱”的政治局面，嗣后即位的晋惠公又因韩原兵败而施行了“作爰田、作州兵”的政策，县与采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到晋文公回国后，又因为在国内缺乏根基，不得不确立了“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新经济制度以获取大夫阶层的支持，等于是在制度层面上追认了县作为大夫封邑的法律地位。

这也就意味着，晋国的县制仅仅设立了二十几年便完全偏离了轨道，成为采邑的代名词。国君不断将原本应该直属于公室的县分封给大夫，此消彼长之中自然也就使得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出现权力倒挂，从而为后来公室的衰微埋下了伏笔。

此外，晋国起初设县的方式也与楚国一致，都是设立在边境或者新征服土地上。但到了春秋后期，伴随着卿大夫之间兼并风潮的兴起，县制也逐步向内地扩展。比如到晋平公时期，连晋国的旧都故绛都已成为赵氏的属县了。县制由边境向内地扩展的过程也伴随着血腥杀戮，如祁氏、羊舌氏灭族之后，两家原有的封地被划分为十个县，为六卿所瓜分。

县制不断扩张的过程，与卿大夫实现宗族内部集权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间，封建制危机一再展现出其恐怖的獠牙，诸侯架空了天子，大夫又架空了诸侯；而在一些宗族内部，“陪臣执国命”，家臣侵夺甚至架空大夫权益的事情也屡有发生。

这种种乱象让聚拢了大量财富的世卿家族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为了避免重蹈过去天子和诸侯的覆辙，在宗族内部开展集权化的变革也就在所难免了。而在诸多的变革手段中，重新恢复县制的初始功能，也就是以临时性的县大夫取代世袭封君，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措施。

只是对于新旧两类卿族来说，由于其历史条件不尽相同，在宗族内部改革的难度也迥然不同。赵氏虽是晋悼公时期重新发展起来的新兴势力，但由于其特殊的发展历程而兼具了旧贵族的特征，在其家族内部存有数量庞大且传承久远的世袭封君。想要在这些固有的封邑内推行县郡官僚制，就必须触动地方封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由此所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这也是其与小宗邯郸氏爆发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方面，邯郸氏的先祖赵夙是赵衰的兄长，其获得封邑最早可以追溯到晋献公时期，因而虽是侧室却比大宗的历史更为绵长。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邯郸氏与赵氏并行传承，到内战爆发前已延续了五代，其血缘亲情早已淡化，天然就缺乏对赵氏大宗的向心力。

另一方面，邯郸氏在政治上有很强的独立性，首先要效忠的对象是国君，其次才效忠赵氏的大宗。而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邯郸氏内部也出现了小宗和从属于邯郸的县大夫。

邯郸氏除了没有卿的地位外，在其他方面几乎可以与智氏比肩，这就使得当赵氏想要加强内部集权时，邯郸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其独立自

主的地位，冲突的爆发也就成了必然。也就是说，这场爆发于赵氏大小宗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新旧两种制度碰撞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冲突早已有之且不可调和，最后以战争的形式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节 东阳内乱

肇乱之端

公元前497年初，赵氏家臣董安于主持营建多年的晋阳城宣告完工，因而人们都将这一年记作太原建城的起点。赵鞅修建晋阳城的初衷，原本是希望将其作为赵氏宗保之地，可出人意料的是，这座被寄予了厚望的城池非但没能给赵氏带来安泰平和，反而在其建成之日便引发了一场内乱。

这场内乱迁延日久，前后持续时间长达七年，在整个春秋历史上仅次于“曲沃代翼”的七十年内战，但其强度、烈度显然不是“曲沃代翼”战争所能比拟的。战火波及甚广，不仅晋国的六卿尽数被卷入其中，周王室以及东方诸侯如齐、鲁、郑、宋、卫，北方“夷狄”鲜虞莫不深陷其中，从而对天下政治格局的塑造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这场如同世界大战一般的晋国内乱，在历史上一般被称为“范氏、中行氏之乱”，又因其主要爆发的区域在晋国的东阳地区，因此在本书中简称为“东阳内乱”。

战略相持

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韩、魏两家的主持下，赵鞅从晋阳返国进入绛都。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赵鞅整合了赵氏分散在各地的力量，在绛都附近先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盟誓。参与盟誓的除了智、韩、魏以及赵氏自己分散各地的力量，还有从邯郸叛逃出来，乃至范氏和中行氏未跟随叛乱的宗人和家臣。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军将荀跖却突然派人前来责问赵鞅：“范氏和中行氏发动了叛乱不假，但据我所知，祸乱的始作俑者实际上是您的家臣董安于。根据晋国的法令，‘始祸者死’。如今范氏和中行氏已经受到了惩罚，所以特来向您报告！”

荀跖的话说得很客气，但言语之间却将矛头指向了董安于，意在逼迫赵鞅将其处死。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按照《左传》的说法是由于受到其助手梁婴父的怂恿，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出于他对待赵氏一以贯之的态度。

早在十一月初，荀跖决定要介入这场纷争的时候，就已经给赵氏定了罪，认为赵鞅与范氏、中行氏一样都属于“始祸者”。后来在韩、魏两家的支持下，赵鞅被迎回了国内，但荀跖的态度并未发生转变，仍然视赵鞅为戴罪之身，必须要做出惩戒。

听了荀跖的这些话，赵鞅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此时赵氏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邯郸氏与范氏、中行氏仍旧占据邯郸、朝歌，盘踞在东阳地区。眉头之难未解，智氏就已经开始趁火打劫，如此行径怎能不让人愠怒！

为了免于让赵鞅陷入伦理困境，董安于挺身而出。他说：“我都已经这么老了，死是迟早的事。如果我的死能够换来晋国的安宁和赵氏的安定，那也算死而无憾。”说罢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悬梁自尽了。

等到赵鞅得知消息时，他最为倚重的智囊早已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赵鞅欲哭无泪，只能按照董安于的遗愿，将其暴尸街市，并派人告诉智氏说：“主前日里派人责问的罪人董安于已经服罪了，谨此向您答复。”

智氏除掉了赵氏心腹，便也没有了继续刁难的借口，因此同意与赵氏结盟。

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高强对晋国内政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智、韩、魏三家表面上看似与赵氏站在了同一战线上，可暗地里却各怀鬼胎。尤其是对于荀跖而言，他只是痛恨中行氏甚于赵氏，故而愿意助赵氏扳回一局，但并不代表两家关系有多和睦。战争持续时间越久，对赵氏的损耗越严重，战后的局势也就对智氏越有利。因此，只要赵鞅没有出现全局性的溃败，智氏就会选择以超然事外的态度袖手旁观；甚至说假如战事突然出现了好转，他还有可能会利用执政地位为其制造障碍。

在智氏、赵氏面和心不和的情况下，处于弱势地位的韩、魏两家也只能尽可能地保存实力，因而无法做到全力以赴。其余如梁婴父、士皋夷，虽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范氏、中行氏宗族内部的分裂，可毕竟实力弱小，这也就使得整场战争实际上仍然只是赵氏自己在战斗。

反观范氏和中行氏，尽管他们在国内斗争中落了下风，可在列国却取得了广泛同情，以齐国为首的势力很快就介入了晋国内乱。

晋定公十六年（前496年）夏，也就是范氏、中行氏退守东阳的半年后，齐景公邀合鲁定公、卫灵公在牵地（今河南浚县北）会面；秋季，与宋景公在曹国的洮地（今山东鄄城）会见；次年夏天，又与卫灵公在渠蔭会面。这几次会议的主要议题都是要谋救范氏和中行氏。

除此之外，常年受到晋国兵锋威胁的郑国、鲜虞（中山），也都积极配合范氏、中行氏的行动。尤其是郑国，不仅直接派兵参与内乱，还同时承担了为叛军输送粮草的重任。周王室在刘文公的主持下，也不遗余力地帮助范氏，在经济上、政治上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战争刚刚进行到第二年，中原大地上就形成了以范氏、中行氏、邯郸氏为核心，齐、鲁、宋、卫、郑、周、鲜虞（中山）等国为助力的反晋同盟，声势不可谓不浩大。

有了诸侯的强力支持，范氏、中行氏胆气陡增。晋定公十六年夏，正当赵鞅带领晋军主力奔赴朝歌之时，东阳残余势力却在士鲋（析成鲋）、小王桃甲的带领下，引动狄人反攻绛都；是年十二月，上军司马籍秦、齐国亡臣高强又在郑国军队的直接支持下，于潞氏起兵反叛。好在晋国内部防守严密，没有给对方留下可乘之机，这两场战事才没有闹出大乱子来。不久后，战败的析成鲋奔周，小王桃甲退至朝歌，籍秦、高强兵败被俘，增援的郑国军队也在百泉（今河南辉县）被击溃。

内线的反叛很快就得以平定，但外线的战争就没那么顺利了。到战争的第四年（晋定公十八年，前494年），围困朝歌的战斗仍然不见起色。

为了救援朝歌，当年四月，齐景公和卫灵公又联合出兵包围了五鹿（今河北大名东）。秋季，两国又在乾侯会合，联合鲁国和鲜虞的军队入侵晋国，占取了棘蒲（今河北赵县）。晋国方面，赵鞅于当年十一月增兵朝歌，与诸侯联军互不相让，战场局势大抵处于均势状态。

而恰恰在这个时间点上，卫国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内乱，为赵鞅打破战略均势提供了契机。

战略转折

话说卫灵公的夫人名叫南子，是宋国公族女子，早年曾与同族的公子朝有些私情。后来她被迫嫁到卫国，又得知卫灵公对如花美眷提不起兴趣，反而更偏爱一些男宠，心中便更是失落。卫灵公为了抚慰南子，就命人将宋朝请到了卫国，谁知却因此惹下了大麻烦。

这个时候正是晋国内战的第二年，齐国和宋国在洮地举行会见。卫太子蒯聩前往宋国向齐国赠送土地，在回国的路上，偶然听到宋国有人唱歌讥讽

卫国的宫廷绯闻，蒯聩听后感觉十分羞耻，于是决定杀死南子。

当然了，任何风花雪月的故事背后，往往都蕴含着更大的秘密。蒯聩之所以要杀南子，或许是因其太子地位受到了动摇，抑或是被卷入了去年公叔戌的叛乱当中，这些我们都已不得而知。但总之，从宋国回来之后，他就开始秘密筹划刺杀行动了。

不过，太子虽有雄心，做事却不够机密。他找到一个名叫戏阳速的武士，让他跟自己一起进宫朝见南子，且约定好只要自己一回头，戏阳速就上前刺杀。戏阳速当面倒是满口答应了，可真到了刺杀的时候，太子频频回头示意，他却始终都不敢有所动作，反倒是让南子看出了蹊跷，因此急忙向卫灵公告状。眼见事情败露，蒯聩在国内无法立足，只得逃往宋国，不久之后又到晋国投奔了赵氏。

蒯聩出奔三年后，也即晋国内战的第五年（前493年），卫灵公突发重疾，临终前有心传位给公子郢（子南），但对方坚辞不受，两个人你推我让，最后也没有议出个结果。卫灵公去世后，南子旧事重提，公子郢仍然不肯接受，还提出太子的儿子公孙辄尚在，坚持让南子改立了新君这才了事。

消息传到晋国，正在赵鞅门下效力的蒯聩顿时就崩溃了：父亲尚在人世，你们偏立儿子来做国君，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而赵鞅也从中看到了机会，心想：如果能扶持蒯聩取得卫国君位，必能在齐国围堵晋国的联盟中撕开一个口子，从而改善赵氏的外部环境，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志趣相投，那就放手去做。当年六月，赵鞅即整点兵马，带着蒯聩直奔卫国而去，打算以武力助其登上卫君宝座。

想象总是很美好，可真要到执行的时候，却未必会那么顺利。当时双方激战的朝歌、邯郸大都位于卫国周边，从绛都去往帝丘需要经过各方势力往来穿梭的“交战区”，大军浩浩荡荡开拔而过很难不被人发现。为了避免暴露行踪，他们起先选择了趁夜行军，毫无意外的是，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六月十七日夜，大军果然就在黄河北岸迷了路。还好有鲁国叛臣阳虎在军中，指点大军就地渡河向南进军，这才顺利进入卫国境内。

抵达戚邑城外，赵鞅利用卫国内政未定的契机，让太子换上丧服，向守城的人通报说是前来迎接太子回国的，借此占领了戚邑。按照《史记》的表述，在此期间，赵鞅还曾带兵护送蒯聩入卫，但遭到了卫人的激烈抵抗，只好又返回戚邑停驻。也正是因为这一个月多的耽搁，使得赵鞅不但没能完成使命，反而又遇到了新的危机。

晋国内战期间，以齐国为首的反晋同盟除了提供军事上的直接支持外，还在经济上向范氏、中行氏提供了大量援助，而这些援助的运输任务则是由郑国军队承担。这年八月，郑国的子姚（罕达）、子般（驷弘）带领的运粮部队自东向西抵达戚邑郊外。而为了保证粮道安全，范氏宗主士吉射也亲自带兵前来迎接。正当赵鞅带着军队在戚邑徘徊的时候，突然间就同时与这两支军队不期而遇。

情况万分紧急，来自鲁国的叛臣阳虎此时再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向赵鞅提议说：“我们的车辆少，肯定不能与他们硬碰硬。不如把将旗插在车上，与郑国的战车先行对阵。对方突然看到我们的阵容，必定会心生恐惧，到时候合兵围之，必能令其不战而溃。”

当然了，关于阳虎的这段话还有另一种解释。此处原文为“彼见吾貌，必有惧心”，有注解认为是郑国人见到阳虎的容貌之后，会因为害怕他而军

心涣散。其中的原因倒也不难理解，当年郑国公然叛晋之时，鲁国曾出兵伐郑占取匡邑，当时出征的“总指挥”便是阳虎。

或许是由于阳虎为人太过残暴，此战让他在郑国一战成名，人人皆对其恨惧交加。在晋国内战爆发的第一年，孔子去卫赴陈途中行经匡邑，当地人不由分说将其扣留数日，据说也是由于二人的容貌太过相像而产生的误会，可见阳虎其人在郑国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形象。因此，当两军在戚邑相遇的时候，阳虎认为只要打出自己的招牌就能让郑人胆寒，倒也不算是自矜功伐。

赵鞅此行的目的本来只是为了送蒯聩回国即位，并不想有太大的动作，因此所带兵力有限。而他们所面临的对手，无论是郑国的运粮部队还是范氏的接应部队，都要比赵军阵容更加强大。因此在阳虎看来，既然赵军没有足够的兵力与其中的任何一支展开大规模战斗，最优的解决办法就是挑一个软柿子，把他们吓跑就完事了。

铁丘之战

赵鞅很认可阳虎的建议，于是就在戚邑南部的铁丘进行了一次战前动员演讲。演讲中，他一再声明自己的正当性，并痛斥敌人的无道：“范氏和中行氏违背天命、斩杀百姓，想要在晋国专权而欺压君主。以前我们的国君曾依仗郑国的保护，可如今他们却抛弃了国君反过来帮助逆臣，是为大逆不道！”与他们的无道不同，“我们上承天命，下服君命，推行德义，是得到上天庇护的。匡扶正义，消除国耻，就在今天这一战了”！

大道理好讲，可面对强大的敌人，想让士卒克服恐惧、摒弃侥幸，终究要付出重赏才行。为此，赵鞅宣布了一项大胆的决定，凡是英勇迎战、痛击

敌人的，不论身份贵贱，都会有不同等次的赏格：“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

对作战勇猛的有功之臣赏赐土地田产是春秋时期的惯例，晋国的大小贵族都是依靠军功赏赐发展起来的。因此，赵鞅的赏格虽高，却并未突破制度限制，若仅仅如此的话，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此时赵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随军兵员数量不足，为了能够在局促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扩充兵员、激发现有人员的战斗力，赵鞅又祭出了两个大招：“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

春秋时期参军作战的主要力量都是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工商业者及庶人等并没有参军的义务和权利，更没有进仕为官的渠道。因而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惨烈程度上，春秋时期的战争都很有节制，所谓的战争礼仪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战时征召工商业者及庶人随军的主要形式是服劳役，为军中士兵搬运物资，并从事一些战时设施修建等体力工作。而比工商业者和庶人地位更低的奴隶，更是连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

到春秋末期，伴随着族群冲突的日趋恶化，各家族为了求得胜利，在用人时大都不拘一格。比如在固宫之役时，有一名叫斐豹的奴隶，就是以杀死栾氏猛将督戎为条件换取了自己的自由。这些个例的出现表明原本牢不可破的阶层壁垒出现了松动，但大规模免除奴籍的事件还是鲜见的。

赵鞅在此战中的宣示，则是进一步破除了阶级秩序的藩篱，只要能够破敌立功，庶人和工商业者也都可以晋爵为官，官家和私人的奴隶都可以凭借军功获得自由身。此举大大激发了随军劳役和奴隶的战斗积极性，使得他们为了获取更大限度的自由，愿意积极投入到战斗中去。

赵鞅的这些措施后来对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阶层藩篱被冲破，无产者和手工业者被允许进入军队，战争的形态也就发生了转变。春秋时期

贵族之间的有限战争，也会被全民皆兵的大规模战争所取代，由此也就带来了一个变革更为剧烈的时代。

这些都是后话了。在这场战争中，除了对各阶层人员进行动员之外，赵鞅还为自己定了规矩：“如果我能够侥幸脱罪，会将列位的功劳上报给国君，请国君对诸位加以赏赐。若是战败得罪，就对我处以绞刑，死后以三寸桐棺下葬，不得设置衬板和外椁，不得用装饰过的车马运送，也不得葬于本族的兆域，依照下卿的地位操办丧事，以示惩罚。”

战争动员已经完成，按照影视剧的套路，也就到了该决战的时候，不过现实总有其固有的逻辑可循。赵鞅的战前动员固然鼓舞人心，可当人们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时，总难免心存恐惧。比如卫国太子蒯聩，八月初七日两军对阵的时候，他担任赵鞅的车右。大军行至铁丘，蒯聩远远看到郑军人多势众，便不自觉地从小车上跳了下来，不敢再往前进。这时担任御戎的邰无恤（王良，王子於期）便讥讽他说：“你怎么就跟个女人一样？”

这种讥讽对于已经失去心智的蒯聩来说，已经丝毫都起不到激励作用了，他依旧不住地祷告说：“皇天上帝，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请保佑你们的曾孙蒯聩！郑胜（郑声公）兴起祸乱，晋午（晋定公）处于危难之中，不能平定祸乱，故派赵鞅前来讨伐。蒯聩不敢贪图安逸，登车执戟列于行伍。死生不敢请求，佩玉也不敢爱惜，只希望祖宗保佑我：不要伤筋动骨！更不要毁掉我英俊的面容！保佑我成就大事，不要给先祖带来羞辱！”

临阵畏缩的不只是蒯聩一人，更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还有温大夫赵罗。在见到黑压压的郑国大军的那一刻，他就不由得开始双腿发抖、无法站立，

御戎繁羽和车右宋勇只好把他绑到车上勉强出战。有军吏上前询问，繁羽就说他是因疟疾发作站不起来了。

赵鞅巡视全军，看到此番情景不免担忧。为了消除将士们的恐惧心理，他又登高振臂为众人打气说：“当年毕万（魏氏祖先）也只是个普通人，可他每次参加战斗都能俘获敌人，后来凭借军功获得赏赐，家里有马四百匹，自己在家里无疾善终。大家都想想吧，我们每个人都跟毕万一样，只要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谁死谁生尚未可知！”

赵鞅的战前动员不可谓不精彩，可兵力悬殊的现实摆在那里，赵军的士气再旺盛，也总免不了要吃一些亏。战争初期，在郑军的猛烈攻势下，赵军损伤惨重，不仅绑在车上动弹不得的赵罗被人掳走，就连主帅赵鞅也身负重伤，帅旗也被郑军缴获了去。

眼见赵鞅疼痛难忍而无法指挥战斗，原本畏缩不前的蒯聩突发神勇，这才击退了郑军。郑军败退之时，蒯聩又组织兵力突入敌阵，将他们为齐国押送的一千车粮食全部缴获。

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公孙龙的人，他原本是范氏的属吏，内战期间奉范氏之命到周王室接受赠田并收取赋税，结果被晋人抓获。有司准备将其处以极刑，但赵鞅爱怜其忠，就赦免了他。这一战中，他趁夜带着五百人偷袭郑军，在郑军主帅罕达的账下夺回了蠡旗，以报答赵鞅的知遇之恩。

赵军获得胜利后本想趁势追击，但郑军统帅子姚、子般、公孙林临危不乱亲自殿后，使得赵军前锋损失惨重。赵鞅本来带兵不多，如今战事既已取得胜利，便也不做纠缠，只带着缴获的千车粮草返回了国内。

这次战斗因发生在铁丘附近，因而被称为“铁之战”。赵鞅久攻朝歌、邯郸不下，却不料在护送蒯聩入卫时，凭借着铁之战的以少胜多，在外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突破。

此战赵军不但一举截获了齐国输送给范氏的一千车粮草，同时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启发：一旦外围的交通补给线被切断，范氏势必因粮草不继难以支撑，赵氏取胜也便指日可待了。也正是从这一刻起，赵氏对范氏、中行氏的战争终于突破僵局，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

物伤其类

《史记·孔子世家》上曾有这么一段记述，说是在晋国内战时期，赵氏攻打中牟，范氏驻守中牟的县宰佛肸无法抵御，故而据邑反叛。古来叛主归降者都会向新主人献上投名状，以便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前程。由于赵氏喜欢举贤之人，佛肸便准备投其所好，献出一个别出心裁的投名状：召请孔子入仕。

彼时孔子在卫国混得很不如意，如今得到出仕的机会，自然是欣然前往。不过他的弟子子路却不怎么理解，于是就问道：“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亲自做了不善之事，君子就不会去他所在的地方。如今佛肸亲自以中牟叛变，您却要应邀前往，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的回答很有意思：“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也说过，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我又不是中看不中用的匏瓜，总要有一个地方来施展抱负才行啊！”

说完这些，他就准备前往晋国去见赵鞅。但刚走到黄河边上，就听到奚鸣犊、舜华被杀的消息，于是又慨然长叹说：“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

此，命也夫！”孔子决定不再去找赵鞅谋职了。

子贡不解，就问道：“老师您这又是什么意思？”您不是说要找一个地方施展抱负吗？连佛肸的过错您都能容忍，怎么就独独不能容忍赵鞅犯错呢？

孔子回答说：“竊鸣犊、舜华都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当年赵鞅还未得志的时候，是依靠这两人的帮助才得以从政的，如今他得志了却要卸磨杀驴以执掌政权。我听闻，若是有人剖腹取胎杀害幼兽，麒麟就不会再来到他的郊野；涸泽而渔使鱼虫无处匿藏，那么蛟龙就不会来调和阴阳了；倾覆巢穴毁坏鸟卵，凤凰就不愿意在这里飞翔——君子讳伤其类也。鸟兽见到不义的行为也知道避开，更何况我孔丘呢！”

孔子的确该为此感叹，因为事实上竊鸣犊、舜华的死并不是孤例，被冤杀的贤能之士还大有人在，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王室大夫萇弘。

萇弘是一名很有学识且德行高尚的贤人，也是孔夫子赞叹不已的君子，在这个礼崩乐坏的世道中，他与叔向、晏婴等人一样，都是激浊乱世中难得的清流。然而，由于他长期服务于执掌王室大政的刘氏，而刘氏又与范氏有姻亲，在内战期间长期向反叛势力提供经济援助，令赵鞅极为恼火。晋定公二十年（前492年），赵鞅派人到成周问罪，周人不堪其怒，遂于六月十一日杀掉了萇弘向晋国解释。萇弘本为蜀人，据说时有蜀人为纪念萇弘，将其血藏于家中，三年后皆化为碧玉，故有“萇弘化碧”之说千古流传。

在国内，为了防止范氏死灰复燃，赵鞅还杀掉了曾帮助自己驱逐同宗的士皋夷。

士皋夷原本打算借助赵氏之力驱逐士吉射，自己取而代之成为范氏新的宗主，因此便积极地为赵鞅摇旗呐喊。然而这些都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赵鞅通过艰苦战斗打败了士吉射，就必然要将其完全剿灭，保留范氏的宗族传承显然不符合其自身利益，这也是晋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在莒弘被杀五个月后，赵鞅终于攻破了朝歌城，士皋夷也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赵鞅的这些做法符合政治家的逻辑，但却与孔子的仁政理念背道而驰，他们不是同一类人，也就注定不会走到一起。这就好比当年的铸刑书之争，参与论辩的叔向和子产都是当世的贤人，但所处位置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大相径庭。面对世间的一切纷乱，叔向只是一个旁观者，故能坐而论道、大谈季世将临、人心得失；可子产却不同，他是一国执政，承担着救世济民的重任，就要摸着石头过河、斩断荆棘寻路，哪怕是遇到了刀山火海也总得闯一闯、试一试。

同样，在面临两难抉择的时候，赵鞅和孔子立场不同，最后的选择也会大为迥异。赵鞅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当他与东阳势力处于胶着之中时，一城一池的拉锯往复也是常有的事，佛肸能够以中牟背叛范氏，窦鸣犊、舜华或许背叛了赵氏也未可知。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大局面前，一切可能会对战局造成不良影响的因素都应该被清除掉，至于被清除的人是不是贤人，这并不是他所要关心的事。

而相比于战事的进展，孔子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理想能不能得到赵氏的认可，赵氏能够容忍公孙龙、佛肸叛范，却不能容忍窦鸣犊、舜华，似乎说明他并不看重窦、舜的贤能。

结合孔子对荀寅的评价——“尊贤而不能用，贱不肖而不能去”——可知，如今晋国的这些政客们虽在外有尊贤礼贤尚贤之名，可内心里却都是不

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在旁人眼中你或许是饱读诗书以救世的圣贤，可在他们眼中你就是“中看不中用的苦瓠”，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吉祥物”。他们对天道缺乏敬畏，对圣哲缺乏尊重，只要你的行事方式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哪怕是麒麟在世、凤凰落凡也一样逃不过他们的魔爪。面对如此徒有虚名的“贤君”，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战略反攻

中牟原本是隶属邯郸氏的城池，邯郸氏叛离赵氏，中牟自然也落入了叛军之手。这座城池在东阳地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曾引用晋平公的话说，中牟是晋国的股肱、邯郸之肩髀。齐卫伐晋的夷仪之战时，卫军奔袭五氏，中牟便是必经之地，当时赵氏在中牟驻有一千乘兵车，这已经是一个中等诸侯国的军队规模了。

佛肸叛范发生的时间节点，按照一般的推测应该就在战争的第五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卫灵公去世前的那段时间里。中牟重镇的回归，意味着赵氏对邯郸的进攻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而同一年的铁之战又切断了国外支援邯郸的交通线，这就对东阳方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大约在铁之战后不久，一直与赵鞅有龃龉的荀跢也去世了，赵鞅得以升任中军将，在国内事务上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权势的稳固使得 he 可以从容调配各种资源，不必再受智氏的牵制，后方也有了坚实的保证。

铁之战的次年，也即晋定公二十年（前492年）十月，赵鞅再次包围朝歌。面对赵军的凌厉攻势，荀寅无法坚守，于是便集中兵力佯攻城南，以调动赵军各部增援大本营。待到赵军主力集结完毕，中行氏预先安置在城北的部队则趁势涌入朝歌，带着荀寅从北门突围而去。

中牟、朝歌两城的陷落，戚邑外部交通线的截断，意味着邯郸已成孤城一座，范氏、中行氏也就失去了对抗赵氏的根本。然而支持他们作乱的诸侯却并不甘心失败，为将这场内战拖延下去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首先是在晋定公二十年春季，齐景公在联合卫国出兵包围戚地的同时，向中山请求援兵，意图分散赵军注意力以打通支援邯郸的交通线。朝歌陷落后的第二年七月，齐国又派出陈乞、弦施联合卫国的宁跪出兵，包围五鹿（今河北大名东）以声援邯郸的赵稷。

赵鞅对此并不忌惮，当年九月，赵氏大军包围邯郸，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终于将其攻破，从而拔除了东阳的又一个根据地。荀寅再次出逃，投奔鲜虞，赵稷则逃奔到临地（今河北临城西南）等待齐军接应。

齐将弦施接到赵稷后，就拆毁了临地的城墙，以防止晋军占据把守。随后又安排国夏出兵，先后占取了邢（今河北邢台）、任（今河北邢台任泽区东南）、栾（今河北石家庄栾城区一带）、鄆（今河北高邑一带）、逆时（今河北保定一带）、阴人（不详）、孟（今山西黎城县东北之吾儿峪）、壶口（今山西长治东南壶关）等地，并会合鲜虞把荀寅送到柏人邑（今河北隆尧县西南）固守。

齐国这次的军事行动一路攻取了晋国东部边境的一系列关口，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晋国所取得的最佳战绩。但这些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赵鞅并没有理睬齐军的入侵，反而是在稍做调整之后，又迅速集中重兵包围了柏人邑。

到战争进行的第八年（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春，经过不长时间的猛攻，柏人终于被攻克。柏人守将张柳朔殉节，荀寅、士吉射无处躲藏，只能逃奔到齐国。这场持续七年有余的晋国内乱，终于以赵军完胜而告终。

战略收官

晋国爆发内战的这几年间，以齐国为首的东方联盟为东阳势力提供了大量的人财物支持，场面可谓轰轰烈烈。然则细观其行状，他们的举动似乎又未必是要帮助范氏、中行氏取得胜利，而是想借此尽量拖延战争进度，以达到削弱晋国的目的。

与此同时，东方联盟看似声势浩大，然则内部利益纷扰，与盟的各国往往各有各的盘算。战争期间，齐景公与卫、鲁、宋、郑等国分别举行了几次双边或者三边的会盟，但是将五国统一起来举行的大型会盟活动是完全没有的。可见以齐景公当时的力量，并不能彻底消除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联盟自然也就不那么牢靠了。

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是郑宋之间的世代恩怨。比如战争早期，宋国爆发了持续四年的内乱，郑国作为齐国的盟友，在帮助范氏、中行氏之余，还忙里偷闲地派罕达出兵伐宋。而宋国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在齐、卫、郑纷纷出兵干预晋国内乱时反而趁机讨伐曹国和小邾国去了。对于宋国的姿态，齐景公其实是很不满意的，因此等到范氏败亡，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不合作的宋国进行征讨。

至于鲁国，在晋国内战爆发时孔子所主持的堕三都计划刚刚破产，国内出现了一系列变乱。再加上他们对齐国长期不信任，不愿意为了齐国而与晋人为敌，因而在干预晋乱的过程中显得十分消极。尤其是在鲁定公去世后，主政的三桓一边与齐国虚与委蛇，一边把大部分精力投到侵夺邾国土地上，对齐国实际上没有给予太大的帮助。

范氏、中行氏败逃后，齐国在晋国国内失去了强援，原本松散的反晋联盟也宣告解体。看着面前这两个曾被自己寄予了厚望的亡臣，齐景公内心充

满了无法言说的愤懑，不久后便溘然辞世了。

齐景公死后，世卿国夏（惠子）、高张（昭子）立晏孺子荼为君并把持朝政，景公诸公子出奔鲁卫。齐国政局风云突变，给潜伏在朝堂上的阴谋家陈乞创造了时机，一场针对齐国公室的“收网行动”即将展开，“田氏代齐”很快就将成为无法逆转的现实。

当一切尘埃落定，赵鞅也迅疾对过去趁火打劫的各方势力如周、郑、卫、鲜虞等国展开了持续的报复和清算。在晋国的持续打击下，卫国很快就陷入了长期动乱；而鲜虞则开始以中山的面貌登场，在此后的岁月中不断承受着晋人的怒火。

荀寅在失败流亡后，似乎对自己过去的种种行径幡然悔悟。流亡途中，他经过了一处县邑，这个县的长官原来是中行氏的属臣，故而有随从劝他：“这个人是您的故人，咱们何不到他那里休息一下？还能等等落在后面的人。”

荀寅哀叹说：“以前我喜欢音乐，他就送我一张古琴；我喜欢玉，他就送我一只上好的玉环。这些不过是为了让我接纳而故意投其所好，来纵容我的过失罢了！如果我现在去他那儿，恐怕我就会变成他讨好新主子的投名状了。”据说荀寅离开后，那个长官果然就把他后面的两辆车截获，献给了赵鞅。

二十多年后，晋卿智瑶（智襄子）出兵攻打郑国，齐国实际控制人陈恒出兵救援。荀寅随陈恒出征，他探听到晋军可能偷袭的消息，便告知了陈恒。不料陈恒胸有成竹，早已制定好了各种预案，根本不担心晋军来犯。

这个时候，荀寅猛然想到自己早年起兵的仓促，不由得喟叹说：“如今总算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会失败了！君子谋划一件事要三思而后行，开始、发展和结果都要考虑清楚，才会做出决策。当年我做事不够周全，失败不也是必然的吗？”

荀寅的觉悟终究还是太迟了，他不可能带着这份觉悟重新来过，故而也只能默默地接受最终的结果。

士吉射和荀寅的流亡以及士皋夷之死难，宣告了从晋献公时期开始兴起、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二百年的祁姓范氏家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兴起的姬姓荀氏家族如今也只剩下智氏这一脉。范氏、中行氏的最终覆灭，也宣示了自晋平公八年（前550年）栾氏灭族后形成的六卿割据体制，在维持了五十多年后终于走向了解体，一个以智、赵、韩、魏四卿主导的政治格局自此成型。

只是，一场战争的结束，往往也是另一场战争的开端。正如赵氏家臣傅僂在铁之战后所说的那段话：

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在战争状态下形成的“泛新贵联盟”，伴随着战争的结束也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嫌隙，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酝酿。旧的敌人被打败了，就总还会有新的敌人冒出头来，赵氏并不能就此过上安稳的日子。因为，过去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智氏，将成为他新的敌人。

第四节 霸业终章

吴王争霸

公元前482年七月初六日，在位已到第三十个年头的晋定公，在赵鞅的保护之下前往黄池（今河南封丘南）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会盟。这是自召陵之会以来，时隔二十年后晋国第一次参与诸侯会盟，或许也是晋国以一个统一的整体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会盟。然而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习惯的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并不是素来颐指气使的晋国，而是二十年前凭借破郢之战而声名大噪的南方新秀——吴国。

此时此刻，身为晋国君主的晋定公不知是否有过一番感慨。

一百年前，吴国还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国，若不是来自楚国的申公巫臣提起，晋人恐怕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家。在巫臣的坚持下，晋景公同意委派其为全权大使，以兵车三十乘远赴吴国，去行使一项前途未知的使命。

八十年前，巫臣在吴国的使命终于收到了应有的回报。一直以来对中原诸侯若即若离的吴国，终于放下疑虑加入夏盟，让彼时兵锋正盛的晋国如虎添翼，也让疲态尽显的楚国不堪其扰，终于成就了晋悼公复霸的伟业。

随着晋国复霸大业的完成，吴国又渐渐淡出了中原诸侯的视野。直到二十年前，在那场虎头蛇尾的召陵之会后不久，吴国大军攻入郢都，泱泱大楚被搞得鸡飞狗跳，天下皆为之震动。尽管后来在秦、越等国的帮助下，楚人收复了故土，国力也渐渐恢复，可郢都被攻破的故事终究还是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噩梦。

凭借着对楚国的压制，吴国的国势达到了顶峰，便开始染指中原霸权。彼时晋国因内战而疲弱，齐国因复霸企图破产而衰败，中原大地正处于极端混乱之中。在吴王夫差看来，这或许是上天赐予的良机，让他能够建立足以令万世景仰的功业。为此，他首先将目光瞄准了与自己接壤的鲁国。

晋定公二十四年（前488年），也即晋国内战结束两年后，夫差亲率大军北上中原，鲁哀公惊恐不已急忙赶往鄆地会见，却不料对方无礼至极，竟然要求鲁国以百牢之礼来招待他们。随同鲁哀公前往的子服何（子服景伯）本打算一口回绝，谁知对方更加强横，竟然质问说：“当初我王前往宋国时，宋人曾以百牢之礼相馈，鲁国跟吴国好歹还是同姓，怎么能落到宋国人后头呢？”此外，他们还提到了四十年前的一桩旧事，说：“你们也别跟我说什么‘先王未之有也’，我听说过去你们也曾以超过十牢的规格宴请晋国的大夫，那么以百牢规格来宴享我王也不算过分吧？”

见吴人蛮横无理，子服何也不愿再多争辩：“当年士鞅贪婪而不知礼，动辄以武力威胁逼迫，我们只能按其要求以十一牢宴请。现在范氏最终落了个什么样的结局，您也看到了。您如果还想用礼仪来命令诸侯，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的数字来，否则的话那也太过分了！倘若您执意不听劝告，我鲁国虽说不怎么富裕，可也不会吝啬这区区百牢的牲畜，也只能听命于执事了。”

当鲁哀公前往鄆地参与会盟之时，吴人还曾召请鲁国执政季孙肥（季康子）前来，可季孙肥不仅拒不参会，还在吴人的眼皮子底下出兵攻灭了邾国。邾国被灭后，一些故土难离的忠臣带着财礼到吴国去请求救援，夫差当下便调集兵马征伐鲁国，迫使对方再次与之结盟。

盟约既已达成，两国之间的纠纷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可偏偏与鲁国为邻的齐国又掀起了事端。原来，齐悼公即位之前曾在鲁国流亡，季孙肥为了笼络对方，将自己的妹妹季姬嫁给了他。后来齐悼公被人迎立回国，留在鲁国的季姬便与季孙肥的叔父季鲋侯有了私情，等到齐国派人来接的时候，她担心事情败露因而哭着闹着就是不肯去。齐悼公不知内情，总以为是季孙肥有意扣留自己的妻儿，于是便借此机会向吴国提出请求，希望共同出兵攻打鲁国。

鲁国一看这架势，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当下就派人把季姬送到了齐国，齐悼公因此心满意足，就又派人到吴国去辞谢原来的请求。在吴国急欲进取中原的当口上，齐国的做法无异于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夫差认为齐国朝令夕改，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因此就会合鲁、邾、郯等国军队，与晋军一起夹击齐国。

面对来势汹汹的诸侯大军，执掌国政的陈恒自知无力抵抗，于是就杀掉了齐悼公以请求和解。但当吴军退去，齐国马上出兵鲁国以为报复。鲁国一方面出兵抵御齐军，一方面派出使者前往吴国请求援助。

晋定公二十八年（前484年）春季，齐国大军侵入鲁国，鲁人被迫在都城曲阜郊外应战，一战获得齐军首级八十，就让齐人军容涣散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月二十七日，吴军会合鲁军入侵齐国，双方在艾陵（今山东济南莱芜区东南）交战，这一战吴、鲁联军俘获齐国的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五员战将，缴获战车八百辆，斩首三千人，由此对齐人造成的震慑可想而知。

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在夫差看来也算是威震天下了，于是就合计着要让中原诸侯尊自己为霸主。晋定公二十九年（前483年）夏季，吴国征会鲁、

卫、宋等国在郕地（今江苏如皋东）会见。但让吴国感到费解的是，与会的三国在吴国的地盘上分别举行了盟会，却独独把自己撇在了一边。夫差为此勃然大怒，派兵包围了卫出公的馆舍，若不是有孔子的弟子子贡居中调解，卫出公的流亡岁月恐怕要提早许多年了。

郕地会盟不得志让夫差十分苦恼。想来这些年自己所建立的功业，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齐桓公、晋文公的水准，齐、楚两大强国都已经败在吴国手上，为什么诸侯还是不认同自己呢？苦苦思索之后，他将目光转向了晋国，心想：要是能让称霸中原上百年的老牌霸主低头，自己的霸业或许也就水到渠成了。想到这里，他迅疾点了三万大军，越过鲁、宋直逼晋国而来。

彼时的晋国因为刚刚经历了内战的创伤，早已千疮百孔，国力大不如前，以至于连元气大伤的楚国都敢于前来威逼。而如今吴国举兵北上威逼中原，使得早已放弃了争霸事业的晋国不得不放下国内繁杂的事务前来参加这次盟会，此中辛酸又有几人知晓？而此时，距离巫臣使吴的公元前584年，刚刚过去了一百年的时间。

黄池会盟

与二十年前召陵之会的盛况相比，黄池会盟的境况多少显得有些冷清。此番前来参会的只有晋定公、吴王夫差、鲁哀公和单平公四位国君，会议似乎也没有什么正经的议题，唯一值得一提的似乎就是晋、吴两国争当盟主的事情了。

对于这次的会盟，夫差可以说是志在必得，因此一开始就笃定了要亲自担任主盟人。吴国代表给出的理由是：“在周王室中，吴国的先祖太伯资历最老，理应由我们先歃血！”

晋国代表据理力争，说：“姬姓诸侯一直以我晋国为首，应该我们先歃血！”

眼看着吴国人态度决绝，不肯相让，晋国正卿赵鞅就有些耐不住性子，对身旁的司马寅说：“天色已晚，如果事情还是没有个结果，你我二人恐怕要遭人耻笑了。倒不如整顿队伍与吴国决一雌雄，次序自然就定了。”

司马寅为人谨慎，担心吴国有所防备，便决定先去吴军营中探查一番。结果这不去不知道，一去还真就发现了大问题：司马寅敏锐地察觉到吴国大夫们个个都面如土色、双眼无神，连吴王也面色晦暗、神情呆滞，显然是遭遇了什么变故。回去之后，他就向赵鞅陈述道：“吴人神情反常，估计是后方打了败仗吧？又或者是太子、宠妾死了？夷人轻佻沉不住气，必然不能长久忍耐，不如等等看他们有何反应再说！”

赵鞅按照司马寅的办法一直耗着，果然吴国人真就耗不下去了。他们主动找到赵鞅，提出要让晋国先歃血，吴国也愿意尊奉晋国为盟主。赵鞅就这样不动声色地为晋国取得了先歃血的特权，再次成为诸侯盟主，果然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不过，对于这次会盟晋吴双方究竟是谁做了盟主，人们已经争吵了差不多两千年了，尤其是《国语》和《史记》对此有着截然相反的记录。一般来说，后世还是比较认同《国语》中的表述。

黄池会盟举行之时，吴国的后方的确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晋定公三十年（前482年）六月，越王勾践趁吴国内部空虚，亲率大军分两路进入吴国。先头部队被吴国王子地、王孙弥庸打败，领军大夫畴无余、讴阳也被俘虏。但到第二天，越王勾践率军抵达，与吴军交战仅一日便攻破了姑苏城，太子友、王孙弥庸、寿於姚皆被越军俘获。

战败的消息传到黄池之时，吴军帐中的情景也的确如司马寅所言，君臣上下皆面如土色、神情恍惚。但在《国语》的记载中，吴王夫差做出的决策却与《左传》所言完全相反。他强忍着丧子兵败的悲痛，亲自在大帐中处死了陆续前来报信的人，随后又召集近臣商议计策，让他们就当前的困境做出选择：“我们是干脆放弃盟会回国好呢，还是把盟主之位让给晋国更好？”

此言一出，众人皆不知如何应对，帐中顿时鸦雀无声。当此之时，有一位名叫王孙雒的大夫厉声说道：“我认为两种情况都不利！”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他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王孙雒在众人期望的眼神中，有意压低了声音，仔细分析道：

第一种方案，不参加盟会就回国，会助长越国的声望，显然是不可行的。“人们会认为吴国害怕越国，百姓也会因此感到恐惧而逃亡，这样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诸侯也会认为吴国已经败了，若是他们在邗沟两岸趁势袭击，恐怕我们就只能葬身鱼腹了。”

而第二种方案，参加盟会但让晋国当盟主，更是有着诸多的弊端。“晋国若是重掌霸权，必然踌躇满志，居高临下地控制我们。届时倘若他们要带我们去朝见周天子，我们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如果不去，诸侯就会从中看出端倪；如果去了，反而会延误了救援的时间，这对我们都是不利的。”

鉴于此，王孙雒提出了第三种解决方案：“不仅要参加盟会，而且一定要做盟主，掌握主动权。”

吴王认为此话有理，就走过去问：“那依你看来，我们如何才能取得盟主之位呢？”

王孙雒回答说：“无论是吴国人还是晋国人，人人都希望长寿富贵，都有贪生怕死的本能。但不同的是，晋国距离本土近，有退却的余地，而我们路途遥远，是完全没有后路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我们拿出拼命的决心来，晋人就一定会害怕的！奉侍君主要有勇有谋，要有转危为安、起死回生的智慧，如今是我们吴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谁也不能再有半点犹豫。就在今晚，吾王要拿出财宝和爵位，拿出江淮的封地来激励士卒、振奋士气，用必死的信念来向晋国挑战。晋国人看到我们的勇气，定然不敢与我们决战，他们会乖乖地把盟主之位让出来。只要我们得到了诸侯之长的权柄，好生抚慰诸侯，让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他们也就不会在背地里袭击我们了。到时候我们再从容地回国，安安稳稳地实现我们的计划，一定能让国家转危为安！”

夫差对这个办法极为赞许，当即命令士卒饱餐一顿并喂饱战马、披坚执锐，集结待命。吴王夫差亲自执钺，在夜半时分带兵悄然压向晋军营地，在距离晋军只有一里地的地方，三支万人的方阵迅速列好了阵势、敲起了战鼓、喊起了口号，响声震彻天地。

听到外面喧闹的声音，赵鞅急忙起身戒备，却发现吴军已经近在眼前了，仓促之下只得派董褐去向吴王问话。

吴王夫差回答说：“眼下王室衰微，诸侯都不来纳贡，连告祭鬼神的用品都无法凑齐，天子痛心于姬姓宗族的冷漠，因此特别派人向孤求助。孤接到王室命令之后，日夜兼程赶到此地，就是想问一下晋君：为何贵国兵强马壮，却不拥护王室，不去征讨藐视天王的蛮夷和秦楚等国，反而不讲长幼礼节，攻打同姓的兄弟国家？盟会日期已经临近，孤担心无法完成使命会被诸侯耻笑，因此希望今天就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你先回去禀告，孤将亲自

在军营外听取你们的回复。”说罢，他就命人将少司马和五个不肯用命的王士带上前来，让他们在使者面前自杀以谢客。

据说到了这个时候，董褐才对赵鞅提到之前司马寅说的那番话。同时他又强调说：“被逼到困境的人通常会非常残暴，与他们作战对我们极为不利。不如就答应他们做盟主算了，无非是多提一些条件以挽回颜面。”

赵鞅整了整衣冠，从容地回应道：“既然你已经有了主意，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董褐出了营帐，恭敬地向夫差回禀：“寡君不敢显示军威，也不能亲自露面，因此特派微臣前来复命。寡君说：‘正如您所言，眼下王室已经衰微，诸侯大都失礼于天子，贵国有心恢复周文王、周武王时天子的尊贵，晋国接近天子自然也是责无旁贷。’以前天子也经常跟寡君提起，说：‘从前吴国先君不失礼，总是能定时率领诸侯朝见，只是近来有蛮荆的威胁，不能履行职责，所以才让晋国代劳辅助王室。’如今贵国扫除威胁，权威覆盖东海，天子自然是欣喜的，可贵国僭越的名声却也传到了天子的耳朵里。天子早有圭命，称贵国国君为吴伯，可您却偏偏要僭越规制、自称为王，这也是诸侯与您疏远的原因所在。所谓天无二日，周室也不能容忍有两个王，只要贵国能够放弃王号，以‘吴公’自称的话，晋国又有什么理由阻止您做诸侯盟主呢？”

夫差等的就是这句话，心说：不就是让我自称“吴公”吗？只要你能把盟主之位让给我，让我赶快回去收拾家里的烂摊子，就依着你们中原人的秉性，叫我“吴子”都可以啊！不过，在外交场合，夫差又不能失了分寸，他十分耐心地听完董褐的长篇大论，随即不慌不忙地表示，吴国同意晋国的要求。

事不宜迟，在王室大夫单平公的见证下，刚刚降尊号为“吴公”的夫差强忍着内心的焦虑，与晋、鲁两国举行歃血仪式，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霸主称号。盟会结束后，夫差一刻也不敢耽误，即刻动身回国。而为了防止齐、宋等国趁机抄自己的后路，他还事先派王孙雒和勇获带了些步兵，以借道为名去往宋国，在其境内烧杀抢掠以恫吓人心，这才安心地率大军从宋国境内取道回国。

越王争霸

夫差回国后不久便与越国达成和解，但这或许只是吴越之间新一轮争锋的开始。此后的几年间，越国、楚国不断深入吴国境内进行袭扰，使得吴人终于也尝到了疲于奔命的苦头，国势急转直下。

到黄池会盟七年后，也即晋定公三十七年（前475年），越国大军包围姑苏，发动了对吴的最后决战。经过两年的围城，至晋出公二年（前473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越国攻破姑苏，吴王夫差自尽，强盛一时的吴国就此灭亡。

吴国灭亡后，越王勾践顺利地从夫差手中接过了全部遗产，同时也萌生了求霸中原的念头。从有限的史料中可见，勾践干预中原事务的行动主要有这么几件：

第一件事是处理邾国政权的遗留问题。早年吴国与鲁国在郕地举行会盟时，季孙肥曾出兵灭邾，引发了吴国的不满。后因齐国联结吴国意欲伐鲁，鲁人遂将邾隐公送还，以获取吴国谅解。不料邾隐公却是个记吃不记打的角色，回国后依旧荒淫无度，引发国人不满，吴国只好再次将其驱逐，改立太子革执政。

越灭吴的同一年，邾隐公从齐国逃奔到越，依靠越国的力量再次返国。但据说他回国后还是死不悔改，让越国人也感到不满意，不久后便再次将其拘捕，改立了公子何为君。而这个公子何据说也是一个无道之君，至于其是如何无道的，其结局又如何则不得而知了。

第二件事是处理鲁国内争事务。鲁哀公晚年，鲁国君卿关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鲁哀公一心想要清除三桓威胁，于是便于晋出公四年（前471年）亲自前往越国，试图以与太子适郢结亲的方式获得外援。有人将消息传回国内，季孙肥闻听大骇，急忙派人带上财礼贿赂太宰嚭，终于把一桩好事给搅黄了。

这件事让鲁哀公如鲠在喉，其与三桓的冲突也变得更加不可调和。三年后，也即晋出公七年（前468年），季孙氏宗主季孙肥去世，鲁哀公打算借此机会引越人剿灭三桓，却不料计划还未实施就被人抢了先。鲁哀公不敌三桓，只好出亡国外，并于当年去世，国人立其子宁为鲁悼公，鲁国的公室自此彻底走向了衰败。

第三件事是干预卫国内乱。这场内乱的根源还要追溯到晋国内战时期。晋定公十六年（前496年），卫太子蒯聩因刺杀夫人南子不成出逃晋国。后来卫灵公去世，其子公孙辄即位为卫出公，而蒯聩则在赵鞅护送下准备回国跟儿子抢夺君位，但却没有取得成功。无奈之下蒯聩只好退守戚邑，并在此居住了十几年。

到黄池会盟后，蒯聩利用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发动政变，从自己的儿子手中夺取了君权，即位为卫庄公。但他即位后，国内矛盾激化，卫国君臣之间经常爆发冲突，国外的晋、齐两国也都跑来干预卫国内政，使得卫国君位如跑马灯一般来回更替，政局变得极不稳定。

经过几轮激烈的角逐，到晋定公三十五年（前477年），卫出公终于回国复位，但仅仅七年后，就再次被人赶出了国门。为了能够继续坐稳国君的位置，卫出公派人到越国请求协助，但由于国人的激烈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无奈之下，卫出公只好跟随大军返回越国，并最终死在了异乡。

勾践对于中原政局的几次干预都没有什么成效，再加上中原诸侯对于越国的“蛮夷”身份缺乏认同，其妄图称霸的愿望也始终无法实现。彼时越王勾践已经年迈，自知将不久于世，为能在有生之年赢得霸主的虚名，便打起了仁义牌。他将原先吴国在中原侵占的土地全都归还给了鲁、宋、楚等国，这才勉强与宋、鲁、郑、卫、陈、蔡等国在徐州举行了一次会盟活动，获得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盟主称号。勾践于徐州会盟后不久便去世了，其一生所追求的霸业也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的波涛之中。不久，越国也步吴国后尘，逐渐走上了下坡路，不断被边缘化，直至最终为楚国所灭。

第五章 晋国历史的终结

第一节 晋阳之战

索地风波

公元前458年，是晋出公在位的第十七年。在智氏宗主智瑶（智襄子）的主导下，智、赵、韩、魏四卿瓜分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这一变故让晋出公怒不可遏，于是便在满腔怒火的指引下，派人致信齐、鲁等国，要求列国能念着往日的情分，为自己这个孤家寡人讨回哪怕一点点的公道。

但正如鲁定公试图援引越国打击三桓而身死异乡一样，晋出公如此做派，其结果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听说国君突然要搞事情，原本你争我抢、互掐得不亦乐乎的四卿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决定要以实际行动帮他增长些见识。于是不久后，晋国便出现了一条大新闻，说是国君一时有些想不开，打包了行李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谁知一个不小心就死在了路上。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这句话放在如今的晋国，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了国君的领导，四卿到底还是有些发慌，于是便急忙张罗着要立一个新的国君来为大家做主。作为晋国的执政，智瑶提出了一个他十分中意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作骄。

按照史料中的记载，晋骄是晋昭公的曾孙、公子雍（戴子雍）的孙子、公孙忌之子，其与昭公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悼公与襄公的关系，虽说已出三代血亲，却也算是正宗的公室枝叶。在实在找不出符合继承规则人选的情况下，让他来做国君似乎也不算违反原则，其余三卿自然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于是在经过一番合理的讨论后，这个原本没什么正经工作的晋骄便被推上了国君的宝座。

公元前456年，晋骄在一片惨淡中宣布即位改元，历史上一一般称其为晋哀公。由于早已没有什么可供支配的财产，晋哀公的即位仪式办得略微有些寒碜。

看到公室如今的凄凉图景，身为哀公父亲公孙忌故交的智慧瑶不禁扼腕叹息，于是便在朝堂上声泪俱下地立下誓言，要在有生之年重振公室。

晋哀公为智慧瑶的大义感动涕零，他激动地从台几前起身，走到智慧瑶面前下拜说：“伯父若真有此意，寡人也就心安了。”

初听到这个故事时，赵、韩、魏三家的主君都为执政的出色演技而拍手叫好，可当有一天智氏的使者真的登门拜访时，他们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了。

大约是在这一年的秋冬时节，三卿之中实力最为弱小的韩氏家中首先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者自称是智氏的使者，并向韩氏的家臣禀明来意，说是因为公室疲敝，国君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智氏主君感叹公室颓败而四卿豪阔，总觉不成体统，故而献出了一个万户之县以给养公室。考虑到国君毕竟是四家共同的主君，若只有智氏献邑，难免会有人说三道四，因此希望各家都能跟进，以切实缓解公室的“财政危机”。

此时韩氏的宗主名叫韩虎，史料中通常都以谥号称其为韩康子。他的父亲据说名叫韩庚，谥号为庄子。东阳内乱爆发时的韩氏领袖韩不信（简子）则是他的祖父。韩不信、韩庚生平事迹有限，世人亦不知其生卒年岁，在整个家族发展史上大体上都是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到晋出公后期时，掌管家族事务的便是韩虎了。

韩虎与智瑶素来不睦。据《国语》记载，早年智瑶伐卫归国时，曾在一个叫作蓝台的地方设宴款待前来接风的韩、魏宗主，席间他对韩虎及其智囊极尽羞辱之能事。

这次智瑶前来索地，韩虎动动脚指头都知道这是来者不善。使者美其名曰让各家献邑奉养公室，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不过是在“挟哀公以令诸卿”，以奉养公室之名行瘠韩肥己之实。

近百年来，晋国诸卿为了争夺土地而无所不用其极，对此韩虎倒也见惯不怪。让他感到愤慨的是，过去人们为了争夺土地明争暗斗者有之，巧取豪夺者亦有之，却唯独没有见过以公室之名前来行骗的！想到这里，韩虎便准备着人把使者打出门去，可就在此时，有一个浑厚的声音突然在他的背后响起：“主君万万不可啊！”

韩虎回头一望，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与他一同受辱于智瑶的谋臣段规。段规看到韩虎气得浑身发抖，便上前解劝说：“智瑶为人贪财好利且刚愎不仁。如今派人前来索取土地，若是不给，他必定会向我们用兵，主君又何必因小失大呢？还是给他吧！”

“可是……”

韩虎心中满是疑虑，正待要发问，只见段规不慌不忙地解释道：“你想啊！既然他已经动了这个心思，就决计不会只从韩氏这里索求土地。主君若是能忍一忍，姑且满足了他的愿望，必定会激发他的骄狂情绪，从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别人索取。一旦有人忤逆了他的想法，他必定会出兵报复，到时候我们静观其变、从中取利即可，何必要把自己推到前台去呢？”

韩虎听罢，惊出了一身冷汗：“多亏有你及时提醒啊！若是依着我的性子，铁定会得罪了智氏，且为整个家族引来不测之祸。你就是传说中那个能让死者复生、白骨长肉的人吧！”说罢，他当即按照段规之言，给智瑶划出了一座万户的城池。

智氏在韩氏这里得了便宜，很快就又把手伸向了魏氏。不久后，魏氏家中也迎来了同样的一位客人，且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身为魏氏宗主的魏驹（魏桓子，又称魏宣子）第一反应也同样是拒绝。同样地，在魏驹的身后也有一个智囊，在《资治通鉴》里，这个人名叫任章，看到主君气急败坏的反应，冷不丁地就问了一句：“为什么不给？”

魏驹被问得有些莫名其妙，于是便反问道：“无缘无故就找我要地，我欠他的？”

任章的解说与段规大同小异：“他既然无缘无故地找你要土地，肯定也会找其他人要啊！《周书》上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您给他土地，他必然会因此而骄横，一骄横就会轻敌，您不就有机可乘了吗？况且说了，他不断索取土地扩大地盘，其他人一定会产生恐惧心理。人们害怕智氏就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智氏就会成为天下公敌。用相互团结的军队来抵御轻敌傲慢的智氏，您觉得智氏还能长久吗？反过来讲，如果您不给他，他的野心得不到满足，天下人的恐惧也没有被激发起来，而您却成了强大智氏唯一的攻击对象，您真的有把握取胜吗？”

劝说魏驹的或许不止任章一人，在《战国策》里还有一个叫赵葭的谋士也说了同样的话。众口一词地同意割地，让魏桓子幡然醒悟，于是也派人把一个万户的城邑给了智氏。这样一来，智瑶的胆子也就更肥了，便又开始向赵氏讨要土地。

不过这次，智瑶就没那么好运了。赵氏宗主赵无恤（赵襄子）是个愣头青，听说智氏先后从韩、魏手中骗取了两个大县，如今又上门向自己讨要，心中的无名火便说什么也控制不住了。此时也不管旁人怎么解劝，他嘴里都只有简单干脆的两个字：“玩去！”

这两个字让智瑶感到很不开心。

以他过往的经验来看，从来都只有自己找别人碴的份儿，怎么可能会有人反过来倒找碴儿呢？既然有人这么不识相，就必须用实际行动来给他补补课。否则的话，若人人都以此效尤，这个执政还有没有点尊严了？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智瑶的政治角色也就由“挟哀公以令诸卿”转向了“奉公室以讨不臣”。

明谋定策

智氏使者破门而出的那一刻，赵无恤就知道自己闯下了泼天大祸，断定智瑶定然不会善罢甘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战争威胁，赵无恤急忙把重要的谋臣谏士都聚集起来商议对策。朝堂之上各色人等纷纷发言，但始终都见解殊异、莫衷一是，让赵无恤的心绪更加烦乱。

其间，赵无恤最倚重的谋臣张孟谈曾提议说：“先主在世之时，曾备制了大量贵重礼器，为的就是当国家有难时能够有备无患。如今大难将至，何不以这些宝物作为财礼向诸侯求援呢？”

张孟谈的话还没说完，赵无恤便简单干脆地回答道：“我没有可派的使者。”

张孟谈略一思忖，又劝说道：“或许地可以完成使命。”

赵无恤白了他一眼，辩解说：“很不幸，我这个人德行有失，跟先主没法比，所以先主能做的事情，到了我这里未必就能行得通。况且据我所知，地这个人办事能力一流，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他有个缺点，就是会用尽各种办法来满足我的欲望。说得难听一点，他这是在助长我的过失，以此来从我这里窃取俸禄。在关乎赵氏存亡的大事面前，我若是用他，岂不是在自取灭亡？”

当然了，赵无恤之所以拒绝这个建议，是因为他知道，求助于诸侯根本无助于解决内部问题，反而有着诸多危害。他犹记得四十年前的那场内乱，范氏和中行氏有齐、鲁、郑、卫、周、鲜虞等一大波盟友，可最终还是败给了赵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指望没有切肤之痛的外人，终究难以保全自己。那些身处局外的所谓盟友，说白了只是想趁火打劫以削弱晋国，并不会真心诚意地投入全部力量帮你打内战。

更何况，引外敌入晋是犯了大忌的。当年他的父亲赵鞅在绛都与大夫盟誓时曾一再强调，不要引外敌祸乱晋国。如今赵氏不尊奉公室已经是大逆不道了，如果再引入外部势力，势必让那些原本同情赵氏的人寒心，会因抗拒外敌入侵而转投智氏的。引入了一些无足轻重的所谓盟友，换来的却是民心尽失的结果，这是不明智的。

既然不能向外求助，那就要做好以赵氏自家力量与三家对峙的准备。如此一来，如何选择一个足以固守的根据地，就成了当务之急。赵无恤于是就向众人提问：“我们该去哪里固守呢？”

有人回答说：“长子距离近，而且那里城墙厚实完整，有利于保守。”

赵无恤红着脸说道：“为了修筑长子城，几乎耗尽了当地所有的民力，那里的百姓恨我都来不及，哪里肯与我同心协力、共同守卫呢？”

又有人提出：“那不如去邯郸，邯郸仓库殷实，可以固守。”

赵无恤的脸更红了，他说：“那些都是榨取民脂民膏才囤积起来的，往日里我们要了人家的粮食，如今还要让人家为我们拼命，你觉得可能吗？”

听到这里，众人也都颇感无奈。这时赵无恤转念一想，说：“还是去晋阳吧！那是先主简子属意的地方，尹铎在任时也足够宽厚，那里的百姓一定会与我们同心协力的！”

不过，在不同的史料中，关于这件事的细节有很多相异之处。比如《战国策》里，提出走保晋阳之计的依旧是赵氏的谋臣张孟谈，他指出：“先主简子在世时，曾安排董安于治理晋阳，后来尹铎因袭安于的治理办法，至今其政治教化遗风犹在。”

这里所提到的尹铎是赵鞅时期的一名贤臣。董安于死后，尹铎受赵鞅委派治理晋阳，临行前他曾问过一个问题：“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搜刮财富呢，还是想将晋阳作为保障之地？”

赵鞅没料到他会这么问，因此愣了一下，随后说道：“当然是要作为保障了！”与此同时，赵鞅还告诫尹铎说：“晋阳城沟深垒高，我每次见到这些，总会想到荀寅和士吉射，你到任之后一定要把那些壁垒全都拆除了！”

得到主君的嘱托，尹铎二话不说就走马上任了。到了晋阳，他故意少算居民户数，减少征税的基数，以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这些事情让赵鞅感到十分满意，因此就对赵无恤说：“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难，不要嫌尹铎的地位不高，也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晋阳作为你的归宿。”

不过，尹铎并不是事事都言听计从的顺臣，他在为赵氏广施恩德的同时，却并没有遵从主君的意愿将城墙壁垒拆毁，反而还命人把城防工事加高

加固，这未免又让赵鞅感到十分恼火。有一次赵鞅到了晋阳，看到坚固的城防顿时怒不可遏，说什么也要把尹铎给杀了才肯进城。若不是一个叫卹无正的人好言相劝，尹铎说不定还真就让他给碎尸万段了。

在董安于和尹铎的用心经营下，晋阳城既有坚固的城防，又有可同生共死的百姓，自然也就成了赵无恤的最佳避难场所。事不宜迟，赵无恤当即派延陵生带兵到晋阳先行部署，而他自己则抓紧时间，从各个封地里调集粮草军械，征召赵氏的军队向晋阳聚拢。

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赵无恤没办法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到晋阳城中，而其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便是箭矢的短缺。赵无恤于是就向张孟谈询问对策：“我仔细察看了城中的防御设施和府库钱粮，发现这些都没有问题。可唯一不足的是，围城之战必定会打不少时日，若是箭不够了该怎么办？”

这些难题的确很难破解，不过张孟谈却并无忧虑之色，而是略带神秘地说道：“我听说董安于修筑晋阳的时候，凡是公室的墙壁都会用狄、蒿、苦、楚填充。我看公室墙壁高度足有一丈有余，里面一定能存放不少东西，您何不破开墙壁试试？”

狄、蒿、苦、楚都是可以用来制作箭杆的材料，倘若张孟谈所言不虚，这必将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赵无恤听罢急忙让人动手破壁，果然就发现了不少存货，而且据说这些箭杆质地精良，经过多年的存储不仅没有朽坏，反而比竹子还要坚硬。

赵无恤如获至宝，高兴地捧着这些带着泥土的箭杆合不拢嘴。但很快，他的笑容便又凝滞了：“制作箭杆的材料是足够了，可如果没有铜簇，箭杆再多也都派不上用场啊！”

看到赵无恤这大喜大悲之色，张孟谈倒是愈发举重若轻了。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毕恭毕敬地回应道：“主君且勿忧愁。我还听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凡是公室的柱子都会以上好的炼铜填充。主君不妨将这些柱子都放倒，定然会大有收获。”

听他这么一说，赵无恤也心中释然：“原来先大夫竟有如此远虑！”当宫殿的立柱被全部刨开，红彤彤的炼铜露了出来，他更是兴奋得难以自制。

在完成了战前一系列的布局与动员工作后，智、赵双方都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了准备。公元前455年，智瑶打着国君的旗号，带着韩、魏两家的军队向晋阳逼近，晋国历史上一场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战争，终于，打响了。

晋阳围城

智瑶、韩虎、魏驹带着三家兵马进逼晋阳，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城作战。晋阳为赵氏根本，本来就城池坚固、战备充裕，再加上民众同仇敌忾，联军猛攻三月未能攻克，只好停止强攻，转为围困。

战争一时陷入僵局，让智瑶感到十分焦急。为了找到新的突破口，他信马由缰地带人四处巡查，不知不觉间便走到了一处山顶之上。站在山巅眺望晋阳城，便见远处连绵不断的群山如巨龙一般三面环绕，三山之间又有一条汾水，如玉带一般从城外飘过，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旁人看到如此景象，或许会心旷神怡，从而产生诸多感怀，然而在智瑶的眼中，此番景致却让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翌日，他便开始命人沿汾水修筑堤坝，将蜿蜒流淌的河水径直引向了晋阳城的方向。

智瑶这一招，可以说是极其阴损毒辣。

晋阳城三面环山，本身地势低洼，一旦遇到暴雨天气，雨水聚集很容易引发洪涝灾害。如今智瑶故意将河水引入，更是将晋阳城变成了“晋阳湖”，城内军民的住所特别是炉灶完全被浸泡在水中，原本错落有致的庭院街巷也都变成了蛙鱼虾蟹的天下。城中居民虽感念赵氏的恩泽，与赵无恤同心同德，宁愿依靠高地和树木“巢居而处，悬釜而炊”，也不肯背叛投降，可这终究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古代的城墙以及房屋大都以夯土筑成，长期在水中浸泡冲刷后易崩解坍塌。如果再经历冻融作用，墙体更是会发生冻胀和变形，防御功能也会被彻底瓦解。

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情况。军队作战、百姓生活都需要大量粮草物资，这些物资也都需要有良好的存储环境。一旦经过水浸，粮草就会腐化变质，兵器也更容易朽坏，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城内军民的战斗意志。除此之外，长期的河水浸泡还会滋生出传染病甚至瘟疫，由此引发的风险也让人不寒而栗。

面对智瑶兵围水困的布局，赵无恤似乎也毫无应对之策，因此直到两年后，晋阳城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了如此这般境地，不仅城中军民心有怨气，就连他自己的信心都受到了动摇。

有一次，赵无恤巡视全城，看到城内食物将尽，守城将士和城内居民都饿得皮包骨头、身体羸弱，不禁悲从中来：“赵氏是躲不过这场劫难了吗？”甚至在与张孟谈谈话时，他还隐隐地透露出了想要出城投降的念头。张孟谈当即正色道：“若是国家危难，不能想办法求存求安，那还要我们这些谋臣智囊干什么？主君还是尽早打消这个念头吧，臣这就去向韩、魏两家求救去！”

见到韩虎和魏驹后，张孟谈劈头盖脸便指责道：“现下智瑶带着你们攻打晋阳，赵氏恐怕很快就要灭亡了。但臣也听说‘唇亡而齿寒’，赵氏若是灭亡了，恐怕二君也很快就会成为砧板上的肉，你们难道就不感到担忧吗？”

韩、魏二人受到质问并未辩驳，而是反问道：“这些情况我们如何不知？可智伯为人严厉而刻薄，这你也是知道的。要是我们与你合谋的事情被他知道了，会产生什么后果想必你也清楚，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张孟谈心直口快，回答道：“计谋出自二君之口，入于臣下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的。”

韩虎、魏驹渐次提出了他们心中的种种担忧，而张孟谈则见招拆招，将他们的疑虑一一化解。经过几个回合的唇枪舌剑，终于说服两家同意帮助赵氏。随后他们又就战场的局势进行了分析推演，商定了一整套的行动方案以及危机预案，并就行动的时间和细节进行了一再确定，一个三家灭智的详尽计划便出炉了。

计划已定，张孟谈准备趁夜返回晋阳。可让他感到后怕的是，就在他经过辕门的时候，却遇到了智氏的大夫智果。两人四目相对的瞬间，张孟谈被吓得心惊肉跳，可又不敢表现出惊慌的样子，只能假装镇静，缓步走过这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等到智果远去了，这才强摇桨橹奔回晋阳。

而智果则完全没有料到张孟谈会出现在这里，因此虽有疑虑却并未放在心上。等到张孟谈走远了，他才突然缓过神来：这一定是赵氏派过来搞离间计的！想到这里，智果急忙回到大营去拜见智瑶，一进门便气喘吁吁地喊道：“韩、魏两家的主君恐怕会生变！”

二主必叛

猛听到这句话，正在筹划军务的智瑶不由得心头一惊，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嘴里有两个字也脱口而出：“为何？”

智果步伐急促走上前来，忙不迭地回答道：“臣在辕门之外遇到了张孟谈，看见他神情很是傲慢，走路时脚抬得很高……”

“你多虑了。”智瑶本来神情紧张，可当他抬头看到智果，反而就不那么在意了。还没等智果说完，智瑶就打断了他的话，漫不经心地说道：“我和韩、魏主君已经订立了盟约，破赵之后三家平分赵氏的土地。这些都是我亲口告诉他们的，也绝对不会食言，他们又怎么会欺骗我？你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些话实在不该从你的口中说出来。”

智果想继续劝说，可看到智瑶笃定的表情，又有些怀疑自己可能真的是太过于神经质了。古来摇唇鼓舌的游说之士，向来都带着几分傲慢，以此抬高自己的价值，提升游说的本钱，这些并不足以证明韩、魏二君已经被策反。在事情还未完全确定之前便下定论，也的确是太过于草率。

为了搞清楚韩、魏两家的真实态度，智果决定亲自探访韩、魏的主君，在与二人天南海北的闲聊中用心观察他们的表现。经过一番观察和试探，智果更加笃信自己的判断，于是又回去向智瑶汇报说：“两家主君神色游移不定，臣笃定他们意志有变，用不了多久一定会背叛您！不如趁现在把他们杀了，以防患于未然！”

智果的一番良苦用心并未引起智瑶的重视，对方反而轻蔑地说道：“我们包围晋阳已有三年，眼看着就要攻取晋阳、三分赵氏了，这个时候他们会改变心意？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能信啊！这个事情你就不要再提了！”

智果一听更着急了，便退而求其次：“若是不杀他们，最起码也要好生抚慰一下啊！”

“哦？”智瑶正待要离开，猛听到智果如此说，不由得又转过身来，“怎么抚慰？”

智果说：“魏驹的谋臣赵葭、韩虎的谋臣段规，这两人足智多谋、能言善辩，是可以左右二君决策的人。如果您能额外跟这两位谋臣约定，事成之后给他们各自分封一个万户之县，看到如此利好，二人自然会心动，韩、魏两家也就稳住了。”

智瑶听了忙摆摆手：“没那个必要！我们约定的是平分赵氏土地，若是再额外给他们两县之地，那我得到的土地就更少了，这样做实在不妥。”

除了智果，智氏内部怀疑韩、魏两家有可能会叛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战国策》提到一个叫郗疵的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警告。至于做出如此判断的缘由，郗疵给出的解释是：“臣不过是以人之常情来猜度罢了。主公与二君约定破赵之日三分其地，如今晋阳城水位高涨，未被水淹的城墙只剩下不到三丈了，晋阳攻破指日可待。然而我观韩、魏二君的颜色却不喜反忧，故而猜想他们一定是担心自己会步赵氏后尘，这便是反叛的迹象，主君不可不察啊！”

当然了，对于郗疵的这番推测，不少史料中还有一段前情提要。说是有一次，智瑶在韩虎和魏驹的陪同下视察军情，远看到晋阳城的衰败景象，智瑶不由得志得意满，便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水也可以亡人之国。”

言者无心，闻者足戒。韩虎和魏驹闻听此言突然感到莫名惊悚，因为韩氏建都平阳、魏氏建都安邑，两都分别位于汾水、绛水之畔。若是有一天智瑶故技重演，用绛、汾之水来攻，两家难免会重蹈赵氏的覆辙。想到这里，二君不免都有兔死狐悲的凄凉之感，于是便不约而同地提醒对方——魏驹用手肘碰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这个细节被郗疵看在眼里，因此才有了他劝谏智瑶的那番话。

不过，智瑶果然是自负过了头，这次他不但没有听劝，反而还把郗疵的谏言全都说给了韩、魏的主君听。韩、魏之君听后慌忙自辩道：“我们虽然没有主公您这样的雄才伟略，可还是懂得利弊的。赵氏马上就要战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放弃唾手可得的利益背弃盟约，去铤而走险追求无望的事情呢？”

紧接着，他们还使劲往郗疵头上泼脏水：“郗疵的做法恐怕是在为赵氏做谋划吧！您想啊！在如今的关键时刻让您怀疑我们、破坏三家攻赵的联盟，最后会对谁最有利呢？如果您偏听偏信这些谄臣小人之言而断绝三家友好之关系，臣实在是为此感到痛心！”

两家主君说完之后，故意表现出愤怒的神色，纷纷摔门而去。郗疵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急忙入帐拜见并关切地问道：“主君为什么要把臣的话告诉他们呢？”

“你怎么知道我告诉他们了呢？”智瑶立刻反问道。

“韩、魏主君出去的时候，使劲地瞪了我一眼才快步走开的，显然是知道我已经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这句话刚说出口，郗疵便意识到这番辩解有些多余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当自己提出质问之时，主君要么是解释原因，要么就顾左右而言他，绝对不会抛出“子安知之”这样的问题。如今既然问出来了，就表明他已不再信任自己，无论如何解释都是徒劳的。为了自证清白，郗疵只好说：“若是主君不弃，臣请求到齐国出使。”郗疵去后，便再也没有人愿意再提这桩事，智氏的最终命运似乎在这个时刻就隐然注定了。

三分智氏

再说赵氏这头。

张孟谈将与韩、魏两家商议好的具体方略带回晋阳，赵无恤听后激动万分，急忙安排人员前去部署。然而，张孟谈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还在为辕门突遇智果的事情忐忑不安。直到有一天，事先安排的密探送来一个消息，说智果因与主君不和，愤而请族内太史将自己开除出智氏，自立为辅氏家族。这个消息对于旁人来说或许无足轻重，可张孟谈听到后却像是受到了电击一般，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他欢天喜地地找到赵无恤，满怀激情地说了四个字：“是时候了！”

赵无恤让他这一惊一乍给吓得够呛，忙问这是咋了？张孟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去拜见二君回来的时候，在辕门外遇到了智果，我担心他会坏我们的大事，因此一直惴惴不安。如今听闻智果已经自立门户，可见智瑶并不信任他。但我们还是不可掉以轻心，万一智伯醒悟过来就万事俱休了。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联系韩、魏两家，提前在今夜采取行动，以免夜长梦多！”

无论是赵无恤还是韩、魏两家的主君，惊闻智瑶已经得知他们会面的消息，恐怕都被吓得不轻。尤其是韩虎、魏驹，当智果前来试探的时候，他们

都还被蒙在鼓里，如今想来真是脊背发凉。甬管之前是如何约定的，也甬管准备是否充分，到了这种时候，时间就是生命，提前行动已是必然。

当天夜里，韩、魏两家以巡查河堤为名，派人出其不意地杀掉了智氏派驻的守卫大堤的官员，随后又掘开大堤，将河水引到智氏军营。滔天洪水无约而至，使智氏军队顿时乱作一团。不少人尚在睡梦中便被卷入激流，只能在洪水的裹挟下苦苦挣扎；未遭洪水冲击的士兵纷纷依地势向高处突围，又被预先分两翼围拢的韩、魏联军掩杀。一片混乱之中，赵无恤则带着赵氏军队坐着小船冲进敌阵，与智氏军队正面厮杀。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智瑶也惊慌失措。惊悚之中，他想聚拢残兵，想组织反击，想突围出逃，却都未能如愿。在汹涌的洪水之中，人人都在争相逃命，山间奔走的呼号，水中绝望的呐喊，夹杂着河水澎湃的激荡，将他的声音完全淹没了。

他绝望地看着自己的军队被洪水冲散、被敌军阻截，目之所及能看到的只有狼藉破败的营地、横陈遍野的尸骨，耳之所闻能听到的只有将士被砍杀时痛苦的哀号。他恍惚见到“恶而无勇”的赵无恤正划着小船向自己逼近，却毫无抵抗的能力。

心中充斥着的悲痛让他甚至都忘了要在屈辱到来前，拿起手中的剑结束自己的生命。直到敌人越来越近，直到包围圈越来越紧，直到他看到满身鲜血的赵无恤，提着他那把已经砍钝了的剑，在自己面前高高扬起……

公元前453年三月，轰轰烈烈的晋阳之战落下了帷幕。

不久后，智瑶被人带到一个叫作凿台（今山西晋中榆次区西）的地方杀死，其头颅也被赵无恤制成了酒器。

智瑶的嫡长子智颜不知所终，另外两个儿子智宽、智开又负隅顽抗了大约六年的时间。到前448年，随着智宽投奔秦国，持续约八年时间的晋国内乱宣告终结，自原黯（荀息）入仕晋国后，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激荡二百余年的荀氏家族，作为一个整体退出了历史舞台。

智氏灭亡后，赵、韩、魏三家将其所有遗产全部瓜分，从此以后，三家愈富、公室愈卑，公室在晋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愈发无足轻重了。

第二节 历史迷雾

心恨败国

在论及晋阳之战智瑶以胜取败的原因时，人们大都依照儒家的传统，将其与吴王夫差等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是“极武而亡”的典型。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更是将其上升到了德行的高度，并做出一番精彩的论断：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如果说荀寅的失败是因为“无才”的话，那么智瑶的失败，归根结底便是所谓的“才胜德也”。司马光并不否认智瑶的才干，但正是因为他有才而无德，这才导致强大的智氏最终走向了败亡。

司马光的观点并不缺乏论据，在传统的儒家史料中，有关智瑶有才无德的例证不胜枚举，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智果劝谏智瑶的父亲智申慎择继承人的故事。

智申谥宣子，是范氏、中行氏之乱爆发时的执政荀跖（智文子）之子，大约在铁之战后不久成为智氏宗主。智申有两个富有才华的儿子，分别是智宵和智瑶，而在这二人之中他似乎又更喜欢智瑶。因为这个儿子兼具了诸多优点：仪态不凡、身材高大，箭术高超、精力充沛，技艺出众、聪慧过人，巧于文辞、辩才绝伦，坚毅果决、能谋善断……可以说集当时人们所认为的所

有美好素养于一身，是一个典型的长相俊美且文武双全、才华爆表的“高富帅”。

这样一个完美的形象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人们的青睐，即便是按照现代管理学的标准来看，也不失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看到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儿子，智申当然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就想把他确立为继承人。

但智氏的一个旁支亲戚智果，对智申的想法却很不买账，曾多次劝说让他改立智宵。在智果看来，智瑶的确是个“高富帅”，也具备诸多优秀的特质，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会将智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那就是“不仁”。如果让他来掌权，智氏必定会走向灭亡。

智申对此颇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按照他对两个儿子的了解，智宵其人庸碌无能，才华远不及智瑶；可要论起“不仁”来，却又远甚于智瑶。既然两个孩子在德行上都有欠缺，那为何要舍弃满腹才华的智瑶，反而要立平庸无能的智宵呢？

智果对此自然心中有数，他说道：“智宵虽然凶残，但那都是流露在表面上的，而智瑶的凶狠却埋藏在心里。”一个人表面凶狠，人们顶多是避而远之，这并不打紧；可若是一个人表面仁慈、内心凶狠，那就必定会亡室亡家。再加上智瑶又有那么多优点，他就会用这些优点去欺凌他人，从而干出更多不仁的事情。您要是在的时候，别人看着您的面子，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可真要到他执掌家业了，还会有谁会宽让他呢？

智果的这番说辞的确没有什么说服力。你拿智瑶的残暴来对比，并不足以推翻智宵为人残暴的缺点，而智瑶所具有的那些优点，智宵却一样也不行。如果换作是旁人，恐怕也难以认同他的观点，智申自然更听不进去，因此最终还是选择了智瑶为下任宗主。

斩岸堙溪

正如智果一再强调的，若是不论品行的话，智瑶的确是一个才智超群的人物。当历史进入了智瑶执政的时代，在他强有力的政治手腕控制下，晋国很快就掀起了又一轮对外扩张的热潮。

晋国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来都是对“戎狄”用兵相伴的，这次也毫不例外。自荀吴将晋国势力北扩至太原到石家庄一线后，北方“白狄”建立的中山等国就成了晋国对外扩张最难啃的骨头。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里，晋国与“白狄”国家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其间不仅晋国会时不时向北用兵，“白狄”也经常主动出击，对晋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比如公元前506年的召陵之会之所以虎头蛇尾，据说就与中山对晋国的压迫有很大关系；而范氏、中行氏之乱爆发之际，中山更是与东方诸侯协同配合，给深陷内战旋涡的晋国制造了不少麻烦。

智瑶执政期间，一度曾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北方，比如在《韩非子》的记述中，便有一个智瑶伐仇由（又作夙繇）的故事。与当年荀吴伐灭的无终国类似，仇由位于今天山西盂县东北一带，当地多崇山峻岭，且有原始植被覆盖，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供晋国的战车通过。即便是延续荀吴时“毁车为行”的战斗组织，想要通过莽莽大山吞并仇由，其难度显然不会比征服无终国更小。

但这些困难都难不倒智瑶，他想了一个很讨巧的办法，就是差人铸造了一口大钟，声称要送给仇由国君，以显示两国两家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白狄”的君主大抵上都有这样一个烦恼，那便是由于疏于礼乐，使得他们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始终不能为中原国家接受。如今有大国上卿赠

送如此贵重的礼器，这不就表示要接纳自己了吗？仇由国君自然大喜过望，说什么也得把那口钟拉回来。

当然了，仇由国还是有明白人的。有一个名叫赤章曼枝的大夫知道智瑶来者不善，于是就劝谏说：“只有当小国侍奉大国时，才会赠送钟鼓礼乐的器具，如今却完全反过来了。我担心他们会派大军尾随，图谋灭我仇由，所以还是放弃吧！”

跟之前所有故事的套路一样，不听劝的一定会吃亏，仇由国君便是这样的典型。任由旁人怎么劝说，他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愣是让人“斩岸堙溪”在崇山峻岭之中开出一条路来，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久后，智瑶便很尽责地沿着新修好的道路前去给他们送了“钟”，仇由国君也算是亲自挖了一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晋国与中山之间散布着许多类似于仇由这样由“白狄”建立的定居国家，均在智瑶执政期间被一一扫除，中山也就完全暴露在晋国人的铁蹄之下。从《竹书纪年》和《国语》等史料的零散记载可知，智瑶和赵无恤都参与了对中山的讨伐，但并没有确切地说明中山国是否被晋国所灭。不过从后来的史料中可见，赵、魏双方发生矛盾时，赵国为避免冲突有复立中山的举动，似乎表明彼时中山已经是赵国属地，而这极有可能是智瑶时期对外征伐的成果。

谋卫伐郑

讨伐北方“戎狄”可以极大地扩展晋国的版图，能够带来马匹、铜铁矿石等重要战略物资，但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讲，这并不是什么划算的买卖。在当时的封建领主眼中，可耕种的土地显然要比险要的地形更重要，熟悉农

业生产方式的劳动者数量也比单纯的人口数字更加令人激动，这些优质资源显然是开发程度较低的北方高寒地区无法提供的。

为了进一步扩充财力，晋人很快又掉头向南，将魔爪伸向了那些中原友好邻邦。而与韩起执政时扭扭捏捏、欲盖弥彰的做法不同，自从中原霸业秩序不可挽回地走向崩塌之后，晋国就完全放弃了追求霸业的努力，更放弃了对诸侯提供保护的义务。这也使得晋国可以从容地抛掉思想和道德的包袱轻装上阵，在侵吞他国土地时也完全没有了负罪感。

在这一波扩张浪潮之中，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与晋国接壤的郑、卫两国。在汉代的一些史料中，散见几个以智瑶为反派角色的故事。在这些离奇的故事中，智瑶就像是青青草原上的灰太狼，屡次三番使用诡计进犯卫国，结果都被勇敢无畏的卫人识破，最后碰得灰头土脸。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次，吴国使者赤市出访晋国，在途经卫国时，卫国大夫宁文子对其以礼相待，临走时还送了不少礼物。后来赤市顺利完成使命准备回国，智瑶也盛情相送，命人以一艘巨轮载赤市渡过黄河。

一般来说，大夫渡河只需以一方舟济之即可，晋国如此大费周章，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使臣应当享受的规格。事出反常，必有妖孽。赤市不敢掉以轻心，急忙命人四处查探，果然就发现雾色之中有大量运兵船尾随在后，准备以其为掩护偷袭卫国。赤市有感于宁文子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干脆就装病不去卫国，智瑶的偷袭之计自然也就落空了。

还有一次，智瑶送给卫君四百匹野马（后文为四匹）和一块白璧。卫君得到这些馈赠心中欢悦，于是就让群臣前来庆贺，但就有那么一个叫南文子的人不喜反忧。卫君感到十分扫兴，于是就派人前去质问，南文子回答

说：“我们对晋国既无功劳也无苦劳，晋人为什么要送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呢？更何况，四匹马外加一块玉璧，这是小国赠送大国的礼物，如今却偏偏反了过来，这如何解释呢？”

事出反常必有妖。卫君也是个明白人，赶紧让边邑加强戒备，后来果然就发现智瑶带着一队人马朝卫国摸过来了。智瑶本来打算趁着卫国君臣麻痹大意的时候发动偷袭，却不料偷袭不成，还白白搭上了几匹良马，心里那叫一个气啊！

不久之后，智氏嫡长子智颜突然致信卫君，说自己被父亲驱逐，希望能到卫国避难。这本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卫君不假思索爽快地回复说：既然你在晋国待不下去了，那就过来吧！

但这个时候，那个叫南文子的大夫又来了，他对卫君说：“智颜很受智瑶宠爱，而今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怎么就突然要投奔卫国了呢？”

卫君跟这个南文子简直就是一对“黄金搭档”，南文子的话一出口，卫君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于是很快，被派往边境迎接的人便收到了一条命令，要求必须清点智颜随行的车辆数目，如果超过五辆就拒绝入境。

这个消息自然也传到了晋国，智瑶本来是打算让大部队混在太子车队里突袭卫国的，可当他听说卫国边境“安检”工作突然升级了，便知道这次的计谋又被识破了，只好再次放弃了伐卫的打算。

我们大可不必在意这些故事的真假。从这些故事中可以体现出的信号是，在智瑶执政时期，晋国与卫国的关系十分紧张，两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同样的，与晋国只有一水之隔的郑国，也免不了要频繁应对来自晋国的压力。

在《左传》最后几年的零散记录中，智瑶伐郑的记录总共有两次，一次是在晋出公七年（前468年），另一次是在出公十一年（前464年）。只是与“青青草原”的叙事方式不同，晋国对郑国的侵扰之所以未获大功，更多还是受到了来自齐国的制约。

自打召陵之会后郑、卫两国相继叛晋以来，这两个国家便一头倒向了齐国。一开始齐人还以为是又迎来了复霸大业的曙光，可折腾了几年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梦幻泡影。齐景公连续多年向晋国发力，最后不仅没能实现人生理想，反而彻底将国家政权推到了田氏的手中。而田氏在完成了篡夺权力的一系列运作后，为争取民心，同时出于遏制晋国扩张的需求，也乐于参与中原的战争。因此当郑、卫两国同时面临晋国的侵扰时便频繁出兵相助，从而将郑、卫两国的千里沃土变成了晋、齐两大列强角力的舞台。

多陵人者

智瑶执政之后，晋国与齐国还有过几次直接接触。比如在晋出公三年（前472年）六月，刚刚执政的智瑶亲自带兵伐齐。战斗爆发之前，他原本想靠近齐军营垒探查虚实，谁知一个不小心战马受惊、战车失控，其行踪一下子就暴露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智瑶当机立断，决定亲自向齐军致师。他对自己的随从喊道：“齐军已经看到了我的旗帜，如果我们当着他们的面退回去的话，会助长敌人的志气。”说罢便策马驱车直奔齐军营垒。

作为中军主将，只带了几个随从就亲自前往敌营致师，这可是亘古未闻之事，但智瑶还真就做到了，可见其勇武绝非虚言。不久之后，两军在犁丘（今山东齐河东北，齐邑）展开激战，智瑶一举击溃齐军，并夺回了英丘，其指挥作战的能力也得到了实战的检验。

晋出公七年夏天，智瑶带兵讨伐郑国。执掌齐政的陈恒（陈成子、田常）为了援救郑国，不顾大雨倾盆、道路泥泞，千里行军奔赴郑国而来。眼看齐国决心很大，智瑶不愿跟对方死磕，于是便对周围人说道：“出门的时候我只为伐郑是否吉利占卜过，跟齐军作战还没占卜。”说罢便带着大军回去了。

故事的前半段，智瑶还算是一个思路清晰、头脑正常的人物。可就在他宣布撤军之后，却突然做了一件多余的事，使得他的人设开始急速崩塌。

为了对陈恒表示羞辱，他派人到齐营传话说：“你们田氏是陈国的后裔，有些话不妨跟你说清楚。我听说陈国的灭亡，郑国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寡君为此感到十分忧心，因此才派瑶来调查实情。既然您也来了，那就顺便问一句，您可曾对陈国的灭亡感到过忧虑呢？若是您自个儿都本末倒置，对陈国的灭亡毫不在乎的话，那我就更没意见了，这就回去向寡君复命！”

智瑶对陈恒的为人充满了不屑，话里话外满是羞辱之意，惹得陈恒大怒，说：“经常欺压别人的都没有好结果，难道你智伯就能够长久吗？”

人设的崩塌通常都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在陈恒这里吃到甜头后，智瑶突然发现羞辱人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了。比如在上文提到的蓝台之宴上，他便公然羞辱了韩氏君臣。彼时有智氏宗室大夫智国曾劝智瑶早做防备，否则会有大难临头，谁料智瑶却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有没有大难那得看我的心情，现在晋国就属我最为强势，我不发难，谁敢率先对我发难呢？”

智国十分忧心，仍旧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可不能这么想啊！郤氏的车辕之役，赵氏的下宫之役，栾氏的固宫之变，中行氏和范氏的叛乱失败，这

些旧事您都是知道的。一个人屡犯过失，造成的怨恨往往不会表现在明处，因此要防微杜渐，在事情出现苗头之前就要有所防备。况且，怨恨也不在于大小，君子能够谨言慎行，在细微处注意自己的言行，才不会招致祸难。蚊子、蚂蚁、黄蜂、蝎子看起来微不足道，可他们一样也能害人；一个人即便能量再小，也有让人感到恐惧的时候，更何况是主君和辅臣呢！如今您在一次宴会上就羞辱了一家的主君和辅臣，还说他们‘不敢向我发难’，这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

智瑶为人狂傲，不仅对相对弱势的韩氏君臣不屑一顾，对与其实力不相上下的赵氏也同样不会心慈手软。比如晋出公十二年（前463年），智瑶带着他的下属赵无恤讨伐郑国时，就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当时面对大国的征讨，郑国执政驷弘一点也不感到着急。因为自打人设崩塌以后，智瑶刚愎自用、争胜心强的缺点便广为人知，驷弘也算是多有耳闻。他认为，面对这样的对手，郑人只需要频频示弱，对方得了便宜自然会退兵。因此在作战的时候，郑人的抵抗都十分消极，晋军很快就攻破了外城。

郑国的表现让智瑶感到十分骄傲，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身边还有个赵无恤，于是就转过头来指着内城的城门说：“你给我打进去！”

听到这个命令，赵无恤也是一脸蒙，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同时恭敬地回应说：“主在此，无恤不敢先行入城。”

智瑶横竖都看他不顺眼，就趁机挖苦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长得丑还没勇气，也不知道你父亲究竟抽的什么风，竟然会选你继任！

“长得丑还没勇气”，这种话也亏他能想得出来。要是一般人，听到这话早就忍不住要动粗了，可赵无恤是何等样人？他有着超出常人的忍耐力，面对智瑶的羞辱不动声色，只是平淡地回了一句：“因为我能忍受耻辱——就算有百般不是，至少不会危害赵氏宗族吧？”

除了为人处世上放荡不羁外，智瑶也兼具了历史上所有昏君暴君都具备的一大特质，那就是贪图享乐。据说在晋阳之战爆发前夕，他曾建造了一座华美的宫室，众人对此都称羡不已，但有一个叫士茁的大夫却当着众人的面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宫室美则美矣，可我却总感到有些担忧啊！”

听到士茁如此说辞，智瑶照样不以为然：“你是担心过度了吧？”

士茁回答道：“臣秉笔事君，因此熟读古代典籍。我记得有一本书上说过这么一句话：‘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如今您将房子造得如此华丽，怕是榨取了不少民脂民膏，也寒了不少士人的心吧？我担心它一旦建成，人心会有不安啊！”

从这些描述中可见，智瑶的人设与之前的吴王夫差，以及后来史家笔下的隋炀帝颇有几分类似。他们都是生得一表人才，且颇具文韬武略，再加上善于伪装，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总给人一种十全十美的印象。然而即位之后，失去了管束的他们都开始好大喜功、贪图享乐，以至于闹到最后亡室亡家，为天下笑，看来“才胜于德”的确不是什么好现象。

常山宝符

与智氏怎么看都不对味的家风恰好相反，赵氏的家教可以说是出了名的严苛，其前任宗主赵鞅（赵简子）在选择继承人时也是慎之又慎，跟智申的轻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根据《史记》记载，赵鞅的嫡长子名叫伯鲁，按照儒家立嫡立长的原则，早先已被确立为太子人选。但有一天，赵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名叫姑布子卿。此人在江湖上很有盛名，据说曾给孔子相过面，说孔子从正面看有王者之风，从背面看则像丧家之犬。如此名望之士亲自登门拜访，赵鞅自是大喜过望，急忙把儿子们都叫过来，好让他给看看相。

不看不要紧，这一看就出了大问题。姑布子卿对这些儿子一个都看不上，只是不停地摇头说：“没有能做将军的人！”

赵鞅这下可就慌了：“莫非这是天要亡我赵氏？”

姑布子卿并不答话，而是若有所思地四处张望，同时有些漫不经心地问道：“你确定所有人都到场了？我刚才在外面见到一个孩子，很有将军风范，是不是你儿子啊？”

赵鞅一想，或许还真有遗漏的，赶紧命人把庶子们都叫上来。等赵无恤进门，姑布子卿突然惊叹起来：“就是他了，此真将军也！”

姑布子卿一时情绪激动，反倒让赵鞅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在一旁扯了扯子卿的袖子，很是难为情地说道：“他的母亲是从“狄国”来的婢女，地位低贱，您会不会看错了？”

姑布子卿显然对自己的相面功夫充满了自信，他确证无疑地说道：“不会看错！如果这是上天的意志，即便是卑贱的人也可以显贵。”

在赵鞅长期的观念中，从来都是贵贱有分的，高尚的事情就应该让高贵的人去做，出身低贱的人如何能够担当大任呢？如今姑布子卿这么一说，倒让他有些怀疑人生了。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姑布子卿认为无恤贤能，那就暂

且把他列为考察人选吧！出身卑贱的赵无恤据说也正是以此为契机，进入了父亲赵鞅的视野之中。

赵鞅对诸子都有着严格的标准，从小就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有针对性的训练，而且还时不时要脑洞大开地对他们开展各种考核。有那么一次，他出了一道题目，说是自己闲来无事，在常山藏了一个宝符，让儿子们去找，谁先找到这块宝符就归谁。

拿到考试题目后，一班人马不停蹄地跑到常山，开始漫山遍野地寻找宝藏。结果找了个把月，谁也没能找到宝符，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赵鞅对儿子们感到特别失望，但就在这时，那个不起眼的儿子赵无恤却不慌不忙地走进来说：“您藏的宝符，无恤找到了。”

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赵鞅也很惊讶，就问：“那你拿出来吧！”

赵无恤不紧不慢地说道：“无恤在常山巡查多日，发现常山山势险要，且俯临代地，以此地为根据攻取代国有如探囊取物。君父所说的宝符，可是此物？”

赵鞅听罢拍案叫绝：姑布子卿所言不虚啊！然后马上就决定废掉伯鲁而立无恤为太子。

除此之外，《韩诗外传》中也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天，赵鞅将日常训诫的言辞凝练成了十二个字“节用听聪，敬贤勿慢，使能勿贱”，刻在竹简上交给伯鲁和无恤，并嘱咐他们说，一定要时刻铭记这些话。

三年之后，赵鞅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问话，询问他们是否还记得竹简上的内容。事情过去已经太久，伯鲁早就把竹简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更遑

论还要记起上面的话了，最后支支吾吾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蹦出来。赵鞅很生气，就问他竹简去哪儿了，结果伯鲁说丢了，赵鞅这下就更生气了。

轮到赵无恤的时候，他不仅非常熟练地将那十二个字完整地背了出来，还当场从袖子里掏出几乎已经磨平的竹简，显然是时时刻刻带在身上、随时随地背诵领会。赵鞅一看，孺子可教啊！他对无恤的表现简直不要太满意，当即就立无恤为太子，并将赵氏的家业都传给了他。

以上这些故事不论确实与否，我们都能从中得出一些确切的信息。由于母亲是“狄国”的奴婢，赵无恤从小便因出身低微饱受冷落，甚至受到歧视，这也让他养成了善于隐忍、心机深重的个性特点。这种个性使他往往给人一种怯懦、畏缩的观感，与出身高贵且个性张扬的智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无怪乎智瑶会从心底里瞧不上他。

赵鞅去世之后，尽管智瑶以执政之尊几乎将对外征伐的丰功伟业都包揽了，但赵无恤还是见缝插针地找到了不少建功立业的机会。

公元前475年，在接替父亲赵鞅成为赵氏的宗主之后，赵无恤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常山宝符”攻取代国。

代国与中山毗邻，早年与赵氏有姻亲关系，算起来其国君还是赵无恤的姐夫。赵鞅死后不久，赵无恤尚在守孝期内，就身披丧服北登夏屋山，提出要设宴款待自己的姐夫。

夏屋山位于山西代县东北，从夏屋山向东北方向延伸，就到了今天的北岳恒山，也就是当时的常山。与此同时，夏屋山与句注山紧紧相连，地势险要的军事要地雁门关就在这一区域。在漫长的帝制时代，这一片山区一直都是中原王朝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防线。代国凭借着山川形势有恃无

恐，从来都没有想过晋人还会打自己的主意；再加上他们与赵氏之间的姻亲关系，使得代君对赵无恤全无防范之心，因而满心欢喜地就前去赴宴了。

然而让代君万没想到，正当他酒意正浓的时候，原本和蔼恭敬地为自己盛饭的厨子却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将手中的铜勺一挥，直接砸在代君的后脑，使其当场毙命。紧接着，预先埋伏的甲士以及随身带着武器的舞者也都一拥而上，对着代国的士兵一顿乱砍，最后无一人侥幸逃生。杀死代王后，赵无恤迅疾点兵伐代，将其正式纳入了赵氏的管辖范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赵无恤设计侵灭代国的举动对赵氏自然是有利的，但也苦了他那可怜的姐姐代嬴。得知代君已死，代嬴独自走出城去，登上了一座高山，远望着自己生活多年的土地，哭天抢地悲恸不已。

过去所有的美好生活，终究随着代国的灭亡而烟消云散，任她再如何哭泣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她将头上的簪子磨尖刺入了胸口，以此追随自己的丈夫而去。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多情的女子，便将她殉情的那座山改名叫作摩笄山。

跟妄自尊大、独断专行的智瑶相比，赵无恤虽说也不是什么完人，可毕竟称得上是一个很听劝且能礼贤下士的典型。他终其一生都将父亲教诲的“节用听聪，敬贤勿慢，使能勿贱”牢记心间，即便是创造了诸多功业，也总能保持戒惧的态度，并身体力行地践行这十二字箴言。

比如《国语》中就提到，有一次新稚狗（新稚穆子）讨伐中山，攻取了左人、中人（河北唐县）等地，取得大捷。战胜的消息传来，赵无恤不喜反忧，脸上甚至还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有侍者见其面色不豫，于是便询问其故，赵无恤回答说：“没有淳厚的德行却福禄并至，这不是福气而是侥幸，我实在担当不起如此快乐，因此才感到恐惧。”

当然了，在史料残存的诸多事迹当中，最能体现赵无恤优良品质的，当要数他在处理有关中牟事务时所表现出的开明态度。

举贤纳谏

中牟是晋国东阳地区的一座军事重镇，东阳内战期间也曾是范氏、中行氏对抗公室军队的一个重要据点。大约在战争进行到第五年的时候，中牟宰佛肸据邑反叛，投入赵氏阵营，这对赵鞅打破僵局取得战争主动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到战争结束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赵鞅在出兵报复卫国回国途中，竟又派兵将中牟给围了。据有关方面推测，很有可能是佛肸再次叛变了，而且这次的叛变似乎也很彻底，一直到赵鞅去世还没有平定，这个重要任务自然就交到了赵无恤的手中。

赵无恤在安葬了父亲后，旋即调兵遣将包围中牟。或许是天公作美，赵家的军队还没有集结完毕，中牟的城墙就突然崩出个宽约十丈的大窟窿。军人们高兴坏了，都说这是有上天襄助赵氏，若不趁机攻入，岂不是让老天爷也没面子？可赵无恤就是一个倔人，任凭左右好说歹说，就是不想乘人之危，还下令说在对方修好城墙之前，谁也不许靠近。

军人们听了自然不乐意了，赵无恤便解释说：“我记得叔向曾经说过，君子‘不乘人于利，不厄人于险’。趁着对方城墙损坏而攻取，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咱们还是等着吧！”

这样的戏码并不新鲜。比如晋文公伐原克阳樊、荀吴伐鼓围昔阳时都用过这招，而且后来的结果也大差不差，城里的人一看：“这不就是明君吗？遇到这样的仁义之师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麻利地开城投降吧！”于是乎，父亲赵鞅十五年都没办成的事，赵无恤用了短短几天就解决了。

这样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实际，我们不敢乱猜，反正书上是这么写的，就姑妄听之、姑妄信之。总而言之呢，中牟城又重回赵氏的怀抱，毕竟是喜事一桩。不过，赵无恤并没有掉以轻心，因为如何处置战后事务也同样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旦处理不慎后果会很严重。

就比如说，早年佛肸背叛赵氏的时候，城里有很多人都是极不情愿的。但佛肸用了一个办法，他把全城的贵族都聚集在一起，院子里还煮着一口滚烫的鼎镬，威逼到场的人说：你们要是跟着我干，事成之后吃香的喝辣的绝对少不了你们；可如果有谁不乐意，那就是我的敌人，今天我就当众把你给煮了！

看到鼎镬里滚烫的油水，院里的人大都被吓得哆哆嗦嗦，只有乖乖投诚的份儿，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可偏偏人群里就有个硬骨头，这个人的名字叫田基（又称田卑），他不仅不肯听从佛肸，还对在场的人说道：“我听说，内心坚守正义的君子，不会因为贪图高官厚禄而动摇信念，也不会因为害怕斧钺加身而向恶魔低头。与其无义而生、不仁而富，倒不如死了好！”说完就准备往鼎里跳。

佛肸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可也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听了这番话，觉得挺有一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风度，就急忙上前拉住了田基。

这件事后来传到了赵无恤的耳朵里，他也觉得这样的君子实在难得，因此等到攻下了中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赏田基。可没想到田基这个人太有风格了，他就连赵无恤的面子也不给，还说什么“廉士不耻人”，“一人举而万夫俯首，智者不为也；赏一人以惭万夫，义者不取也”。

意思是说，中牟的这些百姓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并不愿意跟着佛肸造反，只是面对佛肸的威逼不得不从罢了。如果我接受了你的赏赐，那么中牟的万千百姓就会因此而感到羞耻、惭愧、自责、无地自容，这不是智者、义士该有的作为。

田基因不愿受赏，最后背井离乡去了楚国，据说在楚国受到了重用，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紧接着，赵无恤还有一件棘手的事要处理，那就是对佛肸母亲的处置。

按照晋国的法令，“以城叛者，身死家收”，实际上就是满门抄斩。不过佛肸的母亲却并不是任人宰割的愚人，她不想就这么白白地送死，于是就跟审理她的士长说道：“你们不应该杀我！”

士长就喜欢治这不服气的人，于是就拿着法律条文一条一条地念给她听，一边念还一边得意地问道：“我念的可都是国家颁布的法令，你帮我找找，这里面哪条说你不该死了？”

谁知这老母亲脾性高傲，不愿意跟这些低级官吏分辩，她喝道：“我犯不上跟你讲这些道理，把你们主君叫来，我亲自跟他说！你要是请不动他，也没什么大不了，老妇我最多不过一死而已，但你们主君的损失可就大了！”

士长一听这话也挺生气，可又总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只好乖乖地把赵无恤给请了来。老妇人不认得赵无恤，见了面之后依旧是那句话：“主君不来我不说！”

赵无恤感到很好奇，于是就问道：“我就是赵氏的主君。说吧，你为什么认为自己不该死呢？”

“哦，你就是主君啊？那我倒想问问你，我为什么就必须死呢？”

赵无恤一听颇有些摸不着头脑，心里琢磨了半天总觉得这话问得好像也没什么道理，于是就回答说：“因为你儿子造反了啊！”

“啊！照你这么说，儿子造反，母亲就必须死啊？这算什么理由呢？”

“这很容易理解啊！”赵无恤挠着头回答道：“母亲对儿子负有教养的义务，您的儿子走上了造反的道路，说明您没把他教育好啊！这样的母亲难道不该死吗？”

“咦……我还以为你能讲出什么大道理呢？没承想全是歪理邪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倒怪老妇我没教育好儿子，你怎么不说是你主君自己的责任呢？”老妇人摇了摇头辩解道，“我听说，儿子小的时候不听话，那是母亲的责任；长大以后不堪用，那是父亲的罪过。而且你们也常说，女人要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我丈夫死得早，家里什么事情都是我儿子做主，我哪里还有教育他的义务呢？再说了，我儿子从小就是个乖孩子，老妇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把他交到你的手里，他就不再是我的儿子，而是你的臣子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肩负起教育他的责任。如今你没有把他教育好，却反过头来要怪罪老妇，有你这么甩锅的吗？”

佛肸母亲这番话吧，也不能说没毛病，可赵无恤就是想不出反驳的理由，他只好向老妇人认错，说：“您说得对，都是寡人的错啊！”最后也只能把她给放了。

中牟的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因为韩非子还有话说。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中牟收复后，赵无恤任命王登为县令。王登走马上任没多久就打报告说：“我在中牟发现了两个人才，一个叫中章，一个叫胥己。这两个人都是德行高尚、博学多才的士子，您为何不重用他们呢？”

赵无恤对王登十分信任，既然是他推荐的人才，那绝对没问题，于是胳膊肘一挥：“那就任命他们为中大夫吧！”

有家臣不理解，于是就问道：“中大夫那可是大官啊！您连见都没见他们一面，就让他们无功受禄，我担心其他人会有意见。”

赵无恤对此毫不担心，他说：“我选拔王登的时候是亲自面试过的，他这个人绝对可靠。所谓用人不疑，他的耳目就是我的耳目，他考察过的人就等于是我考察过了。否则若是每个受到举荐的人都要我亲自相看，岂不是完没了了？”

这个故事很有儒家风范，但作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脑回路显然不会这么简单。所谓“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国君有什么偏好，老百姓就会朝着什么方向努力，王登一日举荐了两个中大夫，中牟的百姓就会心向往之，他们也会纷纷抛弃土地、卖掉田宅去追求私学。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太平的时候他们不能贡献粮食，有战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又扛不起武器，长此以往国家必定走向灭亡。

法家与儒家向来水火不容，凡是儒家倡导的东西，法家多半都会反对，反之亦然。在举贤这件事上也是如此，法家崇尚军功爵制，对于带有感情色彩的推举机制向来是看不惯的，可儒家却偏偏奉为圭臬。甚至在儒家看来，一个人是否能够推荐贤人，是他自身贤能与否的重要标志。

比如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当今之世，谁能够称得上是贤人呢？”

孔子抖了个机灵，说：“我没见过。要说以前的话，齐国有鲍叔，郑国有子皮，他们算得上是贤人。”

这下子贡就不理解了：“难道管仲、子产还比不上他们吗？”

“你这就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孔子得意地说，“我问你，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人和能推荐贤士的人相比，哪种人更当得起贤能二字呢？”

“当然是能举荐贤士的人了！”

“我只听说过鲍叔举荐了管仲，子皮发现了子产，却没有听说后两者举荐过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啊！”

这个逻辑当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若是我们认定了管仲、子产不是贤人，那么在链条的另一端，鲍叔、子皮的举贤就不再成立，他们所谓的贤便也无从谈起。不过，儒家是最不讲逻辑的，我们还是姑且按照儒家的标准来看，赵无恤重用王登，而王登又能举贤，可见他在辨才、识才、用才方面的确有慧眼。

才德之论

史料中用以褒奖赵无恤贤德的故事有很多，用以讽刺智瑶失德的故事也有很多，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列举。总的来说，将智瑶和赵无恤放在一起，这

画风简直不要太美：他们一个生得英俊潇洒、智勇双全，同时还有各种“女频男主角”的光环加持；另一个则不仅长得丑，而且还没才情、没勇气。若是一般的编剧或者小说作者，绝对不会让自己的主角变成后者的模样。

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长得帅的被人砍了头，有才情的头骨被人做了酒器，倒是那个连亲爹都看不起的“猥琐男”成了最后的赢家，你说气人不气人？

当然了，两个人外在形象的强烈反差，更多的恐怕还是史家有意为之，最终的目的是为儒家所推崇的德性论做铺陈。智瑶万般皆好，唯一的缺点便是不仁，他的所作所为显然称不上是正直中和，而从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贪婪、骄横和刻薄寡恩，则严重地拉低了全社会的道德水准。赵无恤万般不是，可人家就是德行高尚，且有着礼贤下士、居安思危的优良品质，使得即便是他这样一个毫无亮点的人，也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差，才更能够印证儒家“仁者无敌”的重要作用。

司马光也正是以此为据，得出了他引以为傲的结论，认为自古以来，凡是导致家国败亡的，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之人。推而广之，他还将这个结论引申到现实政治中，指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人主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要将候选人的德行作为考察的首要标准，而不能仅仅看这个人才能的大小。如果你运气不好，实在找不出一个能达到圣人、君子水平的人可以任用，那么与其选择有才无德的小人，倒还不如找一个无才无德的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小人一旦受到重用，就会无恶不作。这种人因为有智谋、有能量、有勇力，一旦作起

恶来，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住他，造成的危害也难以预估。相反，愚人虽也无德，可由于他能力不逮，就算是想要作恶，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司马光的这段话在我们如今也很有市场，不少人至今都将其奉为金科玉律，视为择人选人的黄金标准。但问题是，道德或者所谓的“德行”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古往今来从来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在现实条件下，界定一个人的“德行”是否高尚，显然要比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庸才要难得多，这无异于是给《资治通鉴》最初的读者——也即当世的帝王们——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既然这项技术太难掌握，弟子们学不会，那么做出这些论断的老先生是否又做到位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政敌王安石在东京城里与神宗皇帝一唱一和，搞变法、改古制，混得风生水起，而自己却只能在洛阳城中看着夕阳著书立说，心中的苦闷自是无处发泄。他将所有的怒气都倾注在这部鸿篇巨制当中，同时也将对王安石的批判全都渗透在这字里行间，这里所提到的“小人挟才以为恶”很大程度上便是对变法者无情的影射。

如果一切都止步于此的话，司马光必定会以其伟大的著述流芳千古，不会留下丝毫的污点。然而，他对王安石的恨意实在太深了，恨到即便是让自己身败名裂，也决不允许对方的新法继续为害人间。王安石退隐后，尤其是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司马光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决然离开洛阳回到了汴京，用了不到一年便将王安石多年的心血毁弃殆尽，完全不顾自己的做法是否符合君子的本义。

司马光的极端做法给当世的人们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典型，使得此后的政治斗争完全脱离了现实社会的需求，陷入到了有关“君子”“小人”无休止

的争辩中去。士大夫们但凡遇到政见不一的情况，往往不会就事论事去争辩其中曲直，反而如街头掐架一般互相讥讽对方为小人。被攻击者为了免于陷入道德困境，也不再关心国计民生，整个北宋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乌烟瘴气。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政治斗争在此后几十年中愈演愈烈，直到最后蔡京搞出了所谓的“元祐党人碑”才算画上了休止符，而大宋王朝令人回味的浩然之气也由此被完全斩断了。

司马光毁弃王安石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仓皇登基，建立南宋。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同时也为自己的父亲徽宗开脱，赵构将造成北宋衰落的根源都归结于王安石“自任己见”“尽变神宗法度”，从而为这次变法彻底定了性。此后一直到明清两代，人们一提到王安石，大都会认定其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这也无形中给那些试图变法革新的人们制造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尤其是在张居正的改革失败后，古代帝制王朝自我革新的基因更是荡然无存，这些恐怕都与《资治通鉴》以及司马光的道德理论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我们并不打算跟会砸缸的司马光抬杠，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本书所要讨论的范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马光的德性论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理论，其既不能指导北宋的政治生活，帮助颓败的大宋王朝恢复汉唐气象，对于上千年前人物是非得失的品评自然也难说是完全公道的。至少在有关晋阳之战的论述中，无论是前代的儒家学者还是后来的司马光，对智瑶和赵无恤的评价都缺乏了最起码的客观公正。

智瑶其人

世人皆以为赵无恤礼贤下士，而智瑶则刻薄寡恩、缺乏仁心，故而人人离心，其败也可耻。可事实上，在晋阳之战的通篇叙事当中，有关智瑶人设的描述是十分混乱的，甚至在不同的场景下还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在智申选择继承人时，智果提出的反对意见中给智瑶画了一个色彩鲜明的人物画像，也即认为智瑶有五大优点，“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唯一的缺点便是“甚不仁”。然而当进入实战的时候，原本满是优点的智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程智商不在线”，总体表现贪婪自大且愚蠢昏昧的角色。

在汾河大堤上，他可以当着韩、魏两家主君的面说出“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这样的话；当身旁的智囊一再提醒韩、魏两家已有反意的时候，他不仅未能及时警觉，反而还大大咧咧地把这些话都转述给对方；当韩、魏两家使出最原始的离间计为自己开脱的时候，他又照单全收，毫不怀疑对方的用心……这种种迹象让人不禁要产生疑惑，就这么一个如蠢猪式的人物，是如何力压三家那么多年的？他的失败分明是败在了“蠢”字上，跟所谓的“不仁”又有什么关系呢？

此外，在主要角色的台词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么一些评价，说“知伯之为人，阳亲而阴疏”“粗中而少亲”。意思是说，智瑶这个人的残暴是深植于内心的，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可实际上却是睚眦必报、锱铢必较，眼里容不下一点沙子的小人。这样的人属于是典型的笑面虎，你若是事事依从他还倒罢了，若有一事不遂其意，就保准会在背地里暗算你。智果在劝谏智申的时候也提到过，“宵之佞在面，瑶之佞在心”。智瑶虽然不仁，但却不会把这些坏显露在表面，可见是一个极有城府的人。

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在有限的史料中可见，智瑶是一个相当高调的坏人。在国外，他敢指着鼻子把齐国的主政陈恒骂个狗血淋头；在国内，对待同僚如赵无恤、韩虎等人也是极尽羞辱之能事，完全没有一点城府深沉的样子，他所谓的“阳亲而阴疏”又表现在哪里了呢？

至于说智瑶的不仁，我们同样能够在儒家系统琐碎的史料中找到一些反例。比如有一个名叫长儿子鱼的人，此人早年是智氏臣属，大概是在晋阳之战爆发当年，因与智瑶意见相左愤而与其断绝了关系。到三年后，他本打算去鲁国（又说是越国）谋职，可当在半路上听闻智瑶被杀的消息时，却当机立断要回去为其死难。

同行的御者大惑不解，问道：“你跟他断绝关系都已经三年了，如今却要回去送死，是不是没搞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份啊？”

长儿子鱼的回答很是清爽：“这你就错了。我听说‘仁者无余爱，忠臣无余禄’。在听到知伯死讯的时候我心中一动，说明他的余禄依旧在发挥作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抛弃他而独活呢？”

这个故事虽然简短，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智瑶并非全无可取之处，或者说他的为人并没有江湖上风传的那么差。能够让一个已经断绝关系三年的人回去送死，这份情谊恐怕连他赵无恤都会自愧不如。

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无头无尾的故事还不足以让你放下成见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你一定听说过，也或许能对你有所触动，这便是侠士豫让的故事。

侠士豫让

据史料记载，豫让的祖父名叫毕阳，与魏氏的始君毕万同氏。毕阳主要活跃于晋景公、厉公时期，其主要事迹是当伯宗受到郤氏迫害之时，受伯宗之妻委托，保护伯宗之子伯州犁逃往楚国。

与国内众多的普通贵族一样，毕阳的后人为了在乱世之中求得生存，不得不依靠大族的庇护，豫让年轻的时候就选择了范氏作为自己的主君。东阳

内战结束之后，范氏、中行氏一朝破败，原本依靠其保护的小贵族也顿时失去了依凭，豫让也只能在取得胜利的其他家族之中另觅主君。

当时最有尚贤之名的赵氏，其家长赵鞅在灭掉范氏和中行氏后，也有要收拢其余众为己用的愿望。但赵鞅的近臣史黯却反对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并不能算是良臣。如果是真正的良臣，就应该在主君得意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规劝过失，帮助主君实行正道，哪怕是为之而死也不足惜；主君失意的时候就应该追随他们流亡，为其出谋划策，让他们在国外重新获得封地和爵位，至死方休。可如今这些人，君主得意时未见他们匡正错误，失势的时候又不能追随其流亡，你收了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或许是对史黯的看法深以为然，又或者是担心范氏和中行氏的死士会乘机混入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赵鞅终究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最终又是做出了何种选择，这些都是赵鞅自己的事，本也无可厚非，但这却苦了那些如豫让一般急于寻找新主的末路之人。在这些士人最为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个家业鼎盛的赵氏却向他们关上了大门，迫使他们只能在另外三家中寻找依靠。

豫让最终选择了智氏。

多少次坐在门前屋檐下，恬然看着落日余晖洒满天际，豫让都会为这个选择感到骄傲。因为正是在智氏家中，他第一次有了被重视的感觉，第一次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他为智氏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服务了三十多年，看着智氏家族一天天壮大起来，心中更是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或许有的时候回想起这一生，他会有些懊悔，因为自己的才能不够出众，为智氏做出的贡献也不够突出，有许多事情还不够圆满……可毕竟岁月不

饶人。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他已经不再年轻，即便内心有再多的激情，也终究抵不过似水年华。终于有一天，他决定放下包袱，回到家中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去品味岁月静好的真谛。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他以为这一切的美好都会如日出日落一般永驰不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主君失败了？”

晋阳之战失败的消息就像是晴空里的一个炸雷，将他的人生完全拖入了黑暗之中。他不敢相信，才华卓著的智瑶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败亡？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智氏怎么就突然崩塌了？

他张皇失措地四处打探消息，希望有人能告诉他是自己听错了。然而所有人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主君智瑶的确死了，而且他的头颅还被赵无恤刷了漆当作酒器用了！

豫让始终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他怔怔地站在山岗上，绝望地凝视着这片苍凉的土地，无助的悲鸣足以令呼啸的北风失色。可这又能怎么样呢？即便是他的悲歌唤醒了霍太山的生机，澄清了奔腾的河水，却终究无法令死者复生，让时间倒流。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既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那就只能改变未来。豫让决定要用自己衰老的躯体去对抗天命，以精卫填海的气概去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他要为自己的主君复仇，要让赵无恤血债血偿——这不仅是为了主君遭受的杀身之祸，更为了主君死后蒙受的屈辱。

豫让将自己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他离开了原本打算安享晚年的家庭，独自栖身于深山之中，为自己伪造了一个新的身份，并秘密筹备一个宏大的复仇计划。一切准备就绪，他便打扮成了一个受过刑的奴隶，混入赵氏宫中打扫厕所，耐心地等待动手的时机。

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让他等来了。

这一天，赵无恤还像往常一样，穿戴整齐准备出门去。或许是因为临时内急，赵无恤突然离开了随从，朝着这个很少光顾的厕所走了过来。豫让躲在厕外，凌厉的凶光透过垂下的茅草，穿透了那个让他恨之入骨的人。仇恨，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让他的身体剧烈地抖动，时间也近乎凝滞了。

他看到赵无恤神情倨傲、高昂着头颅走了过来，孤傲的眼神漫不经心地朝这边瞥了一眼。有那么一刹那，他们曾四目相对，赵无恤起初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依然踏着坚毅的步伐向前走了几步。然而就在快要靠近的时候，赵无恤却突然停了下来，怔怔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或许就是刚刚那漠然的一瞥，那转瞬即逝的四目相对，让赵无恤感受到了茅草丛中一束仇恨的光芒。那束掩藏在黑色的皮肤和浓密发际之下的光芒，充满了让人战栗的愤怒，让他顿时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精神紧张，一股前所未有的窒息感扑面而来。

随身的卫士们很快就察觉到了异样，他们急忙奔上前来扶住主君，却不意听到主君有气无力地从牙缝中挤出了三个字：有——刺——客！

卫士们很快就将豫让抓了出来，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年迈的豫让在这些壮士的推搡之下，单膝跪在赵无恤的面前。

“你就是豫让？”赵无恤刚刚缓过劲来。他跽坐在内堂的榻上，细微的声音中透着严厉：“为何至此？”

“欲为智伯报仇雪恨而已！”

赵无恤端起几案上的酒樽放在嘴边，既没有饮酒，也没有说话。过了许久，有卫士主动请缨要将豫让处死，赵无恤这才摆了摆手说道：“智瑶死而无后，臣子能为其尽忠至此，便是天下之贤士。寡人以后避开他就是了！”说罢就差人将豫让送出了宫门。

豫让之死

赵无恤的宽宏大量并没有换来原谅，反而是他脸上无意中流露出的优越感，让豫让更感愤恨，复仇的欲望也更加强烈。可问题是，赵无恤已经见过自己的面貌，想要再依靠身份伪装接近对方显然是行不通了。

万般绝望之时，豫让又生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离开赵家后，豫让找到了一个过去共同侍奉智瑶的好友，让他为自己置办了许多器物，随后带回山中的居所，开始了一段常人所无法忍受的痛苦历程。他剃掉了眉毛和胡须，毁掉了容貌，将热漆浇在身上烧坏了皮肤，用烙铁在头上烫出一大片瘢痕，从而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人人避而远之的流浪汉。

为了验证易容的效果，他故意装作乞丐到自家门前乞讨。他的妻子每次出门时，猛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都会回过头来四处张望，可看到的却只是一个脏兮兮的乞丐。几次三番下来，连她自己都感到恍惚，于是便喃喃自语道：“他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像我的丈夫呢？”

听到妻子的话，豫让忍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心中似刀割一般难受。可既然已经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便不能半途而废，就只能将这份苦楚埋在心

里。一番痛哭之后，他又迈着蹒跚的步伐回到山中，吞下了许多炭末把自己的嗓音变哑，终于连他的妻子也辨认不出来了。

“你这样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得知了豫让所做的一切，他的好友顿足痛哭，后悔没有早些劝他回头，以至于让他变成了如今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好友不无痛惜地叹道：“你的做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志士，但却很难说是明智的。我早就听闻，赵无恤很欣赏你的才华，你大可以借此跟随在他身边。等到有一天他彻底放下了猜忌，你再去杀他岂不是易如反掌，何必非要糟践自己呢？”

豫让苦笑一声，紧接着用嘶哑的声音回答道：“我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告诉全天下人什么是君臣之义！就是要让全天下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因此，即便前方的路如登天之难，也绝对不能贪图捷径。更何况，倘若我委身赵氏做了赵无恤的臣子，却每天想着如何杀掉他，那我岂不就是在为先知杀后知，为故君杀新君？这样的做法和那些违背君臣之义的人又有什么区别？我的所作所为，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友听罢，深为豫让的理想而折服，也便只能由他去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豫让都以乞丐的身份混迹在晋阳街头，苦苦寻找着机会。

终于有一天，豫让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赵无恤将带着少量的随从外出巡视，而此行必然要经过城外的一座石桥，这将是一个下手刺杀的绝好时机。为此，他早早地藏匿到这座石桥下，准备一举搏杀赵无恤。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次他还是失败了。

说来也是事不凑巧。正当赵无恤的车驾接近石桥时，有一匹马突然受惊失控，差点把赵无恤掀到车下。随从急忙上前控制住车辆，可那匹马依然嘶鸣不止，众人费了好大的劲才算给稳住了。等到慌乱过去，赵无恤或许是想

解嘲缓和气氛，于是便悻悻然言道：“不会又是豫让吧？”说罢便笑了起来。

他这一笑不要紧，身旁的人个个都错愕不已，顿时神情紧张地四处仔细搜查，果真就在桥下找到了一名身带利器的乞丐。这名乞丐神情凌厉，让几名卫士感到不寒而栗，纷纷退回到桥上。

赵无恤很快就从那令人惊悚的目光中辨认出了豫让的身份，于是愤怒地质问道：“我听说以前你也曾侍奉过范氏、中行氏，而范氏、中行氏正是为智氏所灭，说起来智伯也算是你的仇人吧？可你从来没有想过为他们复仇，反而屈节忍辱去侍奉你本该怨恨的敌人，甚至智伯都已经死了这么久了，还要心心念念地要为他复仇，这又是为什么呢？”

既然身份已被拆穿，便也无须掩饰。豫让以他嘶哑的声音铿锵有力地回答道：“范氏将我当普通人一样看待，我就以普通人的态度回报他们；智伯以国士待我，我便以国士的态度报答他——这难道不够吗？”

这番话让赵无恤听了很不是滋味。当年父亲想要收拢范氏、中行氏的良臣，但史黯却以他们内不能匡相其君、外不能效死以定为由，认定了范氏、中行氏之臣属皆非良臣，从而对他们关上了大门。可如今却有一个鲜活的案例站在面前，用他的生命诠释着良臣的真义，而这个人却不能为己所用，这该是多大的讽刺啊！

想到这里，赵无恤不禁长叹一声：“唉，豫让啊！你为——”他眼中饱含着泪水哽咽道：“你为智伯报仇能做到如此程度，可以称得上是忠义之士了。而寡人待你也算是仁至义尽，可你为什么就非要与寡人斗争到底呢？既然你不愿意回头，寡人也不能再宽恕了，你自求多福吧！”

或许是因为这滴眼泪让豫让感觉到了赵无恤的爱贤之心，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请求：“臣听说，‘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您之前已经宽恕过臣一次，天下莫不为君之德义而感动；今臣既然决定了要再次行刺，便是抱定了必死之决心。臣死不足惜，只是不能完成心愿，便是死也不会安心。若是您宽厚为怀，能让臣在您的衣服上刺几下，也算是死而无憾了，只是不知君可愿为臣了此心愿？”

赵无恤没有回头，只是缓缓地张开双臂，示意卫士将自己的衣服取下递给豫让。豫让将赵无恤的衣服挂在灌木之上，然后跳跃呼号着将其砍成了碎片，呼号声中充满了悲凉之色，令在场之人都为之动容。这时只见豫让重重地跪倒在地，使尽了全身力气长啸道：“臣无能，只能以此报主知遇之恩了！”说罢便伏剑自尽了。

成王败寇

豫让的故事每次读来都会令人感慨，不过如此感人肺腑的故事，显然是经过了诸多艺术加工后才最终形成的。比如有关豫让的人物设定，史料中都认为他曾服侍过范氏、中行氏，后因两氏败落而无奈委身于智氏。然而这些叙述往往都忽视了一个现实问题，范氏、中行氏的败亡是在公元前490年，而智氏的败亡则要到前453年，前后相距近四十年，这也是几乎所有关于晋阳之战叙事的通病。

这种现象之所以频频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书写历史的人有意要抹黑智瑶的形象，将范氏、中行氏的见灭，两家土地的私分，以及晋出公客死他乡等众多有损声名的黑锅扣在一个失败者的头上，从而为赵、韩、魏三家瓜分晋国土地提供合法性依据。

与此同时，古人有意将豫让塑造成了一个油盐不进的愚忠之人，大约也是为了展现赵无恤求贤若渴、宽谅包容的人格魅力。但或许是由于细节刻画太过有力，一不小心让豫让反客为主成为千古传颂的人物，顺带着还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智瑶打开了一扇窗，让他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

与之相对应的是，素来为人们所称颂的赵鞅、赵无恤父子，其道德品质也未必就如传说中的那般高尚，智瑶身上存在的缺点，在他们的身上多少也有所展现。

比如赵鞅在执政期间以一己之力打败了诸侯支持的范氏、中行氏，真可谓军功卓著，故而骄狂情绪难以掩饰，以至于连太史公都说他“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这股狂傲的架势恐怕连智瑶都得甘拜下风。

至于赵无恤，《新序》中有一则故事，说是有一次，他连续饮酒五天五夜依然不止。对此他不仅不感到自责，反而还扬扬自得地跟一旁伺候的人夸耀说：“如今我连续喝了五天五夜，照样是身体倍棒、吃饭倍香，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国士无双？”

看到他这副恬不知耻的样子，侍者优莫毫不客气地指出：“您也就是跟纣王的七天七夜差了两天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除此之外，智瑶经常为人所诟病的“不仁”，赵无恤同样不遑多让。晋阳之战爆发之初，在讨论赵氏究竟该选择何处固守时，史料中便提到，赵无恤在长子城耗尽民力修筑城墙，在邯郸又搜刮民脂民膏以充实仓廩，两地百姓皆对其恨之入骨。这也就意味着，赵无恤所谓的仁义，无非也仅限于作为宗保之地的晋阳，其余各地的百姓未必就比智氏家族统治下的民众更加幸福。

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赵无恤在灭掉智氏之后，竟然将智瑶的头颅割下，在他的头骨上涂漆用来制作酒器——若是智瑶取得胜利，恐怕也未必能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从这些事例来看，赵无恤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什么仁君。

另外我们再从“贪婪”的角度做个对比。智瑶对于韩、魏两家的态度虽然极其恶劣，但当智果等人提醒他韩、魏将反的时候，他一再强调自己早已与对方协商，事成之后要三家平分赵氏之邑。且在言谈之间，智瑶对这两个盟友也有着充分的信任，他自己更是坦诚相见，很难看到他有准备赖账的想法。反观两家与赵氏合谋攻灭智氏后，得到的结果却是“知氏之地，赵氏分则多十城”，两家实际所得显然缩水了，可见赵无恤的器量未必会比智瑶更宽广。

赵无恤的为人与智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出于“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式，以及为亲者隐、为尊者讳的传统，史家更倾向于为胜利者唱赞歌，使得他的这些缺点并未太多展现。所谓“五十步笑百步”，既然两个人半斤八两，那么当人们在赞美赵无恤这个“英主”的时候，大可不必拿智瑶的“不仁”来开涮，以显示道德上的优越感。

之所以说这些，并不是要为智瑶翻案，仅仅是想说明，儒家写史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有选择性的，并不能作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来做考量。智瑶或许真的是一个骄横不仁之人，但横向来进行对比，作为战胜者的赵无恤也未必就是什么谦谦君子。

若要真正弄明白晋阳之战的成败原因，我们有必要抛开儒家的视角，对整场战争的进程进行重新梳理。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必要搞清楚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晋出公的死究竟跟智瑶有没有关系呢？

第三节 战争复盘

待解之谜

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分野的关键阶段，晋国公室地位的衰落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了。正因为所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史料的记载难免就会错漏百出，以至于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竟然发现就连晋出公的在位时间都成了不解之谜。

史料中关于此事有很多种不同的记载，其中最常提到的说法出自《史记·晋世家》以及《六国年表》，认为晋出公于其在位的第十七年（前458年）出奔，到第二年就去世了，在位时间一共十八年。而其出奔的原因，则是不满于智瑶主导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出公去世后，智瑶以职务便利，拥立了与自己关系亲近的晋骄为君，是为哀公。

不过，同样是在《史记》里，《赵世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据文中的叙述，赵无恤于出公十七年继任赵氏宗主，按照逾年改元的习惯，赵襄子元年便是出公十八年，也即公元前457年。襄子四年，晋出公以同样的缘由出奔齐国，结果死在了半路，晋骄即位为懿公。

以这种方式计算，晋出公在位的时间至少有二十一年，晋阳之战的整个进程也都要推后四年，这与我们通常的认知显然是不符的。当然了，赵家人素来善于篡改历史，有关赵无恤即位时间的推断后文会提及，这里我们只需要记住出公在位的年数即可。

与上述记载不同的还有《古本竹书纪年》，其与《史记》有两个重大差异：其一是出公出奔是在晋阳之战结束、三晋瓜分智氏邑之后，其目的地是楚国而非齐国，在位时间一共二十三年；其二是继出公之后即位的是昭公之

孙敬公（原为懿公，因晋朝避司马懿之名讳而改为敬公），而非之前所提到的哀公。

在三种不同的版本中，《史记》中的两种说法尽管有不小的差异，但都认为出公之死是在晋阳之战爆发之前，而《竹书纪年》则采用了战后出奔的说法。历史上有关晋阳之战的叙述，大都建立在前者基础上，倘若这个时间线索被颠覆了，那么整个晋阳之战的过程都必须改写。因此厘清出公出奔的真实时间，对于理解晋阳之战的前因后果至关重要。

好在前人已经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如钱穆、杨宽等学者均认可古本《竹书纪年》，而对《史记》中的记载存疑，在这里我们无须再重复验证。不过需要一提的是，无论支持哪种观点，学者们对发生在晋出公十七年的事件，也即四卿瓜分范氏、中行氏土地的叙述大都深信不疑。然而如果我们结合晋国历次政治斗争的规律来进行比对，会发现恐怕连这个细节都是伪造的。

这里最大的疑点在于，晋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剧烈冲突，每次冲突过后，失败者留下的封邑很快就会落入他人之手。比如先穀灭族之后，其封邑原县很快就归到了赵同名下；下宫之役后，赵氏的封邑当年就被封给了祁奚，后来还是因为韩厥的劝谏，晋景公才收回成命。

同样，栾氏灭族之后，对栾氏土地的瓜分也很快就展开了，就连其中争议最大的州县，也都是在固宫之役爆发的两年内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与此同时，赵武为了宣示自己领有州县的合法性，还提到了温县是赵氏的属邑，而这块封邑在二十多年前，还是属于郤氏的土地。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祁氏、羊舌氏受荀跢陷害被先后灭族，仅仅一两个月后，其封邑就被魏舒划分为十个县，被六卿瓜分殆尽。

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到，这些掌握了实权的政客们在瓜分土地一事上向来都雷厉风行。一个家族一旦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他家族便会像饿狼扑食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他们庞大的资产撕裂分割、瓜分殆尽。

然而奇怪的是，东阳内乱结束后，情形却有些不同。战争结束的时间是在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而私分土地的时间却要等到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前后时间相差三十余年。在这三十多年间，四卿放着大片的土地不要，全都唱起了温良恭俭让，演起了君明臣贤，将范氏、中行氏的遗产全都上缴给了公室——这也太不符合他们的一贯风格了。

古代学者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疑点，但他们并不打算改变传统的叙事，而是在著书之时采取变通手法以规避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比如豫让的故事，史料便全然不顾两场内乱前后相距四十年的事实，将豫让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先侍奉范、中行氏，后侍奉智氏，智氏灭族后又为旧主报仇的形象，这恐怕就是人们刻意缩短两者时间差所造成的结果。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将伐灭范氏、中行氏的“功劳”，以及瓜分其地的责任都一股脑地推给“知伯”，从而把赵、韩、魏三家塑造成被迫参与的角色。

然而事实上，当我们推翻了晋出公十七年而亡的结论，相应地所谓“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的逻辑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史料中与之相关的叙事，不过是“赵、韩、魏共分智氏邑”的变体，其目的无非是撇清三晋逼压公室的道德责任。而智瑶也就因此成了在政治上、肉体上、道德上被全面毁灭的又一个牺牲品。

先发制人

透过以上疑点，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智瑶挟晋哀公以令诸卿的事件，或许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是胜利者为了抹黑失败者而编纂的谎

言。当负有原罪的三卿成了各据一方的诸侯，他们有动力也有能力去篡改历史，以使得自身的权力更具合法性。这种现象在春秋的史料中并不罕见，在此后的历史中更是会不断上演。

砸碎一个旧世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既然过去的史料不可全信，传统的解释不可照搬，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姿势才更为合理呢？接下来，我们的任务便是通过有限的史料，对晋阳之战的全过程进行一个复盘，对导致战争胜败的因素进行重新分析，以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的原貌。

让我们将时针拨回到公元前490年。伴随着士吉射和荀寅的出奔，持续了整整六十年的六卿专政局面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由智、赵、韩、魏四卿共存的新格局。在此后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四卿有对抗也有合作，有对话也有摩擦，但总归是保持了一个大致和平相处的局面。

但正所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四卿结构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政治模式，伴随着权势和财富的此消彼长，相互之间强弱形势的不断转化，这种结构迟早会走向崩塌。作为晋国数百年来大浪淘沙后的幸存者，四卿都有着足够的警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同时也有足够的智慧来应对随时可能会掀起的腥风血雨。

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较量。

谁能够在这场巅峰对决中赢得最后的胜利，谁就能拥有辉煌的未来，而失败者便只能在众人的嘲笑中黯然离场。为了避免在决战中遭遇淘汰，四卿都铆足了劲储备力量。在这其中表现最为显眼的，还是智氏和赵氏之间的竞争。

追溯这两大家族之间的恩怨，实际上早在东阳内乱爆发之初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当时在韩不信和魏曼多的斡旋下，被放逐达半年之久赵鞅重新返回新田，并恢复了中军佐的职务。然而，正当他意气风发地准备向范氏、中行氏宣战的时候，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中军将荀跢却派人前来问罪，要求赵氏将“始祸者”董安于处死。

对于这样一个无理要求，赵鞅自然是不同意的。然而一心为赵氏服务的董安于却看破了荀跢的心思，为了给赵氏赢得生机，他选择了慨然赴死，这也就成了赵氏和智氏关系走向恶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几年后，当赵鞅在铁之战中击败了为邯郸提供援助的郑国运粮军队，彻底扭转了战局的时候，家臣傅佗就不失时机地提醒他切勿掉以轻心：“虽克郑，犹有知在，忧未艾也。”

当范氏、中行氏之乱落下了帷幕，智氏和赵氏之间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只是这场战争起初是以一种静默的形式展开的。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智、赵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军事竞赛：赵无恤灭掉了代国，智瑶便设计将仇由划为自己的领地；智瑶攻取穷鱼之丘（今河北易县），赵无恤便攻取左人、中人“秀肌肉”；赵氏以卫国为主攻方向，智氏便将郑国作为他们攻城略地的首选。这些针锋相对的动作，构成了四卿时代晋国政治的奇视图景，也预示着这两个中原大地上的最强家族必将会走向战争的泥潭。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作为晋国政治舞台上两个强大家族，智氏和赵氏之间迟早会有一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仅仅智氏有消灭赵氏的冲动，赵氏也同样有清除智氏的强烈意愿，这种日益临近的战争威胁，让所有人都感到焦虑不安。但问题是，既然智氏和赵氏都有打破僵局的冲动，可为什么最后却是智氏最先挑起了战争？难道真的是因为智瑶的强横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纵观晋国两百多年来的斗争史，历数包括赵盾驱逐狐射姑、荀林父除灭先穀、赵氏的下宫之役、三郤的车辕之役、栾氏的固宫之役在内的历次冲突，我们不难发现这么两个规律：其一，依靠国君的一方更容易取得胜利；其二，冲突双方地位较高者会有更高的胜算。

这两条规律在范氏、中行氏的东阳内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晋定公的国君权威荡然无存，六卿排位也早已形同虚设，但当范氏、中行氏与赵氏爆发冲突的时候，有名无实的晋定公以及居于上位的荀跢却依然能够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

一切的过往都历历在目。这样的规律对于智瑶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像是一个无声的诅咒，让他时刻都无法安眠。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晋国的选卿规则是一个自主运行分权机制，列卿地位的高低并不以家族的强盛与否作为标准，而是由在任时间长短、资历高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智瑶之所以能够坐上执政的宝座，并通过执政的地位取得巨大优势，是因为当赵鞅去世的时候，他在四卿中的位置恰好居于首位。

不过风水轮流转，一时的权倾朝野并不必然带来世代的安枕无忧，一旦如今顺畅的局面一去不返，他所掌握的有利地位也会随风而逝。智瑶无法预测自己去世之后，儿子智颜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顺利爬到执政的位置上。而在此期间，假如晋国再次陷入内乱，假如赵无恤以执政地位挟制国君来谋取智氏，智颜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从容应对这被动的局面呢？

或许在智瑶看来，与其在无限的恐惧中为儿孙的前程担忧，倒不如趁自己大权在握、优势在手的时候，一劳永逸地将最大的对手消灭掉，从而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这恐怕才是他急于发动战争的心理动机所在。

在这种强烈焦虑情绪的驱使下，已经英雄暮年的智瑶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只能选择在自己权势最为强盛的时候，集合一切有利条件发动对赵氏的战争。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当时担任执政的不是智瑶而是赵无恤，当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也未必就能够放弃当前的优势地位，任由这种足以颠覆宗族的威胁持续下去。

因此，只要你处在智瑶的位置上，只要你有着和他一样的焦虑，发动战争解除赵氏的威胁就是必然选项。那么，智瑶又是如何挑起这场冲突的呢？

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智瑶在向韩虎和魏驹索地的时候，并没有提及索取的是哪座城邑，更没有言之凿凿地说我就是要一个“万家之邑”。所谓“万家之邑”的提法，大概是韩、魏两家共同商定的数字，但却被人们有意栽到了智瑶头上。而在向赵氏索地时，智瑶则一反常态，明确地提出要“求蔡、皋狼之地”，结果就引发了赵无恤的强烈不满。

问题来了，智瑶为什么非要索取蔡和皋狼这两个地方？赵无恤为什么一听到这个就会出火？这两个地方究竟有何特异之处呢？

在有关赵氏族源的章节中 我们曾提到，赵氏家族的先祖蜚廉、恶来父子曾长期为商纣王服务，在周朝建立之初也曾有过反叛之举，因此嬴姓家族在周朝初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受重用。一直到周成王后期，因孟增有宠于王室，他们才又受封于皋狼，从而获得了立足之地。

皋狼之邑的获得，代表着嬴姓氏族终于结束了流浪的生活，拥有了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封地，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周王室的认可。自此以后，嬴姓氏族很快就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特别是到孟增的孙子造父时，又因辅佐周穆王平定徐偃王有功获封赵城，是为赵人得氏的最初起源。

但好景不长，或许是受到游牧民族的冲击，嬴姓族人不久后便离开皋狼、赵城这些为他们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土地。尽管后来有奄父之子赵叔带在晋国落脚，并借由晋国的政策红利发展壮大，可过去的光荣与梦想终究成了他们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鉴于此，皋狼对于赵氏意义非凡，是赵氏家族几百年来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如今智瑶二话不说，上来就要索要皋狼之地，显然不是贪图那区区两个县邑，而是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挑起赵人的仇恨。赵无恤哪怕再能隐忍，恐怕也无法接受如此明目张胆的羞辱。

从这些细节可见，智瑶的目标从始至终都锁定在赵无恤身上。与此同时，智瑶也并不是一个莽夫，为了筹划这场战争，他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也充分吸取了过去历次战争的经验教训。

首先是在挑起战端时，他以充实公室为由向三卿索取土地，这就为自己取得了尊奉公室的道德优势，从而避免犯下过去范氏、中行氏因失去道义而招致失败的错误。倘若三卿都奉献了土地，公室生活更为优渥，只有对智氏感激涕零的份儿；可只要有人不肯贡献，那么他就可以打着“奉公室以讨不臣”的旗号名正言顺地征讨叛逆，从而为智氏赢得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当赵无恤公然拒绝献出土地时，智瑶也并没有急于用兵，反而是多次派韩、魏主君前去说和，得到的结果是“三使韩魏”而赵无恤“弗与”。这个做法无形中在赵氏和韩、魏之间制造了一道隔阂，使得两家不得不站到赵氏的对立面——这一招又恰好是借用了先轸在城濮之战中离间楚国与齐、秦关系时用到的计谋。

从这些动作来看，智瑶的确是一个有着强烈战略意识的统帅。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他充分吸取了过去历次内外冲突的经验教训，利用自身的执政地位，紧紧地抓住了能够为自己赢得胜利的诸多有利因素，同时也将竞争对手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胜利可以说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事实的发展却总是与理想背道而驰。智瑶或许至死都无法理解：有了如此周密的部署，占据了如此有利的战略地位，同时又采用了几乎无可挑剔的战术，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以小博大

古人在叙述晋阳之战的故事时，大都将叙述重点放到战争的两个主角身上，对韩、魏两个家族却着墨不多。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似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无足轻重的花絮和陪衬，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所持有的态度自然也鲜有人关心了。甚至有的时候，与智瑶前后矛盾的人设一样，史料对于他们的描写还充满了让人费解的矛盾。

比如在智瑶前去索邑时，韩、魏两家的智囊段规、任章早就提出了“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释以天下图知氏”的既定方略，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将智瑶视为敌人。

可当晋阳之战真的爆发以后，他们的做法便和智瑶一样，突然间“智商全部掉线”。眼看着晋阳城已经无力支撑，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背叛，非要等到智瑶说不靠谱的话，等张孟谈上门来言说利害，才下定决心转投赵氏。这诸多的反常举动，如果不是著史之人有意为之的话，那我们也就只能说他们是真的蠢了。

与风头正劲的老牌世家比起来，韩、魏两个家族虽出道晚、资历浅、资本积累也不够丰厚，但作为经历了上百年流血冲突存活下来的强卿家族，作为对这场战争胜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两方势力，他们不可能就像“小白”一样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其所持有的态度也显然不应该被轻易忽略。

而以当代的公司治理理论来解释，当两个大股东的权益都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的时候，往往小股东才是制胜的关键。晋国政治从来都是分权制衡的体制，这就使得晋国内部很难出现如齐国田氏那样一家独大的局面。故而当智氏和赵氏这两个“大股东”为了争夺控制权而酿成冲突时，韩、魏这两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角色反而会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因此，要想搞清楚晋阳之战智瑶先胜后败的内在逻辑，就必须明白一个问题：在这场至关重要的世纪大战中，韩、魏两家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背叛智瑶？

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回看历史，晋国被三分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可以有无数的理由去为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做出解释。然而，正如身处当今世界的我们总会对未来感到迷茫一样，身处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也未必能够看得清楚他们所处时代的发展脉络。而当历史的脚步跨入春秋与战国交替的时代，最让晋人乃至各国政要感到困惑的，莫过于谁都看不清晋国政局的最终走向。

史料中有关晋国历史发展最早的预测，出现在晋阳之战爆发的九十年前，也即晋平公十四年（前544年）。彼时正是第二次弭兵会盟的两年后，有吴国公子季札（延陵季子）周游上国，分别到访了鲁、齐、郑、卫、晋等国。在晋国时，他对诸卿家族进行了一轮友好访谈，其间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谈甚欢，还留下谶语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

对于季札的预言，当代学者大多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都是《左传》著者根据战国时的现实政治局面做出的修正。相对来说，银雀山竹简《吴问》中所载孙武的预言，似乎更能反映当时各诸侯国的普遍认识。在这场发生于召陵之会前后的对话中，孙武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所谓“萃于三族”的概念，反而是认为“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也就是说，只要赵氏能够坚持让利于民的政策，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成为晋国的主人。

同样的判断在晋国诸卿的对话中也能找到踪迹。比如东阳内战爆发时，梁婴父在劝谏荀跢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

又如晋阳之战中，张孟谈密见韩、魏主君时也说：“今知伯帅二国之君伐赵，赵将亡矣，亡则二君为之次矣。”智氏的谋臣郗疵也同样认为：“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也就是说，即便是到了晋阳之战进展到末期的时候，身处棋局中的人们依旧将“晋国归一”作为预测未来政治走向的唯一选项。

在诸多论述之中，无论是身处局中的晋国卿士，还是隔岸观火的各国政要，几乎所有人都在以齐国田氏独大为样板预测晋国政局的演变逻辑，笃定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走向一家独大的局面。这样的预见，不仅会让智、赵两家

感到惶惑，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韩、魏两家来说更无异于是一个冗长而残酷的噩梦。

在当时四卿共存、两强相争的格局下，无论以何种口径来判断，最后的胜利者都只能在智氏和赵氏之中二选一，以韩、魏两家微薄的实力，成为最后赢家的概率实在太过于渺茫。这就意味着，晋阳之战一旦结束，无论哪一方取得胜利，韩、魏两家都难逃“二君为之次”的命运，这种前景实在是太令人悲观了。这个时候，假如你是韩、魏的主君，而你也对这种判断深信不疑，你会怎么做呢？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先想到的应该是“鸵鸟战术”，也即尽可能地让两个强家保持均势，维持割据共存的总体态势。只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处于风口浪尖的智、赵两家内心恐怕比他们还要焦虑，这就使得战争的爆发终究无法避免。

在已知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韩、魏两家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尽量选择隔岸观火以求自保。然而可惜的是，智瑶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他们。因为智瑶深知，韩、魏两家尽管弱小，可智氏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忽略他们的地步。尤其是回想到四十年前的那场战乱，赵氏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围困下迅速翻盘，靠的就是局外势力的干预。要想避免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就必须在开战之前将韩、魏这两股势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这场复杂的博弈当中，韩、魏两家原本就对智氏心存顾虑，智氏对韩、魏也并非全然放心，这就使得三家的联盟从根本上就缺乏牢靠的基础。在众人各怀鬼胎的情形之下，我们大可以设想一下，当智瑶提出让韩虎、魏驹带兵讨伐赵氏时，双方的心理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

对韩、魏来讲，家族主君亲身犯险，就必然要对战场上可能遭遇的种种后果有充分的预估。他们不仅要保障主君在战场上的人身安全，更要为整个家族的持续发展准备好应急预案。因此，在跟随智瑶前往讨伐赵氏的时候，韩、魏两家都不会倾尽全力，相反还要“设守而后行”，也就是将大部分的武装力量都留在都城。只有当他们在外围保持了足够的军事存在，才会使智瑶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们的主君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将最坏的情形纳入考虑范围。也即万一主君在战场上遭遇不测，嫡长子也要在家臣的拥护下尽快即位，并迅速动员所有力量展开反击，以确保其家族基业不会因战场上的异动而出现致命危机。

对于智瑶来说也是一样，他有充分的理由对韩、魏主君的忠诚感到怀疑。只要两家存在被赵氏策反的可能，那么他们带来的人员在联军中占比越大，将来可能诱发的风险便越不可控。因此站在智瑶的立场上，他也并不希望两家投入太多的兵力。最理想的情况，是让韩虎、魏驹孤身前来，像人质一样留在军中，保证他们不会在后方搞破坏就足够了，这恐怕才是他强拉韩、魏两家参与围城的真实目的。

战略之选

“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总觉得人可以选择战略。但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往往是反过来的，是战略在选择合适的执行人。”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面前，个人的智谋通常显得无足轻重，这大概也是古人崇信天命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场长达三年的晋阳围城战中，智瑶的诸多布局已经极尽当时人力之所能，即便是换作旁人也很难做得更加周全。然而即便如此，他最终还是走

向了失败，其最底层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战略决策在根本上就是与韩、魏两家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正如前文所述，在人们过去的认知当中，晋国的政治似乎只有沿着四进三、三进二、二进一的路径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并最终走向“田氏代齐”的“大一统”结局。在这样的预期下，无论是谁最先挑起战争，都会触发韩、魏两家的自我保护机制，从而促使他们通过战争的方式重新塑造一个理想的政治模型，以使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不得不接受“三家分晋”的新选项。

这个时候，谁的道德情操更为高尚，谁的智谋更加高明，谁在道义上更加站得住脚，谁给出的条件最为丰厚，这些都已经无足轻重了。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让战争的胜利者放低身段，接受一个他们起初没有想过的方案呢？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对于韩、魏两家来说，他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胜利者？是一个凯歌高奏的全胜者，还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惨胜者呢？

毫无疑问，他们会选择后者。

战争最好的结局是一败一伤，任何一方笑着赢得战争，都不会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也就是说，作为这场博弈游戏的参与者，先帮助智瑶围困晋阳，随后再等待时机渔翁得利，是韩、魏两家主动选择的结果。当赵无恤因看到“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而感到绝望的时候，也正是韩、魏两家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这与智瑶是不是贪婪不仁、骄横跋扈，张孟谈有没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智瑶那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举动，尤其是他对待韩、魏主君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在智囊一再提醒下，为什么智瑶偏偏对韩虎、魏驹深信不疑，甚至还要将谋臣的建议和盘托出呢？

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很明确：智瑶对两家主君可能存在的反叛情绪心知肚明，这些并不需要智果、郤疵的提醒。但问题是，倘若自己果真一时冲动杀掉了两家主君，那么不出意外的话，已经摩拳擦掌备战三年的韩、魏大军，定然会在新主的带领下倾巢出动。智瑶哪怕再张狂，也不敢说自己以一敌三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这也就意味着，在韩、魏两家的积极谋划下，原本作为优势的“人质策略”，此时反而成为掣肘智瑶的力量，使得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对两家主君大开杀戒。不仅如此，为了缓解对方的紧张情绪，让他们死心塌地跟随自己围困晋阳，他还必须对韩、魏两家开出足够丰厚的条件，并一再表示自己会信守承诺，这也是他故意将智果、郤疵的话透露出来的原因所在。

如果单纯地站在战争的角度，智瑶的部署不可谓不周密。在向赵氏宣战之前，他率先发动了舆论战，以不尊奉公室、不礼让同僚的罪证，将赵氏彻底孤立起来。战争开始后不久，他又放弃了围城作战，选择水灌晋阳的方式，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一名家族抑或是国家的治理者，尽可能减少己方在战争中的损耗，减少战争对百姓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是负责任的做法，也是明智的选择，并无可指摘之处。

但是，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就会大相径庭。政治博弈显然要比单纯的军事、经济问题更为复杂，也最让人感到

难以捉摸。那些在军事上让智瑶引以为傲的战术布局，在政治上恰恰是让韩、魏两家感到危险的信号。

当智瑶站在汾河的大堤上，满心欢喜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并为将来的美好图景展开想象的时候，他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在战术上取得的胜利，恰恰也是战略上失当的重要标志。智瑶在战场上取得的一时优势，反而将自己锁死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如此作茧自缚，恐怕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

因此，晋阳之战表面上看是两个强者之间的战争，然而细察其根本，整场战争的进度和节奏却掌握在两个弱者手中。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一场力量的搏杀，倒不如说是智氏、赵氏的“独存战略”，与韩、魏两家“共存战略”之间的高维对决。处于强势地位的两家，谁能够放弃原有战略，主动向“共存战略”靠拢，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两个看起来对政局最缺乏影响力的家族，却成了决定战争胜负真正的主宰——这样的战略智慧和操作手法，恐怕才是韩、魏这两个经历了血与火洗礼的政治世家在乱局中应有的表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无恤没有坐在执政的位置上，不必像智瑶那样承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同时他那种近乎自残式的示弱，恰恰就误打误撞地成了韩、魏两家的“天命之选”，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终极法宝，这或许也是一种运气吧！

第四节 桐叶凋零

晋君传承

公元前453年，也即晋出公在位的第二十二年，赵无恤联合韩虎、魏驹在晋阳城外合灭智氏，并将智氏封邑瓜分一空，纵横捭阖的战国时代徐徐拉开了大幕。然而，正当赵、魏、韩三国在历史舞台上各显身手的时候，曾经在中原大地上谱写了壮丽诗篇的晋国宗室却渐渐被人遗忘了，乃至他们后来的谱系都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其中首先发生混乱的就是晋出公本人。赵、韩、魏三家私分智氏邑，使得公室处境更加逼仄，晋出公对此大为不满，于是便求助于齐、楚等国准备武力攻打三家。未料事情败露，最后在三家的逼迫下离开晋国并身死异乡。

为了掩盖分地逐君的恶行，三家建国之后不约而同地改写了历史，从而将导致晋出公身死的罪行扣在了失败者智瑶的头上，这就给后来的历史研究带来了不少混乱。

按照现在的通行看法，晋出公在位共二十三年，去世于公元前452年，接替其成为晋君的是晋昭公的曾孙骄。晋骄的谥号在不同的资料中分别被记作哀公、敬公和懿公；在位时间同样也是一笔糊涂账，在不同的史料中分别有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二年等多种说法。通常情况下我们都采信《古本竹书纪年》的看法，以公元前434年为其卒年，也即在位十八年。

晋骄在位期间没有任何可供记述的事迹，就这么波澜不惊地把国君的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柳，也即晋幽公。据司马迁在《晋世家》中的记载：“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絳、曲沃，余皆入三晋。”

晋幽公在位的时候，三家已经大成气候，公室所拥有的土地就剩下绛和曲沃两地了。三家对公室的事情也完全不操心，幽公想要做什么事情，不敢召请三卿来朝，反而还得到三家的朝堂上去朝见。三家也基本上只是把他当作一块招牌，有什么事情总要拉上他出去，而幽公也只能任劳任怨，铆足力气为其扩张摇旗呐喊。

晋幽公在位一共十八年，有关其即位和去世时间的混乱，我们就不再做罗列了，也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将其确定为公元前416年。

史料中关于他去世的原因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来自《晋世家》，说晋幽公荒淫昏聩，私生活很不检点，常在国中奸淫妇女，闹得民怨沸腾。有一次，他在夜间私自出城，结果被盗贼杀害，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按照当时的记事传统，只要没有大夫参与就算是盗乱，因此可以认定是一场民变所致。事后魏文侯曾出兵平定晋乱，至于具体经过，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种说法出自《竹书纪年》，其中载明是“晋夫人秦嬴贼幽公于高寝之上”，这个说法与《晋世家》“幽公淫妇人”相呼应，似乎也证明幽公的私生活的确不怎么检点。而今本纪年则记作“大夫秦嬴”，应该是传抄中出现的笔误。

魏文侯定晋后，立晋幽公之子（又认为是其弟）止为晋烈公。烈公在位期间，发生了三家伐齐及三家列为诸侯的重大事件，晋公室彻底丧失了法理上的宗主权威。在叙述这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三家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魏国霸业

晋阳之战结束后，赵、韩、魏三家大约是对晋国未来走向达成了一致，也即所有人都放弃了一家独占晋国的主张，转而寻求分晋独立建国的道路。

分晋后的三国以赵国的土地最为广袤，其领土主要有两个中心城市，分别是位于山西中部的晋阳城和位于河北南部的邯郸城。以这两座城市为核心，赵国的领地又可以分为晋北和东阳两大块。其中晋北的土地因处于高寒地带，且在当时开发程度也不高，与东阳地区的经济效益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赵人主要还是将东阳地区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其都城也主要设在中牟、邯郸两地。

魏国占据的区域比较分散，其领土与赵、韩两国领土交错，被分割成许多块互不相连的飞地。其中面积最大的一部分属于晋国早期的核心区域，包括河东（今晋南临汾、运城盆地）、西河（今陕西东部）等地。这片区域横跨黄河两岸且扼守崤函通道，是晋国抵御秦国的东进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自不待言。自毕万获封魏县以来，魏氏家族长期在此经营，有着深厚的根基，因而在三分晋国后长期将都城设在安邑（今山西夏县）。

此外，魏国在今晋、冀、鲁、豫交界地区还有一块飞地，按照晋人的视角，通常被称为河内，其地东抵齐、鲁、宋、卫，西临赵、韩、郑、周，向南又与楚国遥遥相望，是当时各国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到战国中期，魏国战略重心东移后所建立的都城大梁，便是以此为根据开拓的疆土。

韩氏素来弱势，即便是三分智氏领地，所占据的土地也是最少的。而且与魏国的情形类似，韩国的土地也是由若干块互不相连的飞地构成，且其主要区域又与魏国的两块土地呈十字交叉的形状。其中位于北部的一块包含了平阳、上党等地，南部则是以陆浑、南阳地区为主，这些大都是晋景公以后

新征服的土地。两块领地通过野王（今河南沁阳）相连，勉强连缀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了韩国领土的原始形态。

分晋初期，为了避免再度发生内部冲突，赵、韩、魏三家都心照不宣地根据各自领土的重心，对未来扩张的方向进行了分工。比如赵国的核心在邯郸、中牟一带，故而其扩张的方向便是向东，主要是与齐国争夺卫国、宋国的领土。魏国的核心区域在晋南，则其扩张方向便是向西，主要是与秦国争夺西河地区。韩国的核心区在南阳和陆浑，那么其发展方向便是向南，并将吞并郑国作为其主要目标。

在这样一个战略原则的指导下，三晋对内开放领土、互为支援，对外则密切配合、同步扩张，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彼时经过近百年的兼并，中原大地上存留的诸侯国已所剩无几，而即便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也大都深受三晋侵伐之苦，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魏国对秦国的压迫。

大约在公元前446年前后，参与晋阳之战的魏驹去世，其孙魏斯（又名都）即位，这便是大名鼎鼎的战国首霸魏文侯。魏文侯当政时的用人态度十分开放，他既重用李悝、西门豹这样的法家人物，推行法治改革、奖励耕战；也以高姿态礼遇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儒家名士，以收取民心。既任用翟璜、魏成这样为人称道的君子，对乐羊、吴起这些有污点的能人也都来者不拒。

魏文侯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既带动了魏国的文化繁荣，同时也为其军事、政治、经济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悝（李克）的主持下，魏国针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弊病推行了大量的改革措施，从而开启了战国时期变法图强的先河。

在经济上，针对魏国多山的实际，李悝推广精耕细作的方法，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为应对农业发展的不均衡和时常降临的天灾，推行平籴法以平衡粮价。魏国的国土分散，其领土与当时的主要大国都有接壤，这也为魏国开展商业贸易提供了便利。另外，魏国还在军制上实行了改革，放弃对战车的依赖，训练出一支强悍的步兵队伍，也就是时人闻风丧胆的“魏武卒”。

经过这一系列改革，魏国综合实力很快就达到了顶峰。作为其主要进攻对象的秦国，更是在魏国一系列打击之下，被压迫在泾洛以西多年不敢东进，成为战国时代变法图强的第一个受害者。到晋烈公十年（前406年）左右，魏国又越过赵国，灭掉了盘踞在河北中北部的中山国。

不仅如此，魏文侯还带领赵、韩两国在中原大杀四方，让齐、楚等国闻风丧胆，这就使得魏国很快就取代了过去的晋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可以说，三晋在战国初期之所以能在中原横行无忌，魏文侯在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比如据《系年》记载，公元前425年前后，为了打压强卿对公室的压迫，即位不久的宋悼公前往楚国朝见，请求楚国协助攻打侵削公室的执政司城氏。楚简王也是个爽快人，得到消息后立刻命莫敖阳为点兵北上平定宋乱，并修筑黄池、雍丘二城驻扎，这就引发了三晋的强烈不满。不久，魏文侯便与赵献侯（浣）、韩武子（启章）合兵一处包围黄池，以逼迫楚国撤军。

楚国并不甘心失去宋国，又派阳为带兵侵晋，先后包围宜阳、赤岸等地，以报复三晋干涉黄池之事。可三晋也不是什么能吃亏的角色，不仅集体行动抵御楚军，迫使对方解开了赤岸的包围，还与楚国在长城一带进行了一场激战，打得楚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后来楚声（桓）王即位，大约是不满于宋、郑两国参与为三晋正名的活动，于是出兵包围宋国达十个月之久。在楚国的压迫之下，宋休公不得不低头认错，并于公元前401年与郑繻公一同朝楚。

郑、宋的来朝，让楚声王颇有些志得意满，于是便再次经略中原。他们一方面在郑国的榆关（武阳，今河南中牟南）筑城，并趁着韩国国丧的机会，指使郑国出兵包围阳翟；另一方面则与秦国联络，从侧面奇袭魏国，以抵御三晋向外扩张的势头。

可事不凑巧，偏偏这个时候，楚国内部爆发了“盗杀声王”事件，雄心勃勃的楚声王一朝命丧，使得楚国又陷入了一场内乱之中。不久后，有王子定出逃到晋国，希望借由三晋的力量与刚即位的楚悼（哲）王争夺王位。

三晋对此大喜过望，于是便与郑人联合起来伐楚桑丘（今河南新蔡）、攻取榆关、再败楚师于桂陵，将楚国在中原的据点一一拔除。第二年，三晋再接再厉，大军长驱直入，准备将王子定送回楚国。这次事件因为鲁阳公（鲁阳文子）抵御未能成功，但却将三晋与楚国之间的冲突推向了高潮。

公元前398年，楚国大夫郎庄平君率师侵郑，郑军一战而溃，从而引发了郑国内部的长期混乱。次年，三晋出兵包围并攻克了楚国的津、长陵等地。作为报复，楚国大夫平夜悼武君带兵入侵晋地，占领了郃邑。

至公元前391年，韩取、魏击带兵再次攻取了楚国在中原建立的据点大梁（今河南开封）和榆关，打得楚军精锐尽丧，其主要将领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右尹昭之婁全部战死，残军弃甲曳兵、犬逸而还。

战争的失利在楚国内部引发了剧烈分化，陈县人擅自接纳王子定，似乎预示着国内有人想与楚悼王分庭抗礼，这就直接威胁到了楚悼王的地位。若不是齐、秦两国对三晋的牵制，楚国很可能会再次迎来政权颠覆、乱局纷扰的时代。

郑国覆亡

与风头无两的魏国相比，赵、韩两家发展的势头显然要缓慢得多。但即便如此，在战国初期的中原政治舞台上，脱胎于晋国的赵、韩两国也依然称得上是诸侯中的翘楚。赵国、韩国在魏文侯的鼓舞下也都施行了积极的扩张政策，让周边大小诸侯无不胆战心惊，而其中最感到忧虑的，自然就要数与三晋为邻的郑、卫两国了。

晋国对郑、卫土地的觊觎，实际上从晋平公时期便已经开始了。晋平公即位初期，卫国发生了一次逐君事件，卫献公被权臣孙林父、宁殖驱逐出国，在经历了十二年的流亡之后，才又在宁殖之子宁喜的支持下返回国内。

在这场政治事件中，晋国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他们不仅慨然接受了孙林父叛逃带来的土地，还堂而皇之地出兵攻取卫国西部六十邑赠予孙氏，从而开启了晋国侵夺邻国土地的序幕。

与此同时，当齐国叛臣乌余带着从齐、鲁、宋、卫等国劫掠而来的土地叛逃的时候，晋人对这些土地也都一概笑纳。尽管这些非分的举动在赵武、韩起执政时期得到了纠正，但晋国罔顾盟主身份的做法还是在诸侯的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尤其是让卫国感受到了强烈的恐惧。

与对待卫国时强横的做法不同，晋人虽对郑国的土地也常怀觊觎之心，可在手法上毕竟温和了许多。彼时先后担任晋国执政的赵武、韩起，都曾利

用外交场合命郑国六卿赋诗以观其志，表现出了对郑国内政走向的极大关注。

这种过分的关心足以引起郑人的警觉，因此当子产开始担任郑国执政的时候，便时刻对晋国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是在楚太子建被杀之后，晋国意欲侵吞郑国的野心便不再是什么秘密，两国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直到最后走向了彻底决裂。

不过多少能让郑、卫两国执政者感到宽慰的是，当晋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扩张姿态时，齐国却自告奋勇地站在了“护花使者”的位置上，一再阻挠晋国在郑、卫的军事行动。

而在晋国内部，不同的家族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因而当执政者出现更替时，他们对外扩张的用力点也经常转移。比如东阳内战之前，士匄、士鞅父子更关心在卫国的利益，赵武和韩起则对郑国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担任执政的赵鞅为了巩固东阳利益，便将扩张的方向转向了卫国；与之相反的是，在智瑶执政的二十年间，晋国对郑国的军事投入则明显增多。

执政者的轮番交替、战略重心左右偏移，总能给郑、卫两国带来喘息的机会，然而这一切都在晋阳之战后发生了变化。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韩、赵两国为了迅速扩张，分别将火力锁定在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这对他们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们先来看郑国。

承担对郑国主攻任务的是分晋后的韩国。早在晋平公在位后期，担任执政的家族领袖韩起就隐约间确定了其未来发展基本的战略。晋阳之战结束

后，形式上已经独立的韩国更是将郑国视为禁脔，并为之做出了长远的布局。当时，韩氏谋臣段规曾一再劝谏宗主韩虎，让他一定要将成皋（后世称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争取过来。韩虎起初很不理解，于是就问道：“成皋不过是一块流水不存的石洼地，寡人要它有什么用处？”

段规回答说：“臣闻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一块微不足道的土地之所以能牵动千里之外的局势，是因为它占据着地利之便；一支万人的军队之所以能打败数倍于己的敌人，靠的是出其不意的奇谋巧计。成皋的土地看似贫瘠没什么出产，但却有着险固的地势，占据了它，我们就能以此为跳板撬动整个郑国，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韩康子尽管取得了成皋，但似乎并未立即对郑国下手，更多的还是将精力投入到巩固新分得的土地上。直到二十多年后，其子韩启章（韩武子）即位，韩国才发起了对郑国的大规模攻势。

韩武子二年（前423年），韩国趁郑国君位更替的时机首次用兵，使得在位不到一年的郑幽公死于战祸，郑人立其弟驸为郑繻公，继续组织抵抗。公元前408年，刚刚继位的韩虔（韩景子）又亲自带兵伐郑，攻取了雍丘（今河南杞县）。

为了进一步压迫郑国，韩国在短短十几年内迁都两次。第一次是韩启章在位时期，将都城从平阳迁到了宜阳；韩虔在位时期，又将都城迁到了阳翟（今河南禹州）。

阳翟位于新郑西部，两者相距不过三四十公里；而且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阳翟的城市规模小得实在不像话，与他们之前用心经营的宜阳不可同

日而语。因此，与其说韩国是将都城迁到了阳翟，倒不如说是韩景子将自己的宫殿搬到了军营里。

然而，郑国虽然弱小，却也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郑繻公在位期间，任用驷子阳为相，在郑国内部开展了一系列变法改革，使得郑国一度出现了强盛局面。他们不仅积极修筑防御工事，甚至还大举反攻韩国，一度在负黍（河南登封西南）打败了韩军，并包围了韩国临时首都阳翟。

在此期间，郑国似乎也有意缓和与三晋之间的关系。比如当三晋试图获得天子册封的时候，郑人鞍前马后为之奔走；当三晋与楚国在榆关展开对抗的时候，郑国积极出兵，配合三晋击溃了楚国阳城桓定君所率的军队。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系列举动不仅未能换取韩国的谅解，反而又激怒了楚国，从而为自己带来了一场致命的灾难。

公元前398年，为报复郑国为虎作伥的行径，楚军大将郎庄平君带兵大举伐郑。面对楚国大军的讨伐，原本就没什么战斗力的郑军接连“翻车”，到最后包括领军四将皇子、子马、子池、子封子在内的整支军队都成了楚人的俘虏。

战争的失败在郑国内部引起了系列内乱。首先是以太宰欣为首的一派势力推翻了驷子阳取得了政权，但对于如何解决郑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毫无头绪。按照韩非子的评价，太宰欣属于是“朋党比周以事其君”的典型，对上威逼主君，对下扰乱法治，对外勾连卖国，对内专意行事，是个不折不扣的奸佞小人。在他的治下，郑国政局乌烟瘴气，最后的灭亡也就不再是什么悬念了。

驷子阳被杀的两年后，在位二十七年的郑繻公被人杀害，郑幽公的另外一个弟弟康公乙被拥立为君。这次的事件将郑国内部冲突又推向了一个高

潮，使得原本就已衰弱的郑国被一分为三，互相敌对的势力分别占据负黍、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新郑各自为政。为了抵御韩国的蚕食，他们也只能依附魏国来寻求自保，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

此时的韩国已经从一个有实无名的国家变成了正宗的诸侯国，韩虔摇身一变升级成了韩景侯，从此也加紧了对郑国的攻势。

公元前400年，在位九年的韩景侯去世，其子韩列侯韩取即位。韩列侯在位六年（前394年），负黍势力在内斗中失败，宣布归顺韩国。

韩文侯在位二年（前385年），韩国又打败了盘踞在阳城的另一派势力。与此同时，他们还顺势进攻宋国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虏杀了宋国国君。

公元前375年，刚刚即位的韩哀侯趁楚、魏交兵的时机出兵包围新郑，郑国由此彻底灭亡，其大部分领土都被韩国吞并。

赵国内乱

卫国方面受到的压力主要来自赵国。由于其在范氏、中行氏之乱爆发期间充当了齐国的马前卒，因此内战结束之后遭到了晋国的猛烈报复。光是赵鞅执政的最后十几年，史料中晋国对卫国的讨伐就至少有七次。

赵氏对卫国的侵蚀会严重损害齐国的利益，因此齐国也频繁插手卫国事务，为赵氏的东扩增添了不少阻力。为了减轻自身的压力，赵氏很讨巧地选择了“远交近攻”之策，也即与北上争霸的吴国结盟以钳制齐国。

晋定公三十七年（前475年）十一月，赵无恤在为其父服丧期间，听闻越国大军包围姑苏，发动了对吴国的最后决战，因此决定在丧食的基础上再度

降低饮食规格。其臣属楚隆怕他身体吃不消，于是就关切地问道：“三年之丧已经是表达亲情最极端的方式了，如今您再次降低饮食规格，如此戕害自己的身体，又是何苦呢？”

赵无恤回答说：“黄池盟会时，先主与吴王歃血盟誓，约定自此之后要‘好恶同之’。如今吴国陷入危难，我这个继承人本想遵守先主的约定为吴国排忧解难，怎奈晋国的力量有限，因此也只能以此来表达心意了。”

楚隆听罢深受感动，于是便主动请缨，跋山涉水赶到姑苏城外，在得到越王勾践的许可后，入城将赵无恤的一片温情传达给了夫差：“寡君的管事无恤派陪臣隆前来，是为了向您表达歉意的。黄池之会时，先臣志父（赵鞅）有幸参加盟会，并与贵国约定‘同好共恶’，为您纾解患难。可如今您陷入危难，晋国却无能为力，因此特派陪臣来向您报告。”

晋国与吴国相距千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带领军队穿越列国前去营救显然不现实，夫差自然也不会有所埋怨。他对楚隆说道：“寡人无才无德，不能与越国友好相处，如今又惊动了贵国令大夫烦忧，谨劳贵使代为转达寡人的谢意。”

赵氏与吴国交好，而越国又灭掉了吴国，那么赵氏与越国之间是不是就应该不共戴天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吴国被灭后，赵无恤很快就与越国达成了盟约，用“系年”的说法就是“越人因袭吴之与晋为好”。

晋阳之战后，赵国先后两次与越国联合对齐国进行夹击。第一次是在晋敬公十一年（前441年），赵桓子统帅诸侯大夫与越国令尹宋在巩地举行会盟，随后又大举伐齐。大约是在这一战中吃了大亏，战后不久齐国就开始沿着南山（泰山）至北海（渤海）一线修筑长城，是为齐长城修筑的起始年。

第二次战争发生在晋幽公四年（前430年），新稚狗又与越王朱句、宋昭公合兵攻破齐长城，败齐军于襄平。

赵国对齐国的战争节节胜利，局面也是一片大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赵国东扩的步伐却突然陷入了停滞。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赵国内部出现了一场变乱，而这场内乱又与赵无恤的身后事有很大关联。

按照《赵世家》的说法，赵无恤与妻子空同氏原本有五个儿子，但是由于感念长兄伯鲁让贤之举，决定死后将宗主之位让给哥哥的儿子代成君。可遗憾的是，代成君身体似乎不太好，还没等到那一天就离世了，赵无恤只好把代成君的儿子赵浣立为继承人，以确保其在自己死后能继承家业。

想法虽好，可真要实施的时候总会出现些麻烦。等到赵无恤去世，他的弟弟赵嘉（赵桓子）却跳了出来，把赵浣赶走自立为君。好在赵嘉命比纸薄，篡位的时候年纪也老大不小了，过了不到一年的宗主瘾就也跟着赵无恤去了。

赵嘉这一死，赵氏内部就出现了冲突：赵嘉一派希望父死子继；可还有不少人认为，赵嘉本来就不是赵无恤确立的继承人，他自己的合法性都成问题，他的儿子又凭什么继位？两派人谁也说不动谁，最后实在着急了就动起了手，结果是赵嘉一方失败，赵嘉的儿子被杀，赵浣被迎回重新继位，是为赵献子（分晋后追认为赵献侯）。

这段记载虽然简略，可存在的问题却不少。首先是关于赵无恤的在位时间，《赵世家》与《左传》就有很大的出入。按照《左传》的记载，赵鞅（赵简子）最晚到晋定公三十七年（前475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因此人们一般将这一年定为赵无恤在位元年。然而在《赵世家》的记载中，赵鞅去

世的时间却被挪到了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相应地，赵无恤即位元年也就改为了公元前457年。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偏差，或许与传文表述事实的模糊性有关。《左传》的记载中并没有直称“赵无恤”又或者“赵襄子”，而是含糊地以一个“赵孟”称之。“赵孟”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可以指代任意一个赵氏大宗领袖，在赵氏二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被称为“赵孟”的至少有四个人，分别是赵盾、赵武、赵鞅、赵无恤。

或许在司马迁看来，上文所提到的“赵孟”并非赵无恤，主要依据大概有这么两个：首先是“赵孟降于丧食”未必就是指父丧，因为这一年恰好是晋定公去世的年份，“赵孟”为晋定公“降于丧食”也未可知。第二个依据在晋出公十一年（前464年），智瑶和赵无恤在伐郑时发生了争执，智瑶很是不屑地嘲讽对方：“恶而无勇，何以为子？”这里的“子”指的是嫡子，意思是你长得丑又没勇气，有什么资格被立为嗣君呢？既然是嗣君，那么赵无恤就还不是赵氏的主人，这个家族还得归他的父亲赵鞅来管。

如果以上推论确实的话，整个故事似乎也能圆得过去。但问题就在于，偏偏这个时候，《赵世家》又画蛇添足地写了一句：“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前文晋定公三十七年已经写了“是岁，越王勾践灭吴”，如今赵襄子元年又发生了“越围吴”，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一个已经灭亡了的吴国，怎么就又被围了呢？

赵氏谜团

想要厘清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只需要回到《左传》的文本，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晋定公三十七年的传文中，故事的主人公“赵孟”曾有这么一段表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楚隆在慰问吴王的时候，也明确地指出：“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

以上表述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这里的“赵孟”就是赵无恤，而赵鞅则已经是赵氏的“先主”、晋君的“先臣志父”了。而越围吴的时间，在《吴太伯世家》《鲁周公世家》《楚世家》等记载中均可以提供佐证，可以确信是在前公元475年。因此，赵无恤即位的时间基本可以确定是在公元前475年前后，《赵世家》的记载显然出现了巨大的疏漏。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接下来还需要明确的是赵无恤去世的时间。按照《赵世家》的记载，赵无恤在前457年即位，在位“三十三年卒”，那么去世的时间就应该是公元前425年。到他去世之后，赵氏爆发了内乱，也就是赵嘉自立为君的闹剧。对这件事的记载倒是没有出现前述的低级错误，但其他史料却依然对以上表述提出了质疑。

首先是关于赵无恤、赵嘉、代成君、赵浣这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赵世家》以赵嘉为无恤之弟，代成君为赵无恤之侄；但在《世本》中，却认为赵嘉、代成君都是赵无恤之子；而到了《史记索隐》中又认为赵浣也是赵无恤之子。

其次是关于赵嘉在位的时间。《赵世家》认为赵嘉于公元前425年即位，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然而根据《系年》的说法，早在晋敬公在位的第十一年，赵嘉就已大会诸侯且与越、宋等国联合伐齐。依照现在的普遍看法，晋

敬公元年为公元前451年，其在位十一年便是前441年，可见早在这个年份之前，赵嘉就已经继任了。

以上的史料相互抵牾，却又不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论，如何判断信息的真伪，就成了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在这有限的信息之中，我们究竟该如何甄别才能解开其中的谜团呢？

作为一名忠实的历史记录者，司马迁总会有这样的烦恼，他所掌握的古代史料，对于同一件事经常会出现相互矛盾的记载。比如晋定公三十年的黄池之会，对于晋、吴双方究竟是谁抢到了歃血的主动权，古往今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惑。由于年代久远，司马迁无法回到历史现场去亲自验证，也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做出取舍，于是便只能将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全都保留下来，留待后人考证。

同样的，《赵世家》中的很多记载也经常会出现与其他史料有出入的现象。比如赵氏孤儿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援引了赵国残存的史料和民间传说。这些传说今天看来显然不足取信，多半是后世的赵国君主为掩盖赵庄姬的丑闻而捏造出来的。赵氏的后人的确很善于做宣传工作，他们总有一种要篡改历史的冲动，以粉饰自己的过往、修饰其传承的合法性。

在有关赵嘉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赵氏的宗主之位从赵无恤传到赵嘉、再从赵嘉传到赵浣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斥着血雨腥风的黑暗，写满了手足相残的故事。鉴于赵国后来的国君都是这场政治斗争胜利者赵浣的后人，不难想象在赵嘉“篡位”的这个情节上，他们会做些什么文章。

考虑到古人对宗法传承的无上信仰，赵浣的后人在篡改历史的过程中，应该不存在歪曲本宗族世系的可能，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测，赵浣的确出

自赵伯鲁、代成君一系。唯一难以确定的，是赵无恤与赵嘉之间究竟是兄弟关系还是父子关系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赵世家》中的一个细节，其中提到“襄子立三十三年卒”。作为领导三家分晋的重要角色，赵无恤可谓是一战成名天下知，身处当世的人们对于这样一位人物自然会格外关注，因此其在位三十三年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恐怕也是天下人尽皆知的。这就好比是人们对于晋文公年龄的争论，有的认为他是十七岁流亡，也有人认为是四十三岁流亡，但对于他前后流亡共历十九年这个事实，却没有人敢否定或篡改。

以此为基础，我们似乎也可以做这样推定，赵无恤在位年限的确是三十三年。倘若其继位的元年是公元前476年，那么去世的时间就是公元前444年，而非《赵世家》所认为的前425年。这也就意味着，作为赵无恤的后继者，赵嘉继任的时间要大大提前，这样一来就能与《系年》中赵嘉伐齐的记录相吻合了。

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推论，也即赵嘉就是赵无恤的儿子，由他来继承赵无恤的宗主地位，既符合继承规则，也符合人之常情。

三晋伐齐

结合以上推论我们可以想见，在战国时代开始的几十年间，赵氏或许是经历了这样的一场变乱：

强大的赵氏在经历了晋阳之围后，原本精锐的武力受到了重挫，以致中央控制力减弱，但在赵无恤的控制下仍旧保持了多年的安定局面。

及至公元前444年赵无恤去世后，其子赵嘉继位，被封到北方的强大公族代成君因为记恨赵无恤当年鸠占鹊巢而兴风作浪，试图通过战争的形式实现小宗对大宗的革命。只可惜，由于大宗力量太过强大，代成君“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其子赵浣继承乃父衣钵，继续与赵嘉周旋。

经过近二十年的内战，到公元前424年，以代地为大本营的赵浣终于打败了赵国大宗，再次上演了一出曲沃代翼式的以小宗灭大宗的历史大剧，成功夺取了赵氏的大位。

取得成功之后，已经成为赵献子的赵浣乃至于后来的赵国君主，为了给自己的合法性做背书，着意掩盖这桩政治丑闻。他们一方面制造了赵无恤改立嫡子的故事，抹杀了赵无恤与赵嘉的父子关系，另一方面则有意缩短赵嘉的在位年限，以此为这段丑恶的历史背书。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们或许还会会心一笑，但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这次的胡乱篡改，才闹出了一个吴国被灭两次的笑话，而这个锅却被甩到了太史公身上。

在此期间，赵氏的内政改革也不容乐观。为人称道的张孟谈、公仲连等人也只是继续推行举贤任能的传统政策，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原本积极进取的赵氏此时反而有些故步自封的味道。这种种的纷扰和积弊，使得本就在晋阳之战中遭到削弱的赵氏，在分立之初的几十年间一直不能振作，其东扩的努力也渐趋停滞。

赵浣继任后，赵氏内政渐趋稳定，于是便将都城迁至中牟，准备与齐国展开新一轮抗衡。齐国大约是嗅到了其中不安分的气息，因而于前413年率先向赵氏发起了挑战，大军侵入赵地，毁黄城（今山东冠县）、围阳狐（今河北大名），使得赵国在这一轮争夺中颓势尽显。然而，正当赵人感到手足无措的时候，齐国却突然爆发了一场内乱，这就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场爆发于齐宣公五十一年（前405年）的内乱，在不同的史料中被分别冠以“和子之乱”“项子牛之祸”等名称。据推测，可能是田白（田庄子）的次子田和联合子牛、田布等人谋杀了其兄长田利（田悼子），成为田氏的新任宗主。党于旧主田利的公孙孙、公孙会举旗造反，结果被田布镇压，公孙孙死于非命，公孙会只得据守廩丘（今山东郓城）投靠了赵国。

赵氏依靠齐国的叛乱获取廩丘，但由于其总体上仍处于颓势，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保证廩丘不被齐军攻陷。因此当田布带大军前来讨伐时，也就只能求救于韩、魏，这就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晋伐齐事件。

接到赵国的求援后，韩、魏两氏也不遑多让，立刻派出翟角（翟员）、翳羌两员大将，配合赵将孔屑（孔青）救援廩丘。双方在龙泽展开激战，晋人以新式步兵采用全新战法对峙齐国旧式的车阵，结果一战斩杀齐军三万，缴获战车两千乘。尽管这个数字有虚报的可能，但从斩首的数量级上看，显然与八十年前晋吴夹击齐国的艾陵之战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赵国主将孔青难掩心中喜悦，于是便打算用敌军尸体造两座京观，以宣扬此战的功绩，但他手下一个名叫宁越的大夫却不以为然。在宁越看来，与其建造这么两座与己无益、徒招人恨的京观，倒不如全军后退三十里，把战场留给敌军好让他们为战死者收尸。

之所以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发扬儒家仁爱之心，其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诱使齐国调配大量的兵士、战车、粮草、绢布等资源，来安葬阵亡将士并抚慰其家属。

如果说通过战争直接消耗对方的战车铠甲可以称为“外攻”的话，那么腾出时间让对方安葬丧者、抚恤生者，达到消耗对方府库钱粮的目的，便是所谓的“内攻”。这个计策既能为赵军带来仁义的名声，同时还能从内部削

弱齐国，的确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孔青还是不免有些疑虑：“万一对方不中招，那该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宁越认为根本无须考虑。因为假如他们真敢这么说的话，那么领军的将领至少要承担三桩罪名：“作战而不能取胜，其罪一；带领士兵出征而不能让他们平安回国，其罪二；士兵抛尸荒野却不管不顾，其罪三。这三条罪行，足以让百姓怨恨上位者，从而使其无法役使百姓，百姓又无从侍奉上位者。如此一来，齐国岂不就是受到了双重攻击吗？”

长城之战

不过饶是如此，三晋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对方，而是本着穷追不舍的气势，决定对齐国展开更加猛烈的攻击。

龙泽之战的第二年，也即公元前404年，赵、韩、魏三家向偏安一隅的周威烈王请了王命，拥着日薄西山的晋烈公前往任地，在那里召集诸侯举行了一次盛大的会盟，商讨再伐齐国大计。

经过一百多年的兼并战争，此时中原大地上尚存的诸侯国屈指可数，已经很难出现有十几个国家参与会盟的盛况了。而宋悼公在赴会途中突然去世，使得宋国也不得不中途退出。因此任地会盟实际参与的国家可能只有越、鲁、郑几国，而最终派兵配合三晋伐齐的则只有越国了。

这次的讨伐，三晋主君赵烈侯籍、魏文侯斯、韩景侯虔都亲自出马，与越国密切配合，从西、南两个方向对齐国展开攻击。三晋大军声势浩大地进军齐国，一路踏取平阴、攻破长城、追逐齐国残军直达汧水之滨。

已经损兵三万且国库空虚的齐国，哪能经得起这种高强度的打击？他们首先将建阳、丘陵割让给越国，默许了越国灭亡缙国，并进献大量人口给越

王；而有名无实的齐康公则被甩到鲁国，让他亲自担任越王骀乘，与驾车的鲁穆公一左一右服侍着越王在鲁国都城大出风头，终于换取了越国的退兵。

与三晋的和谈就没那么顺利了。对方趾高气扬地提出了两个非常过分的要求：“毋修长城，毋伐廩丘。”其中，“毋伐廩丘”要求齐国承认廩丘归属三晋的事实，这个条件虽说有些蛮横，但在互有攻伐的古代社会，一城一池的得失终究是能够接受的。可“毋修长城”就不一样了，这与当年郤克“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有得一拼，都是让齐国不得设置针对三晋的战略防御工事，以便对方随时讨伐，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不可能接受如此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条件如此苛刻，齐国实在没办法答应，可不答应又无法让三晋退军，进退两难。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括子的人看出了其中玄机，他认为三晋的土地并不与齐国直接接壤，之所以逾邻国而包围平陆（平阴），显然不是因为贪利，而是为了求名于齐国。

单从字句上看，括子所提供的论据显然不够严谨。毕竟晋齐两国的边境早在春秋中期就已经相连，而诸侯之间的攻伐也并不以互相接壤为必要条件。但从最终的结论来看，括子的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这件事真正的疑点实际上有这么两处。第一处是《系年》和《竹书纪年》中有关“晋公止会诸侯于任”“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的字句。以三晋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军事实力，只要能够联合起来，基本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扛得住。再加上这次齐长城之战爆发的前一年，三晋通过廩丘之战以及后来的“内攻”手法，已经基本解除了齐国的抵抗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原那几个小国参与与否，对于战局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三晋却偏

要将已经毫无实权的周威烈王和晋烈公全都给搬了出来，显然是小题大做了。

第二个疑点源于战后的会盟。古代举行会盟素来讲究对等原则，也即以君会君、以臣会臣。而在这次会盟活动中，作为齐国名义上君主的齐康公却被迫与赵、韩、魏三家的主君在军中会盟；齐国实际上的控制人，此时名义上臣子右相田和、左相田湫却只能与“三子之大夫”结盟。三晋主君特意将自己放在与齐康公对等的位置上，而田氏则只能与三晋的大夫平齐，其中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或许正是因为察觉到了这其中违和的信号，括子才突然茅塞顿开，从而得出“利不足贪也，然则求名于我”的结论，并提出让齐康公去往成周为三晋正名。

括子的想法让不少人都感到匪夷所思，也在齐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果不能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就只能答应晋人的要求，否则就无法让其撤军。

到底能不能退敌，也只有试一试才知道。反正要抛头露面的是那个早已失去权威的齐康公，就算是被撞得灰头土脸，对于田氏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那为什么就不能试试呢？

最后试探的结果也的确让他们感到惊讶：三晋在得到齐国的允诺后，竟然真的就撤军了！这下轮到齐国人傻眼了，他们看着晋军退却时扬起的漫天尘土，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三晋封侯

三晋从齐国退兵之后，煞有介事地奉了晋烈公到成周去朝见天子，而齐国人也很识趣地通知鲁穆公显、宋休公田、卫慎公虔、郑繻公骀，让他们陪着齐康公一同朝见王室。

自打春秋开始礼崩乐坏，周王室的日子过得是一日不如一日。特别是王子朝之乱后，天子合法性严重受损，诸侯各行其是，王室事务更是无人问津，最少有一百年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了。猛然间有这么一群地广千里、膀大腰圆的诸侯同时出现在天子的朝堂上，一个个还都表现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模样，还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次诸侯汇聚成周，主要的议程是晋侯向天子“献齐俘”。按照几百年传下来的祖宗家法，兄弟舅甥之间打架斗殴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是不可以向天子献俘的，因为这会坏了规矩。如果实在是打得太狠了，互相之间有些过意不去，也顶多是向天子通报一下战况，天子若是觉得问题严重，出面抚慰一下即可。

比如当年晋齐鞌之战爆发后，晋国曾派巩朔到成周献捷。那个时候的天子是周定王，这家伙虽然也没什么威严，可总还是明事理的，因此很傲娇地把巩朔献捷的请求回绝了去。

当然了，傲娇归傲娇，并不代表他就可以对晋国的使臣为所欲为。周定王很识时务，事后还很殷勤地私下设宴招待巩朔，并馈之以厚礼，同时不忘叮嘱他：“这件事不符合礼制，回去以后千万不要在史册上乱写！”

可如今时势异也，周威烈王虽然谥号听起来很虎气，可比起他的先祖周定王来，终究还是少了些许胆气。如今同样的场景再现，威烈王是大气也不敢喘，更别说提意见了！他战战兢兢地顺着三晋的意愿走完了献捷的流程，

刚想要为自己擦把汗，却不料东方大国齐国的君主突然间扑通一声跪倒在他面前。

这一跪不要紧，差点把威烈王的魂儿给吓丢了。他惊恐地扫视着朝堂上的众人，本以为自己的举动会引起一片嘲笑，可当他扫视一周之后却发现，所有人都表情肃穆，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

朝堂之上一片静谧，只听到齐康公伏在地上正声泪俱下地数落自己的罪过。两人相距只有十几步远，但那呜咽的声音，好似是从群山阻隔的千里之外传来，缥缈缥缈，让人生出恍如隔世的错觉。齐侯的倾诉情切而冗长，在这漫长的诉说中，周威烈王似乎正漫步在时光的回流中，慢慢地回到了祖先荣光的时刻。

还是在同样的朝堂之上，被征服的“蛮夷”被捆缚了手脚，正伏在堂前悔罪请求宽恕。意气风发的天子端坐高台，将这些部族的首领或是诛杀或是迁徙，而新征服的土地则都分封给功勋贵胄，让他们定国安邦、藩屏王室。坐在朝堂两侧的，或是自己的叔伯兄弟，或是舅甥子侄，正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朝堂，脸上全是普天同庆的喜悦和踌躇满志的神色。

说完了自己的过错，阶下的“蛮夷”突然话锋一转，转而开始赞扬三晋主君是如何本着“治病救人”的精神，让自己悬崖勒马、悔过自新的。他盛赞这三位英雄大公无私、高风亮节，不辞辛劳、排除万难，只为将自己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可见其德行与贤能足堪为万世楷模。

周威烈王猛地一怔，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出戏”了。壮怀激烈的情绪顿时消散，死寂和落寞再次涌上心头。他已经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齐康公会继续颂扬僭越晋卿的德行功业，劝自己册命那三个早已自号为诸侯的逆臣以正式的封号。

他从心底里不愿这样做。可就算他拒绝了，又能如何呢？大周朝天下的礼崩乐坏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是在这些诸侯的欺辱下，周王室才一天天地江河日下，直到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如今也算是因果轮回、报应不爽，那个往日里不可一世的霸主之国，今天也算是步周王室的后尘，终于尝到了以下犯上的苦果。

他或许该为此而高兴，又或者该同病相怜，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自己的情绪和意见在这些骄横的侈卿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说还有什么足以安慰的事情，他只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僭越为诸侯的大夫们，也能尝到同样的恶果。只是那一天，自己或许永远都看不到了。

接下来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齐康公果然把册命三晋的话说了出来。尔后，一直跪坐两侧的宋公田、郑伯骀、卫侯虔、鲁侯显，甚至包括晋国国君晋烈公，全都齐刷刷地跪在阶下，表示他们也有同样的愿望。

既然这是大家一致的想法，作为天子又能做什么呢？诸侯们早就把策命所需的一切礼器都置备周全了，自己只需要像木偶一样，在襄礼的引导下，分别为魏斯、韩虔和赵籍举行册命典礼，履行授土授民的仪式。自己唯一需要付出的，是耐着性子由着他们假惺惺地推辞，耐心地等着他们换完一件又一件的华服，耐心忍受他们完成整脚的演出。

在这一系列的表演完成后，魏斯、韩虔、赵籍终于有了天子册封的名号，正式位列诸侯。这场册封典礼似乎也耗尽了天子所有的心力，到第二年，周威烈王就驾鹤西去了，只留下了一幅疏影横斜的画卷供后人评说。

这一年是公元前403年，也是《资治通鉴》叙事的起始之年。

兄弟离心

晋阳之战以来，赵、韩、魏三家战略明晰、配合密切，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都是以一个整体出现在中原的战场上，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他们打马向东，雄霸东方的强齐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战而丧师三万，折损战车两千；再战则平阴失陷，巍峨的长城也成了三晋纵马的乐园。他们驱车向西，赳赳老秦只得仓皇西窜；秦晋交锋的前线被推进到洛水之滨，情势比春秋时期更加局促。他们剑指荆南，不可一世楚国精锐一夜间折戟沉沙，其北上所倚仗的主要将领全部战死，国家也陷入了持续的混乱之中。他们纵横中原，曾经辉煌一时的郑国从此灰飞烟灭，硕果仅存的宋、鲁、卫等国也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份儿。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三晋就是整个中原的主宰，俨然是从晋国脱胎出来的“混世魔王”，兵锋所指尽望风披靡，车马过处皆人心战栗。即便是在取得诸侯地位后，也仍然维持了几年和平友好的关系，继续保持着昂扬向上、积极扩张的势头，让齐、楚、秦这样的强国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

然而物极必反似乎是这个世界运行的不二法则，当三晋的威势达到顶峰，由盛而衰也就成了必然。首先试图打破这个局面的，是以遏制三晋扩张为目的而形成的一个全新的诸侯反晋同盟。

与百年前齐景公草创的东方反晋联盟不同，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初的反晋同盟，是一个由楚、齐、秦三大强国构成的松散联盟。然而遗憾的是，在整个战国历史上，诸侯联盟在应对单一强权的过程中总是力不从心，这种现象在后来六国对抗强秦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同样的，与三晋同出一门而自然形成的同盟关系相比，反晋联盟的联结程度显然不够紧密，在应对三晋扩张上起到的作用也着实有限，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晋国独霸中原的政治格局？又是什么

原因让脱胎于晋国的三晋如此强悍？面对这几尊见神杀神、横行霸道的混世魔王，周边诸侯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齐、楚、秦等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三晋为师，开始任用法家人物进行改革。楚国的吴起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将列国彻底从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中拉了出来，最终创造了一个剧烈激荡又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新时代。而就在这个新时代来临的前夜，三晋内部却突然出现了分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兄弟阋墙，也非一夜之功。

以利益联结而形成政治联盟，终将难以逃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诅咒，这是晋国内部政治逻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被历史一再验证的普遍规律。尽管到战国初期，三晋已经独立建国，然而由母体所生发出来的政治惯性却一直在发挥作用。这就注定了过去的故事总会频繁上演，三晋也终将会从亲密无间的盟友，变成互不相容的仇敌。

事实上，就是在他们精诚合作，关系最为紧密的五十年中，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便已经受到了不少的挑战。

《战国策·赵策》中讲过这么一个例子，说是在晋阳之战结束多年后，韩、魏两家因为赵氏多分了十个邑的土地而心怀不满，于是就准备联合齐、楚等国攻取赵地。赵无恤听到后很是忧心，于是就把早已罢官归耕的张孟谈找回来，让他消除这场危机。据说张孟谈回国后，将他的妻、子分派各国进行游说，终于瓦解了四国同盟，保证了赵氏的安定。

另据《魏策》记载，说是魏文侯在位时期，韩、赵两家又闹别扭，分别派人去联络魏国想找对方的麻烦，魏文侯都以与另一方为兄弟之邦为由，拒

绝了出兵的请求。两国起初都对魏国的态度感到十分气恼，但事后听说了魏文侯的初心后又心悦诚服，于是携手朝见魏文侯，并尊其为三晋之长。

与此同时，在有关中山归属的问题上，赵、魏两国之间的分歧更是显而易见。

史料中关于中山国的记载非常模糊，如今我们已经很难理清其详细的发展脉络。根据现有的史料分析，中山国应该是由原来白狄所建立的鲜虞发展而来的。其领土位于燕赵之间，也就是如今河北省中北部一带。

从弭兵会盟到晋阳之战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中山与晋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而据《中山策》的说法，中山国似乎早在战国初年就已经成为晋国的领土抑或附庸，且一度被赵国托管。

后来魏文侯打算将中山并入魏国管辖，这就让赵襄子感到十分不安。这时，有一位名叫常庄谈的人提议说：“中山一旦并入魏国，那么赵国必将危殆。您何不向魏国提出求娶魏文侯之女公子倾为夫人，并将其分封到中山去，让中山复立呢？”

以当时魏强而赵弱的形势判，魏国越赵而并中山，就会对赵国形成夹击之势，赵人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但常庄谈的提议却又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完全无法给出合理的解读。

到公元前408年，魏文侯再次决议要攻取中山。讨伐中山必假道于赵，赵人围绕该不该借道给魏国争执不休，后来有一位名叫赵利的大夫占了上风。在他看来，魏与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即便是攻取了也不可能长期占有，最后占便宜的一定是赵国，因此建议赵国纯粹以看热闹的心态来对待这件事。

同样的强弱形势，同样的地理位置，同样的一场争论，最后竟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而人们对此皆深信不疑，我们果真得夸赞古人摇唇鼓舌能力的不同凡响了。但不管怎么说，赵国最后还是答应了借道的要求，只是为了迷惑魏人，在借道的时候表现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

联盟瓦解

在外部局势不明晰的时候，三晋之间的矛盾顶多算小打小闹，到底还是没有引发直接冲突。然而当他们击败了周边的强国，尤其是被周天子册命为诸侯后，彼此的利益冲突便开始凸显，这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因素，来自各家实力发展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战国初期，魏文侯依靠李悝变法迅速强盛起来，逐渐取代了过去晋国在诸侯中的位置，成为当之无愧的头号强国。在强大实力的加持下，魏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在西河的扩张，将秦国进一步锁死在洛水以西。

而与魏国狂飙突进的发展形成对照的是，同样继承了晋国传统的赵、韩两国却由于国力疲弱，与齐、楚等国的竞争不仅进展缓慢，有时还常被对方“反推”，这就让国力强盛的魏国人操碎了心。三晋伐齐的廩丘之战和齐长城之战、全歼楚国精锐的榆关之战，这些辉煌战绩的取得都离不开魏国的鼎力支持。

从生产力角度分析，魏国所针对的秦国当时土地开发程度不高，劳动人口密度严重不足，属于绝对的落后地区。这就使得魏国长期向秦国腹地深入变成了一桩高投入、低产出的赔本买卖，微薄的收益无法为其提供长久的动力。而赵、韩两家所争夺的中原地区却是一块“流淌着奶与蜜”的肥沃之地，土地开发程度高、劳动人口稠密，是列强垂涎已久的天下粮仓。与此同

时，殷商故地在不少文学作品中还被冠以“中原十字路口”抑或“巴尔干半岛”的称谓，是春秋列国获取中原霸权的必争之地。

魏国在三晋之中承担了领导角色，然其所得却与付出不成正比，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一种为人作嫁的感觉，从而不再满足于早先的分工，同时开始在殷商故地启动大规模的拓殖活动。如此一来，三晋纷纷齐聚“巴尔干半岛”，开始同步争夺天下粮仓，原本分工明确、互相协作的联盟关系，就变成了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敌对关系，最终的分道扬镳也就无法避免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晋阳之战为三晋关系埋下的“炸药桶”。

与齐、楚、秦这些依靠自然扩张而形成的国家不同，三晋的财富积累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晋国公室的封赐，二是其他中小贵族的依附。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逐渐产生了抗衡甚至取代公室的能力，也有了与其他诸侯分庭抗礼的资本，然其土地分散的属性却很难转变。

正因为三晋的国土疆域都是在过去封地的基础上，由若干个互不相连的飞地拼凑而成，因此难免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形成一个整体。这种犬牙交错的领土形态也就成了引发争端、制造对立最大的隐患。

此外，领土的分散还为国家安全带来了挑战。春秋时期施行都邑制，大家都没有领土意识，只要占据了一个个的都邑，就算领土被分割成若干块，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战国时代恰恰是一个领土意识形成的时期，这就使得三晋天然有一种想要把土地合成一个整体的冲动。而若要达成这个目的，要么是和平交换，要么是武力掠夺，没有第三条路径可选。

在最初五十年的蜜月期中，三晋的确围绕土地的和平交换开展了不少工作，从而将各自领土最大限度地连缀在一起。然而，任何违背人性的善举都是不可持续的，在损失厌恶心理的驱使下，每个人都倾向于高估自己已有财富的价值，而对他人用来交换的财富给出不客观的评价。尤其是对于土地这种特殊的资产，人们通常很难以单纯的数字来估量其价值。就比如韩国的成皋，若从经济角度考量或许一文不值，但若从战略价值出发，得到了成皋就等于拥有了整个郑国。因此衡量一块土地的真实价值，往往要包含由此可能会衍生的附加价值，这就使得自愿平等的交易很难达成。

在此情形之下，普遍的焦虑情绪便取代了睦邻友好的美好愿望，成为主宰三晋关系的主要逻辑。当这种焦虑值突破了临界点，撕毁和平协议走上武力相向的道路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此后绵延日久的角逐之中，一场激烈的战争结束后，总会有人以胜利者的姿态逼迫失败者割让土地，或者强行进行土地置换，这成了三晋之间经久不衰的主题。而围绕三晋土地置换衍生出来的各类冲突，也构成了战国中期诸侯局势的主旋律。

三晋之间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要比其他诸侯之间的矛盾复杂得多。从这个角度上看，晋阳之战实际上是一场没有完成的战争，其遗留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战国时期，直到三晋灭亡都没能彻底梳理清楚。三晋就这样在互相的消耗中折损了元气，而一直被晋国欺压后来又被魏国放弃的秦国，却在西部边陲悄悄地捡起了被丢弃的珍宝，开始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直到最后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大约是在公元前396年前后，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的魏文侯溘然辞世，继位的魏武侯不想再充当为人作嫁的角色，于是便开始积极地为自身谋取利

益。一方面，他开始向郑、卫两国提供援助，以遏制韩、赵两国侵夺中原的势头；另一方面，则是逐步发展与齐、楚等国的关系，加强了自身对中原核心地带的利益的争夺。

晋烈公二十七年（前389年），大约是受齐国实际掌权人田和的邀请，魏武侯参加了包括有魏、齐、楚、卫等国参与的浊泽会盟，并亲派使者到王城去请求周安王册封田和为诸侯。在魏武侯的运作下，到前386年，妫姓田氏正式取代姜姓吕氏成为齐国的君主，标志着“田氏代齐”的历史大剧终于落下了帷幕。

而在处理与三晋同盟的关系方面，田氏封侯的同一年，魏武侯趁赵国君位更替的时机，武力护送夺权失败的公子朝（朔）回国夺位，这一事件标志着赵、魏两国虚与委蛇的同盟关系已然破裂。而让两国关系最终走向决裂的，又当属不久后所爆发的一场大战了。

这场大规模的混战爆发于公元前380年前后。当时赵国在卫国的北部边境修筑了一座刚平城，大约是用来屯兵的要塞。修筑完毕，赵国旋即挥师南下直逼濮阳，准备灭掉卫国以扩张领土。

眼看着赵国大军来势汹汹，卫慎侯内心慌乱，于是急忙向魏国求援。魏武侯对此高度重视，不但同意了卫国的请求，还附带着联络了齐侯田剡一道出兵，与卫国齐心协力对抗赵国。

联军浩浩荡荡开入卫国境内，赵国军队自知不敌，只好退守刚平以避锋芒。可谁料魏武侯却不肯罢休，又追逐着赵国败军一路北上，联军相继占领刚平、摧毁中牟、围攻邯郸，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直接把赵敬侯给打蒙了，最后思来想去只得向楚国求援。

接到赵国的求救信号，楚肃王也是当仁不让，当即点兵北上来了了一场“围魏救赵”。楚国大军并没有直接救援邯郸，而是转头冲入魏国境内四处劫掠，并借机切断了魏国东西两块飞地之间的联系。魏武侯一看情势不妙，急忙调转枪口回去保卫国土，而赵敬侯则壮着胆子追出城来，在棘沟、黄城等地烧杀抢掠，总算是报了这一战之仇。

这场战争持续了四五年，由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的额外的效应：原本于公元前406年被魏国攻取的中山国，在其旧君桓公的带领下趁机复国，并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由于此时赵、魏两国已然决裂，魏国无法再通过赵国的领土对中山实施管辖，对此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而韩哀侯更是趁着魏国焦头烂额，无力对郑国施加保护的机会出兵攻入新郑，终于实现了兼并郑国的夙愿。

晋宗覆灭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对于晋国公室来说都已经无足轻重了。

公元前389年，在位二十七年的晋烈公去世，其子公子顷（颀）继位为新的国君，是为晋孝公。不过按照《晋世家》的说法，晋孝公早于公元前394年就即位了，在位十七年，于公元前378年去世，其子晋静公俱酒接位。静公纪元的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废静公为庶人，并将公室土地一分为三，晋国公室也紧步齐国吕氏后尘走向了覆灭。其时间点在公元前376年，也即韩国灭郑的前一年。

如果严格采用《晋世家》的记载，那么本书也就应该告一段落了，可不巧的是，古本的《竹书纪年》又给我们添了一些乱。到公元前374年，也就是《晋世家》中晋宗覆灭的两年后，书中又出现了“晋桓公邑哀侯于郑”的记

载。其中的哀侯是韩国君主韩哀侯，去年刚刚攻取新郑灭掉了郑国，可这晋桓公又是何许人也？他怎会有资格将郑国的土地封赏给韩哀侯呢？

历来的学人早就已经为我们找到了答案，所谓的晋桓公，与《晋世家》中所说的晋孝公本就是同一个人。从《赵世家》《韩世家》等同出于《史记》的字里行间也可见，晋国宗室还远没到覆灭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翻查《晋世家》中关于晋孝公去世的记录会发现，书中载明这一年是齐威王继位的元年。在《史记》的其他记录中，太史公很是笃定地认为，齐威王是在公元前378年继位的。然而不少史家却很不客气地指出，太史公是误把齐威王出生的时间当成了他即位改元的时间了，齐威王实际继位的时间是在公元前357年。因此，如果《晋世家》中那句表述准确的话，就意味着晋桓公（晋孝公）一直坚强地活到了公元前4世纪中叶。接下来，我们便可以继续愉快地讲述有关他的故事了。

公元前374年，威逼晋桓公册封土地的韩哀侯，当年就被韩山坚（严遂）派来刺杀国相韩傀（侠累）的刺客聂政所杀，其子若山即位为韩共侯（懿侯）。

韩共侯在位期间，主导了几场政治事变，使得中原政治版图出现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公元前370年，因魏武侯去世，魏公子瑩（后来的魏惠王）与公子缓（公仲缓）为争夺君位而大打出手。韩共侯趁机与赵成侯联合介入魏国内政，在浊泽打败了魏瑩所带领的军队，魏都安邑也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

当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突破，韩共侯便开始策划将魏国一分为二，以降低其对自身的威胁。然而赵成侯却不同意，更倾向于割占魏国的土地来壮大

自身的实力。双方因无法取得一致而不欢而散，这才给了魏罃以喘息的机会，最终保全了魏国的国祚。

不过，韩共侯在魏国没有实现的愿望，最终在王室却得到了满足。公元前367年，受封于王城的西周国国君周威公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公子朝和公子根为了权势争斗不休，使得同样的戏码又开始在王畿内上演。韩共侯于是就故技重施，联合赵成侯将公子根封到了巩邑，从而建立了东周国。而在这个过程中，周显王所居住的成周也被并入了东周国的势力范围，周王室从此彻底失去了收入来源。这个事件也标志着周王朝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实际上已经走向了灭亡。

在处理王室问题时尚且如此颓废，对待原先的宗主国，韩共侯自然也没有什么好遮掩的。王室内乱爆发的两年前，也即晋桓公二十年（前369年），韩共侯还联合赵成侯瓜分了晋国公室最后的土地，并将晋桓公迁到屯留（今陕西长子县北）居住。

不过，晋桓公并不是一个肯认命的君主。他大约是有着和《天龙八部》中的慕容复一样的志向，总想着要复兴晋国。到公元前361年，因韩、赵两国接连受到秦、魏等国的军事打击，晋桓公借机在屯留周边攻城略地，夺取了兹氏（今山西高平）城。

新即位的韩昭侯内外交困，无暇分身，因而未能及时报复。一直到三年后，他与魏国交换了大量土地，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这才回过头来夺取了屯留、长子等城邑，并将自不量力的晋桓公赶出韩国的地界，重新封到赵国的端氏（今山西沁水）。经过这么一闹，晋桓公总算是识趣了，在端氏战兢兢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生活。

晋桓公死后，他的儿子晋（悼）静公又故技重演，于公元前351年出兵夺取了临近端氏的玄武、濩泽两邑（今山西阳城附近）。当时三晋之间内争不断，赵国受到魏国的攻击，连都城邯郸都陷落了，还是在齐国的帮助下才在桂陵打败魏军，自是无暇应对晋国公室的挑衅。一直到两年后，赵成侯去世，刚继位不久的赵肃侯才夺取了端氏，将无家可归的晋国公室像踢皮球一样踢给了韩国。

见到晋静公后，韩昭侯真有些哭笑不得，但又不能说什么，只好又把屯留封给了晋君，将其好生供养着。晋静公以为自己还可以平平安安地了此残生，然而令他怎么都想不到的是，韩昭侯对晋公室这个累赘早已失去了耐心。就在晋静公徙居屯留后不久，《韩世家》中就出现了一条令人恍惚的记载：韩姬弑其君悼公。

关于这个悼公是何人，历来众说纷纭，据猜测可能就是晋静公。至于弑君者韩姬，有称其为悼公夫人的，也有人认为是晋国的大夫韩玘，孰是孰非已无从考证。

只是从此以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了晋国公室的传说。一个曾号令江湖数百年的辉煌霸主，一个自西周初年建国，国祚绵延传承近七百年的古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那一片混沌时期由少年天子剪裁的梧桐树叶，在孕育了一大片森林之后，终于凋零在冬日的寒风里，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成为历史迷雾深处永久的回响。

这一年是公元前349年。晋国的历史就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让人无限感慨的——句号……

第六章 霸业秩序的兴与灭

第一节 先秦的天下观

霸业缘起

每当谈起东周历史，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八个字，可见这个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但与“战国七雄”有秦、楚、齐、燕、韩、赵、魏的明确指向不同，关于“春秋五霸”的具体所指，自古以来却都是一笔糊涂账。

有关“春秋五霸”的概念，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论述中就已经出现。比如《商君书》有言曰“五霸不同法而霸”；《孟子》章句也提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但对于“五霸”究竟是谁商君并未明言，孟老夫子也只是提到“五霸，桓公为盛”，其余人选便未可知了。特别是依据孟子所谓“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的说法，我们很难揣测老夫子所指的“五霸”究竟是“春秋五霸”，还是包括昆吾、大彭、豕韦在内的“先秦五霸”。

最早对“春秋五霸”做出明确限定的大约是墨子，在传世的《墨子》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此说大体上确定了墨家心目中的五霸人选。

后来的荀子对这个说法也大加赞同，曾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

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这五位君主也就构成了关于“春秋五霸”的第一个版本。

除了以上说法，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队列出自儒家。在这个新的版本中，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被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之前并不怎么出彩的秦穆公和宋襄公。这个版本并非尽善尽美，但由于所选择的对象更加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仁义规范，在大一统的时代里受到了广泛推崇，也因此很快就超越了墨子和荀子的观点，成为受学界认同的主流版本。

不过以上两种观点还只是整个论战的冰山一角，由于“春秋五霸”的概念自诞生以来就缺乏明确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流转其内涵也不断扩展，在不同人眼中就会有不同的标准，以至于有关“春秋五霸”的各种版本在此后千年里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

在这些观点各异的排序中，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位君主外，能够有幸入选霸主行列的还有郑庄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齐景公、楚成王、楚灵王、楚昭王、吴王夫差，等等，使得这区区五个席位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场面蔚为壮观。

这场论战一直打了两千年，到现在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局外人总是看得一头雾水。为了厘清历史的真实脉络，赵鼎新在《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时期战争和政治发展》（《学术月刊》2006年02期）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

文章将春秋时期的中国大地划分为四个主要战区：以齐国为中心的中原区又或东方区、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区、以曲沃晋为中心的北方区和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区。这四个区域内的战争就像是体育赛事中的小组赛，齐、楚、晋、秦四国就是小组赛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也就是各自战区的霸主。

在取得区域性优势之后，各个国家都会向中原发展，从而促进四大区域性战区的合并，中原争霸的赛事也就进入了所谓的半决赛阶段。

到春秋中叶，随着齐桓公去世后齐国政局的混乱衰弱，以及秦穆公轻率冒进而丧失三军，齐、秦两国在半决赛中被淘汰，最后就只剩下晋、楚两国联手进入决赛。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晋级决赛的晋楚两国围绕霸主宝座打得昏天黑地，最后的结果却是各有胜负、未分伯仲。到公元前546年，互耗了近百年的晋楚两国在宋国举行弭兵会盟，宣告两国共享霸业，轰轰烈烈的争霸战争戛然而止，一场激烈的总决赛就这么烂尾了。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整个春秋时代都没有产生过具有全局影响力的霸主，我们通常所认为当之无愧的所谓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也不过是区域性强国中的代表人物而已。

另外，赵鼎新在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霸主政治作为整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在公元前546年的弭兵会盟后就进入了尾声，取而代之的是整个中原封建体制的全面危机与崩溃，并最终促成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形成。

由此，文章对整个东周的历史进行了重新划分，提出了一个三段分期说：从前770年到前546年为霸主时代，前419年到前221年为全民战争时代，此间从前546年到前419年的一百多年为转型时代。

这篇文章立意新颖、观点独特，道出了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真实图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角。特别是其提出的三段分期说，跳出了过去仅仅从春秋、战国固有分期展开的争论，更加符合历史演变的实在规律，与本书行文初期所持的观点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文章对霸主概念的论

释倾向于理解为“全中国范围内的霸主”，由此得出了一个“春秋无霸主”的结论，则与本书所持观点大相径庭，这也是最值得商榷的地方。

众所周知，霸主政治这种极富“中国特色”的存在，是一种几乎贯穿于春秋历史始终的政治模式，春秋时期有一定实力的君主无不对霸主的权位倾心向往、殚精竭虑。在论述先秦历史的诸多典籍当中，时人对于霸主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见以霸主为主导的政治秩序，在当时的情境下的确是深入人心的观念，并非全然出于后人的想象。在赵鼎新的文章中，也同样没有否认春秋前中叶霸主迭兴的事实，因而将其所属的时代定义为霸主时代。

由此一来，我们不禁要深入地反思一下，既然霸主政治是真实存在的历史现象，那么这样一种奇特的政治模式，其发展形成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处于政治旋涡中的各国君主为了争夺霸主权柄费尽心力，他们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霸业秩序在春秋时期的昙花一现，究竟是要完成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呢？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回到时间的起点，到原始丛林的深处去探寻历史的奥秘了。

政治联盟

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中国古代历史自传说中的夏朝开始，就已经有了朝代更迭的治乱循环；先秦时期存在的夏、商、周三代，也往往被认为是与后世王朝具有同一属性的历史实体。

然而，如果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了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版图的真正统一要等到秦始皇时才成为现实。秦统一之前，中原大地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大一统王朝，更缺乏构建大一统王朝的技术条件。夏、商、周三代从具体的政治属性上看，是由一个具有相对权威的大国通过武力威慑的手段，对周边的城邦或者村镇国家进行控制，从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之所以在文明发源初期就形成了这种超越了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出现了“天下共主”这样一个类似于中央政府的特殊形态，一般来说与黄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在黄土高原奔腾而过的河水进入中原地区后流速减缓，携带的泥沙不断沉积形成了一个广袤的冲积平原，为农耕文明的觉醒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在气候温暖湿润的远古时期，中华文明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又总是喜怒无常，经常会以一副极其恐怖的面目出现，将中原大地的千里沃野变成自己奔流的河道，给生存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为了抵制水患灾害给人们生产生活乃至种族繁衍构成的威胁，蒙昧时期的各个部族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黄河进行治理，于是就出现了如大禹治水这样的传说。

治理水患是一项艰巨而浩繁的工程，要动员流域内各个部族的人、财、物资源，设计完善的工作流程，组织大范围、大规模的协作，这些都需要一个具有高度权威和强大组织能力的团体或个人来进行统筹。这种在治水活动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会逐渐扩充自己的权力，久而久之也就演变成了具有一定社会控制力的超级部族。我们认知中的第一个王朝——夏——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尽管黄河流域内不断发生“改朝换代”的革命，各个王朝内部也经常会出现权力更迭，但这种因治水而形成的政治秩序却大致确认了下来，并最终为周王朝所继承。

除此之外，一些从文本中无法看到的隐形逻辑，恐怕也在影响着中原政治秩序的走向，对“天下共主”秩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我们感到

既熟悉又陌生的先秦特产——青铜器。

青铜器作为一种古代常见的金属器具，几乎在所有人类社会早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此也常被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志。这种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金属器具，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于过去历史的观感，从而为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赋予了“青铜时代”这样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

然而，正如所谓的“黄金时代”并非遍地黄金一样，自来让我们引以为傲的“青铜时代”也并非到处都是青铜，甚至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真正的历史现状要远远超乎我们的直观感受。

在那个礼乐文化盛行的时代里，青铜从来都没能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它们就如同藏于秘府的法律一样，都是贵族专有的私器，底层的农业生产依旧停留在落后的石器时代。这倒不是因为贵族太过自私，不肯把他们日用的青铜分赐给百姓，实在是青铜这种材料太不适合被当成农具使用了。

首先是从材料特性上讲，金属铜最大的优势是熔点较低，在高炉冶炼和鼓风技术出现之前，铜的提取和冶炼要比铁容易得多。但由于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提取的纯铜（也即红铜）质地太过柔软，并不适合直接用来制造工具。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只要在纯铜中加入铅、锡等金属，达到一定比例，冶炼铜器的熔点就会显著降低，硬度也会有所提高，进而可以打造成人们所使用的器具。

但问题到这里仍然没有解决。根据如今我们出土文物来看，商周青铜器大都是铜锡合金，这种合金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太脆了。即便是被用作兵器，也只能制作像匕首一样的短剑和用来勾啄的戟，都是不能直接拿来砍人的，更不用说要当作农具使用了。

另一方面，稀缺性决定了价值属性。由于铜矿资源在地壳中的储量要远低于铁矿，这就使得青铜器在当时的价值不亚于如今黄金的价值。即便是在后来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发展的帝制时期，铜也一直都被当作货币原料使用，很少会用来制作工具。而更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虽说地大物博、物产丰盈，但矿产资源的分布却极度不均匀。

我们先说铜矿资源的分布。根据如今探明的情况，中国境内有一半的铜矿分布在江西、西藏、云南、新疆四个省区，剩余的产量又有一多半分布在甘肃、安徽、内蒙古、山西、湖北、黑龙江六个省区。其中楚国所在湖北，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云南等地，晋国所在的中条山地区储量较为丰富，而中原核心区所在的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地，分布则十分有限。

据一些史料分析，早前夏朝迁都至少八次，商代迁都更是不下十次，即便是到了周朝，在短短二百多年时间里，王室迁都的记载据说也有四次之多，而他们迁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追逐矿脉。这也从一个侧面上反映出，至少在先秦时期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原地区可供开采的铜矿资源并不多。

与铜矿的分布情况类似，中国虽说是世界上锡矿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但其分布也极其不均匀。如今探明的矿产地主要分布在15个省区，其中云南、广西两省区的储量就占到了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矿产较为丰富的广东、湖南、内蒙古，以上五个省区总储量就达到了全国总量的95%，中原地区锡矿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有不少学者皓首穷经，在古代文献中寻找中原存在锡矿开采的证据，但至少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春秋时期冶炼青铜器所需的锡矿，大都是从传统中原疆域以外输入的。退一步讲，就算是中

原地区的确有锡矿开采的痕迹，也很难保证每个国家都能获得充足的供给，从外部尤其是南方地区输入仍然是多数国家获取原料的主要途径。

作为先秦时期的主要金属材料，青铜器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方方面面。对于发轫于中原地区的中华文明来说，在当时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中，青铜器既是维持他们身份和地位的支撑，是自我保护的利器，是举行祭祀、开展宗教活动的载体，同时也是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锅碗瓢盆、笔墨纸砚，关乎着他们衣食住行的一切所需。

辉煌卓越的青铜文明和原料资源的稀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何消解由此造成的冲突，就成了中原各国不得着力解决的难题。尤其对于那些远离产地的国家来说，货物运输需要辗转经历多国，一旦青铜原料的供给受到了制约，造成的后果将会难以想象。为了保证铜锡原料的充分供给和在国家间的自由调度，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原市场就成了当时人们的共同呼声。

因此，不论是从治理水患灾害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构建统一市场的需求方面进行分析，形成一个超越国家规模的部落或者国家联盟，都是文明初期各个邦国的共同需求。这样的一个联盟与早期希腊半岛所形成的城邦同盟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与希腊半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不同，中原大地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群构成各有不同、外部影响因素众多，催生并维系这样一个庞大的联盟显然不能仅靠各国君主的自觉自愿，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外部机制进行约束，成立一个超越主权的“列国权威机构”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礼崩乐坏

与后世大一统的帝制国家不同，这种松散的联合体有一个先天的缺陷，那就是处于联盟之中的所有部族或者城邦国家，在本质上都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着近乎完全的自主权。在

这种特殊的政治架构之下，居于中心地位的王朝为了稳固统治，就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对其余邦国进行控制，以确保他们不至于太过强大而颠覆自己的地位。而在这所有的控制体系中，又以周公改制的影响最为深刻。

有关周公改制的背景在本书的开头有过一段介绍。周武王夺取商王朝的天命之后，将自己的兄弟和宗亲分封各地进行殖民活动，并对商王朝及周边残余势力进行监视。周武王本以为用兄弟宗亲拱卫王室，便可以让周天子的地位得到绝对巩固，可后来的历史却证明，这似乎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在他死后不久，那些被派去监视敌人的兄弟之国，反而与旧朝残余势力勾结起来对王室统治构成威胁。周公旦在历经艰险平定东方叛乱之余，难免也会痛定思痛，对这一切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产生了营建东都和制礼作乐等一系列的政治革新。

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等级秩序，将天子以下掌握有土地资源的国人或者说贵族阶级，划分为公、侯、伯、子、男、士六个等级，并对每个等级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用度规格做出了近乎苛刻的规定。各个阶层的贵族都必须严格按照其中的规定来配置日常的一切用度，不能因为你有钱任性就逾矩，或者因为对客人重视而擅自提高接待的规格，也不能因为节省或者谦卑而私自降低规格。周公就是要用这些条条框框的规定，限制地方诸侯的能力，更限制他们的思维，从而达到稳固王室地位的目的。

此外，由于技术手段的欠缺，周王朝对各国的控制力会随着交通距离的增加而不断递减，其等级秩序的作用到了长江、太湖流域就基本上无法显现了。为了防范在整个秩序的末端出现足以颠覆王朝根基的新生势力，周公还另外创制了一套新的规范，也即所谓的“华夷秩序”。

他将处于中原核心区的诸侯用周礼文化统一起来，建立了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文化记忆的共同体，也即所谓的“华夏”，处于共同体之外的远方诸国则被贬斥为“夷狄”。在这种共同体的作用下，中原诸侯很容易就能被煽动起来，不远万里去抗击那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敌人。

也就是说，周公的制礼作乐，不仅用森严的等级秩序限制了共同体内部的国家规模，也对外部势力的崛起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保证了王朝统治的稳固。

可现实就是如此吊诡，你越是害怕什么，这件事情就越是容易发生。礼乐秩序支撑之下的天下体系，仅仅维持了二百多年就崩塌了，这显然是周公制礼作乐时所未能预料的。

西周末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使得中原地区的降水线南移，随之而来的是游牧部族的纷纷南迁。南迁的部族与国内的野心家勾结，直接冲击了王室所在的镐京，以至于被“戎狄”追逼而流离失所的周平王，不得不依赖诸侯的支持迁都到洛邑以维持国祚。

这场巨变使得周王室统治的根基瞬间瓦解，也完全消解了王室的权威，由此带来局面的完全失控。由于中央权威的缺位，春秋初年的中原大地变成了一个丛林社会。原本饱受压制难以发展的诸侯纷纷脱离王室的控制，一时间兼并灭国战争蔚然成风，进而在几个地理上相对封闭的文化地域内，形成了一批远超西周时期国家规模的超级诸侯国。

在西方，结束了曲沃代翼七十年内战的晋国，刚刚掀起了第二轮扩张热潮，一度居于王室卿士地位的虢国从此万劫不复，为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的成就功业添砖加瓦。为了获得进取中原的门票，取得对晋国的战略优势，秦国对周边国家的侵夺占领也方兴未艾。晚至晋惠公时期，灭国

战争仍在持续，秦穆公也凭借“兼国十二，开地千里”的不俗成绩，在灭国榜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东方，齐桓公也在大力扩张领土，以“并国三十五”的不俗成绩力压群雄，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灭国狂魔”。

然而这一切都还只是刚刚开始，那些业已成为超级诸侯的国家，也并不能安然坐享大国的红利，反而要时刻警醒，以免被其他的列强吞并，更加重了诸侯间的信任危机。比如在齐桓公执政中期，戎狄之祸横行中原，已经成就霸业的齐桓公仍然在为吞并鲁国这样的强邻而日夜筹谋。紧随其后的晋文公，也同样对中原大国郑国心存觊觎。这种时常被人觊觎的感觉和对于亡国绝祀的恐惧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是植根于每一位国家统治者内心的隐痛。

除了政治格局的混乱，超级国家也改变了原本小国寡民的社会结构，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在分析晋国内部冲突形成的动因时曾提到，由于国家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公卿矛盾、君位争斗、阶层固化、族群分裂、观念冲突等为主要形式的内部矛盾也开始不断积累，彻底撕裂了原本和谐有序的小共同体，而大国则在不断的碰撞和摩擦之中还步履蹒跚、迟迟未至。

当整个社会丧失了共识，恐慌情绪和不安全感开始蔓延，接踵而来的便是一幅让孔子痛心疾首的画面，以子弑父、以臣弑君、公子夺嫡、大夫弄权的事件频发，构成了一幕“礼崩乐坏”的长篇交响曲。为了应对频发的内乱，各国都采取了不少制约办法，但始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的系统性危机。

伴随着诸侯兼并之风的兴起和内乱狂潮的不断涌现，中原文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急速降低。诸侯间由于缺乏统一权威各自为政，在治理灾害的

过程中经常按照自己的需求随意修筑水利设施，“以邻为壑”、祸水他引的情形开始不断出现。

当他国因水旱灾害频发酿成饥荒时，周边各国袖手旁观者有之、落井下石者亦有之，让本已混乱的国际政治秩序变得愈发不可收拾。比如发生在晋惠公时期的韩原之战，其起因就是源于秦晋之间围绕自然灾害展开的一场博弈。

这种互不信任的局面也进一步打破了由天子所维系的共同市场秩序，各个大国在中原舞台上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为了获取军事征服的胜利，贸易战也常常会成为摆在各国君主案头上的选项。比如在有关管仲相齐的各种施政纲领中，为他国人为地制造危机从而借机吞并的案例常常被当成功绩广为流传。这对于那些经济实力不够丰厚的国家来说，绝对不会是什么福音，尤其是那些过度依赖外部输入的国家，青铜原料的运输难免会受制于沿途各国，从而对自身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文化危机

天灾叠加人祸，无疑给当时黄河流域内尤其是下游周边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让以中原礼乐文化团结起来的文化共同体内部裂痕不断、危机重重，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各国之间的信任危机。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又带来了一个更加严峻的后果，那就是使得中原各国对抗外来文化入侵的免疫力显著降低，为外部势力的兴盛提供了机遇。

自西周末年兴起的“戎狄危机”，趁着中原内乱又持续发展了一百多年，到齐桓公称霸时期又出现了一次小高峰。在那场蔓延到整个中原的危机中，北方的“戎狄”横冲直撞、无人能挡，一度导致了黎、卫两国的灭亡，郑、邢两国在“戎狄”兵力强压之下节节败退，就连周王室也无法幸免于

难。中原各国合力抵御“北狄”的侵扰，却似乎总是疲于应对，最后只能以空间换时间，让他们又折腾了许久。

此外，中原国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更加不容忽视的威胁，那就是南方江汉流域的楚国对中原的入侵。

西周时期，远离中原核心区且以“蛮夷”自居的楚国尽管桀骜不驯，但在周王室的强力弹压之下，总算还是不敢太过霸道。然而，随着周王室权威的突然崩塌，江汉流域出现了长达百年的权力真空，这就给楚国的发展提供了绝佳时机。在这一百年间，楚国几代君主励精图治、大力扩张疆土，逐渐将分布在江汉流域的诸侯国一扫而空，并伺机北上征服了陈、蔡、郑、许等国，将触角延伸到了中原地区，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

与单纯的武力征服不同，这种危机更激发了人们文化上的焦虑感和忧患意识。“北狄”的文化特性究竟是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不过只要对比历史上曾盘踞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文化进行脑补，便可大体窥知其与中原讲究的礼乐文化的差异。春秋早期，王室大夫辛有路过伊川，看到有人“被发而祭于野”的时候，便深深地叹息道：“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这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礼乐文化流失的普遍焦虑。

而与相对弱势的游牧文化比起来，南方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可以说自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就已经显现了出来，在独立发展了上千年之后，更是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文化体系。在我们如今所知的一些资料中，大体可以看到楚文化中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重死轻生的一些特性，与周礼指导下的宗法观念有着天壤之别。

楚国与中原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他们在周王朝的天下体系当中显得格格不入。而楚人似乎对所谓的“蛮夷”身份也毫不在意，常常把“我蛮

夷也”这句话挂在嘴边。比如《史记》有载，周夷王时周朝国力衰弱，楚君熊渠就毫不避讳地说道：“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与此同时，他还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封了王号，让他们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其对所谓“华夷秩序”的不屑与鄙夷从中可见一斑。

到了春秋时期，尽管礼乐秩序崩坏、列国之间兼并战争不断，战争的发起国还是会打着礼乐征伐的旗号，找一堆应景的借口，可楚国却不管这些。公元前706年征讨随国，随人满腹委屈地辩解说：“我无罪！”楚君熊通很是不屑地回答道：“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想打谁就打谁，是不需要借口的。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随国向王室传话，说“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王室不答应，他就自上王号，与周天子平起平坐，这在中原诸侯看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室对此虽有不忿，却也无可奈何。到楚成王即位的时候，还得低眉顺眼地派人“赐胙”，并告诫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算是默认了楚国自上王号的行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楚国发源于长江流域，尽管也时常会面临各种天灾人祸的威胁，但这种威胁与中原文明所面临的黄河泛滥属于不同体系，因此天然缺乏中原诸侯所共有的亲和感。

此外，从前文有关青铜原料的分布情况来看，楚国所在的湖北省蕴含了大量的铜矿资源，与之毗邻的湖南、云南等地又是重要的锡矿产区。丰富的矿产资源使得楚国从青铜原料的勘探、开采、运输到青铜器制作等各个流程，基本上都能做到自给自足，从而在国内构建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市场区域。

相较之下，中原各国无论是储量还是矿产资源的丰富程度，都无法与楚国相媲美，甚至还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这也是为什么在春秋早期，楚国可以在当时的边缘地区迅速崛起，进而以一己之力威胁周王室的生存，挑战包括晋、齐等国在内的整个中原政治秩序，其内在逻辑就在于此。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雄厚的家底，楚国可以毫无顾忌地侵吞他国，不必考虑旁人的感受。在中原各国看来，它就像是一个饕餮，永远都不知道满足。楚国大军所过之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被吞进去，然后被搅碎、被消化，最后变成楚国治下的一个县。

这种时刻惊扰着人们的噩梦，让那些即便是已经臣服的国家，也总是心存亡国绝嗣的恐惧。楚国的战车永不停歇，诸侯内心的恐惧也永不消逝，整个中原文化圈都弥漫着一股悲观消沉的情绪。

楚国与中原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一直以来又自外于中原政治秩序，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很难将其纳入“华夏”的行列。有鉴于此，我们大可以将春秋早期的中国大地划分为两个不相统属的独立板块，位于北方的是以周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板块，而在南方则是以楚文化为中心的荆楚板块。

正因如此，中原诸侯对楚国的排斥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按照当时的习惯，“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中原诸侯互相征伐所获战俘和战利品，一般都不会去天子面前招摇，就算是去了，天子也一定会义正词严地拒绝接受。但晋楚之间发生战争，晋国但有所获就一定会献俘于天子，天子也从来甘之如饴，从中也可以看到时人对楚人的真实观感。

晋文公去世将近半个世纪后，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文子）还将楚国视为异类，并为我们创造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名言。即便是到了春

秋末年，晋楚两国已经举行弭兵会盟商定共享霸业，各国仍然对楚国心存芥蒂，迟迟不愿履行盟约中确定的义务，这恐怕也是与楚国的“夷狄”身份是分不开的。

人们常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楚国对中原的入侵完全可以与波斯入侵希腊相类比，由此所造成的冲击显然也更加激烈，带给人们的恐惧感也更加真切、更加深入骨髓。但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中原诸侯摆脱王室控制的时间尚短且积累不足，单打独斗还很难与独立发展数百年的楚国相抗衡。而由于统一权威的缺失，各国之间又无法建立互信机制，合力抗击楚国对中原文化侵蚀的厚望显然也无法达成。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局势的窘迫引发了中原诸侯的集体危机，让各国有关之士无不痛心疾首，恢复核心权威以抵御外敌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第二节 霸业形成机制

上下求索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理出有关春秋初年各种危机得以发展的逻辑链条。

这一系列乱局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周王室核心权威的丧失，原本用以维系诸侯之间及其国内秩序的宗法制度、礼乐秩序迅速瓦解，由之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诸侯间兼并战争持续不断，井然有序的自然灾害治理体系无以为继，和谐稳定的诸侯间统一市场遭到重创，维系各国和平共处的互信机制遭到破坏。

其次是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结构被陌生人组成的大社会所取代，诸侯国内部以公卿矛盾、君位争斗、阶层固化、族群分裂、观念冲突等为推动力，以子弑父、臣弑君、公子夺嫡、大夫弄权为表现形式的封建危机频发，进一步撕裂了社会共识。

最后，中原内部的混乱使得制约远邦崛起的“华夷秩序”解体，华夏共同体抵御外部文化入侵的能力显著降低，为外部势力的兴盛提供了机遇。

诸侯间的弱肉强食，诸侯内部的钩心斗角，外部力量的不断侵蚀，这三者几乎构成了春秋早期历史发展的主线。这种种因素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又演变成了整个中原文明的生存危机。这种由秩序崩坏和权威丧失带来的混乱，将所有人都裹挟其中，没有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家族可以置身事外。

人类天然就有追求秩序的本能，旧的秩序崩塌了，就需要建立新的秩序，但新秩序的出现并不是天然就能成型，而是需要人们根据过往的经验和现实的反馈进行探索和试错，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当时的不少人来说，最先想到的路子自然是重塑天子的权威。常言道，“人们总是在失去之后才会懂得珍惜”，中原诸侯对天子的态度亦是如此。当他们在天子的盘剥之下艰难度日时，总希望有一天能够独立自主，可如今天子的权威真的不复存在了，却发现日子过得比以前更糟糕了。特别是那些没有野心的国家，在天子羽翼的保护下至少还能延续国祚，如今却要日日为身边的强邻欺压甚至吞并而担惊受怕，恢复天子的权威自然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这股思潮一直到春秋末期还在发挥着作用，我们所熟知的孔夫子就是这一方案的坚定支持者。孔夫子希望以忠恕之道改造人们的内心，让人们克己复礼、恢复周制。然而在他所处的时代，不仅仅天子的权威积重难返，就连国君和卿大夫的地位也都受到了威胁，这种理想的政治模型终究还是如镜花水月，无法得以实现。

事实上，早在礼崩乐坏开始的那一刻，天子权威的江河日下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其中首要的原因还是来自天子自身。大乱兴起之时，周平王即位的合法性受到了广泛质疑，诸侯不尊王、不朝王早已是司空见惯，甚至就连以周礼守护者自居的鲁国也都多年不朝天子，其他诸侯对待天子的态度如何可想而知。

等到周平王谢世，天子合法性已不再是舆论焦点，但如齐、鲁、郑、宋这样的大国早已成并列之势，以周王室的弹丸之地和区区武力，根本无法钳

制他们的发展。到了这个时候，即便那些岌岌可危的小国有再强烈的愿望，也无法逆转大势让王室走向复兴之路。

第二个原因，也是人们试图探索的第二条解决之道：既然天子的权威恢复无望，而人们又都急切地希望重塑权威，那么何不改朝换代、另起炉灶呢？

关于这一点，不少人都拿秦统一天下的大业来类比，认为当时的诸侯都不具备绝对的实力，很难将反对势力尽数消灭从而登顶天子的地位。这种类比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春秋时期的观念与后来的帝制时代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并不能完全类同。

此前的中原王朝大都实行以等级秩序为表征的封建制，无论是夏商周三代的天子还是春秋时期的五霸，从来都没有想过更不可能实现我们如今观念中的天下一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的“大一统”向来都只是一个虚妄的概念，只要能求得“天下共主”的身份，便已经算是修成正果了。

比如春秋中晚期的晋卿士匄在回忆家族历程时提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在士匄看来，当时的晋国虽然没有天子的名分，事实上却掌握着天下的权柄，“晋主夏盟”几乎已经可以算作是与虞、夏、商、周并列的历史时期了。

因此，对于当时有实力的君主来说，想要取代天子改朝换代，完全不必把中原版图推倒重来，也不需要真的将所有国家都灭一遍，只要能打败天子并获得对诸侯的绝对威慑，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事实上，春秋早期持有这种想法并付诸实施的人不在少数。且不说占据“南蛮之地”的楚国几百年来一直都想成为中原政治秩序的主导者，就单说中原内部，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我们所熟悉的郑庄公便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郑庄公在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43年至前701年之间。其初即位时，周平王东迁的事宜刚刚尘埃落定，中原各国都在憋着劲扩张疆土，郑庄公更是借着王室卿士的地位大发“国难财”，开创了一个春秋初年首屈一指的大国。与郑国毗邻的东部邦国——如宋、卫、曹、陈、蔡、燕等诸侯——看不惯郑庄公的做派，便借着共叔段内乱的余波，组成联盟对其进行封堵，周王室也趁机在其背后搞起了小动作，让郑国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郑庄公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主儿，他不畏艰难、背水一战，硬是通过“远交近攻”的策略，在逼仄的环境中打出了一片天地，最后将中原各国皆收入麾下。此外，他在繻葛之战中不仅敢于迎战王师，打败前来征讨的多国部队，还以“射王中肩”的战绩让堂堂天子威风扫地。这一系列的功业让郑庄公骄傲不已，再加上他本身就是王室近亲，自然就会产生要取而代之的想法，也就是在中原上演一出“曲沃代翼”式的好戏。

这件事在史料中很难寻到踪迹，但也并非完全无章可循。童书业在《春秋史》中就提到一个细节，说是民国时期出土了一件写有“王子婴次炉”的铜器，这位“王子婴次”据说就是郑庄公的儿子子仪。当时只有天子的儿子方可称为“王子”，诸侯君主的儿子大都以“公子”相称。即便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君主都僭称王号，“公子”的称谓也依然没有改变。

在礼乐秩序尚且发挥余热的春秋早期，将诸侯之子称为“王子”显然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使得“王子婴次炉”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这意味

着，郑庄公在打败天子之后很可能是称过王的，只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史家传统，这件事对于天子来说太不光彩，因而才未能流传后世。

秩序重建

郑庄公是如何去除王号的我们还很难推断，不过透过齐桓公的事例，或许可以窥知一二。《左传·僖公四年》在介绍齐桓公伐楚的召陵会盟时，曾提到他邀请楚国大夫屈完参观阅兵仪式，其间兴致盎然地说道：

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

这里的“不谷”与后世的“朕”一样都是天子的专称，但通常只有在遭遇凶祸之时才会使用，因此被称为“降名”，平日里天子会以“予一人”自称。春秋时楚国僭越称王，不敢以天子专用的“予一人”自谓，故而采其“降名”之例而自称“不谷”。此处齐桓公以“不谷”自称，显然也有效仿楚国自上王号的动机。

此外，在《史记》的记载中，齐桓公晚年时自夸功业，曾不无感慨地说道：

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

齐桓公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所建立的功业已经足以与“三代受命”的圣王媲美，一时有些飘飘然，于是便想“封泰山，禅梁父”，以此象征性的意义试探诸侯的反应。管仲听闻这个想法后急忙劝阻，说封禅之礼需要备齐远方各种奇珍异物才能举行，以齐国的人财物力恐怕难以企及，这才让桓公知难而退。

太史公的史料来源于何处，齐桓公是否真的有过封禅泰山的想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说起齐桓公晚年的骄纵之心来，的确是有史料支撑的。《公羊传》论及齐桓公的一生，曾提到：

贯泽之会，桓公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

齐桓公刚刚扛起振兴中原的使命时，远方各国都趋之若鹜；可当他的功业到达了顶峰，心中骄矜之心无法抑制的时候，诸侯对其威势也就产生了恐惧，他们担心其会效仿三王让诸侯以君臣之礼事之，于是便相继叛离。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春秋时的局面与商朝末年的情形已大不相同，无论是郑庄公、齐桓公还是秦楚之君，都不可能像当年周武王克商一样，仅仅依靠打败天子就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坐镇王城的天子可以说是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当晋文公提出请褻的无理要求时，原本已经落魄到靠人救济的周襄王也敢顶撞救命恩人，说什么“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挑明了就是要告诉晋文公，你没有称王的“德行”，就不要起什么非分之想了。

周襄王所谓的“代德”并不是说晋文公的品德不够高尚，而是指代社会运行的一种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突破的底层规则。影响这种底层规则的既有当时的社会、文化和观念因素，也受现实技术条件的制约。

三代统治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天子统御诸侯的政治架构，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此前中原大地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处于中心地位的王朝为了保持绝对优势，会想方设法地遏制诸侯的崛起。一旦哪个国家或者部族出现

了叛逆情绪，动辄就会施加以灭国绝祀的严厉惩罚。诸侯在这种绝对威慑之下战战兢兢，只能一再表达忠心，为王朝的永续继续添砖加瓦。

在这种政治架构之下，处于统治半径之内的国家很难发展到威胁王朝生存的地步，改朝换代革命也只会发生在统治秩序的末端。但到了西周时期，随着礼乐秩序的建立，周王朝的统治半径得到了扩展，其控制能力也显著增强，就算是远在江汉流域的楚国有了不臣的举动，周王室也同样会“虽远必诛”。

西周王室强大的控制力造成了一个显著的后果，那就是当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时，新的权威无法在短期内出现，这就使得中原政治版图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景象。

东方诸侯趁势纷纷摆脱控制大力扩张疆土，将原本碎片化的政治格局进行了重新整合，中原大地上同时出现了若干可以互相抗衡的大国。这个时候，一些有权势的君主大都想通过进一步扩张疆土取得绝对威慑的能力，以便为自己的“革命”理想创造条件，可诸侯间相互制衡的关系却进一步锁定了他们的梦想，使得过去的革命模式无法复制。

比如齐桓公在位中期，鲁国发生了一场牵连甚广、绵延已久的内乱，也即所谓的“庆父之难”。齐桓公本想借机吞并鲁国，但权衡再三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了其他诸侯的制约。晋文公成就霸业之后，也产生过侵吞郑国土地的念头，未曾想却激发了秦穆公的忧患意识，使其选择了与晋国决裂。晋文公去世后，秦穆公打算故技重演，却不料功败垂成，全然葬送了自己的上升之路。即便是如饕餮一般的楚国，当其兵锋指向中原时，其兵势也便如强弩之末无法施展，最后不得不按照中原的规矩通过结盟的方式扩展势力范围。

此外，在这场持续百年的政治浪潮中，中原大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无论是进攻性武器还是城防技术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可当历史演进到春秋中叶，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一方面，随着各国实力的不断提升，财富积累和可动用劳动力数量急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城防技术的日渐精进；而与之相对的是，由于基础材料物理特性的限制，青铜器的效能被发挥到了极致无法继续演进，进攻性武器的发展遭遇了瓶颈。

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造成的结果就是围攻城池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攻坚作战造成的伤亡越来越严重，灭国战争所需要投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在以贵族作为主要征兵对象的春秋时代，不惜血本攻城略地的代价显然是谁也无法承受的。

在这种新的格局当中，国家实力的强盛固然可以对周边各国构成威慑，但已经无法像过去天子对诸侯那般形成致命威胁。这也就意味着，单一强权主导世界的局面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日趋扁平化的世界。这种种因素都使得那些有野望的君主不得不放弃对天子荣耀的追逐，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一种有别于中央王朝的替代机制，也就是人们所探索的第三种方案——霸业秩序。

也就是说，面对春秋初年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原各国都急切地盼望着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以从混乱失序中走出，重新焕发中原文明的勃勃生机。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政治秩序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于是便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试错、不断地修正，霸业秩序就是人们经过长达百年的摸索后最终找到的一条最佳路径。

可问题是，没有人天生就愿意屈服于他人之下，也没有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旁人的摆布。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路径不同，诸侯之间强弱大小的差

异客观存在，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地位总是平等的，没有哪个国家天然就具有对他国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权力。特别是在西周二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内，东方诸侯饱受周天子的压迫之苦，如今好不容易趁着天下无主的机会翻身做了主人，又怎么甘心再无端地制造出一个霸主来约束自己呢？那些愿意参与到霸业秩序中的其他玩家，究竟有哪些强烈的需求，使得他们甘愿放弃独立自主的地位而屈身于霸主的羽翼之下呢？

尊王攘夷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有充足的合法性来源作为保证，在崇信天地神灵“君权神授”的早期社会，人们大都相信天子的权力来自上天的授予，国君的权力来自天子的册命，这些都是有着天然合法性的权力来源。霸主作为介于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符号，其地位既不同于普通的诸侯又不同于天子，其领袖诸侯的权力究竟又来自何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们如今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以“尊王攘夷”的行动获取天子授权，从而取得霸主地位。不过当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事情却未必就那么顺理成章了，至少在霸业模式形成的早期，人们似乎并没有把天子当回事。

比如前文提到的郑庄公，他能够以盟主身份带领诸侯东征西讨，却没能荣登霸主榜单，便是吃了这个亏。尤其是他在繻葛之战中“射王中肩”的举动太过惊世骇俗，在礼法上难以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更难为后世的儒家学者相容，因而其霸业也通常不受人认可。

在这方面，齐桓公可以说是个幸运儿。齐桓公即位初年一心忙于扩张疆土的事业，不过在此期间，他无意中却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682年。当时的晋国还正处于统一前夜，位于中原腹地的宋国发生了一场内乱，大夫南宫长万因受羞辱弑杀国君宋闵公，后因难以抵挡公族讨伐而出逃。到今年冬天，宋国通过外交手段，将伙同南宫万作乱的党羽陆续遣返，齐桓公也邀合诸侯在北杏会盟商议平定宋国内乱。但不知是何原因，不久后宋国就背叛了盟约，齐桓公于是又邀集陈、曹两国伐宋，迫使宋国再次与其结盟。

伐宋期间，齐桓公突发奇想，向早已衰弱的周王室请求支援，周僖王闻讯大喜过望，当即派出单伯带兵出征助齐国一臂之力。天子对诸侯事务的介入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宋国投鼠忌器，不敢承担抵抗天子征讨的罪责，这就使得齐国伐宋得盟变得轻而易举。

人们常说“拉大旗作虎皮”，尽管齐桓公这次的举动与之前诸侯之间的互相攻伐并无本质的不同，可一旦有了王室这杆大旗，效果就会异常悬殊。这次行动的出奇顺利让齐桓公倍受鼓舞，于是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便屡屡祭出“尊王”的大招。

比如其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山戎”侵略燕国，齐桓公应邀前往救援，燕庄公为感其恩义，一路相送到齐国境内。这时齐桓公便扯出了王室的旗帜，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就把燕君所至的土地赠送对方，还“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得到了诸侯的赞许。

即位三十年，齐桓公携诸侯讨伐楚国，管仲也搬出了陈年旧事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大有替天子讨回公道的意思。

到齐桓公三十五年（晋献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51年），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遣使褒奖，特命其不必跪拜。但在管仲的劝说下，齐桓公仍然执意要拜，可以说是将“尊王”的戏码演到了极致。

也正是在这次的盟会上，齐桓公对天子的虚与委蛇终于得到了回报——“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史记》中更是言之凿凿地称：“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无论是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胙肉，还是精美的弓箭、天子的座驾，都象征着天子授予了齐桓公以王命讨不臣的权力，等于是正式确立了其霸主的身份，给了他代替天子行礼乐征伐的责任。

至于晋文公，尽管其对待天子的态度着实让人不敢恭维，但其获取霸权的途径却依然与齐桓公如出一辙。早在即位的第二年（前635年），他就以平定王子带之乱而获得了天子的褒奖；城濮之战后，他也同样把“尊王”摆在前头，用“平礼”献楚俘于王，依照周礼“三辞”“三觐”才接受策命；在践土会盟上，晋文公更是与到场诸侯约定要“皆奖王室”，在诸侯面前做足了姿态。

有了齐桓公的前事，周襄王也算是轻车熟路，向晋文公赏赐了“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钜鬯一卣，虎贲三百人”，策命其为“侯伯”，还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要“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这也成为晋文公成就霸业的标志。

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天子的处境尽管早已不同往日，可终究还是占据着礼制传统的制高点，享有着宗教意义上的最高权威。无论王室权威衰弱到什么程度，王室的授权仍然是霸主权力的首要来源。

正如晋国大夫狐偃所说的：“求诸侯，莫如勤王。”一个君主想要获得霸主的殊荣，就一定会将“尊王”视为第一要务，无论是用武力威逼还是施加恩惠，获得天子的首肯都将是他们通往权力高峰的必由之路。甚至当历史发展到春秋中后期，在以晋国为首的历次盟会上，有关“奖王室”的条款也常常被拿出来谈事，“尊王”的原则依然是“政治正确”的不二之选。而诸侯就算是在内心中对天子有再多鄙夷，却也不敢公然与天子对抗，否则就会给其他诸侯留下口诛笔伐的借口，最后总难免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话说回来了，天子的授权固然重要，可说到底也只是起到了一个风向标的作用，风向标会指向何方，终究还是大风说了算。霸主受天子策命获得无上荣耀，如果只是整日里把这些勋章拿出来炫耀而不为他人谋取福利，难免会有狐假虎威的嫌疑，也就无法获得诸侯的真正拥护。这就要求谋求霸业的人必须要拿出看家本领，满足诸侯的内在需求，让他们产生真正的获得感。

反观彼时各国贵族内心中最大的痛点，莫过于对文化灭绝和亡国绝祀的恐惧，而在能激发他们恐惧感的诸多因素中，来自“异族”的入侵又表现得最为剧烈。因此，对于那些想要获得霸主殊荣的人来说，“尊王”之后的“攘夷”无疑将成为快速获得诸侯认可的重要戏码。

在齐桓公的霸业历程中，虽说其“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尊王”时颇有些虚情假意，可在“攘夷”这件事情上却是认真的。他不仅带领诸侯抵御“戎狄”，远征孤竹以救援燕国，帮助卫、邢异地重建，还数次带领诸侯击退楚国对郑国的觊觎，甚至一度亲领大军侵蔡伐楚，迫使对方在召陵与各国签下盟约，这些都是很值得称道的事迹。晋文公在位时间只有九年，但其所建立的功业却毫不逊色，他先是以勤王之功获得诸侯的青睐，随后又在楚

国北侵中原的时候发动三军，凭借城濮之战一举击溃楚国而登顶霸主的宝座。

人们谈及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之时，也无不把视线都聚焦于此。比如孔子在提到管仲时，曾从侧面指出自己对齐桓公霸业的看法：“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危亡关头，若不是齐桓、晋文站出来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或许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就会和迈锡尼文明抑或过去的殷商文明一样，成为永久的历史遗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面貌。

因此，凭借王室的宗教权威获得合法性，并借此统合诸侯合力抵御以楚国和“北狄”为代表的“异族文化”的入侵，挽救华夏文明于倒悬，就构成了霸主政治产生的最大动因，也代表了霸主必须要履行的重要职责。

分灾救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尊王攘夷”既是获取霸权的手段，同时也是霸业秩序得以维系的重要支柱。但是，身为周文化圈这个大家族的“掌门人”，如果仅仅是做到了这一点，却对诸侯所承受的苦难视而不见，就仍不足以让他们箪食壶浆、赢粮而景从。

正如《左传》中所强调的：“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要想让那些互相缺乏信任的诸侯再次回到“相亲相爱”的温馨时刻，恢复大家族“兄友弟恭”的优良传统，让大家携起手来共赴时艰，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里，我们还是以齐桓公作为参照对象来进行分析。

传统史料一般将公元前679年作为齐桓公称霸元年，但实际上，其在位的前二十年，各国的主要任务都还聚焦于开疆拓土，齐桓公也概莫能外。他在管仲的辅佐下与周边国家大打金融战、贸易战、经济战，灭掉了不少共历患难的邻邦。这些做法尽管有利于齐国的发展壮大，可对于霸业成就的取得实际上利害参半，因此我们很难将这二十年计入其霸业时期内，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准备期。

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转折点始于其在位的第二十二年，当时位于中原腹地的燕国、卫国、邢国先后受到“北戎”的侵扰，齐桓公帮助各国抵御“戎狄”、重建家园，其“兴灭继绝”的善举受到了广泛认可，而这也反过来推动齐国的政治重心逐渐转向中原，其政治逻辑也开始出现了转变。

《穀梁传》总结齐桓公的一生，说其共举行“衣裳之会”十一次，“兵车之会”四次，足见其气势之盛。但齐桓公在进行自我总结的时候却很谦虚，并没有将即位初期的几次会盟算进来，只提到了“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这个说法尽管保守，但却更能描摹其霸业政治的全貌。

在这诸次会盟当中，公元前651年举行的葵丘会盟代表了其霸业的巅峰。有关这次会盟的主要成果，《左传》只是简单地提到与会各方盟誓说：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穀梁传》更加详细些，列举了盟约中的几项重要内容，分别是：

毋雍泉，毋讫采，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

《孟子》之说更为具体，对其中的约定进行了细化解读：

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统括以上的盟约内容，大体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灾害治理的，也就是所谓的“分灾”。比如其中有“毋雍泉，毋讫籴”或“无曲防，无遏籴”的条款，都申明各国不得随意修筑堤坝，不得将祸水引入他国，当灾荒发生的时候，必须履行互相救助的义务，不得禁止邻国采购粮食。这些都体现了齐桓公试图整合各国力量共同治理水旱灾害的担当和雄心。

这个原则后来也被晋国继承，到晋文公去世半个多世纪后，晋悼公召集诸侯在亳地举行会盟，载书中提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一再重申“救灾”方面的义务，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题中之义。

此外，在葵丘会盟的誓词当中，还提到了“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种大的原则，其用意便是要制止国际社会以大侵小、以强凌弱的现象，防止灭国战争再度发生。这些原则构成了盟约的第二部分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定患”。春秋后期的齐国大夫晏子回顾齐桓公功业时就有这样的断语：

昔先君桓公，方任贤而赞德之时，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行远征暴，劳者不疾，驱海内使朝天子，诸侯不怨。

所谓“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就是在说正是因为有齐桓公这样的霸权存在，那些无法自保的弱势国家才得以延续国祚，那些已经灭亡了的国家才得以复兴，避免了被大国吞并或为“戎狄”所灭的命运。

历史的发展似乎也印证了这个结论。在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尽管中原大地战火不断，可屡见于春秋早期和晚期的灭国战争却几乎销声匿迹，可见霸主的权威终究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正是因为有这种机制存在，那些无所依仗的小国尽管时常受到霸主的盘剥，可他们对霸主的依赖之心和感念之情却总是发自肺腑的，这与他们当初对待天子的态度几乎一致。因为一旦霸主权威丧失，这些国家会最先感受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压力，那种无日无之“亡国绝嗣”的恐惧感便会油然而生。

正因如此，到了春秋晚期灭国苗头再次出现的时候，晋国仍在不断地重申“大毋侵小”的准则，并就“以大侵小”的问题不断“约谈”各国领导人，以体现其作为诸侯盟主的责任感。

但到晋昭公时期，随着历史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演进，霸主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末日黄昏。面对齐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鲁国大夫叔孙婼就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谓乎！

当诸侯间以大侵小再次成为现实，人们不免会更加怀念过去那段被霸主支配的时光。叔孙婼将春秋末年的局势与王室权威刚刚丧失时的情形相类

比，认为造成如今局面的原因皆在于霸主权威的去而不返，从中也可以看出各国对霸主政治的强烈呼声。

定纷止争

葵丘会盟约定了治理自然灾害的总体原则，也明确了各国互相扶助、和平友好的政治秩序，但这些还不是会议的全部议程。在孟子列举的五条盟约当中，几乎每一条都提到了有关各国内政的约定，概括下来大体上有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是确定继承原则。诸侯只要确立了储君就不得随意更换，更不能将妾室“扶正”以动摇储君的地位；如果诸公子当中有人胆敢有所企图，要当机立断立行处置，切不可因储君地位的争夺引发内乱。在这方面，引发“五世昏乱”的晋献公以及亲手制定这条准则的齐桓公，都可以说是声名远扬的坏典型。

第二是确定用人原则。要尊重能人异士和德行高尚的贤人，要注重人才培养；但有封爵，一定要向霸主汇报，避免因为偏私而令佞人得利。换句话说，这一条强调的实际上就是后人所说的“亲贤臣、远小人”，佞臣擅以私利动摇国本，贤臣全凭公心维护社稷，贤臣能人多了，国家自然就能远离祸端。

第三是确定分配原则。规定士官之职务不得世代相传，不能“一人分饰多角”，在录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考察。这一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杜绝世官制，防止卿大夫坐大侵蚀公室权益，进而危及国本。

第四是稳固统治基础。一方面对于大夫阶层要予以保护，不能独断专行随意杀戮，以维护大夫阶层的利益不受侵蚀；另一方面则是要“敬老慈幼，

无忘宾旅”，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得到保护，构建坚实的群众基础。

春秋初年，层出不穷的内乱和丑闻在中原大地上肆虐近百年，各国也都采取了相应手段来制止争端，但试错的结果并不理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引发内乱的都是与公室有着密切关系的公族势力，能够参与到君位争夺的更是离不开与国君有着近亲血缘关系的公子公孙们，寻常人等根本无法插手权力争斗。人们于是便想当然地认为公族才是祸患，因而把处理内部危机的矛头都对准了公族。

殊不知，各国危机爆发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是在国家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周公的制度设计无法适应新的国家形态而导致的系统性危机。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所能调动资源的多寡，在无法解决政治权力分配的情况下仅仅限制公族的权力，显然是缘木求鱼。正因如此，这种蔓延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封建危机，在整个春秋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有效化解。

以上盟约规定了各国需要遵守的基本政治准则，其目的就是要保证诸侯内部政治清明，避免因为各种利益纠纷引发冲突。这些措施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能够得到彻底执行，春秋末期很多权臣威逼公室的悲剧即便不能避免，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延缓。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在于，要想让这些准则得以持续贯彻，仅仅依靠各国君主大夫的自觉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特殊权力机构进行监督。这种监督方式用今天的政治学术语来描述，就是要建立了一个“可信承诺机制”，利用霸主“讨罪”的武力威慑维护各国内部秩序的安定。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霸主取代天子成为诸侯领袖之后，过去诸侯对天子履行的朝贡义务也就转向了霸主。这种朝贡体系实际上也是维护共同市场、在各国间进行资源调配的一种变通手段。联盟内的诸侯向霸主缴纳贡赋，霸主则根据各国需求给予赏赐，从而为各国稀缺物资的供应提供保障。

在有关齐桓公霸业的各种记载中，我们常常能见到类似的情形，比如在《国语》中，“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载而归”。

齐桓公为了博取诸侯的信任而大施恩惠，各国前来朝贺带来的都是劣质产品，齐桓公不仅不计较，反而还馈之以厚礼，让他们可以空手而来，满载而归。晋文公取得霸业之后，尽管出手不再那么大方，但大抵还是采用了齐桓公的朝贡体系，与中原各国互通有无，从而促进了各国的商贸沟通和物资交流，为构建统一中原经济体系提供助力。

当然了，国家间物资交换不能仅仅依靠朝贡体系，一定程度的市场开放也是必要的。这种关于统一市场的需求，既是维护各国政治秩序正常运转的需要，也是整合各国资源共同抵御外部侵蚀的必然选择。只是建立如此庞大的市场体系，其作用不仅仅是针对我们此前提到的那些青铜原料，其他的一些商品如食盐、牲畜、粮食、皮革、珠宝等物资的流通，也都是这个统一市场的应有之义。

如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齐桓公为了得到诸侯的拥护，特别降低或干脆取消过往商品的关税，以让利于诸侯，对于凝聚中原文化共同体也是大有裨益的。

统括起来，我们便可以看到，霸主虽然只是诸侯领袖，但却基本上承担了原先本应由天子履行的所有职责。只是与天子在名义上广有天下不同，霸

主所能管辖的只有中原地区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诸侯，超然于中原秩序之外的“蛮夷”之邦并不在其管理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在缺乏绝对威慑力的情况下，为了维持霸业秩序的可持续性，凝聚中原各国的合力为己所用，还必须塑造一个假想敌，明确“华夷”之间的基本界限，这也是后来百年间晋楚争霸的实质所在。而赵鼎新文中有关“全中国范围内的霸主”的标准，恰好就是天子与霸主的本质区别。

在霸业秩序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华夷之辨”、敌我意识这些原本模糊的概念开始不断增强，进一步重塑了人们的观念，从而重构了“华夏”的内涵。霸主正是依托于“华夏”而存在的政治实体，一旦其外延发生了转变，囊括的范围出现了扩展，霸主的概念也会因之而发生动摇，而这一点也是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

第三节 晋国霸业的基石

定义霸主

行文至此，有关霸业秩序的形成逻辑便一目了然了。霸业秩序的形成，是人们为了应对春秋初年自然灾害治理失序、诸侯国内外政治混乱，以及抵御“异族文化”入侵所需而形成的政治秩序；是人们在不断探索、试错、修正的过程中，排除了重塑天子权威、重建新王朝这两条路径之后所找到的替代模式；是大国君主寻求王权不得后妥协的产物，也是当时情境下诸侯相互妥协后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霸业秩序存在的根本目的或者最终使命，是在不危及诸侯自主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系礼乐传承，避免其文化信仰被“异族文化”侵蚀和摧毁。

霸业秩序建立的基础，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基因、共同利益驱动、共同市场需求以及共同外部威胁的所谓的“华夏联盟”。处于这个联盟之外的国家，包括北方的“戎狄”、南方的楚国以及后来出现的吴、越，都是他们极力排斥和防范的对象。随着霸业秩序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北方的“戎狄”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散，渐渐无法对中原各国构成威胁，及至春秋中后期，楚国就成了以一己之力与整个中原抗衡的特殊存在。楚国在中原政治秩序中的特殊地位，也造就了其中原诸侯巩固“华夏联盟”唯一假想敌的身份，其兴盛与否也往往成为霸业秩序能否存续的硬性指标。

与此同时，所谓的“霸主”或“伯主”也是一个有着鲜明文化烙印的概念。霸主地位的取得并不完全依赖于诸侯所取得的武功，而是要同时得到天子的授权和诸侯的认可，二者缺一不可。只是对于如何团结中原文化圈内的各诸侯国，早先人们普遍缺乏共识，霸业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过

程，“尊王攘夷”正是人们在不断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尊王攘夷既是获得霸权的手段，也是霸业秩序赖以存在的支柱。因此，要想保证霸业秩序长盛不衰，已经取得霸主地位的国家还需要尽力调和混乱的诸侯秩序，承担兴灭继绝、分灾救患、定纷止争、重建互信机制等义务和职责。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过程，实际上就蕴含了中原霸主的形成逻辑。

诸侯对于霸主秩序有着强烈需求，同时也因为周王室的授权而团结到了霸主的周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希望出现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对他们予取予夺。一旦有人背离了这个初衷，诸侯马上就会作鸟兽散，甚至受到威胁的国家为了保全社稷，还会迅速寻找新的靠山，使其在争夺霸业过程中获得的优势荡然无存。诸侯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封堵了霸主的向上之路，反过来成为一种监督霸主履行职责的外部机制。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不妨给春秋时期的霸主下一个严苛的定义：

所谓霸主，是华夏联盟这个想象共同体内部产生的，通过获得天子授权和诸侯权力让渡，代替天子统领诸侯行使礼乐征伐职责，维护中原政治经济秩序，抵制异族文化侵蚀的诸侯领袖。

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定义，再回过头来审视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春秋五霸”，就能有一个鲜明的判断标准。也即在判定一个人是否是“霸主”时，需要看他是否同时符合这三个要件：一是同盟内部产生，二是充分授权，三是履行礼乐征伐的职责。

从这个标准出发，首先要排除的是处于中原体系之外的君主，如楚国的历代君主，吴国的阖闾、夫差，越国的勾践。这些国家在春秋初年所形成的诸侯关系中并不属于华夏同盟的一员，而是中原霸主抵制的对象。特别是楚国在整个春秋时期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以吞并灭国和文化渗透为目的的搅局者，而不是争霸战争的参与者。

其次是中原文化圈内的有力竞争者，如秦穆公、宋襄公，他们虽有称霸之志且都曾为这个理想奋斗过，但其影响力仅仅限于其所在的局部区域，既没有得到天子的授权和诸侯的拥护，也不具备代替天子行礼乐征伐之实，显然也不符合成为霸主的条件。

如果非要将他们与齐桓公、晋文公并列的话，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霸业草创初期的有力竞争者。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晋文公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脱颖而出，从而奠定了晋国长期称霸中原的政治格局。此后在整个春秋中叶将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唯有晋国真正做到了长期带领诸侯行礼乐征伐的重任，延续了霸主的权威。

因此，在现实的春秋政治实践中，除了齐桓公曾因开创了霸业模式而获此殊荣外，其余的时间里，霸主权威都掌握在晋国君主手中。这个时候我们再缩小范围，以是否履行霸主职责来进行遴选，晋国称霸期间的几任君主如晋灵公、晋成公、晋厉公、晋平公，因未能完全履职尽责，其在位期间或之后华夏同盟也遭到了一定的冲击，因此也无法列入霸主行列。

最终筛选下来，在整个春秋时期，能够有资格跻身霸主行列的人便屈指可数了。如果定要为春秋霸主人选凑一个整数来套用所谓“五霸”说法的话，那么这个序列恐怕也只能是：齐桓公、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晋悼公。在这样一个队列中，晋国占到了四个席位，这既与晋国在春秋中期的表

现相吻合，也能够契合南北对立与融合的主线，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梳理春秋时期的历史全貌。

地缘优势

行文至此，或许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为什么晋国就能够成就霸业，且能将这种优势长期保持下去，而齐国的霸业却会一世而衰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首先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予以分析。

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曾一再强调，晋国所在的地理位置，东有太行、太岳群山阻隔，南有中条山与黄河天险并行不悖，构成了其与东方列国之间的天然阻隔。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东方诸侯很难越过天险且远距离跋涉对晋国政局造成影响。

正因为如此，当晋国陷入了七十年内战的漩涡而日渐衰落的时候，郑、虢等国势力尽管能够深入晋境，却不能扭转整个晋地的局势，更不可能对当地政权的生存构成威胁，使得以小宗克大宗的曲沃势力仍然能够统一晋国，取得与东方诸侯平等的地位。尽管晋国一再触碰底线，对内虐杀宗族、对外灭国夺邑，高举尊王攘夷、兴亡继绝大旗的齐桓公却也只能望洋兴叹，始终无法将触角延伸到西方，插手晋国的内外事务。即便是到了城濮战场上，当晋文公因为担心失败而寝食难安的时候，狐偃还能以“表里山河”来勉励他，这正是他们敢于以区区实力去挑战人人畏惧之超级强权的底气所在。

所谓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与地理位置的封闭性相伴相生的，还有晋国占据交通要道所带来的开放性。晋国与关中有两条重要通道，一条是韩原附近的龙门渡口，一条是晋陕豫三省交界、黄河金三角地带的蒲城、风陵等渡口，后者也是西周时期东方诸侯朝觐天子的必经之路。在面对地处

西方的宗周抑或后来的秦国时，相比于东方各国，晋国交通的便捷性又大为提高。

在当时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承接夏商周三代文化核心的汇聚之地，联系宗周和中原交通要道的独特优势，与王畿距离适当、气候相近的自然禀赋，都为晋国的率先崛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西周末期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晋国最能感同身受，周王庭受到游牧部族的冲击，晋国也曾亲身体会。当西方世界二王并立的局面开始出现的时候，晋国也能第一时间得知内情、从中周旋并获取利益，从而在东方世界尚处于蒙昧中时就实现了第一轮扩张。

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政治重心转向东方，位于中原腹地的成周也就成了王朝新的中心。这个在西周初年便已经被周公看中的古都，自来就有睥睨天下的地理优势，后世王朝也曾多次建都于此，可见其在整个中原版图上的重要性。而晋国所在的晋南盆地恰好就位于成周的背后，其直线距离也不过百里之遥，正可以镇抚天子而雄视天下。

与此同时，黄河水患在古代政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常常成为影响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春秋时期活跃的大国多数都位于黄河周边，这种影响也就尤其不容忽视。而晋国占据黄河上游的区位优势，使其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有了更高的发言权，并借此对下游各国构成威慑，这就为其霸业成就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战略优势。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晋国蕴含战略资源的丰富性。春秋时期各国对于铜锡矿产等资源有着高度的依赖，然而与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不相适应的是，中原地区自来就是个战略资源稀缺的地区。尤其是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

等矿产资源，更是高度依赖外部“进口”，这就使得整个中原在与资源完备、自给自足的楚国的竞争中落了下风。

所谓“矮子里面拔高个”，晋国的矿产资源虽说没有多丰富，可要跟其他邻邦比起来，总还是有不少优势。比如晋国南部的中条山地区，既是秦晋两国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是盛产铜矿资源的“淘金圣地”。晋国掌握了这样一个富矿，在各国间铜矿贸易当中自然就占得了先机，从而避免了被列强所挟制的命运。另外，晋国虽然并不出产锡矿，其国土与当时的重要锡矿产区燕辽地区的距离也很远，但自从晋献公时期取得了卫国故地朝歌、河内、邯郸、百泉四邑的控制权后，晋国在锡矿运输通道上的战略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除此之外，中条山以北的运城盆地，从古至今都是重要的食盐产地。在马匹方面，晋献公“假道伐虢”之时，曾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做饵诱使虞公同意借道，“屈产之乘”在当时也是极负盛名。拥有丰盛而优质的战略资源，为晋国逐鹿中原提供了强大的政治资本，这是其他诸侯所难以比拟的。

地缘政治带来的优势还不止于此。由于晋国“荐居狄土”，其所在的晋南盆地自古以来就是“夏后氏”以及各部“戎族”活跃频繁的区域，其中有祁姓、隗姓、允姓、姜姓、嬴姓、真姓等各类部族，难以胜数。正因如此，早在晋国立国之初，周王室就特许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治理当地的百姓，使晋国的文化因子中既有周礼文化的成分，也同时受到了来自夏朝和“戎狄”的律令风格影响。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使晋国能够不必拘泥于固有的制度框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不可预知的机遇和挑战。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多元包容的文化基因、与怀姓九宗合作共治的历史先例，以上的种种因素也都为晋国任用异姓卿族的行政风格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基因。随着西周末年气候剧变影响的不断深入以及宗周政治环境的日趋恶化，这种优势更加凸显。

早在骊山烽火爆发前，西周大夫东迁避难就已成为一股潮流，前文所提的郑桓公与虢公翰便是其中的典型。不过跟这两位比起来，多数的公卿或许并没有如此的权谋与幸运，他们或者是丧失了土地，或者是失去了官职，仓促之间无法获得新的根据地，就近选择“寄孥”之所也就成了他们的普遍做法。

在这个过程中，晋国以其地利之便收容了不少从宗周逃难而来的贵族。这些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的还掌握有大量的王室典籍，这些智力资源对于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大有裨益，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也成了晋国赖以扩张的重要推动力。

人才优势

当然了，在周礼的约束下，异姓贵族从定居晋国到参政议政，从默默无闻到大放异彩，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促成这一转化的正是曲沃代翼战争。为能在战争中获胜，曲沃方面无法拘泥于周礼的约束，曾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措施。

按照李孟存、常金仓在《晋国史纲要》中的说法，《诗经》中有大量描写翼侯势力残暴无道的篇章。比如一篇叫《扬之水》的诗歌，描写的就是公室奴役百姓，迫使他们投奔曲沃桓叔的情景，从中似乎就能窥见曲沃进行的经济制度改革的影子。在用人方面，曲沃势力自然也是开出了丰厚的条件大

肆延揽人才，其中不乏异姓大夫的影子，比如智氏和中行氏的始祖荀息（原黯），就是在武公时期被封到荀地而成为大夫的。

异姓大夫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始于晋献公时期。当时刚刚即位的晋献公深受“桓庄之族”压迫之苦，不可避免地也跟东方诸侯一样把问题简单化，从而在对待公族的态度上走向了极端。在他任内，先是制造“聚邑之围”消灭了“桓庄之族”，后又通过“骊姬之乱”驱杀诸子，并将“国无公族”制度确立为晋国的基本国策。这些政策使得近支公族非死即亡，本应优先重用的远支亲贵也弃置不用，反而是出自异姓贵族的士蒍、荀息、里克等人成了献公时期的红人。

晋国率先打破周礼的藩篱，施行“国无公族”政策，为异姓大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了巨大的人才优势。与此同时，异姓大夫的崛起固然压制了公族势力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在这种竞争机制的驱使下，公族贵胄不仅无法躺在功劳簿上享受清平，还必须在各方势力的裹挟下建功立业，晋献公时期建言伐桀，在战场上被羽先登的卻叔虎便是其中的典型。强有力的竞争机制既激发了异姓贵族的活力，也为底层贵族提供了实现阶层跃迁的舞台，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人才流动。

总而言之，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交通条件的便捷性、水患治理的优先性、战略资源的丰富性、文化系统的多元性、人才战略的开放性、政治环境的竞争性，以上的七个因素构成了晋国得以称霸的先决条件，为后来的霸业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晋国依靠这些地缘政治等方面的优势，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扩张后，终于成为睥睨天下的大国。但地缘政治带来的优势只是一个基础，如果仅依靠以上条件，还不足以将他们推上霸主的宝座，并且让他们在此后长达百年的时

间里维持霸业长盛不衰。如何整合这些优势资源，将这些便利发挥到极致，往往才是决定霸业归属的最终因素，而这一切似乎又蕴含着某种偶然性。

有关这一点，本书中也有论述。晋国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决定了其内部危机一旦爆发就很容易走向极端，且很难通过外部势力的干预得到解决。其结果要么是酝酿成为如“曲沃代翼”一般的长期内乱，要么就是将问题自行消化。而幸运的是，晋文公长期流亡的经历和恰到好处的回国时机，为晋国内部冲突的化解提供了可能。

从个人经历上看，晋文公长期流亡的经历让他遍尝人间冷暖，遍历各国制度的优劣，从而能够以更加广阔的视角、更加超然的姿态去审视国家内部各种危机出现的根源，并以此为契机出台一系列相对公平的制度安排。而他回国之时，晋国恰好经历了矛盾冲突得以充分释放的阵痛期，“五世昏乱”后人心思定的局面为推行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另外，晋文公之所以能够得以顺利回国，是因为他代表着国内民众的一种强烈的诉求，这就使得他在回国即位之后，不论是否真心情愿，都必须对人们呼声加以重视，必须承担贤名背后所承载的政治理想。

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晋国自“曲沃代翼”时期就已经开启的各项改革措施，为晋文公施行新政提供了政治基础。比如晋献公“国无公族”的“休克疗法”，吕甥“作爰田、作州兵”的应急举措，这些做法在晋文公主政时期都得到了采用。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政策措施大都具有临时性特征，而晋文公则有意在制度层面上对其进行了规范，从而创制了“执秩之法”，使得这些政策举措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

晋文公在位时间虽短，却刚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在这个重要节点上，他顺应社会需求，先是通过恢复旧族地位迎合国人的愿望，稳定公族

及居守大夫的情绪，随后又在晋惠公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官僚系统，重构经济体制，融合各类族群，规范竞争机制，严明刑罚规则，终于将回国初期的混乱局面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人争先向上的新局面。从此以后，不同群体、不同派别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不论是居守派、流亡派也好，公族、异姓大夫也罢，都不再执着于眼前的龃龉，而是在一个自由竞技场上各显其能，从而将竞争所产生的效能发挥到极致。

这些制度设计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当前来看，大大地提升了国内民众的凝聚力，提升了整个行政系统的运行效率，终于使得晋国这架老爷车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进而一举定鼎中原，建立了不世之功业。而长远来看，则是在春秋时期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尽管在此之后，晋国内部的纷乱并未完全消失，但晋文公所奠定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则一直为后人所遵循。甚至直到百年以后，已然无法控制朝局的晋平公，依然将“齐、楚多难”作为晋国能够统领诸侯的资本而沾沾自喜，这也正是晋国得以雄霸天下的真正秘诀所在。

第四节 霸业衰亡路线图

以前述对霸主的定义为基础，我们不妨再向前一步，探究一下霸业模式在春秋末期走向衰亡的内在逻辑，实际上不难发现，诸侯叛离晋国的过程与霸业模式走向衰退的进程几乎是同步的。依照前文的分析，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诸侯懈怠

第一个阶段始于公元前562年，其标志是晋悼公十二年冬的萧鱼会盟。也就是说，晋悼公复霸成功的那一刻，也是晋国霸业和霸主政治由极盛转向衰亡的起点。这是因为，以晋国为核心的华夏联盟是建立在共同诉求之上的，其形成和维系有赖于共同的外部假想敌而存在。然而自晋悼公霸业复兴之后，维持整个霸业秩序存在的基础便开始受到了动摇。

首先是随着争霸战争的持续演进，原本横行中原的北方“戎狄”势力，在中原各国的合力抗击下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伴随着联吴制楚、疲楚服郑战略的综合运用，楚国因受内外各种因素的冲击，不得不将战略重心转向了吴越地区，其对中原各国的压力也顿时消散了。当过去那些让人们感到恐惧的力量，那些迫使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的假想敌一夜之间消失无影，人们对霸主的依赖感也就显著降低。

正如士燮在评论晋国内政时所说的那句“不有外患，必有内忧”，这样的论断对于华夏联盟也同样适用。晋悼公复霸的努力，恰恰就是消解外部假想敌的过程，其造成的最终结果，不仅使得晋国内部出现了分化，也为霸业联盟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而在各国内部，由世卿世禄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集聚到了一个临界点。争霸战争是一场零和游戏，参与战争的各方只是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拉锯，双方影响力的此消彼长并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实际的收益，反而会因土地的不断分封而稀释并削弱公室的实力，增强国内豪强的政治资本。

晋悼公即位前后，各国的土地、人口已大部分落入世卿大族之手，公室的财富和地位都急转直下，中原大地再次进入了一个封建制危机集中爆发的时代。包括晋国在内的中原诸侯，或多或少都出现了族大逼君的强卿政治，强卿之间的兼并成了新的主流。

而在这个过程中，晋国不仅不能消弭诸侯内部的威胁，甚至连自身的危机都难以解决，作为霸主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挑战。更让事情变得雪上加霜的是，在晋悼公争霸的关键时期，中原大地普遍遭遇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旱灾。在这青黄不接的年头，晋国对外的征伐却没有停止，诸侯皆因在晋楚之间疲于奔命而产生倦怠，也让晋国逐步丧失了公信力。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楚国势力渐渐退出中原的这个节点上，两种因素叠加起来，晋国的霸业自然也就难以为继了。

不过，现实政治总有其惯性。在晋悼公复霸前的大半个世纪中，人们已经习惯了由晋国来统领中原的政治模式，在新的政治秩序诞生之前，这种社会、心理上的依赖感会持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齐国复霸野心彰显的情形下，受到齐国侵扰的鲁、卫等国还有赖于晋国的支持，不敢公然表现出对晋国的不满。此后十几年中，尽管晋国做出了很多不友善的举动，人们大都还是消极地维护晋国作为中原盟主的地位。因此，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关键词便是“懈怠”。

两相敷衍

霸业秩序衰亡的第二个阶段始于公元前546年，标志是晋平公十二年秋的第二次弭兵会盟。

弭兵会盟本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会盟过后，人们也难免会感到有些担忧。因为在弭兵的盟约之中，晋楚双方约定，各自麾下的盟友要到对方那里去朝见，也就是履行“交相见”的义务。彼时中原各国对楚国都有一种莫名的偏见，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履行“交相见”义务的时候都有些犹豫。

另一方面，晋国在弭兵会盟中表现出的软弱态度，大大地激发了楚人的野心。尤其是后来弑君篡位的楚灵王不仅有如齐桓公、晋文公一样的称霸中原之志，还有似商汤、周武王一般的并吞八荒之心，不仅要让诸侯时时朝见，甚至还要拉着大家到东吴练兵，在中原地区引发了普遍的不安情绪。

此时此刻，诸侯大都仰赖晋国能出头做主。可遗憾的是，此时的晋国内部早已混乱不堪，用子产的话来说，是“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晋平公心灰意冷，早已经失去了向六卿争夺权柄的野心，每日所思所想全是如何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纵情酒色，在欺凌诸侯这件事上比之楚灵王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六卿则各自为政，以自己的诉求为最高指针，随意左右国家政策，以至于“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又哪里还有替难兄难弟撑腰的觉悟呢？

晋楚两国的强横做法让诸侯感到万分失望且如鲠在喉，大抵都已经产生了对晋国的厌弃情绪。但由于南方局势未定，诸侯又不敢公然撕破脸皮，只得尽可能顺着对方的脾气来，为的只是在遭遇楚人诘问的时候自我打气。

在晋楚两国的双重压榨之下，诸侯与昔日霸主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一种刻意维护的特征。对于这种虚与委蛇、逢场作戏的滑稽场面，所有人都心知

肚明，但没有谁愿意说破，只等着有一只黑天鹅会突然出现，将一切的伪装都撕掉。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概括为两个字：敷衍。

众叛亲离

第三个阶段始于公元前529年，标志是晋昭公三年夏天举行的平丘会盟。正是从这次会盟开始，诸侯对晋国的态度从内心的反叛转向了实际的行动。在论及“诸侯皆叛”的原因时，《左传》将其归结于诸侯对虎祁宫落成的不满，并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来说明德行在霸业中的重要地位。

晋国政策朝令夕改，对待诸侯朝聘不时、索求无度，令人进退失据、无所适从，这些因素的确是促使诸侯叛离的原因，虎祁宫的建立也的确可以看作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但实事求是地讲，虎祁宫的建成最多算是人们发泄情绪的突破口，却并不是引爆情绪的导火索，真正的导火索恐怕还是当年楚国发生的那场动乱。

这场爆发于晋昭公三年四月的内乱，从楚国新设县的陈、蔡以及东部的吴、越边境引爆，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蔓延全国，先后导致了楚灵王和他的两个弟弟子干、子皙死于非命，对楚国社会经济更是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此后即位的楚平王尽管控制了局面，但却无法重振国力，只能一心保守家业。更有甚者，为了防止有人到自己家里来趁火打劫，他还紧紧地关闭了北大门，这样一个外交政策转趋保守的国家已经无法对诸侯构成直接威胁了。

笼罩在中原大地上的乌云一夜消散，人们突然发现，似乎没有了霸主，生活也依然会很美好。既然如此，又何必再看着晋国脸色行事呢？

也正是因为嗅到了这股异样的气氛，晋国感到无比紧张，这才决定举行平丘会盟，并试图通过阅兵的形式向诸侯炫耀武力，以此来迫使他们继续维护晋国的盟主地位。

然而，这次盛大的阅兵仪式不仅没能挽回诸侯的信心，反而将晋国的虚弱暴露无遗。郑国执政子产对这一切看得十分通透，因此当其他人还在担心这个花架子的时候，他却敢于为郑国的权益与晋国争辩。平丘会盟结束后，时任晋国执政韩起曾为挽回局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可在内外势力的制约下，终究还是无济于事。

一个直观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当晋平公去世后，诸侯都派出了重要的卿士来参加吊唁和葬礼，场面可谓隆重。仅仅六年后，到晋昭公去世时，这样的气氛就一去不返，往日的盟友已经不怎么捧场了。再到十几年后晋顷公去世时，其葬礼更是冷冷清清，与平丘会盟前的场景形成了巨大反差。

诸侯对往日的霸主不理不睬，晋国多次争取都收效甚微，最后也只能放弃霸主的职责，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春秋初年那种类似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之中，一个让孔子感到痛心疾首的乱世再次降临。面对这样一个纷乱的世道，晋国要么就是放任不管，对违背礼乐秩序的行为听之任之；要么就是浑水摸鱼，利用他国的灾难谋取利益。这些做法无异于是将那些原本就满心失望的诸侯推向对立面，进而形成一个负反馈相互叠加的恶性循环，霸业秩序的最终消亡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一阶段的关键词便是：疏离。

联盟解体

霸业秩序的最终消亡始于公元前506年，标志是晋定公六年的召陵之会。

召陵之会举行前，华夏同盟早已是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了，只余几根残破的廊柱苦苦支撑。然而即便是这几根可怜的廊柱，在经过日积月累的虫凿风化之后，也渐渐无法支撑这沉重的楼阁。推动整个秩序走向最终崩溃的，主要有两次重大事件，其中的一次是爆发于公元前520年的王子朝之乱。

在这场持续五年的动乱中，晋国依仗自身强大的军力，公然违背周景王的意愿和诸侯的期待，前后两次出兵支持权臣单、刘两家所扶持的周悼王、周敬王势力，最终将王子朝驱逐到了楚国。晋国在王室内乱中的所作所为，彻底激起了诸侯压抑多年的愤怒情绪，而王子朝在流亡后所发布的讨晋檄文，更是将晋国犯下的种种罪行都揭露了出来，为天下人提供了一个彻底释放怨气的窗口。

第二件事是公元前506年的吴军入郢事件。晋定公六年春，晋国正卿士鞅带领诸侯联军大举伐楚，横扫方城之外的大片土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在其后举行的召陵之会上，由于晋国六卿颡顽、内忧纷扰，诸侯各怀心思、莫衷一是，轰轰烈烈的军事行动最终落了个半途而废。

而就在他们打道回府半年之后，吴国竟然出其不意地攻入了郢都，在令天下侧目、举世哗然的同时，更将晋国统御诸侯的无力感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更重要的是，随着楚国都城被吴人攻破，往日震慑中原不可一世的超级强权顿时变得狼狈不堪，这个被中原诸侯想象出来的假想敌也失去了作用。

“尊王”和“攘夷”是维持霸主合法性最主要的两个支柱，是霸业秩序这种特殊的政治模式赖以生存的土壤。然而，经由对王子朝之乱的干预，晋国“成功”地动摇了天子地位的合法性，彻底消解了周王室的文化和宗教权威，由“尊王”获得天子授权的前提便不复存在。吴军入郢事件，则是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宣告了楚国在中原影响力的终结，使得能够最大程度唤起

人们忧患意识、凝聚起华夏共同体的外部威胁一去不返，凭借“攘夷”建立起来的霸业根基顿时坍塌。

自此以后，原本就已经出现嫌隙的华夏同盟，更是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诸侯纷纷脱离了晋楚两国的控制，有的甚至走到了晋国的对立面。因此，这一阶段的关键词便是：对抗。

文化融合

霸业秩序消亡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其中不仅包含有政治因素，更包含了文化、社会、经济、技术等各个方面的推动力。

从文化视角出发，霸业秩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碰撞、斗争和融合的过程。

楚人原先一直自立于华夏系统之外，其独特的文化体系相较于中原的礼乐文明起步较晚且相对落后。面对浪漫恣肆的楚文化，中原诸侯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并在文化交流中采取一种“文明对野蛮的俯视姿态”。但与此同时，楚国强悍的武力和崇尚兼并的国家性格，又经常让中原诸侯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忧惧”，这也是霸政秩序得以形成和维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正是在这种互相矛盾的心理机制作用下，中原诸侯对待楚国的态度总是伴随着其军事实力的消长而在疏远、好奇、求媚等情绪之间反复切换。当霸业秩序难以振作之时，中原诸侯无法独力抵挡楚国的入侵，恐惧情绪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迫使他们以虚假的臣服来换取安定。可一旦霸主兴盛起来，楚国北上的步伐受阻，中原诸侯就立刻会改换一副面貌，代之以轻鄙的态度。

在“文化霸权”的加持下，中原诸侯通常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反而将楚国描摹成了无信、不知礼且贪婪的形象，这也使得楚人对中原文化的态度总在抗拒与接纳中反复徘徊。他们一方面不断增强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以获得诸侯间的威望；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吸收河洛文化的精髓，试图以主动融入的方式挣脱野蛮的形象，换取诸侯的好感。

在与各诸侯国广泛交流的过程中，当时广为流传的《故志》《训典》《诗经》等文化典籍开始大量出现在楚国的贵族教育当中。楚庄王时期的大夫申叔时就是一个融汇了中原文化和楚国传统的集大成者。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交融无形中塑造着楚人自身的观念，使其逐渐对“华夏意识”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而楚庄王在位时期就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楚庄王即位初期仍将周文王、周武王作为自己的榜样，其内心里依然有一个取代周室、承接天命的梦想。正是在这个理想的推动下，楚庄王才创造了“并国三十六，开地三千里”的功业，做出了“问鼎中原”和“灭陈设县”等让中原诸侯皆感到骇然的重大动作。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在申叔时等人的影响下，楚庄王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剧烈转化，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同意恢复陈国的社稷。到邲之战后，当潘党建议收拢晋人的尸体以堆筑“京观”炫耀武功时，楚庄王又以“止戈为武”的解释否定了这个提议，同时对所谓的“武德”做了进一步诠释。他认为，“武”的功用在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显然是与中原文化基因相契合的。

再到楚共王时期，楚人的自我意识逐渐与华夏趋同。这种逐渐趋同的文化认同甚至对郑国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以至于尽管楚国在鄢陵战败了，郑人也不会因楚人的“蛮夷”身份而轻易背叛。楚共王去世前回顾一生得失，认为自己德薄才浅、有辱社稷，故而希望大夫在“灵”和“厉”之间选择谥

号。但到他去世后，令尹子囊却不肯遵从其遗命，并评论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可见楚人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了维护诸夏利益的先行者。

弭兵会盟后，楚国与中原的交往日益频密，也更加速了楚人融入中原文化圈的步伐。然而由于长期的历史、民族、文化隔阂，楚人试图融入华夏的努力却遭到了中原诸侯的极力抵制。

如晋平公二十年（前538年）时，楚灵王召集诸侯在申地举行会盟，其间伍举列举了夏商以来的几次重要会盟，问他准备采用哪一种礼仪，楚灵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吾用齐桓。”与此同时，他还听从伍举的建议，特意向宋国左师向戌、郑国为政子产询问仪礼的细节，并让伍举随时提醒自己纠正错误。这些举动表明，楚灵王在潜意识里早已将自己当成了“华夏”的一员，也早已放弃了楚人千百年来取代周室的愿望。但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偏见，以及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中原诸侯对楚灵王称霸的野心采取了集体抵制的态度，终于使其出现了无法遏制的认知失调，并酿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内乱。

然而，楚人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他们依旧或主动或被动地汲取着中原文化的滋养。如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因争夺王位失败而逃奔楚国，临去之时还带走了大量的王室典籍，促进了中原文化在楚国的传播，更加速了楚国礼乐文明的进程。后来孔子周游列国，楚昭王甚至“兴师迎孔子”，展现出对先进智识的强烈渴求。

到战国时代，伴随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儒、墨、道、法等学说在楚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反过来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如今研究春秋历史所依赖的重要史料《左传》最早就是在楚国

成书的，众多考古发掘的文献典籍也是在楚国境内得到了妥善保存。尽管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楚文化仍保留着其独特的个性，但却已然与中原文化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并共同融入华夏文明的基因中，成为中华古典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原各国区分华夏与“蛮夷”时，并不以共有血缘为主要标准，而是以文化和政治的认同作为判断依据，因此华夏和“蛮夷”的身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当楚人在文化、心态上逐渐与华夏接近，甚至以华夏文化守护者自居时，人们也就不再将其视为“蛮夷”，由此而产生的“惧鄙”心理自然也就不复存在。相反，伴随着南北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楚国独特的文化特性也引起了中原诸侯的强烈好奇。

比如晋平公十四年（前544年），为履行“交相见”义务而到楚国朝见的鲁襄公，被楚人精湛巧妙的建筑艺术所打动，于是回国后便仿照楚人的营建法式建造了一座“楚宫”。尽管这一做法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但他依旧乐此不疲，最终死在了这座宫殿里。

霸政余韵

当华夏与荆楚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的同时，中原诸侯间的差异却逐步扩大了。

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伴随着礼崩乐坏的更加深入，在争霸战争中逐渐崛起的卿族势力粉墨登场，中原政治版图再次碎片化。世卿家族为了适应新的竞争环境采取了大规模的变革措施，使得晋、郑等国的政治生活逐渐抛弃了周礼的传统底色，显现出浓厚的法家色彩。

与此同时，大量世家大族在政治竞争中出局，其子弟纷纷“降在皂隶”。这些富有涵养的群体既为官僚体制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为百家学说的产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也将具有神秘色彩的文字、青铜等“威信财”逐渐祛魅，对时人文化信仰、宗教观念的转变带来了显著影响。

从技术发展角度分析，随着铸造工艺的不断发展，铁器的制作成本越来越低，技艺也越来越精湛，给中原大国带来了底层技术突破。它打破了春秋时期进攻性武器发展缓慢的僵局，为更加激烈的灭国战争提供了可能。以此为基础，晋国对周边的“戎狄”部族展开了大规模的兼并，使得不少文化各异的“狄人”转化成晋国的百姓，同时也重塑了晋国自身的文化特质。

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大量推广以及牛耕方式的逐渐普及，使得农业生产摆脱了以木、石、骨、蚌为主要工具的落后方式，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上获得解放。这些“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商业活动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繁荣。而新兴的政治体也在不断发展中，或主动或被动地扩大了兵源范围，使得这些来自底层的民众被大量吸纳为职业军人，又进一步改变了过去的贵族传统，战争的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极大转变。

全方位的变革对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天命观念、宗法制度、土地封建、礼乐秩序构成了猛烈冲击，使得划分“华夏”和“蛮夷”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原先具有天然影响力、能够最大程度凝聚人心的共识不复存在。从此以后，中原政治的主旋律就从“华夷之辨”过渡到了“礼法之争”，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演变成了文明内部的冲突，诸侯之间的战争也从“尊王攘夷”的“礼乐征伐”，转向了单纯以国家利益和实力权衡为前提的武力比拼，霸业秩序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在霸业秩序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转折点上，有的人会向前看，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迎接未知；而有的人却沉迷于过往，仍在以一种近乎偏执的理念，孜孜不倦地去试图恢复他们所熟悉、却并不真正了解的政治模型。

然而毕竟时势异也，当旧的政治制度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当霸业模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一切试图恢复霸权的努力注定会徒劳无功。中原版图内的齐景公如是，中原版图之外的新兴势力如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更是如此。他们争先恐后地捡起了恢复霸业的大旗，可拼尽全力的结果，只能是耗尽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其所有的成就不过如流星划过夜空，在短暂的闪烁后便迅疾湮灭，从此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当霸业的辉煌不再，霸主所肩负的职责无人履行，诸侯间大兼小、强并弱的灭国战争便死灰复燃了。在此后短短的几十年里，与楚接壤的陈、顿、胡、蛮氏、唐等国皆被并入楚国版图；常见于诸侯会盟的许、曹两国分别被郑、宋吞并；晋阳之战后，中原地区仅存的蔡、杞、莒、薛、邾、郕等国也都不复存在。整个中原都在进行着新一轮的资源整合，为迎接气势磅礴的战国时代而精心筹划着。

各国内部以臣逐君的事件也卷土重来，包括晋、齐、鲁、郑在内的中原诸侯，国家政权完全落入了卿大夫之手，国君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而以卿大夫组成的利益集团，为了进一步争权夺利，又掀起了一股相互倾轧甚至兼并攻伐的狂风骤雨。这股恐慌的潮流如燎原的星火一般，在中原大地上不断蔓延，使得那些过去君权相对稳固的国家也无法幸免。

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早已忘记了霸主的本来面目，也忘记了霸业秩序的最初使命。游走列国的百家学者用当世的眼光审视过去的历史，并用自己认同的观点去套用古代的政治规则，使得“霸业”“霸主”“霸权”这

些原本有着鲜明时代烙印的概念被逐渐异化，最终脱离了其原有的内涵和形成时的基本逻辑。

所谓“各花入各眼”，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春秋五霸”的不同解读，都是战国士子为了各自目的而有意遴选的结果。他们或者以权谋诈术为纲，或者以仁义道德为本，或者以崇信尚义为尊，或者以选贤任能为要，从过去人们所熟悉的春秋君主中选择出更符合自身学术理想的楷模，并为这些君主冠以“霸主”的名号。可无论这样的选择出于何种理由，一旦筛选的标准脱离了历史的本来情境，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就经不起推敲。由此而产生的所谓“春秋五霸”，自然与春秋时期真实存在的霸业秩序毫无关联了。

春秋战国是一个大破大立的时代，十年韶华便是前尘一世，整个社会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个板荡的时代里，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面前，无论是国君还是平民，是忠贞还是奸佞，是宽让还是偏执，是犹豫还是果决……所有人都如同蝼蚁一般，注定要被潮流裹挟而无法自主。

乱花渐欲迷人眼，沧桑巨变总会让人感到眼花缭乱，也很容易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困惑。

孔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霸业秩序崩塌后的时代，他为中原的乱象感到痛心疾首，希望能够通过“克己复礼”来恢复文王武王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司其职的昌盛局面。他有着柏拉图一样的理想，希望建构一个理想国，希望统治这个国家或者天下的，是一个具备了诸多美好特质的人，一个如“哲学王”一样的圣人。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他看来，只要上位者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认真磨炼自己的道德品质，并身体力行地通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方式教育和感化百姓，国家就能够走向大治。这对统治者

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要求他们必须修炼自己的一颗“仁”心，用忠恕之道立身处世而不能随波逐流。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样的政治理想毕竟太过于浪漫了，如三皇五帝那样的上古圣君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现实生活中只有如齐景公、卫灵公那样满是缺点的普通人。这就使得他的政治理想从一开始就缺乏植根的土壤，更遑论去改变现实世界了。

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停下脚步，时代的航船也不会因为谁的一厢情愿而改变航向。一个以兼并逻辑主导的新时代，终究还是伴随着战场上滚动的车轮，碾压着春秋霸主的尸骨粉墨登场。那些无法跟随历史脚步前进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只能被无情地淘汰。只有那些逆流而上敢于革新求变的人，才能真正立于潮头之上，成为引领时代的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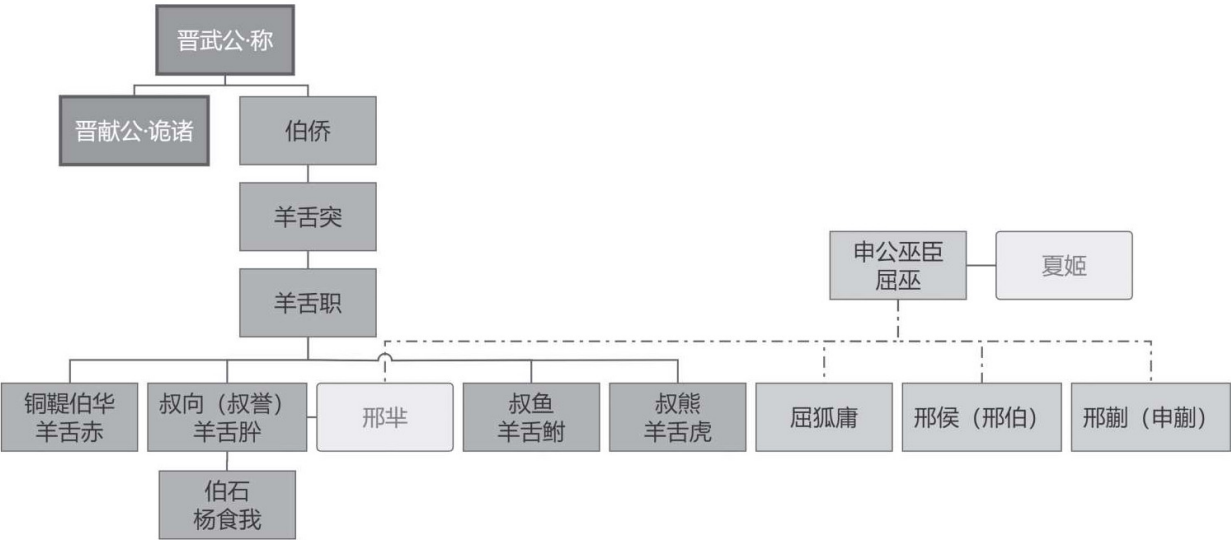
尽管在这数百年的激荡中，能够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不是坐享了荣耀和财富的贵族，就是在重要历史事件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英雄人物或者奸佞小人，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一股神秘的力量。政治变革的成功与失败，霸业秩序的形成与衰亡，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停滞，君主权威的衰落与强化，家国势力的兴盛与灭亡……无不受到这股力量的强烈推动，历史的车轮也正是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发出了隆隆的回响。

那些在史书上留下了姓名的人物，无论是取得了霸业的齐桓公、晋文公，还是篡夺君权的三晋和田氏，他们的存在固然可以让历史叙事变得多姿多彩，但只有当个人的选择顺应了这股力量演进的方向，其孜孜以求的功业才能够得以圆满，其不断探求的理想才能够得以实现。而这股力量真正的源泉，正来自那些行走在崎岖道路中的商旅，来自耕耘在苍茫土地上的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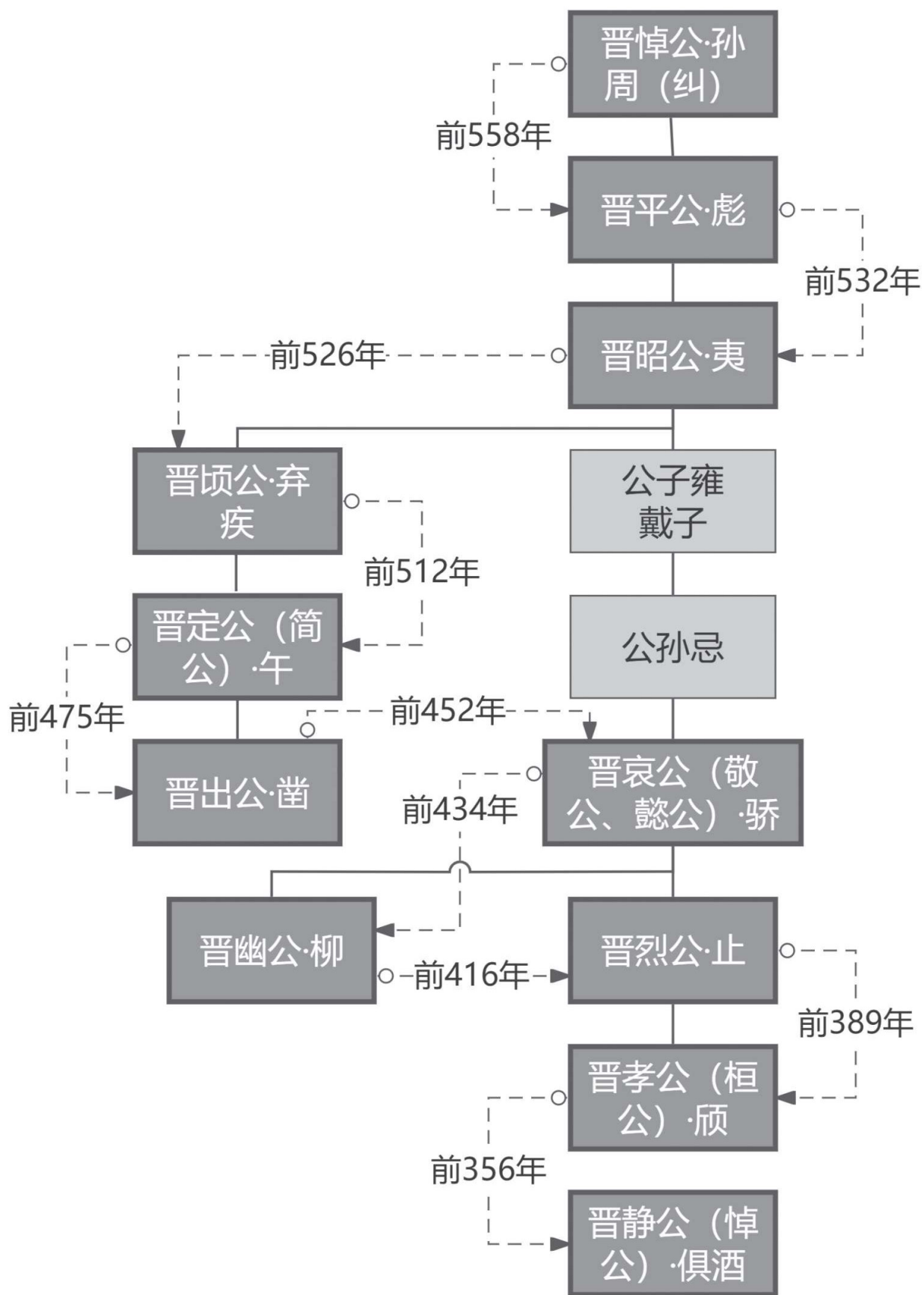
来自挥汗于炙热高炉前的匠人，来自无数个没有留下任何音信的百姓，更来自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每一个人.....

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Shu分享更多搜索'雅书）

附录



附图3-1 晋国公族羊舌氏及半姓邢侯家族人物关系示意



附图6-1 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晋国君主世系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1. [晋国600年1：周礼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2. [第一章 从桐叶传说到曲沃代翼](#)
3. [第二节 文侯始兴](#)
4. [第三节 曲沃代翼](#)
5. [第二章 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6. [第二节 辟土服远](#)
7. [第三节 假道伐虢](#)
8. [第三章 “国无公族”制度的成型](#)
9. [第二节 风波初起](#)
10. [第三节 父子离心](#)
11. [第四节 骊姬之乱](#)
12. [第五节 祸起何处](#)
13. [第四章 “五世昏乱”与“秦晋之好”](#)
14. [第二节 惠公当国](#)
15. [第三节 韩原之战](#)
16. [第四节 惠公之惠](#)
17. [第五章 晋文公流亡之路与称霸前的列国局势](#)
18. [第二节 中原乱象](#)
19. [第三节 周游列国](#)
20. [第四节 终成夙愿](#)
21. [第六章 周礼保守主义的复兴和晋文公改革](#)
22. [第二节 问诊国策](#)
23. [第三节 渐进改革](#)
24. [附录](#)
25. [晋国600年2：中原霸权的兴盛与衰落](#)
26. [第一章 城濮之战与践土会盟](#)
27. [第二节 城濮之战](#)
28. [第三节 践土会盟](#)
29. [第四节 重整山河](#)

30. [第二章 “秦晋之好”神话的彻底破灭](#)
31. [第二节 穆公幻灭](#)
32. [第三节 夷董之](#)
33. [第四节 再起波澜](#)
34. [第三章 晋国的中原霸业中衰](#)
35. [第二节 问鼎中原](#)
36. [第三节 战云密布](#)
37. [第四节 两棠之役](#)
38. [第四章 齐楚联盟对晋国的挑战](#)
39. [第二节 晋齐首战](#)
40. [第三节 信任危机](#)
41. [第五章 从第一次弭兵会盟到鄢陵之战](#)
42. [第二节 联吴制楚](#)
43. [第三节 战云纷飞](#)
44. [第四节 鄢陵之战](#)
45. [第六章 从悼公复霸到第二次弭兵会盟](#)
46. [第二节 疲楚复霸](#)
47. [第三节 晋齐争锋](#)
48. [第四节 弭兵终战](#)
49. [附录](#)
50. [晋国600年3：封建危机的形成与爆发](#)
51. [第一章 嬴姓赵氏在晋国的兴起](#)
52. [第二节 冬日之日](#)
53. [第三节 夏日之日](#)
54. [第二章 世卿世禄制的形成与危机](#)
55. [第二节 世卿世禄](#)
56. [第三节 景公治政](#)
57. [第三章 下宫之役探微](#)
58. [第二节 下宫之役](#)
59. [第三节 景公之死](#)
60. [第四章 车辕之役与晋厉公之死](#)
61. [第二节 三郤之罪](#)
62. [第三节 大预言家](#)
63. [第四节 内乱之源](#)
64. [第五章 晋国诸卿利益格局重组](#)
65. [第二节 世卿联盟](#)

- 66. [第三节 新贵联盟](#)
- 67. [第四节 互助联盟](#)
- 68. [第五节 危机将至](#)
- 69. [第六章 封建制危机全面爆发](#)
- 70. [第二节 固宫之役](#)
- 71. [第三节 晋君少安](#)
- 72. [第四节 大夫多求](#)
- 73. [第五节 英雄迟暮](#)
- 74. [附录](#)
- 75. [晋国600年4：霸业秩序的消亡与重生](#)
- 76. [第一章 晋国霸业的衰落](#)
- 77. [第二节 晋政多门](#)
- 78. [第三节 诸侯皆贰](#)
- 79. [第二章 霸业秩序的合法性危机](#)
- 80. [第二节 无伯之害](#)
- 81. [第三节 霸政危机](#)
- 82. [第三章 六卿瓜分公室与对外扩张的狂潮](#)
- 83. [第二节 公族枝叶](#)
- 84. [第三节 新郑之行](#)
- 85. [第四节 反晋联盟](#)
- 86. [第四章 霸业秩序的最终消亡](#)
- 87. [第二节 季世药方](#)
- 88. [第三节 东阳内乱](#)
- 89. [第四节 霸业终章](#)
- 90. [第五章 晋国历史的终结](#)
- 91. [第二节 历史迷雾](#)
- 92. [第三节 战争复盘](#)
- 93. [第四节 桐叶凋零](#)
- 94. [第六章 霸业秩序的兴与灭](#)
- 95. [第二节 霸业形成机制](#)
- 96. [第三节 晋国霸业的基石](#)
- 97. [第四节 霸业衰亡路线图](#)
- 98. [附录](#)